



斯大林全集

附卷十卷总目录

附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共分为十卷，以飨广大读者。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生平综合篇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早年诗作

诗六首

(1895年—1896年)

致明月(外三首)	3
----------------	---

早晨(外一首)	8
---------------	---

家信家事

致母亲

一 “不要把忧愁放在心上”(1922年4月16日)	12
---------------------------------	----

附录 娜·谢·阿利卢耶娃致叶·格·朱加施维里

(1922年10月21日)	13
---------------------	----

二 “祝你活上一千岁”(1923年2月26日)	14
-------------------------------	----

三 “你是在生我的气”(1929年4月25日)	15
-------------------------------	----

四 “不要失去朝气!”(1934年3月24日)	16
-------------------------------	----

致妻子

附录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8月28日)	18
---------------------------------	----

一 “有什么新闻——写信告之”(1929年8月29日)	19
-----------------------------------	----

二 “真是见鬼了……”(1929年9月1日)	20
------------------------------	----

附录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日)	21
--------------------------------	----

三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1929年9月16日）	23
	附录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24
四	“我将做能做的一切”（1929年9月23日）	27
五	“忘了给你寄钱了”（1929年9月25日）	28
	附录四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7日）	29
六	“我打算一星期后回去”（1929年9月30日）	30
	附录五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10月1日）	31
七	“想去郊外看看孩子们”（1930年6月21日）	32
八	“我等你，别误了归期”（1930年7月2日）	33
九	“写信告诉我一切”（1930年9月2日）	34
	附录六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5日）	35
十	“英语自学课本给我寄来”（1930年9月8日）	36
	附录七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2日）	37
	附录八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9日）	38
十一	“你对我的责怪是不公平的”（1930年9月24日）	39
	附录九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30日）	40
	附录十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10月6日）	41
十二	“是好，还是不好呢？”（1930年10月8日）	42
十三	“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1931年9月9日）	43
	附录十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44
十四	“电工学方面的书收到了”（1931年9月14日）	46
十五	“和基洛夫一起过得很愉快”（1931年9月19日）	47
	附录十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1日）	48
	附录十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6日）	50
十六	“冶金方面的书收到了”（1931年9月29日）	51

与儿女

雅科夫

	关于雅科夫给阿利卢耶娃的便条（1928年4月9日）	53
	附录一 雅科夫被俘后写给父亲的字条（1941年7月19日）	54

附录二 苏联内务部关于雅科夫之死的调查（1946年9月16日）·····	55
瓦西里	
一 关于瓦西里致叶菲莫夫（1933年9月12日）·····	59
附录一、二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1934年9月26日）·····	61
附录三 叶菲莫夫致弗拉西克（1935年9月22日）·····	63
二 关于瓦西里致马尔特申（1938年6月8日）·····	65
附录四 拉·贝利亚致约·斯大林（1938年12月8日）·····	66
附录五、六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1939年11月13日）·····	68
附录七 瓦·约·斯大林的毕业鉴定（1940年3月25日）·····	70
附录八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1941年3月4日）·····	72
附录九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去前线的事宜的报告 （1941年8月26日）·····	74
三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3年5月26日）·····	75
附录十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 截至1945年6月的鉴定书（1945年7月20日）·····	76
附录十一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 健康状况的报告（1950年12月9日）·····	78
斯维特兰娜	
附录一一八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1952年2月10日）·····	79
附录九 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致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91
给“兄弟”	
就“改姓”问题答布洛欣（1924年9月3日）·····	92
附录 布洛欣请求改姓“斯大林”的来信（1924年7月29日）·····	93
谈化名	
“斯大林”的由来（1933年12月25日）·····	96

谈书论文

个人藏书分类表（给图书管理员）	98
和阿利卢耶娃通信中谈到的书（1930年9月—1931年9月）	101
关于阅读康德等人著作致加里宁的信（1933年1月21日）	104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934年8月5日）	105
不能贬低列宁，也不能贬责恩格斯（1934年8月5日之后）	106
还在写萨姆金吗？——致高尔基的信（1930年4月30日）	107
关于《国内战争史》等书的编辑出版（1932年1月28日）	108
《国内战争史》一事比想象的要糟（1933年2月3日）	110
大公鸡对待珍珠粒的态度（1933年7月2日）	111
附录一 美国出版商斯涅威克给托洛茨基的提议 （1922年8月27日）	112
关于斯涅威克提议出版小册子一事（1922年9月8日）	113
附录二 列宁在斯涅威克来信上的批语（1922年9月17日）	114
您一定会得到稿费吧？（1931年12月13日）	115
推荐一本关于心理学基础的书（1940年1月21日）	117
“活一世纪，学一世纪”（1940年11月7日）	118
附录三 与《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瓦维洛夫的谈话 （1949年7月13日）	120

评说影剧

话剧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的艺术形式	125
《26名公社社员》剧本写得苍白无力（1929年6月11日）	126
关于反映“破坏分子”剧本的写作（1930年10月24日）	128
附录一 观看国产影片时的谈话（1934年7月13-14、21日）	129

附录二 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136
--	-----

纵论文化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1922年7月3日)	142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1932年10月26日)	144
建立作家俱乐部一事有必要(1933年3月1-22日之间)	145
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和《列宁格勒》 两杂志问题的讲话(1946年8月9日)	146
附录“斯大林实际上是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1943年)	151

隔离列宁

附录一 中央委员会授权斯大林负责隔离病中列宁 (1922年12月18日)	157
关于列宁病重期间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1922年12月22日)	158
附录二 列宁就斯大林“辱骂”自己妻子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3月5日)	159
对列宁关于“电话冲突”信件的回复(1923年3月7日)	160
关于列宁“要氰化钾”一事(1923年3月21日)	161
关于列宁请求氰化钾致政治局委员(1923年3月21日)	162
我们不应忘却列宁(1941年4月22日)	163

再三请辞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年8月19日)	165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1926年7月22日)	167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1926年12月27日)	168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1927年12月19日)	169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6日）…………… 173

个人崇拜

我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25年1月25日）…………… 176

为什么非要让我来修改你的讲稿——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1月7日）…………… 177

“个人崇拜”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1934年12月）…………… 178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

（1937年1月8日）…………… 179

不要“马—恩—列—斯”（1939年4月26日）…………… 182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1945年11月10日）…………… 184

应当删去“斯大林是‘党的领袖’”等修饰语

——给《真理报》主编的信…………… 185

对《斯大林传略》第1版的批评（谈话记录）…………… 186

传略传闻

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第2版清样作的修改（1947年）…………… 190

附录 斯大林逝世后的个人财产登记表（1953年3月6日）…………… 211

人人获得解放和我自己的别墅

——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213

附录一 美联社记者纳特请求采访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215

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世界

——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来信

（1936年10月26日）…………… 216

附录二 纳特再次致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217

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再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218

预言身后

对身后的预言(1939年) 216

插图

- 一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 2
- 二 斯大林和母亲在一起 11
- 三 娜·谢·阿利卢耶娃 17
- 四 雅科夫、瓦西里、斯维特兰娜 52
- 五 推进苏维埃文化事业 123
- 六 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188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党政建设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五二年

党的建设

关于左翼与右翼共产党员问题——致列宁的信（节选） （1922年11月13日）	3
政治局的一些分歧已经得到了解决——致马吉多夫的信 （1923年11月22日）	5
对全会议程我没有异议——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20日）	6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1926年3月15日）	8
把问题提交书记处会议的意见无法采纳——答复皮达可夫的信 （1926年7月13日）	13
天天检查中央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4月8日）	14
关于秘书处工作的声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10月16日）	15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问题的会议记录（节选） （1937年10月12日）	16

政权建设

- 关于签订对外贸易合同的问题——致纳里曼诺夫的电报
 (1921年9月26日) 20
- 关于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界限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3月10日) 21
-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
 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1922年8月11日) 23
- 关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对列宁的便函的答复
 (1922年9月22日) 25
-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与
 独立共和国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决议的说明
 ——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
 (1922年9月26日) 28
- 对列宁修改决议的建设的意见——答列宁给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9月27日) 30
- 就决议问题在会上交换的便条——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1922年9月28日) 32
- 关于主席团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致莫洛托夫的信(节录)
 (1929年8月21日) 33
- 必须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2日) 34

联盟诸国

- 将出现两个新的苏维埃政府
 (1918年12月17日) 38
- 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白俄罗斯人
 (1918年12月29日) 40

排除 3 名政府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致日卢诺维奇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42
各共和国政府应服从中央委员会——致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43
请通报格鲁吉亚的局势——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21 年 2 月 16 日)	44
查清消除巴斯马奇分子活动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4 月 21 日)	46
谈谈对布哈拉问题的意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4 日)	48
把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2 年 8 月 11 日)	50
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 (1937 年 11 月 7 日)	52
健全法制	
关于拟订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初步计划——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 年 9 月 26 日)	55
关于不对恐怖犯罪分子公开起诉的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 年 6 月 28 日)	57
关于惩处 12 岁以上犯罪儿童的法律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 年 6 月 28 日)	61
对人民公敌的体罚是作为例外允许使用的 (1939 年 7 月 27 日)	63
附录 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释放在押者的报告 (1939 年 12 月 22 日)	65

干部队伍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年3月5日） 67

中层干部决定事业的成败——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37年11月7日） 89

选择领导干部的标准——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0年11月7日） 91

大胆提拔年轻干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1年2月4日） 92

要宽容每个人工作中的小缺点

——同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谈话的片断 93

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问题的会议记录（节录）

（1941年2月21日） 94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年10月16日） 95

清洗肃反

把反党分子清除出去——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9日） 100

维护右倾观点与党员身份不相容——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1月17日） 101

关于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3日） 102

反党派别集团在玩弄政变把戏——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104

对破坏中央指示的犯罪行为不能不闻不问——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2年（不早于6月））	106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7年6月2日）	107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134

宗教政策

对一款有关宗教的条文的意见——给司法人民委员的便函 （1923年7月2日）	139
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的指令信 （1923年8月16日）	140
应保护教堂一类古建筑文物 （1933年9月12日）	142
关于如何对待宗教和教徒问题的决议 （1939年11月11日）	143

宣传阵地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操之过急了——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146
一篇反对销售白酒的杂文引起的风波——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5日）	149
《真理报》任命了临时编委会——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7日）	151
该结束这种荒唐的局面了——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7月29日）	152

你们的建议是错误的——致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9年9月13日)	154
《真理报》编辑部情况不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2月25日)	156

党史教育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年10月1日)	160
--	-----

工作通信

对回应一封短信的建议——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3月7日)	202
谈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节选) (1926年9月16日)	203
再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9月23日)	206
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9日)	208
再谈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底)	210
你们有多少问题尽管提出——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2年6月25日)	212

插图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53
二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137
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	159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国内战争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战后至一九三六年)

军事指挥

不允许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发布命令——致列宁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3
遏制一下托洛茨基让他守规矩——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3日)	5
托洛茨基的不可理解的电报命令 ——致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7
托洛茨基的讲话和命令造成了混乱 ——致斯维尔德洛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5日)	8
总参谋部和野战司令部在为白卫分子工作——致列宁的信 (1919年6月4日)	9
大本营与南方战线已形成不正常关系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19年11月12日)	10
需要的是调去骑兵预备队——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2月4日)	12

高加索方面军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2月20日）	13
关于中央拒绝向南线增派兵力的问题 ——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6月2日）	14
关于西南战线兵力调配的问题——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6月3日）	15
应该撤换总司令——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0年6月14日）	17
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多余的——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6日）	18
关于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命令的传达——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8日）	19
总司令拒绝调派骑兵——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12日）	20
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20年9月23日）	21

各条战线

拉达的回答需要我们的答复——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27日）	25
停止乌克兰内部的战争——致契切林的电报 （1918年5月4日）	27
这里没有中央的全权军事代表——致列宁、托洛茨基的信 （1918年6月22日）	28
察里津正在变成军事行动的基地 ——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电报 （1918年7月11日）	30

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绝对必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33
请提供一封您亲笔签名的信件——致列宁的信 （1918年8月31日）	35
两个星期没有运来任何东西——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7日）	36
关于消灭马赫诺叛军的进展情况——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37
有关高加索战线的兵力部署——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38
关于西南战线的战况——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5月29-30日）	39
就弗兰格尔包围敖德萨的来往电函——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1920年6月4日）	41
弗兰格尔将在秋季之前被完全消灭——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4日）	43
见面谈谈东南地区的事情——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7月27日）	45
查清土耳其斯坦前线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4月21日）	46
关于处理布哈拉问题的意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5月14日）	48

苏波冲突

波兰军队正在彻底崩溃——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13日）	52
抓紧使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2日）	54

党中央请你们再加一把劲——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的电报 （1920年7月23日）	55
我们正在准备进攻——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4日）	56
恢复以师为单位采取行动的旧策略 ——致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电报（摘录） （1920年7月25日）	58
请通报有关同波兰停战的计划——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59
痛打波兰人而别管期限——致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60
总司令想起来要调动兵力已经晚了——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31日）	61
建议中央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调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8月30日）	62

外交斗争

（战时和战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把俄罗斯推入战争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65
关于芬兰局势的来往便条——斯大林、列宁、斯克良斯基 （1919年7月21日）	66
关于援助阿富汗起义者的问题——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67
为阿富汗的反英势力创建一个基地——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69

该好好教训英国的总委员会——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	71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初）	73
目前韩德逊掌握在我们手里——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9日）	74
与敌人谈判就是一种斗争——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77
英国问题处理得确实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	78
卡拉汉和李维诺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9月7日）	79
对“大”国既鄙视又自信——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1月24日）	80
你们关于满洲事件的指示是错误的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35年10月13日）	81
针对日本的照会和运动不能令人满意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5年或1936年）	82
就法国有关建议进行谈判的策略	
——致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6年8月16日）	83

党史节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1918年至1920年）

86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86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91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 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 三个月的喘息时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97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 波兰计划的破产。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102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 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105
	简短的结论	109

插图

一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的手稿	23
二	察里津不能丢	50
三	斯大林在前线	63
四	我们红军，战争中成长	84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经济建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

经济政策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0日）	3
--	---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4月6-11日）	17
---	----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9日）	33
---	----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11日）	66
--	----

计划工作

关于建设新工厂的计划的计划——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12日）	75
--------------------	----

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纳入正轨——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5年7月25日）	77
--------------------	----

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惰性极为有害——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8日）	78
必须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	80
对李可夫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意见 （1928年11月7日）	81
对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 （1928年11月13日）	83
关于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6日）	86
工业10个月总计增长结果不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3日）	88
关于经济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4日）	90
加强计划机关的草案很好——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10日）	93
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棉花缴纳计划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建议 （1934年6月29日）	94
保障棉花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4年8月28日）	96
议了一下1936年的控制数字——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7月21日）	97
关于1936年控制数字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7月28日）	99

农业生产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30年9月2日）	102
---	-----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的讲话（摘录）	
（1935年2月）·····	104
个体农庄不可能排挤集体农庄	
（1939年5月28日）·····	106
棉花生产一定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33年3月21日）·····	107
关于种植烟草致乌拉尔州委的电报	
（1933年6月6日）·····	109
关于改进棉田培土和灌水工作的指示	
（1933年7月18日）·····	110
把灌水工作和夏季耕作正确地结合起来	
——给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指示	
（1935年5月31日）·····	111
关于发展植棉业和留种苜蓿生产的措施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1935年9月15日）·····	113

工业生产

不要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0日）·····	117
催问第聂伯工程一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7日）·····	119
认真关注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120
请特别重视建立新的黑色冶金厂——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3日）·····	121
乌拉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6日）·····	122

需要尽可能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日)	124
我们不能让北方没有石油 ——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年8月19日)	126
关于产品配套运动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日)	127
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2日)	128

粮食收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就粮食收购工作给地方党组织的命令 (1928年1月6日)	13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加强粮食收购措施给地方党组织的电报 (1928年1月14日)	135
附录 有斯大林同志和收购组织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同参加的 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记录) (1928年1月18日)	137
根据刑法打击投机商和富农包买主——致莫洛托夫和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140
粮食收购工作抓得太晚了——致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142
就地制止严重违反粮食价格的现象——致联共(布)中央的电报 (1928年1月20日)	143
完成计划一点不能讲价钱打折扣 ——在巴尔瑙尔、比斯克和鲁布佐夫斯克专区 党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2日)	144

收购工作稍有起色——致柯秀尔和魏策尔的电报 （1928年1月27日）	147
收购工作已经加强——致柯秀尔和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1月29日）	148
收购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致莫洛托夫、柯秀尔、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2月2日）	149
你们的收购计划落后于各地的收购速度 ——致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电报 （1928年2月3日）	150
尽可能快地完成收购和装运任务 ——致米高扬、莫洛托夫、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2月4日）	151
粮食产量基本的需要是够用的——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8年6月10日）	152
对关于粮食收购决定草案的意见——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10日）	154
今年粮食收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156
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改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1日）	157
关于处理维申斯克区问题致肖洛霍夫的函电 （1933年4月16日-5月6日）	159

法制措施

立即开除并审判破坏日用工业品价格的人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16日）	164
关于使用囚犯劳动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7日）	166

对破坏分子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67
工人为什么会向农村倒流——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70
加强对工人的供应和管理工作——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8日)	172
富农自愿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3月11日)	175

对外贸易

关于在东方边境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致契切林的信 (1921年11月22日)	177
关于与法国商人合营出售白金的问题——致列宁的信(摘录) (1922年11月13日)	179
关于在苛刻贷款条件下向美国订货的问题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25日)	181
美国现在是金融领域的主要敌人——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30日)	182
由于新的情况不得不削减进口——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9月24日)	184
我们正面临美国策划的货币金融风暴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31年11月9日)	185
对兰开斯特的贷款应坚持第二个方案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2年6月)	187

插图

一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101
--------------------	-----

二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130
三 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162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论反对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

论托洛茨基

有关就工会问题进行的争论——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1月25日) 3

托洛茨基应先向中央通报列宁文章内容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的声明

(1923年4月16日) 4

有关托洛茨基和46人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23年10月26日) 5

答一张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便条

——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摘录(对问题的答复)

(1923年12月2日) 9

对于谎言和诽谤必须用真相进行反驳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23年12月8日) 11

八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声明

(1923年12月14日) 13

托洛茨基挑起了反对我党主要干部的争论	
——致基洛夫的信	
（1923年12月17日）	22
九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	
（1923年12月31日）	24
托洛茨基的发言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致贝克尔的信	
（1924年3月4日）	42
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伏龙芝、斯大林	
（1924年12月10日）	45
托洛茨基与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的关系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5年6月17日）	46
发表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尤为重要——致“七人小组”	
（1925年8月1日）	53
关于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日）	54
关于与托洛茨基有关的文件的发表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9日）	56
不该反对有关伊斯特缅文件的提案——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8日）	58
有关托洛茨基的两件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4日）	59
党会揭露托洛茨基等人的丑恶嘴脸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6年6月15日）	60
对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	
（1937年11月11日）	62

论季诺维也夫

你们看来真要准备决裂——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65
政治局的工作程序和一些问题的决策过程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7日)	66
季诺维也夫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69
务必清算季诺维也夫的严重错误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72
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的信 (1926年6月25日)	74
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职务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0日)	77
关于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案件的处理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6月23日)	79
坚决抗议让季诺维也夫担任《真理报》常任编辑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80

论加米涅夫

关于解除加米涅夫职务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日)	84
---	----

加米涅夫不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了——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2月23日)	86
附录 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	
(1928年7月11-12日)	88
加米涅夫向英德美大使进行了政变试探	
(1936年8月23日)	94

论布哈林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一)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1929年1月30日)	96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二)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1929年2月9日)	120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关于《笔记》事件来信的答复草案	
(1929年3月14日)	135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三)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未经修订)	
(1929年4月22日)	138
布哈林正在堕落下去——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21日)	201
共产国际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写得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23日)	203
应当考虑将布哈林赶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0月7日)	204

论李可夫

- 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致莫洛托夫等的信
(1929年9月30日) 206
- 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声明”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29年11月13日) 208
- 应当把李可夫及其一伙赶走——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5日) 220

斗争动态

- 他们想在英国的问题上捞一把——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6月2日) 224
- 分发反对派的文件是不利的——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16日) 225
- 反对派加紧了派别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27年9月23日) 226
- 应该分发“劳动农民党”案的供词——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日) 228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信
(1936年9月25日) 229
- 叶若夫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231

插图

- 一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82
- 二 反对派的首领们 222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1
---------------	---

卫国战争篇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〇年

战前绸缪

苏联对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态度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3

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

（1939年9月7日） 7

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1940年1月21日） 9

对苏芬战争中苏联军队的评价

（1940年3月28日） 11

关于签订苏-保互助条约的建议

（1940年11月25日） 13

我们已经有400万人的军队做好了战备

（1941年2月4日） 15

德国军队并非战无不胜

（1941年5月5日） 17

在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简要记录）

（1941年5月5日） 19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的三次讲话 (1941年5月5日)	26
--------------------------------------	----

对德关系

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致希特勒电 (1939年8月21日)	30
莫洛托夫先生同意回访柏林——致里宾特洛甫的信 (1940年10月22日)	31
对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指示 (1940年11月9日)	32
在对德签约时删除关于印度的条款——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35
同德国协议已告完结一句说得不准确——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36
与希特勒谈判的方针——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37
与希特勒谈判的策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38
希特勒主要想干的是进攻苏联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40年11月18日)	39

战争开始

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了 (1941年6月22日)	43
关于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1941年6月30日)	45
关于组织斯摩棱斯克保卫战的第2号命令 (1941年7月16日)	47

关于改组方面军和调整红军指挥人员的决定	
(1941年7月29日)	48
“当家的”，好心情	
(1941年9月8日)	50
国防委员会关于撤离莫斯科的决定	
(1941年10月15日)	51
“今天您就必须撤退！”	
(1941年10月15日)	52
关于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1941年10月19日)	53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关于破坏靠近前线地带居民点的命令	
(1941年11月17日)	55

艰难应战

你违背了斯大林讲话的指示精神——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0日)	58
等待你们的将是对怕死鬼和逃兵的严惩——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1日)	60
应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了	
——与西方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7月20日)	61
通过朱可夫向红军骑兵司令传达的命令	
(1941年7月21日)	62
各部队必须与方面军保持经常联系——与沙波什尼科夫的谈话	
(1941年7月26日)	65
关于西方面军防御准备工作的情况——与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8月2日)	68
要学会自己供应和补充自己	
(1941年8月5日)	70

苏英之间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一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6日)	74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二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7日)	86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三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8日)	94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四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20日)	100
向丘吉尔转达我对他的信函的答复——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107
对英国人提出加紧提供歼击机和坦克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108
尽快签订条约并在这之后去美国——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09
你应当在返途中在伦敦停留——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10
对艾登的草案不要再作任何修正——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5日)	111
同意你对第四条条款的修正——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6日)	112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1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1日)	113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摘录)	
(1943年10月21日)	117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2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7日)	119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摘录）	
（1943年10月27日）	128
关于欧洲战后安排的问题	
——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记录	
（1944年10月17日）	130

战局转折

关于组建机械化军的指示	
（1942年1月3日）	137
国防委员会关于有关人员责任范围的决定	
（1942年2月4日）	138
您的立场非常方便但糟糕透顶——给梅赫利斯的电报	
（1942年5月8日）	139
关于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连的指示	
（1942年7月4日）	140
关于修改“指环”计划的指示	
（1942年12月28日）	141
给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的指示	
（1943年1月4日）	142
希特勒失去了所有经验丰富的将军——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943年2月4日）	143
关于五个方面军坦克部队建制的指示	
（1943年5月14日）	146
关于被围希特勒军队突围一事——致朱可夫的电报	
（1944年2月12日）	147

苏美之间

要搞清楚“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28日）	149

三国首脑午餐会时的谈话记录（续）

- （1943年11月30日） 150
-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同罗斯福的会谈记录
（1943年12月1日） 154
- 雅尔塔会议开幕前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4日） 157
- 就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8日） 161
- 柏林会战前夕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电报
（1945年4月1日） 166

波兰问题

关于旅美波兰侨民对苏联的态度

——与奥尔列曼斯基的谈话记录

- （1944年4月28日） 168

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记录

- （1944年8月9日） 175

与丘吉尔关于波兰问题的谈话记录

- （1944年10月14日） 180

同丘吉尔关于波兰等问题的会谈记录

- （1945年2月10日） 184

关于波兰的局势——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节选）

- （1945年4月15日） 190

苏法之间

会见法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柏蒂的谈话记录

- （1943年9月15日） 193

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第一次会谈的记录

- （1944年12月2日） 198

同戴高乐共进早餐时的谈话	
(1944年12月3日)	208
同戴高乐第二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6日)	211
同戴高乐第三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8日)	221

战后世界

附录 原子弹、原子弹……	
(1945年7月-1949年8月)	231
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谈记录	
(1946年7月23日)	234
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见	
(1950年5月15日)	240

插图

一 广播演说	46
二 必胜信念	72
三 三巨头会	145
四 胜利喜悦	229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中国革命篇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五一年

签署中央政治局决定

1、就同中国谈判的原则致越飞电 ^① (1922年8月31日)	3
2、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帝斗争的政策 (1923年1月4日)	5
3、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 (1923年3月8日)	7
4、弄清楚越飞对张作霖建议的看法 (1923年3月26日)	9
5、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1923年8月2日)	10
6、拨款50万金卢布援助孙逸仙 (1924年1月24日)	11
7、由伏龙芝负责实施援助计划 (1924年3月20日)	12
8、关于批准与中国的协定问题 (1924年7月24日)	13
9、致函国民党吊唁孙逸仙逝世 (1925年3月13日)	14

① 标题仅为文件重点内容，全部内容请查阅全文。——本书制作者注

10、在中国建立两所军事学校 (1925年3月13日)	15
11、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5年3月19日)	17
12、正式决定建立中山大学 (1925年4月2日)	18
13、责成加拉罕开始同张作霖谈判 (1925年4月2日)	19
14、帮助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 (1925年5月7日)	21
15、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 (1925年5月15日)	23
16、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1925年6月11日)	24
17、增加全俄工会电汇上海的款项 (1925年6月18日)	27
18、推进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 (1925年6月25日)	28
19、责成中国委员会作出综合报告 (1925年8月13日)	30
20、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1925年8月22日)	31
21、批准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的预算 (1925年9月17日)	32
22、补充拨款为中共组织军政训练班 (1925年9月17日)	33
23、促使中国当局颁布工会合法化的法律 (1925年9月24日)	35

-
- 24、 责成加拉罕提出关于中国的总报告
 (1925年10月15日) 36
- 25、 在最短期限内向中国提供武器
 (1925年10月22日) 37
- 26、 基本上采纳伏龙芝来信的建议
 (1925年10月29日) 39
- 27、 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
 (1925年11月5日) 42
- 28、 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
 (1925年12月3日) 43
- 29、 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
 (1925年12月3日) 45
- 30、 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中国局势
 (1926年1月7日) 47
- 31、 紧急向中国派出使团
 (1926年1月14日) 48
- 32、 保护苏联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
 (1926年1月21日) 49
- 33、 向拉萨派驻苏联非官方代表处
 (1926年1月21日) 50
- 34、 刊登塔斯社关于满洲冲突的报道
 (1926年1月25日) 51
- 35、 关于中东铁路可以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
 (1926年1月28日) 53
- 36、 起草就满洲事件告全体劳动者书
 (1926年2月4日) 54
- 37、 消除中东铁路某些员工的沙文主义情绪
 (1926年2月11日) 56

-
- 38、说服国民党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2月18日) 59
- 39、同胡汉民讨论建立高等军事学校问题
(1926年3月11日) 60
- 40、解除中东铁路搞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负责人职务
(1926年3月18日) 61
- 41、关于对满洲和日本政策问题的建议
(1926年3月25日) 63
- 42、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年3月25日) 65
- 43、通过专门委员会关于日本和满洲问题的建议
(1926年4月1日) 66
- 44、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1926年4月1日) 68
- 45、不希望广州军队进行军事远征
(1926年4月15日) 78
- 46、要求张作霖保证我驻北京代表机构的安全
(1926年4月22日) 82
- 47、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
(1926年4月29日) 84
- 48、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
(1926年5月6日) 86
- 49、关于国民军代表同张作霖谈判问题
(1926年5月6日) 87
- 50、对同张作霖谈判拟定的指示
(1926年5月13日) 88
- 51、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
(1926年5月20日) 90

-
- 52、弄清冯玉祥在返回军队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1926年5月27日) 92
- 53、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北伐问题
(1926年8月5日) 95
- 54、将加拉罕正式从中国召回
(1926年10月14日) 97
- 55、目前主要军事危险是奉系军队
(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 99
- 56、对广州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
(1926年10月29日) 103
- 57、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学生的建议
(1926年11月4日) 106
- 58、远东局对发动武装起义采取了轻率态度
(1926年11月11日) 107
- 59、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
(1926年11月18日) 109
- 60、加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25日) 111
- 61、通过罢工加强工会和党组织对群众的领导
(1926年12月2日) 113
- 62、成立审查中国开支账目的检查委员会
(1926年12月16日) 115
- 63、在城市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斗争是错误的
(1926年12月23日) 117
- 64、中山大学必须服从中央鼓动宣传部的领导
(1926年12月30日) 119
- 65、日本必须放弃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政策
(1927年1月6日) 121

-
- 66、调解鲍罗廷和加伦之间的误解和摩擦
(1927年1月27日) 123
- 67、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
(1927年2月5日) 124
- 68、责成苏联商船队派船去广州
(1927年2月10日) 126
- 69、英国推行干涉和恐吓政策必遭失败
(1927年2月17日) 127
- 70、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都不能容许
(1927年2月17日) 130
- 71、在宁夏或其他地点建立电台
(1927年2月24日) 132
- 72、目前中国革命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
(1927年3月3日) 133
- 73、应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
(1927年3月10日) 136
- 74、真正捍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1927年3月24日) 139
- 75、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
(1927年3月31日) 141
- 76、对逮捕苏联公民搜查使馆人员住所提出抗议
(1927年4月7日) 144
- 77、召回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苏联顾问
(1927年4月21日) 147
- 78、不能建议汉口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
(1927年4月27日) 149
- 79、在作出特别决定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
(1927年4月30日) 151

-
- 80、采取紧急措施、保守工作机密
 (1927年5月12日) 153
- 81、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5月13日) 155
- 82、驳斥托季反对派对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攻击
 (1927年5月19日) 157
- 83、重新审议中山大学的教师组成人员
 (1927年5月19日) 161
- 84、不得向武汉和上海发出密电和指示性电报
 (1927年5月26日) 163
- 85、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是可行的
 (1927年8月11日) 165
- 86、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
 (1927年8月18日) 168
- 87、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
 (1927年8月25日) 171
- 88、同意派同志去中国工作的建议
 (1927年9月1日) 173
- 89、最好让陈独秀来莫斯科
 (1927年9月15日) 174
- 90、我们与冯[玉祥]的关系早已结束
 (1927年9月22日) 176
- 91、警告中共防止过去的国民党员加入中共
 (1927年9月29日) 178
- 92、向孙逸仙大学提出逐步共产主义化的任务
 (1927年10月6日) 180
- 93、要采取措施建立苏维埃
 (1927年10月6日) 181

94、不支持在华北交战的任何一方	
(1927年10月13日)	183
95、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将力量分散	
(1927年10月27日)	184
96、采取措施保护我国在华公民和机关	
(1927年12月6—17日)	186
97、对于广州事件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1927年12月6—17日)	187
98、就中国事变制定整个活动的纲领	
(1927年12月22日)	188
99、赞同孙逸仙大学清洗右派国民党员的工作	
(1927年12月29日)	189
100、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必然的伴侣	
(1927年12月29日)	191
101、去北京商谈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	
(1928年1月5日)	193
102、同意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1928年2月23日)	195
103、审议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的问题	
(1928年3月1日)	196
104、把将中国人逐出苏联降到最低限度	
(1928年3月15日)	197
105、拨给中方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全部预计利润	
(1928年3月15日)	198
106、米夫参加中国委员会和蒙古分委员会	
(1928年3月22日)	200
107、清洗军事院校中国学员中的国民党分子	
(1928年3月22日)	201

-
- 108、同意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作出调整
 (1928年4月19日) 206
- 109、指示苏联[驻华]机构所有人员留在原地
 (1928年5月17日) 208
- 110、在孙逸仙大学集中培训中国工作人员
 (1928年5月24日) 209
- 111、我驻华代表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
 (1928年6月14日) 211
- 112、对搜查苏联驻华领事馆提出抗议
 (1928年6月21日) 213
- 113、斯大林因负担过重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928年6月28日) 214
- 114、给中国共产党拨6个月经费34万卢布
 (1928年7月26日) 215
- 115、鲍罗廷在在华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
 (1929年5月23日) 216
- 116、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
 (1929年10月15日) 217
- 117、三所共产主义大学不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930年1月25日) 219
- 118、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30年2月15日) 220
- 119、成立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撤校工作委员会
 (1930年4月5日) 221
- 120、研究接受中国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的办法
 (1930年4月5日) 222
- 121、对沙文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30年5月15日) 223

- 122、军事学习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游击队人员
 (1930年6月15日) 226
- 123、关于南京人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1932年6月16日) 228
- 124、不侵犯条约可在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解决
 (1932年12月10日) 229

致中央领导成员函电

- 一、转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问题的答复
 ——致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一封信
 (1926年2月16日) 231
- 二、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23日) 235
- 三、关于给中国汇款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4日) 236
- 四、我担心, 武汉会胆怯, 屈从于南京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 237
- 五、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与退出国民党联系起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8日) 239
- 六、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7年7月9日) 240
- 七、我们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1日) 244

八、匆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印象不好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6日）	245
九、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	246
十、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摘录）	
（1930年8月13日）	247
十一、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①	
（1931年9月23日）	248

关于中国革命的讲话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	
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251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27年9月27日）	262
附录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谈话的记录	
（1928年6月9日）	264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年11月11日）	269
同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年11月—1942年3月）	272
关于印度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	
（1951年2月9日）	276

附录 物质援助中国共产党

- 1、请转运货物给八路军使用
 - 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
(1939年1月8日) 282
- 2、寄给你们一个贵重的包裹
 -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7月28日) 283
- 3、钱交给了亲密的朋友们
 - 普罗斯库洛夫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8月22日) 284
- 4、要求大规模组织医疗援助
 - 任弼时等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9月8日) 285
- 5、寄去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包裹
 -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9月21日) 286
- 6、要求为军事学校提供技术装备和教员
 - 周恩来和任弼时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10月3日) 287
- 7、要求为八路军和中共干部医院筹集资金和人员
 - 季米特洛夫致安德烈耶夫信
(1940年1月13日) 289
- 8、要求青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
 - 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致周恩来和任弼时电
(1940年1月29日) 291
- 9、收到无线电器材若干
 -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年2月8日) 292

目 录

- 10、需要 30 万人的防流行病药剂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2 月 24 日) 293
- 11、无线电发报机等已给你们发出
——季米特洛夫致周恩来电
(1940 年 4 月 23 日) 294
- 12、在你们那里积压了大量重要包裹和材料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
(1940 年 7 月 16 日) 295
- 13、规定给我党的款项短缺 87410 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8 月 10 日) 296
- 14、寄回英镑，请寄给我们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11 月 26 日) 297
- 15、可以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0 年 11 月 27 日) 298
- 16、两笔美元和 6 箱各种器材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2 月 17 日) 299
- 17、请拨给我们今年款项总额 1 百万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5 月 16 日) 300
- 18、你们的人拒绝接收书籍等物资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1 年 5 月 21 日) 301

- 19、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 100 万美元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4 号记录（摘录）
（1941 年 7 月 3 日） 302
- 20、为给毛泽东治病急需以下药品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8 月 7 日） 303
- 21、上一份电报中药品名称不全准确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8 月 13 日） 304
- 22、寄去 60 万（美元）请确认收到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1 年 9 月 5 日） 305
- 23、35 箱物资和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13 日） 306
- 24、我们决定建立情报部需 50 万美元等援助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29 日） 307
- 25、寄重庆周恩来的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 年 1 月 13 日） 308
- 26、你们收到的款项是 100 万元援助的一部分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2 年 1 月 17 日） 309
- 27、能否寄来我们需要的全套药品和器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 年 4 月 8 日） 310

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

关于 1945 年 4 月时中国的局势

——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节选）

（1945 年 4 月 15 日） 312

附录一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国共谈判问题

（1945 年 9 月 6 日） 318

附录二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国共谈判和
中国政治、军事形势

（1945 年 10 月 10 日） 322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与中共关系等问题

（1945 年 12 月 30 日） 326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关于东北形势等问题

（1946 年 1 月 3 日） 342

答复蒋介石的来信

（1946 年 1 月 4 日） 354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有关中国共产党近期工作的情况

（1946 年 1 月 7 日） 355

附录四 联共（布）中央：毛泽东可随时前来莫斯科

（1947 年 6 月 15 日） 357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篇目

（1918 年—1927 年） 360

附录 朝鲜支援中国解放战争

朝鲜党和人民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支援

（1945 年—1949 年） 363

插图

一 上海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 105

二 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旧址 210

三 宁汉合流，汪精卫叛变 238

四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 359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苏中关系篇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访苏周折

附录一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6月15日)	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前景 (1948年4月20日)	4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访苏及其计划 (1948年4月26日)	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 (1948年4月29日)	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延缓来访时间 (1948年5月10日)	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延缓对苏联的访问 (1948年5月10日)	1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年7月4日)	11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请毛泽东改变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13
附录五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延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14
附录六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15

附录七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年7月28日)	17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1948年9月28日)	1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19
附录九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20
附录十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22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年11月21日)	2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几天访苏是正确的 (1948年11月23日)	24
附录十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1949年1月9日)	25
联合政府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2月30日)	2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2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联合政府可能在春季建立 (1949年1月10日)	30
和谈风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美国人授意南京政府提出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0日)	3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1949年1月11日)	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南京政府的备忘录原件	
(1949年1月11日)	35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2日)	37
附录二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反对参加任何谈判	
(1949年1月13日)	3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抓住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	
(1949年1月14日)	40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4日)	4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1949年1月15日)	44
附录四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 复函草案及正式答复	
(1949年1月17日)	45
西柏坡行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年1月17日)	4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	
(1949年1月23日)	49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代表是米高扬	
(1949年1月28日)	50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1月28日)	52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转告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年1月28日)	53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	
(1949年1月28日)	54

附录四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5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年2月2日)	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应努力尽快夺取大城市	
(1949年2月3日)	5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国民党正在偷运国有黄金和贵重物品	
(1949年2月3日)	60
附录五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	
(1949年2月4日)	61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	
(1949年2月4日)	62

助建政府

附录一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	
(1949年2月4日)	6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1949年2月7日)	65
斯大林转达毛泽东：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已停止活动	
(1949年2月16日)	6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	
(1949年4月19日)	68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陈云电：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	
(1949年4月26日)	7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建立新政府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1949年5月26日)	71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	
(1949年6月12日)	7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	
(1949年6月18日)	76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 （1949年6月27日）	77
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的批注：中共建国的大政方针 （1949年7月4日）	82
附录三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 （1949年7月6日）	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 （1949年9月12日）	100
附录四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 （1949年9月19日）	101

出版毛著

附录一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日）	104
斯大林致中共中央电：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2日）	105
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您的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1949年12月16日）	106
附录二 毛泽东、尤金致斯大林电：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情况 （1950年10月4日）	107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 毛泽东的《实践论》 （1950年12月10日）	11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尤金再次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11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 （1951年9月30日）	11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兼职“毛选” 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113

中共建国

- 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新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116
- 苏联政府声明：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117
-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118
-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
斯大林肖像越好
(1949年10月11日) 119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
顾问赴中国
(1949年10月14日) 120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
提供帮助
(1950年11月6日) 121

缔结盟约

- 附录一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123
-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苏中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
等问题
(1949年12月16日) 125
-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
大连等问题
(1950年1月22日) 131

附录二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 文件草案 （1950年1月22日）	137
附录三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141
附录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的草案	143
附录五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 （1950年2月15日）	145

友好往来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关于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3日）	14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会议决议：同意中国党务工作者 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4日）	15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 （1950年4月8日）	1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 （1950年5月3日）	15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准许苏联电影用汉语等 多种语言配音 （1950年5月23日）	15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团工作人员 来苏学习 （1950年11月13日）	154
附录 联共（布）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 （1950年11月22日）	155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 （1951年1月9日）	15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 （1951年3月14日）	15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 五一节活动 （1951年3月24日）	158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延长部分苏联人员在华 工作期限 （1951年3月28日）	15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 （1951年4月18日）	16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 （1951年5月8日）	16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 文艺演出 （1951年5月10日）	16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 展览会 （1951年5月16日）	16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 代表团访苏期限 （1951年5月17日）	165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 参加夏令营 （1951年5月26日）	16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准许部分中国学生 回国度假 （1951年6月11日）	16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 电影放映设备 （1951年6月13日）	16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对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 错误问题的处理 （1951年6月23日）	17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周年 （1951年6月26日）	17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 在华期限 （1951年6月28日）	17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 （1951年8月2日）	17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人来苏学习 （1951年8月4日）	17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 （1951年8月7日）	17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 访问苏联 （1951年8月13日）	178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 （1951年8月14日）	17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巩固民族 和平”国际奖 （1951年8月16日）	18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杜绝在华专家在生活方面 的多余开支 （1951年8月20日）	181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消除在华专家滥用中方
服务设施的现象
（1951年9月1日） 182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两部
苏联电影
（1951年8月23日） 183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
（1951年8月28日） 184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年9月24日） 185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
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187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出差
（1951年9月29日） 188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
访问苏联
（1951年10月2日） 189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
《金星英雄》
（1951年10月4日） 190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192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参加五一节活动
（1952年3月21日） 194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在新疆的苏联公民
受到挑衅的问题
（1952年3月31日） 195

经济互助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多项援助 （1950年1月6日）	197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1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 （1950年12月3日）	199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 （1951年5月26日）	20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 代表处 （1951年5月30日）	20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方缩减中苏船舶公司 经营期限的建议 （1951年6月2日）	20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 苏方董事 （1951年8月25日）	20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失误的问题 （1951年8月29日）	205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的不足 （1951年9月1日）	20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克服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工作中的缺点 （1951年9月6日）	20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 航空拍摄	
（1951年9月22日）	20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年10月7日）	210
附录一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212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年1月28日）	213
附录二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214
附录三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216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217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21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年3月15日）	219
附录四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备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220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2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4月2日）	224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第一部分）：关于援建中蒙铁路、 军事工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2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关于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等问题	
（1952年9月3日）	233

橡胶生产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请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243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2日）	24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代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245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8月17日）	2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248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 （1951年9月16日）	2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是否赞同朱德组建中苏橡胶股份 公司的建议 （1952年3月15日）	251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 橡胶不太合适 （1952年3月28日）	252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橡胶种植及苏方向中国提供设备和 专家的清单 （1952年3月28日）	2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树协议及有关物资供应等问题 （1952年4月4日）	255

军事合作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 （1950年1月8日）	258
-------------------------------------	-----

斯大林致中国领导人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	
(1950年7月13日)	25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向中国派遣防空和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261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7日)	26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26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2日)	264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26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一事	
(1951年5月26日)	26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提供60个师武器装备的问题	
(1951年6月24日)	2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的问题	
(1953年1月15日)	269

旅顺撤军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苏联可以应中国政府的 请求从旅顺撤军	
(1949年12月16日)	27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雅尔塔协定——那就 见它的鬼吧！	
(1950年1月22日)	273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 旅顺港地区	
(1952年3月28日)	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

提出论据

（1952年4月2日） 277

附录一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 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278

附录二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 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279

外交协调

斯大林致苏驻捷大使电：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

（1950年8月27日） 28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政府任命

张闻天为大使

（1951年3月16日） 28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284

附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

（1951年5月7日） 28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关于朝鲜停战、联合国、

对日关系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87

附录

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94

二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296

三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中国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病情
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298

插图

- 一 斯大林和米高扬在一起 51
- 二 毛泽东阅读斯大林著作 109
- 三 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44
- 四 中国观众争睹《金星英雄》 191
- 五 旅顺口苏军烈士纪念碑 275
- 六 1953. 3. 5, 斯大林与世长辞 299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朝鲜战争篇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战前朝鲜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 (1947年12月31日)	3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同意苏联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 (1948年10月12日)	8
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纪录：关于经济和文化援助 (1949年3月5日)	9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苏联海军暂留朝鲜的决议 (1949年3月18日)	17
斯大林致苏驻朝大使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19
斯大林与金日成谈话纪录：关于经济计划和文化交流 (1950年4月10日)	20
附录三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 (1950年5月14日)	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同盟条约 (1950年5月16日)	26

三八线上

附录一 华西列夫斯基等关于三八线形势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4月20日)	28
附录二 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通报金一与毛泽东会谈情况 (1949年5月15日)	30
附录三 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取瓮津半岛的报告 (1949年9月3日)	3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关于朝鲜问题来电的答复 (1949年11月5日)	3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朝鲜问题 (1950年1月30日)	34
附录四 伊格纳季耶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朝鲜大使李周渊的情况 (1950年4月10日)	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军事器材、金日成访苏等事 (1950年5月3日)	36
附录五 什特科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的谈话 (1950年5月12日)	38
附录六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想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说明 (1950年5月13日)	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的条件 (1950年5月14日)	41
附录七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转上级电：关于朝鲜开始进攻时间 (1950年5月30日)	42
附录八 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上级赞成您的建议 (1950年6月1日)	45
附录九 朝鲜外务省通报：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发起突然进攻 (1950年6月26日)	46

战局初开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朝鲜战局的几个问题 (1950年7月1日)	48
--	----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是正确的 （1950年7月5日）	49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朝鲜人民军必须重视补充兵员 （1950年7月6日）	50
附录一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谈苏联顾问和中国代表等事 （1950年7月8日）	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 （1950年7月8日）	53
斯大林致驻朝大使电：建议朝鲜驳斥美国诬蔑人民军虐待战俘 （1950年7月13日）	54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驳回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1950年7月13日）	5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英国无理要求和安排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7月13日）	56
斯大林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回信 （1950年7月15日）	58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对朝鲜人民军作战问题的建议 （1950年8月28日）	59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同意与美方接触的决议 （1950年9月27日）	62
斯大林给马特维耶夫和什特科夫：关于扭转朝鲜作战局势的指示 （1950年9月27日）	6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对朝鲜作战局势的处理意见 （1950年10月1日）	66

中国出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 （1950年10月1日）	69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1950年10月3日）	7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1950年10月5日)	73
附录二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的态度和顾虑	
(1950年10月7日)	75
斯大林致金日成信：中国表示过一些时候再出兵	
(1950年10月8日)	78
附录三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	
(1950年10月13日)	80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决定援助朝鲜，暂缓部队向北撤退	
(1950年10月14日)	82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的最后决定	
(1950年10月14日)	83
军事援助（上）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8日)	8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87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留下苏联顾问整编朝鲜部队问题	
(1950年11月1日)	88
附录二 金日成致斯大林信：请求留下苏联顾问培训部队	
(1950年11月2日)	8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供应步兵武器装备	
(1950年11月7日)	9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您关于加强空军的建议	
(1950年11月15日)	91
附录五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抽调苏军汽车事宜	
(1950年11月17日)	92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提供500辆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93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培训朝鲜飞行员的问题	
（1950年11月20日）	94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军事贷款支付差额问题	
（1951年1月14日）	95

相互支援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感谢朝鲜提供铅，将满足朝所需装备	
（1950年3月18日）	98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致周恩来电：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	
（1950年11月9日）	99
斯大林签署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在苏朝鲜籍大学生去中国东北	
（1950年11月28日）	10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帮助朝鲜恢复铅工业生产的问题	
（1951年2月3日）	1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单独准备的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103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1951年5月7日）	105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向朝鲜人民赠送5万吨面粉	
（1952年4月14日）	106

战局进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	
（1950年12月1日）	108
附录一 罗申：中国政府拟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11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112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的作战计划	
（1951年1月28日）	1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1951年1月30日)	11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的问题	
(1951年1月30日)	117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我的电报不是指示而是建议	
(1951年2月3日)	11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1951年3月1日)	1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未来战役方针和苏联空军入朝事宜	
(1951年3月3日)	12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再调拨1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	
(1951年3月15日)	125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等问题	
(1951年3月18日)	12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朝鲜铁路运输应交中国指挥部管理	
(1951年3月25日)	127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否近期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7日)	12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13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	
(1951年6月5日)	132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和高岗将前往莫斯科	
(1951年6月5日)	1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	
(1951年6月7日)	1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中国空军使用问题	
(1951年6月13日)	13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问题和提供军队装备问题	
(1951年6月24日)	138

停战谈判（上）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1年6月30日）	140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反应电 （1951年6月30日）	141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您亲自领导这次会谈 （1951年6月30日）	1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1951年6月30日）	143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朝鲜应与中国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 （1951年7月2日）	145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来电 （1951年7月3日）	146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 （1951年7月3日）	147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 （1951年7月3日）	14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问题 （1951年7月3日）	150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 （1951年7月5日）	151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7月13日）	1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提出的谈判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1951年7月14日）	154
附录九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 （1951年7月20日）	15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 （1951年7月21日）	157

附录十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敌人在中立区的挑衅行为 （1951年8月27日）	15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1951年8月29日）	160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们有关邀请中立国代表 的意见是不适宜的 （1951年8月30日）	161
派遣顾问	
附录一 金日成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0年7月8日）	16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向朝鲜派遣苏联顾问事 （1950年7月8日）	164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防空与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165
附录二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空军顾问 （1951年2月12日）	166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 （1951年2月16日）	167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1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1951年9月10日）	1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12日）	17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兵团 （1951年9月20日）	17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 （1951年9月26日）	172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1951年10月4日）	173
---	-----

军事援助（下）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2日）	175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1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 （1951年5月26日）	178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不能马上满足供应迫击炮的申请 （1951年5月29日）	17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新的武器装备申请单由高岗带去 （1951年6月9日）	180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尽快培训中国飞行员 （1951年6月13日）	181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为中国训练米格-15飞行员 （1951年6月26日）	182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 （1951年8月17日）	183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1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 （1951年9月26日）	186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军用物资问题 （1951年10月4日）	18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装备和贷款结算方法 （1951年10月7日）	189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1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 （1951年11月13日）	19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2年4月9日）	1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向中国提供弹药的问题 （1952年7月24日）	19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1952年7月24日）	1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等问题 （1952年12月27日）	2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2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27日）	203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阿芒拿炸药 （1953年1月29日）	204

停战谈判（下）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和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20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1951年11月19日）	20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21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您拟定的计划和对谈判进程的估计 （1952年2月3日）	21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1952年7月17日）	214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关于战争局势和遣返战俘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15
斯大林与金日成和彭德怀谈话纪录：关于双方情况和 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2年9月4日）	221
附录三 周恩来向斯大林转交毛泽东来电：关于墨西哥的建议等问题 （1952年9月16日）	23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 （1952年9月17日）	232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关于墨西哥建议和交换战俘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33

苏联生变

附录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 （1953年3月19日）	238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238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242

朝鲜战争大事年表	243
----------------	-----

插图

一 三千里江山	7
二 美国军队突破三八线	29
三 仁川登陆，战局剧变	61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84
五 三次战役，展开攻势	109
六 著名的米格走廊	124
七 边谈边打，打打谈谈	199
八 朝鲜战争双方兵力投入	236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1
---------------	---

国际共运篇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三年

关于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往来便条 (1928年1月12日)	3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年4月7日)	5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得很精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8月5日)	9
关于共产国际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 (1937年2月11日)	10
弄清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 (1937年11月7日)	11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年10月24、25日)	12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年11月7日)	14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年4月20日)	16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年5月8、11日)	18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年5月21日)	19
---------------------------------------	----

关于德国^①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0日)	22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3年8月21日)	25
将苏联制度移植到德国的道路是错误的 (1945年6月7日)	28
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31日)	2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一) (1948年3月26日)	3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二) (1948年12月18日)	5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三) (1950年5月4日)	82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四) (1952年4月1日)	107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五) (1952年4月7日)	122

关于英国

出版我国支持英国罢工者的决议——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6日)	132
---	-----

① 以下各国的顺序，按首份档案日期的先后排列。——本书制作者

我们的代表团在柏林表现得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8日）	134
现在应当全力支持向英国禁运煤炭——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27日）	135
英国的工党现在很难后退	
（1946年9月4日）	138

关于美国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一）	
（1929年5月6日）	140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二）	
（1929年5月14日）	148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三）	
（1929年5月14日）	160

关于西班牙

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退出政府	
（1938年2月17日）	165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有的	
（1939年4月7日）	166

关于法国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169
实行适合法国形式的“左派联盟”路线	
（1944年11月19日）	171
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4年11月19日）	172

与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

(1947年11月18日) 181

关于意大利

对意大利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204

关于保加利亚

重要的是要保留住保加利亚军队

(1944年10月6日) 206

保-南联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

(1945年1月28日) 207

与保加利亚总理关于莫斯科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7日) 208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年9月2日) 216

关于保加利亚面临的一些问题

(1946年9月2日) 218

这一切都可以静悄悄地进行

(1947年8月8日) 220

苏联政府对保-南无限期条约的态度

(1947年8月12日) 222

关于建立保-南联邦问题的谈话

(1948年2月10日) 223

关于南斯拉夫

对铁托无理指责红军的来信的回复

(1944年10月31日) 231

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赫布朗的会谈记录	
(1945年1月9日)	232
南斯拉夫人想要……、想要……	
(1945年1月10日)	249
同铁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7日)	251
关于阿尔巴尼亚局势给铁托的信(节录)	
(1947年12月23日)	256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年3月27日)	257
附录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1948年6月28日)	263

关于罗马尼亚

给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议	
(1945年1月4日)	272
关于罗共党内和国内局势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等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2日)	273
关于罗马尼亚的经济政策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10日)	279
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谈话纪录	
(1948年2月3日)	284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与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谈话记录	
(1945年6月28日)	293
争取在近期内签订捷-波互助条约——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5日)	298

关于签订捷-波互助条约——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7日）	299
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 ——与捷政府代表团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9日）	300
对贝奈斯关于捷对外政策问题的来信的意见 （1947年7月11日）	305

关于蒙古

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 （1945年7月7日）	308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年2月22日）	309

关于波兰

建立具有共产主义纲领的波兰工人党 （1941年8月27日）	314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年11月14日）	315
与贝鲁特等人关于波兰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4日）	318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作用问题 ——同莫拉夫斯基等人的会谈纪要 （1946年8月19日）	341

关于伊朗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年5月8日）	352
-------------------------------------	-----

关于匈牙利

与匈代表团关于苏匈关系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7日) 356

关于印度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

(1951年2月9日) 361

关于阿根廷

同阿根廷驻苏大使布拉沃的谈话记录

(1953年2月7日) 373

新的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年1月28日) 380

附录 关于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问题

——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11月2日) 38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答季米特洛夫

(1948年11月6日) 385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3月14日) 387

插图

一 列宁在共产国际演说 20

二 马-恩-列-斯 394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一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一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1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生平综合篇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早年诗作

诗六首

(1895年—1896年)

致明月(外三首)	3
----------------	---

早晨(外一首)	8
---------------	---

家信家事

致母亲

一 “不要把忧愁放在心上”(1922年4月16日)	12
---------------------------------	----

附录 娜·谢·阿利卢耶娃致叶·格·朱加施维里

(1922年10月21日)	13
---------------------	----

二 “祝你活上一千岁”(1923年2月26日)	14
-------------------------------	----

三 “你是在生我的气”(1929年4月25日)	15
-------------------------------	----

四 “不要失去朝气!”(1934年3月24日)	16
-------------------------------	----

致妻子

附录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8月28日)	18
---------------------------------	----

一 “有什么新闻——写信告之”(1929年8月29日)	19
-----------------------------------	----

二 “真是见鬼了……”(1929年9月1日)	20
------------------------------	----

附录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日)	21
--------------------------------	----

三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1929年9月16日）	23
	附录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24
四	“我将做能做的一切”（1929年9月23日）	27
五	“忘了给你寄钱了”（1929年9月25日）	28
	附录四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7日）	29
六	“我打算一星期后回去”（1929年9月30日）	30
	附录五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10月1日）	31
七	“想去郊外看看孩子们”（1930年6月21日）	32
八	“我等你，别误了归期”（1930年7月2日）	33
九	“写信告诉我一切”（1930年9月2日）	34
	附录六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5日）	35
十	“英语自学课本给我寄来”（1930年9月8日）	36
	附录七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2日）	37
	附录八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9日）	38
十一	“你对我的责怪是不公平的”（1930年9月24日）	39
	附录九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30日）	40
	附录十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10月6日）	41
十二	“是好，还是不好呢？”（1930年10月8日）	42
十三	“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1931年9月9日）	43
	附录十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44
十四	“电工学方面的书收到了”（1931年9月14日）	46
十五	“和基洛夫一起过得很愉快”（1931年9月19日）	47
	附录十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1日）	48
	附录十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6日）	50
十六	“冶金方面的书收到了”（1931年9月29日）	51

与儿女

雅科夫

	关于雅科夫给阿利卢耶娃的便条（1928年4月9日）	53
	附录一 雅科夫被俘后写给父亲的字条（1941年7月19日）	54

附录二 苏联内务部关于雅科夫之死的调查（1946年9月16日）·····	55
瓦西里	
一 关于瓦西里致叶菲莫夫（1933年9月12日）·····	59
附录一、二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1934年9月26日）·····	61
附录三 叶菲莫夫致弗拉西克（1935年9月22日）·····	63
二 关于瓦西里致马尔特申（1938年6月8日）·····	65
附录四 拉·贝利亚致约·斯大林（1938年12月8日）·····	66
附录五、六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1939年11月13日）·····	68
附录七 瓦·约·斯大林的毕业鉴定（1940年3月25日）·····	70
附录八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1941年3月4日）·····	72
附录九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去前线的事宜的报告 （1941年8月26日）·····	74
三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3年5月26日）·····	75
附录十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 截至1945年6月的鉴定书（1945年7月20日）·····	76
附录十一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 健康状况的报告（1950年12月9日）·····	78
斯维特兰娜	
附录一一八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1952年2月10日）·····	79
附录九 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致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91
给“兄弟”	
就“改姓”问题答布洛欣（1924年9月3日）·····	92
附录 布洛欣请求改姓“斯大林”的来信（1924年7月29日）·····	93
谈化名	
“斯大林”的由来（1933年12月25日）·····	96

谈书论文

个人藏书分类表（给图书管理员）	98
和阿利卢耶娃通信中谈到的书（1930年9月—1931年9月）	101
关于阅读康德等人著作致加里宁的信（1933年1月21日）	104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934年8月5日）	105
不能贬低列宁，也不能贬责恩格斯（1934年8月5日之后）	106
还在写萨姆金吗？——致高尔基的信（1930年4月30日）	107
关于《国内战争史》等书的编辑出版（1932年1月28日）	108
《国内战争史》一事比想象的要糟（1933年2月3日）	110
大公鸡对待珍珠粒的态度（1933年7月2日）	111
附录一 美国出版商斯涅威克给托洛茨基的提议 （1922年8月27日）	112
关于斯涅威克提议出版小册子一事（1922年9月8日）	113
附录二 列宁在斯涅威克来信上的批语（1922年9月17日）	114
您一定会得到稿费吧？（1931年12月13日）	115
推荐一本关于心理学基础的书（1940年1月21日）	117
“活一世纪，学一世纪”（1940年11月7日）	118
附录三 与《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瓦维洛夫的谈话 （1949年7月13日）	120

评说影剧

话剧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的艺术形式	125
《26名公社社员》剧本写得苍白无力（1929年6月11日）	126
关于反映“破坏分子”剧本的写作（1930年10月24日）	128
附录一 观看国产影片时的谈话（1934年7月13-14、21日）	129

附录二 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136
--	-----

纵论文化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1922年7月3日)	142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1932年10月26日)	144
建立作家俱乐部一事有必要(1933年3月1-22日之间)	145
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和《列宁格勒》 两杂志问题的讲话(1946年8月9日)	146
附录“斯大林实际上是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1943年)	151

隔离列宁

附录一 中央委员会授权斯大林负责隔离病中列宁 (1922年12月18日)	157
关于列宁病重期间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1922年12月22日)	158
附录二 列宁就斯大林“辱骂”自己妻子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3月5日)	159
对列宁关于“电话冲突”信件的回复(1923年3月7日)	160
关于列宁“要氰化钾”一事(1923年3月21日)	161
关于列宁请求氰化钾致政治局委员(1923年3月21日)	162
我们不应忘却列宁(1941年4月22日)	163

再三请辞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年8月19日)	165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1926年7月22日)	167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1926年12月27日)	168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1927年12月19日)	169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6日）…… 173

个人崇拜

我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25年1月25日）…… 176

为什么非要让我来修改你的讲稿——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1月7日）…… 177

“个人崇拜”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1934年12月）…… 178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

（1937年1月8日）…… 179

不要“马—恩—列—斯”（1939年4月26日）…… 182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1945年11月10日）…… 184

应当删去“斯大林是‘党的领袖’”等修饰语

——给《真理报》主编的信…… 185

对《斯大林传略》第1版的批评（谈话记录）…… 186

传略传闻

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第2版清样作的修改（1947年）…… 190

附录 斯大林逝世后的个人财产登记表（1953年3月6日）…… 211

人人获得解放和我自己的别墅

——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213

附录一 美联社记者纳特请求采访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215

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世界

——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来信

（1936年10月26日）…… 216

附录二 纳特再次致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217

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再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218

预言身后

对身后的预言(1939年) 216

插图

- 一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 2
- 二 斯大林和母亲在一起 11
- 三 娜·谢·阿利卢耶娃 17
- 四 雅科夫、瓦西里、斯维特兰娜 52
- 五 推进苏维埃文化事业 123
- 六 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188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生平综合篇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早 年 诗 作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

(2)



诗 六 首

(1895—1896, 作者时年 16~17 岁)

致明月 (外三首)

你不知劳累一如既往，
巡行在乌云笼罩的大地上，
用你那银色的清辉
把浓浓的黑雾驱散。

你的微笑是那么柔美，
你俯瞰的大地还在沉睡，
卡兹别克^①的冰峰直插天外，
你的催眠曲叫它陶醉。

但是你要永远牢记，
有人虽然遭受压迫和毁灭，
却有着满腔强烈的希冀，
要与姆塔茨明达^②一争高低。

你照亮黑沉沉的苍穹，
迸射出淡淡的光辉，
像以往那样优柔和婉，
映照故土的山山水水。

① 大高加索山脉中部一段山名。

② 大高加索山脉的主峰之一。

我向你敞开心扉，
我向你举起双臂，
我看到明月皎洁，
思潮重又起伏澎湃。

* * *

诗人啊，你热泪盈眶，
为农民的苦难黯然神伤，
此后你又亲眼目睹了
非人的磨难一桩又一桩。

伟大的祖国使你激动，
你一次次欢呼雀跃，
你的歌声响彻云霄，
宛如瀑布奔泻直下。

祖国给了你灵感，
你弹起神圣的琴弦，
把理想倾注在她的身上，
如同坠入情网的少年。

从此你同人民融为一体，
爱情使你们永远分不开，
你在每个格鲁吉亚人心中
为自己竖立起一块丰碑。

祖国的歌手英勇顽强，
理应得到相应的奖赏，
因为种子已生根发芽，
现在该来收获庄稼。

人民有理由把你赞美，
你将跨越世世代代，
我的祖国将再抚育出
埃里斯塔维^①那样的儿女来。

* * *

他从一家走向另一家，
叩响了陌生人的门扉。
弹起柞木的老潘杜利^②，
淳朴的歌声轻轻颺起。

在他动人的歌声里
激荡着伟大的真理，
洋溢着崇高的理想，
像太阳的光芒万丈。

他使早已麻木的心房，
重又热血沸腾，慷慨激昂，
他唤醒了许多人的良知，
不再在黑暗中犹豫彷徨。

可是故乡的人们并没有
把崇高的桂冠给他戴上，
却无情地给他端来了
一碗毒汁四溅的药汤。

他们对他说道：“可恶的人，

① 格鲁吉亚作家（1811—1864）。

② 格鲁吉亚的民间拨弦乐器。

喝吧，喝吧，喝光这碗药……
你的歌声我们并不喜欢，
你的真理我们并不需要！”

* * *

当皎洁的月光
蓦然洒向大地，
淡淡的清辉投射到
那遥远的天际；
 当苍翠的树丛里，
 夜莺在啾啾啼啼，
 悠扬的萨拉穆里^①，
 袅袅余音回肠荡气；
当安静片刻之后，
山泉重又叮咚而去，
长夜里微风徐徐，
把黑树林骤然惊起；
 当逃亡者在敌人追逐下
 重返多难的故地，
 当沉沉黑夜过去，
 重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这时终于消散，
敞开了抑郁的心扉，
强烈的希望再一次

① 一种芦笛。

在我的心中燃起；
 诗人心情激动万分，
 诗人心潮澎湃不已，
因为我知道，这希望，
是多么美好，多么纯洁！

早 晨（外一首）

玫瑰花蕾绽开了，
在紫罗兰旁依偎，
微风惊醒了铃兰，
花朵向青草低垂。

云雀飞得高过白云，
歌声在蓝天里飘荡，
树丛里夜莺啼声沥沥，
给孩子们把歌儿轻唱：
“我的格鲁吉亚，愿你兴旺！
愿和平降临祖国大地上！
朋友们啊，要努力学习，
为我们的祖国增添荣光！”

* * *

我们的朋友尼尼卡老了，
一头白发，老态龙钟。
宽阔的双肩垂下了，
英雄如今再也不能称雄。

多么不幸！遥想当年，
他举起意气风发的镰刀，
像狂飚一般席卷麦田——
身后麦秸垛越堆越高。

他在麦茬地里飞跑，
把汗珠从额上擦掉，
饱含欢乐的火苗
在小伙子的脸上燃烧。

可是现在两腿走不了道——
年龄毕竟不把人饶……
可怜的老人一直躺着，
给孙子们说说笑笑。

可是当自由劳动的歌声
从田野传进他的耳中，
他那颗无比坚强的心
还会像从前一样猛然跳动。

老人稍稍抬起身子，
拄着拐杖站立起来，
他冲着孩子们笑了，
容光一下子那么灿烂。

选自《斯大林研究》
1995年第4辑

译后记：约·维·斯大林青少年时代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后来大部分已经散失。这里译出的六首诗作于1895—1896年，是根据《关于斯大林一家的神话和真相》一书转译的。（成士译）

家信家事



斯大林和母亲在一起

(11)



叶·格·朱加施维里

致 母 亲

一 “不要把忧愁放在心上”^①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②

(1922年4月16日)

我的妈妈!

愿您健康，不要把忧愁放在心上。

要知道有人说：“活着的时候，我要让自己的紫罗兰花高兴，如果我死了，墓地的小虫子们将因此而快活。”

这位妇女就是我的妻子。我尽力使她不受委屈。

你的 索索^③

1922年4月16日

本篇和以下各篇斯大林家信及有关材料均选自《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4辑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

① 标题系我们所拟加，余同。——本书制作者注

② 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加施维里（1860—1937），斯大林的母亲，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20年代开始在梯弗利斯居住。

③ 索索，斯大林的小名。——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 娜·谢·阿利卢耶娃^①致

叶·格·朱加施维里

(1922年10月21日)

亲爱的妈妈：您好！

非常热烈地吻您并转达索索对您的问候，他现在身体十分健康，自我感觉非常好，工作很忙并且经常想您。

雅沙^②在上学，很淘气，会抽烟了，不听我的话；瓦西卡^③也淘气，老惹妈妈生气，也不听我的话，他烟倒是不抽，但是约瑟夫大概很快就会教会他的，因为约瑟夫总是拿烟给他抽。我们生活得很好。莫斯科的冬天很快就要到了。亲爱的妈妈，请写信告诉我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如何？约瑟夫让我代吻您。

热烈地吻您，瓦西卡让我代他热烈地亲吻奶奶。

您的 娜嘉

雅申卡吻您，保姆向您问候！

1922年10月21日

向瓦里亚问好！

①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1901—1932），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阿利卢耶娃的信作为附录收入，余同。

② 雅沙，即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1907—1943），斯大林的长子，系斯大林早逝的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1885—1907）所生。

③ 瓦西卡，即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1921—1962），斯大林的次子。——以上均为本书制作者注

二 “祝你活上一千岁”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

(1923年2月26日)

我的妈妈：

你的来信都收到了。祝你身体健康、结实。

近日内我们就会见面，祝你活上一千岁。

吻你！

娜嘉问你好！

你的 索索

三 “你是在生我的气”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

(1929年4月25日)

我的妈妈：你好！

你近来怎么样？自我感觉如何？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显然你是在生我的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呀，我实在太忙了。

寄上150卢布——我已倾我所有。如果还需要钱，请告诉我，我尽可能寄上。向熟人们问好！

娜嘉向你们问好。

祝你长寿！

你的 索索

四 “不要失去朝气！”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

(1934年3月24日)

您好，我的妈妈！

您的来信收到了。果酱、丘奇赫拉^①、无花果也收到了。孩子们非常高兴并向您表达谢意和敬意。

知道您身体很好，精神愉快，我非常高兴。

我身体很好，不要挂念我。我能承受自己的一切。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或者是没有了。

给您寄去500卢布以备需要。同时寄去几张照片——我的和孩子们的。

祝您健康，我的妈妈！

不要失去朝气！

吻您。

你的 索索

1934年3月24日

孩子们向您致敬。娜嘉去世^②后，我的个人生活自然很沉重。但是，没关系，勇敢的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坚强的。

① 丘奇赫拉，一种格鲁吉亚甜食，用葡萄汁、核桃、面粉等制成香肠形。

②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8日去世。——本书制作者注



娜·谢·阿利卢耶娃

(17)



丈夫与妻子

母与子



致 妻 子

附录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8月28日)

亲爱的约瑟夫：

你的身体怎样？是否完全恢复了？在索契是否感觉更好一些？我走以后一直有点担心。一定给我写信。我回来的路上一切顺利，正好预期到达。星期—即9月2日，我们进行数学笔试，9月4日是自然地理，9月6日是俄语^②。应该向你承认，我有点紧张。考完试后一直到9月16日我都非常空闲。现在是这么说，以后有什么变化还不知道。总之，暂时我还不能定什么计划，因为目前一切都“似乎”是这样。等一切都知道得很准确时，我再给你写信。你也给我出个主意，怎样利用这段时间。莫斯科很冷，天气变化无常——冷空气加雨。暂时我还谁也没有见到，哪儿也没去。听说高尔基好像去了索契，大概能到你那儿，很遗憾我不在那里——非常喜欢听他讲话。事情—结束我就给你写信告诉你结果。我也恳求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热烈、紧紧地吻你，就像你吻别我—样。

你的 娜嘉

1929年8月28日

另：瓦夏8月28日开学

① 指的是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1929年7—8月，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在索契度假。8月末，阿利卢耶娃为参加工业学院入学考试而先回到莫斯科。

一 “有什么新闻——写信告之”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8月29日)

塔奇卡!

8月28日按下列地址给你寄了一封信：“克里姆林宫，娜·谢·阿利卢耶娃收”。寄的是航空件。是否收到？一路是否顺利，你的工业学院的事情进展如何，有什么新闻——写信告之。

我已经进行两次浴疗了。我想做十次。天气很好。我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纳尔奇克与索契之间的巨大差异，索契更有利。

我想会恢复得很好。

给我写写孩子们的事儿。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29年8月29日

二 “真是见鬼了……”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1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的两封信你是否已收到？原来，在纳尔奇克我的肺有点发炎了。尽管现在感觉比在纳尔奇克好多了，但还是觉得呼吸困难，总咳嗽。真是见鬼了……

如果你能有6—7天空闲时间，就直接到索契来。考试准备得怎样了？

吻我的塔奇卡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1日

附录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2日)

你好，约瑟夫！

你8月29日的信已经收到，另外一封8月28日的大概还在路上。你在索契感觉更好，非常为你高兴。当然，如果你自己能更注意一些，在那里你会恢复的。你问我工业学院的事情进展得怎样了。现在我可以这样说：非常好。因为今天我们已进行了数学笔试，我考得很成功，但还是有点不顺利：早上应该9点之前到工业学院，我当然是8点半就出发了，可是电车坏了，我又等公共汽车，但没有车。为了不迟到，我只好乘出租车，可走了一百俄丈左右就停下了，出租车也出了毛病，真是令我哭笑不得。最后终于到了工业学院，但我还是等了两个小时才开始考试。你问有什么新闻？说实话我什么也不知道，直到现在我哪儿也没去，只是星期天去了一次祖巴洛沃，那儿一切都正常。林子里的小道已开辟出来了，珠鸡都活着。由于缺雨，蘑菇很少，因此也没给你采多少。斯维特兰娜一见到我就问，我爸爸怎么没回来。

昨天米高扬^①来电话询问你的身体情况和我的事情进展如何，并说他将到你那儿去。顺便应该和你说一下，莫斯科到处都在排队购买牛奶和肉，这种情景让人很不愉快。主要的是，这本来可以通过正确的组织方式来改善的。

开学的具体日期还不清楚，因此关于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写的。明天是星期二，同例行邮件一起将这封信给你寄去。我本想今天的邮班你可能给我寄点什么，非常盼望。但很遗憾，火车到达和出发的时间总是赶不到一块儿。今天是9月2日，伏罗希洛夫^②从纳尔奇克返回来了，打来了电话并说他在巴克桑度过假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非常满意；他离开的那天，谢尔戈^③和鲁祖塔克^④正好也到了巴克桑。谢尔戈是悄悄去那儿的并打算在那里呆几天。总之，我们不要再去纳尔奇克了，而直接到巴克桑。对了，他还去了小巴尔达，对那儿的印象非常不好，说那里像撒哈拉大沙漠，热得人们连打猎的兴趣都没了。我光顾唠叨了，忘了你不喜欢长信。给我写点什么，也好使我不这么寂寞。收到你的信

我特别高兴。等我的事情一有结果，立即给你写信。现在让我热烈地吻你。再见。

你的 娜嘉

1929年9月2日于克里姆林宫

你瞧，这次考试费佳^⑤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他的头脑真是绝顶的聪明，他还像从前那样，给我讲解得特别好，我们一起复习了三天，差不多没动地方。我很同情他，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①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1895—1978），时任苏联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②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1881—1969），时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③ 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86—1937），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④ 鲁祖塔克，扬·厄内斯托维奇（1887—1938），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

⑤ 费佳，即阿利卢耶娃的患有精神病的兄弟费多尔。

三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16日）

塔奇卡！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旅途是否顺利？

也许我的第一封信（丢失的那封）被你母亲在克里姆林宫收到了。如果收到别人的信并拆开看了，那真是不懂事。

我已经恢复一些了。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29年9月16日

附录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你好，约瑟夫！

你的短信已收到了！得知你的事情很顺利，我很高兴。我这里目前一切都很好，除了今天的事令我非常不愉快以外。现在让我来给你说说这件事，今天我去《真理报》下面的单位办理注销证，自然是科瓦廖夫^①向我讲了自己的不愉快的事。话题是关于列宁格勒事件^②的。你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就是关于《真理报》事先没有同中央商量就刊登了这份材料，尽管这份材料波波夫^③和雅罗斯拉夫斯基^④都看过了，而且他们谁也不认为应该向《真理报》的党支部指明必须同中央（也就是同莫洛托夫^⑤）商量。而现在麻烦事出来了，所有的罪责都落到了科瓦廖夫身上，他本人同编辑委员会商量的这个问题。前几天他们都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到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同志、克鲁明^⑥（他不喜欢科瓦廖夫，因为他知道科瓦廖夫在《真理报》的威信很高，而他自己却没有威信）、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科瓦廖夫同志。谢尔戈主持了会议。科瓦廖夫向我讲述了会议的进行情况。克鲁明编造说，仿佛科瓦廖夫没有把这份材料给编辑委员会看等等；莫洛托夫说，《真理报》的党支部不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自我批评方面总是偏离党的路线。科瓦廖夫发言解释这件事情，但是谢尔戈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像往常一样用拳头击桌子并叫喊说，《真理报》的科瓦廖夫分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监察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和这种情绪。科瓦廖夫对我说，总之，从对他的解释的这种答复中他明白了，这是克鲁明捣的鬼。无论是谢尔戈，还是莫洛托夫绝对都不知道，按机构的原则应该由谁来领导《真理报》的这项工作，自然也不清楚克鲁明将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除此，科瓦廖夫还对我说，他和波波夫合作得很好。而与波波夫相反，克鲁明的私欲非常强烈，正是这一点导致其不满的情绪。在编辑委员会会议上克利尼茨基^⑦宣称，科瓦廖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总之，科瓦廖夫是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波夫都犯了，但并不等于说，可以使用这种口气和说法。你别怪我，我确实很同情科瓦廖夫，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而编

辑委员会却根据克鲁明的建议突然免去他的党的生活部主任职务，并认为他是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这简直是太荒唐了。而一般来说只有把他派到这里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门才能解除他的职务，而不是克鲁明。很可惜你不在莫斯科。我私下劝他去找莫洛托夫并坚持原则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认为需要免除他的职务，也不能用“党性不坚定”、科瓦廖夫事件、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作为理由。跟这样的同志不应该采用这种谈话方式。总之他现在也认为，他确实应该离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进行工作的。

总之，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是这么的不愉快。他的样子很沮丧。是的，在谢尔戈的委员会里，克鲁明扬言：他没有组织能力，没有任何威信等等。这纯粹是胡扯。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干预这一类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事你应该管管。

我一切都好。已开始学习了。出乎意料的是在第一个学年就有政治经济学，这是所有学科中最令我担心的学科，但也没什么需要特别费力的。是的，在工业学院还有一个阿利卢耶夫，已经弄清楚，是我的一个西伯利亚亲戚。

孩子们身体都很好。关于信的事你错怪我妈妈了。事情是这样的：信一直未收到是因为他们寄了挂号信，写的名字是奥·叶·阿（利卢耶娃）收，把我的名字弄混了，而在莫斯科甚至没有奥·叶，在梯弗利斯也没有过。这就是邮局所作的官僚主义的答复，而信还是没有。我已看过她的住处收到的所有信件。非常非常可惜，信丢了，而你甚至没有对我说信里写了什么。别生气，我又写了这么多，可是这样的好同志好工作人员真让人气恼。

再见，热烈地、紧紧地吻你。给我回信

还有，真理报的这一切问题政治局将于9月26日（星期四）予以解决。

约瑟夫，如果可以请给我寄50卢布来，我们工业学院9月15日才发工资，而我现在一个戈比也没有了。如果你能寄钱来就好了。

娜嘉

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① 科瓦廖夫，时任《真理报》党支部书记、编委会成员和党的生活部主任。

② 1929年9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组要求开展自我批评、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列宁格勒一些因受到批判而自杀的党员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

③ 波波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90/1891—1938),时任《真理报》编委。

④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里杨·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时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⑤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1—1986),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⑥ 克鲁明,加拉尔德·伊凡诺维奇(1894—1943),时任《真理报》编辑。

⑦ 克里尼茨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1894—1937),时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

四 “我将做能做的一切”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23日)

塔奇卡！

你的关于科瓦廖夫一事的来信已收到了。对这件事我了解得很少，但我想你是对的。如果科瓦廖夫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编委会，也就是事件的当事方，就更有错误了。看来他们是想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如果还不晚的话，我将做能做的一切^①。

我这里的天气总是变化不定。

紧紧地吻我的塔奇卡，非常热烈地。

你的 约瑟夫

1929年9月23日

^① 斯大林在收到阿利卢耶娃信的当天晚上就给莫洛托夫发电报，建议把科瓦廖夫的事情放一放，并认为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是不对的。此后，他又就《真理报》9月1日发表文章的事同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交换了电报和信件，除了指示加强中央对报纸的监督外，还指出把责任推到科瓦廖夫身上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不正确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方法”。

五 “忘了给你寄钱了”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25日)

塔奇卡！

忘了给你寄钱了。不等例行的信使了，让离开这里的同志把钱顺便给你带去（120卢布）。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29年9月25日

附录四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27日)

亲爱的约瑟夫！

非常高兴，在科瓦廖夫这件事上你对我表示的信任。如果不能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错误将很遗憾。你在最近给我的两封信中都没说你的身体情况，以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在我非常非常寂寞，你恢复得怎样了，快点回来吧，一定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情况。我目前一切还顺利，学习也很认真。暂时还不累，但我还是11点钟就上床了。冬天大概要难熬一些。可以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好，大家相处很和睦。学习成绩按下列方式确定：富农，中农，贫农。大家每天都说笑、争吵。一句话，我被列入了右派。总之，快点回来。只有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孩子们都很健康。很可惜，最近天气令你不快。莫斯科比较晴朗，但是很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怎样。吻你，热烈地，紧紧地。

快点回来。

你的 娜嘉

1929年9月27日

六 “我打算一星期后回去”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30日)

塔奇卡！

信已收到。钱是否已转交给你？我们这儿的天气已经变好了。我打算一星期后回去。

你的约瑟夫 热烈地吻你

1929年9月30日

附录五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10月1日)

亲爱的约瑟夫，你好！

信和钱都收到了。谢谢。大概现在你很快——也就是在最近两天就回来了，只是很遗憾，你马上又要有一大堆的事情，这一点是很显然的。把军大衣给你寄去，因为你离开南方后很容易感冒。星期日（9月29日）有邮班，我等你的信。我这儿目前一切都好。一切情况等你回来后再说。

最近谢尔戈和伏罗希洛夫来过，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人来了。谢尔戈说，已经给你写信讲述了一切情况，并说，大家都在等你回来。好了，快点回来吧，尽管我也愿意让你再休息休息，但是反正时间再长一点也不会有多大作用了。热烈地吻你。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否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接你。吻你。

你的 娜嘉

1929年10月1日

七 “想去郊外看看孩子们”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6月21日)

塔奇卡！

给我写信，随便写点儿什么。一定写信并寄外交人民委员会托夫斯图赫收（转中央）^①。一路是否顺利，有什么见闻，是否去了医生那里，医生对你的身体情况有什么说法等等——写信告诉我。代表大会将在26日召开^②。我们这里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我非常孤独，塔奇卡，一个人在家里，仿佛与世隔绝。因忙于工作，没能到郊外去。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明后天想去郊外看看孩子们。

好了，再见。别耽搁太久，快点儿回来。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6月21日

① 1930年6月到8月，阿利卢耶娃去了卡尔斯巴德，后来又到了柏林她的哥哥巴维尔处。斯大林在信中请她通过外交邮件方式寄信，收信人托夫斯图赫时任联共（布）中央机要局局长。

② 指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

八 “我等你，别误了归期”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7月2日)

塔奇卡！

三封信都收到了，因为工作特别忙没能立即回信。现在我终于空闲下来了。代表大会将于10~12日结束。我等你，别误了归期。如果身体状况需要，可稍微延长几天。

我有时也去郊外。孩子们身体都很好。我不太喜欢那位女家庭教师。她总是在别墅的四周走来走去，并让瓦西卡和托米克^①从早到晚玩耍。我毫不怀疑，瓦西卡和她在一起什么也学不到。难怪瓦西卡跟她学习德语成绩总是跟不上。真是奇怪的女人。

这段时间我有点疲劳，着实瘦了很多。我想休息几天，然后再恢复正常的工作。

好了，再见。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7月2日

^① 托米克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阿尔乔姆的儿子。阿尔乔姆1921年因公殉职。

九 “写信告诉我一切”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9月2日)

塔奇卡！

旅途是否顺利？事情进展如何？有什么好消息？写信告诉我一切，我的小塔奇卡。

我的健康状况好些了。

你的约瑟夫 热烈地吻你

1930年9月2日

附录六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5日)

约瑟夫，你好！

给你寄去你要找的书，很遗憾不是全部，因为英语教科书我没能找到。我模糊地记起，这本书好像是放在索契的小房间的桌子上的那一堆书里。如果索契没有，那我就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真是倒霉。

你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今天是第一天上课。我已经递交了转到化学系的申请书，并被批准了，只是倒霉的是：化学老师还没凑齐，招聘工作要到10月1日前才能结束，这样暂时我还得在原班学习。很多课我都没学，现在不得不快点赶上。很高兴你感觉身体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你的牙怎么样了？一定要治好。我已经给基洛夫^①打电话了，他现在不在列宁格勒，我真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怎么跟他说，因为我觉得这种“委托”不是很妥当的。

祝你一切都好。

吻你，娜嘉

1930年9月5日

^① 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1886—1934），时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中央委员会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 “英语自学课本给我寄来”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9月8日)

塔奇卡！

信已收到，书也收到了。缅什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我这儿没有（按照罗捷塔尔的方法编写的）。你再仔细找找然后给我寄来。

我的牙已经开始进行治疗了，拔掉一颗坏牙，两侧的牙也钻了，总之，正全力以赴地进行治疗。医生打算在9月底结束治疗工作。

我哪儿也没去，也不打算去哪里。我感觉好多了。正在恢复健康。

给你寄一些柠檬，这是你身体需要的。

瓦西卡学习怎样了？还有萨丹卡^①？

吻你，非常、非常热烈地。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9月8日

① 萨丹卡，即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七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12日)

约瑟夫，你好！

信已收到，谢谢你的柠檬，自然，这对身体很有益处。我们生活得还不坏，现在已经完全开始过冬了——昨天夜里温度是摄氏7度，今天早晨所有的房顶都结了一层白霜。你能晒太阳并且已经开始治疗牙齿，这很好。最近莫斯科很喧闹、嘈杂，一片混乱，不过会逐渐好转的。公众（在电车里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的情绪还可以——大家只是悄悄议论着，不是很厉害。在莫斯科我们大家都被“采别林”号飞艇的到来吸引住了，场面确实值得关注。整个莫斯科都在观看这艘美妙的飞艇。根据诗人捷米扬的说法大家都在抱怨贡献太少，我们捐了一天的工资^①。我看了新上演的歌剧《阿尔马斯》，马克沙科娃非常出色地表演了列兹金卡舞（亚美尼亚舞蹈），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么美妙的表演了。我想，你也是非常喜欢舞蹈和歌剧的。

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你的那本教科书，我给你寄去另一种版本的。不要生气，哪儿也找不到。祖勃洛沃已准备供暖，一切正常，大概很快就会就绪了。

“采别林”号到达那天，瓦夏是骑着自行车从克里姆林宫穿过全城一直到机场的，干得还不坏，但自然是很疲劳了。

你没有到处走，是很明智的，因为这在各方面都是有风险的。

吻你。

娜嘉

1930年9月12日

^① 1930年9月10日，以德国飞艇设计家采别林伯爵的名字命名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在莫斯科进行了飞行表演。9月12日《真理报》工作人员倡议为建造苏联的《真理报》号飞艇捐款。倡议信中提到了诗人捷米扬·别德内依。

附录八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19日)

约瑟夫，你好！

身体怎么样？听来的同志（乌哈诺夫^①同志，还有另外一位同志）讲你气色不太好，自我感觉也不好。而我知道的却是你正在恢复健康（这是从你的信中得知的）。由于这种情况我受到了莫洛托夫夫妇的责怪，说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下等等。当然，这是符合情理的。我向他们解释说离开是由于忙于功课，而实质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今年的这个夏天我没有感觉到你愿意我推迟离开的日期，而是相反。去年夏天这一点非常明显，而今年却不是这样。带着这样的心情留下当然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已完全改变了我留下来的意义和益处。因此我认为，我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责怪的，但是在他们的概念中当然是这样的。

最近我去了莫洛托夫家，听听他的建议，获得一些消息。这很好，要不我只知道报刊上的那些东西。总之，高兴的事很少。关于你回来的事，阿维尔^②对同志们说，你要到10月底才能回来。我没见到阿维尔，难道你真的要在那里呆那么久吗？

请回信。如果你不是很满意我的这封信，那也只能随你便了。

祝一切都好。吻你。

娜嘉

1930年9月19日

① 乌哈诺夫，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1891—1937），时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指叶努基泽，阿维尔·萨夫罗维奇（1877—1937），阿利卢耶娃的教父，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

十一 “你对我的责怪是不公平的”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9月24日)

塔奇卡！

你的邮件已收到了。给你寄一些从我们的树上摘的桃子。

我身体很健康，自我感觉也特别好。可能，乌哈诺夫见到我的那一天，正好是沙皮罗一下子给我钻了8颗牙，8颗呀！可能当时我的情绪不太好。但是这件事情与我认为的健康已经基本上恢复了这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谈到对我的关心，有人责怪你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莫洛托夫夫妇就是这种人。你代表我对莫洛托夫夫妇说：他们错怪了你，在这方面对你不公平。关于你认为我不愿意让你留在索契的这种想法，那么你对我的责怪也是不公平的，就像莫洛托夫夫妇责怪你一样不公平。是这样的，塔奇卡。

我当然不是到10月底才回去，而是早很多，在10月中旬，就像我在索契对你说的那样。为了保密，我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散布消息说我10月底返回。看来，阿维尔是这种消息的“牺牲品”。只是不想让你打电话问这件事。我回去的日期只有塔奇卡、莫洛托夫，大概还有谢尔戈知道。

好了，祝你一切愉快。

吻你，热烈地。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9月24日

孩子们的身体都好吧？

附录九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30日)

约瑟夫，你好！

再一次从这句话开头——信已经收到了。你在南方的阳光下感觉很好，我非常高兴。莫斯科现在也不错，天气已经变好了，有时森林里甚至还像秋天。日子过得很快。目前大家身体都很好。钻8颗牙，你真是好样的。我也在和我的喉咙作斗争，斯维尔热夫斯基教授给我做了手术，割掉了四块肉，不得不躺了四天，而现在我可以说，我已经结束了“休整”状态。我感觉很好，在躺着的这几天甚至有点发胖了。

桃子太棒了！难道这真是从那颗树上摘下来的？它们简直太美了！现在你，尽管完全不情愿，但还是很快就要回到莫斯科了，我们等待你，但是不着急，你尽量休息好。

致敬。吻你。

卡冈诺维奇^①对住宅非常满意，已经接受了。总之对你的关心非常感动。我刚刚从突击队员代表会议上回来，卡冈诺维奇在大会上讲了话，还有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讲了，讲得真不错。接着是卡尔明——戈洛瓦诺夫手下的人，讲得也很出色。

娜·阿

1930年9月30日

^① 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1893—1991），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附录十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10月6日)

最近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不知什么缘故。我向德文斯基^①查问过了，他说，已经很久没有邮件了。大概是旅行太使你着迷了，或者就是懒得写信。

莫斯科已经刮起了暴风雪，现在还没有停止。总之，天气非常冷，非常可怕。可怜的莫斯科人冷得够呛，因为莫斯科供暖局下过命令，10月15日之前不准供暖。生病的人多得不得了。我们上课时都穿着大衣，否则就冻得总是打哆嗦。我的事情大体上进展得还不坏。我的身体也很好。总之，“周游世界”的旅行造成的疲倦已经过去，而忙忙碌碌的事情也起了明显改善的作用。

从一位年青有趣的妇女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她是在加里宁^②家的午宴上见到你的，她说你的气色非常好，而且非常快活，和大家有说有笑。听到这些我非常高兴。

好了，不要因为这封愚蠢的信而生气，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否值得给你往索契写这些枯燥的事情。很遗憾，莫斯科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这些乏味的东西。好好恢复身体。祝一切都好。

吻你。

娜嘉

1930年10月6日于莫斯科

祖勃洛沃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目前已非常舒适了。

① Б. А. 德文斯基，斯大林的一名助手。

②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75—1946），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二 “是好，还是不好呢？”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10月8日)

塔奇卡！

你的来信已收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开始夸奖起我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好，还是不好呢？

很遗憾，我这里没有任何新闻。我生活得不错，还期待着更好一些。我们这儿天气又变坏了，真是可恶！应该回莫斯科。

你在信中暗示我的什么旅行，告诉你，我什么地方（真的是任何地方！）也没去，也不想去。

吻你，非常热烈地。

你的 约瑟夫

1930年10月8日

十三 “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9日）

你好，塔奇卡！

一路是否顺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孩子们都好吗？萨丹卡好吗？

齐娜^①来了（基洛夫的妻子没来）。她在泽济诺夫卡逗留了几天——并认为，这里要比普扎诺夫卡好。还好，——非常愉快。

我们这里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击木游戏，打地球，然后还是击木游戏和类似的这些游戏。莫洛托夫已经来我这里两次了，而他的妻子好像去了什么地方。

暂时就这些。

吻你

约瑟夫

1931年9月9日

① 指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齐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

附录十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不晚于 1931 年 9 月 12 日）

你好，约瑟夫！

我一路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很冷，也许是我刚刚离开南方才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确实是很凉。

莫斯科更美丽了，可是有些地方仍然像一位企图用香粉来掩盖自己脸上斑点的妇女一样，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更是如此。下过雨后，墙上的涂料就随着雨水一道一道地流了下来。总之，要想给莫斯科一个令人满意的外表，目前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些措施和条件，还应在技术上作进一步的改进。

回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堆事情，同我们在去索契的几十俄里路上所遇到的事情一样，令人不愉快。是的，事情少了一些，但只是略少了一些。我已经给基洛夫打了电话，他已决定 9 月 12 日去你处，但是，对于交通工具只是勉强同意^①。关于格洛特一事^②他会向你讲述全部情况的。莫斯科的街道状况已经好些了，有些地方甚至很好。从特维尔大街到红场这条路上景色特别美。教堂虽然拆得很慢，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神气”^③。

克里姆林宫里面很干净，但车库的院子特别乱，那里什么也没收拾，甚至连修理汽车留下的垃圾都没清除。这一点我觉得不太好。总之，你可能已厌倦了我唠叨的这些琐事。在班里，大家对我能百分之百遵守纪律特别满意，应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各种新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迟到了，而不仅仅是由于为了这个百分之百。

是的，关于《消息报》刊登的那起恶性事件^④，现在已经查明：凶杀完全是为了抢劫，因为这位老师身上当时带着钱，是用于给数学教研室买教具的。谁是凶手，还有其他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发生后，教师们心情都特别沉痛，虽然这是学院的一位新教师。教师们工作热情都很高，尽管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师对伙食问题都有点意见，大家都厌倦了排队和一系列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主要是最普通的制服问题。商店里物价很高，因此造成商品大量积压。

你不要为我这么详细地说这些而生气。我真的希望能从人们的生活中清除

这些缺陷，使大家都感到生活的美好，并更加努力地工作。

给你寄去你要的电工技术方面的书。增补版的书我已经订购了，但是今天还没收到。下一次邮班你会收到的。还有，德文读物——我把我们家里的都寄去，成人教科书也通过下一次例行邮班寄给你。

一定要好好休息，最好是什么事也不要做。

谢尔戈打电话来了，说你无论是在信中，还是电报中都批评了他。看来，他很苦恼。我向他转达了你的问候。

孩子们都很健康，都在莫斯科。

祝你一切、一切都好。

吻你

娜嘉

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① 基洛夫希望乘坐飞机到索契去。对此，斯大林在电报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没有权力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乘坐飞机。恳请坐火车来。”

② 格洛特，坦克设计师，这里指的是他去德国的事。

③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7月13日作出决定，为建造苏雄埃宫而拆掉莫斯科市内的救世主基督教堂。

④ 《消息报》于1930年8月30日和9月4日报道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是工业学院数学教研室的副教授。

十四 “电工学方面的书收到了”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14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学会了写这么详细的信，这很好。从你信中看出，莫斯科的外貌开始变好了。终于是这样了！

电工学方面的书《中等技术工作手册》收到了。塔奇卡，请再给我寄一本关于黑色冶金学方面的《中等技术工作手册》。一定给我寄来（你到我的图书室看看——在那里找找）。

索契没有任何新闻。莫洛托夫一家都走了。听说，加里宁打算到索契来。目前这里的天气还不错，甚至很好，只是有点寂寞。

你生活得怎样？让萨丹卡给我写点什么。还有瓦西卡也是。

继续向我提供“情报”。

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1年9月14日

附言：我的身体正在恢复。很慢，但是正在恢复。

十五 “和基洛夫一起过得很愉快”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19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

目前我们这里的天气很好。昨天夜里（12点钟）我和基洛夫一起测量了一下普扎诺夫卡低处和高处的温度，我现在住在高处。得出结果是低处和高处温差是列氏3度，这对新别墅很有利：也就是当低处温度（夜间12点）是列氏14度时，高处是列氏17度多。这就是说，我们这里现在高处的温度就好像在加格拉赫和苏呼米一样。

到海里洗了一次海水澡（只有一次！）。非常好！以后还想去。

和基洛夫一起过得很愉快。暂时就这些。

热烈地吻你。

你的 约瑟夫

1931年9月19日

附录十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1年9月21日)

你好，约瑟夫！

给你寄去“家庭书信”。斯维特兰娜的信带了译文，因为你未必能完全看明白她所写的重要事情。除此而外还给你寄去杰尼^①的书和他的信，我理解这封信是去国外治病的请求，当然，关于这一点他在信里什么也没写，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我认为，是可以答应他的，不过你更清楚怎样答复他。已经收到了在机场拍的照片的相册，一起给你寄去，非常有意思。几乎什么新闻也没有。去看了一场芭蕾“巴雅洁尔卡”，谢苗诺娃虽然精神不太好，但仍然完成了很多新动作。我每天晚上不得不做很多功课。莫斯科的情况是这样：正在加紧进行卢比扬卡广场的工作——拆除了中心喷泉，按直线铺设电车轨道，并因此而免去了一个大圆圈。莫斯科宾馆附近的街道还没修完，四周都堆满了东西。我想，在你回来之前这一切都会完成的。三四天以前车库的院子已经开始收拾了。我想，阿维尔能比我更详细地向你讲述这一切的，这样，我就没有什么新闻可补充的了。

给你寄去《黑色冶金学》。因为没有好的评论人，所以，新出版的书中也选不出什么很有趣的可给你寄去的。天气总是很潮湿，哪儿也不想去。只是在回来的那天去了一次祖勃洛沃，以后再也没去。9月23日准备去试试浴室，那儿已经弄好了。外表上看很不错，我再去看看蒸气足不足，然后再写信告诉你。

好好休息。基洛夫去你那里了吗？谢尔戈对我说，他想去索契住十来天，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决定的。暂时就这些。吻你。

娜嘉

1931年9月21日

已经写完了这封信，才收到你的来信。基洛夫已经去你那儿了。你那里很

暖和，这非常好。去海里洗澡可要多加小心，因为毕竟现在水温已经降低了。你没有什么新的委托，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

娜嘉

1931年9月21日

你好，爸爸，快点回家来。吻你。萨丹卡

① 杰尼，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1893—1946），原姓杰尼索夫，苏联画家，政治宣传画的奠基人之一，曾创作《协约国》（1919年）。

附录十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1年9月26日)

你好，约瑟夫！

莫斯科没完没了地在下雨。天气很潮湿，令人感到很不舒适。很多人患了流行性感冒。自然，孩子们也得了流感和咽喉炎，我也很担心生病，因此总是穿得很厚。郊外也是这样，所以也没有去。索契大概很舒适，这非常非常好。

我们这里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白天在外面忙，晚上回到家里也是如此。明天我想去看一场《广告》，这将在艺术剧院的小舞台演出，据说非常可笑，而我也真的很想笑笑。

最近，雅科夫列夫寄来了我们在索契的照片，也挺可笑的，特别是莫洛托夫更可笑。寄给你，只是一定要把它带回来。这些天你没有要我做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可给你寄的。等到下一次例行的邮班时，如果你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你寄去一本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论斯大林和列宁》（这是一个叛逃分子写的），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寄去，因为德文斯基还没有弄回来，我也只是在自由报上读到的，报上说这是关于你的最有趣的资料。感兴趣吗？因此，我请德文斯基快点弄到这本书。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闻。这两天谢尔戈打来了电话，说患了胸膜炎，躺了好几天。

一定好好休息。吻你。

娜嘉

1931年9月26日

十六 “冶金方面的书收到了”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29日)

你好，塔奇卡！

照片（击木游戏）已经收到了。非常可笑，也很有意思。再给你寄回去（在我这里会丢的）。

上次没有给你写信，——这一回弥补一下过失。

冶金方面的书已经收到了。还有瓦夏和萨丹卡的信都收到了。代我亲亲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

我很快就会回家了。因此，你可以不写信了。

从9月25日开始索契的天气一下子就变坏了。

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风暴。暴风雨已经刮两天了，风声像疯狂的野兽在怒吼一样。我们的别墅前有18棵很大的柞树都被连根刮倒了，而在山上（在普扎诺夫卡）的别墅门前有3颗巨大的柞树也被连根刮倒了。9月28日地面温度已降到列氏4度。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还是不得不把炉子生起来。

好了，暂时就写到此吧，再见。

热烈地吻你。

约瑟夫

1931年9月29日



雅科夫·朱加施维里



在德寇集中营

(52)



斯大林和斯维特兰娜



瓦西里·斯大林



约·斯大林的孙子、孙女

与儿女

一 雅科夫^①

关于雅科夫给阿利卢耶娃的便条^②

(1928年4月9日)

代我转告雅沙，说他的行为像一个小流氓，一个骗子，我和这种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点。随他的便吧，喜欢在哪儿就在哪儿，愿意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约·斯大林

1928年4月9日

① 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1908—1943），斯大林长子，毕业于工农红军炮兵学院。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作为第14师炮兵团的上尉连长上了前线，1941年7月16日被俘，1943年年底被德寇杀害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77年10月28日，苏联政府认定他为反法西斯英雄，追授他为上级中尉，授予一等祖国战争勋章。——本书制作者注

② 1928年，雅科夫因与父亲关系紧张而试图自杀，事后他去了列宁格勒，住在阿利卢耶娃的父母家里，斯大林的这张便条显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附录一 雅科夫被俘后写给父亲的字条

(1941年7月19日)

亲爱的父亲：

我被俘了。身体很好。不久我将被送往德国的一个军官集中营。对我还好。

祝您健康。问大家好。

雅 沙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315页

附录二 苏联内务部关于雅科夫之死的调查^①

(1946年9月16日)

绝密

办事员不能拆开

致苏联内务部长

上将C. H. 克鲁格洛夫同志亲收

柏林市

内务部柏林行动处于今年7月19日逮捕了德国中央集团军总部第一处的工作人员帕乌尔·根斯戈尔。

在对他进行审讯时，他供认：1941年他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在鲍里索夫市对炮兵上尉雅科夫·朱加施维里的审讯。审讯是由第一处的上尉军官、帝国保安总局第5处工作人员舒尔茨博士主持的。审讯结束后朱加施维里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后来我们又确认，1945年美国入逮捕了至少15个以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向他们提出请求，将这些被逮捕的德国人转交给我们，以便继续调查，因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美国人将这些被逮捕的人转交给我们了，这些人中包括党卫军上校、集中营警备司令卡因特尔和党卫军中校、警备营营长韦格纳。

为了核查根斯戈尔的供词，审讯了原党卫军“死神”师警备营营长古斯塔夫·韦格纳。古斯塔夫·韦格纳，1905年生，受过高级警官教育，1939年起为法西斯党党员。

在审讯时，古斯塔夫·韦格纳证明，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有一个特别集中营“A”。在这个集中营里关押了一些苏联红军、英国军队和希腊军队的将军和高级军官。

1943年3月的一天，当韦格纳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

^① 此件由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于1946年9月24日呈送斯大林。

因特尔一起巡视特别集中营“A”时，卡因特尔提醒他注意2号牢房并说，今天将从集中营的监狱押送两名上尉军官到这个牢房，其中一名是斯大林的儿子，一名是莫洛托夫的亲属。

同时，他还命令韦格纳在牢房里用俄文写上战俘的行为规章。

第二天，2号牢房果然押送来了别索诺夫将军，两名中校和上尉雅科夫·朱加施维里和科科林。别索诺夫少将曾是德国人在波兹南市开办的培训少年破坏者的学校的负责人，目前已被逮捕，关押在莫斯科。

接着，韦格纳去了几次2号牢房，并问上尉朱加施维里，他对集中营警备司令部有什么请求。朱加施维里除了要一些他所感兴趣的反映前线形势的报纸以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他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姓是朱加施维里。他总是表现得很独立，对集中营管理当局总是带有几分轻蔑的态度。

接着，韦格纳又证明说，1943年底他才知道，朱加施维里是在“企图逃跑的情况下”被值班哨兵开枪打死的。但枪杀的细节韦格纳似乎不知道，因为这件事的调查是根据希姆莱的指示进行的。

根据这些证词，我们审讯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卡因特尔。卡因特尔，党卫军上校，1937年起为法西斯党党员。他证实说，实际上朱加施维里上尉被关在集中营监狱里3个星期，后来，根据希姆莱的命令，把他转到特别集中营“A”中。这个特别集中营共有3个牢房，被用石墙隔离，在离墙两米的地方还设有三道铁丝网，其中的一道还有高压电流。

正如卡因特尔所说的那样，他每周都要去2号牢房，并对那里关押的人很感兴趣。

根据希姆莱所布置的任务，别索诺夫将军编写了按照德国的原则改组俄罗斯的草案。卡因特尔这才知道，别索诺夫和两名中校军官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他们在德国人的领导下进行瓦解红军的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但不知犯了什么过失，因此被关进集中营。

上尉朱加施维里表现得很孤僻，他从不与任何人交谈，其中包括别索诺夫将军。他没有向集中营管理当局提出过任何请求，但是，对前线的形势特别感兴趣。

有一次，根据朱加施维里的请求，卡因特尔除了报纸以外又给了他一张地图，上面标有红军和德军的位置。朱加施维里长久地，并很仔细地看这张地图。关于朱加施维里被枪杀的情况，卡因特尔证明说，1943年底，上尉军官朱

加施维里是在下述情形下被值班哨兵开枪打死的：

2号牢房的犯人在牢房附近放风。晚上7点钟的时候，负责监视犯人的党卫军分子容克林格命令犯人们回牢房去，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朱加施维里没有走，他要求见集中营的警备司令。党卫军分子容克林格重复了自己的命令，但朱加施维里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当时，党卫军分子说，他去给警备司令卡因特尔打电话。在电话交谈时，容克林格对卡因特尔说，他听到了枪声，接着，就挂断了电话。正如卡因特尔证明的那样，这时发生了下列情况：

朱加施维里若有所思地越过了通向铁丝网的中间地带。值班哨兵举起了枪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并喊道：“站住”。朱加施维里还继续向前走。值班哨兵又喊道：“我要开枪了”。

在喊声之后，朱加施维里开始骂了起来，并用双手抓住制服，撕破了衣领，露出了胸膛，向哨兵喊道：“开枪吧”。值班哨兵向他的头部开了枪，朱加施维里被打死了。

在审讯时，犯人卡因特尔证明哨兵是向朱加施维里开了枪，并补充说，朱加施维里在哨兵开枪的同时抓住了带有高压电的铁丝网并立即跌倒在前两排带刺的铁丝上。

在接到希姆莱的命令，将尸体取下、运往集中营的火葬场进行检查之前，根据卡因特尔的指示，被击毙了的朱加施维里一直躺在那里长达24个小时。然后，帝国安全机构派了两名教授来到火葬场，他们做出了一份书面材料：朱加施维里先是被高压电流击死，此后头部才遭到枪击。与此同时，文件里还写到：根据条例，值班哨兵的行动是正确的。

在教授们做出结论后，朱加施维里的尸体在火葬场被火化了，骨灰安放在骨灰盒里，并与死亡调查文件一起被送到了帝国安全总局。

正如卡因特尔证明的那样，在调查期间，他很担心此事引起希姆莱的不快，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为了证明卡因特尔的有关枪杀朱加施维里证明材料的准确性，要求他描绘一下朱加施维里的外貌特征。

卡因特尔清楚地记得朱加施维里的外貌并进行了正确的描述，除此而外，还出示了从德国杂志上剪下的朱加施维里的照片，卡因特尔立即就指出了照片上的朱加施维里。

因此，卡因特尔关于1943年朱加施维里被关押在他的集中营里并遭枪杀的证词是可信的。

卡因特尔还补充说，朱加施维里被高压电流击死是他编造出来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对朱加施维里遭枪击应负的责任。

我向卡因特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战俘朱加施维里的个人档案存放在哪里？对此他回答说，档案曾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在德国投降前夕，他命令副官将文件全部销毁了。

在调查过程中确认：集中营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因特尔和党卫军警备营营长韦格纳中校，担心要为在集中营中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没有彻底交待事实。他们曾企图自杀，流露出要扑向哨兵、撞牢房的墙等等想法。

在从美国人那里接收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军的罪犯时，美国人要求让他们出庭，因此，对罪犯卡因特尔和韦格纳采取肉体上的惩处是完全不可能的。采取了一些间谍手段，在牢房内监视罪犯。

鉴于要将德国方面的业务工作转交国家全部，这个问题的全部资料都将保存在柏林行动处。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伊·谢罗夫

1946年9月14日于柏林市

密件第001034号

二 瓦西里^①

一 关于瓦西里致叶菲莫夫^②

(1933年9月12日)

叶菲莫夫同志！

保姆和斯维特兰娜已经返回了莫斯科。斯维特兰娜应尽快送到学校上学，否则，最后她会变得很孤僻的。请你和帕乌凯尔一起给她安置个学校。你们二人同保姆和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③商量并确定一下，安置在哪个学校。

保姆回来了，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应该去休假了。请你转告她：她应该去休息了，否则会损害健康的。如果她想来索契度假，请你为她准备一下行程。如果她不太愿意来索契，也可以去祖巴洛沃，并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值得给予一切关心的。如果她希望带她的姐姐一块儿到祖巴洛沃，我也不反对。

在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休假期间，让保姆留在莫斯科的住宅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等你的回信。

致敬！

约·斯大林

让瓦夏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远点：她对他的有害的让步会惯坏他的。

约·斯

1933年9月12日

① 瓦夏，即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1921—1962），是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所生的儿子。瓦西里在1938年至1942年间先后在卡恰航空学校和利保茨克高级航空培训班学习。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歼击机大队长助理、歼击航空团团长、歼击航空师师长，曾击落敌机两架。1947年至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4月被捕，被控滥用、侵吞和占有国家财产，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敌意攻击和散布反苏言论，于1955年9月被判8年监禁。1960年1月获提前释放，但同年4月又被关押，继续服刑。1961年刑满释放后被指定永久居住在喀山。1962年3月19日在喀山去世。瓦西里·斯大林的妻子卡比托丽娜·瓦西里耶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按照俄罗斯现行法律，应当承认瓦西里是政治牺牲品，并应该给予彻底平反。——本书制作者注

② 叶菲莫夫，祖巴洛沃别墅的警卫队长。

③ 斯大林家的管家。

附录一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

爸爸，你好！

我生活得还可以并且已经在另一所学校里学习了。这所学校非常好，所以我想我也会成为一个好的红色瓦西卡。

爸爸，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休息得好吗？斯维特兰娜生活得很好，她也上学了。

代表我们的劳动集体向你致敬。

红色瓦西卡

1933年10月1日

附录二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4年9月26日)

你好，爸爸！

我生活得还可以，去学校上课，总之，生活得很快乐。爸爸，我参加了学校的第一足球队，可每次我去踢球时，就这个问题总是要进行谈话，也就是说没有爸爸的允许任何事情都不准做。

请您给我写信，告诉我，我能否去踢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斯维特兰娜请叶菲莫夫给你捎去一封信，我没来得及，因此托济娜伊达·卡夫利洛夫娜将我的信给你带去。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再给我寄一些桃子。

红色瓦西卡

1934年9月26日

附录三 叶菲莫夫致弗拉西克

(1935年9月22日)

您好，弗拉西克同志！

现将我们的工作情况向您通报。第一，斯维特兰娜和瓦夏身体都很健康，自我感觉也很好。

斯维特兰娜学习很好。瓦夏学习不好——懒惰，校长已经给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打了三次电话，说瓦夏有一天没上化学课，过了几天又借口说没有准备好功课而拒绝上地理课。笔记本的书面作业是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的，一会儿是黑色，一会儿是蓝色，一会儿是红色，而学校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在学校里他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忘记带作业本，就是忘记带钢笔，而另外一支钢笔不能用，这样就不做作业了。9月7日他根本就没去上学，说嗓子痛，可又不让医生看他的嗓子，体温也很正常。休息日也不做功课。依我看，他不去上学并不是因为咽喉病，而是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嗓子痛是他为了不去上学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瓦夏非常喜欢踢足球，经常是每隔一天放学后在学校踢足球，回到家已经不是下午3点钟，而是晚上6~7点钟，自然很疲倦，做功课就有点困难。况且，根据“斯·同志”的命令，我已经解雇了他的男家庭教师，而瓦夏和女家庭教师只是学习德文，其他学科他从不请教她，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

9月17日又有两门课得分是“差”，而这种“差”的分数已经有5~6次了。

几天以前，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在瓦夏的衣袋里发现了10卢布，卡罗琳娜问他是哪里来的钱，瓦夏回答说，这不关她的事，然后又说，这是他卖集邮册的钱，还说这个集邮册是某个人送给他的礼物。

9月19日，他在一页纸上全部写上自己的名和姓，而在最后写的是：“瓦夏·斯…（被写满了）生于1921年3月，死于1935年9月20日”。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将此事告诉了我。字条我没有看到，因为卡罗琳娜已经将字条销毁了。这张字条使我们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是不是他已经打算干什么了？

我同他的关系经常是很好的，但有时他也任性。

在克里姆林宫还有托姆同他住在一起。每个假日孩子们都是在祖巴洛沃度过的。

总之，瓦夏感到自己是个成年人了，总是固执地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想法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他有分歧。由于我给他讲道理和劝说，这些分歧现在差不多消除了。

向大家致敬

叶菲莫夫

1935年9月22日

二 关于瓦西里致马尔特申^①

(1938年6月8日)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感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忙，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并不总是诚实的，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是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爹”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的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学生遵守学校的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还有这样一些老师，他们不放纵这些纨绔子弟。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敬礼

约·斯大林

1938年6月8日

^① 马尔特申是瓦西里的老师。

附录四 拉·贝利亚^①致约·斯大林

(1938年12月8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派去的那位同志将信转交给了卡恰航空学校的校长——旅级指挥员伊万诺夫同志。这位同志在当地已经了解到：学校的领导知道瓦夏要来后，为他做了特殊的安排，这种安排违反了学校现有的给学员规定的统一的条件。

瓦夏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那天，学校政治委员、团级政治委员谢苗诺夫同志和特别处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车站迎接他。在去学校的路上，瓦夏对谢苗诺夫同志说：“今年爸爸要来塞瓦斯托波尔休假，大概顺便要到卡恰看看”。

没有将瓦夏安置在学员的宿舍里，而是安置在为客人准备的单独的小楼里，也就是所谓的学校宾馆。

在最初的日子里，伙食是在指挥员的食堂里专门为他准备的。有一次，瓦夏点的是东方菜，而当地的厨师没有人会做这道菜，于是就专门派人到塞瓦斯托波尔城里去打听怎样做这道菜。

瓦夏曾经有三四次乘坐学校领导提供的汽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穆赫拉特卡，用高频电话与莫斯科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通话。

今年11月24日，瓦夏和学校参谋长格拉西缅科在校园内骑摩托车。瓦夏跌了一跤，脸和手都擦破了皮。根据瓦夏的请求，格拉西缅科把这件事对学校领导隐瞒了几天。

在编队还没有装备好之前，有教员单独辅导瓦夏飞行方面的理论知识，学习《Y-2》型飞机和《M-11》型马达的材料组成部分，以及飞行的规则。

我在给卡恰航空学校的校长伊万诺夫同志和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雅库舍夫同志的信中，已做了如下指示：

1) 撤消不适宜的公开的警卫，为了保证瓦夏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应采取隐秘的保护措施。

2) 对瓦夏的关心和照顾不应表现在给予他一些违反航空学校规章制度和

内务条例的特殊待遇，而是应该帮助他很好地学习和掌握学校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遵守学习和生活纪律。

拉·贝利亚

1938年12月8日

① 贝利亚，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1889—1953），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附录五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生活得很好。正在学习很多东西，目前还比较顺利。

我已经给自己找到了朋友——米沙·列宾，这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小伙子。

我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我想，没关系，最终我会被接受的。

总之，我生活得很好，很快乐。又增加了新学员，所有的人都是从莫斯科来的。一共15人。

我们这儿的天气又变坏了。北风刮得很厉害，目前的天气情况还可以飞行，我也在飞。

再见，爸爸！

你的 瓦夏·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

附录六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9年11月13日)

卡恰城

你好，亲爱的父亲！

你身体好吗？

我的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还在学习，飞得也很好。看来我没有理解您的那封信，是斯维特鲁什卡弄错了，她对你说，我想节日前夕回到莫斯科，而你也允许我回去。

爸爸！在没有毕业之前，我不会回去的，尽管我也很想念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决定坚持，因为我认为，我毕业后再回去同你团聚，你才会高兴的，这样我也将会更高兴。我想，你会理解我并同意我的这种想法。这似乎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切。

我们这里天气还好，不过，已经有点开始变坏了。这样，飞行就不得不减少了，但暂时还行。

这些就是关于我和卡恰的一切。

从克里米亚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

期望尽快见面。

你的 瓦夏

1939年11月13日 卡恰

附录七 瓦·约·斯大林的毕业鉴定

(1940年3月25日)

副本

卡恰亚·费·米亚斯尼科夫红旗军事航空学校学员斯大林，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毕业鉴定

1921年生，格鲁吉亚人、学生。自1939年起为联共（布）预备党员。学历：普通中学。1938年12月加入工农红军。

政治思想状况：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事业，忠诚于社会主义祖国。政治思想坚定，道德品质可靠。能够保守军事秘密。能够正确理解并且积极关心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全面。在工作和政治方面，在同志中间享有较高的威信，积极参加部队的集体生活。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坚持不懈，对于已作出的决定能贯彻到底。作为分队长，对下属要求严格，关心下属的需求。有时在同上级指挥员谈话时态度有些生硬。本人遵守纪律，能够给其他人作出榜样，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同志，理论知识成绩优秀。驾驶技术成绩优秀。更感兴趣的是各个学科的实践课，对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重视不足。密封驾驶室飞行和领航飞行掌握良好、有氧高度飞行优秀、编队飞行优秀。热爱飞行，但对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不够细心，必须对飞行前的准备进行监督。身体状况良好。队列训练成绩优秀。

根据本人素质和飞行素质，可作为歼击机飞行员，为歼击机部队所使用，有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因为所有的科目和驾驶技术成绩均为优秀。

飞行教练 大尉（马连科夫）

瓦·斯大林已看过鉴定

1940年3月21日

上一级首长的结论：

同意鉴定。

支队长 大尉（斯留萨连科）

1940年3月22日

鉴定委员会结论：

鉴于所有的理论和飞行科目的成绩均为优秀，可以毕业。

有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并任命为歼击部队 И-15 飞机的飞行员。

第二飞行大队指挥员

少校科罗勃科

第二飞行大队政委

主任政治指导员 米亚斯尼科夫

1940年3月23日

学校首长和军事委员会的结论：

对飞行事业有兴趣。飞行技术成绩优秀，热爱飞行。学习过的理论科目成绩优秀。可以作为初级飞行员在歼击机部队服役，并授予中尉军衔。

临时代理的学校领导 上校 里亚勃钦科

学校军事委员 团级政委 谢苗诺夫

1940年3月25日

正本确认：

红军空军第三管理局第一处处长上校（签字）

附录八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斯大林

(1941年3月4日)

你好，亲爱的父亲！

你的身体好吗？感觉如何？

不久以前（22号，23号，24号的半天），奉雷恰戈夫^①的召唤我到了莫斯科，我非常想见到你，但他们对我说，你正忙着不能见我。

雷恰可夫召我来是因为学习的事情。我们这里又不让我飞行了。他们担心出什么事儿。他召我来并狠狠地训斥了我，因为我认为与其学习理论知识，还不如去飞行，并向领导证明必须飞行。他还命令我把这次被召见和谈话之事向你汇报，但是，我没有见到你。

雷恰戈夫到底还是下了命令准许我飞行，别人飞多少次，我就飞多少次。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飞行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就不得不重新学习飞行了。

总之，班里的全体学员都期待着能飞得更多些。

在柳别尔齐^②和其他一些部队都使用了新型的飞机，如：米格、雅克、拉克，而在我们训练队，航空大队的指挥员们还都在使用老式的、看了都让人可怕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是伊-15P。

真弄不明白，今后我们将去指挥谁。要知道，6月份前绝大部分部队都将装备新的飞机，而我们，航空大队未来的指挥官们，对这些新的飞机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因为我们还在驾驶着老式的飞机。在伊-16型飞机上，我们仍然使用以前的M-63和M-62发动机。我的意见是最好教我们使用105和35型发动机和雅克、米格飞机，因为我们到部队时将不再飞伊-15和伊-16飞机了。而一个指挥员如果不了解新装备，他就无法指挥使用这些装备的飞行员。

学员们都收到了部队同志们的来信，说实在的，大家都很遗憾没有在部队里，现在，学员们并非愿意使用这些旧飞机，而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都飞过1000至2000个小时，差不多都是勋章获得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有了更好的新型飞机时，他们自然

不愿再使用这些旧式飞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我反正使用什么样的飞机都一样，因为我实践经验还很少。他们当然是想要新型的了。

同时还有这样的情形：这些老式飞机不能保证顺利地完成飞行。比如：大灯脱落，机翼机枪的电刷脱落。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很少能顺利结束。能应付飞行只是因为驾驶这些老式飞机的是一些特别有经验的飞行员。

父亲，关于我和训练队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

父亲，如果有时间，请给我回信，那怕一行字也好，这对我来说将是最大的快乐，因为我非常想念你。

你的 瓦夏

1941年3月4日

① 雷恰戈夫，П. В.，空军中将，红军空军司令员。1941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同年4月被免去一切职务。

② 苏联莫斯科州的一个城市，铁路枢纽。

附录九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秘书处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去前线的事宜
致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部的报告
（1941年8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

西林同志（亲收）

兹报告：在您电话询问关于父亲^①是否同意瓦·约·伊万诺夫^②同志出差的事宜后，我给工农红军空军管理总局副参谋长、上校别利亚耶夫同志打了电话，他通报我说，父亲同意，并说关于这一点好像是伊万诺夫同志亲口对他讲的，日加列夫^③同志也向他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给您的报告。

我同上校别利亚耶夫同志电话交谈时，中尉叶菲缅科同志在场，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潘诺夫

1941年8月26日

① 父亲，指约·维·斯大林。——本书制作者注

② 瓦·约·伊万诺夫，即瓦西里·斯大林。——本书制作者注

③ 日加列夫，巴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900—1963），时任苏联红军空军司令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三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943年5月26日)

致红军空军司令员

空军元帅诺维科夫^①同志

我命令：

- 1) 立即免除上校瓦·约·斯大林的航空兵团团长职务，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之前不许给他任何指挥职务。
- 2) 向该团和该团原团长斯大林上校宣布：斯大林上校由于酗酒和放纵自己，以及腐化和败坏该团风气而被免除团长的职务。
- 3) 报告执行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6日

^① 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00—1976），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员。

附录十 获苏沃洛夫勋章的第 286 涅仁斯基红旗歼击航空师师长
近卫军上校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
截至 1945 年 6 月的鉴定书

(1945 年 7 月 20 日)

1921 年生，格鲁吉亚人，1940 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学历：普通教育——10 年，军事教育——1940 年在卡恰亚·费·米亚斯尼科夫红旗航空军事学校培训班学习，1941 年在空军乌克兰歼击航空学院一年级学习，1943 年没有毕业。无政治学历。1938 年起参加红军，并在空军服役。在卫国战争前线参战 3 年零 9 个月，1938 年起成为干部军官。1940 年初次获得军衔。健康状况较差：双脚、椎骨都有毛病，特别是在工作量大、过于疲劳时，神经系统就会不适。卫国战争以前在红军空军总局任飞行技术教练员。曾于 1942 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43 年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944 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45 年被授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1942 年荣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奖章，没有受伤。自 1945 年 2 月起担任领导职务。

鉴定书文本

驾驶过的飞机：波-2，教练机-2，伊-15，伊-5，伊-153，利-2，伊-4，米格-3，拉格-3，雅克-1，雅克-5，雅克-7，雅克-9，伊尔-2，波斯顿-3，特斯-3，拉-5，拉-7，飞行总时间——3145 小时 45 分。在卫国战争期间共进行战斗飞行 27 次，空战中击落 2 架敌机。

自 1941 年 6 月 22 日赴前线参加卫国战争，任红军空军歼击航空大队队长助理，后任歼击航空兵团团长。航空兵团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由于顺利地完成任务，不止一次地受到最高统帅部的嘉奖。

自 1944 年 5 月 1 日起担任红军近卫歼击航空学院飞行技术教练员，此后，担任第三近卫歼击师师长。

该师在斯大林同志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下列城市的战斗行动：明斯克，维尔诺，利达，格罗德诺，波涅维日，沙乌良义和叶尔加瓦，在这些地区共进行了 1781 架次的战斗飞行，进行了 30 次空战，击落敌机 16 架。

在进行战斗行动的同时，对没有经验的新飞行员进行了战术训练。该师的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好。

1945年2月，斯大林同志被任命为第286歼击航空师师长。在进行柏林战役的准备期间，部队又增加了50架“拉-7”^①飞机，装备一个团。

在重新学习新技术期间，斯大林同志亲自进行了11次训练练习飞行，顺利地完成了重新学习的任务，并把全团训练好使其能进行“拉-7”飞机的战斗飞行任务。

在柏林战役期间，该师的各部队顺利地进行了961次战斗飞行，进行了15次空战，共击落了15架敌机，其中有11架是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击毁的，而自己只损失了1个机组。

斯大林同志本人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他还将自己的战斗经验传授给了下属。

在工作中，他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并要求下属具有这些素养。执行命令准确无误。

空军第16军军长 空军上将 鲁坚科

确认；

莫斯科军区空军干部处主任 中校（库采罗）

^① 拉-7，由设计师C. A. 拉沃奇金设计的一种飞机。

附录十一 关于瓦西里·斯大林健康状况的报告

(1950年12月9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亲收！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您报告一下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健康状况。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患有神经衰弱、慢性胃粘膜炎和贫血等疾病。上述疾病是由于长期严重酗酒所造成的。

今年11月16日（大约是夜里1点钟左右，正在家里看电影时），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突然癫痫病发作，当时完全失去了知觉，全身痉挛，并咬伤了舌头，满嘴吐白沫。

第二天，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安置在巴尔维哈疗养所，一直到11月26日才稳定了病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他体重增加，食欲改善，睡眠好了，神经系统的兴奋现象也减少了。遗憾的是，在最近的7~10天里，瓦西里·约瑟夫维奇又重新开始大量地饮酒，结果是又出现了严重的中毒症状（厌食、消瘦、神经常常出现兴奋现象、睡眠不好）。

医生劝告并要求他戒酒，可是没有任何作用。我恳求您给予协助。

我认为最好是让瓦西里·约瑟夫维奇在巴尔维哈疗养所多住一些时间（不少于2个月）。在疗养所里可以顺利地帮助他恢复健康。

可是一出院，由于瓦西里·约瑟夫维奇严重违反了一般的规定，又重新开始严重酗酒，因此他的身体很快又垮了。

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管理局

局长 П. 叶戈洛夫

1950年12月9日

三 斯维特兰娜^①

附录一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

你好，我亲爱的、可爱的爸爸，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亲爱的爸爸，我已经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我非常喜欢那里，学校里很快就放映电影了。

女家庭教师已经到我这儿了。我现在学习德文，学习弹钢琴。爸爸，尽管你不在，我很想念你，但我还是愿意让你在那里好好休息。热烈地吻你。

全体向你致敬

你的 萨丹卡

1933年10月1日

^① 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斯大林的女儿。生于1926年，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2年进入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曾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1967年4月去了美国。196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其苏联公民权。——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二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34年9月14日)

亲爱的爸爸！

谢谢你的信^①和桃子。桃子非常好吃，我每天都吃。爸爸，您问我还需要寄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了，这里什么都有。我学习很好。现在功课比以前多了。目前我在学校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这里每节课要50分钟。昨天，我们全班去了农业基地。给我们上课的是另外一位女老师，农业技术员，她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蔬菜的一些知识。我们要把这些蔬菜画下来并交给学校。

休息日我去了祖巴洛沃，在树林里玩了一整天，天气特别好。这里天气总是很好，只是今天有点不好，很冷，还下了雨。

再见，亲爱的爸爸。

热烈地吻你。

你的 萨丹卡

1934年9月14日

① 指斯大林在1934年9月8日写给斯维特兰娜的信。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引用了父亲的话：“谢谢你的信，我的小萨丹卡。送去一些桃子，50个给你，50个给瓦夏。如果还需要桃子和其他水果，给我写信，我给你送去。吻你。”

附录三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34年10月2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今天，米·伊·加里宁给我带来了你的信。非常感谢你的信。也谢谢你捎来的桃子和石榴。这两种水果我都非常喜欢吃。

莫斯科现在正是秋天，再暖和的天气不会有了。

最近的那个假日，天气很不好，我也没有去祖巴洛沃。白天去了大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红罂粟》。我很喜欢这个芭蕾舞剧。

我学习还像从前一样，很好。现在给您写完信，我还要给国外的少先队员写信。今天，我们这里举行了小星星集会，我们决定给国外的十月儿童和少先队员们写信。

我很想给少先队员们写信。

祝你一切都好。

热烈地吻你。

你的 萨丹卡

1934年10月2日

附录四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40年8月22日)

我的亲爱、可爱的爸爸，你好！

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没有我和瓦夏在你身边，你是否感到很寂寞？爸爸，我太想念你了，总是盼着你能来，可是你总是没时间、没时间。“我已经生气了”。你又在哄我，说什么没有指令不能来，啊——呀——呀！

这不好，一号书记同志，哄骗自己的女主人！

据说，莫斯科的天气不太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经常下雨，而我这里天气很好；我29日动身回莫斯科，31日能到达。

我们是9月2号开始上课，因为1号是星期天，休息日。现在地理课可要有麻烦事儿了：又新增加了5个共和国，面积增大了，居民数量增加了，工业企业的数量也增加了——而教科书却还是1938年的。尤其是，今年我们还有苏联经济地理课——而教科书中很多内容都没有。我已经看过了这本教科书；尽管它有两个指头那么厚，但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即所谓的艺术装帧——各种图片，风景画，例如：索契、马采斯塔以及所有疗养区的风景，总之，都是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图片。

对了，空军阅兵式你喜欢吗？是比去年的精彩一些呢，还是和去年的一样？不久前，我去了旧马采斯塔，那里修建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笔直的，很平整，非常漂亮。一条非常出色的公路。总之，索契变得干净和整齐了，甚至漂亮得很显眼。

我已记不得，我是否已写信告诉你，我乘坐旅客滑艇——特别快船——的事情。据说，报纸上报道它的航速是每小时90公里，而实际航速每小时不超过65公里。但这已经很好了。糟糕的是，只要有一点小风浪，它就不能开了，否则，海浪会把它折断的，因为它的形状就像是用一根横木连接起来的两只小船，里面只能容纳50个人。

爸爸，你一接到我的信，就立即给我回信，否则，你过后又忘了，或者又是很忙，而我自己也快回去了。

好了，吻你，热烈地，热烈地，再热烈地，我亲爱的爸爸。
盼望尽快见面。

你的 斯維特兰娜
1940年8月22日于索契

向我的全体书记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附录五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43年9月19日)

古比雪夫市

我可爱的爸爸，我亲爱的人，你好！

你生活得怎样，我亲爱的书记同志？我这里一切安排得都很好，我已经开学了。所有的同学都是从莫斯科来的，熟人特别多，因此也就不寂寞了。

我亲爱的爸爸，每当我去什么地方时，我总是想念你，但现在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念你。假如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坐飞机马上飞回去，住上2~3天（这里每天都有“道格拉斯”飞往莫斯科）。坐火车实在令人腻烦。而坐飞机，假如你允许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飞回去。

不久以前，马林科夫的女儿和布尔加宁的儿子都飞回了莫斯科。既然他们可以坐飞机，我为什么不能坐呢？他们和我年龄相同，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强。

这里的天气原来很好，很暖和，而现在却变得很冷，常常下雨。我不很喜欢这个城市。像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样，这里很脏，风沙很大。（不知为什么）这里有很多跛腿的、失明的、歪肩的、罗圈腿的、残手的和其他方面的残疾人。在大街上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还有很多乞丐和流浪儿。

（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奥德萨和其他城市来到了古比雪夫。当地居民对于外来的人怀有不加掩饰的敌意。他们认为外来人要对物价上涨、食品短缺、经常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排队买东西的情况负责。古比雪夫人还说：“瞧，各种穿着华丽、打扮漂亮的人陆续来到了这里，这样希特勒就要飞到这里进行轰炸了！”

唉，爸爸，我是多么想飞回莫斯科呀，哪怕在莫斯科呆上一天也好啊！！爸爸，怎么德国人又钻出来了呢？！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地、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呢？总之，绝不能让他们把重要的工业区都占领了！

爸爸，我对你还有一个请求。雅沙^①的女儿加利娅现在在索契。如果需

要的话，请将奶奶、爷爷，总之所有的人都是从那里转送到其他的什么地方去。我多么想能把加利娅带到我这里啊。要知道她那里现在什么人也没有了。

但这一点只是在所有的人都应该离开索契的情况下才需要。而目前还是让他们呆在那里吧。

亲爱的爸爸，我非常想见到你！你现在大概特别忙，这样你就要好好睡觉，否则我这里就会得到情报，说你睡觉太少。这是不允许的，尊敬的书记同志！

好了，祝一切都好，我亲爱的爸爸。

等待你批准我飞回莫斯科。只要两天的时间！吻你，热烈地，再热烈地！！！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因此没有打电话。如果愿意，请给我打电话，从9点到12点（晚上）。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学校里。也可以早晨挂电话——从10点到2点。

再无数次地吻你，我的亲人，我亲爱的爸爸。

斯维特兰娜

1943年9月19日于古比雪夫

① 即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六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45年12月1日)

亲爱的爸爸，你好！

我还从来没有像收到你的信和柑橘那天那样开心呢。你是正确的，实际上，我现在已经不是小麻雀了，而简直就是一只“乌鸦”了。因此，收到你的信和包裹要比我还是“小麻雀”时更让我高兴。甚至就连小儿子也品尝了橘汁，但是，目前除了粥以外，他对什么都没有概念。

你身体健康，休息得好，我非常非常高兴。否则，不习惯没有你的莫斯科人又会开始传出流言来，说你病得很严重，某某医生去给你看病了。不管怎样，这都是很让人害怕的，而且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是真的。要知道，你的那些“忠诚卫士”对我什么也不说，什么都保密……

一句话，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你没有生病，而且休息得很好。亲爱的爸爸，请继续保持这一点，现在你什么也不要做了，好好休息。

最近，莫斯科的天气完全变暖了，零下1度到零上2度，很潮湿，令人讨厌。人们接连不断地患上流感和伤风。除此之外，最近半个月来，每逢夜晚就有一些匪徒和流氓进行抢劫和杀人活动，莫斯科人感到很害怕。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甚至在市中心地区（例如，高尔基大街）人们都害怕天黑以后上街，特别是进黑暗的小胡同里。

今天，有人对我说，有一种传闻，说“斯大林已经回到了莫斯科并发布了命令，要在新年之前消灭匪徒和小偷。人们总是这样想，如果什么事情和你连上，那就好了……

爸爸，关于热尼娅，我感到你产生这样的怀疑只是因为她很快又重新嫁人了。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关于这一点她本人对我讲了一些，我没有问她。等你回来时，我一定要对你说说，因为，对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是令人很不愉快、很可怕的，也有些令人难为情。

而且，事情并不在于热尼娅和她的家庭悲剧，而在于原则性问题：请想一下，他们也着实对你说了很多诽谤我的话！……是谁呢？……算了，让他们见

鬼去吧。

亲爱的爸爸，让我热烈地吻你，感谢你的非常好的信，紧紧地拥抱你，吻你。

爸爸，请你给我指明“方向”——在欧洲将会发生什么？——我什么也不弄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我们，都在对我们大吼大叫。

（同时还有这样的新的俏皮话：“戴高乐穷极生智”。）

反正我等待着你回莫斯科。

也可能，爸爸，你将再给我寄一封这么好的信？

吻我的爸爸。

你的 萨丹卡

1945年12月1日

附录七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48年11月2日)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

急忙向你通报我这里最有趣的新闻：像所有的五年级的大学生应该做的那样，我也教课了，教的是十年制学校的历史课。令人高兴的是，我是在我曾经学习过的那所学校的十年级上的课——以前教过我的老师都鼓励我，这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我的课的题目是：1)《专制制度被推翻后俄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917年）》以及2)《七月危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对讲的课征求了意见并补充了新的材料。自然，还有很多缺点，但总的来说，对我的课还是评价很好的。

爸爸，瓦夏和我都想像去年那样，到你那里过节。8号我们可以飞到你那里，因为7号瓦夏他们将在红场进行空军阅兵式。恳求你能批准我们，三、四天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就让弗拉西克打电话通知我们。

热烈地吻你，亲爱的爸爸，并期望尽快见到你。

你的 斯维特兰娜

1948年11月2日于莫斯科

附录八 斯维特兰娜致斯大林

(1952年2月10日)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好！

我非常想见到你，向你讲述我目前的处境。我非常想一个人面对面地向你倾诉一切。我曾经几次想这样做，但是，一想到你目前身体欠佳，工作繁忙，又不忍心去打扰你了。

首先，我对能在社会科学学院学习感到非常高兴，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不错，大家对我似乎也挺满意，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了。因为，在家庭不和的时候，能做我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也就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至于说到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丹诺夫，还在新年前夕，我就已经决定同他彻底分手了。这完全是必然的结局，因为我们差不多已有半年时间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不知道谁是谁了。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证明了——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我对他来说既不珍贵，也不重要。此后，又要求我把女儿留给他。不！对这个无情无义的教授、没有心肝的“学问家”我已经受够了。让他去啃他的书本吧，他完全不需要家庭和妻子，他的众多的亲戚们是完全可以代替他的家庭和妻子的。

总而言之，对于我们的分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可惜的只是在这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身上我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美好的感情。

由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纯物质方面的问题，我想同你商量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帮助（靠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施舍过日子我会很不愉快的），但我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小儿子秋天就要上学了，而且我的老保姆也住在我这里（她现在已经退休了）。

钱我现在还有一——还是你给的那些——所以问题并不只是在钱上。

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我再告诉你原因吧，但这都是些不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爸爸，我仍然很希望见到你，请你千万别生我的气，说我对你先斩后奏了，以前你不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吗？

最最热烈地吻你！

让你操心的女儿

1952年2月10日

附录九 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致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斯·约·斯大林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格·马·马林科夫

我深深感谢政府和您本人在这悲痛的日子里^①给予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同情和关心。

与此同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谢绝提供给我的家庭的那些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没有必要的，我认为我们不能享受这些权利：

- （1）谢绝把“沃伦斯科耶”别墅及其服务设施指定归我们家使用。
- （2）谢绝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生活补贴。

我请求不要指定“沃伦斯科耶”别墅归我们家使用，但请求您允许我有权在夏季的时候，在卢布列沃-乌斯宾斯基公路边上的茹科夫卡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里租用2~3个房间，房租另付。

再一次表示谢意！

敬礼！

斯大林娜

1953年3月21日

^① 1953年3月5日，约·维·斯大林逝世。

给“兄弟”

就“改姓”问题答布洛欣^①

(1924年9月3日)

致布洛欣同志

副本

1924年9月3日

(尼扬多马镇，铁路北，

工人村，第38号)

亲爱的同志，我不反对改姓斯大林，相反我会十分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我有了一个弟弟（我没有兄弟，而且从来也没有过）。

只要一有可能，我将设法写一篇文章。至于改变姓氏的手续，要找省委会行政管理处询问。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① 1924年7月29日，工厂技校学员、17岁的布洛欣给斯大林写信，信中提出打算改姓斯大林，以“表示对列宁宠爱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敬仰”，还汇报了他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斯大林给他回了这封信。

附录 布洛欣请求改姓“斯大林”的来信

(1924年7月29日)

1924年7月29日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您当然不认识我，甚至也没有听说过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在苏联数以百万计，而我则从报纸、杂志上认识您。

在我订阅的《接班人》杂志上读到，说您是伊里奇宠爱的学生，我为之深受鼓舞，我本以为伊里奇没有宠爱的学生。

我以共青团的名义请求您在《接班人》杂志上写文章谈一谈作为导师的列宁，因为这本杂志是青年工人的指路人。希望这个请求能够得到满足。

现在我对您提出一项私人的请求，不过在说明这一请求的实质内容之前，我要说一说自己的经历。

我1907年10月3日出生于切列波韦茨省，切列波维茨县，乌西谢夫斯克乡，拉夫罗沃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从12岁开始就从事裁缝手艺。在农村住了几年以后，把我送到彼得格勒市，我在那里住过5年左右，把我送回农村，从那里又到了巴巴耶沃镇。当然我不是一个人来去，而是跟着父母亲一起。在巴巴耶沃镇人们向我们谈到尼扬多马。说那里很好，于是，很自然，父亲就带着我和母亲去了。到了尼扬多马，我们定居了下来，一直住到现在。父亲开始工作，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如今一直住着。

我读完了统一传统制小学的7年级，转到8年级，但我已不愿在二年制学校学习，因为它教不了许多东西，我转入尼扬多马的工厂技校。

下面我谈谈我的政治活动：尼扬多马的共青团是1919年建立的，但我当时甚至并不知道。到1921年从同伴那里知道尼扬多马有共青团组织以后，我很感兴趣，想打听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参加。回到家里我说：“我可以申请参加共青团了。”我还没有讲完，母亲就骂了起来。她的原话是这样的：“每天夜里像流氓一样游逛，又不上教堂做礼拜，这就是共青团教出来的人。在我家里你敢，看我怎么揍你。”这就是我想参加共青团得到的结果。父亲不

知道为什么没有讲话，不过他一般话很少。于是，我决定先通过看书研究共青团，同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摆脱父母亲枷锁的那一时刻的到来。

又过了2年，而我还是未能加入共青团。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是1923年3月30日，在复活节之前。俄罗斯共青团区委委员到二级中学召开大会，讲解共青团的宗教[旨]和他们如何过复活节。我和一个同伴写了张纸条，要求二级中学组建共青团支部。他回答说可以，并且宣布愿意参加共青团的会后留下来。

会后有13个小伙子留了下来，但谁也不走近桌子去。我决定报名，便毫不胆怯地走了过去，说了自己的姓、名和父名。其他12个人也在我之后跟了过来。

随即选举支部书记，结果我当选。

回家后我示威性地扬言：“我已报名参加了共青团，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不会退出。”

开始骂我，并决定不给靴子，不给面包，以为这样我就会清醒过来，而在3月里光着脚是无法走远的，但我并不泄气。早上该上学了，我不起床，等着来喊我。果然，母亲终于走过来说：“懒鬼，起来吧，想睡一整天，不上学了？”我说，“给我靴子，我就去。”给了靴子，但条件是一定要退出共青团，而且不给吃任何东西。到了学校我向同学要了面包，吃得很饱。有几个同学跟我讲了和我相同的遭遇。有3个人真退了团，但3天以后又偷偷来参加，他们至今还担任团的工作。到学校以后，我们以为谁也不会再触犯共青团，但是多数年轻人开始骂我们，还编唱嘲笑共青团的歌。

回到家里，问我退出了没有。我坚定地回答说：“没有，也不会退出。”当然又是一顿责骂，而且3天不给吃喝，但仍要我上学，我就在学校吃饭。不过最后还是父母亲让了步，我开始不受干扰地开展团的工作。担任了7个月支部书记，5个月墙报编辑，等等。有时不得不放弃学习搞团的工作，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升到了二级制的三年级，在这一年级我几乎不学习了。目前，在镇上的工厂技校学习。

这里的工作也多得不可开交。我现在担任以下工作：

1. 工厂技校团支部委员；
2. 政治学习小组秘书；
3. 联系农村委员会主席；
4. 列宁主义学习小组秘书；

5. 联系海军小组秘书；
6. 航空之友协会会员；
7. 国际革命战士援救会会员；
8. “青年建设者”墙报通讯员。

不过，我想写得够多了，言归正传吧：我是一个年轻的列宁主义者，前几天举行了政治测验，我通过了第3级，这是最强、最好的一级。作为列宁主义者，我学习列宁的遗训，参加第3级的列宁主义小组。

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也希望纪念列宁，为此在家里设了一个“列宁之角”，安放有一些书籍和宣传画。不过没有文章。

列宁去世以后我本想把自己的姓布洛欣改为列宁，不过考虑以后，认为自己不配有这样的荣幸。

于是，我决定把自己的姓改为您的姓，即斯大林。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您改姓斯大林？”我将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列宁宠爱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敬仰。”

为此我想请问您对此有无反对意见。如果没有，请您向我说明，我该到哪里去办和能否改姓。

我曾向一名党员说过此事，他说要到18岁以后，小于18岁不行，而我只17岁。

请快答复，因为学习就要结束，我也许要到别处去。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地址如下：

尼扬多马镇，铁路北，工人村，第38号工厂技校学员

布洛欣

谈化名

“斯大林”的由来^①

(1933年12月25日)

最后，记者问斯大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名字的，为什么？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

这个名字是1911年或者是1912年同志们给我起的。他们认为，这个名字适合我，我也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我们老一代地下工作者总是使用类似的化名，因为不得不躲避沙皇政治密探。

原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9年第5期

^① 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在同美国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的谈话中谈到了自己的这个化名一事，这段话当时没有发表。

谈 书 论 文

个人藏书分类表

给图书管理员。我的建议（和请求）^①

1. 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 (1) 哲学；
- (2) 心理学；
- (3) 社会学；
- (4) 政治经济学；
- (5) 金融；
- (6) 工业；
- (7) 农业；
- (8) 合作社；
- (9) 俄国历史；
- (10) 其他国家的历史；
- (11) 外交；
- (12) 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 (13) 军事；
- (14) 民族问题；
- (15) 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
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机构
(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① 这是斯大林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个人图书室而开列的给图书管理员的分类表。

- (16) 工人状况；
- (17) 农民状况；
- (18) 共青团（所有单独的出版物中关于共青团的一切）；
- (19) 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 (20) 关于1905年；
- (21) 关于1917年二月革命；
- (22) 关于1917年十月革命；
- (23) 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 (24) 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 (25) 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等）；
- (26) 工会；
- (27) 小说；
- (28) 文艺批评；
- (29) 政治杂志；
- (30) 自然科学杂志；
- (31) 各种辞典；
- (32) 回忆录。

2.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籍拿出来单放：

- (1) 列宁的书；
- (2) 马克思的书；
- (3) 恩格斯的书；
- (4) 考茨基的书；
- (5) 普列汉诺夫的书；

- (6) 托洛茨基的书；
- (7) 布哈林的书；
- (8) 季诺维也夫的书；
- (9) 加米涅夫的书；
- (10) 拉法格的书；
- (11) 卢森堡的书；
- (12) 拉狄克的书。

3.所有其他书籍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

原载《斯大林文集》第17卷
俄罗斯北方王冠学术出版公司
2004年出版 第191—192页

和阿利卢耶娃通信^①中 谈到的书

(1930年9月—1931年9月)

附录一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摘录)

(1930年9月5日)

给你寄去你要找的书，很遗憾不是全部，因为**英语教科书**^②我没能找到。我模糊地记起，这本书好像是放在索契的小房间的桌子上的那一堆书里。如果索契没有，那我也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真是倒霉。

一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摘录)

(1930年9月8日)

信已收到，书也收到了。缅什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我这儿没有（按照罗捷塔尔的方法编写的）。你再仔细找找然后给我寄来。

附录二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摘录)

(1930年9月12日)

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你的那本**教科书**，我给你寄去另一种版本的。不要生气，哪儿也找不到。

① 见本卷第35—51页。——本书制作者注

② 书名的粗体是本书制作者用的，下同。

附录三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摘录）

（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给你寄去你要的**电工技术**方面的书。增补版的书我已经订购了，但是今天还没收到。下一次邮班你会收到的。还有，**德文读物**——我把我们家里的都寄去，**成人教科书**也通过下一次例行邮班寄给你。

二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摘录）

（1931年9月14日）

电工学方面的书《**中等技术工作手册**》收到了。塔奇卡，请再给我寄一本关于**黑色冶金学**^①方面的《**中等技术工作手册**》。一定给我寄来（你到我的图书室看看——在那里找找）。

三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摘录）

（1931年9月19日）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

附录四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摘录）

（1931年9月21日）

给你寄去《**黑色冶金学**》。因为没有好的评论人，所以，新出版的书中也选不出什么很有趣的可给你寄去的。

① 黑色冶金工业指铁（有时也包括锰、铬、钛和钒）和铁合金的生产，包括对铁矿石的开采与处理、炼铁、炼钢与轧钢成材等部门。——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五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摘录）

（1931年9月26日）

等到下一次例行的邮班时，如果你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你寄去一本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论斯大林和列宁》（这是一个叛逃分子写的），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寄去，因为德文斯基还没有弄回来，我也只是在自由报上读到的，报上说这是关于你的最有趣的资料。感兴趣吗？

五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摘录）

（1931年9月29日）

冶金方面的书已经收到了。

关于阅读康德等人著作 致加里宁的信

(1933年1月21日)

献给加里宁同志：

阅读巴克尔、米利、孔德、康德^①的著作，直到他们那些名词，比理解你，我的朋友，容易百倍。

约·斯大林

1933年1月21日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1卷第199页

（注：本卷所引历史档案除
另有注明外，均选自《苏联
历史档案选编》一书各卷）

① 四人均为欧洲著名古典哲学家。——本书制作者注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4年8月5日）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的述评不是偶然事件。我感觉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干的。如果编辑部以它没有收到我先前所写的并得到中央赞同的关于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的评语^①为托辞，那这纯粹是搪塞，因为通过阿多拉茨基^②同志编辑部肯定会知道这一评语。我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我们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杂志留在这些总是被季诺维也夫同志糊弄的糊涂虫手里。

应该揭露所有负有责任者，把他们从编辑部开除。最好把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撵走。……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① 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4—10页。

② 阿多拉茨基，时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

不能贬低列宁，也不能贬责恩格斯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4年（未注明日期）

（1）用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部文章不合适。第一，由于该文加上了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而使事情复杂化。把恩格斯和列宁加以对比是应该的。该文由于给这一对比补充了恩格斯和斯大林的对比而使问题复杂化。从策略角度来看是不恰当的，从事情的实质来看是愚蠢的。我提出了相应的不同意见。

（2）我开始对该文进行修改，从头至尾都读了，经再三斟酌，我认为此文不宜付印。显然，不能贬低列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贬责恩格斯，贬低他作为政治家的作用。可你们却把恩格斯说成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政治家，这不妥。

（3）我建议

①不是整个地提供一篇编辑部文章，而是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

②关于列宁在发展马克思模式中的作用的文章等我抵达之后再研究。

这件事很敏感，一封信不可能说清楚。需要面对面地、认真地交换意见……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还在写萨姆金吗？

——致高尔基的信

（1930年4月30日）

于莫斯科

向尊敬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致以热烈问候！

请原谅我没及时给您回信。

您的身体可好？

还在写萨姆金^①吗？

我身体挺好，我们这里情况也不错。混得过去。

紧紧握手。

您的 斯大林

1930年4月30日

本篇及以下各篇致高尔基的信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3辑和2000年第3辑

① 高尔基此时即将完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四十年间）》第3部的写作，斯大林通过《明星报》（1930年第1—8号）和《消息报》（1930年2月12日和4月12日）阅读了这部小说的片断。

关于《国内战争史》等书的编辑出版

——致高尔基的信

(1932年1月28日)

于莫斯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好不容易才脱开身来给您写回信。

整整两个月没给您答复，这当然很糟糕。但是您应该能想像我有多少工作要做：(a)要起草**1932年**的经济计划；(b)还要起草关于制订**五年计划**的指示；(c)还要布置远东的防卫；(d)还要处理容不得拖延的成百上千个现实问题……可我只是个普通人，而且远不是什么完人。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已经完成，现在多少还算有点空闲。

(1)《国内战争史》一事的症结不在于您看到的那些方面。您不想让文学家参与这件事——那就算了吧，关于这一点我不与您争论。此事的症结在于：(a)“大纲”不合适，要修改(我们需要的不是狭义的**军事史**，而是**国内战争史**)；(b)工作人员选择不当，对这个班子要作调整(得把金、明茨和他们的追随者撤换下来；让埃德曼主管此事不妥；加马尔尼克要去远东执行军务，3月初才能返回莫斯科)。

这就是《国内战争史》一事拖延的原因。——现在有望进展得快一些。

(2)您提出的关于出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一书(类似写俄国从资本主义之初到现在的历史)的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未必来得及在十月革命15周年纪念日之前把这件事办妥。大家都忙得要命，现实的问题就占去了我们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这时间也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们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看法。

(3) 关于《苏联的法规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通俗读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您认为应当**抓紧**出版此书。

(4) 如能将罗素^①的书中的一章寄来，我们肯定予以出版。

(5) 为英美出版社选书的事一定得做，我们一定从速办理此事并会将情况告您（和克留奇科夫^②）。

丘巴尔说他去过您处，看到您“非常健康”。这很好。请看在上帝的份上保重身体。

我的身体不错。曾一度（两周左右）失眠（疲劳过度！），后来就没事儿了，现在自我感觉极好。

我们这里情况不错。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抓冶金工业，——这是我国工业中**目前**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我相信，再有那么五六个月时间我们就能战胜这方面的困难。

好了，就此搁笔。

紧紧握手。

您的 约·斯大林

1932年1月28日

又及：1月31日收到您谈“科学院”出版社和约诺夫问题的最新来信。只好免去约诺夫在“科学院”出版社的职务了。

约·斯大林

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著名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本书制作者注

② П. П. 克留奇科夫，高尔基的秘书。

《国内战争史》一事比想象的要糟

——致高尔基的信

(1933年2月3日)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1933年1月16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您的热情话语和“赞扬”。无论人们怎样神气十足，他们对于“赞扬”还是不能做到无动于衷的。很清楚，作为一个人，我也不例外。

1. 关于《国内战争史》一事，看来，目前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些。给您寄去一份《国内战争史》秘书处关于出版前四卷的准备工作报告，以便您了解情况。从报告中您将看到，甚至不能保证在1933年6-7月份这个期限内出版前二卷。在秘书处成员和主编委员会会议上（我和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其他人不在莫斯科]），通过了关于前二卷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同志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正在列宁格勒。附上会议记录。

2. 关于“全苏人学研究所”事宜，只要一接到列宁格勒学者提出的具体方案，我们就立即推进这项工作。

3. 近期我们就进行喜剧（悲剧）竞赛，不让托尔斯泰走掉。保证一切都按您的要求去做。关于“奖金冠以斯大林的名字”，我坚决（坚决！）反对。

敬礼！握您的手！

又及：请保重身体。

约·斯大林

大公鸡对待珍珠粒的态度

——致高尔基的信^①

(1933年7月2日)

于莫斯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来信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信中的观点。我们的作家（为《国内战争史》一书写文章的那些作者）不懂得他们所处的位置有多高，不理解他们肩负的任务有多重。他们对这项任务的态度往往像克雷洛夫的著名寓言大公鸡对待珍珠粒的态度一样。您的信应当使他们变得清醒起来。

握手。

如果可以的话，我日内将去您处。

您的 约·斯大林

1933年6月2日^②

原载俄罗斯《新世界》杂志
1998年第9期

① 根据手稿刊印。下划线为斯大林所加。

② 原文如此，看来是笔误。此信标题下签署的日期是根据此信的内容并比照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的日期确定的。

附录一 美国出版商斯涅威克给托洛茨基的提议
以及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8月27日、9月8日)

莫斯科 托洛茨基部长

阁下：

我担心您由于我的第一封信^①写得简短而理解不透我所提建议的实质。为此我冒昧地把我的计划更加详细地描述一下，希望此后我的请求不再因为您抽不出时间而得不到满足。此外请您注意，我没有对实现我的建议规定任何期限。恳请您务必读读下面的东西。

真诚忠实的 塞缪尔·斯涅威克

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2年9月8日)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传阅）

附上美国报刊界提出的一个有趣的建议。

毫无疑问，提出建议的事实本身预示着美国资产阶级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从“苏维埃”观点来看发表这种文章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效果却是消极的，而且我认为，消极效果会大于积极作用。

因此我提议对此建议不予答复。

列·托洛茨基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2000年第3期

① 在美国出版商塞·斯涅威克致托洛茨基的第一封信中，他提议出版一套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撰写的反映俄国革命史的小册子，在美国发行。这封信在档案中没有找到。

关于斯涅威克提议出版小册子一事

——致列宁的信

(1922年9月8日)

列宁同志：

我个人认为（同托洛茨基相反）可以采纳塞·斯涅威克的建议，但条件是应该把作者的全部所得打入美国的“失业者组织”账户，或者干脆分发给美国的失业者，为此应在拟出版小册子的出版社管理机构中为失业者设一个监督席位。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事情转到这个方面来，那么提出方案的美国人就会被抓住（并且挨打），于是这一建议的消极方面也会变成积极方面。

约·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2000年第3期

附录二 列宁在斯涅威克来信上的批语

(1922年9月17日)

依我看，应该向写信人问清有关的细节问题。简而言之：我现在可以拿到多少钱？交稿期限？数额？条件？然后我们再仔细考虑。我会亲自把一半收入交给共产党员。

列 宁

无误：

原件交列宁研究院。

C. 切丘林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2000年第3期

您一定会得到稿费吧？

——同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记录片断^①

（1931年12月13日）

.....

斯大林：是的，近来德国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现在请允许我也向您提一个不礼貌的问题。是问题，而不是建议。您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如果您能作出肯定的答复，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向您提出的。

路德维希：我可以先加以肯定。

斯大林：等一等。您不是要发表我同您的谈话内容吗？

路德维希：我不会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但在写到您时我至少会以某种形式加以利用。^②

斯大林：您一定会得到稿费吧？

路德维希：是的。

斯大林：您愿不愿意从这笔稿费中提出一小部分送给德国失业者儿童救济基金会？但是，您当然绝对不能说是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的。

路德维希：几周后，乌曼斯基^③先生就会收到我寄来的一张捐赠1 000 马克的收据。我将很高兴这样做。但是，您是否还是认为不能

① 路德维希，埃米尔（1881—1948），德国作家、法律学家，居住在瑞士和美国，著有《歌德》、《拿破仑》、《俾斯麦》、《罗斯福》等书。斯大林于1931年12月13日同他进行了谈话（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9—92页），这个片断是谈话记录公开发表时斯大林删去的一段。

② 路德维希撰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于1945年出版。

③ 乌曼斯基，苏联外交家，作为翻译参加了这次谈话。

把您同我谈的这番话说出去呢？成千上万的人不是把您说成残酷的沙皇，就是把您说成高贵的强盗。如果把这番话说出去，就会在人们对您的看法上添上十分令人好感的一笔。

斯大林：我清楚，敌对阵营的生们说我什么的都有。我认为，去说服这些先生改变看法有失我的尊严。他们还会认为，我是在出风头。不，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这个建议。

路德维希：我至少非常重视您的建议。在我所见到的几十位国家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个问题。我重视您的建议，不仅是因为您心中装着德国儿童，而且还因为您现在已经证明，您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1998年第3期

推荐一本关于心理学基础的书

(1940年1月21日)

在政治局办公室内。

在场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季米特洛夫^①。

(库利克^②来了，他通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斯大林：“您陷入了慌乱。我会把切尔帕诺夫所著关于心理学基础的书给您送去。希腊祭司们是聪明人。在他们听到令人忧虑的消息时，就去浴室，沐浴之后再对事件作出评价和决定。人通过自己的器官获得各种各样的印象和感觉——也获得各种各样的粪便。存在着抑制中枢（库利克身上的这一中枢很脆弱！）。应该摒弃全部垃圾，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在瞬间的情绪和可怕的、子虚乌有的东西影响之下作出决定。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105—106页

①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迪米特罗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本书制作者注

② 库利克，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890—1950），苏联元帅，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本书制作者注

“活一世纪，学一世纪”

（1940年11月7日）

在红场上。

游行之后，我们在斯大林家吃午饭。出席者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后又找来了铁木辛哥）。

大家挨个为在座的举杯。……大家正准备走时，斯大林突然说：“我想发言。”并拿起了酒杯说：

历史把我们惯坏了，我们比较轻松地取得了很多成就。这在很多人身上引起了自满，一种危险的自满。人们不想学习，尽管在我国学习条件非常好。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是工人和农民，既然他们的手上长着老茧，他们就什么都会，没有必要再学习和提高自己。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蠢人。

我国有许多正直的、勇敢的人，但是他们忘记了，仅仅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技能。

“活一世纪，学一世纪”。

必须经常学习，而且每隔两三年要重新学习。他们没有研究芬兰战争和欧洲战争中的教训。

我们在哈勒欣^①打败了日本人，但是我国飞机的速度和飞行高度低于日本。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像德国和英国之间的那种空战。

结果是，我们的飞机能在空中飞行35分钟，而德国和英国飞机可以飞几个小时。

假如我国的武装力量、运输等不能同我们的敌人（所有的资本主

① 指1939年5—9月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地域击溃侵犯蒙古的日本军队。

义国家和那些号称是我们朋友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处于同等水平，他们就会把我们吞食掉。

只有在物质力量相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取胜，因为我们依靠人民，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但为此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有知识，需要有能力。

顺便提一句，军事部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提醒人们注意飞机的事情。你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找来了咱们的设计师并问他们：是否做得到让我们的飞机也能在空中呆较长的时间？他们回答说：“能，不过，任何人都没交给我们这样的任务！”现在，这一缺点正在改正。

目前，在我国，步兵在改组，骑兵一直很好，我们应该认真地管管空军和防空。现在，我每天都在管这件事，接见设计师和其他专家。但是，我独自在管所有这些事。你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考虑这件事。我是独自一个人……

我怎么每天都能够学习、看书、注视新事物，为什么你们却不能这样做？你们不喜欢学习，而是自满地过日子。你们在糟蹋列宁的遗产。

（加里宁：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支配时间，好像时间总是不够！）

不，问题不在这里！人们无忧无虑，他们不想学习，不想提高技能。他们听完我的话后一切照旧。不过我会做给你们看的，假如我失去耐心的话，（你们知道我会做什么。）我会把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打得眼冒金星。

我会为懂得学习和掌握技能的布尔什维克们干杯！布尔什维克包括党内的和党外的。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们一般不太自满！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113—114页

附录三 与《苏联大百科全书》

主编瓦维洛夫^①的谈话

(1949年7月13日)

斯大林同志于7月13日晚10时接见了我；谈话时在座的有马林科夫同志。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谈话的前半部分由我报告科学院的一些事情，讨论和审核科学院的各种问题。在谈话的后半部分我才把话题转到《苏联大百科全书》上来。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代表主编们请求允许在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七卷的“联共（布）”词条中刊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还就这一问题呈上了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笑起来，说道，“怎么好印上整本书呢？干嘛要这样？谁要看整本书呢？要说值得印的嘛，也超不过全书的二十分之一，其余的部分是写给党的工作者的，感兴趣的人很少，许多内容也过时了，况且也缺乏近十年的东西。”

我请斯大林同志指示，近十年的东西可以委托谁来写，斯大林同志却说：“总而言之不必印了，尤其是你们不见得非要印到‘联共（布）’词条中去不可。因为我打算在代表大会上建议将‘联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到时候你们又要改排到字母‘K’里去了，现在还有一段时间，请您考虑一下。”

显而易见，要真的更改党的名称，那么很大的篇幅就不得不归到其他词条里去了。

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样本问题，应当提一下，还在我和斯大林同志谈话之前我就曾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谈过。他那儿已经有一大堆样本。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我说，斯大林同志不同意你们主张的百科全书的开本，

^① 瓦维洛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91—1951），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49年起是《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1949年7月13日，斯大林与瓦维洛夫就《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谈话。本件是瓦维洛夫在7月19日对谈话情况所作的叙述。

他不喜欢那么大开本的书，而更喜欢小开本的。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此事，他果然一开口就说：“太大了！”我当时向他报告了我们选择这种开本的初衷：其一，是要让书完全舒展开，不会倒页，书页显得自然、平整；其二，每一页上的两栏都可以宽一些，这样看起来舒服些，安排插图也方便，而且比较漂亮。斯大林同志同意这个意见。他还说，可以用蓝色。阿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①，在这，在样本上，我直接写上了：样本是得到了斯大林同志本人赞同的，马林科夫同志也赞成样本。

接着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当时草案就在我手边。我边读边解释，斯大林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都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总的说草案未遭到任何异议，因此我就让这个草案维持原状了。斯大林同志对所有内容——包括高频通信和增加自动电话机^②——都表示同意。问题处理得很干脆。说到书的定价，我说定50卢布，斯大林同志说：“不低吗？要定得有点利润。”我说：“这一点考虑到了”。斯大林同志说：“50卢布，这很好，可是否应该高一点？”我说不用。随后又谈到给国家出版社图书贸易管理局的提成问题。我说，国家出版社图书贸易管理局因为负责书的推销，要拿25%，我们请求确定15%。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说：“10%是应当给的，再多就不应该了。”我还汇报了纸张的问题，我们请求组织生产专用纸和漆布，斯大林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支持这样做。之后，谈决议的第五点——改变付给作者报酬制度的问题。我马上解释说，我们这儿已经批准了提高短篇文稿酬的制度。对两万字符以下的文章，每页手稿我们可付高达一万卢布的稿酬。对两万字符以上的文章，我们请求允许每页手稿只付五千卢布的稿酬。斯大林同志说：“长篇文章每页手稿稿酬低一点是对的。”谈到房子问题，斯大林同志问，事情进展如何。我说，我们正在得到房子。在这个问题上马林科夫同志帮助了我们。于是马林科夫同志说了话，说原来房子的困难现在已经解决了。就是还有一个新编辑部问题。对组建这些编辑部的问题，斯大林同志也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增加人员编制。总的说，对决议各点都同意了。

然后我又转而谈到了一个惹祸的问题——关于像托洛茨基这类的反面人物的问题：应不应当给我们的敌人和对手立词条？斯大林同志说：“我个人认为，

① 瓦维洛失的谈话对象，身份不详。

② 指的是政府通讯电话。

应当给反面人物立词条，反对这样做的编辑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说，应当囊括一切，不这样做是愚蠢的。“其实，你们的书里是会有拿破仑的，可他是大坏蛋。”关于反面人物的问题就这样被完全肯定地解决了。

之后，又谈那些其作品受到严厉批判的作者的问题。我说，我们国家有一些这样的作者，他们是很权威的，近来时不时地被人骂几句，让不让他们撰写词条呢？“啊，怎么啦，当然，让他们写，假如他们能写出好文章的话”，斯大林同志说。我也认为，必须让他们写。于是在我谈到反面人物的时候，我就提到了阿列克辛斯基。斯大林同志说：“当然，要让写。”因此你们可以放心地刊登了。

我问，从人民民主国家邀请外国作者是否妥当。斯大林同志说：“当然妥当。”我说可能会有障碍。“不会的，有什么障碍呀，”——斯大林同志说，“完全可以商量”。

后来斯大林同志又问我们能否胜任。我说但愿能够胜任。对我们来说，前三卷最困难。这三卷今年就要交稿，而我们还处在开始阶段。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了起来。他说，“你们自己想这样，这是科学院的倡议。”我没有加以反驳，但依我看，说倡议是科学院提出的，这不符合实际。嗯，其实也就谈了这么多。是的。态度毫无疑问是非常赞许的。从整个谈话对答和插话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是在巨大的保护下上马的。

对，还有一个材料的性质问题。斯大林同志惟一的一条意见是：“你们尽量努力吧，不要搞出过时的东西，要多些科学中的现代东西。”这项指示对我们很重要。要有新的有创见的文章，而不是翻印的东西。所有陈旧文章都应当现代化，引新的文献。

全部谈话内容就是这样。

C. 瓦维洛夫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3卷第394-397页



斯大林领导创作的苏联国歌

阿·马·高尔基



(123)



电影《伊凡雷帝》剧照



《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文选译本

评 说 影 剧

话剧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的艺术形式

——在同作家们会见时的讲话片断

我们现在最需要剧本。话剧更通俗易懂。我们的工人很忙，他们在工厂里干八小时活，家里有一大家人、孩子，他们哪里有时间坐下来读厚厚的长篇小说……话剧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的艺术形式。工人很容易看完话剧，通过话剧很容易使我们的思想变成人民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深入人民之中。共产党员剧作家写的剧本不好，他们应该向杰出的职业作家布尔加科夫、这位《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的作者学习学习。

……

在建议导演多夫任科拍摄关于萧尔斯的影片时，斯大林说：

不管是我说的话，还是报上的文章都不能勉强您去做什么。您是自由的人。您想拍《萧尔斯》，那就去拍，如果您有别的计划，那就拍别的。请不要不好意思。

……

在与拍摄《伟大的公民》的导演埃尔姆列尔谈话时，斯大林说：

应该这样拍，不要使托洛茨基分子和苏联政府的斗争看上去像两个政党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其中一个政党在这场斗争中‘走运’而另一个‘不走运’，这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而是要使这场斗争看上去是两个纲领的斗争，其中一个纲领符合革命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另一个纲领违反革命的利益，遭到人民的唾弃。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215-217页

《26名公社社员》剧本写得苍白无力

——致高尔基的信

(1929年6月11日)

于莫斯科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1) 寄上我昨天答应给您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回答了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和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以私人通信形式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2) 我读了斯皮里多诺夫的剧本《26名公社社员》，依我看，剧本写得苍白无力。像是小说，有的地方粗制滥造，作者对几个极其重大事变的内在联系不了解。

从剧本中看不出巴库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和怎样放弃了（恰恰是放弃，而不仅仅是没保住）政权。而这是巴库事变中的主要问题，要么是顾及邵武勉^①等同志的声誉，干脆别去写26名公社社员这个剧本，要么（如果要写的话）就别回避这个主要问题，别避重就轻。作者的一大失误就是违背了历史真相，还不只是违背历史真相，而且违背了年轻一代的意愿，他们希望从老同志的错误和失误中（就像从他们的成功与成就中一样）学习一些东西。

不能同意作者把里海的水兵描写成一伙十足的酒鬼和卖身投靠者的做法。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国内战争时期没有这样的情况，国内战争甚至使最为封闭的机关和团体都发生了分化和分裂。由于苏维埃俄国的存在，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① 邵武勉，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1878—1918）——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被英国人枪杀的26名巴库公社社员之一。

令人不解的是，工人阶级没有作为主体在剧中出现。事情发生在石油之乡、工人之都巴库，却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作为一个阶级在行动和战斗的工人的形象。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剧本中有那么 8—10 页写得精彩生动，这表明了作者的才华。彼得罗夫这个人物写得非常好。桑德罗和麦克唐纳也写得不错。其他人物显得平淡苍白。这些精彩之笔弥补不了（也不可能弥补）剧本的重大缺陷。

总的说来，剧本写得苍白无力。

就此搁笔。

祝好！

约·斯大林

本篇及以下各篇致高尔基的信
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1999 年第 3 辑和
2000 年第 3 辑

关于反映“破坏分子”剧本的写作

——致高尔基的信

(1930年10月24日)

于莫斯科

尊敬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刚休假回来不久。早些时候，即代表大会^①期间，因工作繁忙也没给您回信。这当然很不好。但是您对我当予谅解。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写信了。也就是说有机会补过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没有过失当然用不着悔过，不悔过呢又不能得到解脱”……

我们这里情况不错。大车我们正在推；当然很费力，但是在向前进。整个情况都是如此。

听说您在写一部反映“破坏分子”的剧本^②，那您肯定不会反对得到有关材料。我搜集了一些有关破坏分子的新材料，这两天就寄给您。您很快就会收到。

您的身体可好？

计划何时回国？

我身体不错。

紧紧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10月24日

① 指1930年6月26日至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② 指以苏联工业部门出现的破坏活动为题材的《索莫夫及其他》这部话剧，高尔基从1930年开始写，次年继续进行，但这部话剧最终没有写完。

附录一 观看国产影片时的谈话

(1934年7月13-14、21日)

鲍·扎·舒米亚茨基记录整理

1934年7月13日21时至14日1时。观看影片的还有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瓦·弗·古比雪夫、叶努基泽等，以及时任苏联电影总局局长舒米亚茨基。

约·维·（斯大林）在见面时问：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什么片子？

鲍·舒·（舒米亚茨基）回答：一切顺利。一些不错的影片即将问世，《切柳斯金号》等几部影片已经可以观看了。

克·叶·（伏罗希洛夫）：确有一些优秀影片，像描写顿巴斯的影片《一个人的复活》。

约·维·：可是像《手风琴》这样的糟粕别再拍了。

鲍·舒·：我不能担保所有拍出来的影片都是精品，它们中可能会有少数几部是废品，但《手风琴》我认为不是糟粕，只是一位大有希望的年轻导演的平平之作。

克·叶·：你别轻描淡写。这是一部庸俗的片子，它几乎把手风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

拉·莫·（卡冈诺维奇）：的确是糟粕，而且俗不可耐！

约·维·：不，《暴风雨》、《阿莲娜的爱情》、《土耳其之心》和《切柳斯金号》都是货真价实的影片。年轻人学会了拍片，演员演得很好。

约·维·转向我说：我们决定帮助您。近期我们将召请您和您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到时请您告诉我们，要让您领导的工作开展得更有声有色并真正推向前进，您都需要什么。请您说明，需要多少资金，有什么需要进口，必须新建哪些工厂，需要为您提供哪些设备和汽车。您有工厂。

鲍·舒·：工厂我有，但都不大。而需求却非常大。要制造的不仅有生产

设备，而且还有放映机。放映机的生产是大批量的，我在自己的小工厂里无法投产。

约·维·：那谁在为你们生产放映机？

鲍·舒·：谢尔戈同志的工厂。但放映机连年受到工厂特殊订货的排挤，近3年放映机的产量减少了六分之五。况且这些工厂对放映机的质量和结构重视不够，给我们提供的产品式样陈旧。

约·维·：不行，您得建设自己的拥有最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工厂。谢尔戈的工厂指望不上。这事儿不是它的强项。您得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除了放映机厂，您还得又快又好地建设一批大型胶片厂、其他电影和摄影器材厂，以及为之服务的印刷厂、出版物、报刊。我们在这方面会帮助您的。将来要是需要资金、设备、进口货、纸张，我们都会提供的。请拿出您的可行性建议，物色好起草这个报告和解决问题的人选。

鲍·舒·：请您在人员方面给予帮助，我们最缺的是人才。

约·维·：那当然。既然我们想发展您这个行业，人员不会成问题。我们负责配备您所需要的任何工作人员。一句话，建立独立的电影业需要什么，您就准备什么。人民委员们不可能替您做这项工作，他们顾不上这个。

鲍·舒·：我将开一份详尽的清单。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量需求，所以我一直力主建立自己的机械、胶片和原料基地，力主提高电影业和摄影业的比重，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独立行业。

约·维·：别忘记，该表彰的人就要表彰。从您的工作的开展情况看，您那里大有人才。

鲍·舒·：当然有，这些人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他们一直同我并肩从事这项十分艰难的事业。

（谈话之后开始观看影片《切柳斯金号》。大家反映很好，对沙弗兰和剪辑师赞不绝口。）

约·维·看完影片后说，影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个半小时使他心潮澎湃，充满希望，在“切柳斯金”号船员与飞行员会合时再次感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意见（见附录），并询问了影片在国外发行的情况。

鲍·舒·介绍了有关情况。

约·维·：为表彰出色的组织工作和整个电影—摄影事业的不容置疑的进

步，我们决定将这部影片的外汇收入全部交给您，以便在初期增加一些投入，购置所需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所缺的器材，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当然了，这不列入刚才所谈的项目之内。

鲍·舒·：遵命。我可以保证，影片的收入将超过此前预计的数额。

瓦·弗·（古比雪夫）：太妙了！只要把收入给他，他就会增加收入。

约·维·：当然了，就应该这样。这就是刺激！

约·维·：我们下面看什么。

克·叶·：放《快乐的人们》吧！

约·维·：这又是一部什么片子？

克·叶·：这是一部欢快、有趣的音乐片，由乌乔索夫和他爵士乐队出演。

鲍·舒·：可我现在没有完整的影片。这部影片马上就拍完，今天我只能故映前3本。

约·维·：它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放吧，尽管已经深夜了。

拉·莫·：乌乔索夫的嗓子不怎么样。

日丹诺夫：他只擅长演唱粗俗歌曲。

克·叶·：不对，你们看好了。他是一位天才演员，一个异乎寻常的乐天派，在影片中唱得十分出色。影片有趣极了。

鲍·舒·：我们让他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演唱。

拉·莫·：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鲍·舒·：我讲述了有声电影的技术性能。

约·维·：既然有趣，那就看吧！

在观看《快乐的人们》时，场上不时发出哄堂大笑。钓鱼、浴场和点名的场面，以及：“您这么年轻就成天才了”、“怎么可能呢”、“习惯了”等台词令（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克利缅季·叶夫列莫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和日丹诺夫）作出了特殊反应。进行曲、通行、耕畜点名等场面颇受喜欢。

大家开始询问，影片是由谁和在什么地方拍的。

鲍·舒·作了介绍。

拉·莫·：这真是在我们莫斯科拍的？这可是高水平制作，可人们总说您的莫斯科厂根本不是厂，而是坟墓。就连报刊上也经常这样说。

鲍·舒·：我们这儿只有怀疑论者、悲观论者和那些自己很少工作的人才

说这种话。

约·维·：说白了，是无所事事的厌世者。要知道，这种人在各行各业为数不少。他们不是通过顽强努力去改进工作，而只知道怨天尤人、散布失败预言。不过，我们先不要管它，再看几部像这部一样有意思的片子。您什么时候给我们放完整的影片？呆会儿还放什么？

鲍·舒·：整部影片近日就放。现在要放的是一部无声影片，《羊脂球》。

约·维·：是根据莫泊桑小说拍的吧。

鲍·舒·：正是。

约·维·：如果拍的好，那是十分有趣的。《羊脂球》是莫泊桑的一部优秀作品，它旗帜鲜明地鞭笞了小市民习气和伪善行为。

开始观看这部影片后，约·维·不断讲述莫泊桑小说的内容。当演到羊脂球怒打死乞白赖的民主派时，看到片中没打出有关字幕，约·维·讲述了对白，并希望在此处加上一目了然的字幕词。关于影片他几次说道：“这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力作，气势宏大，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特别夸赞了摄影，询问是由谁和在哪儿拍摄的。

我告诉他还是在波特利赫(莫斯科联合工厂)拍的之后，约·维·(冲着拉·莫·)说：“你看，又是你的莫斯科走在了前面。这很好。影片有趣极了。总的来说，莫泊桑的作品可为电影提供很多这类有趣的题材。”

日丹诺夫：影片的确有趣极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声音。

约·维·：当然，我们已经习惯看有声影片了，但你忘了，大多数电影都是无声的，像这样的影片应当放给群众看。

他问道，我们拍的有声影片和无声影片各有多少。

鲍·舒·说，比例是1：1，他指出了这方面的有害倾向，以及“无声片”论的危害。

约·维·：做的对。不能停止发展有声影片，同时也必须继续拍摄货真价实的无声影片，但如您所说的那种，不是有声影片的下脚料。好了，再放点什么给我们看看。

我放了第17号有声新闻简报。我在放映之前说明，这部影片不敢冒险发行，因为我觉得，片中拍摄的吸收作家协会成员的情节实际上会引起异议。

观看之后，约·维·、维·米·、克·叶·和日丹诺夫指出，吸收作协成员的工作实际上不是这样进行的，这样做不符合规定。这些人不明白，他们属

于社会团体，这个团体不能脱离所有诚实创作的人。

鲍·舒·指出，片中根本不吸收剧作家加入作协。我们不要求在吸收他们时降低专业水平要求，我们坚持这一点。

约·维·（冲着日丹诺夫同志）说：这可是归你管的。他们在片中怎么会作出这等怪事。

日丹诺夫：看来，我这次还得亲自过问。我已经亲自审查了160多份入会申请。现在还会去做。不吸收电影剧作家加入作协是不对的。写个材料给我，我们重新审查。尤金、基尔波京看问题采取的是形式主义态度，纵容关门主义的做法。

约·维·：不错，你应过问一下，要让那些诚实工作的电影剧作家有机会加入作协。高尔基对此持何态度？

鲍·舒·：他主张吸收电影剧作家加入作协。

约·维·：那就好。把新闻简报中的这个情节删掉，不合适。尤金等人对吸收作协成员所持的轻率态度会遭人讥笑的。

他在分手时说：可别忘了。

1934年7月14日。

下面这份文件，是对上述文件的补充，题为《1934年7月21日我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谈话速记》（在场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努基泽）。

约·维·打电话询问：听说您那儿有新片？

鲍·舒·作了肯定答复。

约·维·：什么片子？

鲍·舒·说了新片名称。

约·维·：啊，就是我们已经看过开头的那部《快乐的人们》吧？

克·叶·：我已经把这部影片从头至尾看完了。令人捧腹大笑，非常有趣。

约·维·：军人作风，雷厉风行。有关对影片的评价，等我们一起看时再谈。

趁检查放映机之时，约·维·问我：计划准备好了吗？我起初以为，他是问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计划，于是回答说，我们的计划不仅基本制定完毕，而且已经准备送往威尼斯了。

约·维·（转向莫洛托夫同志）说：他说基本制定完毕，基本是什么意思？您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说的不是威尼斯电影节计划，而是电影发展措施计划，就是我答应全力帮助您的那个计划。我知道，您一向处事刚毅果断。我对您在远东的工作和您出色指挥的蒙古战役一直记忆犹新。

克·叶·：俘虏温格恩的就是他。

约·维·：还不止这些。他不顾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对，建立了独立的蒙古人民革命国。可现在行动却有点迟钝。

鲍·舒·：我确实没明白您指的是哪个计划。请原谅，我动作慢了。计划我已经起草好了，您看，就带在我身上。我想再好好改一改。

约·维·：您不想降格以求吧？

鲍·舒·：当然。既然问题被广泛提出，干吗要缩小它呢！明天中午之前我一定把计划交给您。

大家开始看电影《快乐的人们》。

约·维·事先已看过影片的前两本，他给那些没看过影片的同志讲述剧情发展，看到精彩之处每每开怀大笑。当出现点名场面时，他兴致勃勃地对克·叶·说：“这个想法太妙了！而我们有些人却自作聪明，在昏暗的‘恢复’、‘改造’，中寻找新东西。我不反对对这些问题进行艺术探讨。而是相反。但要拍得喜气洋洋、生气勃勃、令人开心。”

看完第三本（动物场面），以及第四本（音乐厅）和第五本（打斗场面）后，斯大林发出了朗朗笑声。他在影片结束时说：好。这部影片可使人痛痛快快地放松一下，给人带来一种得到休息的感觉。我是首次从观看国产电影中获得这种感觉。国产影片中有些非常优秀。

约·维·：《切柳斯金号》情况怎样？

鲍·舒·：很好。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6天之内观众就达80万。

约·维·：国外情况如何？

鲍·舒·：几天前刚刚发走。我们将多多出售。

约·维·：我们从租片中拿到的分红一定要达到50%，在美国分红至少要有30%。您要亲自督查。

鲍·舒·：是的，我不会放松的，再说您把影片的全部收入都给我了。

约·维·：好吧，那就让您去发财吧，权作未来计划的预付款。

克·叶·：请再给他一些，他这个人不清高，会收下的，因为他那儿要办

的事很多。

约·维·：好吧，只要事业得到发展就行。

随后话题重又转到《快乐的人们》这部影片。约·维·给它的评价是节奏明快、十分有趣。他特别强调，演员奥尔洛夫、乌乔索夫表演“出色、活跃、有创意”，爵士乐队那些风趣快乐的小伙子配合十分默契。

最后，快要分手时，他谈到了歌曲。他冲着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进行曲将深入群众之中。他开始回忆曲调并询问了歌词。他指出，应当把歌曲灌制成留声机唱片。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5年第9期

附录二 斯大林与电影《伊凡雷帝》
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谢·爱森斯坦、尼·契尔卡索夫记录整理

我们应召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已将近11点钟。10点50分来到会客室。11点整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出来领我们去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最里边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同志。我们进屋后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到了桌边。

斯大林同志说：

你们写了一封信。今日答复有些迟了。本想作书面答复，但觉得还是谈谈好，由于我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拖了很久才决定在这里会面。我收到你们的信是在11月份。

日丹诺夫：是的，您在索契就收到了这封信。

斯大林：你们对历史有研究吗？

爱森斯坦：多少有点儿。

斯大林：多少有点儿！我对历史也知道得不多。你们对禁卫军的刻画是不正确的。禁卫军是沙皇直辖的军队。为有别于随时可能卷旗罢战的封建主军队，成立了正规的军队，进步的军队。你们把禁卫军演得像是三K党，

爱森斯坦：三K党戴的是白色尖顶帽，而我们的禁卫军戴的是黑色尖顶帽。

莫洛托夫：这没有原则区别。

斯大林：你们把沙皇演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像是哈姆雷特。总是别人告诉他应当做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作出决定。

沙皇伊凡是一个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如果把他同路易十一作比较（你们读过有关路易十一为路易十四奠定专制制度基础的书吗？），那么伊凡雷帝同路易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伊凡雷帝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从而防止了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在刻画伊凡雷帝时，这方面有些偏差和失误。

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听任俄国德意志化。叶卡捷琳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再往后看，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不，他们的宫廷是德意志的宫廷。

伊凡雷帝采取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这种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

日丹诺夫：爱森斯坦塑造的伊凡雷帝成了一个神经衰弱的人。

莫洛托夫：总的来说影片注重心理描写，极其强调内心矛盾和个人感受。

斯大林：应当正确地表现历史人物的风格。例如，在第一集中，伊凡雷帝长时间地与妻子接吻，这是不真实的。在那个时代这样做是不容许的。

日丹诺夫：影片带有拜占庭倾向。而这在当时也是没有的。

莫洛托夫：第二集中处处可见拱顶建筑和地下室，既看不到莫斯科的繁华，也不见人民的影子。表现阴谋、镇压是可以的，但不应局限于此。

斯大林：伊凡雷帝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人。表现他的残酷是可以的。但应当说明为什么要残酷。伊凡雷帝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彻底铲除五大封建家族。如果他消灭了这五大家族，那就根本不会出现混乱时期了。而伊凡雷帝不管是处死谁，过后总是后悔不已，忏悔个没完。在这方面妨碍他的是上帝。应当更果断一些。

莫洛托夫：应当正确地反映历史事件。例如，就拿杰米扬·别德内的剧本《勇士们》来说吧。杰米扬·别德内在剧本中对罗斯受洗加以嘲弄，而实际上接受基督教在那个历史阶段是进步的现象。

斯大林：当然，我们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不能否定基督教在一定阶段的进步作用。这个事件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俄罗斯国家开始同西方接轨，而不是向东方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与东方的关系时说，伊凡雷帝急于把刚刚摆脱了鞑靼人桎梏的俄罗斯统一起来，是要使其成为抗击鞑靼人可能发动的侵袭的堡垒。阿斯特拉罕虽被征服，但随时都可能向莫斯科进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可能这样做。杰米扬·别德内对历史前景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当我们动工将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移到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近旁时，杰米扬·别德内表示反对并写信给我（斯大林同志指指自己），说根本就不应当保留纪念碑，应当彻底忘记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我在给他的复信中称他为“数典忘祖的伊万”。历史我们是无法删除的。

接着斯大林同志就伊凡雷帝的形象处理谈了几点意见，他说马柳塔·斯库拉托夫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在与立窝尼亚的战争中英勇牺牲。

契尔卡索夫同志在谈到批评有益、普多夫金经过批评拍出了一部好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时表示：“我们相信我们会干得同样出色，因为我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舞台上都塑造过伊凡雷帝的形象，我爱上了这个形象，我认为我们改编的电影剧本可以说是准确和真实的。”

对此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好吧，那就试试看。

契尔卡索夫：我相信改编定会成功。

这时斯大林同志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万事如意”（笑）。爱森斯坦问斯大林对影片还有哪些专门指示。

斯大林同志回答：“我不是向你们作指示，而是作为一个观众谈谈看法。”

日丹诺夫同志说，爱森斯坦过于喜欢阴影，他用伊凡雷帝的大胡子转移了观众对剧情的注意力，伊凡雷帝为了使人看清他的大胡子，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抬起头来。

爱森斯坦答应日后把伊凡雷帝的胡子剪短。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伊凡雷帝》第一集中的一些演员时说：“库尔布斯基演得极为出色。斯塔里茨基（由卡多奇尼科夫扮演）演得也特别好。他逮苍蝇的技术特别高。都要当沙皇了，还用手逮苍蝇。这些细节是需要的，它们有助于揭示一个人的本质。”

斯大林同志说：好吧，问题到此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至于完善主题思想、把影片拍好，就由契尔卡索夫同志和爱森斯坦同志去做吧。

他又补充说：请将这个意见转告博利沙科夫。

契尔卡索夫同志询问对于影片细节和对伊凡雷帝外貌的意见。

斯大林：外貌符合实际，没有必要改变。伊凡雷帝的外貌很好。

契尔卡索夫：影片中可不可以保留斯塔里茨基被暗杀的情节？斯大林：可以保留。暗杀在过去是常有的事情。

契尔卡索夫：我们的剧本中有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勒死都主教^①菲利普的

① 都主教，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和英国圣公会中教省的首脑。——本书制作者注

情节。是否需要保留这个情节？

斯大林：要保留这个情节。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莫洛托夫说：对于镇压总的来说是可以也是应当予以表现的，但应当表明为什么要进行镇压，原因是什么。为此应当表现国务活动，不要光是地下室和密室中的情节，而要表现英明的国务活动。

契尔卡索夫就今后剧本的改编谈了自己的设想。

斯大林询问影片的结尾将如何处理。怎样拍得更好些，因为还有两集即第二集和第三集，或者说我们对此有何通盘考虑。

斯大林：你们的影片将如何收尾呢？

契尔卡索夫说，影片的结尾将处理为：立窝尼亚被击溃，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壮烈牺牲，向海洋进军，伊凡雷帝站在海边，对周围的将士们说：“我们已经立足于海上，我们将要继续这样做”。

斯大林：这样结尾符合事实。恐怕还有点儿不够。

契尔卡索夫询问将来剧本的草稿需不需要拿到政治局审读和批准。

斯大林回答：剧本用不着送审，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一般来说光看剧本作出评判是困难的，还是谈拍成的影片容易些。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您一定特别想看剧本吧？

爱森斯坦说，如果摄制这部片子时没人催促就好了。

这条意见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人的热烈反响。斯大林同志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要急于求成，而且凡是匆忙搞出来的影片我们都将扣住不发。列宾的《扎波罗热人》这幅画整整画了11年”。

大家一致得出结论：只有付出长期劳动才能真正拍出好的影片。

斯大林同志针对《伊凡雷帝》这部影片说，如果影片需要拍一年半到两年，甚至三年，那你们就按这个期限去做好了，只要影片能拍得好，只要影片能做到“精雕细刻”就行。

斯大林同志说：总之，我们现在应当提高质量。影片可以少拍一些，但质量要高。

他说，采利科夫斯卡娅演其他角色演得很好。她的表演很出色，但她是个芭蕾舞演员。

我们说，无法把另一个女演员从莫斯科请到阿拉木图。

斯大林同志说，导演应当有股子韧劲，要求做到他需要的一切，而我们的

导演往往过于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爱森斯坦同志说，找阿纳斯塔西娅找了两年。

斯大林同志指出，演员扎罗夫对其在影片《伊凡雷帝》中扮演的角色态度不端正、不认真，不像一个威严的军官。

日丹诺夫同志：这不是马柳塔·斯库拉托夫，而成了随便一个戴大礼帽的人。

斯大林同志说，伊凡雷帝是一位民族意识较强的沙皇，是一个较有远见的人，他不允许外来影响渗入俄国，而“彼得鲁哈却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放进了太多的外国人”。

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祝大家成功并说：“愿上帝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们互相握手并告辞。谈话于零时10分结束。

以下是几点补充：

日丹诺夫同志还说，影片中宗教仪式出现得太多太滥。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造成了某种神秘色彩，而这是不应当如此大加渲染的。

日丹诺夫同志接着说，大教堂里的“炉中得救记”那场戏场面拍得过大，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斯大林同志说，跳舞时的禁卫军拍得像是野人，并使人觉得和腓尼基人和巴比伦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契尔卡索夫同志谈到他已经多年在电影中和舞台上扮演伊凡雷帝这个角色时，日丹诺夫同志说：“我已安安稳稳当5年多沙皇了”^①。

契尔卡索夫同志伸手去烟盒拿烟时问斯大林同志：“可以抽烟吗？”

斯大林同志说：“禁止吸烟的决定好像还没有。我们是不是要举手表决呢？”他示意可以抽烟。

补遗（关于剧本）：

当谈到剧本不需要报批时莫洛托夫同志说：

剧本不需要报批，再说爱森斯坦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大概已经对有关伊凡雷帝的所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虑。

斯大林询问了爱森斯坦的心脏病情况并说他的气色看起来非常好。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3卷第386-392页

^① 这是普希金的剧本《鲍里斯·戈杜诺夫》中的一句独白。

纵 论 文 化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第 5018/C 号

致政治局全体委员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争取接近我们的青年诗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及时的。我认为，某些“无产阶级思想家们”（波格丹诺夫^①等人）议论得很多的苏维埃文化（就其狭义内容而言），现在才刚刚开始形成。这种文化应当在倾向于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和文学家同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反革命流派和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把倾向于苏维埃的诗人团结成一个核心，并千方百计地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他们，这就是任务所在。我认为，这种团结年轻文学家的最适当的形式，应当是组织起一种独立的，譬如说，“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或者类似的机构。试图把青年作家拴到书刊检查委员会或别的某个“官方”机关那里的办法，只会把年轻诗人推开，并把事情搞糟。最好是一定让一名非党的但是倾向于苏维埃的作家，例如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②这样的人，去担任协会的领导。物质上的支持，直到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出现的补贴，

①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② 伊万诺夫，俄国作家，20年代以《游击队员们》、《铁甲列车 14-69》等作品著称。

是绝对必需的。

为提供情况，附上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同志对我的相应查询的回答。

斯大林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

——在同作家们会见时的讲话片断

（1932年10月26日）

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成为好的艺术家。有过这样的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

……

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话，就不会去写诗，他会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或者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全都想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提纲塞满艺术家的脑袋里。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他要是真实地表现生活，就不能不发现，不能不表现引导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他在同高尔基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个概念：）

我们不必特别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无助于创作力量的统一。不应该冒进，提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现在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这个说法的优点，首先是简洁（只有两个词），其次是好懂，第三是表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性（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运动阶段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段转变、发展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210-211页

建立作家俱乐部一事有必要^①

——致高尔基的信

(1933年3月1-22日之间^②)

于莫斯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您好！

信（第二封）已收到。

1.关于“作家城”。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凭空臆想之事，而且会使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并且变得妄自尊大。

2.建立作家（受过训练的和已在写作的作家）俱乐部一事有必要而且有益处。最好能有个组建俱乐部的详细计划。您的回国肯定会对此项工作产生推进。

3.您对组建一所以您的名字命名的、隶属于作家俱乐部或以其为依托的文学院一事看法如何？

我们这里的情况不错。

祝好！

约·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新世界》杂志
1998年第9期

① 根据手稿刊印，下划线为斯大林所加。

② 这里的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并比照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确定的。

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 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 问题的讲话

(1946年8月9日)

我们列宁主义者认为，任何一本杂志，不管是科学杂志还是文艺杂志，都不能是不问政治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作家、许多责任编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以为，政治是政府的事，是中央委员会的事。他们说，政治家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一个人写得好，写得漂亮，有艺术性，就应该放行，尽管其中有腐朽的地方，会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会毒害他们。这就是我们与许多文学家和担任编辑部领导职务的人的分歧所在。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求我们文学界的领导同志和写作者以苏维埃制度赖以生存的东西即政治为准则，以使我们教育青年时不采取轻率的、缺乏思想性的态度。不像左琴科那样去教育人，因为他们鼓吹无思想性，他们说：“让你们和你们的批评去见上帝吧！我们想休息休息，快活地生活，笑上一笑”。因此他们写了这样一些毫无内容的浅薄东西，甚至不是什么特写和短篇小说，而是催吐药粉。能容忍这样的人呆在文学界吗？不，我们不能养这样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编辑、编委会成员、作家同志们，你们要考虑这一点。苏维埃制度不能容忍以轻率的态度、缺乏思想性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因此我们的文学家同志们应该改弦更张。左琴科在写作。我们的另一些人在忙着，不总是能得到版面，而左琴科能得到版面。这就是对全民事业的非政治态度。

其次，对作家持一团和气的态度。不是采取政治立场，而是持一

团和气的态度。这一切都由于文学家不问政治。由于对人一团和气，他们干脆不作批评。这也是不行的。这方面的自由主义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对我们青年进行正确教育的利益。哪一个更高：是一团和气的关系还是国家的利益？我认为后者更高。人们互相迁就。不应该害怕批评。没有批评将一事无成。还不仅如此。一个人不会作自我批评，不会检查自己的工作，每一天结束时不会向自己提问：“我今天工作得怎样？”——这样的人不能是苏维埃人，这样的人是懦夫。不仅如此。这个人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相。因此许多人才不喜欢别人批评他们。而我们欢迎人们对我们的批评。这不舒服，但我们欢迎，因为没有这样的批评，一个人就会腐朽变质。当机体的疾病耽误了，病魔就会把爪子伸得更深。病情越早暴露就越好，越能活。治愈得越快。对个别人来说，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应该勇敢面对批评，应该每一天有勇气总结自己的工作，问一问自己。我能干得更好吗？不错。我取得了成果。可是我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形成人们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局面。我们文学界的领导同志也缺少这一点。他们由于一团和气就想牺牲我们青年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是不行的。

这是总的前提。可是实际上因此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愿意我们杂志的编辑们工作出色。有的编辑负责任，也有的编辑不负责任，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还不全是这么回事。应该有一个主编在杂志方向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手下有高级的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但应该有一个人对文学产品负责，主持杂志，能对国家和党负责。编辑部里应该有人，哪怕是一个人，有批评发表作品的作家的道义权利。如果放在那里的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但在文学问题上却是糊涂虫，那没有人会听他的，他也不可能承担起批评的权利。瞧，该有一个威信高的人，精通文学的人。也许他自己曾经写作过，也许他有经验，但该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能有充分的权利给作者们提出意见。他可以说：

“我读了这部作品。我认为这部作品很出色。这跑不了。可是仔细看看的话，那里有些地方不好。”因此编辑部里应该有个人能进行批评，帮助年轻作家，能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要是编辑们把不冒犯任何人当作准则，顾忌阿赫玛托娃当年有威望，而现在在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不能当面跟她说：“您该知道，现在是1946年，也许30年前您为过去写作得很好，而我们是现在的杂志。”应该有勇气说。

难道我们的杂志是私人企业？是单独的一群人？当然不是。在别的国家里。杂志是像提供利润的工厂那样的企业。如果杂志不提供利润，那就要被关掉。这是单独一群资本家、英国勋爵的私人企业。谢天谢地，我们不是这样的制度。我们的杂志是人民的、我们国家的杂志，任何人无权去迁就不愿承认我们任务和我们的口味。阿赫玛托娃等人，关我们什么事。我们的利益是一个——教育青年，回答他们的需求，把新一代教育成朝气蓬勃、相信自己的事业、不怕障碍、决心克服任何障碍的一代。难道安娜·阿赫玛托娃能教育这样的人？还是那个粗俗的短篇小说作家左琴科能行？同他们有什么好客气的！

要的就是这样的编辑。他们不怕对作家们说真话。他们把正确教育青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作目标。要是我们不这样以对事业的信仰的精神教育青年，我们就不能击败德国人。大家清楚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应该选拔这样的编辑，他能勇敢地主持自己的事情，不左顾右盼，只考虑国家的利益、正确教育青年的利益——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现在来具体谈谈杂志。《星》杂志提供了许多好作品。要是萨亚诺夫能承担，他有足够勇气真正领导这样的战斗杂志。那我倒愿意他继续担任主编。有时杂志成了邮箱，来什么，就收下什么。杂志同邮箱有什么区别？区别是把坏东西放在一边，把好东西收下。要是萨亚诺夫同志能使《星》不变成邮箱和仓库，能使《星》成为领导作家写

作的杂志。能指出前进的方向路线，我就支持萨亚诺夫。有人说他性格软弱，意志不坚定。对还是不对，我不了解他。至于左琴科则不能让他进。因为总不能让我们去改变口味。让他改弦更张吧！他不想改弦更张那就让他见鬼去。

另一本杂志是《列宁格勒》。我发现这两本杂志总的来说也许材料不够。因此有时才刊登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因为杂志总得出版。难怪出现了双月合刊，而且不标明月份，隐瞒了。瞧，萨亚诺夫同志默不作声，让他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杂志在全俄罗斯发行，却不标明这一期杂志是在哪个月出版的。这是否是因为高质量的材料不够，他们有时不得不按强制目录把商品放行。对列宁格勒和对我们人民的事业来说，也许办一份杂志更好，给它更多的纸张，把优秀的作家引进到那里去。维什涅夫斯基同志把这件事描述得十分悲惨。没有任何悲剧。这叫作合理化。（会场上笑声）将办一份有更多纸张、更高质量作家的杂志。事情办好了，以后也许通过芽殖^①将创办三份杂志。要是列宁格勒出现五份杂志的话，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样一点也不坏。不过现在看来力量不够，你们因此不得不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我以为办一份好杂志要比办两份蹩脚杂志好。近来《星》杂志缺人。

至于那些从前线回来、想把爪子伸进杂志的人，他们中也有军人，有军衔，级别高，非常执着。这样的人你们不应该放进来。有的是军人，军衔高，级别高，要是他在文学上差呢？同样决不能放他们进去。编辑同志们，请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感到为难，要是我们从前和现在的军人成了文学家，来缠着你们，请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感到为难。对他

① 芽殖（Budding），即出芽生殖，是指生物细胞核邻近的中心体产生一小突起，逐渐冒出小芽，当芽长到正常大小后，与母细胞脱离，成为一独立的细胞的过程。——本书制作者注

们要像对其他作家一样批评。请你们知道，党中央只会夸奖你们，因为你们有力量连这样的人都敢批评。尽管他们军衔高，级别高，对文学却一知半解。关于这件事，维什涅夫斯基说，有一个军人来找过他。要是他是个傻瓜呢？就这么跟他说：“去学习，你会得到尊敬；要是学不好。就不应去要不该得的东西。”军衔高，级别高，为此他得到了奖励，但文学不应因此受到损害，教育的利益不应因此受到损害。这些人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但大家不要以为，那里没有像左琴科那样哭鼻子的人和作家。什么人都有，因为在军队中有 1250 万人。难道可以以为他们全都是天使，真正的人。难道可能会这样？什么情况都有。对这些人应像对所有的人一样，你写得好，就给你荣誉和尊敬，写得不好，那就去学习。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附录 “斯大林实际上是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

B. 卡尔波夫记述

斯大林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想到了苏联没有国歌，只有一首非正式的国歌是《国际歌》，在隆重的大会上都奏《国际歌》。……苏联有必要创作自己的国歌，以取代《国际歌》。国歌将反映国家的统一，在苏联则要反映众多民族的统一，而不是政党的统一。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全民的象征是非常必要的。

……

培养爱国主义意识、加深对祖国的热爱（特别是在祖国危急时）、铭记前辈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从来都鼓舞人民的士气，加强国家及其军队的力量。斯大林懂得这一点，因此尽管他军务繁忙，仍抽出时间关注国歌的创作。政治局支持他的建议，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任主席，著名的作曲家和诗人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公开宣布征集国歌的词曲。一些最著名的诗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寄来歌词的有多尔马托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别尔戈利茨、西蒙诺夫、苏尔科夫、阿谢耶夫、吉洪诺夫、施巴乔夫、安托科尔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等。

工作人员对所有的歌词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对有些歌词还试配上乐曲，送到委员会的乐曲的数量也不少。这些作品被一一送给斯大林审听，他都不喜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不够厚重，有的是没有爱国主义思想，还有的是音乐的旋律太像进行曲。

最后，是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写的歌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

“我们就对这首歌词做些加工吧。这首歌词像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适用，但是它有爱国主义思想。”

这句话道破了斯大林主张创作国歌的主要目的：培养和强化爱国主义。他好像要突破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局限。他现在正在寻求全民的、全国的爱国主义的支柱。

命运又一次使我在创作时获得了一个好机会：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给我提供了帮助。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时的老同事，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我多次去过他家，他除了赠给我其他的书籍外，还赠给我印数巨大的国歌的歌本，并写了亲切的题词。他当时还向我讲述过，他和埃尔-列吉斯坦是怎样与斯大林一起“使国歌达到标准的”。

现在，我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再次拜访了米哈尔科夫，请他回忆创作国歌时的一些细节，因为好多情况我都忘了。

……米哈尔科夫以他特有的幽默开口说道：

“夜里两点，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正在想，是哪个蠢家伙这么晚打来电话？这时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我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原来如此！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我已经不知所措了。斯大林的秘书却说：‘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说着就把电话转了过去，我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您好，米哈尔科夫同志。’然后他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听了几个候选的国歌稿，其中包括您写的。您写的国歌篇幅稍微短了些。应当写一个反复唱的副歌，还有一段歌词您没有写出红军的气势，没有表示出我们正在打击而且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帮。’

‘当然了，斯大林同志，我和埃尔-列吉斯坦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你们努力吧。请不要拖延。要在几天之内完成任务。’

这次通话的时间是1943年10月27日。

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动了起来。在克里姆林宫给我和列吉斯坦腾出了一个房间，我们在这里写歌词。伏罗希洛夫把新写成的一稿又一稿拿给斯大林看，又把斯大林改过的稿子交给我们。斯大林改动了几个字，又补写了几行，光是斯大林的修改稿就有好几个。斯大林最后才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把他改过的稿子递给我们，直接了当地说：

‘你们看看吧，现在这一稿如何……’”

斯大林实际上是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他对最后一稿作了很大改动。作者当然完全同意他做的修改并请求把这一稿给他们留作纪念：“这是历史啊，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意了。

接下来是以不同的演唱方式在大剧院对国歌进行过几次试唱，有合唱，有用交响乐队伴奏，有时用铜管乐队伴奏。斯大林每次必到。他边听边提出意见和建议，最终选了由萧斯塔科维奇、恰恰图良和亚历山德罗夫这三位作者创作

的曲子。

在一次试听时，合唱队和乐队演唱（奏）了沙俄的国歌（“上帝呵，保佑沙皇吧”）和英美的国歌，以进行比较。斯大林选中了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曲子和由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创作的歌词。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又在大剧院试听了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的领导干部都应邀出席，贵宾们在政府包厢就座。国歌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斯大林对此感到很满意——他认为重要的和必须达到的目的达到了。

他高兴地说：

“哎，按照俄国人的习俗，应当为国歌的诞生举杯庆祝啊。去把词曲作者和指挥都请来。”

他对莫洛托夫说：

“由你来主持我们这个庆祝会。”

于是在包厢前面的房间里摆起了餐桌。斯大林让米哈尔科夫和列吉斯坦分坐在他的两边。第一杯酒，是为新国歌的作者们和新国歌的顺利诞生干的！

米哈尔科夫谈到，斯大林当时请他朗诵他写的诗歌：

“我朗诵了《斯焦帕叔叔》和其他几首欢快的诗。斯大林笑得很开心。我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幸福，一有人祝酒我就满满地干上一杯。突然斯大林低声地对我说：‘您怎么老是干杯呀？这样和您聊就没有意思了。’后来斯大林又问：‘您是党员吗？’我说：‘还不是。’他开玩笑地说：‘没关系嘛，我写诗的时候^①，也还不是党员。’

斯大林在席间谈戏剧，谈上演《苏萨宁》的必要性，谈电影，谈《库图佐夫》这部影片不恰当地把库图佐夫这个了不起的统帅塑造成患病的老头。我们还谈论战事，因为战争甚至不让参加庆功宴的人忘记它的存在。

将近半夜两点的时候，斯大林提议喝掉‘最后的收杯酒’。分手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很高。

1944年1月1日，国歌第一次交全俄广播电台广播。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与这首庄严雄伟的乐曲朝夕相伴。”

国歌的作者获得了奖金。

① 斯大林是指他 1895—1896 年 16~17 岁时创作的诗歌。见本卷第 3—9 页《诗六首》。——本书制作者注

.....

创作国歌的必要性以及为确定国歌内容所作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都再次证明斯大林目光远大，证明他对人民的精神道德状况的支柱和基础认识十分深刻。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513-516页

1944年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歌》歌词

伟大俄罗斯，永久的联盟；
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
各民族意志，建立的苏联，
统一而强大，万年万万年！

自由的祖国，你无比光辉：
各民族友爱的坚固堡垒！
苏维埃红旗，人民的红旗，
从胜利引向胜利！

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伟大的列宁，指明了前程。
斯大林教导，要忠于人民；
并激励我们，去建立功勋。

自由的祖国，你无比光辉：
各民族幸福的坚固堡垒！
苏维埃红旗，人民的红旗，
从胜利引向胜利！

战争中成长，我们的红军，
敌人来侵略，就消灭干净。

斗争中决定，几代人命运，
引导我祖国，向光荣前进！

自由的祖国，你无比光辉：
各民族光荣的坚固堡垒！
苏维埃红旗，人民的红旗，
从胜利引向胜利！

作词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

作曲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

采用 1944年1月1日

隔离列宁

附录一 中央委员会授权斯大林负责隔离病中列宁
(1922年12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议

1922年12月18日

如果列宁同志询问关于外贸问题的全会决议，根据斯大林与医生达成的协议，告诉他有决议文本和补充书，无论决议还是委员会组成，都是一致通过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应保存起来，无论如何现在不应转告，直到医生与斯大林同志商定允许后再转告。

斯大林同志负责隔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既包括与工作人员的个人往来，也包括通信往来。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关于列宁病重期间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

——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12月22日)

加米涅夫同志：

来函已收到。我认为，你在报告中应当只作一下说明，而不是把老头^①如何不顾费尔斯特^②的绝对禁令而给托洛茨基写信的事在党团的会议上公开。

约·斯大林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① 指列宁。

② 费尔斯特，德国神经科医生，1922年3月起为列宁的保健医生当顾问。

附录二 列宁就斯大林“辱骂”自己妻子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3月5日)

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① 据列宁的秘书玛·沃·洛季切娃回忆：“信是我亲手转交的。我请求斯大林立即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回信，因为他等待答复，他着急。斯大林站着，当着我的面读完了信。他的面色是平静的。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慢慢地、清晰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词与词之间还做停顿：‘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病说的。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作为一个党员，做得不对，她会受到处罚的，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这件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但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愿意为了自己的粗暴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对列宁关于“电话冲突”信件的回复

(1923年3月7日)

列宁同志！

五个星期之前，我曾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志谈话。我认为，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的党内老同志。我对她（电话）讲了以下内容（大意）：“医生禁止向伊里奇提供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样的治疗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最重要的方法。但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却违反了这一制度。不能将伊里奇的生命视为儿戏等。”我不认为，这些话可以被视为粗暴或不能允许的“反对”您，因为我没有其他任何目的，除了更快地使您的健康恢复外。而且，我认为，监督这一医疗制度的执行是我的职责。

我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进行的解释证明，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问题，除了无足轻重的误会外。

不过，如果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该把以上所讲的话“收回”，我可以把这些话收回。但我不明白，问题究竟何在，我的“错误”在哪里，究竟想让我怎么做。^①

约·斯大林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① 据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说，这封信件并没有让列宁看：“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终也不知道斯大林道歉的回信。”

关于列宁“要氰化钾”一事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

(1923年3月21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刚才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电话，以秘密的方式告诉我说伊里奇状况“很糟”，他要氰化钾，务必给他。她说，她想给他一些钾，但“缺乏毅力”，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回复：

无论如何不能给。费尔斯特能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即使没有这个希望也不行！不能，不能，不能！

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29页

关于列宁请求氰化钾致政治局委员

(1923年3月21日)

绝密

政治局委员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杨诺娃（娜·康·^①）同志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让我，斯大林，负责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搞一些氰化钾并转交给他。在与我的谈话中，乌里杨诺娃顺便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继续这样活下去是不可思议的”，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由于娜·康·特别坚持和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他曾两次在与我谈话时将娜·康·叫来，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认为没有可能做出拒绝的答复。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放心和相信，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你的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确放心了。

但是我要说，我还没有力量执行伊里奇的请求，我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这一使命是多么人道和必要，关于此情况，特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① 即克鲁普斯卡娅。

我们不应忘却列宁

(1941年4月22日)

1941年4月22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为塔吉克艺术旬参加者举行招待会。

最后斯大林为列宁举杯：

感谢你们对我的祝贺和同情……人们习惯于赞美没有倒下的活着的领袖们。他们一死，人们就忘掉了他们。这种习气不好，尽管它广为流传。我们，布尔什维克，也习惯于逆流而上，要摒弃这种习气。我们不应忘却那位使我们拥有和达到所有成果的伟人。我们不应忘却列宁。列宁创造了我们所有人，锻炼了我们，把我们组织、武装起来，给我们指引方向。他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在困难中不懂得害怕，在斗争中不懂得畏惧。他创立了人类的新思想体系、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和热爱、各民族平等的思想体系。把一个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并要求其他民族服从于它的思想体系是垂死的思想体系，它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为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教育者、我们的父亲列宁干杯！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36页

再三请辞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年8月19日）

俄共中央全会：

从列宁离职到以后逝世，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政治局共事已经一年半了，这段经历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可能在一个小的集体范围内，与这两位同志开诚布公地共同进行政治工作。有鉴于此，我请求批准我退出中央政治局。

鉴于总书记不可能不是政治局委员，也请求我退出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

请批准我休假进行治疗，为期约两个月。

休假期满后，我请求另行分配工作，或者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者到雅库特州，或者到国外的任何地方，从事不显眼的工作。

上述问题，请全会在我缺席和我不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因为我认为，除了这封信的第一段已提出的意见外，再作其他说明都于事业不利。

恳请古比雪夫同志将这封信的副本分送给各位中央委员。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24年8月19日

古比雪夫同志：

我写此信给您，而不是给中央书记们，是因为：第一，在这件可

谓有争执的事情中，我不可能绕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中央书记们不了解此事的有关情况，我也不愿平白地打扰他们。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年第7期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年7月22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讲话

请允许我就宣读的这封信^①谈几点意见。从这封信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个结论是：想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由另一个具有同样品质、但不粗暴的人取而代之。出席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认为这是不谦虚——所有代表团，无一例外，都主张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之职。我手头就有这些决议，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宣读。

(有人喊道：不需要。)

虽然如此，在十三大以后紧接着召开的我党中央一中全会上，我仍然提出辞职。全会对我的辞职请求未予考虑，我记得，还一致决定要我留任总书记。这样一来，我该怎么办呢，同志们？我是身不由己呀，我服从全会的决定。

第二个结论是：由于我是按照党的意志留在总书记岗位上的，我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克服粗暴作风，改掉它。

(有人喊道：还有不谦恭这一条。)

还有不谦恭……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年第7期

^① 指列宁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信。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年12月27日)

致主持中央全会的李可夫的辞职声明

中央全会（李可夫同志）：

谨请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兹声明，我不能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也没有能力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

约·斯大林

1926年12月27日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年第7期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

(1927年12月19日)

斯大林：同志们！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已经有三年了。每次中央全会都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知道，不久以前的种种情况使党还需要我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果断，是消除反对派危险的某种解毒剂。我知道，尽管列宁同志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但当时确实需要让我留任总书记。但是，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说不复存在，是因为反对派如今已被粉碎。反对派似乎还从未遭到过这样的惨败，他们不仅被粉碎，而且被开除出党。因此，当初全会拒绝我的请求，不肯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的那些理由现在已不复存在，当时这些理由似乎还是正确的。再说，你们都有列宁同志的指示，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我认为应该加以落实。我认为，党在不久以前不得不对这个指示保持沉默，是为党内发展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所迫。我再说一遍，这些特殊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该把列宁的指示付诸实施了。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志们，请大家相信，这样做只会给党带来好处。

多加多夫：无需辩论，直接表决。

伏罗希洛夫：我建议否决上面的声明。

李可夫^①：无需辩论，直接表决。柯秀尔同志的建议可作为基础。现在对斯大林同志解除他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一人弃权。除一人弃权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① 此次全会由李可夫主持。

斯大林：那么，我想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央委员会或许会认为取消总书记的建制是适宜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不设这一职位的时候。

伏罗希洛夫：那时候我们有列宁。

斯大林：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没有总书记的建制。

有人喊道：是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

斯大林：对，好像是十一大以前我们没有这种建制。那时列宁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如果说列宁认为必须提出建立总书记制的问题，那么我估计，他是从十大以后我们党内出现的特殊情况出发的。当时党内形成了力量较大且组织严密的反对派。现在，这些情况在党内不复存在，因为反对派已被彻底粉碎，因此，可以考虑取消这种建制。许多人都把总书记有某些特权的说法归咎于总书记的建制。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应当说，同志们也可以证实，总书记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不同于书记处其他成员权力的特殊权力。

有人喊道：那么责任呢？

斯大林：也没有比书记处其他成员更多的责任。我认为，有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机构，有书记处——由5人组成的执行机构，书记处的这5名成员，大家都是平等的。实际上也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总书记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责任。没有发生过未经书记处批准而独自下达指示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没有拥有特殊权力的总书记，而只有一个称为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我不晓得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名存实亡的建制。况且这种总书记的建制、名称，在各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在中央，总书记的建制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特殊权力和特殊责任，而在地方却发生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现在在所有的州里，被称作书记的同志们之间都由于这一建制而发生争斗，例如在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里。总书记现在太多了，地方上产生的特权无不与此有关。为什么还要保留呢？

施米特：地方上可以取消。

斯大林：我想，党如果取消总书记的职位，从而使我有可能从这个岗位走下来，对党是有利的。可以在党章中不规定设总书记一职，这样做比较容易。

李可夫：我建议，不要给斯大林同志创造辞去这一职务的条件。至于外州和地方机关的总书记，则需要改变，似不必改变中央的现状。总书记的职位，当初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设置的。在那以后的时间里，不管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还是他逝世后，（组织上和政治上都）证明这种设制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设置这一职位和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的工作，所有反对派，所有现在被我们开除出党的那些人，也都参与了。全党所有人对于是否需要总书记的设置和谁来出任总书记记都没有异议。我认为，这样就完全彻底地解决了执行遗嘱的问题（因为这一条已经解决了），同时，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我们一模一样。这是全党尽人皆知的。难道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需要）取消总书记的设制吗？

斯大林：反对派已被粉碎。

李可夫：是啊，正是由于党的出色工作，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出色工作，反对派才被粉碎。

有人喊道：对！

李可夫：难道一方面我们在十五大之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需要把中央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难道需要把中央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要在我们的（这个）决议中对已被完全消灭的反对派作出无论何时和以任何方式都不应作出的让步（我看，很可能让人理解成这样）吗？既然列宁在世时和（列宁）以后的实践，既然总书记的设制本身（以及应当担任总书记的那个人）和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所做的工作，均已被我们的整个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不管是列宁在

世时，还是在列宁逝世后）证明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我认为，就没有任何理由改变现状。

斯大林同志有一点说得是正确的，即（我们）书记处、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各地）的工作，完全是由集体做的，一切事情都由所有成员集体负责，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同志对书记处所负的责任毕竟要比书记处其他成员大一些，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这种责任应当延续下去。

有人喊道：（这是事实！）对！

李可夫：我提议，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予以否决。

有些人喊道：对，表决吧！

李可夫：有人提议进行表决。

有些人喊道：是的，是的。

李可夫：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斯大林同志取消总书记设制的建议？谁反对？谁弃权？没有。

斯大林：同志们，在第一次表决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时，我没有表态，忘记表态了。请把我的一票算作反对票。

有人喊道：这没有多大关系。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年第1期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52年10月16日）

.....

（维·米·莫洛托夫在讲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并声称自己始终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

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说：“胡说八道！我没有什么学生。我们大家都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提议解决组织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取代政治局的是大大扩充了的主席团，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处——共计36人。）

斯大林说：“名单里有除了安·安·安德列耶夫之外的原政治局全体委员，受人尊敬的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他耳朵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不能工作了，让他安心养病吧。”

（会场上有人喊道：“应当选举斯大林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不行！请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马林科夫（在讲台上）说：“同志们！我们大家应当全体一致地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在讲台上）说：“中央全会上用不着鼓掌。应当不带情绪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老了，文件也不看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铁木辛哥说：“斯大林同志，人民不会理解的。我们大家一致选举您为我们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可能有另一种决议。”）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支持铁木辛哥。斯大林站了很长时间，看着会场，然后一摆手坐下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757页

个人崇拜

我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1925年1月25日)

致察里津省省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①

一、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二、此事没有我的参与，是没有通过我发起的；

三、如果一定需要给察里津改名的话，那么就把它叫作米宁^②格勒或另一个名字好了；

四，如果改为斯大林格勒的事已广泛传扬开了，现在您难以放弃已开始做的事情的话，那就请您不要把我牵涉到这件事里去，不要求我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不然会给人以我要求改名的印象；

五、请您相信，同志，我不追求名誉地位，不希望造成相反的印象。

原载《史料》杂志2003年
第5期，第54-55页

① 1925年1月，当斯大林得知察里津省当局决定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时，于1月25日给省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写了这封信。

② 米宁，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察里津苏维埃主席。

为什么非要让我来修改你的讲稿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1月7日)

莫洛托夫同志：

既然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讲话都不经过预先审查，不知你为什么不把讲话按原稿^①发表，而非要让我来作修改。我现在才明白，我的不妥之处就是没让任何人看我的报告。你如此这般地坚持要我修改你的讲话，这难道不是在说，我没有把自己的讲话拿给朋友们看是错了吗？前天那场争论之后我就感觉到这种不妥了。可你现在一再地坚持要我审查你的讲话，是想以自己的谦逊态度来使我无地自容。不，我还是不这样做为好。最好是你认为怎么需要就怎么发表。

约·斯大林

11月7日

^① 信的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批注：“关于我在党的第15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个人崇拜”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

(1934年12月)

1934年12月，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给中央写信，建议在斯大林五十五岁寿辰时组织一次宣传活动，宣传斯大林的功绩。

斯大林在这封信上批示道：

我反对，因为这样的活动会导致“个人崇拜”的加强，这是有害的，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的。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和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

——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节录）

（1937年1月8日）

福伊希特万格：我在这里只有四五个星期。初步的印象之一是：我觉得对您表达尊敬和热爱的某些形式是夸张的和低俗的。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朴实的谦虚的人。这些形式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多余的负担？

斯大林：我完全同意您的话。当夸大到过于夸张时是令人不愉快的。人们为一些小事而倾倒。在几百封致敬信当中我只回答一二封，不允许把其中大多数发表出来，只要我知道，就完全不允许发表过于热情的致敬信。这些致敬信十分之九确实都是低俗的。它们都给我以不愉快的感觉。

我想要不进行辩护，——不能进行辩护，而想要力所能及地说明这种围绕着我个人的达到甜腻腻的程度的遏制不住的狂热是从何而来的。看来是因为我们国内解决了整整几个世纪几代人——巴贝夫派、埃贝尔派^①，以及法国、英国、德国的革命者的各种其他的派别——力求解决的任务。看来这个（工农群众一直关心的）摆脱剥削的问题的解决，使得人们欣喜万分。人们对摆脱剥削过于高兴了。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了。

摆脱剥削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庆贺这件事。把一切都归功于我，——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我看作一个综合性概念，于是在我周围燃起了傻乎乎的兴奋的大火。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巴贝夫、埃贝尔追随者们组成的派别。

福伊希特万格：我作为一个同情苏联的人，看到并且感觉到对您的敬爱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和低层次的。正因为您受到这样的爱戴，您能否说一句话制止这些使您国外的一些朋友感到困惑的表达感情的形式呢？

斯大林：我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对他们说——这不好，这不合适。人们心里想，我这样说是装谦虚。

曾经想在我五十五岁时搞庆祝活动。我通过联共（布）中央禁止这样做。于是有人抱怨我妨碍他们搞庆祝活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说问题不在于我。另一些人说，我装腔作势。怎么能禁止这些喜悦的表现呢？用强制手段不行。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友好的请求……

这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讨厌这样做的。很难阻止人们表达自己的喜悦。我下不了决心采取严厉的措施反对工人和农民。

胜利是十分巨大的。过去地主和资本家是创造者，不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看。现在对劳动者的奴役取消了。这是巨大的胜利！地主和资本家被赶走了，工人和农民成为生活的主人。于是便过分地高兴。

我们的人民在总的文化水平方面还是落后的，因此表达高兴表达成这种样子。在这方面不能用法律禁止做什么：可能会落到可笑的境地。这使国外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达到。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很多事情：例如仅只在1935年和1936年这两年在城市里已建了两千多所新学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图提高文化。但是效果要在五六年后才表现出来。文化是缓慢地提高的。而狂热却是急速地和不雅观地上升的……

福伊希特万格：我说的不是工农群众敬爱的感情，而是另一些情况。陈列在各个地方的您的雕塑像很难看，做得很差。在莫斯科建筑的展览会上首先还是想到您的，——可是干什么陈列这样不好的雕塑像呢？在搞得很雅致的伦勃朗的展览会上，干什么要在那里摆上难看

的雕塑像？

斯大林：问题是提得很有道理的。上面我讲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各个机关的官吏。至于说到官吏，那么不能说他们没有欣赏能力。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陈列斯大林的雕塑像，那么或者报纸，或者上级会骂他们，或者参观者会感到惊讶。这就涉及官吏们的功名利禄的事了，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不受到触动，需要摆上斯大林的雕塑像。

取得胜利的任何政党总是会有异己分子、向上爬的人混进来的。他们根据看风使舵的原则竭力保护自己——摆雕塑像，书写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关于说到雕塑像的质量差，那么不仅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道通常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还由于不会选择。例如在五一节的游行队伍中我看到我和我的同志们的画得像鬼一样的画像。人们兴高采烈地高举着，但这些画像、雕塑像不合适。不能下一道命令规定只许摆好的雕塑像，——去它们的吧！没有工夫管这些事，我们有另一些要操心的事，对这些雕塑像不会看上一眼。

俄罗斯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
《斯大林文集》第14卷，
第2版，第179—182页

不要“马—恩—列—斯”

(1939年4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①。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他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斯大林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挑拨性的文章。

（莫洛托夫：是的，是挑拨性的文章，正是在我们同英国人进行谈判时发表！）

.....

斯大林不同意在告人民书中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而只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① 指共产国际准备在1939年5月1日发表的“告人民书”。——本书制作者注

(虽然在[联共(布)]中央的口号中公布的是“马—恩—列—斯”。)

斯大林：这不是威信问题，是原则问题。

口号——这是我们“本国的问题”。这里我们已经疏忽了，本不该这样写！而告人民书是国际文件——这里必须说得更准确些！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93-94页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①

——致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信

(1945年11月10日)

丘吉尔的谈话，对于俄罗斯和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我认为将它发表出来是一个错误。这种赞美对于丘吉尔是必要的，他是为了抚慰他那肮脏的良心，掩饰他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特别是掩盖这个事实，即，丘吉尔和他在工党里头的信徒是反对苏联的英、美、法集团的组织者……。发表这个谈话，我们就帮了这些绅士们的忙……，我们现在有很多身居要职的工作人员对丘吉尔、杜鲁门和伯恩索夫的这种赞扬感到傻乎乎的狂喜，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绅士们说出的不利的话感到沮丧。我认为这些情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使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一种谄媚。假如将来我们再发表这种类似的谈话，我们将灌输这样一种谄媚和奴颜婢膝的思想。我且不说苏联领导人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就我个人来说，这种赞美也是很刺耳的。

^① 1945年11月9日，丘吉尔借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发表了一通谈话。在谈话中，他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真正的伟人，一个国家之父。当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也找不出什么错，于是，便让《真理报》全文发表了。11月10日，斯大林从索契的疗养地给他们写了这封信。

应当删去“斯大林是 ‘党的领袖’”等修饰语

——给《真理报》主编的信

梅赫利斯同志！

附上一个集体农庄很有教益的故事，请予刊登。我勾去了信中说斯大林是‘党的领袖’、‘党的领导人’等等词语。

我想，这些称颂的修饰除了害处，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处。发表这封信时，应当删去这些修饰语。

致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786页

对《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批评

（谈话记录）

错误非常多。基调不好，像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腔调。我的学说名目繁多，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学说。闹半天，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看到了吗？似乎列宁只谈到了社会主义，而关于共产主义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我，你们看，讲了共产主义。再往下看，似乎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学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提出工业化问题以及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恰恰应归功于列宁。

传记中有很多赞扬的话，对个人的作用大加吹捧。读者在读完这本传记后应该做什么？是下跪和面对着我画十字吗……

再看看关于巴库是怎么说的。什么在我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没做什么，而我一出现，一切焕然一新。信不信由你！而真实情况是什么？需要建立干部队伍。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干部队伍在巴库已经形成。在相应的地方，我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涉及另一个时期。要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像捷尔仁斯基、伏龙芝和古比雪夫，他们当时还健在和进行工作，但没有写他们，没有他们……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国战争时期。当时起用了有才华的人，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锻炼他们。正是这样的一批人聚集在红军最高司令部周围。

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说出，我是列宁的学生。实际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对此，在众所周知的与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我已明确讲到……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

是相反。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在已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莫恰洛夫^①记录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① 莫恰洛夫是《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撰写人之一，他留下了自己两次与斯大林会面时的谈话记录。会见中，该书的第一版受到了斯大林激烈批评。



(188)



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传略传闻

对《斯大林传略》一书 第2版清样作的修改 (1947年)

斯大林传略 第2版，修订本

编者：Г. Ф. 亚历山德洛夫
М. Р. 加拉克季昂诺夫
В. С. 克鲁日科夫
М. Б. 米丁
В. Д. 莫恰洛夫
П. И. 波斯彼洛夫

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47年 莫斯科

I

[5]

……他的父亲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①
……

……1894年斯大林小学毕业，同年进入梯弗里斯正教中学。

[7]

……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是当时青年中各种解放思想产生的温床。

[8]

……1900年8月，铁路修配厂和机车库工人^②举行大罢工。

说明：

1，左端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第2版的页码；

2，有下划线的文字为斯大林作的补充或修改；

3，旁注是本文原编者就斯大林对第2版清样作的删节或改动做的说明。

4，正文中的罗马数字是第2版各章的序号。

斯大林作的修改

① 删掉了“·朱加施维里”。

② 删掉了编者加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II

[22]

……斯大林同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委员，同茨哈卡雅同志一起领导该委员会的工作……

1904年12月，巴库工人在斯大林和贡帕里泽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

[2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这次罢工好像是预示俄国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雷前闪电。

[35]

①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工农举行武装起义。

① 删掉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36]

1905年十月总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迫使吓得要死的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

III

[44]

……从1902年到1913年，斯大林先后7^②次被捕，6^③次被流放，从流放地5^④次逃跑。沙皇的走狗刚把斯大林押解到新的流放地，很快他就又逃跑了，在“狱外”又去锻炼群众的革命毅力了。只是1917年二月革命才把斯大林从最后一个流放地，即图鲁汉斯克流放地解救出来。

② 第1版为“8”。

③ 第1版为“7”。

④ 第1版为“6”。

[46]

斯大林把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核心，

其成员有费奥列托夫、萨拉托韦茨（叶菲莫夫）、瓦采克、博科夫、马雷金、奥尔忠尼启则、^①贾帕里泽、邵武勉、斯潘达良、汉拉尔、梅梅多夫、阿齐兹别科夫、基亚济·马梅德等。

[48]

……斯大林在流放地……严厉批评了^②托洛茨基“腐臭的无原则性”……

IV

[53]

……在彼得堡同斯大林一起工作^③的雅·斯维尔德洛夫和维·莫洛托夫，他们积极参与对《真理报》、选举运动和杜马党团的领导工作。

[55]

……应当把民族问题看作整个^④革命问题的一部分……

1913年2月23日，斯大林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大厅举行的晚会上^⑤被捕。

[56]

……他给列宁写过很多信^⑥，在修道院村多次^⑦召开的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讲话（1915年）……

1916年12月，斯大林被征召入伍，先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来又被送到阿钦斯克市。

[56]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共同领导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⑧

① 删掉了“伏罗希洛夫”。

② 删掉了“叛徒”。

③ 第1版上“工作”一词为单数第三人称，这里说的是1912年。

④ 删掉了“无产阶级”。

⑤ 第1版为“音乐会上”。

⑥ 第1版为“一封信”。

⑦ 第1版为“一次会议”。

⑧ 指1917年3月。

V

[60]

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①坚决维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揭露了加米涅夫、李可夫^②及其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者提出的反列宁的机会主义路线。此外，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65]

……斯大林经常召见^③州组织的代表，给他们下达指示，并为一些州^④制定战斗任务。

[67]

斯大林从苏维埃政府成立到 1923 年一直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直接领导了党和苏维埃政权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全部工作。^⑤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在原沙俄殖民地上开始建立^⑥各苏维埃共和国。

[68]

……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苏联的鼓舞者和组织者^⑦。

……斯大林和列宁一起领导了反对加米涅夫、李可夫和革命中其他^⑧工贼和逃兵的斗争。^⑨

VI

[72]

……察里津一旦失守，就会使共和国失去最后的粮食来源，失去巴库的石油，同时使白军有可能把顿河的反革命分子同高尔察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势力纠集起来一起向莫斯科进攻……斯大林迅速和坚决地采取措施，（转下页）

① 指 1917 年 4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

② 这里删掉了编者加的“季诺维也夫”。

③ 删掉了“区和”。

④ 第 1 版为“区”。这里说的是 1917 年 8—10 月。

⑤ 删掉了“他起草了历史性的《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宣告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各民族间的完全平等、兄弟般的信任和友谊取代了统治和服从、压迫和强制”。

⑥ 第 1 版为“建立了自由和繁荣的”。

⑦ 删掉了“和缔造者”。

⑧ 删掉了“卑鄙的”。

⑨ 删掉了“列宁生病期间，斯大林代理他在人民委员会的职务”。

[73]

将分散队伍加以改编，加速把伏罗希洛夫所属部队从顿巴斯调来，作为新编第十集团军的中坚……^①

[76]

……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傲然自夸，称这次进攻为“十四国的征讨”^②……

[77]

……同时，实现这个计划^③就能收复顿巴斯，顿巴斯是供给全国燃料的强大的煤炭基地，也是革命力量的源泉……

[82]

根据列宁的提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11月27日作出决定，授予斯大林“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建立的功勋。^④

……列宁和斯大林同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活动家^⑤一起领导了国防事务。

[83]

……斯大林^⑥领导了很多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① 指1918年6—7月事件。

② 指1919年。

③ 指红军在南方战线的进攻计划，该计划取代了托洛茨基的计划。

④ 第1版为“决定指出：‘在被敌人从四面八方紧紧包围的苏维埃政权奋起反击敌军的生死存亡之际，在工农共和国的敌人于1919年7月逼近红色彼得堡，并且占领了红丘炮台，从而使苏维埃俄国面临危险之时，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到战斗岗位上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以其充沛的精力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把苦苦支撑的红军部队联合了起来他亲临前线，在战火中以身作则，鼓舞军队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预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在彼得格勒保卫战中的功绩，以及他后来在南方方面军的忘我工作。’”

⑤ 删掉了“直接”。

⑥ 删掉了“直接”。

VII

[88]

……自 1921 年底起，列宁不得不

[89]

经常中断自己的工作。于是对全党的主要^①领导工作便只能由斯大林主持^②。

[90]

1923 年 4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第一次列宁因病不能参加的代表大会^③……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组织工作报告……

[93]

1921 年 1 月 21 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创始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列宁在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逝世。列宁的旗帜、党的^④旗帜由列宁的优秀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儿子、列宁事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和伟大继续者斯大林高高举起，并继续前进。

[95]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自己的永垂不朽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誓言^⑤。

[98]

这部^⑥著作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础……

[99]

“我希望‘狄纳莫’工厂的工人们”——斯大林在 1924 年写道……

[103]

投降主义者^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用自己的“计划”对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

① 第 1 版为“全部”。

② 第 1 版为“斯大林主持了”。

③ 删掉了“斯大林主持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④ 删掉了“和共产国际的”。

⑤ 指斯大林 1924 年 1 月 26 日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⑥ 删掉了“天才的”。指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

⑦ 第 1 版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104]

①布尔什维克党集中了人力和资金，抛弃了投降主义者和缺乏信心者，引导国家走上了历史的新阶段，即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②

在这场反对缺乏信心者和投降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对布哈林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由斯大林、

[105]

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③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卡岗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施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我们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把党团结在列宁的遗嘱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斯大林同志是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党和国家的引路人。

斯大林出色地履行着党和^④人民领袖的使命，博得了全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从不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也从不自我欣赏。他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了天才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的事业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他讲到自己的时候只简单地^⑤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① 删掉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② 接着斯大林写了“增补”两字，并亲笔写了后面的两段。增补内容写在另外两页纸上。斯大林在第1、第2页纸上都写着：“对第51页的增补”（这是第1版的页码）。

③ 古比雪夫的名字是斯大林后来加上的。

④ 删掉了“苏联的”。

⑤ 最初写的是“谦虚地”。

VIII

[106]

……这（工业化）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残酷剥削人民、发动侵略战争、血腥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以（转下页）

[107]

及举借外债等手段获得这种资金的……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则^①……

① 第1版为“学说”。

[110]

布尔什维克击溃并抛弃了这些^②投降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辩护士，继续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

② 删掉了“可鄙的”。

[111]

……以及其他企业都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③

③ 删掉了“因此全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许多大工厂都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

[116]

^④党为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

④ 删掉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117]

……斯大林同志号召全党从沙赫特事件中吸取教训，首先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必须精通技术，成为专家，并加速从工人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118]

1917年10月，不击溃投降主义者和工贼，不击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不能取得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1928—1929年，不击溃右倾投降主义者，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

[120]

这样，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完成了从对富农分子实行限制和排挤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历史性转变。^⑤

⑤ 第1版中第8章到这里结束。斯大林在本章最后写了“增补”两字。第2版清样中这个(转下页)

斯大林^①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的最初阶段，在必须动员民众中的一切劳动力量去完成各项伟大任务的时候，把妇女问题、妇女地位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妇女、女工和农妇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大作用的问题全部^②提了出来，并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21]

^④斯大林同志说道：“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⑤

“劳动妇女，——斯大林继续说道，——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支后备力量……”^⑥

“但是，——斯大林继续说道，——劳动妇女不只是一支后备力量……”^⑦

斯大林在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阐述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的作用和和和意义问题。

斯大林说：“同志们，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123]

斯大林继续说道：“至于女庄员(转下页)

地方附上了几页由编者写的增补内容。斯大林对这些内容作了补充和审订，同时又写了一张字条：“波斯克列贝舍夫收。这三处增补内容已阅。我作了一些修改(见文中)。约·斯大林。(增补内容是由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写的)。”

① 增补内容中删掉了“对祖国”。

② 增补内容中删掉了“十分尖锐地”。

④ 编者用不带引号的斯大林引文，作为妇女问题的增补内容。斯大林在看清样时给引文加上了引号，并作了这里的补充和修改。

⑤ 增补内容中本段末尾删掉了“国际妇女节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不可战胜的标志和伟大的未来的先声”。

⑥ 增补内容中本段末尾删掉了“国际妇女节是把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种手段”。

⑦ 增补内容中本段末尾删掉了“国际妇女节应当成为一种把(转下页)

自己，她们应当记住集体农庄对于妇女的作用与意义……”^①

女工和农妇从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作战军队的手段。国际妇女节万岁！”

① 在关于妇女问题的补充后面，编者又增补了民族问题，并对这一增补作了说明：“对第59页，即第8章结尾的补充。”斯大林对这一说明补充道：“放在关于妇女问题的补充后面”（第59页——本书第1版的页码）。

IX

[129]

斯大林全面具体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②，并指出，向集体化的过渡不是通过农民简单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通过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现的。必须在全体农民面前公开击溃富农，使农民群众认识到资本主义分子确实软弱无力。因此向全盘集体化过渡是与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紧密相连的……

② 第1版为“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党的敌人用尽各种办法试图破坏党所采取的农业^③集体化的方针。

③ 第1版为“国家”。

[133]

……斯大林制定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理论^④……

④ 第1版为“学说”。

[139]

^⑤斯大林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研究了苏联商业的问题，指出商业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形式。

⑤ 这里增补了5段关于商业问题的内容。这一补充内容是编者加的，并经斯大林审定。

斯大林同志^⑥说：“苏联商业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

⑥ 删掉了“还”。

[140]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要使全国经济生活十分活跃，要刺激工业和农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产量，那还要有一个条件……”

……斯大林同志说：“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商业，而且对于苏维埃商业，还抱着一种高傲的鄙视态度……”^①

X

[148]

^②红军获得了新的、精良的技术装备……

……结果红军成了使社会主义的敌人胆战心惊的^③力量。

^④党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苏联社会必须培养出自己的干部。

[149]

苏联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基本条件。斯大林同志根据列宁这一指示^⑤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人才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⑥……

[150]

当我国已经拥有大量新技术、并迫切需要掌握技术和能够^⑦充分利用技术造福我们祖国的人才的时候，培养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干部问题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154]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经常同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一起接见^⑧兄弟社会主义(转下页)

① 编者用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摘引的一段关于对外政策的论述对第9章结尾作了简短补充。斯大林批注：“可以放在此处”。

② 删掉了“工农”。

③ 删掉了“不可战胜的”。

④ 这里编者的两段增补内容是经斯大林审定的。

⑤ 第1版为“称”。

⑥ 第1版为“一个”。

⑦ 删掉了“最大限度地”。

⑧ 删掉了“蓬勃发展的”。

共和国的代表团。

[158]

①斯大林讲到苏联宪法的国际意义时说：

“现在，法西斯主义浊流侮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苏联新宪法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苏联新宪法对于所有目前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

[159]

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

②党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使人民的敌人变得更加疯狂。1937年披露了一批有关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即为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关效劳的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的新材料。诉讼程序表明：这些人类害虫阴谋反对列宁甚至企图逮捕列宁，从十月革命最初时日起就阴谋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他们秉承自己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旨意，力谋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颠覆国防，帮助外国进行武装干涉，设法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役制度。③党和苏维埃政权捣毁了人民公敌的黑窝……

[166]

④新的战争是由德国⑤和日本这两⑥个主要的帝国主义侵略国挑起来的……

[167]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的发起人是英法两国当权者张伯伦和达拉第，他们试图把德国⑦法西斯的侵略锋芒引向东方，引向苏联。

① 下面两段取代了原来的一段：“斯大林同志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它可以与《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天才著作相媲美。”

② 删掉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③ 删掉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④ 下面三段是编者增补并经斯大林审定的。

⑤ 删掉了“意大利”。

⑥ 第1版为“三”。

⑦ 删掉了“和意大利”。

斯大林同志^①揭穿了那些企图挑起反苏战争的人的诡计……

^②斯大林同志非常深刻地向党和苏联人民阐明了

[168]

当时国际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和危险性，并^③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原则。他说……

[170]

……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他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具体化了^④，并得出结论^⑤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我国也能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结论^⑥丰富了列宁主义……

[171]

列宁在国家论^⑦方面没有完成的事情，斯大林把它完成了！^⑧

[178]

由于实行了^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苏联在1940年生产了……

[179]

1939年秋，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我们的同胞兄弟——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从波兰地主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他们加入了苏联各自由民族统一的兄弟大家庭。不久，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又重新加入^⑩苏联。

[181]

……1941年6月，因德国侵犯苏联而发生的战争使得苏联人民和平的创造性劳动遭到了破坏。

① 删掉了“以天才的洞察力彻底”。

② 第1版为“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彻底揭穿了战争挑拨者诡计，并非常准确地确定了我们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对外政策的原则。他说：……”。

③ 删掉了“非常准确地”。

④ 第1版为“继承了…理论”。

⑤ 第1版为“学说”。

⑥ 删掉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现，其意义不亚于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发现。他”。

⑦ 删掉了编者加的“和无产阶级专政”。

⑧ 接下来清样上附有42页打字稿，上面有斯大林的修改意见。附在打字稿后面的另一页纸上有斯大林的亲笔附言：“这是对第83页（第1版的页码）的大段增补。这些增补内容在第2版中已发表，见第176页第2段到237页最后一段。”

⑨ 删掉了“斯大林的”。

⑩ 第1版为“被纳入”。

XI

[182]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帝国主义德国粗暴地破坏了互不侵犯协定，向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突然进攻……

[183]

劳动人民的^①领袖和导师^②斯大林同志担起了领导苏联武装力量的重任，率领苏联人民抗击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

……面对人数多，武器精，且占有突然袭击先手的敌人，苏联军队不得不向国内腹地且战且退。

[187]

苏联各族人民响应党的^③号召，奋起保卫祖国。

^④整个国民经济迅速而彻底地进行了改造，所有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都纳入了战时轨道，以满足前线的需要……

[189]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尽管如此^⑤，1941年11月6日，莫斯科还是举行了传统的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

[194]

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溃败表明，斯大林同志制定的战略进攻计划比德军的战略高明^⑥。

[195]

斯大林关于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决定性因素的命题^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科学，即关于(转下页)

① 删掉了“敬爱的”。

② 删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天才理论家和领导者、苏维埃国家英明的舵手和最伟大的统帅”。

③ 第1版为“斯大林同志的”。

④ 删掉了“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

⑤ 第1版为“但是”。

⑥ 第1版为“完善”。

⑦ 第1版为“斯大林关于……的学说”。

战争进程及结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和性质、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部人才的培养和成熟程度有着直接有机联系的科学。

斯大林关于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命题^①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斯大林同志认为^②，官兵掌握军事艺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7]

苏联军队遵照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③的命令，堵住了敌人向北方、向莫斯科后方推进的道路。

[198]

……1942年10月5日，斯大林同志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下达命令：“我要求您采取一切措施保卫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不能让给敌人。”

[200]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在一个战场上作战，就向苏德战线投入近240个师，即几乎超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入兵力的一倍。

只是由于苏联军队和游击队的英勇战斗、苏联爱国主义者在后方的忘我劳动和最高统帅、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同志的正确^④领导，才克服了我们在抵抗希特勒敌寇侵袭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202]

遵照斯大林1942年11月19日的命令，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转入了进攻。首先突击德军两翼，然后突击后方。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翼侧突击^⑤战略计划，保证了红军取得新的辉煌胜利……

这是大规模战争史上最出色的(转下页)

① 第1版为“斯大林关于……的学说”。

② 第1版中“认为”一词用的是过去时。

③ 第1版为“统帅部”。

④ 第1版为“天才的”。

⑤ 第1版为“击溃斯大林格勒德军集群的”。

一次胜利。^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203]

是军事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是苏联先进军事科学成熟完善的新例证。^②

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

[206]

……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鸣放礼炮，向收复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英勇军队表示敬意。从那时起，在莫斯科鸣放礼炮成为我国战争期间的惯例。

在库尔斯克附近击溃德军对后来的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斯大林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

[207]

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就把它推到了覆灭的边缘。”

[209]

1943年也是苏联后方工作发生转折的一年。经过我国人民^③的努力而建立的发展迅速且协调的战时经济，保证苏军军事装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德军……

[211]

1944年初，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把国防人民委

[212]

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从全联盟人民委员部改为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并在各加盟共和国成立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

这些决定是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新举措，是对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政策能够保证苏联各族人民的（转下页）

① 第1版为“还没有哪一个统帅取得过如此的胜利”。

② 删掉了“这一军事科学的创立者是斯大林”。

③ 第1版为“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

民族国家体制得到顺利发展^①。

[213]

^②1944年6月20日，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将第一枚“保卫莫斯科奖章”授予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元帅，以表彰他领导莫斯科英勇保卫战和在莫斯科附近组织击溃德军的功绩……

1944年斯大林战略计划的顺利实现，结下了丰硕的军事政治成果。在苏军的打击下，先前是希特勒德国盟军的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放下了武器，并开始对德作战。匈牙利也很快

[214]

投降。这样一来，德国基本上^③陷入了孤立状态。当时的战局表明，苏联无需盟军帮助单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占领德国全境、解放法国。这种局势迫使^④此前一直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派兵进入西欧……

[215]

1945年2月初，在克里木举行了苏美英三大盟国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决定苏联加入对日战争……

[220]

斯大林同志对祖国的一大功绩是，他在卫国战争时期挑选和培养了**新的**^⑤军事领导干部，提拔他们担任要职，这些领导干部担负起了对德及其同盟军作战的全部重任。他们是：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戈沃罗夫、朱可夫、瓦图京、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安东诺夫、索科洛夫斯基、梅列茨科夫、罗科索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转下页）

① 第1版为“发展”。

② 这一段是用打字机打在另一页纸上的，放在“大段增补内容”中。这一页和增补的一页上都有斯大林写的“增补”二字。

③ 第1版为“完全”。

④ 第1版为“最终强迫”。

⑤ 黑体是斯大林用的。

沃洛诺夫、托尔布欣、雅可夫列夫、马利宁、加里茨基、特罗菲缅科、戈尔巴托夫、施捷缅科、库拉索夫、韦尔申宁、戈洛瓦诺夫、费多连科、雷巴尔科、波格丹诺夫、卡图科夫、列柳申科等许多人……

[222]

1945年7月16日，^①斯大林抵达柏林，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会议在这里举行……

[224]

日本关东军进行了几次疯狂猛烈但徒劳无功的反扑之后，不得不停止^②抵抗，放下武器，向苏军投降……

XII

[225]

……全世界人民渴望的和平来临了……^③

斯大林同志在战争期间一方面领导^④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和后方的经济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研究并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

[226]

苏联的军事科学、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职能和力量源泉^⑤的理论^⑥，在斯大林同志被编入《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的讲话和命令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同志^⑦总结了苏维埃国家战时活动的经验，指出了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纪念伟大十月革命26周年的报告中，指出了^⑧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制度、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伟大意义……

① 删掉了“最高统帅”。

② 第1版中没有“不得不”一词。

③ 删掉了下面一段话：“苏联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战胜德日帝国主义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是因为苏联人民是在列宁的旗帜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工作和战斗的。”

④ 第1版为“直接领导了所有的”。

⑤ 删掉了“和不可战胜”。

⑥ 第1版为“学说”。

⑦ 删掉了“天才地”。

⑧ 第1版为“揭示了”。

[229]

斯大林同志说，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是苏联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①……

[230]

斯大林同志发挥的^②论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命题^③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同志说^④：“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

[231]

斯大林同志^⑤进一步发展了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⑥。斯大林同志深入研究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战争中各兵种与作战技术的相互作用、关于现代战争中大量坦克和飞机的作用、关于炮兵是最强大的兵种等论点^⑦。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凭靠着他的天才总能找到充分考虑到战局特点的正确解决办法。

斯大林的军事艺术无论在防御中，还是在进攻中都得到了体现。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军队的积极防御始终与准备反攻^⑧相配合。进攻始终与稳固防御相配合。斯大林同志巧妙地制定和运用了新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如在若干地段同时突破敌军战线的战术，

[232]

使敌人不能集中自己的后备力量实行集中打击；如在若干地段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突破敌军战线的战术，使敌人不得不消耗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调兵遣将；如突破敌军侧翼绕到敌军后方，包围并消灭敌军大兵团的战术。斯大林同志以他天才的洞察力总能识破和挫败敌人的计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军队进行的战斗，是军事艺术的卓越^⑨典范。

① 第1版为“是苏联的力量源泉”。

② 第1版为动名词“发挥”。

③ 第1版为“学说”。

④ 第1版为“教导说”。

⑤ 第1版为“最高统帅”。

⑥ 第1版为“是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创立者”。

⑦ 第1版为“学说”。

⑧ 第1版为“反突击”。增补内容中删掉了“为……的条件”。

⑨ 第1版为“不朽的”。

[234]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详尽描述了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辉煌的历史性胜利和进一步加强^①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宏伟纲领。

② 第1版为“发展”。

[235]

斯大林同志谈了未来的计划，谈了苏维埃国家国民经济及科学的新的巨大发展，谈了创造条件保证我们祖国免遭意外，以及不断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保证我国文化水平有新的提高^③和人民物质福利有所增长。

③ 第1版为“发展”。

1946年2月，苏联人民根据斯大林宪法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新选举……^④

④ 这一段的最后删掉了“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位代表。”

斯大林同志的生平事业，是与其导师和培育者列宁的活动、与我们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与伟大苏联人民^⑤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人民坚定勇敢地向前迈进，因为他们知道天才的斯大林不仅保证苏维埃祖国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必将指引祖国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大道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236]

其次，斯大林同志的生平事业，是与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⑤ 第1版为“苏联人民的”。接下来斯大林重重地勾掉了他写的两行字。

[237]

……在这个党^⑥的领导下，不仅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劳动人民政权，而且还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

⑥ 删掉了“新型的党”。

各国的工人都知道，斯大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⑦人民说的，而且说了就要做的……

⑦ 第1版为“两亿”。

[238]

……列宁逝世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领袖像斯大林那样领导过如此广大(转下页)

的千百万工农群众……

斯大林同他的亲密战友、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者^①一起率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着这个亘古未有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

[240]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或者像我们党内所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

[243]

^②整个进步人类、一切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民都将自己对永久和平和安全的希望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有苏联英明的和久经考验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红军和苏联人民奋勇前进。我们军队的光荣胜利将与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一起载入我国和全世界的史册。现在，我们在伟大领袖和组织者斯大林的领导下，正着手进行和平建设，以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真正发展，不辜负我们全世界所有朋友的美好厚望。”^③

载于《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① 删掉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什维尔尼克等人”。

② 下面引的这两段话是第2版的最后两段，是用打字机打在另一页纸上的，并被放入第2版清样，上面有斯大林用蓝笔划的“钩号”。同时斯大林删掉了第1版的这个原有结尾：

“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工作和斗争都是由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领导的。

我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一致愿望是：

我们亲爱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健康长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而战无不胜的旗帜万岁！”

③ 莫洛托夫《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8周年》1945年俄文版第18—19页。

附录 斯大林逝世后的个人财产登记表

斯大林同志个人财产登记表

1953年3月5日22时30分，我，近郊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贴身卫士长斯塔罗斯京、助理图科夫、工作人员布图索娃，根据贝利亚同志的指示，登记了约·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财产。

- 1、灰色皮封面便条本一个；
 - 2、红色皮封面笔记本一个；
 - 3、分别书写在零散纸张和纸片上的个笔记和批注。编号总计67（六十七）页；
 - 4、红色封面普通笔记本（里面有扎记）一个；
 - 5、烟斗5个，另有：4个烟盒及专用器具、烟草；
- 斯大林同志办公室：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纪念品未登记入册。

卧室及衣帽间：

- 6、白色上衣2件（两件衣裳上都别着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
- 7、灰色上衣，日装，两件；
- 8、深绿色上衣2件；
- 9、长裤10条；

10、内衣放在2号盒子中；

3号盒子里放的是：6件上衣、10条长裤、4件大衣、4顶宽尚帽；

1号盒子里放的是：便条本、笔记本、个人札记；

沐浴用品放在4号盒子里。

属于斯大林同志的其他财产未做登记。^①

登记表及文件的完成时间——1953年3月6日0时45分。

在场人员签字：

奥尔洛夫

斯塔罗斯京

图科夫

布图索娃

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存折，有900卢布的存款。这就是斯大林的全部个人财产。住宅是国家的，后来那儿是总统档案馆；别墅是国家的，转给了其他人使用。

斯大林另有一笔3万卢布的存款，仅相当于当时苏联一名矿工3个月左右的工资（矿工的月工资是8000-13000卢布），后来由斯大林的女儿分赠给了其他亲属和晚辈。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771-772页

人人获得解放和我自己的别墅

——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

斯大林：我们的最终目标，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人民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的人。资本主义则剥削人，使他失去个性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自由的只是一些极其富有的人，大多数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享有个性自由。

罗曼·罗兰：是的，是的。

斯大林：既然我们挣脱了剥削的羁绊，我们就解放了个性。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作了精采的论述。

罗曼·罗兰：这部著作好像没有翻译成法文。

斯大林：不可能。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作了精采论述，指出：共产党人在打碎了剥削的锁链后就应当完成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人人获得解放，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更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目前我国正在形成一个崭新的局面，涌现出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完全新型的人。在我国，人们憎恨懒汉、游手好闲的人，在工厂里人们把懒汉用席子一卷打发他们回家。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展开突击运动，这是我国现实生活中的主旋律。突击手们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重，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我们目前的新的生活、新的文化。

罗曼·罗兰：是这样的，非常好。

我占用了您很多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斯大林：哪里，哪里！

罗曼·罗兰：感谢您为我提供了这次谈话机会。

斯大林：您的感谢使我有些难为情。一般说来，人们都是向那些并不指望他会带来好结果的人表示感谢。难道您认为，我不会盛情接待您吗？

罗曼·罗兰（站起身来）：说句实在的，这次谈话对我来说非同寻常。我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像在这里这样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

斯大林：明天是6月29日，您是否想去高尔基那儿？

罗曼·罗兰：我们约好了，明天高尔基来莫斯科。我们一起去他的别墅，然后，也许我会接受您的建议去您的别墅住几天。

斯大林（笑着说）：我可没有别墅。我们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别墅。这不过是许多属于国家财产的备用别墅中的一个。为您提供别墅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苏联政府，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我。

您住在这个别墅会感到很安静的。那儿既没有电车，也没有铁路。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这个别墅永远归您使用。只要您想用，就不必担心会打扰别人。

您参加6月30日举行的体育大检阅吗？

罗曼·罗兰：是的，是的，很想参加。请您为我提供这次机会。也许，我能在高尔基的别墅或您为我盛情提供的别墅里再次见到您并同您交谈。

斯大林：随时恭候。我完全听您的，很高兴去别墅看望您。我保证您能参加体育大检阅。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辑

附录一 美联社记者纳特请求采访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美联社

办公室主任肯特·库珀

苏联莫斯科梅尔特瓦戈胡同

1936年10月22日

致共产党总书记约·维·斯大林

克里姆林宫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国外说您罹患重病的恶意报道可谓铺天盖地，有的报道甚至说您已离开人世，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拜见您，与您攀谈一番，以证明这些纯系捏造。

现在整个世界由于西班牙事件又陷入了恐慌，所以我认为，各国的读者都会希望像过去那样，遇到困难或信心不足时能看到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敢肯定地、负责任地说，您的明确观点会对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您有时会接见外国报纸记者，但美联社尚未有此荣幸，它是美国最大的报业联合体，是通过与塔斯社这样的通讯社联系来为全世界服务的。塔斯社的多列茨基先生可能会推荐美联社和我本人。

我能否恭请采访您，聆听您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并在苏联新宪法通过之前听到您对它的解释。

忠于您的

分社社长 查尔斯·纳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58全宗，
第11目录，第1160卷宗，第102—103张
译自英文的俄译文打字稿。

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世界

——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来信

(1936年10月26日)

致美联社分社社长 查尔斯·纳特先生

阁下！

我从国外报纸的报道中得知，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世界，到天堂去了。既然外国报纸的报道不可不信，假如您不想从有教养的人的名单中被除名的话，那就请您相信这个报道，不要搅扰我在彼岸世界的宁静生活。

敬礼！

约·斯大林

1936年10月26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58全宗，
第11目录，第1160卷宗，第98张打字稿

附录二 纳特再次致斯大林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莫斯科 查尔斯·纳特

美联社

莫斯科梅尔特瓦戈胡同18号

1936年10月27日

致总书记约·维·斯大林

克里姆林宫

亲爱的斯大林先生！

请您相信，从彼岸世界写信时的那种感觉相当奇特。我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有些诚惶诚恐，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儿时给圣诞老人寄信的事，我们让父母寄信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信寄往北极有多么困难。

我相信而且能够理解，您不希望有人打搅。不过，您在天堂作过礼拜后会允许我去您那儿谈谈世间的事儿。

我将不胜感激。

忠于您的

分社社长查尔斯·纳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58全宗，
第11目录，第1160卷宗，第107张

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再复美联社记者纳特的信

(1936年10月27日)

致查尔斯·纳特 美联社分社社长

阁下！

遗憾的是，对上封信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敬礼！

约·斯大林

1936年10月27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58全宗，
第11目录，第1160卷宗，第106张打字稿

预言身后

对身后的预言

(1939年)

斯大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1939年，即在我国后来发生的事件之前半个世纪，他就预言（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记下了他的话）：

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会遭到歪曲和诬蔑，首先是在国外，国内也一样。

追求世界统治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报复我们，它依旧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野蛮国家和供应原料的附属国。我的名字也将遭到咒骂和诽谤，许多暴行都会强加于我。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将尽全力来摧毁我们的联盟，使俄罗斯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苏联的力量在于各族人民友好。敌人攻击的矛头应当首先指向破坏这种友谊，指向使周边地区脱离俄罗斯的企图。在这方面，应当承认，我们做得还不是尽善尽美。

民族主义将特别严重地兴起。在一定时期内，它将压倒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时间不长。各个民族内部都会出现许多猥琐的领袖和叛徒。

整个说来，未来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复杂，甚至疯狂，转折将是最急剧的。结局将是东方翻腾起来，同时西方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

不论事态如何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和胜利。后代人将举起自己先辈的旗帜，他们将按照自己过去的榜样来建设自己的未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795-796页

致明月

你不知劳累一如既往，
巡行在乌云笼罩的大地上，
用你那银色的清辉
把浓浓的黑雾驱散。

你的微笑是那么柔美，
你俯瞰的大地还在沉睡，
卡兹别克的冰峰直插天外，
你的催眠曲叫它陶醉。

但是你要永远牢记，
有人虽然遭受压迫和毁灭，
却有着一腔强烈的希冀，
要与姆塔茨明达一争高低。

你照亮黑沉沉的苍穹，
迸射出淡淡的光辉，
像以往那样优柔和婉，
映照故土的山山水水。

我向你敞开心扉，
我向你举起双臂，
我看到明月皎洁，
思潮重又起伏澎湃。

——斯大林《诗六首·之一》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一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二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2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党政建设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五二年

党的建设

关于左翼与右翼共产党员问题——致列宁的信（节选） （1922年11月13日）	3
政治局的一些分歧已经得到了解决——致马吉多夫的信 （1923年11月22日）	5
对全会议程我没有异议——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20日）	6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1926年3月15日）	8
把问题提交书记处会议的意见无法采纳——答复皮达可夫的信 （1926年7月13日）	13
天天检查中央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4月8日）	14
关于秘书处工作的声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10月16日）	15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问题的会议记录（节选） （1937年10月12日）	16

政权建设

- 关于签订对外贸易合同的问题——致纳里曼诺夫的电报
 (1921年9月26日) 20
- 关于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界限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3月10日) 21
-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
 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1922年8月11日) 23
- 关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对列宁的便函的答复
 (1922年9月22日) 25
-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与
 独立共和国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决议的说明
 ——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
 (1922年9月26日) 28
- 对列宁修改决议的建设的意见——答列宁给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9月27日) 30
- 就决议问题在会上交换的便条——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1922年9月28日) 32
- 关于主席团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致莫洛托夫的信(节录)
 (1929年8月21日) 33
- 必须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2日) 34

联盟诸国

- 将出现两个新的苏维埃政府
 (1918年12月17日) 38
- 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白俄罗斯人
 (1918年12月29日) 40

排除 3 名政府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致日卢诺维奇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42
各共和国政府应服从中央委员会——致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43
请通报格鲁吉亚的局势——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21 年 2 月 16 日)	44
查清消除巴斯马奇分子活动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4 月 21 日)	46
谈谈对布哈拉问题的意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4 日)	48
把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摘录) (1932 年 8 月 11 日)	50
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 (1937 年 11 月 7 日)	52
健全法制	
关于拟订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初步计划——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 年 9 月 26 日)	55
关于不对恐怖犯罪分子公开起诉的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 (节选) (1935 年 6 月 28 日)	57
关于惩处 12 岁以上犯罪儿童的法律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 (节选) (1935 年 6 月 28 日)	61
对人民公敌的体罚是作为例外允许使用的 (1939 年 7 月 27 日)	63
附录 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释放在押者的报告 (1939 年 12 月 22 日)	65

干部队伍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年3月5日） 67

中层干部决定事业的成败——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37年11月7日） 89

选择领导干部的标准——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0年11月7日） 91

大胆提拔年轻干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1年2月4日） 92

要宽容每个人工作中的小缺点

——同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谈话的片断 93

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问题的会议记录（节录）

（1941年2月21日） 94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年10月16日） 95

清洗肃反

把反党分子清除出去——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9日） 100

维护右倾观点与党员身份不相容——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1月17日） 101

关于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3日） 102

反党派别集团在玩弄政变把戏——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104

对破坏中央指示的犯罪行为不能不闻不问——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2年（不早于6月））	106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7年6月2日）	107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134

宗教政策

对一款有关宗教的条文的意见——给司法人民委员的便函 （1923年7月2日）	139
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的指令信 （1923年8月16日）	140
应保护教堂一类古建筑文物 （1933年9月12日）	142
关于如何对待宗教和教徒问题的决议 （1939年11月11日）	143

宣传阵地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操之过急了——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146
一篇反对销售白酒的杂文引起的风波——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5日）	149
《真理报》任命了临时编委会——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7日）	151
该结束这种荒唐的局面了——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7月29日）	152

你们的建议是错误的——致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9年9月13日)	154
《真理报》编辑部情况不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2月25日)	156

党史教育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年10月1日)	160
--	-----

工作通信

对回应一封短信的建议——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3月7日)	202
谈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节选) (1926年9月16日)	203
再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9月23日)	206
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9日)	208
再谈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底)	210
你们有多少问题尽管提出——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2年6月25日)	212

插图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53
二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137
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	159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党政建设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五二年

党的建设

关于左翼与右翼共产党员问题

——致列宁的信（节选）

（1922年11月13日）

列宁同志：

我认为有一些事需要分两个方面向您报告：

.....

二、我收到了不少莫斯科党组织的实践家们和共产国际俄罗斯党团成员由于你与《观察家报》记者之间关于左翼与右翼共产党员的谈话造成的不便而表示的意见。他们说，列宁同志的谈话使得左派共产主义（或许就是工人反对派）的存在变得合法了^①。实践家们认为，现在，当左派共产主义整个从形式上被消除时（不排除工人反对派），再像谈论可能与正统党的共产主义竞争的合法现象一样来谈论左派共产主义是危险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况且，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确认了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紧接着在十一大以后，讲的也是继续从思想上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我在想，如果在外交方面强调存在着右派共产主义，或许是有益的，但在党内关系上继续强调

^① 指刊登于1922年11月10日《真理报》上的列宁对《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对于记者提出的“拒绝批准俄罗斯与英国的一个经济协定是否意味着‘左派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列宁回答说，英国反对俄罗斯参加洛桑大会是很不正当的行为，“它只会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不仅会使右翼共产党员与左翼共产党员紧紧地团结起来，而且会使俄罗斯居民中广大的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也都团结起来。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演变成左翼和右翼共产党人产生什么分歧的地步”。

这一点，那就会导致有损于党和有利于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恶劣的结果，从而产生紊乱和是非不清。应该继续好好地纠正这个错误。

斯大林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注：本卷所引用资料除另
标明出处外，均选自该书)

政治局的一些分歧已经得到了解决

——致马吉多夫的信

(1923年11月22日)

亲爱的马吉多夫同志：

您的来信已收到，为此非常感谢您。从第15号的非公开信中，您可以看到，您所提的几个问题帮我认识了我们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收到您的信正好赶上中央政治局为检查顿巴斯的工作任命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您会看到，您正好赶到了这个点上。您抱怨从中央方面得到的信息很少，这个意见很正确。我希望第15号非公开信能够使您在这点上得到满意。很遗憾，我不能方方面面都写到，比如，中央决定，由于政治局内部的一些分歧，有关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今年10月做出的决议不向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这些分歧其实并不大，它们已经在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上根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立场得到了解决，误解本身已经或者说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协调地工作。而且，我也无权把中央和中央监委有关决议的文本寄给你，因为，这是党中央机关所不允许的。1月份将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应该能在莫斯科见面，届时，我可以当面告诉您所发生的一切。再一次感谢您的来信。望继续来信。

握您的手！

斯大林

对全会议程我没有异议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25 年 8 月 20 日）

莫洛托夫同志：

你 8 月 20 日的来信收到了。今天我同布哈林交换了意见。

（1）你建议全会议程包括 5 个问题：1. 外贸，2. 工会，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 工资，5. 中亚的土地改革。对这个议程我没有异议。对工资问题（有计划地提高工资等）作好准备很重要。这件事是七人小组提出来的，未经政治局讨论将准备工作委托给了施米特。勤催着他点儿。在对这个问题作准备时应事先通过政治局。最好再加上工业建设问题，由费利克斯或皮达可夫作个报告（这里没有斯米尔加什么事，他领导经济是个冒牌货，况且要谈的是工业而不是整个经济）。但如果费利克斯目前作不了报告，可以推迟到下次全会，但要作出坚决保证，即不经政治局批准在这一时期不开工兴建任何一个全苏规模的工厂。

（2）关于乌克兰贫苦农民委员会问题没有必要形成文件。乌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同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完全一致。最好在中央全会上将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而在报告中要谈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等。这也将是对乌共中央决定的肯定。这个报告应由你来作。一定由你来作。

（3）如有必要，可在下次全会上提出经济计划，报告不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作，而是由李可夫（人民委员会）或加米涅夫（劳动国防委员会）并吸收中央监察委员会来作。

(4) 关于代表大会议程我们以后再谈。

(5) 你如有时间，信请写得勤些，——我将及时复信（我时间有的是）。

(6) 布哈林说你现在工作严重超负荷。我力争 10 月或更早些回到莫斯科，以减轻你的负担。

我很健康。身体恢复得相当好。

握手！

你的 约·斯大林

附言：关于工会的提纲总的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个别提法有毛病和不够明确，还需要进行修改。必须根据安德列耶夫的著名讲话的精神进行修改。

约·斯·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 年第 9 期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 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1926年3月15日在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

先谈一般性的意见。“检查”这个词在计划^①里反复出现。这是整个计划的中心。我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计划的中心是从颁发指示转向检查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况。我们的指示多得很。人们写呀，改写呀，再改写呀，发呀，然后把指示忘掉。于是重新再发指示，又把它束之高阁，如此等等。一部分指示，由于某种缘故合乎执行者的口味，被执行了，其余的都被搁到了一边。我们有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人们常常从演说家的讲话中寻找指示。为了结束这种状况，就必须从言论和指示转向行动。同志们，请回想一下，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提出了必须从言论转向行动的问题，指出了当前的关键是“检查执行情况”。必须实现列宁的这些指示，必须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列宁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就把这一点作为基本任务提出来了。我们像往常一样比列宁迟缓和落后了两三年，到现在才开始来实现它。必须对已经发出、没有被废止但是被忘掉了的所有指示，都从其执行情况的观点来加以检查。

一般性的意见就是这样。

现在我想把注意力放在某几点，对它们略加解释。关于通报工作，柯秀尔^②说得对：这里应当说到来自地方的通报和来自中央的通报。

① 据1926年3月18日《真理报》报道，这个计划包括三十五项，于3月15日由联共（布）中央批准。

② 柯秀尔，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我想请大家注意第四点即关于苏维埃支部工作的那一点，而据我理解，苏维埃支部也包括经济机关支部在内。这一点怎么理解？我对这一点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苏维埃支部要成为我们机关中的真正苏维埃秩序的维护者。要知道有大量岂有此理事在国外的全权代表处、商务代表处和国内的苏维埃机关里发生着，一个方面是侵吞人民财产，再一个方面是对公民采取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态度。常有这样的事：一些“普通”公民一连好几个月叩机关的大门，可是因为他们在机关里没有“关系和熟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人们奔走好几个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见不到机关领导人的面，没法向他们递交申诉书和申请书。这还成话吗？支部应当监督苏维埃机关，包括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要它们具有哪怕是起码的秩序，具有起码的同情心和愿望来倾听人们的意见，而少一些官僚主义。

所以，苏维埃支部面临的任務，就是进行监督，不让人民财产被侵吞，不许借分红等等的名义搞诈骗，分发钱财，不许出现那种愚钝的、犯罪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在我们的机关和居民之间，即在我们的机关和跟机关没有“关系”的老百姓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克服的障壁，一堵无法穿过的死墙，使这些老百姓寻找真理而不可得。支部，特别是支部委员会和支部书记，应当怎样在这里起作用。支部书记作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的一些例子说明到处在偷窃。大家知道，某商务代表处有个工作人员携款潜逃。那里的支部书记干什么呢？又例如，大家知道，国家银行把几千万卢布当作职员薪俸开销了。那里的支部和支部书记干什么呢？为什么支部书记不把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情报告中央或中央监委呢？

假若一个老百姓遇到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而对苏维埃政权失掉一切信心，那么支部书记就应当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党和党的组织。但我知道，所有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情，不仅是在共产党员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有时还是共产党员带头干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

题，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会都应当关心。苏维埃支部生活的内容决不能只限于作关于张伯伦^①的报告和唱《国际歌》。必须做到，苏维埃支部要能够同全党息息相关，帮助党改改善和进一步简化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使它们同居民接近，成为廉洁的节约的机关。

其次，我对草案第三页上的第10点讲点意见。这里说的是在定期报刊上就节约开支的制度、反对附加开支、缩减编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组织宣传鼓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报刊是蹩脚的。它们常常回避人员编制的膨胀、机关的浪费、举办庆祝会和纪念会成风、工厂的旷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停滞不前等现象。报刊随波逐流。如果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必须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不必要的支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具有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然而报刊却往往拒绝揭发浪费分子，不去反潮流，不愿意向工人们解释所有这些问题。而如果向工人们解释，他们是会理解的。要使每个工人、每个共产党员都来监督资金的花费，在这方面厉行节约，要吸收所有的人参加这个事业。钱是当着大家的面花的。他们不会看不到。

给你们举个例子：现已证明，我们出口粮食是不赢利的，因为各地采购时每普特粮食比应花的多花了五戈比。去年，在采购运动展开前，曾经就地方采购的各项开支作了预计。你们知道我们的开支预计是怎么作的，一一打得很宽并且给了附加。结果说明，预计的支出在所有项目上都是正确的，然而各地采购每普特却多花了五戈比。预计是每普特八戈比，结果是十三戈比。这样便把事情办糟了。出口粮食变得不赢利了。而出口粮食不赢利就意味着进口要缩减，工业建设要缩减。这额外的开支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是由于在地方上到处搞采购粮食的大机构，铺得很开，而不在支出方面实行节约，一句话，白白

^① 张伯伦，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

花费了人民的钱财。工人们看见了这种情况没有？看见了。农民呢？农民也看见了。共产党员就没有看见这种情况吗？当然看见了，但可惜他们自己也参与了，不是参与节约，而是参与浪费。由于这个缘故，就需要报刊经常揭发我们国家机关的所有这些缺点和溃疡。不然什么也改不了，人也得不到改造。不然不得了。

现在请注意第三页的第2点：“苏维埃改选的总结”。在这方面我想简单说两句。问题是我们某些苏维埃机关和某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大大滋长了宽容心理，非常愿意叫非无产阶级分子喜欢，向他们让步。既然说要活跃苏维埃，那末某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就以为，需要讨所有的人喜欢，连富农和其他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不例外。我们中央有决定，宪法和选举权不改变。但实际上却出现了新的选民集团——商人、富农都选举。为什么？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选举细则》，把宪法给放宽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委员会”走得更远，竟奉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所谓的法律专家们出的主意。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叫非无产阶级分子喜欢。为了显示眼光的“远大”，博取“纯粹”公众的称赞。这里需要再三检查。最近，在我们好多个苏维埃同志身上，那种情愿向非无产阶级分子让步的情绪，已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过：威胁制服不了共产党员，阿谀奉承却可以制服他。现在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有的共产党员，只要“纯粹”公众夸奖一下他眼光“远大”，就高兴得软了下来，被俘虏过去，而离开党和党的指示。我将在讨论议程第二项时更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再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第三页第4点。不久前我收到了阿斯芬季亚罗夫的一封短信，他在信中抱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某些民族共和国里（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尔）关系紧张，中央对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漠不关心。我认为，阿斯芬季亚罗夫是对的。需要听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部的专门报告，首先是关于巴什基

尔和哈萨克斯坦的报告，采取措施来制止中央以及地方上的这种不可容许的违反党的民族问题指示的行为。

载于 1926 年 5 月 3 日
《联共（布）中央通报》
第 16-17（137-138）期

把问题提交书记处会议的意见无法采纳

——答复皮达可夫的信

（1926年7月13日）

1926年7月13日

皮达可夫同志

7月13日来函已阅。同样的建议已于7月10日呈中央书记处交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审阅签字。他们已提请将此问题递交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在重订集体合同之前解决它。考虑到该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书记处决定提交全会后就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议。你提出把这个问题提交这次（7月）书记处会议的意见无法采纳，原因是，正如你自己所写的：你还没有把提交的问题准备好；有关工业的控制数字你也没有准备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也不清楚（据查，捷尔任斯基对你的信毫不知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全会的议程已被政治局通过；再说，你既然参加了星期一（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为什么没有在会上提出增加全会的议程？我记得，根据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有问题应当在开会前3天列入政治局的议程。我认为这个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列入全会的议事日程。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天天检查中央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4月8日)

10.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

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为自己的地方机关编写一份具体指示，说明当今的主要任务是天天检查中央下列决议的执行情况：即关于日用必需品的决议；关于发展苏联贸易，改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组织的决议；关于开展和改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轻工业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商品基地的工作的决议；关于实行价格政策并以实现这项任务来检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的活动能力的决议，如果这些地方机关在这方面工作很糟时将其改选掉。

关于秘书处工作的声明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摘录

(1932年10月16日)

5. ——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指示中央委员会秘书处^①在政治局会议期间必须停止以咨询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免得分散政治局委员们对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的注意力。

^①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政治局的公文、对政治局的活动给予技术保证。1933年11月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了改组，它仅为政治局服务，并直属于总书记。

联共（布）中央十月全会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问题的会议记录

（节选）

（1937年10月12日）

安德烈耶夫：现在开始讨论议程的第二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就全会第二项议程，根据政治局的建议，我提出几个问题供中央全会讨论并提出建议。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成员。六月全会后，至本次全会这一期间，有几名中央委员离去、被逮捕：捷连斯基（他原来是沙皇的暗探）、列别德、诺索夫、皮亚特尼茨基、哈塔耶维奇、伊克拉莫夫、克里尼茨基、瓦列伊基斯——共8人。经过对所有材料的审核，经过对材料的核实，结果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

如果没有问题，我建议将此事备案。

喊声：对，予以备案。

斯大林：在这期间内，候补中央委员中离去的、被逮捕的有16人：格林科、柳布琴科（已用枪自杀）、叶廖明、杰里巴斯（日本间谍）、杰姆琴柯、卡雷金娜、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间谍）、舒布里科夫、格里亚金斯基、萨尔基索夫、贝金、罗森霍尔茨（德、英、日间谍）。

喊声：喔唷！

斯大林：列帕、吉卡洛、普图哈等16人。经过审核、核实所有材料，原来这些人也都是人民的敌人。如果没有问题或异议，希望把这问题查照备案。

喊声：同意。

安德烈耶夫：有人提议赞同政治局的提案。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没有。

安德烈耶夫：谁赞成中央委员会这一决定，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斯大林：按我们党的习惯做法，当有人去世，或者被开除而离开中央委员会时，中央委员会成员通常由候补委员增补。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现在这样办也同样是适宜的。我们的候补委员名单是在代表大会上编制好的，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名单不是按姓氏的字母排列顺序，而是按得票多少排列顺序。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前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是合适的。他们都是谁呢？

帕霍莫夫——水运人民委员，得票最多。代表大会上得票数在其后者伊萨耶夫——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莫洛金——斯大林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布柳赫尔，你们对他都很熟悉。布尔加宁，你们对他也很熟悉。布林，他在军事部门工作。库利科夫，你们对他也应该很熟悉。洛佐夫斯基，你们对他也很熟悉。巴吉罗夫——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卡罗夫，他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负责钢铁生产工作，共 10 人。

喊声：对。

斯大林：政治局建议通过关于将在 17 届党代表大会上得票最多的这些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决定。

安德烈耶夫：还有什么建议？

赫鲁晓夫：我想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作些补充。我提一些同志，这些同志不在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按得票数目多少排列的顺序之内，这些同志是党中央委员会熟悉的，他们主持重大工作，我认为也应把这些人由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普拉姆涅克，他是顿涅茨克州州

委书记，顿涅茨克是个大州，大家都认识这位同志。梅赫利斯，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候补中央委员。米哈伊洛夫，是沃罗涅日州州委书记，也是一位主持重大工作的同志。乌加洛夫，他是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二书记，很早就参加工作，在这样重要的组织内担任工作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建议也把这些同志由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安德烈耶夫：全会希望……

喊声：表决。

安德烈耶夫：对政治局的提案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提案是否分开单独表决……

喊声：不是提案，是补充。

安德烈耶夫：要不与修正案，与补充一起表决。

喊声：一起。

安德烈耶夫：就是说政治局的提案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补充一起表决。谁赞成这提案，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斯大林：是可以把所有候补中央委员都转为中央委员，我们完全有这个权力，但是首先这没有任何必要，其次中央委员会不应没有预备队，不应没有候补委员。因此范围可以只限于已通过的那个决议。

第二个问题，关于政治局的成员问题。政治局建议把叶若夫同志接纳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建议依法确认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喊声：正确。

安德烈耶夫：还有什么建议？

喊声：表决。

安德烈耶夫：谁赞成政治局的提案——接纳叶若夫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请举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政权建设

关于签订对外贸易合同的问题

——致纳里曼诺夫的电报

(1921年9月26日)

副本

秘密

密码

第 01185/261/III

致巴库 纳里曼诺夫

未经区域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意和俄共中央批准，无论如何不得与德国人或其他任何人签订对外贸易合同。收到此电后请复电并告执行情况，然后函告全部详情。

列 宁 斯大林

关于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 之间的界限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3月1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3月10日

致中央书记处 莫洛托夫同志

我建议把季诺维也夫的提纲放到星期日再说，依我们看，这份提纲不完备，还需要补充下面四点：

1. 尽可能确切地规定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界限，定出前者和后者的工作范围，并责成党的机关不再就苏维埃工作发布行政命令。

2. 认为有必要在不同的党的工作者群体之间分工，尽可能使之固定在一定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部门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工作者的频繁调动。

3. 提高党员质量的途径有：

(1) 组建高级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主要是工人小组。

(2) 组织工人马克思主义俱乐部来讨论日常问题。

(3) 普遍组建中低级党校。

(4) 改善党的积极工作者（党的军士）的物质生活状况。

至于萨法罗夫同志的提纲，我们认为今天就可以送去见报。

鉴于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奥新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要求把农村工作问题列入议程，我们建议单独同库比亚克同志谈一下，让他起草农村工作的初步提纲并提交中央审查。

斯大林 加米涅夫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 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①

（不早于 1922 年 8 月 11 日）

1. 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几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适宜的。关于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目前只和他们订立有关关税、外贸、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条约。

附注：第 1 点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宪法中的相应改动，将于苏维埃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后着手。

2. 认为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扩大到第 1 点中所列举的各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的相应机构是适宜的。

3. 第 1 点中提到的各独立共和国外事（外交和外贸）、军事、铁道和邮电，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事务合并。

4. 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正式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5. 认为第 1 点中提到的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卫生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附注：上述各共和国与反革命斗争的机构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令。

^① 该决议草案是由斯大林拟订的。

6. 本决议如果得到俄共中央委员会赞同，将不公布，而作为通令分发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便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先由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

委员会成员 约·斯大林

关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问题

——对列宁的便函的答复

(1922年9月22日)

对便条^①的答复。

列宁同志！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现状，即缺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正在变得忍无可忍。这种现状引发了冲突、怨恨和愤慨，把所谓统一的联邦国民经济变得有名无实，在全俄范围内阻碍一切经济活动，使其处于瘫痪状态。两者必择其一：要么真正独立，那样的话，没有中央干预，有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租让委员会，自己的铁路部门，而且，共同的问题通过对等的谈判，根据协议解决，而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各独立共和国不必执行；要么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成一个经济整体，把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正式扩大到各独立国家的人民委员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即以各共和国在诸如语言、文化、法律、内务、农业等方面真正的内部自治来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

应当注意到：

1. 如果正式规定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各独立共和国不一定执行，而这些机构又经常取消各独立共和国中央机构的决定，这会引起后者对莫斯科中央机构

^① 指1922年9月22日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便函，在该便函中，列宁要求斯大林就有关各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情况向他汇报。

“非法行为”的抗议。

2.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一般是在地方中央机构已经发出自己的命令，而这些命令旋即被莫斯科中央机构取消之后才进行干预，这就造成经济工作中的拖延和停滞现象，而且在地方上引起非党群众的不解和共产党员的愤慨。

3. 在四年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武装干涉，我们莫斯科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自由主义，但是却意外地在共产党人中培养出一些真正彻底的社会独立主义分子，他们要求全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把俄共中央的干预视为莫斯科的欺骗和虚伪。

4. 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形式、法律和宪法不能轻视，地方上年轻的一代共产党人不把搞独立投机看做投机，固执地把关于独立的文字当成真的，还固执地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落实独立共和国的宪法。

5. 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使地方应当在一切基本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服从中央这种中央和地方相互关系的形式，与实际相互关系一致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用形式上的（同时也是实际的）自治取代形式上的（名义上的）独立，那么，一年之后，维护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统一将无比困难。

现在的话题是可别“得罪”民族共和国的人，一年以后，话题很可能是可别因此引起党的分裂，因为“民族”自发势力在地方上的作用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不利，形式上的独立有利于这种作用。实例很多，其中之一是：前不久，格鲁吉亚中央竟然不与俄共中央打招呼就决定，允许奥斯曼银行（英法资本）在梯弗里斯开设分行，这无疑会导致外高加索在财政上屈从于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里拉已经成了统治货币，正在把格鲁吉亚货币和俄罗斯货币排挤出市场），而且中央的果断禁令（在索柯里尼柯夫^①同志的坚持下通过的）竟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我的计划：

1. 关于布哈拉、希瓦和远东共和国（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暂时搁置，即暂不实行自治。

2. 对其他 5 个独立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宜承认自治，好让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自愿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它们愿意在自治的原则下加入到与莫斯科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中来（我已经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希望自治化的申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希望保持独立的申请）。

关于确定与边疆区关系的中央委员会^②会议可能于 23 或 24 日召开（尚未全部到达）。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自治，其中也有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至于美国股东，有消息传开：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另一些人认为他们不可信赖。近日内我将收集准确的信息告知。

附笔：

1. 为备不时之需，给您寄上“假冒的”民族主义者马努伊尔斯基同志的信并告知您，据说，绝对“不是假冒的”乌克兰人拉柯夫斯基^③同志对自治表示反对。

2.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已来，向您致以热烈的敬礼。

约·斯大林

星期二详谈^④。

斯大林 又及

① 索柯里尼柯夫，时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财政人民委员。

② 指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

③ 拉柯夫斯基，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④ 列宁和斯大林的面谈于 1922 年 9 月 26 日在列宁休养地哥尔克举行，主要讨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与 独立共和国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决议的说明

——致俄共（布）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

（不早于 1922 年 9 月 26 日）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与独立共和国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决议（已分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基本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只需确切说明主要涉及联盟中央机构的组成和部分涉及其职能的几点。与某些中央委员和与许多当地民族共和国人士的交谈使我们对此确信不疑。据此，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经过某些改动的，对该委员会决定更加准确的说明：

“1. 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同时为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约是必要的。

2. 认为‘联盟’的最高机关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数按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人口分配。

3. 认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联盟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4. 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应的机构合并。而‘共和国联盟’的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共和国和联邦中有自己的全权代表以及规模不大

的机构。这些全权代表由‘联盟’的各人民委员同各联邦和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附注：认为吸收各有关共和国代表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人民委员部相应的国外代表机构是必要的。

5. 加入‘共和国联盟’的共和国和联邦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检查等人民委员部及其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中央机关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6. 认为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

奥尔忠尼启则

米亚斯尼科夫

莫洛托夫

对列宁修改决议的建设的意见

——答列宁给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9月27日)

绝密

1922年9月27日

致列宁同志、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答列宁同志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信)

(1) 依我看，对委员会决议的第1条可以同意列宁同志的建议，把它表述为：“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宜的（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暂不正式联合，因为其中前两个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第三个还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

(2) 列宁同志对第2条的修改，即除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建立一个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我看，不应接受，因为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个看来将代表“下院”而另一个将代表“上院”，这除了制造冲突和摩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我建议用以下修改方案代替列宁同志的方案：“与此相应，把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成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共和国联盟的中央机构都必须执行其决定。”我认为，按列宁同志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其他任何决定都会导致一定要建立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

而把加入俄罗斯联邦的8个自治共和国（鞑靼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等等）排除在外，并宣布这些自治共和国同乌克兰和其他独立共和国一起独立，导致在莫斯科建立两院（俄罗斯院和联邦院），总之，导致深刻的改建，这在当前国内外都无此必要，依我看，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不适宜，至少为时过早。

（3）列宁同志对第3条小修改纯属措辞上的修改。

（4）依我看，对第4条，列宁同志要求把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入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有点“操之过急”。毫无疑问这种“操之过急”将“助长独立分子”而有损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

（5）依我看，列宁同志对第5条的修改是多余的。

约·斯大林

就决议问题在会上交换的便条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1922年9月28日)

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建议我见见格鲁吉亚人。他甚至要拒绝昨天的修正意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①来过电话。

斯大林：我认为，反对伊里奇需要坚定性。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影响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而后者影响伊里奇，试问，这就是其中的“独立性”吗？

加米涅夫：我想，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抗拒会更坏。

斯大林：我不知道。让他瞧着办吧。

^①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

关于主席团^①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

——致莫洛托夫的信（节录）

（1929年8月2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关于英国**。李维诺夫是错误的。李维诺夫不愿弄明白韩德逊用**关于解决**（而不仅仅是谈判）有争议问题（所有有争议的！）的问题**替代了程序**问题。如果允许其这样做，就意味着把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绩一笔勾销，就意味着武装敌人来反对自己，把我们自己赶进了死胡同。在韩德逊发表声明、外交人民委员部作出答复之后，不管多夫加列夫斯基^②进行了什么样的谈话，它们（这些谈话）都会被当作是在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从而使我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一问题由主席团移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处理，因为，如果韩德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主席团自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不放弃，我们直接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即可彻底解决问题（用不着再经过主席团），“主席团全体会议”就等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这点大家心照不宣。这样一来，你的“强调将问题由主席团移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解决”的提议也就失去了意义。

.....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21日

① 主席团，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② 多夫加列夫斯基，时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

必须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2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我认为，必须在入秋之前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问题。届时将同整个领导人的问题一起解决，因为党的领导人和苏维埃领导人是交叉兼职、分割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如下：

1. 必须免去李可夫和施米特的职务并取缔他们的整个官僚主义的咨议性秘书机构；

2. 你替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必须这样做。否则苏维埃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就会脱节。只有这样安排我们才会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班子，这无疑会加倍增强我们的力量；

3. 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从一个清谈机关变成一个战斗的、有作为的经济领导机关，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大致减少到10-11人（主席、两名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财政人民委员、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陆军人民委员、商业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

4. 应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它的唯一的目的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它有权直接对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士的官僚主义、不执行或无视中央决定的行为、组织不力、经营不善等等情况立即追究责任。该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享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首先）、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检察院和印刷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没有这样一个有威信的、雷厉风行的委员会，我们就不可能打破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的铜墙铁壁。没有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改革，中央的指示往往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好由谢尔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来担任。

这样一来，苏联人民委员会将总共拥有三个主要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5. 现在的副手会议应予撤销，人民委员会主席同他的副手开会（吸收某些工作人员）可由其自行酌定。

所有这一切暂时仅限我们两个知道，详情等秋天再谈。目前先在亲密朋友的小范围里考虑下此事，并将不同意见告诉我。

二、乌拉尔的情况不妙。矿场上的矿石堆积如山，却没有运输工具将矿石运出来。没有铺设铁路专用线和厂内支线所需的铁轨，——这就是整个症结所在。为什么就不能把乌克兰或其他地方新上的铁路建设项目停上一年，腾出200-300俄里的铁轨，并把这些铁轨立即交给乌拉尔呢？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而这就可以使乌拉尔的冶金工业摆脱对马匹、燕麦等鬼东西的依赖（要命的依赖！）。你能否催一催呢？

为什么柯秀尔还未动身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三、罗森霍尔茨来找我。请求帮他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而不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我答复说，我争取让他留在商业人民委员部。他听后请求帮他带三四个工作人员去（苏金、别连基（工程师）、伊兹拉伊格维奇，还有一个人，他的姓名我想不起来了）。我答应支持他并说我将把这件事告诉你。

四、康德拉季耶夫“案件”暂缓移交法院。这样做并不完全保险。等到秋天再解决这个问题。10月中旬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几点相反的看法。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1930年9月22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11期

联盟诸国

将出现两个新的苏维埃政府

（不晚于 1918 年 12 月 17 日）

安维尔特^①同志！

请原谅，没有时间详细写。我只写最重要的。

1) 您应该知道，从我们方面来说，保证完全支持您，如果您什么时候对此感到可疑的话，那就太不应该了。

2) 我们在关于爱斯特兰独立的法令^②中有点回避军事和铁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整个波罗的海应该是一个战略。我们考虑了所有只会对您有利的因素。当然，如果政府没有一位自己的司令员的话，形式上是不太妥当，但您什么时候都是能够任命一位军事委员的（看来，您也就是爱斯特兰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但要记住的是，这种任命不应该破坏所有被占领州的战略上的统一。

3) 要求《罗斯塔》^③的报道不要说是“我们的军队占领了这里、那里”，而要说“爱斯特兰苏维埃政府的军队解放了这里、那里”。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责令这里的《罗斯塔》只能按指示他们的方式报道。

① 安维尔特，俄国和爱沙尼亚革命家，190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爱沙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1919 年为爱斯特兰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

② 1918 年 11 月 29 日，在爱沙尼亚境内成立了苏维埃共和爱斯特兰劳动公社，首都是纳尔瓦。1918 年底，人民委员会承认其独立。

③ 罗斯塔，俄罗斯通讯社，存在于 1918-1935 年。

4) 舍费尔同志将负责人民委员会与您之间的联系。请您安排好,以便使您对人民委员会的呼吁等等都能转交给他。我将照样为您提供信息材料。

5) 看来,17日将出现两个新的苏维埃政府,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①。

握手

向佩钦曼同志、金吉谢普同志问好。

请告知你们的苏维埃开会的日期。

斯大林

① 拉脱维亚东部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拉脱维亚被德国军队占领,德国战败后,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于1918年12月17日宣告成立,存在到1919年8月。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在1918年12月到1919年1月间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12月15日,从1919年2月到8月,它是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白俄罗斯人

(1918年12月29日)

1918年12月29日

米亚斯尼科夫^①、卡尔马诺维奇同志

今天，白俄罗斯人将出发去斯摩棱斯克^②。他们带着宣言。党中央和列宁请你们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他们。他们或许暂时还缺少经验，但他们准备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宣告政府成立应在明斯克进行。请通过直通线路告知宣布的日期，否则可能出现不妥。白俄罗斯人同意了你们已知道的附有两条保留意见的协议：1. 鉴于还有一人——弗谢沃洛德·法利斯基——将进入政府并担任外交部长职务，所以主席不再兼任部长职务；2. 任命白俄罗斯人担任政府部长的副手（不要求正式宣布）：济勃科——财政部长莱因戈尔德的副手，盖佐夫——比凯利的副手，齐巴克——罗森塔尔的副手，涅采茨基——萨维茨基的副手，德罗科-德罗贡——军事部长的副职，政府事务

① 米亚斯尼科夫，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是白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为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② 在白俄罗斯各地，1917年10月到11月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2月到11月，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被德国军队占领。1918年12月底，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西北州境内建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1918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白俄罗斯苏维埃政府，1919年1月1日，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其独立得到苏维埃俄国的承认。

总管（非政府成员）——彼得·克雷什。党中央同意上述保留意见，并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多谈就同意他们（不能浪费时间）。最近几天，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要宣布取消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宣布众所周知的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领土问题的决定无效。这很清楚，所有资产和通信均处于白俄罗斯政府的管辖之下。

受党中央委托，斯大林

12月29日

排除 3 名政府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

——致日卢诺维奇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斯摩棱斯克

发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致日卢诺维奇，抄送米亚斯尼科夫

我认为日卢诺维奇关于排除 3 名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是同党的决定根本矛盾的。日卢诺维奇集团的任何特殊决定都是不能存在的。成员名单—— 一共 17 人 ——是最终决定。我要求日卢诺维奇及其集团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否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受党中央委托，斯大林

各共和国政府应服从中央委员会

——致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年1月1日)

发自莫斯科

发往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米亚斯尼科夫同志

我这才知道，不打不相识，今后应该记住，政府应与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并服从它。您请日卢诺维奇今天就给我发报^①。

斯大林

^① 在斯大林直接干预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于当日（1919年1月1日）发表。

请通报格鲁吉亚的局势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21年2月16日)

巴库，便函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从你的通报中，很遗憾，我们没有完整地得到[……]，我们得出结论，亚美尼亚政府在格鲁吉亚进行战争，保护起义者^①，希望您那里得到对此事的准确说明以通告欧洲，以及您对由于格鲁吉亚内部的起义而成立的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说明^②。然后报告我们，阿塞拜疆政府是否也在为保护起义者或其他什么人而进行战争，关于格鲁吉亚人以残暴手段对付萨洛格雷-索古特胡拉赫镇和其他地区鞑靼起义者的说法是否真实。还请告知我们，你们是否采取了措施，要求俄罗斯集团军司令员、师长、旅长禁止谈论关于我们要向格鲁吉亚进军和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方面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而要具体和明确地说明用当地部队保护起义者。最后，必须由您向巴库报界宣布关于与[……]联系中断，并通过罗斯托夫通报[……]日。

① 1921年2月11日至12日夜间，在格鲁吉亚军队占领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部分有争议的地区，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格鲁吉亚的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苏俄红军第11集团军的支持。

② 1921年2月中旬，格鲁吉亚东部地区爆发起义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于2月16日向列宁呼吁给予军事援助。俄共（布）中央开始考虑全面干预格鲁吉亚局势直至占领梯弗利斯的问题。

该[……]什么也别派出，别忘记安巴泽^①那里也在起义，第9集团军就在附近。如果您能通过让步使格鲁吉亚的左派孟什维克对您有好感，就像在亚美尼亚对待达什纳克党人那样，可以答应让步，如大赦等等。

斯大林

① 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地区。

查清消除巴斯马奇分子活动的情况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4月21日)

4月21日7点55分发目莫斯科

4月23日10点30分收到

4月23日12点15分解码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中央责成你立即前往塔什干，自到达之日起一周内查清土耳其斯坦方面军有效消除费尔干纳和布哈拉地区巴斯马奇分子活动的情况并立即将结论上报中央。已决定在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实行戒严，并责成你会同土耳其斯坦局确定戒严的时间，将商定的结果尽快报告中央。上报的结论中必须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地方军向巴斯马奇分子提供武器一事是否属实。

第二，地方当局是否确实干预了军事事务，削弱了军事告局的作用。

第三，是否需要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机关进行改组，如何改组。

第四，是否需要改组土耳其斯坦局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如何改组。

第五，布哈拉和费尔干纳[失陷]的危险性有多大。

第六，巴斯马奇队伍状况和人数如何，地方当局和党组织同巴斯马奇运动进行政治斗争的状况如何。

第七，我军的战斗力如何，人数多少，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第八，作为调查的结果，你认为应建议中央采取哪些措施。

收到此电和政治局的决定后请电告，去塔什干的动身日期也请电告。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
第 558 全宗，第 1 目录，第 2294 卷宗，
第 1 页。经过核对的打字稿

谈谈对布哈拉问题的意见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5月14日)

塔什干，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收。

所有密码电报均已收到。中央的答复我只能明天转告，因为今天不可能召集中央开会。先谈谈我个人对布哈拉问题的意见。埃利亚瓦的意见不对，既然战争已经爆发^①，武装占领就不可避免，而且是越快越好，问题只是用哪种方式占领。当然，在武装占领的同时必须开展长期的政治战，即在民族、宗教以及归还赎地上作一些让步。中央的有关命令早在3个月前就已传达给了布哈拉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穆赫特基诺夫是个危险人物，他是阿富汗方面的主要祸首。没有中等农民参加的民族民主政府，要么成不了气候，要么是恢复埃米尔。我建议在没有听取霍贾耶夫意见之前不要对布哈拉问题作评论，土耳其斯坦人迄今为止还未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布哈拉人。最好把霍贾耶夫等人召到塔什干，和他们详细地谈谈，然后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你对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看法是对的。我们把萨法罗夫召回的用意是削弱实行强制分化政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他们显然应当彻底击溃。应当取缔布哈拉左派，应当赶走穆赫特金，追随他的都是恩维尔的爪牙。

我完全赞成解散布哈拉共产党。关于索柯洛夫和彼得斯，不要听土耳其斯坦人的一面之词，应当亲自去核实一下并作出自己的结论。

^① 指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在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的针对巴斯马奇运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不要把霍贾耶夫派往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那里有希姆巴耶夫就足够了。关于法院判决问题，克雷连柯是对的，土耳其斯坦人要求得到比乌克兰人和其他独立共和国居民更多的权利，这是不能容忍的，没有必要宠着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他们不值一宠。近两年的情况表明，他们都不如雷靳库洛夫，我得让他回来。对巴拉诺夫应该……（原件文字不清）大家对阿塔巴耶夫、秋拉库夫等人的变化无常都已厌倦。肯定古谢夫的情报是危险的。古谢夫同地方上的政治不开展分子搅在一起，因此你要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来亲自核实一切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相信，中央只能在征得你和埃利亚瓦同意的情况下确定人选。你还得在塔什干^①再待两天，别为此而责怪我们。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
第 558 全宗，第 1 目录，
第 2329 卷宗，第 1-2 页

① 奥尔忠尼启则受俄共（布）中央委托外出检查工作时住在塔什干。

把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2年8月11日）

……现在乌克兰是最要紧的事。乌克兰的情况遭透了。党内情况很糟。据说在乌克兰的两个州（大概是基辅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有大约50个区委员会反对粮食收购计划，认为该计划不现实。其他区委员会的情况也不乐观。这像什么？这不是党，而是议会，是滑稽可笑的议会。柯秀尔^①不去领导各区委员会，却在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各区委员会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结果一筹莫展。列宁说得对，紧要关头不敢反潮流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维埃的情况很糟。丘巴尔^②不成其为领导者。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情况很糟。列坚斯^③对于在乌克兰这样大的、特殊的共和国里领导打击反革命的斗争力不从心。

如果不立即着手扭转乌克兰的局势，我们就会失去它。请注意，皮尔苏茨基没有睡大觉，他在乌克兰的间谍机构比列坚斯或柯秀尔所想像的要强大许多倍。还应注意，乌克兰共产党内（50万党员，嘿嘿）发现不少（真的不少）腐朽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佩特留拉之流，或干脆就是皮尔苏茨基的间谍。只要形势一变糟，这些家伙就会毫不迟疑地在党内（和党外）开辟反党战线。最糟糕的是乌克兰的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些危险。

① 柯秀尔，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② 丘巴尔，时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③ 列坚斯，时任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局长。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乌克兰变成苏联真正的堡垒，变成真正的模范共和国，这应成为我们的目标。为此不要舍不得花钱。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 2000 年

12 月 1 日《独立报》

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

(1937年11月7日)

1937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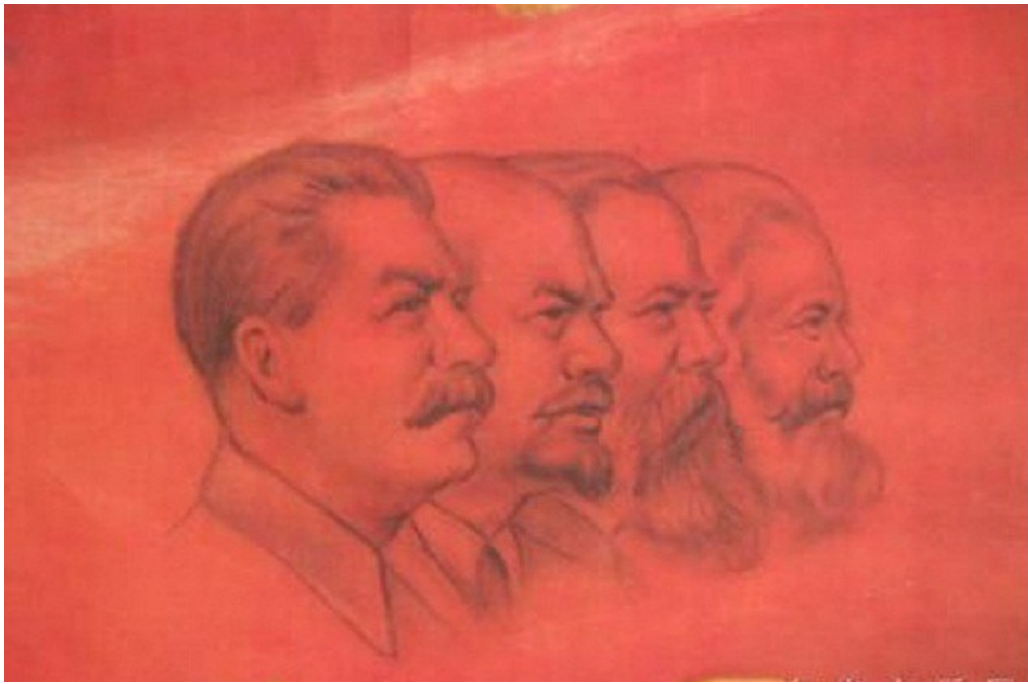
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参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季米特洛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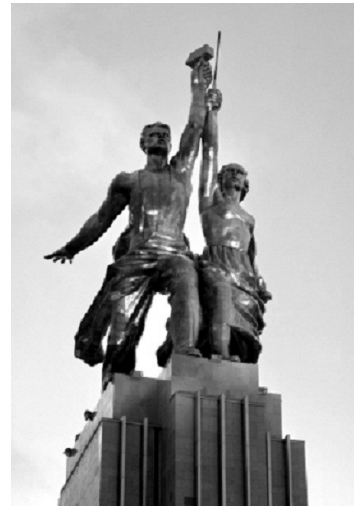
斯大林：我想说几句话，也许不那么喜庆。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他们抢劫并奴役人民。他们为了地主的利益发动战争、攫取领土。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每一部分，如果它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企图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的部分和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就要消灭这种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他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 第58页



(5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健全法制

关于拟订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初步计划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9月26日)

维业切斯拉夫：你好！

关于宪法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同党的纲领混为一谈。宪法中应当写上已经取得的东西。党纲中除此之外还应写上我们正在争取的东西。

我的初步计划如下。宪法应当由（大约）七章组成：（1）**社会制度**（关于苏维埃、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等等；（2）**国家制度**（关于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关于共和国联盟，关于民族、种族平等，等等）；（3）**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取代它的机关、两院，它们的权力，主席团，它的权力，苏联人民委员会，等等）；（4）**管理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等等）；（5）**司法机关**；（6）**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各项自由，结社自由，教会，等等）；（7）**选举制度**。

在宪法中**原则**不应当同其他条款分开，而应当作为宪法开头部分的前几条收入宪法。

引言我认为用不着。

我觉得应当进行**全民公决**。

至于说到粮食收购，必须将计划稍稍下调。大家都抱怨计划订高了。如果乌克兰减少1000万普特，北高加索减少700万普特，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减少500万或600万普特，给其他地区下调计划再留出2500万-3000万普特，那么我们就只能保持2.5亿-2.4亿普特的

计划了。

敬礼！

你的 约·斯大林

1935年9月26日

关于不对恐怖犯罪分子公开起诉的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

罗曼·罗兰：苏联政府作出决定，无论是法院裁决和法院判决，还是改变通常惩罚措施的法律，都是苏联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或人会引起或者得到普遍的关注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某种原因外国舆论也会纷纷作出反应。避免误解是很容易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们坚决镇压了参与阴谋杀害基洛夫的罪犯，这做得对。但你们在惩处了阴谋者后，应当让欧洲公众和世界了解这些罪犯的杀人罪行。你们判维克托·谢尔日^①到奥伦堡流放3年，这本来是件无足轻重的事，但为何让欧洲舆论因此沸沸扬扬了两年。他是一位用法语写作的作家，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但我是他朋友的朋友。他们常就把他流放到奥伦堡及他的遭遇一事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深信，你们这样做，自有其重要的理由，但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向坚持认为他无罪的法国公众说清楚呢？总的说来，在一个发生过德雷福斯案和卡拉斯案的国家里，让被判决有罪的人成为整个运动的中心是极其危险的^②。

斯大林：您问，为什么我们不对恐怖犯罪分子公开起诉。我以基洛夫遇害一案为例来加以说明。也许，出于对恐怖犯罪分子的满腔仇

① 维克托·谢尔日，法国作家，托洛茨基分子，当时居住在苏联。

② 卡拉斯于1762年被错判死刑，引起伏尔泰的公开抗议。德雷福斯于1894年被非法判处终身监禁，激起以左拉和法朗士为首的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抗议。罗曼·罗兰援引这两个案子来说明舆论的作用。

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感情用事了。基洛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对我们不能不产生影响。我们枪毙的 100 个人从法律角度讲与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是由我们的敌人从波兰、德国、芬兰派来的，他们都全副武装，其任务就是要对包括基洛夫同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这 100 个白卫分子在军事法庭上根本不否认自己的恐怖意图。他们当中许多人说：“不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想消灭苏联领导人，你们跟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毙了我们吧，如果不想让我们把你们干掉的话。”我们觉得，在由辩护人出庭的公开法庭上审理他们的犯罪案件未免太抬举这些先生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恐怖犯罪分子在凶狠地杀害了基洛夫后，还打算杀害其他领导人。为防止这一罪行重演，我们只好承担起枪毙这些先生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义务。这就是政权的逻辑。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显得强大有力，无所畏惧。否则，政权就不成其为政权，就不能被公认为政权。法国公社社员显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为此受到卡尔·马克思的指责。所以他们失败了。而法国资产者并没有饶恕他们。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

由于基洛夫同志被害，我们采用了极刑，今后我们不想对罪犯采用这种手段，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并不取决于我们。此外，应当指出，我们的朋友不仅在西欧有，而且在苏联也有。当西欧的朋友建议我们对敌人要尽可能地宽容时，我们的苏联朋友则要求我们强硬，例如要求枪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枪毙杀害基洛夫同志的策划者。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到。

我想请您注意下面这样一种情况。西欧工人每天工作 8、10 或 12 个小时，他们有家庭，要照顾妻子、儿女。他们没有时间读书，并从书中寻求自己所需的行动准则。再说他们也不很相信书籍，因为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文痞们往往用其作品蒙骗他们。因此他们只相信事实，只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于是这些工人发现，东欧出现了

新的工农国家，在那里资本家和地主再无存身之处，人人参加劳动，劳动群众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尊敬。工人由此得出结论：可以过上没有剥削者的生活，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对世界各国工人的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各国资产者清楚这一点，对苏联恨之入骨。正因为如此，西欧的资产者才希望我们苏联领导人尽快死掉。所以，他们把恐怖分子网罗起来，不惜重金和其他手段通过德国、波兰、芬兰将他们派往苏联。例如，不久前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发现了恐怖分子。我们有一个政府图书馆，那儿有一些女图书馆馆员，她们在克里姆林宫常常出入我们的负责同志的住宅，去整理他们的个人藏书。结果发现，这些女馆员当中的一些人是我们的敌人安插进来进行恐怖活动的。应当说，这些女图书馆馆员大部分是当年处于统治地位而现在已被打倒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渣余孽。结果怎样呢？我们发现，这些女馆员身上带着毒药，想毒死我们的某些负责同志。当然，我们逮捕她们，但不打算枪毙她们，而是把她们关起来。这是我给您举的又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敌人有多么猖狂，告诫苏联人必须提高警惕。

正如您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极其残酷地反对苏维埃，然而却在其报刊上大肆叫嚣苏联人残酷无情。他们用一只手向我们派遣恐怖分子、杀人凶手、流氓分子、放毒者，而用另一只手写文章咒骂布尔什维克惨无人道。

至于维克托·谢尔日，我不认识他，现在也无法向您提供情况。

罗曼·罗兰：我本人也不认识他。我曾听说，他因追随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迫害。

斯大林：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不仅仅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还是个骗子。这个人不诚实，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他试图蒙骗苏联政府，但未能得逞。托洛茨基分子在巴黎召开的保护文化大会上提到了关于他的问题。诗人吉洪诺夫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作了回答。

维克托·谢尔日现自由地住在奥伦堡，好像在那儿有份工作。他当然没有遭受任何痛苦和折磨。那全是胡说八道。我们不需要他，随时可能让他去欧洲。

罗曼·罗兰（笑着说）：有人告诉我说，奥伦堡是个穷乡僻壤。

斯大林：不是穷乡僻壤，而是个挺不错的城市。我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4年，那才是个穷乡僻壤呢，温度在零下50—60度。不过没什么，也过来了。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辑

关于惩处 12 岁以上犯罪儿童的法律问题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 年 6 月 28 日）

.....

罗曼·罗兰：还有一件事，其性质则截然不同。不久前，颁布了关于惩处 12 岁以上少年罪犯法^①。这项法律的条文知道的人不多，即使大家都知道，也会引起极大的怀疑。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要对这些儿童施行死刑了。我很清楚，你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震慑那些不负责的人和想利用这种不负责行为的人。但公众并不清楚。他们觉得，这种威胁是存在的，或者法官会擅自予以执行。这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抗议运动。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已刻不容缓。

.....

斯大林：现在我要回答您对惩处 12 岁以上儿童的法律的意见。这个法令纯粹是为了进行教育。我们的本意与其说是震慑具有流氓行为的儿童，不如说是为了震慑那些在儿童中进行流氓教唆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指出，在我们的中学里已经发现有一些由 10-15 个流里流气的男少女们组成的团伙，他们的目标就是殴打最优秀的学生和标兵或者把他们拉下水。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些流氓团伙把姑娘们骗到成年人那里，把她们灌醉并变为妓女。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这帮流氓团伙把那些在学校学习优秀并是标兵的男孩子们沉入井里，把他们打伤，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同时还发现，是成年强盗分子在组织和操纵这

^① 指的是 1935 年 4 月通过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人刑事处罚适用于 12 岁以上儿童的决定。

些流氓儿童团伙。显而易见，苏联政府不可能对这些恶行不闻不问。法令的颁布就是为了震慑并打击成年匪徒，保护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不受流氓的毒害。

现在请您注意，我们在颁布这项法令的同时，还颁布了一项决定：禁止买卖和拥有芬兰刀和匕首。

罗曼·罗兰：为什么不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呢？公布出来，大家就清楚为什么要颁布这项法令了。

斯大林：事情不这么简单。苏联还有不少行为失常的人，如过去的宪兵、警察、沙皇官吏，他们的子女及亲人。这些人不习惯劳动，对一切充满仇恨，是现成的犯罪基础。我们担心，将上述流氓犯罪的事实公布于众可能会对这些反常的人起作用，促使他们去犯罪。

罗曼·罗兰：说得对，说得对。

斯大林：难道我们能够去解释说，我们颁布这项法令是为了进行教育，防止犯罪现象发生，震慑犯罪分子吗？当然不能，因为，这样一来，法律对于犯罪分子就失去了任何效力。

罗曼·罗兰：不，当然不能。

斯大林：我要告诉您，到目前为止，这项法令中最为严厉的条文我们从未用于犯罪儿童，希望将来也不用。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辑

对人民公敌的体罚是作为例外允许使用的

(1939年7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密电

1939年1月10日？

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局局长：

联共中央得知，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时，把对被捕的人进行体罚作为犯罪活动指责他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如下说明：

自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实践中使用体罚措施是经联共中央批准允许的。与此同时指出，体罚是作为例外允许使用的，而且仅仅是针对那些公开的人民公敌，针对那些用人道的审讯方法却公然拒绝交代的阴谋者，他们在监狱中继续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经验证明，这样的规定产生了效果，大大加快了对人民公敌的揭露。的确，在之后的实践中，体罚的方法被扎科夫斯基、利特温、乌斯片斯基等坏人玷污了，因为他们把这一方法由例外变为规则，对偶然被捕的诚实的人也开始进行体罚，为此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丝毫无损于这一方法本身，在实践中应正确地使用这一方法。众所周知，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是极其卑劣的体罚方式。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死不悔改的间谍、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更

人道一些呢？联共中央认为，体罚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法，今后肯定会继续使用——是作为例外对那些显然是人民公敌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使用。联共中央要求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在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时遵循本说明。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附录 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释放在押者的报告

秘密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9年12月22日

1939年12月22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第1227“Б”号224989

莫斯科市

报告

为执行1939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697/3号决议，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营中释放了12860名在不同时间被法院判刑的人。11223名在押者获释，中止有关他们的刑事案件。有5万多人因其活动给苏维埃政权造成重大危害而继续服刑。

对这些公民的案件将重新审理。预计还有近15000人将被释放。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2月22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69页

干部队伍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年3月5日）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现在请允许我在结束语中简要地谈一谈更为具体的几个问题。

看来，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事务，陶醉的原因是这些事务能带来直接结果，而且可以说，这也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件事，这样过分陶醉而忘记其他问题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同志们对此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了。

从一些发言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从这个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是公理性的论点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有人认为：“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笑声）“……现在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

同志们，这是另一个极端。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和不应该离开政治一样。我们仅仅是为了便于研究，才在方法上人为地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千万不能。决议草案的意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自行代理经济机关的职能，不能取代，不能把经济工作的指挥部——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一样

① 此件部分内容已收入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151-164页，这里发表的是按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5年第11-12期刊载的有关文献的原文译出的。原先发表的文献篇幅少了三分之一，并在文字上有修订，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当时联共（布）的高层领导人。

——搬到第一书记的办公室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我们只是定下了方针。要实现关于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和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方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应当充实农业机关，给这些机关配备优秀人才。工业（基础比较坚实）以及工业机关看来是用不着你们取代它们的。这很好。情况差一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机关。应当尽全力派人加强这些机关，而主要是应当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的方法，不要取代这些机关并使它们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而要帮助这些机关，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问题正在于此。

只要农业机关还没有得到充实，得到巩固，你们，很遗憾，在最近时期内就不得不直接从事农业事务，以防这些事务根本无人过问。所以说，必须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领导整个经济即工业和农业的方法。应当巩固经济机关，以优秀人才充实这些机关，从旁帮助这些机关，给这些机关提供领导思想并通过这些机关领导经济，不应跑到另一个极端，也不要拒绝做经济工作。这样就不会产生，同志们，就不会产生另一个极端。

下面谈一谈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一切托洛茨基主义和非托洛茨基主义代理人、外国代理人的问题。我想，所有的同志们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不管这些人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这些人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人是一伙无廉耻的匪帮，其中有雇佣杀手，破坏分子，间谍，暗害分子，等等，等等。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但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同志的讲话中流露出一种想法：让我们左右开弓，打击那些曾经与某个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同行的人或者曾经在一个公共食堂同托洛茨基分子同桌吃饭的人。现在让我们左右开弓

地打击这些人。

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对的。在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有我们一些出色的人才，这大家都知道，有优秀的工作人员，他们过去偶然动摇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后来同托洛茨基分子断绝了关系，并且像令人羡慕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工作。捷尔任斯基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有人喊道：谁？）捷尔任斯基同志，你们是知道他的。因此，在捣毁托洛茨基分子的巢穴时，你们应当认真观察，亲爱的同志们，打击对象要有所选择，我再说一遍，不要殃及那些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偶然同行的个别的同志。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布尔什维克对这件事的理解如下。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看他们是否忠于党，政治上是否可靠；第二，要看业务能力，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公理性的准则，对此用不着多说。在我们这里这个准则遭到了破坏。这个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已经谈到了。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我要举的这两个例子说明，有的时候挑选人不是根据政治和业务的原则，而是从私人交情、哥们义气、朋友关系的角度出发，总之是根据种种庸俗的标准，根据在我们的实践中不应有的标准。就拿米尔佐扬同志来说。他现在哈萨克斯坦工作，原先他长期在阿塞拜疆工作，离开阿塞拜疆之后曾在乌拉尔工作。我曾几次警告他：既不要从阿塞拜疆，也不要从乌拉尔带出熟人，而要在哈萨克斯坦挑选人，不要同哈萨克斯坦当地人相隔绝，原因是——从阿塞拜疆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从乌拉尔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同样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有了某种对当地组织的独立性，甚至是某种对中央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的小团体，我有自己的小团体，它们全都忠于个人。请看，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达巴什扬同志当上了南哈萨克州委

组织计划部部长，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克扬同志当上了库斯塔奈州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尔基相同志当上了贾塔戈里区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波乌兹比克扬同志当上了赛桑区委书记，他从格鲁吉亚带去的艾拉佩当上了列宁区委书记。我讲的是中央机关提供的情况。

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什拉江同志当上了卡尔萨克帕伊区委书记，他从巴库带去的阿斯里扬当上了边疆区委组织计划部部长，当上了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苏维埃主席的萨乌莫夫同志也是他从巴库带去的。萨尔基索娃当上了阿拉木图市斯大林区委书记，尤素波夫当上了阿拉木图市委书记，这两人都是他从巴库带去的。他从原先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带去的平哈西克当上了卡拉干达州委书记。有一个姓斯维尔德洛夫的人当上了东哈萨克州委书记，他也是从巴库带去的。先是把他库调到乌拉尔，然后从乌拉尔调到这里，调到哈萨克斯坦。当上阿拉木图州委书记的基谢廖夫是从乌拉尔带去的。来自亚速海-黑海地区的斯捷潘诺夫当上了北哈萨克州委书记。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库利耶夫当上了奇姆肯特州委书记。卡马基泽当上了哈萨克边疆区委员会农业局副局长。（贝利亚；相当可疑的一个人。）人们怀疑他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总之，所有这些人，在他们原先的共和国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嫌疑。（有人喊道：库利耶夫被解除了政治部的工作。）公用事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尔扎耶夫原任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有人喊道：他由于工作不称职而被解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他也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利耶夫·铁木尔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巴拉诺夫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拉诺夫先是被他调到乌拉尔，又从乌拉尔被他带到了哈萨克斯坦。（米尔佐杨：他从未同我一起工作过。）巴拉诺夫我们还是了解的。

这像什么话？难道可以这样挑选人！请问，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能有什么好结果。我可是警告过米尔佐扬同志，叫他不要这么做，应当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干部。可他，大家知道，却组成了忠于他个人的小团体，他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挑选人，而在这些人中有托洛茨基分子。但他认为，既然他们忠于他，他们就能永远与他合作。那以后他要是不在了呢？

另一个同志是瓦伊诺夫，他同米尔佐扬一样，也从其他州带去人，特别是从〔……〕带去了23个人。这样的人在那里多得多，因为在苏维埃机关里还有许多人。从顿巴斯带去了9个人：苑拉夫廖夫、魏斯贝格、克里梅尔、伊万诺夫、卡茨、波努卡洛夫、尤尔洛夫、亚历山德罗夫和伊萨耶夫。他从顿巴斯调到雅罗斯拉夫尔当书记后，便逐渐从顿巴斯把这9个人弄到自己身边——离开这些人他就无法工作。这些人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位。瓦伊诺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地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外来的人呢？当然是怀有戒心。带去人，用外来的、忠于个人的人组成小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信任当地干部。米尔佐扬或瓦伊诺夫有什么理由对当地干部不信任——请他们说清楚。这些同志包揽的事情太多，从而使自己、使党都陷入了窘境。

这样挑选人是不行的。谢尔戈^①同志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是经济工作高级领导人，可我认为，他也染上了这样的毛病：欣赏某一个人（公开说某些人忠实于他个人并对这些人恋恋不舍，而听不进党和党中央的警告。他为了拉拢洛米纳泽而大伤脑筋。他大伤脑筋的是，他始终认为他能够使洛米纳泽改邪归正，可洛米纳泽却总是欺骗他。他为了维护所有那些现在来看显然是坏蛋的人如瓦尔达尼扬、戈戈别里泽、梅利克谢托夫、奥库贾瓦（现在在乌拉尔被揭露）而大伤脑筋。他自己大伤脑筋，也让我们大伤脑筋，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最信任和他认

① 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则，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忠实于他个人的那些人，原来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坏蛋。这样一个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的经验表明，以个人的好恶来挑选人是极其有害的，尤其是像米尔佐扬和瓦伊诺夫这样的人，我不能认为他们是高级领导人，但我举他们的例子是为了指出，这些人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党。这种挑选方法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党的挑选人的方法，趁现在为时还不算晚，同志们应当摒弃这种方法。

第四个问题。检查工作，检查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应当怎样审查工作人员，一般来讲是否需要审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如果不根据人们的工作结果来对他打进行审查，就无法了解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无法确定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不能根据言论、宣言和口头上的声明来对一个工作人员的本质作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这是危险的，这是幼稚的。为了了解工作人员，应当在工作中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对他们进行审查，应当日复一日地进行审查。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审查办法呢？有自上而下地审查，即上级领导人对其属下的下级领导人进行审查，到他们中间去，或请他们来，总之根据工作结果进行审查。这样做非常正确，非常好，但这是不够的。在我们中间甚至这一准则也常常遭到破坏。选定一个人并把他放到工作岗位上就完事大吉，以后就把他忘记了，不过问，不检查，也不给任何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给予帮助，他们发牢骚，叫苦连天，一封又一封地写信，一份又一份地发电报，但既得不到答复，也得不到安慰，总之把你往工作岗位上一放，就算把工作包给你了。这是破坏列宁关于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最起码准则的行为。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审查，来自上级的审查，即上级对其下属进行审查；还有自下而上的审查，即党员群众或非党群众对领导者进行审查。党员积极分子或非党积极分子，或者是人民通过选举亲自进行审查。例如我们组织的我国最高机关的选举，这次选举是对我们的许多

工作人员的一次大审查。自下而上审查的手段——这就是经常性的积极分子会议，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以及领导者的工作报告，即关于自己工作的诚实的、实际的工作报告。许多同志逃避这项工作，他们陶醉于经济运动，认为自己〔……〕世界。然而他们错了，显然他们迷失了方向。

应当在各人民委员部恢复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子会议，在各企业恢复原先叫作生产会议的东西。召集整个工厂的人开会是困难的，我们有些工厂有3-4万人，但可以从优秀的党员和非党员中挑选出积极分子并向他们报告工作和了解他们这些积极分子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发现了哪些错误。

党员积极分子会议，非党和党外积极分子会议，领导者在这些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工作——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段。还有另一个手段——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恢复民主集中制。这也是一种审查，同志们。在党章的基础上恢复党的机关的选举制，不记名投票，对任何一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批评的权利。你们看，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的第二个手段。两种手段都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因此，我们有两种审查工作人员的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上级审查下级，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即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自下而上的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的监督是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并由领导者报告工作，另一种形式的监督是恢复我们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即党员有对任何一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有自由批评的权利，有要求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权利。

第五个问题。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曾经教导我们说，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教育干部，培养和训练党及其他组织后备力量的好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及时帮助干部揭露他们的错误；及时帮助每一个工作

人员、每一个领导者揭露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错误并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彻底改正错误，而不要像有些人那样，担心这样做会被坏人所利用。

有为数不少的人或工作人员不高兴这样做，然而应当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有勇气倾听批评意见，养成习惯，从而使工作人员有可能步步向上、不断进取。

举几个例子。你们都记得 1930 年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上的错误，当时称之为胜利冲昏头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无情地批评我们的干部的坚定方针。而当时，你们知道，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在各州之间展开了一场大竞赛，看谁集体化的百分比高。一队宣传员来到村里，把 500-600 户村民召集到一起开大会，并询问谁拥护集体化。同时作了非常明显的暗示：你要是反对集体化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农夫们说：我们没什么说的，你们组织吧，我们拥护集体化。这以后电报一份接一份飞向党中央委员会，说我们的集体化在发展，而经济却依旧在旧轨道上运行。根本没有集体组织，只不过是表决拥护集体化。

我们检查过莫斯科州的情况，表面上 1930 年集体化似乎达到了 85%。这一百分比的实际可信程度有多大呢？实际上，集体化最多达到了 8%，而不是 85%。是的，你们在摇头，而实际上所有人都是这样。这是一种通病，每个州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

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抨击。我们的干部最终扭转了这件事，而且我们通过这件事也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如果我们不揭露这些错误，如果中央委员会担心我们会失去某些干部，担心我们会招致不满，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敢说出某些人不爱听的意见，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顶着这股潮流而上，我们就会把整个事业断送掉，并使我们的全体干部灰心丧气。我们就会断送农业干部的成长，断送集体农庄的发展。现在我们拥有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不错的领导者，我们通过彻底揭露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并走上了新的道路。

另外一个例子是沙赫特案件，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地抓这件事，没有按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干部通过自身错误得到教育的机会，那可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大失误，就会毁掉工业事业。许多同志担心反潮流会对敌人有利。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结果我们胜利了。揭露了自己的错误并通过这件事教育了自己的经济工作干部。从那时起——沙赫特事件以后——已经过去10年，我们培养出一批从事技术领导工作的优秀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我们听信（哪怕是一时片刻）所谓反潮流会得罪人、会对敌人有利的论调，就不会有这些干部，他们就会灰心丧气，变成一盘散沙。

这就是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就是要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分析自己的错误并找到改正错误的途径。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部才能成长才能得到锻炼，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且列宁的这些话也多次得到证实，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第六个问题——什么叫爱惜干部？到底怎样才能保护和培养干部呢？爱惜干部。有许多同志认为，如果对一些同志的错误轻描淡写，如果掩饰并只是部分地指出同志们的错误，那我们就是爱惜干部和保护干部。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呢？谁要是认为掩饰我们干部的错误就是保护干部，爱护干部，谁就是在害干部，毫无疑问，他就是在害干部。对我们干部的错误轻淡写，对错误加以掩饰——这不是爱惜干部，而是害干部。害干部。

我想从我们某些非常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当中举个事实。例如谢尔戈同志，我对他的尊重不是亚于而是胜于某些同志，但对他的错误我应当在这里指出来，以便我们大家能从中吸取教训。

就拿他与洛米纳泽的关系来说。洛米纳泽在党务和政务工作方面出现过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早自1926-1927-1928年起谢尔戈同志对这些错误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人都知道得多。他没有告诉我们这

些错误，他寄希望于自己，希望他自己能扫除这些错误，从而在这件事上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他与他即谢尔戈同志与洛米纳泽书信往来频繁。我们只是在后来，在这些信件写成八九年之后，我们后来在中央委员会才知道这些信件具有反党性质。谢尔戈同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纯粹是出于他的善良愿望，显然他是希望对此加以改正。

由于我们不了解洛米纳泽的本质，我们，中央委员会不了解，所以我们曾把他放到一些不同的岗位上，看看他做得如何。了解一个人非常困难。有一种方法——冒着风险安排，给予他责任重大的工作并关注这样做的结果。我们采取了这种冒险的方法，安排他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织的书记。如果我们知道他与谢尔戈的往来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就不会把他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然而我们不知道。安排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是拥护党而是反对党的。

恰恰在这一时期谢尔戈同志收到了洛米纳泽的一封很不像样、令人厌恶和违反党性的信件。他跑到我那里说：“我想给你看看洛米纳泽的信”。——“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写得不像话。”——“把信给我，我向政治局汇报，中央应当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不行。”——“为什么？”“我答应过他。”——“你怎么能答应他，你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党的传统的保卫者，你怎么能答应别人不把有关中央和反对中央的反党信件告诉中央委员会呢？怎么，你同他、同洛米纳泽有什么反对中央的秘密吗？这像什么话，谢尔戈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确实不行。”他一再请求，请求我看看这封信。看来，他是想让我在道义上对他与洛米纳泽的那些秘密同他共担责任，当然，他对洛米纳泽那些无疑是反对中央的观点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纯粹是对事业的贵族态度，甚至是骑士态度。我对他说，我不想参与这样的秘密，我迄今为止一直自认为是中央委员。你把信给我，我马上把信分送给政治局委员，让他们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我向中央作汇报，而谢尔戈却说：“你会毁了他，毁

了洛米纳泽。”——“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信是反党性质的，但还不是那种可以据此将他开除出党的信件，——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把信的事情告诉中央委员们，那么在大事上洛米纳泽就会变得收敛一些。如果你在件事上瞒着中央并对他百般袒护，洛米纳泽今后就会认为以后还可以犯反对中央的某种错误，因为反正有人保护他，这样洛米纳泽就会重犯这类错误，今后他就会在大事上栽跟头，而如果他在大事上栽了跟头，我们就会让他粉身碎骨，彻底灭亡。你害了他，你认为你是爱惜他洛米纳泽。按照庸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按照实际的观点，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你是害了他，因为你没有及时制止他。”他说，这样的信件过去也收到过。“那么就更糟了，无疑是你把他毁了，是你把他置于中央的打击之下，因为他现在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已经无法饶恕他了。”

结果就是这样。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当然，对这一悲剧谁都不像谢尔戈这样痛心疾首，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而这个人却对他的信任报之以欺骗。他要求枪毙洛米纳泽。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从袒护他变成了要求枪毙他。我们说：“不，不会枪毙他，我们不会逮捕他，我们甚至不会把他开除出党。我们只是要把他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举的一个例子，谢尔戈同志一个人的例子，经他的手任命的人数以万计，他培养了数千名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

看，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掩饰、袒护一个同志的错误，不及时地制止他，相反却加以袒护——你就害了他，肯定会害了的。

那么，什么叫爱惜干部、保护干部呢？这就是说，如果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及时给他们指出，及时加以制止，而不是袒护和掩饰。这是爱惜干部的唯一的方法，保护干部的唯一的方法。

应当怎样用列宁主义的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呢？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我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谈了一

些意见，现在还可以更具体地说上几句。

首先，同志们，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鼓足干劲，首先自己培养两个副手。现在在职的第二书记或其他什么人，他能否称职，可以说，这取决于你们的洞察力，取决于你们了解人的本领。但副手应当成为真正的副手，名符其实的副手，有能力代替你们的副手，因为如果中央通过了决议草案的这一条，看来，中央会通过这一条的，那么我们显然将要着手做这件事。我们党有 102000 个支部，即 102000 个基层党组织。那么就有 102000 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将每隔 4 个月，每隔 5 个月送他们所有人去培训班，或每隔 3 个月，每隔 4 个月送去——将视实际情况而定。但在送他们去之前，他们这些书记们应当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而为避免他们选错人，副手名单应当由有关的区委会予以批准。我们应当送 102000 个书记去接受党政培训和再培训。这是我们党的士官，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十分之九的工作都取决于他们。

我们有 3500 多个城市和非城市的区委书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挑选两名名副其实、有能力代替他们的副手，入选的是否是现职的第二书记，我不知道，但我们对书记们挑选唯命是从的人做自己副手的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这样做是不行的。中央将要求副手们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和有能力代替区委书记的副手。我们有大约 3500 个书记。我们将派他们所有人去学习，去接受再培训，去上培训班即我的列宁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教学大纲将由我们制定，我同你们这些各州和各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做这件事。将指定若干个中心来组织这些培训班。当然，决议草案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硬性规定，中心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只要教学能够真正安排好就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遗憾，是为了统计，为了汇报，为了编制名册，而应当是为了真正列宁式的政治学习。

我们有数百个市级委员会。这次全会以后，州委或边区委第一书记

记看来要担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为此应当赋予他们直接的责任。市委将设第二书记，数量可能是两个。我们希望市委第一书记为自己挑选两名名符其实的副手，也派他们去参加党史培训班的学习。

我们有 100 多个边疆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有书记，各民族州也是一样。我们也将要求每一个第一书记尽力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两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副手。我们将在中央批准对他们、对这些副手的任命，以便后来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能来到莫斯科并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有一定的意义。我在报告中讲过，这里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些老头子，政治局的委员们，很快就将退出舞台。这是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有若干个接班人，而为了组织好这件事，现在就应当着手去做。亲爱的同志们，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们应当同我们一起认真地参与国际和国内事务。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必须借助这些方法对我们的干部进行真正列宁式的培训和再培训，这些干部包括：102000 名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3500 名区委书记，200 多名市委书记，100 多名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这就是应当再学习和不断完善自己的领导人员。

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大家都有决心改正错误，当然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愿意就能改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我们实际政策和组织政策的某些具体问题还缺乏理解。因此我认为，在闭幕词中谈谈这些问题并非多余。

列宁提出，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都懂的聪明人。这是不对的，我们领导者是从一个方面来看事物、事件的，而被领导者则是从另一

个方面来看同样的事物的。我们能看到的東西，也许普通党员看不到，而他们能看到的東西，我们大部分是看不到的。而为使我们能对事物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认识事物就是从各个方面来了解事物，为此就必须把从上面来看事物的领导者的经验同也有生活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从下面来看事物的普通党员的经验结合起来。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会使我们对事物、对情况和事实有一个真正而充分的认识。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既然他是人民委员，他就什么都懂，他们认为。官衔本身就会提供丰富而全面的知识，或者认为：既然我是中央委员，因此我这个中央委员就不是随便当上的，因此我就什么都懂。这是不正确的。老年人都应当活到老学到老。就更不用提青年人了。作为领导者的我们和作为被领导者的他们应当互相教育，以使学习名符其实和真正落到实处。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不能断绝我们同群众即同党员群众、同工人群众、同农民群众、同全体人民的联系，一分钟也不能削弱和断绝联系。这就是说，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即人们所说的倾听下层的呼声，或人们所说的倾听普通小人物的呼声；要学会倾听小人物的呼声，这些小人物没有官衔，没有职位，但他们并非白白活在世上，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为了使这个道理明白易懂，我给你们讲两个同我们的领导有关的事例。这是大约三四年前或更早，也许是五年前的事。我指的是当时在这里，在莫斯科，中央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共同制定了关于顿巴斯重新调整工资、重新安排工作和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新的方针。这大概是五年前的事。

当时我们的状况非常困难，顿巴斯要求我们动员工人，因为人不足。我们动员了几十万工人，动员了20万。一星期之后20万工人都离开了顿巴斯。人们对我们说，你们对我们的供应太差，因此也就没

法采煤。我们回答经营管理者说：去年你们采掘了那么多煤，得到了那么多供应，而如今你们获得的供应增加了 20%，我们为你们动员了几十万人，但这些人却跑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一年复一年。这简直是西绪福斯式的工作^①。我们好不容易动员了几十万人，30 万人，结果这 30 万人又离开了顿巴斯，我们给了最好的供应——同样无济于事。

我们向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请拿出你们的摆脱这种状况的草案来，因为那里形成了某种不可救药的局面——供应是最好的，新给了几十万人，30 万人，结果 30 万人都走了，再动员 30 万人，结果又都走了。事情搞得乱七八糟，顿巴斯成了穿堂大院。先后提出了三个草案。参与这件事的有谢尔戈、约瑟夫·柯秀尔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我们，政治局委员们，认为这些草案一点用处也没有。人们根本不知道顿巴斯的实际需要，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东西来，于是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普通人、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工人。人找来了，问他们——问题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摆脱困境？我们同他们谈了三天，在他们的启示下我们作出了那个后来使顿巴斯的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决议。原来，工人离矿井越远，他所得到的薪金越高，离井下越近，得到的薪金越低。显然，优秀的工人远离矿井，不好的工人却向矿井靠近。然而不好的工人不可能给事情带来任何好处。井上工人得到的薪金高于井下工人。那有经验有创造精神的工人谁还愿到井下去呢？谁也不愿去，因为他在井上工作得到的薪金高得多。这里暴露出职权分散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批准的，而主要的是，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具体办法。我们让工人给我们讲的东西形成了文字，读给他们听，他们表示赞成，而后付诸实施。你们看，这就叫倾听小人物的呼声，不中断同小人物、同群众的联系，不削弱

^① 西绪福斯式的工作，来自希腊神话，意为令人厌倦的繁重而无效的劳动。

这种联系，而是永远牢牢地保持这种联系。

另一个例子——尼古拉延科的例子。关于她已经说了许多，这里没什么可多说的。她是正确的——小人物尼古拉延科，一位妇女。她告状，向各级告状，谁都不理睬她，待到理睬她时，便为此给她扣上了帽子。后来信转到了中央。我们进行了审查。为了弄清真相，她经受了多少磨难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这你们都是知道的。然而这就是事实——一个小人物，不是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人民委员，甚至不是支部书记，而是一个普通人——可她是正确的。像这样呼声被压制的人我们有多少？因为什么打击她？就因为她的不屈服，她碍事，她不安分守己。人们说：既然你已被开除，那就别吭气，老实呆着，省得搞坏身体。可她不，她不甘心，她撞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不行再撞一个地方，——所幸她的精力旺盛，大家都对她表示支持，而当她最终弄清事情真相时，结果证明她是正确的，她帮助你们揭露了一大批人。这就是倾听基层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的意思。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他就是人们公认不可战胜的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据神话说，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这个每次往地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的英雄成了不可战胜的人，但他最后还是被别人战胜了，战胜他的是海格力斯。怎么战胜的呢？他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离开了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很像安泰，应当像安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安泰，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不愿意断绝和削弱同生育和抚养他们成人的母亲的联系，即同群众、人民、工人阶级、农民

和小人物的联系。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是人民的儿子，他们只有不让任和人使他们离开地面，使他们失去靠向大地、靠向母亲即靠向群众从而取得新的力量的机会，他们才将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懂得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的人，只有懂得一分钟也不能同母亲——人民、工人阶级和生育、抚养和教导我们成人的群众失去联系的人，只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才可能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们必须实行列宁的这一遗教和论点。不这样做就会脱离群众，不这样做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僵化，不这样做就会灭亡，不同我们的母亲——群众、同生育和教导我们成人的工人阶级建立起这种联系，不建立起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僵化，就会灭亡。这就是列宁关于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关心党员和党员的命运。我不能说我们对党员和党员的命运非常关心。总之我们出了一些气魄大的人，考虑起来就是几千几万人。说开除1万个党员无关紧要，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有200万党员和预备党员，开除1万个被叫作包袱、消极因素的人意味着什么，对这种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法——是叫消极分子吗？（有些人喊道：消极分子。）对普通党员的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所有敌人的帮助。原因是，如果我们将许多人开除并容忍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开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数十人，而将“个人”、个别党员忘在一边，那么显然并非所有被开除的人都会安于自己的现状。这样就会给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的敌人以可乘之机，给他们提供后备力量，给他们提供一支大军。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的力量从来就不大。

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最后的一次争论，一次公开的争论，这是一次全党投票。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在854000名党员中，参加这次全党投票的有73万党员。这就是说，有123000名党员没有参加

投票。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倒班，或者是因为外出或休假等等。因此，在 854000 名党员中，参加全党投票的有 730800 人。赞成布尔什维克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有 724000 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 4000 人。占 0.5%。弃权的有 2600 人。我认为，应当把弃权的人列入赞成托洛茨基分子之列。这样就是 6000 多人。我认为，在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参加这次全党投票的党员中，即在 121000 名党员中，可以把 10% 的人划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当然，参加投票的人的力量对比是，99.5% 的人赞成布尔什维克，0.5% 即半个百分点的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然而在那些未参加全党投票的人中，我想将 10 个百分点不是半个百分点，而是 10 个百点，划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这样，在 12 万人中占了大约 11000 人。

你们看：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 4000 人，弃权的有 2600—6600 人。再加上 11000 人，共 18000 人。可以假定赞成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有大约 1 万人，这样一共 28000 人。让我们为客观起见多算一些，比实际数量多算一些，统共为 28000 人。再加上形形色色的其他坏人：右倾分子等等，让我们算为 30000 人。你们看，拥护反党派别、拥护托洛茨基分子、拥护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就是这些人，其数量绝对没有夸大。许多人拥护季诺维也夫分子，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小股力量：工人反对派，右倾分子，民主集中派，等等，——在 854000 党员中占 30000 人。现在我们有 150 万党员，加上预备党员大概是 200 万人。在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已被逮捕的有 18000 人。如果以 3 万人计，那么还剩下 12000 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到了党的一边，而且转得相当坚决。一部分退出了党，一部分仍留在党内，似乎成了不很大的一支支力量。然而，第一，要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第二，苏联境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并不止这些。

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开除了数万、数十万人，我们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常常表现出残酷无情、官僚主义冷漠的态度。在近两年中先后进行

了清党和更换党证的运动——有 30 万人被开除。所以说，从 1922 年起我们有 150 万人被开除。在某些工厂，例如在科洛姆纳厂……该厂有几千工人？（有人喊道：13000 人。）党员数量现在为 1400 人，而原来是党员后来离开该厂或被开除的达 2000 人，这是一个工厂的情况。你们看，该厂力量对比就是这样：1400 名党员——和 2000 名原来是党员的人。看，你们干下的所有这些咄咄怪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帮我们敌人的忙。你们不要自己安慰自己，说什么旧的力量中剩下的大概不过 12000 人，托洛茨基分子投入了最后的力量来搞破坏，而这些人即将被我们所消灭，不要安慰自己了。对普通党员采取冷漠的、残酷无情的政策，我们的领导者中有许多人对个别党员的命运漠不关心，容许开除数千名经我们审查实为优秀人才的人，实为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一流的斯达汉诺夫作者。

所有这一切都为增加敌人——右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所有敌人的后备力量提供了条件。同志们，应当摒弃这种冷漠的政策了。

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简直是荒谬的。我们有一个老的、经过考验的、为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凡是承认党纲，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承认党纲——这并不是说必须成为读马克思书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达到这两点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连时间都没有，怎么能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工人的处境促使其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了解党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党纲，并准备为实现党纲而同敌人进行斗争。这就足够了。然而要是说他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是说他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人喊道：没有掌握。），没有掌握——这是愚蠢的。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就犯了这种愚蠢的错误，在党的章程中加进了有关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积极分子和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消极分子

的解释。我们无法改变章程。我们无法在全会上消除我们由于疏忽而犯下的错误，但我们可以凭良心去做，不实行这一条，因为这一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反列宁主义的，是违背真理和良心的。

如果一个人承认并基本上接受我们党的纲领，如果他在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如果他尽自己的可能缴纳党费——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中央委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会场上活跃起来。）

是否有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呢？要有10年功夫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是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是怎样读马克思的著作的呢？他不是一般地读，而是细细咀嚼。他做笔记，一遍、两遍、三遍地反复读，领导运动。于是他最后成功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能这样。这是愚蠢的。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闪失和过错，我就知道了。反正一个普通人要是犯了错误，我们的人对他除了开除就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就像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或者是枪决，或者是宣告无罪，似乎就不存在中间的办法。我们假定一个党员有一次、两次不能到会。那么你可以把他找来，提醒他党的会议不能缺席。如果他仍然不能到会或者出现了不能缴纳党费的情况，那么你可以再次提醒他注意。这时，可以作出指示，以后还可以提出警告，再以后还可以给他记过，最后可以规定期限——给你一个期限——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改正。还有，如果他连我们党的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有一些初步知识党员必须学习，那好，给他一个期限，帮助他学习。如果不见效果，把他转为预备党员，如果这仍然无效，把他转为同情分子。但是，我们的人却不打算这样做。或者你是党员，或者你就退党。这样不好，同志们，这不好。

以上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几个问题。（经久不息的掌声。）

安德列耶夫：现在我们来通过关于斯大林同志报告的决议。得到政治局基本赞同的草案已经分发给了大家。对草案还有没有修改意见或补充？（有些人喊道：没有。哈塔耶维奇：有一处文字需要修改。草案中说：“全会责成州委书记承担起市委书记的职责”。这有些不妥，因为市委书记应当是选举产生的。斯大林：草案中说，应当进行选举。承担职能——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书记。）没有必要接受你的修改意见，哈塔耶维奇同志，这本来就是清楚的。

还有没有修改意见或补充？没有。现在表决。同意通过决议草案的请举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一致通过。全会议程到此结束。

斯大林：看来，同志们，在根据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苏维埃系统的选举，无疑要推到5月20日了。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必须像这样详细地讨论一下我们的苏维埃也要按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即在苏维埃中恢复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苏维埃中的选举搞得很糟糕。不仅党的组织忘记了党的机关应当选举，而且苏维埃机构也忘记了这一点并且错误地运用选举原则——代表们不知去向，没有名单，没有报告。然而，只要我们能将党的组织进行改组（将党的组织按民主的方式进行改组是可能的），我们就能够帮助它们积极参加并领导最高国家机关的选举。此外，你们应当按民主的方式对我们的地方苏维埃进行改组，包括所有这些区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市苏维埃，因为那些地方的民主未必很多，你们怎么看呢？（有些人喊道：不多。莫洛托夫：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总的意见是在下次全会上结合通过新宪法提出苏维埃对新的选举条件做好准备的问题……（有些人喊道：对！）……邀请原执委会委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有人喊道：工会问题也应讨论。）关于工会和共青团问题，下次全会大概也要进行讨论，不光是工会，还有共青团，或许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但核心问题是对我们地方苏维埃的

工作人员队伍进行改组，地方苏维埃中的民主太少，工作无人过问。

（卡冈诺维奇：对。有些人喊道：对。）如果这样做对，那么可以通过了。

安德列耶夫：对斯大林同志的这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吗？（有些人喊道：没有。）

斯大林：只有当同志们在党内实行了选举原则并同应我们邀请列席下一次全会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交流自己的经验后，才可以讨论改组问题。那时就会有民主经验了。（卡冈诺维奇：那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报告工作了。）

安德列耶夫：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吗？

有些人喊道：同意。

安德列耶夫：现在我宣布中央全会闭幕。

原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5年第11-12期合刊

中层干部决定事业的成败

——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37年11月7日）

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

伏罗希洛夫为斯大林祝酒。……

斯大林：……关于伟大的领袖们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部——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为中层干部干杯！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

季米特洛夫：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不，不。主要是这些中层干部。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

季米特洛夫：……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最伟大的幸运就是：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同志在所有急剧转折中都如此坚定和英明地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并保证了事业的胜利。如果不把列宁同斯大林联系起来，就无法谈论列宁！

斯大林：我非常尊敬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现在是朋友，而且将来也仍然是朋友。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他的说法甚至不是马克

思主义的。事业的胜利必须有相应的条件，而领袖们是会找到的。单单指出正确的道路是不够的。从我们的观点看，英国党不是有正确的立场吗。但是它什么也没能做成，因为中层干部在工党方面。法国党执行正确的政策，而社会党仍然很强大，基本问题是中层干部。必须要注意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中层干部决定事业的成败。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58-59页

选择领导干部的标准

——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0年11月7日）

.....

开始谈国内战争和南部战线情况（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

我问斯大林他按照什么标准选择领导干部。

斯大林：托洛茨基坚持使用常常会叛变的老军官、专家。我们，正相反，选择了忠于革命、联系群众的人，首先是来自底层的军士们，尽管我们清楚地了解正直的专家们起的巨大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曾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藐视专家。他把我叫到莫斯科去。托洛茨基和皮亚塔科夫力图证明这一点并为两名被我除名的专家说话。这时收到了来自前线的通知，说其中一人叛变了，另一人当了逃兵。伊里奇读完这份电报后揭露了托洛茨基和皮亚塔科夫，承认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12-113页

大胆提拔年轻干部

——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节录）

（1941年2月4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

庆祝伏罗希洛夫60寿辰。

斯大林两三次举杯祝酒。……

关于年轻干部：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会把年轻干部压制20—25年，然后才准许他们到各种各样的领导岗位上去。这是法国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提拔年轻干部，有时甚至过于大胆。我们满意地、高兴地提拔他们。

年纪大的人坚持旧观念，年轻人向前进，及时地用年轻人替换年纪大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不如此做的国家注定要失败。”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26页

要宽容每个人工作中的小缺点

——同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谈话的片断

如果您确信并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就任何时候也不要顾及别人的意见，而要凭理智和良心去做。

您自己怎么想的，就请怎样回答，不要迎合。和我谈话不需要这样。如果您揣摩我的意愿，我们的谈话就不会有多大好处。不要以为如果您说的和我的意见相左会很糟；您是专家，我和您谈话是为了向您学一点东西，而不只是为了教训您。

我想问，他懂行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收起您的这些修饰语吧——诚实的，合适的。诚实还不行，单凭诚实还不够，傻瓜也有诚实的，我们需要他不光是诚实，而且还懂行。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工作中的失误，圣人是不会存在的。因此要宽容每个人工作中的小缺点，重要的是利大于弊。您以为自己没有缺点吗？——他用手碰了碰我的肩膀——您也有缺点。连我也有缺点，尽管我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是我从报纸上知道的。——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45页

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 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问题的会议记录

（节录）

（1941年2月21日）

安德烈耶夫：……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问题。现在由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我们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在这里商议过，结论是最好扩充成员，哪怕是扩充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政治局里老年人不少，有些人就要离去，必须选拔出其他更年轻的人，让他们多学会一些，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以便他们接任职位。现在谈的就是必须扩充在政治局工作的人员。

具体地说，我们的意见就是最好现在补充人。现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名候补委员是贝利亚，第二名是什维尔尼克。最好增加到5人，再补充3人，让他们帮助政治局委员工作。譬如说，接纳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就不错，他当之无愧，还有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三个是马林科夫。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烈耶夫：有谁想发表意见？没有人。现在对整个名单进行表决。谁赞成通过斯大林同志的提案，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人。有弃权的吗？没有。议案通过。

问题就这些，会议结束。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年10月16日）

现在我们开完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开得很好，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了完全的统一。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统一。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我们的决议。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大大地扩大中央委员会呢？可是必须给中央委员会注入新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老头子，一个个都会死去，但是应当想一想，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谁，交到什么人的手里，由谁来举着它继续前进？为此需要更年轻的、忠诚的人，需要政治活动家。而这是不是说，要培养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呢？而为此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培养出一个国务活动家需要10年，不对，整整15年。

而且，仅仅有这种愿望还是很不够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日常工作中，在克服形形色色敌视我们的、极力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中，才能培养出思想坚定的国务活动家。我们党培养的、掌握了列宁经验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在斗争中摧毁这些敌对的图谋，夺取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完全胜利。

我们必须提高党及各级党委的作用，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列宁教导我们要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这难道可以忘记吗？这一切都要求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我们党的领导司令部。我们根据列宁的教导，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才扩大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我们党自身也扩大了一些。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解除了一些著名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的重要部长职务。这方面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一些人的部长职务，用新干部取代了他们。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部长的工作是很吃力的事情，它需要有许多精力、具体的知识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我们才解除了某些功勋卓著的同志现任的职务，任命了更熟练的、更有主动精神的新干部来代替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精力充沛，我们应当支持他们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

至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本身，他们仍旧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我们调他们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个副手。

如果我们要谈我们事业的统一，那就不能不涉及某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的错误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

莫洛托夫对我们的事业很忠诚，只要你一号召，我毫不怀疑，他就会坚决地为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不能因此对他不光彩的举动视而不见。莫洛托夫同志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外交宴会上受到“沙尔特廖斯甜酒”的作用，同意英国大使在我国出版资产阶级报纸和杂志。为什么呢？做出这样的同意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不明白，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在苏联人中发行资产阶级报刊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吗？如果走出这样错误的一步，它就将对苏联人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有害的负面影响，削弱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个政治错误。

莫洛托夫同志主张把克里米亚交给犹太人的建议付出了多大代价？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犯的大错误。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莫洛托夫同志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有犹太族自治，这难道还不够吗？就让这个共和国发展下去好了。莫洛托夫同志不应当替犹太人对我们的苏维埃克里米亚的非法要求辩护。这是莫洛

托夫同志的第二个政治错误，莫洛托夫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坚决拒绝他胡乱想出来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十分尊重自己的妻子，以致我们还来不及就某个重大政治问题通过决定，而热姆丘任娜同志却很快就知道了。事情成了这样：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政治局和热姆丘任娜同志和她的朋友们联系起来，而她身边的朋友是不能信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能被容许的，

现在说说米高扬同志。请看，他反对提高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农民是欠我们情的人，我们和农民有牢固的联盟。我们把土地永远地交给了集体农庄，他们必须向国家尽应尽的义务。因此不能同意米高扬同志的立场……

（阿·伊·米高扬在讲台上为自己辩护，说是出于某些经济上的打算。）

斯大林（打断米高扬）说：“请看，米高扬是新出现的弗鲁姆金。他自己搞糊涂了，还想在这个明明白白的原则问题上把我们也搞得晕头转向。”

（维·米·莫洛托夫在讲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并声称自己始终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

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说：“胡说八道！我没有什么学生。我们大家都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提议解决组织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取代政治局的是大大扩充了的主席团，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处——共计36人。）

斯大林说：“名单里有除了安·安·安德列耶夫之外的原政治局全体委员，受人尊敬的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他耳朵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不能工作了，让他安心养病吧。”

（会场上有人喊道：“应当选举斯大林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不行！请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马林科夫（在讲台上）说：“同志们！我们大家应当全体一致地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在讲台上）说：“中央全会上用不着鼓掌。应当不带情绪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老了，文件也不看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铁木辛哥说：“斯大林同志，人民不会理解的。我们大家一致选举您为我们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可能有另一种决议。”）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支持铁木辛哥。斯大林站了很长时间，看着会场，然后一摆手坐下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754-757页

清洗肃反

把反党分子清除出去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9日)

9月9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务必将波柳多夫^①开除出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个家伙在新的铁路建设方面总是把中央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弄糊涂，他身上没有一点（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他现在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新的）建设项目。可他算是什么建设者？难怪西伯利亚与欧俄之间铁路复线的建设毫无进展。一定要把这个一贯违背中央决定并经常嘲弄中央政治局的反党分子清除出交通人民委员部。

(2) 其次，为什么让乔尔内^②呆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里？干吗不把他调去干别的工作？

约·斯大林

① 波柳多夫，曾任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调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处长。

② 乔尔内，曾任科研管理局局长，后调任培养科学工作者委员会副主任。

维护右倾观点与党员身份不相容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1929年11月17日）

莫洛托夫：

应当在即将颁布的（关于控制数字的）主要决议中加上一条，即**宣传或维护右倾观点与党员身份不相容**。

关于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管辖西伯利亚的两部分时，西伯利亚人不声不响，从未要求撤换埃赫，而如今，当西伯利亚一分为二，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工作区域缩小了一半（也就是说减轻了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工作），埃赫却突然变得“不胜任”自己的任务了。对于这件事，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得很吗？我不怀疑，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即欺骗中央和建立“自己的”团伙式的边疆区委员会。我提议将所有的阴谋家首先是克利缅科（乌克兰式的阴谋“手段”）及巴佐夫斯基、利亚斯库特金、库兹涅佐夫之流统统开除出去，并给予埃赫以充分的信任，以便今后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不敢再诬蔑诚实的工作人员和欺骗中央。

二、一定要全文发表（在《真理报》上）联共中央关于阿塞拜疆的决议。外高加索的滑头们在自己的决议（已经发表）中竟把吉卡洛说成了主要责任者（因为他排在被撤回者名单的前列），而主要责任者（阿马斯等人）却成了次要责任者，就差说他们是吉卡洛的学生了。

① 1930年7月末，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常委库兹涅佐夫、巴佐夫斯基、叶戈尔、克利缅科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利亚斯库特金等人致信斯大林，批评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埃赫，并提出尽快将其取代的问题。1930年8月19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声明。克利缅科、库兹涅佐夫、巴佐夫斯基和叶戈尔因“无原则的派别主义和非党行为”而受到申斥，并被撤职。

为了粉碎这一花招（欺诈），应当发表联共中央的决议。

三、政治局把迈科普从格罗兹尼分出去，做得完全对。
暂时就写这些。握手！

附言：我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约·斯大林

1930年8月13日

反党派别集团在玩弄政变把戏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现将列兹尼科夫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实质上是右倾）派别集团的两份报告寄给你。简直太卑鄙了。一切材料都说明，列兹尼科夫的报告符合实际情况。玩弄政变把戏，糊弄政治局，结果完全堕落。

二、至于图哈切夫斯基一案，表明图哈切夫斯基百分之百的清白。这太好了。^①

三、我们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列扎瓦和克维林被免去（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职务。近日内将做出正式决定。

你的近况如何？

握手！

斯大林

10月23日

^① 1930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旧军官采取了一次大行动，被捕的伏龙芝军事科学院的教官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招供说，似乎当时列宁格勒军区的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国内的形势很严重，要等待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建立军事专政，图哈切夫斯基在军区有很多支持者。9月24日斯大林致信奥尔忠尼启则，在信中写道：“尽快读一读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想一想结束这一不愉

快的案件的措施。你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极为秘密的：它只有莫洛托夫和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不知道克利姆（即伏罗希洛夫——编者注）是否知道。大概图哈切夫斯基被反苏分子所俘，并被右翼队伍中的反苏分子说服。根据材料只能得出这种结论。这可能吗？当然可能，既然这不能被排除。看来，右翼为了摆脱中央、摆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摆脱布尔什维克式的发展工业的速度，甚至不惜准备实行军事独裁。正如你所看到的，奥尔洛夫和斯米尔诺夫的供词（有关逮捕政治局的供词）和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和‘主张’）都源于同一个培养基——右翼阵营。这些老爷们显然想使军人变成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苏汉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苏汉诺夫-布哈林这一派——这就是对照表。但情况……不能用普通的方式（立即逮捕等）结束这个案子。这个案子需要周密地考虑一下。明仁斯基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最好拖到10月中旬，等我们大家都到齐时再解决。要是你在莫斯科的话就与莫洛托夫谈谈这一问题。”

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审查了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进行了当面对质，在对质时他们证实了自己的证词。加马尔尼克、亚基尔和杜博沃伊也受到了审问。1937年6月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设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找过杜博沃伊、亚基尔和加马尔尼克。应当把图哈切夫斯基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是否正确，他们三人都说不正确，这是一种误会，不正确……我们进行了对质并决定将这一案件一笔勾销。”

对破坏中央指示的犯罪行为不能不闻不问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2年(不早于6月))

卡冈诺维奇同志：

对破坏中央关于不允许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红军侦察局在满洲秘密活动的指示的犯罪行为不能不闻不问。一些进行爆炸的朝鲜人被逮捕和我们的机关跟此事有牵连会造成(有可能造成)和日本发生冲突的新危险。除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谁还会需要这种局面？请务必向远东领导人了解情况，请主办此事，惩办破坏苏联利益者以儆效尤。再也不能容忍这种不像话的事了。

请和莫洛托夫谈一谈，并采取严酷手段打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红军侦察局中的罪犯(这些先生们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安插在我们中间的间谍)。让他们看看，在莫斯科还是有一个能够惩罚罪犯以儆效尤的政权的。

敬礼

约·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7年6月2日）

斯大林：同志们，关于有过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现在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怀疑。事实、罪犯自己的这么多供词和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的观察结果，这些东西是这样多，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这个阴谋受到德国法西斯分子的鼓励和资助。

大家在骂这些人：骂一些人是坏蛋，骂另一些人是怪人，骂第二类人是地主。

但是骂人本身无济于事。为了把这个祸害连根拔掉并把它消除掉，应当研究它，心平气和地研究，研究它的根源，揭露并看准其手段，以便今后无论在我国，还是在我们周围都不再发生这样丑恶的事情。

我就是想就这方面的问题说几句话。

首先请大家注意军事政治阴谋的首要分子是什么人。我不拿已被枪毙的那些人来说，我拿不久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人来说。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领导人。属于他们这类的我认为还有鲁祖塔克这个人也是首要分子，干得很狡猾，把一切都搞乱，原来是个德国间谍，还有卡拉汉、叶努基泽，接着是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系统的，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

① 鲁祖塔克，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5月26日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判死刑。

尼克，—— 一共 13 个人。这是些什么人？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人是军事政治阴谋的核心，是与德国法西斯特别是德国国防军有经常联系的，使其全部工作都适合德国法西斯的口味和目的。这是些什么人？

有人说图哈切夫斯基是地主，另一个什么是牧师的儿子。同志们，这种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当人们把贵族作为与劳动人民敌对的阶级来谈时，指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一个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贵族中某一些个别的人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列宁就是贵族出身——这个你们知道吧？

有人回答：知道。

斯大林：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不管怎么说非无产阶级分子。恩格斯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厂并以此供养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牧师的儿子——这个人不错。相反谢列布里亚科夫^①是个工人，但你们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坏蛋。利夫希茨^②是个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原来是个间谍。

大家谈到敌对力量时指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一个阶层。但并非该阶级中的每个人都可能干坏事。贵族、资产阶级中的个别的人为工人阶级工作而且工作得不错。比方说律师这个阶层中就有许多革命者。马克思是律师的儿子，不是雇农的儿子，也不是工人的儿子。在这些阶层中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而且不比纯血统的无产者差，而是比他们好。因此是不是雇农的儿子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书记、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等职。1936 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 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死刑。

② 利夫希茨，1930 年起历任南方铁路局、北高加索铁路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7 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死刑。

这个一般的尺度，对个别的人不适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要说这是生物学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生物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所以这种一般的尺度，尽管对一些等级、集团、阶层而言是完全正确的，但不适用于非无产阶级或非农民出身的任何个别的人。我将不从这方面来分析这些人。

你们还有另一种流行的、也是不正确的观点。常常听到有人说：“1922年某某人投票赞成托洛茨基。”这也是不正确的。这个人可能年轻，有些不明事理，好惹是生非。捷尔任斯基也曾投票赞成托洛茨基，不仅是赞成，而且是在列宁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这个你们知道吗？他不是个对什么事情能消极对待的人。他曾是个非常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想把整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发动起来保卫托洛茨基。这一点他未能做到。安德列耶夫 1921 年曾是个非常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

有人在座位上问：哪个安德列耶夫？

斯大林：中央书记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所以你们要知道，某人某时投票赞成或某人某时动摇这样一种一般的观点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总是正确的。

因此这第二种流行的，在你们中间乃至全党非常普遍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我说它不总是正确的，是它常常使人陷入迷途。

这就是说，在评价这个核心及其成员时，我也不使用这个不正确的观点。

判断人最好是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他们的工作。有人动摇过，后来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地、诚实地脱离了，与我们在一个队伍里很好地同托洛茨基分子战斗。捷尔任斯基曾战斗得很好，安德列耶夫同志现在战斗得很好。我们可以举出二三十位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彻底脱离了，现在同它战斗得很好。而且不

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事实证明列宁——托洛茨基派与其开始了公开的战争——的路线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后来，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整个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不能不影响到一些前托洛茨基分子。像捷尔任斯基、安德列耶夫这样的人和二三十个前托洛茨基分子明辨了是非，认识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转到了我们这方面，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再多说几句。我知道有些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过去也不曾是托洛茨基分子，然而他们也不曾带给我们多大益处。他们形式主义地拥护党，这样的列宁主义者有多大价值呢？相反有些人过去固执己见，怀疑过，不承认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没有怯懦到要掩饰自己动摇的程度，他们曾投票反对党的路线，而后来转到了我们这方面。因此这第二种观点，在你们中间流行而普遍的观点，作为绝对的观点我不能接受。

在评价这个阴谋的核心的领袖们时需要第三种观点，这就是根据这些人多年来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举出了 13 个人，现在重复一遍：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其中 10 个人是间谍。托洛茨基组织了这一集团，直接训练他们、教导他们去给德国人提供情报，让他们相信我托洛茨基手下有人。去进行破坏、颠覆，让日本人和德国人相信我托洛茨基有力量。这个人在自己的人中间鼓吹进行间谍活动的必要性，他说，因为我们托洛茨基派应当与德国法西斯联合，所以我们应当合作，所以我们应当像他们在需要时帮助我们那样去帮助他们。现在他们需要情报方面的帮助，那就给他们情报。你们还记得拉狄克^①的供词，你们还记得利夫希茨的供词，你们还记得索柯里尼柯夫^②的供词——他们都给了情报。这就是间谍活动。托洛茨基是从我们党内的人或我们党周围的人当中物

色间谍的组织者，是头号间谍。

李可夫。我们没有资料表明他本人向德国人提供情报，但他通过自己的人鼓励这种情报活动。与他联系很密切的是叶努基泽和卡拉汉，他们俩是间谍。卡拉汉从1927年起，叶努基泽也是从1927年起。我们知道他们通过谁送交秘密情报，通过谁送交这些情报——通过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某个人。我们知道。李可夫知道这一切。我们没有材料表明他本人是间谍。

布哈林。我们没有材料表明他本人提供过情报，但是同他联系很密切的既有叶努基泽，又有卡拉汉，还有鲁祖塔克，他们劝他，提供情报吧，他们自己没有提供。

加马尔尼克。我们没有资料表明他本人提供过情报，但是他的所有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乌博列维奇，特别是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为德军总参谋部从事经常的情报活动。

剩下的人。叶努基泽、卡拉汉我已经讲了。亚戈达是间谍，而且在自己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培植间谍。他告诉德国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中谁有什么毛病。他把这样的肃反工作人员派到国外去休假。德国情报机关抓住这些人的这些毛病，吸收他们加入组织，这些人回来时都成了间谍。亚戈达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已被德国人吸收加入了组织，不管你们认为怎样，要么你们做我的人，为我个人工作，我让你们怎样就怎样，惟命是从；要么我向中央委员会告发你们是德

① 拉狄克，曾任《消息报》国外部副主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等职。1937年因“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而被判10年徒刑，死于狱中。

② 索柯里尼柯夫，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财政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副外交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10年徒刑，1939年死于狱中。

国间谍。那些人被吸收加入组织，作为亚戈达的人听命于他个人。他同加伊^①这个德日双料间谍就是这样干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也供认了。他同沃洛维奇^②也是这样干的，后者自己供认是德国间谍。他同保克尔^③也是这样干的，这个人是个老德国间谍，从1923年起就是了。这就是亚戈达。下一个是图哈切夫斯基。他的供词你们都看了。

有些人回答：是的，看了。

斯大林：他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是我们神圣的东西——交给了德国国防军。与德国国防军代表会过面，是不是间谍？是间谍。在西方为了体面把这些西欧文明国家的骗子称做情报员，而我们按俄罗斯的方式去理解，这就是间谍，亚基尔经常向德军参谋部提供情报。他诡称自己患肝病。这个病也许是他虚构的，也许他确实有这种病。他去那儿治病。乌博列维奇不仅伙同朋友和同志们，他本人也亲自提供过情报。卡拉汉是德国间谍，埃德曼是德国间谍。卡拉汉从他在德国当武官时起就向德军参谋部提供情报。鲁祖塔克，我已经说过他不承认他是间谍。但我们掌握所有资料。我们知道把情报交给谁了。在德国，在柏林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女情报员。等你们以后有机会去柏林，说不定你们中间有谁认识约瑟芬·根茨。她是个漂亮女人，老情报员。她吸收了卡拉汉加入组织，是靠女人那方面本事吸收的。她还吸收了叶努基泽，帮助别人吸收了图哈切夫斯基。她把鲁祖塔克抓在手里，约瑟芬·根茨是个很有经验的情报员。她本人好像是个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务的丹麦人。长得漂亮，很愿意响应男人们的任何提

① 加伊，苏俄国内战争期间任师长、集团军和骑兵军司令员。1933年起任空军学院军事史和军事艺术教研室主任、教授。

② 沃洛维奇，1936-1937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③ 保克尔，1933-1937年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作战处工作人员。

议，然后伺机破坏。你们也许在《真理报》上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招募者举行的一些包藏祸心的招待会。她是在这种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德国国防军女情报员之一。你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10个确定的间谍和3个德国国防军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和纵容者。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

当然，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些昨天还是共产党员，突然自己就成了德国间谍机关手中的无耻工具？是这样的，他们是被吸收加入组织的。今天要求他们给情报。如果你不给，我们手里有你签过字的条子，说明你已被吸收入伙，我们会把它公布于众。他们害怕被揭露，只好提供情报。明天要求：不行，给太少，多给一些，把钱拿去，开个收条。在这之后又要求：开始搞阴谋，搞破坏，首先搞破坏活动，证明你们对我方有用。你们若不证明，我们就揭发，明天就把你们交给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你们的脑袋就得搬家。于是他们开始搞破坏活动。在这之后德国人又说——不行，你们得想法在克里姆林宫或莫斯科卫戍部队里干点什么，干脆去占据指挥员职位吧。于是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开始卖力。后来这又不够。你们干点值得干的实事吧。于是他们就杀害了基洛夫。德国人说，这是钱，拿走吧。又对他们说，继续前进，能不能把整个政府都除掉。于是他们就是通过叶努基泽，通过戈尔巴乔夫^①、叶戈罗夫^②——当时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所学校校长，而学校就在克里姆宫里——还有彼得松^③来安排。德国人对他们说，组织一个小组，让这个小组去逮捕政府成员。

① 戈尔巴乔夫，苏联红军指挥员，曾任军长，30年代在不同地方担任指挥员职位。

② 叶戈罗夫，苏联元帅。曾任集团军、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1931-1938年历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总参谋长和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

③ 彼得松，1920-1935年任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后任基辅军区副司令员。

报告飞速传去，说有一个小组，我们一切都会办到，去抓人，等等。但是抓几个人，杀几个人还不够。还有人民呢，还有军队呢。所以他们又报告说，我们已经占据了一些指挥员职位，我们几个占据高位，我，图哈切夫斯基，他，乌博列维奇，还有亚基尔。又提出要求——关于日本、远东的情况怎么样？于是又开始了一个战役，非常重要的战役。他们要撤掉布柳赫尔^①。那里已经有了候选人。当然是图哈切夫斯基了。不是他还有谁呢？为什么要撤掉呢？是加马尔尼克、阿隆施塔姆^②进行鼓动的结果。他们进行得这么巧妙，以至于把布柳赫尔周围的人几乎都发动起来反对他。此外，他们使军事中心的领导人深信应当撤掉他。有人问为什么，你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他好酒贪杯。那好，还有什么？他早晨起床晚，不去巡视部队。还有什么？老了，不了解新的工作方法。可是今天不了解，明天会了解的，一个老战士的经验不会没有用处。你们看，在对布柳赫尔说那些下流话这一事实面前，中央委员会挺身而出。普特纳在烦扰，阿隆施塔姆在莫斯科烦扰我们，加马尔尼克也在烦扰。最后我们召开了会议。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同他见了面。是个不错的男子汉，我们不了解他，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让他发表讲话，讲得极好。我们用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了审查。各地都有人提醒，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大厅召开会议。

当然，他比任何图哈切夫斯基，比任何危言惑众的乌博列维奇，比任何在军事上毫不出众的亚基尔都更有智慧，更有经验。有过一个小组。我们拿科托夫斯基来说，他从未指挥过集团军，也未指挥过方

① 布柳赫尔，苏联元帅。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国防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后历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司令员。1938年10月22日被捕，后被处决。

② 阿隆施塔姆，1934-1937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1937年任莫斯科军区副司令员，1937年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

面军。如果有人不了解本行，我们就会骂他们，见你的鬼去，我们这里不是修道院。把不喝酒但也不会打仗的人放在指挥员的职位上是不好的。有些人拥有十年之久的指挥经验，年龄确实够老的了，但不能撤掉他们，相反要留住他们。我们当时骂过加马尔尼克，而图哈切夫斯基却支持他。这是惟一一件达成协议的事。想必是德国人告发了，采取了一切措施。想安插另一个人，但未能得逞。

这个核心是由 10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和 3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教唆者组成的。很清楚，这些人的思想本身取决于德国国防军。如果他们将执行的是德国国防军的指示，那么很清楚，国防军将怂恿这些人到这里来。这就是阴谋的内幕。这是一个军事政治阴谋。这是德国国防军一手安排的。我认为这些人是国防军的傀儡和玩偶。国防军要在我们这里搞阴谋，这些先生就着手搞阴谋。国防军想让这些先生经常向他们提供军事机密，这些先生就把军事机密通报给他们。国防军想要推翻现政府，杀掉政府成员，他们就着手办这件事，但没有成功。国防军想在战争爆发时一切准备就绪，想让军队去从事破坏活动从而对防御不作准备，国防军想这件事，他们就去准备这件事。这是一些代理人，是在苏联搞军事政治阴谋的领导核心，由 10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和 3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教唆者组成。这是一些德国国防军的代理人。这是主要之点。因此，这个阴谋与其说有内部基础，不如说有外部条件，与其说在我国有内部方针上的政策，不如说有德国国防军的政策。他们想把苏联变成第二个西班牙，找到并招募了从事这方面活动的奸细。情况就是这样。

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他一直扮演着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不会干卑劣害人勾当的有教养的人。我们都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军人，我曾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军人。我问过他：您怎么能在 3 个月内把一个师的兵员搞成 7000 人。这是什么？是门外汉，不是军人。什么是 7000 人的师。要么是个没有炮兵的师，要么是有炮兵但没有掩护部队的师。这

根本就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耻辱。怎么能有这样的师。我问过图哈切夫斯基，您这个自称此事行家的人怎么能坚持把一个师的兵员搞成7000人，同时又要求我们每个师都配备60-40门榴弹炮和20门大炮，要求我们有这么多坦克武器，这么多炮兵，这么多迫击炮。这里二者只能选一，或者您让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见鬼去，只提供步兵，或者您只供应军事装备。他对我说：“斯大林同志，这是爱好”。这不是爱好，这是按德国国防军要求进行的破坏活动。

这就是核心，而核心是什么？他们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没有？鲁祖塔克从来没有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但他是个奸细。叶努基泽也从未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他也是个奸细。这就是你们的观点——谁投票赞成谁。

地主出身。我不知道那里还有谁出身于地主家庭，好像只有图哈切夫斯基一人。阶级出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在每个个别的情况下都需要根据事情来判断。这些人多年来与德国国防军有联系，给他们当间谍。也许他们常常犹豫并且并非总是进行自己的工作。我认为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自始至终干自己的事情。我看到把他们带到监狱时他们是怎样哭泣的。就拿那个加马尔尼克来说吧。你要知道，如果他自始至终是个反革命分子，那他的表现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若是处于他的位置上，作为一贯的反革命分子，首先会要求见斯大林一面，首先把他打死，然后再自杀。反革命分子都这样干。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只是德国国防军的俘虏，被吸收加入组织的间谍，而这些俘虏只能沿着搞阴谋的路，沿着搞间谍活动的路，沿着拱手交出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方的路滑下去。国防军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那些软弱的人抓来当俘虏，做奴隶，而软弱的人应当按照给他们下达的命令行事。俘虏就是俘虏。这就叫落入间谍活动的圈圈。只要你落入这个轮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把你卷进去，你只能顺着斜坡滑下去。这就是基础。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别的什么，谁也没问他们政策的

事。这不过是这些人在听从而已。

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知道，他们可怜起农民来了。就是这个坏蛋叶努基泽，1918年把农民赶走并恢复了地主经济，现在他又可怜起农民来了。然而因为这个傻大个儿（笑声），能装成老实人的样子并痛哭流涕，所以大家就相信了他。

第二次，在克里木，当时有几个老太太，妇女不找他，像在白俄罗斯那样，来找他哭了一顿儿，他就把庄稼人赶走了，就是这个坏蛋把农民赶走并让一个什么贵族卷土重来。我当时就提出把他开除出党，但大家不相信我，认为我作为格鲁吉亚人，对格鲁吉亚人太严厉了。你们要知道，是一些俄罗斯人给自己提出了保卫“这个格鲁吉亚人”任务。农民们与他，与这个让地主卷土重来的坏蛋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的问题不在政策上，谁也没问他关于政策的事儿。他们是德国国防军手中的俘虏。执行命令。这些傻瓜以为我们是瞎子，什么也看不到。你们要知道，他们要在克里姆林宫把政府成员抓起来。结果我们有所察觉。他们想在莫斯科卫戍部队里找到自己并把整个部队发动起来。他们以为谁也不会发现任何情况，以为我们这里是撒哈拉大沙漠，而不是一个有居民，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政府和政党的国家。结果是我们有所觉察。

而现在这些德国国防军的俘虏正坐在牢房里哭呢。政治家！领导者！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先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吸收那些人呢。我们在军队系统逮捕了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好人。他们是怎样被吸收的呢？

我不能说这是一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列宁生前身后他们发动过多少次反对列宁、反对党的公开斗争，但每次都被击败了。现在他们又发动了一次大运动，再次遭到失败。这些人本事并不大，从1921年起到1937年止，他们不断遭到失败。本事不大，不是什么天才。

他们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吸收那些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一个人对某件事不满，例如他对因从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而不能随便得到提升而不满，或者他因为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而被降级不满，而他自认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很难了解自己有多大力量和自己有多少优点和缺点。有时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因此在得不到提升时自己就会抱怨。

先是小打小闹，搞个意识形态挑战集团，然后越走越远。进行了这样的谈话：伙计们，事情是这样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我们手里，亚戈达在我们手里，克里姆林宫也在我们手里，因为彼得松同我们在一起，莫斯科军区、科尔克和戈尔巴乔夫也在我们这一边。所有的人都在我们这边。要么你现在就出人头地，要么明天，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你一无所得。于是许多意志薄弱的、不坚强的人就想，这件事现实可行，真不得了，这件事好像还有利可图呢。若是你错过了机会，在这期间别人逮捕了政府成员，控制了莫斯科卫戍部队以及诸如此类的勾当，那你可就一筹莫展了（全场活跃）。

彼得松在自己的供词中就是这样考虑的。他摊开手说：“这件事现实可行，怎么能不被吸收呢”？（全场活跃）

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现实可行。然而这些意志薄弱的人正是这样考虑的：真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能落到别人后面。赶紧着手办这件事吧，不然就一筹莫展了。

当然，这样也只能吸收几个人。当然，坚强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事取决于性格，然而也可能取决于教育本身。同志们，我要说这些不够坚强的人，他们就是些被招募的材料。这就是这些坏蛋能如此容易地吸收不够坚强的人的原因。催眠术对他们起了作用：明天所有的人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德国人与我们在一起，克里姆林宫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从内部起作用，他们从外部起作用。这些人就这样被招

募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令人费解地忽略了这件事？有过预兆的。2月份开了中央全会。不管怎样这件事还是提了出来，而我们毕竟还是忽略了。我们自己从军人中发现得很少。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我们是些能力差的人，或者眼睛全瞎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当然，军队并未脱离国家，脱离党，而在党内，你们知道，这些成就有点儿冲昏人们的头脑。每天都在取得新的成就，计划被超额完成，生活在改善，政策好像不错，我们党的国际威望无可争议地增长，军队本身从基层到中层甚至上层的一部分，都是非常健康和强大的力量，整个事业都在前进，这时候人们不由得就松劲了，失去了视觉的灵敏，开始考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有什么不够的？政策不错，工农红军拥护我们，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在增长，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前程远大，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想当反革命吗？这些毫无价值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有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核心已被德国人吸收进了组织，他们甚至在希望脱离反革命道路时也不能脱离，因为他们总是害怕被揭发出来丢掉脑袋。然而总的形势，我们力量的增长，军队、国家和党蒸蒸日上的发展，这些使我们的政治警觉性变得迟钝，使我们的视觉变得不够灵敏了。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是软弱无力的。

需要对人进行审查，不管是外来的人还是自己人。这就是说应当有一个广泛设立分支机构的侦察机关，以便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同侦察机关在一起，扩大自己的网络并更警觉地观察。我们在所有方面都粉碎了资产阶级，惟独在侦察方面像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一样被打败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弱点。没有侦察，真正的侦察。这个词我既是在广义上使用，指的是保持警觉；也是在狭义上使用，指的是对侦察的良好组织。我们军事系统的侦察机关不好，很薄弱，内部间谍活动泛滥。我们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侦察机关由间谍加伊领导，我们的肃反委员会侦察机关

内部有一批主宰这件事情的人，他们为德国、日本、波兰工作，让他们干多少他们就干多少，就是不为我们工作。侦察是我们在20年间首次遭受最惨重失败的领域。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侦察机关扶植起来。这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同志们，他们取得的胜利太大，对所有的掠夺者而言苏联是一块极香的肥肉。泱泱大国，出色的铁路，船队在扩大，粮食生产在增长，农业兴旺而且将继续兴旺，工业蒸蒸日上。这块肥肉对帝国主义掠夺者而言是如此诱人，以至于它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命运和历史把这样巨大的财富，把这个辉煌伟大的国家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却在酣睡，忘记了像我们国家这样巨大的财富不可能不引起渴求、贪欲、忌妒和侵占这个国家的欲望。德国第一个认真地伸出了手。日本是第二个，把它的情报员放进来，有自己的暴动核心，那些人想得到滨海地区，而这些人则想得到列宁格勒。我们却疏漏了这一点，不懂得这一点，在获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最富有的国家，又是一块令所有掠夺者垂涎的肥肉，这些掠夺者在使尽浑身解数从这块肥肉上夺下一点儿之前是不会安心的。我们对这方面疏漏了。这就是我们的侦察机关不好，我们在这个领域像乳臭未干的小孩一样被击败的原因。

侦察机关不好，但这还不是一切。很好。现在开始安心了。这是事实。取得一些成绩。成绩是一件大事，我们大家都渴望取得成绩。然而这些成绩也有其阴暗面——自满使人失去理智。但我们也有另一些缺点，不管有没有成绩，这些缺点都存在，并且应当克服这些缺点。现在有人在这里谈论报告，也有人报告过。我要说来自地方的报告搞得很不好。不好。如果报告得更多，如果我们把事情像列宁所想的那样提出来，那么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外人士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他发现的缺点写出自己个人的意见。他也要这样想，伊里奇也这样努力过，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学生都未能安排好这件事，需要的是不仅要看，要观察，要发现缺点和漏洞，发现敌人，而且要所有其他的同

志也看这件事。我们从这里不能看到一切。人们认为中央应当知道一切，看到一切。不，中央不能看到一切，没有这么回事。中央只能看到一部分，剩下的在地方上才能看到。中央把人派出去，但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地了解这些人，你们应当审查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审查手段——这就是在工作中审查人，根据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审查。而这些只有地方上的人才能看到。

戈里亚切夫同志讲了冲昏头脑的实际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当然会采取措施。有人说这说那，说我们的步枪的情况不好，说我们的战斗用枪有变成运动用枪的趋势。

（有人说道：马赫诺的半截枪）。

不单是半截枪，有人放松弹簧，为的是不需要张力。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告诉我，有一件不好的事，委托该委托的人去审查了。一个人瓦西连科辩护，另一个人不辩护。最后弄清楚了他确实有罪。我们未能知道这是破坏活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原来是间谍。这是他自已讲的。从哪年开始，叶若夫同志？

叶若夫回答说：从1926年开始。

斯大林：当然，他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当托洛茨基分子可比当间谍好多了。

报告搞得不好，但没有你们的报告，无论军事委员会，还是中央委员会什么也不能知道。派出的人并非百分之百经过全面审查。在中央这样的人不多。派出去的人可能有用。你们的责任是在事业中，在工作中审查这些人，如有差错你们就报告。每一个党员、忠诚的党外人士、苏联公民，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报告他所发现的缺点。如果属实，哪怕百分之五属实，也不错。必须把信寄给自己的人民委员，把副本寄给中央委员会。随你们的便，谁说只给人民委员写信就行了？不对。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它发生在伊里奇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在

组织国防委员会的时候，似乎是在1918年或1919年末。

托洛茨基来抱怨说：中央委员会收到一些共产党员的信，这些信的副本有时寄给作为人民委员的他，有时甚至不寄副本，信越过他寄到中央委员会。“这不合适”。列宁问：为什么？“怎么能这样呢，我是人民委员，那样我不能负责任”。列宁当时像对一个孩子一样把他顶了回去：“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一个人关心军事。战争是全国的事，是党的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由于记性不好或别的什么原因直接给中央委员会写信，那么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应当向中央委员会控告。您是怎么想的，中央委员会会把自己的事让给您吗？不。请您务必把这个控告的实质弄明白。您以为中央不会告诉您，会告诉的。您感兴趣的应当是这封信的实质——是对还是错。甚至连副本也可以不寄给人民委员。

难道什么时候伏罗希洛夫禁止你们给中央写信？（有些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你们中间有谁能说禁止你们给中央写信？（有些人说：“没有，谁也不能”。）既然你们拒绝给中央写信，甚至不给人民委员写信，报告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你们就是在继续原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与头脑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的斗争现在也应该进行，应当拒绝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径。我再说一遍，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对混乱局面感到担心的党外人士——说实话，有些党外人士比其他党员的信写得还好——都有责任给自己的人民委员，给副人民委员，给中央写信，报告那些他们认为危险的事情。

这就是说，如果这个规则得到执行，而这是列宁主义的规则，你们在政治局里就找不到一个对此说出反对意见的人；如果你们执行了这个规则，那我们早就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了。

这就是有关报告的情况。

在由上级对人进行审查方面还有缺点：没有进行审查。我们为什么要组建总参谋部，为的是让它对军区司令员进行审查。可它在干什

么呢？我没有听说总参谋部对人进行过审查，没听说总参谋部在乌博列维奇那里发现了什么并揭露了他的所有诡计。刚才这里有一位同志发言，谈到关于骑兵的问题，谈到事情在这里是怎样提出来的，总参谋部究竟在哪里，你们是怎么想的，总参谋部是为摆样子而存在的吗？不是。它应当从上面在工作中对人进行审查。军区司令员不是张作霖，把一个军区交给他任其摆布。

有些人说：有过这样的情况。

斯大林：这种做法不合适。当然，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听不顺耳的话，但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当然，有时候人们逆潮流而说一些不顺耳的话。但也有的时候人们不想得罪军区司令员。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其有害的事。总参谋部存在是为了让它天天对人们进行审查，给他出主意，改正他的错误。也许有个军区司令员经验不足，无意中自己惹出什么事来，应当让他改正过来，去帮助他。好好地审查一下。所有这些勾当都可能发生——在乌克兰有亚基尔，在白俄罗斯这里有乌博列维奇。

他们的所有勾当我们并非都知晓，因为这些人可以自行其是，他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只有天知道。

总参谋部该了解这一切，如果它想真正在实际上管好自己的事。我还没看到总参谋部高水平挑选人才的迹象。

还有，在我看来，对任命指挥干部这件事不够重视。你们看看会出什么事。要知道如何分配干部是很重要的问题。军事上的惯例是有命令就得服从。如果领导这件事的是一个坏蛋，他就可能把一切搞乱。他可能把好的士兵，好的红军，卓越的战士派到不应当去的地方，不是去包抄敌人，而是去帮助敌人。军事纪律比党内纪律更严格。一个人被委派到一个职位上，他就要进行指挥，他是主要力量，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所以在任命干部时应表现出特别的谨慎。

我是局外人，不久以前才有所觉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几

乎所有的机械化旅都有一些未经审查的人，不坚定的人。为什么这样，怎么回事？就拿阿博希泽来说，他是个放荡的人、大坏蛋，这是我偶然听说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机械化旅交给他呢。我说的对吗？伏罗希洛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他是一个军的“阿勃特”部队司令。

斯大林：我不知道“阿勃特”是什么？

有人在座位上说：一个军的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队司令。

斯大林：祝贺！祝贺！很好！为什么他应该在那个职位上？他有什么优点？已经开始了审查。原来他几次被开除出党，但后来又恢复了党籍，因为有人帮他的忙。给高加索发了电报进行了审查，原来他过去是个格鲁吉亚的执法队员，酒鬼，打过红军。但有军人姿态！

（全场活跃）

开始进一步分析。究竟是谁举荐了他呢，真该死！你们想像一下，原来举荐他的是埃利亚瓦^①，还有布琼尼^②和叶戈罗夫同志。布琼尼和叶戈罗夫也不了解他。这个人看来很能喝酒，善于当主持人（笑声），但有军人姿态！今天他发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宣言，明天又发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言，全凭自己的意愿！难道可以举荐这样未经审查的人吗？当然，他已被开除了。

再进一步地察看，发现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莫斯科，还有个奥尔尚斯基……

有人说：骗子！

① 埃利亚瓦，1923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国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② 布琼尼，苏联元帅。国内战争期间历任骑兵军长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员，1924-1937年任工农红军骑兵监。1937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有些人问：是奥尔尚斯基还是奥尔舍夫斯基？

斯大林：是奥尔尚斯基^①，还有个奥尔舍夫斯基。我说的是奥尔尚斯基。我向加马尔尼克问起过他。我知道一些格鲁吉亚公爵，是些大坏蛋。他们失去了很多，因此任何时候也不会与苏维埃政权善罢甘休，阿博希泽这个家族尤其坏，他是怎么到了你们那里的？有人说：怎么会这样，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他当上了指挥员。抓住了装甲坦克部前部长哈列普斯基^②的尾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是个酒徒，不是个好人，我把他从莫斯科赶出去了，他怎么来的？后来追究到叶戈罗夫、布琼尼、埃利亚瓦那里，他们说是谢尔戈举荐的。现在发现他做得很谨慎——没有签字（有人说：他只要求）。我手头没有推荐书给你们读。

叶戈罗夫：这个时期他在科学院。

斯大林：他是作为一个头脑清醒、仪表堂堂、意志坚强（笑声）的人而被推荐的。这就是一切。至于他在政治上怎么样，不知道，但把坦克部队交给了他。对这件事太疏忽大意了。还有一件事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就是加里卡维^③、萨维茨基^④、费尔德曼^⑤、叶菲莫夫^⑥连续多年占据指挥官的职位。当然，他们也尽过力，但许多事情还是不取决于他们。人民委员应该签字。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巧妙手段？

① 奥尔尚斯基，曾任工农红军汽车装甲坦克部副部长。

② 哈列普斯基，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和方面军通信主任，后任工农红军通信部部长，1934-1937年任工农红军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1937—1938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③ 加里卡维，1935年起任乌拉尔军区司令员。

④ 萨维茨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

⑤ 费尔德曼，曾任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管理局局长。

⑥ 叶菲莫夫，1935-1937年任工农红军总炮兵部部长，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听说需要一个武官，就提出7个候选人——6个傻瓜和1个自己人，他在傻瓜中间看去像个聪明人（笑声）这6个人的公文退回去了——不合适，把第7个派出去了。他们有很多办法，当提出六个傻瓜和一个聪明人作候选人时，你不得已只能签批他。对这件事需要特别注意。

然后就是对军事学校，在我看来就是对良好的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把所有的人都堆在那里。这一点应当改正，应当清醒。

有人说：这个问题提过多次了，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光提出问题还不够，应当解决问题。

那个人说：我无权解决。

斯大林：问题不是为提出而提出，是为解决它们而提出的。

对军事部门的出版机关也未给以应有的注意。我读过一些杂志，有时就发现一些很令人怀疑的东西。你们要考虑到，我们的青年军人读杂志是认真地去理解的。对我们来说杂志可能不完全是重要的东西，而青年人对这件事看得很神圣，他们读杂志是要学习，如果往出版物中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合适的。

现在给你们讲这样一件事。有过这样一个事件。胡佳科夫寄来了自己的小册子，但未被出版。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情况知道，既然这个人写作，他是个指挥员、老游击队员，需要对他加以注意。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从前就知道他头脑不清楚。我写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成，不合适。我在信中对他说，列宁格勒人什么样的都有——邓尼金也是列宁格勒人，米留可夫也是列宁格勒人。但是会聚集起不少对旧东西感到失望并且不反对回来的人。我们会放他们来的，干嘛为这个举行各种各样示威游行呢，我写信给自己的大使放他们来就是了。只是他们并不想来，纵然他们回来了，他们也不是斗士。他们厌倦了纷乱，他们不过是想当一当家而已。心平气和地对他作了解释，他满意地留了下来。后来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我受到了排挤，说我写了本关于苏波战争经验的书。

有些人说：是《基辅的石头》^①。

斯大林：关于1920年的《基辅的石头》。他们没有出版。你读一读。我很忙，问一些军人，他们说糟极了。问克利姆，也说是糟极了的东西。但还是读完了。确实是糟极了的东西（笑声）。它极力颂扬波兰的指挥部，过分诋毁我们的指挥部。而我看，小册子的整个目的是要揭发当时在那里解决问题的骑兵军并认为第28师——好像是它——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是第25师。

斯大林：他那儿有好多个师。我知道一点，那儿的庄稼汉挺满意，巴什基尔人去了吃落果、马匹，也没有去扰民。这是些好汉子。而为了让这个师特别突出，这一点看不到。有意思的是，谢佳金^②同志写了这本书的前言。我对谢佳金同志不大了解。也许这样不好，我不大了解他，但如果从这篇前言来判断，是很令人怀疑的前言。我不知道，他是个军人，怎么咬不开小册子这个核桃。出版这本玷污我军指挥员、把波兰的指挥人员捧上天的小册子。小册子的目的是让骑兵军名誉扫地。我知道没有这个军西南方面军一个重大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过分赞扬自己的28师，随他的便，这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不公道地把波兰指挥人员捧上了天，把我们的指挥员踩在污泥里，想使骑兵军名誉扫地，这是不对的。这一点谢佳金同志怎么没发现呢。前言说：一般地看是有缺点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也有有意思的经验。这是一个未必真实的甚至令人怀疑的前言。

有人说：我同意。

① 原文如些，应为《基辅的美人蕉》。

② 谢佳金，1933-1936年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37年7月起任巴库地区防空司令。

斯大林：同意什么，对出版物未加注意，出版物一定要掌握在手里。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些缺点应当消除，这些我不再重复。

阴谋家的主要弱点在哪里，而我们的主要力量又在哪里。这些先生受雇去做德国破坏活动的帮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正在沿着搞阴谋和毁灭苏联的路上滑下去。没人征求他们意见，而是吩咐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得执行。

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在于同人民没有联系。他们害怕人民，努力从上面进行，在那里建立一个点，在这里占据一个指挥员职位，在那里再占一个，在那里勾结一个被关押过的人，勾结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指望自己的力量，以为德国人会支持他们但德国人不想支持。德国人想：喂，你去惹点麻烦，我们还得看一看。在这里事情难办，他们想做出成绩让他们看看，说波兰人不放行，这里是边境缓冲国，若是往北，去列宁格勒，那里情况要好些。而且他们也知道在北方，在列宁格勒，他们也并非这么强大。他们指望德国人，不懂得德国人不拿他们当回事儿，在逗弄他们玩呢。他们害怕人民。假如看过他们的计划，你就会知道他们想怎样占领克里姆林宫，他们想怎样欺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他们想欺骗一些人，把一些人安插到一个地方，把另一些人安插到另一个地方，把第三批人安插到第三个地方，并让他们守卫克里姆林宫，说应当保卫克里姆林宫，而在里面他们要逮捕政府成员。当然白天怎么干这事呢？“您知道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会先开枪的，这是危险的”。因此决定最好是夜间干这事（笑声）。但是夜间也有危险，也会开枪的。

这些软弱、不幸的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指望人民的支持，军队的支持，害怕军队，躲避军队和人民。他们指望德国人和自己的一切诡计，如何欺骗克里姆林宫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如何欺骗卫队，在卫戍部队里制造混乱。他们不指望军队，这就是他们的弱

点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有人说，怎么这么多指挥人员离职。我看到有人感到不安，怎样接替他们。

（有些人说：这是胡说。非常好的人有的是。）

在我们的军队里人才不可胜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里人才数不胜数。不要怕提拔人，我们要更大胆地从下面提拔。现在给你们讲一个西班牙的例子。

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请求放他们去西班牙。我们说：“不，我们不要名人。我们将向西班牙派不大出名的人，你们看看结果怎样？我们对他们说，如果派你们去，所有的人都会发现，不值得。于是我们派出了不太出名的人，就是他们在那里也创造奇迹。巴甫洛夫^①是什么人？难道他出名吗？

有人说：是个团长。

另一个人说：机械化旅旅长。

布琼尼：第6师机械化团团长。

伏罗希洛夫：那儿有两个巴甫洛夫：上尉……

斯大林：巴甫洛夫表现特别突出。

伏罗希洛夫：你要说的是年轻的巴甫洛夫吗？

有人说：那儿有个古里耶夫和巴甫洛夫大尉。

斯大林：谁也没想到，我也没听说别列津有指挥员的才能。你们看他把事情安排得怎样？事情办得非常好。

你们认识施特恩吗？原来不过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秘书。我认为施特恩不比别列津差多少，也许不是差一些，而是好一些。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没有名望的人。他们说：“派我们这些有名望的人去西班牙吧”。不，让我们派没有名望的人，派我们的中下级军官去。这

① 巴甫洛夫，曾任机械化旅旅长，西班牙战争参加者。

就是力量，这个力量与军队联系在一起，它将创造奇迹，我向你们保证。就从这些人中间更大胆地提拔吧，把一切都打破，彻底摧毁。更大胆从下面提拔人。大胆一些——不要怕。（长时间鼓掌）。

伏罗希洛夫：我们将工作到4时。

有些人说：休息一会吧，抽支烟。

伏罗希洛夫：现在休息10分钟……

伏罗希洛夫：需要分发速记记录，像我们通常做的那样。

布柳赫尔：回到部队以后，我们得立即召集少数积极分子，因为在部队里或多或少有些议论，而且说些不该说的话。总之需要告诉部队这里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也就是说谁被逮捕了？

布柳赫尔：不，不全是这样。

斯大林：我若是处于您的位置，作为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司令员，就会这样做：召集级别较高的人员，向他们详细报告。然后还是我，在我参加的情况下，召集级别较低的指挥人员，向他们比较简要而又明白易懂地解释，让他们懂得敌人混进了我们军队，他们要破坏我们的强大力量，这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人和德国人雇佣的人。我们要把他们从我们的军队中清除出去，不要怕，我们将把一切挡路的人揍扁。要是我就这样说。对高级干部说得要全面一些。

布柳赫尔：需要对红军战士说那些给小范围的人讲的情况吗？

斯大林：说那些给大范围的人讲的情况。

伏罗希洛夫：为简便易行可能颁布专门的命令，说明军队中揭发出这样的事情。指挥干部们会带着这个命令到各部队去宣读。

斯大林：是的。还应当进行解释。为了让高级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了解，还是得分发速记记录。

伏罗希洛夫：是，这样会很好。在速记记录中我引证了很多材料。这样就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斯大林：如果同志们着手去做，在每个固定的组织中预定两个自己的副手并开始和政治方面和军事指挥方面培养他们，这就好了。

伏罗希洛夫：让我们采纳这个做法吧。在党的系统通常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去了解人。

伏罗希洛夫：就是这个费尔德曼先生，多年来我一直要求他：给我150个可以预定提拔的人。他给司令员们写了信，又等了两年半差不多三年。这个名单还在什么地方。应当找一找。

布琼尼：我看过这个名单，上面列的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一些人已经抓起来了，其他人也有嫌疑。

斯大林：既然其中一半人已被逮捕，这就意味着这个名单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布琼尼：不需要印发这个命令，说一下就行了，此事不宜宣扬。

斯大林：只发给军队，然后把它收回。速记记录也收回。

还有一件事怎么办才好。你们怎样两个月聚会一次？

伏罗希洛夫：3个月一次。

斯大林：既然你们没有公开的批评，那么就在你们委员会内部开展批评，要有1个来自你们要批评的国防工业的人参加。

（有些人说：对。）

斯大林：你们需派5个人去国防工业委员会当代表。

（有些人说：好。）

斯大林：可能从团长开始就应该有副手，再低一点儿更好。

伏罗希洛夫：我将给师长或团长委任副手。

（有些人说：有过这样的命令。）

伏罗希洛夫：命令是有的。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那里找到这样的人，这样就不用我来动手了。我会知道在科扎诺夫那里，22号潜水艇艇长或“红色乌克兰”号的指挥员是他选

中了要培养的人。我就不管了。

（有人说：这样的命令下达过。）

伏罗希洛夫：完全不是一回事。

斯大林：也许你们那里没有可以当副手的人。

伏罗希洛夫：有。我们这里人所共知按高低排队。指挥叶菲莫夫，他是军长，他将在师长里面找，然而因为师长人少，他不能从中预定，他将到营长里面找。

斯大林：不会害怕撤掉这些预定的人吧？

（有人说：这种害怕是有的。）

斯大林：所以，应当寻找和培养，如果有好的人选的话。

伏罗希洛夫：那么8点钟在我那儿大厅里开会。

斯大林：有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我想，在我们的人中间，无论是指挥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还有这样一些偶然被触犯的同志。有人对他讲了些什么，想吸收他，恐吓他，讹诈他。如果这些人来自己讲出一切，那就原谅他们，采用这种做法很好。有这样的人吗？

有些人说：毫无疑问，有。

斯大林：工作了5年，偶然地触犯了某些人。还有些等着瞧的人，要对这些等着瞧的人说，他们干的事是要失败的。需要帮助这些人为了原谅他们。

夏坚科^①：像以前对匪徒许诺予以宽恕一样，如果他交出武器并前来请罪（笑声）。

斯大林：这些人连武器也没有，也许他们只是知道敌人的情况，但没有报告。

伏罗希洛夫：顺便说说，他们的处境都不太好，当你们将来说明

^① 夏坚科，1937年5月起任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11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和解释时，就应当说明，现在不是一点、两点、三点的问题，全都要说清楚，最好让他们自己来。

斯大林：应当宽恕，我们答应宽恕，我们保证。

夏坚科：应当从军事委员会开始，库钦斯基和其他人。

库钦斯基^①：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不属于这个集团，不属于斯大林同志说过的那个集团。我一直是诚实的。

伏罗希洛夫：还有这个梅列茨科夫。这个无产者，见鬼去吧。

梅列茨科夫^②：这是谎言。况且我从未与乌博列维奇一起工作过，在索契也没见过。

伏罗希洛夫：这些人与他们非常亲密。就这样吧，8点钟到我那里。

① 库钦斯基，1934-1937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1937年任总参谋部学院政委。

② 梅列茨科夫，1920年起至30年代历任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远东特种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在及时和正确清洗钻进我们武装力量的外国间谍的过程中，伏罗希洛夫同志及其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手们显然过分卖力了。他们相信了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提供的“情报”，解除了近千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军职，据说是因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大部分人被解除军职的借口是现在流行的口号：由于勾结人民的敌人或由于丧失警惕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只要确认，军人的熟人或日常工作中有交往的人中有人被揭发是外国情报部门的间谍（这一点他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立即解除这样的指挥员的军职。

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因为在前线进攻要取得胜利，需要几十万战士英勇作战，而要使进攻失败，只要总参谋部出两三个该死的叛徒。但是不管如何为4万名指挥员被解除军职辩解，这项措施不仅过了头，而且在各方面都极其有害。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

到1938年1月，有1.1万名被解除军职的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重新回到陆海军中。我们国外的敌人出于别有用心目的散布谣言说，苏联大肆枪决人，他们为被我们揭露并处决的间谍，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之流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苏联揭露了外国间谍会使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下降，而苏联被处决的人数几乎超过100万。这是别有用心诽谤。1937年法院因反革命罪判处了841人有罪，其中121人被枪决。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关于反革命

罪的条款逮捕了 52372 人，经法院审理有 2731 人被判有罪，其中 89 人被处决，49 人被宣告无罪。这样大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没有充分根据就逮捕了許多人，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因此他于 1939 年 4 月 1 日被捕，1940 年 4 月 4 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的判决，内奸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被枪决。至于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系统劳改营中的大多数在押人员，他们是出于对苏联人民安全考虑不能使之自由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消灭了一贯策划并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同志们，我们清除了武装力量中的阴谋分子和叛徒，清除了我们国内的外国间谍，这是共产党为苏联人民立下的大功。不这样做，就无法使全国作好防御准备，因为已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权，他们一旦得逞，苏联就会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国，而苏联人民就会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奴隶。人民敌人的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破坏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协助外国侵略者进攻苏联，为苏联军事上的失败准备条件。

.....

这些卑鄙可怜的叛徒在依靠他们武装起来的反革命败类、刑事犯罪分子和丧失阶级特性分子夺取政权并在我国建立波拿巴制度后，首先试图放弃社会主义所有制，把我国经济上重要的经营项目出卖给资本主义分子，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以亏损为借口撤销国营农场并解散集体农庄；把拖拉机和复杂的农业机器交给被称作农场主的个体农民，以在农村中恢复富农制度；通过获取外国贷款使我们遭受奴役；把对帝国主义国家十分重要的我国工业企业租让给他们；把萨哈林的石油给日本，把乌克兰给德国。与此同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民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

例如，反苏阴谋积极参加者之一的索柯里尼柯夫在受审时谈到人

民敌人的计划时说：“……我们明白，我们的纲领性方针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去，提出资本主义纲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我国的某些阶层，培养出小资本主义阶层、小商人、小资产阶级。”

这伙人、这一匪帮的根子应该到收买他们、豢养他们、为他们忠实的奴才表现付了大价钱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密室中去找。

外国间谍不倦地活动，寻找并令人遗憾地在我国找到了盟友，在敌视苏维埃制度的腐化堕落分子中找到了助手。

由于被揭露和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目标是为外国敌人、侵略者打开大门，及时揭露并消灭他们是我们为成功防御作好准备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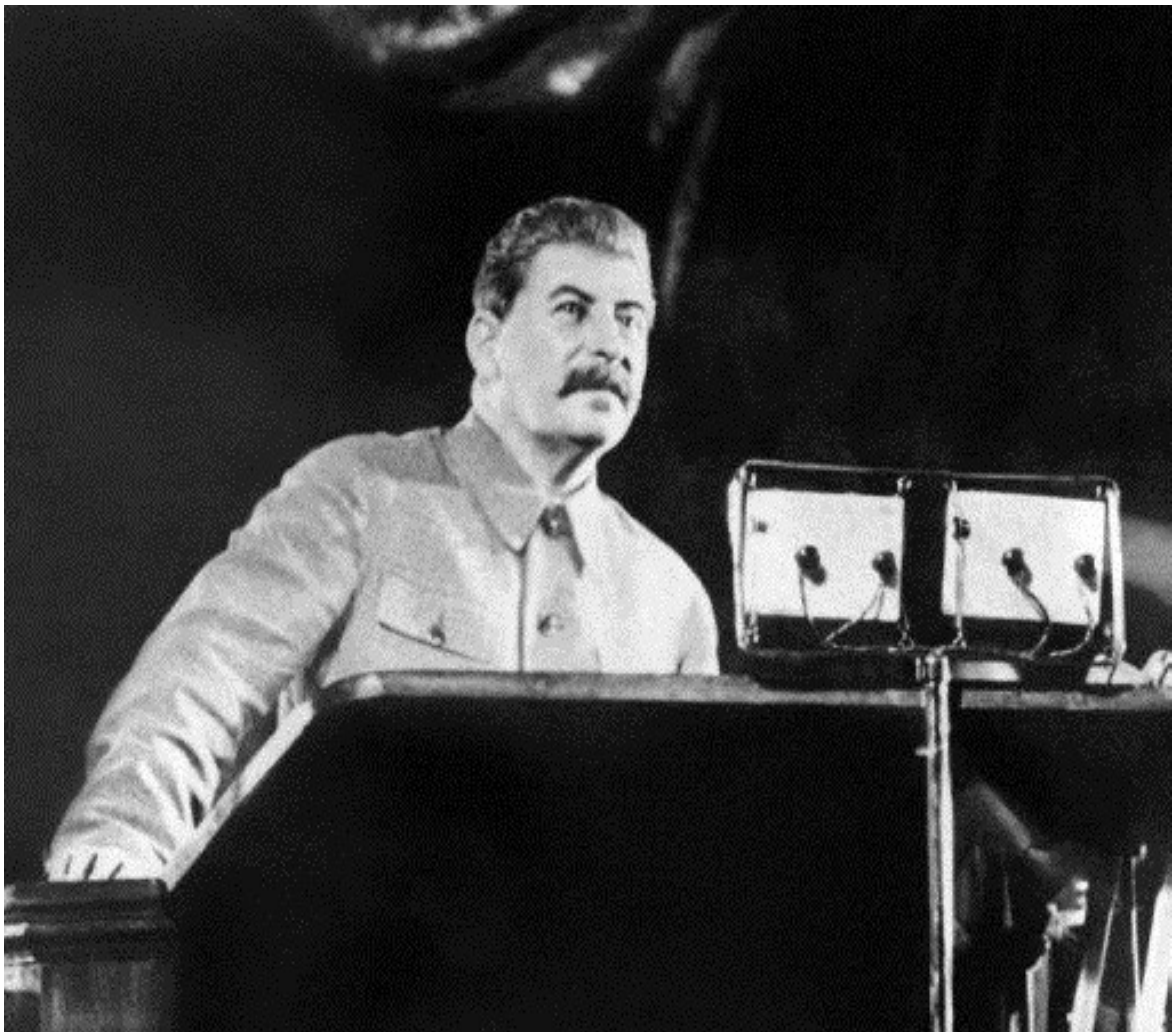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123-125页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137)



宗教政策

对一款有关宗教的条文的意见

——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便函

(1923年7月2日)

库尔斯基同志：

涉及辩护人协会的修正案及对于刑法典第 121 条的补充，即禁止团体性质宗教教义的传授条文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建议无论如何不能采纳这些提案。如果委员会的意见同我们有分歧，我们将此问题提交 1923 年 7 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加米涅夫
斯大林

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的指令信

(1923年8月16日)

絕密
第 份

俄 共 中 央

致各省委、州委、边疆区委、
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的指令信 第30号
(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请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某些组织在反宗教宣传以至对教徒及其崇拜的态度方面所犯的一系列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党纲指出：“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伤害他们的感情只会加强狂热的宗教情绪。”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宗教鼓动宣传的决议断定，“中央和各地经常采取的蓄意粗暴的手段，对信仰和崇拜物不认真分析和解释而肆意嘲弄，都不会加快劳动群众摆脱宗教偏见，反而阻碍了这一进程”。

可是我们地方组织的有些人一贯违反党纲和党代表大会这些明确的指示……

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例子非常明确地表明党的某些地方组织和地方政权机关对宗教信仰自由这样重大问题很不谨慎，很不严肃，轻举妄动。这些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看来不懂得他们对占居民中绝大多数的教徒粗暴而没有分寸的行为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极大危害，有断送党在瓦解教会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利于反革命的危险。

中央委员会因此决定：

（1）禁止以不执行关于登记的行政命令为由关闭教堂和祈祷场所——如果已关闭则立即撤销此类命令；

（2）禁止通过有非教徒或与签订房屋租约的教徒无关人员参加的大会投票表决来取缔祈祷场所；

（3）禁止因未纳税而取缔祈祷场所，因为此类取缔与1918年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第二项不十分相符；

（4）禁止“宗教性质”的逮捕，因为此类逮捕与“教会人士”和教徒的公然反革命行为无关；

（5）在把场所交宗教团体使用并确定租金时应严格遵守1923年3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6）告诉党员，我们在瓦解教会和根除宗教偏见方面的成绩不取决于对教徒的迫害（迫害只能加强宗教偏见），而取决于对教徒合乎分寸的态度，要耐心地、周密地批评宗教偏见，要认真地从历史上来说明上帝、崇拜和宗教等思想；

（7）本指令由各省委、州委、州常务局、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边疆区委亲自负责贯彻。

中央同时提醒，对教会和教徒持这样的态度，绝不应削弱我们各级组织的警惕性，即仔细监督、不让教会和宗教团体将宗教变成反革命的工具。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6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62-63页

应保护教堂一类古建筑文物

(1933年9月12日)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

1933年9月12日

第 1037/9 号

绝密

致维·鲁·明仁斯基同志

在 1920 至 1930 年间在莫斯科及其相邻地区完全拆毁了 150 个教堂。在剩下的教堂中有 300 个改为工厂车间、俱乐部、集体宿舍、监狱、隔离所及少年和流浪儿教养院。

建筑设计预计要拆除 500 多座剩下的教堂建筑。

中央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认为不能通过破坏教堂规划来设计建筑，应把这些教堂看作是古俄罗斯建筑文物。

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农民警机关应采取措施（直至追究党纪法纪责任）保护古俄罗斯建筑文物。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67-68页

关于如何对待宗教和教徒问题的决议

(1939年11月11日)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

第 1697/13 号
绝密

致拉·巴·贝利亚同志

摘自 1939 年 11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98 号记录

1939年11月11日决议

宗教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宗教问题、俄罗斯正教人士及正教徒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

(1) 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俄罗斯正教会人士、迫害教徒的做法今后不再合适，

(2) 撤销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 1919 年 5 月 1 日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第 13666-2 号《关于同神父和宗教作斗争》的指示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切涉及迫害俄罗斯正教人士和正教徒的相应指示。

(3)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检查因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案件被捕和判刑的公民的问题。释放由于上述原因被判刑的公民或代之以不剥夺自由的处罚，只要这些公民的活动不曾给苏维埃政权带来危害。

(4) 关于对在押的或入狱的其他信仰的信徒处理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另作决定。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68-69页

宣传阵地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操之过急了

——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列宁同志^①：

我们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是由于误会，或许是由于轻率。

(1) “党要组建一个由185人组成的鼓动部”这一说法不确切。根据我的核实和组织局应予批准的编制，不应是185人，而是106人，其中58人为少数民族；

(2) 关于除少数民族外的87人“将起破坏作用”等等的说法没有根据。另外，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制，剩下的也不应是87人，而是48人，将分别从事鼓动、宣传和出版工作。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看过索洛维约夫^②同志的草案（这个草案我还没有看过，也没有得到组织局的批准）后便决定“组建新的委员部”。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操之过急了。

(3) 48人中，将有6人在鼓动宣传部中央机关工作，分别担任部长、副部长和技术性工作，6人在宣传局工作，从事技术性工作和

① 据列宁年谱记载，1921年11月“不迟于24日”，列宁审阅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克鲁普斯卡娅1921年11月24日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的副本。信中提出了分清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职责的建议，并附了关于鼓动宣传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之间关系的条例草案。随后列宁把自己的意见寄给政治局并斯大林，时间不晚于11月26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这封回信。

② 索洛维约夫，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

领导工作的人员比例同上，11人在省出版局及《鼓动者通报》和《中央委员会通报》^①编辑部、图书馆工作，负责分发专供省委会阅读的书刊。其余的58人将分别在8个少数民族局工作，负责管理的党员不下3万人，其中包括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鞑靼人等，这些人已不在本共和国内，且俄语极差或根本不会讲俄语。这就是那个连“见多识广的”卢那察尔斯基都感到畏惧的“新委员部”（应当说，我已将少数民族人数缩减了整整一半，因此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的总数不是增加了，而是比过去减少了）。

（4）根据我近日读过的、组织局应予批准的鼓动宣传部“条例”，鼓动宣传部将负责1）领导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搜集并总结其工作经验，2）监督各苏维埃机构和工会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挤垮”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问题的实质在于，不能把鼓动宣传部的工作仅限于向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派遣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为总结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和领导其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将会因此而被忽略。这是极其有害的。

产生误会的根源在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看到了经组织局有关委员会原则通过的“条例”（草案），而我没有看到，组织局也没有批准，星期一才能批准。克鲁普斯卡娅又操之过急了。

（5）按我的理解。您今天往政治局给我写信，是要我退出鼓动宣传部。您应当清楚，鼓动宣传部的工作并不是我主动要求干的，而是安排我干的。因此我是不会反对离开鼓动宣传部的。但如果您恰恰

① 《鼓动者通报》是1920年由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出版的不定期出版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也由鼓动宣传部出版，创刊于1919年4月，开始为不定期出版物，后改为周报，

②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11月12日，行政上受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克鲁普斯卡娅曾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目前这个时候，由于存在上述误会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会使您本人和我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则会认为您这样做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您希望有人“做出牺牲”，我同意“做出牺牲”，但这样做不合适。

我以为，如果组织局把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和我，或许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吸收进委员会，那么一切误会都会在委员会中得到澄清并被消除，也许还会达成某种共识。在没有实施这一方案之前，不应向组织局提出这个问题。

约·斯大林

一篇反对销售白酒的杂文引起的风波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5日)

于莫斯科

季诺维也夫同志：

这是给您写的第一封信。关于各项决定的情况想必您已从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得知了。我们这里的一件新鲜事是辛克莱的涉及共和国现有全部产油区的“合营公司”方案。要是抓住这条大鱼就好了，但事情没有办成，而且看来也办不成了。这个可恶的家伙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我们的条件（见政治局会议记录）他又不接受。伏尔加河船队租让一事毫无结果，倒是我们的水运员工由于害怕租让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同意减员15%（这要感谢盖森先生！）

还有一个新闻。您大概知道，由于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那篇人所共知的反对销售白酒的杂文（登在《真理报》上），政治局建议《真理报》不要再就白酒问题进行辩论了^①。对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政治局寄来了一份声明，认为这项“**由中央委员会中一部分人（即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请求解除他在《真理报》的职务。同时他对索尔茨说：“这件事可能会导致分裂，一些同志看来正在为掀起又一场风波寻找‘适当的’借口。”我想，只好满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请求，使他从《真理报》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并成立一个“临时编辑小组”。请把此事告诉布哈林，让他高兴高兴（这下他可

^① 1923年7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伏特加，教堂，电影院》。当天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建议该报编辑部“不要再就售白酒的问题在《真理报》上刊登辩论文章”。

有帮手了)。这些事……

我们要派卡拉汉去北京。李维诺夫近日就要休假。他依然同契切林不和。契切林威胁要用自杀来了结问题。

党内的情况依然过得去。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3人（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和我），其他人都分散在外。要是日内李可夫还不从克里木回来，政治局就不足法定人数了。

请代我吻布哈什卡^①的鼻子。

就此搁笔

约·斯大林

① 布哈什卡，布哈林的绰号。

《真理报》任命了临时编委会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7日)

于莫斯科

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今天得知，德国的同志取消了他们原先要搞游行的决定，只举行一些秘密集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这些怪人，想游行穿过柏林去兵营。硬要同白卫军官较劲。无法与七月事变^①相比。七月事变时我们有苏维埃，有整个整个的团队，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士气低落。而这些条件现在德国人都不具备，除了看来已经冲昏他们头脑的五金工会选举的胜利。谢天谢地，事情总算顺利地了结了。

我在第一封信中忘了告诉您，我们决定签署海峡公约^②。我想，这是惟一可行的决定，已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

今天已做出调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决定，任命了一个由拉狄克、布勃诺夫、利亚多夫、大概还有索尔茨组成的临时编委会，它将一直工作到布哈林回来为止，而以后的事再说。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指1917年7月时俄国发生的政治危机。

② 1922—1923年间举行的洛桑会议讨论了关于签订黑海海峡公约的问题，公约草案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并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商船或军舰自由通过。

该结束这种荒唐的局面了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7月29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中央政治局星期一会议

我坚决反对在政治局对沙茨金^①的文章提出批评后没过几天，又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与该文相似的斯滕^②的文章（见《共青团真理报》第169号）^③。这样做或许是《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在干蠢事，或许是对党中央的公开挑战^④。斯滕认为，共青团员（包括党员）服从党的总路线是在“照章办事”，这种观点等于号召修改党的总路线，破坏党的铁的纪律，把党变成争论俱乐部。我们的任何一个反对派集团都正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反党活动的。托洛茨基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是由此开始的。布哈林也为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还有沙茨金、阿韦尔巴赫、斯滕、洛米纳泽集团，他们要求（实质上）拥有修改党的总路线的自由，削弱党的

① 沙茨金，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委。

② 斯滕，1914年入党，1924-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处长，1927-1928年任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③ 斯滕的文章题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大旗》。

④ 沙茨金的文章《打倒党内的庸俗作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6月18日）受到政治局7月22日决议的谴责，而沙茨金本人被解除《真理报》编委的职务。7月23日政治局建议《共青团真理报》编委会发表文章，阐述沙茨金文章的错误，而共青团中央常务局则讨论加强编辑部的措施。

纪律的自由，把党变成争论俱乐部的自由。为此沙茨金、斯滕集团正努力使《共青团真理报》成为（如果还没有成为）自己的战斗机关报。为了这一目的，这个集团也在努力将《青年近卫军》杂志变成自己的理论刊物。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让《共青团真理报》与《真理报》相对抗，让《青年近卫军》杂志与《布尔什维克》杂志相对抗。该结束这种荒唐的局面了。该整治和控制一下这个集团了，因为它正在，或者说已经从列宁主义的立场滑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托洛茨基的）激进主义立场上。应当采取行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这些年轻的同志并为党保住他们。

应当：

（1）立即改组《共青团真理报》和《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部，由党内受过考验的同志主持其工作。^①

（2）对沙茨金、斯滕、阿韦尔巴赫、洛米纳泽集团思想上的动摇不定提出尖锐的批评。^②

（3）指出，斯列普科夫之流^③和沙茨金之流是一路货色。

我认为，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好。晚了就会把事情搞糟，而且会使党因此失去一批将来也许能成为宝贵干部的年轻同志。晚了将意味着纵容这批误入歧途的年轻同志分化和腐化我们光荣的革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约·斯大林

1929年7月29日

① 1929年8月15日政治局批准了《共青团真理报》新的编委会。

② 1929年8月8日政治局批准共青团中央关于《共青团真理报》的决议。建议《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文章，阐述与斯滕和沙茨金的文章中的错误有关的问题。

③ 指支持布哈林观点的一些青年理论家，斯列普科夫是其代表。

你们的建议是错误的

——致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9年9月13日）

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你们关于自我批评的密码电报收到了。你们的建议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各级党组织就有可能将中央的专门决定和莫洛托夫的发言理解为（一定会理解为！）一种向后倒退的新方针，即号召“在自我批评方面向后倒退”，自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必将破坏中央（及莫洛托夫）在优秀党员中的威信，从而有利于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

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对列宁格勒领导人（即反对基洛夫、科马罗夫^①）的文章（特别是文章的形式）是个大错误。有人（即党的敌人）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列宁格勒的上层领导不愿改正缺点（毫无根据！），抵制自我批评，不接受这种形式（毫无根据！）而《真理报》的糊涂虫们竟相信了。于是他们为了博得党的敌人的欢心而“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忘记了，列宁格勒组织不是索契或者阿斯特拉罕或者巴库组织。他们忘记了，攻击作为中央的可靠支柱的列宁格勒组织的上层领导就是攻击中央的心脏……中央的失误就在于一时放松了对《真理报》编委会常务委员会的控制，忽略了在常务委员会中还有一位具有目光短浅这一特长的、抵制自我批评的干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① 科马罗夫，1909年入党，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1921、1923-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共青团真理报》及各地方刊物中。中央书记处应当**重新掌舵**，应当对《真理报》及《共青团真理报》实行监督，应当**改变**这些报刊上自我批评的调子和精神，这样一切才会步入正轨。

祝一切顺利！

握你们的手！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13日

《真理报》编辑部情况不妙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2月25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你的第一封来信当然早已收到。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不给你回信。你当然有权这样做。可是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忙得不可开交，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真是这样）。总之，我会及时给你回信的。

(1) 《真理报》编辑部情况不妙。好像那里的一切都被科瓦廖夫^①和瑙莫夫（两人过去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及几个工作人员（机关人员）所控制。波波夫^②已被科瓦廖夫拉了过去。而克鲁敏^③仍然在“随波逐流”。或许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忍上一段时间，但问题在于科瓦廖夫为人“愚昧”、“古怪”，不完全是我们的人（据说他对季诺维也夫分子有好感）。施略普尼柯夫的文章没卡住登出去了^④；再早些时候弗鲁姆金的文章也放出笼了；而现在又是瑙莫夫的文章！他们还打算让皮达可夫最近的一篇文章出笼，幸亏我和卡冈诺维奇及时抓住了这件事并及时（在深夜）对皮达可夫的文章中某些“含糊”之处作了修改。今天我们将处理施略普尼柯夫的问题。至于弗鲁姆金，这

① 科瓦廖夫，《真理报》党务部主任，1929年6月起为该报编委，1929年7月当选《真理报》党支部书记。

② 波波夫，1922-1932年任《真理报》编委。

③ 克鲁敏，1928年起任《真理报》编委。

④ 施略普尼柯夫的文章《拥护工业化——拥护社会主义》刊载在1929年12月16日的《真理报》上。

是很早以前的事，我认为可以等到有更合适的时机再求解决。恐怕得把科瓦廖夫一伙人解职……

(2) **关于军事问题**（工农检察院关于炮兵部的通知）近日内我们将根据陆军人民委员部**已采取**的关于消除缺口的措施通过一项**政治局决定**。我们认为这件事用不着过分宣扬。决定将以特别案卷渠道下达。

(3) 卡冈诺维奇答应促一促为米哈伊洛夫（列宁格勒人）这类人办培训班一事。

(4) （杰索夫、科马罗夫）反对基洛夫的坏事反而有助于加快肃清列宁格勒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分子。真是有祸必有福！据目击者说，列宁格勒州委痛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这是事实！在这件事上科马罗夫的官僚主义、中央的威信以及看来基洛夫最近一段时间在列宁格勒赢得的组织的极大尊敬都起了作用。科达茨基、阿列克谢耶夫、洛博夫、谢尔加宁（虽然不像其他人那样坚决）马上与杰索夫、科马罗夫划清了界线。列宁格勒人想**推举科达茨基当主席**。中央的这项决定也将以特别案件渠道下达。

(5) 中国问题想必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对中国的干预有点自讨没趣。

(6) 我们打算在近几天内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建设速度的决定，雅柯夫列夫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草案。我觉得这份草案不太合适。你手头大概也有一份。请电告你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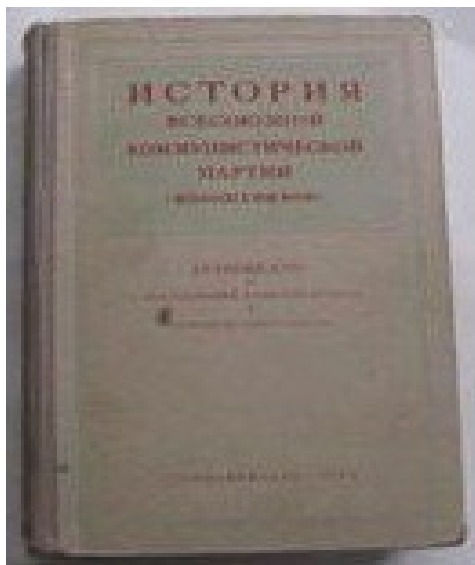
再说一遍：我答应按时写信。

紧握你的手！

约·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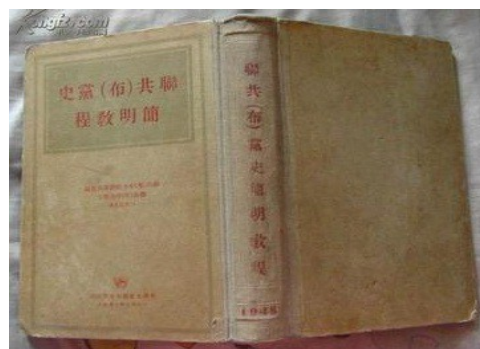
1929年12月25日

党史教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

(159)



中文版的几种译本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的发言^①

（1938年10月1日）

（速记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我原想，聚集在一起的同志们会帮助中央委员会并将提出一些重要批评意见。很遗憾，我应当指出，批评是轻描淡写的，不深刻的，而某些地方简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认真的批评会对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央委员会不是一切都能看到，也不能看到一切。你们在各地工作，你们从一个侧面见到一些事情，我们在上面——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而把上面的和下面的经验结合在一起那就好了。但是没有得到这种结合。你们走马看花地滑过去了。

一 关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批评意见^②

有人说，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太少——一些人在埋怨。这是对的。当然，谈得太少了。可以谈得更多一些。于是，据说，工人们在问：“为什么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这么少呢？”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乌拉尔人、巴库人或者哈尔科夫人，如果有的话，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关于我们的事情谈得这么少呢？”如果按照演说家

① 这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传员会议上讲授《党史》的发言，其节选已收入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5卷，这里刊载的是全文。

② 文中小标题是我们拟加的。——本书制作者注

在这里所叙述的那种宗旨来作判断，就应该满足一切人的要求，谈谈乌拉尔、谈谈莫斯科、谈谈列宁格勒、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他们有过非常伟大的业绩，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有过，谈谈罗斯托夫、谈谈巴库等等。这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不是联共（布）的党史，而是我国各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概况汇编。这是中央不想做的事情，因为这类概况汇编我们多得很。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简单汇编，而是需要党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总结的历史。

所以，从这方面批评简明教程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任务是什么。最容易不过的事就是，如增加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增加一些关于乌拉尔的情况，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了。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巴库，但这将成为贪多嚼不烂的事，这将是联共（布）的党史。

另一些人埋怨说：“譬如，关于农业问题方面谈得太少了，这是怎么回事？譬如，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都做出过一些决议，而在教科书中却丝毫也没有谈到”。中央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叙述我们党过去的农业方针，那末，应当全面地叙述农业问题的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曾要求把一小块土地归还给农民。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否具有代表性呢？这不具有代表性。这不能说明党的农业问题方针的全部状况。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过没收所有的公有土地的问题。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呢？不，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农业问题方面的政策实质在于，在把全部土地没收充公的情况下，宣布对所有一切的土地实行国有化。这个观点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明过。关于这一点在党史简明教程中作了说明。还需要什么，让人不理解。

有人说，关于民族问题谈得少了。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党的主要决议作了充分的叙述。你们还想要我们说些什么呢？要求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叙述列宁及我们党的其他理论家的文章的详细内容是不可
以的！依我看，这是多余的。

第三部分人埋怨说：他们说，丝毫也没有谈到我们党为党章第一
条款所作的斗争^①有什么国际影响。是的，好像，谈过？

喊声：谈过，谈过。

斯大林：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我们为党章第一款所作的斗争
对无产阶级国际运动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理解这一点。同志们，
这是胡言乱语。为争取这一条款所作的斗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革
命运动没有任何国际影响，没有任何的。他想说什么？他在那里？让
他来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曾为党章第一款进行了斗争，而西
方社会民主党左翼最优秀的人士反对过布尔什维克：罗莎·卢森堡^②、
巴甫洛夫^③反对过。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问
题上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把这种情况称为布尔
什维克争取党章第一款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不知道，
什么叫作不是影响？（笑声）。

至于谈到问题的本质，谈到我们党章第一款在我党的历史上的
意义，那末，依我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并无必要在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中作冗长的叙述。

① 指 190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3 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的第一条“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当
时列宁提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活动的人均可成
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则主张，只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而无需参加党的
一个组织便可称为党员，每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都能宣布自己为党员。当时
是马尔托夫的主张获得通过。

②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和波兰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
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代表之一。

③ 此人身份不详。

有人说，关于 1905 年革命对国际的影响问题谈得太少，或者丝毫没有谈到。很对。而且对 1917 年的革命的国际影响谈得更少。但如果研究我国三次革命对国际工人运动国际影响或国际作用，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成倍地扩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范围。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研究联共（布）党史的一些问题。所有现存的教程或是教科书中的缺陷中的一个通病是，他们想怎么教就随便怎么教，1905 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添枝加叶详细地叙述了好几页并丝毫不谈比 1905 年的革命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 1917 年十月革的国际影响。

为什么这样守旧，用老习惯把 1905 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提到首位，而丝毫不谈 1917 年革命的国际影响呢？这对还是不对呢？不，不对。一切都不成比例，不相称。

如果谈我们的所有的重大措施——我重复一遍，他们都具有国际影响，势必写出的不是联共（布）的历史，而是写的我们三次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历史。这倒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而第二，简明教程不能经常离开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党是怎样发展的这样的主题，而转到不是本题的其他实际理论方面去，去论述 1905 年革命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或 1917 年的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国际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埋怨说，关于共产国际大会谈得太少了或是丝毫没有谈到，多半是谈得太少了。我熟悉联共（布）党史方面的一些教科书，书中相当详细地说明共产国际大会的情况。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要么应当写联共（布）党史，要么写共产国际大会的历史。两者中写一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胡言乱语，这是“国际主义”，这是沿着树干四处漫流，当一个人失去目标时，他就开始向各种题目四处漫流。中央委员会，这样说吧，不能去仿效到处游荡、四处漫流的那些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的目的是希望让这本教程去说明联共（布）党的历史。你看这里提出的所有批评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太少，是轻描淡写、浮光掠影的批评。

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抱的目的是什么？中央委员会已了解，我们图书界有大批的简明的和非简明的各种教程、指南，搞出许多波波夫的、布勃诺夫的、克诺林的、因古洛夫^①的各种的政治常识教程。中央委员会知道，各类指南、教科书、政治常识教程、各类文选读本多得要命，这真把人弄糊涂了。党员同志们不知道，选择什么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没有任何一种教程、没有任何一种选读本或是政治常识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鉴定、签证，因而这更加把人们搞乱了。人们不清楚，买谁的更好，买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买波斯佩洛夫的，买克诺林的，买布勃诺夫的，或是买波波夫的，还是买随便什么人的。在教科书这样丰富的情况下，在观点上缺少实际上的统一，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鉴定。这一切造成了人们头脑中的紊乱现象，而且连我们党的干部们也不知道买哪种好，需要紧握住的指南针在那里，不声不响地认为，如果给我们一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或是波斯佩洛夫的教科书，这就意味着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但同时又怀疑了起来，有没有同意？的确，没有得到中委员会的任何同意。有人曾委托过写本教科书，而后来中央委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鉴定这本教科书，这可就不好了，这是一个错误。可以用工作负担过重对此加以解释。工作负担过重未能有机会从头至尾审阅那怕教科书中的一种并给予签证。情况就是如此。

怎样摆脱这种状况呢？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对联共（布）党史给予指导，并希望能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在学习这种指导的时候，希望党员和积极分子不要产生任何的怀疑，希望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在

① 均为当时的党史研究工作者。——本书制作者注

这方面能看到中央委员会向他们所推荐的东西。

那么首要的任务——从各式各样的、多种教科书、教程、选读、政治常识中，从这种混乱中进行挑选，我想说，要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对这种指导不会产生怀疑——这就是中央委员会所正式建议的：应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这是首要的任务。

对联共（布）党史的材料应当怎样讲述，应当怎样沿着批评此书的同志们给我们所指出的道路去叙述？当然，他们是为中央委员会好，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片紊乱，完全是一团糟。

问题不在于想要去描述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切事情，问题不在于想说很多的事情，想说一切事情，问题在于要使这本教科书，简明教程，或是随便叫什么名称，使其能包括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的关键问题，党的主要发展阶段。围绕这些问题，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能够说明这些阶段特点的一切主要的问题上。

二 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提纲

在我们党内有什么样的阶段呢？我认为，我们党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三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想称为：“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或是按照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开头的四章叙述了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要谈论某些事情的一切细节，问题在于在四章中对所叙述的一切事情要围绕主要的轴心，围绕着从1900年到1912年，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的一个阶段，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的阶段。应该这样去安排材料。

由此可以看清楚，为什么简明教程把重要的注意力转向列宁的这样一些书，如《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两种策略》、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好这四种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切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准备从政治团体组成独立政党的东西。由此拟订开头四章的计划。与这个计划比较，所有批评意见，如某段对民族问题的某些细节没有谈到，某段关于莫斯科谈得太少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是尘土。主要的问题在于，要让开头的四章指出一切本质的东西，并能说明布尔什维克为建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斗争的特点。这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以下三章：第五章，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到第四章结尾和第五、第六和第七章。^①

这个阶段，或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党成立了而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着，它在为开辟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而斗争着。我想为这个阶段加上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

所有的缺陷，如哪一点没有谈到，哪一点没有强调，——这一切都是琐碎小事，与说明党的两个阶段特点的那些主要事实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事实及引证应围绕这些重点。因此，一切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意见，都偏离了摆在简明教程面前的任务，即搜集事实并集中思想，使它们像聚光灯那样照耀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第三阶段——剩下的五章：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结束语。可以给这个阶段加上这样的标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是的，布尔什维克在执政。

这就是作者在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所遵循的提纲。

^① 原文如此。按本意应是：“第二阶段包括第四章的结尾，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和第五、第六、第七章”。

三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宗旨

所以，出版这本教科书时，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这是唯一一部经中央委员会核准的、手续完备的、具有中央委员会签证的、统一的教科书，这是统一的指导，希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对它要有信心，这不是波波夫，这也不是因古洛夫，而是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在于，要去消除近年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脱节的现象。你们要知道，我这里有一份为党的教育小组准备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学习计划，你们看，共有十一个专题。大概，大纲你们是知道的。第一个专题——讲座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二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第二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到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第三个时期——从俄国革命开始，等等；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形成和发展；列宁与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和继承人。

这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列宁奠定了基础。其余的一切谈的是列宁关于斯大林的书写了些什么^①，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那些标题丝毫不差，完全相同。这本

^① 原文如此。其本意应为：“关于列宁，斯大林的书中写了些什么”。

书叙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新的、特殊的贡献。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假如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极重要的部分带来任何新的贡献，我们就不会有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我不想说，斯大林在书中对一切都谈得非常详细。如果仔细地去读，不是2至3遍，而是10遍，15遍地读列宁全集，那末在那里可以发现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多得不可比拟的新思想、新方针、金钻石。但不管怎样，斯大林的书是试图叙述列宁带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主要的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或多或少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研究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就足够了。绝对没有的事。在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相比较的过程中叙述列宁提出的新东西是一回事，提出怎样研究列宁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当学习恩格斯的著作。列宁一向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他是正确的。当然，这不单是他谦虚，而是历史事实。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学习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或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其他政论著作，还要学习像《资本论》这类的主要著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认为，什么《资本论》？在苏联资本主义早已经完蛋了，是否还有必要花精力去研读《资本论》这部书。同志们，这是错误的。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有，并有论证。

凡是想研究列宁主义和想研究列宁的人，都应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西。列宁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的思想是因为，他肩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任。新的思想是好的，但是要知道，新思想所负的责任也是好的，这是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一切都是这样

一回事。同志们，不了解它们是不可能弄懂列宁主义的。而在我们的一些大纲中，大概地说，出现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现象。

因此，《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在于，要消除这种分离现象并把马克思提出的东西与列宁提出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第四章要完成这项任务，整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要完成这项任务。把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联系起来。史册所谈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个别草稿，如分散的、顺便说出的想法或是在来往书信中某处顺便说出的论点，这些思想怎样被列宁抓住并进一步发展了，而又用新的观点提出论证。这一切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尽可能地都提到了。

因此，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就在于堵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出现的缺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基础提出的东西与列宁继承发展了的东西之间的缺口。因此，要更好地、科学而更准确地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使作为列宁主义基础的旧东西与作为这些基础的继承和发展的新东西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第三个任务在于，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的历史时期中的作用。因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以讲授的方法在人所共知的前提基础上概括某些思想；但也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在并非杜撰而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从而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史数十年的时期内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就是说，第三个任务就在于要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授变得简捷，当然要简捷，不是按叙述某些前提和思想的演讲叙述方式进行教授，而是要在联共（布）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第二种方法——不是演讲的方法，而是历史

的方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你们是与事实打交道，你们能够查验大量的文献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判断列宁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当历史向我们提出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时，而它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这是一所学校，这是很大的考验。假如在几十年的时期内理论证明自身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它是有某些价值的。这就是第三个任务。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个任务在于，要在这本不太厚的书中证明、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表明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和意义。理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旧规律不够时去发现新规律的指南。这是很好的事情，请你们确实相信。而且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认真地去学习。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有很多人认为，理论——是很困难的事情，怎样才能掌握它呢？不对的。理论同一切知识一样——是完全可以获得的东西，要有掌握它的愿望，最主要的是，不要头一回遇到障碍就退却，不要躲避障碍，而要迎着它，克服它，而在不能迎着上的地方，就用迂回的办法来克服，那么理论也就为你们掌握了。

这样，要用历史事实来指明我们党的发展，指出理论的力量和意义。我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尤其令人信服地谈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们要想一想，假如列宁和列宁周围的那些人，他们人不多，假如他们在1917年4月没有提出从民主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方针^①，党就会迷失方向，在黑暗中徘徊。我还清楚地记

① 指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堡后，于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说，即著名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得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情况，——在黑暗中徘徊。结果列宁回来了，提出了新的方针，于是大家开始明确了：党把事业推向何处去，党知道它的目的何在？这不，我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讲清楚了。假如说没有四月提纲，没有党的这一新方针，没有新方针，革命就会遭到失败，我敢保证，苏维埃就会变成附属品，变成预备国会，围着这个不幸的民主共和国转，并会失去很多东西。你们瞧瞧，理论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善于发现新规律，假如新的规律不能很快被发现，那就提出路线，给个引导事业向何处去、确定打击目标为谁的照明灯。

或者，譬如，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吧，沙皇已被打倒了，克伦斯基及李沃夫雷总理也在摇摇欲坠。而下一步事业将向何处去，没人知道。大家都说，俄国还不发达，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好想的，这里哪有什么社会主义，上帝保佑，就维持民主共和国的状态吧。人们是这样说的，社会舆论也是这样的。你们想象一下，党也是这样指示方向的，俄国在政治方面不发达，文明程度也不高，——这儿哪有什么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有人曾这样说：你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上帝给你们的那些自由，暂时设法抓住并保持住。这也是普遍的风气。而伊里奇却闯进了这个泥潭并说：“不，不对。俄国已经成熟到了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他也正在证实这一点。如果没有列宁的这个小组及其着手这项事业的学生们从理论上提出根据，并不顾大家的反对，开始努力向前奋斗，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理论，先进理论给你们带来的力量和意义！中央委员会就是想以简明教程来向我们的干部证明，理论的力量是伟大的和无法估价的，证明没有它，没有理论，党势必有时在经验主义的黑暗中徘徊：今天指示你向这个角落走，向那边瞎闯，明天指示你向另一个角落走，像一条瞎眼的小狗向那边瞎闯，明天从背后把你拽回来，往回

走，这就是你的领导！这算什么领导？要领导就应当了解情况，要有预见，而为了善于预见，就要掌握理论，也就是说要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理论。

或者，譬如拿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怜的人——民粹派，当他们想把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活动的基础和支柱力量时，他们为什么会受挫？他们受挫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构成了大多数。为什么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或是如他们所说的无产者时忸怩作态？因为无产者人数很少，要手持蜡烛去寻找无产者。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解体，与农民相联系的那种生产形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有理论才能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社会上数量不多的少数无产阶级。抓住什么阶级作为依靠力量，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党的命运。民粹派的失败即在于此。

或者，譬如，他们希望在俄国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从农村，从村社开始，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发展最简单、最起码的规律，不懂得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在起领导作用，不懂得社会中的领导力量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不懂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要从城市开始。他们说，城市是毫无希望的事情，说城市——是又脏又乱的地方，而农村——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是村社。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决定着农村的命运。

这就给你们指出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民粹派——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另一种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掌握了理论、懂得历史发展规律，推行一条能取得成绩的正确路线。那就是说，第四个任务：要在这本最简明的教程中证明理论的力量和意义，以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尤其要去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牢记住。这不是什么困难和大不了的事情。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可以十分容易、心安理得地去掌握它。不要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顶聪明。

他们也是如你们一样的非常普通的人，懂得的东西比你们还少，读的书也比你们少。现在给了你们非常丰富的书，在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们当时弄不到书，我们也见不到书。我记得，在1898年梯弗里斯，为了租《资本论》第一卷来阅读，我们，这些穷光蛋，每人5戈比，将近100人，凑够了25卢布，将《资本论》租来看了两星期并把它抄下。而你们现在手头上有各种书。权力是你们的，出版是你们的，所有的书也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会很容易地就掌握理论。好吧，而如果不想去掌握——那是你们的事。

第五点，中央委员会出版简明教程，任务是为了使我们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们的领导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避免简单化，避免对某些原理的庸俗化，避免低级趣味。

例如，常常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描写成仅仅是护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要进攻，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他们反对战争”。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归结为这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不对，不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懂得各种战争之间的区别并完全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开始进攻。我们还记得列宁在《论欧洲联邦》^①的著名文章中所说的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了政权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之后，形势将迫使其对其余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征讨，以便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应当对布尔什维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切精微处，一切细微差别、方针说明清楚，说明布尔什维克不单纯是为和平而伤感的和平主义者，仅在有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的。这不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形势比较合适，如果条件有利，布

^① 原文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

尔什维克也将主动进攻,他们将主动开始攻击。他们完全不反对进攻,不是反对任何的战争。我们现在大声呼吁防御——这是面纱,面纱。所有的国家都在掩饰。“与狼生活在一起,就不得不学狼嗥”。(笑声)敞开心扉地坦白是十分愚蠢的。人家会说,你们是大傻瓜。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有点儿被庸俗化了。有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已经夺取政权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没有考虑另一面,即社会主义很快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不仅教导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落后,一些国家刚开始起跑,但列宁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些国家落后,另一些在起跑,一些在作战,另一些在搔痒,同时进行打击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与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相对立。可不知什么原因,这第二句话人们通常避而不谈。什么是发展不平衡?如果说所有国家都平衡发展的话,可以说,进行打击时所有的国家也都同时成熟,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说,同时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列宁曾说过:“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天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了,明天另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落在后面的其余国家逐一在赶过去,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在发展,一些国家落后了,另一些又跑到了前面。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成熟的程度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可能同时取得胜利。这是傻话。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方面人们避而不谈,而仅谈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这没有充分地表达列宁的观点。应当对这一点说清楚。一些问题普及的过程中被简单化了。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教科书、政治常识、各种文选中简单化导致了庸俗化、低级趣味。

或者,譬如,关于抵制杜马的问题。所有的教科书都对读者避而不谈在抵制第一届杜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结果在这里进行

了掩饰，而这有什么好掩饰的？抵制还处在妊娠中的布里根杜马，抵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埋葬了它，在全俄罢工的情况下没有让布里根杜马诞生。

而后来的维特杜马，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召集的杜马，我们也对它进行了抵制；在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决定抵制。所有的教科书都隐瞒这件事是不对的。列宁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错误不大，可以很快纠正这个错误，也很快地纠正了，但这总归是个错误。

而你们是怎么想的，历史可以修改吗？历史应当是与事实相符的，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丝毫不能增补。我们这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评论50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这怎么可能呢？

在圣弗拉基米尔^①时代宗教起过积极作用，当时是多神教，而接受基督教还是后来的步骤。现在我们的哲人身处20世纪，他们从新形势的观点出发，说弗拉基米尔是下流的东西，多神教徒是下流的东西，而宗教也是下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辩证地评价所发生的事件。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时间、地点。

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历史既不能往好改，也不能往坏改，根本不能有丝毫的增补，它是怎么发展的，就应当怎么叙述，不能有丝毫增补。比如在抵制第一届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并应该去纠正，这要不容争辩地去纠正。

或者，譬如，有人把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庸俗化了，他们说，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基础，上层建筑算什么，它有什么

^① 圣弗拉基米尔，即弗拉基米尔（960—1015），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980—1015）。他在基辅确立了统治地位后，立即将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众多神祇的偶像树立起来，顶礼膜拜，企图以此加强和巩固罗斯国家的统一。

么作用，它的作用是不值一提的，他们把这庸俗化了并陷进了低级趣味的泥潭。而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对此作了强调。列宁是专门深入研究先进思想作用问题、并发展了社会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组织人们、动员并引导他们将旧社会改造成为新社会。新思想是在经济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新思想，对行为的改造、对革命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新的思想如同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必须的，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这被庸俗化了。在这被简单化后，社会理论的积极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滑到了经济唯物主的或者低级趣味的唯物主义路线上去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丝毫共同之处。——这是简明教程的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要清洗脑筋，以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袭，使其不被低级趣味化。

于是，第六个任务是提供这种统一的教科书或是统一的教程，要使书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或多或少地集中起来，因为这将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宣传质量。

对我们，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十分清楚，宣传质量大家不很关心，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数量上，希望网点能多些，希望小组多一些，办公室大一些，想炫耀一下：瞧我们这里小组有好几千了，而你们那里有多少？没那么多，就是说，你们的事情没有办好。完全有可能，哪儿少，哪儿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这样一来，出版这本简明教程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从数量强度转向广度，转向质量，转向提高宣传质量。中央委员会出版这本简明教程，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宗旨。

四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理论上。你们这些宣传员坐在这里，当然，你们感觉到，在学习时或是在学这本教程时，好钻研的人会来向你们请教许多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们没有谈这些问题。你们会说，因为在教程中没有叙说这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那样一些问题？你们会说，当然，有这些问题。在课堂讨论中，在小组里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向你们请教。你们不但不把问题提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避开这些问题。你们愿意躲起来，而我尽量设法把你们拽出水面来。（笑声）

以恩格斯为例子。在简明教程中是这样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及社会政治、社会意识的发展。讲述这一点不受任何时期的限制。而有人就会来问你们：“对不起，恩格斯不是那样说的，而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

宣传员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这一点对还是不对？我认为，这不对。在任何条件下社会形态往往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往往如此。恩格斯引证了群婚，引证了母权制。但母权制本身也是繁衍来的（正如现在大量的材料对此所作的阐释一样），即在当时，男子去打猎，而打猎不是获得食物的经常性源泉，妇女从事原始的农业，栽种作物，从鸟巢里取蛋，取鸟雏，驯养禽类。当男子打死扁角鹿后，把活着的鹿的幼子留下，妇女们将这些鹿的幼子拿去驯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6。

养，这样，妇女就成了奠定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基础的第一个群体——即简单地驯养禽类和动物。她们（妇女们）或多或少地有了些经常的食物储备。事实说明了什么？男子打猎归来，什么也没有猎获到，向女人乞讨：“给点吃的吧！”——“没有什么吃的，再回去，去打猎”。而男子便坐下来像小孩子一样地哭泣，因为是野人，不太像人，他们央求，哭泣，要吃的。这就是母权制所建立的基础。

在从原始的农业转向畜牧的生活方式之后，妇权（母权制）也就失去了意义，家庭也变化了。

恩格斯试图把家庭形式和生产形式作为两种起同等作用的因素相提并论，存在着推翻这种试图的事实。马克思从来不赞同这种观点，从来不。顺便提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作过任何一点儿暗示，无论是注释中还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他们是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家庭》的呢？伊里奇在其《人民之友》一书中说“大概这属于非常远古的时期，人和猿猴还不能区别开的时候”。别尔托夫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怎么，你们在挖苦我们？”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也挖苦过我们——他说，“你们说什么？时而是生产方式决定，时而是家庭决定？你要明白，忽而这个，忽而那个，将会有什么结果”。普列汉诺夫也不承认，并说这应当从下述观点来理解，即从这属于什么时期，也就是说从属于那个当时连人与猿猴都不能区别开来的时期来理解。试问，难道我们在研究猿猴，而不是在研究人？这种理论是属于猿猴还是属于人类社会？如果理论是属于类人猿时期的，那么就给猿人留下吧。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在其中处处都是基本因素。

血缘氏族，氏族公社。什么是血缘氏族？对它是如何定义的？就拿家庭为例来说：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是贫穷的，食品缺乏，而人在繁衍，家庭就要分成若干个单位，一批人就应当从家庭中分出来。

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上，还行吗？不，当然不行。生产资料不允许一家的人太多。于是就产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萌芽。结果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血缘氏族，而是那种辅助力量，即生产工具状况，生产工具状况为在该领域内拥有达到一定范围的大的氏族公社提供了可能，而后来当它无法维持大的公社生活时，这些公社就解体了，由两个分成了四个，血缘氏族就渐渐消失了。

依我看来，这是冒险的事，它不完全符合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儿所学的东西，应当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起同等作用的两种基本因素：家庭和生产方式，只有一种形式，即生产方式，它决定了社会形态、家庭形态和婚姻形态。

我不知道，难道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问过吗？没有问过是不可能的！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处都写着：“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而在这里“在一定历史时代和某个国家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或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这是什么样的胡说八道？这不对。如果要我提建议，那么我建议你们，如果人们向你们请教的话，他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在简明教程中说的是一回事，这里说的又是另一回事”。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不对。我们的理论家不是那样处理的。例如，以米丁^①同志为例。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第2卷。米京同志，他在这里吧？

喊声：在这里。

斯大林：他引用了这句引文，但很巧妙，巧妙地引用（笑声）。他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样的引文：“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

^① 米丁（1901—1987），苏联哲学家，1939年起为院士。——本书制作者注

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这些。什么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没有说明并对读者暗示，这反正都一样，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余的一切他都撇开了。为什么不适用的一一（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他都撇开了。依我看来，这里不必使用巧妙的办法，也没有必要断章取义，虽说这引文是恩格斯于1884年提出的，当时马克思已不在人世——最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诚实地说：“依我们之见，这是对的”，或是说，“依我们之见，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钻研的人会向你们提出来的，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不管怎样都要明确地回答——或是，或不是。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的问题。经常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国家就要消亡。为什么它不消亡？该消亡了，20年都过去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而你们还不想消亡（笑声）。

真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消亡？这个问题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我给你们读一读恩格斯的某些原理，而且不仅是恩格斯一人，而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那种论点，我所读的也是很多人所遵循的论点。

这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这里国家为什么不消亡，它什么时候最后消亡。你们熟悉关于国家的理论。你们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抗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工具，国家是秩序、是保障，是多数服从少数。如果阶级和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也得存在。当敌对的阶级消亡了，国家就该消亡了。这是你们所熟知的普遍原理。

以此为根据，恩格斯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

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国家形式上是社会代表，而实际上仍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在粉碎资产阶级和出现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国家第一次能够在实际上代表社会说话。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这将是这个国家政权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到那时，国家政权对这方面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国家就逐渐自行消亡。到那时，对物的分配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取代政府对人的统治。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逐渐自行消亡的。这就是说，当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在整个历史上取得所有权时，它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这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

这也将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在这以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我们在1918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行动。但为什么国家还不消亡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是，例如，有这样一句话：“国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个祸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又能是什么？），它以继承的方法传给了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像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刻消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一直到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后才能抛弃国家组织这个废物”^②。

对这个问题人们是如何看待呢？这一切是否都正确？资产阶级被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72。

推翻了，它的政权被摧毁了，按照我们的理论被打碎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政权不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旧的国家机器被毁坏了，旧的国家机器由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取代。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在此之后它的作用开始失去效力，逐渐消亡。这正确吗？据我看，这是正确的，但仅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假如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的国家，至少是在大部分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假如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周围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那时，大概国家政权就不需要了，它应该消亡。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那时该怎么办？这一理论对这种情况是否适用？不适用。20年来我们的全部实践，我们的全部工作——它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毫无疑问，——这一点正得到证实。须知理论是怎样发展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怎样产生？在实践中，或是在实验室，或是在群众的实践中。社会也是实验室。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实践常常发出信号说，某种理论不完全适用，说这种理论是有害的，像巴巴宁^③报告所说的那样，有关北极的理论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请作些修改。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理论与实践要相联系。理论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斗争过程中的实践又在不断得出理论应该注意的新的经验。

在1905年以及后来1917年2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我国出现之

② 该引文出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文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4。——本书制作者注

③ 巴巴宁（1894—1986），苏联第一个漂流站——“北极”第一研究站的站长，苏联英雄（1937、1940），第一、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前，经验证明，民主共和国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法国、德国等国革命基础上产生的，那里的民主制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但是革命运动，即实践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代表苏维埃。当然，彼得格勒的工人，当他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在按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理论进行大变革。他们不过是想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帮助下实行自卫以抵抗沙皇。1917年2月，当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后，其倡议者也没有料到，能由此搞出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过是想有个可依靠的特殊据点，以便打击敌人。但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组织，而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支撑点。这就是实践，这就是革命运动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如何指导着这个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来，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或者他们不顾外部条件地去发动革命——是实验室式的。这样说吧，这是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在科学中存在，使一种现象与周围现存的一切相脱离：离开空气，离开水等等，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来研究它，以便研究这一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因素，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国际因素，按照这种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可以完全正确地阐述，国家不是从外部带来的，而是在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在存在阶级社会的地方从内部产生的。而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规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即如果国家政权，或是有政治权力的该国家，没有摆脱国际因素怎么办，因为被罩在玻璃罩里、不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的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假如在按实验室的方式研究了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之后，我们就提出对事情产生影响的国际因素问题，那么，情况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会得出另外一些结论。

他们用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能的，因此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我对国际形势不感兴趣，有包围或是没有包围，这与我无关。作为学者，我研究国家政权，它是在阶级社会中

产生的，如果阶级社会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就不应该有政权。我作为学者，不准备去考虑国际上的包围），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它不是始终适用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随便丢开什么都可以，而在现实中你不能丢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包围着你。我想对这种形式的不完备性加以解释。或是这样，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如果所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那么这将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而且他们当时不容许无产阶级政权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历史经验和形势都表明，应当容许有这样一种意外情况，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所有国家而是仅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且它没有被击溃，相反，获得了巩固，存在着，并想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提出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个政权本身也存在着，它在巩固，在加强，社会主义在建设着等等，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局限于对问题的现有提法，而应该继续前进，可以说，应对问题做出另一种提法：如果无产阶级政权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国家它还未获胜利，那该怎么办？而在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周围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又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消亡还是不消亡？如果这样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大概会说：“不消亡，不应该消亡”。但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于是他们自己可能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而历史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存在了20年。

尽管马克思写完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巴黎执政两个月的一本书^①，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并看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存在了20年，那他就会写出非常有价值的新书，会找到我们没有见到的、而他也是很晚才发现的新真理。

① 指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

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提法。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实验室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我们应予以尊重。

以实验室的方式来研究政权内部发展规律的方法是正确的，是非常好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在弄清某些问题时，是比较好的方法，而当你转入实际生活时，这里实验室不能避开任何现象，既避不开空气，也避不开气候。你们并没有罩在玻璃罩中。这里既有周围各国人民，也有周围的各个国家，应该考虑到他们。

假设说，如果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存在，它也就应该在其他国家存在。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即政权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要在所有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从而可以这样说，国家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然后它自行消失。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问题的提法是，现在的情况不同。如果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也不是在大部分的国家，而是仅在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而除了这个政权之外，形成了憎恨社会主义国家、并找机会进行破坏的资本主义的包围，那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是消亡呢，还是不消亡？这里应当回答说，不消亡。即使各地将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那样快消亡。真的，假如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我们这里都发生了革命，那时我们就需要常备军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什么叫常备军？它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我们将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对军队提供补给，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动用国内的一切资金来进行防御。这就是国家所创造的一切要素。

我想，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它经历了两个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它还是阶级的政权时，它与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一致的，因为其目的就是镇压反抗。但是也有不同之点，即以往的一切国家政权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镇压，

而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劳动居民对不劳动的剥削阶级的少数人进行镇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国家不仅仅是进行镇压，如果拿1918、1919、1920、1925、1930、1934这些年代来说，在消灭敌对阶级之前，国家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职能，捍卫职能，保护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还有第三个职能即接管公有化的生产资料，调整自身的生产，进行有组织经济援助）。而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国家政权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少数人利益的政权，它们也有保卫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在进行自卫以免外部敌人侵犯之时，它们同时也行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

在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政权。它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职能，在这方面它和其他所有的阶级政权是一样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镇压之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所有阶级的政权的区别性原则在于。它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镇压剥削者，而不是镇压被剥削者，——这是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经济组织的职能。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组织任务。第三个职能是保卫生命、财产和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就这三种职能。这是第一阶段——在消灭了阶级，政权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我不想说，现在是阶级政权，说这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不是白白地使用劳动人民苏维埃这个称呼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镇压的职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阶级已被消灭，也就是说构成阶级政权典型特点的这种镇压的职能在消失。也就是说，这种职能残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在这里其职能已不是要对付什么阶级的反抗，而是要去对付个别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反抗，只要有惩罚机关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军队来对付，有些规模不大的惩罚机关就足够了，这些惩罚机关能够消灭恐怖分子

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镇压一些个别人。就是说，镇压的职能在我们政权内部，它的确是已无必要了，但是经济领导的职能却相当大地增长了。这里也不需要镇压。这里需要有组织的工作，任何镇压都不需要，经济领导也不需要任何的部队，甚至连惩罚机构也不需要，镇压职能也就失去意义，但破坏分子中有人受惩罚被擒获，这种情况除外。

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恩格斯说：“政权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那么，好吧，阶级在内部消灭了，而在外面却留了下来。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而那里有还想与我们作战的资本家，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阶级还没有被消灭。

我想以恩格斯的先决条件作为依据。既然没有敌对的阶级了，就不需要国家政权了。这是在国家内部，而假如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敌对的阶级呢？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国家政权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把恩格斯的属于内部阶级制度的观点挪到国际领域去，那就会发现，在那里阶级没有被消灭，我们没有脱离开世界，剥削者依旧在那里逞威作福，而我们这里是劳动人民，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大概，政权还是需要的。

只要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敌对状态的阶级还存在，也就需要这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及国家领土的职能就要不断发展，目的是，譬如说，镇压某些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及他们的残余，不需要军队，——这是第一种职能的事，镇压的职能，这种职能逐渐在消亡，我也许会说，它已经消亡。

就经济领导的第二种职能来看，进行管理，甚至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机关。而要履行第三种职能——防御的职能，保卫受到致命威胁的生命、财产及我们国家的领土，这里非要有军队来履行这种职能不可。

什么是军队？这里说的可不是民警机关，有人报警，工人来厂，拿起步枪，去进行战斗，这不会有结果的。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国家一定要有高技能的军队。问题不在于，拿起步枪就可以结束一切，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空军，多种多样的空军，各兵种部队，需要有炮兵，有炮兵的各兵种，需要坦克，需要化学武器和反化学武器，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人材不是很快就能训练出来的，这里需要经验，需要常备军。在民警制度的基础上，在民兵制度的基础上，不能组织任何的防御，不能组织任何对生命、对国家领土的保卫。一定要有常备的、训练有素的、具有高技能的、在各个方面造诣很深的军队。这种军队将要有第一流的空军、化学、坦克、炮兵、工程师、技术员，因为这里是技术决定着一切。

而如果有军队，那么，军队的存在就需要经费来供养军队，就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需要国家机关，需要官员，但不是那样的官员，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选举中产生的，今天选出了，明天又赶走了。需要那种非常有经验的官员，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一点，对军队的任何供给，军队的任何防御都是不可能的。这里也需要普通的工作人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既然军队将存在，国家、国家机关、政权机关也将存在，它要粉碎敌人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击。既然有军队，那么，也要有侦察机关，有反侦察机关，就是说，国内的肃反机关也得加强，因为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是在睡大觉，他们时常暗中向我们派新的人员来摸情况，看看在我们这里可干些什么事，能不能炸毁些什么，毁坏些什么。就是在党内也有这样一些人，是有的，是有的，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为了暗派人员，收买和贿赂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已肃清了一切。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人就将继续存在。这就是同家政权机关存在的依据。因此，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何苦你们坐着20年而不想消亡呢？”你们对他们说：“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社会主义在

各国都取得了胜利的话，我们早就消亡了，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只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周围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军队，为了军队需要有国家机关，需要国家政权，它不能消亡，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它”，非得要给这样的回答。这一点你们同意或是不同意，而如果要按照马克思或是恩格斯对此所做出的那种回答行事，我们早就应该关门了（笑声）。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想停业（笑声）……而相反，想要继续生活下去。击退敌人，甚至粉碎他们，那么国家政权一定要存在，并一定要加强，无可争辩地应当加强。

有求知精神的人在小组里和在课堂讨论中还会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有求知精神的人你们那里是否很多，我不知道，但在你们那里大概总会有的。例如，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生产资料，一会儿生产力，一会儿生产方式，一会儿又是生产工具？请你告诉我，在你们那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接生活的生产，直接生活的再生产，这是怎么定义的，请明确的告诉我们，能不能将这些术语条理化？”混乱不堪的情况，往往使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混淆在一起，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混淆在一起，总的来说，这里是一团糟。因而旧时代敌人嘲笑我们说：“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你们自己都谁也没有搞清楚，分不清哪儿是主要的，哪儿不是主要的”。因此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想对一些术语做出某种精确的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应当做出规定。例如，米丁同志引证马克思的话。依我看来，要善于引证马克思的话。比如，米丁在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书中说，“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工人阶级是生产工具之一。马克思在40年代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后来在《资本论》中他抛弃了这个结论，对它作了更为准确、更为清楚的表述，在书中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另一种态度。总之，

应该指出，在《资本论》写成之前，马克思更喜欢谈物质的，使其与精神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战，为争取它的胜利而战，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某些因素下定义时就不是很规范。他想为那条被称为生产资料的总航线开路，也就是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他围绕这个问题而奋斗，而存在的构成要素，特别是生产的组成要素，他不是始终都能做出确切定义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任务。50年代以后，当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获得了活动舞台，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他对个别术语的定义就比较准确、比较规范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所下的这些定义就清楚了。如果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当然，就应当使用最好的术语，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劳动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在《资本论》中，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劳动手段，也就是生产工具，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们用来加工改造劳动对象——自然界的原材料——水、矿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所使用的那些东西，他没有把人归入生产工具一类，要不然，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无产阶级成为生产工具中的一种的话，那么结果将是，现在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工具便构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在革命时势必要把这些劳动工具（无产阶级）变为社会公有的，这是十分荒唐的。在《资本论》中及在《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从对社会物质生活作一般性的界定转向了对生产组成要素的界定，因此，我们只能在《资本论》中看到他的准确清楚的表述，就应当使用这种表述。他说，假如把劳动手段，也就是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也就是人进行改造的一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石，——这一切将构成生产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包括机器、一切仪器设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藏、原料、交通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概念包括机器、所有的设备、土地、森林、水源、矿藏、原料、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一起构成了生产

资料，即应当综合的那些东西。

生产力——这一概念——这是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那么，这里也应当说说“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工人阶级是最宝贵的工具”。应当说，工人阶级在所有的生产力中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要不然，工人阶级作为生产工具势必也要变为社会公有，势必会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这也是错误的。

就是说，生产力——这是生产工具加上使生产资料运转起来的人。劳动手段，换言之，生产工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篇第二点里有。你们打开《资本论》的第2卷——那里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是分开的。他说，有生产资料，有工人，假如把它们割裂开来，无论是工人，还是生产资料——它们都不能代表任何的生产力。

我讲这一点是鉴于在一些教科书中在这方面存在着十分紊乱的现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拿起它来阅读就恶心，完全是杂乱无章，应该增强明确性。

有时说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问题，假如拿我们的宪法来看看，那里也是这样的说法。有人可能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是生产资料，这里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是为了通俗化。通常，假如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为例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料主要理解为建筑物、原料等等，而把生产工具撇开了。为了使宪法明白易懂，为了能使它不引起任何的非难，将生产资料列入了，从学术方面来看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做是为了通俗化。我本人也不鼓励这种事情，但是这是由大家所希望的通俗化造成的。在联共（布）党史中经常有某些重复，这是容许的，是为了不引起误解。而从理论和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容许的，因为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

还有，在结束语中还会产生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你们杜撰的，过去说的所有原理都是正确的，而在这里竟然要篡改它们。却说什么，这叫做用新的经验来丰富理论。

在制定某些方针之前，为了不至发生变化，你们此前要从事丰富的工作。而很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学习得太仔细了，说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他们想。由于情况的变化，新问题的产生，这些原理和结论可能会改变的。

这不，关于国家问题。恩格斯推测，社会主义将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关于三个要素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而结果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周边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说，这是新情况，不得不改变对国家及其消亡问题的看法。有人可能会想，我们决定要做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人还都认为，理论和结论应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将其背熟并静静地坐等，不会不成功的。而现在看来，原来并不是一切都那样永恒不变，并不是一切都是完美的，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比较自由主义的态度看待个别原理和结论的，这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进行了叙述。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吧，这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好著作，也是较好的著作之一。依我看来，恩格斯虽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熟悉宣言的原则。马克思比恩格斯花了更多的精力。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这是赞美诗，我说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上杰作。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称这本书是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40-60年代的国际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实践纲领也是萌芽中的国际^①的理论和实践纲领。这本小册子出版25年后，各种语言的版本几乎都有，而且出了好几版，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小册子中最

^① 即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国际成立后，前者通常被称为第一国际。

普及的一种。在这本小册子出版 25 年后，马克思考虑到[18]48 年的革命经验及后来的公社，他认为，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已过时了，他认为，如果他不得个重新写的话，他会按另一种方法写这本书。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完全不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个别原理和得出的个别结论是一劳永逸的。他们作为懂科学的人和作为真正的辩证法学家懂得，一切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而且个别的原理和结论会由于发展的进程而不适用了，也就是说，要求提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原理。

瞧瞧，在 1872 年德文版的前言中他们写了什么：“最近 25 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总体说来直到现在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的地方应该作某些修改。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正如在宣言中所说的，要以当时当地的条件为转移。因此，绝不应该认为，在第二章的末尾所附加的革命措施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这一点现在势必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发展，其根据是，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发展，由于二月革命的实践经验，及后来规模更大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在那里首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这一点现在在某些地方已过时了。”

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他对我们 20 年的革命经验会谈些什么呢？

“这一纲领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现在他对这一切评价说，这个基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说不应该简单地掌握政权，而应该打碎旧的机器并建立新的机器，公社尤其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为自身的目的服务，需要摧毁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接着：“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文献的评论对现时来说还不全面，

因为它只写到1848年，这方面的评语也是这样…… 尽管对现存的一些评语已过时，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完全改变了，而且事件的发展使得已出现的共产党的大多数都被彻底消灭了。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历史性文献，而且我们不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其中的任何地方，以后的各版中将有一版出版时可能将附有增补遗漏的前言。而目前版本的出现使我们感到突然，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对这项工作进行调整”。

你们瞧，一切都在变化，也可能会变化。假如有人问：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什么永久性的东西？今天是一回事，而明天又是另一回事，怎么生活？应该这样去解释：如果你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应该懂得，理论基础是没有变化的，而个别的原理可以改变，就是说，应当动脑筋去思考。

好，我就指出这四个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你们也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我尽力设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回答。

五 宣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实际问题

现在来谈一些实际问题。

怎样改变宣传工作的安排？我们这里的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太好，从中央委员会开始，这我们应当承认。这项工作那里安排得不好，很不好。这是我们的错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我的错误和有关部门的错误。我们都很忙。这不是辩护的理由。不过我想解释，但如果承担了这项工作，就应该去做，用不着推诿说工作忙。但是，我想说，实在是忙，就算是理由。但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好，无组织性，很分散，工作方法很落后，大家都在竭力追求小组的数量，谁那里的小组多，而很少去研究，小组在做什么；追求课堂讨论的数量，但很少去关心课堂讨论中做了些什么；或是夸耀党的研究室的数量，而不说党的研究室里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应该明白，这件事没有组织性。宣传的

质量因素被忽略了，这一切直接向广度发展开来，而要想控制住，就要了解，做了什么事情，不仅要了解领导或监督情况，而且还要了解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一点就没有做到。这是一个主要缺点——向广度发展了，而没有深入进去。

依我看，对待小组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的小组，为什么？我不理解，要知道人们是能在自己家里阅读的，要知道是用俄语写的，假如有不懂的地方，有辞典，还可以向随便什么人去问。难道为了能理解所读的内容就需要有上千个小组。我对很少利用报刊，而总是指望小组这一点很不理解。在我们没有掌权时，报刊不属于我们的，那时可以这样去做，而现在报刊是我们自己的。

在某个小组里，想必会有好的宣传员，假如把他的全部讲课内容登载出来，这些讲课材料就成为大家的财产了，否则他仅能将自己的经验局限于自己小组的范围内。须知，这是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机械化的生产与手工劳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将所有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一起、用于一处。这是一个起码的组织任务，而我们，想必有许多可以写出好的讲课内容的好宣传员，是有很多，不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就在小组的范围内进行教授。仅仅在小组里才认识他们，而哪怕向莫斯科委员会、区委员会提出任务，听听 10—20 个宣传员的课，看他们怎样讲解，要他们讲述并作为例子刊登出来，这或许能将其经验传遍全俄罗斯。你们看看，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意味着什么。以国家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一回事，以家庭手工业的方式提问题，这是另一回事，很多的小组是不必要的，报刊利用得太少。

其次，依我看，你们党的研究室太多。依我看，这不对。这里有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不很熟悉这事情，所以我唠叨几句。这不，在听人们讲课时，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研究室里完全不受监督，完全是独立的，无论是在组织宣传时还是在进行辅导时都没有集中的管理。没有集中的管理，个别的点、小组、党的研究室是完全独立的。那里，

大概坐着一些好人，但要帮助他们。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会白白浪费时间，会在政治上毁灭。你瞧，他坐在那里，在工作，工作是好是坏，没有人知道。谁也不关心他们，谁也不来问问。而如果有任何人两次、三次来提醒，帮助这种人就好了，不然的话会被抛弃，这种人会被抛弃的，因为没有人来帮助。我很担心的是，党的研究室也是这种状况，他们已被抛弃，没有人领导他们，没有人询问他们，没有人进行检查。而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宣传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一些人是这样解答疑问，另外一些人按另一种说法解答，第三部分人按第三种说法去解答。这件事情要在某种程度上集中管理。我反对压制人们的首创精神。不，人们的首创精神——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应当这样来安排工作，以便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能有共同的东西，以便对人检查。这就是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利用报刊来进行辅导。在党的研究室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对各种问题作了很好的准确的解答。那为什么不去搜集他们在党的研究室中的经验，搜集他们对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实质性的问题是，不仅要问，在什么书里，在第几页可以找到。实质性的问题是，要搜集这种资料，印刷出版，以便使其变为大家的财产。

国家和家庭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国家能够总结经验并把它变成苏联的东西，而手工业者仍然停留在自己手工作坊的范围内，谁也不知道他：当不得不按旧的手工业的方法在办公室里非常勤快地干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掌握政权。在党的研究室里有好的经验，而报刊不登载它，这是不对的。

小组的数量要减少，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少，不是减少 50%，我反对这种做法。应当研究一下，什么地方有哪些小组，什么地方由谁在教课。或许在莫斯科在 2-3 个月内小组就有可能减少，而宣传员可以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调到党中央机关，或是调到莫斯科市委的机关去。

宣传局在干什么？它好像不见了，有谁见到它没有？乌加罗夫同志，你们那里有宣传局吗？

乌加罗夫：有。

斯大林：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停办了高级党校，撤销了红色教授学院^①。还有什么专修班吗？

莫洛托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专修班。

斯大林：我不敢说，那里的工作室安排得很好。停办了学校，是因为学校提供了两边摇摆的人。

喊声：对。

斯大林：但是应当改进，而你们立刻就停办了，高级党校一定要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分开。不然的话会弄成这个样子，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从事活动的基础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党校应当组建不只一所，而要好几所，因为非要办这样的学校不可。是否将这样的学校与其他培养组织家的学校合并，或是分开，——这应当讨论一下，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级党校一定要办，无可争辩地要办。^②

再次，至于是否要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制订学习计划的问题？我认为，你们已经谈过这件事。你们这里什么叫学习计划？是问题或题目的项目单吗？

喊声：题目的项目单。

斯大林：你们要明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使我们的干部积累丰富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我指的是党的干部，不是指那些按党的狭隘路线工作的人，而是指在苏维

① 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培养高校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及科研机构、党中央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教学机构。

②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在战后才得以执行，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两年制党校。

埃的工作中、在经济方面、在商业组织系统的共产党员，合作社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在保健方面，总之，在一切管理部门，希望在各地的共产党员——这些有知识的人能够成长。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一点要牢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应该是我们最优秀的分子。过去对知识分子进行挖苦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实际上是轻率无知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上天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剥削者服务。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干部，不太说从前他们是工人、从前他们是农民。就拿什基里亚托夫^①同志打个比方，既然离开了车床并开始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您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请原谅（笑声）。十年前您是干什么的，与谁也不相干，而现在您是知识分子。

什基里亚托夫：对，斯大林同志，我同意您的意见。

斯大林：我们全体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应当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且也能够成为。只有知识界能够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为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最优秀的人，他们应该学习，应该把书带给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我不知道，或许他们自己也想学习《简明教程》，要帮助他们提高其政治水平并使其积累丰富的知识。

外国情报机关破坏了我们这些知识界干部的一个小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事件。我们对知识界的及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些干部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教育。

我想再重复几句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话。我们这里过去曾对知识分子持一种荒唐可笑的轻视态度。我们大家都深入过车间，走近工人，却忘记了在工人中很少能找到那些能找到空余时间成为理论家

^① 什基里亚托夫，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1883—1954)，党的活动家，农民出身，小学文化。从1921年起在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的工人，或是他们掌握了理论，这样的人很少。工人工作8小时，他们不习惯看书，不习惯于总结，他们应当去习惯。你们带着宣传材料钻进那儿，却忘记了在你们的周围有上百万的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在机关里有知识分子在工作，这是以前的工人，以前的农民，是我们的人，他们已成为有文化的人，他们同样与我们一起在管理着国家！你们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写写指示。这是胡扯。管理国家，意味着要在实际中执行，要善于在实际中执行决议，有时甚需要修改决议，假如这些决议不好，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向都是好的，也有错误。有这样一些实践家，他们修改决议，说我们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老爷派的夜郎自大习气，相反，我们认为，有时要有人向我们提醒，说我们不对。要使我们的一切决议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了解全国的情况。这是胡扯。于是，这些人在进行管理。他们在执行我们的决议，意味着在进行管理，而我们对他们估计过低，轻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异己的。昨天车床旁边的工人是很有才能的人，受到尊敬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配得上去学校学习，受教育，为什么又对他瞧不起。我或许说，这是以粗野的、马哈伊斯基^①式的、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这种态度对我们党来说是有害的、危险的。正是由于在军队里，在合作社，在商业，在工业中，在农业中以这种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这种流氓式的态度，我们才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抛弃了，没有使他们在政治上积累丰富的知识，而使他们成为所有这些情报机关的猎获物——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随便哪个国家的。由于我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疏忽大意的、错误的、流氓式的、有害的、轻视的态度，几十个人被毁掉了。所以应该把这本书发送给这些知识分子，让党员以及那些不比党员差的非党员读读，让他们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并提高自己的水平线、自己的政治水平。

①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流派。

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我认为，有三点是主要的，让他们来读一下，以便于学习。

第一点——这是基层小组，政治上还未成熟者的小组，他们是一些忠心耿耿的、革命的、一切都作好了准备的人，但是在政治上还未成熟的人。我想为他们提出这样的学习计划：把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四章“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当时党本身还没有出现；第二部分——有三章“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和第三部分“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当它掌握政权后，它在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简短地教授了这个问题。大概，基层小组不可能完全掌握全部内容，但稍微减少一些并分成三个阶段：党的发展史以这种形式教授。或许，这会容易些。而一年后，他们开始看书，懂得会更多一些。

中级小组——人数最多并对我来说是最感兴趣的，由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组成。按书中的内容、按章篇，12章，12个主要部分来制定学习计划，再没什么了。

第三小组——高级小组。对这个小组可以按照附加的章篇制定学习计划。每一章中有一附加的章篇，每个附加的章篇都列有书目、文献资料。学了一章后，就转向附加章篇，让他们看文献资料，以便他们学得扎实，让他们掌握比书中提供的更多的内容。附加的章篇是为了高级小组掌握基本的问题，十分清楚的问题，并迫使他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找到向这一章过渡的相关书籍。

我想这样去安排。如果是很少受过训练的，就用简明的方法；具有中等知识的要学完全书的内容；而对知识比较丰富的人，要按照书目，按照附加的章篇学习书中所讲的内容以外的更多的东西。

我说完了。

工作通信

对回应一封短信的建议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3月7日)

绝密
莫斯科

亲爱的谢尔戈：

加米涅夫告诉我，说伊里奇给马哈拉泽等同志捎去一封短信，他在信中站在倾向分子一边并责骂你、捷尔任斯基同志和我。目的显然是向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施加压力以利于倾向分子。不用说，倾向分子收到此信后，定会全力利用它来反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特别是反对你和米雅斯尼科夫同志。我建议：

1.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不要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多数派施加任何压力，而且可以让他们尽情表现。

2. 争取达成这样一种妥协，也就是说，应是合乎情理的、自愿的妥协。

3. 我听说，米雅斯尼科夫想来参加代表大会，但似乎由于人手不够而不肯放他。我认为，绝对应当准许他作为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因为我相信，他肯定会当选为大会代表的。

你的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7日于莫斯科

附言：

代表大会延至4月15日开幕。全会定于4月10日召开。请准时出席。

约·斯大林

谈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节选）

（1926年9月16日）

莫洛托夫：你好！9月12日的来信收到了。

（1）同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柯普的误会彻底清除了^①，这很好。不然我们就会断送自己的政策，这两个人就会成为张作霖和日本人的俘虏，我们则会成为他们两人的俘虏。顺便说一句，张作霖之所以不可一世是因为他现在知道（这是柯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告诉他的）我们不会进行军事干预，知道即使半年前我们也没想过进军哈尔滨，因此他可以无所顾忌，蛮横无礼，以“此表现”换取日本人或者（特别是）英国人的某种援助。这就是奥秘之所在。柯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由于饶舌把我们的外交秘密透露给了张作霖，告诉他说，我们只是吓唬他一下，不会因为中东铁路的问题去跟他打仗。他们两人竟想以姑息纵容和透露秘密来收买张作霖和日本人！且不说他们还另有派别目的，这是在李维诺夫的帮助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搞的……

（2）现在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在现阶段，张作霖只能搞些挑衅活动，他不至于去强占中东铁路。张作霖以及日本人（通过张作霖）和英国人都在试探我们的反击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不应该把卡拉汉召回来^②。但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从我

① 1926年9月7日，政治局讨论了中国问题并通过决定：“鉴于柯普需要继续治疗的报告，取消政治局今年9月2日的决定。9月9日，政治局取消了9月2日关于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去中国的决定。”

② 1926年8月27日，根据契切林的建议召卡拉汉回莫斯科述职。9月21日要卡拉汉迅速返回莫斯科，不去广东，也不去日本。

们对华政策的实质来看，完全中了冯玉祥分子和其他中国“将军”们的奸计的卡拉汉，是一个不可取的人。我们将在近期内把中东铁路和张作霖的问题统统提出来。

(3) 在上一封信里我没有跟你详谈谢尔戈的情况。但是现在应当告诉你，谢尔戈，特别是纳扎列强在从外高加索“召回”这件事上，给我的印象很坏。我同谢尔戈吵翻了，说他气量太小，不再见他（他现在在新阿丰）。关于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处的人选问题要专门讨论一下。纳扎列强目前不适合接替谢尔戈在书记处担任的职务（他还年轻，不够认真，有时还不诚实）。

(4) 关于控制数字问题，我的意见是现在就要自上而下地对人民委员部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的编制进行精简和压缩。否则厉行节约就是空话。工业的比重一定要增大。

(5) 现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从政治上看有害。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分裂分子（请看她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发言）如果我们想保持党的统一，就要打击她这个分裂分子。不能同时提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针——既反对分裂分子，又要与之和平共处。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十分荒唐、毫无办法的办法。不排除季诺维也夫明天会宣布莫洛托夫和布哈林“不讲原则”，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向他“建议”结成“联盟”，而他季诺维也夫“愤怒地拒绝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调情”等等，等等。

(6) 关于“八月联盟”你的意见完全正确。应当重新发表伊里奇的文章，不是一篇，而是几篇，同时还要谈谈这个联盟产生的过程。一定要让索凌^①上阵。你和布哈林务必发言。这件事意义重大。

^① 索凌，1920-1925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1924年起在列宁研究院工作。

(7) 关于商业和工资的事进展顺利，这很好。这非常重要。

(8) 对涅恰耶夫一伙毛孩子不妨狠狠地打击一下。

(9) 杰米扬的诗不适用，写得不够生动。我写信跟他谈了我的看法。

(10) 我的身体稍有好转，但是手还疼。

(11) 布哈林是蠢猪，或许比蠢猪还蠢，他竟认为，简单写一下自己的访德印象有失身份。我得教训教训他。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16日

对信的补充

.....

再谈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9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

你9月20日的来信收到。

（1）工资的事看来解决得不错^①。要紧的是使基层群众得到一点实惠。若能给石油工人也加点钱就好了^②（他们的收入总的说来不算少），但是如果目前没有这种可能，那只好作罢，也顾不了巴库工人的牢骚了。

（2）如果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想“孤注一掷”的话，只能对他更不利。现在就把他开除出政治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取决于他的表现^③。现在的问题是：要么他们服从党，要么党服从他们。显而易见，如果党容许后一种（第二种）可能性，党就不成其为党了。

（3）关于斯米尔诺夫，在对他提过警告之后，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他开除出党，哪怕是开除一段时间^④。

（4）我认为，全会不可能“绕过”梅德维捷夫的问题。或许你

① 1926年9月20日，政治局批准政治局下设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建议。委员会建议提高从事生产的工人（煤炭、采矿、五金……工人）的工资。

② 1926年9月30日，政治局认为可以提高石油工业某些工种工人的工资。

③ 1926年10月联席全会通过决定，因从事派别活动，解除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④ 1926年9月8日，斯米尔诺夫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26年11月26日承认错误后恢复党籍。

有“绕过”的办法，那就说说看，是什么办法。

(5) 看来你是对的，关于反对派联盟的问题应该等到代表会议上提。其实，用不着仓促行事，最好是先看一看它们现在的表现再说。

(6) 你和布哈林关于“八月联盟”问题的发言要抓紧准备，我看没什么好等的。

(7) 我写信跟杰米扬说了，他的寓言“不够生动”、“不适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应出版”。我这里没留抄件，不然就可马上寄给你看。至于说这个寓言中的不良“征兆”反映了杰米扬的立场在倒退，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个问题待我回去后再谈。

(8) 不能让卡拉汉在中国问题上自作主张，他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真的。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因为他当全权代表的时候正值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他现在仍然停留在那个阶段；在当前中国和国际出现新形势下，在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事变的情况下，他根本不合适作领导者，因为他对新的事变不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独立地理解，他这个人极端轻率冒失，局限性很大（就革命眼界而言）。可是论蛮勇、放肆、自信和高傲，他却绰绰有余。这一点尤其危险。卡拉汉永远也不会理解，汉口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23日于索契

我的身体有所好转。

附言：我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公开呼吁总委员会联合抗议炮击万县的作法是否正确没有把握。这样做会过分刺激总委员会和保守党。有这种必要吗？最好能选择另外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9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8月27日的来信收到了。

（1）**关于英国**。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政治局就李维诺夫的提议所作的决定是对的^①。问题实质不仅在于要争取得到承认，同时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我们以**揭露“工人政府”**为核心的立场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的呼吁，发动**无产阶级对“工人政府”**进行革命的批判，有助于对各国（首先是英国）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事业，协助各国共产党人以**反改良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如果不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就是犯罪。李维诺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对此也不感兴趣。但政治局必须考虑到这一切。

.....

（4）反对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沙茨金等人）的运动进展顺利。

（5）反对右倾分子的思想家，即**布哈林**的运动同样进展顺利。

《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很精彩^②。

① 1929年8月26日政治局讨论李维诺夫关于英国问题的建议。政治局委托李维诺夫向英国政府代表声明，如果韩德逊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同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讨论恢复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苏联政府在谈话中将说明自己过去的立场。

② 《真理报》1929年8月24日发表题为《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和倾向》的文章，指责布哈林是倾向分子的主要领袖和鼓舞者。

(6) 关于米尔佐扬我同意你的意见。

(7) 最好能将鲁勉采夫^①从巴库调到乌拉尔油田管理局来领导工作。他懂行，能推动工作，

(8) 我已往政治局寄去给米高扬的贺信（作为给他的回信），因为你们成功地揭露了格罗曼之流、维诺格拉茨基之流以及其他隐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政客。应当将他们赶出莫斯科，让年轻人、我们的人、共产党员接替他们的位置。

(9) 粮食收购工作进展顺利。对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巴什基尔要实行强硬政策。对试图推卸重大责任的埃赫及其他同志不能作任何让步。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空谈家，我们就应当并且能够征集到1亿普特的紧急储备粮。至多可以减少5-7百万普特，但不能再多，而且这部分还要从其他地区补回来。如果我们在粮食收购上获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将在一切方面，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都取得胜利。

(10) 我在纳尔奇克得了病，现在索契开始恢复。

就写到这里。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29日

① 鲁勉采夫，1916年入党，20年代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9月5日，政治局通过斯大林的建议，鲁勉采夫获得任命。

再谈关于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底)

维亚切斯拉夫：.

上一封信收到了。

一、我无条件地主张把集体合同从1月改为10月。这件事不能拖延。但根本不需要为此召开中央全会。

二、我反对将中央全会改在10月初召开。为了把中央全会改在10月初召开，（最迟）应在9月中旬得到控制数字。显然，控制数字在此时是不可能准备好的。此外，问题不在于全会和全会的新决定，而且我们的决定也太多了。问题更不在于发布新的“号召书”和“呼吁书”：每一期《真理报》都有“号召书”、“呼吁书”。现在问题在于积极而经常地进行监督，在于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只要我们还未组织好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就会很差，这意味着计划的执行工作也会很差。我认为，在提前召开全会的问题上，我们最多能将全会改在10月末召开，而且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苏维埃机关能在月初将控制数字完全准备好。

三、你对于乡镇协作社章程及报刊上的有关宣传的看法过于肤浅。请注意，这个作为新东西而抛出来的倒霉的章程，其意图在于用它同“旧的”东西即农业协作社章程相抗衡。同时，乡镇（新）章程的核心是力图给予个人以“改善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可能性”。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国的集体农庄运动方兴未艾，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的自作聪明的人却想绕过集体农庄问题，一门心思去“改善

个体农民经济”！我认为，右倾分子在这里抛出乡镇协作社章程，是在进行某种报复，而中央的人由于埋头于工作，却没有看出这个阴谋。

四、关于全会日程问题我已在密码电报中向你谈了我的意见。我认为，中央全会只有不再就泛泛的问题做出泛泛的决定并听取工作最差劲的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总结！）报告，对事情才会有好处。现在对工人的供应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全会是无法绕开这个问题的。应当将消费合作社来个大换班，并将官僚主义者从其中驱逐出去。应当对肉类的供应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有关经济组织进行整治。这就是我对日程的建议。

五、最好派欣丘克去柏林。他是个经济工作者，他去那里比苏里茨的作用大，因为苏里茨对经济问题没有经验。土耳其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地方，苏里茨去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认为，把他从那里召回将是一个错误。会找到去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工作的人的（弗里德里希森、扎尔马诺夫——现任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副手）。只要有粮食，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工作就能搞好。

六、我建议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卡冈诺维奇作为民用航空总局局长的人选。

七、任命罗森霍尔茨一事办得怎么样了？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我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你们有多少问题尽管提出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2 年 6 月 25 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关于革命法制的来信收到了。写得不错。我做的为数不多的几处修改见原件。我认为，中央的指示，具体说是前两点及某些修改意见——应当刊登出来，而指示的第三点可以在内部分发。

二、你们收到我最近关于兰开斯特及新方案（1 亿美元，10 年，追加 3%，占 1 亿美元 15-20% 的定货）的电报了吗？应当坚持这个新方案。这个方案对我们有利。这个方案对兰开斯特也有利，因为他要求的偿付总额提高到了 6000 万卢布（按照第一个方案为 4000 万卢布），而定货则达到了 4000 万卢布（按照第一个方案为 700 万卢布。

三、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书记会议准备情况如何？

敬礼！

约·斯大林

附言：政治局咨询的次数同我的健康无关，你们有多少问题尽管提出，我将愉快地予以答复。

约·斯大林

① 1932 年 6 月 25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革命法制》的决议，并就这一问题向各地方党组织下发如下指示：“联共（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 6 月 2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法制措施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充分贯彻实施这一决议。”

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一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三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三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3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国内战争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战后至一九三六年)

军事指挥

不允许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发布命令——致列宁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3
遏制一下托洛茨基让他守规矩——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3日)	5
托洛茨基的不可理解的电报命令 ——致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7
托洛茨基的讲话和命令造成了混乱 ——致斯维尔德洛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5日)	8
总参谋部和野战司令部在为白卫分子工作——致列宁的信 (1919年6月4日)	9
大本营与南方战线已形成不正常关系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19年11月12日)	10
需要的是调去骑兵预备队——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2月4日)	12

高加索方面军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2月20日）	13
关于中央拒绝向南线增派兵力的问题 ——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6月2日）	14
关于西南战线兵力调配的问题——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6月3日）	15
应该撤换总司令——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0年6月14日）	17
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多余的——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6日）	18
关于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命令的传达——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8日）	19
总司令拒绝调派骑兵——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12日）	20
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20年9月23日）	21

各条战线

拉达的回答需要我们的答复——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27日）	25
停止乌克兰内部的战争——致契切林的电报 （1918年5月4日）	27
这里没有中央的全权军事代表——致列宁、托洛茨基的信 （1918年6月22日）	28
察里津正在变成军事行动的基地 ——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电报 （1918年7月11日）	30

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绝对必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33
请提供一封您亲笔签名的信件——致列宁的信 （1918年8月31日）	35
两个星期没有运来任何东西——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7日）	36
关于消灭马赫诺叛军的进展情况——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37
有关高加索战线的兵力部署——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38
关于西南战线的战况——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5月29-30日）	39
就弗兰格尔包围敖德萨的来往电函——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1920年6月4日）	41
弗兰格尔将在秋季之前被完全消灭——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4日）	43
见面谈谈东南地区的事情——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7月27日）	45
查清土耳其斯坦前线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4月21日）	46
关于处理布哈拉问题的意见——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5月14日）	48

苏波冲突

波兰军队正在彻底崩溃——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13日）	52
抓紧使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2日）	54

党中央请你们再加一把劲——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的电报 （1920年7月23日）	55
我们正在准备进攻——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4日）	56
恢复以师为单位采取行动的旧策略 ——致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电报（摘录） （1920年7月25日）	58
请通报有关同波兰停战的计划——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59
痛打波兰人而别管期限——致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60
总司令想起来要调动兵力已经晚了——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31日）	61
建议中央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调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8月30日）	62

外交斗争

（战时和战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把俄罗斯推入战争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65
关于芬兰局势的来往便条——斯大林、列宁、斯克良斯基 （1919年7月21日）	66
关于援助阿富汗起义者的问题——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67
为阿富汗的反英势力创建一个基地——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69

该好好教训英国的总委员会——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	71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初）	73
目前韩德逊掌握在我们手里——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9日）	74
与敌人谈判就是一种斗争——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77
英国问题处理得确实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	78
卡拉汉和李维诺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9月7日）	79
对“大”国既鄙视又自信——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1月24日）	80
你们关于满洲事件的指示是错误的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35年10月13日）	81
针对日本的照会和运动不能令人满意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5年或1936年）	82
就法国有关建议进行谈判的策略	
——致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6年8月16日）	83

党史节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1918年至1920年）

86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86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91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 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 三个月的喘息时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97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 波兰计划的破产。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102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 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105
	简短的结论	109

插图

一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的手稿	23
二	察里津不能丢	50
三	斯大林在前线	63
四	我们红军，战争中成长	84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国内战争篇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战后至一九三六年)

军事指挥

不允许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发布命令

——致列宁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我们收到了托洛茨基的电报命令，命令的副本和我们对命令的答复想必您已经收到。我们认为，这个命令是一个对南方战线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写的，它威胁要把南方战线和南方的革命的全部事务都交给瑟京^①将军。瑟京不仅是一个前线不需要的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任的人，因此是个有害的人。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将军而毁掉战线，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托洛茨基可以用有关纪律的词句掩护自己，但谁都懂得，托洛茨基不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的命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某种意义，即如果它们是根据对兵力的考虑和对情况的了解作出的话。把战线交到一个不能信赖的人手中，就像托洛茨基所作的那样，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纪律、对革命和**前线**利益的最基本概念的践踏。因此，我们作为党员坚决声明，我们认为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就是犯罪，而托洛茨基的威胁是卑鄙的。必须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蔑视最杰出的党员、讨好军事专家中的叛徒、损害前线和革命利益的行为的问题。要提出不允许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发布命令的问题，这些命令完全不考虑时间和地点条件，使前线受到崩溃的威胁。要重新审议来自无党派反革命分子阵营的军事专家问题。我们建议党中央委员会在最

^① 瑟京，原沙皇军队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曾任南方战线司令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行政部部长、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军事代表等职，后来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近的会议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在有特殊需要时，我们将向会议派出自己的代表。

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

党员 伏罗希洛夫

载于《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前线文件集》

斯大林格勒，1941年，第65页

（注：本卷所引档案资料如未有注明者，均系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一书）

遏制一下托洛茨基让他守规矩

——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3日)

伊里奇同志！

首先向您问好，然后请允许我向您通报一些有关我们战线的问题和托洛茨基的几个命令。所附的这个文件可以使您了解南方战线工作人员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令人极其烦恼的冲突。问题在于，一般说来托洛茨基不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是不行的。在布列斯特，他以自己漫无节制的“左”的姿态打击事业。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问题上，他也早在5月份就以自己那种大喊大叫的外交姿态损害了事业。现在，他又在纪律问题上以其固有的装腔作势进行新的打击，更何况托洛茨基强调这种纪律实际上是由于前线的一些杰出活动家识破了“无党派”反革命分子阵营中的军事专家的阴谋诡计、不让他们毁掉战线（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不干涉作战事务）。

总的来说问题在于，托洛茨基不用假嗓子就唱不了歌，不大喊大叫装腔作势就不会行动。而如果这没有危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话，我对此是不会有反对的。

因此，我请求及时地——还为时不晚遏制一下托洛茨基，让他守规矩，否则我担心，如果托洛茨基继续发布那些狂妄的命令，把整个战线的工作交给那些完全靠不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军事专家手中，将造成军队和指挥人员之间的不和，彻底断送南方战线。我们新的军队正在建设之中，因为新型的革命的指挥员同新型的士兵在一起成长。把显然是叛徒的瑟京或切尔纳温之流强加于他们，意味着毁灭整个战线。

我已经不想说，昨天刚刚入党的托洛茨基竟然拼命地教我学习党的纪律，但他显然忘记了，党的纪律不是反映在形式上的命令之中，党的纪律首先反映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中。

我不是吵闹和丑剧的爱好者。但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个笼头，他就将用他那种“左的”和“红色的”纪律毁掉我们的整个军队，而真正守纪律的同志是憎恶这种纪律的。因此，现在应该——还为时不晚——制止托洛茨基，让他遵守秩序。

握手。您的斯大林

察里津，1918年10月3日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托洛茨基的不可理解的电报命令

——致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的电报

(1918年10月3日)

10月3日我们收到了托洛茨基发来的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的电报命令：“我命令斯大林立即根据政治委员不干涉作战事务的原则组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设在科兹洛夫。如24小时内不执行这个命令，我将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这个命令不可理解，因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在9月17日就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并从9月20日起就在行使其职能，请读一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吧……

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

载于《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前线文件集》
斯大林格勒，1941年，第64页

托洛茨基的讲话和命令造成了混乱

——致斯维尔德洛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5日)

抄送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 斯维尔德洛夫

托洛茨基的谈话非常简短，故意侮辱，逻辑内容无法理解，托洛茨基自己中断了谈话，紧接着瑟京和梅霍诺申就开始不用密码发秘密命令，只是在我们抗议之后才开始用密码发剩下的内容。我们无保留地承认集中和服从是必要的，但在托洛茨基讲话之后和他的命令造成混乱之后，我们现在完全困惑不解，因为，即使我们方面愿意，无论什么样的服从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实现不了的。正因如此，所有问题应推迟到斯大林抵达莫斯科后解决。此外，拖延供给将对前线产生致命的影响。657号电报收到了，每昼夜正常地发一次通报。现在将发两次。斯大林今天出发。

斯大林

米宁^①

伏罗希洛夫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米宁，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任察里津苏维埃和党委会主席。

总参谋部和野战司令部在为白卫分子工作

——致列宁的信

(1919年6月4日)

副本

绝密

1919年6月4日

致列宁同志

现寄上从瑞士人那里缴获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不仅全俄总参谋部在为白卫分子工作（您一定还记得去年秋天第11师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克近郊投向克拉斯诺夫方面的事，或者彼尔姆战线几个团投敌的事），而且还有以科斯佳耶夫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野战司令部（后备队是由科斯佳耶夫分配和调遣的）。

现在整个问题就在于，中央自己要有勇气来作出相应的结论。中央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吗？

对材料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而且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意外情况”。我本应写得详细一些，不过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让彼得斯讲吧。

我深信：

(1) 纳焦日内不是一个司令，他没有能力指挥，他将会彻底断送西方面军。

(2) 像奥库洛夫这样一类干部十分有害，他们唆使专家们迫害我们那些本来就备受压抑的政治委员，使我们集团军精华士气涣散。

斯大林

大本营与南方战线已形成不正常关系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19年11月12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声 明

在大本营（共和国小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方战线之间已经形成完全不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目前一方面表现在总司令^①和古谢夫对南方战线司令员^②的直接敌视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南方战线的需求完全漠不关心上。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必须或者撤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或者大本营，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撤销古谢夫的职务，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古谢夫是反对南方战线的罪魁祸首。^③

中央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列·谢列布里亚科夫^④

斯大林

1919年11月12日于谢尔普霍夫市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1919年7月开始，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

米涅夫。谢·加米涅夫是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的原旧军队上校，1918年9月出任东方战线司令员。

② 当时南方战线司令员是叶戈罗夫。他原是俄国旧军队的中校，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历任第9集团军、第10集团军、南方战线和西南战线司令员。

③ 1919年11月初，南方战线因部队军事行动失利而受到批评。南方战线领导人斯大林、叶戈罗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并认为失利的原因在于部队建制不全、兵力不足，要求给南方战线增调部队。

④ 谢列布里亚科夫，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党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需要的是调去骑兵预备队

——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2月4日)

第40/III号

副本

绝密

直达电报稿(密码)

库尔斯克

1920年2月4日6时第736/VII号

党中央委员会 致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

我深信，我此行不会使局势发生任何变化，需要的不是某个人去走一趟，而是调去骑兵预备队，可是这样的预备队西南方面军又没有；何况由于绍林的缘故，我们在罗斯托夫—马内奇高地白白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扭转局面的行动已经迟了。布琼尼和奥尔忠尼启则认为失利的原因是绍林指挥不当。二者择一：或者是我们的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击退敌人，或者是我们被敌人打败，第二种前景近期内不可能出现。况且我的身体不太好，现在无法承受这种长途旅行和紧张的工作。因此，请中央不要坚持要求我去。最好是调派西南方面军预备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拉脱维亚师去；第3师和爱沙尼亚师战斗力不强，不适合派往前线。

斯大林

高加索方面军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2月20日)

副本

绝密

密码电报

第77号III号—1292

1920年2月20日第970号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抄送：党中央委员会

我不明白为什么首先该由我来管高加索方面军。按照程序，加强高加索方面军一事完全应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据我所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身体都很健康，而不应由斯大林去管，因为他的工作担子本来就过重了。

斯大林

关于中央拒绝向南线增派兵力的问题

——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6月2日)

副本

绝密

密码电报

发自克列缅丘格，无标题

6月3日零时50分收

1920年6月2日 克列缅丘格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您的密电收到了。我想，您没有看到我昨天给斯克良斯基的密电。对您的来电我是这样理解的：中央委员会拒绝调给两个师，而不管我多次提醒，这就使我对前线以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不再负责。那就这样吧。政治局的决定我是记着的，但由于弗兰格尔不理睬这一决定，相反却在准备进攻，并且他完全有可能突破我们的防线，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军事行政和军事作战性质的预防措施。仅此而已。

斯大林

附：列宁批示

“这等于把问题提交政治局。需要询问政治局全体委员。”

副本

秘密

密码电报

1920年6月39第3620号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我从同总司令的谈话中已经了解到西方面军的处境不妙，必须首先抽调一些师到该地区来。根据我们的预备力量的现状，中央可以立即拨给西南方面军不超过5个团和几个补充营的兵力，然而对于西南方面军来说，至少还必须有18个团才有可能完成占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这一首要任务。因此，西南方面军决定从克里木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师。为了在这方面做起来更有把握，必须把克里木问题明确起来，要么与弗兰格尔达成切实的停战协议，从而有可能从克里木地区抽出一两个师，要么放弃同弗兰格尔的一切谈判，不等弗兰格尔实力增强就打击他，并在粉碎弗兰格尔之后为波兰方面军腾出兵力。如果不对克里木问题作明确答复，现在的处境将令人难以忍受。有鉴于此，我请求中央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停战，并能够从克里木战线调出部队，或者，如果情况不允许这样做的话，批准我们进攻，用军事手段解决克里木问题。

需要迅速明确地作出答复，因为波兰人不会等我们。

斯大林

托洛茨基代列宁所拟的答复：

这显然是空想。要付出的牺牲不是太大了吗？我们将使无数的士兵丧失生命。应当反反复复地考虑和斟酌。我建议这样答复斯大林：

“您的进攻克里木的建议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情况，极慎重地加以考虑。请等待我们的答复。

列宁 托洛茨基”。

应该撤换总司令

——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0年6月14日)

莫斯科 俄共中央

致托洛茨基

我坚决反对用乌博列维奇或科尔克来取代叶戈罗夫，乌博列维奇对于这样的职位还不成熟，而科尔克不适合担任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和总司令^①一起坐失了克里木，因为在弗兰格尔发动进攻前两个星期总司令在哈尔科夫，他没有发现克里木集团军在土崩瓦解就返回了莫斯科。如果必须处分的话，那就应该两个人都处分。我认为，我们眼下找不到比叶戈罗夫更优秀的人选。倒是应该撤换总司令，他在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之间来回折腾，自己颠三倒四，还要把方面军司令搞糊涂，不会做一点好事。

斯大林

1920年6月14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22页

① 指时任红军总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原沙俄军队军官）。

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多余的

——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6日)

抄送俄共中央

哈尔科夫7月26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弗兰格尔战线目前失利的原因是，从北方新调的几个师未能按时抵达，它们在8月10日以前不能集结。弗兰格尔看来了解这几个师的调动情况并竭力赶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没有对克里米亚前线予以应有的注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依我看，成立特别克里米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没什么用处。全部问题在于上述情况，而不在于为克里米亚组织特别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弗兰格尔企图抢在我们前边和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奥列霍沃甚至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失守是可以预料的。现在，弗兰格尔的突击已经开始，我们的失利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短时期。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在这里，而不在于成立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以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多余的。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关于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命令的传达

——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8日)

托洛茨基

关于全部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的命令，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总攻开始之时颁布并传达。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总司令拒绝调派骑兵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12日)

列宁收

第一，我想向您也向我自己祝贺胜利，但应该承认，我不相信加米涅夫转达的劳合·乔治的声明^①。

第二，我们现在对弗兰格尔的突击不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由于大本营指挥不力，北方几个师向克里米亚前线的调动很慢，间隔时间很长，我们被迫将其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而不等其余部队到达，例如，志愿兵旅至今还未完全到达，原因是野战司令部不知为什么规定每天只运送一个梯队，而该旅共有23个梯队。我的印象是，总司令和他那类人对战胜弗兰格尔的组织工作进行怠工，至少，他们对于战胜弗兰格尔的愿望与他们在同波兰的战争中无疑表现出的胜利愿望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此外，总司令还拒绝调派骑兵。因此，我们现在对弗兰格尔的突击不应该被认为是决定性的。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指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将建议波兰接受苏俄的停战条件一事。

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20年9月23日)

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向参加会议的同志提供了怀疑我不正确地转达了事实的依据。为了真理，我要作如下声明：

1)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戴着粉红色眼镜描述我们战线状况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我是当初嘲笑“向华沙进军”这类老生常谈的口号并在报刊上公开提醒同志们不要夸大战绩、不要对波兰军队估计不足的惟一的一个中央委员。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就够了。

2)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打算攻占利沃夫但未能实现的说法与事实相矛盾。8月中旬，我们部队接近利沃夫，距利沃夫8俄里，部队确实可能攻占利沃夫，但结果没有，原因是最高指挥机关有意放弃攻占利沃夫，在我们的部队距利沃夫只有8俄里的时刻，指挥部却将布琼尼从利沃夫地区调往西方战线去救援该战线。这难道是斯大林的打算？

3) 列宁同志关于我偏爱西方战线、在战略上误导中央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谁也无法否认，中央有指挥部关于8月16日攻占华沙的电报。问题不在于华沙未能在8月16日攻克，这是小事，问题在于西方战线显然陷入了因战士疲劳而后勤跟不上所导致的灾难，指

挥部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它也没有发现。如果当时指挥部预先向中央通报真实情况的话，中央无疑会及时放弃进攻作战，就像它现在所做的那样。至于未能在8月16日攻克华沙，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小事，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它使我们10万人和200门火炮被波军俘获。这已是指挥部的严重过失，不能轻易放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中央任命一个委员会查明灾难的原因以保证我们免遭新的打击。看来，列宁同志爱惜的是指挥部，但我想，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9月23日 斯大林

Президенту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М-из Ленину.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нем. Оуд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х Суде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Пока судьям иудейским задвигать
Вань об адво; не держатся отпора; отставка, мушкетер
11-ей армии. Было в том, что от 11-ей армии (было
30 тысяч) осталось лишь около 11 тысяч уцелевших, истре-
паны солдат, все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х илов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 значительны также некадровы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раждебно к нам и мушкетеру в суровый фронт =
грозит. Эти малые остатки 11-ей армии и предостере-
жений сторон и продвижений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о стороны
(по линии евангелия, полуженщины от каждого со-
става фронта и 11-ей армии, эти отдаленные содер-
жания реальных /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неважно строго пер-
кинуть итс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омандарм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адежные по-
на.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против евреям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
лении итс на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
ях. Повторяем: без какой-либо помощи итс
тако итс немыслимо, так как отсюда итс итс
итс к итс итс, к которому итс итс итс
итс итс на оставшихся в итс итс итс
итс.

Стажир,

5/1 1919. Восток
8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Ф. Дроздович

1919年1月5日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給
列寧的信的手稿
(製版縮小的)

各 条 战 线

拉达的回答需要我们的答复

——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27日)

12月27日晚上5点

列宁同志！

请您务必速来彼得堡一趟，28日中午一定得在斯莫尔尼宫^①。因为：

1) 我收到了拉达^②的回答，回答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总的来说是相当妥协的（需要我们的答复）；

2) 今天卡列金部队的代表来我这里，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我们（人民委员会）能够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派遣讨伐卡列金的远征军（需要我们的回答）。

3) 我与普罗相和他的亚美尼亚人举行了会议，决定颁布一个总的法令（须要您签署）。

请您来一趟吧，然后再回去。

对杜托夫的进攻正在进行中。杜托夫撤退时炸毁了桥梁。对拉达的进攻（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从西面实施）进展很顺利（有捷尔—阿卢丘尼扬茨的报告）。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通报说，关于谈判地点问题

① 当时列宁在芬兰疗养。

② 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建立的。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4日向乌克兰中央拉达发出最后通牒后不久，派出以普罗相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乌克兰与拉达代表谈判。12月19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基辅谈判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由普罗相提出的关于同拉达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并于次日将条件发给了拉达。

看来我们能够拿下来。

握您的手，等您明天回来。

我们颁布了关于电报员劳动义务制的法令，其中包括一系列惩罚的威胁（预料可能发生与立宪会议有关的电报员罢工），坚决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停止乌克兰内部的战争

——致契切林^①的电报

（不晚于 1918 年 5 月 4 日）

安东诺夫^②为寻求本人及其部队的出路，建议授权靠近前线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组织国境警卫队。越过边境的安东诺夫部队应打出白旗，解除武装。他同时声明，如果这一点得到执行，他将正式辞去自己的职权，并将其转交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好像没有这个机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使德国人失去入侵俄罗斯联邦的借口，而停止乌克兰内部的战争。我们这里大家都认为，必须尊重安东诺夫的请求。上述命令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下达。首先以无线电报发给沃罗涅什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罗斯托夫，以及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这样的命令将加快停战的实现，有利于我们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报道，原来决定对利戈夫以南的科列涅沃的进攻没有进行。我们的部队稍微撤了一点。人们相信，撤退并非是无秩序的，很快就会被制止。

① 契切林，时任代理外交人民委员。

② 1918 年 5 月 4 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议的要求，苏维埃军队要撤离乌克兰并被解除武装，所以他请求解除自己担任的南方各共和国最高总司令的职权。当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对乌克兰各部队和顿涅茨克工人共和国下达了关于将武器交给俄罗斯联邦军事当局的命令。

这里没有中央的全权军事代表

——致列宁、托洛茨基的信

(1918年6月22日)

1918年6月22日，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

我写简单些，时间太少，忙得团团转。

1) 粮食事务正走上轨道^①，如果多运来一些印花布和小面额纸币（不要大于500卢布），事情就会更好。

2) 在外部战线，以及特别是在内部战线，战争情况都明显恶化。专家都是些死气沉沉、脱离实际、完全不适于国内战争的人。与此同时，哥萨克并没有睡觉，他们一遇机会便会同奥伦堡的哥萨克联合起来，将中央地区与南方产粮区隔断。我不想为自己谋取任何军事职务，但军区司令部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一摊事。我感到不这样也不行，没别的办法。现在我认为，如果我拥有直接的正式的干预和任命的授权，诸如任命部队和司令部的政委、出席军区司令部会议以及在南方代表中央军事权力机构，将会对工作有利。你们自己想想，前些天专家科瓦列夫斯基被某一位“政委”逮捕了，而斯涅吉廖夫只是由于上了前线才幸免于逮捕。还有，泽金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诚实可靠的，但另一位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挥霍公款的人，等等，等等。必须立即纠正所有这些毛病，但谁“应该”来干这件事呢？中央一下子不可能弄清情况，而这里又没有中央的全权（军事）代表。你们是否知道，彼得罗夫和他的整个司令部不知为何去了莫斯科，而

^① 斯大林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9日的决议，到察里津领导南方的粮食征集工作的。

他的“集团军”因此而完全瓦解并为哥萨克开放了道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所宣布的对哥萨克人的动员同我们自己开了个恶毒的玩笑，我们武装了数千哥萨克人，他们从我们的司令部得到了火炮和弹药，然后就离开了我们，现在正用我们的炮弹打我们的部队。你们是否知道，所谓顿河共和国的一些部队（顺便说一下，其中哥萨克人总共只占2%—3%）企图夺取察里津的火炮，然后轰掉当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在当地解决。

3) 在罗斯托夫前线已开始同德国人进行谈判。

4) 我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密电，但没有给我密码。请原谅，这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5) 为什么不向我通报有关的事情？

斯大林

察里津正在变成军事行动的基地

——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电报

(1918年7月11日)

托洛茨基，抄送列宁

由于时间紧，我简单地写几点。

1. 我们和你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宣布对哥萨克进行单独动员。

1) 同克拉斯诺夫^①相比，我们晚了；2)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将哥萨克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的革命的哥萨克核心，（“顿河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神话。由于那些“外来人”^②和为数不多的仍然支持我们的哥萨克的坚持，这个“政府”昨天宣布解散了。）这件事本身说明，我们所宣布的对哥萨克的动员有利于克拉斯诺夫，因为被动员的哥萨克得到枪炮以后就成千上万地转到克拉斯诺夫一边去了（他们正在主要以这种方式组建克拉斯诺夫“集团军”）。

2. 了解这件事的人一致认为，我们在顿河州的支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外来人”。在他们没有从哥萨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普遍”动员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哥萨克作为军事力量加以利用。莫斯科的“哥萨克委员会”^③脱离生活，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

① 克拉斯诺夫，沙皇俄国将军，1917年8月曾参与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曾指挥克伦斯基调往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1918—1919年领导顿河哥萨克白军，失败后逃亡国外。

② 指居住在哥萨克土地上的非哥萨克人。

③ 管理各哥萨克地区的机关，1918年5月底成立。

3. 哥萨克单独动员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在顿河州，而且也在库班-捷列克州。哥萨克人得到武器后就听命于旧哥萨克军的军官们，就进行局部的发动，开始在整个北高加索破坏铁路。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向他们提供支持的不仅有克拉斯诺夫的、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间谍。

4. 由于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完全不能适应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条件，使事情复杂化了。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专家”在心理上不能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战争，而且在于他们作为“司令部”工作人员只会“图上作业”、制定改编计划等，而对作战行动、供应事务、对军事指挥员的监督等绝对是漠不关心的，总的来说，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是客人。军事委员也不能填补漏洞。泽金不大聪明，掌握情况差，随波逐流。阿尼西莫夫觉悟较高并很机灵，但他单枪匹马。而军事指挥员及其助理们对工作是如此冷漠，以至于在季霍列茨克交通线中断两天之后，他们——斯涅萨列夫和泽金——还打算去巴库（尽管没人邀请他们去那里），只是由于我的抗议（我指责他们逃跑）才迫使他们推迟了行期。而且我不能不指出，他们虽然留在了察里津，但并不努力采取措施恢复中断的交通线，直至今天。

5. 所有这一切，以及南方（我管辖的范围）的粮食问题成了军事问题这一事实，迫使我不得不干涉司令部的工作。我已不想多说，由于北高加索军区的各司令部在供给事务上明显的敷衍塞责，各条战线和各地段司令部的代表团要求我进行干预。我向司令部派去了三位同志（根据当地人们的建议按我的要求，其中一人被任命为军事监察处主任（鲁希莫维奇），其余两位为助理（瓦季姆、巴尔霍缅科）。这三位同志发现了一系列不能允许的疏漏，找到了几门大口径火炮和几辆装甲汽车，泽金曾否认有这类武器，而前线由于没有这些武器已经吃了两三个星期的苦。找到的火炮被投入使用了。后来发现了一种通病：我们有许多指挥员，但司令部不善于（或不愿意）使他们服从

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种毛病的话，道路是不会中断的。当卡尔宁前线与补给点的联系被切断，北方与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时，我认为自己无权对这种情况袖手旁观。我将纠正地方上的这些和许多其他毛病，我正在采取（和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直至撤掉那些毁坏事业的官员和指挥员，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困难，但必要时我将摧毁它们。与此同时，很清楚，我本人要对所有上级机关承担责任。

6. 察里津正在变成弹药、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等等的基地。这里不需要像斯涅萨列夫这样的萎靡不振的军事指挥员。你们那里有没有其他人选？军事委员应该是军事工作的灵魂，是领导军事专家的灵魂，但在察里津却相反。（请给阿尼西莫夫派一位比泽金强的同志。）

7. 特里丰诺夫“屈服了”，成了忠顺的人，但作为军事委员不适合。我们派他到你们那里当催办军事物资的代表，他看来适合干这项工作。阿夫托诺莫夫同法国人交好，一般认为他听任哥萨克匪帮破坏铁路。各级司令部的大门不知为什么都向法国代表团成员敞开，而且，根据同志们的证明，我们库班人反对德国人的冒险行为是由法国人和相信他们的没头脑的人一手造成的。我声明，如果他们（法国人）落入我的手心，我决不放过他们。

8. 为什么不用在察里津无所事事的海军驱逐舰去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①呢？

人民委员 斯大林

察里津

1918年7月11日

① 1918年5月底，准备遣返的由约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发动叛乱，祸及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绝对必要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收到了你的信，谢尔戈，以及卡尔宁的问候。我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要直接转入工作。

1. 第一个问题。铁路交通中断，一方面，俄罗斯与惟一的产粮区处于完全被隔绝的状态，这使得饥荒不可避免（请注意，通往基兹利亚尔和彼得罗夫斯克的道路也中断了）；另一方面，罗斯托夫前线与供给中心的交通也中断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条战线的崩溃。如果交通不能迅速恢复，北方的饥饿暴动和失去北高加索也将是必然的。我们这里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恢复交通线，我想，你们那里要尽快找到可能的力量从南面实施突击（去济莫夫尼基的道路已被切断）。在任何情况下，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是绝对必要的^①。赶快行动，为时还不晚。

2. 你们那里有大功率电台，你们最好能同察里津建立正常联系，察里津有接收电台。您为什么不利用这一途径呢？空中航线无疑很方便，但驾驶员很调皮，不会尽心执行任务，何况对他们并不是能够始终相信的。

^① 1918年7月下旬，由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顿河军对察里津的进攻，察里津与北高加索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在捷列克，哥萨克白军也取得进展，建立了捷列克边疆区“临时人民政府”。格罗兹尼和基兹利亚尔也相继陷落。当时奥尔忠尼启则作为驻俄罗斯南方的特别政治委员，在捷列克州负责镇压捷列克哥萨克的暴动。

.....

4. 请收集一些有关粮食装运数量的情况，第一，正在运输中的，第二，在各征集点上的，立即告知。

5. 你们那里同德国人的谈判进展如何？库班州和捷列克州的政治形势如何？

6. 给您寄去密码。

人民委员 斯大林

又及，传闻卡尔宁将要离职。我们都坚决请求他在这严峻时刻不要离开岗位。

请提供一封您亲笔签名的信件

——致列宁的信

(1918年8月31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沃罗涅什的形势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不稳定，如果不是没有希望的话。同时，沃罗涅什和沃罗涅什前线对整个南方战线来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米宁、伏罗希洛夫决定派一个由信得过的人组成的小组去沃罗涅什工作，以便清洗沃罗涅什和沃罗涅什前线的反革命分子。我请求为他们提供一封您亲笔签名的信件，使我们派往沃罗涅什去的同志能够直接进入最重要的岗位。请答应我们的请求，我请求您！

紧紧握手，您的 斯大林

1918年8月31日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两个星期没有运来任何东西

——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7日)

您好，亲爱的伊里奇！

时间少（成天忙于前线事务），我直接写问题。

事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察里津仓库里的所有储备品都已用尽，而莫斯科两个星期以来没有运来任何东西。一点东西（哪怕是一颗子弹、一发炮弹）也没运来。这是某种犯罪性的掉以轻心，简直就是叛变行为。如果这样拖下去，我们无疑将输掉南方的这场战争！^①

您的 斯大林

1918年9月27日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在写这封信的当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报，对南方战线失利的原因作了申述，提出了扭转局势的措施，特别提到了弹药装备不足的问题。

关于消灭马赫诺叛军的进展情况

——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亲自转交

托洛茨基

第一，据未经证实的情报，马赫诺的军队不超过 1000 骑兵和 2000 步兵^①。第二，对马赫诺的包围在几天前已经开始，将于 9 日完成。为了得到更多不利于马赫诺的材料，以便瓦解其已经发生分歧的同伙，颁布了关于对付波兰军队的命令。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正在落实您关于开展广泛运动的建议。^②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斯大林在 1 月 10 日的补充电报中核实了马赫诺部队的准确数字：“马赫诺分布在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克和波尔塔瓦各地的部队共有约两万步兵和骑兵，其中三分之二是在红军困难时期落入马赫诺之手、而现在倾向于我们的原红军，余下三分之一是某种程度的效忠者”。

② 1929 年 1 月 9 日，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马赫诺及其同伙为临阵脱逃者和叛徒，所有对其给予支持和掩护的人也都将无情消灭。

有关高加索战线的兵力部署

——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莫斯科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密电已收到。高加索战线的兵力不少于 25 个步兵师和 10 个骑兵师，我认为，可以根据您的建议调走 6 个师去对付波兰军队。留下的兵力将能够勇敢地守住巴库油田。格鲁吉亚并不危险，如果允许其中立的话。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关于西南战线的战况

——致列宁的电报及列宁的批示

(1920年5月29-30日)

副本

绝密

密码电报

发自集团军电报局

025836 С Л, 5月29日21时32分

5月30日11时35分收

5月29日第295号21时25分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1. 克里木战线的局势由于邓尼金军队有突破战线的危险及我方指挥不力而令人十分担忧。为避免这个危险，我们撤换了第13集团军司令，派祖尔^①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下级指挥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增补到第1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建议由共和国野战司令部掌管的总参谋部的阿拉富佐担任第13集团军参谋长。请托洛茨基同志一定支持将阿拉富佐速调西南方面军任职的请求。

2. 关于方面军司令部转移一事，未采取极端措施。司令部仍留在哈尔科夫。

① 祖尔，当时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4集团军、后任第1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3. 骑兵集团军的展开已结束，开始实施6月1-3日前在别尔季切夫地区发起进攻的计划。

4. 请要求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遣其工作人员时一定要经西南方面军政治部同意。

5. 调瓦利多夫及其他政治工作人员归我指挥，以便掌握西南地区的巴什基尔旅。

6. 我将于29日夜去克列缅丘格等地。

斯大林

5月30日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秘书处解码。

约·斯大林

附：列宁批示

“托洛茨基同志。如果您没有这份及其他所有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秘书处解码的电报的话，请您立即给斯大林发一份由我签署的密电：‘请将所有战报也发一份给托洛茨基，不然的话有误事的危险。’

列宁”

就弗兰格尔包围敖德萨的来往电函

——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1920年6月4日)

副本

秘密

密码

1920年6月4日第4620号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在讨论克里木问题时请注意如下刚刚由各方面获得的材料：

“弗兰格尔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军队将进攻阿廖什基-赫尔松地区，另一部分军队在敖德萨登陆（6月10-15日），以便从两面包围敖德萨。”

斯大林

托洛茨基同志：应通知总司令并要他作出结论。接到他的意见后，把您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结论寄给我，我们在电话上谈一谈（如果会议结束得不晚）。

(列宁手书)

我不理解这种办法：为什么叶戈罗夫不直接向总司令报告，他有义务这样做——这样绕弯子破坏了各种关系的稳定。

(托洛茨基手书)

这里面大概有点任性。但是要尽快讨论。有哪些非常措施？

(列宁手书)

弗兰格尔将在秋季之前被完全消灭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4日)

莫斯科，只发列宁，急件

洛佐瓦亚，8月4日

我通报有关克里米亚前线的下述情报以便您了解形势：第一，在7月30日前，敌军在前线和最近的后方共有步兵36000人、骑兵14000人，其中投入战斗的有步兵18000人、骑兵8000人；我方前线和最近的后方有步兵40000人、骑兵6000人，其中投入战斗的只有步兵10000人和骑兵5000人（其余的正在到达和集结中）。这就是我们当前失利的原因。这样，敌军的直接预备队有骑兵6000人，步兵18000人，我军的直接预备队有骑兵1000人，步兵3万人。很明显，如果从后备兵力来说我们的步兵还算好的话，那骑兵可就差多了，因为敌军骑兵是我们的两倍多。第二，刚刚收到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划分战线，而是加强克里米亚地段，在不破坏西南战线机关的情况下把西部地区所有集团军完整地转隶西方战线。我已在给克列斯京斯基的电报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副手，中央可在两周内给我找一位。总司令从克里米亚战役一开始就使人为难，因为他（不光是他一人）对弗兰格尔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总是拖延履行自己的许诺，结果等于是让弗兰格尔为所欲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要把它们写出来是一件很无聊的工作。至于我们的外交，我保持沉默，最好见面时再谈。第三，您想必已经知道，我们攻克了科维尔、卢茨

克和布加奇。

第四，刚刚向我转达了您关于中央全会期待了解有关战线前景的询问。我不知道，您本人还需要我的意见是为了什么，所以我无法转告您所要求的结论，而只能限于通报一些纯粹的不加任何说明的事实：布琼尼的迟滞是暂时的，敌人向布琼尼投入了利沃夫、卢茨克、加里西亚集群以救援利沃夫。布琼尼坚信，他将粉碎敌人（他已经抓了大量俘虏），但显然还要早些时候才能拿下利沃夫。一句话，布琼尼的不顺利并不意味着发生了有利于敌方的转折。至于弗兰格尔，我们现在尽管由于上面所阐述的原因而力量薄弱，但仍然制约着敌人，最晚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将投入 3 万新锐步兵，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将造成我们的优势，将弗兰格尔赶出其阵地。我们的情况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因为迟到的部队将抵达。当然，战争就是赌博，估计到一切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能够作一般的预测，弗兰格尔的机会必定要丧失。各战线总的前景我看是这样的：波兰精疲力竭，需要喘息，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使资产阶级波兰无法恢复元气的条件；弗兰格尔在最近几天内就会被击退，而如果总司令给我们调来骑兵的话，弗兰格尔将在秋季开始之前被完全消灭。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见面谈谈东南地区的事情

——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7月27日)

嘿，朋友！

我打算8月10号去罗斯托夫，然后到莫斯科。如果能见面谈谈东南地区的事情^①就好了。如果可能的话，给我准备十来普特的面包，当然，如果没有就算了。

紧握你的手。

向布琼尼、布勃诺夫^②致敬！

你的 斯大林

① 指清剿土匪的情况，1921年时土匪是苏维埃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② 布勃诺夫，1921年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和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东南局委员。

查清土耳其斯坦前线的情况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4月21日)

发文：莫斯科4月21日7时55分

收电：4月23日10时30分

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1922年4月21日，中央委托你立即赶往塔什干，自你到达之日开始的一周内，从顺利肃清费尔干纳和布哈拉地区巴斯马奇匪帮的观点出发，查清土耳其斯坦^①前线的情况，并将你的结论尽快报送中央委员会。中央决定了解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的军事情况，而且，你必须取得土耳其斯坦政治局的协同，定下了解军事情况的期限，并将一切报知中央。在你做出结论时必须回答如下问题：

第一，当地地方部队是向巴斯马奇匪帮供应了武器吗？

第二，当地政府真的干涉军事并且把军事部门的行动搞瘫痪了吗？

第三，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领导机构需要进行调整吗？如何进行调整？

第四，土耳其斯坦政治局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需要进行调整吗？如何进行调整？

第五，丢失布哈拉和费尔干纳会有多大危险？

第六，巴斯马奇匪帮的组成和人数如何？当地政府和党组织是如何对巴斯马奇匪帮作政治斗争的？

^① 土耳其斯坦，即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

第七，我军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其人数和对取胜的指望有多少？

第八，经过调研获得了哪些需要提请中央采取的切实的措施？

收到该密电和政治局决定的抄件后，连同你抵达塔什干的时间一起电告中央。^①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1922年4月23日，斯大林给奥尔忠尼启则发电报一份，内容如下：“你过3、4天动身的通报我已收到。没有补充指示了。”1922年5月12日，奥尔忠尼启则寄来了完成受命情况的总结。

关于处理布哈拉问题的意见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5月14日)

5月14日

塔什干，奥尔忠尼启则

所有来电均已收到。中央的回电只有等明天才能发给你，今天我已不能召集中央会议。暂时把我个人关于布哈拉^①的意见告诉你。埃里阿瓦的事不妥，因为战端一开，占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问题只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占领^②。我明白，在实施占领的同时必须对主张返还被赎回土地的民族的、宗教的割让路线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有关对于布哈拉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的指示已在3个月前下达给中央委员会。穆赫吉诺夫这个人很危险，他是阿富汗现行政策的主要责任者。没有贫下中农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府要么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复辟艾米尔。我劝你在布哈拉事务上没有霍贾耶夫不要轻易做出判断，土耳其斯坦人至今在布哈拉问题上还没有表现出客观性。把霍贾耶夫和其他人派到塔什干去很好，要详细地跟他们讲一讲，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关于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右翼共产党的事，你的意见是对的，召回萨法罗夫。我的意思是削弱推行强行分化路线的左翼共产党，显然，应该把他们彻底击溃。应当解散布哈拉的左翼势

① 布哈拉，指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

② 指已经开始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反对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巴斯马奇匪帮的军事行动。

力，穆赫金这个人应该赶走，他的追随者是恩维尔的代理人 and 走狗。

我完全支持解散布哈拉共产党。关于索科洛夫和彼得斯，不应当听土耳其斯坦人的，可以让他们自我检查一下，自己从中得出结论。霍贾耶夫就不要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了，有拉希姆巴耶夫就足够了。在法院审判问题上，克富连科是对的。土耳其斯坦人要求自己比乌克兰人和其他独立的共和国拥有更多的权利，无法容忍对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娇惯，不为别的，因为他们不应该享受这种娇惯。最近两年的事实证明，他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富斯古洛夫，我不反对把富斯古洛夫调回来。需要巴拉诺夫……对于阿塔巴耶夫、丘拉库洛夫，还有其他一些人的随心所欲，大家已经厌烦了。如果认为古谢夫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那是危险的。古谢夫依靠当地一些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编造谎言，只有通过对错复杂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核查，才可得出自己的结论。毫无疑问，中央在决定其组成时需征得你和埃利阿瓦的同意。我们还得在塔什干多待两天，不要因此而骂我们。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察里津不能丢！（电影镜头）

(50)



阿·托尔斯泰著《保卫察里津》

察里津保卫战态势图



苏 波 冲 突

波兰军队正在彻底崩溃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13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列宁

波兰军队正在彻底崩溃，波军失去了通信联络和指挥，波军的命令经常到不了地方，而是落在我们的手里。一句话，波军一片混乱，短时间内无法很快恢复。看来，寇松非常了解这一情况，他现在正竭力以建议媾和的形式挽救波兰人^①。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来解释有关弗兰格尔的建议。因为随着波兰的失败，弗兰格尔将失去其意义，英国人也会失去克里米亚。您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是想从我们手中夺走胜利。我建议：第一，在关于波兰的复照中不要给予肯定的回答，总的意思要强调俄罗斯是爱好和平的，并且说明，如果波兰真的想要和平，它可以直接向俄罗斯提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第二，关于弗兰格尔，首先要强调，寇松在弗兰格尔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调停，如果已经进行，也不能证明是有效的，其次要指出，克里米亚还没有脱离俄罗斯，而俄罗斯将独立解决所有内部问题，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问题。我想，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在波兰失败的时刻——这样软弱，而我

^①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20年7月11日向苏维埃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红军停止向由协约国最高委员会1919年12月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线那一侧的进攻。波兰由于战场上的形势对其不利而承认了这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随后被称为“寇松线”。

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正因如此，我们表现得越强硬，对俄罗斯和国际革命来说就越好。请告知政治局的决定。^①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1920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拒绝英国在俄罗斯联邦和波兰之间进行调停的建议，红军部队继续向波兰境内进攻。次日，向寇松发出了相应的照会。

抓紧使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

——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2日)

哈尔科夫，7月22日

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伏罗希洛夫

第一，西方战线的推进正在顺利地进行，波军第一道防线——涅曼—沙拉一线——已在斯洛尼姆地区被突破，如果波军无法将我们阻止在第二道防线——布格—那雷夫一线，那么波军肯定要退至第三道防线——维斯瓦—桑河。现在，西方战线部队比西南战线部队距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近一些。根据这一情况，您的集团军可以放弃布列斯特方向而转向偏南一点。

第二，您应该是知道的，我们拒绝英国的调停——它曾建议我们同波兰停战，同时表示同意进行谈判，如果波兰不经中间人自己向俄国提出的话。您知道，如果波兰自己向我们提出停战，我们就不能拒绝。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抓紧使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

第三，我们正在为您准备增援部队，授权西南战线在顿河、库班、北高加索动员志愿人员，由该战线首先设法加强您的集团军。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党中央请你们再加一把劲

——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的电报

(1920年7月23日)

亲自译出，哈尔科夫，7月23日

第1骑兵集团军，伏罗希洛夫、布琼尼

收到了波兰关于不经英国调停进行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7月30日以前给予答复。你们当然明白，我们不得不同意。因此，要求你们以最快速度向利沃夫方向进攻，必须尽力在30日以前最大限度地夺取能够夺取的地区。我们关于利沃夫的最新命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党中央请你们再加一把劲，可能是最后的努力，然后休息。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我们正在准备进攻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4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只送列宁
哈尔科夫，7月24日

第一，布琼尼战线的情况很好。看来，敌人的目的是疲惫布琼尼部队，他们化整为零，每次出现新的部队，都像苍蝇一样缠扰布琼尼。这种情况使我们的部队推进有点慢。昨天我们命令布琼尼突破防线，于7月30日前占领利沃夫，这次战役可能获得成功。第二，在克里米亚战线，我们正在准备进攻，这次**进攻**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8月5-10日。如果敌人不能**抢在**我们之前的话，这次战役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正在采取保证措施。第三，作为对您371号便函的回答，谈谈我的意见。现在，我们有共产国际、被战胜的波兰以及多少还说得过去的红军，而另一方面，协约国得到喘息的机会，这有利于波兰改组和重新武装其军队、组建骑兵，然后再进行突击。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前景下，不去鼓励意大利的革命就太不应该了。应该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同协约国直接斗争的地带，因而转弯抹角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其意义，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执行进攻政策（不要同莽撞的政策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想在**外交**上保持我们不久前所赢得的那种主动权的话。因此，应该把在意大利以及像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应该予以粉碎）这样的还不怎么强的国家组织起义的问题提到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德国有30万流氓无产者，如果让他们实际上存

在于自然状态的话，他们当然不会去改变、也改变不了现状。简单一点说，应该利用现在帝国主义还来不及修理其散了架的破战车的机会——它还是能够在某个时期来修理这辆车的，它现在还没有转入坚决的进攻——起锚，开航。第四，电话交谈不行，因为有人窃听、干扰。有关前线的状况我将每天向您简要通报。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恢复以师为单位采取行动的旧策略

——致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电（摘录）

（1920年7月25日）

……你们的骑兵部队最近一周采取的缺乏骑兵风格的行动令人感到吃惊。在此之前你们一般是以师为单位采取行动，对敌人搞包围，以大兵团打击敌人。不知何故你们现在倒以小分队为单位行动起来，一个师的几个骑兵连拆借给另一个师，大兵团被拆成小股部队，大兵团失去了骑兵队特有的雄威。一句话，你们的行动像个训练无方的步兵队的行动，因此敌人常常会把你们包围，插入你们的后方。我再说一遍：你们过去没有这样的情况。据我猜测，骑兵变成步兵的事情始于总参谋部的步兵参谋到达你部野战司令部之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请你们今后别再受这些没有骑兵部队工作经验的总参谋部步兵参谋的影响并恢复以师为单位采取行动的旧策略。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把你们的意见告我。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请通报有关同波兰停战的计划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官

只发列宁

哈尔科夫，7月29日

在整个克里米亚战线，激烈的战斗在继续，奥列霍沃和邻近的车站几经易手。弗兰格尔展开全线进攻的同时，还企图破坏我们准备发起的进攻或至少挑动我们进行过早的和准备不足的进攻。弗兰格尔可能获得局部胜利和我们可能丧失某些地点不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但要求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和沉着冷静。因此，我们在实施积极防御的同时，决心继续顽强地集结有生力量以准备主要突击。弗兰格尔在向我们猛扑和冲击之后，最终将消耗自己的力量并面临我们有力量的打击。请通报我有关同波兰停战的计划。布琼尼报告说，由于骑兵部队疲劳过度，看来在30日以前不能攻克利沃夫^①。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当天斯大林和叶戈罗夫给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发报，认为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不可能如期完成攻克利沃夫的任务的回答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并再次命令占领利沃夫。

痛打波兰人而别管期限

——致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第1骑兵集团军

布琼尼、伏罗希洛夫

我们成功地争取到，停战条件将由我们在8月4日转交给波兰人，而不是7月30日。就是说，你们还掌握有4天时间。此外，在接到战线正式命令之前，你们可以痛打波兰人而别管期限。我完全正式地向你们通报所有这些情况。就这样，你们攻打利沃夫吧，现在你们有时间。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总司令想起来要调动兵力已经晚了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31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只发列宁

我已通报过，总司令要到我们前线来。今天他来电说，由于西方战线的形势，他已取消了这次出行。我觉得，他是害怕了，被弗兰格尔的行动吓破了胆，不想把自己与我们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看来，他不相信这些战役会成功，尽管他取消了这次出行，但很清楚，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弗兰格尔继续全线疯狂进攻，被格鲁吉亚扣留的邓尼金部队^①也已在弗兰格尔指挥下同我们在前线交战。在奥列霍沃地区，经过激烈战斗后，我们损失了6门火炮，在别尔江斯克地区敌人在向前推进，占领了上托克马克，击毁了我们的一列装甲列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集中兵力和开始突击之前还会继续失利。而我们的兵力虽然在集结，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进行得很慢，主要原因是，总司令想起来要调动兵力时已经晚了，尽管我曾多次提醒过他。今天晚上我要同战线司令员一起去前线。

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① 这里指的是格鲁吉亚根据1920年5月7日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扣留的格鲁吉亚境内的邓尼金部队。

建议中央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调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8月30日）

中央政治局

我建议中央组成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调查我们在西方战线的7月进攻和8月退却的条件^①。给委员会两周的期限。委员会主席（如果中央没有最合适的人选的话）我建议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②

约·斯大林

原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
（1912—1927）》1996年莫斯科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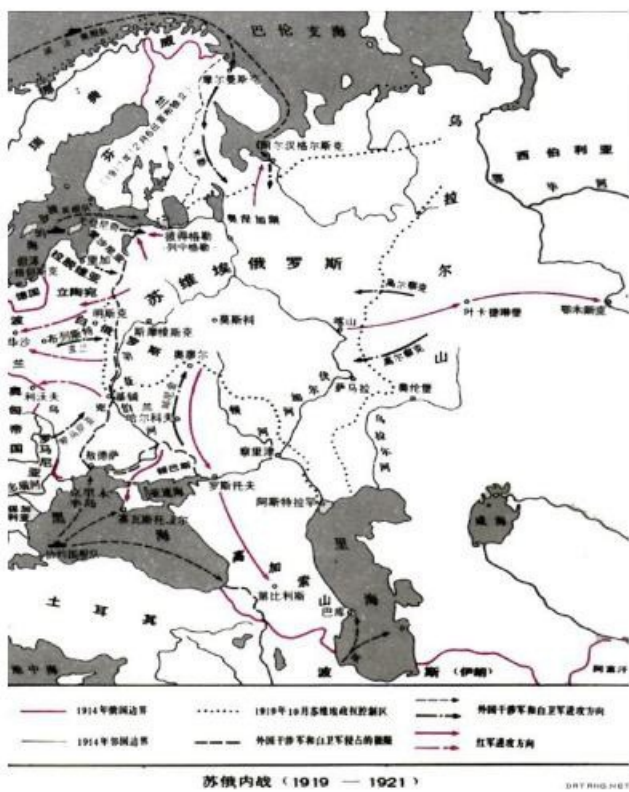
① 在1920年夏天的俄波战争中，红军曾一度打到华沙城下。8月中旬波兰军队转入反攻，于月底将苏俄军队击退到波兰边境。红军遭受严重失利，后来签订的和约使苏俄失去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② 1920年8月30日，斯大林向政治局递交声明，认为波兰战线的失利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错误造成的。他认为，军事政策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像样的后备部队，他建议建立“共和国战斗预备队”（参看新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7-250页）。9月1日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斯大林的建议。会议通过了“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议采取措施”的决定。



头戴“布琼尼”军帽的斯大林

(63)



国内战争态势图



斯大林在前线(画)

外交斗争

(战时和战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把俄罗斯推入战争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18年7月17日）

收到了你的信，谢尔戈，以及卡尔宁的问候。我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要直接转入工作。

.....

3. 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和穆拉维约夫在萨马拉附近的冒险行为您想必知道。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把俄罗斯推入战争，打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凶手被枪毙了。由于此事，德国人要求派一个营来莫斯科保卫大使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并声明，俄罗斯将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直至战争来坚持拒绝。列宁认为，德国人将会让步。同时，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建议卡尔宁要格外保持警惕并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以应付不测事件。穆拉维约夫想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行为，企图向捷克斯洛伐克人开放战线，把军队调往莫斯科和彼得堡。穆拉维约夫的企图未能得逞，他被枪毙了。

.....

人民委员 斯大林

关于芬兰局势的来往便条

——斯大林、列宁、斯克良斯基

(1919年7月21日)

副本

1919年7月20/21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致列宁

总司令致电西线各司令部说，我们与芬兰处于战争状态。这样的电报只会引起并已经引起挑衅滋事。请向总司令解释，他无权宣战。请约束住总司令。

斯大林

斯克良斯基同志：您的意见如何？在我看来，这是吹毛求疵，总司令在发出这一声明之前曾向我征求过意见。

顶多可以这么做：请现在告诉总司令，要他发布一道命令——“既不要向别人挑衅，也不要受别人挑拨”。密令。

[列宁]

也许是出于愚蠢，也许是由于误解了您的话，因为您大概对他[总司令]说过，我们在与所有的国家作战。我会嘱咐他谨慎一些的。

(斯克良斯基)

关于援助阿富汗起义者的问题

——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1921年11月2日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天贾迈利-帕沙在我这里（苏里茨也在场）。从谈话中（对我来说至少）发现（谈话持续了三小时）：

1) 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将贾迈利的要求缩减一半，而对起义者的要求缩减80%。

2) 我们应向喀布尔给贾迈利派去10名或5名有经验的军事教员——穆斯林（伊斯兰教徒）（这样的人员我们这里是有的），形式上是去帮助贾迈利，实际上是对资金和军事装备消耗是否正确进行监督（贾迈利也不反对）。

我很清楚，构成印度河和旁遮普地区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部族（贾迈利在这个部族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可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如果英国在1922年春天或夏季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给它以最沉重的打击。此外，如果我们有可能使贾迈利在阿富汗至少有一个由我们的和土耳其的教官参加的旅（组织得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为阿富汗的反英力量建立一个实用的基地。这个基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没有它，第二个任务（对印度起义运动的直接影响）就不可能完成。所有这一切，我们得一次性直接向起义者领袖们支付10万卢布才够，另外为供养土耳其和俄国穆斯林教官需10万金卢布，补加6000支步枪（英国的或德国的）、几百万发英国枪械子弹、12挺马克西姆机枪、12或8门炮，最后加1个穆斯林印刷所。

我想，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做。否则，我们就要冒削弱我们在阿富汗势力的风险（那么就会相应地强化英国的势力），并且在国际形势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失去在春季或秋季沉重打击英国的机会。

我想，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明天就要政治局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①

斯大林

^① 在1921年11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做出决议：“给指定的目的增加拨款20万金卢布。指派两名完全掌握了外语的同志和五名以内的助手去”。

为阿富汗的反英势力创建一个基地

——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天杰马利-巴夏到我这儿来过（苏里茨也在）。经过交谈（持续3个小时）搞清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1) 我们应当给予支持，但要将杰马利的需求减少一半，而将起义者的需求减少80%。

(2) 我们应当给杰马利派10个或5个经验丰富的穆斯林军事教官（我们有这样的人）到喀布尔去，表面上是帮助杰马利，实际上是为了监督资金和军事装备的使用情况（杰马利不反对）。

我很清楚，印度河谷地和旁遮普地区大都是穆斯林部落，杰马利在他们中间影响很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地，如果1922年春季或夏季英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基地对英国造成重创^①。此外，如果我们能让杰马利在阿富汗有至少一个（装备精良的）旅，再配备上我们的和土耳其人的教官，我们就会为阿富汗的反英势力创建一个现实的基地，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舍此第二项任务（对印度的起义产生直接影响）就无法完成。为此我们要向起义军首领一次性提供10万卢布，另外每年要为土耳其和俄罗斯穆斯林教官支付10万金卢布薪水，还要提供6000支（英式或德式）步枪、数百万发英式手

^① 尽管英国与阿富汗签订了英阿条约，英国承认阿富汗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是苏维埃俄国继续为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抗英运动提供军事及物质援助，俄国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关系仍十分紧张。

枪子弹、12挺马克辛机枪、12门或8门大炮，最后还要建一个穆斯林印刷厂。

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这些事。否则就会削弱我们对阿富汗的影响（英国的影响将随之扩大），即使国际环境允许，我们也不可能在春季或夏季对英国发起进攻。

我想，此事不宜拖延，明天政治局就应当作出最后决定。

约·斯大林

1921年11月2日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
全宗，第2目录，第51卷宗，
第1打字稿。斯大林手稿。

该好好教训英国的总委员会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和尼古拉

1. 你们的最近（6月24日）的来信以及政治局关于英俄团结委员会的决定收到了，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我指的是总委员会），不是单纯的斥责，而是**认真地**教训。他们可能要闹分裂，以“证实”自己“不依附”于莫斯科，从而得到张伯伦的赞赏。但是闹分裂将使他们比在煤矿罢工时期输得更惨，因为现实出现的战争危险触痛了，而且是**深深地触痛了所有的工人**。他们试图利用枪决事件^②来捞一把，但这并不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你们能就此发表理由充足的声明的话。应当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挑明。他们这是在**帮助自己的主子发动和进行战争……**

……

6. P. 投向“左派”不足为奇。这就意味着他暂时失去了“配合”、“机动”等的可能性。而米高扬在政治上则还是只雏鸭，是有才能的雏鸭，**但毕竟是雏鸭。他会成长并成熟的。**

① 1927年6月24日政治局通过政治局委员会的下列建议：召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并在会上通过谴责导致同团结委员会决裂、支持保守党政府政策的总委员会的决议。

② 1927年6月9日根据国家政治保总局局务委员全的决定，枪毙了从事恐怖活动的20名白卫分子。

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6月27日^①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6月27日。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初)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我病了，躺在床上，所以简单写几句。

- (1)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不错^①，李可夫的答复很糟^②。
- (2) 托姆斯基的报告差劲^③。
- (3) 我赞成对伊先科和瓦连廷诺夫提出警告^④。
- (4) 该让托洛茨基去日本。
- (5) 如果需要或是全会延期，我可以出席全会。
- (6) 布哈林关于中国的文章^⑤写得很成功。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托姆斯基与总委员会代表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会谈发表的宣言，宣言于1927年6月28日得到政治局批准，其中有批评总委员会的内容。

② 指李可夫对英国工会活动家抗议苏联枪毙20个白卫分子的电报的答复。

③ 指托姆斯基1927年6月28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的报告。

④ 1927年秋，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了伊先科和瓦连廷诺夫反党派别活动问题，两人被开除出党。

⑤ 指布哈林的文章《中国革命的目前局势》，刊载在1927年6月30日的《真理报》上。

目前韩德逊掌握在我们手里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我和伏罗希洛夫（谢尔戈早已去了纳尔奇克）讨论了你的来信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 关于英国。如果韩德逊^①不再提供新的理由作出让步（这不太可能），那么最好将英国问题放到粮食收购最高潮时，即10月中旬或月底，届时将可以召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例行会议，届时将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并大致通过如下决定：

“（1）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做法；

（2）认为没有根据去违反初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通行原则，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今后协调解决一切争议问题、要求和反要求的必要的法律基础；

（3）责成苏联人民委员会一俟互换大使后即组成出席苏英会议的代表团。”

我认为这是我们惟一可以接受的决定。而我们如果接受韩德逊的建议就会搞乱自己并落入别人的圈套。接受韩德逊的建议就意味着：

（1）将使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承认我国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感到困惑，并促使它们与我国断绝关系；

（2）将使美国国内不愿承认我国的势力得到加强；

（3）将证明与我国断绝关系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对的；

① 韩德逊，1911-1934年任英国工党书记，曾任不管、内政、外交大臣。

(4) 将有助于杰捷尔金格^①之流及张伯伦^②之流将重心由正常的经济关系转向债务、个人要求及宣传问题；

(5) 默认我们不仅要偿还欠英国的，同时还要偿还欠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债务，因为同意韩德逊的建议，就等于开了**先例**，其他各国势必群起仿效；

(6) 将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反苏阵线。

最糟糕的是，即使我们采纳了韩德逊的建议，我们也**达不到恢复关系的目的**，因为我们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反正不能都达成一致，同时一切情况均表明，麦克唐纳是**想严重违背 1924 年的协定^③**并强迫我们接受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条款。

目前韩德逊和麦克唐纳**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竟想成为一个比意大利法西斯和法德资本家更资产阶级化的政府，而这些国家已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承认了我国。**反过来**（如果我们采纳了韩德逊的建议）**我们就会被他们攥在手里**，因为他们将瞧不起我们，他们就会说，我们并不珍惜和平事业。所以不愿就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让步，也不认为可以承认苏联。

接受韩德逊的条件就等于钻进敌人为我们设置的圈套。

我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是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政府”中的走狗的欺骗行为的惟一可行的答复。

2. 关于布哈林的问题（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等等），我们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应当把拉柯夫斯基打发到更远的地方去，让他今后没法再在报刊上诽谤布尔什维克。我认为布哈林的两封信都是在骗人。看来这位立宪民主党的副教授还不清楚，靠这种骗人的手法

① 杰捷尔金格，1929 年是英国荷兰一家石油托拉斯的经理。

② 张伯伦，1924-1929 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③ 指 1924 年 8 月 8 日签订的英苏条约。

是骗不了布尔什维克的^①。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辩护士。

关于《共青团真理报》，情况还不错。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約·斯大林

1929年8月9日

① 1929年7月3-1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同意联共（布）4月中央全会关于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解除布哈林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与敌人谈判就是一种斗争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

9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1）对英国问题不要操之过急。韩德逊目前比我们更需要恢复关系。现在危险的不是已被我们逼到墙角的韩德逊，而是过于相信怀斯等坏蛋的李维诺夫。尤为危险的是奉劝我们给韩德逊以“真诚”答复的“我们的”巴黎“顾问”。这是一群韩德逊的代理人，他们为英国政府通风报信，同时又用假情报欺骗我们。简而言之，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请注意，我们不只是在同一个英国作斗争（与敌人谈判就是一种斗争），而是在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因为麦克唐纳政府是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急先锋，它用一种“新的”、更“巧妙”、更隐蔽，从而也更“有效的”方式来“损害”和“扼制”苏联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证明，它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借助于“温和的”办法）比墨索里尼、彭加勒、鲍德温更多的东西，它能成为比资本主义的夏洛克更厉害的夏洛克。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本国（而且不仅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信任。如果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对这伙厚颜无耻之徒说“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东西”，那我们就真成了最无用的人了。

.....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9日

英国问题处理得确实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

莫洛托夫：你好！

10月4日的来信收到了。

（1）英国问题处理得确实不错。韩德逊输了。李可夫、布哈林以及李维诺夫也都输了。他们看不到苏联的影响和实力在加强，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中所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变化。

.....

过几天我将回到莫斯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10月7日

卡拉汉和李维诺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9月7日）

……我收到了帕滕的草案和卡拉汉^①同帕滕的“会谈”记录。现将这两份文件送回。显而易见，卡拉汉在“会谈期间”的举止愚蠢又有失体面。卡拉汉不明白，在法国人事件之后（一个半月前塔斯社的辟谣），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提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生怕会遭到来自“反对派”的“令人不快的事”。卡拉汉不明白，虽然波兰人试图与我们开始签约谈判，但是要在表面上不是由他们提议才肯开始。卡拉汉不明白，根据谁的提议进行谈判对我们而言归根结底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签订我们所需要的条约就行。可是卡拉汉不是抓住帕滕提供的口实和他的……（此处辨认不清——俄文整理者注），却糊涂地推开了帕滕，搞坏了事。关于帕滕的草案，丝毫不比法国人最初的草案差，众所周知，这草案成了我们和法国人之间谈判的基础之一。

我认为卡拉汉和李维诺夫^②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要消除这个错误需要较长的时间。顺便问一句，为什么帕滕的草案交给卡拉汉，而不是交给李维诺夫或克列斯廷斯基^③，请务必弄清此事并向我报告……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① 卡拉汉，苏联外交官。

② 李维诺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③ 克列斯廷斯基，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对“大”国既鄙视又自信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3 年 1 月 24 日）

维亚切斯拉夫：

今天我看了国际部分^①，写得好。对“大”国既鄙视又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往耀武扬威的“列强”的锅里坦然自若地吐上一口，——太精彩了。让他们“吃去”……

斯大林

① 指的是莫洛托夫年 1 月 23 日在第六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最后部分（见 1933 年 1 月 24 日《真理报》）。

你们关于满洲事件的指示是错误的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35年10月13日）

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

依我看来，你们给……（此处辨认不清——俄文整理者注）和杰里巴斯^①的指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使日本人不受阻碍地就占领发生过战斗的那块我国领土、抢回日本人尸体，然后声称日本人在满洲国境内被打死，指责我方侵犯边境、进入满洲国领土。要是当时发出指示命我军立即占领我国的这块领土、夺取日本人的尸体以便保证我国有物证就好了。但现在已不可能纠正了，因为你们已经把指示发下去了。

你们的指示使日本人能够在离满洲国和苏联边境线纵深达3公里的我国领土内自由行动，对此我不能赞同。你们想过我国边防军人、设防地区会陷入何种状态吗？如何解释对日本恶人的这种慷慨？

给日本人的照会和塔斯社的通告显然搞得太仓促、太粗糙，但又毫无办法，相距遥远不可能进行修改。只能使其保留你们在索契所转告的那种样子。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① 杰里巴斯，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针对日本的照会和运动不能令人满意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5年或1936年，无准确日期）

……我们针对日本的阴谋和挑衅的照会和运动不能令人满意，软弱无力。你们应该不断地驳斥日本报刊和官方人士的每项失实报道。这对于争取日本、欧洲、美国的社会舆论是必须的。

而你们却在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什么也不干。应当敲打一下外交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毫无作为、盲目无知、鼠目寸光。可你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当了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游手好闲者的尾巴。我建议通过塔斯社来驳斥有关苏联和中国之间秘密条约的报道。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就法国有关建议进行谈判的策略

——致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6年8月16日)

我建议这样答复帕滕^①：苏联同意在采纳我们修改意见的条件下讨论法国的建议，但在此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意见的结果，是被采纳还是被撤销，如果被采纳那么是谁采纳，只有法国还是有其他国家？如果帕滕答复说不知道或者答复得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请通过我国驻巴黎的代办加以探询，如果其他国家所有修改意见均被撤销，而我们的修改意见成了惟一障碍，那就得接受法国的建议，撤销我们的修改意见。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① 帕滕，当时法国高级外交官。



红军早期的骑兵和坦克兵

(84)



苏联红军军旗军徽



我们红军，战争中成长

党史节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
和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年)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苏维埃政权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方面的革命措施而得到巩固(当时西方正在酣战)，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极大的惊慌。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担心，德俄两国缔结和约会有利于德国的作战地位，而相应地增加协约国前线军队的困难。其次，他们担心，俄德之间建立和平会加强各国和各战场要求和平的趋向，从而破坏战争事业，破坏帝国主义者的事业。最后，他们担心，苏维埃政权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存在以及它在推翻那里的资产阶级政权后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会使西方工人和士兵受到传染，因为西方工人和士兵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深感不满，可能效法俄国人，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因此，各协约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干预)，以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成立资产阶级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能恢复俄国的资产阶级秩序，取消对德和约，恢复对德奥的作战。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所以乐意干这种黑暗勾当，还因为他们深信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以为只要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稍微努一把力，苏维埃政权必然很快灭亡。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巩固，引起了被推翻的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被打倒的党派(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

政府主义者及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白卫将军和哥萨克军官等等更大的惊慌。

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起,就到处叫嚷: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没有根基,它注定要失败,它经过一两个星期、一个月、至多两三个月就会灭亡。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敌人诅咒下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巩固,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要比他们先前想象的强大得多;要推翻苏维埃政权,需要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很大的努力,来一场激战。因此,他们决定广泛地进行反革命叛乱工作来纠集反革命力量,搜罗军事干部,组织叛乱,首先是在哥萨克和富农聚居的地区组织叛乱。

由此可见,还在1918年上半年就已经形成了两股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明显势力:协约国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

这两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势力,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推翻苏维埃政权。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虽然有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所必需的相当的军事干部以及相当的人力——主要是哥萨克上层分子和富农,但没有金钱和武器。反之,外国帝国主义者有金钱和武器,但不可能“抽出”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武装干涉,这不仅因为这些力量必须用于对德奥作战,而且因为这些力量用于反苏维埃政权会不十分可靠。

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条件迫使国内外这两股反苏势力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就在1918年上半年形成了。

这样,就形成了以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革命叛乱为内应的外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

这样,喘息时机结束了,俄国的国内战争,即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内外敌人的战争开始了。

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没有宣战就发动了武装干涉,虽然这种武装干涉是对俄国的战争,并是一种最坏的战争。这些“文明”强盗不声不响地偷偷摸到俄国边境,驱使自己的军队在俄国登陆。

英国人和法国人驱使军队在俄国北部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支持当地的白卫叛乱，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白卫的“俄国北方政府”。

日本人驱使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夺取了沿海边区，解散了苏维埃，支持白卫叛乱分子，使这些叛乱分子得以在后来恢复资产阶级秩序。

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和邓尼金这几个将军在英法支持下组织了白卫“志愿军”，发动了哥萨克上层分子的叛乱，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两个将军在德帝国主义者秘密支持下(德国人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因为同俄国订有和约)发动了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了顿河区，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策动，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这个军是战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但是中途他们受社会革命党人和英国人法国人的利用而举行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这个军的叛乱成了一个信号，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富农、沃特金斯克工厂和伊热夫斯克工厂同情社会革命党的工人跟着也举行叛乱。伏尔加河流域成立了萨马拉白卫—社会革命党人政府。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

德国没有参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这次武装干涉，因为——至少是因为——它同这个联盟还处于交战状态。但是，虽然如此，虽然订有俄德和约，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知威廉皇帝的德国政府也如英法日美干涉者一样，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而德帝国主义者也确实是在竭尽全力来孤立、削弱和消灭苏维埃国家。他们从苏维埃俄国(诚然是按他们和乌克兰拉达^①订立的“条约”)夺去了乌克兰，应乌克兰白卫拉达之请派兵进驻乌克兰，残暴地掠夺和

① 指乌克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18年被推翻。——译者注

压迫乌克兰人民，禁止他们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从苏维埃俄国夺去了南高加索，应格鲁吉亚和阿捷尔拜疆的民族主义者之请派去了德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在梯弗里斯和巴库横行霸道。他们千方百计(虽然是暗地里)用武器和粮食援助在顿河区进行叛乱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样，苏维埃俄国同自己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苏维埃俄国在这一时期很困难。面包不够。肉类不够。饥饿折磨着工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两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根本得不到面包的时候。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工或几乎停工。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灰心丧气。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灰心丧气。这一时期所遭到的极大困难和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证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具有极其巨大和无法估计的力量。

党宣布全国为军营，并把全国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政治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人民进行抗战。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几十万工人和农民志愿加入红军、奔赴前线。党员和共青团员约有一半上了前线。党发动人民起来进行**卫国战争**，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侵犯，消灭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叛乱。列宁组织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负责为前线供应人员、粮食、服装和武器。志愿兵改为义务兵，使红军得到几十万新兵的补充；红军在短时期内就成了一支百万大军。

尽管国内状况十分困难，尽管红军很年轻、还来不及巩固，但由于采取种种防御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克拉斯诺夫将军已经被撵出他认为保证能固守的察里津，而且被赶到顿河区以外。邓尼金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北高加索的狭小地区，科尔尼洛夫将军则在与红军交战时被打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社会革命党白卫匪帮被赶出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并被压迫到乌拉尔。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团团长洛

卡尔特策动白卫分子萨文可夫在雅罗斯拉夫里进行的叛乱已被粉碎，洛卡尔特被捕。刺杀了乌里茨基、沃洛达夫斯基同志并恶毒地谋害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搞反布尔什维克的白色恐怖而受到红色恐怖的惩治，在俄国中部一切较为重要的地点都已被打垮。

年轻的红军在同敌人的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

当时在红军中任政治委员的共产党员，在巩固红军，进行政治教育、加强战斗力和纪律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知道，红军的这些成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还仅仅是它的初步成就。党知道，前面还有新的更加严重的战斗，只有同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之后，国家才有可能收复失去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因此，布尔什维克加紧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决定使整个后方都来为前线服务。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除对大工业实行监督外，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日用品供应军队和农村。它实行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搞好粮食储备、向军队和工人供应粮食。最后，它实行了遍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党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强制的体力劳动，从而腾出工人去从事其他的对前线更为重要的工作，这样就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暂时采取的这一整套措施，就叫做战时共产主义。

国家准备同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国内战争。它应当使军队人数到1918年底增加两倍。它应当积蓄供应这个军队的物资。

列宁当时指出：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三百万人的军队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87页。——译者注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 第三国际的成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正当苏维埃国家准备对外国武装干涉进行新的战斗的时候，在西方，在各交战国的后方和前线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当时德国和奥地利被战争和粮荒压得喘不过气来。英、法和北美还能不断挖掘新的潜力，而德国和奥地利连最后一点潜力也快耗尽了。精疲力竭到了极点的德国和奥地利，眼看很快就要失败。

同时在德奥两国内部，民怨沸腾，怨恨战争无休无止、招致灭亡，怨恨两国帝国主义政府把人民弄到精疲力竭和饥饿的境地。十月革命的伟大革命影响，布列斯特和约前就发生过的苏维埃士兵同奥德士兵在前线的联欢，以及后来同苏维埃俄国停战媾和本身的影响，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俄国人民通过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而结束了可恨的战争，这个实例不能不给奥德工人以教育。而德军方面那些原先在东线，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又调到西线的士兵，通过讲述他们先前怎样同苏维埃士兵联欢以及苏维埃士兵怎样摆脱了战争，也不能不在西线造成军心的瓦解。至于奥地利军队，还要更早一些，就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开始瓦解了。

由于这一切情况，德军中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了，他们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的战斗力了，他们开始在协约国军进攻之下节节败退；而在德国本国，于1918年11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威廉及其政府。

德国不得不承认战败，并向协约国求和。

这样，德国这个头等强国一下子就降到二等强国的地位。

从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来看，这种情况有某些消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变成了欧亚两洲的统治力量，

使它们有可能对苏维埃国家加强武装干涉和实行封锁，加紧围困苏维埃政权。结果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往下就可看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情况还有更为重大的积极的作用，即从根本上缓和苏维埃国家处境的作用。第一，苏维埃政权有了可能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停付赔款和进行公开的斗争(军事的和政治的)来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南高加索从德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在欧洲的心脏德国存在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必然会使欧洲各国革命化，而且也确实使他们革命化了，这就不能不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当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苏维埃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因为德国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德国白卫分子可以任意杀害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这样著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制裁，仅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德国的革命软弱无力到何等地步。但它终究是一场革命。威廉被推翻了，工人挣脱了锁链，单是这一点就不能不发动西方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欧洲国家革命的高潮。

欧洲革命高潮开始了。奥地利的革命运动展开了。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欧洲各国共产党在革命浪潮基础上出现了。

现在有了把各国共产党统一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现实基础。1919年3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虽然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迫害阻挠了许多代表来莫斯科，但是欧美各重要国家的代表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中，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指出它是真正的劳动者的民主。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他们为在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苏维埃在各国胜利而坚决奋斗。

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

这样，就成立了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国际，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

1919年3月，一方面协约国反动联盟加紧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欧洲（主要是战败国）的革命高潮大大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在这样一种矛盾情况下，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零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零二人。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第一句话就是悼念大会开幕前夜逝世的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组织者之一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说明了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特征，党纲对比了两种国家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党纲详细地指出了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具体任务；把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按照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全国经济，使工会参加组织国民经济的工作，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在国民经济中由苏维埃机关监督利用专家，逐渐地有计划地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在党纲上除载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定义外，还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旧党纲说明工业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经济的那一部分写进去。列宁认为，在党纲上必须估计到我国经济的复杂情况，指出国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其中包括中农所代表的小商品经济。因此，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反对布哈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因为布哈林建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小商品生产、关于中农经济的条文从党纲上删去。布哈林的这种观点，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又抹杀富农分子正从小农商品经济中产生

和滋长的事实。

列宁还驳斥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他们反对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写进党纲，反对民族平等，借口是这个口号会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妨碍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列宁驳倒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种极其有害的大国沙文主义观点。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工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实现了著名的土地法令，农村愈来愈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已在农村居民中占多数。中农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他们的情绪和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至关重要。国内战争的结局如何，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中农倒向哪一边，取决于哪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能吸引中农跟自己走。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1918 年夏在伏尔加河流域所以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农支持了他们。富农在俄国中部举行叛乱时情形也是如此。但是从 1918 年秋天起，中农群众在情绪上开始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农民已经看到，白军胜利的结果就是：地主重新掌权，农民土地被夺，农民遭受掠夺，鞭笞和折磨。贫农委员会击败富农，也促进了农民情绪的转变。因此列宁在 1918 年 11 月提出了如下的口号。

“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3 卷第 294 页）^①

当然，中农还没有完全停止动摇，但是他们比过去更接近苏维埃政权，更牢靠地支持苏维埃政权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对中农的政策，大大促进了这点。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党对中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列宁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决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路线。大会要求党的组织和全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12 页。——译者注

体共产党员严格地把中农与富农区别开、划分开，通过关心中农的需要把中农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必须用说服的方法，而绝不要用强制、暴力去克服中农的落后性。因此，大会指示，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措施(成立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时，不允许采取强制手段。凡涉及中农切身利益的场合，都要同他们达成实际的协议，例如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要对中农让步。大会提出实行这样的政策：在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对中农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对富农作斗争。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大体上是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这就是说，党争取中农不站到富农方面去，不站到一般资产阶级方面去。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反对白卫匪帮和外国武装干涉，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对基本农民群众即中农所采取的路线，对于胜利地结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及其白卫走狗的国内战争，起了决定的作用。1919年秋，正当需要在苏维埃政权和邓尼金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农民支持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就战胜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在会上占有特殊地位。会上出现了所谓“军事反对派”。它联合了不少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但是，除了已被打垮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参加“军事反对派”的，还有从未参加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工作者。大多数军人代表都激烈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崇拜来自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其中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直接背叛了我们)，反对他对军队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采取傲慢和敌视的态度。会上举出的许多“来自实践”的例子证明，托洛茨基曾企图枪毙许多他所不喜欢的在前线担任军事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借以帮助敌人；只是由于中央的干涉和军事工作人员的抗议，这些同志才幸免于死。

“军事反对派”虽然反对托洛茨基对党的军事政策的歪曲，但是在军事建设的许多问题上维护不正确的观点。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因为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军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队。斯大林同志在反驳“军事反对派”时要求建立一支纪律非常严格的正规军。

斯大林同志说：“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遭到灭亡。”^①

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的一系列提案，同时给了托洛茨基以打击，要求改进中央军事机关的工作，要求加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

由于大会成立的军事小组进行了工作，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使红军得到了加强，使它跟党进一步接近了。

其次，大会讨论了党和苏维埃的建设问题，即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回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的机会主义集团，因为他们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由于新党员大批涌入党内，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和重新进行登记的决议。

这是第一次清党的开始。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2页。——译者注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 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 进攻及其被粉碎。三个月的喘息时机。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协约国把德国和奥地利打败之后，决定投入大批兵力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在德国战败，德军退出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后，英法两国就取代了德国，把自己的军舰开进了黑海，派兵在敖德萨和南高加索登陆。协约国武装干涉者在占领区横行霸道，残暴到竟然整批整批地屠杀工农。到后来占领土尔克斯坦时，武装干涉者甚至猖狂到将邵武勉、菲奥列托夫、查帕里泽、马里根、阿集兹别科夫、柯尔加港夫等二十六个巴库布尔什维克领导同志解到里海东岸，在社会革命党人协助下把他们残暴地枪杀了。

不久，武装干涉者宣布对俄国实行封锁。所有与外界来往的海上的和其他的通道，都被切断了。

于是，苏维埃国家陷入了几乎四面受围的境地。

当时协约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傀儡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高尔察克被宣布为“俄国最高执政”。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都听命于他。

于是，东线成了主要战线。

1919年春，高尔察克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差不多推进到伏尔加河畔。为反对高尔察克派去了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力量，动员了共青团员和工人。1919年4月，红军大败高尔察克。不久，高尔察克的军队开始全线退却。

正当红军在东线的攻势达到高潮的时候，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可疑的计划：在乌拉尔停下来，对高尔察克军队停止追击，把军队从东线调往南线。党中央明白，不能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留在高尔察克手中，不能让他在那里靠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帮助恢复元气和重新站稳脚跟，因此否定了这个计划，指示继续进攻。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指示，提出辞职。中央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辞职，同时责令他立刻停止参加对东线战事的领导。红军开始更猛烈地向高尔察克展开进攻，使高尔察克遭到了一连串新的失败，并在白军后方的强大游击运动支持下从叛军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1919年夏，帝国主义者责成领导西北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勒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借以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彼得格勒附近两个炮台的守备部队受旧军官的反革命煽动，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在前线司令部中又发现了反革命叛乱。彼得格勒岌岌可危。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措施，在工人和水兵的支持下，从白军手中解放了两个叛乱的炮台，打败了尤登尼奇的军队，把尤登尼奇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

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失败，有利于反高尔察克的斗争。1919年底，高尔察克军队被彻底击溃。高尔察克本人被俘，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

这样高尔察克就完结了。

当时，西伯利亚民间流传着一首嘲讽高尔察克的歌谣：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叶，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脱落了，

烟叶吸完了，
执政王不见了。”

武装干涉者看到高尔察克没有实现他们所寄托于他的希望，就改变了他们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敖德萨的陆战队不得不撤回，因为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同苏维埃共和国军队接触后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感染，开始起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例如，敖德萨法国士兵举行了起义。因此现在，在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协约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科尔尼洛夫的同僚和“志愿军”的组织者邓尼金将军身上。当时邓尼金正在南俄库班地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勾当。协约国供应邓尼金军队大批武器装备，驱使他北上去反对苏维埃政权。

于是，南线这次成了主要战线。

1919年夏，邓尼金开始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大进军，托洛茨基把南线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使我军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到10月中旬，白军控制了整个乌克兰，攻占了奥勒尔，逼近到供应我军子弹、步枪和机关枪的土拉。白军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党敲响警钟，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列宁提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口号。在布尔什维克鼓舞下，工人和农民集中了全力来歼灭敌人。

为了组织好歼灭邓尼金的战事，中央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布琼尼四同志派往南线。托洛茨基被撤销领导南线红军作战的职权。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之前，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曾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察里津经顿河草原前往诺沃罗西斯克，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但红军在顿河草原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当时很大一部分居民还受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地区。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歼灭邓尼金的计划：取道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对邓尼金实行主要突击。这个计划保证我军能迅速前进去攻打邓尼金，因为在我们工作过的工农地

区，人心显然是归向我们的。

此外，这个地区有稠密的铁路网，使我军有可能按时获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给。最后，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解放顿巴斯，保证我国燃料的供给。

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同志的计划。1919年10月下半月，邓尼金经过激烈的抵抗以后，在奥勒尔附近和沃龙涅什附近的两次决战中被红军击败。邓尼金开始迅速退却，随后在我军追击下向南逃窜。1920年初，整个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白军手中解放了。

在南线两次决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又把尤登尼奇军调来进攻彼得格勒，以牵制我南线兵力，缓和邓尼金军队的处境。白军进抵彼得格勒城下。彼得格勒英勇的无产阶级挺身捍卫第一个革命之城。和往常一样，共产党员战斗在最前面。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白军被击败，重新被逐出我国国境，被赶到爱沙尼亚去了。

这样，邓尼金完结了。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

帝国主义者看到白卫军队被击败，武装干涉不成功，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巩固起来，而在西欧，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又使工人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于是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1920年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停止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

这是武装干涉墙壁上打开的一大缺口。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国家已消灭了武装干涉和结束了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波兰进犯的危险依然存在。远东、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武装干涉者还没有被彻底赶走。但是苏维埃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党有了可能来处理经济问题。

国内战争时期，许多熟练工人因为工厂关闭而离开了生产。现在党动员熟练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从事本行工作。几千名共产党员被派去恢复情况严重的运输业。如果不恢复运输，就无法切实地恢复基本

工业部门。粮食耕作加强了和改进了。开始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近五百万现役红军战士由于存在战争危险，暂时还不能复员。因此一些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劳动军**，用来搞经济建设。工农国防委员会改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为了协助它工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3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五十多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二人。

大会规定了国家在运输业和工业方面当前的经济任务，并特别指出工会必须参加经济建设。

大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特别注意，这个计划要求首先发展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关于整个国民经济电气化的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占有主要的地位，这是列宁提出的“10-20年的伟大纲领”^①。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那个著名的计划，现在它已远远超额完成了。

大会回击了反党的“民主集中派”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而坚持在工业领导方面事事都实行“集体领导”，完全不要专人负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主要角色是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和弗·斯米尔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他们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①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4页。——译者注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 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波兰计划的破产。 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虽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虽然苏维埃国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从白军手中解放了北部边区、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顿河区、乌克兰等等，虽然协约国被迫取消了对俄国的封锁，但是协约国仍然不甘心承认苏维埃政权坚不可摧，苏维埃政权不可战胜。因此，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尝试。这次他们决定，一方面利用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波兰国家的实际首脑皮尔苏茨基，另一方面还利用在克里木收集了邓尼金的残兵败将并从那里威胁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弗兰格尔将军。

按照列宁的说法，地主波兰和弗兰格尔是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用来掐死苏维埃国家的两只手。

波兰人的计划是，占领苏维埃乌克兰的河西地区，占领苏维埃白俄罗斯，在这两个地区恢复波兰地主政权，把波兰国界扩大到“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但泽到敖德萨，并且帮助弗兰格尔击败红军，在苏维埃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以报答弗兰格尔对他们的帮助。

这个计划得到了各协约国的赞同。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持和平、防止战争，试图同波兰进行谈判，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皮尔苏茨基无意谈和，只想打仗。刚刚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的红军打得疲惫不堪，已经疲于应付波兰军队的进攻。

短暂的喘息时机结束了。

1920年4月，波兰军队入侵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基辅。同时，弗兰格尔也转入进攻，开始威胁顿巴斯。

作为对波兰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反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加里西亚的里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部队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

还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由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错，西线红军部队向华沙方面的进攻毫无组织，没有让部队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先头部队前进得越迅速，预备队和弹药越落在后方，先头部队由于没有弹药，没有预备队，战线过长而易于被突破。由于这一切，当波军一个不大的集团突破我西线一点的时候，缺乏弹药的我军不得不实行退却。至于进抵里沃夫城下，压迫着该处波军的我南线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却禁止他们攻占里沃夫，并命令他们把骑兵集团军即南线主力远近地调往东北，似乎是去援助西线，虽然不难明白，攻占里沃夫是对西线唯一可能的和最好的援助。但是骑兵集团军退出南线和离开里沃夫，实际上意味着我军在南线也实行退却。这样，就是托洛茨基自毁长城的命令迫使我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的、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这是直接的援助，但不是对我西线的援助，而是对波兰地主和协约国的援助。

过了几天，波兰军队的进攻被阻止住了，我军开始准备向波军发起新的反击。但是波军无力再战，又怕红军反击，不得不放弃占领乌克兰的河西地区和白俄罗斯的基辅而愿意同苏维埃共和国缔结和约。1920年10月20日，在里加同波兰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波兰保留了加里西亚以及靠近俄罗斯的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同波兰缔结和约后，决定消灭弗兰格尔。弗兰格尔从英法方面得到了最新式的武器：装甲车、坦克、飞机和装具。他拥有白卫突击部队，主力是军官部队。但弗兰格尔没能给也在库班和顿

河区登陆的部队纠集起多少可观的农民和哥萨克力量。然而弗兰格尔推进到了顿巴斯附近，威胁着我们的产煤区。苏维埃政权之所以处于很困难的境地，还因为红军这时已经相当疲惫。当时红军战士必须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推进，既要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又要消灭援助弗兰格尔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匪帮。但是，虽然弗兰格尔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虽然红军根本没有坦克，红军还是把弗兰格尔驱逐到克里木半岛上。1920年11月，红军攻占了皮列柯普筑垒阵地，冲进了克里木，击溃了弗兰格尔军队，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克里木。克里木成为苏维埃的了。

武装干涉时期以波兰大国主义计划的破产和弗兰格尔的溃败而宣告结束。

1920年底，南高加索开始从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木沙瓦特派、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阿尔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胜利了。

但这还不是说武装干涉可以完全停止。日军在远东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1922年。此外，还有过组织武装干涉的新尝试（在东方有哥萨克军队首领明诺夫和男爵翁格恩，在卡累里亚有芬兰白军1921年的干涉）。但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武装干涉的主要力量，到1920年底已经被击溃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自卫分子的反苏维埃战争，以苏维埃胜利而告终。

苏维埃共和国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主权和自由生存。

这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结束。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性胜利。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 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级 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只要看看武装干涉时期的欧美重要报刊，马上就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有名的著作家(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或军事专家相信，苏维埃政权会获得胜利。相反，所有有名的著作家、军事专家、研究各国和各民族革命的历史学家即所谓学者，都异口同声地叫喊，苏维埃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必不可免。

他们确信武装干涉必获胜利的根据是，苏维埃国家还没有已经组织好的红军，还得临时建立，即所谓边打边建，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比较现成的军队。

其次，他们的根据是，红军缺乏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大多数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这样的干部。

再次，他们的根据是，由于俄国军火工业落后，红军的武器弹药数量少、质量差，而从其他国家获得军用品又不可能，因为俄国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却大批获得而且今后会继续获得头等的武器、弹药和军服的供给。

最后，他们的根据是，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当时占领了俄国最富饶的产粮区，而红军失去了这样的地区，痛感粮食不足。

的确，所有这些缺点和不足在红军部队中确实都有过。

在这方面，但也只是在这方面，武装干涉者老爷们是说得完全对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这么多严重缺陷的红军战胜了没有这些缺陷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呢？

(一)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所捍卫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人民认识到和了解到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对它坚持到底。

布尔什维克知道，为不正确的、人民所不支持的政策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拥有一切：有经验的老指挥官、头等的武器、弹药、军服、粮食。但是就少一件——俄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俄国各族人民不愿意支持也不可能支持武装干涉者和白卫“执政”的反人民政策。因此，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失败了。

(二)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彻底忠实于和献身于自己的人民，因此人民也爱戴它、支持它，把它看作自己的、情同骨肉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儿子，只要它像儿子对待母亲那样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它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一定会胜利。而反对本国人民的军队一定会失败。

(三)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整个后方，整个国家来为前线的需要服务。军队如果没有坚固的、全力支持后方的后方，必然要遭到失败。布尔什维克知道这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全国变成了一个为前线供应武器、弹药、军服、粮食、兵员的军营。

(四)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红军战士了解战争的目的和任务，认识到了这些目的和任务的正确；(乙)由于认识到了战争的目的和任务的正确，红军战士加强了纪律性和战斗力；(丙)因此，广大红军战士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往往表现出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空前的普遍的英雄主义。

(五)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的后方和前线的领导核心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一个由于自己的团结和纪律而统一的党，一个由于

具有革命精神、具有为共同事业的胜利牺牲一切的决心而强有力的党，一个善于组织千百万群众并在复杂环境中正确领导他们的出色的党。

列宁说：“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96页）^①

（六）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它在自己的队伍中锻炼出了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这样一些新型的军事领导者；（乙）在它的队伍中战斗的有柯托夫斯基、哈巴也夫、拉佐、肃尔斯，帕尔霍缅柯等许多有才能的英雄；（丙）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的是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德列也夫、彼得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沙金柯、美赫利斯、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等这样一些活动家；（丁）红军有政治委员这样出色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团结了红军战士的队伍，培养了战士遵守纪律和英勇作战的精神，有力地（迅速和无情地）制止了个别指挥员的叛变行为；另一方面，又大胆和坚决地维护了献身于苏维埃政权并能果断地领导红军部队的那些指挥员（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的威信和荣誉。

列宁说：“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②

（七）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在白卫军队的后方，即在高尔察克、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8-15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1卷第155页。——译者注

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的后方，有出色的党员和非党员布尔什维克在进行地下工作。他们发动工农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后方，从而给红军的进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家知道，乌克兰、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白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游击队，通过破坏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后方，给了红军不可估量的帮助。

(八)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反对白卫反革命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及其成功，赢得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同情和援助。当帝国主义企图用武装干涉和封锁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工人站在苏维埃方面，援助苏维埃。这些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的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促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英法和其他参加武装干涉的国家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装载军用品去援助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建立了以“不许干涉俄国”作为自己口号的“行动委员会”。

列宁说：“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向我们举起拳头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05页）^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76页。——译者注

简短的结论

被十月革命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同白卫将军们一起，牺牲祖国的利益，同各协约国政府勾结，想共同用武力来进攻苏维埃国家，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和俄国边境地区的白卫叛乱，结果俄国同粮食和原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德国的军事失败和两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欧洲战争的结束，导致协约国的加强，武装干涉的加强，给苏维埃国家增加了新的困难。

另一方面，德国革命和欧洲国家中开始的革命运动，却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白卫匪帮。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把协约国的傀儡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弗兰格尔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打败，把协约国的另一个傀儡皮尔苏茨基驱逐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而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干涉军赶出了苏维埃国境。

这样，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被革命打倒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在武装干涉时期支持白卫将军和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搞反革命阴谋，对苏维埃活动家搞恐怖活动。这些十月革命前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某些影响的党派，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在人民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是反革命党派。

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是这些党派在政治上灭亡和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彻底胜利的时期。

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所捍卫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人民认识到和了解到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对它坚持到底。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二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四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四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4



斯大林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1
---------------	---

经济建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

经济政策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0日）	3
--	---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4月6-11日）	17
---	----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9日）	33
---	----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11日）	66
--	----

计划工作

关于建设新工厂的计划的计划——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12日）	75
--------------------	----

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纳入正轨——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5年7月25日）	77
--------------------	----

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惰性极为有害——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8日）	78
必须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	80
对李可夫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意见 （1928年11月7日）	81
对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 （1928年11月13日）	83
关于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6日）	86
工业10个月总计增长结果不妙——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3日）	88
关于经济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4日）	90
加强计划机关的草案很好——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10日）	93
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棉花缴纳计划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建议 （1934年6月29日）	94
保障棉花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4年8月28日）	96
议了一下1936年的控制数字——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7月21日）	97
关于1936年控制数字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7月28日）	99

农业生产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30年9月2日）	102
---	-----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的讲话（摘录）	
（1935年2月）·····	104
个体农庄不可能排挤集体农庄	
（1939年5月28日）·····	106
棉花生产一定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33年3月21日）·····	107
关于种植烟草致乌拉尔州委的电报	
（1933年6月6日）·····	109
关于改进棉田培土和灌水工作的指示	
（1933年7月18日）·····	110
把灌水工作和夏季耕作正确地结合起来	
——给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指示	
（1935年5月31日）·····	111
关于发展植棉业和留种苜蓿生产的措施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1935年9月15日）·····	113

工业生产

不要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0日）·····	117
催问第聂伯工程一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7日）·····	119
认真关注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120
请特别重视建立新的黑色冶金厂——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3日）·····	121
乌拉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6日）·····	122

需要尽可能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日)	124
我们不能让北方没有石油 ——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年8月19日)	126
关于产品配套运动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日)	127
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2日)	128

粮食收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就粮食收购工作给地方党组织的命令 (1928年1月6日)	13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加强粮食收购措施给地方党组织的电报 (1928年1月14日)	135
附录 有斯大林同志和收购组织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同参加的 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记录) (1928年1月18日)	137
根据刑法打击投机商和富农包买主——致莫洛托夫和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140
粮食收购工作抓得太晚了——致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142
就地制止严重违反粮食价格的现象——致联共(布)中央的电报 (1928年1月20日)	143
完成计划一点不能讲价钱打折扣 ——在巴尔瑙尔、比斯克和鲁布佐夫斯克专区 党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2日)	144

收购工作稍有起色——致柯秀尔和魏策尔的电报 (1928年1月27日)	147
收购工作已经加强——致柯秀尔和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1月29日)	148
收购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致莫洛托夫、柯秀尔、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2月2日)	149
你们的收购计划落后于各地的收购速度 ——致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电报 (1928年2月3日)	150
尽可能快地完成收购和装运任务 ——致米高扬、莫洛托夫、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2月4日)	151
粮食产量基本的需要是够用的——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8年6月10日)	152
对关于粮食收购决定草案的意见——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10日)	154
今年粮食收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156
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改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1日)	157
关于处理维申斯克区问题致肖洛霍夫的函电 (1933年4月16日-5月6日)	159

法制措施

立即开除并审判破坏日用工业品价格的人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16日)	164
关于使用囚犯劳动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7日)	166

对破坏分子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67
工人为什么会向农村倒流——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70
加强对工人的供应和管理工作——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8日)	172
富农自愿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3月11日)	175

对外贸易

关于在东方边境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致契切林的信 (1921年11月22日)	177
关于与法国商人合营出售白金的问题——致列宁的信(摘录) (1922年11月13日)	179
关于在苛刻贷款条件下向美国订货的问题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25日)	181
美国现在是金融领域的主要敌人——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30日)	182
由于新的情况不得不削减进口——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9月24日)	184
我们正面临美国策划的货币金融风暴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31年11月9日)	185
对兰开斯特的贷款应坚持第二个方案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2年6月)	187

插图

一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101
--------------------	-----

二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130
三 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162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经济建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

经济政策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0日）

同志们，我想就解决苏维埃国家的农业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谈几点原则性意见。我拿不出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也不大了解，不过对于农业的总方针及其前景倒可以讲上两句，这点必须提一下。

需要指出的第一个事实是：我国在革命后成了最典型的小农国家之一。革命前我国有大约1500万个个体农户。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很难说，不过看来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今革命后情况怎样呢？如今个体农户数目已达2500万。这方面地主的破产、大农户的解体，农户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起了作用，分割的开始也起了作用。

我认为，按照我们现有发展农业的途径，每过10年就会出现新的分割苗头。尽管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关于阻止分割的法令，但也无济于事，分割还会发生。可见，不仅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是小农最多的国家，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如果我国在农业的发展方面不来一个转折，今后仍将是一个小农国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主要经济部门的专业化不会有多少进展。小农户抵御各种灾难、挫折和偶然事件的能力不强，为了保险起见，它们尽量继续保持其混合型经济的格局。它们不愿成为单纯生产小麦的农户，它们想什么都有一点，因为它们认为，谷物如果没有收成，马铃薯会有收成，要是向日葵没有收成，还会有乳制品，小牲畜会增加。这种混合型经济，小型经济，对大国说来是一个不幸。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形态的农户不能保证使用农业机器，不能保

证运用改良农作物的科学知识，不能保证使用肥料，等等，等等。比方说，现在使用农业机器、使用肥料和运用科学知识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里十分之九是为大农户服务的。显然，有数百万农户没有这些也行，它们认为使用农业机器不合算。在小农户现有的资金状况下，有数百万农户显然根本用不着机器，难以使用这些机器，因为必须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才能使用机器。

富农的力量在哪里呢？富农的力量根本不在他生来就是如此，而在于富农有大经济。富农经济的规模使它们能够利用一切科学资料，能够使用机器、化肥，什么都可以使用。富农很有力量，各经济部门的大经济无不如此。这就是富农的力量所在。

我们能否按照作为个体农户的富农农户的路线，按照培植大农场的路线，按照象匈牙利、东普鲁士、美国等那样培植大地产的路线来发展农业呢？不能，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我们希望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培植公有经济。我们应当遵循这条路线。只要我们尚未循着这条路线真正起步，富农就会始终表现出……（听不清）^①

这就是富农相对于同样是小经济的中农所具有的力量。谈起中农，不能认为我国的中农同德国的一样，完全不是，我国的中农是小农，在经营中极少使用机器。而我国的贫苦农民是更小的小农。我再说一遍，富农的力量就在于它拥有大经济，富农拥有大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结果，就可以使用所需的一切农业机器，使用肥料和利用一切科学条件。贫苦农民还有中农不可能这样做，便摆脱不了目前的处境。农民真实的经济状况就是如此。

既然认为我们应当按照扩大农业的方针、按照逐步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大农户的方针发展农业，那就应当按照这个途径认真地采取措施，应当开始这项工作，否则前途将……（听不清）富农

^① 此处的注释系速记员所加，下同。

是不会止步的，他要继续前进。这里产生了第一个问题：是向富农供应机器呢，还是限制供应。

可见，继续发展农业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走发展个体大农户的道路，要么走发展集体大农户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想偷偷地按照加强个体大农户即富农农户的方针发展农业，到头来也成功不了，因为整个苏维埃制度，我国整个立法制度，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向农村供应农业机器的措施，无不遵循限制个体大农业的方针。这是不是事实呢？即使是想扩大经营的中农，处在这种制度和条件下也没有任何发展前途可言，而且还受到种种经济……措施的限制。农户不能原地踏步，走下坡路又不愿意，于是中农就没有前途。

他不愿意走下坡路，那么走哪条路呢？当然，富农是有前途的，但我们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发展，结果农业目前走进了死胡同。应当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单靠决议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应当振兴农业，应当实行集约经营。这里两条道路：一方面可以走富农路线，走发展富农的路线，走振兴富农大农户的路线，然而因为单一发展个体大农户在我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苏维埃政权的目标是限制大农户。于是就还有另外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发展集体大农户，但不是发展个体大农户。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把收获量提高两倍，按照技术革新、使农业在科学的经济学的指导之下发展的方针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

听了同志们刚才的发言，我认为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前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上正处于某种困境，没有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个体富农农户，对我们来说此路不通。另外一条是巩固小农户，必须把它们联合成为大农户，联合成为集体。这第二条路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既然如此，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走上这条路呢？

顺便说说，刚才有同志谈到租赁站和救济贫苦农民。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一半以上的贫苦农民救济款都吃光了，而且是个填不满的窟窿。这些基金应当给，贫苦农民基金肯定也应当有，因为一个政权如果只是许愿而从不兑现，那它就一钱不值。贫苦农民基金是需要的，救济也需要，这方面什么事情都应当做——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确切地说，解决问题不能靠这个。应当拟定逐步把个体小农户联合成为大农户和把小农户、中等农户、大农户联合成为更大的农户的具体途径，并遵循唯一能够战胜个体农户即富农的有组织的计划。

应当谈论的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步骤。当然，这在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但必须坚定地采取拟定具体途径、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大农户的方针，因为这是在农村培植真正合作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推动农村赶上城市的唯一办法。这是拯救贫苦农民的唯一办法，而且拯救的不光是贫苦农民，连中农也在内。

你们对中农不能联合成为信用合作社的说法如何看呢？中农当然能够联合成为信用合作社，但必须让中农看到前途，必须向中农保证今后不把他们划为富农，而且应当相应地改善他们的经济。贫苦农民更可以联合了，不过当然别忘了，这是很费钱的。实践表明，新的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巨额财政支出，但还是要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我们正处于没有出路的困境之中，因为这是认认真真地继续发展农业、像我们过去振兴今天的社会主义工业那样振兴农业的唯一途径。

你们这里集体农庄不多，它们有点被当成旁门左道，这些农庄不在整个农业所处的大道上——你们的所有各区都是这种看法。有时人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集体形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发生在许多农业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的事情是一回事，至于集体农庄，据说这反映了过去贫农委员会的时代，而

且集体农庄也不是合作经济的组成部分，刚才我们一些同志也是这么说的。小个体农户和极小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之后，在剥夺富农的时期结束后进行的。刚才查古明尼同志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我回头再讲），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显然不清楚剥夺富农与限制富农是两码事。在停止执行剥夺富农的政策后，这一转变已经完成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形成文件……（听不清）。事情经过是怎样的呢？伊里奇说应当限制富农，在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停止执行剥夺富农的政策之后，开始向培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转变，恰好在这个时候伊里奇说，看来我国的集体农庄问题似乎同富农没有联系。这话不对：正是在取消贫农委员会、停止剥夺富农、我们转而走上持久建设的道路之后，集体农庄问题才成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亟待解决，而且现在，当我国已出现实际拟定把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的具体途径的某种机会后，我要说，集体农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什么恰恰现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首先，因为我国的工业发展了，它要为农村指明道路；其次，因为富农农户发展了，现在不仅贫苦农民而且中农都很清楚：我们应当继续前进，而不是步富农的后尘；我们不应以单干的方式、而应以把单个农户联合在复杂机器周围、联合在我们制度周围的方式巩固我国的经济。

我国许多人都在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农户、大庄园、中心试验站、特殊的机器系统进行研究，在那里星星点点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那里由于这一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我国富农农户的 20 倍。我们应当发展的是这种类型的经济，但不是以资本主义农户为基础，而是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只要善于处理这个问题，农民是愿意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是推动农户前进的唯一方法。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如果农民要走富农道路，那么他会发现会遇到许多不快。

我们过去是这个政策，现在和将来也是这个政策，它会使所有富

农感到沮丧，使中农脱离富农。除了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别无他途。在苏维埃制度下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就是说，伊里奇提出集体农庄问题时基本上同贫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后重谈这一问题的。

什么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个体农户的生产联合体，是搞生产的，不是象消费合作社那样搞销售，也不是象农业合作社那样搞供应，而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有3种甚至4种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供应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生产合作社，正因为如此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不应把集体农庄同合作制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应当善于在合作制中发现集体农庄。的确，我们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农业中的贫苦农民和中农是搞生产的，这很重要，也很关键。

销售方面的联合非常好，因为这是为生产方面的联合作准备。供应方面的联合更好，这是在生产方面、在订购方面、在经济作物方面把中小农户联合起来的直接途径和直接准备。

关于农户集中的问题我不再多说，因为这点大家都知道。为了从供应、代销的集体化过渡到需求的集体化，我们必须这样做。集体农庄是纯粹型农户联合体。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是合作制。

毫无疑问，我们已着手认真解决振兴农业、使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问题，而如果不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振兴就无从谈起。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就是如果希望我们今后的运动能真正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提高整个农村的福利，而不是提高那正在建设大庄园、雇用工人并且大搞剥削的个别上层集团的福利，那么我们就别无他途。我想就这些前景说几句，以便把讲过的那些零散措施阐述得更清楚。如果你们不按照正确的前景把这些措施归纳为一个总体系，措施就会落空。我再说一遍，

这就是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搞生产的集体大农户。

关于查古明尼同志给我的信，我简单地说几句。他是就我们为执行第 107 条而作出的那些决定写这封信的。他认为，我们关于第 107 条的决定不是把富农当作粮商，而是当作占有大量商品粮却不把粮食上市的人，查古明尼同志认为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认为富农的剥削本质不是表现在贸易上而是表现在农产品的生产上。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私人生产者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出售而生产。我们有些商品生产农户的产品卖不出去……（听不清）。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家常常遇到危机，届时资本家采取烧掉粮食这样的措施。例如在美国，当生产的粮食很多、而粮价不高的时候，就烧掉粮食。这怎么解释呢？

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在……^①是城乡之间的基本调节器的条件下，如果生产是为了出售，如果市场没有保障，生产就会落空。可是富农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生产量大，而在于他们搞的是众所周知的哄抬物价。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商品。商品的主要部分掌握在中农手里，但如果论个体农户分门别类的囤积商品，那么还是富农囤积的商品最多。他们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是为出售而生产。您对富农剥削本质的定义是不正确的。

查古明尼同志说：“我认为，如果采取上面谈到的措施……（听不清），由此而引起粮食的市场投放量进一步减少”。我前天^②提到的那些准备采取的措施将给富农、商人以打击，为的是消除哄抬价格的现象。到那时农民就会明白，价格不会再涨了，应当把粮食拿出来，不然还得蹲监狱。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查古明尼同志说，这样会减少粮食收购量。何以见得呢？

① 速记记录有遗漏，按意思应为“贸易”。

② 斯大林指的是他 1928 年 1 月 18 日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我从莫斯科获悉本月第三个 5 天的数字，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收购量提高了，由于实行这一政策收购的谷物增加了 350 万普特。乌克兰已经收购 200 多万普特，而从这 5 天来看，可以收购到 450 万普特。情况就起了这样的变化。给商人以迎头痛击，市场就得到了改善。请看实例：在乌克兰最先采取查古明尼同志提到的方法，以打击商人和富农，结果乌克兰的收购量从 230 万普特上升到现在的 450 万普特，也就是增长了一倍。中部各省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收购量原来为 50—60 万普特，现在已将近 150 普特。

这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北高加索前不久报来的 5 天情况简报说，收购量原先将近 50 万普特甚至降到了 40 万普特，而现在的收购量为 150 万普特。这些事实是回避不了的，事实推翻了你的推测，因而也证明我们的措施比预想的还有效。就是说，我们抓住了市场的关键，打中了要害，从而提高了粮食收购量。

“如果你们现在对富农采取某些行政措施，你们就篡改了新经济政策。”完全不对！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商品流通自由，我们希望对商品流通加以调节。列宁同志也说过，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允许商品流通自由，但我们应当对一切加以调节，我们是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我们实施监督的情况下，允许这种商品流通自由。这是调节我们所允许的商品流通的手段之一，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说：“你们爱怎么调节、爱怎样干都行！”对不起，不是的。我们说过，我们允许商品流通自由，但有一定的范围，为的是这种自由不致妨碍国家，为的是让这种自由对工人、农村的贫苦农民和中农有利，而不是对富农有利。这绝不是说我们让自发势力为所欲为。那样一来就不是新经济政策，而是恢复资本主义了。我们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我们是确立苏维埃制度，而且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保持了城乡的调节作用，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下恢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允许搞新经济

政策，同时又保留了国家的最后决定权，所以我们做得对。查古明尼同志说这是失败。完全不对。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一直是这样说的，情况不是这样吗？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我和瑟尔佐夫同志的。也许我收到信后应当给查古明尼同志回信，也许我在全体同志参加的大会上稍微泄露了他的疑虑这个做法不对。我认为归根结底我是做得对的。也许从一个完善社会的礼貌（笑声）的角度来看我的做法不好，但从有利于事业的角度，从我们目前的政治路线的角度，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看，我是做得对的。

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您有疑虑，我们大家也都有疑虑——干吗要隐瞒起来呢？这方面我们可以有所改进，而且总的来说有好处，尽管有些人显然会感到委屈，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包括写信人（查古明尼同志说：一点也不）。不觉得委屈？那就更好了。我认为，如果说我违反了某些礼仪准则、这方面有欠妥之处的话，那么我在使人们消除疑虑方面就大有收获了，这种疑虑许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大家在许多问题上都会有各种疑虑，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百分之百地弄清问题，即使我们还会有疑虑，可只要我们理出头绪，人们终归会理解的，最后只会有好处。我觉得，我在讲话中泄露了您的疑虑虽有欠妥之处，但还是好处多，所以正式地说来我做得是对的。

现在谈谈信本身。我已经讲过，这里只好再讲一遍，不能这样谴责靠别人的劳动^①生产的人。富农自己生产，同时也强迫他人生产，而商人则是低进高出。很难在这两种人——两种剥削者之间划这样一道分界线。富农为生产^②而生产，他们出售自己的商品，因为在商品关系下销售对生产者说来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在销售方面、在供应方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是“为出售”。

面实行合作制，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从买卖的角度对待个体农户的态度，这是对待个体农户的最正确的态度，因为个体农户生产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出售，否则就无利可图。

这种从商品流通角度确定的对待个体农户的态度，就是对待个体农户的基本态度，因为从其产品的销售角度说来恰恰应当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对富农的打击，在这方面的打击，是主要的打击。怎么能在生产方面打击富农呢？无法打击，而应组织与之并存的另一种类型的农户，这种农户要更完备，生产力要得到更大的增长。这是打击富农的方针。要把个体农户组织成大农户，这相当困难，而富农作为自己产品的支配者在给我们设置障碍，因此打击的矛头正应当对准产品方面。

这将对中农的状况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前天就对大家讲过，一部分人要抱怨，一部分中农要[抱怨]说，人家劳动，可又不让人家好好地出售。他们会感到委屈，尤其是一部分中农，他们会抱怨说，我们把他们当作不把自己的商品拿到市场上的人甚至当作商人来打击。我前天说过，中农可能会说，我自己花钱买粮食，你想买你也买。看来，应当奉行一种谁也不得罪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永远不会有，不管它有多么正确。既然我们不仅把富农作为不拿出货物的人、而且作为商人来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能因为一部分中农感到委屈就止步不前，因为他们会说：“他们自己花钱买粮食，你想买你也买。”我们同富农打交道不可能一个中农也不得罪。这样的政策是没有的，一部分中农会感到委屈，他们不会很快就理解，甚至不仅中农，包括我们共产党员也不会很快就理解我们的路线。你向他们作解释，他们却左右摇摆：先走这个极端，然后又走那个极端，因为我们缺少治理国家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工人完全理解，不能要求他们全都马上理解我们的整个路线。农民受管理者的压迫达300年之久，管理干部……（听不清）。令人惊讶的是，工人阶级掌权才10年，自

己的队伍中就涌现出了许多充当管理人员的优秀人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在这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我们毕竟胜任了这项工作，毕竟应当记住，不仅一部分中农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而且我们的共产党员兄弟们也并非任何时候都理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总之，世界上还没有一项政策能立即让我们的共产党员兄弟们百分之百地理解，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不满。共产党员中间也会产生不满。一部分中农可能会产生不满，这点要估计到。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我们正在前进，正在带领他们前进，领导他们，哪怕有一部分人感到不满，这部分人可能是少数，不过也要带领这部分人前进，其余的落伍者以后会弄清是怎么回事，最后大家都会理解，而如果考虑有些人不理解，那就意味着原地踏步。查古明尼同志应当学会这种辩证法，否则我们什么政策也搞不成。

中农会认为，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个转折。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一部分中农会这样来理解：我们原来认为准许搞商品交换呢，——私人资本可能复活，而经济措施则限制私人资本。中农会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不对，——自发势力多会儿想发展就让它发展吧。”

我们对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应该向中农讲清楚，那不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要让国家保留调节作用。这点不仅要给中农讲清楚，而且要给我们某些不理解的共产党员讲清楚。

谈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没有提出我们只应限制富农或者只应用经济措施限制富农的问题。有行政措施吗？有，我们正在采取行政措施。你们必须证明现在还不是采取行政措施的时候。这你们是没法证明的。你们主张对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是那些为私商运输粮食发放优待证的村苏维埃主席执行第 105 条。而情况究竟怎样呢？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对头。要给中农、给那些不理解的共产党员解释新经济政策。如果谁不理解，要给他调换工作

环境，他就会理解了。至于对那些策划积极反抗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人，要采取行政措施。不这样做不行。我国还存在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大家以为，在粮食收购工作方面无所作为的关头，商人不会利用这一时机吗？完全不对，商人在搞自己的一套。因此，除了迄今我们采取的经济措施外，还得有补充措施。大家对商品抱着很大希望。这是不对的。这是所有合作社系统和采购机关的错误。不管是合作社还是采购机关都在喊叫：“给商品。”商品给了。他们以为这回农民该满足了，商品的价格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一个地区需要多少工业品就运去了多少，可农民关心的是另一回事。他想的是：“你拿1俄尺印花布换我1普特粮食，可我想拿1普特粮食换你2俄尺印花布呢。”商品本身还不能解决价格——这个农民的主要问题。农民想多得，我们想少给。这方面谁在妨碍我们呢？就是破坏市场的人。人们都说，是投机商在起妨碍作用，投机商有大量商品，并用这些商品耍手腕。我说过，市场是个封闭的链条。

如果把市场比作由1000个单位组成的整体，那么只要破坏其中的2个单位，整个市场、整个机制就会被破坏。只要有2个坏单位和998个好单位，整个市场机制就会被破坏。这就是市场的本质，市场的复杂机构。例如，我们要是在国外市场上卖得便宜些，那么资本家的全部生意都砸了，他们肯定要跟着我们……^①，所以我们就要卖得更便宜。如果我们是卖方就会这样做，而如果我们是买方呢，我们就会比资本家出价稍高一些，去购买某种纺织品或其他商品，我们就把资本家的整个市场都搅乱了。如果你是买方，只需往降价那边加个砝码，如果你是卖方，只需往提价那边加个砝码，整个市场就会动起来，——给搅乱了。

为使情况得到改善应当打击谁呢？应当打击那些叫嚷提高粮价的

① 速记记录有遗漏。——原编者注

人。粮价一高，农民不种经济作物就很合算。如果种粮食更合算，农民就不会种经济作物，就不会种亚麻等等。

市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在一个地区只要有富农串通好了哄抬价格，所有的经济单位都会受影响，大家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查古明尼同志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打消中农以为今后粮价肯定提高的想法。怎样打消呢？靠执行第 107 条。

请看事实：我已经说过，我们原先 5 天内在全国收购 600 万普特，如今是 950 万普特。这算什么，算不算成绩？

你们在这里预言：“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作预言，我让事实说话。请看乌克兰：原先 5 天收购 200 多万普特粮食，现在是 450 万普特粮食。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已着手对市场里无数农户中的这两个破坏市场的经营单位进行打击。

中农怎么想呢？中农想：“要是能多卖钱就好了，但现在事情不妙。彼得鲁哈蹲监狱了，瓦纽什卡蹲监狱了，弄不好我也得蹲监狱。算了，我还不如把粮食卖了。苏维埃政权可是惹不起。”这种强制办法对中农产生了影响。

我们还有经济上的办法，我们不得不这样行事：如果哄抬农产品价格，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办：如果 1 普特粮食卖 1 卢布 50 戈比，就是多卖 50 戈比，那我们的印花布也加 50 戈比。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农。这点要给中农讲清楚。有制服富农的论据，有经济上的论据：只要富农提高粮价，就得提高工业品价格。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农，更不必说哄抬上去的粮价会破坏整个工业，破坏亚麻工业、棉纺工业及其他一切工业。这样一来商品就会比今年还少。如果压缩亚麻、棉花的生产，还是中农吃亏。这就叫强制的办法。

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工人对阶级非常敏感，工人立刻就会明白，农村——这是个阶级。工人很快就会理解我们的政策。如是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去，他们就会认为不存在农民阶级。这样

不行，同志们。阶级确实存在。强制的办法可以起同经济的办法一样的作用，有时甚至作用更大，就是有人扰乱市场、竭力把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资本主义轨道上的时候。

现在就有关集体农庄建设的各种报道和声明谈几句。我在这里发现了（也许我看错了）某种偏重生产合作社的倾向。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培植公有成分的唯一途径，那就错了。农业合作社中从事产品加工的农户联合体，例如黄油厂、干酪厂、榨油厂及其他所有通过把单个农户联合起来而组成更大联合体的企业是一回事……（听不清）。这是基本的途径，是较为广泛和普遍的途径，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庄等就是走的这条路。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这也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思想，他把销售方面和生产方面及粮食生产内部的各种农户都包罗到这一计划内。当然，榨油厂、黄油厂主要是集体农庄部分，而集体农庄是粮食生产即主要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中还没有其他把粮食生产联合起来的联合农户。就农业合作制而言，什么都组织好了，唯独没有粮食生产，而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所以集体农庄目前是主要的、而不是唯一的……应当重视这一修正，我再说一遍，不仅要有从事销售和供应、在供应基础上成立的联合体，而且要组织集体农庄即在农业的基本部门——粮食生产方面集体农户组织的生产形式。

速记记录，未经整理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①

^① 本卷所引档案资料如未有注明者，系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一书。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4月6-11日）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由于前面几位发言人已经十分详尽地通报了沙赫特案件^①，我就只谈几个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争论的性质问题。你们看到我们就全会日程上的问题的争论，不管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还是关于沙赫特案件问题，是在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对自己错误的批评，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组织的自我批评是我们争论的共同的调子。这说明了什么？这种“抑制不住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总之，我们需要这样的自我批评吗？

这一自我批评的浪潮是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我批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对我们来说像空气和水一样需要。有哪些原因？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因为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由一个党——共产党执政的，该党不与也不可能与其他政党分权，因此，如果我们想前进的话，我们应该自己来揭发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再没有别人来纠正它们了。这自然是清楚的，我也不准备就此展开来说。

第二，因为在消灭了反对派的十五大以后，党内形成了新的局面，

① 指顿巴斯的沙赫特区及其他区内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初被破获。

对此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局面新的特点在于我们再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了反对派，于是有了一种危险性：认为党在摧毁反对派后想吃老本，想稍作歇息而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视而不见。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早在十五大上就应该提出全面加强自我批评的口号，以此作为我们前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第三，因为最近以来，我们的党内在与群众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变化表现在哪里？它们表现在：我党的领导集团爬得太高，他们的威望过高，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变得几乎高不可攀了。我们拥有这样一批权威领导人的事实反映了我们党最伟大的成就。但是，事实上，群众开始从下边眯缝着眼睛向上看这些领导人，不敢经常去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反映出群众远离其领导人的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出领导人脱离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会一方面现实地导致群众远离高层领导和对他不信任，另一方面，导致高层领导的骄傲自满。如果高层领导骄傲自满和开始俯视群众的话，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很清楚，这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要永远开放自我批评的渠道，要使苏联人民能“斥责”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以便使他们不骄傲自满，而使群众不远离领袖。

这就是我党召开十五大以来出现自我批评蓬勃发展的总局面的基本原因，这一局面给今天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整个工作打上了烙印。

正因为如此，应该欢迎《真理报》在组织《工农检察院专页》这个问题上的倡议。由于同样的原因，要欢迎《共青团真理报》为批评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组织的自我批评开辟专页的倡议。应该希望的只是批评将是深刻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描淡写地停留在表面上。

有人有时责备批评者们的批评不完善，说他们的批评有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同志们，这是错误的。这是很大的误解。不能要求批评

百分之百正确。谁要是批评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排除了提出批评的任何可能，特别是来自工农群众的批评的可能。普通的工人或农民哪里能组织最完善的批评？同志们，这是空想。如果批评哪怕只要5%-10%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应该欢迎，应该认真地去倾听并考虑好的地方。否则，我们就得堵住千百个来自基层的我们的文学家和评论家们的嘴，他们在自己的批判工作中还不够内行，但他们所反映的是事实的真相。正是为了不压制批评，而是要鼓励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认真地听取苏联人民的各种批评，即使有时批评甚至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所有部分都正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群众才能相信他们不会因为不完善的批评而受到申斥以及相信他们不会因其批评意见中的某些错误而被“讥笑”。

为什么我说这些？因为一些发言人对批评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完全清楚，一些同志这样议论：既然开展自我批评，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想要撤某人的职。（笑声）而有些人认为，既然批评教育人民部的实际工作，那就意味着想搞垮教育人民部而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受益。当然，这一切是不正确的。问题并不在于撤某人的职或者搞垮一个人民委员部和加强另一个。不，同志们，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揭露我们管理国家的实践中的缺点，并在揭出这些缺点后，本着减轻和加速我们发展的精神来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别的，同志们。如果想要知道我个人的观点，那我主张不撤任何一个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管理人员的职。有人在这儿找被告。不用找被告，同志们。如果要找的话，那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被告……

喊声：对。

斯大林：从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问题是要揭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共同消灭它们。而为此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诚恳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希望改正这些缺点。

有关第一个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同志们在此很少涉及，这是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幕。事实上，沙赫特案件的根子隐藏在何处？这种经济反革命在何种阶级秩序的基础上能够发生？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通常说：我们这儿忽略了秩序，没有注意到，假如我们不疏忽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沙赫特案件。这里有疏忽，而且疏忽还很大，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用疏忽来解释一切，这表明不明白事情的实质。事实说明了什么？事实表明，沙赫特案件是由过去控制煤炭工业的部分资产阶级专家们挑起的一场经济反革命事件。事实接着表明，这些曾经组织起秘密小组的专家，从现移居国外的原老板[在欧洲]和西方的反革命的和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那里得到搞破坏活动的经费。事实最后还表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小组是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和破坏我们的工业的。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在这里与西方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对我国工业进行的经济干涉打交道。过去有过军事、政治干涉，我们用国内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这种干涉。现在我们遇到了经济干涉的企图，为了消灭它，我们并不需要去进行一场国内战争，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消灭它，我们应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方法去消灭它。

设想国际资本不来干涉我们是愚蠢的。不，同志们，这不对。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国际资本，它不会平静地看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发展。过去，国际资本想用直接军事干涉的方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前途落空了。现在和将来，它将一如既往地用看不见的、不经常看得见的，但有足够威力的经济干涉的方式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破坏活动，在各个工业部门蓄意制造各种“危机”，以便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更轻松些。这里的一切都交织在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任何偶然性可言。只有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要么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采取革命的政策，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组织起来，到那时，国际资本将

竭力来干扰我们前进；要么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转而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可能国际资本看来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些人觉得，我们可以采取革命的对外政策，并同时争取得到西欧资产阶级的好感。我不再去证明这些人与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例如，英国要求我们同它确定在某地，譬如说在波斯湾、在阿富汗或者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并且它提出保证，如果我们做出这一让步，它就准备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走这一步？

喊声：不！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原则上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做出这种让步的话，一切都会顺利。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要做出这种让步？

喊声：不！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与日本分割满洲里，我们就能与它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出这种让步吗？

喊声：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有人要求我们“减少”对外贸易垄断并同意偿还所有战时和战前的债款。也许去这么做，同志们？

喊声：不！

斯大林：但是，正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自己去做出这些和这样的让步，所以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国际资本将总会一直给我们制造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管这是沙赫特案件还是什么别的类似的事件。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国际资本的军事干涉得以在我们这里发生？因为我国有一大批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孝子贤孙，他们总是准备挖苏维埃政权的墙脚。这些军官和将军如没有国际资本的财政及

其他援助，能否组织像样的反对苏维埃政权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没有这个白匪军官和将军集团的援助，国际资本能否组织重大的干涉行动？我想，不能。那时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现象，如果我们不释放克拉斯诺夫、马蒙托夫等人，那干涉本不会发生。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其他白匪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对此不可能有怀疑。可军事干涉的根源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以苏维埃政权为一方、国际资本及其俄罗斯的将军残渣余孽为另一方之间的阶级矛盾，对此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寄希望于国际资本能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一些原为矿主的资产阶级专家们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吗？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不存在某个准备进行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国际资本能在我们这里组织类似沙赫特案件的经济干涉吗？很清楚，不可能。总之，我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准备进行经济干涉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呢？我想是有的。

喊声：他们有很多。

斯大林：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很多。但是，我们这儿存在着某些不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家集团，他们比干涉时期存在的要少得多，对此是不可置疑的。这两股势力结合在一起就会给对苏联进行干涉提供基础。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因就在于此。

现在来谈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讲一下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四点实际结论。

1. 列宁说过，选拔人才问题是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没有很好地选拔我们的经济工作者，而且不单单是没有很好地选拔，给这些干部所提供的条件还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第33号法令，特别是提到了这一法令附带的《规范条例》。这个《规范条例》的特点是它几乎为技术经理提供了所有的权力，而

只给经理留下调解冲突、“当代表”和弹巴拉莱卡琴^①的权力。很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部门的管理干部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这条法令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它是在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时期颁布的，那时，我们不会管理工业，出于无奈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了技术经理。但现在这条法令变成了枷锁。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他们有经验并能成长为我们工业部门真正的领导人。正因为如此，是到了取消陈旧的规范条例和将它更新的时候了。有人说，共产党员们，特别是工人党员—经济工作者们不能掌握化学公式，根本不懂技术知识。这是不对的，同志们。世界上没有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不能攻破的堡垒。我们过去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的岂止是这样的堡垒。所有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和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布尔什维克式的耐心武装自己的愿望。但为了改变我们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工作条件和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和全权的事业主人，必须取消老的规范条例，用新的条例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会有损害我们的人的危险。譬如说在3年前，难道雷库诺夫比我们中的任何人差吗？像雷库诺夫这样的人在其生活中同资产阶级混到了一起，开始腐化堕落。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经济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说明我们经济部门选拔干部和工作的条件阻碍着这些工作的开展，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尾巴。应该结束这样的实践，同志们。

2. 沙赫特案件提示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教育干部，我们没有很好地培养我们的红色专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结论。我满意地听到了安德烈耶夫同志的真正的革命的讲话。他建议在完善我们的实践方面改变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但遗憾的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必须在这方面讲一下。安德烈耶

① 俄罗斯民族的一种三弦的三角琴。——译者注

夫同志同意在我们管理的所有领域，即在党的、工会的和经济的领域里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可他留下了一个领域没有触及，那就是培养新的红色专家这个领域。他想仍然按照老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他不明白原来教育和培养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实践需要有重大改变，他不明白在这方面同样需要改变方向，使其朝着完善我们的实践工作的方向发展。安德烈耶夫同志要我们相信在新老专家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在新的专家中间有时会遇到这种在做坏事方面不亚于某些老的反革命专家的无赖。但是，如果在这里真的有阶级斗争的成分，而它们确实在这里存在着，那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这样来武装新的专家们，要使他们在同老专家们的斗争中获胜，而不是失败。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新的年轻的专家们不断地在与老专家们的斗争中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照着书本学的，他们是书本知识的专家，但他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脱离生产，他们自然也要失败。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哪怕他们是年轻三倍的专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他们不仅要擅长理论，而且在实际经验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也要有很强的能力。一个未见过矿井和不想进矿井的年轻专家，一个未见过工厂和不想在工厂里蹭脏自己的年轻专家，这样的专家永远不能战胜在实践中久经考验的老专家。所以，不仅老专家们，不仅我们经济部门的工作者，而且还有工人们，常常会与这样的年轻专家格格不入，就容易解释清楚了。

但为了不发生与年轻专家们的这种突发事件，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学，而且要这样来改变：要使年轻专家们从他们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最初年代就开始与生产、工厂、矿井等保持紧密的联系。那谁更容易在教育年轻专家的实践中进行这种改革——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我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容易实施这

种改革措施。我想，如果我们哪怕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们就会在加快培养新的、真正有经验的专家方面获益。我想，在这种条件下，年轻的专家们就会在同资产阶级老专家们的斗争中更好地武装起来。那时，我们会有几十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里，有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手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关系，它们就不得不改善教育年轻专家们的工作，那我们最终就能加速进行培养新专家的工作。

就是这么回事，安德烈耶夫同志。

为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容易做好这件工作呢？不是因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比起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经验更少或者能力更差吧？当然不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可以说是处于同样的位置。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它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加速培养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事情，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把其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这项工作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另一回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培养数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律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可能同样程度地去重视所有这些学习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应该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负担过重，只要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管理，它就能顺利地减轻负担。

第二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合理地挑选自己的教师队伍，因为前者不仅有研究理论的教授，而且还有能在高等技术学校教书的精通工业的实践家。而这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最后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于自己的地位，将更

容易使高等技术学校同工业实际结合起来。不见得能证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能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平起平坐。而大学生们同工业部门的联系是减轻从年轻干部中培养优秀专家工作的主要因素。

有人说，外国的高等技术学校集中掌握在人民教育部的手中，而不是在私人资本家的手中。就算情况是这样的。

古比雪夫：不是到处都是这样。

斯大林：就算情况是这样吧。它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培养专家的工作应掌握在国家或者国家的人民委员部手中，而不是私人资本家的手中。但是，难道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吗？要知道我们是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不是转交给私人资本家，它同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样，也是国家的一个人民委员部，区别仅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全联盟的人民委员部，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共和国的，而且这个区别并非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利，而只对它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同时保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机构参与这些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工作，那么，我们无论在培养新专家还是从工人中选拔学生的工作中只会得益。

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注定要垮台？当然不是。大部分高等技术学校还继续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而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竞争只会有好处。假如我们不把任何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否意味着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事业呢？不，没有这个意思。

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加速培养新专家方面失利了。而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菲加特纳：这些高等技术学校会不会处于特权地位。

斯大林：不，菲加特纳同志，根本不一定是这样。问题并不在于

特权，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把高等技术学校与生产结合起来。

霍多罗夫斯基：我们在这方面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争论。

斯大林：不，霍多罗夫斯基同志，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高等技术学校目前的领导人，而是指要改变和改进对高等技术学校大学生的教学实践。

霍多罗夫斯基：我指的不是那个。

斯大林：有人说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交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意味着当前体制的瓦解，当前教学模式的瓦解。这不能令人信服，同志们。不能使模式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我们从未答应要做模式的奴隶，也从未发过誓要对任何一个模式绝对忠诚。例如，众所周知，一年前，当我们面临有关我国工业部门指挥人员的问题时，我们组织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学院。这个学院至今还在，而且如了解情况的人士所说，它运作正常。大家知道，那时我们对由哪个人民委员部参与组织工业学院的问题有过争论：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参与。争论的解决是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与。因此，我们对模式有所“摧毁”，如果你们想这样说的话。我们从中得到好处了吗？我想，我们是获利了。接着你们知道，高等军事学校是掌握在军事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中。这是好还是坏？了解情况的人说，这非常好，因为这种情况减轻了培养军事管理部门的指挥干部工作的困难。这是否是某种“摧毁”或者是模式的改变？很清楚，是的。同志们，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由于害怕模式而畏惧改进对工业部门新干部的教学工作吗？

我们有没有任何关于向有关部门或组织转交某些高等专业学校从而得到良好结果的经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以党为例。大家知道，党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正因为它直接领导自己的高等院校，所以，可以认为我们的党是一个配备最为齐全的组织之一，从县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州的工作人员。也许为了模式要把这些高等院校交给教

育人民委员部，那会怎么样？或者比如军事部门。众所周知，中等和高等军事院校（总参谋部的学院）集中由军事部门把握。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大约有2.5万—2.6万名大学生。那又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军事部门是干部配备最为齐全的部门之一，从连队指挥员一直到军区指挥员。这好吗，同志们？我想是好的。但如果按照模式来进行的话，那这些学校就应该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去管理了。

我知道在培养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是有区别的。洛莫夫同志是完全对的，他说军事干部的培养要比经济干部容易些。事情本来就很清楚，正因为经济工作更为复杂，所以必须使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转交某些高等技术学校的事有所进展。这将是有益的和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实践中正在转变方向，似乎在培养经济干部方面也应该改变方向。

某些同志害怕事情向好的方面迈出一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种胆怯来自何方，它对于布尔什维克们来说是否体面？我想，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有些人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那位动不动就说，“可别出什么事”的主人公。众所周知，不管雨天还是炎热的天气，这位契诃夫的主人公总是带着雨伞、穿着套鞋，这是“为了小心翼翼”。比方说，跳出一只蟑螂，露出了触须，我们的主人公就急忙闪到一边，说：“可别出什么事。”同志们，可我们不能去模仿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我们不能这样去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方向前迈一步，即便是能确保培养新专家的工作加速进行的一小步也好。

喊声：重要的一小步。

斯大林：不很重要的一小步，同志们。两年前，我们拖延了这个问题，后来把它官僚主义地推给了一个委员会，它最终艰难地产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工业学院。可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有以沙赫特案件这种形式出现的警告和报警信号。为了向前迈出新的一小步，难道这还不够吗？

古比雪夫：是不是迈出更勇敢一些的一步呢？

斯大林：古比雪夫同志，我反对更勇敢的一步。

古比雪夫：我只主张迈一步，总共8所高等技术学校。

斯大林：让我们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之内，我们瞧瞧，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此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干些什么（笑声）。如果它证明它能做更多的工作，那时就能看清楚了。

喊声：那如果不能呢？

斯大林：3. 第三个结论关系到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工业的工作问题。根据沙赫特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怎样？非常不好。坏到了极点，同志们。已经证明，劳动法典遭到破坏，每日6小时地下作业的制度得不到履行，劳动保护的条件受到压制。而工人们忍着；工会不说话；党组织不采取措施去消除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党要求每天地下作业7小时的说法使工人们惊愕，但工人们仍在干着活，因为如果党有指示的话，他们准备干得更多。谁需要这种欺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手段？为什么要嘲弄那些有充分理由被称为英雄的工人们，而且不只是工人们？不久前去过顿巴斯的莫洛托夫同志，跑遍了那儿的矿井，并向矿工们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条件。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需要对条件去发牢骚。莫洛托夫问他们：“同志们，你们过得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没什么，同志，过得不坏。”莫洛托夫问：“我去莫斯科，告诉我，我应该向中央汇报些什么？”矿工们回答他说：“告诉那里的人，我们过得不坏。”莫洛托夫对他们说：“听着，同志们，我可不是外国代表团（全场大笑），我是俄罗斯人，到这儿来是为了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我们无所谓，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对外国人和对我们的人都说真话。”这就是我们的矿工们的面貌。他们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这正是我们得以积累在工人们心坎里的那种精神资本的财富。只是要想想，我们是在亵渎地、罪恶地滥用这笔无价的精神资本……

喊声：对。

斯大林：十月革命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是多么愚蠢和毫无用处呀！但是，同志们，总是抱着过去的精神资本不放，轻率地滥用它是不行的。该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早就到時候了。如果说工作6小时，那就应该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完成。谁不想去完成，就让他尸首分家！如果有工人們的工会，它們有义务捍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那就应该做到让这些工会运用相应的权力，让它们不要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工人的国家也是为此而存在的。如果有人說，提拔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好，那就应该明白，在破坏劳动保护最起码的条件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情况不可能好。如果事情发展到了甚至沙赫特区的工人中都有人怀疑：“这是他們（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我們的”，那就应该明白，在这种秩序下，我们就将无法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参与工业管理的工作。到時候了，是该结束我国工业部门中这种混乱现象的时候了！

4.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系到执行情况的检查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在所有的管理领域里，在党、工业和工会领域里，我们这里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状况坏极了。写决议，发指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令完成得如何，它們是被执行了还是被压在了书桌上的垫毯下面？伊里奇说过，国家管理事业中的严肃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问题。但是恰恰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糟糕极了。领导不光是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意味着要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不仅是指令的执行情况，还要检查指令本身，它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认为我們所有的指令都百分之百正确的想法是可笑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志们。检查执行情况也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际经验的熔炉里不仅要检验我們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验指令本身的正确性。所以，在这方面的漏洞就意味着我們整个领导工作中存在漏洞。

就拿检查纯粹党的系统的执行情况为例吧。我们通常是召见州委和省委书记到中央作汇报来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汇报时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中央揭出这些问题并做出公式化的决议，指出要加强和拓宽工作，强调这点和那点，要求重视这点和那等等。（笑声）书记们带着这些决议回到地方上。以后又重新把他们召来，又还是那些加深和拓宽，等等，等等。我不是说整个这项工作没有用处。不，同志们，这件事在培养和振兴组织这个意义上有其好的一面。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必须承认这种方法应该由其他方法来补充，这就是用派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成员去参加地方工作的方法。

喊声：这是件好事。

斯大林：我说的是把我们的领导同志派到地方去临时工作，不是作为指挥人员，而是作为听从地方组织命令的普通的工作人员。我想这件事有远大的前途，如果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履行的话，它能使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得到改善。

乌加洛夫：应该让这些去的同志不住进经理的家里。

斯大林：经理是各种各样的，乌加洛夫同志。不久前，我看了话剧《轨道在轰鸣》，其中描绘的主人公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党员经理。去看看这个话剧，你们就会知道，工人出身的经理是一个应该竭尽全力给予支持的、饱经忧患的人。

喊声：对！但不是任何人都这样。

斯大林：耐普曼^①暗中监视着他，任何一个专家都对他吹毛求疵，妻子攻击他，尽管这样，他经受住了这场斗争，他清清白白地通过了这场斗争。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这样的经理家里住下呢？

那么，同志们，政治局关于派遣我们的领导同志参加临时的地方

① 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

工作的相关决议草案务必要通过。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工会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中还有施瓦尔茨同志……

喊声：首先。

斯大林：如果他们将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去并在那里开展工作，为了了解工作、研究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短处和长处，那么，请你们相信，这将是真实的和最有效的一种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这将成为丰富我们尊敬的领导人经验的最好的方法。如果这成为一种制度，而且这务必要形成制度，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法令和我们所发布的指令会比目前的这些要更具有生命力和正确得多。

原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第一卷第 233—244 页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9日）

斯大林：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有理论意义的和在全会的辩论时在这里出现的几个总的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的途径问题，关于形成它的源泉问题。奥新斯基同志和随后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直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想，滋养着我国工业、让它能够快速发展的那些源泉，基本的和首要的当然是工人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只有一个源泉是不是就足够能让我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了呢？这就是问题。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发生是以极其巨大地和系统地掠夺其他的国家为基础的。

你们知道，英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从所有的国家榨取民膏，投入附加的资本，最终变成了“世界工厂”。你们知道，德国是靠70年代掠夺了法国把自己的工业向前推进了的。法国现在是靠掠夺德国和从它那里得来的战争赔款来推动自己的工业的。是不是有其他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被历史上奉为神明的道路呢？这就是新的道路，德国的道路，它是靠从美国得到的借债推动自己的工业的。这条路并不是全新的，这样的道路以前也有过。通常，各种不同类型的道路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工业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是通过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得到快速发展的。从工业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规律来，那就是，

只靠自己的国家工业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一个国家要是抱定了工业化的目标的话，它要么就要有系统地掠夺其他国家，要么就是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债款，靠这个来发达起来。在我们这里，在沙皇时期，也有过工业化。你们知道，我们的债款也相当不少，你们也知道，在我们这里没有一条铁路不是靠了大笔的债款建设起来的。现在正在建设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全长 1400 俄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你们说不出任何一种情况，在原来的俄罗斯，像这样大型的项目，只是靠国内的资金建设的。你们说不出来。我们建设的第聂伯国家建筑工程是如此大的工程，它需要大得可怕的钱。你们能说出旧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有过哪怕是一种情况，像这样庞大的工程只靠国内的力量就建设了吗？你们说不出来。我们不能掠夺别人，我们不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喂养工业的危险源泉，别人又不借债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靠国内的力量。这个国内的力量在哪里呢？这就是农民。如果不是向农民收取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贡赋，——我说的要粗鲁些，为的是更清楚些——我们就没有能力继续快速地推动工业，我们就做不到，就没有可能做到。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看来不懂得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发言建立在了这样一点上，那就是农民在商品上支付的过多了，这是对的，我们为农产品给农民支付的并不够，这也是对的。我要回答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的是，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不这样做。这是把我们的工业推向前进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所以谁要是想现在就把支付不够的部分支付给农民，把价格提高到恢复性的水平上的话，谁要是想同时不从老乡那里为城市的商品收受更多，把价格降下来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話，谁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把我国工业化的源泉从我们这里夺走。同志们，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有着某些理论上的意义，但它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最大程度的

实际问题。这个剪刀差是不是该扯平呢？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在。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把这个剪刀差削平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的工业薄弱，它还没有合理化，为了今后的发展，它没有外部源泉。只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源泉太少了，而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如果不想垮掉的话，就应该向前推进，因为没有工业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站住脚跟。“剪刀差”我们是应该缩小和消灭的，但是不可能是在今年，也不可能是在两三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工业还年轻，还薄弱，还没有合理化。谁要是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在反对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这一点，奥新斯基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并不想搞明白。奥新斯基同志问道：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的立场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奥新斯基同志，我要劝你相信，有根本的区别，是根本的区别。他可能会对我的回答感到吃惊。我要说的是：他在形式上是有权吃惊的。的确，为什么是这样呢？反对派本来是超级工业主义者，但却是他们要求在我们这里采用农产品的回复性价格。怎样才能把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中和起来呢？非常简单。反对派有两个心思，原来就有两个心思，现在剩下的还是两个心思：一个心思是扭曲的。给我一个超级的工业化！这是愚蠢的，当然也是很怪的。但是，他们这样喊是为了引起关注，“揭发”我们，好像我们是反对我国高速度的工业化的。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和扭曲的心思。另一个心思是实际的心思，那就是要求实行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为了作为所谓的极左派，反对派需要这种叫喊出来的心思，而作为极右派，它需要的是这种实际的心思。要知道，我们总是在说，反对派是所谓的叫喊的左派和所谓实用的右派的混合物和乌合之众。

米高扬：是投降派。

斯大林：是投降派，半孟什维克，如果你们想这样说，也可以算是半社会民主党人，而我们总是说，反对派左边叫喊的这一翼是在掩

饰右翼所干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愿意，我这里手上有一份整个反对派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关于收购问题的声明。他们要求什么呢？是穆拉洛夫代表他们发的言。他是整个反对派派出的人。你们听听看：“粮食收购运动应该不仅是按收购到的粮食数量和年平均价格来评价，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利益来评价。粮食价格的政策应该符合以下的基本要求：第一，生产者应该为自己的粮食得到生产价格；第二，必须力求让没有什么实力的各类农民得到和富裕类型的农民同样的粮食价格。”

当然了，当一个人想要出卖工业化的话，他一定会拿结合的问题做文章，但这是借口，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奥新斯基同志，您的立场和这种立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对您所提出来的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之间有什么差别的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差别。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的是和中农结合的问题以及为什么需要这种结合，我们用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再一次涉及奥新斯基同志了。照他的说法，城乡之间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结合是通过纺织、通过满足农民的个人消费这条线进行的。

这对不对呢？这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同志们。当然，通过纺织这条线满足农民的个人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加强结合的。但是说事情就此完结了，说这构成了结合的基础，对于结合来说是足够的基础，这是完全不对的。城乡之间的、工农之间的结合不仅发生在满足对纺织的个人需求上，而且发生在满足农民作为生产者的需求上。你们给他们种子，给他们小型和重型的机器，给他们铁，给他们肥料，把他们作为生产者，给他们贷款。所有这些都是把结合变得牢固的成分，不仅是在纺织方面，而且也包括在钢铁方面，奥新斯基同志把这个方面忘记了。可是这是不能忘记的，这是无论如

何也不能忘记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纺织上推行结合，这就意味着是要俄罗斯农民个体小型经济停留在它现在的这种状态。它的生产被抛弃了，小农经济的联合组织的机械化被作为次要的东西抛弃了，于是重心就转移到了只是满足农民个人的需求上来了。这不是能够让我们满意的那种结合。

结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让它，让这个结合本身，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给中农带来好处并加强工人阶级；是让它，让这个结合，能够在这个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里保障工人阶级的领导。结合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也能和农民有结合，但是在这个结合里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而在工人和农民的结合中，领导是属于工人的。如果有人建议一种不是用工人阶级当领导的结合，那么这样的结合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结合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把各个阶级固定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合的目标是为消灭阶级做准备。我们想和中农结合并不是为把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让它永远存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结合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中农。因此，需要结合是为了消灭阶级，不是为了把他们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只在纺织方面推行结合，那他就是要将阶级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在生产上推行结合，那他就是在准备土壤来改造老乡，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和走上消灭阶级。

一般来说怎样才能改造农民，我们逐渐改造中农、消除他们的那些旧的心理和让他们走上新的轨道所要借助的那些手段在什么地方呢？为此需要鼓动和宣传，它们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准备土壤。当然，奥新斯基同志是对的——在销售和供应方面，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合作社的基础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农民才发生了向合作社的转变，向合作社这方面的转变，有利于合作社的转变。

但是基本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呢？是技术。农民的心理是通过新技术而彻底地得到决定性的改造的。

奥新斯基同志引用了列宁的话。他想用列宁把自己装扮起来，这很好。但是在这里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农民哲学家，拿来列宁的一部分话，不愿意完整地引用他的话，这就不好了，奥新斯基同志。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语录，它提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国家应该怎样逐渐地争取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改变农民：“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是在什么地方说到这一点的呢？也许是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关于这一点，列宁是在一本论证新经济政策的小册子里，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说的。

如果奥新斯基同志善于引用列宁关于需要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的语录的话（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就不能只限于这样的语录，应该是完整地把列宁的话都拿过来。您想要完整地引用列宁的话，那就请完整地引用。我可以再引用另一条语录，说的是不能在搞结合的时候只顾了消费方面而忽略了这件事的生产方面。如果我们不用金属上的结合来补充纺织上的结合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牢固的和扎实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也就不可能逐渐改造农民、让他们和无产阶级接近和把他们转到集体主义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关于新经济政策，还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同志们，很抱歉，但是30分钟不够用。

喊声：再给些时间。

斯大林：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能简短地涉及了，因为这些问题是在讨论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必须做出回答。

当时我曾经说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

后提出来的，而是在它之前，在1918年初，当我们第一次有了可能开始真正进行建设的时候，提出来的。我可以引证1918年初出版的伊里奇著名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里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政策被称为“新”的，是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有了可能推行它。

布哈林：当时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忘记了。

斯大林：奥新斯基同志没有表示反对。我不想争论，但是我想引用一个著名决议，那是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列宁的报告做出的决议，白纸黑字写着的是我和布哈林同志所说的，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奥新斯基：我并没有反对。

斯大林：就算是您没有反对，但是其他的人将会反对。

奥新斯基：我甚至自己说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您也许总还是能允许我引用几句话吧。在1921年末，就是在新经济政策过了一年的时候，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决议里……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1920年初。

斯大林：这是在1921年末，12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伏罗希洛夫：对，对！

斯大林：我是这样说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通过了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共和国工业的决议。是一个著名的决议，我建议同志们读一读。“还在第一次喘息的时候，在1918年春天就准确确定了基本原则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力量的严格考虑的基础上的。实行被俄罗斯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对工农政府的配合进攻中断了的这个政策，只是在从军事上消灭了反革命的各种企图之后，到1921年初才有了可能”。我说这一点是针对着这种情况的，如果说，甚至人们

认为……——而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就是奥新斯基同志也没有反对，在共产国际内部和在我们党的内部，有一系列人们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明白了，必须要在允许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还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列宁代表的党就知道这一点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说这一点还因为反对派对采用新经济政策的评价也是有些不同的。它也只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拓宽新经济政策的范围是倒退了，而且还要继续倒退。

布哈林：一直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

斯大林：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退到这场革命将会兴起并且拯救我们，让我们不用再后退了。你们知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在农村采用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做法，你们知道，可以这样说，允许这样做成为了反对派的一系列进攻的借口和原因。我们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背离了列宁，——他们是这样说到这一点的。后退吧，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要为此负责的。我们要对你们说的是——你们背离了列宁，但是在合适的时机我们要打击你们。反对派就是这样说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评价的。你们看看：“而苏维埃政权最近在农村的措施是什么呢——是允许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展农村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但是能在农村不扩展新经济政策吗”——他问道。他说：“不能不扩展。”我要问：这是扩展，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列宁的立场哪怕是后退了一点点吗？我要说的是，一点也没有背离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点也没有扩展。要知道，扩展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那是要把权利送给富农，恢复耐普曼，无条件地取消市场上现在存在的、将总是作为国家在市场上发挥调节作用的那些限制，等等。我要说的是，早在1922年初，在十一大上，列宁就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沿着允许租赁土地的路线，沿着雇佣劳动力的路线走。可以援引1921年末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著名决定，

那里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这是最近这些天我才在各种著作中发现的。你们看看，关于允许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问题，列宁同志在1922年4月写给奥新斯基同志的信里就说到了。你们应该记得这一点，这是“致奥新斯基同志的信”，他在第三点里写的是：“在采用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的条件问题上（希望党的代表大会能通过这样的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个领域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要受这两种现象的各种过分的形式约束，只是限于推行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研究可以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能够更适宜限制上述关系中极端的做法和有害的夸大。”你们瞧，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扩展。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是按照党的规矩，表述了1922年4月列宁对我们的指示。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把一切都收缩了，如果我们想要前进的话，现在应该扩展。

现在我有一人的一份文件，谁都不会怀疑他的诚实，他和我们靠得很近，是甘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他是切尔诺夫，一位来自“别德诺塔”的农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布哈林：看来现在是共产党员了。

斯大林：感觉他还是一个非党人士，但是要比一些共产党员更强，头脑很清楚。

加里宁：对！

斯大林：他赞成中农，反对富农，但是这个人的脑子搞得如此之乱，老是要把一切都扩大了。想要给农村的资产阶级完全松绑，把选举权还给他们。这个文件没有印出来。它是通过高尔基送到我这里来的。他请我和他谈谈，当然我要和他谈谈，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些想法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转，当然，这是一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有些甚至是党员。难怪在1月份，在收购运动的时候，在第一次受到压力的

时候，不得不把一些同志开除出党，因为他们不想着手进行收购。既然你们是工农政权，就应该是提高粮价，否则的话，农民就不会缴粮。请允许我引用两个地方，因为我要再说一遍，这些想法在人们的脑子里打转，必须要做出某种澄清。“第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渐进的所得税制度。第二个原因是重新选举的指令改得不对，指示不清楚。”他要求什么呢？“第一是要取消现在这个样子的渐进的所得税制度，取代征收土地税，对牲畜和大型农具略征一些税”。

第二个措施也很重要——“改变选举办法，对有剥削的富农经济该从什么地方算起，要画出另外的标记来”。

第三个措施他没有表述，但是他在文字中指出了我们对农村中的租赁压缩得太厉害了，应该扩大租赁，而且这不是只对富农，而是对全体居民都有好处的。而在出现斗争的时候，他将会在街垒上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对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

在这方面，在关于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实。我指的是在座的一位同志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联系到粮食收购的阶级斗争好像只是有着最为次要的意义，它，也就是这场阶级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同志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绝对不正确的，不对的，在我们的全会上提出来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这一点也是说过的，只要我们掌握着政权，只要制高点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直也都要说到这一点。鼓动和煽动阶级斗争不是我们要干的。当我们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让我们能够采用那些对我们特别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式，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来，而是把斗争的成分吸收掉，把它们消除掉。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策呢？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制高点，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多余的麻烦。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主要是在经济措施方面，我们从敌人的营垒里把一些分子中立化了，的确是中立化了，而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我们把这些分子中立化了，减缓了斗争的气焰，把我

们敌人中的那些最好斗的分子、那些最起劲的和最不服输的分子化解了，孤立了——用经济斗争的和平方式把敌人的军队拖开、冲散和孤立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政策。可能彼得罗夫斯基想要说的是这个，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敌人所需要的。我们给出指令来——不要煽动起阶级斗争来，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本来就这样强大了，我们应该用经济的措施来进攻、排斥、削弱对手，中立反对的分子，孤立最起劲的那些人，但是敌人是不听我们的。就拿沙赫特事件来说吧，我们是怎样对待那些组织了阴谋活动反对我们的专家呢？这些专家是些什么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敌人的一部分，我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是建议合作——这是事实。把专家吸收过来，给他们提供保障，对他们说——为我们工作吧，给你们钱，可以过着像样的生活，反正我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该和我们……（听不清楚）。我们对他们是采用了合作的态度，可是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这些拥护旧制度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前进意味着要排斥资本主义成分，削弱旧世界，加强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于是他们投到了外国资本家那里去了，投向了这里的资产阶级，组织了阴谋，要向我们进攻。要知道，这是事实。我们要和他们合作，而他們要和我们打仗。显然，我们在经济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我们的敌人，最好斗的分子们的反抗。

不可能想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前进，我们在前进，在用经济的办法排斥自己的敌人，而他们一直在后退。我们又用经济的办法前进，他们还是一直在后退，然后一看，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反抗。这种情况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从来就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是走向消亡的阶级会不声不响地交出自己的阵地，没有反抗，没有厮杀，也不组织对抗。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前进，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前进都在压迫着、挤压着我们的敌人，他们就要反抗，因此阶级斗争就会尖锐起来。富

农的情况或者粮食收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1月的时候，在1月之前，我们是怎样开始粮食收购的呢？就拿去年的8月、9月、10月来说吧——是放任自流的。我们绝对没有采用任何非常措施，任何非常措施都没有。这你们是很清楚的。一个卢布就一个卢布——拿去。价格当然是你不满意的，它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伏罗希洛夫：而且远远不是恢复性价格。

斯大林：但是你去年就是用这个价格卖的粮食，别固执了，现在还这样卖吧。于是他卖了。8月、9月勉强卖了，甚至在10月以前也还算好，在10月里就开始减少了，在11月的时候就更少了，而在10月的时候甚至到了总共只有3900万[普特]。这是我们挤压的阶级，也就是农村的富裕阶级的一定形式的反抗。我们是挤压了，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让他们能敞开地干，没有让他们能回过头来，没有让组织成粮食辛迪加，拿价格做文章，没有让租赁扩展开来。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对他们征收了很高的税，是累计税，这是真的。当然，对这种反抗我们是应该打击的。不这样不行。我们不想发生这样的战斗，但是人家强加给我们了。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这样的，我们前进了，在城市和乡村里，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发展了，在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如何和平地进行，它肯定会压迫资本主义分子，压缩他们的规模，它会挤压他们，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有组织地抵抗我们，这样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了。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行动，没有一个是不能恰恰完全或者主要地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得到解释的。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又怎么能说阶级斗争不是起着首要的作用呢？不，它是决定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

喊声：对！

斯大林：斗争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是会改变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我们想让这些形式具有和平竞赛的形式。虽然我们是

这样希望的，但是敌人不想这样，因为这种形式会削弱它，于是它就要反抗，这样，阶级斗争也就会不断增长。情况就是这样的，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能说联系到新经济政策，在粮食收购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具有次要又次要的意义。不能说，也不能对立起来，说是我们奠定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我们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而我们前进迎面对着的那些人都是在后退，都是处于一种和平生存的状况的，没有任何的波动。我们是在前进，他们是在后退；我们再向前进，他们又在后退，你瞧，于是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了。不是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即便是我们这里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让工人阶级对此有所准备，不要再让我们遇上粮食收购这方面的意外情况，或者是像沙赫特案件这样的意外情况。

一般性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问题。不能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措施“一般来说”是好的，或者“总是”好的，或者它们一般来说是不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从思想上说，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允许这样来对待。

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采用非常措施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呢？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不是错误，这是局势强加给我们的。李可夫同志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在1月面临的某些坏事中，这是最小的一件了，但总还是坏事，是一种我们不可能回避的手段。你们自己真的也可以评断一下。1月来了，收购下降了，和去年相比，我们缺了1.28亿[普特]的粮食。可以说，通常施加影响的所有措施都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有一亿左右的粮食储备，可以让我们再等一等，把持有粮食的人围困起来……

伏罗希洛夫：将来一定需要有储备。而且不把这些粮食给人民委

员部。

斯大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储备；或者我们有1亿-1.5亿卢布的外汇储备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不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口粮食是耻辱。我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一个种类的粮食，一种作物我们可以进口，而另一种我们可以出口，在平衡表上我们还是有利赢利的。

有人喊：对！

斯大林：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储备。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储备，我们就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了。未必能否定的是，没有这些措施，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伏罗希洛夫：对！

斯大林：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如果粮食不够了，应该进口，这没有什么耻辱，而如果没有外汇，那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要摆脱出来。人家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来，没有粮食储备，没有外汇储备，剩下的只有一条了——企求非常措施。现在谁也不能说非常措施就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措施，它拯救了……

有人喊：对。

斯大林：〈拯救了〉国家免遭整个国民经济极其严重的危机。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的。

斯大林：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缺了1.28亿粮食，这是赤字。我们应该把它补上，到地里泥泞的时候剩下两个半月了，大约是3个月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里把丢失的补上。弗鲁姆金同志在他的信里做了计算，如果我们提高了价格，一个月可以收到6000万，也就是说，3个月是1.8亿，而我们收到的是2.75亿，而且这还是不够。

伏罗希洛夫：也就是说都吃掉了，如果还有的话，也都是全吃掉了。

斯大林：我将会说到，我们是怎样把用了这样的力气收集到的粮食没有理智地和不能允许地分散掉了，我会说到这一点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今后也还要采用非常措施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为的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用采取非常措施了，不仅是在这场收购运动中，而且是永远。我们应该采取所有措施来达到排除必须采用任何的非常措施，至少是在将进行的收购运动中要能做到这一点。一些人说，非常措施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措施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的，他们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绝对不对的。也有人说，采用非常措施是一个错误，应该谴责这些措施，这也是不对的。同志们，还有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不对的。在这里应该两面出击：既要打击犯了一种极端的人，也要打击犯了另一种极端的人。我要再说一遍的是，我们应该采用一切措施，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任何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这里就发誓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采用它们。不是这个意思。和剥夺富农以及贫农委员会的做法相比，这样说非常措施意味着什么呢？放空炮。列宁甚至对贫农委员会也没有发誓说，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永远不会采用它们了。相反，他认为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将不得不甚至采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同志们，这些情况你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有些人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请允许我能让同志们回忆起这一点来。你们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了一个所谓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决议《关于农村工作》，这是他提交给代表大会批准的。你们知道，列宁狠狠地批评了这封信，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那里有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方法问题，是针对富农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不接受这些阶层（即富农和富裕的阶层）和用 1918 年贫农委员会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粗暴的、非经济的镇压的政策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也就是说，是富农和富裕农民不能接受的政策；而且他鼓吹说，这是非经济的镇压措施。他

说的是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说这种政策是不能允许的。列宁对他的回答是：“第二句（反对‘贫农委员会的做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例如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农委员会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你们看到了，列宁知道什么是贫农委员会的方法，他甚至也不想坚决放弃这些做法，并没有发誓无论何时都不采用这些做法。我们就更不能事先就发誓永远不采用非常措施，不能采用这些措施了。我们的政策就在于，我要重复的是，让我们工作的环境能够完全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形势可能会迫使我们说的话，我们就要聚在一起，决定一下，是不是没有另外的出路了，而且我们可能要采用某些非常措施。所以，如果是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话，如果是从总体上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的那些倾向、那些极端的做法，无论是要绝对主张采用还是绝对反对非常措施，都应该抛弃。

在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请允许我谈谈粮食这件事。我想，有一些同志，包括奥新斯基、斯捷茨基同志和克里茨曼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有一个毛病，把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各种原因都堆到了一起。

我们的困难原因中，有长期的、基本的原因，这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克服的，消除它们需要很多年，也有和行情变化有关的、特殊性的、暂时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能消除。把所有这些原因混淆起来，都堆到一起，是不行的。一些同志，包括我提到的那些同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困难的意义何在呢？就在于它们在我们的面前把粮食、粮食生产、

总的农业上的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全部提了出来。

总的来说，我们是不是存在粮食问题呢？这里有些人表示怀疑。当然存在。我们不可能像茨冈人那样，每年都是对付着过日子——比如说，缺了1000万[普特]，或者多了2000万，就凑合着够了。没有出口的粮食，没有军队的粮食，没有防备歉收的储备，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们是不能这样过日子的。甚至是小农经济，他们的家里总共也只有少得可怜的东西，就是他们也不能没有储备。比方说，我们这一茬的过冬作物在乌克兰没有被毁掉，甚至是在北高加索也没有遭殃。就算是我们勉强可以过关了，难道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你们是怎么想的，同志们，要是打起仗来，能够一方面在前线和波兰人打，而同时又在后方和富农打吗？当然不行。李可夫说得对，一旦战争打起来，富农就不是那样子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强制他们拿出粮食来的。他们是要调皮捣蛋的，还有中农，还有贫农，但特别是富农。他们会说：去你们的吧，谁知道战争会拖多久。你们不是想给军队搞到粮食吗——那好，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也许会有歉收，会没有保险基金了，我们是不习惯没有保险基金过日子的。而且他们是对的。人家就会这样说了。如果和打仗相比，今天的困难是很小的（粮食上的困难当然是不大的），如果说在今天有这种相对不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在政治的地平线上看到的是乌云和国内会发生某些分离的威胁，如果是威胁已经形成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了，如果发生战争又会怎样呢。敌人就会把头抬得更高了，就会去找军队、贫农、中农和落后工人的某些阶层了。他们是会去找的——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储备了，如果打起仗来，就需要有5000万到6000万，为的是在最初的6个月或者可能是更多一些时间里，在打起仗来的时候，在关于战争的议论传播到全国的这段时间里，在国家看到战争是因为什么开始的，看到有人在进攻我们，看到我们是正确的、不是他们正确的这段时间里，直到这整个浪潮平息下来

（按照公认的道理计算，要能够传播到全国去，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关于打仗的传说会产生一大堆的风言风语，而这一切平息下来需要有6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要重复的是，我们不可能是战场上和波兰人打，在后方又和富农打。富农不是原来的富农了。他们是不会白给东西的。他们不会再害怕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夺走了，他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他们会说这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把这件事忘了吧，来点什么新的东西吧。

伏罗希洛夫：他说的也对。

有人喊：早就该建立储备了。

斯大林：如果我们满足于“不多也不少”地过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备战的储备了。

伏罗希洛夫：你听听，米高扬。

米高扬：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

斯大林：将不会有防备歉收的储备了，不会有国内的储备了，而没有这些是很难周转的。我们的粮食今年不能出口了，可能明年也不能出口了，要知道，我们是不能长期这样生活下去的。要知道，我们应该努一把力，让粮食能够列入出口的清单。不这样是不行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大体上要有3000万[卢布]用于进口粮食，而我们要节省下这些钱是为了进口拖拉机的。那你们就看看，怎么才能支配得开吧。粮食不能出口了，相反我们不得不进口，外汇的储备非常少，还不得不用在粮食上，而进口它我们就不能进口拖拉机了。这就是不能出口粮食意味着什么。在早先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运出的是5亿-7亿。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还是出口了。不能否定的是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那个时候的商品粮比现在多。我们不能在老的基础上扩大商品粮，但是在新的基础上，在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该建立起商品粮的储备的，因为如果不出口粮食，就得不到设备，就得不到农业用的机器。这就是四种类型的储备。出

口粮食是为了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又怎么能否认，说是没有粮食问题呢？不是的，同志们，它在我们这里是主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系列例行任务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基础，基本原因，基础……在转到这上面之前，在评论了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之后，在这之后，我想要涉及的是政治性的困难。我刚才说了粮食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关于总的粮食生产和总的农业方面的一个基本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这里出现了政治性的困难。

这一点，同志们，是不能否认的，同志们，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的情绪被破坏了，富农在政治上用这一点赢得了一些东西，这种情绪开始传播到一定阶层的工人那里，甚至是在粮食足够的地区，甚至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为结合制造了某种威胁，——这是不能否认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善于正视危险。但是我不想说这就是分离，这是不对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已经是分离”，就像奥新斯基同志说的，是在做文字游戏。这是不对的。分离如果不是国内战争的话，也是国内战争的前夕，也是国内战争的开始。难道我们这里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我们这里是分离的话，难道农民将会是像这样生活吗？难道在基本的工人地区将会是像现在这样，有那种相对的平静吗？从来就不会是这样的。对结合构成的威胁当然是有的，分离则是怎样的都没有。如果分离有的话，如果农民想要和苏维埃政权斗一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了。当工人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们至少是要罢工的。当农民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你们扩大春播面积了。当然，不能像奥新斯基同志那样，把两个东西混淆起来，把春播面积和过冬作物的面积混淆起来，把这一切都推到我们采取的非常措施身上。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是去年秋天播下的，

那时非常措施还没有呢。如果你们想要解释清楚，说是非常措施能够影响或者已经影响了播种的增长的话，就应该把春播的面积拿出来，而且只是把它拿出来，因为它是在非常措施采取了之后播下的。当然，像一些同志那样，像克里茨曼同志的文章那样得出结论来，夸大地想象到，好像是非常措施推动了农村，刺激农村扩大了播种面积，这当然也是太做作了。克里茨曼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是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编辑部的评述是正确的。要不就不对头了，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提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农民是不是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对苏维埃政权丧失了信心，要分离而不要结合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准备讨伐苏维埃政权了，而且由于这一点，就像克里茨曼所说的那样，农民的经济计划已经没有前途了。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要再说一遍：当工人想要讨伐政权的时候，他们至少要开始罢工。当农民想要讨伐苏维埃政权，而且是要整个和政权对着干的时候，他们至少要等待，而且至少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而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怎样的情况呢？至少他们应该是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至少是该缩小播种面积。可是要知道，在我们这里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拿来的不是奥新斯基提供的那些混乱的数字，那些没有用处的材料，而是我们所有的那些实际的材料，如果拿来的是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西伯利亚，可能还有乌拉尔的材料，那么到处……——我不说北高加索了，那里有复种，会把整个情况都搞乱的；我也不去说乌克兰了，那里也有复种的情况，而且规模更大，我说的是5个地区的情况，而且其中有4个是主要的产粮区。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不拿复种的材料？这也是能表现出农民的积极性来的。

斯大林：春播的面积扩大了，这是事实。清楚的是，如果农民怀疑，准备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恼火到了要分离的程

度，如果他们感觉到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的话，这样的农民如果有要分离的想法，他们是不会扩大自己的春播和过冬的面积，这就是不正常了。这是一个证据，说明不可能谈上什么分离，需要说的有分离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把它排除掉。这就是粮食上的经济困难。

这些困难的基础是什么？这些困难越来越大的基础是什么呢？决议里说了，我不做任何补充了。基本的一点是农业越来越更加分散和零散。这是事实，农业变得越来越零碎了。如果说我们在革命前有大约 1500 万-1600 万农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的是 2400 万-2500 万了，这就意味着，农民经济越来越小型化，所以它变得不能赢利了。经济单位越小，它的盈利就越小，它的商品率就越小，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商品粮。播种面积几乎还是那样，大体上比战前的标准低了 5%。粮食生产几乎也还是那样。如果说粮食的话，那就是要比战前落后大约 5%、6%，而商品粮的数量几乎要落后 50%-60%，因为小农经济盈利少，商品率低，和 50 亿的粮食相比，生产出来的几乎少了 3 亿，而提供的商品粮要比在资产阶级经济时期少一半。我们有大约 6.3 亿-6.5 亿普特，大约 7 亿普特的商品粮，这太少了；从农村的周转中抽出来的粮食要比沙皇时期少一半。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受的基本困难。

如果说到长期的原因而不是行情造成的原因的话，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关于行情造成的原因，我在下面要谈到。如果不是指出这样的原因，而是向自己提出消灭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的话，那就像决议所说的，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应该是提高中小个体经济。当然，说个体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自己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可笑的。这是不对的。条件有很多。这当然是不对的。可以采用改良的种子，可以采用农具，还有肥料，总的来说，可以有上万种条件能够把农民经济的收成提高一倍。这是事实。我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像样

地利用这些条件，关注得太少了。

有人喊：我们不善于这样做。

斯大林：部分原因也在于我们不善于这样做。卡尔平斯基同志证明说，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绝对愚蠢的。

我不能同意的，不仅是有些人对小农经济的条件估计不足，而且也不能同意有些人过高地估计这些条件。还是应该注意到，中小农民经济发展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且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说，要是我们真正严肃地想要把原料经济以及整个农业向前推进的话，在我们这里，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的问题就是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抓住的和必须要贯彻的第一个出路，就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收成，供应肥料，供应机器和良种，等等。

有一种手段，借助于它可以更轻松地提高这种小农经济。这就是合作化。非常奇怪的是，有些同志最近在不懂得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批判性地评价这个计划。不久前，布哈林给我看了从列宁格勒的《红色报》上摘录下来的一段话，说是以前我们是在生活和供应上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农民联合起来的，而且是用这样的办法把这种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来，集体化的形式上来的。

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这是愚蠢的，怎么能允许这样做呢？我搞不明白。要知道，如果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在最近这些时间建立的那种合作社团体，如果我们没有把个别的农民经济收拢到共同生活和供应的组织里的话，那我们这里就没有任何集体农庄运动了。既然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已经为农民转向集体农庄，转向协作组织的经济单位创造了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这就是说，在生活和供应上的合作社组织正在我们这里得到发展，并且将继续发展，把小农经济逐渐转向集体经济的轨道会变得更加容易了。这也就是第一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就是决议所指出的，逐渐地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这里指的是这种集体化的所有形式，从最简单的机器上的、土地耕作上的协作组织，劳动组合等等开始，直到集体农庄，公社。

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当一些同志说到例行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的时候，一些人，远不是所有的人，通常是背朝着小农经济的，说是现在我们有的是新的任务——集体农庄，而小农经济是枷锁，应该尽量快地摆脱它。当我听到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米柳亭同志说的话时，感到很吃惊。米柳亭同志威胁说，“如果你们想要给小农经济恢复名誉，那没有你们的好”。这是很怪的。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走得更远了，说是小农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东西。我不明白。如果是该诅咒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和它们联盟呢？这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原来我们是和这种该诅咒的东西，和小农经济搞联盟，而且已经有10年了，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而且我们有根据在今后还要维系这个联盟。怎么会是这样，哪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一个列宁主义者怎么会是这样看待小农经济呢？我们并不是要努力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我们并不是要竭力摆脱它，就像要摆脱枷锁，要摆脱该诅咒的东西一样。我们要有它并不是为了给它恢复名誉，因为它并不需要恢复名誉，而是相反，我们是要把它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难道您，米柳亭同志或者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要发展合作社，就将提出一个口号，或者即便不是口号，那就是指示，或者哪怕是一种暗示，说是小农经济对于我们来说是枷锁，是该诅咒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最后要垮掉的东西，不值得我们给它恢复名誉，也不能由我们给它恢复名誉吗？而我所担心的是，在你们能够勉强让合作社站立起来之前，你们就已经把我们和农民有的那个联盟破坏掉了。

喊声：对，对！

斯大林：我们和小农经济是有着联盟的，你们却在灌输这样一种

鄙视和轻视它的情绪，那你们将立足于什么呢？那么，这个联盟还有什么用呢？这根本就不是在帮助合作社经济，完全不是。我们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说：我们要通过为集体农庄提供基础的合作化来解决第一项任务。我们希望的是，让农民不是把集体农庄看成自己的敌人，看成要把他们搞得忍无可忍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把集体农庄看成是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朋友。

米柳亭：对。

斯大林：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小农经济“恢复名誉”和把它说成是我们的经济中该诅咒的东西。应该说的是，和大型的合作经济相比，小农经济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不大能赢利的或者甚至是最没有好处的，——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而且该说的是，为什么应该逐渐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列宁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看看，他是怎样从我们今后的发展的角度评价小农经济的。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这种评价的，我们的党也正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米柳亭：我并不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按您的说法就是，它，小农经济，不仅不是有利的，而且是有害的。按您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否则它就不需要恢复名誉了。按列宁的说法，它是最少有利的，——但还总是有一些利的，——比起大型的合作社经济来说，当然是很少有利的。接着列宁说到了个体农民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应该确立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是这样说的：既然提出了合作社的任务应该是什么，那么合作社是应该和小农经济斗争，还是应该把它们拉过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然你们面临的是两种形式的经济，如果是一种在和另一种斗争，这样就是一

种关系，而另一种关系是两种经济形式，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一种是在帮助另一种提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列宁接着说：“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它的信任。”

这里没有说到恢复名誉或者说这种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这里说的是一种经济盈利少，另一种盈利多，更有利的经济应该帮助不大有利的经济提高，而不是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应该把它作为个体经济，给它帮助。就说集体农庄吧，它的周围是农民，其中也包括中农。一件事是帮助小农经济活下去，另一件事就是要把它作为小农经济，给它帮助，让个体农民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这种天长日久的组织上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不用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加入到集体农庄里来。

米柳亭：我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句话的末尾没有听清楚）

斯大林：第一段语录说到小农经济是最落后的，盈利最少的，应该逐渐地把它们联合起来。这段语录我是从列宁《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引来的，它论证了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在《论粮食税》这个小册子里，恰恰首先说到的是关于个体的小农经济，而且他也没有忘记提到集体农庄。

第二条语录我是从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摘下来的，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这里制定出了我们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还有第三条语录，是从集体农庄运动的观点解释我国发展的前景的。“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还没有集体化的农民

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这次讲话他也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同志们，这就是方针：千方百计地发展作为个体经济的农业经济，利用所有的条件，而它们是很多的，在农业的发展中，这是一项基本的，这是现在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因为正像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小农经济依然是农业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该忘记的。像奥新斯基同志或者另外的什么人那样的人，对这一点的估计不足，他们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那些过高估计和看不到除了小农经济外还需要建立大型的集体经济的人们，他们也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既不需要指责个体农民经济的人，也不需要为这种经济唱赞歌的人，这两种人都应该刮他们的鼻子。而且从这方面说，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有一系列同志在这里发言，说到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说到对它支持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到集体农庄，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这项任务一样。我把奥新斯基同志的讲话看了三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到，在我们面前，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外，有另外一项任务——这就是发展集体农庄。一句话都没有说到这一点。斯捷茨基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忘记了这件事，讲了话，也咬了什么人，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发展集体经济。照我的看法，对这样和那样的人，都应该当场就向他们指出，除了农民经济这项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关于国营农场我就不说了。发展国营农场的任务——这是一项无可争议的任务，加里宁同志会说到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这就是3项任务。

从农业角度看，当前时刻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是一项老的任务，现在它也是一项新的任务，但对我们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已经不够了。在这个任务之上，还要加上两个实际任务，

提高所有形式的集体农庄和提高国营农场，包括老的也包括新的国营农场的任务。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谁要是想，总的对于农业来说，特别是对于粮食经济来说，用这样的一项任务，也就是说用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就能把我们的任务全部说清楚了的话，那他就是对我国现在的局势一窍不通。应该是把所有这三项任务都看成是例行的任务，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农业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想要这样来安排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有对内和对外的需求的储备的话，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所前进。我说的是粮食的储备。

有意思的是，列宁同志是怎样看待这三项任务的结合问题的呢。你们可能读过列宁同志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件说到了，请全会注意的政治局决议是和列宁在这个文件中勾画的发展农业的实际计划完全吻合的。我指的是列宁亲手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

米高扬：1921年8月。

斯大林：他是在1921年5月颁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

布哈林：还有经济会议。

斯大林：在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他给出了纯粹实用性的、没有废话的、实实在在的指令，说到了怎样在实践上扭转我国的经济政策，沿着新经济政策轨道前进。列宁把这个命令里的任务分成了三类任务和三类问题。第一类涉及的是总的商品流通和工业的问题，包括了除国家工业外的其他所有类型的工业的所有相互关系。第二类涉及的是提高农业。第三类是组织掌握市场的制高点所绝对必要的经济会议和各种这样的经济领导调节机关。我来说一说第二组问题——是这样说的。发展农业。就是这样说的——第二组问题——发展农业：

(1) 农民经济；(2) 国营农场；(3) 公社；(4) 劳动组合；(5) 协作社；(6) 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还是在1921年，在7年以前的时候，

当我们这里可以说还是手里拿着蜡烛一台台地寻找拖拉机的时候，当我们这里的集体农庄还少得可怜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领袖，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实际任务的呢？他没有把两个任务对立起来，他没有把任务的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扯开，他是从总体上看，于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发展农业——发展农业，那就发展农民经济，发展国营农场、公社、劳动组合和其他类型的协作耕种土地的组织。在我们这里，决议所作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决议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我们要在三个方面前进，在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方面，在发展国营农场方面，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方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列宁这个能够搬动大山，让它们彼此相撞的巨人，怎么能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关于建立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集体农庄或者从美国发来了几台拖拉机的每一个小消息的。这就是 27 日（听不清楚）……的一封信，我来读读。《致苏俄技术援助协会》。亲爱的同志们……（读）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惜没有帮上他们。

斯大林：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待我国农业未来的组织，他对从不大有利的和落后得可怕的个体经济这样一种生存的基础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过渡理解到了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这里的某些人引用他的话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哲学家。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那些暂时的、市场行情上的困难上来，对这一点说上两句，因为这里有许多要说的，我就要结束自己的话了，拖得太长了。

决议里说了，产生我们的粮食困难危机的暂时原因、特殊原因有 4 个。在这里列举的是：市场平衡受到破坏，价格的对应关系，计划领导的错误，收购机构和党的机构的缺点以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利用了所有这些结论。

我想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说几句。我要说的是第一点，关于破坏市场平衡和关于农村中富裕的富农阶层以及总的来说农村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提出了过多的需求，我们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在这种差距的基础上造成了困难。他不想相信这一点，于是说：“怎么是这样呢？一方面你们那里说农业是最落后的，另一方面它又积累了，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工业不能满足它。”我想，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我们那里说的是农业的落后，是它和工业相比非常落后，而这里说它前进了，不是和工业相比，而是和前些年相比。这也是正确的。这是事实，和前些年相比，农村成长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否则的话，干什么要提高税收，干什么要一个劲地大搞捐献呢？农村是积累了钱。这是当然的。这些年它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特别是它的富裕的富农成分提高了这种收入。这是事实，这里说的是农村今天的收入和它以前的状况的比较，和它过去的收入的比较，而那里说的是农业、它的速度和工业速度的比较，——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是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的。所以决议是正确的。

我想，在这里开列的造成今天收购危机的特殊原因里，在这个清单里，还缺一条：应该在这5条原因里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们错误地消耗了粮食。

有人喊：一定要加上。

斯大林：不要把矛头指向商业人民委员部，在这一点上不只是它一家有过错，我们大家都有错。（笑声）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大家都有错，但首先有过错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管这件事的。（笑声）

斯大林：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有错。在3个月里收到了2.75亿普特，但是显然我们看花了眼。

有人喊：收了很多！

斯大林：那就分配吧。不是像一个真正精打细算的主人，知道除

了好日子外还有不好过的日子，不是一点点地分配，我们开始把粮食都分散了，给了一个区，又给了另外的一个区。为什么在3月份就该是把5500万都分出去供应了呢？难道是为了在5月或者6月只能分配2300万吗？你们看看，是怎样的差距呀，有那么一个月，我们是从大家的锅里拿出5500万来供应分配给消费者的，可是到了紧的时候，就变成2300万了。为什么不能在那个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和现在，在6月份的时候，都拿出3500万来呢，那我们就能省下1500万了，而这样做是有很大大意义的。照我的看法，这一点应该写到决议里去。

关于需要采取措施排除必须采用非常措施的任何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更多地展开说了。我只想说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这里指出的、我也想强调的3个事实。

第一，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的缺点之一，无论是在第一个时期，在1月到4月这段时间，还是在后半段时间，在5月和6月的时候，是我们的党组织手伸得太长了，把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完全取代了。

有人喊：不这样就什么也做不成。

斯大林：我懂得这一点，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是由于什么原因，把党的组织这样推到了前面呢？你们都知道，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没有能动起来，应该把它们动员起来，应该监督、领导和帮助它们。

有人喊：指令是相当吓人的。

斯大林：指令是很吓人的，因为大家都是火急火燎的，但是我们总还是应该避免发生这段时期在我们这里发生的那些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避免让党的组织取代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

有人喊：对。

斯大林：要让农民不是一定要找区委书记来告状，而不是去找执

委会主席，去找收购单位，去找一个什么合作社的主席告状——农民不认他们，他们就是要找区委书记。这样是不行的。非常的局势，非常的措施，然后就是局势恶化，出现一系列的扭曲——所有这些造成了这样的气氛，当然就需要有人来有力地把事情推动起来。党的工作者们便出头了。照我的看法，不该再这样下去了，应该采取措施，不要让党的组织这样出头，让它们替代了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不能允许这样，否则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将不能得到发展，将不能强壮起来，它们的威信将会降低，而且党将会在这上面栽跟头。需要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向老百姓交待的外壳。党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党员和围绕着它的、党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也就是说 100 万的党员和党的周围的 200 万积极分子——党是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而我们打交道的不仅是这些人，而是所有的老百姓，而我们有 1.5 亿的老百姓。谁能和他们打交道呢？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党应该是在内部领导、帮助，但不是取代。见鬼了，我们为夺取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的形式进行了斗争，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是在争取得到它的，为的是建立能够从内部进行领导的管理形式的。如果我们将老百姓那里把它们消灭了，自己伸头太多，取代它们，那我们就会断送事业的。这就是我想要指出的。我明白，当时是需要的，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的，但是总还是应该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要避免出现这种扭曲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谷物加工费问题。我想，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 10 亿多普特的粮食是农民在磨坊里磨了之后供个人用的。这些粮食有一部分是用风磨加工的，有一半是在我们国家和合作社的磨坊里加工的。而且所有的人——农民，贫农、富农和中农，都承认，应该为此支付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果是多

少呢？

有人喊：一普特交 3 俄磅。

斯大林：一普特支付 3 俄磅，而有的地方是 4-5 俄磅粮食。按照懂行的人的计算，合作社的和国家的磨坊大约可以拿到完全有保障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5000 万普特的粮食。

米高扬：对！

斯大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些粮食没有受到监控。我的感觉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决定，我知道得不准确，说的是把这些粮食的一部分交给贫农基金，而另一部分用做……收购。至于这些粮食是不是一点点地用在了私人的市场上去了，没有任何监督 and 任何把握。要知道，往往是这样的（请合作社的人员不要见怪），有一定数量没有控制的粮食是放到了私人市场上去了，因为合作社想要把平衡表扯平，给这部分粮食支付的钱要多出一倍，这样的诱惑是非常大的。能不能把这些粮食控制起来呢？既然数量达到了不少于 5000 万普特，这可是我们有保障的和完全无可争议的粮食呀。

米高扬：可以而且应该。

有人喊：现在就干起来。

斯大林：这个问题应该从实际上得到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梅德韦杰夫同志在这里提出来的，是关于社会商店的问题。好像您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吧？这一点不可能写到决议里去，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将对我们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在 1 月、2 月、3 月已经把贫农动员起来了，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这是事实，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我们在 1 月、2 月和 3 月已经把夺来的粮食的一部分给了贫农，他们的情绪是好的，在这里，就情绪而言，情况是越来越好些了，而且只是在 4 月、5 月和 6 月被搞坏了，只是因为不可能给贫农挪出更多的 800 万-1000 万普特粮食作为消费基金。那么，该怎样安排，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在新的收购之前，在收成打

下来之前，能够让贫农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商店当然是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有人喊：那里也有中农参加。

斯大林：实际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说完了，同志们。关于主要的困难已经说了，关于特殊的困难也说了，所有这些困难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迫使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最终要注意到农业了。遗憾的是，历史总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只有经历了困难我们才学会了纠正局势。只是由于在东部战线上，当高尔察克少许触动了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才得以建立了步兵。只是通过在南部战线上和邓尼金的斗争，我们才明白了必须要建立炮兵。只是在遇到了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不培养自己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不培养来自工人阶级的人们的新知识分子，能够自己推动事业的技术方面前进的技术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行，我们没有他们就会完蛋。现在是新的困难，粮食上的困难，只是到了现在，布尔什维克才严肃地抓起了农业。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搞的是工业和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只是议论了农业，只是泛泛地随意抓了一些事。应该利用这些困难来严肃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抓农业和粮食经济这件事，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消除我们困难的那些特殊原因和向前迈进。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032号案卷，第115—178张。原件。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年7月11日）

斯大林：同志们！我今天本不想讲话。但奥新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让我不能不讲了。我总共用10—15分钟，不会多。

我们昨天争论的是什么？说到的是城乡之间存在剪刀差，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钱，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钱。这里讲的是，为了工业，为了更快地前进，必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工业的工人和支持这个工业的农民。这里所说的是，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的钱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的钱，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农民的附加税，而且我把这叫做某种贡赋。某些人不喜欢这种说法，其中也有奥新斯基同志。当然这是各人的口味。但是应该给各种东西一个正名——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在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不是在农民大会上，应当照直讲出实情。这有些呛鼻子——贡赋，附加税。

就算这是呛鼻子的字眼。我们就应该是更多地和更快地努力结束这种贡赋，发展工业，把它变得合理，把商品的价格降下来，这样来把“剪刀差”消除。说的就是这个。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越是到后来就应该越是更多地这样做。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剪刀差”，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在今年还是在明年，也无论是在今后的年份里，如果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工业搞垮的话，我们做不到消除“剪刀差”。这里说的是这个。奥新斯基同志非要在最近就消灭剪刀差。我与其他同志一起，把这称做是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理论。今天奥新斯基同志承认说，他反对恢复性价格。这

很好。也许奥新斯基同志丢掉了他所犯的片面性。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这样的：批评没有白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我和其他人一起，特别是我，强调的是，我们党最著名的活动家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中大谈特谈了发展农业的途径问题，谈了应该按照什么渠道快速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经济，却只字未提诸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是不能允许的。他说到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决议承认个体经济长时间内仍将是农业的基础。发展和提高它是一项主要的任务，虽然光这样是不够的。奥新斯基同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整个发言都用在这个问题上，而完全不提我们所面临的全新任务，不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我说了，奥新斯基同志对这件事保持了沉默。奥新斯基同志今天声明说，他以前就支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和将来仍然支持。这很好。

奥新斯基：如果给我两个小时，我会把这件事说得更加详细。

斯大林：很好。可能又是批评没有白费。

第三个问题是衔接工业的问题。在这里，奥新斯基同志犯的还是原先的错误。他今天和以前一样，只认为纺织工业是衔接工业。

奥新斯基：只有纺织工业……不是这么回事。

斯大林：显然，您发言的时候连自己讲的话都没有听。

奥新斯基：请允许我现在就读速记记录。

斯大林：有人当场就喊了，而且丘巴尔在自己的发言里纠正了您，说是不只是纺织工业代表了衔接工业，还有冶金业以及整个重工业。如果奥新斯基同志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承认说，衔接不仅是在消费品上，而且也还有给农业的商品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分歧了。这很好。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谈国营农场问题。有一些意见，又是关于奥新斯基同志的一系列声明的。当然，说在美国没有大型粮食经济的样

板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图拉伊科夫的著名著作，他不久前去了美国，转述了自己的印象。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里描写了几个粮食类型的大型农业经济单位中的一个，这是一个还在生存并发展着的单位。可以就这方面的情况读上几段话。

“蒙大拿州的小麦农场属于肯博尔农业公司……”

奥新斯基：我说的就是这个。

斯大林：您是这么唾弃了这个公司，简直就没有剩下什么可以从这个公司拿来例子效仿的了。

“它的面积是 32000 俄亩。农场位于……（读）它的总收入是 50 万美元”。

这样的大型农场在美国的北部有，在南部也有。它们生存着，但是他们在那里生存得比较差：对于这样大型的粮食经营单位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良好的成分要比我们这里少。我的意见涉及的问题是，奥新斯基有些脱离开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大型经营单位来说，我们的环境，苏联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环境的差别。就拿这一点来说吧，那里有的是绝对的私有制，在那里，土地是应该买来的，而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土地是国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再说了，那里对土地是要上很高的税的，而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大型经营单位提供优惠，当然是优惠的地租，总的来说，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因素，通过它们可以揭示出苏维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别来，这种差别不是不利于，而是有利于大型粮食经营单位的。

现在来总的说一说国营农场。我不是仅仅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而且首先是从加强结合的角度，从在农村里为加强结合建立经济支撑点的角度看待它们的。同志们没有从这方面看待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权从这个方面说上几句。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通知说，

它同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签订了今年耕种土地的合同，可以得到2亿-2.5亿普特粮食。资料说，我们的国营农场，老的和新的，在今年可以提供不少于2亿普特粮食。

安采洛维奇：要多一些。

斯大林：安采洛维奇同志说，要多一些。而我用的是比较少的数字。这就是4000万普特的粮食了。这是非常好的储备。如果我们在去年的收购运动中能有这样的支撑基础或者这样的储备来等待时机，压价，保持价格和平息市场上的发热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必使用非常措施了。很可能是这样的。

柯秀尔：至少用不着再动用这些措施。

斯大林：我们的粮食经济的支撑点是和农业合作社有合同的各种类型的集体农庄，乃至机器联合组织；还有国营农场，包括老的和新的；然后是合作化的、用预约合同联系在一起的、和我们和合作社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农民，而在今年，你们要记住，我们是有4000万普特的合同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如果我们通过这三条渠道能够得到一些储备，可能不是很丰厚的储备，大体上有8000万到1亿的话，那我们也就不需要用任何非常措施去触动中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支撑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和千方百计地推动这些支撑点前进了。我们并不像昨天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在维护结合的事业中是那么无助的。听着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见鬼了，难道我们的处境就那么无助吗？难道我们在维护结合的问题上就那么束手无策吗？原来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种维护的储备手段了——让步。今天让步，明天让步，后天还是让步。照他的说法，这样可以加强我们。我非常怀疑，在农民施加了压力之后，在富农组织施加了压力之后，就不断地对他们让步，就不断地对中农让步，以便他们能大大加强苏维埃政权，——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

有人喊：正确。

斯大林：不，我们所具有的储备办法，不仅是为保持结合而做出的让步，而且还有组织起经济的支撑点，那就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合作社，还有就是在农村建立起能够提供政治支撑的政治储备。什么是政治的支撑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两句。如果除了让步的储备外，我们在农村不加上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各种签订预定合同形式的合作制这样的、不断发展的储备的话，如果是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了像是在贫农中间开展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牢固的支撑）这样储备的话，如果在农村没有这些牢固的支撑点的话，——我们的处境就的确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就只有退让了，但是这些退让是不可能无止境的。难道我们能在所有方面都退让吗？今天退，明天再退，后天还要退，而如果要求我们开放不要有国家的调节性影响的自由市场，如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要知道有人已经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如果是要求我们取消关税壁垒、对外贸易的垄断和为商品的最低价格开辟道路（而这样的价格顷刻之间就会扭断我们工业的脖子的），那我们是让步还是不让步呢？而如果是所有人都要求这一点，如果是已经没有指望了，苏维埃政权是不是就完全无望了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不仅是像集体农庄这样的支撑点——我们要发展它们，不仅是以国营农场的形式发展它们——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发展它们，不仅是用农业合作制预约合同的办法——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它们扩展开来，而且我们还有对中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支撑点——这就是加强在贫农中间的工作。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除了我们这里说到的那些修改之外，完全有必要在关于收购的决议里再加上一条展开的修正，说到关于在贫农中间的工作。

喊声：正确！

彼得罗夫斯基：只是这样做需要钱。

斯大林：对，关于钱我现在就要说到。你们自己瞧瞧，2月、3月

——收购搞得热火朝天，收来的粮食有一部分给了贫农。贫农转向了我们。这是大家都认的，大家都这样说。贫农是支柱——农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农的表现又怎样呢？是反对富农的，不赞成富农。5月和6月，收购降下来了，我们没有了储备，没有什么可以给贫农了。他们是不是需要很多才能拖到新的收成下来呢，在6月、7月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给最需要的贫农很多呢？最多是1000万、1200万、1500万[卢布]。而如果像托姆斯基说的，提高40%的话，1500万又算得了什么呢……

托姆斯基：我没有建议，我说的是“大体上”。

斯大林：如果大体上提高40%，这就是大约3亿-2.8亿了。从哪里能拿到它们呢？你们计算一下：要么我们是用一切办法建立贮备基金，用一切力量为贫农得到大约1200万粮食，为的是在新的收获年份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点东西给他们补充一下，要知道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要求的，贫农想要的是比较便宜地得到粮食，——这就需要我们花费3000万左右，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给出这些来——3000万卢布，——那我们就得每年给中农1.4亿。事情就会变成这样了。

同志们，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说的是，我们的事情不是像一些同志的发言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糟糕。我们有储备来保持和中农的联盟，但是这些储备不仅仅就是退让，它们还在于要全面展开农村中的经济秩序的支撑点，要有储备和保持物价水平，要等待。它们在于要建立起政治秩序的支撑点，为的是加强在贫农中的工作，从而迫使中农向我们这边摇摆。中农是一个摇摆的阶级。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像此前那样，凭着一时的印象进行，而是天天都是在系统地进行的话，那么，贫农就将会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牢固支柱。而且工作不仅应该是宣传鼓动——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应该表现在物质方面。请你们相信，中农将会倒向我们这一边，而富农的日子将会不好过的。中农是听信力量的。谁要是胆小怕事，他就不可能把中农拉到自己这

边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营农场，不光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它们能够建立起支撑点来，依靠着这些支撑点，我们就能够让中农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的情况下保持结合。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中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是怎样把这种打击挡回去的呢？是通过加强贫农的工作，通过贫农向中农群众进行劝说，说是这样是不行的，这是富农的诡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的工作体系中的这种劝说的成分几乎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被排除掉了。在这方面，过错可能在于各种非常状态吧？同志们，应该把贫农工作中的这种说服的成分再拿起来，要知道，有的时候中农会说：你们的调节见鬼去吧，把自由的市场打开吧。中农一直都是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动摇的。你们开放自由的市场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1.5卢布，我们就该是给出1.6卢布，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2个卢布，你就该给出2.1卢布，就像是人们实践工作中所说的那样——该啐口唾沫把这个投机商淹死。如果是这样下去，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办事的话，如果在这里拱手托出的话——这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去，因为那样就得把工资提高两倍；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工业商品的价格，把一切都来个底朝天。我们怎样把这一切挡回去呢？要通过加强对贫农的工作，用这样的办法把中农拉到我们这边来。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我们才能说服他们。应该让他们能够有所准备，让他们知道，采取这样的措施——取消国家机关的所有调节职能，建立自由的市场，将会导致加强富农的力量，这可能会使得期限更加延长。富农可能会去拉中农，但是能够教训中农，鼓动他们去让人家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的人，在我们俄罗斯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要确认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联盟的分裂已经来临，我们就要撒手不管了呢？不是的，我们要斗下去。要通过贫农去说服

中农，说明这样做是会导致我们的国家丧命的。我们不仅是在让步上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在发展我国经济的领域里建立起我们的支撑点上，我们也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结合将是牢固的。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033号案卷，第59—72张。原件。

计划工作

关于建设新工厂的计划的计划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12日)

7月12日于罗斯托夫

莫洛托夫同志：

此信阅后望转七人小组。

(1) 我有一些罗斯托夫朋友。据了解，今年的收成总量将近5亿普特，也就是说接近1914年的历史最高数字（我说的是东南部）。大约富余2.7-3亿普特。罗斯托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的出口部门（东南部的）能够完成1.5-1.7亿普特。这样一来，就可以有1.5-1.7亿普特的粮食从东南部地区运到国外去。挺不错。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

(2) 从报上看到，全苏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拟定出建设新工厂的计划。我担心，他们会不考虑在边境地区搞建设的诸多不利因素就干起来，而且一旦错过时机将无法纠正所犯的错误的。例如，他们想在彼得堡、罗斯托夫建新工厂，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在制定建设计划时，除了要考虑工厂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这一原则外，还应注意两点：同农村的结合和新工厂所在地区的战略地理位置。我们的大后方是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南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廖尔，等等）。现在缺乏工业的正是这些地区（如果不算乌拉尔的话）。而在战局恶化的情况下对我们最有利的后方也正是这些地区。所以，恰恰应当在这些地区发展工业建设。就这方面来看，彼得堡是绝对不合适的。当然，地方上会产生压力，但应当克服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甚至应当把它提交中央全会（如果为了克服地方

压力而需要这样做的话)。很想知道七人小组对此有何看法。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我今天动身去索契。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①

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纳入正轨

——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5年7月25日)

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从莫洛托夫那里得知您已申请辞职。恳请您别这样做。您没有理由这样做：（1）您那里的工作开展得不错；（2）有中央的支持；（3）我们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使个别人民委员部无法结伙来损害国家利益；（4）我们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工作纳入正轨。请再忍耐两个月吧，我们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真的。

紧紧握手！

您的 斯大林

附言：身体怎样？

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惰性极为有害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8日)

1925年7月28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同志：

应当考虑一下组织分配部的问题。格伊^①大概不适合这项工作。他年轻，没有什么名气，资历也浅，不会有威信的。不论问到谁，都这样说。克里尼茨基也不合适，或者更确切说，还不如格伊合适（理由是同样的）。是否该任用柯秀尔而把格伊派往西伯利亚呢？也许，还可以任用什维尔尼克或者扬松？鲍曼怎么样？他不会太嫩吧？好像他也嫩。总之，组织分配部是件棘手的事，要在代表大会之前解决好。

近日我看到报纸说，纺织辛迪加已作出决定，说是由于缺乏原料——主要是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供应不足——明年的生产不会扩大得太大。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原因确实在于原料，那么在我看来，辛迪加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对我们来说，在美国多买些原料（顺便提一下，美国的棉花现在便宜），然后在我们这里加工要比在国外购买纺织品合算得多。从各方面来看都更合算，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辛迪加的惰性不难理解：它不愿扩大生产，是因为扩大生产会带来一些麻烦，既然辛迪加已经如此兴旺发达，何必自找麻烦。这种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惰性极为有害，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克服。请你同捷尔任斯基谈谈这个问题，给他看看我的信，让他促一促辛迪加。我再说一遍，

① 格伊，1924年任彼尔姆边疆区区委书记，1925-1926年任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24-1934年为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要么是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国家、对工人、对那些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得到安置的失业者都有利；要么是我们解决不好，到那时别的不说，光是我们在这方面让外国布匹商赚去的钱就得几千万。

紧紧握手！

约·斯大林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必须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

莫洛托夫同志：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事的确不妙。捷尔任斯基干着急，他太累了，不过无火毕竟不会生烟。就连政治局现在也很为难，因为它脱离经济事务。仔细看看《经济生活报》，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各项基金是由斯米尔加、斯特鲁米林再加上格罗曼来分配的，而政治局……政治局正从一个领导机构变为一个受理上诉的机构，一个类似“元老院”的机构。有时甚至更糟——管事的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各专家“组”。可见，捷尔任斯基真该不满意。而工作当然也因此必不可免地受到损害。除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有政治局委员参加该委员会外，我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敬礼！

你的 斯大林

对李可夫 1928-1929 年度 控制数字提纲的意见

(1928 年 11 月 7 日)

阿列克谢：

我把对提纲的意见寄去。

1. 我认为，应把提纲分为几章，再写一个类似于提纲引言的东西，主题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改造时期的任务作一个简单概括（其中包括关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问题）。

2. 应当指出，我们不仅保持了现有的工业发展速度，而且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基建投资计划比 1927-1928 年度多 3 亿卢布。

3. 在谈工业问题时要有一段专门论述关于改造时期发展技术、合理化和降低成本的意义的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新老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作用、爱护忠于我们建设事业的党外专家、与这方面的过火行为作斗争等附带问题。

4. 还应有一段专门谈谈旷工、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会议问题以及工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问题。

5. 不妨专门谈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发展那些为农业生产的生产性需要服务的工业部门的任务。

6. 一定要有一段专门谈谈七小时工作制及其进步意义的问题。

7. 一定要谈谈电气化问题，而运输业问题（包括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要谈得比提纲中略多一些。

8. 应说明尽管我们的工业品逐年增长，但在我国经济中还存商品奇缺的现象，以及必须采取哪些措施缓解商品奇缺的问题。

9. 在谈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分）发展速度滞后的问题时应指出，1927-1928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使农业发展速度有重大提高的最重要手段是在广泛开展合作化、引进新技术和肥料、发展和改善集体农庄、发展新老国营农场的基础上改造农业和提高个体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

10. 应当提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提到必须巩固这一结合并（顺便）提到必须改正分摊和征收农业税上的错误和过火行为。

11. 应谈谈关于债券（工业化债券等）、债券发行和必须在农村中推广的问题。

12. 不妨谈谈区划问题，指出它是完全正确的，等等。

13. 还应提到劳动人民的文化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措施问题。

14. 必须在提纲中谈到我们的敌对阶级、阶级斗争、我们的困难，这些困难的性质（成长中的困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党内的动摇，谈到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公开机会主义倾向（右倾），也反对偏离列宁路线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在当前必须特别强调与右倾的斗争，同时丝毫不能削弱与“左倾”的斗争，指出绝不允许对这两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等。

15. 应有一条专门谈谈计划、我们计划中的不足和错误以及改善计划工作等问题。

16. 应更尖锐地提出储备问题，指出必须执行党关于储备问题的决定。

其余一些零散意见我们周六或周日再谈。

约·斯大林

1928年11月7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798号案卷，第5-6张。手稿。

对 1928-1929 年度 控制数字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

(1928 年 11 月 13 日)

致李可夫、布哈林、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同志

我同意古比雪夫同志（关于工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关于农业）、米高扬同志（关于商业）在各自的发言中谈到和答应提出的修改意见。既然他们将提出这些修改意见，那么我在这封便函中只谈谈自己的补充修改意见。

1. 在谈农业问题时应强调如下思想，即“农业仍处于极低的水平，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参看中央七月全会决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农业的谷物部门。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后退或停滞，而是农业、包括它的谷物部分在内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顺便参看中央告莫斯科党组织成员的十月宣言）。与之相应，要对提纲的第 4 条进行改动，指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小麦和黑麦总产量减少（播种面积也相应“减少”）是由于气候条件（春寒、夏旱），而如果不是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现在的播种面积就会比去年增加（而不是减少），1928-1929 年度谷物作物的总产量就会增加不止 0.72 亿普特，而是至少 3 亿普特。

2. 在指出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的原因时，必须根据中央七月全会决议指出，哪些是根本原因（在农业分败和落后条件下对其进行新技术改造的困难）和哪些是市场原因（市场关系等）。同时应指出，根本提高农业发展速度的最可靠手段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广泛开展

个体农户的合作化，逐步把分散的农户联合成建立在最高技术基础上的大型联合经济，加强老国营农场并发展新国营农场，还应指出能够立即见效的市场方法和手段（提高粮食价格，取消非常措施，加强农村商品供应，帮助农民播种，改正农业税实行上的缺点等）。

3. 在谈商品奇缺、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必须指出以下因素：

（a）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工业产品每年都有显著增长，但仍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b）改造时期工业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把力量集中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来（重工业），而且投资周期长，这必然导致对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快于这类产品的生产增长。根据这一点应对第10页上关于“克服商品奇缺”的表述进行修改，把“而后”一词改为“最终”或“将来”。

4. 删去“刺激广大农民群众的经营兴趣是我们目前的一项基本任务”一句（第9页），以及“发挥对贫农和中农农户的经营刺激因素”一句（第8页），理由是，第一，此类表述会被理解成弗鲁姆金同志关于农民经济“没有前途”的著名思想的另一形式，第二，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提高自身经济，并且贫农和中农经济确有提高，谈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富农农户提出一定保留条件，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其剥削趋势的政策。

5. 删去关于取消个别税的一条，代之以必须严格执行关于只对富农中最富的一部分人（不超过3%）征收个别税的法律这样一条。

6. 单设条谈苏联的文化建设（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等）和国家增加这方面的开支问题。

7. 指出我们的困难是成长中的困难。

8. 在第19页上“资本主义成分的反抗”一语后加上“和阶级斗争在城市和农村的尖锐化”。

9. 在同一页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一语后加上“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一些党组织的压力”。

10. 在同一页上“超工业化倾向”一语后加上带括号的“托洛茨基主义”。

11. 在同一页上“右倾暴露出来”一句“右倾”之后加上带括号的“公开的机会主义”。

12. 在同一页上“半孟什维克的右倾实质”一语后加上“实际导致右倾在我们党内取胜后必然导致的致命后果”。

13. 在第20页上另起一段：“由此提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任务——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偏离列宁路线的‘左倾’。”

14. 在同一页上将“杜绝乱扣倾向帽子的做法”等改成“杜绝将自由想法和各种批评意见当做‘倾向’、‘捣乱’（引自中央六月宣言）事先予以摒弃的做法，但这绝不意味着认可偏离列宁路线的倾向”。

15. 在同一页上将“与这两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强调必须与一切形式的右倾危险作斗争”一句改为“中央全会与这两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强调当前必须展开与右倾危险的斗争，但这不应丝毫削弱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同时把注意力”，等等。

约·斯大林

1928年11月13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798号案卷，第35-38张。复印件。

关于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0 年 8 月 6 日）

维亚切斯拉夫：

8 月 6 日的来信收到了。

一、我反对派米尔佐扬去红色工会国际，因为我一贯反对，并仍旧反对从各州，特别是像乌拉尔这样的州里抽调人，因为这个州发展迅速，正是用人之际，

二、同硬币匮乏的斗争结果几乎没有什么意义。28 万卢布，简直不值一提。看来，揪出几个出纳员就心安理得了。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出纳员。问题在于皮达可夫、布留哈诺夫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赞成进口白银。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曾大肆鼓吹进口白银的必要性，并在副手（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我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否决了该项决议，骂他们是财政破坏分子的“尾巴”。现在就连瞎子都请楚，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措施是由尤罗夫斯基（而不是布留哈诺夫）主持制定的，而国家银行的“政策”则是由那些被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政府”策动的国家银行机构中的破坏分子（而不是皮达可夫）主持制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1）要彻底清洗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管那些行为可疑的布留哈诺夫-皮达可夫类型的共产党员怎样哀号；（2）一定要把这些机构中的破坏分子枪毙掉 20-30 个，包括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出纳员；（3）要继续在苏联全境进行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回笼硬币（银币）的战役。

三、我认为对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萨德林一案应当十分认真地侦查，不要着急。该案非常重要。该案的全部文件应当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我相信，**这些先生与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索柯里尼科夫和泰奥多罗维奇）定会暴露出来。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和另外两三个坏蛋一定要枪毙。

四、一定要把破坏肉食品供应的整个破坏分子集团都枪毙掉，并将此消息在报上公布。

五、你们真的决定**现在就**发行镍辅币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此事需缓一缓再说^①。

六、真的从英国进口了很多皮鞋（花掉几百万卢布）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

七、美利坚合众国允许进口我们的木材，这很好。我们的坚定立场取得了成果。对波格丹诺夫的处理暂时等等再说。

八、同意大利的条约——大有好处。德国也会步其后尘的，顺便问一下，德国贷款一事怎么样了？

九、请竭尽全力加紧粮食出口。这是当前的关键。如果我们把粮食运出去，贷款也就有了。

十、**请注意斯大林格勒和彼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事态**。那里的情况不妙。

就写到这儿，握手！

斯大林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11期

① 1930年8月20日，政治局否决了鲁祖塔克委员会提出的铸造镍币的提案。

工业 10 个月总计增长结果不妙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0 年 8 月 23 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国家工业 10 个月总计增长 26%（不是 32%）。这个结果不妙。你谈了相应的工业财务计划和中央的号召。我认为，只要能达到 30-32% 的增长率，什么都可以干。我担心现在说这些已为时过晚，——反正 10 月份（年底）以前是不会作大的修改了。或许可以试试看？也好，试试吧。看来，应该试一试。**

二、我们还剩下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出口粮食：从 10 月底起（或许早一些）美国粮食将开始大量上市，我们很难竞争过美国。如果我们在这一半月内不能出口 1.3-1.5 亿普特粮食的话，那我们的外汇情况将会非常不妙。再说一遍：**必须全力以赴加紧粮食出口。**

三、一定要把苏汉诺夫、巴扎罗夫和拉姆津抓起来，应该试探一下苏汉诺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因为她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家里发生的丑事。应该无一例外地将**全部**供词（不管是主要供词还是补充供词）分发给中央委员，加里宁是有罪的——对此不可能有怀疑。供词中有关加里宁的一切情况全都属实。所有这一切必须通报中央，使加里宁今后不敢再和那些奸徒来往。

四、我收到了奥新斯基关于汽车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所的信。奥新斯基不对。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理由将由克利门特^①转告你。奥新斯基真是无耻之徒。

五、附上关于马里乌波尔冶金工厂的剪报。算下来这已是可恶的

① 即伏罗希洛夫。

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第四次的挑拨行为了。可不可以好好地惩罚一下罪犯呢？

（载于 1930 年 8 月 23 日《真理报》）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 年第 11 期

关于经济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4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你将国家银行及其“领导人”置于专门的监督之下，这太好了。我们早就应当做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了。显然，卡克滕和卡尔克林没有给国家银行的工作带来任何新气象。至于皮达可夫，从各方面来看他依然故我，仍是一个管着糟糕的专家（或专家们）的同样糟糕的人民委员。他成了他那个机关的俘虏。需要通过实践，通过日常工作，通过“小”事来认识一个人。瞧，皮达可夫以他在货币（和信贷！）管理的实际工作让大家完全认识了他，认识了他这个管着糟糕的专家们的糟糕的人民委员。应当跟你说一下，像这一类型的从事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现在对我们危害最大。

结论。应当撤掉他。应当派其他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代替他。10月份我们再议。

二、米高扬告诉我，说收购工作在加快，每天出口100万-150万普特粮食。我认为**这还不够**。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等）就有落空的危险。有些自作聪明的人主张**等一等**，等国际市场上的粮价达到“最高点”时再出口。商业人民委员部中有不少这样自作聪明的人。应当把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赶走，因为他们在把我们引入陷阱。如果要等，就必须有外汇储备。可我们没有。如果要等，就必须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占有**可靠**的一席之

地。可我们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已经好久没有任何位置了，——我们现在只能利用当前出现的对我们特别有利的条件去争取一席之地。

总之，必须大大加快粮食出口。

三、米高扬提请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负责人。洛莫夫不同意，因为他已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俄石油辛迪加生产局负责人。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洛莫夫考虑得更多的是辛迪加（石油联合企业）内部如何舒适的问题，而不是加快出口的问题。最好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的负责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出了毛病，应当进行整治，该公司现领导人不称职。

四、还是应当撤换腐败透顶的图曼诺夫^①。难道中央会指望他在法国的环境中能改造过来吗？

五、跟中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

六、“连纳-戈尔菲茨”^②情况如何？

我有些不舒服（咽喉炎！），但很快会好的。握手！

斯大林

还有，我差点儿给忘了。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一件“小事”，即商业人民委员部目前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委员部之一（如果不是最复杂的人民委员部也是最复杂的人民委员部之一）。可情况怎样呢？领导该人民委员部的人不胜任工作，而且一个人要胜任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

① 1930年11月25日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解除图曼诺夫的驻法商务代办一职。

② 连纳-戈尔菲茨是一家英国股份公司，1925年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阿尔泰等地开采黄金、铜、铁等金属矿的租让合同。1930年初，连纳-戈尔菲茨在仲裁法院向苏联政府提出诉讼。

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应当撤换米高扬，而这尚未得到完全证实；或者应当给他配几名得力的副手，这大概是不会引起异议的。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令人不解，为什么我们不能马上说了就做？为什么？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把罗森霍尔茨（除了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能从哪里找到得力的人呢？）给米高扬，以取代欣丘克这个领导对外贸易工作极不称职的人呢？还需要提出哪些证据来证实欣丘克不称职呢？是为欣丘克感到惋惜吗？而事业才是更值得惋惜的。是不愿意得罪谢尔戈吗？那事业，重要而庄严的事业就可以得罪吗？

我提议（正式地）：

1) 任命罗森霍尔茨同志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主管对外贸易），并解除他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①

2) 解除欣丘克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其为莫斯科苏维埃乌汉诺夫的副手或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主席。

如果谢尔戈叫起来，我们就把西伯利亚的克利缅科给他。罗森霍尔茨则无论如何也要调到商业人民委员部去工作，应当整治好商业人民委员部。继续等待就是犯罪。

约·斯大林

1930年8月24日

^① 1930年9月10日，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1月15日政治局又决定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分成两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供应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被任命为供应人民委员。

加强计划机关的草案很好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10日)

维亚切斯拉夫：

你10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一、顿巴斯的事情你处理得好。对执行情况作了一次列宁式检查的小小尝试。如有必要，我将祝贺胜利。

二、加强计划机关的草案很好。我作了几处修改，现退回。有一点必须要做到，即给计划机关“供应”的大学生不能照单全收，不能不挑不选，而要逐个精心挑选，杜绝仓促行事的现象。

三、将甘申的信及一些材料一并寄上。如果政治局追究甘申法律责任的说法属实，那么我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要免去他所担任的经济领导工作并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他。能否把政治局的决定改得缓和一些，取消关于“追究”甘申的“法律责任”这一条呢？我个人赞成这样做。最好是撤消洛莫夫在“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坳”的职务（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弄懂石油业务），任命甘申接替他。这样做要好得多，这件事等我回到莫斯科后再详谈。

再见……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10月10日

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棉花缴纳计划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建议

（1934年6月29日）

塔什干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指示

由于春季寒冷和多雨，棉花生长迟滞，因此需要抓紧时间提早进行培土和灌水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不得延迟第一次灌水的时期，现在只有 15.5% 的棉田进行了第一次灌水。中央委员会建议：

1. 通过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和政治部主任，并吸收产量委员会参加，对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用水计划组织周密的群众性的检查，并把计划切实执行。

2. 做到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培土和灌水工作，并全部消灭田间的杂草；进行上述工作的方法是在工作队中组织工作小组，各小组在棉田整个耕种和灌水期间固定负责一定地段，由工作队长每天登记小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并及时结算劳动日。

3. 由于棉田出现大量害虫，必须动员各地现存的药物和肥皂，以便迅速消灭受害棉田的害虫。

4. 中亚细亚报刊对培土和灌水工作的进程进行专门的监督，对于即使是稍许拖延农业技术所要求的耕种和灌水时期的现象以及工作质量低劣的现象展开严厉的批评。

中央委员会警告中亚细亚各党组织：只有在执行这些措施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才能消除棉花生长迟滞的现象，才能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棉花缴纳计划。

希电告你们所采取的措施。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1934年6月29日

载于1934年7月2日

《东方真理报》第150号

保障棉花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4年8月28日）

主要任务是：保障棉花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大约4000—5000万普特纯棉）的完成，为这一保障逐年做好准备，并立即行动起来。实现目标的途径：（1）年年提高产量（改进耕作、最大限度的施肥和灌溉等等）；（2）扩大种植面积（年年开垦新耕地）；（3）高产发奖金、扩大种植面积给优惠、优秀职工颁奖章；（4）监督决定的执行。

除了一般的指导性决定之外，必须为每一个共和国单独制订具体的计划和指导性决定。

……我觉得是取消中亚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俄文整理者注）的时候了，把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直接与莫斯科联系起来（只是把卡拉卡尔帕克作为自治共和国并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并入俄罗斯联邦）。如果中亚存在联邦，则另当别论。那样的话，中亚局或许可以得到发展。但是，既然那里没有联邦，中亚局就无法长期存在，它已经在失去（如果不是已经失去了的话）它存在的意义。

给哈萨克斯坦用于帮助力量薄弱的集体农庄和牧区的400万普特粮食当中，还有60万普特尚未动用。全部剩余粮食要从哈萨克斯坦收回。我想，或许可以给哈萨克斯坦人留下15万普特，其余的收回后交给苏联……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议了一下 1936 年的控制数字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 年 7 月 21 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今天议了一下 1936 年的控制数字。梅日劳克根据 190 亿的基建规模，提出了一个设想。重工业人民委员部——60 亿；交通人民委员部——30 亿多一点儿；农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数字减少；卫生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公用事业、地方工业等——数字也有减少，即使再精打细算也无济于事，特别是考虑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完全满足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需求。我提出的数字是 220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 65 亿-67 亿卢布（1935 年为 80 多亿）；给交通人民委员部增加 4 亿-5 亿；轻工业人民委员部 2 亿，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 4 亿-5 亿，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将近 3 亿，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地方工业、公用事业、邮电人民委员部等——剩下的部分。还在争的有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想要 90 亿），交通人民委员部（想要 45 亿），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及其余各委员部。委托梅日劳克和丘巴尔在 220 亿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设想）。我们再考虑考虑。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削减的：国防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修路和机车车辆的修理以及支付新车厢和机车的费用；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建设；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新装备（技术上的）；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造纸厂和纸浆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某些

十分急需的企业（煤炭、石油、平炉钢、机床、粘胶、电厂、化学）。这就使事情更为难办。看看再说。

过得怎么样？休息得好吗？

我身体很好，朋友们也一样。向热姆丘任娜同志问好！

约·斯大林

1935年7月21日

附言：控制数字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重新计算问题等到秋天再说。

关于 1936 年控制数字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5 年 7 月 28 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来信收到了。我们打算组建炮兵、空军和海军军官学校。

二、寄上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于编制 1936 年控制数字的指示。正如你所知道的，基建工程的规模确定为 270 亿卢布，而财政拨款为 250 亿卢布。如果基建工程的造价能下降——这是必须要执行的指示。那么国家拨款 250 亿卢布，基建工程将能达到 270 亿卢布。这使降低基建工程的造价和人们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220 亿是不够的，而且**也不可能够**，这是显而易见的。增加学校建设投资（增加 7.6 亿），增加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地方工业投资（总共增加 9 亿多卢布），增加国防投资（11 亿），增加卫生保健、莫斯科运河建设工程和其他项目的投资（4 亿多卢布），决定了 1936 年控制数字的特点和大小。

我不遗憾，因为必须年复一年地抓紧，以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就写到这儿，敬礼！

向热姆丘任娜同志问好！

约·斯大林

农业生产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101)



从马拉耙犁到拖拉机

丰收的喜悦



年份 项目	1913年	1920年	1925年
农业总产值(%)	100	67	112
种植业(%)	100	64	107
畜牧业(%)	100	72	121
粮食(万吨)	7 650	4 519	7 247
牛(万头)	6 060	5 250	6 210
猪(万头)	2 090	1 750	2 180
工业总产值(%)	102.5	14.10	77.39

一九二五年时的苏联农业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30年9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

五、我认为，大张旗鼓地公布乡镇协作社新章程并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是错误的。这样做让人觉得是在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来对抗“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这样做使人产生了从“拥护农庄！”的号召退到“拥护乡镇协作社”的号召的错觉。莫斯科是否打算这样做，——已经无所谓了，实际上让人觉得是要用非驴非马的和凭空虚构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乡镇协作社”来取代意义重大的和胜利在握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集体农庄”。而且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我认为这种想在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刻拉我们后退的企图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并削弱加入集体农庄的势头。我已经就这个问题给你发了一份电报，也许不应当发这份电报，但请你不要为此而骂我，因为我觉得，把我的意见越早告诉你越好。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但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可以立即开始给整个这场“乡镇协作社”闹剧逐渐刹车。我认为，应当，**第一**，给各州委和各区下一个**内部**指示，告诫不要迷恋于乡镇协作社，不要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偷换“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加入集体农庄运动上来^①；**第二**，用“加入集体农庄”口号的精神武装《真理报》和我们的所有报刊，责

成它们**每天和一贯地**至少拿出一版来刊登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报道，刊登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经济的**报道**，并且要把这些**报道、通讯、来信**等刊登在显要位置上，而不能用小号字刊登在犄角旮旯里。总之，要在报刊上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运动的运动，因为集体农庄运动如今已成为农业建设的一个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因素。

好了，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2日

① 1930年9月24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致各个边疆区委、州委和各个共和国的党中央有关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信的草案，在信中特别谈到：党中央警告在个别组织中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以农业合作社偷换了劳动组合组织。在一些农业集体化运动比较薄弱的地区恢复了农业合作社。必须展开顽强而坚定的工作，组织作为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运动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 公共利益结合起来^①

——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上的讲话（摘录）

（1935年2月）

如果你们想巩固劳动组合，如果你们想有一个包括千百万农户，而不是几户或几百户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如果你们想达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就应当除了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共同利益外，还一定要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

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公顷，这就是一点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奶牛不能给，另一些人认为母猪不能给，总之，你们想挤压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先进人物。我懂得你们是很关心集体农庄制度，很关心集体农庄经济的。但是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和你们一样吗？你们在集体农庄中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想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应不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应当考虑的。

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极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便不能承担

^① 本篇是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上的讲话的摘录。这次大会于1935年2月11-1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为此，大会于2月14日选出了有斯大林参加的一百六十七人的审查这个章程草案的委员会。斯大林在这个委员会上的讲话全文没有发表，这篇摘录是苏联《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的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引用的部分。

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同意：集体农庄中的农户应该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的。倒不如承认，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同时也要有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需要和个人口味，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你们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生活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人民出版社 1979年2辑

个体农庄不可能排挤集体农庄

(1939年5月28日)

1939年5月28日

马努伊尔斯基传达中央全会：

安德列耶夫的报告《关于保护集体农庄公有土地防止滥用的措施》（报告中提到许多个体农庄排挤集体农庄的事例）。许多发言的书记把形势说得很悲观。

斯大林也发了言。他指出，集体农庄制度是健康的。60%的庄员是诚实的、勤劳的，支持集体农庄。10%是懒汉和投机商。现在如果我们采取措施把这类分子开除出农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某些同志的危言耸听的发言有孟什维克的味道。这不是我们的看法。个体农庄不可能排挤集体农庄，何是如果一切任其自流，那么几年后要解决问题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现在解决则不需要那么高的花费。此外必须清楚地看到前景，不能允许放弃庄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棉花生产一定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33年3月21日)

致乌兹别克斯坦各区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和国营植棉农场场长

今年你们共和国的农民棉花生产计划，除了向机器拖拉机站缴纳768000吨实物以外，规定在播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一定把单位面积产量较去年至少提高1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认为这个任务是最低的，是绝对可以完成的，为了充分保证本计划的完成，消除过去几年常发生的缺点，特要求你们：

第一、任何一个区和任何一个集体农庄都不允许重复过去常发生的报表中的播种面积和用仪器测定的实际播种面积不符的现象。必须铲除这种欺骗敷衍的行为，为此必须在4月1日以前结束棉田的分拨和丈量工作。

第二、对灌水和培土的期限规定特别的监督，因为去年的培土工作虽然进行了必要的次数，但由于延迟而在许多地方未能完全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三、对灌水期限规定特别的监督，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许多区的棉花生产收到了巨大损失；因此，必须检查灌水干部的培养工作和检查他们的成分。

第四、检查机器拖拉机站生产段上的工作人员的成分，因为这些事人员的挑选多半没有经过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监督，这些人员中混进了许多异己分子和不适用的分子；必须用最忠实、最可靠、最有学识

的人充任生产段上的工作人员（副站长、段农艺师、机械师），必须从区内现有的工作人员中挑选优秀的人员来担当这项工作。

第五、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提请你们注意在巩固国营农场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的工作。主要的国营植棉农场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它们在最近一年内已联合为国营农场托拉斯，并完全由你们监督。优秀国营农场的挑选和棉花播种计划的缩小，在提供给国营植棉农场的技术资源条件下，使国营植棉农场有可能显著地提高产量。规定给乌兹别克斯坦各国营植棉农场的产棉 34600 吨的计划必须无条件地完成，为此必须经常地监督国营植棉农场的工作并给以帮助，应检查干部的培养工作，特别是“气压式采棉机”干部的培养工作，以保证这些机器在今年能够充分利用。

希望你们所采取的措施报知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斯大林 莫洛托夫

载于 1933 年 3 月 21 日
《东方真理报》第 66 号

关于种植烟草致乌拉尔州委的电报

(1933年6月6日)

致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保密室

你们地区在栽种马哈烟上已经落后，看来它被当作了次要作物。人民委员会、党中央认为，完成马哈烟栽种计划是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所以责成你们采取措施，保证马哈烟栽种计划不折不扣的完成及其应有的加工，为此：第一，最迟至6月20日之前结束马哈烟的栽种；第二，检查为栽种马哈烟划出的地块，以保证栽种马哈烟的地都施过厩肥；第三，必须保证在7月之前除完三遍草和整个马哈烟地块上的打杈工作；第四，鉴于马哈烟苗通常会大量死亡的情况，要特别注意观察中耕和补苗，一定要对马哈烟苗进行分蔸间苗和疏苗，并同时对整个播种面积上的行距进行疏松；第五，在大田生产队内部广泛设置栽种和耕作马哈烟的专业小组；第六，及时准备好烘干用的板棚和烘干机；第七，在一切必要情况下，对栽种马哈烟的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进行帮助，特别是在翻地方面。请报告采取的措施。

莫洛托夫

斯大林

1933年6月6日

关于改进棉田培土和灌水工作的指示

(1933年7月18日)

塔什干

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

乌兹别克人民委员会

乌兹别克拖拉机总站

你们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5月27日关于耕种和收获棉花的决定。培土工作没有如期结束。棉田的灌水也进行得不好，只有半数棉田进行了灌水，这种情况造成了减产的危险。国营植棉农场在培土方面和灌水方面尤其落后。

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曾要求你们设法显著地改进培土工作的质量，并在8月1日前普遍结束第三次培土工作。在杂草丛生的地区（塔什干的许多地区、苏尔汉河的许多地区以及泽拉夫珊的部分地区），必须组织第四次培土，保证铲除全部杂草。在所有灌溉渠系上实行昼夜灌水制度，动员一切力量消除灌水的间歇现象。

要把塔什干各机关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城市的全部水利技术人员调到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中去领导灌水工作，直到根据棉田的地势和特点结束灌水工作时为止。希报知所采取的措施。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33年7月18日

载于1933年7月22日

《东方真理报》第168号

把灌水工作和夏季耕作正确地结合起来

——给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指示

(1935年5月31日)

塔什干

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

今春天气炎热干燥，用水情况显得紧张，因此要求你们根本改善棉田和苜蓿地的全部灌水事宜。但是，关于最合理地用水以获得棉花丰收的问题，尚未成为所有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农业机关以及广大集体农庄庄员群众的注意中心。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组织灌水工作，使它和棉花的夏季耕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将决定丰产斗争的胜利。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

(1) 加强对灌溉渠系的领导，保持渠系的正常状态并保证渠系不间断地进行工作，建立极严格的用水纪律，禁止各种特派员干预渠系的工作和破坏既定的用水计划。

(2) 保证最严格地节约用水，普遍实行昼夜灌水制度，显著地改进灌水技术，严厉惩办偷水喝浪费水的行为。

(3) 责成农业工作人员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田地的灌水工作，并对灌水的时间和质量负责。

(4) 保证从优秀的有经验的集体农庄庄员中挑选灌水员，规定灌水员完成一天的工作定额按两个劳动日计算，同时对灌水质量好和节约用水的灌水员在所完成的灌水工作劳动日上增加 20% 以下的附加额作为奖励。

(5) 为提高灌水工作的效率，必须把灌水工作和棉田的下一步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不要让土壤干涸和杂草生长。

本电报应传达到各区、各机器拖拉机站、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希将采取的措施报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35年5月31日

载于1935年6月8日

《东方真理报》第130号

关于发展植棉业和留种苜蓿生产的措施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1935年9月15日）

为了鼓励花刺子模沃地迅速发展植棉业和留种苜蓿的生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给予花刺子模沃地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以下列优待：

（甲）取消他们在农业税、捐献、文化捐和国家保险等方面的尾欠：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花刺子模州 585900 卢布。

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沙乌兹州 548300 卢布。

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203300 卢布。

（乙）取消他们在 1935 年以前在肉类供售、粮食供售和稻米供售方面的债务。

（丙）解除他们向国家缴售谷物和稻米的义务，取消 1935 年和 1936 年向国家缴售肉类的定额降低 50%；

（丁）下列款项分三年偿付：

（1）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花刺子模州：

农业银行贷款——280700 卢布。

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欠款——574400 卢布。

棉花收购委员会所发给的预付金——149800 卢布。

（2）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沙乌兹州：

农业银行贷款——920000 卢布。

（3）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农业银行贷款——941000 卢布。

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欠款——626000 卢布。

棉花收购委员会所发给的预付金——308500 卢布。

2. 规定花刺子模沃地在 1936 年将水车灌溉改为机器灌溉的面积为 22500 公顷，其中：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花刺子模州——11200 公顷。

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沙乌兹州——7500 公顷。

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800 公顷。

拨出十八匹马力的石油发动机 300 台（由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存货中拨出 200 台，由消费品的存货中拨出 100 台）来组织机器灌溉，其中拨给：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花刺子模州——150 台。

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沙乌兹州——100 台。

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50 台。

建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水利人民委员部保证在 1935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内向花刺子模沃地运送 1000 吨石油，以便保证新的机器设备从 1936 年春季起开始工作。

3. 建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靠扩大 1935 年生产计划拨出下列离心式单轮泵（有皮带传动装置的带皮带轮）给苏联农民人民委员部以花刺子模沃地使用：

200 公厘的离心式单轮泵——50 台。

250 公厘的离心式单轮泵——25 台。

这批水泵（整套带活门和网罩）的发货日期至迟不得超过 1935 年 9 月，其他产品的发货日期可延至 1935 年第四季度。

4. 建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用事业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公用事业器材供应局）由库存中（在美里托坡里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巴林茨基工厂的仓库中）拨出 200 公厘的离心式单轮泵 150 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应对这些水泵进行检查并装上活门和网罩，在 1935 年 9 月发货。

5. 责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于 1935 年 9 月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储

备物资中拨给花刺子模沃地直径 200 和 250 公厘的提炼石油用的铁管 150 吨。

6. 除了农业人民委员部总拨给的以外，责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 1935 年 9 月内再拨给花刺子模沃地橡皮带和棉布 2500 公尺。

7. 拨出 1600000 卢布作为在花刺子模沃地新建 225 个机器抽水站之用。

8. 为了保证南花刺子模在 1936 年度灌溉渠系清淤和修筑堤防工程机械化（其工程量不下于 5000000 立方公尺），特责成：

（甲）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 1935 年为南花刺子模建造 24 条吸泥船，为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建造 7 条吸泥船，并供应必要的运输工具、守卫船和储油船；在 1935 年第三季度内运去 33 架电动铲土机；

（乙）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保证在本年第四季度（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经费）拨给南花刺子模和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具有全部钢缆和戽斗设备的挖土机（索式挖土机）19 架，并把燃烧室改装成燃烧石油。

9. 南花刺子模（卡拉——卡尔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花刺子模州、塔沙乌兹州和基普察克区）各灌溉渠系的一切管理工作集中在阿姆河三角洲灌溉渠系管理局，该管理局通过其在各州的分局领导下级灌溉机构。阿姆河三角洲灌溉渠系管理局直接受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棉业总局领导。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维·莫洛托夫

1935 年 9 月 15 日

载于 1935 年 9 月 18 日

《东方真理报》第 216 号

工业生产

不要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0日)

1925年7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经济生活报》^①第159号（7月15日）上读到一篇题为《对第聂伯工程方案的检查》的短评，从该短评中看得出，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党（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耗资2亿卢布的第聂伯工程之中。原来捷尔任斯基同志已经下了“命令”，责成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中旬之前”提交一份工程的经济技术及财务计划，以便“也能将准备工作所必需的贷款纳入1925-1926年预算”。已拨给托洛茨基同志3万卢布用于草拟计划。短评还提出要谨慎行事，等等。但是，既然拨了3万卢布并规定了提交计划的期限，这件事就算是干起来了，因而具有严重性质。

我认为，就我们的财政状况来看，无论今年还是明年我们都不能去搞第聂伯工程。昨天，外高加索的输油管道计划也被否决了，尽管它在当前看来更加现实而且费用低四分之三。试问，我们凭什么非要采纳并不太切合今天的实际而且费用高出三倍的第聂伯工程计划呢？难道我们有那么多钱吗？难道顿巴斯（第聂伯工程所在地区）的燃料现在不是充足而是紧缺吗？干吗这样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

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为我们的那些破旧的工厂提供新的设备。难道这一需求已得到满足了吗？

① 《经济生活报》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

其次，我们需要扩建一批农业机械制造厂，因为我们现在仍需在外国购买价值几千万卢布的最普通的农机具。

再次，我们需要至少建造一个拖拉机制造厂，一个新型的大工厂，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批工厂，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炼铜业，发展铅的生产，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业，因为没有这些别人赤手空拳也会打败我们。

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已得到满足了吗？

我们怎么能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忘掉这一切呢？

我认为，除了种种危险之外，我们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把那些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钱拿来乱花，轻率地将它们白白浪费掉，从而给我们的建设工作造成困难。一个月以前捷尔任斯基同志还明白这一切，可现在他显然已热衷于……

莫洛托夫同志，务请给捷尔任斯基同志读一下这封信。鉴于问题很重要，请在七人小组中读一下并将他们的意见简告我。

握手！

约·斯大林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催问第聂伯工程一事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7月2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个星期前我给你本人发了一封信，对第聂伯河石滩电气化工程立刻上马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没有收到回信。莫非信在路上丢失了，你收到了吗？不管这封信是否丢失，如果手不懒的话就请写上三言两语。

握手！

约·斯大林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认真关注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情况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

7. 请你**认真**关注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情况。现已查明，每年提供的钻井设备只有10部。而且钻井工具大部分都是冲击式，而不是旋转式，也就是说掘进速度极其缓慢。这表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乌拉尔油田管理局的“支援单位”——阿塞拜疆中央石油管理局和格罗兹尼油田管理局对在乌拉尔开采石油的态度与诺贝尔对乌赫塔的态度相似。这简直是胡闹，是在犯罪。我认为，应当（1）立即建立专门的托拉斯乌拉尔油田管理局——以使乌拉尔摆脱打算压制乌拉尔采油产量的“支援单位”的控制；（2）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石油工作者主持“乌拉尔油田管理局”的工作，把由“支援单位”——格罗兹尼油田管理局派来的**破坏分子多布伦斯基**（好像姓多布伦斯基）赶出乌拉尔（把我们没有用的东西给你们吧）；（3）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今年提供40—80部旋转式钻井设备。如果我们不采取类似的措施，开采工作就将受阻（甚至会被扼杀），而我们在乌拉尔也将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勘探。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21日

请特别重视建立新的黑色冶金厂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请**特别重视建立新的**（黑色）冶金厂。我指的是在捷利别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等地。有材料表明，这一部门工作进展**不顺利**。领导黑色金属工业总管理局的是洛卡茨科夫（好像是）。但他只有乌拉尔的经验，即因循守旧的经验，因为乌拉尔冶金工业（黑色冶金工业，高炉生产等等）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他们或者不吸收美国和德国的专家们参与管理，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准许吸收极少数人参加。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复杂的工作最需要国外的技术援助。要让古比雪夫和洛卡茨科夫振作起来，并要求他们（开始时这样，以后视情况定）以**书面形式**报告有关这一部门的情况以及技术援助的性质和规模等。比如说，为什么当时不签订合同让“奥斯丁公司”或其他公司参与新厂的建设？如此等等。

.....

（5）能否任命克里尼茨基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事先将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的旧包袱清除干净），**同时又让奥拉赫拉什维利留任第一书记的职务呢**（没有他的帮助克里尼茨基将很难工作，因为克里尼茨基对当地的语言一种也不懂）？以后会清楚的。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李可夫什么时候到？

乌拉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6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现寄去我刚刚收到的米尔佐扬的来信。你知道，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不主张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实行“姑息”政策。但是应当说，将米尔佐扬置于死地并不符合党的利益。^①

似乎你在日前给我的来信中正是从这一角度谈论米尔佐扬一事的。要重视他的来信并满足他的请求。

我考虑不妨让米尔佐扬担任彼尔姆（乌拉尔）区委书记，并对其委以发展乌拉尔石油事业的重任。他熟悉石油业务，他和鲁勉采夫（我提议让鲁勉采夫担任乌拉尔石油管理局局长）合作一定能搞好乌拉尔的石油工作。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一点我们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却不愿搞清楚。

2. 在祖巴列夫的问题^②上我之所以赞成卡巴科夫和奥什温采夫的意见，出于两点考虑：（1）乌拉尔对苏联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那里却极缺乏负责工作人员，决不能“没完没了地抢劫乌拉尔”；（2）祖巴列夫是一位农业专家，但严格地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没有农业。

① 1929年9月30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米尔佐扬被派往乌拉尔担任党的负责工作。

② 祖巴列夫原先被任命为乌拉尔北边区组织委员会主席，1929年9月12日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政治局决定把他留下。

再见！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6日

需要尽可能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日）

维亚切斯拉夫：

请注意（目前）以下两个问题：

一、波兰人无疑会组织（如果尚未组织的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联盟，目的在于向苏联开战。我认为，它们在还没有组成这个联盟之前，是不会向苏联开战的，——因此，**这个联盟一旦组成**，——它们就会开战（借口总是能找到的）。为了保证我们能击退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波罗的海人，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能扩编（在战争爆发时）不少于150-160个步兵师，也就是说比**我们现在的设想多**（至少）40-50个师。这就是说，要把目前和平时期我国军队64万人的编制扩大为70万人的编制。不进行这一“改革”就无法保证（在波兰人与波罗的海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列宁格勒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防卫，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进行这一“改革”我们就一定能保证苏联的国防立于不败之地。但进行“改革”需要不小的一笔钱（更多数量的“枪炮”，更多数量的技术装备，增加指挥人员的数量，增加被服供应和粮食供应的支出）。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我认为，需要增加（**尽可能地**）伏特加酒的生产。应当去除不该有的愧疚感，并直接、公开地去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以便我国的国防得到真正和认真的保证。因此，应当**马上**考虑这件事，为生产伏特加酒储存相应数量的原料并将其正式列入**1930-1931年度国家预算**。请注意，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也需要一大笔钱，为此又得在伏特加酒上作文章。

二、我们需要大量的**筑路机械**，**面包厂设备**和**洗衣房设备**。生产这些东西——事情并不复杂，我们的工厂完全可以做到。但谁也不愿意干（认为是“小东西”），结果我们不得不动用外汇。乌汉诺夫想抓这件事，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让他干，该委员会占着茅厕不拉屎，自己什么都不干，也不让别人干。必须结束这种乱七八糟的状况。请你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并责成乌汉诺夫（莫斯科苏维埃）立即着手生产面包厂设备和洗衣房设备（以及筑路机械）。这势必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但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们想使事情有所进展的话。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刚刚收到中央关于工业财务计划的《号召书》和中央关于贯彻《号召书》的实际措施的《决定》。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好了。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① 1930年7月2日，政治局否决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提高伏特加酒价格的议案。9月15号，政治局做出决定：鉴于城市和农村伏特加酒的明显短缺，排长队购买伏特加酒的现象增多，投机活动猖獗，苏联人民委员会提议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责成李可夫亲自监督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们不能让北方没有石油

——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年8月19日)

据日丹诺夫报告，伏尔加河在通航期按计划本应该运送 750 万吨巴库石油，可目前，月运量不仅比计划低大约 20%，甚至比去年还低大约 15%。

落后的原因似乎是巴库没有石油。但这种解释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今年巴库的石油产量毕竟比去年多。

我担心，原定通过伏尔加河运输的相当大部分的石油正用油罐车运输。

运输委员会在干些什么？为什么不给伏尔加河石油？为什么伏尔加河的油船队非得停航？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

把日丹诺夫找来，查明情况，核实一下他的报告，结束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我们不能让北方没有石油。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 2000 年
12 月 1 日《独立报》

关于产品配套运动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一、老实说，我（以及伏罗希洛夫）不满意你一走就是一个半月，而不是像我们在制定**休假计划**时说定的那样去两个星期。要是我知道你想去一个半月的话，我就会提出**另外的休假计划**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是躲避谢尔戈吗？难道你不明白，不能把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长期**交给古比雪夫（他会**酗酒**）和卡冈诺维奇？不错，我对休长假曾同意过（在电报中），但是你清楚，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我认为谢尔戈对维辛斯基的行为是无赖行为。你怎么能对他让步呢？显然，谢尔戈是想用自己的抗议破坏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产品配套运动，这是怎么回事？是卡冈诺维奇骗了我们吗？看来是他骗了我们。还不止他一个人。

敬礼！

约·斯大林

9月1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1990年第11期

① 1933年7月末，地方上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拍了几封关于扎波罗热的“公社社员”工厂装运缺少系列重要配件的新康拜因的电报。根据这些信息，人民委员会7月28日以咨询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向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违法发送不成套康拜因”的决议。

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2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我同意，1934年度的基本建设项目拨款不应超过210亿卢布，而工业产品增长率不应超过15%。这样较妥。

二、我也同意，根据1932年度的粮食总产量计算，应该征收6.98亿公担粮食。不得少于此数。

三、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在“产品配套”一事上的行为只能说是反党行为，因为这一行为的客观目的是庇护党内反动分子反对联共（布）中央。的确如此，全国都在叫喊产品不配套；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即公开在报刊上进行讨伐；对那些肆无忌惮地恶毒破坏党和政府决定的党的敌人已经做出了判决，而应当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的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不是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攻击检察长！这是为什么？当然不是为了制止这些破坏党的决定的反动分子，而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向党的舆论证明他们是对的，并以此来诬蔑党正在开展的运动，也就是诬蔑中央的现行路线。

我给卡冈诺维奇写了一封信，说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件事上他竟然站在党内反动分子一边。

四、由于我的原因你要提前从休假地返回，这使我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显然就要把中央的工作长期交给卡冈诺维奇一个人去做（古比雪夫会酗酒），这很轻率，何况卡冈诺维奇还要同时抓地方和中央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将回到莫斯科，那时你可以再去

休假。

五、我依旧坚持你没必要去土耳其。让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去吧。^①

握手！

约·斯大林

1933年9月12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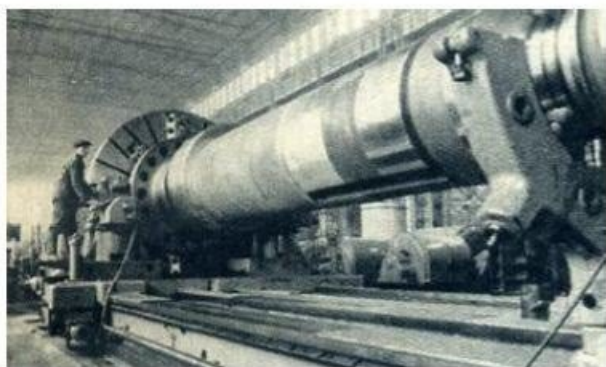
^① 1932年5月土耳其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访问了苏联。1933年9月20日政治局批准由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组成的代表团回访土耳其。



418. Кравченко П.
Нефтяники, больше нефти Родине! Выполним пятилетку в 4 года! 1948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130)



粮食收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就粮食收购工作给地方党组织的命令^①

（1928年1月6日）

虽然中央已经两次发布过关于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硬性命令，但是此项工作无任何改观。地方组织的工作速度之缓慢令人不能容忍，无所作为的现象仍在继续。下级机关还没有行动起来。合作社没有完成自己起码的征购任务。政权机关和党组织没有发挥杠杆作用，没有组织工业品去为粮食收购工作服务。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的积极分子都没有把自己的全部余粮拿来出售；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把商品粮全部交来；同时还发现，他们有时把粮食卖给私商。农民向国家还款的日期虽已临近，可是农业税、保险费、种子贷款和农业定期贷款都还没有收上来；这说明党的机构、苏维埃的机构和合作社的机构工作涣散，它们在农村的影响微弱。

鉴于这种严重失职的现象，中央委员会在12月14日和12月24日的命令中要求你们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的现状。从发布命令到现在，已经3个多星期过去了，局面未见任何改观。

这一切都说明，你们忘记了在这项工作中对党和无产阶级应负的基本革命责任，这种现象是绝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确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要求你们从接到本命令之日起，在一周时间里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现状，同时对以节日或其他原因为借口而不积极行动者，中央将按粗暴破坏党的纪律论处。

^① 本命令由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1月5日组建的工作委员会起草，并由斯大林签署，用电报通知了地方党组织。

中央委员会决定：

1、 必须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给你省（州）下达的收购粮食的年度任务和每个月的任务。在执行商业人民委员部近期发布的各项命令时不得拖延。

2、 对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运粮派工单要按期执行，并不得有任何差错。

3、 落实中央过去颁布的关于不允许钱款在农村滞留的指示，确定一个最近期限，限期让农民向国库缴纳全部税款、保险费和种子贷款；不得拖延信用部门的贷款单所规定的偿还期限，要组织好投放工业品和农业机械时所垫款项的回收工作；争取提前缴纳一切款项，与此同时要开展一个推销农民公债和吸收合作社股份的运动；根据自愿捐献的原则尽快确定地方追加股份的数额。

4、 在收缴拖欠的各种款项时尽快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首先是对富农；对破坏农业价格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必须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

5、 立即组织包括省委常委、州委委员、区委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内的党内一切优秀力量全力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让这些人留在收购区，直到那里的工作彻底改观。

6、 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对保证完成他们所承担的收购任务负有个人责任，对没有能力和不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的人，要立即解除职务。

7、 在报刊上发起一场针对粮食收购工作的长期运动，集中注意对粮食收购运动中的缺点进行系统有力的批评，特别要注意那些对玩忽职守、阻碍和破坏粮食收购负有罪责的机关和个人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但不允许在农民群众中和城市中制造恐慌。

中央委员会提醒你们，如果延误本命令的执行，在一周内不能取得实际成效，即不能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现状，中央就不得不撤换现任

的党组织领导人。

将收到本命令和所采取的措施的有关情况立即报告中央。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1928年1月6日

机密第241号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加强粮食收购措施给地方党组织的电报^①

（1928年1月14日）

哈尔科夫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卡冈诺维奇、梅德维捷夫
抄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新西伯利亚——多加多夫、瑟尔佐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米高扬、安德列耶夫；克孜勒奥尔达——戈洛晓金、库比亚克。

第一，我们认为，在苏联南部地区，我们的粮食收购期总共只剩下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再往后道路就泥泞了。南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年的粮食问题，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利用好这段不长的时间。情况表明，我们在粮食收购工作中所犯错误的三分之二是由于领导人的失算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狠狠地抓一下我们的党组织并向它们发布关于进一步作好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的严肃命令。

第二，私商和富农利用我们的组织的心慈手软和疲沓拖拉破坏粮市局面，提高粮价并使农民产生观望情绪，从而使粮食收购工作更加难做；这种状况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许多共产党员以为，不能去触动包买主和富农，因为这样做会把中农从我们身边吓跑。这是某些共产党人头脑中存在的所有迂腐想法中最迂腐的一种。事情恰恰相反。要想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并取得大的进展，就应当立即打击包买主和富农，应当拘捕投机倒把分子、富农分子和其他破坏市场和物价政策

^① 这份电报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1月14日通过的。电报的草稿由斯大林和柯秀尔起草，由斯大林签署发出。

的分子。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才会使中农认识到，所谓提高粮价的可能性是投机倒把分子的臆想，投机倒把分子和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把自己的命运同投机倒把分子和富农的命运拴在一起是危险的，他们中农应当对工人阶级负起自身的同盟者的义务。不实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不能在市场上孤立投机倒把分子和富农，不能在粮食收购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

事实证明，我们党的工作者在这项实际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司法机关、苏维埃下级机关和合作社下级机关的情况更是自不待言。他们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富农往往采取放纵态度。

第三，就重要性而言，其次的地区就要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了。在这两个地区，我们离道路泥泞期只有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了。要狠抓这两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储粮地。莫洛托夫已经到乌拉尔去了。斯大林今天就到西伯利亚去。如果不拼命地给所有政权机构和党的机构施加压力，我们的整个经济状况就会停滞一整年，也许甚至整个最近一个时期都会停滞不前。

大家都看到了，问题就出在粮食收购上。因此，粮食收购是个堡垒，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攻破。如果我们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用布尔什维克的干劲去进行工作，就一定能够攻下这个堡垒。

联共（布）中央书记 斯大林

1928年1月14日

绝密第68号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附录 有斯大林同志和收购组织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同参加的
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

（会议记录第 53—6 号）

（1928 年 1 月 18 日）

会议听取了：1、斯大林同志的情况通报和粮食收购中的几个问题……

会议通过决定：

1、认为必须绝对保证完成向中央提供 6000 万普特粮食的收购计划。

2、给各州、区和粮食收购组织明确具体计划，提出每 5 天应完成的任务。责成西伯利亚边疆区商业管理局（兹洛宾同志）负责这项工作，执行时间从 1 月 25 日开始。

3、（a）保证把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出去，由波德希瓦林、别利亚耶夫和塔乌克利斯 3 同志对保证采取相应措施承担个人责任。

（b）责成边疆区工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组织在近期内集中主要精力提高铁路员工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纪律性，派边疆区的工会干部到最重要的地区去，并对下级机关，其中包括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

（c）建议州委员会、工会机关的党团、鄂木斯克和托木斯克铁路管理局不折不扣地执行边疆区委员会今年 1 月 4 日颁布的第 4-c 号通令，同铁路运输中玩忽职守和马虎从事的现象进行斗争。

4、建议州委会和区委会保证以坚决的态度征收拖欠的农业税，一定要对那些不按时缴纳农业税的富农采取镇压措施（拘捕和法庭起诉等等）。

5、边疆区常委会 1 月 17 日决定，在每个主要粮食收购区，要对若干名（4—10 名）囤积大量余粮，利用粮食困难搞投机倒把并哄抬粮价，拖延交粮和不交粮的富农作为作恶多端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惩罚，没收他们的粮食。作为对这一决定的补充，我们认为，必须由检察部门出面（根据刑法第 107 条的规定^①）执行这一措施，委派埃赫同志、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边疆区法院）和扎科夫斯基同志于 1 月 29 日去了解清楚是否有可能通过人民法院不拘泥形式、从快审理一部分这样的案子；要通过村苏维埃等机构选择那些作恶最多的富农投

机倒把分子作为审理对象，审理和判决情况要在报刊上广为公布。

6、委托边疆区检察机关以本机关名义通过报纸或专门的传单公布刑法第107条和第105条的内容及其适用范围。

7、在边疆区报刊和地方报刊上更多地报道与粮食收购有关的问题，揭露各类机关和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丑闻。

8、会议认为，除了早些时候已派往各地的工作人员外，必须再增派一批边疆区的工作人员（从边疆区委员会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抽调）到各地去，让他们留在各州、各区和个别机关。名单由基西斯同志和埃赫同志确定。

9、把西伯利亚工农检察院和粮食收购组织的通知公之于众：已经给粮食收购组织的下级机关发布过命令，不得以任何手段不按现行指示办事（不得投机倒机，互相暗算等等）。授权三人小组^②在必要时对以上命令加以补充，以保证各收购组织协同工作，保持统一。

10、不允许收购组织和地方组织在第二季度提出缩减收购网点的问题。

11、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西伯利亚机关解决西伯利亚与哈萨克交界地区粮价混乱的问题。

12、同乌拉尔联系一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多提供一定数量的铁制品。由科尔涅夫、斯特里科夫斯基和波德希瓦林3同志尽快地把需要的铁制品列一个清单。

① 这里以及下面指的是1926年版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的条文。其中第105条规定，违反商业调整规则的，如果在规则中没有特别规定应当依照行政程序进行追究的话，判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2000卢布以下的罚金。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或者信贷机关的管理机关服务的人，实施法律或者机关章程所禁止的行为的，判处6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500卢布以下的罚金。第107条规定，对以包买、隐匿或不让商品上市的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剥夺自由1年以下，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也可不没收财产；对共同通谋实施上述行为的商人，剥夺自由3年以下，并没收全部财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1932年莫斯科版第56页）。从1928年1月起，刑法第107条也适用于那些拒绝按国家价格出售余粮的富农和粮食投机商。

② 指在收购粮食期间于1928年1月10日成立的隶属于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收购粮食特别三人小组。

13、建议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尽最大努力反对私自酿造白酒，由州执行委员会设在各地区的机关负责罚款事宜，审批罚款的权力在州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要起草相应的指示。

责成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尽快拟出奖励同私自酿造白酒作斗争的民警的措施（例如，建立改善民警生活条件的基金）的指示。

书记 瑟尔佐夫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根据刑法打击投机商和富农包买主

——致莫洛托夫和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莫斯科联共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和柯秀尔

1、在粮食收购方面，西伯利亚是最落后的。上半年，即从7月至12月这段时间，收购的粮食不足年计划的三分之一；下半年，即从1月至7月则要完成年计划的三分之二还要多；为此必须把收购速度起码提高1倍，可是，1月份的粮食收购只提高了10%-15%。鉴于这种情况，大家普遍主张降低指标，因为计划完成不了，但是，在做过一些工作后，干部会议昨天一致同意要千方百计地完成整个计划，向中央提供6000万普特粮食。

2、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相信工业品对提高粮食收购速度的万能作用。对工业品的巨大作用不能否认，但是也要承认，工业品本身是解决不了粮食价格这个对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只有在粮食的价格政策稳定、我们的全体粮食收购人员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上采取统一步骤、把投机倒把活动坚决制止住、党组织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积极领导的情况下，工业品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即使有了工业品，我们的粮食收购人员的变本加厉的竞争、投机商和富农的自由活动、下级机关的姑息迁就以及党组织的无所作为，这些现象都为抬高粮价打下了基础，对市场起了瓦解作用并破坏了收购工作的进行。

有鉴于此，会议通过如下决议：第一，根据刑法第107条，对破坏革命法制的投机商和富农包买主进行打击；第二，根据第105条，对下级机关中破坏苏维埃法律、姑息迁就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和这种行

为的同谋者进行打击；第三，惩治破坏粮食收购统一步调的人；第四，立即组织全体苏维埃的和党的高级领导人较长时间地到地方去工作，并竭尽全力地利用好报刊。

3、本着不让钱款在农村滞留的方针，决定在2月15日安排征收税款。自愿捐献的事被耽误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律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律不一致。公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修改意见，可是它受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的直接威胁。应当纠正这个疏漏。有关私自酿造白酒的法律很好，可是一引用那些造成拖拉作风的旧条款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这个疏漏也应该纠正。会议决定根据第60条的精神对那些拖欠税款和破坏法律的富农无条件地追究刑事责任。

4、我认为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党的工作者抓工作非常卖力，他们干工作一丝不苟，象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是工作有可能取得成绩的保证。

5、21日晚我出发去阿尔泰，从那里把我的地址告诉你们。

斯大林

1月19日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粮食收购工作抓得太晚了

——致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1月19日)

莫斯科联共中央委员会 柯秀尔

第一，我于18日抵达新西伯利亚。当天就举行了有40名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给人的总的感觉是：粮食收购工作抓得太晚了，很难挽回损失，只有拼命抓紧并讲究点领导艺术才可能把损失挽回，干部们准备不遗余力地去扭转局面。关于会议的决议，我另行报告。关于托洛茨基和托茨基分子的勾当的密码电报我已收到。

第二，莫洛托夫在哪里？他是否收到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出的密码电报？我建议政治局立即派莫洛托夫到俄罗斯中部的4个农业省份去，建议他在每个省停留2-3天进行领导和检查执行情况。这是必要的。这件事应该做。

斯大林

1月19日8点

于新西伯利亚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就地制止严重违反粮食价格的现象

——致联共（布）中央的电报

（1928年1月20日）

莫斯科 联共中央

抄送：克孜勒奥尔达联共（布）州委会戈洛晓金、库比亚克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委会贝克尔、省商业局局长科申巴耶克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联共（布）省委会赖帖尔、省商业局局长

据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报告，在与西伯利亚边疆区毗邻的哈萨克地区，尤其是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省，均有严重违反粮食价格的现象，个别情况下粮价竟达12-27戈比一普特，这从根本上破坏了西伯利亚及其邻近产粮区的收购工作。粮食价格被搞乱的原因，是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省的商业局局长在这两个省省委书记的纵容下违反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中央的指示。我将于日内前往这些地区并召见书记和省商业局长，以就地制止这种令人愤慨的丑行，具体情况当随时向联共中央报告。

斯大林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完成计划一点不能讲价钱打折扣

——在巴尔瑙尔、比斯克和鲁布佐夫斯克专区
党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2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现在开会。

现在由斯大林同志通报情况（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同志：我想简要地给大家讲一讲俄国目前由于收购运动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和收购进展迟缓所面临的形势。

收购为何进展迟缓？详细说明没有必要：原因很多。

原因之一是，争论^①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还有代表大会上轻易取得的胜利，代表大会结束后回到各地的同志们兴高采烈——因此螺丝有所松动。

另一个原因是，农业税的征收抓得不紧。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总是想：“既然中央发了关于加紧收购的指示，那我们专区委员会原样照抄，再转给各区，区委员会原样照抄，再转给各支部”——就万事大吉了。其他事由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及其他单位来做。既然由它们收购，它们就得对这件事负责。

这样对待粮食收购是不正确的，这不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党的组织对一切都要负责。第一个要对国家和工人阶级负责的是党。虽然有各种收购单位，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们的责任，

① 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和开会期间发生的争论，结果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我们要对它们的错误负责。

我们为数众多的单位之间的分工过细过滥，以至这个环节对那个环节的工作连道义上的责任也不肯负。因此就没有整体性。只要……（听不清）整个体制的运转就要出毛病。这就是第三个原因。

因为党组织认为自己不对粮食收购负责，责任都由收购单位来负，因为党组织对这件事情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粮食收购就没有进展。没有党组织，没有党组织的影响，什么工作也搞不好。内战时期我们要是说由红军对整个事业负责，那就糟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收购工作上行动迟缓的原因，当然原因还很多。

我们在这一阶段收购的粮食大大少于去年，尽管今年我们的状况好于去年，至少不比去年差。这里我不谈其他的收入。

所有这些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我国出现了困难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一些工业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不好，工人开始受苦，而工人状况不好的地方劳动生产率开始滑坡。

第二个消极结果是，许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由于调拨的粮食少而开始波动。例如普斯科夫、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粮价开始上涨，这样一来农民就开始不种棉花种粮食。

粮价开始哄抬上去了，这削弱了棉花生产，而这就是对整个工业的打击，因为我们自己棉花本来就不够用，我们要花大约1亿多卢布从国外订购棉花。如果棉花生产由于哄抬粮价而滑坡，再加上我国种棉地区又不太多，我国的工业就会发生严重困难。由于一系列工业生产部门可能会发生困难，原料的生产可能会滑坡，这就会引起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我说这些是为了使大家弄清粮食收购工作进展迟缓带来了什么结果。

这就是在市场上起作用的一个措施。

运输商品方面的一整套措施以及其他许多措施大家都了解，因为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对其他问题还没有像这样多次大声疾呼过。

这些措施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确实是显著的。就拿乌克兰来说，那里第一次开始实行这一整套措施，情况是：以前乌克兰每5天收购620万普特，现在是950万普特。所以大家有目共睹，见成效了。

北高加索原先每5天收购将近50-60万普特，现在是115万普特。

俄罗斯中部的坦波夫、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奥尔洛夫这4个省，应当收购1亿零500万普特粮食。原先这4个省5天收购60-70万普特，现在是150万普特。

西伯利亚总共应收购6000万普特，就这你们还唉声叹气。西伯利亚落后了，落后得厉害。你们的粮食同去年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可是今年的粮食收购计划还少了100万普特（去年的计划是6100万普特）。

已经半年过去了，可西伯利亚的收购量还不到三分之一。在下一个半年里西伯利亚必须补上旧帐，再收购三分之二以上的粮食。同志们，你们落后了。行动太慢了。有些工作人员甚至感到奇怪：“怎么，我们的粮食运走了这么多，莫斯科还在叫苦。”自己守着粮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都在积极行动，而你们却行动迟缓。

一定要按时完成收购任务！完成计划一点不能讲价钱打折扣！任务必须完成！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加紧进行这项工作（鼓掌）。

速记记录，未经整理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收购工作稍有起色

——致柯秀尔和魏策尔的电报

(1928年1月27日)

莫斯科

密码

联共中央 柯秀尔和魏策尔

收购工作稍有起色。1月底或2月初当会出现重要转机。如能经常催促，收购计划将全面完成。今天在我的参与下，通过了一项一昼夜往西给中部装运360车皮、一个月装运将近1100万^①的计划。目前要全面完成这个装运计划看来不行，不过再有10来天甚至不到10天，计划就完全现实可行了。请在起草商业人民委员部2月份装运指示时考虑最后这个情况，一昼夜360车皮的定额决不能降低，大概2月份定额还得往上增加。

斯大林

1928年1月27日12时15分

第11号密码电报

手稿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① 这里和下面显然是指“普特”。

收购工作已经加强

——致柯秀尔和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1月29日)

密码

联共中央 柯秀尔和米高扬

第一，近日在装运方面采取的镇压措施已见成效。1月26日向西部装运了367车皮，27日为423车皮，28日为433车皮。此外，这几天在线路上找到了西伯利亚内部供给专用150个富余车皮并发往西部。今天通过一项计划，决定2月份往西部装运1240万[普特]，即每昼夜424车皮。我认为，由于收购工作已经加强并加紧向车站站台运送，必须在2月中把这个计划提高到1400万甚至1500万[普特]。

第二，2月份收购300万的计划对西伯利亚联合会来说太少。请增至450万。应增加所有收购单位2月份的收购计划。大家都动起来了，要利用这种形势。

第三，我到过巴尔瑙尔、鲁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同比斯克、斯拉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进行了交谈，同卡緬卡的同志们通了书信，把每个人都痛骂了一顿。这里的情况当会好转。我正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途中，我已让东部7个专区的代表到该地，这7个专区共提供2700多万普特。这些专区还未动起来。此事结束后即返回莫斯科。

斯大林

1928年1月29日23时10分

于泰加车站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收购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致莫洛托夫、柯秀尔、米高扬的电报

(1928年2月2日)

第24号密码电报

莫斯科 联共中央

莫洛托夫 柯秀尔 米高扬

收购工作出现转机。1月份的第六个5天收购了290万普特，超出通常120万普特的指标。这是个重大转机。我想，这个收购指标不仅会保持下去，而且在道路泥泞期到来之前，如果一如既往地施加压力，还可以再提高一些。看来，2月份1800万普特的收购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今天动身回莫斯科。

斯大林

1928年2月2日13时40分

于泽列杰耶沃车站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你们的收购计划落后于各地的收购速度

——致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电报

（1928年2月3日）

第26号密码电报

新西伯利亚 兹洛宾

抄送：基西斯 联共中央 柯秀尔和米高扬

你们2月份的收购计划落后于各地的收购速度。你们给阿钦斯克2月份的收购任务是70万普特，但是阿钦斯克1月份就收购了90万普特，而且现在打算2月份收购100万普特以上。你们给鄂木斯克2月份的收购任务是120万普特，但是鄂木斯克根据已经出现的转机自行把收购任务定为170万普特。伊尔库茨克、图伦、米努辛斯克也有类似情况。我担心，你们对其他专区，特别是对阿尔泰各专区也会出现同样的失误。新的情况和转折局面要求你们立即重新修订计划，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提高收购计划。请不要落后于收购速度。

斯大林

1928年2月3日20时30分

于鄂木斯克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尽可能快地完成收购和装运任务

——致米高扬、莫洛托夫、柯秀尔的电报

(1928年2月4日)

第27号密码电报

莫斯科 联共中央

米高扬 莫洛托夫 柯秀尔

我赞成把西伯利亚2月份的收购计划增加到2200万普特。2月份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月份。这就要求提高收购计划，尽可能快地完成收购和装运任务。祝贺中央1月份完成8000万普特的收购任务。这是党的重大胜利。

斯大林

1928年2月4日14时20分

于卡梅什洛夫车站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粮食产量基本的需要是够用的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8年6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1) 我只是偶然从柯秀尔那里得知，——而且这是在关于卡明斯基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原来你是反对任命卡明斯基领导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库比亚克（以及整个农业人民委员部）反对安采洛维奇是能令人信服的。库比亚克总的是倾向于把集体农庄搞掉（不顾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类型的自愿组织）。这最后的一种情况迫使我主张用合作社的人——卡明斯基。

(2) 我们想让埃赫领导新的国营农场。西伯利亚人反对（关于这一点是不久前去过西伯利亚的柯秀尔说的），但是不得不坚持。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不得不在你来了以后决定。

(3) 事态的发展是这样的，可能对于卡冈诺维奇和对于事业来说，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柯秀尔取代他，都是最好的做法。不久前在柯秀尔在场的情况下，丘巴尔对我是这样说的（一而再地！）。其他的“证人”也说到了这一点。柯秀尔不反对这样的组合（我感觉他在内心里是高兴这样的，因为他想“在地方上”工作）。我作为可能的前景和卡冈诺维奇说了这一点，附加条件是，如果他离开的话，更合适的做法是他能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根据我的感觉，现在，当他们那里是“一片寂静”，对他的“进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他甚至是高兴的。在你回来之后不得不谈谈这件事。

(4) 去了伏尔加沿岸地区（在萨拉托夫召集了伏尔加的两个州的各省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会议）。他们的收成高于中等水平。春播面积（还有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在他们那里肯定扩大了（5%—10%“并更多些”）。为了不把多余的粮食卖掉，老乡们原来是在疯狂地进行播种，并不怀疑价格将会提高，而在今年采用的非常措施是暂时的。老乡有自己的逻辑……我的感觉是，在6月和7月，不包括乌克兰，能够收到不多于2000万，最多是2500万普特。我们之间已经说过——这样总的来说对于基本的需要是够用的。现在清楚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向我们的基本消费者供应粮食上骗了我们：在3月，2月原来我们是按一个月5000万—5500万普特的标准供应的，而现在通过的标准是一个月2300万普特，——为什么不能在所有这些月里都按3000万—3200万普特的标准供应呢？至于粮食的价格，现在不得不把它提高10—15戈比一普特，同时要对肉和蛋的价格有一些降低，但是这是必须要做的。

(5) 柯秀尔说，西伯利亚的收成年景是好的，春播的面积在扩大，等等。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播种面积有些下降。

你20号在莫斯科吗？

握手。

N.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号全宗，
2号目录，1420号案卷，第196—197张。

对关于粮食收购决定草案的意见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联共中央关于粮食收购的决定^①我已读过。尽管这一决定优点不少，但我觉得还很不全面。目前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

(1) 在粮食市场上或粮食市场周围存在着一大批城市投机商，他们从国家手中抢走农民的粮食，而更主要的是，在粮食持有者中造成惜售气氛；(2) 各粮食收购组织间的竞争，使粮食持有者能摆架子，不出售粮食（为了等一个好价钱），或是将粮食藏起来不及时上交；

(3) 许多集体农庄想隐瞒余粮，非法出售。这些因素使我国的粮食收购工作现在（和将来）不能顺利开展，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因素会愈来愈增加。因此我们要想在1-2月份结束收购工作并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就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危险。中央的决定首先应该指出这一点。但中央的决定回避了这个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而且所谈的内容在这个冗长的决定的数不清的其他（次要的）条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担心，这么办我们很难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我提议：

(1) 立即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构下达立即公开镇压城市（与城市有关的）粮食投机商的命令（即将他们逮捕驱逐出产粮区），以

^① 斯大林指的是关于粮食收购的决定草案，1929年8月15日政治局最后批准，并吸收了斯大林的建议。

便粮食持有者（从粮食收购运动一开始）**马上就**意识到不能指望投机商，只有将粮食老老实实（无损耗）上交给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机构。

（2）立即命令合作社、粮食联合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司法机构**的上层领导查明被揭发出的抢购粮食的粮食收购员，并将其作为**偷偷混入我们组织、蓄意破坏工人国家事业的异己分子和耐普曼（我不排除有“共产党员”）**立即送交法庭审判（并立即免职）；

（3）（通过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党组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集体农庄实行监督，将那些被揭发出的扣留余粮或是非法出售粮食的集体农庄**领导人立即免职**，并以欺骗国家、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

我认为，不采取这些及类似的措施，我们的事情就办不了。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作口头**宣传**而缺乏任何**具体**的粮食收购措施。

请将此信交米高扬一阅。

我希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不会出现意见分歧。

我在第一封信中忘了答复有关“不间断工作周”的问题^①。毫无疑问，应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不要理会乌格拉诺夫及其他牢骚满腹的人的不同意见。这将是我们的生产政策及实践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10日

完全同意。

伏罗希洛夫

① 苏联政府当时打算借助于不间断工作周（浮动休假日），加强对设备的利用，但这种做法有其消极面。1929年7月22日，劳动人民委员部在乌格拉诺夫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了此问题。次日，乌格拉诺夫给人民委员会送去报告，指出目前不可能施行不间断工作周。

今年粮食收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8月2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

6. 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粮食收购的提案。这很好。但我认为还不够。现在的问题是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毋需证明，所有收购组织（特别是乌克兰的）都会回避执行这项决定。其次，我担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对政治局的决定一无所知，这项决定卡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因此应当要求各收购组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等机关：

（1）提供发给各下属机构的**执行政治局决定**的指令抄件；（2）每两星期（最好一星期一次）定期汇报执行决定的**结果**。还应吸收工农检察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参与此事。不知你对粮食收购的情况和前景是怎么看的（可能米高扬以为，既然已经作了决定，他的粮仓里就会有1.3亿普特的紧急储备粮）。我却认为，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目前并不顺利。你想吧：8月份的头10天我们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15%。即使在剩下的20天内我们完成的不是15%，而是20%，也同样没达到我们目前所应当完成的数额。我担心这样低的速度会影响今后的收购工作。而今年粮食收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果失败了，一切都将受到影响。您要是再不**狠抓执行**中央决定一事，那么这项工作失败的危险性还会增加。

约·斯大林

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改革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9月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从报刊上发表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通报上看，我就中国问题提出的责备（见我上一封信的附言）是不对的。看来我没有认真领会这份密码电报的内容。我倒是希望是我错了并准备就责备错了一事道歉。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维诺夫、布哈林、卡拉汉不再是机会主义者。决非如此！

(2) 我看了关于订购合同制的决定^①。内容不错。但我想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将农村中收购的东西全都交给**农业合作社**（粮食中心等单位），不让消费合作社和**粮食中心**去从事收购工作，而是将粮食中心变成接收收购来的粮食的单位。这在订购合同制获得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不实行这种改革，竞争及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这事等我到莫斯科后再详谈。

(3) 粮食收购进展顺利。这很好。如果再加上另一个事实，即为第三期工业化债券已收集了4亿多卢布，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工作搞得确实不错。现在最主要的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将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4) 莫斯科组织在干什么？鲍曼为什么要那样蛮横地敲打波隆斯基？这种不光彩的个人争斗有什么意义呢？

^① 1929年8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谷物订购合同领域工作的基本总结和当前任务”的决定。

再见！

握手！

约·斯大林

关于处理维申斯克区问题 致肖洛霍夫的函电

斯大林致肖洛霍夫的电报

(1933年4月16日)

急电

送北高加索边疆区维申斯克区维申斯克镇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15日收到你的来信^①。谢谢你提供的情况。该办的事都在办。请将必需的救济粮数目告我。请告知具体数字。

斯大林

1933年4月16日

斯大林致肖洛霍夫的电报

(1933年4月22日)

急电

送北高加索边疆区维申斯克区维申斯克镇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刚刚收到你的第2封来信。不久前我们给维申斯克人拨去40000普特黑麦，现在又追加80000普特，总共拨出黑麦120000普特。给上顿河区拨去40000普特。应当回电报而不是回信。回信浪费了时间。

斯大林

1933年4月22日

① 1933年春，肖洛霍夫就维申斯克地区粮食征购过程中某些工作人员的横行霸道行为致信斯大林。1933年7月4日，政治局听取了什基里亚托夫就过火行为所作的汇报。联共（布）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济明、罗斯托夫市委书记奥夫钦尼科夫被撤销职务，维申斯克区的领导受到严重警告。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3 年 4 月 23 日）

维亚切斯拉夫：

我认为，应当完全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即给维申斯克人追加 8 万普特，给上顿河人 4 万普特。这件事看来已经弄得“全民”皆知，在那些地方发生了种种胡作非为的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挽回影响。多给四五万普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这两个区的居民来说，眼下却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表决（请告诉切尔诺夫。除此之外应当派一个人（可以派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到那里去），以便弄清事情真相并追究奥夫钦尼科夫及其他所有胡作非为的人的责任。这件事明天就去办。

约·斯大林

斯大林致肖洛霍夫的信

（1933 年 5 月 6 日）

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

您已经知道，您的两封来信均已收到。所需救济粮已经拨出。

为了解情况，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将去维申斯克区找您，恳请您对他的工作给予协助。

这件事就谈到这儿。但是，肖洛霍夫同志，我还有话跟您说。事情是这样的：您的几封信上感到有片面性。我想就这个问题跟您谈几句。

我曾对您写的信表示过感谢，因为这些信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

中的毛病作了揭露，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为制服敌人而在无意中伤害朋友，甚至干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作了揭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你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也不错。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应当学会看到另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内容就在于：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

当然，这也丝毫不能证明您所说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干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是正确的。搞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应当受到应得的惩罚。然而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

祝您一切都好并握您的手！

您的 约·斯大林

1933年5月6日



(162)



正在建设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 1931年



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企业一期工程 1932年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成就



法 制 措 施

立即开除并审判破坏日用工业品价格的人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16日）

莫洛托夫：你好！

9月12日的来信收到了。

.....

对信的补充

报刊上（特别是经济学报刊）**接二连三地报道**的合作社及地方和中央的**采购单位普遍违抗**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和党的命令的情况令人难以容忍。一些明目张胆的犯罪分子在帮耐普曼和工人阶级的其他敌人的忙，实际上**却得不到制裁**，这对整个经济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起着瓦解作用，我们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我们的党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如果我们不想被那些表面上“接受”党的命令而实际上却对这些命令百般嘲弄的恶棍所左右，那就不能再这样容忍下去了。我建议**责成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察院）**：

（1）立即**开除破坏收购价格政策的人**，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并公布其姓名；

（2）立即**开除破坏日用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零售价）政策的人**，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并公布其姓名；

（3）发一个党内通报，指出这些破坏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同他们的斗争要毫不留情。

我将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自己的这些建议，也请你们大家采纳这些建议。要知道，如果不采纳这些措施，我们就会吃败仗，**盘据在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耐普曼分子就会得利**。不采取这些措施，

我们就要倒霉。

盼复。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16日

关于使用囚犯劳动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7日)

维亚切斯拉夫：

谈两个问题：

一、听说李可夫和克维林不顾政治局的决议，想要扼杀北方运河的修建。应当制止他们并给他们一个教训。最大限度地削减财务计划是应该的，但扼杀这件事却是犯罪！

二、据说想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挑出一批刑事犯（三年以上）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烂透了的托尔马乔夫的阴谋。李可夫极力讨好瑟尔佐夫，也提出过某些意见。我认为，政治局的决议应当执行，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应当关闭^①。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7日

^①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使用刑事犯劳动》的决议，规定被判剥夺自由3年或3年以上者转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的劳改营，被判剥夺自由1到3年者仍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1930年10月5日，政治局重新审议了《关于使用刑事犯劳动》问题，并做出决定，“仍旧维持政治1929年6月27日的决定”。1930年12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解散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其职能转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

对破坏分子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必须立即将那些破坏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的破坏分子的全部供词公之于众。我们为什么不公开这些供词，干吗要“保密”？应当把它们公之于众并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已将此案移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该机构在我们这里类似于法庭）处理，一星期后再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名义发布消息：所有这些坏蛋都已被枪决^①。应当把他们统统枪决。

二、还应当将“英国国家情报处”的间谍尼安德、戈登、邦达连

^① 1930年9月20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被坏肉类及其他供应的破坏分子》的决议，在决议中说：“1）有必要立即公布在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方面从事破坏活动的破坏分子的供词；在这份文件后附上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简短引言，指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已做出决定，把这一案件转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议；2）刊登一些文章，讲清这一案件的实质，指明这伙反革命匪帮的活动已经被完全揭穿了，现在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纠正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后果。9月22日的主要报纸应用一页半的篇幅登载这一材料。3）责成由明仁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李可夫和波斯特舍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公布前审查要公布的材料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引言文稿；4）5天后公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破坏活动组织的所有参加者所做出的枪决判决。”

所谓“工人供应破坏分子”组织的成员的供词，刊登在1930年9月22日的报纸上。10月25日，报纸公布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会议将48名“工人供应的破坏分子”处以枪决，判决已经执行。

科、阿克尔曼、博布罗夫希科夫等人关于维克斯公司的职员搞破坏活动，一些人（杰克逊、洛曼斯、利普等）策划爆炸、纵火和破坏我们的工厂和建筑物的供词公之于众。为什么要将这些丰富的材料保密呢？现在，在将要同英国人谈判债务和租让问题的时候，公布阿克尔曼等人的供词，货真价实的供词（作为不容置疑的文件），对我们尤为有利。可以在破坏肉、鱼等的供应的破坏分子的供词公布5天之后再公布这些文件（经过精心准备）。目前，可以只公布文件，而不发布审判或枪决的消息。

三、当然，第一批和第二批供词的公布都不应当是“随随便便地”，而应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司法人民委员部）写一个前言并由我们的报刊做出一定的说明（这种说明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把一切情况都查清了，我们对资产阶级及其纵火强盗和所有破坏分子的阴谋一清二楚并给了他们狠狠的打击）。阿克尔曼及“英国国家情报处”的其他英国坏蛋的供词很可能对波克罗夫斯基、斯特里若夫等人原先的供词有所补充。

四、关于柳亭我已给你发了密码电报。

五、我们苏维埃中央领导班子（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副手会议）患了绝症，劳动国防委员会从务实的和战斗的机关变成了无聊的议会。人民委员会被李可夫那些空话连篇、实质上是反党的讲话搞得瘫痪了。原先是李可夫-索柯里尼科夫-舍印曼司令部的副手会议，现在有可能变成与党中央对抗的李可夫-皮达可夫-克维林或博哥列波夫（我看不出后两个人之间有多大差别）的司令部。显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至于采取什么办法——待我回莫斯科后再告诉你。而眼下要密切注视皮达可夫这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索柯里尼科夫第二），他现在是李可夫-皮达可夫联盟中危害最大的人物，代表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者的康德拉季耶夫式失败主义情绪。要是能让谢尔戈和米高扬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就好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同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一起能够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副手会议中把李可夫和皮达可夫孤立起来。

六、我的身体现在非常好。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11期

工人为什么会向农村倒流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对今天的信作如下补充：

一、我认为，对柳亭不能**只是开除了事**。应当在开除后过段时间将其放逐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必须彻底打垮这个反革命魔鬼的斗志。

二、我已同甘申谈过了。我认为，从为生产汽油而**增加裂化装置的数量**这一角度来看，一定要在9月份将石油问题提交政治局。没有石油我们将陷入困境。拖到10月份就晚了。

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取缔那些像老鼠般吱吱尖叫，说什么“普遍歉产”、“接连失败”、“挫折不断”等等胡话的刊物。这是歇斯底里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的腔调，这种腔调已被材料证明是**不正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叫喊得最凶的是《经济生活报》、《真理报》、《工业化报》和在某种程度上的《消息报》。这些报纸抱怨速度“下降”，“**工人向农村倒流**”而不解释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工人怎么会一下子“突如其来地”向农村倒流，这种“灾难性的”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食品供应不好？但是难道去年的供应就比今年强吗？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这样的流动，没有向农村倒流呢？工人去农村是为了参加收获，是为了不让集体农庄在分配收成时漏掉他们，是为了在集体农庄当众人之面劳动上一两个月，以此保证自己有权享有集体农庄一份**完整的**口粮，这些难道不清楚吗？为什么

不写这些东西，而只是张皇失措地叫喊？顺便说一句，中央的《呼吁书》也忽略了这个因素。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原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年第11期

加强对工人的供应和管理工作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8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我9月22日的信收到了吗？这封信我是通过亚戈达发的。我在信中顺便提到建立“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谢尔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一职，你就应当担起这一职务，而谢尔戈则可以做你的副手，负责对执行情况讲行检查。我认为对于**改善我们机关的工作**，对于反对简直要把我们吃掉的官僚主义，这样的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

二、然而“执行委员会”只涉及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将其打击锋芒对准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完全将我们的建设事业引上正轨，还应当抓一下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我指的是企业中的“流动”。是“跳槽者”，是劳动纪律，是固定工人骨干的减少，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工人供应的组织工作。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工人按照竞赛原则诚实劳动，另一些工人（大多数）则胡乱瞎整和“跳来跳去”，而且对这些人的供应同对诚实劳动的人一样（**甚至还要好**），他们在休假、疗养、保险等方面享有同诚实劳动的人一样的优惠条件。这难道不是胡来吗？要知道这样做会毁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的整个现实基础！除了这种胡来以外，我们还时常从生产一线抽调（“提拔”！）较有创造精神的工人并把他们随便往哪个办公室一塞，而他们在他们所不习惯的环境里苦闷得要命，这样一来，生产一线的骨干工人被掏得一干二净。这就是说，我们再次破坏了竞赛的基础，

削弱了骨干工人的队伍。现在继续这样干下去——就是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采取哪些措施呢？

应当：

1. 把对**主要的**、有决定意义地区（名单另定）的工人的供应物品**集中起来**并对这些地区的合作社机构和商业机构按照迅速和充分供应工人的原则**进行改组**（如有必要——则解散这些机构并重组），把这些地区置于中央委员（名单另定）的特别监督之下；

2. 在**每个企业推选突击手**，并在食品、服装和住房方面对他们**充分和优先**供应，保障他们**充分享有**保险方面的一切权利；

3. 将非突击手分为两部分，分为在**本企业**工作1年以上者和工作1年以下者，对前者的食品和住房供应排在**第二位**，并**全额**供应，对后者——排在**第三位**，并按**打了折扣的标准**供应。关于生病等的保险，大概可以同他们这样说：你在企业工作不满1年，你既然可以“跳槽”，那在生病时就不能领到全额工资，比方说可领到2/3的工资，而那些工作1年以上者则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4. **禁止**把工人从**车床旁**提拔到任何机关里去，只鼓励按**生产系统**（或者按工会系统）提拔他们。应把工人（专业熟练的）从车床旁提拔为副工长、工长、车间主任等。现在我们需要这种提拔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生产一线的骨干工人折腾光，任由败家子糟蹋我们的企业。

5. 必须同托姆斯基在**旷工**和**劳动纪律**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决裂，消除旷工者能钻的一切“合法的”空子（这些空子使他们处于比诚实劳动的工人**优越的地位**），对旷工者广泛建立工人审判会并将他们开除出工会。

6. 必须同托姆斯基在**失业者**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决裂，组织对**真正**失业者的正式登记，定期清理失业者名单，以便把那些偶然失

业和肯定**没有**失业的人从名单中除名，建立严格的制度，失业者凡两次拒不服从工作分配，将自动失去领取救济金的权利。

7.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我不怀疑，诸如此类的措施必将赢得工人的极大支持。

这件事当然是重大而复杂的。对此应当认真想一想，能否把这些措施**马上用于所有工业部门**，——这也是个问题。但这件事毕竟是亟待去做和必须去做的。

请在你那里在亲密朋友的小范围内好好议一下这件事（以及“执行委员会”问题）并将他们的意见告诉我。

只是请注意，瑟尔佐夫的工人供应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提供任何东西。需要一个建立在另外的原则之上的新委员会。如有必要我也可以参加这样的委员会。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28日

附言：我刚刚收到你从顿巴斯写来的信。看来，施瓦尔茨不宜担当重任。

约·斯大林

富农自愿劳动者享有的权利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1 年 3 月 11 日）

莫洛托夫：

我只看了关于“倾销”和“强制”劳动的部分。关于“倾销”的一章写得好。关于“强制”劳动的一章写得不够全面和充分。我的意见和修改写在原件中^①。

约·斯大林

附言：关于未被监禁的富农的劳动，或者干脆不用提，或者专门做出有根有据的解释，即在被迫强制迁移的富农中只有愿意者才劳动，并享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权利。

^① 这里讲的是莫洛托夫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 1931 年 3 月 11 日《真理报》）。

对外贸易

关于在东方边境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

——致契切林的信

（不早于1921年11月22日）

抄件送列宁

致契切林同志

我仍然坚持我关于在东方各国有实施我们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的意见。

当然，我们在不定什么时候将从现今的经济崩溃中摆脱出来。当我们摆脱出来后，那我们就能谈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组合了。但要知道，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未来的麻烦事”，而是现在的实际政策，在土耳其、在阿富汗，我们不必在我们对方的几百万现金的面前退却，而在波斯，我们尽管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却为自己找到了亲英政府。我毫不怀疑，我们不论在贸易还是工业方面都不能与上述国家的敌人竞争，因为——1) 俄国卢布的兑换率在下降，2) 我们这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出口基金，3) 我们的对外贸易完全是逆差，4) 我们没有能够补偿我在上面讲的三点上经济亏损的足够数量的黄金。

应该承认，在您的第二封信中，我没有找到反对您这样（实际）提出问题的不同意见。

而在这个时候，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制订最近几年我们的实际政策。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要在其他条件相同，即国际条件相同，所有的一切都按目前的样子和平地运行时才行。当然，对这一点，不可保证做到。

我认为，更合理更实际的方法似应是集中精力发展与上述东方国家毗邻的一些边境国家的工业，也就是在阿塞拜疆、西伯利亚、土耳

其斯坦，只要在这些边境地区成功地发展了工业，我们就能够与这些国家首先建立贸易联系，而后建立工业关系，使他们接受俄罗斯的经济影响。例如，似乎可以将每个工厂（纺织厂和制革厂）转移一部分到阿塞拜疆去；每2个或每3个工厂（纺织厂或制革厂）转移一个到土耳其斯坦去；比如说在乌尔加和西伯利亚之间蒙古人和远东共和国按入股原则铺设铁路。实施这些措施不那么远离国土，也不像您的那个将一些工厂搬到土耳其去的计划那样不现实，因为这样，不用在一个陌生国家进行装备，而是在自己的，就是在自己的边境进行，这里俄国的卢布可以流通（因此，不需要花费黄金），这种创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有厂房，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全力支持这些创举，乌尔加-西伯利亚公路为铺设铁路提供了方便条件，等等）。我认为，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状况下，不经过特别的努力和俄罗斯中部的经济事业没作一些牺牲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不能实现这样一个与你提出的问题只有间接关系的最低纲领的经济计划。俄罗斯中部经济事业不作某些牺牲，我们甚至不能幻想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对协约国竭力想在经济上奴役俄国进行抵抗。

至于说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他们同土耳其和波斯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俄罗斯和欧洲的中间环节。它们在把我们同欧洲联系在一起时，已作为我们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列入我们的总体中，这对恢复俄国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还向这些国家支付了一定数量的过境捐款），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不能谈土耳其和波斯的理由。

斯大林

关于与法国商人合营出售白金的问题

——致列宁的信（摘录）

（1922年11月13日）

列宁同志：

我认为有一些事需要分两个方面向您报告：

一、今天，加米涅夫同志通过电话告诉我说，必须批准与法国商人就组成一个合营公司出售我们的白金而签订的协议，而且，我们至少有60普特的白金需要交给该公司拿到境外去卖，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将自己的白金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因为这一协议草案中没有任何“合营”的条款。（所有白金都是我们的，法国人没有任何白金，他们仅仅是销售白金的经纪人，而且大概由于白金差不多是专卖物品，他们法国人总是尽量少卖白金，为的是迎合美国商人，使之能够把美国的白金以高出三倍的价格卖出，而且，整个协议对于俄罗斯完全是带有侮辱性的。）

我建议加米涅夫把拥护这项协议的人都叫在一起，把真相告诉他们，建议他们废除这个合资公司的协议，改为从委员会成交的白金总款额中抽取一定的提成给法国人^①。我想，该注意被斯维尔德洛夫^②

① 1922年11月23日，政治局研究了合资公司出售白金的问题，要求建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一下协议的准备情况。1923年1月18日，政治局依据斯大林的建议承认：白金的问题已处理完毕，而原先建立的委员会已被撤销。

② 这个斯维尔德洛夫，并不是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

使劲地到处宣扬的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实在是不能指望了）

.....

斯大林

关于在苛刻贷款条件下向美国订货的问题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25日）

……我认为美国订货问题比某些同志想的要尖锐得多……。问题首先在于如果我们不放弃在美国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下向美国的新订货，我们就会失去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取得（并将在法国取得）的优惠条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不理解这一点。当然，可能会有例外，我指的是对车里雅宾斯克工程或军事工业而言。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应该由政治局根据各个具体情况来解决的问题。我就此给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写了信……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美国现在是金融领域的主要敌人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1年8月30日）

……（1）为什么您未通报由帕滕^①转交给李维诺夫的波兰条约草案（关于互不侵犯）的任何内容？此事非常重要，几乎具有决定意义（对最近的两三年），事关和平，我担心李维诺夫屈从所谓的“社会舆论”而使此事落空。请认真关注此事，政治局应对这件事予以特别的监督，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全力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要是在这件事上屈从于普通小市民的“反波兰主义”，哪怕有一分钟忘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都是滑稽的。

（2）梅日劳克^②的事和在法国订货的事怎么样了？为什么那里没有动静了？为什么所有订货集中在德国、英国，却不向法国人提出订货？

（3）在生铁管的问题上你们显然屈从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压力，不仅如此，公用事业负责人也施加压力要求进口。你们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都错了，因为：①在中央委员会关于1932年的控制数字的指示中，金属进口数字被严格确定，规定1932年金属进口数字应当低于1931年的数字，然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却想对中央的这项决定提出异议，你们竟随声附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②关于不一定非在今年付款的议论不能令人信服，因为1932年和1933年我们支付的外汇将比今年更多。北美合众国力图掏空我国的外汇和破坏我

① 帕滕，法国外交官。

② 梅日劳克，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国的外汇状况，它现在是金融领域的主要力量，也是主要敌人。因此应当珍惜外汇，这不仅是为了1931年也是为了未来几年；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是向其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炼出更多的生铁，反倒是向国库施加压力（即向国家、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工人阶级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构的缺乏能力、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而付出外汇资金。

卡冈诺维奇同志，情况就是这样。

（4）因此，我认为不能对为了本机构工作人员的安逸而企图挥霍工人阶级的外汇资金的人员（和机关）有任何宽容……

（5）我看了布哈林的讲话（速记记录）。这是一篇空洞的、脱离生活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讲话。这篇讲话是给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工人供给方面反对联共（布）中央的前右派分子提供纲领“提纲”的一次不诚实的、不成熟的尝试。这个布哈林同志真是怪人！就此应该给他写出滑稽戏。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派布哈林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宣传局不是让他就技术宣传、技术宣传的必要性而夸夸其谈，而是让他组织起活生生的具体的技术宣传。如果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就另找旁人。

如果布哈林问到或者情况需要，您可以告诉布哈林这是我的意见……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由于新的情况不得不削减进口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9月24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来信收到了。

你是对的，由于新的情况（英国的金融危机等等）不得不削减我国的进口。我相信，我们非得削减年初确定的进口定额不可^①。年初的情况是一个样子，现在已经变了（恶化了）。这一点务必加以考虑。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百货商店^②，当然你的意见对。

敬礼！

约·斯大林

1931年9月24日

① 1930年10月2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1）鉴于外贸形势的根本改变，从最大限度缩减输入量的角度重新审议政治局、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制订的有关进口的补充决议，是绝对必须的。2）责成由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和古比雪夫组成的委员会在两天内划分出绝对必须的订货项目和数额。

② 在1931年9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审议了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百货商店的问题。政治局通过决议，把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百货商店的供应纳入劳动国防委员会制订的总的供应计划，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要开的百货商店的数量及其供应标准。1932年12月底开业了83家百货商店，将一些稀缺商品只卖给它们主管的工厂的工人和工作人员。

我们正面临美国策划的货币金融风暴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31年11月9日）

……（1）政治局总算取消了补充进口钢的决定。这很好。该明白了，我们正面临北美合众国针对我们策划的货币金融风暴，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顶住这场风暴。我们是要在一两年后遭到破产，从而断送我们所有的经济计划，还是要避免破产，这就是政治局取消钢的补充进口时解决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将尝试（将—尝—试！）朝着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积累外汇资金的多次决定迈出第一（第一！）步。

（2）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尤其是中央委员，不应该也不可以互相欺骗。无需多言，本应直接和诚实地提出取消政治局七月决议的问题，却提议补充进口钢等等，这是企图欺骗中央（欺骗卡冈诺维奇、鲁祖塔克^①等等）。皮达可夫之流很容易走上这条非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当然，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一伙本位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们就不能走这条路。政治局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

（3）你提出：给出解决办法，指明从何处得到钢、车轴和车轮等等。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立即把这些东西的进口压缩到最低限度，不立即在我国组织生产这些东西，不立即对我国经济机构施加压力并迫使其执行中央关于在我国工厂大规模地组织生产钢的多次决定，那

^① 鲁祖塔克，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么我们就永远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也永远不会有足够数量的钢、车轴、车轮等等。为什么乌拉尔钢厂的改造搞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没有全力利用军工厂来生产优质钢？因为经济机构希望中央糊里糊涂、马马虎虎，指望中央会同意补充进口。任务在于消除这种希望中央糊里糊涂的心理。怎么做好：是为维护经济机构的安逸而对国家金库施加压力，还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对经济机构施加压力？我看后者好于前者……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 2000 年
12 月 1 日《独立报》

对兰开斯特的贷款应坚持第二个方案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摘录）

（1932年6月）

关于兰开斯特^①，应当坚持第二个方案，1亿美元，10年期限，3%（不是5%）的年度追加，1亿美元中订货占15%—20%。这个方案对我们有利。对兰开斯特也有利，因为给他400万卢布的订货，而按第一个方案订货为500—700万卢布，他要求的总额提高到6000万卢布，而按第一个方案为4000万卢布。万不得已可以把订货增加到贷款总额的25%，但无论如何不能对第二个方案其他条件让步。我认为，兰开斯特肯定会同意这个方案，因为对于兰开斯特和他的银行来说，根本问题是为美国的面临关闭的工厂吸引从前的订货，使工业复苏，挽救工厂免遭倒闭……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2000年
12月1日《独立报》

① 兰开斯特，美国银行家。

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会遭到歪曲和诬蔑，首先是在国外，国内也一样。

我的名字也将遭到咒骂和诽谤，许多暴行会都会强加于我。

不论事态如何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和胜利。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二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五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五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5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论反对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

论托洛茨基

有关就工会问题进行的争论——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1月25日) 3

托洛茨基应先向中央通报列宁文章内容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的声明

(1923年4月16日) 4

有关托洛茨基和46人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23年10月26日) 5

答一张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便条

——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摘录(对问题的答复)

(1923年12月2日) 9

对于谎言和诽谤必须用真相进行反驳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23年12月8日) 11

八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声明

(1923年12月14日) 13

托洛茨基挑起了反对我党主要干部的争论	
——致基洛夫的信	
（1923年12月17日）	22
九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	
（1923年12月31日）	24
托洛茨基的发言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致贝克尔的信	
（1924年3月4日）	42
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伏龙芝、斯大林	
（1924年12月10日）	45
托洛茨基与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的关系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5年6月17日）	46
发表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尤为重要——致“七人小组”	
（1925年8月1日）	53
关于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日）	54
关于与托洛茨基有关的文件的发表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9日）	56
不该反对有关伊斯特缅文件的提案——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8日）	58
有关托洛茨基的两件事——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4日）	59
党会揭露托洛茨基等人的丑恶嘴脸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6年6月15日）	60
对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	
（1937年11月11日）	62

论季诺维也夫

- 你们看来真要准备决裂——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65
- 政治局的工作程序和一些问题的决策过程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7日) 66
- 季诺维也夫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69
- 务必清算季诺维也夫的严重错误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72
- 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的信
(1926年6月25日) 74
- 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职务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0日) 77
- 关于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案件的处理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6月23日) 79
- 坚决抗议让季诺维也夫担任《真理报》常任编辑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80

论加米涅夫

- 关于解除加米涅夫职务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日) 84

加米涅夫不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了——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2月23日)	86
附录 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	
(1928年7月11-12日)	88
加米涅夫向英德美大使进行了政变试探	
(1936年8月23日)	94

论布哈林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一)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1929年1月30日)	96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二)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1929年2月9日)	120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关于《笔记》事件来信的答复草案	
(1929年3月14日)	135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之三)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未经修订)	
(1929年4月22日)	138
布哈林正在堕落下去——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21日)	201
共产国际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写得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23日)	203
应当考虑将布哈林赶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0月7日)	204

论李可夫

- 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致莫洛托夫等的信
(1929年9月30日) 206
- 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声明”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29年11月13日) 208
- 应当把李可夫及其一伙赶走——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5日) 220

斗争动态

- 他们想在英国的问题上捞一把——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6月2日) 224
- 分发反对派的文件是不利的——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16日) 225
- 反对派加紧了派别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27年9月23日) 226
- 应该分发“劳动农民党”案的供词——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日) 228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信
(1936年9月25日) 229
- 叶若夫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231

插图

- 一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82
- 二 反对派的首领们 222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论反对派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

论托洛茨基

有关就工会问题进行的争论

——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1年1月25日)

约·维·斯大林致克·叶·伏罗希洛夫

向布琼尼同志致敬

朋友！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事情进行得很好：列宁等人的政纲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①。

我们这里毫不怀疑，你、伏龙芝、莫洛托夫、米宁和其他同志能够争取到顿巴斯（矿工代表大会也表示支持我们）以及一些工业城市和军队的支持。叶夫多基莫夫、梅利尼昌斯基和扎鲁茨基会帮忙的。在右岸不妨利用彼得罗夫斯基，不经战斗不给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让出任何一个代表的席位。^②

你的 斯大林

① 指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共（布）党内由托洛茨基挑起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② 本卷所引档案资料如未有注明出处者，系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一书。

托洛茨基应先向中央通报列宁文章内容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的声明

（1923年4月16日）

斯大林同志给中央委员的声明

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早在3月5日就收到了列宁同志这些无疑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文章^①，他居然认为可以把它们搁置一个多月而不向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报告，直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提交出来。今天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告诉我，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些文章，在代表中间有种种流言和传闻。我今天得知，知情者都是些与中央委员会毫不相干的人，而中央委员却不得不靠这些流言和传闻过日子，显然，应该先向中央委员会通报文章的内容。我认为，列宁同志的文章应该在报刊上发表。但遗憾的是，正像福季耶娃同志的信明确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能发表，因为文章尚未经列宁同志审定。

约·斯大林

1923年4月16日晚10时

① 指列宁在生前口授的几篇文章。

有关托洛茨基和 46 人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23 年 10 月 26 日)

斯大林：对一些声明的几点实际意见。

(1) 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不仅在对某些工作人员的迫害方面，而且在事情的原则性方面都存在着分歧。我不明白，因为没有发生过大的分歧。

(2) 为什么政治局委员对是否出版列宁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犹豫不决？索斯诺夫斯基的行为令人费解。事情是这样的，文章中有三处提到分裂的危险。政治局担心党被引入迷途。而政治局里连一点儿分歧的迹象也没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全体政治局委员关于根本不存在分歧的通告信连同列宁的文章一起发送给各省委。

(3) 托洛茨基说，根据[代表大会]决议，不需要党的经济问题委员会。但决议指的是临时委员会。工资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作临时委员会。一个星期前，任命了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难道可以没有这些委员会吗？

(4) 关于书记干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分配军队指挥人员的问题。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谈到这一点。我们问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回答说不存在分歧。

现在谈谈有关托洛茨基和 46 人的问题。

奥新斯基说：“我们在自发势力的浪潮中颠簸”。托洛茨基说：“我们陷于危机，没有计划，我们没有控制住自发势力”。危机是新经济政策的必然因素。你们不懂新经济政策。刚遇到点困难就哀号起

来，以后困难还多着呢。

关于价格的分歧。你们研究这个问题了吗？“剪刀差”^①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农业。工业产品少，粮食多。出口我们暂时又做不到。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无济于事。

剪刀差的另一个原因是，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亏损。

第三个原因；托拉斯和辛迪加是垄断者。“我定出价格，你要不买，就没处可买”。这一点必须改正，应该对此加以注意。

难道有谁反对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吗？托洛茨基常常因为对问题没有充分研究而弃权。要是我们也弃权呢？结果会怎样？不能对理论问题采取弃权的办法。制定一个必须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动纲领是可笑的。

索斯诺夫斯基认为，如果我们把农业机器“零售”给农民，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这连沧海一粟的作用都起不到。必须进口大工业品，但这需要钱，而我们又面临着战争。

你们不是帮助讨论这些严重问题，却纠缠不休地要制定行动纲领。在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中我没有听到一条具体建议。

中央正在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书记的党龄和上级机关批准任命的问题^②。这是对民主的限制。清党就是党的一半人清除另一半人。这也是对民主的限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使党免受新经济政策影响的措施。

民主派们，请告诉代表大会，这种使党免受新经济政策影响的做

① “价格剪刀差”是指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在价格上相脱节。

② 根据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党的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党员，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党龄。同时，省和县的党委书记应由上级党的机关批准。

法是不必要的。让我们看看代表大会会不会答应你们。而我们只是执行代表大会决定、向它汇报工作的机关。

没有争论，雅柯夫列娃这样说。如契诃夫市的一位妇女说的：“请给我造成这种气氛”。常常有这种无暇进行辩论的时候，从地方上来的同志讲，现在各个省委都面临着成堆的经济问题。党被埋进了解决琐碎问题的大量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中。现在想进行辩论就是犯罪。从未发生过有人向中央建议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议而遭中央拒绝的情况。46人集团提出问题只是为了掀起一场风波，并不是想认真讨论问题。

中央没有掩盖任何经济问题。关键不在这些问题，而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集团没有利用党内可允许的途径解决问题并越过中央致信党员。他们在这里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对主要问题，即我们为之聚集在这里的问题，只字不提。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没有利用合法途径帮中央改正“错误”，而是越过中央致信党员。

托洛茨基写道，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致信任何一个有足够修养的党员。如果托洛茨基用尽了一切帮中央纠正“错误”的合法机会，那他就是对，他就应该越过中央致信党员。但他并没有去做这些尝试。这就是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问题的实质。现在中央进行争论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都会对我们失去信任，敌人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的软弱。1921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争论^①，当时我们遭到巨大损失。

托洛茨基越过中央委员，制造派别斗争的气氛，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46人走得就更远了。

解决的办法是：我们不能再次尝试十大前夕的争论。当时是托洛

^① 指由托洛茨基挑起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争论作了总结。

茨基挑起争论，他拒不执行列宁关于在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中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种情况又重演了。托洛茨基再次采取行动，造成了使我们面临分裂威胁的气氛。必须这样评价托洛茨基的行为并对他加以谴责。必须保证这样一种制度，使今后所有分歧都在委员会内部解决，不得外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04卷宗，第31—38页

原载苏联《苏共中央通报》
1989年第10期

答一张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便条

——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摘录（对问题的答复）^①

（1923年12月2日）

……[约·维·斯大林]一张与托洛茨基同志有关的便条写道：“请您谈谈，党员中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某封信的传说有什么根据吗？信的内容是什么？别再保密了。请通报一下。”同志们！尽管我特别想说，但是我不能通报托洛茨基同志十月全会前写的那封信的内容。还有一封46位同志的信，在这些同志中也包括斯图科夫同志。有关这两封信的内容我无权告诉大家，因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决定^②，有关这两封信的内容和信中提出的要求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的决定不向全党通报。

（有人喊道：对很多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很多人都已知道此事，对此我很遗憾，但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决定，无论是这两封信，还是政治局的答复都不能通报。除托洛茨基和46位同志的两封信外，还有政治局委员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在上面签名的有李可夫、加里宁、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加

① 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的任务》，发表在1923年12月6日的《真理报》上，对问题的答复当时没有发表（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34—244页）。

② 这里和后面指的都是1923年10月25—2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定（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0期第188—189页）。

米涅夫^①。列宁和鲁祖塔克同志缺席，后来鲁祖塔克到会后也赞同这个答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以绝对多数赞同政治局的立场：102票赞成，2票反对，10票弃权，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同志和46位同志的行为。其余情况我无权通告大家。（鼓掌）

现在我谈谈罗森贝格^②同志。她说她非常了解中央的情况，比中央自己还了解。瞧，她非常清楚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都做了些什么。据她说，大家都知道。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大家都知道。她说我们的制度不中用，说我们扼杀党的思想，说好像全会反对民主等等，没有她不说的。我真弄不懂，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

罗森贝格：是从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中。

斯大林：我不知道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我没看过。但是难道根据一个人的报告就可以指责整个制度吗？十月全会上决定的并不是罗森贝格同志说的那些问题。十月全会面对的问题是，超越一定的辩论界线，就意味着建立派别，意味着分裂政府。而分裂政府就意味着毁灭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当时的问题，罗森贝格同志。辩论是可以的，但不要使辩论发展到组织帮派，使帮派发展到建立派别，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党内的派别将会导致政府的分裂，使内外敌人欢欣鼓舞。有鉴于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谴责了一些同志。这就是这次全会的情况，而不是所谓的全会反对民主。

原载苏联《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12期

① 指九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923年10月19日对托洛茨基的答复信。签署该文件的人中斯大林漏掉了托姆斯基。

② 罗森贝格是斯维尔德格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

对于谎言和诽谤必须用真相进行反驳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23年12月8日）

致中央政治局

下面在引用我在普列斯尼亚区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①速记记录摘录时，我认为有必要声明如下：

（1）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声明中从未经我审阅的我的报告的速记记录中摘用引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未经作者本人审阅的速记记录中常常会有许多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

（2）我承认，我向普列斯尼亚区的会议通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声明这一问题的决定的情况，是违背全会关于对决定保密的决议的。但是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为党内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和破坏分子在党员中间大力散布有损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威信的谣言。党员中传说，有关托洛茨基同志患病的通告与事实不符，托洛茨基同志因在十月全会上要求实行党内民主而被政治局软禁（我在作报告时对一张关于托洛茨基同志患病的条子作答时的声明，遭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讥笑和质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罗森贝格同志在发言中直截了当地声称，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的信不是秘密，托洛茨基同志是因为要求民主而遭非难，似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反对实

^① 见前面斯大林1923年12月2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摘录。

行民主。这些荒谬传言是由于下述情况造成的：

1、尽管中央有禁令，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的文件还是在党员中得到广泛扩散，可是政治局委员对这些文件的答复^①和全会的决定，却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严格保密；

2、46 人的拥护者没有采取措施来杜绝这些荒谬传言和制止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的文件在党员中扩散，尽管只有他们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些文件的扩散，因为这种扩散就是 46 人中的干的人干的；

3、辩论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不想破坏全会关于对那个决定要保密的决议，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不得不报以沉默，这样就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并且造成一种假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害怕说出实情，他们心中有愧。

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并且不可能不导致破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员心目中的威信，使党内那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得到满足。

我认为，对于谎言和诽谤，除了用真相进行反驳外，没有其他方法。为了保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免遭谎言和诽谤的攻击，唯一的方法就是说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决定的实情，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

约·斯大林

1923 年 12 月 8 日

原载苏联《苏共中央通报》

1990 年第 12 期

^① 指俄共(布)中央九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3 年 10 月 19 日对托洛茨基的答复信。

八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声明

（1923年12月14日）

给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 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向全党提出了当前的复杂任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非常清楚，党的领导机关无论是在通过决议，还是在后来贯彻决议时都应团结一致，这是党顺利完成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和最现实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签署本声明的人无论是在制定决议的分委员会中，在政治局工作委员会中，还是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都力争达到意见一致。

毋庸置疑，在对决议进行表决时所达到的意见一致得到了全党的欢迎。党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内民主问题作出意见一致的决议是党痛苦最少地过渡到党内民主制度的保证。

托洛茨基同志先后在工作委员会和分委员会讨论中央决议时，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在我们看来，这些修改意见无疑会给过渡带来痛苦和危险。托洛茨基同志力图用自己的修改意见使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具有不仅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而且谴责党的整个机关的过去所有行为的性质。同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对所谓的党内“派别”进行旗帜鲜明而坚决的谴责。

我们也十分清楚，托洛茨基同志试图用自己的修改意见破坏中央

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 102 票赞成 2 票反对 10 票弃权认定，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和 46 人的信是搞派别活动和威胁党的统一的“严重政治错误”。

无论是在政治局工作委员会内，还是在分委员会内我们都曾想方设法劝说托洛茨基同志放弃部分修改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把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从党内和平的工具变成党内斗争和破坏党的领导机关威信的工具。

托洛茨基同志收回了部分修正意见，从而出现了一致通过决议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托洛茨基同志的令人十分忧虑的（从齐心协力贯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这个角度来看）行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同志便越过中央委员会致信莫斯科各区会议，接着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新方针》一文。我们认为，该文就其内容而言是在破坏那个由于托洛茨基同志放弃了他的修正意见后才得以一致通过的决议。

这篇文章的实质内容是：（1）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2）挑唆党内青年反对党的基本核心，（3）破坏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威信。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政治局的决议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已着手在作重大的转变。”托洛茨基同志需要这种有意夸张的说法，目的是为他以后作结论而用，但是这种说法却给党指错了方向。毫无疑问，诸如起义的决定、承认布列斯特和约、改行新经济政策等重大关头，才是党的历史道路上的重大转变，而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并不是什么“党的历史道路上”的重大转变，而只是党内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有助于党完成它的真正的历史性重大任务。托洛茨基同志有意使用这种夸张说法，无非是为他今后攻击党的机关，攻击党中央机关的政策做准备。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把“机关的作用”和“党的首创精神”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不能允许的，危险的。托洛茨基同志简单地表述了党的任务：“党应当使自己的机关服从自己。”这样提问题显然是错误的。不能把“机关”和“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对立起来。认为机关到现在都没有服从党，没有成为党的工具，认为党现在应当进行斗争以使党的机关服从党，这样的论点是不能容忍的。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在露骨地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下”建立秘密集团“是过分加强机关集中制的结果”的论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不能允许的。向全党论证这一点就是间接地证明米雅斯尼科夫之流是正确的，从而向党隐瞒了真正原因和作为成立诸如“工人小组”和“工人真理派”等小集团的基础的真正客观矛盾，这些小集团的目的就是要激起对党机关的仇恨。

所有这些论点和夸张说法不可能不在党内（托洛茨基同志给党写了一封信）造成对党机关普遍不满的氛围，这些论点和夸张说法只不过是在广义上套用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用“撤职”和“惩罚”党机关工作人员的口号补充决议的最初建议。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试图要党相信，现在的党机关只是“从形式上准备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实际表述中对机关问题的提法，显然是用挑唆党反对自己的机关来取代中央委员会号召的为改善党的机关而进行的经常性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俄共中央的信中关于“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主义方针的最集中表现”的声明是他整个理论的顶峰。我们完全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就机关问题写给党的信是在暗示自己的真正思想，即中央委员会和目前的党机关是没有受到党信任的“官僚主义的机关小集团”。

我们不能不认为，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发表这样的意见就是对齐心协力贯彻执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的蓄意破坏。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给俄共中央的声明中说：“十月全会谴责的正是两个月后的今天政治局认为必须接受的东西。”这是对事实最拙劣的歪曲，因此我们不得不还这些事实的本来面貌。

10月8日，托洛茨基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在将此信提交给中央和中央对此信进行讨论之前，可以让一些党员了解信的内容。这封信对中央的整个政策进行了攻击。中央在收到托洛茨基同志这封“信”的同时还收到了一份46人声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集团），该声明在党内广为流传以征集党员签名。这份46人声明基本上重复了托洛茨基同志“信”的内容，在该声明提交中央之前托洛茨基同志就已知道了这个声明，声明说中央“正在使党和国家走向灭亡”。

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了解了这两封信的内容之后，立即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到的所有问题从本质上详细地作了答复。政治局委员们在这一迫不得已作出的答复中，列举了所有臆造出来的、牵强附会的意见分歧，同时准确而鲜明地指出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答复的最后是下面几点结论：

“托洛茨基同志的宣言中生拉硬扯地摆出许多虚构的杜撰的‘分歧’，而真正的分歧（择其要者）则有以下这些：

（1）在经济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懂得这方面的发展速度问题，净给党找麻烦。他要求实行体现在托洛茨基同志一柯列加耶夫同志的经济独裁中的、将导致党脱离工人阶级核心的那种简单的“强行集中”。

（2）在对外政策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把“意志冲动”政策强加

给我们，这样的政策会使国家卷入军事冒险，这种冒险必然导致在农民当中完全丧失政治威望。

(3) 在党内政策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成了我们党主要干部的所有反对者的中心。

(4) 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党及党内生活，看来，他也不可能搞清楚这一点。由此便产生了他的诸如“省委的奥勃洛摩夫习气”的“简要”鉴定，产生了他对地方党组织的不信任，产生了他在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的危险的错误，这些错误完全有利于我们党的政敌。

(5) 在农民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止一次地犯根本性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这一点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麻烦。

(6) 在军事工作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排斥那些优秀的军内中央委员，削弱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使其脱离党。

(7) 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了党的统一。

这是我们之间真正的分歧。

与此同时，政治局面临着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是否同意以两个纲领（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和政治局委员们的答复）为基础，立即在全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面前广泛展开托洛茨基同志与整个政治局之间的争论，或者另辟蹊径，使党在德国共产党人计划起义之前有望避免党内斗争。

政治局不可能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展开“两个纲领的争论”的责任。46人声明也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一致决定把是否允许就两个纲领进行争论的问题提交党的最高机关决定，并立即召集了有十个最大的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紧急全会。

这次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的声明，以 102 票赞成 2 票反对 10 票弃权通过了以下决议：

“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世界革命和全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尤其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认为，托洛茨基同志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党员书的办法，而没有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同志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同志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46 人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坚决斥责 46 人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步骤也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这项声明有使党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会议意识到，政治局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禁止传播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矛头正是指向政治局的信。会议认为，政治局在放弃了将争论转向广泛的争论的计划并召集了紧急全会之启，选择了一条保持党的统一的绝对正确的道路。会议了解所有的材料，现负责停止已开始的派别争论。会议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可谓短兵相接的时期（德国事件，可能发生的战争）。有十个党组织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坚信，他们禁止目前就行动纲领进行派别争论是反映了全党的意见。”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党就无法行动。

至于民主问题，那一次十月全会在没有进行任何争论、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及时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并完全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强同浪费现象和新经济政策对个别党员的腐蚀影响作斗争的建议。

“政治局对这些问题制定必要措施后应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作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在这些事实面前，托洛茨基同志所谓“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主义的最集中表现”和“十月全会谴责的正是政治局目前所接受的东西”的论点显然是弥天大谎，其目的就是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威信，不让党员了解情况，因为根据这次全会的未被取消的决议，中央不能向党员讲明全部实际情况。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便扩大了进攻，他把青年同“体现着党的实践经验和党的革命传统的老一辈”对立起来。所谓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的说法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所谓青年即被我们集中到工农速成中学和高等学校的青年，应该被看作是党内的晴雨表，中央委员会应根据这些人来确定行动方向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对中央和全党来说，能够和应当成为晴雨表的，不是这些党内被置于完全特殊条件下并正在经历着特殊过程的人，而是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主要部分。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利用他这一理论上错误的论断试图日后通过把青年一代同党的基本核心对立起来而破坏该核心的威信，说这个核心正在“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

明确地暗示“马克思的学生”“已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当然也是为了破坏党中央的威信，这些机关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列宁同志真正的直接学生。托洛茨基同志可以不喜欢这些机关里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类比和暗示布尔什维克主要干部已蜕化成机会主义者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这些干部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而托洛茨基同志多年来长期同机会主义分子携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写给全党的信中并未涉及派别问题。然而我们大家非常清楚，关于党内派别自由问题是中央委员会制定决议时的主要分歧点之一，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近期党的所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公布之后，原民主集中派就不停地并且十分真诚地声明，说他们对党的看法同托洛茨基同志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声明他同46人集团的见解完全一致，并在他给中央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了这一点。然而，正是这个以萨普龙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尼·斯米尔诺夫等人为代表的46人集团在所有的会议上都坚持必须允许派别自由，否则党内民主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工作委员会内坚决反对把谴责派别这一点写进决议中，并且声称，将类似的补充内容写进决议必将使他对整个决议投反对票。因此，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点上所采取的立场使得组成46人核心的原民主集中派有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是他们的领导。

经过托洛茨基同志发挥并在他对党机关即党的基本核心及派别自由问题的看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整套观点，显然偏离了我们党多年来一直赖以生存的组织原则，同时，这整套观点中也包括许多报纸上司空见惯的东西，近几年来报纸不断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制”、“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制”和“布尔什维克的官僚主义”。假若党依照托洛茨基同志的指示开始实行党内民主，那么党早就瓦解并变成某种类似于第二国际中的由一些联盟、集团和派别组成的孟什维克党了。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便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决议一致通过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同志就向党提交了一篇文章，该文实际上是对齐心协力地贯彻执行一致通过的决议的破坏，并在转向新轨道时引起托洛茨基同志提到的、我们千方百计想回避的派别骚动。我们之所以没有把托洛茨基同志的表现问题提上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只是担心在目前

形势下立即讨论这个问题会给党实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造成困难，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把下面的情况通报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给党的信中的声明（1）理论上是错误的，（2）在实现工人民主方面给党指错了方向，给有计划地实行党的原则带来危险，（3）破坏了中央委员会所取得的一致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是保证最无痛苦地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

我们希望，托洛茨基同志在他今后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发言中提一些使他的立场与党中央的立场接近起来的修正意见。

布哈林
季诺维也夫
加里宁
加米涅夫
莫洛托夫
李可夫
斯大林
托姆斯基

1923年12月14日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第51全宗，第1目录，第21卷宗，第52—62页

托洛茨基挑起了反对我党主要干部的争论

——致基洛夫的信^①

(1923年12月17日)

致基洛夫同志

近日来，莫斯科的争论变成了令人不快的勾心斗角，日益激烈的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某些原则性论点，而是关于个别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同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等人在原则问题上遭到失败后，现在竭力在自己的发言中证明：问题不只在于实行民主，而且在于把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鉴于这种情况，政治局公布了一项决议^②，驳斥了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同志的恶毒传闻，建议各级组织不要脱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中所制定的争论原则。

与此同时，彼得堡组织在《真理报》发表声明，从实质上批评了托洛茨基同志那封著名的信（《新方针》^③），并且声明道，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积极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见随函所附的彼得堡组织的声明）。

我们认为，我们各大组织，如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

① 基洛夫（科斯特里科夫），谢·米·，1921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斯大林也给克·叶·伏罗希洛夫、埃·约·克维林，阿·伊·米高扬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等人发去了同样的信函。

②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12月17日《关于党内斗争尖锐化》的决议，该决议刊登在12月18日的《真理报》上。

③ 指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给代表会议的信）》一文，该文刊登在1923年12月11日的《真理报》上。

巴斯、罗斯托夫、巴库、梯弗利斯、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组织必须作出反应。按我们的看法，应该效仿彼得堡组织的声明，形式可以稍加改变、内容简化一点，口气缓和一些^①，在支部委员会或积极分子大会上通过，并立即将决议发往《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此事须立即完成。对托洛茨基同志挑起的反对我党主要干部（见托洛茨基的《新方针》一文）的宣传鼓动，我们各大组织不能不予以回答和反击。

敬礼！

约·斯大林

12月17日

附言：彼得堡人的声明将于明日见诸《真理报》。请转告谢尔戈让他在梯弗利斯组织中也通过类似的声明。

约·斯大林

① 下划线是斯大林加的。

九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

（1923年12月31日）

绝密

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及 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同志
1923年10月24日的信^①的答复

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人至今未对托洛茨基同志10月24日的信作过答复，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定会结束这场争论。现在看来，在这点上我们错了。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在尽一切可能深化这场争论。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把他10月24日的信重新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因此，我们不得不开来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

第1章 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是派别斗争的武器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摸不透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给中央写了那么多的宣言和信函？只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才完全清楚了这些文件的目的。

① 此信写于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于10月24日收到。

尽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致决定，46名托洛茨基同志的追随者的信和他本人给中央委员的信同联席全会的决定一样，只限中央委员会知道，但是这两封信还是广泛流传开来。在莫斯科，似乎找不到一个没看过这两封信的斯维尔德洛夫人^①。在乌克兰，正像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正式宣布的，这两个文件正在军队中广为流传。从高加索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46人的信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早在中央全会讨论这两个文件之前就在莫斯科市很多区广泛流传。无需成为预言家就可预知：这两个文件很快就会出现在国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刊物上。

托洛茨基同志的追随者在传播这两个文件时，向全党隐瞒了政治局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和46人的信作出的答复，隐瞒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今年10月曾审议过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的声明，并以102票赞同2票反对10票弃权谴责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的行为是派别行为。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想利用这种方法哄骗青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是谁在传播这两个文件呢？是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为什么他们要进行这种传播呢？就是为了散布对中央多数派的不信任，而中央多数派又被自己作出的应把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争论限制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这一决定捆住了手脚。

这种派别斗争方式很像统一的（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最尖锐的派别斗争时期的斗争方式。当时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我们党恐怕不会允许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长久使用这种方式。

第2章 关于“臆造出来的” 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列宁路线的“传闻”

^① 指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 10 月 24 日的信中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是“多数派制造了关于我（即托洛茨基同志）的几乎是反列宁的‘恶闻’”。

不错，我们是公开声明过：事实上的确是一方面中央多数派在继续奉行列宁同志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则在进行反对这一政策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列宁同志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的那些特有财产是同列宁主义誓不两立的。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我们分歧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又在哪些方面偏离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基本路线呢？

我们完全同意我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看法，编辑部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如下：

“十月革命后，我党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布列斯特危机、工会危机和目前的危机。在党的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托洛茨基同志都犯了错误。必须‘冷静地仔细地深思这个问题’，设法搞清楚他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只有彻底琢磨透这一根源，才能及时纠正从过去的事物中不可避免地延续下来的各种倾向。

“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同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在哪里呢？其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陶醉于未来蓝图、迷恋于漂亮的纸上空谈的计划。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者就描绘过这样的蓝图，但他们看不到天才的列宁神奇地看到的糟透了的现实。首先，他们没有看到既不希望打仗，也不可能和不愿意打仗的农民。

“工会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同样是上述那些错误。他们绘制了一幅结合工会、整刷（根本改变）工会、使工会适合‘生产民主’的美好的生产蓝图。但是这一蓝图是实现不了的，尽管它绘制得非常精确、非常清楚。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这一政治路线与现实不符。

“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居民的主要群体——农民曾大声疾呼：坚决要和平！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休息，哪怕是喘口气。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或者鼓吹进行革命战争，或者强迫人们接受毫无意义的**不战不和**的方案。

“工会争论期间，国家要求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枷锁，可是工会的一些人却向国家建议**拧紧螺母**。可见，问题仍然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首先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忽略这种心理状态，无产阶级就无法在我国执掌政权。

“目前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歧也出于同一基本原因。这些分歧早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中央工作时就已存在了，后来这些分歧一直没有消除。托洛茨基同志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缺乏有计划的工作。他认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灭亡’。托洛茨基同志也正是在这一方面**顽固地、不断地**指责整个中央委员会。

“不言而喻，这种‘灭亡’只能出现在托洛茨基同志热昏了头的派性想象中。不言而喻，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不会对加强工作的秩序和计划性表示反对。但是中央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极其危险的过火行为**。中央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计划要想成为切实可行的而不是空谈的计划，要想有活力，而不是遭受第1042号命令^①的命运，就必须极其慎重地加以制定。中央认为，与托洛茨基同志相反，我们不能再谈‘工业专政’，正如列宁教导的，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工业**，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目前分歧**的根源。试问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罢了。

“当然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可是这

① 指托洛茨基1920年5月对交通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命令。

个计划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况。这里主要还是对农民的实际情况估计不足。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所犯错误的根源的根源，就是对列宁主义的偏离。

列宁用新的语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极其明确地提出（理论上）并解决了（实践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他们的联合、他们的经济政治联盟等问题。

“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偏离了列宁主义，原因在于他过去的整个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独特看法。

“从我们目前的争论以及托洛茨基同志最近那篇文章^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托洛茨基、萨普龙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集团是怎样在党内政策问题上有意无意地背离列宁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般组织原则是什么呢？坚如磐石、团结一致一向是我们这个党的特点。我们的党及其组织属性明显不同于机会主义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它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党从来都不是而且我们相信也永远不会是彼此达成协议的各种集团、小团体、帮派和‘流派’的联盟。相反，与‘不容异见的’、‘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温和的党派有极大的‘发表意见的自由’、‘组织小集团的自由’和‘结成派别的自由’。就在不久前，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时，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还在炫耀他们的这种‘宽容’，说他们之中有公开支持白卫分子的派别，有‘行政中心派’，有左派，有中派等等，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孟什维克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要知道，

① 指托洛茨基发表在1923年12月28日《真理报》上的《新方针。小集团和派别组织》一文。

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党是一支团结的‘钢铁大军’，在意志上达到了最大的统一，我们党的传统做法是：所有不同的意见都汇总归一，而不是把党分成相互争斗、互相削弱的帮派。

“既然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现在背离了这一组织传统，那么他们也就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传统。当然，所有传统包括列宁主义传统都可以进行嘲讽，但是这种嘲讽应当是直截了当的、公开的。当然任何传统都不可能是绝对永恒的，但是应当作出说明、解释和论证：为什么说列宁主义在这一点上已经‘过时了’。我们认为，列宁主义没有过时，因为我们党依然在战斗岗位上，依然被敌人包围着，所以我们的党必须像从前那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很重视党的机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主义对机关的毛病（包括它的官僚作风）就可以或者是视而不见。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从来都没有把党同机关对立起来。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看，这样做是无知透顶的，因为没有机关的党是不存在的。如果把党的机关取消，党也就变成了分散的人群。与此相反，孟什维克，比如说，一向以‘民主派’自居，蔑视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孟什维克在维护党内群众的主动精神反对机关的幌子下，保护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工人政治家’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机会主义涣散状况。

“可以而且必须坚决反对机关的各种毛病，因为这些毛病也反映了党的毛病，但是把党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背离列宁主义。”

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的十大前夕采取的立场和现在也就是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不久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在民主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似乎来了个90度大转弯，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托洛

茨基同志十大前后发表的所有演讲，无疑就会发现这些演讲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在我党十大前夕，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从上面整刷列宁的工会工作者核心和永远保持对党的军事管理方法的官僚主义口号来反对列宁主义。现在，也就是我党十三大前夕，托洛茨基同志又根据“从下面”整刷列宁党的机关的主要干部和一般党员这个原则，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的口号。就在前不久，即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托洛茨基同志刚一觉得在民族问题上似乎要出现巨大分歧，便赶紧利用了这方面显露出来的裂缝。凡是留心托洛茨基同志这一时期的讲话的人都清楚，托洛茨基同志不惜“利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挑动年轻的少数民族党员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主要核心。总之，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所有的理由、所有的办法、所有的行动纲领，只要能动摇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能打击列宁的俄共的主要干部，就都是好的。目前托洛茨基同志挑动年轻党员首先是青年学生反对列宁党的主要干部的行为，归根结底也属于这种情况。

党如果想在托洛茨基十大前和现在的观点中寻找什么完整性和一贯性，那是白费力气。工会国家化、有名的官僚主义“结合”都与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很少沾边，这就如同目前“真正的”民主与托洛茨基同志理解的工业“强行”集中不太沾边一样，在这点上托洛茨基同志倒是前后一致。这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完善的路线，这是“意志冲动”的表现，是为某种能够把党内相当一部分人聚集到托洛茨基同志“政策”周围的行动纲领而奔忙。

在列宁同志生病前，也就是列宁同志直接领导政治局工作的那段时间，情况就已经极不正常了。政治局那时所以不能安静地进行工作，就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把一些派别活动和闹独立性的因素带进了政治局，而自列宁生病时起，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

托洛茨基同志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在抱怨政治局的工作缺乏计划性。但是，如果说应该有人对政治局过去是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

然是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进行工作承担罪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一连数月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同志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还是列宁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英语辞典，并且几乎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在学习英语以表示对会议的抗议，只是有时停下来，尖酸刻薄地插上几句如政治局的工作杂乱无章一类的话。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一方，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竟不止一次地发生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由于局面极为紧张，列宁同志越来越经常向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人建议用电话表决的方式来解决某一问题，只为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冲突等。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 10 月 24 日的信中试图把列宁同志关于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是枉费心机。这不是小事，这是列宁同志想通过将托洛茨基同志调往乌克兰，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气氛的一种尝试。列宁只是在多次劝告托洛茨基同志参加政治局的集体工作而毫无结果后才不得不提出这种彻底摆脱困境的办法。

第 3 章 经济问题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 10 月 24 日的信中，引用了“与列宁同志”涉及某些问题的“内容相当丰富的书信”。这些“内容丰富的书信”不过是列宁同志的两三封便函。这样的便函在每个人民委员那里都能找到几十张。如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援引列宁在某一点上同意他们的看法的所有书信和便条或者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的文章和便条的话，那可就远远不止两页纸了。托洛茨基同志引用这些“内容丰富的书信”，看来是因为他自己也认为，列宁例外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形是很特殊的。

在关于能否准许托洛茨基同志担任经济工作的问题上，列宁同志始终毫不妥协。他认为，不能委派托洛茨基同志负责共和国的经济工作。我们也同意列宁同志的意见。有名的第 1042 号命令的发起人就是当时担任交通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同志，该命令显然过高地评价了纸上的“计划因素”，是一个不懂行的命令。当这些铁路掌握在托洛茨基同志手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列宁同志那样如此为共和国铁路的命运担忧，也没有一个人像列宁同志那样多次倡议把托洛茨基同志从铁路工作中调开。当托洛茨基同志试图给自己建立一个经济管理工作的代用品即有名的莫斯科手工业管理局的时候，列宁同志甚至一连几个月同托洛茨基同志这个小小的“经济工作”打算作斗争，列宁同志多次当着托洛茨基同志的面或在其缺席的情况下详细地论证，如果采取托洛茨基同志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只能被毁掉。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列宁同志坚决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列宁同志在 1922 年 5 月 6 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道：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根本不对，而且对自己所批评的事毫不了解，简直令人吃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毛病不仅不是学院气，恰恰相反，而是被大量非常细小而紧迫的‘杂务’所缠……”

“1922 年 4 月 23 日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二个文件的内容是：第一，非常激动地、然而极不正确地‘批评’了政治局关于成立财政三人小组……的决定，说它是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之间的障碍。把这种批评送给副主席，是不符合任何国家工作的要求的，既不符合有计划的国家工作的要求，也不符合多少有组织的要求。”

“第二，这文件还有一个内容是指责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学院气，这种指责同样是根本不正确的，完全违背事实的。”

这就是列宁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作用的错误

看法的评价。

这些分歧主要在于托洛茨基同志根本不懂得我国农民的作用和农业经济。托洛茨基同志竭力争取的“完善”计划，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他的“计划”有个“小小的”缺陷，即计划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犹如他那有名的第1042号“计划性”命令一样。而列宁同志和我们，他的所有最亲密的拥护者，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只有仔细考虑到我国农业所起的巨大作用，才能制定出实际可行的计划。1923年前，也就是在整理财政、建立预算基础和积累机动基金之前，关于“机动灵活的”有计划的工作问题在很大程度悬而未决。只是近来才为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实际作用创造了先决条件。政治局也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他最后的信件中同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的行政管理权限问题上向托洛茨基同志让步^①。但是行政管理权限问题只具有非常次要的意义。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列宁同志在任何情况下基本上没作过也不可能作出让步，原因很简单：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忽视农民的作用，再三背离布尔什维主义原则。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当提名托洛茨基同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时，列宁同志在1922年12月27日口授的便函中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人选，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到我们不应该赞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时，指的正是托洛茨基同志。列宁生病期间，一些同志为了改善中央内部的关系，有意设法推举托洛茨基担任经济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认识到，我们当

① 指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文章建议提高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科学鉴定委员会的作用，在这个委员会中“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4—348页）。

中赞同这种做法的人是不对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第4章 对外贸易垄断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搞清楚了。但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集团又固执地扯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只好再来谈谈。1922年12月，中央全会在列宁同志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几项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列宁同志不同意这些决定。当时绝对没有说要取消对外贸易垄断。中央全会对此连想都没想。中央全会只想试着临时开放一两个港口（就像当年相对开放巴统一样），自由进口一些绝对必需品，特别是加快出口库班多余的粮食。列宁同志得知这一决定后，对此提出异议，并使我们相信，此决定需要重新审查，对此下次全会一致通过。托洛茨基同志引用的那张便条就是列宁在这两次全会期间写的，当时列宁同志可能感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会出现严重分歧。

从那时起，政治局内部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中央在这方面执行的路线取得了极大成功。政治局在有计划地分工时，我们有意识地把监督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委托给托洛茨基同志，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对政治局的这一委托干脆一点没做。

第5章 民族问题

在筹备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极其困难的过程中和重新提出民族问题的时候，我们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核心中似乎真的产生了某些分歧。最初我们同列宁同志，特别是列宁同志同斯大林就筹备建立苏联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毫无疑问，如果不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染重病，我们会百分之百地达成协议。然而正是因为不能同列宁同志本人进行交谈，而后来连通信都不可能，所以才产生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主要表现在对众所周知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内发生的冲突的评价方面。所有这一切也就引发了列宁同志那封著名的信^①。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由斯大林同志起草）。中央委员会还一致通过了著名的民族会议的决议。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两个决议都投了赞同票。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可是为什么要围绕着这两个已被一致通过的决议再次挑起争论，而且还错误地说在这件事上似乎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呢？这种做法只能是出于派别考虑。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像在民族问题上这样自打耳光。托洛茨基同志及其集团一口咬定，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他们的政治对手当中，问题都是用某种小集团的方式解决的，然而全党都看到了我们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确实一分钟也没向全党隐瞒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看法。我们当然把列宁同志的信看作是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财产。在此次大会上，我们某些签署本信的人之间曾发生过公开的、相当尖锐的争论。十二大的决议完全是本着列宁同志的精神通过的。对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

十二大后不久，政治局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召开了一个少数民族党员会议，会议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贯彻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格鲁吉亚的冲突早已消除。民族路线在格鲁吉亚得到完全贯彻。然而，直到现在托洛茨基同志还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挑起冲突。究竟谁有小圈子习气，请党评判吧。

^① 指列宁那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各代表团宣读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9—355页）。

第6章 列宁同志关于改组工农检察院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

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24日的信中试图杜撰一个当代传奇故事：只是在他的努力下，列宁同志的文章才得以发表。这真是欲盖弥彰。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由于错误或者疏忽寄给了当时正好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这一做法使政治局委员感到不理解。古比雪夫同志已经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专门作了说明，说托洛茨基同志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他想把列宁同志的文章束之高阁，纯粹是恶意造谣。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当一弄清列宁同志的文章不是寄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而是寄给党中央并且确实想发表时，我们便决定立即发表。但是几周后在中央全会上，当提出实际贯彻列宁同志的计划时，正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在党内建立两个中央（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这一完全反列宁的方案。而且正是托洛茨基同志一发现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不会维护他的派别活动，便在这两个机构刚开始工作就攻击它们。

第7章 对外政策

我们曾指责托洛茨基同志：（1）在寇松发出最后通牒后，他怂恿政治局采取一种冒险政策，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同英国关系破裂；（2）在波兰政府不愿承认苏联和德国事件正在发展期间，托洛茨基同志更是怂恿政治局采取一些考虑不周的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在德国发生重大事变之前就导致同波兰关系破裂，甚至发生军事冲突。

这些指责依然有效。事情并未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就英国问题的建议遭到政治局否决后积极地参加了政治局给寇松的复照的起草工作而

发生变化。在同波兰的冲突中，政治局不得不直接推迟发布由托洛茨基同志制定的给军队的命令草案。政治局这种坚定政策使得波兰政府不得不放弃自己不承认苏联的企图，同时由于柯普同志根据政治局委托转交的建议，波政府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第8章 托洛茨基同志在军队中的工作

同志们还记得托洛茨基在中央九月全会期间是如何表现的吧，当时中央全会鉴于即将爆发的战争的危險，决定加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吸收一些久经考验的军内中央委员进入该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退出了中央全会的会场。全会只好派了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见托洛茨基同志，建议他返回全会会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同志还是拒绝返回会场。

这又一次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方面远没有把事业利益放在那些次要的理由之上。中央重视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合作，并坚持让托洛茨基同志留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结果却使中央至今一直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央的手脚被束缚住了，它不能采取它认为是对加强军事部门所必需的所有措施。这种状况大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了向党承担起军事方面的全部责任，中央必须设法在军事部门建立起较为正常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坚持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对军队的工作确实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过去，当前线的革命宣传鼓动任务为最首要的任务时，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做得多么有成效，可是现在，当需要做琐碎而细致耐心的工作时，他在军队的工作又是多么不能令人满意。每一个军事工作者都非常清楚，军队的供应情况糟透了，以斯克良斯基同志为首的现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小组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认真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和井井有条地致力于我们军队的工作。同时每个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都知道，中央认真加强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小小

打算竟遭到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仇恨，几乎被看成是分裂的理由。

第9章 不信任党，不了解党

我们指责托洛茨基同志不相信党及党的地方组织的创造力，他回答说，在内战困难的年代里他几乎同所有的省委会一起工作过。没有人要否定托洛茨基同志内战时期的功劳。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即红军是由党中央这个整体领导的。

托洛茨基同志不仅不相信我们党的创造力，而且也不了解这种创造力，或者说，可能正是因为不了解党的创造力，所以才不相信这种创造力。对我党的不了解也导致了托洛茨基在目前的争论中犯了错误，他恨不能对所谓的“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棒刑（解除职务以示“惩罚”），这些机关工作人员中有部分是党的主要骨干。

现在托洛茨基同志越是“解释”他那封关于《新方针》的信，就越使人看清，他不了解党，不信任党，不信任党的主要干部。

第10章 无派别人士的派别

托洛茨基同志直到现在还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派别行动纲领和企图建立帮派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0月24日的信中引用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必须坚决转向工人民主的一系列声明，“说他”（托洛茨基）的说法则比较“谨慎”。但这些引用的话完全是针对托洛茨基同志说的。这些话证实了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政治局早在今年9月时就认为必须转向工人民主，并且驳斥了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杜撰的所谓只是在他们的压力下政治局才决定转向工人民主的传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3年10月）谴责托洛茨基同志及其46人集团，不是因为他们建议（在政治局多数派成员之后）转向工人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一个派别行动纲领，臆造出7个不的“危机”并且开始组织自己的帮派。正是因为这种派别活动，也就是加剧党的分裂危险的行为，联席全会才对托洛茨基同志及其46人小集团进行了谴责。

46人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是有简单分工的，这一点早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召开期间就已经很清楚。联席全会期间，托洛茨基同志对他如何对待46人的信坚决避而不谈。但是后来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向我们正式声明，说他对46人的信负完全责任。这种分工一直延续到现在。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等人作为一个集团，他们的活动比较公开。托洛茨基同志自称是“无派别人士”，可是他却完全支持他们的行为，称这些派别分子是“模范党员”等等。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这种分工。托洛茨基同志长期以一直动摇于各种派别之间，现在终于与民主集中派为伍了，实际上他领导了这个派别。

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在莫斯科组织中挑起了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斗争。该集团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之一——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就变成了派别执行中心。像克里姆林宫学员警卫队和总参谋部支部这样的组织都得到了表示不信任党中央的建议。国家政治保卫局1500个基层组织也得到了类似的建议。每个人都清楚，在党管理国家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什么。该集团拥护者之一拉狄克同志竭尽所能，力图把反对党中央的斗争扩大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总之，反对党的派别斗争正在全力进行。

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24日的信中抱怨说，党内争论中出现了许多个人因素。但是我们这些关注目前莫斯科争论的人可以断言，我们还从未见过像托洛茨基同志的同盟者目前在莫斯科发起的对大多数中

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进行如此嚣张的个人攻击、诬蔑和诽谤。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不应对实际情况抱有幻想。只有全党起来最坚决地反对这些“派别骚动”，才能取得重大成果。党已经比较全面地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作出了答复。现在只看这个集团是否听取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了。

我们再重申一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坚决谴责托洛茨基同志及其46人集团的派别活动。同时，这次联席会议（我党最具权威的机关）决定再次建议托洛茨基同志真正参加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其他托洛茨基同志为其成员的国家机关的工作。

十月全会后，政治局多数派为了同托洛茨基同志建立较为正常的合作关系，再一次做出最大努力。我们为此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召开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托洛茨基的非正式会议，为的是在比较自由的氛围中预先讨论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问题。同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非正式会议我们召开过两次。两次会议都是我们发起的。在这两次非正式会议上，我们竭尽所能，力求同托洛茨基同志达成协议，消除他的成见，营造出同志式的工作环境。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未获得成功。托洛茨基同志照旧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他对政治局多数派希望营造正常的共同工作环境这一心愿并未采取任何响应措施。相反，现已完全查明：在联席全会之后的整个期间，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一直致力建立自己的集团，并准备用自己的集团击败莫斯科组织。

总之，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的行为完全证明了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同志搞派别活动的指责是正确的。其实托洛茨基同志那篇刊登在12月28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已经公开承认，他确实组建了一个集团。每个有经验的政治家都会从托洛茨基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现作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已经走得更远。他们不仅竭力使自己的集团成为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使它在

党内合法化。我们认为，无论哪一种做法，党都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

尼·布哈林
格·季诺维也夫
米·加里宁
列·加米涅夫
维·莫洛托夫
扬·鲁祖塔克
阿·李可夫
约·斯大林
米·托姆斯基

1923年12月31日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3期

托洛茨基的发言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致贝克尔的信

(1924年3月4日)

11436/C号

致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

负责核查萨普龙诺夫同志声明的委员会

主席贝克尔同志

对您 1924 年 2 月 11 日的询问答复如下。

首先我对因一个月休假而未能及时回复表示歉意。若在其他情况下，我是不会推迟答复您的询问的。

您的第一个问题：

“政治局是否曾经不打算发表伊里奇的文章，而打算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

我的答复：

政治局一致决定立即发表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在政治局会议上根本没有谈及，更没有建议印《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大概在政治局开会前的私下交谈时有过这样的议论，但是我没有根据确定。

您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确有此事，委员会请求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还是在私下交谈中提到的？”

我的答复：

政治局会议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文章印成《真理报》专页给

伊里奇看的没想，所以，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没有意义了。在政治局会议上之所以谈到是否发表伊里奇的文章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委员对伊里奇文章中关于中央委员会分裂的说法有些担心。政治局委员们正确地认为，伊里奇关于中央委员会分裂的说法会在全党中产生对中央委员会完整性的担心，因此，必须在发表伊里奇文章的同时，专门向各地方组织发一封信，说明伊里奇的文章中关于分裂的说法指的是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指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现状，目前没有理由担心分裂。正因为如此，政治局通过的不是一个决议，而是两个：1. 立即发表伊里奇的文章；2. 给所有地方组织发一封由政治局和组织局所有成员签名的中央委员会的信，说明没有根据担心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分裂。这封中央委员会的信当天就用密码发给各组织。随函寄上此信的复印件。

您的第三个问题：

“如果没有此事，请说明原因，为什么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会宣布此事。”

我的答复：

我想，原因在于党内激烈斗争造成的派别分歧。我党历史上不乏对党的领导上的可怕的诽谤。这里谈的正是这样的诽谤。托洛茨基同志去年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发言说，古比雪夫同志千方百计地把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搁置起来。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纯属对古比雪夫同志的诬蔑。然而这个诽谤却在到处传播。大概这个诽谤就是您所指的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声明的依据吧。大家会问，假设对古比雪夫同志的诬蔑符合事实，可古比雪夫同志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与政治局有何干系呢？但是盲目的派别斗争是不喜欢搞清楚这些细微之处的，而喜欢把所有的事都混为一谈，把诽谤说成事实。

至于吉格尔施泰特同志谈的关于中央委员的“秘密文件”和中央

委员会电报这些旨在破坏托洛茨基同志威信的消息，我作为中央书记应该向您声明，吉格尔施泰特同志的这个消息不是捏造就是作者出于派别利益而讲的胡言乱语。我请您，贝克尔同志，不要只相信我的话，而应严格审查我的这个声明，仔细了解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在中央档案馆中的电报和文件原件，询问瓦列伊基斯同志和基辅组织的全体委员，询问吉格尔施泰特同志关于他的消息的来源，彻底弄清楚这件事，以便使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24年3月4日

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伏龙芝、斯大林

(1924年12月10日)

斯大林同志

请您就这份文件提出您的意见。

伏龙芝

需要查明“托洛茨基是红军的领袖”这一措词的始作俑者，并给予处罚。一定要更换这一结论。

斯大林

这一措词当然需要更换，但我也喜欢“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领袖”这样的称呼。我考虑，对党来说，称领袖更好一些；而对范围相对较小的军队来说，不宜称呼领袖。干脆向全军介绍一下军队领导人的简历。

伏龙芝

托洛茨基与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的关系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5年6月17日)

今年5月8日政治局收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声明是写给《星期日周报》“埃里克·维尔涅”的，回答他的下述问题：出版了伊斯特缅的《列宁死后》一书，被资产阶级报刊广泛引用，其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描绘成“阴谋的牺牲品”，而此书的读者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托洛茨基对民主和贸易自由怀有好感，为此埃里克·维尔涅请求托洛茨基作出相应的解释供该刊发表。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发表在1925年5月9日《真理报》第104号上。我个人那时没有注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因为对伊斯特缅的书没有概念。

1925年5月9日，英国共产党中央由英克平同志签署就上述伊斯特缅的书向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质询，请求托洛茨基同志对伊斯特缅的书发表看法，因为如英克平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所说，共产国际的敌人在利用您对俄共的立场。

下面是英克平信的全文：

“1925年5月9日。致列·托洛茨基同志。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我给您随信寄去一本麦克斯·伊斯特缅的书《列宁死后》，以及刊有该书书评的《新领袖》、《Лэнсберис-Уикли》、《工人杂志》。这些书评显示，在我国的共产国际敌人是如何利用您对俄共的立场的。

我党中央认为，如果写出对这些评论者的答复并寄给我们，那是

大有好处的。这样的文章还会有益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尽全力使之广泛传播。致共产主义的敬礼！总书记英克平。”

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英克平同志如下：

“亲爱的英克平同志：您5月9日的信，看来是在伦敦收到我给《星期日周报》的答复之前写的。

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充分回答了和平主义、费边社分子、议会生意人、市侩和麦克唐纳们利用我党所发生的这一那一事件，去证明改良主义压倒共产主义、民主压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企图。

一俟我的小册子通过我党中央的审查，我立即把手稿寄上。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5年5月21日”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同志于1925年5月日给斯大林并政治局一封信，信中没有给英克平同志提出的问题以直接的答复，仅限于引用其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中的与英克平同志的问题毫无关系的引文。

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尊敬的同志：为避免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就英文书籍麦克斯·伊斯特缅的《列宁死后》（我刚收到，只来得及浏览一下）一事向您通报如下：

我认识伊斯特缅是在共产国际的一次早期国际大会上，他的身份是美国共产党人。

伊斯特缅在3-4年前请求我给予他写我的传记以协助。我拒绝了他，建议他从事其他较有普遍意义的工作。伊斯特缅给我写了一封信，证明用传记，而不是通过对理论或者历史的阐述来使美国工人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和其他美国作家想使某些俄国革命家的传记成为共

产主义宣传的武器。伊斯特缅请求我给他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在以后读一读手稿。我回答他说，鉴于他的解释，我没有理由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料，但坚决拒绝阅读手稿，以免因此对传记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后来我向伊斯特缅提供了涉及我头 22 年的生平资料，即到 1902 年我到达伦敦的时候。我知道，他访问了我的亲友和学校同学，收集那一时期的资料，看来，这些资料使他得以写成《列·托洛茨基。青年肖像》一书，关于此书的广告印在《列宁死后》的封面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伊斯特缅应在一年半以前，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其情况了。关于他打算写涉及我党争论的书，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他为收集关于我青年时代资料见到我的时候，他本人当然也没有这种念头。

无须多说，他不可能从我这辈或者通过我获得任何党内文件。不过伊斯特缅的俄语读说的能力都很好，在我们党内有很多朋友，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还娶俄罗斯的女共产党员为妻，因此能自由接触到我党的所有出版物，看来，其中也包括在各地分发的文件、分发给党的第 13 次代表会议代表的文件，等等。他引用的这些文献是否准确，是否听来的，我没有核对过。

英国孟什维克的报刊企图利用伊斯特缅的书来反对共产主义（英国共产党书记给我寄伊斯特缅的书的时候，还寄来 3 期孟什维克出版物评论此书的文章）。那时候《星期日周刊》应当刊出我的电报（关于此事《每日先驱报》曾提及）。我想，我的小书《英国向何处去？》在目前情况下是非常及时的，可以消除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许多幻想和是非。我准备对英文版作必要的补充。

我在私人谈话中对您说过，我已经将近半年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文件了。例如，我就不懂特伦向我提的“质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把罗斯梅尔和莫纳特开除出党，不知道他们同党发

生了什么意见分歧，不知道他们出版了什么东西，到底出版了没有。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5年5月19日”

只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之后，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顽固地不对英克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利用伊斯特缅的书反对俄共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情况下，我才清楚，必须立即了解一下此书的内容。

读了伊斯特缅的这本书，使我坚信这本书写得不简单，它的目的是败坏苏联政府和俄共中央的声誉，为此目的伊斯特缅进行了一系列造谣污蔑，利用了托洛茨基的威望及自己同他的“友谊”，以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布过的某些机密文件。使我特别吃惊的是伊斯特缅关于他同托洛茨基同志就所谓列宁“遗嘱”及关于“中央主要人物”问题“谈话”的声明，还有他关于所谓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得到“俄国3个负责共产党人”的证实的声明，我（即伊斯特缅）同他们分别谈过，他们不久前读过此信，记得最重要的语句。

我开始明白，得知这一切以后，如果对托洛茨基同志同伊斯特缅及其《列宁死后》一书的关系表示沉默，那不仅不能容许，而且简直是犯罪。

为此我同中央书记们商量之后，采取措施把伊斯特缅的书翻译成俄文，把译本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听取他们的处置意见。

对我来说下列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时候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在国外的出版物上利用伊斯特缅的书来反对俄共和苏维埃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依据“共产党人”伊斯特缅，托洛茨基同志的“朋友”和“交谈者”提供的“证词”来污蔑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说统治俄国的是一小撮篡位者和骗子。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伊斯特缅的书是一本谤书，它会给世界反革命势力带来（已经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会给整个世界革命运动

造成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对伊斯特缅的书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伊斯特缅在自己的书中污蔑俄共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时候往往援引托洛茨基同志的东西。

在目前时刻我不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就伊斯特缅书中涉及的原则问题，即构成我们分歧的原则问题，在报刊上发表实质性意见。谁对，谁的政治立场正确，是中央的立场还是托洛茨基的立场，关于这一切让党和共产国际去评判。

但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一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有最起码的责任和道义义务，这是托洛茨基同志不能也不应当推卸的。这起码的东西要求托洛茨基同志在报刊上毫不含糊地反对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歪曲，反对伊斯特缅在书中旨在败坏俄共威望的歪曲。因为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的沉默只能看做是证实或掩盖这些歪曲。

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至少应当驳斥下述歪曲：

1. 伊斯特缅的小册子中“对老近卫军的攻击”一章中说，“托洛茨基的信（指因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而于1923年发表的告各区书。——斯大林）以及小册子形式的某些文章实际上被政治局停止传播。”

其次，伊斯特缅小册子第9章说，“在他们（即俄共政治局。——斯大林）确信自己的手法能取胜之前，托洛茨基的书（指《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和《十月的教训》——斯大林），实际上被政治局禁止了。”

最后，伊斯特缅书的第14章中说，“托洛茨基的原文没有在公众中出现以驳斥他们（即中央。——斯大林）的声明。这些文本是由那些面对国家刺激和支持的普遍的歇斯底里保持勇气和远见的人凭良知秘密刊印的。”我想，托洛茨基应当驳斥伊斯特缅的这些对党和苏

维埃政权的恶毒污蔑。因为托洛茨基同志不能不知道，无论在 1923 年争论期间，还是在 1924 年争论期间，不论在任何时候，中央都没有阻拦托洛茨基文章和书籍的出版。

其中，托洛茨基同志不可能不记得，在 1923 年争论期间他本人在其著名的声明中表示拒绝在报刊上回答党内多数派代表的不同意见。他也不能不记得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下述《编者按》的声明：

“一些同志问，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不回答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评，《真理报》编辑部谨通告，迄今为止编辑部没有收到托洛茨基或者其亲密的志同道合者任何回答对托洛茨基主义批评的文章。”（见 1924 年 12 月 13 日《真理报》第 284 号）

2. 伊斯特缅小册子第 2 章说，俄共领导人“隐瞒了列宁本人的文章”，第 9 章还说，他们，即党的领导人，“给他（即列宁）最后留给党的最后遗言套上书报检查的笼头”。

我想，托洛茨基同志也应当驳斥伊斯特缅这种污蔑党的领导人，污蔑中央及其政治局的这些说法。因为他像全体中央委员一样，清楚地知道，伊斯特缅的说法同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号。

3. 在小册子第 2 章中伊斯特缅说，“所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书记们，不仅反对列宁建议的政策，而且还反对他的文章”（指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斯大林）。

我想，托洛茨基同志也必须反驳伊斯特缅的这种显然污蔑之词。因为，他不能不记得，第一，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发挥的计划，那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讨论；第二，列宁文章中有谈到中央可能分裂的著名语句，这可能引起个别党组织的误解，为此政治局那时召开了会议。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政治局那时决定在刊印列宁文章的同时向各党组织散发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的一封专信，说明列宁的文章不应引起中央有分裂分子的想法。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刊印列宁的信的决定，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关于中央内部不存在分裂的

事实的信，是一致通过的，说什么政治局关于公布列宁文章的决定似乎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压力下通过的，这是可笑的胡说八道。

此信是这样说的：

“给省委和区委的信。亲爱的同志们：1月25日《真理报》第16号刊载了列宁同志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谈到我党中央的作用以及采取组织措施，以排除如果由于新经济政策发展起来的新的条件，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复杂化，中央出现的分裂的可能性，或者使分裂变得极其困难。某些同志请政治局注意，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可能被地方同志解释为，似乎中央最近的内部生活中出现某种分裂的倾向，所以促使列宁同志提出文中所说的组织建议。”^①

^① 档案复印件到此为止，从内容看，似应还有下文。

发表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尤为重要

——致“七人小组”

（不早于 1925 年 8 月 1 日）

七人小组：

七人小组曾经作出决定，等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伊斯特缅的文章和信在国外刊物发表之后即在国内刊物上予以发表。鉴于文章和信已在国外发表，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未发表，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在目前时刻，当曼努伊尔斯基把一切全都搞乱了，不由自主地提出了托洛茨基文章的真假问题的时候，发表上述文章和信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那么真假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而这对党，不光是对我们的党，而且对外国共产党，尤其是对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将是有利的。

约·斯·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 年第 9 期

关于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日)

1925年8月1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同志：

1. 我听说曼努伊尔斯基故意把托洛茨基文章的初稿交给《人道报》发表。如果属实，那就太不像话了。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你来信所说的那种“错误”，而是不知何故不愿发表托洛茨基文章定稿的某些人的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件事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我建议把问题提交七人小组^①并谴责曼努伊尔斯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使俄共和《人道报》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必须查明究竟是谁唆使曼努伊尔斯基干这种卑劣行径的。为使你知道情况现告知一些必须知道的事实：（1）文件是根据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在中央档案库）并经七人小组同意（向曼努伊尔斯基提供文件是季诺维也夫在七人小组中提出的）交给他的；（2）文件交给他时，托洛茨基的文章还未最后定稿；（3）文件交给他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顺便提一下，请看看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申请）；（4）发表文件即发表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书的便条的问题七人小组讨论过，而且我们全都认为我的便条应在托

^① 七人小组——1924年8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会议，从政治局委员中选出执行机关“七人小组”，其成员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七人小组”定期开会，决定原则问题。

洛茨基的文章的定稿发表后再发表，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是知道的；

(5) 在曼努伊尔斯基动身赴德国之前（7月初或6月末），我请曼努伊尔斯基把**全部文件交还**中央书记处，他表示同意，却不但不还，反而随身带走。事实就是这样。**恳请七人小组将此事一抓到底**，从而杜绝这种卑劣行径在我们党内发生。

2. 我不同意七人小组关于只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的意见。第一，还应当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①。第二，在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完全可以发表某些文件（其中包括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书的便条），以证明托洛茨基只是由于俄共的压力才写的文章（否则托洛茨基倒成了挽救党的威望的英雄）。

3. 最后请告我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有关伊斯特缅的文章的情况，文章是否已在**英国**发表。我问了三次也未见回音。

4. 你至今尚未答复我关于第聂伯工程的信。你可将答复口头转给托夫斯图哈，一一由他写信给我。

5. 我不相信托洛茨基“没有读过”你分发给政治局委员的伊斯特缅的文章。托洛茨基在装腔作势。

6. 托洛茨基对德国代表团的“回答”我读过了。我不完全赞同他的谈话。《真理报》赞同他的谈话吗？这是托洛茨基集团的纲领。

7. 我的身体逐步好转。马采斯塔温泉的泉水（**索契附近**）对于**治疗硬化、神经紧张过度、心脏扩张、坐骨神经痛、痛风、风湿病**效果很好，你最好把妻子送到这里来。

握手！

约·斯·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

^① 指克鲁普卡娅的文章《致〈Sunday Worker〉报编辑部》，载《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16期第71-73页。

关于与托洛茨基有关的文件的发表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9日)

1925年8月9日于索契

把信读给布哈林听。

莫洛托夫同志：

你8月5日的来信收到了。

1. 看来，在你收到我关于任命什维尔尼克或其他什么人为组织分配部部长的信之前就已经任命了格伊。对于格伊我们确实有过争论，但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并通知了你，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也好，让我们看一看格伊的表现。两次通过的决定现在根本没有改变的必要。

2. 关于第聂伯工程。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耗资数亿的事情，人们打算轻率地作出决定。应当趁为时不晚采取预防措施，同时应努力使这件事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不因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可能会有些不快而止步不前。问题应由七人小组来决定。

3. 至于曼努伊尔斯基，那么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甚至讹诈。我再次声明：（1）把文件交给曼努伊尔斯基是根据七人小组的决定，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

（2）我对曼努伊尔斯基说过，在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之后，在国外发表一些文件，具体发表哪些文件——这只应当（只能够）由七人小组来决定；（3）我没有也不可能向曼努伊尔斯基下达任何有关发表托洛茨基文章未定稿的指示，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主张等托洛茨

基文章改好后再发表，而不是未改好就发表；（4）我根本就不可能给曼努伊尔斯基下达这样的指示，因为我要求他在出国前把**所有文件还给**中央委员会（对此他表示同意，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履行许诺）。问问曼努伊尔斯基——他为什么没有在出国前交还文件。

4. 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是七人小组决定的，责成我、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审读。我同布哈林和李可夫**审读**了文章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缺席。人们尤其是布哈林简直太健忘了。

5. **七人小组决定**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在国外发表后即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无论如何不要为此事挑起争论。可能七人小组现在已取消这个决定。这当然是它的事情。但如果决定未被取消，文章和信就应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

6. 至于发表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便条一事，可等我休假回来后再说。没必要着急。

7. 请转告布哈林，《真理报》既然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答问，那就应当为其加上按语。

8. 伏龙芝的身体如何？

9. 科托夫斯基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害的？真可惜，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握手！

别骂我，这封信写长了。

约·斯·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不该反对有关伊斯特缅文件的提案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5年8月18日)

8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迟复为歉。

曼努伊尔斯基的信既怯懦又狡诈。

尽管有些同志不满意，但我仍完全坚持我关于欺骗和卑劣的说法。

加米涅夫声称斯大林首先力争发表自己关于伊斯特缅的便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光明正大。他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你和布哈林做得不对，不该投票反对有关伊斯特缅的文件的提案。不能阻断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得有关伊斯特缅的文件的途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造成使托洛茨基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前提，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托洛茨基以自己对伊斯特缅的书的回答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即挽救了自己。

握手！

约·斯大林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

1990年第9期

有关托洛茨基的两件事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4日)

你好！

我于星期天傍晚到达这里。近两天天气不太好，北高加索一带的庄稼长势不错。我这里一切正常。

别连基讲了两件事：（1）托洛茨基星期三早晨就到莫斯科了；（2）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柏林去找过他^①（去会面？），有意思。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星期一于索契

^① 1926年托洛茨基和妻子在柏林治病。

党会揭露托洛茨基等人的丑恶嘴脸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6年6月15日)

莫洛托夫：你好！

布哈林：你好！

我于今日（6月15日）回到索契。在梯弗利斯闹上了胃病（吃鱼中毒），现在勉强在康复。今天读了你的来信（无日期）和布哈林的来信（也无日期），我的意见如下：

（1）你们的提纲很好。还应当抓住波兰问题揭露格里沙，是他自己把瓦尔斯基拉进来的，可**现在**又企图把他推给你们。格里沙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2）不要说提纲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一致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致。**现在**掩盖同格里沙的分歧就是给他的反党活动帮忙而使自己陷入愚蠢的境地。

（3）如果拉舍维奇在召集秘密会议，格里沙·季诺维也夫在安排路·费舍往德国跑^①，派索柯里尼柯夫去法国参加代表大会^②，那就是说，他们和托洛茨基都想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破坏党。我不大相信党会被破坏掉，但是发生大的动荡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想防止党发生不测，那就必须而且应该努力使反对派的人重新组合。你们对付拉舍维奇的办法是对的。要是能想办法对季诺维也夫也提出问题就好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政治局就特别案卷问题向

① 指路特·费舍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许可的情况下赴德国治病。

② 指1926年6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全会作报告，在全会讨论过程中回顾一下政治局内部争吵的整个情况，让全会来表态。

(4) 如果托洛茨基对布哈林说，他指望很快在党内赢得多数，那就意味着他想吓唬和讹诈布哈林！他对布哈林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对布哈林的评价是何等之低啊！我想，不久党就会揭露托洛茨基、格里沙和加米涅夫的丑恶嘴脸，使他们成为像施略普尼柯夫^①一样的背弃党的人。

(5) 应当马上把索柯里尼柯夫从法国召回，并通知法国中央委员会：无论是联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没有委派索柯里柯夫去处理法国事务。

(6) 经济工作吓不住我。李可夫能胜任这项工作。反对派在经济问题上一点儿也占不了上风。

(7) 布哈林决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作报告，这非常好。

再见！

握你们的手 1

约·斯大林

1926年6月15日

附言：鲁祖塔克和米高扬建议全会延期到7月20日召开。我不反对。

约·斯大林

^① 施略普尼柯夫，十月革命后曾任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等职，1933年被开除出党。

对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

(1937年11月11日)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 “这是不够的。对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

斯大林的私下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在转折关头：

(1) 1905；

(2) 1917；

(3)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4) 内战；

(5) 特别是在集体化这完全新的、空前的创举中。

各种软弱分子从党的行列中淘汰了出去。他们在党的力量面前让

步了，但是内心并没有接受党的路线，特别不能承受集体化（不得不向富农开刀的时候），他们就转入地下。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就同外国敌人联系，答应把乌克兰给德国人，把白俄罗斯给波兰人，把滨海地区给日本人。它们等待战争，特别主张德国法西斯快些开始对苏战争。我们还在去年就知道了某些情况并准备处理他们，但是我们还在等待抓到更大的线索。他们本想在今年年初采取行动，可是没有下决心。他们又准备7月在克里姆林宫进攻政治局，但是又害怕了——他们对自己说：“斯大林会开始打枪，会闹出丑闻。”我们对他们说，他们不会下决心行动的，我嘲笑他们的计划。

对于我们周围的某些人，我们的确疏忽了。

这对我们和对所有共产党都是巨大的教训。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论季诺维也夫

你们看来真要准备决裂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1923年8月3日于莫斯科

抄送伏罗希洛夫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已同谢尔戈谈过话。我不明白，我究竟应该怎样做才会使你们不骂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认为出于事业的利益需要掩饰看法。要是你们寄来一封便函，把情况写得清楚明确就好了。要是我们一有机会马上谈一谈，那就更好了。这当然都要看你们是否认为今后有可能齐心协力地工作（因为通过同谢尔戈谈话我才明白，你们看来真要准备决裂，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不认为有可能齐心协力地工作，那就随你们便吧，俄国定会有人来评价这一切，并对有罪者进行审判的。

过10来天我就去休假（我累了，累极了）。祝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1922[3]年8月3日

附言：你们毕竟是有福之人：能够在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想入非非，琢磨种种不切实际的东西，等等，可我却在这里没完没了地工作，像一只被链子拴住的狗，苦闷不堪，而且还成了“有罪的人”。谁都会被这种方法折磨得痛苦至极。你们是吃饱了撑得慌，我的朋友。

约·斯·

政治局的工作程序和一些问题的决策过程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7日)

1923年8月7日于莫斯科

并转布哈林

抄送伏罗希洛夫

季诺维也夫同志：

您7月31日的来信收到了。现就一些问题答复如下。

1. 您写道：“请不要把同谢尔戈的谈话当成反面的东西，也不要往反面去想”。坦率地说，我正是“往反面”去想的。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是指马上就撤换书记，要么是有人想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你们两人不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却在围着问题绕圈子，竭力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大概以为别人都很蠢。既然小组确实还存在，并且也有起码的一点信任，又何必要采取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呢？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也就不怕什么信吗？小组的成员都在想方设法相互恐吓（这还是说得轻的），该如何称呼这样的小组呢？我同意撤换书记，但我反对实行政委制（政委已经不少了：组织局的，政治局的，全会）。

2. 你们说书记个人决定问题，你们错了，任何一项决定，任何一项指示，无不在中央的档案中留有相应的副本。我非常希望您能在中央的档案中找到哪怕一份未经中央某一个部门核准的电报或命令。

3. 你们硬说政治局的议事日程是个人确定的，你们错了。议事日

程是根据书记处**加上加米涅夫**（主持政治局工作）、**加上古比雪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上收到的所有问题而确定的。要是全体小组成员或政治局委员都想在确定议事日程时到会，那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束之高阁”，这不仅因为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还因为上述人员能充分保证做到这一点。

4. 海峡问题是一致决定的，当时契切林对签订公约略有异议，李维诺夫则坚决要求签署。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提出过征求未到会者意见的问题，托洛茨基留下了一张便条，请求连政治局会议记录也不要给他寄去。对于我所询问的有关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他未作明确的答复。看来他是想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你们两人临走时丝毫也未表示过必须征求你们的意见。此外，由于文件很多，不可能总是靠打电报来征求意见。从问题的实质来说，我们不能采取其他的做法（我们需要对海峡实行监督，以便一旦我国的粮食及其他产品的出口受阻，可及时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连契切林现在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5. 越飞被解职首先是因为他妻子提出了请求。随信寄去几份文件（他病得很厉害）。

6. 普梯洛夫工厂当然不会关闭。但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因为李可夫领导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坚持要提出这个问题。

7. 佐林早已被任命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

8. 至于德国的事情，问题当然不在拉狄克。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力图（在现阶段）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这样做的地步，——依我看，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当初在俄国夺取政权时有这样一些潜在条件：（a）和平，（б）给农民以土地，（в）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г）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人现在毫无这些条件。当然，他们毗邻苏维埃国家，这一

点是我们不曾有的，可我们当前又能给予他们什么呢？如果德国的政权马上——比如说——就垮台，而共产党人接管它，那他们将一败涂地。这种情况还是“最好的”。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彻底打垮并被抛到后面去。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把这种游行演变为一场决战（他们目前还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并把他们打垮。法西斯分子当然并没有睡大觉，不过让法西斯分子先动手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的资料来看，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力量很弱。我认为，应当阻止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祝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附言：我于8月15日去休假。

这封信的抄件我要给伏罗希洛夫寄去，因为谢尔戈说过，他熟悉情况并对问题感兴趣。

约·斯·

季诺维也夫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立即解码

联共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格里沙^①的提纲实际上是根据下述考虑提出来的：1. 稳定正在或已经结束，2. 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革命爆发时期，3. 积聚力量的策略和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正在失去意义和退居次要地位，4. 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过时，5. 我们应当依靠少数人的运动来建立自己的工会。因此格里沙的建议倡导公开与总委员会决裂。

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我认为这整个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一方针是在帮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②和第二国际的忙，使我们共产党走上宗派主义的道路。我认为：

(1) 稳定没有结束，尽管这种稳定过去和现在都不牢固。

(2) 英国保守党人挑动罢工表明资本企图建立牢固的稳定，也就是说，这一回发起进攻的不是革命而是资本。

(3) 这一企图不会也不可能使稳定得到巩固，但也不会使工人的革命斗争得到胜利的发展和破坏稳定，而且某几类工人甚至会由于罢工而难以保持原先的劳动和斗争条件水平。

(4) 因此现在不是革命猛烈进攻的新时期，而是持续的稳定，尽管是暂时的、不牢固的，但毕竟是稳定，这时资本家一再试图向工

① 格里沙，即季诺维也夫。

②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成立。苏联工会没有加入。

人发动新的进攻，而工人仍不得不进行防御。

(5) 任务是继续实行积聚力量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训练工人阶级去反击资本家的新进攻，把防御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广泛的、革命的进攻，转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6) 因此必须加强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以达到从内部改造并控制这些工会的目的。

(7) 因此要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推行分裂工会运动、反对统一战线这样一条有利于乌达格斯特和扎先巴赫的路线。

(8) 因此要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把英国工会运动推向阿姆斯特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怀抱。

(9) 因此要坚决反击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路线，这条路线使各国共产党同群众隔离开来并将群众置于改良派的独家领导之下。

(10) 因此要坚决地反击一切倡导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同英国工会运动决裂的图谋，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同总委员会决裂不能不意味着同英国工会运动决裂从而有利于阿姆斯特丹。

(11) 同总委员会决裂必将导致法德两国工会运动统一政策也遭到破坏，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改良派丝毫不比英国改良派好。

(12) 应当加强红色工会国际^①和少数派的工作，提高它们的威望。

(13) 应当将英国共产党置于无条件的保护之下，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对该党的诋毁。

(14) 应当接受洛佐夫斯基同志的一系列实际建议以及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之间达成完全的一致。

(15) 对中派和总委员会中的左派进行无情的批评是绝对必要的。

① 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于1921年，1931年结束，是左翼工会的国际组织。

(16) 这种批评不排除而且也不能排除保留英苏团结委员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7) 不应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而应以专门决定的形式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关于五月罢工的总结报告通过一项决议，对右派的背叛行为和左派的优柔寡断提出批评，将通过广播播送这一决议并送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总委员会周知。

(18) 英国的工会少数派和共产党应当开展一场要求改选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以便把托马斯之流的叛徒及其走卒从左派中驱逐出去并推举出新的革命领导人。

(19) 布哈林的提纲应当以政治局和政治局英国问题委员会^①就有关英国罢工问题通过的决议为依据，注意到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提纲中背离了这些决议。

(20) 应当完全推翻季诺维也夫的取消主义的提纲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提纲。

(21) 不用格里沙的提纲可能会导致以辞职相要挟，对此决不应惧怕。

(22) 我认为不需要前来。

(23) 如果仍然需要通过直达电报交谈，那么请发来电报，我将答复。

6月3日拍发。

约·斯大林

^① 1926年3月5日政治局决定成立英国问题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任委员会秘书。5月10日李可夫参加该委员会。

务必清算季诺维也夫的严重错误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26年6月3日)

立即解码

莫斯科

联共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布哈林的提纲务必清算季诺维也夫在英国罢工、皮尔苏茨基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十分严重的错误，并通过某种形式对这些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因为这些错误有市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右翼派别的支持。

(1) 在英国罢工初期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向政治局提出了给英国共产党人的指示草案，这份草案是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同情反对派的个别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制定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很清楚，草案只字不提必须将总罢工引导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也根本不提打倒保守党人政府、工人政府万岁的口号。这一新指示和新口号是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对季诺维也夫的草案所提的修改意见，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意见。这种忘记提英国罢工运动的最重要口号的做法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帮托马斯的忙。无法保证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在工作中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为了保证党不犯这样的重大错误，提纲必须清算季诺维也夫的错误。

(2) 在大约一个月以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从而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这样一项纯粹取消主义的建议。政治局多数委员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是一条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路线，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仍试图坚持自己的建议，实在坚持不住才被迫答应收回建议并接受了政治局关于

加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建议。由于无法保证季诺维也夫的错误不再重犯，因而提纲务必清算这个错误。

(3) 在有关皮尔苏茨基占领华沙的最初消息传来的当天，季诺维也夫即在政治局波兰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温什利赫特、捷尔任斯基、多姆斯基、韦涅茨基及其他许多人提出了给波兰共产党人的指示草案。草案说共产党人决不能在皮尔苏茨基反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草案把皮尔苏茨基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把皮尔苏茨基的运动说成是革命运动，但草案却只字不提共产党人更不能支持皮尔苏茨基。

委员会的多数人提出了关于不允许支持皮尔苏茨基的一项主要修改意见，季诺维也夫被迫接受了这一意见，对自己的整个指示草案作了修改。我相信，季诺维也夫如今津津乐道的波兰共产党人的错误，完全是由于季诺维也夫认定皮尔苏茨基的冒险行为具有革命性这一极端机会主义立场所致。由于无法保证这些错误不再重犯，布哈林的提纲务必清算这些错误。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情况，同时请你将本件分送给最亲密的朋友们。

斯大林

6月3日21时

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的信

（1926年6月25日）

1926年6月25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各位朋友：

关于“拉舍维奇^①事件”的问题我考虑了好久，一直犹豫不决，我把这个问题同整个反对派集团的问题联系起来，几次得出的意见都不相同，今天总算形成了如下几点意见：

1. 在季诺维也夫集团出现之前，反对派（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还算是比较规矩，比较克制；
2. 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变得猖狂起来，不再守规矩了；
3. 季诺维也夫集团成了反对派一切分裂活动的鼓动者和党内分裂派的实际首领；
4. 季诺维也夫集团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1）它比其他任何集团都更熟悉我们的方式方法，（2）它总的说来比其他集团都强大，因为代表着强大力量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掌握在它手里，（3）因此，它表现得比其他任何集团都更加猖狂，为其他派别树立了“勇敢”、“坚定”的榜样；

① 拉舍维奇，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

5. 因此，季诺维也夫集团是目前危害最大的集团，在全会上应当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

6. 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还要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就要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①

7. 要么是现在就进行这种打击，以期托洛茨基等人重新变得规矩起来；要么冒把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变成丧失工作能力的机构的风险，不久的将来在党内就会闹出危害事业和统一的大乱子；

8. 季诺维也夫在此后可能会呈请辞去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我们应当接受他的辞呈。把季诺维也夫从政治局除名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担任主席职务了，关于这一点，各个支部都会明白，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作出必要的结论。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制改为书记处制^②。这样就可以解除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武装，并肃清猖狂制造分裂的季诺维也夫路线（请想想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言论^③吧！）

9. 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样做，在党内和国内都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为人们深知季诺维也夫其人，不会为他惋惜；

10. 我原来曾想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现在我觉得还是把这样的决议留到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上去搞更好一些（作一些原则性论证等等）。在全会上可以而且应当只搞一个简短的决议，引证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结合拉舍维奇

① 1926年7月联席全会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拉舍维奇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② 1926年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并撤销主席建制，成立新的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

③ 指1925年12月20日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事件从狭义上论述一下统一问题。这个决议要指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不是由于他同中央委员会有分歧（托洛茨基同中央委员会有着同样深刻的分歧，但并不存在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执行分裂政策。我想，这样做可能好一些，这样会得到工人的理解，因为他们珍惜党的统一；而对其他反对派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警告。可以让捷尔任斯基进政治局取代季诺维也夫。这个方案在党内也好接受。或者是把政治局委员人数扩大到10个人，让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都进政治局。且不说如果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决议（这是过去的方案），就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合为一个阵营；这种做法目前可能为时过早，从战略上看也不合适。最好是把他们各个击破。让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去为季诺维也夫辩护好了，我们洗耳恭听。在现阶段这样做总归好一些。日后会见分晓的。

等我回莫斯科后再与你们详谈。

我打算在全会召开前大约3-4天回到莫斯科。你们意下如何？

附言：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却认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拉舍维奇事件搞得处境艰难，如果把这个事件与古拉利斯基^①事件联系起来，他们的处境会更难。应当联系起来。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古拉利斯基，1918年入党，1926年为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1927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院研究人员。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

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职务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0日)

莫洛托夫：你好！

(1) 事情的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提出免去格里戈里在共产国际的职务问题。一些西欧党（英国、德国）关于解除格里戈里职务的决定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的第一项日程（“国际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整个形势已提出这一问题，而两个西欧党已明确**建议**解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联共）还“回避”这个问题，就会令人不解和不合情理了。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出决定**，承认关于解职的建议是合适的。^①

(2) 至于正式解决这个问题，要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来做。如果**所有的党**或者绝大多数党都赞同解除格里戈里的职务，那么就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种意见体现了所有党的真正意志，即整个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志。可将最后的决定转告代表大会。

(2) ^② **现在**已该考虑关于工会和经济形势的提纲草案或初稿（草稿）了。书记处有这类初稿了吗？也就是说，书记处收到这类“草稿”了吗？如果没有，要抓紧。

(3) 你不认为应该在工会中甚至在产业工会各分会中也许在各行业中实行工会积极分子“制度”或“机制”吗？如果还没有实行这

^① 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联合全会通过决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可能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了”。

^② 原文如此。

个“制度”，那么应当着手实行了。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选拔新人**，又有利于**密切工会与生产的关系**，还有利于**活跃工会的工作**。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积极分子**（纺织业的、石油工业的、煤矿业的及其他行业的）要有**广泛性**，不要只是工会干部，不要只是共产党员，也要有非党人士（比例大约一半对一半）等等，你对此有何看法？

（4）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加米涅夫的问题？安排加米涅夫去日本之事，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在办？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1926年8月30日

附言：**斯捷茨基论新反对派的文章**^①我看过了。是一篇好文章，但其中个别地方使文章**减色不少**。斯捷茨基认为，**我们不应当去争取“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苏维埃中的绝对优势”**。这种看法不对。我们同反对派的分歧不在于此，而在于下列方面：第一，在无产者非常少的那些地区，无产者在**人数上不可能占优势**；第二，对优势要从**政治上理解**（而不要仅仅从统计学的角度理解）；第三，我们**根本不同意**反对派向我们推荐的那种夺取优势的办法。非常糟糕的是，我们没能帮助斯捷茨基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① 斯捷茨基的文章《新反对派是怎样走向托洛茨基的》，刊载在1926年8月26日的《真理报》上。

关于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案件的处理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6月23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1) 我（粗粗地）读了一下处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案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给我的感觉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分尴尬。进行审问和起诉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而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奇怪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竟躲了起来。谢尔戈^①在哪儿？他躲哪儿去了，为什么要躲起来？真丢人！我坚决反对把起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委员会变成指责中央及共产国际的讲坛，并把“事件”的矛头对准斯大林，他现在不在莫斯科，因此可以对他百般指责。难道可以把这个《记录》交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让他们去扩散！真是岂有此理。

(2) 请注意有关《劳动报》的文件。应当对《劳动报》进行清洗。

1926年6月23日^②

① 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则，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②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6月23日。

坚决抗议让季诺维也夫担任

《真理报》 常任编辑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9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

.....

（2） 要坚决制止鲍曼将组织拖进无原则的斗争中，拖进“个人之间”的斗争中。正因为如此（至少暂时），不应当触动波隆斯基。关于日丹诺夫、波斯特舍夫和鲁勉采夫，最好等到秋天再说。

（3） 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开始作为（据说已经开始）《真理报》实际责任编辑进行活动，可不太妙。这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危险和有害的，因为虽然他有许多非凡的才干，但在政治领导方面很弱（他喜欢跟着“群众”情绪随波逐流）。千万别弄成实际上领导《真理报》的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而是像季诺维也夫一类或是季诺维也夫的一个门徒那样的人，因为他们对雅罗斯拉夫斯基极尽奉承之能事，而对列宁格勒组织则心怀不满。请注意，这种危险并非是完全不现实的。不管怎样对列宁格勒组织的议论已引起人们的怀疑。^①

（4） 关于李可夫的决定是对的。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9日

^① 1929年9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列宁格勒党组织压制批评的材料。这以后列宁格勒开始了自我批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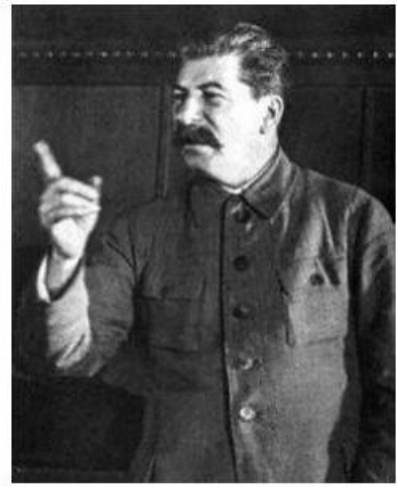
附言：差点忘记说了。必须拒绝斯米尔诺夫、瓦加尼扬、姆拉奇科夫斯基^①等人的新声明（新的！），因为这个声明不仅不能为我们所接受（那还用说！），而且它还是利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软弱和对他们的信任进行反党活动的厚颜无耻的反革命分子的文件。应当禁止雅罗斯拉夫斯基与这伙无耻之徒接触，这些人利用他的软弱用“新的”、“章程的”原则来组建反革命派别。我们党内不需要这样的人。你们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另外，我坚决抗议不顾政治局的决定而让季诺维也夫担任《真理报》的一个常任编辑（和领导人？）^②。难道就不能停止这种荒唐行为吗？这是谁的过错？是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为什么你能容忍这种政治上的腐化行为？

约·斯大林

① 姆拉奇科夫斯基，曾任乌拉尔军区司令、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国家缝纫机管理局局长。1927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

② 1929年5月9日政治局审议了关于5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问题，并决定：“就发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柏林事件的文章警告《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未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不得发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文章。”



(82)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论加米涅夫

关于解除加米涅夫职务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3日)

8月3日(星期二)

莫洛托夫：

(1) 加米涅夫在政治局讨论进出口计划问题之前提出了辞职申请，并建议由米高扬代替他的职务。

(2) 政治局研究了进出口计划问题，认为情况“不妙”，成立了以鲁祖塔克为首的委员会，以期改进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3) 我们将于星期四(8月5日)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并在征询中央委员的意见后任命米高扬担任此职。^①

(4) 准备把加米涅夫派往日本^②，把阿拉洛夫派往中国(中国政府要求撤换卡拉汉，得把他撤下来)，可能要把柯普派往意大利，把克尔任采夫召回莫斯科，他在意大利工作不顺利。

(5) 总的来说情况不错。西方的所有大党(包括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表示支持我们中央委员会，反对反对派。

(6) 布哈林还没有回来。政治局现在有6个人：李可夫、鲁祖塔克、加里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加米涅夫也投了票，因为莫斯科再没有其他候选人了)。

(7) 任命古比雪夫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职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反对派在政治局里表现平静。

向在索契的各位朋友问好！

握手！

斯大林

尽快把你发言的速记记录寄来。我们准备在下一期上公布“拉舍维奇事件”，也就是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情况。

① 1926年8月5日，政治局解除加米涅夫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任命米高扬担任苏联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② 1926年8月12日，政治局任命加米涅夫为驻日本全权代表，1926年9月2日此决定被取消。

加米涅夫不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了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12月23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你不用急着回来，可以超假，自由自在地多呆上一周（甚至更长一点儿时间）。

我们这里的情况总的来说不错：

- （1） 征购和出口工作进展顺利；
- （2） 国家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目前不是太好；
- （3） 切尔文卢布的情况不错；
- （4） 工业在缓慢发展；
- （5） 决定降低一些畅销商品的出厂价格；
- （6） 我们正在紧急制定降低零售价格的具体措施（要狠压商业合作社系统）^①。

工会代表大会^②开得“正常”，正像托姆斯基说的那样，代表大会保留了全部原有的东西，但是没有给自己的思想武库增添任何新内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③开得不错。第15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被一致通过（意大利的一个博尔迪加分子弃权）。我们的反对派是一些愚蠢的家伙，竟鬼迷心窍，硬要较量一番，结果受到沉重打击。

① 1927年2月中央全会通过《关于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决定。

② 苏联第7次工会代表大会于1926年12月6-18日召开。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扩大全会于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举行。

鉴于加米涅夫的流氓言论，我不得不在总结发言中向他提起给米·罗曼诺夫^①发电报的事。加米涅夫“反驳”说“这是谎言”^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费多罗夫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反驳声明”，并要求把它公布。我们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声明，同时还刊登了中央委员会的答复和足以在政治上致加米涅夫于死地的文件。我们认为，加米涅夫已经失去作用，他不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了。

暂且就写这些。其他问题留待面谈。握手！

柯巴^③

1926年12月23日

① 罗曼诺夫，米·亚·，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② 1926年12月15日，加米涅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言否认斯大林14日讲话中提到的下列事实：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曾给米·亚·罗曼诺夫发过电报。

③ 斯大林早期革命时用的化名。

附录 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①

(1928年7月11-12日)

1. 7月11日，星期三，上午9点。与索柯里尼柯夫谈话。

概述：1) 事情已经无法收拾，布哈林和斯大林彻底决裂了。撤职的问题提得很具体：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背叛了。鉴于他的让步，目前他们的态度较为缓和。2) 布哈林两次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真想把斯大林换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的处境很悲惨：他最怕的就是你们会说：斯大林的路线是正确的。3) 不存在四人帮和五人帮——他发誓。4) 全会上斯大林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的两股潮流，真正的潮流是恢复价格。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要发展工业，“需要农民交纳贡赋”。米高扬也说：“剪刀差还将长期保持，不能取消剪刀差”（说是托洛茨基也想取消剪刀差）。索柯里尼柯夫在推销托洛茨基主义。莫洛托夫：“中农强大起来了，所以产生了冲突”。5) 布哈林回答：贡赋理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规律”理论毫无二致。托姆斯基回答：“如果莫洛托夫说的对，那么前景会如何”，“你们想要没有耐普曼、富农和租让业主的新经济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李可夫打败了卡冈诺维奇。结论：斯大林路线将被压倒。布哈林处境艰难：别赞美斯大林。将和你们共同起草一个积极的纲领。布哈林自己想谈一谈。为撤换斯大林而结盟。你们对他来说是X，Y？斯大林放风说你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2. 逐字强调的话。“我来后过了一小时（7月11日上午10点），布哈林到我这儿来了，没有预先约好，也没打过电话。索柯里尼柯夫后来走了。[布哈林]看起来很激动，极其痛苦。很激动地讲了下面的话。不停地说了一小时。

① 这份《笔记》包括：1) 加米涅夫7月11日与索柯里尼柯夫谈话记录；2) 加米涅夫7月11日与布哈林谈话记录；3) 加米涅夫7月12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函。从文字上看，加米涅夫是在与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谈话之后立即做的记录，以便准确地向季诺维也夫通报会谈情况。这些文件后来被托洛茨基分子得到，并在报刊上公布出来。

尽可能准确地记录如下：1) 关于任命(4—5)没有进行任何表决。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2) 季诺维也夫文章的注释是斯大林口授的，针对我的，作为与莫洛托夫的妥协，后者曾坚决反对发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现在谈问题的实质：

1) 中央和党内事态的发展已经无法挽回了，你们（可能还有托洛茨基分子）必将被卷进去，并将对问题的解决起重要作用。

2) 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不知道，可能不会太快，因为双方还不敢向你们呼吁。但无论如何几个月内必然会发生。

3) 所以，我想让你们了解情况。我知道（或者料想），斯大林分子也会来找你们。当然，你们作为政治家，会利用这一局面“抬高身价”，但我不担心这个。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所以我想让你们了解斗争的焦点是什么。

4) 加米涅夫：“斗争是否很激烈？”布哈林：“这正是我想说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会危害整个革命。按他的路线走我们可能会完蛋。我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和你们早先的分歧严重很多倍。

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致认为：“如果现在政治局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斯大林，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一点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已经坦诚地谈过；我和斯大林已经几个星期都没谈过话了。这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置于维护自己权力的需要之下。他为了当时要除掉某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理论。在“七人小组”里我们经常和他争吵，甚至互骂“你撒谎！”、“你骗人！”等诸如此类的话。他现在让步，是为了整我们。我们清楚这一点，但他耍手段，把我们说成是分裂分子。决议被一致通过，因为他收回了，莫洛托夫说百分之九十接受我在“七人小组”里宣读的声明，这份声明我一直拿在手里（一张纸都不能交到他手中）。

他现在的任务是从我们手中夺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真理报》和撤掉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的乌格拉诺夫。他的路线是这样的（在全会上讲的）：1) 资本主义的发展或靠殖民地，或靠借债，或靠剥削工人。我们没有殖民地，也没人借债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向农民要贡赋（你知道，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2) 社会主义越发展，抵抗就会越大（参看决议中的句子）。这是白痴般的无知。3) 既然需要农民贡赋，抵抗会增强，那么就需要强硬的领导。自我批评不应涉及领导，而是床垫。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指向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这是警察作风。现在的事情不是玩“布谷鸟”游戏，而是

真正决定革命的命运。按这个理论走可能会毁掉一切。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外实行右倾政策：他把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宫。对沙赫特案件他建议一个也不杀（我们投了反对票），在所有的谈判中他都让步。托姆斯基这样说：在国际问题上我（托姆斯基）比你（布哈林）要右倾30公里，但我（托姆斯基）要比斯大林左100公里。路线是致命的，但他连讨论的机会也不给。抓住机会就给人扣各种倾向的帽子。他发言中提到只有“地主”才会这样议论问题的那句话，完全是原文引用乌格拉诺夫的话。他要干掉我们。

5) 我：“你们的力量怎么样？”

布哈林：我、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彼得堡人完全都站在我们一边，但是当谈到可能撤换斯大林时他们都被吓住了，所以科马罗夫宣布不同意斯捷茨基的发言，但晚上乌加洛夫到我这儿来替科马罗夫道歉，安德烈耶夫赞同我们。要把他从乌拉尔（北高加索？——编者^①。）撤掉。把卡冈诺维奇从乌克兰撤走后，乌克兰人现在都被斯大林收买了。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是1) 中间派中央委员还不了解分歧有多深；2) 十分害怕分裂，所以对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让步，妨碍了我们对他的进攻。我们不想搞分裂，因为那样我们会被除掉。但是托姆斯基在全会的最后发言中清楚地表明，搞分裂的是斯大林。亚戈达和特里利谢尔站在我们一边。150起各种规模暴动。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时刻背叛了。我想，斯大林用某种特别的链子套住了他们。我们的任务是逐渐阐明斯大林的毁灭性作用，引导中间派中央委员去撤换他。组织局是我们的。

6) 我：“但现在是他要撤掉你们。”他：“该怎么办呢。”撤职的事目前在中央是通不过的。夜里我时常会想我们有权保持沉默吗？这是不是勇气不够啊？”但理智告诉我，应该谨慎行事。周五李可夫做报告。那时我们再下结论。我将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些文章，可能还要再敲打一下，才能让党明白，他要把党引向何方。

7) 这些附件中有大量揭露“七人小组”的东西。调子是对斯大林绝对的仇恨和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还有些举棋不定，是公开出头还是不出头。出头的话，他就用搞分裂的罪名整你。不出头，他就要小手腕整你，而且一旦10月份还没有粮食，他就会推卸责任，归咎于你。

① 指印发传单（文件的注释）的编者。

我：“他们希望靠什么搞到粮食？”

他：“问题就在于再度出现困难时，再次采取非常措施。那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和砍头。”

我：“你们会怎么办？”

他：可能会采取更深入的策略和中农搞好关系。富农可以爱怎么整就怎么整，但应该和中农搞好关系。只要斯大林和那个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并被我们称之为“石头屁股”的笨蛋莫洛托夫还在，就什么办法也没有

8) 我：“你指望我们做什么？”

他：斯大林夸口说你们都在他在掌握之中。你们的人（具体地说就是茹克）被斯大林收买。这简直太可怕了。你们自己当然可以决定自己的路线，但我请你们不要支持斯大林，而帮助他扼杀我们。斯大林大概会寻求与你们接触。我希望你们明白问题之所在。

9)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人窃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盯我的梢，你这儿也有。我希望通情报，但不要通过秘书和中间人。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讲，但要告诉己人别攻击我们。”

10) 我：“斯大林给你看过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吗？”

他：“没有，我头一次听说”。

我：“会拿我们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这种事是不会跟我们说的。要不就是试着用高级职位收买你们，或者安排足够拉拢你们的位置，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再见，最近几天我要忙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事，不能再见你了。总而言之，要保密！”

“我的纲领很多地方都让斯大林给破坏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挡了回去。他渴望成为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他就缺这个了”。

此外，还谈了很多琐事和细节。他特别激动，有时嘴唇会激动得发抖。有时会造成一个知道自己必遭失败的人。所有人都认为这几天另一个阵营该有信号了。要静心地等待。会出现的。

3. 对布哈林谈话的补充。夜，7月12日11点^①

① 原文如此。正确的日期应该是“7月11日12点”。

1) 总的来说, 有种必遭失败的感觉。他的原话: 所有我们这些“捣乱”是不是一种手淫? 我经常对叶菲姆(蔡特林, 布哈林的秘书)说: 我们的事业是不是没有希望: 1) 如果国家灭亡, 我们也会灭亡, 2) 如果国家摆脱困境, 斯大林会及时转弯, 我们也会灭亡, 怎么办? 当你面对的敌人是中央的那种成吉思汗作风, 你该怎么办?

2)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谈有关退出武汉政府的事。

3) 斯大林对共青团员们说, 预留工位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布哈林能否停止其卑鄙的政策。

4) 如果我们发起辩论。我们会因此而挨整的! 中央害怕辩论。

5) 如果我们——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的话, 那会怎样呢?

6) 我能不能躲开一段时间, ——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 等危机来临时, 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

7) 我们不能发起辩论, 因为辩论将直接从武装冲突开始, 这是由指控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会说: 这个人把国家推向饥饿和灭亡。而他则说: 他们保护富农和耐普曼。

8) 党国一体化就是灾难之所在。

9) 除了保住权力, 斯大林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对我们让步, 保住了领导权, 保住领导权后再收拾我们; 我们没什么办法。因为中央里面撤掉斯大林的主观条件还在酝酿之中, 还没有成熟。

10) 索柯里尼柯夫: 请你们多努努力, 哪怕是要求把莫洛托夫去掉也行。

11) 斯大林只知道一个手段, 就是报复, 而且还是在背后捅刀子。我们会记得“甜密的报复”理论。

12) 谢尔戈不是什么好汉。到我这儿来把斯大林臭骂了一通, 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

13) 全会决议和打架的经过: (1) 我要求讨论总的问题。斯大林避开了, 用须要讨论工业财务计划等等来搪塞。(2) 我给斯大林写信要求进行一般性讨论。他对我说: “布哈什卡, 你连大象都可以搞得心烦意乱”, 但他没有同意进行讨论。(3) 我写了第二封信, 他把我叫去了。他说: 我和你就是喜马拉雅山, 其他人都不值一提。(4) 我们一起去“七人小组”。场面十分粗暴。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 我讲了他说的关于喜马拉雅山的话。他喊道: “你撒谎, 这是你杜撰出来的, 想唆使政治局委员们迫害我。”我们分道扬镳了。(5)

我宣读了一份 20 页的声明，没有交出手稿。莫洛托夫说这份声明反列宁主义、反党。斯大林说：“我可以接受十分之九。”莫洛托夫走了。声明基本上被通过，我离开去写决议。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一份从我的声明中剽窃而来的另一个决议；我做了三处修改，李可夫改了一处。一致通过。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我用非常手段提供了粮食，我转变及时，自己起草了决议。如果须采取措施，我一个人就能做到。其实他是在把党引向毁灭。

14) 瓦尔加宣读报告，因为斯大林不想让李可夫宣读，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报告。瓦尔加还发挥说既然是工业化，饥饿就在所难免。

15) 斯大林违反了政治局（“七人小组”）决议。本来决议要把弗鲁姆金的信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并起草答复。斯大林迫不及待，自己写了回信而且发出去了。我们通过决议，谴责违反决定的行为。“回信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不充分。”“我不会再勉为其难了”。

16) 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我（布哈林）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认为，政治局是附属总总书记的咨询机构。”

17) 斯大林的政策会导致内战。他只好用鲜血来淹没暴动。

7月12日，上午11点。索柯里尼柯夫说：集体农庄的辩论中令人感兴趣的只有下面一些东西。斯大林做了非常粗暴的针对托姆斯基的发言。我十分惊奇地听了托姆斯基的发言。托姆斯基以为，我们什么后备力量也没有，只能向农村让步，——这是投降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不相信。如果中农要求在垄断外贸方面做出让步的话，农民联盟。也要让步吗？这是投降主义。我们的后备是国营农庄和做贫民的工作。黑的，绿的，恶的，被激怒的。令人感到压抑。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不仅布哈林在进攻，斯大林也在进攻。粗暴得令人震惊。索柯里尼柯夫这样介绍全会的动态：李可夫开了火。斯大林应战。彼得堡人犹豫是否拒绝承认斯捷茨基。当时布哈林躲在地下，但一个地雷也没有引爆。莫洛托夫蛮横起来，攻击了《真理报》（尤其是阿斯特罗夫，但总的来说是对报纸的片面性以及克里茨曼和其他人的评论）。于是托姆斯基攻击了莫洛托夫，但形式上很温和。然后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攻击，既直接又粗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
2号目录，40号案卷，第2—11张。副本。

加米涅夫向英德美大使进行了政变试探

(1936年8月23日)

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

卡冈诺维奇：

第一，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文章效果不坏。根据记者的通报，外国记者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沉默无语。应当把这些文章在挪威、瑞典、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上重新发表，哪怕是在共产党的报纸上。顺便提一下，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们使我们的敌人无法再把诉讼程序描绘成是由中央委员会一派导演的镇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派的剧目。第二，从赖因霍尔德的供词看出，加米涅夫曾通过自己的妻子格列博娃向法国大使阿尔凡试探法国政府对未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我认为，加米涅夫也向英国、德国和美国大使进行了试探。这意味着，加米涅夫会向这些外国人透露其阴谋和谋杀联共领袖的计划。这也意味着，加米涅夫已经透露了这些计划，否则，外国人不会与他们谈及关于未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政府”。这是加米涅夫及其朋友企图直接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反对苏联政府的行为。这里隐藏着众所周知的美国记者提前写好悼词的秘密。显而易见，格列博娃对这方面的肮脏活动了如指掌。应该把格列博娃带到莫斯科，并对她进行一系列细致的审讯。她可能会公开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斯大林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论布哈林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之一）

（1929年1月30日）

建议让加米涅夫到会。

斯大林：加米涅夫提交声明来确认《笔记》。我建议让加米涅夫到会，他是党员，应该讲出实情。

按顺序发言。

主席：轮到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发言与他在政治局几次闭门会议上的声明不符。在本次会议前我们召开了两次政治局闭门会议，会上谈了加米涅夫的文件。布哈林承认，他去过加米涅夫那里，和他进行过谈判，但关于结盟和严重分歧他好像没说过。可是布哈林同志认可了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中的许多内容。他当时没有说加米涅夫的《笔记》是“伪造”的。他当时没提“伪造”这个词。

莫洛托夫：一次也没说。

斯大林：他没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布哈林承认，他去过加米涅夫那里，曾背着中央和他谈过话。直到出现加米涅夫的《笔记》之前，他向中央隐瞒了这件事。现在瞒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直希望政治局委员就工作问题接见他们。我拒绝和他们谈话。谢尔戈、雅罗斯拉夫斯基、莫洛托夫（主要由他们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系）都曾接受委托同他们谈过话，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向政治局报告了谈话结果。而布哈林同志把自己和他们的谈判向政治局隐瞒了。

李可夫：该谁发言——布哈林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按顺序该我发言，因为布哈林出尔反尔，布哈林曾承认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布哈林：我现在也承认这点，但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参与召集这次会议，可是既然会议召开了，我就有权提问：这是个什么会。我有提问的权利。

斯大林：我按顺序要求发言。如果我无权发言，就请大家告诉我。（会场上寂静无声）那么，我有权发言了？

布哈林同志出席了政治局第二次闭门会议，但后来离开了。我们叫他，可是他没回来。托姆斯基也同样不想回来。在这次会议上，在第二次会议上，在你们走了，而李可夫回来之后，我们决定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托姆斯基：我以为会议结束了，所以就走了。

斯大林：怎么会这样想。你和布哈林待在李可夫那里。我们叫你们，你们答应回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李可夫同志回来了。

托姆斯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吗？

斯大林：是的，昨天或是前天。李可夫回来了，我们在有他出席的时候做出决定，我们不能继续，说得难听点，让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政治局的分歧一无所知。

李可夫：我回来是为了确认一下政治局的议程。

斯大林：议程上就有这个问题。

李可夫：我在场的时候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我提出这个建议，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李可夫当时也在场，我们大家得出结论，不能让中央监察委员会继续蒙在鼓里。所以要召开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参加的此次会议。既然工厂里的党外工人都知道了政治局里的冲突，那决不能让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决定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

这不是什么审判，并不是要决定布哈林同志的政治命运。我理解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我们要结束那种由于某个政治局委员跑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里，和他们密谋反对中央等等而造成的不愉快的氛围。如果不消除这种令人不快的暗中活动，我们就不可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召集这次会议。当然，布哈林同志可以要求检查文件。文件已经检查过了。加米涅夫在声明中确认了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笔记》是他写的。还询问了索柯里尼柯夫，他也没有否认。

布哈林：我也不否认。

斯大林：如果布哈林否认这点，我提议叫加米涅夫到会。

布哈林：我想知道，文件是怎么来的？

斯大林：我们从哪儿知道文件是怎么来的。

布哈林：谁拿来的，你们从哪儿得到的？

斯大林：我觉得，这次会议不是对布哈林同志的审判，我想，不应当惩罚任何人，只是要搞清情况，要弄明白，消除一切制造阴谋诡计的可能，搞清楚我们是否只有一条路线。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能不能、有没有权利不通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呢？我觉得没有这个权利。

布哈林：我并不反对这点。

斯大林：怎么能不通知呢？否则就会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在七月全会之前有一些分歧，然后达成了一个决议，但就此并没有通知我们，通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你们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有分歧，然后搞出了一个决议，但又没有把此事通知我们；现在才清楚了，分歧依然存在，而且事情走得更远了，为了不再有欺骗，请将一切详细地告诉我们。每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会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插话听不清）不，请原谅，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清白的。[……]

斯大林：我提出要叫加米涅夫到会，是针对布哈林在声明中说加米涅夫的《笔记》是“伪造”的。他说，这份文件是“赝品”。布哈

林过去没有这么说。在加米涅夫在信中确认这就是他的笔记之后，该怎么办呢？加米涅夫写道，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文件就是他的笔记，他说的是真话吗？所以鲁祖塔克主张不让加米涅夫来是很奇怪的。要不是布哈林突然出尔反尔，声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叫加米涅夫来。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加米涅夫来。如果文件并不像布哈林现在所说的那样是伪造的，那当然就不用叫加米涅夫来了。[……]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我不想深入地谈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我理解他非常微妙的处境。原来他利用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经常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通风报信。他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牵线，当然不是要他们分手，而是让他们靠拢。过去我不知道政治局内部的一些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现在清楚了。现在清楚了，我们内部情况成为街谈巷议的根源之一就是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

索柯里尼柯夫：我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过全会，但全会的决议并不是秘密。已经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式提供了了解全会速记记录的机会。我没有透露过任何内部消息，这不是事实，而且我也不可能透露——我自己也只是从街谈巷议中才知道这些事的。

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我指的不是这些事，不是中央的决议。我指的是我们内部的秘密信息却成了街头传闻。我觉得就这件事应当专门在政治局议论。无论如何，我们要采取措施，让政治局远离这些对事业有害的意外事件。

现在我们来谈加米涅夫的文件，加米涅夫的《笔记》。

首先，我想对文件中涉及我本人的那些无稽之谈给予实在的驳斥。我不知道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谈话”时，是不是像文件中提到的那样说的，或者是另一种说法。无论如何，文件中有许多无稽之谈和

诽谤，而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并没有予以驳斥。所以我有必要来驳斥这些无稽之谈，如果我有什麼不实之处，请政治局委员（也包括布哈林同志）指正。

第一点反驳。在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布哈林同志说：“斯大林执行了右倾政策，他将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要谈右倾，布哈林同志最好还是别说话：我觉得，他多多少少把我同他混在一起了。至于“把共产国际赶出克里姆林宫”，请允许我声明，这是一个卑鄙拙劣的诽谤，甚至连托洛茨基分子都不敢这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的六大原本就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而是在圆柱大厅。政治局内并没有人反对。只是有点担心，在圆柱大厅安装用于翻译讲话的电话装备有点困难。但当这些疑虑消除，电话设备安装好以后，问题就毫无异议地解决了。事情就是这样。事后声称共产国际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这是卑鄙无耻。

第二点反驳。加米涅夫在笔记中转述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如下：“斯大林给你看过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吗？”“没有，我头一次听说，”布哈林答道。“会拿我们怎么办呢？”“不知道，这种事是不会跟我们说的，”布哈林答道。从这段对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有书信往来，并且这件事瞒过了布哈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声明，布哈林同志的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卑鄙诽谤。我总共就收到过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一张便条（恢复他的党籍之后），他请求接见他，谈谈他的工作安排。我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张便条交给了政治局，并声明我不能接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并建议派其他人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谈他的工作。为什么我拒绝接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呢？因为，就像我当时跟政治局说的那样，我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会涉及政治局内的分歧问题，也许会谈到结盟，那我就不得不将他赶出门去。莫洛托夫被派去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谈话，最后季诺维也夫同志得到了苏联消费合作社文化处的工作。这就是有

关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便条和安排他工作的全过程。我没有收到过其他任何便条。这一切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很清楚，也包括布哈林同志。现在大家来评评理，除了卑劣的诽谤外，还能把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称为什么呢。

第三点反驳。谈到共产国际的纲领，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我的纲领很多地方都让斯大林给破坏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挡了回去。”同志们，请允许我声明，布哈林同志说的这一篇话纯粹是吹嘘自己。说到共产国际纲领的起草，中央档案里有文件，每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可以去看。从文件中你们就能明白，纲领的初稿是布哈林同志起草的，被中央政治局推翻了。从文件中看得很清楚，政治局委托布哈林和斯大林起草一份新的草案，这份草案后来得到政治局通过。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这第二份草案后来不仅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纲领委员会通过，而且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也获得通过。

莫洛托夫：在中央也有相关文件。

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不会忘记，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对纲领的第一稿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而且，布哈林和斯大林还在中央七月全会上一起维护了这第二份草案，批驳了个别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攻击。你们只要从中央档案里取来这两份草案并把它们对照一下，就能明白布哈林同志吹了多大的一个牛皮。

布哈林同志说好像是我“想在全会上做纲领的报告”，而他布哈林“好不容易才把我挡了回去”，这个声明更是可笑。政治局委员不会忘记，事情正像俗话说的那样：“恰恰相反”。

喊声：是的！

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不会不清楚，不是别人，正是布哈林提议由斯大林向全会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而斯大林坚决拒绝，他说纲领的报告理应由布哈林同志做，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

喊声：对！

斯大林：难道布哈林同志把这些都“忘了”吗？

第四点反驳。谈到中央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决议的起草过程和1928年6月底7月初政治局闭门会议上发生的争论，布哈林同志对加米涅夫说：“我宣读了一份20页的声明，没有交出手稿。莫洛托夫说这份声明反列宁主义、反党。斯大林说：我可以接受十分之九。莫洛托夫走了。声明基本上被通过，我离开去写决议，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一份从我的声明中剽窃而来的另一个决议。”（见加米涅夫的《笔记》）同志们，我要声明，布哈林同志的这些自吹自擂，不是别的，只是他狂妄的幻想的结果。

实情是怎么样的呢？6月底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读了他亲自写的关于经济状况和粮食收购的提纲（现在他称其为宣言）。政治局委员要求将提纲发给大家，进行正常的讨论，布哈林同志拒绝了，声称，他只能接受一种讨论方式，就是：布哈林同志读，其他同志听。而当政治局委员们对这种在我党前所未有的新奇讨论方式表示反对时（只有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不反对这种方式），布哈林同志答道，他不认为还有其他方式。

说到布哈林同志提纲或者叫宣言的实质，提纲虽然部分是正确的，但有三点根本的错误，遭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严厉批评：（1）关于和农民破裂（布哈林在自己的宣言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和农民破裂了，政治局内大多数人否认这点，称其是惊惶失措）；（2）关于自由贸易（布哈林在自己的宣言中讲到充分的自由贸易，他“忘记”了国家机构的调控作用，这点遭到政治局多数人的坚决反对）；（3）关于集体农庄（布哈林在自己的提纲里没有充分评价集体农庄的作用，他否认个体农民经济的不是，这点遭到政治局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最终被否决了，于是决定让米高扬、莫洛托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组成委员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审查新提纲，

将这份新提纲由米高扬同志提交委员会。米高扬同志确实于6月30日或7月1日将新提纲提交给了委员会。委员会做了些小改动后批准了这个提纲。后来政治局也通过了，就这样，提纲好像是在7月3日被提交给七月全会审议。

这就是决议形成的过程。现在把实际情况和布哈林同志对加米涅夫同志说的那个臆想的虚假事件对比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这次所谓的“谈话”有什么价值。

布哈林同志说，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粮食收购的提纲是“剽窃”他的宣言。既然如此，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不把自己的提纲（宣言）多复制几份，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来证明他对政治局提出的这项严厉指控（“偷窃”）。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把自己洋洋得意的提纲藏起来呢？为什么当时，1928年6月底，他把提纲藏起来，而现在当他确实认为政治局的提纲是“剽窃”他的提纲时，他仍然把提纲藏着呢？从什么时候起善良的人们开始把优秀的提纲藏起来了的呢？能不能让布哈林同志把这个提纲交出来，让与会的委员们最终能把它同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七月提纲进行核对呢？如果布哈林同志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就会急不可耐地把自己得意的提纲交给我们，这还不清楚吗？偷窃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和丢人的牛皮，这还不清楚吗？

同志们，对于这场现在已经广为流传的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中所涉及的谬论和公然的是非颠倒，我还可以提出十来条反驳意见。但是值得去做这种并不光彩的事吗？我想不值得。我认为这四条反驳已经是以让大家了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性质和价值了。

现在谈谈实质问题。

我们有没有分歧？是的，有过。七月全会前我们首次出现了分歧。我已经向你们讲过中央七月全会前政治局内部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否

涉及非常措施问题，涉及必须取消这些措施等等呢？不，不涉及。必须取消非常措施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承认的。或许，分歧涉及中农问题，涉及保障与中农的联盟问题？不，不涉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认为，应该保障同中农的牢固联盟。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分歧呢？就是在刚才我谈到的三个问题上。也就是同农民破裂的问题，自由贸易问题，最后是评价集体农庄运动问题。但结果是就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是粮食收购政策问题一致通过了一个总决议。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布哈林和他的同伙放弃了自己的错误，分歧也随着总决议的通过而消除了。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那个由政治局全体委员签署的（1928年7月）、关于政治局内部一致和没有分歧的著名宣言，并向共产国际六大各代表团代表会议宣读。现在从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布哈林和他的同伙只是表面上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把这些错误藏在心底以待时机。但是我们当时哪能知道，在投票赞成粮食收购总决议时，布哈林同志却把同中央的一些分歧藏起来了？很显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我们大家认为分歧已经消除，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们之间分歧的第二次爆发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政治局内并非一切都很顺利，至少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试图重新制定或“修改”中央的路线。我们，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毫不怀疑《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篇折衷主义的文章，目的是要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要按照弗鲁姆金同志那封著名信件中的精神来改变我们的农村政策。莫斯科委员会上层的动摇也被认为是这种不好的征兆。但是这些不好的征兆直到十一月全会之前才真正表现出来。当时的争论是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呢？首先是如何评价农业状况，是退步还是发展。第二，对富农的最富裕部分是继续实行还是取消个别征税。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应当明白，这里谈的不是中农而是富农。他提议取消个别征税，而我们主张继续征收。

布哈林：我主张**总体**提高对富农的税率，取消个别征税。

斯大林：无论如何，这里争论的显然不是关于中农，因为个别征税只涉及最富裕的那一部分富农。至于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我们大家都承认应该继续推进这种经济的发展。第三……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

斯大林：〈第三，〉关于在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增长。布哈林同志反对这点。

布哈林：没有这回事！

斯大林：有，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反对这点。我们手头有事实可以作证。

最后是关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位同志的辞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位同志向控制数字决议起草委员会提交了集体辞职的专门声明。这发生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至少一个星期。现在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力图把我们的分歧说成是中农问题上的分歧。然而在他们三个人的辞职声明中却只字未提中农或者什么政治分歧。相反，他们的声明中说政治局委员之间没有政治分歧，他们，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提出辞职只是因为各个组织中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

但是在控制数字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有这些分歧都以某种方式解决了。因为（1）农业倒退的理论被否决了，（2）继续对富农实行个别征税，（3）承认在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是事实，（4）三个同志收回了辞职。结果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控制数字的总决议。结果是政治局做出了大家都知道的决定：所有政治局委员无论在中央十一月全会还是在全会外，都要声明政治局内部是团结的，是没有分歧的。我们当时能不能知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把自己和中央存在分歧的各点保留下来，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国际和

《真理报》的工作，在加米涅夫的档案里有一份《笔记》，它将被托洛茨基分子“偷”去公布，从其中可以明白，我们政治局内部存在一个有自身特殊“色调”的特别集团呢？很显然，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些。

现在大家都清楚，存在着分歧。

谈谈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声明，1月30日的声明。不寻常的是，他突然从兜里掏出声明就宣读了，可以说“径直”宣读，而没有多复印几份发给与会的委员们。干嘛要用这种手段呢？很遗憾，我不能详尽地分析这份新文件，因为只凭听力很难弄清楚声明里的所有部分和细节。但是不难明白，这份文件整体上确认了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让我们来注意布哈林同志声明中的某些地方。

1) 布哈林同志指责党，首先是指责斯大林同志自七月全会以来好像执行着“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政策。你们想想：党执行的原来不是同农民结盟的政策，而是“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政策”。这甚至说不上是诽谤，而纯粹是瞎话，不可理喻的胡说八道。布哈林同志既然和党有如此重大的分歧，为什么他在政治局、在中央、在七月全会、在十一月全会中都不指出来呢？既然他在心中和中央有这种分歧，他怎么能在1928年的7月和11月投票赞同政治局是一致的呢？连布哈林同志自己都不相信他杜撰出来的关于“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胡言乱语，这不是很清楚吗？

2)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太重，但他忘了三点：第一，我们已经为35%的农户（贫农）免了税；第二，我们增加了农民中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税负（布哈林同志不会是为因此而难过吧？）；第三，去年全体政治局委员，包括布哈林，无一例外地承认农业税太低，应当提高。是的，在给35%的农户免税的同时，将农业税增加到4.2亿卢布的确给一部分中农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布哈林同志不能否认，这个失误是我们共同的失误，因为将农业税提高到4.2

亿卢布是中央一致通过的，没有任何异议（其中也包括布哈林同志）。现在正在通过众所周知的修改农业税、将其削减 5000 万—6000 万的政策来改正这个过失。那是谁倡议要改正这个过失的呢？是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倡议。不管怎样，应该承认布哈林和这没有任何关系。

3) 布哈林在声明中提到越冬作物严重减少，影射中央的政策。但布哈林同志引用的都是和我们不同道的人，格罗曼先生的话。这位先生昨天还讲，比如在北高加索越冬作物减少 18%。然后他把减少的百分数降到了 14%。后来看看还是不行，他又把百分数降到好像是 7%。我不知道格罗曼先生还想把百分数降到多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他的数字提出异议，断言我们的秋播面积很稳定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减少。而且是在不利于播种的气候条件下！布哈林同志怎么会对异己分子如此信任呢？他对资产阶级专家的信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去年，好像是 6 月份，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全苏联春播面积下降了 7%，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苏联所有地区的春播，除了乌拉尔的一些地区，总体是增加的。在叫嚷春播或秋播减少之前，对所有格罗曼之流的资产阶级“记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报道应当认真核实，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今年我们的秋播很可能出现一些减少，比如在乌克兰。第一，因为气候条件不适合秋播（没有雨）。第二，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的严重歉收，使农民无法立刻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还有可能一些富农分子不顾气候条件减少了自己的秋播。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党的政策原本就没打算要让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都满意。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如布哈林同志断定的那样，正走向“灭亡”，走向“衰落”呢？显然不是这样。只有那些惊惶失措的人才会在这种情况下叫嚷农业的灭亡。

4)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我们外汇储备灾难性的状况。他的话让人觉得，我们吃光了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储备，只能坐以待毙了。他声称是他布哈林第一个提出了储备问题并“预言了”外汇状况的恶

化。关于粮食储备，包括外汇储备，客气点说，布哈林同志错了。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人早在1925年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首先提出了各种储备的意义问题。至于专门谈到外汇储备，保证这方面盈余的问题，也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鲁祖塔克同志，在政治局提出的。布哈林同志喜欢描绘“灾难”的场景，但他总是忘记或者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来防止“灾难”。不过叫嚷“灾难”时，他忘了一个“细节”，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最低外汇储备。不错，我们做到了这点不是靠了布哈林同志的什么帮助。不过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需要的是“灾难”。

一个小细节。日前皮达可夫同志和我谈起他和布哈林同志的见面。布哈林向他抱怨，他说我们正走向灭亡。皮达可夫反驳他，说工农业的大规模建设使走向灭亡的断言没有根据。而布哈林回答说：“这正是不幸之所在，所有这些工厂很快就会落到白卫分子手里。”皮达可夫据此断定，布哈林疯了。（全场笑声）这就是布哈林心态的又一个写照。

5) 布哈林在声明中指出，中央不但没有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反而还“培植”官僚主义。你们清楚，托洛茨基当初也说过同样的话。但如果说中央在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是谁在和官僚主义斗争呢？那还值得去保护那个培植官僚主义的中央吗？布哈林同志自己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摩拳擦掌反对中央，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6)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中央瓦解共产国际。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及塔尔盖默分子都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说中央“瓦解”共产国际，不就是因为中央在那里领导反右倾分子和反调和分子的斗争吗，不就是因为中央在那里执行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吗，不就是因为中央帮助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肃清自己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吗？好像布哈林同志不仅仅是想同中央作对，他还想把斗争扩大到共产国际。这还了得！

7)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最后想缓和一下，他说分歧将过去或者已经过去了，我们最终会达成一致的总路线等等。这是诡计，同志们。这种伎俩是不会得逞的！先对中央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指责它执行“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政策，指责它“培植官僚主义”，指责它“瓦解共产国际”，然后又宣布一致的路线。不，同志们，这行不通。如果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和中央是一条路线，那你们干嘛要集体辞职呢？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虽说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路线，却仍然执意辞职呢？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听任自己多次粗暴而顽固地破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要求他们留在工作岗位的决议？如果他们的路线和党一致，他们就不会这样执意坚持辞职？这难道不清楚吗？如果路线只有一条，他们就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既然他们仍然不肯留下，这就意味着，他们和路线有格格不入的地方，这难道不清楚吗？

他们抱怨《真理报》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委制”。可是难道中央什么时候放弃过检查《真理报》编辑部或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吗？亚格洛姆比卡冈诺维奇好在哪儿？……费几句口舌说一说诚实和原则性。我举布哈林同志最近的一件事——他和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前反对派进行秘密谈判这件事。我问你们：当中央根据布哈林同志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局内部团结、**政治局内部没有政治分歧**的决议时，他自己却**背着**中央同前反对派进行反中央的秘密谈判，密谋组织反对中央多数成员的**政治联盟**，这诚实吗，忠诚吗，有良心可言吗？

布哈林同志说，他没打算和前反对派建立反对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政治联盟。但有什么根据来相信布哈林同志呢？认为布哈林同志说的显然是谎言，这岂不是更正确吗？因为如果布哈林同志没打算结盟，那他为什么秘密反对中央，为什么把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判瞒着多数中央委员呢？比如说，怎么解释布哈林同志在谈话时对加米涅夫同志

说的话：“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人窃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盯我的梢，你这儿也有。我希望通情报，但不要通过秘书和中间人。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讲，但要告诉自己人，别攻击我们。”这些话不是清楚地表明，布哈林同志知道自己同加米涅夫谈判是在犯罪，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隐瞒与这次谈判相关的一切，而用政治局内部的一致和没有分歧的声明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谈话，布哈林同志大可不必这样严格地对中央保密，这难道不清楚吗？把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叫什么好呢？这里有什么诚实、良知、忠诚可言？如果布哈林同志把这称为原则性，那什么才是无原则性呢？布哈林同志的“原则性”不能自圆其说，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想就三个问题说几句。首先是关于辞职的政策。辞职这种做法是同党、党中央、同中央决议斗争的最糟糕的方式。

喊声：对！

斯大林：托姆斯基把选举卡冈诺维奇进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作为辞职的理由。卡冈诺维奇这个借口完全是虚假的。三位同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提出集体辞职时，还谈不到卡冈诺维奇的事呢。这事发生在11月，十一月全会之前，也就是在第一次提出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工会代表大会（12月底）召开之前两个月。请问，这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有什么关系？我记得，还在9月份布哈林就对我说过，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打算集体辞职。

托姆斯基：我10月才来——有证明。

斯大林：你可能是10月份才来，但关于集体辞职布哈林同志是在9月末或10月初对我说的。

布哈林：9月份我不在莫斯科。

斯大林：那你就是在10月份对我说的集体辞职。所以，辞职的念头你们在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就有了，也就是说，在提出卡冈诺维奇这个问题前三个月就有了。我再问一遍，这和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有什么关系？而且，从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你们三人在1928年7月就酝酿辞职。在这份《笔记》中布哈林直截了当地对加米涅夫说：“如果我们——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的话，那会怎样呢？”这不是在12月发生的，不是在工会代表大会期间，不是在11月份，也不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而是在7月份，也就是说是在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差不多六个月，在提出卡冈诺维奇同志问题之前六个月。

第二个问题——关于所谓的“恶意攻击”。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把所谓的“恶意攻击”作为拒绝服从中央决议的理由。这个“理由”经不起任何批评，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说实话，谁也没有像斯大林现在这样遭到“恶意攻击”。

喊声：对！

斯大林：举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为例，举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声明为例，最后，举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今天的发言为例——所有这些文件、声明、发言，不是对斯大林进行最凶狠的、不公正的、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还能是什么呢？这是不是给了我辞职的理由呢？当然，不是。你们找不出一个政治家没有被批评过，没有被最荒谬的流言缠往过。如果因此就要辞职，那就意味着必须禁止党员对所谓的领袖进行各种批评或者持批评的态度。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看事物的视角很奇特。按他们的看法，如果普通党员不执行中央决议，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党内法规的严厉处罚；而如果所谓领袖，例如，政治局委员，破坏了中央决议，那他们不仅不能受到处罚，也不能对他们进行普通的批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批

评会被这些同志看做是“恶意攻击”。不言而喻，党不能遵循这种虚伪的观点。如果我们对领袖们有一套法规，而对“普通人”有另一套法规，那么我们的党和党的纪律就不复存在了。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居然不明白这一点。

有人说，如果是列宁的话，对待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一定会比现在的中央要温和一些。这完全不对。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政治局的两位委员不断破坏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留在党给他们安排的岗位上，而中央并没有处罚他们，两个月来一直都在劝说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是怎样办的，你们好好想想。难道你们不记得，列宁同志由于托姆斯基同志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把他赶到突厥斯坦去了？

托姆斯基：那是由于季诺维也夫推波助澜，多少也有你的功劳。

斯大林：如果你想说，列宁同志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别人能够让他相信，那就太可笑了。谁能否认，在派托姆斯基同志去突厥斯坦这件事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列宁，而不是别人？你们再想想另一件事，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列宁提议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支部批评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个决议草案。谁能否认，现在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粗暴地破坏中央决议，明确提出反党的新机会主义政纲的过失，比上面提到的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过失要恶劣得多？然而中央不但没有要将他们中的任何人赶出中央委员会或者派他们到突厥斯坦的某个地方，而且试图劝说这些同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当然顺便也揭露他们非党的，有时简直就是反党的行为。我不知道，中央要多么温和才能让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满意。

第三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分歧。听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今天的发言，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分歧比表面上看到的要深刻得多。托姆斯基说，如果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中央

理事会主席团，那我们就会有二个中心。但如果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如果卡冈诺维奇和托姆斯基信奉同一条路线，中央的路线，那怎么会有二个中心呢？所以我们不是一条路线。因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一条路线，那就不可能有二个中心；要么不是一条共同的路线，那么二个中心就不可避免。再者，李可夫同志说，他在我们的农村政策上和我们有分歧。多么渺小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分歧就意味着在我们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上有分歧，这难道很难理解吗？所以，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有一条一致的共同路线。最后，布哈林同志声明，他不反对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但他坚决反对实际执行的党的那条路线。这又是耍的什么花招？怎么能把十一月全会的决议和中央的实际路线分开呢？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就是中央委员会、各个省委和地方组织实际执行的那条路线。如果布哈林同志坚决反对这条实际执行的路线，那就是说，他不同意党的路线，他已经有了或者正在形成另一条路线，也就是我们党内右倾分子（弗鲁姆金同志等人）以放开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手脚为方针的那条路线，而不可能是别的路线。因为二者必居其一，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旨在限制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富农，全力帮助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大力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大力发展合作制——要么这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布哈林同志及其同伙对中央的攻击就没有任何依据；要么这条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就会抓住另一条路线，来放松对资本主义分子的限制，放弃攻击富农，压缩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全部资金来支援个体农户经济，包括富农经济。非彼即此，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路线。这里有个危险，就是布哈林同志正在悄悄地靠近这第二条路线。

布哈林：我在哪儿悄悄地靠近呢？

斯大林：这第二条路线目前还不敢直接明确地提出。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突然出现了所谓的“灭顶之灾”，这条路线就会被抛出

来。这正是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的战略：现在对新政纲保持缄默，只限于做些暗示，然后当危机出现时，就公开发言。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谈话”中就是这样对加米涅夫说的：“我能不能避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见加米涅夫《笔记》）。

布哈林：那里说了——富农随便消灭多少都可以，但要同中农和解。

斯大林：说的不是消灭富农，而是说要限制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富农，尽力发展新的结合形式——通过合作化帮助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发展预购合同，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没有这些（指新的结合方式），就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

布哈林：对。

斯大林：这就是那一条具体的、实际执行的中央路线，而布哈林同志在发言和声明中却反对它。还能怎样从其他角度来理解布哈林同志的“军事封建剥削农民”和“破裂”等方面的攻击呢？因此，布哈林同志是不同意党的现有路线的。布哈林同志呼吁另一条路线，放开富农分子手脚的路线。

布哈林：你硬把这点强加于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斯大林。

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在这里发言说，存在着两条路线。

布哈林：波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也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吗？

波隆斯基：一条是拥护中央，另一条是反对中央。

斯大林：布哈林的心情倾向于辞职是因为他觉得中央没有执行它自己通过的那个决议，于是布哈林同志就认为，实际执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可这就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中央。

布哈林：决议说到储备。我说过我们花钱不很节约，假如我们能节约一点，那就会好一些。这怎么是反列宁主义呢？

斯大林：没有，这里没有什么反列宁主义的地方。但是，辞职和破坏中央的决议并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才是问题所在，布哈林同志。去年我们进口粮食并为此花费了4000万外汇。这是什么，是适量的消费还是过度的浪费？决议提出要积累外汇储备。我们正在积累，顺便说一句，并没有得到布哈林同志的任何帮助，而且一定会增加积累。这是好还是不好？粮食储备没有积累起来，是因为部分地方的歉收。那就让我们采取一切措施，不要浪费粮食。

布哈林：你为什么耍昧心地把富农路线扣在我们头上呢？

斯大林：如果你们没有另一条路线，那你们为什么要坚持辞职呢？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声明，在他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里面有两个中心？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声称，他的共产国际有两个中心？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而你们也没有和党的路线不同的另一条路线，那关于两个中心的说法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你们早在去年7月份就同加米涅夫谈到你们三个人可能要辞职？为什么你们在十一月全会之前，还没提出要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补选入全苏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时候，就提交了三个人的辞职声明。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这些辞职从何而来呢？如果只有一条路线，我们之间没有分歧，那你们为什么跑去找加米涅夫同志，试图和他们结成反对中央的同盟？这些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的诬蔑之词从何而来？你们怎么能在发表这些诬蔑之词的同时又断言我们只有一条路线？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等等言论从头至尾都是谎言假话，布哈林和他的同伙必须放弃这些言论，并且放弃辞职的做法；或者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打算继续污蔑党，同时坚持辞职的做法——那么谈路线一致就是欺骗，是对党直截了当的、不能容许的欺骗。

你们会问，出路何在？据我看，出路只有一个。会议必须坚决拒绝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联席会议必须谴责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这种行为。

布哈林：却支持加里宁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不，我并不建议支持加里宁同志的做法。我觉得，政治局委员里不会有人支持那种无助于巩固党内和平的行为。但我反对散布谣言，反对根据流言妄下结论，而轻信流言正是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特点。比如，昨天他说，政治保卫总局在监视他，没有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在场就不准他和作家帕纳伊特·伊斯特拉季谈话。我们大家都很愤怒并要求立即查清此事，如果布哈林同志所说属实，那就立即把罪犯开除出党。大家一致同意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尽快查清此事。结果怎样呢？原来，布哈林同志说的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无稽之谈。

布哈林：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对于你是，对我可不是。

斯大林：我也怀疑，政治保卫总局是不是有人搞错了。但调查表明，这件事就是胡说八道。

伏罗希洛夫：布哈林的秘书把事情搞混了。

斯大林：这之后还要请大家相信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关于路线一致的言论。比如，李可夫同志今天在这里说，7月份政治局内部的事情比现在糟得多。可是7月份在为莫斯科积极分子会上做报告时他是怎么说的？当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些都印在他的报告中）。应该相信哪个李可夫呢？是那个今天断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李可夫，还是那个在7月份中央七月全会结束后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李可夫呢？

所以，除了党的路线以外，还有一条旨在放开资本主义分子手脚的路线，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别的路线。现在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倾向于这第二条路线。是粮食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的困境引起了这种动摇。我们这些亲爱的同志们想通过辞职来逃避困难，或者至少是推卸自己的责任，然后当出现危机时再来攻击党。布哈林同志已经不是

第一次表现出动摇了。列宁是正确的，他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说到，布哈林有两大缺点：“1）轻信流言，2）在政治上极不坚定”（见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1916年3-4月）。为了消除在我党最高层出现的动摇，须要坚定地至少采取以下两点措施：1）谴责布哈林攻击中央并企图和加米涅夫结成政治同盟的行为；2）拒绝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辞职，责成他们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所有决议。

提议成立委员会及对委员会的指示

主席：同志们，可以结束讨论了吗？

缅仁斯基：我想请求发言。

主席：没人反对结束讨论吧？（通过）讨论结束。现在请提建议。

斯大林：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

伏罗希洛夫：接受斯大林关于委员会的提议。

斯大林：指示委员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相关决议，有三个基本指示：第一，谴责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行为；第二，就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对其错误给予政治评价；第三，拒绝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

李可夫：我有另一个建议：满足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调动工作的请求。

喊声：布哈林并没有这个要求。

主席：谁赞成斯大林同志的提议，请举手。谁赞成李可夫同志的提议？——三票。

李可夫：规定委员会的工作期限。

主席：委员会由谁组成？

布哈林：我能不能给斯大林提个问题？

主席：当然可以。

布哈林：我想问，你们通过的这个指示，是不是排除了我提的解

决方法，还是不排除？

斯大林：我提议让布哈林进入委员会，他可以在那儿提出自己的建议。

布哈林：我请求不把我放进去。但如果你们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就像当初对付托洛茨基那样，那好吧，我就进去。

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同志，你应当问一下：有没有人弃权？

主席：有人弃权吗？一票（菲加特纳）。

托姆斯基：我的体力不能胜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所以我请求把我1月14日的声明分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如果这份决议要分发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那就把我的声明也发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也许我们现在只限于发给本次会议的成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托姆斯基：我同意。

主席：关于委员会的组成。我提议委员会由以下同志组成：斯大林、谢尔戈、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哈林。

伏罗希洛夫：我提议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谢尔戈。

斯大林：还要加上科罗特科夫，也许还应当有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

主席：也许，由这些人组成：斯大林、谢尔戈、布哈林、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基洛夫和科罗特科夫。

斯大林：还要加上莫洛托夫。

主席：建议再加上莫洛托夫。

布哈林：我声明，我确实不能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工作了。

主席：付表决。谁同意上述八人的名单？多数通过。由斯大林召集。有反对的吗？

斯大林：我建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同志召集。

主席：谁同意由谢尔戈召集？多数。现在谈工作期限。

斯大林：一星期。

主席：有反对一星期期限的吗？没有。

斯大林：可不可以将布哈林的声明分发给本次会议的与会委员？

主席：将布哈林的声明分发给本次会议的与会委员。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038号案卷，第16—33张。
原件。有斯大林批注的印刷文本。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之二）

（1929年2月9日）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在我谈今天突然出现的三个人的宣言或称政纲之前，我想就李可夫同志的几点错误的、不确切的、不符合实际的声明说几句。李可夫同志的讲话中这种不确切的、完全错误的声明有许许多多。要驳斥这不计其数的错误声明要花费许多时间。因此我只限于批驳其中的几点。

1) 李可夫同志问道，既然我当时就断定，而且现在也仍然断定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和中央的路线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大杂烩，那为什么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我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一起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赞同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也没有调和分子的决议？李可夫同志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是在欺骗党，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同志们，我感到惊奇，一个成年人，而且称自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人怎么会在这里讲这样的废话。我为什么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呢？因为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也就是关于主要经济问题的决议。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政治局全体委员，其中包括布哈林同志，一致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所以我有根据认为，我们政治局内没有政治分歧。布哈林同志投票赞同十一月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是什么意思呢？它毫无疑问表示布哈林同志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从而放弃了他自己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错误。谁能否认，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

决议和布哈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之间有重大的原则差别？布哈林同志自己能不能否认，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和《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根本不同的呢？让他试试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看。既然布哈林同志不顾这两份文件的巨大差别，投票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十一月决议，那就是说，他放弃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他自己的错误。所以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我们政治局内不再存在政策上的分歧。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李可夫同志，这哪里有什么虚伪呢，怎么能够在这样严肃的大会讲这种废话呢？可是有另一个问题，的确是有趣的问题：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既然怀里藏着对党的种种攻击，什么“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啦，“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啦，“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啦，——既然这些同志藏着这些诽谤性的货色，他们怎么会在1928年11月投票赞同政治局一致的决议呢？如果说名副其实的话，这才叫做货真价实的虚伪，这才是真正的欺骗党。

（罗森霍尔茨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布哈林：早先的托洛茨基分子历来就是这样干的。

斯大林：我和你不同，布哈林同志，我既没有参加过托洛茨基派，也没有脱离过托洛茨基派。这一点请你注意。

布哈林：我说的不是你，而是罗森霍尔茨。

斯大林：2) 李可夫把加米涅夫的《笔记》叫做讹诈性的伪造。我对加米涅夫的信任程度也许不如李可夫和布哈林。不过加米涅夫同志是党员。既然他在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专门声明中肯定，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他的笔记符合实际情况，那我就不能说这份文件是伪造或者讹诈。

布哈林：符合他的信。这是谁也不否认的。

斯大林：是的，符合他的信，他的《笔记》，而信符合实际情况。这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们不顾这一切，坚持要把加米涅夫的这份文

件说成是伪造，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检验这份文件——把加米涅夫找到这里来，让他做出补充说明。所以我在前一次联席会议上才要求把加米涅夫同志找来。可是你们当时反对，请求不要找加米涅夫。你们为什么反对呢？是不是因为害怕真理，害怕进一步揭露你们的幕后活动呢？让人怎么理解你们害怕加米涅夫在会上出现呢？这是不是最准确地表明，你们内心里承认加米涅夫的《笔记》是正确的，现在害怕他进一步揭露你们的种种幕后阴谋活动，所以才竭尽全力反对召唤加米涅夫的建议呢？是不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关于讹诈性的伪造的种种议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为的是掩盖你们幕后活动的事实？

3) 李可夫同志坚决反对我们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把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的行为说成是派别活动。他连喊带骂，声称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不是为了结盟，而只不过是為了开诚布公地谈谈。这真是令人费解的怪事：既然是这样，布哈林同志为什么要向中央隐瞒他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呢？为什么他要瞒着中央，把一切涉及他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东西都隐藏起来呢？如果政治局委员同一些党员的谈话确实没有问题，他们会向中央隐瞒这些谈话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有些同志，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就安排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工作的问题同他们谈过话。事后所有这些同志都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了谈话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向中央隐瞒，也不可能隐瞒，因为他们是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去谈话的。可是布哈林同志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样，报告政治局他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情况呢，如果他的谈话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为什么他把这些事情都瞒着中央，而且千方百计地背着中央，告诫加米涅夫不要把和布哈林谈话的事声张出去呢？布哈林同志意识到他已的行为是犯罪，所以他才不得不瞒着政治局的多数，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此辞职政策和实际上对《真理报》、共产国际、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怠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布哈林同志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的派别活动，又

是什么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派别活动呢？

4) 我们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指出，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的谈判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即便“是不同意的，也是知情的”，李可夫同志说这是谎言和绝对的捏造。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说，根据是什么？难道加米涅夫的《笔记》里没有讲到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谈话是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知道，而且同意的吗？加米涅夫的《笔记》里有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的话：“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这话还能有别的理解吗？你们做了什么来批驳加米涅夫的这句话呢？难道你们今天拿出来的，由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签名的文件不能说明你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用特殊纲领结合起来的派别小组吗？你们作为反对中央多数人的政策的紧密的小组在政治局内活动，而且还在继续活动，这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久前在政治局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声称，他们是在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判之后就立刻知道了的。就算他们是在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判之后就立刻知道了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向中央报告呢？为什么他们要对中央隐瞒呢？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作为一个紧密的小组在反对中央，难道还不清楚吗？也许的确应当把加米涅夫同志找来，询问他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对布哈林同志谈判的态度？怎么样，你们不愿意吗？太可惜了……

下面我来谈今天提出的，由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署名的文件。

首先我就这份文件的突然出现说两句。它并没有事先分发给出席会议的人，而是突然间拿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些同志已经是第二次同我们玩花招了。第一次是他们拿出布哈林1月30日的声明，想搞得我们措手不及，没有得逞。现在他们又一次玩这个把戏。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决议草案里对这份文件做详尽的评价，因为决议草案在两

天以前就已经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不过这对于文件的作者只有更坏，因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这份文件将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批评。我们没有可能对三个人的这份文件逐条做出回答，因为靠听觉很难抓住文件的各个细节。可是文件总的精神是明白的，在这次会上就可以、而且应当对它做出批判，何况这份文件就其基本方针而言和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只不过是它更差的再版。

我认为，三个人的这份文件是一个基本上反对中央路线的政纲。迄今为止，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躲在布哈林身后，而把他推到前台。现在这出喜剧结束了。我们见到了三个人的政纲，再也无法掩藏了。

我觉得，三个人的文件打的是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盘：无论我们是所谓的“大难临头”，或者是不出什么乱子。这就是这份文件的两面性、内在矛盾和政治上经不住推敲。针对“大难临头”，文件提供了诸如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在党内实行“培植官僚主义”政策、“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等等材料。一旦灾难临头，就把这些材料抛出来，达到改变党的政策的目的。如果不出什么乱子，就把这些材料藏起来。为了应付不出乱子，文件准备了另一些材料，如“我们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有一些微不是道的“差别”，分歧已经过去，属于“历史的范畴”等等。因此这份文件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公开反党的灵魂，另一个是外交上温柔的灵魂。

文件的这种结构完全符合布哈林同志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表现在加米涅夫的《笔记》里记载的布哈林的言论中：“我能不能躲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

这种两面战略对我们而言不能说是新鲜货色。大家都知道，迄今为止我们党内的各个反对派集团都是遵循这种战略的。可悲的是

我们的同志现在也想走反对派的老路。

所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两面战略、等待的战略——哎，没准儿会出现危机呢。如果不出现危机，那就可以等待者，保持沉默。如果出现危机，就可以坦率地，完全公开地讲话。

布哈林：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拿危机来投机取巧是犯罪。

卡冈诺维奇：嘴上说说而已，实际行动呢？

斯大林：战略是很明确的：如果发生危机，那就把反对中央的全部武器都拿出来。顺便说说，没有危机，也不会出现危机，虽然他们很希望有危机。

布哈林：希望？

斯大林：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们在期待着危机。这就是你们为了给议论危机哪怕是找一点表面的借口，而把各种负面的事实和各种困难夸大到极端的原因所在。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近来我们这几位受人尊敬的同志为了展示危机的到来，采取了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涉及粮食问题。第二个行动涉及预算问题。近来政治局收到一个大量降低粮食供应的建议。这有点像是针对消费者，首先是针对工人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同志建议把粮食供应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的轻率让我吃惊。他们害怕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却非常轻率地主张对粮食的消费者采取这项非常措施。是不是局势要求采取这项措施呢？不是的。他们是想造成我们处于绝境的印象。检查的结果表明，我们完全用不着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奉派调查这件事的专门委员会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这以后喧闹声才停了下来。

李可夫：可是说的是检查米高扬同志的计划呀。

斯大林：李可夫同志，你老是爱拿别人来做掩护。今天拿布哈林。明天又拿米高扬。拿谁来做掩护都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能够分清什么是假象，什么是实情。关于预算曾经放出风声，说是预算有缺口，也许是5亿，也许是3亿，也许是2亿。因此就说必

须降低工资，提高工业品的价格等等。检查却发现，预算缺口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是的，同志们，你们觉得什么都是危机。可是不存在危机，也不会有危机，你们是盼不来危机的。

这份文件有一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有了什么成绩，文件的作者就喜欢把什么都记在自己名下。如果没有成绩或是遇到了困难，文件的作者就推到政治局的多数人，而且首先是斯大林同志身上。人们要问，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他们说，消耗储备是错误的，浪费了外汇储备等等。如果这都属实，那是谁的过错呢？尽管我应当在这里坚决地声明，说消耗错误是诬蔑。那是谁的过错呢？要支付拨款首先就要有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同志的签字。而经常受到他们指责的中央书记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给过拨款。拿我来说，经李可夫同志的手发出的几千万的拨款要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会知道，甚至还要更晚一些。我不是要用它来指责李可夫同志，因为我完全懂得，没有分工就不能领导我国的经济机构和苏维埃机构。可是既然事情是这样的，是由李可夫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出主要的拨款，那怎么可以推到中央政治局的多数人，或者中央书记处，或者比方说，斯大林同志身上呢？作为直接领导人的李可夫同志推卸自己的责任，这叫什么举动呢？

回过头来谈文件。这份文件有三个对党的主要诬陷。我们来逐个分析。

1) 文件指责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我想，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最终会放弃对党的这种可笑、幼稚而且愚蠢的诽谤。可是三个人的这份文件却轻易地重复了布哈林同志对党的这个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诽谤。文件援引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讲话。可是文件没有引用斯大林同志讲话的任何一句原文来印证自己的诽谤。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不能为文件作者提供任何诽谤活动的材料。也许，我应当引用我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

柯秀尔：是的，最好读一下，提醒提醒。

斯大林：下面是我在七月全会上讲话的摘录：

“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取消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不用说，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抹煞这个事实，如果我们闭眼不看当前的情况，即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可惜暂时还不能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那我们就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了。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看来还不了解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的论点是：农民购买商品付的钱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农民出卖农产品得的钱少了（这也是确实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究竟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调整粮价，要求立刻消除这种‘剪刀差’，消除这种少得多付的现象。但是，比如说要在今年或明年就消除‘剪刀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阻碍国家工业化，也阻碍农业的工业化，破坏我们还不巩固的年轻工业，因而也就是打击整个国民经济。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显然不能。应不应当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消除所有这些少得多付的现象呢？是的，无疑是应当消除的。我们能不能立刻就消除这些现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国工业，因而也不致削弱我们的国民经济呢？不，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什么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逐渐缩小这种‘剪刀差’，使它一年一年地接近起来，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业技术。这样就一定会使粮食生产的成本降低，

从而在若干年以后完全取消对农民的这种额外税。农民能不能忍受这种负担呢？当然能，因为：第一，这种负担将一年一年地减轻；第二，这种额外税不是在农民群众注定要遭受贫困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征收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征收的，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而且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缴纳的。”

下面是我在同一次七月全会上另一篇讲话的摘录，是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

“首先是关于城乡间的‘剪刀差’问题。指的是农民购买工业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钱，而出卖农产品仍然要少得一些钱。指的是这些多付少得的钱就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类似‘贡赋’的超额税，即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额外税；我们一定要取消这种额外税，但是，如果我们不想破坏我国工业，不想降低为整个国家从事生产并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社会主义的我国工业的一定发展速度，那么我们是不能立刻取消这种额外税的。有人不喜欢听这种话。托姆斯基同志也不喜欢听，看来，他害怕承认真相。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口味问题。有些人认为在中央全会上不应当说出全部真相。而我认为我们在自己的中央全会上必须说出全部真相。不应当忘记，决不能把中央全会看做群众大会。当然，‘超额税’、‘额外税’这些字眼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它们很刺耳。但是，第一，问题不在于字眼；第二，这些字眼完全符合现实；第三，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字眼正是为了使人感到刺耳，正是为了促使布尔什维克认真地来取消这种‘超额税’，来取消‘剪刀差’。”

你们看到，这里指的是，为了国家工业化而用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的办法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我把这种额外税叫做“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不是布哈林同志现在“诚实地”胡说八道的贡

赋)。因此这里指的是那种“剪刀差”，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其存在，但是不能立刻消除，不过一有可能就应当消除的那种“剪刀差”。我说的不是“贡赋的口号”（文件的作者造这样诽谤的），而是一旦有可能就消除剪刀差、超额税、“贡赋”的口号。我说的不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而是说苏维埃制度“排除了对农民的任何剥削，更不消说军事封建剥削了”。这全都是事实，只有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蠢货，或者害怕说出真理的胆小鬼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你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说的和文件作者对他的诽谤是完全对立的東西。

同志们，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讲话问题的真相。

最让人吃惊的是：布哈林同志对这种种事实了解得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少，可是他却仍然顽固地诬蔑并制造种种幼稚的谎言。在七月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发言是在我之后，为什么他在发言中没有指出，哪怕是最含蓄地指出他不同意我的发言呢？从中央七月全会到十一月全会之间，和布哈林同志，也和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就重大政策问题，首先就农民问题进行过争论，——为什么他们就“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问题从来不曾说过一个字呢？只是在加米涅夫同志那份尽人皆知的文件揭露了他们反对中央的派别活动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谈到“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今天这份文件的作者们需要“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为的是欺骗对政策问题不太熟悉的党员，用某种办法，哪怕是诬蔑中央来替他们自己的派别活动辩解，——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不仅仅具有以攻为守的意义，它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政治含义。既然文件的作者认为可以把党提高个体贫农和中农的经济、推广预购合同、培植合作社社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减轻中农税负、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说成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们也像

党内的右倾分子一样，企图立刻消灭“剪刀差”，实行恢复价格，从而消除国家收入的一个来源，而没有这个来源目前就不能维持工业化现在的速度。所以说“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是文件作者反对我国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的另一类抗议和叫嚷。文件作者需要“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降低、收缩工业化现有速度的政策。

2) 文件还指责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培植官僚主义”。对这种可笑至极的指责未必值得多说。既然中央在“培植官僚主义”，那是谁在反对官僚主义呢？我们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正是从对党和中央提出这类指责开始它们的活动的，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吗？有过这样的时期，文件的作者和其他中央委员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这样的指责。可是如今，在党开始了蓬勃的生活，党内民主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自我批评的方法一步步在党内取得它应有的位置的时候，文件的作者却像瞎子一样，在老反对派集团的迷途上徘徊起来。

最让人奇怪的是文件作者关于党的集体领导的议论。他们说，我们需要集体领导。完全正确。那么是谁在破坏集体领导呢？同加米涅夫搞幕后谈判，结成派别同盟，——这就是集体领导吗？还有辞职政策和实际怠工，——这就是集体领导吗？背着这样的包袱，怎么还能谈集体领导而不脸红呢？

3) 最后，三个人的文件对党提出的第三个指责是中央委员会仿佛在“瓦解共产国际”。看来，文件作者不喜欢最近3-4个月来坚持执行的反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斗争。看来，作者认为把右倾分子从共产党内清除出去的政策不如和他们团结一致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同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危险进行坚决斗争，以及克服所谓调和态度的决议还有什么意义呢？文件作者说是赞成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不过这只是口头上的声明。而最近他们实际上只是

在妨碍粉碎右倾和克服调和态度。近来联共代表团一再开会，以求解决同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斗争的主要问题。每次代表团开会我们都要求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出席，等待他们，一再推迟会议时间。可是他们总是回避，显然是不想插手开除右倾分子的问题。请看，他们是想在共产国际面前、在右倾分子面前，也在朋友们面前和敌人面前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以便日后可以站出来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斯大林和其他人搞的开除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这算什么呢？这叫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吗？你们在哪儿见过这种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布尔什维克呢？难道就是这样来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吗？他们想把开除右倾分子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那好吧，我们准备对这件事负责。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始终反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里的右倾分子，同他们作斗争。

李可夫：我是投票赞成把右倾分子开除出共产国际的。

斯大林：你们回避了，拒绝出席联共代表团的会议。我们找你们找了好几个小时，叫你们参加会议，在决定关于右倾分子的主要问题时，为了你们而推迟了代表团的会议。可是你们却宁愿待在托姆斯基家里，推托着不肯参加联共代表团的会议。

总之，我们在三个人的文件中看到了对党的三项主要指责，如果出现了所谓的“大难临头”，这些指责就会公开提出来：1) “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2) 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3) “瓦解共产国际”。这三项可笑的指责的反面就是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政纲的三个基本点：1) 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言掩盖着的降低工业化的速度；2) 用攻击“培植官僚主义”掩盖着的结成思想宗派的自由；3) 用“瓦解共产国际”的诽谤掩着着的给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提供外交保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文件作者放弃对党的这些责难，那他们的政纲不言而喻就应当作废；要么是他们不肯放弃对党的责难，那党就不得不揭露他们政纲的

机会主义实质。

这些都是为“大难临头”准备的。可是三个人的文件里对于不出现“大难临头”也有应付的办法。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种种声明，诸如声明政治局内“没有”政治分歧，声明只存在微不是道的“差别”，声明我们之间的分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正在消除：即使没有成为“历史”，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用多说，这类声明丝毫也不值得信任，发表这类声明只不过是玩弄外交手腕。不过就算我们现在确实只有一条共同的路线，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废话已经被埋葬了，“培植官僚主义”和“瓦解共产国际”也已经被埋葬了，既然如此，那辞职政策又从何谈起呢？难道统一的路线、不存在分歧等等会要求辞职吗？比如说，托姆斯基同志认为，如果他留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岗位上，他就一定会遭到“恶意攻击”，过一段时间他必然会被撤职。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托姆斯基：已经有了经验。

斯大林：啊，经验？很好。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会认为，如果他留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工作，过不了几个月就一定会被撤职呢？大概你们也有了“经验”了？现在我对你们是完全理解了。你们起初诬蔑党和中央，指责它们犯下了种种致命的过错。后来又宣称路线是一致的，分歧已经成为过去。不过你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辞职要求。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你们这样做是要表明，即使路线一致，你们也不可能继续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会遭到“恶意攻击”，然后就把你们撤职。那么是谁会进行这种“恶意攻击”呢？显然，是政治局的多数，是中央书记处，最后还有斯大林。因此，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斯大林从政治局撤下来，而不管是否存在分歧。因此，问题全在斯大林。

布哈林：照这么说，我们就应当辞去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不对，布哈林同志，加米涅夫记下的关于改变政治局组

成的话显然是正确的。尊敬的同志们，你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兜圈子。否则你们的辞职就是不可理解的。

奥尔忠尼启则：然后就扭转党的政策。

斯大林：对，同志们，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那好吧，请便。不过那就请你们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样子来，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不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为此你们才引用了列宁讲到斯大林粗暴的信。是的，我确实很粗暴。我过去没有否认过，现在也不否认我粗暴。我不是几次提出，请求解除我现在的职务嘛。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这几位亲爱的同志反对解除我的职务。我尽量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再次提出申请。我尽量这样做是为了夺走机会主义者手里的武器，他们企图滥用列宁的信件，用斯大林的“粗暴”来掩盖他们自己倒向机会主义一边。托洛茨基分子曾经滥用过列宁的信件。现在你们这几位亲爱的同志也跟在托洛茨基分子后面，想滥用这封信。那么好吧，请便。不过请你们注意，会出现一幅多么奇怪的图景。比如说，如果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诽谤党，指责它“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那么这不是粗暴，而是温柔。如果斯大林反对这种诽谤，揭穿它是对党的不体面的攻击，这当然就是粗暴，是斯大林的粗暴。再比如说，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搞幕后阴谋，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同盟，这当然不是粗暴，而是温柔。而如果斯大林揭露了这些派别活动的把戏，反对他们，这当然就是粗暴，斯大林的粗暴。这真是很有说服力呀。

可是三个人的这份文件玩弄辞职的外交把戏，其目的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在于激化列宁同志的信件问题。他们的外交把戏还有另一个目的，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目的。几个同志提出辞职是想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它向文件作者可以接受的方向改变政策。他们提出辞职，仿佛是在对党中央说：“我们提出辞职是因为我们不同意中央的现行政策，但是如果中央改变政策，使其有利于党内的右倾分子，有

利于解开对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子的束缚，那我们也许会放弃辞职，而宣布同我们的最高层领导完全一致。”

辞职政策的基本含义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屈服于恐吓，如果它们哪怕只有一分钟被这种不加掩饰的最后通牒所吓倒，那我们中央委员会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我们党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的政党了。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不论环境多么严酷，也不论多少人提出辞职，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都将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就让我们几位亲爱的同志明白，而且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吧。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038号案卷，第34—44张。

原件。斯大林做了标记的印刷文本。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关于《笔记》事件来信的答复草案

（不早于 1929 年 3 月 14 日）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草案

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将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1929 年 3 月 14 日来信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为了驱散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事件中的举止而在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引起的，委婉些说，误会。

然而，政治局不能不指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解释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感到不满意的是，莫洛托夫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同志在布哈林同志同他谈判这件事情中的行为是对中央的不忠诚。政治局必须指出，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加米涅夫同志不忠诚行为的意见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的确，加米涅夫同志在同布哈林同志谈判之后，为什么不直接到自己的党中央来，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统一、因而也是党的统一受到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今在信中称之为“右派”的那些人的威胁呢？这难道不是“忠诚地”对待自己的党中央，并且准备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帮助党”的党员的责任吗？加米涅夫同志宁愿进行幕

后谈判，背着中央委员会搞谈判，而不肯坦然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中央，——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还有，从托洛茨基 1928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分子的整个集团早在 1928 年 9-10 月间，即在中央得知之前 3-4 个月，对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一事，以及谈判的内容就已经了如指掌了。从加米涅夫同志同年 11 月 29 日向中央提交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他是知道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那封信的。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信散发以后，特别是在国外公布之后，托洛茨基关于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报道就变成了一份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文件。而且还应当指出，连加米涅夫的朋友和托洛茨基的朋友都知道幕后谈判一事，只有中央委员会不知道，因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知为什么认为应当把托洛茨基分子早已知道的事情向中央保密。如果不是加米涅夫同志不想报告中央，从而防止幕后谈判一事被利用于反党目的，那么被党开除了的托洛茨基分子消息如此灵通会是偶然的吗？这哪里谈得上对中央的“忠诚”呢？

再者，托洛茨基 1928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谈了两件事：第一，加米涅夫同志打算恢复同托洛茨基分子的结盟；第二，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了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托洛茨基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布哈林秘密地从后门跑去找加米涅夫，并答应‘交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代替。就是这么说的。加米涅夫当然愿意这样搞，不过他明白，布哈林政治上的保证并不比他经济方面的预言更宝贵。共产国际的这位领袖生活优裕，权力无边而又废话连篇，看看自己的身影，他是不会去找昨天被开除的人的。”

加米涅夫同志在 1928 年 11 月 29 日向中央提交的声明中驳斥托洛茨基断言加米涅夫同志企图恢复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结盟。可是在就

托洛茨基的信向中央提出的专门声明中，加米涅夫同志却令人奇怪地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另一个断言——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不曾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这个断言，以为它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捏造。然而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断言不是捏造，而完全符合事实。对同后来变成了党的敌人手中反对党及其领导的政治武器的布哈林同志“谈话”一事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这该怎么解释呢？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收到托洛茨基 1928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之后，应当立即就涉及同布哈林同志结盟的问题做出反应，并立即就这个重要问题向中央做出说明，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吗？以对党中央“忠诚”自诩的党员却做出这样奇怪的举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向中央发出警报，却宁愿等到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出来，让所有的白卫分子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哪里有什么对中央的“忠诚”呢？

政治局不能不指出，上述种种事实远非是有利于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应当承认，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果把党和党的统一的利益置于派别考虑之上，那就既不会发生幕后谈判的事情，也不会向中央隐瞒这些谈判。列宁教导我们说，唯一正确的政策是摆脱了幕后的、上层的阴谋诡计的原则性政策。不能说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整个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事件中是遵循了列宁的这个教导的。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 号全宗，
2 号目录，40 号案卷，第 90-99 张。副本。

关于加米涅夫记录的与布哈林谈话的《笔记》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之三）

（未经修订）^①

（1929年4月22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晚间会议

鲁祖塔克：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开会。

喊声：开吧。

鲁祖塔克：斯大林同志发言。（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反对派的某些同志的发言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之所以不想谈，是因为我犯不上替自己辩护。大家都是有经验的人。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你们自己能够做出判断，你们手里都有书，用不着我多谈这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谈布哈林同志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私交上是朋友，可是却分道扬镳了。他不满意。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也流露出这种口气。托姆斯基同志也带一点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不能互相尊敬了。

首先，我应当说明一点——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

^① 这篇速记记录经过修订后，以《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为题，刊载在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上（可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8页）。——本电子书制作者注

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即使他活到100岁，他也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绝不能突出私人友谊问题。因为如常言说的，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让私人友谊靠边站。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托姆斯某同志的发言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影射和隐约的责备。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是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演说，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

如果谈的是某些人的个人品格，如果谈的是友谊，如果谈的是某些同志的粗暴或者温柔问题，如果还引用了列宁同志那封著名信件的某些段落，那是怎么回事呢？曾经几次提出过我根据党的意志担任某种职务的问题，我曾经几次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你们是非常清楚的，党也几次拒绝解除我的这个职务。

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知道，不是别人，而正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首先反对满足我的辞职请求。这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现在事情起了变化，那就请你们做结论吧，我会很高兴。就让反对派的同志们——我把布哈林集团叫做反对派，因为它正是反对派——提出解除斯大林同志职务的问题好了。我想，这是我能够给他们充分支持的唯一问题。私人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现在我来谈正题。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说，有什么好争论的，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不过有些细微的差别，而差别总是有的，值得为此而大动干戈吗。如果这样说是对的，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为什么布哈林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企图和他组织派别联盟，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时要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如果不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我们

的工业就要灭亡？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要支持他？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么，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同志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说法怕是不对吧。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那个声明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三个人2月9日的声明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责备党培植官僚主义，责备党瓦解共产国际。

也许这些声明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这些声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我想，这些声明是错误的。那就让他们——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承认这些声明是错误的，他们放弃这些声明吧。可是他们并没看这样做。

同志们，怎么回事呢：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么，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斗争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么，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吗？

关于共同路线的话有点不对头。不能相信李可夫同志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同志们，这不能成立。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而只有细微差别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坚持辞职政策长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我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实行的辞职政策。

当时他们辞去职务，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线。

他们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成立社会主义的政府，也就是联合政府，而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求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不是联合政府。当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所以辞职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从原则上说是有道理的，可是现在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一一既然是一条，那么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进行工作的六个月内，顽固地一再提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同志们，关于一条路线的说法不大对头。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政治局表决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政治局中的三个人投票，其实是不投票，而是弃权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有人在我党现行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在五年计划问题上竟投了弃权票，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不，同志们，李可夫同志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这话不对，他要么是说走了嘴，要么是说了谎。很遗憾，同志们，我们的路线不是一条。这是机会主义者常用的手法——掩饰自己的嘴脸，如果没有一致的路线，就说有一致的路线；如果搞一条和党的路线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就把窟窿堵上，做得含含糊糊。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我认为，在这方面，在我们党是否存在一条统一的总路线方面，李可夫同志的发言是标准的机会主义的，否则他为什么不恢复政治局委员会在2月7日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建议，建议他放弃1月30日的声明（他对党提出了三项主要指责：实行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建议他这样做，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也同意取消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政治局委员会确实是这样做的。同志们，我们当时对他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1）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布哈林同志承认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是政治错误；2）布哈林同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

都是他在激烈的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3) 根据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4) 布哈林同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5) 因此，布哈林同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的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责任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政治局委员会建议布哈林同志，同时也是建议他的伙伴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又重复了一次，但是遭到了拒绝。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而我们大家都希望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特别是我，对这些争论感到厌烦了——如果他们拥护统一，如果总路线是一条，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这个建议呢？这是最大限度的妥协呀。为什么他们要拒绝呢？作为答复，他们在2月9日发表了声明，再次指责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同志们，请看，说政治局的多数同布哈林集团有统一的总路线好像不大对头。李可夫同志不过是极力把事情掩盖起来，关于统一的路线，关于总路线他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实际上他是在暗中破坏这条路线。这就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我想引证列宁同志的一段话，他对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刻画得十分深刻。列宁说：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读引文）……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

这就是李可夫同志的面目和他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发言的主要实质。

卡冈诺维奇：说得对。

斯大林：不是的，同志们，很遗憾，我们的路线不是一条。我们，布尔什维克，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但愿我们别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

伏罗希洛夫：但愿如此。

斯大林：我们要敢于面对真理，虽然它使人很痛苦。真理就在于我们并没有一条统一的路线。有党的路线、革命的路线，还有布哈林集团的路线、机会主义的路线。那么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问题有关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察觉到，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发言里谈过我们的分歧同我们国内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阶级变动的关系。既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点暗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国内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阶级变动。他们不明白，他们害怕这种变动。正因如此，他们在我们面临的新任务面前，在我们和欧洲所面临的转折面前解除了武装。

同志们，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国内、党内、中央内部（因为中央没有脱离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切的基础是我们国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那些新的阶级变动。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提出了许多口号，我不妨说，简直是令人头昏眼花的口号，有些……倾向的党员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事件而重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又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因为农村中富农阶层的势力加强了，粮食采购中出现了漏洞，我们的许多机构或者是不中用，说得厉

害一点是腐化了，不能同富农展开斗争。

事情进一步发展到我们着重提出了在我们所有的机构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简直就是所有的机构——党的、工会的、贸易的、工业的机构。

事情又发展到由于提出了改造工业时期的新任务，就产生了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因为，同志们，如果以为我们无须把全体职业上有组织的工人发动起来，无须放弃工会老一套的做法，放弃自流和暮气沉沉这些对于降低成本和改造工业有致命危险的做法，就能够完成改造的任务，完成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那就太可笑了。

还有，由于粮食采购的困难，提出了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大力发展国营农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查我们的合作社和经济组织的全部工作，要求加强工作，培养改造农业的新干部。请大家注意——改造农业，就是把2500万农户，把2500万农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要提高一片汪洋大海。

然后，着重提出自我批评的口号。这就意味着一切组织的革命，从上到下的一切组织，党的组织和非党的组织。他们必须把自己置于自我批评的火力之下，为的是使自己适应新任务，摆脱腐蚀，抛掉渣滓，像一把刀那样磨砺自己。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不清洗党本身，我们就不能巩固自己的组织，就不能改善它们，巩固它们。

请看，有多少问题，挠头的问题，所以一些惊慌失措的党员就嚷嚷起来了：这叫什么话——那边让你组织，这里又是自我批评的口号，那边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里又是清党，清理国家机关。真糟糕。怎么回事呢？问题在于我们提出了新任务，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而我们的阶级敌人没有睡觉，它们在做准备，通过城市资产阶级向我们迂回前进，这在沙赫特事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不是孤立事件，

不仅在煤炭工业中，而且在军事工业中，在交通中，化学工业中都有这样的破坏者。请大家注意，敌人在进攻，农村中富农的反抗在加强。可是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迄今为止，譬如说在1927年，富农都交出了粮食，后来就不给了呢。难道是粮食少了吗？其实问题很简单：过去富农还没有积攒自己的家业，还没有发展各种经济，购买机器、拖拉机等等。过去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得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以便积累流动资金，而现在他站住脚了，他可以灵活运用，可以把粮食囤积两年，而用家畜、燕麦、干草、蜂蜜、向日葵，用随便什么来周转，他可以灵活运用了，因为他有力量了，他想破坏我国的价格政策。这就是国内发生的变动，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无论城乡都有了巨大增长。这一切不能不使局势尖锐化，不能不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因此有了重新组织，敢新安排自己的力量，磨砺所有的机构，为迎接社会主义成分的前进做充分的准备。这是国内的情况。而在国外，在资本主义各国也在发生新的变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欧洲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方面是资本的进攻加强了，同盟歌业制度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反攻，工人阶级的左倾化，左翼斗争的加强，新的革命浪潮的因素在增加，以及与此相关的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尖锐化，同党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稳定性日益受到侵蚀，不断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着条件。同志们，这就是在我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那些阶级变化。那些看到了这种变化的人，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化的人，就懂得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的技巧，就像渔夫那样，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阶级斗争。有这样的渔夫，他们在风暴起来，小船摇来晃去的时候，敢于破浪前进。这是一种渔夫。还有另一种渔夫，风暴一起，他们就躺到船底下，还能往哪儿去呢？听天由命吧。这是第二种渔夫。在我们说到布哈林同志的这个集团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渔夫。他们不懂得我国和西方的阶级变动。他们不明白，

当阶级斗争打到他们脸上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经受不住，于是躺到船底下，哎，听天由命吧。

伏罗希洛夫：常言道：渔夫老远就能认出渔夫来。

斯大林：风暴里是认不出来的。我们必须磨砺我们的一切组织，加强自我批评的口号，我们首先必须磨砺我们的党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不是麻痹工人阶级，而是使它保持充分动员的状态。当我们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在共产国际和我们联共党内干这件大事的时候，这些同志，这些躺在船底的渔夫，却把我们的全部工作看成是对他们进行的人身攻击。这真是可笑，这是瞎子。我们必须磨砺共产国际的所有组织，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渣滓，清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加强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战斗，不断地选拔能抗御风暴的新领袖。可是他们却说：你们在对我们进行恶意攻击，这难道不可笑吗？这是瞎子。我们必须在国内转变我们的全部工作，以便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任务，迎接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活动，而托姆斯基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我们要重新审视报刊的工作，而布哈林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我们要磨砺我们所有的机构，而李可夫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这不可笑吗？人们只看到自己的肚脐，却看不见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看不见我们正在进行改造，在发动新的阶层，开始改造的伟大事业，逐步改造千百万个农业组织、农业单位（农民），正在重新装备工业，在共产国际方面正在掀起从共产党内清除社会民主党渣滓的高潮。可是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在他们眼里这都是个人事件，是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恶意攻击。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这就是糟糕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分歧的根源。在风暴来临时，有迎着风暴，破浪前进的渔夫，因为他知道要到哪里去。可是也有这样的渔夫，他们躺在船底下，任凭波浪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分歧的基础。所以每当这些同志

只看见自己的肚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政治局的多数都感到好笑。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阶级变动，看不见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看不见那些不解决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来看看共产国际方面的问题。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事情是从布哈林同志向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国际形势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提纲开始的。这个提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这个提纲在送交联共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

于是我们的代表团，联共代表团，还有德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都明白了这个提纲不合适。我们联共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3 或 25 处修正。

斯克雷普尼克：有五十多处呢。

斯大林：这种情况当然使布哈林的声誉受到影响，但这是谁的过错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和联共代表团打招呼，就把自己署名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后来联共代表团提出了一份新提纲，做了重大改动，新提纲如果和布哈林的旧提纲加以比较，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布哈林同志提纲中的第四个问题应当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做出修正，我不说其他次要问题。这些修正后来布哈林也是接受的。这就是稳定问题。按布哈林提纲的说法，资本主义世界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稳定性的新事情，相反，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对第三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国际范围内正在经历的时期，做这样的评价是我们联共代表团不能同意的，因为保留布哈林提纲的说法就是给批评我们的人帮忙，就是使我们站到了资本主义正在恢复的观点上，也就是希法亨的观点上，而我们共产党员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我们做了相应的修正，从中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稳定是摇晃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摇晃得更厉害。同志们，这

给各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明确方针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稳定是否动摇，是不是越来越动摇，它决定党在整个政治活动中遵循什么方针。我们正处在单纯集聚力量的时期，就是革命的低潮时期，还是处在训练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工人阶级自身准备迎接新战斗的时期，也就是准备打碎旧制度的时期。这是两回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基本任务之一。可是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而左翼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最厉害、最狡猾，因此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对此做了修正，因为不做这个修正就不能武装共产党去有效地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党内部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必须同时和对右倾的种种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问题在于：如果只谈和右倾作斗争，而忘记了同调和态度作斗争，所有的右倾分子就都说自己是调和分子。那你还怎么去抓他们呢。我们做这个修正的用意在于将反右倾斗争放在坚实的基础上。没有同调和态度的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同右倾斗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纪律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可是既然要加强我们共产党内的自我批评，加强从我们共产党内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渣滓，加紧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事情就很明显，党内的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系集团，破坏党的纪律。因此我们联共代表团提出了第四点修正，关于党的纪律，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同志们，这就是政治局的多数同布哈林同志之间出现分歧的第一阶段，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些修正。我们不能因为爱布哈林同志，就似乎不爱党，不爱共产国际。古时候，关于柏拉图这位当时最有权威的

人物之一（他的权威可是比布哈林同志大多了），有人说过，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现在也可以说，我们爱布哈林，可是我们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同布哈林同志的私交，为了他的威信，而不提出这些修正；不做这些修正，提纲就没有用。我要说，虽然布哈林同志接受了这些修正，后来也按经联共代表团修正的提纲做了报告，但是他没有贯彻到底，而在后来的发言中千方百计地避开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事实，是抹不掉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同志向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报告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积极分子会议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莫斯科的积极分子会议，是首都的积极分子会议，全党，甚至可以说共产国际的各党都在注意着，可是它的决议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调和态度作斗争。没有一个字！这是谁的错呢？当然是布哈林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过，联共代表团修正了他的提纲，他怎么能忘了呢？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维托夫和台尔曼事件。同志们，你们现在从共产国际史中知道了，那是不对的，那次事件可归结为利用维托夫这个汉堡党组织书记的事件，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一开始是不明显的，但是后来连瞎子都能看清楚了。布哈林同志引用了这件事的一些事实，他抱怨说，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很好地了解情况，他当时在北高加索，我也在北高加索，我们在两个地方，共产国际就问我们，怎么办？事情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反对台尔曼同志的决议（对于他的革命性我们无权怀疑），台尔曼同志事实上被解除了工作，可是根本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而是让它面对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既成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布哈林同志用密码电报回答共产国际说：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必须通知政治局……（读电报）”

请看，台尔曼已经受了一次侮辱，因为发表了德共中央的决议，现在布哈林建议他再一次侮辱自己，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开除维托夫，同时也承认自己被解除工作。“然后共产国际可以指出问题业已解决……（读电报）”。这就叫做领导！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哈特利用了维托夫事件，拉拢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领导，排挤了台尔曼同志，而且公布了自己的决议，把台尔曼没有做过的事栽到他头上。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现领导是正确的。格哈特和埃韦特却利用维托夫事件，撤换了这个领导，党的领导就转到了调和分子手中。而应当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布哈林同志却说：“台尔曼呐，别人朝你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公布了中央的决议，现在你自己再吐一口吧，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而让共产国际记录在案。它不便反对德共中央。”

难道有这样的领导吗？这不是领导，这是小学生！难道可以这样来领导党吗？谁还能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呢？也许，你们愿意听听我是怎样回答这封电报的？

喊声：是的，请你念吧。

斯大林：我那时在索契，布哈林同志在基斯洛沃茨克。我是这样写的：“由于我不了解全部材料，（读电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这就是说，调和分子利用台尔曼的错误，扭转了党的方向，把持了党的领导权，违反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共产国际应当拨正方向，赶走调和分子，让台尔曼回到领导岗位上去。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两封电报并同意以我的回电作为基础。这又是布哈林同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难道能这样领导一个党吗？这是小学生，而不是领导人。这当然又是布哈林同志不满意的。他抱怨说别人不听他的。既然不按六次大会的要求去战胜调和分子，反而让他们成了党的领导，从而削弱了反右倾斗争，还为此利

用了同党的政策毫无关系的一次偶然事件，别人怎么还会听你的呢？可是布哈林同志批准了这些事，还想要别人也赞成。他难道是发疯了吗？

我们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的第三个问题，如果愿意，也不妨叫做第三阶段，是在解决了维托夫事件之后反右倾分子的问题。关于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问题，关于开除布兰德勒与塔尔盖默的问题，关于共产国际的公开信问题，一一解决这些问题时布哈林同志都没有参加。他回避了，躲开了。他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说是主要领导人的话，他是联共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联共代表团曾经事先研究过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问题，召开过几次会议，等过他，可是他没有来。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共产国际反对德共党内右倾的公开信问题，可是布哈林同志不出席。这也叫做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过了一个月，全世界，连房顶上的每只麻雀都懂得不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是不行的，只是在这以后，布哈林同志才在政治局开会时说，他也赞成开除布兰德勒。可是在这之前，在一个月、两个月以前，当必须负起反对右倾、反对布兰德勒-塔尔盖默（他们得到像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支持）的全部重担时，布哈林同志却不见了。看不见他了。

第四阶段是和第三阶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当时正在讨论共产国际的问题，而且是作为有争议的问题来讨论的，布哈林同志提出了要求。他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要求台尔曼放弃自己的讲话，一一这正是德共中央同业已组成了派别的右倾分子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右倾分子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同德国共产党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

我们问他，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要求台尔曼同志放弃自己的讲话

呢？即便你能够证明他反对你了，何况你没有证明，请你拿出材料来。可是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说分发给政治局委员，而这篇演说正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演说。

我们问他：全在这里了吗？布哈林同志，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文件？他说：都在这儿，你们看看吧，我同意这篇讲话。

请看，在这之后怎么还能保护一个站在洪别尔-德罗立场上的人。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这之后布哈林同志当然有点尴尬，所以他就不到共产国际来了。我们每次问他：为什么你不愿意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却说：那儿都把我叫做右倾分子，敌视我，不肯帮助我，没有人同情我，我没法工作。

经过这些事之后形成的气氛自然让布哈林同志确实没法工作。

国内政策问题。联共（布）党内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我说过人们是多么庸俗地，多么个人主义地对待这种事情。

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是从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如果确实想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不认真对付，不能不考虑的那些重大变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我说过这些同志患了盲目症，很遗憾，他们看不见阶级斗争，看不见阶级变动，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有人会问：这种盲目症是怎样发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转到阶级斗争问题。我认为这种盲目症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反对派的领袖布哈林同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同志的一本小书《到社会主义之路》中那段人所共知的話。让我把这段话引证出来，为了说明布哈林同志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地对待我国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本小册子（他没有放弃这本小书，而且又一次肯定了其中的主

要原理)中说：“所以说，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读引文）……像租让企业那样。”

有些同志引证了布哈林同志小册子中的这段话，可是把最后一句话遗漏了，而罗济特同志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从座位上喊起来：“可是他在那里说的是承租企业家。”可是却给他帮了倒忙。

关于承租企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长入社会主义的不仅有富农，而且有承租企业家。（场内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可惜哈里曼已经离开了苏联。

伏罗希洛夫：那就只好不管他了。

斯大林：结果就是这样。

罗济特：这里说的是“异物”……

斯大林：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通过银行等等长入这同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异物，就像，比如说，承租企业那样，也就是说，富农的企业和承租企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异物，都能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就是在长入嘛……

斯大林：我们这些幼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也就是富农和，比方说，承租企业家，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听不清的插话）我们大家一向认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可是现在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不是不可调和，而是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前提的。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济特：问题就在这里。

柳布琴科：他希望你不要专政就长入。

斯大林：结果成了这样，资本主义也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斗争呢？

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喊声：听不清，请对着话筒说。

斯大林：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镇压资本主义，为了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既然资本主义也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是同谁斗争呢？

罗济特：问题就在于它是在长入。

斯大林：我看他是发誓要为布哈林同志效劳了，但是他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全场哈哈大笑）

喊声：不对，不是这样的。你不懂俄国谚语。

斯大林：我只是不想做“粗鲁无礼”的人。

施利希特尔：外交辞令。

斯大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城乡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只有阶级利益的协调，有一种协调理论……

罗济特：布哈林并不以协调为前提。

斯大林：有一种协调理论。

喊声：还有长笛呢。

斯大林：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协调一致就是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不可调和斗争的理论。罗济特同志，这两者绝对不能混淆。这种话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说的。法国的布伦坦诺或英国的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这样说还可以理解。他们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可以这样说，而我们直到今天这样说都是不行的。布哈林同志把列宁同志简单化了。他说：“你们何必骂我呢，嗯，比方说，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机构体系可以有各种途径。”——罗济特同志认为，承租企业家也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本人不是也这么说吗”……

罗济特：我没有这么说过。

斯大林：是布哈林说的。我们看看列宁的话吧。对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读引文）

这不是说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容许合作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而容许他们在我国，在我们专政的条件下存在。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将长入社会主义吗？没有这回事。这是从何谈起？不能这样诽谤列宁。幸好我们还活着，还有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学生，他们绝对不会让别人诽谤列宁。相反，要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几百处、几千处讲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的地方。我可以随手引证列宁的话，例如，列宁在送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就这样说过：“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读引文）”。

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罗济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曲解布哈林的意思。

奥尔忠尼启则：也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乌加洛夫：等他累了，我就说。（场内笑声）

斯大林：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这是列宁的公式。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它说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放弃阶级斗争，通过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是布哈林的理论。

罗济特：这话不对。

斯大林：他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这个错误，从对我国阶级斗争的错误态度就产生了布哈林同志的第二个错误。我谈到他是因为他是新反对派的领袖。

布哈林同志从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问题的错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我们越是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就越是加强。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里说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会加强。

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解释十分奇怪，他用机构的观点——绝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请听：“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读引文）”当然，这不是最尖锐的形式，因为还有更尖锐的形式，比如暴动。不过，就算这是最尖锐的形式吧。接下去：“（读引文）……直至绝迹。”

罗济特：这不过是布哈林举的一个例子罢了。

斯大林：我知道罗济特同志是满心希望保卫布哈林同志，他的保卫无济于事，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谈的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

罗济特：这仅仅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例子。（场内喧哗声）

柳布琴科：他这是在履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呢。

斯大林：怎么能说是一个例子呢？布哈林直截了当地说：“随着这些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越来越来少，以至最后绝迹。”罗济特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

罗济特：请你重复一下结尾。

斯大林：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1927年时，我们的工作是无流的，1927年我们采购的粮食很多，根本谈不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这么说来，我们苏维埃机关那时都是理想的，都好得很。1928—1929年才出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情，就是说，1927年以后我们的苏维埃机关、苏维埃组织才变坏。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阶级斗

争尖锐化。这是胡说八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这样来解释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吗？不能，绝对不能。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应当怎样来解释阶级斗争尖锐化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前进了，社会主义成分增加了，工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增长了，和这种增长同时，一些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相应地被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按列宁的公式“谁战胜谁”在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翻在地，同他们，用列宁的话来说，进行最后的决战，或者是我们被他们打翻在地。资本主义分子每前进一步，这对于我们就是损失，是我们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相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每前进一步，这对他们，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无疑就是损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这就是说，我们的前进——这是第一个原因。再有，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的绝对增长，他们的作用相对降低，因为我们增长得比他们快，可是他们也是在增长，他们的绝对值的增长使他们能够站稳脚跟，灵活机动地反对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反对我们的农村价格政策。我们的增长排挤了资本主义分子的某些阶层，迫使他们反抗，罗济特同志，你永远也找不到垂死的阶级和平地退出舞台的事例，从来没有这种事。不管我们的苏维埃机构是好是坏，因为我们的前进而将被排挤的阶级、垂死的阶级会拼死反抗，垂死的阶级决不肯自愿地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舞台。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诀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这就是我国资本主义分子反抗增长的原因。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增长和他们比重的增长混淆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如果他们，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反抗，这并不是说，他们变得比我们更强大了。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进行反抗，他们的反抗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日益衰弱，是因为我们成长得比他们快，他们感到自己的衰弱，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所以我国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才加强了。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反抗加剧的原因。如果

事情是像布哈林对阶级斗争、阶级反抗的理解那样，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如果事情像布哈林对问题的理解那样，问题仅仅是在机构，那我们就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让无产阶级保持着动员状态。因为按照布哈林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解，用不着唤起工人阶级，提高它的战斗力，所以这是有害的埋论。既有害，又危险。我们的政策、我们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反抗加剧的理解是：看到垂死阶级未日的来临，看到他们反抗的加强，要让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战斗的准备状态，保持动员状态，以便在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采取内战形式的时候，进行回击。这就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

第三个错误涉及农民问题，特别是中农问题。在我们政策和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农民问题上，布哈林同志和他的集团也有许多差错。在布哈林同志看来，我国的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就是这样描绘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我国的中农难道是中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这难道是贫农吗？他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糊口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这是美化现实。这个奇特的公式否认农民中现有的阶级集团之间的差别和分化。正确的是列宁，他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他这样说对不对呢？他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的。应该怎样理解呢？应该这样看：农民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阶级，它，按列宁的说法，每日每时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农民中有贫农，有不断分泌出富农的中农，还有不断分泌出更大的资本主义分子的富农。所以他才把农民称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如果像布哈林同志说的那样，农村只是一片贫困，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那么很明显，农民就不是那个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分子的阶级。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

我顺便就被解除了职务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彼得罗夫斯基

的事说两句。罗济特同志几次谈到这件事。我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列宁格勒真理报》寄去我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篇讲话。这是同红色教授学院谈话的一部分。其中引用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那段话。

我在那里说明，正因如此，我们同基本农民的联盟就意味着同每日每时从农民中分泌出来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

喊声：有人责备你右倾，你老是朝右边看。（场内笑声）

斯大林：你们想得到吗？我引的列宁的这段话被编辑部勾掉了。

（场内笑声，喧哗声）

乌加洛夫：可是彼得罗夫斯基并没有参与这件事。

斯大林：很抱歉，乌加洛夫同志，很抱歉。

奥尔忠尼启则：乌加洛夫来接罗济特的班了。

伏罗希洛夫：也来履行职责了。

斯大林：我就这件事给他写了封信。我问他是怎么回事？第一，我们有决议，不经作者同意，政治局委员的文章不能删节，其次，如果你想删，为什么删掉了列宁的引文。他回答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谁能相信是地方不够呢。总共才三行字，谁能相信呢，《列宁格勒真理报》就找不出地方来登。看来，是编辑觉得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话是不对的。

奥尔忠尼启则：是异端邪说。

斯大林：对，是异端邪说。那么，列宁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因为它分泌出资本主义分子，这话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结成联盟的思想是否矛盾呢？伊里奇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宣称，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工农联盟。那么他当时为什么要把农民定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是为了表明，工农联盟只有建立在同从农民中分

泌出来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是牢固的。

这才是对待农民问题，对待和农民结成联盟问题的正确态度。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结成任何一种联盟，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和全体农民，而仅仅是同农民的多数，同贫农和中农群众结成联盟，反对的也是农民一部分的富农，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联盟，而是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联盟，建立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伊里奇就是这样看待工农联盟问题的。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把农民说成是一堆穷人，而不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显然是向我们暗示，我们必须保持……

米高扬：在致富的过程中。

斯大林：〈必须保持〉和农民的某种联盟，仿佛任何一种联盟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有用的。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声明的。这不对，绝对是不对的。他和列宁对工农联盟的理解不沾边。

请看列宁是怎样谈工农联盟的。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是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读引文）”

不是任何一种工农联盟都需要，需要的是能够巩固工人阶级、能够在联盟内部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联盟。列宁还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的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这就是对工农联盟的看法。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且不是随便什么联盟，而是能够巩固工人阶级政权及其专政，能够保证工人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领导权的联盟。我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和农民的联盟，而是一种准

备消灭阶级的联盟。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在同中农打交道，而中农是一个中间阶级。它一方面是劳动者，接近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是私有主，因而接近资产阶级。谁看不到中农的这种两重性，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影响到理论，影响到政策，而且影响到市场。这里列宁同志关于农民（而且他指的是中农）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由于中农地位的两重性而产生的这种两重性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也就是确立国内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同志们，我看不出布哈林同志有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几乎是确信，布哈林不想搞明白这些细节问题，而赞成和农民的随便什么联盟。这从我要讲到的下面一个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市场问题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喊声：休息，休息！

斯大林：难道我真的讲了很久了吗？

喊声：请你接着讲吧。该休息一下了，那样可以平静点。休息吧。

斯大林：我不需要休息，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鲁祖塔克：要休息吗？谁赞成休息？谁赞成不休息？多数通过。

斯大林：新经济政策问题。从前面讲到的布哈林同志的所有错误：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尖锐化、农民问题、工农联盟的基础问题，从所有这些问题中产生的下一个错误就是他在新经济政策上的错误。

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新经济政策的锋芒，它的一个锋芒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我们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它的锋芒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容许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没有的、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同志记住了。但是，还有另一

方面，更重要、更有意思的一方面，布哈林同志却不曾看到，或者故意忽略了。新经济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容许完全的贸易自由，绝不是容许在市场上价格可以自由浮动。新经济政策没有这个意思。新经济政策是在国家及其机构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贸易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在我国市场上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价格自由浮动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也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资本主义市场上有这种事吗？我们努力抑制工业，不让它取得太多利润，使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因为工业品涨价不是我们的政策。同时在粮价有所提高之后，我们努力保持这些价格的稳定，排除了价格的自由波动，因为这使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活跃起来。这股自发势力想破坏事情的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实行了价格的自由波动，而布哈林同志在谈市场规范化时，在谈扩大商品流通时，在发出叫嚷时，在他说我们是商品的供应者，怎么能这样做时，他正是围着这个问题在跳舞。农民是商品的供应者，怎么能这样？他是在寻求，在指望，而且在努力提高到有价格自由波动的市场制度上去。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正在敲这扇门。当富裕的农民或是富农春天因为不满意我们的粮价，就把粮食囤积起来时，他们想干什么呢？是谁在帮助他们呢？是投机分子，他们支付两倍的价钱。有钱的富农想要什么呢？搞垮我们的价格。请你们读一读农民的信吧。富农也是农民，是有钱的农民。贯穿这些信的红线就是要价格自由。如果容许价格自由，又会怎样呢？布哈林同志围着这个问题手舞足蹈。如果容许按地区机动，提高粮价，那又会怎样呢？假定我们这样做了。今天我们提高了粮价。贫农秋天交出了粮食，而富农和富裕的农民通常是把粮食囤积到春天或是冬末，因为他们能够用其他商品来周转。事实就是事实。两年的实践表明，比如说，我们，就是国家，需要5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办法，用通常的市场关系可以采购到3亿-3.5亿普特，其余的1.5亿普特就只好用有组织的办法，用

捐献的办法，用施加压力的办法等等才能拿到。这是事实。两年来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我们必需的粮食储备的。显然，如果我们今天再提高粮价，投机分子一定会付两倍的价钱。到了春天又会出现粮食困难。也就是说，还得提高粮价。我们反正是赶不上投机分子的，我们也没法超过他们。这样一来，到了春天或是冬末，就是贫农已经在秋天卖出了自己的粮食以后，把价格再提高 10-20 个戈比，而投机分子则再提高一倍。

我们只好又提高价格。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买 5 亿……而是几百万。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明天、后天都提高粮价，因为没有办法。如果想得到粮食，而又不得罪富农和富裕农民，只能这样办。只好压其他农产品，因为畜产品、谷物类产品和其他农产品之间总得保持一定的价格比例。于是就要提高工资。因为我们在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时，不能不提高城市中的粮食销售价，同时提高工资。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委屈工人。既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就得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否则怎么办呢？否则工业怎样运转呢？结果是：我们暂时缩小剪刀差，但不是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下，而是在片面提高粮价和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工资要涨，工业也只好提高产品价格。结果我们只好放弃逐步降低工业品价格和稳定粮价的政策，以及随着粮食生产技术的改进而降低粮价的政策，而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我们放弃了这个明确的政策，而滑到另一种政策上去，滑到在不断涨价的基础上安排剪刀差的政策上去。这打击了谁呢？贫农、农民中的弱势阶层、工人阶级。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城乡资产阶级。这无疑也是一种结合。请注意，这也是一种同农民的结合，然而同哪些农民呢？同富裕阶层结合，而同贫农破裂，同工人阶级破裂。任何一个工人都会说，既然你们的商品太贵，贫农买不起，你们算什么政权，见鬼去吧。既然粮食和肉类等等畜产品的价格这么高，工人买不起，你们还算什么工人阶级政权。

我想，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破坏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政策，布哈林则跟在它尾巴后面。他从我们的价格政策滑到了另一种价格政策，资产阶级的价格政策上去，滑到了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平衡商品流通的政策上去。这只能导致国家同富裕农民结成联盟，而无疑地同贫农破裂，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贫农的政策。这就是布哈林的方向。问题的第二方面表现为国家不能调控价格。结果怎么样呢？加强了富农的权力，富农对农民的经济权力和剥削权力。这就是错误政策。

贡赋问题。

我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中，在报告中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流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这对不对呢？对。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剪刀差”，另一种说法是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一定速度，是否须要把一部分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呢？须要。我有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我不记得他们有过）必须从农业中抽一部分资金用于加强发展工业。我有一系列我国最高层的决议，谈到我们现在还不能消灭剪刀差。这就是剪刀差、抽入、超额税。我把它叫做“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醒目，提醒人们要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改进技术，使生产合理化，继续执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从而拉平，加快拉平的时间，加速取消我们现有的剪刀差的时间，降低我们现在承认的，但是最终必须尽快摆脱的最低限度的抽入。也许布哈林同志现在不承认抽入的理论，那就请他明说。也许李可夫同志不承认？也许罗济特同志会不停地插话，也许他不承认抽入？

罗济特：抽入是需要的，但“贡赋”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场内笑声）

斯大林：安静些，罗济特同志，别激动，激动对神经质的人来说是有害的。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我们只能把一些资金从农业、从农民“抽入”工业，来保证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抽入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等等不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问题，这已经得到证明了。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是用词不当吗？是这样吗？我说的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超额税，不是贡赋。

罗济特：决议里用的是“贡赋”。

斯大林：这话不对。决议里说，苏联的经济制度排除对农民的任何剥削。这都是事实，就是说，谈的是字眼，虽然我用的不是贡赋，而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甚至用于工人阶级。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这怎么可能，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或是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决议里，或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里怎么能用斯大林的话——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而且还得到了公认。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举出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初的讲话。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保留着坦克的小资产阶级……（读引文）”。“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读引文）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罗济特：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用过“贡赋”这个概念。

斯大林：如果你以为中农比工人更靠近我们，那你就太丢人了。我见过许多傻瓜，可是像你这样的还没见过。（场内笑声）

罗济特：其实这话并不俏皮。

斯大林：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赋”，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你们会说，这是列宁同志偶然的失言。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接着看下去，

在列宁的一个小册子《论粮食税》里，这些话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你们再拿《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来看一看，这里也说到这段引文。再着《列宁文选》第15卷第266页（这是1918年末），关于贡赋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里又重复这些话。再打开第18卷，第一部分，第205页，这段引文从头到尾重复了三遍。同志们，我要说，我有幸同列宁做了伴。

奥尔忠尼启则：就是这样。

斯大林：既然对于工人都可以说他因为混乱、因为组织得不好、因为缺点而付出了贡赋，是加括号的贡赋，为什么对于农民就不能谨慎地说“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呢，何况我还说了剪刀差、超额税、补充税，为什么就不能这样说呢？

罗济特：这不是对工人阶级，而是对专家说的。

罗伊津曼：可以说，也应该说。

斯大林：像《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左派幼稚病》、《论粮食税》这样的著作里，列宁把这些话重复了三次，我认为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你们怎么看呢？我甚至没有料到，在列宁同志的著作里贡赋这个词会得到了公认。

当布哈林同志谈到马克思主义者不该这样说时，他指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指的是施列普柯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济特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指的是那些更像自由主义者，而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他们当然不会这样说。如果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带括号的贡赋一词是可以使用的，指的是这件事非同一般，指的是一有机会就应当立即取消这种贡赋。这就是事情的实质。但是“贡赋”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同志挑剔“贡赋”这个字眼，而且似乎党对农民实行的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这不是偶然的。你们以为，他不过是想出我的丑？不对，他这话是暴露了自己。他是想表示

他对于我们实行的党领导农民的政策、对我们的收购价格政策、对我们的组织供应的政策、对我们推行乌拉尔的采购方法的政策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我在下面还要谈。这些他都不懂，所以认为我们是在剥削农民。

这个词是从谁的武库里拿来的，是从哪里拿来的呢？

柳布琴科：是从《最近新闻报》里拿来的。

斯大林：是从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这是米留可夫的玩意儿。当立宪民主党人想要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搞建设。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附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叫嚣呢？为什么呢？难道他就找不到别的词，找不到米留可夫以外的，别的武器了吗？他怎么会这样来指责党，指责列宁的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呢？你们知道，这是怎样的指责吗？这是迄今为止，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只有米留可夫才公开对党提出过的指责。

布哈林同志对“贡赋”问题的挑剔中表现了他对我们现在实行的领导农民的政策完全的、彻底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不满。这表现了他心里积累的火气，由于不明白阶级斗争，不明白阶级斗争尖锐化，不明白农民问题，对工农联合持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产生的火气。

喊声：休息。

（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鲁祖塔克）：继续开会。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同志们，我列举了布哈林同志的主要错误。同这些错误有联系的有一个问题，就是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我应当就托姆斯基同志说几句。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他宣称结合算怎么回事呢，结合的新形式是对列宁纲领的修改，

是修正主义。这当然是可笑的事。

我应当说，从字面上看布哈林同志至少还是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他在自己的修正中写道：“鼓励和发展工农业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结合的新形式”。他在对五年计划提纲的修正中承认这些新形式。托姆斯基同志也投票赞成这些修正。政治局委员都知道这事。怎么能够既投票赞成结合的新形式，又声称这些新形式是修正主义，是对列宁的修改呢。这当然是错误的。也许，托姆斯基同志还没有读过“修正案”，就给它投了赞成票了？

奥尔忠尼启则：他完全信任，所以用不着读了。

乌加洛夫：这就不对了：他是聋子，可是阅读能力还是有的。

斯大林：或者是托姆斯基同志并不理解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或者是他闹了个莫名其妙的误会。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这是说，迄今为止，事情是要把转交给农民的原先属于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经营起来，迄今为止实行的都是这样一些结合的形式，其主要基础是商品交换。如今，农业进入了生产改造时期，农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开始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某些过程开始通过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协助下签订预购合同而联合起来，还通过集体农庄（这里联合起来的已经不是劳动的某些环节，而是农民的经济）。在这个时期新基础采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包括的主要就是签订预购合同，依靠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商品流通保持结合的旧形式，经过结合的生产形式建立新基础。结合的生产形式涉及粮食生产本身，而不仅仅是粮食的商品率，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为农村换来花布等等，为城市换来粮食，而且还有机器、拖拉机，——这对农民改造生产是直接的帮助，而不仅仅是为了多一点花布，可以穿得好一点等等。这是从结合的旧形式（它仍然有效，而且只要还存在阶级，就为我们所需要）转到用新形式对它加以补充。新形式通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集体化，它

使农民经济能够重新装备起来。

结合的新形式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正在借助工业来重新装备，而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新装备了农业。

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装备农业。农民总不能使用陈旧的劳动工具，运用自己对农业的原始观念和老经验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吧。在我国，新工业中心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增长着，旧中心在发展，新的工业巨人——工厂不断涌现，人口增长得比任何国家都快，工业正在重新装备，——这都是事实，因为工业建设的基础是新技术，而农业却停留在原始的、陈旧的耕作方式上，使用旧式工具，而农民使用旧式工具是不能完成日益增长的我国工业向他提出的那些任务的。我们需要的商品粮一天比一天多，但如果我们不重新装备农业，农民就不能满足需求。而重新装备农业生产，这就是说，要依靠新的结合形式、生产的结合形式。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重新装备工业，改造工业。我们提出了重新装备农业，改造农业的任务。为此必须加紧发展工业，使农业工业化。迅速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广泛采用预购合同……（读文件）。由于个体农业在供应工业和工业点方面，在提供粮食和原料方面都在数量上起过，今天还在起着，而且今后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它必须大力支持。不过，问题当然在于依靠个体经济满足不了工业城市的需求。仅仅依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但是个体经济今天还是主要的，它曾经是，今天还是，以后也是主要的。但这不够。需要用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用合理的手段，如广泛订立预购合同，逐步把个体农民经济引导到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联合和巩固的道路上去，从而找到一条为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保证千百万农民能够站起来所必需的道路。在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平等的问题、贫困的问题、农民贫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逐步和个体经济脱钩，让个体经济和集体

经济结合，变成集体经济。这是可以使千百万农户站起来，把他们吸引到集体中去，让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有人说出现困难的暂时性原因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不讨论暂时性原因的问题。奇怪的是有人责备中央，说中央不懂得除了暂时性原因之外，还有由于软弱而产生的特殊的、根本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七月全会的决议里已经公开地、清楚地谈到了。在谈到结合的新形式时，我们宣布：结合的新形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和消除农业脱离工业的根本原因，基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就是说，提高农业，使它能够不仅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能出口一部分粮食，以使用得到的外汇输入机器设备，并且留下一定的储备，准备应付战争、饥荒和其他难以预见的意外事件。基本的道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多谈这个问题了，因为讨论加里宁同志的提纲时，会讨论结合的新形式问题的。所以我只是稍微提一下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主要问题。

布哈林的计划的这一部分。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但实际结果如何呢？他要求的第一点就是使市场规范化，容许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浮动，容许提高粮价，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工业品涨价；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

我引用布哈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吓唬我们说，我们是揪着农民的头发，把他拖进集体农庄，说这可能造成农业和工业的破裂、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破裂。我来引用布哈林同志至今瞒着中央的提纲，这份提纲他一直不肯交给我们，而是在中央七月全会之前作为他们集团的纲领提出来的。他在提纲中说，应当抑制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不应当醉心于国营农场，因为一切的基础是个体农民经济，而那些说个体农民经济的能力有限的人，他们是反对工农联盟。

迄今为止这份提纲还在他手里。他在这里威胁说：你们要是逼我的话，我就把这份提纲掏出来。可是他至今不曾履行这个威胁。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认为，布哈林心里是赞成这样提出问题的：一切的基础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

接着他谈到用听任自流的办法采购，排除了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部分地或是普遍地采用非常措施。他像牧师逃避小鬼一样躲开非常措施。他赞成听任自流，他说，通过规范化市场、扩大商品流通、价格波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粮食，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非常措施。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伊里奇对非常措施持另一种态度。他说，在一定条件下，我们或许不得不采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这可是比非常措施严厉得多了。

如果粮食不够，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在政治局对我们说：从国外输入 8000 万普特，后来又说 15000 万普特粮食。这大约值 1 亿卢布。如果外汇不够，那该怎么办呢？那就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因为我们在用外汇输入设备和机器。否则，按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说法，农业就要原地踏步，甚至是衰退。因此，按布哈林的看法，国家工业化和改造农业的关键不是加紧发展工业，而是加紧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你们看，这一切都是颠倒着的。他字面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这很好。党认为，改造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向前进的问题关键都在于发展工业。为了这个目的，一切都应该牺牲，因为一切的关键，包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都在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没有机器就不能提高农业。而他，布哈林同志，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却把事情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一切的出发点和关键都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我们党的钥匙是发展工业并保持它的速度，而布哈林同志则把发展个体经济看成是一切的关键。为此可以不爱惜外汇，用外汇储备去输入

粮食，为此可以放弃使用非常措施，为此必须规范市场，容许价格自由波动，为此可以从右边来摧毁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分子从左边破坏过新经济政策，不承认商品流通是基础，而布哈林分子从右边破坏新经济政策，不承认采购价格和由国家调节价格的政策。请看，虽然他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是必要的，却把一切都颠倒了。这就是布哈林同志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最后一个主要错误。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在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对于作为发展工业和保持一定速度的补充的结合新形式是不是抓得太晚了呢？我听到有的人在说，我们抓晚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安德烈耶夫同志好像就说过，我们晚了两年。这是不对的。我想，我们抓这件事是及时的。晚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指的是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大规模地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就走不上正路，那我们是早就预见到了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预见到了，还要实现它。问题在于党要相信它，农民也要相信它、欢迎它，而且还需要资金。

米高扬：必须有资金。

伏罗希洛夫：必须有发达的工业。

斯大林：党的首脑机关早就知道个体农民经济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极限的，毫无疑问它是不能发展的。如果我们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就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起来，变成大经济。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月革命中，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天伊里奇就说过，就教导过我们，关心过这个问题，每次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关的会他都要讲。这我们早就知道，可是这还不够。如果党的首脑知道的事，如果党的首脑相信是正确的政策都能够执行，如果一切都能够自然地实现，那就太好了，可是生活里是没有这种事的。必须使党也相信，使党支持自己的首脑。党怎样才能相信呢？有了事实才行。我要说，从去年起采购困难和危机打击了我们，只是在这以后，党员群众才相信了，没有国

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办不成事的。必须要有了去年的粮食采购的困难，必须要有了危机，粮食危机之后，党员群众，几百万党员才明白，党的首脑是对的，必须最后彻底地走上群众性的扩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道路。

同志们，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不是首脑把党引向前进，而是党自己要前进，这就须要使党信服，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这还不够。要使农民也相信，使贫农、中农中的弱势阶层也相信，让斗争的实践说服他们把小经济结合成社会化的大经济。要使个体小农经济放弃它的窝，放弃它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不到必要时，它是不肯放弃的。所以必须在农民中自下而上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运动。起初要先推广合作化运动，要把千百万农户组织到农业合作社里去，还有消费合作社。要让农民认识在经营活动中集体化的意义、作用和比重。要自下而上地由贫农和弱势中农自愿地开展一个建立集体农庄的运动。没有这一切，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就发动不了广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没有这一切，国营农场就会被农民搞垮，因为他们敌视国营农场，而国营农场确实一度遭到农民仇视。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我们就不会有一年增加几万个集体农庄的事情。这就是第二个条件：自下而上的集体农庄运动。没有它，要大规模改造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还有第三个条件：我们必须有资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需要大量资金。我们用了几亿卢布。这还只是我们新建的国营农场，不包括旧的，3-4年内需要50亿卢布，而旧农场需要大约3亿卢布。集体农庄也需要资金。大概也不少于10亿卢布。必须积累资金。直到今天我们忙于工业。须要在工业里积累一些，须要搞好国家财政，还要积累一些储备，才能真正地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需要三个条件：除了党的领导，党本身也要坚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上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道路；其次，必须自下而上地开展集体农庄

运动，让农民自愿地参加运动，而不要强迫他们参加；第三，要实现积累资金。安德烈耶夫同志不妨说说，三年前有没有这些条件？他不敢说，三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开展广泛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资金，全党都相信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我们就有了足够的钱来提高新的和旧有的国营农场，来养活集体农庄。他当然不敢这样说。所以我说，执政党不能提出一个口号以后就把它忘了。既然说了要改造农业，那就要做，而要做就得有资金。这是一。要有党的支持，这是二。要有农民的支持，这是三。这些条件都是最近两年才有的，所以我说，抓这件事我们并不是太迟了，而是很及时。

新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同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有人说，布哈林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当然是理论家，而且是大理论家，这是应当承认的。但是，他那套理论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分析的他在党的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这些错误是从布哈林同志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同志是党的理论家，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还须要补习一下。有人援引列宁同志的话，说是列宁推荐他的。让我们来读读列宁的这封信吧，看看他关于布哈林同志的理论禀赋和理论准备说了些什么。他是这样写的：“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读信）”

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家，在辩证法方面有缺陷的理论家。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须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同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须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

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么他就会谦虚一点。但是，同志们，糟糕的是布哈林同志不知道谦虚。

让我援引一件事情，它很典型地说明，布哈林不自量力到了什么程度，以至在国家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他认为自己比列宁还高明。你们也许不相信，所以我只好回顾一下历史。这不用花很多时间，不过我应当把事情讲完。

1916年列宁和以布哈林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在国家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争论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共产党人是被称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理解国家的，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布哈林同志用N的署名在《青年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宁同志认为，这篇文章是混乱的、错误的，就在一篇短文里提出了批评。列宁的这篇文章是短评，现在收在《列宁文选》第13卷第461-464页。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不明白，以为批评的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一个叫N的人，其实那就是布哈林同志。当时布哈林同志关于国家以及社会党人，也就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态度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读引文）”

列宁批评说：“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读引文）……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这是列宁的话。布哈林接着说：“社会民主党人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师，如今比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自己对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读引文）……在工人心中。”这是列宁的回答。诺托贝纳^①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读引文）……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

① 原件如此。

斯腾：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

斯大林：斯腾同志，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国家。

斯腾：列宁当时只谈到利用国家的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斯腾同志。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你不妨试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这是完全否认过渡时期中的国家。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没有国家是不行的，也不能对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诺托贝纳是怎样界定将来的社会的，他是怎样界定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组织集中的社会生产，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倾向于不要组织。这就是根源，是差别。”难道问题就是这样的吗？无产阶级专政哪里去了？这些同志疏忽了一件小事情，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没有国家是不行的，而且工人阶级当然不能对任何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他敌视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他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在1916年。布哈林同志没有直接回答这篇文章。

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1925年，布哈林同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又说（后来他的讲话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公然声称：在当时他同列宁的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来读一下：“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

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就算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过：弗·伊·要我转告，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布哈林没有意见分歧了。谁都会懂得，没有分歧是因为布哈林承认了自己不对。我就是这样理解的，而不是说列宁过去不明白，只是现在才认识到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在国家这个基本问题上列宁同志向布哈林靠拢，而不是布哈林向列宁靠拢。结果成了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诺塔贝纳署名，但它是存在的，遭到列宁的批评，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没有回答。只是在列宁去世后，布哈林同志才做了回答。你们怎么看是你们的事。可能，在国家这个基本问题上，列宁向布哈林靠拢了。就算是这样。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布哈林的学生，而不是列宁的学生？也许今后不应当讲列宁主义，而应当讲布哈林主义？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问问罗济特！

斯大林：不过事实说明，布哈林企图发展半无政府主义的东西，显然列宁是正确的。布哈林一声不响，等到列宁不在了，他才跑到共产主义科学院去讲了一通，又发表了谁也没有见过的一篇文章。有人会问：值得去关心 1916 年的那些事吗？值得去关心 1925 年的那些事吗？也许你们是对的，不值得关心，可是总得有人研究这些东西。列宁并不是布哈林的学生，恰恰相反。

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也许布哈林是失言了，说走了嘴？同志们，不是的。这些话他在 1927 年又重复了一次。你们看，1916 年开始的争吵，停了九年，到 1925 年布哈林又重新提起，批评了已经不在人世的列宁。现在你们不妨看看 1927 年的苏联百科全书，布哈林词条，是马列茨基写的。

喊声：对！

斯大林：那里散布的是同样的货色，说在国家的理论问题上，列宁是错的，布哈林是对的。是列宁向布哈林靠拢。

卡冈诺维奇：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也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你们看，在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一大堆原则性的错误。

这里有一个声明，说他是党的理论家，可是他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不懂辩证法。可是布哈林却有这么大的野心。原来，他是列宁的老师，而我们是布哈林的学生。同志们，这有点可笑，可是这是事实，布哈林的野心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发言。如果说布哈林给右倾提供了理论根据，我是这么看的，那么李可夫在发言中就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李可夫同志没有涉及各种理论问题。不，他涉及了两个大理论问题。就这些问题我要说几句。第一，李可夫生气了，因为别人不承认他的提纲，不同意他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他把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说成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他生气了。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说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米高扬：是思想。

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蠢话，是胡说八道。难道我们需要的是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发展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生产率的一定发展，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各种计划——年度计划，两年计划，五年计划，十五年计划——的关键所在。苏联经济总应当同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吧。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提出了发展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务。任何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封建主义社会也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好，苏维埃社会也好——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的一切计划首先要关注什么呢？是生产率的单纯增长吗？完全不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不是能够保证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占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增长。因此任何一种计划（包括五年计划在内）的中心任务都不是单纯的劳动生产率的的增长，而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对非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正因为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能够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增长，所以这项任务才是任何计划的中心任务。

第二，他说从商品流通的观点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之间，特别是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经济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已经有人谈过了，我不来多说，只是简单提几句。你们想必记得，弗鲁姆金当初就这样说过：在我们看来，向阿根廷的资本家，向粮食投机商，向中农还是向富农，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这有弗鲁姆金的味道。这是不对的。当然不能把商品流通和生产割裂开。商品流通是生产的一部分。我们要从生产是一切的基础这个角度看问题。什么人生产——这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是从阿根廷或是北美的粮食商人那里，或是从集体农庄那里，或是从中农手里、从富农手里买粮食——这对我们并不是都一样的事情。

五年计划和两年计划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断定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拒绝了那个计划。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用平行的两年计划来冲掉五年计划之外，我们看不出这里还有别的目的。我们问李可夫同志：如果你对农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那就让我们把它加进五年计划里去。你看，这是五年计划，里面有拨款计划，有基建投资计划，有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计划。也许，还缺点什么？那我们就把它添上。可是不，他什么也不想补充。

我们说，除了五年计划之外，还有年度计划，它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把你认为农业方面须要补充的加进年度计划里去，两年之内把它扶持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就拿出来吧。

为什么必须同时平行地准备两个计划呢？谁都会明内，这是为了宣布一个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为了安慰“心灵”，而另一个计划是现实的，是为了“身体”（？）。因为李可夫同志没有拿出一项加强农业的建议来补充五年计划，因为李可夫同志在发展农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拨款方面的或是其他方面的建议，所以我们认为李可夫同志提出第二个平行的计划时，并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把五年计划宣布为字面上的，而把另一个计划（两年计划）宣布为切实可行的，并且使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成为中心，以使用其他经济部门来支持这个两年计划。就是因为这样，同志们，我们才拒绝了那个貌似合理，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拙劣的玩弄手腕味道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关于缩小播种面积。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吓唬人，断言播种面积并没有扩大。他玩弄全国的平均数字。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也许李可夫同志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而掩盖了地区特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果有人想从党的政策的角度来研究播种面积扩大的问题，那就应当按地区了解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想认识真理，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不能吓唬党，说我们什么都在下降。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缩减了，是受霜灾影响，也有增加的，这是事实。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

喊声：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 2.7%。

斯大林：部分地区，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另外部分地区还不错。而东部的播种面积在扩大。如果从党的政策角度看，总不能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东部是另一种；也不能说在乌克兰北部是一

种，而在乌克兰南部又是一种吧。不能这样看问题，把自然条件扯进来是可笑的。

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样说是不对的（或者是对的？）。难道说播种面积不取决于自然条件吗？他要求什么呢？难道要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政策吗？这种政策是不存在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可能被所有的阶级同样接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不曾估计到我们的农村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农民缩小播种面积吗？我们从来不曾打算过实行一种能够使一切阶级满意的政策。

他第三个不正确的地方是说，在某些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缩小了。既然集体农庄在发展，事情当然就应该是这样。怎么会有其他的可能呢？这是必然的，只能是这样。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么它就必然在一方面扩大，而在另一方面缩小。五年以后，集体农庄将要有 2500 万公顷耕地，而现在只有两百多万公顷。五年以后，集体农庄将拥有 2500 万公顷——它靠吸收谁的耕地呢？当然是靠吸收个人耕地。难道有别的办法吗？事情就必然是这样：随着集体农庄的扩大，个人耕地将缩小，这就是进步。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就不能考虑所有的阶级，我们反正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只能考虑工人阶级，如果想到集体农庄的扩大会导致个人耕地的缩小，那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谈谈粮食困难。同志们，我想在这里引用几个数字。无论如何总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记在党和中央身上吧。出现粮食困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自然现象难道真的不起作用吗？天气究竟起不起作用？1928 年 4 月 1 日以前，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 2 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 4 月 1 日以前只收购了 2650 万普特，也就是说，少 1.7 亿普特。为什么呢？因为草原受了霜灾，歉收了。去年 4 月 1 日以前，中央黑土区收购 1.4 亿普特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有 500 万普特，因为

遭了霜灾。总产量减少了，怎么能不看这个原因呢？今年在北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要减产一半。我们的收成减少了两亿五千多万。我们要从东部，在东部地区把它们补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能把这一切推到中央政策的头上，推到党的头上？！这真是怪事。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大家都看到，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我们必须抓紧有组织的收购，再也不能指望自流，指望所谓的市场规律，指望所谓的市场上价格的自由浮动。两年的采购经验表明，我们无须特别费力，就能收购大约3亿至3.5亿普特，而其余的1.5亿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的办法来取得。所以说，乌拉尔人制定的办法，也就是在这里被人责骂的办法，无疑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富农阶层捐献的方法。村里召开村民大会，由贫农和中农阶层进行鼓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富裕的富农应当完成多少，有完不成的就按村里的决议处罚。这样一来全村就都被吸引到组织采购粮食的工作中来了。村子在政治方面分化了，在采购过程中我们从政治上为自己动员了一支军队。如果村子里大家都一样，如果没有政治分化，那就非常糟糕，那就是富农在操纵了。如果村子在政治上分化了，如果中农和贫农发动起来了，那时村子就分为两部分。村子的多数，大多数人，中农和贫农就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迫使富农和富裕阶层拿出余粮，而这些余粮是他们囤积起来，想用来盘剥贫农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价格政策的。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部分地采用非常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这样我们今年就没有办法。很可能，在播种以后我们还可能不得不部分地采用非常措施，非常可能还得采取这些措施。同志们，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能像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那样看问题，他们就像修士怕鬼那样，连部分采用这些措施都害怕。

我们的目的和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采用非常措施，可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必须爱惜外汇，如果

不能用捐献的办法拿到粮食，那就只好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以便把农村的大多数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反对富农。同志们不考虑农村的工作多么重要，我们发动了农村的基本群众之后，在政治上得到了多大的好处。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方法得到正确采用的地方，我们在农村中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军队。这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是十分重要的。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们总是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价格政策，有时候他们甚至能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把农民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反对他们，情况会怎样呢？应该这样来看问题。伊里奇是怎样看待非常措施，看待非常措施的最尖锐形式，看待贫农委员会政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贫农委员会政策已经被排除了。伊里奇说：这话不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形，譬如说，发生了战争，它就会把贫农委员会政策强加给我们。

乌格拉诺夫：是在战争前夜吗？

斯大林：可是，请原谅，我现在并不打算谈采用贫农委员会政策呀。

乌格拉诺夫：这可是有点像。

斯大林：没有的事，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只有那些不懂得粮食在富农手里就是外汇的人才会这样看。这不是棉花，棉花不能吃，它只有一个买主，就是国家；这也不是亚麻，亚麻也不能吃。粮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大家都需要的，是宝中之宝，因为借助粮食富农可以盘剥贫农，不仅仅是从贫农身上多得几个钱，而是给贫农扔一袋面粉，就可以盘剥他。你们希望那些站住了脚的富农，那些可以用其他作物来周转，而把粮食藏起来的富农，希望这些富农会自愿地按照采购价格交出粮食吗？你们这不是疯了吗！？你们不了解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是阶级。

他们是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的呢？我们有哈萨

克斯坦的例子。我们的鼓动员说了两个钟头：伙计们，工人没有粮食吃，军队也没有粮食吃，你们把粮食拿出来吧，可是富农嘴里含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同志，你倒试试说服这样的人看。阶级就是阶级。必须能把农村的贫农发动起来，反对富农，必须迫使富农把粮食交给苏维埃政权。

喊声：对！

斯大林：他们谈到我们农村政策中的过火行为。是的，有过火行为。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了马尔科夫的一封信。过火行为是存在的，可是难道可以根据过火行为就来责备整个政策吗？

就拿七小时工作制来说吧。难道我们这里现在还有人会反对七小时工作制吗？我想，在我们党内找不出敢这样做的人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在推行七小时工作制方面有过多少过火行为和任意歪曲。你们都很了解，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是件多么恼火的事。这个最伟大的革命措施简直就伴随着一系列的任意歪曲，甚至是可恶之极的歪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事实。可是这是不是说，应当废除七小时工作制呢？不能，不能根据过火行为就责骂党的整个政策。这是那些什么也不相信的人的惯用手法，他们不谈党的政策，而是责骂各种过火行为。这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谈谈购货本。李可夫跟着布哈林也在这里骂购货本，把它叫做小卡片儿。这是不对的。粮食卡是在极其贫困时采用的，发给八分之一磅面包，我记得，在莫斯科有一段时间是两天发八分之一磅。现在的购货本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卡片，因为它们用于减少一定数量的面包，用于控制投机分子，组织面包供应。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莫斯科没有组织供应，没有什么购货本，而是只控制了烤面包盘，结果会怎么样呢？每天要剩下1万普特烤面包，没有人买。当然只好卖给投

机分子。这是发购货本以前的情形。现在发了购货本，工人就满意了。

纳扎罗夫：还要求对其他食品也实行购货本呢。

斯大林：李可夫几次提到，根据工人的说法，他们对实行购货本是满意的，因为工人知道，他用不着去排队，面包是有保证的。怎么说呢，工人满意，而这是主要的。投机分子被限制住了。请布哈林同志注意，他在市场关系方面一贯反对采取行政措施，我要告诉你们，我们除了实行购货本之外，还准备逮捕 200 个投机分子。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调节市场吗？（笑声）

斯大林：而布哈林本人不曾想到他会在这里反对这项措施，也投了赞成票。

我们不把行政手段和经济分割开来。我们不能像布哈林这样违反辩证法地看待问题。他是这样的：一个抽屉里装着经济，另一个抽屉里装着政治，第三个抽屉里装着行政措施。这是面包，可是生活有它自己的分类法，它把什么都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就用行政措施来对付投机，而对市场也不放弃。

我不明白，李可夫同志曾经赞扬过这种手段，而且在发言中指出，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购货本，可是在这里他却和布哈林同志一起责备这种手段，把它叫做退回到卡片制去。同志们，来看看结果。莫斯科由于实行了购货本，工人都很满意，得到了自己的定量。莫斯科报告说，那里还剩有两万普特烤面包。这有什么坏处呢？过去这两万普特烤面包到哪里去了呢？到了投机分子手里。

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谈了粮食输入问题。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一个电报中可以看出，有人愿意贷给我们粮食。这是胡说。似乎是这样，有一些善良的人几乎是白送给我们粮食，或者是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偏偏拿架子，不打算要这些粮食。你们在哪儿见过这样的人呢？在中央吗？事情原来是这样：至少是半年以前，各国的资本家对我们狂

轰滥炸，想摸我们的底，想看看我们是否打算进口粮食，是否站稳了脚跟，有没有外汇。现在的斗争是我们能不能站稳脚跟，这决定了英国代表团来不来，决定了德国提不提供贷款，决定了能不能从英国得到贷款，能不能从美国得到贷款。这将决定许多事情。半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的许多粮食公司就找过我们……

米高扬：还有阿根廷的等等……

斯大林：（问我们，）苏维埃政权是否想进口粮食，我们可以用优惠的条件向你们出售粮食，或者提供几个月的贷款。我们在政治局琢磨了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向我们打听了半年，这就是说，在摸我们的底。也许根本不会卖给我们粮食，可是会立即报告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资本家集团，说苏维埃政权已经奄奄一息了：没有粮食，没有外汇。如果没有外汇储备，他们干嘛要提供贷款呢，所以我们决定对这些老爷们说：我们不打算进口粮食。南森也建议向我们出卖粮食，我们也拒绝了。李可夫同志也反对，布哈林同志也反对。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南森的建议呢？

米高扬：他的建议要用 100 万美元。

斯大林：为了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有外汇储备，现在我们不打算进口粮食，如果想进口，我们会及时进口。这样做对我们有利。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的对外环境现在才轻松了，如果同志们关注苏联的国际地位的话。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那帮资本家们现在才争先恐后地同我们拉关系。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德国近来才做了让步，同意以比过去优惠的条件向我们提供 5 亿马克的贷款。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必须善于自持，有时须要有耐心。在敌人试探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需要粮食的时候，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面目，要了解，然后……

这种时刻往往是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认为必须向这些老爷们说，我们今年不进口粮食。现在却把事情说成这样，有人

愿意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这些傻瓜却拒绝了。同志们，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我来讲发言的最后一部分。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能不能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呢？李可夫同志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总路线是一条，只是有不大的意见分歧，这话对不对呢？我想，这是不对的。从我所说的可以看出，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两个不同的计划。也许其中的一个计划、一条路线不很明显，不像党的路线、党的计划那样明显，可是第二条路线、第二个计划的萌芽是存在的。这一点不容怀疑。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同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布哈林集团就是我们党内的新反对派。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用另一条路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党的路线）来代替党的路线。布哈林同志说他们三个人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同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党的路线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这不仅是派别集团。我可以这样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的派别集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谈谈阿扎尔暴动的问题，以及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你们还记得，我们有过几个反对派。我们不妨看看托洛茨基反对派。同喀琅施塔得暴动比起来，所谓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我们当时正和托洛茨基派争吵。结果怎样呢？你们以为托洛茨基派利用了这次暴动来达到派别目的吗？没有。代表大会一决定，大家，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就都出发镇压暴动去了。

在格鲁吉亚发生过比阿扎尔严重得多的暴动，当时枪杀了将近

1500人。我们当时正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可是我不记得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过格鲁吉亚的暴动来反对党。

不久以前，雅库特发生了暴动，比阿扎尔严重得多的暴动。同格鲁吉亚和雅库特比，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你们怎么看呢？是否有过哪怕是一个党内反对派企图利用这类暴动来反对党呢？同志们，我不记得有过这种事情。

请看，在这里有人说，我们没有派别。可是却有人企图利用所谓的阿扎尔暴动来反对党。怎样来解释这种卑鄙的、不光彩的企图呢？必须是真正的自由派，因为只有自由派才不明白，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暴动只会、也必然会发生在边境地区。为什么我们老是大声叫喊，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你们怎么看呢，难道资本家会睡觉吗？你们以为，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吗？难道我们能使一切阶级都感到满意吗？不行，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做，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为一个阶级服务的。难道在我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没有不满分子？现在已经查明，在阿扎尔地区，除了我们党内同志的错误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孟什维克的因素，泛伊斯兰主义的因素，它们武装了阿扎尔人，于是阿扎尔人就反对我们。这个因素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孟什维克分子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不懂得，在我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不可能在边境地区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骚乱或暴动。除了自由主义者，谁还会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来。他们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既然你们是多数，既然你们是领导，那就请你们安排一下，让富农也满意，让中农也满意，让贫农也满意，没有任何斗争，没有任何骚动，也没有任何暴乱，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我们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

现在怎么还能够断言，布哈林集团不是派别集团呢？不行，同志们，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货真价实的派别集团。

布哈林同志说到了公民死刑，说是三个政治局委员被判了公民死

刑。他说，我们默不作声，而关于右倾的决议，关于调和态度的决议等等却满天飞。这是自由主义分子的谎言，企图瓦解党的反右倾和反调和态度的斗争。布哈林同志是怎么想的，既然他卷进了这件事，我们就应该放下武器，不去反对右倾吗？右倾是不是妨碍我们克服困难？妨碍。我们该不该反右倾？应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在应当进行领导的司令部内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地存在，自由活动，我们就永远克服不了困难。而布哈林却希望，既然他卷进去了，我们大家就议论议论，就等着看他自己什么时候同意说出自己的意见，赞成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同党站在一起等等。不行，同志们，关于公民死刑，骂人也好，说假话也好，都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求他们三个人，从前要求过，将来也要要求他们和我们一样坚决地反对现有的种种向左或向右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党内就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整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如果党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发动无产阶级力量，克服困难，反对右倾，反对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因为在我们司令部里的动摇会动摇工人阶级，而这三个人却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这是谁的过错呢？他们作为政治局委员，难道就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同样坚决地反对，而且公开声明他们也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和党站在一起，而不是反对党吗？他们如果这样做了，就只会令党高兴，让全党高兴。

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什么公民死刑。这是自由派的拙劣手段。

关于集体领导。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全会什么都能忍受，不过总得有一点羞耻感吧。布哈林在发言时说，我们没有集体领导。既然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挖政治局的墙脚，而另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却驾上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那么哪里还谈得上集体领导呢？怎么回事呀？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同他商量反对中央——这就是集体领导吗？乌加洛夫同志，你怎么看呢？

乌加洛夫：我，我。

卡冈诺维奇：你是怎么想的？

伏罗希洛夫：问你的意见呢。

乌加洛夫：布哈林自己已经在这里说过了。

斯大林：很清楚，加米涅夫的所谓笔记使党内状况尖锐化了。于是我们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提出了党内状况的问题，——恰好大家在传阅这份笔记。托姆斯基同志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政客的惯用伎俩！怎么回事呢，全党都站起来了，他却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简直可笑。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的话！而布哈林同志说，这是一次普通的谈话。好像这是一次闲聊天似的！可是我们知道笔记的内容。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党的路线是致命的，政治局的组成应该变动。布哈林同志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现在还同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人去商量。现在查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告诉了托洛茨基，同他取得了联系。怎么回事，布哈林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既然他赞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那他为什么要向政治局隐瞒呢，躲藏起来，搞地下活动，跑去找加米涅夫这个以前的反对派分子，他昨天还搞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11月7日游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怎么还能够谈集体领导？简直可笑。这也叫领导者！领导，还是集体领导！没见过这样的领导者。他被别人像孩子一样捉弄了。他被加米涅夫像一个孩子似的捉弄了。领袖！真是没见过！在我们政治局里，加里宁同志有一个说法，有些人也许不喜欢，但是很可笑，也很中肯的说法。它把布哈林同加米涅夫描绘成狼和兔子。说是兔子去找狼，对它说：我很怜悯你，让我们结成同盟吧。狼却回答说：我把你吃了行不行。加米涅夫把布哈林像孩子似的捉弄了。他不明白他是站在多高的地方。他不明白这个。我有一次对他说，你和我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政治家。可是他却理解为我们俩站在喜马拉雅山顶上，而其他的人则一钱不值。既

然是这样，那还能同他谈什么呢？他不明白自己是站在多高的地方。你是政治局委员。把我们每个人盯得很紧的有工人，有农民，还有知识分子。我们每走一步都被看成是政治家。布哈林不明白这一点。他跑去找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像一头狼似的把他捉弄了一番，然后做了笔记，又把它给了托洛茨基，有一份文件说，后来托洛茨基利用了它，后来又送到外国报纸上，被各种资产阶级报刊利用了。他被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捉弄了。还说是领导者呢！还说是集体领导呢！

布哈林同志跑到外人那里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第一次了。这在他不是偶然的。1918年他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

乌加洛夫：这是托洛茨基分子说的。

斯大林：事实终究是事实。他去了。这不是偶然的。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时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央委员却跑去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该怎么称呼他呢？这算什么呢，集体领导吗？

先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现在又跑到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是还同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者联系的人，也就是反革命分子那里去。

罗济特在这里说，布哈林是“无可挑剔”和对党最“忠诚”的党员之一，同志们，这样看问题是不行的。我对这样说是有怀疑的。既然政治局的一名委员背看政治局，和党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挖政治局的墙脚，哪里还谈得到忠诚呢。还有什么忠诚呢？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就搞过自己的宗派，执行了分裂政策。党的历史上有过这种事情。很可能，布哈林在歇斯底里状态下会再重复这些事情。

大家想必还记得，1918年，在我们党中央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时在莫斯科，布哈林同志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召开了自已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他们在那里拥有多数）……

不过，我还是念列宁的话吧，看他是怎样说的：“……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读引文）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

接下去是布哈林同志领导的莫斯科区域局的说明：“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这是列宁还在世的时候。

“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读引文）温和的”，这就是说，列宁是温和的。“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读引文）坚决实行工人专政”。他们已经消灭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专政了。

伏罗希洛夫：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继续读引文）这就是例证，它表明，布哈林多么善于搞派别活动，他怎样指责中央，对中央表示不信任，直截了当地声明他不服从中央，分裂不可避免，他准备丢掉苏维埃政权。当然，布哈林这段时间里学会了许多东西。可是我担心，在歇斯底里状态下他会再抛出这类把戏。

所以我不相信他关于我们党内没有宗派的声明。他说，我们反对把我们叫做反对派，我们是按党的规定行事的。我不大相信声明，而更相信事物的逻辑。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还将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还要继续攻击党，那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逻辑，它比人类的任何逻辑都更有力量。这些事情就会发展到让他们重犯伊里奇在世时的那些勾当。那还是伊里奇在世的时候呢。出过集团的问题吗？出过。有过同加米涅夫组织派别联盟的企图吗？有过。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躲躲闪闪，搞地下活动，让加米涅夫不要用电话同他联系，说是有人监视他等等。为什么要这样躲躲闪闪，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要隐瞒这一切？显然这是企图搞派别联盟。加米涅夫没有上钩，因为他是讲实际的生意人，他看到力量不够，搞集团没有意义。他问道：怎么样，人多吗？对，很多，列宁格勒，莫斯科。可是这个人笑了，当然是多了。那当然好了，你们人多，可是把

你们撤了呢？他说，是呀，我们正在遭到恶意攻击。（场内笑声）

伏罗希洛夫：他睡不着觉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加米涅夫很敏锐，他嗅觉灵敏。嗯，和集团联系在一起是会淹死的。集团没有搞起来，可是不能怪布哈林。然而如果没有搞宗派集团的企图，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派别活动，那该怎么解释一贯执行的辞职政策呢，它可是破坏党的纪律呀。斯大林也提出过辞职，是的，有过这回事。大家一喊不行，我就坐下了。李可夫同志，你不要引用列宁的事情。我们没有人敢把自己同伊里奇相提并论。如果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声明辞职，那是伊里奇，而我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领导人……

喊声：是普普通通的！

斯大林：（我们）同他比起来，只是他不成器的学生，我们是另外的规律。有时候会感到很累，于是想辞职，大家一说不行，就只好坐下了。半年以前，就是在7月间，加米涅夫的笔记里记着，布哈林同志有这样的设想：我、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是不是该提出辞职，是不是该这样来安排，离开领导岗位两个来月，然后，等到出现危机时再出击。这是从何说起？我们党能够容忍这样做吗？你们还记得伊里奇的话吗？“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读引文）……”没有了纪律，我们的党，有50万党员的党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纪律在党内消失了，变成了……（听不清）。这样做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如果司令部不组织好，如果司令部里没有纪律，那在企业里还谈什么纪律呢，既然党内、司令部里都没有了纪律。辞职是什么呢？这是破坏纪律的根基。这能容忍吗？绝对不能。

谈谈集体工作。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这里谈到集体工作。这真是海外奇谈。我有布哈林藏起来的一份提纲，是我几次提到过的，确实存在的，被布哈林藏起来的提纲。

“这就是我的提纲。”我们说：“让我们看看。”“不，不行。”

“我们把它复制几份。”“绝对不行。”“那怎么办呢？”“我来念，你们听着好了。”我们同意了。这叫什么呢，是集体工作吗？发生了这种事之后再谈集体工作，指责中央，那总得有点羞耻感吧。你们听说过这种事吗？在不应当有宗派性的政治局里，一部分委员就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有自己的提纲，可是又不肯拿给别人看。“我来念，你们就听着好了，一边听一边就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李可夫同志谈到集体领导。他最好别谈集体领导。我要举三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同志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三件事。

第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输出了，可是后来我们差一点丢了这批黄金，好不容易才找了回来。是谁决定把黄金输出到美国去的呢？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政治局？不是，政治局只是面对既成事实。显然是李可夫同志的一个副手，是经他同意的，由他签的字。请看，就有这样的制度。当李可夫同志被问到这件事时，他说，我不负责。那他对什么事情负责呢？他说，这不是我的事。那是谁的事呢？1000万黄金运到美国去了，可是没有保证它的完整。政治局不知道这件事，虽然有一个非经政治局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这就叫集体领导。他说，我不负责。那谁该负责呢？你为什么被称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呢？他说，我不知道。那他知道什么呢？他算不算人民委员会主席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同米切尔的谈判。美国有一个大资本家米切尔，他有一家国民银行。这是个大人物。我们在十月革命时让他受了点气，没收了这家银行。他要求赔偿。我们现在的方针是不满足个人索赔的要求。那就请拿出另一个方针吧。我们不打算满足个人索赔的要求。可是就另一个问题，就汽车制造厂的问题想同这家银行谈判。谈的却是满足个人索赔要求的问题！当时我们正打算同这个英国代表团周旋一下，为的是在英国下议院的选举中给工党一点保护，以便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并没有放弃同工党政府签订的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我们执

行的还是那种方针，不谈个人索赔的问题。是谁批准的这次谈判呢？原来又是人民委员会的某位副主席批的。对此李可夫也不负责。这算什么人民委员会主席呢？政治局只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对这一切负责。我指的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里的制度，是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委员会。这叫做集体领导。无论是人民委员会，还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都不知道输出黄金的事，也不知道同米切尔的谈判。谁也不知道，而李可夫回答说他也不知道，用不知道来掩饰。谁应该知道呢？

第三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械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属下有个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通过了这样一项决定：“在哈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读引文）”请看：人民委员会决定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的比重，而提高对富农供应的比重。政治局不知道这些数字。我们是从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听说的这件事，得到的这些数字。这是怎么回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李可夫，他又吞吞吐吐，真是的，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是集体领导吗？

最后，同志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政治局已经变成了穿堂大院。简直就是穿堂大院。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你今天说一句悄悄话，明天托洛茨基分子就知道了。让你害怕开诚布公地说心里话，因为不想让党的敌人知道。就拿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来说吧。这个问题是我和伏罗希洛夫提出来的。好像是我首先提的。驱逐的动机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中是一个人，可是如果没有了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他就成了今天那样的人了。大家认为，驱逐他对党、对共产国际都有利。第二天托洛茨基分子就全知道了。又过了一天，出现了一张传单：斯大林提出建议——这不是在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上，而是在星期一我们几个人碰头的时候

候——斯大林提出什么什么建议，表决时：托姆斯基反对，某某人也反对。简直是对情况一清二楚。

再看一个例子。不久前政治保卫总局抓住了一名托洛茨基分子，没收了他的日记。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姓康斯坦丁诺夫，曾经在《真理报》工作过。他早就是托洛茨基派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他记录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人给他提供情报。雅罗斯拉夫斯莓说了什么，布哈林说了什么，李可夫说了什么，——他全知道。同志们，在政治局简直就不能诚实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成了穿堂大院。必须要保证……

喊声：对！

斯大林：不能这样下去了，政治局必须回到它早先的地位上，是我们党的圣地，而不是穿堂大院。

喊声：正确！

斯大林：我来做结论。你们会问，怎么办，怎么结束这件事？我想，安德烈耶夫同志建议要求布哈林集团放弃自己的错误。我想，这个建议是不恰当的。

喊声：说得对！

斯大林：在这里发言时，他们都正式声明，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现在又一次抛出了这个要求——这就使问题尖锐化了。如果这几个同志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错误，安德烈耶夫同志，那该怎么办呢？你想执行一条较为合理，而且较为温和的路线吗？我同意你的意见。可是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让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在这里站出来，宣布放弃自己的错误，——它只会使局面尖锐化。如果他们不肯放弃呢？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样不行。我想，党在无数次的决议中已经说了，同志们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误，可是他们走出来说，他们不能放弃，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考虑。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当斥责这种观点。

喊声：对！

斯大林：应该斥责他们的立场是和党的路线不相容的，责成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的一切决议。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保证我们统一意志的最起码条件，否则我们就分道扬镳。

二、应该斥责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实行的辞职政策。决议应该严厉地谴责这个政策，因为它在我们党内是不堪设想的，是反列宁主义的，破坏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党的纪律。我们不能这样处理问题，仿佛对领袖执行一种纪律，对党、对群众执行另一种纪律。这是不行的。法律应当只有一个：有了决议就得服从，不服从就应当受到处分。我们对普通党员就是这样办的；如果我们为领导人、为领袖搞出什么新规则，以至党内出现了“平民”和“老爷”，那他们是要愤怒的。

我还想，说良心话，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托姆斯基同志现在都不能胜任他们迄今为止所担任的职务，比如说《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不行。的确，大家不妨想一想：托姆斯基同志有一个顽固的想法，认为中央要像托洛茨基那样折腾工会。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顽固的想法。把李可夫^①同志留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岗位上没有一点好处，所以应当撤掉他的职务。并不是满足他的辞职要求，而是撤销他的职务，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不可能在那里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对布哈林同志也是一样。他在共产国际也没法工作。不行。布哈林同志往右边走得太远了，而且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真理报》的情况也一样。这样办不行。应当做出这样的决议：解除或者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从现在起，他不再是

① 原文如此，应为托姆斯基。

《真理报》或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说真心话，我们当然可以决定让他们留下来。他们也许会留下，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不会为我们工作。

三、我反对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乌克兰同志们，还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同志们的意见，他们提出了相应的决议，特别是安德烈耶夫同志。我认为，如果我们警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足够了，警告他们，如果今后稍有不执行中央及其机关的决议的企图，稍有违反中央及其机关的决议的企图，他们就将作为破坏党的纪律的人而立即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同志们会理解这个措施的。我知道，对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瓦解党的活动是很气愤的，因为他们搞辞职政策。我知道，有许多要求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我理解，这种气愤是一个希望保持我们党的团结一致和纪律严明的人的正直的、无产阶级的义愤，可是我们在解决政治问题时不能凭气愤行事。我们可以，或者说应该让这些同志留下来，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让他们真心实意地履行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决议。如果他们破坏决议，那时再开除他们。

还有，我认为应该注意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在正式发表言论时，在会议上和报刊上不发表任何背离党的路线和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的言论。

喊声：对！

斯大林：这种监督对于执行党的决议是绝对必要的。同志们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仍然留下来；既然在现阶段他们还不能放弃这些错误，那再要宣传这些错误观点就太过分了。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关于刊物。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及其各个领导机关的路线。这也应当无条件地执行。

还有，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的集体工作。我们不能忽略了。必须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也给俄罗

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规定这样的制度，使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个人来决定，而必须由集体：通过人民委员会，或者通过劳动及国防委员会，或者召开会议来决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那样我们就不会有面对既成事实，或者是措手不及的情况。

喊声：对！

斯大林：第八，规定专门的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这样来保证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性……

喊声：对！

斯大林：保证排除把中央和政治局的情况向托洛茨基分子通风报信的一切可能性。

最后，我们将要通过的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决议。应该把这个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但是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这个决议。（喊声：对！）同志们，这最后一项措施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缓和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处境。他们是宗派集团，但是还指望他们会解除武装，给他们一个机会，不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使他们有改正的机会。如果公布这个决议，走出了这一步，那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成员改正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我想，这个决议应当在原则上是严谨的。这就是我已经说过的那种缓和的味道，如果大家愿意，不妨这样说。

乌格拉诺夫：自由派的措施。

斯大林：我们有时候是会向中间派做一些让步的。（场内笑声）

乌格拉诺夫：我就是中间派。

斯大林：对于乌格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做出一些让步呢？当然，这不是经常让步的理论。

柯秀尔：免得发生误会。

斯大林：这是最后的让步，试一试的让步。有效——那很好，要

是无效——那对你，乌格拉诺夫同志，只能更糟。决议的原则部分必须是十分严谨的，不能有任何让步，在原则问题上百分之一的让步都不行，要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抖搂出来，让党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能有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决议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严谨。至于实际工作和组织方面，同志们，如果我们不意气用事，那就更好。如果我们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留在政治局里，让党明白我们不是好战成性的，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假如他们还能够改正的话。我说完了。（掌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043号案卷，第1-131张。

原件。打字稿。

布哈林正在堕落下去

——致莫洛托夫的信（节录）

（1929年8月2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

2. 关于阿塞拜疆。应当全力支持吉卡洛，因为他基本上是对的（从地方老干部中保留一批还有工作能力的人）。与沙茨金把党对右倾分子的胜利看做是他对斯列普科夫之流的胜利一样，阿尔塔克和沙图诺夫斯卡娅把米尔佐扬被联共中央委员会解职看成是他们的胜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应当把沙图诺夫斯卡娅、阿尔塔克调回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以前他们曾在此工作，后根据“巴库积极分子的决定”返回巴库）。他们在巴库干不了好事。他们能干些什么从克拉斯内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又一次卷进了与己无关的事情中！）上的那篇蠢话连篇的文章中即可看出。应当留住布尼亚特扎德和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为作为工作人员，沙图诺夫斯卡娅之流和阿尔塔克之流合起来都抵不上一个布尼亚特扎德。必须任命巴吉罗夫为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尽管他过去犯过错误），因为目前他是惟一能够对付阿塞拜疆农村中气焰嚣张的木沙瓦特分子及伊季哈特分子的人。这是件大事，开不得玩笑。卡苏莫夫可惜了（太可惜了！）。他是我们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将来极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人才。我请求，在我没参与的情况下对他的去向问题不要作任何决定。

.....

4. 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声明”很卑鄙。我们决不能向这些企

图逃避第 58 条的惩罚，然后在莫斯科立足从事破坏“活动”的先生作任何让步。^①

5. 你说得对，布哈林正在堕落下去。这令人痛心，但却是事实。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命”。我只是奇怪，他居然想用这种“小把戏”来欺骗党。他是一个带有立宪民主党辩护士倾向的，政治上没有脊梁骨的、书生气十足的草包的典型代表。随他去吧……

约·斯大林

1929 年 8 月 21 日

^① 1929 年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之后，许多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发表悔过声明，要求恢复党籍，其中就有斯米尔诺夫。

共产国际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写得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8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

(2) 我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决议写得不错。只是发表得似乎晚了些。

(3) 刚刚读了贝斯特良斯基关于同布哈林谈话的报告。我早就料到，布哈林在跌入机会主义泥潭后，肯定会散布谎言，弄虚作假，进行讹诈，因为他找不到其他的论据。关于“文件”、“土地国有化”的说法都是由这个在“实践”中一败涂地的卑鄙的辩护士一手捏造的。如果说布哈林与本届中央存在分歧是由于斯大林的“个性”造成的，那么在列宁生前他与当时的中央间的分歧又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是由于列宁的“个性”吗？但是为什么现在，在列宁逝世后，他又如此称赞列宁？他与托洛茨基之类的所有叛徒称赞列宁（在列宁逝世后！）是不是都是出于同一目的呢？我们这位辩护士全然搞糊涂了

.....

(4) 我看了沙茨金的来信。这封信写得既怯懦又虚伪。沙茨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

.....

约·斯大林

附言：李可夫什么时候到？

应当考虑将布哈林赶出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9年10月7日)

莫洛托夫：你好！

10月4日的来信收到了。

.....

(3) 工业学院支部的速记记录我看过了。不得不把问题提到中央全会去。应当考虑将布哈林赶出政治局。

(4) **我看了政治局关于李可夫的决定**。决定很正确！当然我们要对这个决定承担责任。关于这一点等我回来后再谈。

(5) 收购工作进展顺利。但不能满足，应当继续抓紧，否则将前功尽弃。

(6) 总之应当承认，你们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的工作）目前开展得不错。这很好。

过几天我将回到莫斯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10月7日

论李可夫

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

——致莫洛托夫等的信^①

(1929年9月30日)

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

(1) 李可夫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假装“忠顺”和“同情”苏维埃的**非党苏维埃官员**的讲话。只字不提党，只字不提右倾！只字不提党的成就（李可夫现在无耻地把这些成就算在自己的账上）是在同包括李可夫在内的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所有发言的负责工作人员一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谈一谈右倾分子，有责任号召同右倾分子作斗争。而李可夫竟像没有这个责任似的！试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你们怎么能容忍（也就是**包庇**）这种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呢？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容忍这种伪善态度，就会造成李可夫已脱离右派的**假象**，从而使党产生错觉？而众所周知，李可夫过去和现在都不想脱离右派。今后是否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要么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同右派和调和派划清界限，要么失去代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讲话的权利。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中央不能拒绝的最起码的要求，要是中央不想冒否定自己的危险的话。

(2) 听说李可夫仍然每星期一和星期四在你们那里**主持会议**^②。

① 信的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批语：“完全同意所述的一切。李可夫的讲话我没有读，仅浏览了标题。打算去读。现在我也看到，斯大林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同意，即说我们‘包庇’李可夫。不过，还是应当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改进。维·莫洛托夫。10月3日”

② 指李可夫主持政治局会议。

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容许这种闹剧？谁需要这样做，为了什么？不能结束这种闹剧吗？难道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吗？

（3）我打算在索契再住一个星期。你们的意见如何？如果你们要让我回来，我可以立即返回。

敬礼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30日

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声明”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29年11月13日）

斯大林：同志们，关于三人文件^①这里讲了那么多又那么详尽，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我只需要10-15分钟，但有些东西我认为是一定要说的。

首先，需要作一点实际说明。在这个三人文件里试图通过办公室的途径偷偷塞进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人喊：对！）他们的这个提纲编写得如此狡猾，愿同志们原谅我这粗话，如此诡诈，让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去分析它。“关于‘长入’的提法，——没有说是谁，——它实际上本应当表示……（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党的造谣诬蔑。（喊声：对！）长入的提法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时候中央委员会或者共产国际表示过赞成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从未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旧纲领的前言里有过关于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的提法，而不是关于富农长入——绝对不是。

对此，一个委员会，好像是俄国代表团给予了批准。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疏忽，因为“长入”的术语本身，即使说的是农民基本群众，它，这个术语，也会造成某些不正确的前提。当然，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是在十字路口的，他要么应当长入资本主义，当然是加引号的，如果是在资本主义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里；他要么应当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在社会主义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里，因为生产的商品性质还不

^① 三人文件，指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1929年11月12日的“声明”。

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其中含有资本主义倾向。

大概这就是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批准这个问题时的想法，但是那里并没说富农长入、富农的窝巢长入社会主义。没有这么回事！中央委员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未批准过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从未批准过！这完全是诽谤，这完全是对中央委员会和共产主义国际的诬蔑。

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术语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它认为，农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需要农民自身的根本改造和根本变化，这是不对的。

由于农民基本群众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十字路口和由于社会主义起着主导的作用，他们将投入社会主义，但不是以他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将逐渐进行改造。当我们谈论集体农庄，当我们指出集体农庄的极大发展是党过去一年的主要成绩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同志们作出结论，既然我们有集体农庄，就是说集体农庄里有社会主义，那将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农民的真正改造现在才在以新技术为基础建立的集体农庄的基础上刚刚开始。因为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术语使人有理由认为，似乎说的是农民不经过改造，而以其现有的样子机械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术语用在农民基本群众身上是不对的。还可以这样说，但把这个提法归咎于党、归咎于中央委员会，说党，或者中央，或者共产国际似乎曾经赞同富农，而不是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对党的诬蔑。党从未批准过这样的提法，而是一直在与之斗争。这里并没有说——富农长入的提法。这里没有说——是谁，没有说——长入哪里。这就是我所谈的这个文件的那一部分的全部欺诈、伪善和虚伪。这是我预先要作的一点说明。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文件的实质。这个文件是我们的同志退却的结果……

柯秀尔：亲爱的……

斯大林：我们亲爱的同志、右倾的领袖们退却的结果。文件是从他们过去所持的立场的退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右倾分子。他们退却是为展开新的进攻准备基础。这就是文件的全部本质。他们退却，是因为不能不退却，不能不承认，我们的集体农庄在发展。不能不退却，是因为所有屋顶上的麻雀都在吱喳地叫这件事情，连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在叫喊，我们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甚至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里谈到的巴扎罗夫先生，连他也只得承认，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当然，在这之后很难坚持原来的立场，坚持说中央似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那种立场。很难！三人集团今年年初提出的旧的政纲，它们已经没有用了。继续坚持旧的政纲就要冒着置身党外的危险。你们现在来宣扬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试试看吧！你们试试看吧！应当承认——而且这也是事实，——我们的集体农庄确实在发展，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不能再使用党在培植官僚主义的旧的说法，就像我们的同志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把不可靠的分子清除出党和机关方面取得胜利和成功之后，现在在集会上提出这样的政纲就意味着冒着置身党外的危险。发表旧的政纲是不行了。需要新的政纲。

现在已经不能在工人面前说，联共过去执行的是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现在不冒着落入奇尔布姆们、布兰德勒们等的营垒的危险，你就不能像我们的同志们过去在自己的政纲里说的那样说了。现在这已经变得危险了。

因此，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成就，在工业战线上是因为展开了疯狂的速度，在农业战线上是因为中农开始大批加入集体农庄，在思想战线上是因为右倾分子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整个这种胡说 100%地被揭穿，以及在共产

国际系统的对外政策战线上，党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和如此明显，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连路标转换派分子如巴扎罗夫都承认。要是在这方面我们右倾的同志们成了我们阶级敌人的尾巴，要是他们对我们的成就比我们的阶级敌人承认的少，那会令人感到奇怪的，因此我们的同志们应当重新武装。于是他们便重新武装，从旧的立场上退却和站到新的立场上。这个文件——就是新的政纲，就是右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与党斗争、对党发动新进攻的新的派别政纲。他们在这个新的政纲里究竟提出了些什么呢？他们提出承认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成就，但强调指出，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一，发展畜牧业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二，提高实际工资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三，四是农村新的危险和新的威胁的成分保存了下来，因为所谓的非常措施有变成反对富农的措施制度的危险。这就是四个基本要点。这也就是新政纲的成分，新政纲的目的就是承认现在所有的人直到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成就，在另外的生存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向党进攻。提出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和同志，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好像在向自己的军队说：“好吧，弟兄们，老办法不行了，旧的政纲被粉碎了。现在军事封建剥削不能说了，最好说，我们看到中央有倾向把非常措施制度化。已经不能再说，党在培植官僚主义，不能说，党在瓦解共产国际。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党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必须重新武装，丢掉旧的政纲和创立新的政纲。在新的政纲的基础上，在这四个要点的基础上还可以与党战斗一阵子。因此，弟兄们，不要解散，要在我们给你们的那个文件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右倾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就是这个文件的含义。不退却，因为不能现在退却，因为他们将被彻底击溃，如果他们坚持旧的政纲的话，但是，他们退却不是为了清算自己的立场，而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政纲的基础上坚持它们。正因为如此，这个文件尽管里面用的是这样一种和平的语调，尽管他们承认了一些

东西，承认他们错了，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派别文件，是在新的政纲基础上与党斗争的文件。

问题：提出这个文件之后他们是否多少有点什么好处和便宜呢？当然没有。这完全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他们将被彻底粉碎。

在这个文件之前还可以指望，他们将会保留在政治局里。在这个文件之后，如果他们不对其进行修改，如果他们坚持这个文件，他们当然不可能留在政治局里。这很清楚，同志们，很清楚。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并非我党最差的工作者的这些人——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虚伪的、伪善透顶的文件？这个文件将打击的是他们，而不是党。这个文件有一切可能断送他们，而不是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对某些成就他们有某种概念，因为这些成就太引人注目了，但实际上国内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党内发生什么事情，阶级斗争的奥秘怎样和如何展开，我们发起的全线进攻的内容是什么，它，这种进攻是从哪里来的和它是否需要——这些问题他们都不明白，至少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而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态度看待它们的。这是事实。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非常措施问题上。他们说，使我们分开的只是非常措施问题。他们说，有这样的危险，你们，中央委员会，会把这些非常措施变成反对农民的非常措施制度。他们认为，非常措施是反对农民的，而不是反对富农的。

第一，他们认为，我们在农业战线上的进攻仅限于所谓的非常措施。这不值一提。只有被吓怕了的自由主义者才会这么想，只有《社会主义导报》才会这么想，只有身处国外的克伦斯基才会这么想，但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么想的。

非常措施，这不是目前条件下进攻的特点。这完全不值一提。只

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恐怖”。他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在农村的进攻的。

难道我们一年前实行的非常措施，难道它们像我们现在实行的非常措施吗？当然不会。去年的情况怎样呢？对那些搞粮食投机的人使用了法典的那个条款。这是试探富农的尝试。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进攻，是用行政办法试探富农的尝试。这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贫农和中农的参加，没有组织他们反对富农，没有加紧供给农具和拖拉机，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还没有对富农实行所谓的个别课税，根本就没有有一整套的措施，只有这些措施才能称为在农业战线上对富农的进攻。这只是反对富农的行政措施：你那件事没做到，犯了法，是否想去坐牢。

而现在，非常措施难道就是这样吗？没有这么回事。现在对富农施压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发动广大工人群众，首先是派工人工作队下乡，这是1918年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做过的，把发动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的事情交给粮食收购基地、集体农庄建设基地、机器拖拉机站筹建基地、贯彻税收阶级原则基地等。整个这件事情都交给了从城里动员来的工人、工人工作队，以便发动贫中农群众起来反对和孤立富农。这里问题已经不在于法律。法律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这是全线进攻。

农业战线上的这种进攻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呢？工人工作队保护贫农、组织贫农，保护中农、组织中农，反对富农的行动，团结他们公平分担赋税，在收购中实行阶级原则，这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去年所没有的。加紧组建集体农庄、群众转到集体经济的道路、我们国营农场的扩大及国营农场对周围农民的帮助（关于机器拖拉机站我好像已经说过了），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向富农进攻的一整套措施。这里有什么引人注目呢？引人注目的，可以说，不仅是法律方面（这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引人注目的是给广大农民群众送

去新的杠杆，以便在生产方面，在供应收购方面，在合作社方面和通过集体农庄提供直接生产支援方面，在税收等方面和在粮食收购方面孤立富农。实际上，三人集团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已经成为我们进攻体系的一切措施。难道真是这样？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所谈的是什么样的非常措施？是什么措施？如果贫农和中农集合起来，依靠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孤立了富农并迫使他们交出了余粮，这是什么——是旧的非常措施吗？当然不是。当他们把旧的非常措施和对富农的新的进攻等量齐观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呢？显然，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问题的。他们说，你们在侵害富农，而不是中农，因为非常措施是反对富农的，而这是危险的。因此，把你们的所谓进攻小心地刹车吧。构成我们在农业战线上对富农最广泛进攻行动的这一整套措施，就是他们那么不清楚却又那么悄悄地谈论非常措施的实质和奥秘所在。人们不明白（我来回答关于怎么会发生他们跌进泥潭的问题）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经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后退，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助跑和发起进攻，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进攻。他说，现在我们在重新排队。什么时候需要进攻，这个问题应当研究。1921年他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政策的秘诀在于，党认定，最近一年半时机来了，我们强大到了足以由退却转入全线进攻。这不仅是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这样说不对。过去一年我们进攻的特点和这一进攻取得巨大成就的秘诀在于，进攻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在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上，在劳动生产率战线（社会主义竞赛）上进行。这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是对旷工者和劳动纪律破坏者等（他们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同盟者）的进攻。进攻的典型特点在于，它是全面的、全线展开的进攻。这就是同志们所不明白的。这里问题不在于非常措施，这是小事一桩。只有张皇失措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才会认为，我们进攻政策的中心是非常措

施。这不值一提。进攻政策的中心在于，它，这种进攻，是全面的，它在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进行：在思想战线上，在农业战线上，在工业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在所有的战线上进行。

正因为我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所以不仅能够一条战线上，而且在所有战线上展开进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就是本质，而不是早就被我们埋葬的旧的什么非常措施。似乎它们曾经有变成一种什么非常措施制度的危险或者威胁，或者倾向。这全都不值一提。只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被吓坏了的想像才会这样看待我们进攻政策的中心、基础、核心。这个基础是同志们所不明白的。我们应当助跑，以便在各条战线上向资本展开进攻。我们同志们的错误的中心就在这里，他们商谈之后最终搞出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这个只能使共产党人蒙受耻辱的虚伪文件的基础也在这里。

最后，是一个大概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而大家又不说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同志，并非党内最差的同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支持他们的那些人，像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人会活到这种地步？要知道，他们曾经是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同盟者，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得不错，这我们很清楚。我们了解，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并非党内最差的人，经过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考验的人成了右倾分子的首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同志们？

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我们党内一般常常发生的那样。通常，当党，当党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核心进行斗争，比如说，反对披着左的外衣，包着左的外壳的机会主义，如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这种斗争，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十月革命的日子一直进行到最近），通常，当党的基本核心，马克思主义核心进行坚决的、经常的、有组织的斗争反

对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右倾分子、隐蔽的右倾分子便会作为同盟者参加这个核心，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场斗争的性质和目的。或者相反，当党的基本核心，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得不向没有任何伪装的右倾机会主义，公然的右倾机会主义开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些“左”的半托洛茨基分子，这左是带引号的，加入党的这个核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评价党的核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及这场斗争的意义和目的。1905年革命被粉碎和失败之前，当我们的党主要是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时一些曾经很好地帮助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斗争的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分子加入了我们党的核心：这就是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他们曾经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同盟者，他们曾经和列宁一起站在反对孟什维克，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前列。这我们很清楚。后来，当1905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当不得不由进攻（它通常会吸引各种坏蛋来参加），当党开始由进攻转入退却和面临着不得不由斗争的革命形式，由直接向沙皇制度进攻转向斗争的其他形式，利用合法的可能性的形式的时候，那时，曾经和我们一道出色地同孟什维克战斗的，以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等为代表的我们的同路人、我们的同盟者以及各种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向我们，向我们党的核心发起了进攻。这一点你们很清楚，同志们，当我们党的核心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进攻，一方面是党认为并未结束的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党所进行的反对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的斗争，这时候又有一些自称为普列汉诺夫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加入到党这里来，后来，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这些分子又开始与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我们党的斗争之后，这些人，普列汉诺夫分子、“左的”分子以自己的方式评价我们党的核心反对“左的”分子的斗争。波格丹诺夫分子只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才明白了，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它。我们现在发生的情况也同样如

此。当我们过去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反对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的时候，党的一部分同志中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一斗争的一部分，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像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党的这一斗争的基础。在反对想要推动我们与农民分裂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我们总是提出中农，提出中农好的方面，说他们，中农，不仅在买卖粮食的时候是投机者，而且他们在生产粮食的时候是劳动者，是劳动的人。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自然提出了他们所具有的好的方面。以此培养了整整一代我们的同盟者，像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这样的年轻人，但这是些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你们要问他农民的特点，他只会指出农民好的特点，而看不见他们坏的特点。他不承认中农，不喜欢中农，想象不出中农是什么样子，不愿意谈论这一点，这是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与托洛茨基主义，与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参加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时候需要强调中农过去被完全否定的好的方面。在这样的时刻，一部分同志加入了我们党的核心，以自己的方式对此进行评价，他们说，一切将这样发展，我们这里一切将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说，我们将驱散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就是说，他们曾经保护过中农，只看见中农好的方面，而以后如果与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发生分歧的话，我们可能会逐渐地慢慢地把这个核心推翻的。这个目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我不知道，大概没有。但是，许多同志那时参加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左”的分子的敌人，做“左”的分子的敌人并不就是做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作为敌人来打垮“左”的分子，然后把自己的思想带到党里来，这一点我不怀疑。于是他们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了，而后来，当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得不转过身来反对右倾的时候，很清楚，这一定会揭开与那些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斗争的同路人的分歧，他们在这一斗争中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和并不完全明白党的方针，即

与右倾分子，即与在隐蔽状态中已是右倾分子的那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后来才开始弄清楚的。在与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又有各种来自“左”边的机会主义分子参加到我们这里来。关于他们这里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忏悔了，但许多人没有忏悔。但是我们党里有半托洛茨基主义，有“左”的分子存在，他们往往有一种倾向把为巩固党的自我批评起劲地变成为破坏党的自我批评，他们往往为集体农庄大唱颂歌，并不明白，集体农庄只是农民经济发展的新的渠道，这个渠道内部有其自身的矛盾，他们过分地赞扬我们的每一个成就往往是为了降低我们党的警惕性和不让它有可能发现伴随着我们的成就和成绩的那些阴暗面，——这就是我们将要打击的我们现有的这些新的同路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是存在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和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党内斗争的诀窍。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一些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便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党的方针。而在反对“左”的分子的斗争中，一些右倾分子便怀着自己的目的和任务，作为同盟者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以便致“左”的分子于死命。那好吧，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是怎样做的呢？当我们转而反对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我们；或者像各种戈尔登贝格们、各种罗日科夫们等所做的那样，参加到我们这里来，而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我们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新生活报》，向我们进行轰击，这就是党内斗争的诀窍，这就是党既清除来自带引号的左的，又清除来自右的不坚定分子的政策。你进行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便有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中的同路人参加进来。因此，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当你现在主要进行反对“左”的分子的斗争的时候，右倾分子中的同路人便会参加到你这里来。我认为，那些现在把反对右倾视为常规的同志，他们过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不是同我们在一起，他们参加到我们这里，怀

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曲解了党的政策。只是现在，当我们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进攻，从两方面进行阻挡——既反对向“左”动摇，又反对向右动摇的分子，只是现在他们才清楚了，党的政策是什么。就是由于事物的这种逻辑和由于党内斗争的这种诀窍，我们的同志们，我们昨天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同盟者——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现在处在了右倾分子的营垒里。

你们会问，以后会怎样？我认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同志们让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见鬼去，以工人的方式，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诚实地对我们说，是我们错了，党是正确的。我们中间谁没犯过错误呢？同志们，让我们作个了断，一起前进吧。这我明白，这将是诚实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要么他们这样说，那我们就在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敌人，要么他们坚持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这是一个退却的文件，一个为了准备向党进攻的文件。当然那就只好抨击他们，痛打他们。如果同志们不愿意消除自己的错误，我们只好被迫地痛打某些人，那就请同志们原谅了。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毫无办法。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558号全宗，11号目录，1113号案卷，
第151—174张。原件。打字稿。

应当把李可夫及其一伙赶走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0 年 9 月 15 日）

维亚切斯拉夫：

刚刚收到了你的来信。

一、政治局向李可夫及其一伙发起进攻，这太好了。尽管在这件事上似乎没见到布哈林插手，但他无疑是煽风点火和教唆反党的主谋。显然，在苏汉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这一伙人中间，他（布哈林）是“极左分子”，他在这伙人中间感觉比在联共中好，他在联共中只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失败主义者和苟延残喘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应当把博哥列波夫赶走^①。但事情不能到此为止。还应当把博哥列波夫-格罗曼-索柯里尼科夫-康德拉季耶夫的学生们赶走。这么说来，应当把李可夫及其一伙儿也赶走。现在这是不可避免的。再也不能让这些腐败分子留在苏维埃-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了。但这件事暂时只限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要告诉别人。

二、政治局关于收购工作的指示非常好。收购工作定会成功。

三、我认为，以谢苗诺夫替换阿莫索夫，将对工作有所改进。

四、休假一事你还得再等一等。你不在那里（政治局）将非常困难。我将在 10 月中旬回到莫斯科。即使你不能在这之后再休假，那至少应等谢尔戈回来，否则情况将变得非常困难。

五、伏罗希洛夫怎么样，他回来了吗？代我问他好。

^① 1930 年 11 月 30 日政治局通过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的“免去博哥列波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工作”的提案。

握手！

斯大林

附言：如果李可夫及其一伙胆敢再次蠢蠢欲动，就给他们以迎头痛击。我们对他们过于宽容。现在对他们宽容——就是犯罪。

再附言：**我建议**将库兹涅佐夫（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声明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反对派的首领们

(222)



自托洛茨基起，顺时针：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布哈林 李可夫

斗争动态

他们想在英国的问题上捞一把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6月2日)

莫斯科

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

今天收到了密码电报。莫洛托夫的来信还没有收到。我马上将提纲看完并告知我的意见。我不明白你们拥有多数他们怎么能逼你们。把问题再推迟一个星期，让他们见鬼去吧。关于提纲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好好地琢磨一下，不要着急。看来，他们想在英国的问题上捞一把，把过去的所有损失补回来。应当让他们放明白些。

斯大林

分发反对派的文件是不利的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7月16日)

致莫洛托夫

(1) 关于中国问题我回来后再谈。你没明白我信中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排除有一个间隔时间，但有间隔时间并不意味着近期内就不会出现新的高潮。总之，等我到达后再谈。你们好像已决定把反对派的文件^①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你们又准备用什么来反驳这些东西呢？难道只有布哈林最近的那篇文章^②？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分发文件是不利的。

.....

(3) 我将于23日星期六早晨回到莫斯科。我原打算晚两天再回来，但这儿的天气开始变坏。

敬礼！

斯大林

① 指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

② 指布哈林的文章《中国革命处于急剧转变关头》，载于1927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

反对派加紧了派别活动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27年9月23日）

谢尔戈，你好！

代问济娜好！

自打算给你写信已过了**整整**一个礼拜，可是还是没写成，原因是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到空余时间（李可夫和莫洛托夫去了克里木，布哈林刚回来不久又去了克里木，日内可以返回，鲁祖塔克病了，这样一来，常常是其他人的工作都堆到了我的身上），尽管如此，你今天的来信（今天收到的）还是促使我从呆坐中解脱了出来，并由此下决心放下一切给你写回信。

.....

2) 反对派不但没有平息下来，相反地还加紧了派别活动。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他们搞出了一个小册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动纲领》，你看他们起的书名），要求出版发行（这是9月3日的事），并立即展开公开辩论，其实，这就是新政党的新纲领。我们拒绝了，并禁止其扩散，并且拒绝在最近的全体会议上加以研究。这份《纲领》和政治局以及中央监委主席团的答复已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委员。但反对派还是进行了秘密散发。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获了军事阴谋家，并且撞上了一个叫谢尔巴科夫的人（无党派人士、工厂主的儿子），在他那里发现了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与姆拉奇科夫斯基及其他反对派有直接关系）。政治保卫局还搜查了小小反对派（谁也不知道或很少有人知道的）中的某些人，并逮捕

了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两天后，收到了一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写的蛮横无理的信。信中，他们承认自己是地下印刷厂的组织者，并“要求释放被捕者”（被捕者都是无党派人士），其实，原来是类似于“米亚斯尼科夫组”或“工人真理”的组织。我们以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地下印刷厂的通知》，并决定将与印刷厂有关的“反对派中所有小人物”开除出党，暂时把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两位的问题搁置起来^①……我们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报纸上对这件事暂时还没有什么反应。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3) 什么时候你来这儿？你能摆脱盲肠炎的折磨就好了。

4) 给你寄出一小点有关党内斗争的材料。

赶快康复吧！

向阿廖沙问好！

你的 柯巴

^① 1927年10月13日，政治局批准了中央监委主席团关于从联共（布）开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的决定。

应该分发“劳动农民党”案的供词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和马卡罗夫的新供词。亚戈达已把这些供词带给我看了。我认为，应该把所有这些供词加上格罗曼的第一次供词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及我们那些最积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这是头等重要的文件。

握手！

斯大林

① 1930年8月10日，政治局决定将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而遭逮捕的人的供词，分发给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和候补中央监委，及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信

(1936年9月25日)

1936年9月25日

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第一，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显而易见，在执行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案件的任务中，亚戈达力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延误了四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数州的代表都在谈论这一问题。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任叶若夫的副手。

第二，认为有必要立即撤销雷科夫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亚戈达担任邮电人民委员职务。我们认为，无须为这件事情寻找依据，因为它是清楚的。

第三，认为撤销洛博夫和任命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伊万诺夫同志为林业人民委员刻不容缓，伊万诺夫熟悉林业，他是一个干练的人。洛博夫作为人民委员，对其工作不能胜任，每年他的工作都是以失败告终。建议洛博夫留任林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的第一副人民委员。

第四，至于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则可以让叶若夫兼任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主席，但其90%的时间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中叶若夫的第一副主席，可推荐雅科夫列夫·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担任。

第五，叶若夫同意我们的提议。

第六，自然，叶若夫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日丹诺夫

№ 44 1936年9月25日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叶若夫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我们国外的敌人出于别有用心目的散布谣言说，苏联大肆枪决人，他们为被我们揭露并处决的间谍，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之流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苏联揭露了外国间谍会使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下降，而苏联被处决的人数几乎超过100万。这是别有用心之人的诽谤。1937年法院因反革命罪判处了841人有罪，其中121人被枪决。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关于反革命罪的条款逮捕了52372人，经法院审理有2731人被判有罪，其中89人被处决，49人被宣告无罪。

这样大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没有充分根据就逮捕了許多人，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因此他于1939年4月1日被捕，1940年4月4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的判决，内奸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被枪决。……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124-125页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二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六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六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6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卫国战争篇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〇年

战前绸缪

苏联对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态度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3

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

（1939年9月7日） 7

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1940年1月21日） 9

对苏芬战争中苏联军队的评价

（1940年3月28日） 11

关于签订苏-保互助条约的建议

（1940年11月25日） 13

我们已经有400万人的军队做好了战备

（1941年2月4日） 15

德国军队并非战无不胜

（1941年5月5日） 17

在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简要记录）

（1941年5月5日） 19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的三次讲话 (1941年5月5日)	26
--------------------------------------	----

对德关系

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致希特勒电 (1939年8月21日)	30
莫洛托夫先生同意回访柏林——致里宾特洛甫的信 (1940年10月22日)	31
对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指示 (1940年11月9日)	32
在对德签约时删除关于印度的条款——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35
同德国协议已告完结一句说得不准确——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36
与希特勒谈判的方针——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37
与希特勒谈判的策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38
希特勒主要想干的是进攻苏联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40年11月18日)	39

战争开始

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了 (1941年6月22日)	43
关于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1941年6月30日)	45
关于组织斯摩棱斯克保卫战的第2号命令 (1941年7月16日)	47

关于改组方面军和调整红军指挥人员的决定	
(1941年7月29日)	48
“当家的”，好心情	
(1941年9月8日)	50
国防委员会关于撤离莫斯科的决定	
(1941年10月15日)	51
“今天您就必须撤退！”	
(1941年10月15日)	52
关于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1941年10月19日)	53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关于破坏靠近前线地带居民点的命令	
(1941年11月17日)	55

艰难应战

你违背了斯大林讲话的指示精神——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0日)	58
等待你们的将是对怕死鬼和逃兵的严惩——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1日)	60
应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了	
——与西方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7月20日)	61
通过朱可夫向红军骑兵司令传达的命令	
(1941年7月21日)	62
各部队必须与方面军保持经常联系——与沙波什尼科夫的谈话	
(1941年7月26日)	65
关于西方面军防御准备工作的情况——与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8月2日)	68
要学会自己供应和补充自己	
(1941年8月5日)	70

苏英之间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一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6日)	74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二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7日)	86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三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8日)	94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四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20日)	100
向丘吉尔转达我对他的信函的答复——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107
对英国人提出加紧提供歼击机和坦克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108
尽快签订条约并在这之后去美国——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09
你应当在返途中在伦敦停留——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10
对艾登的草案不要再作任何修正——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5日)	111
同意你对第四条条款的修正——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6日)	112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1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1日)	113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摘录)	
(1943年10月21日)	117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2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7日)	119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摘录）	
（1943年10月27日）	128
关于欧洲战后安排的问题	
——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记录	
（1944年10月17日）	130

战局转折

关于组建机械化军的指示	
（1942年1月3日）	137
国防委员会关于有关人员责任范围的决定	
（1942年2月4日）	138
您的立场非常方便但糟糕透顶——给梅赫利斯的电报	
（1942年5月8日）	139
关于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连的指示	
（1942年7月4日）	140
关于修改“指环”计划的指示	
（1942年12月28日）	141
给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的指示	
（1943年1月4日）	142
希特勒失去了所有经验丰富的将军——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943年2月4日）	143
关于五个方面军坦克部队建制的指示	
（1943年5月14日）	146
关于被围希特勒军队突围一事——致朱可夫的电报	
（1944年2月12日）	147

苏美之间

要搞清楚“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28日）	149

三国首脑午餐会时的谈话记录（续）

- （1943年11月30日） 150
-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同罗斯福的会谈记录
（1943年12月1日） 154
- 雅尔塔会议开幕前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4日） 157
- 就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8日） 161
- 柏林会战前夕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电报
（1945年4月1日） 166

波兰问题

关于旅美波兰侨民对苏联的态度

——与奥尔列曼斯基的谈话记录

- （1944年4月28日） 168

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记录

- （1944年8月9日） 175

与丘吉尔关于波兰问题的谈话记录

- （1944年10月14日） 180

同丘吉尔关于波兰等问题的会谈记录

- （1945年2月10日） 184

关于波兰的局势——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节选）

- （1945年4月15日） 190

苏法之间

会见法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柏蒂的谈话记录

- （1943年9月15日） 193

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第一次会谈的记录

- （1944年12月2日） 198

同戴高乐共进早餐时的谈话	
(1944年12月3日)	208
同戴高乐第二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6日)	211
同戴高乐第三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8日)	221

战后世界

附录 原子弹、原子弹……	
(1945年7月-1949年8月)	231
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谈记录	
(1946年7月23日)	234
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见	
(1950年5月15日)	240

插图

一 广播演说	46
二 必胜信念	72
三 三巨头会	145
四 胜利喜悦	229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卫国战争篇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〇年

战前绸缪

苏联对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态度

——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节选）

（1935年6月28日）

.....

罗曼·罗兰：最后，我要谈谈由战争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引起的迫切需要消释的一种误解。这个问题法国早就争论过。几年前，我同巴比塞^①和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们讨论过不受制约的反战运动的危险性。我认为，必须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研究，并确定在不同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不同立场。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苏联需要和平，想要和平，但苏联采取的立场与整个和平主义并不一致。和平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退让，而这种退让也会导致战争。在这方面，我对1932年举行的阿姆斯特丹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②的某些决议不太满意，因为这些决议使人对反战策略的问题产生某种怀疑。目前，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苏联的许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都茫然不知所措，因为苏联同帝国主义的法国民主政府结成的军事联盟^③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感到难堪，这一切使人们忧心忡忡。这里有许多需要加以阐明的重大的革命辩证法问题。应当尽可能真诚地、公开地来做这项工作。

.....

① 巴比塞，法国著名作家，著有《斯大林传》等书。

② 国际反对战争代表大会于1932年8月27—29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苏联代表团未出席，因某些代表去荷兰的入境签证被拒签。

③ 1932年11月苏法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5月在巴黎签订了法苏协定，规定在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入侵威胁时互相帮助和有义务协商。

斯大林：我现在一一答复。

首先，谈谈战争问题。我们同法国的互助协定是在什么条件下签订的呢？当时，在欧洲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两个国家体系：法西斯国家体系和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另一个国家体系——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系。法西斯国家用强制的手段压制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用强制的手段摧残工人阶级及其思想，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里感到窒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同样压制工人运动，但采取的手段不同，这些国家还有议会、某些自由报刊、合法的政党等等。差别是存在的。诚然，这些国家也有局限性，但毕竟还有一定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呼吸空气。这两个国家体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斗争。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试问：工人国家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保持中立，不进行干预呢？不，不应该，因为如果保持中立，那就意味着让法西斯分子容易得逞，而法西斯分子获胜对和平事业是个威胁，对苏联是个威胁，因而对世界工人阶级也是个威胁。

但是，如果苏联政府要干预这场斗争，那么它应当站在哪一方呢？当然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方，况且这些国家尚未破坏和平。因此，苏联希望，法国能充分武装起来防范法西斯国家可能的进攻，反对侵略者。因此，我们的干预就为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天平上投下一个砝码，使天平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主义和反侵略方面倾斜。这就是我们同法国签署协定的原因所在。

我是从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法国共产党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上是否也应采取这种立场呢？我看，不应该。法国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在法国执政的是资本家、帝国主义者，而法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能否保证法国资产阶级不动用军队去镇压法国工人阶级呢？当然不能。

苏联同法国签署了关于反对侵略者、反对外来进攻的互助条约。

但苏联没有签订，也不可能签订关于法国不动用自己的军队镇压法国工人阶级的条约。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同法国共产党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显而易见，法国共产党的立场同由共产党执政的苏联的立场也不会相一致。因此我非常理解法国同志们所说的，法国共产党基本上应当坚持苏法协定签订前的立场。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如果战争无视共产党人的努力而终于爆发，共产党人就应当抵制战争，在工厂进行怠工等等。我们布尔什维克尽管反对战争并希望沙皇政府失败^①，但从未拒绝拿起武器。我们从来不赞成工厂怠工抑或抵制战争，而恰恰相反，当战争已不可避免时，我们应征入伍，练习射击，学会使用武器，然后拿起武器射向我们的阶级敌人。

至于苏联能否同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反对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协定，这个问题早在列宁在世时并在他的倡导下得到了肯定。托洛茨基当时非常赞成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现在看来他是忘记了……^②

您说，我们应当带领我们的西欧朋友一道前进。应当说，我们害怕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不能承担带领他们前进的任务，因为很难给那些生活在完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从莫斯科来领导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未免过于大胆了。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最一般的建议。否则，我们所承担的就是力所不及的责任。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受外国人领导，而且还是从远方进行领导的滋味。战前，说得更确切些是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党国际^③的核心，而我们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学生。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试图领导我们。如果我们让他们

① 1914 年 10 月列宁发表了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失败的口号。

②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③ 指 1889 年社会党在巴黎创建的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在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解体。

来领导，那么我们肯定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不会有 1905 年的革命，也就是说不会有 1917 年的革命。应当让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人，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实行领导。

当然，如果说我们的西方朋友对苏联政府行为的动机不甚了解，往往被我们的敌人逼进死胡同，那么这不仅说明我们的朋友不善于像我们的敌人那样很好地武装自己，而且还说明我们没有让我们的朋友充分了解情况并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将尽力弥补这一不足。

您说，敌人对苏联人大肆诽谤和造谣，而我们却很少予以驳斥。的确如此。敌人对苏联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有时予以驳斥反而感到尴尬，因为这些谣言太荒谬了。例如，他们写道，我率领军队去反对伏罗希洛夫并杀害了他，可过了 6 个月后，他们把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同一报刊上又写道，伏罗希洛夫率领军队反对我并把我杀了，这显然是说伏罗希洛夫在自己死后又把我杀了，这还不算，他们还写道，我和伏罗希洛夫达成了协议等等。难道这还值得一驳吗？

罗曼·罗兰：但正是由于既不进行驳斥，又不加以澄清，才使诽谤变得肆无忌惮。

斯大林：也许是这样。可能您是对的。当然，是可以对这些荒谬的传闻作出更有力的反应的。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1996 年第 2 辑

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

(1939年9月7日)

1939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

斯大林：战争是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穷的和富的，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等）之间进行，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为了统治世界！

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互相消耗力量。

如果用德国的手能动摇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并不是坏事。

希特勒（他自己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正在动摇、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执政的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不同的。

我们在家里是主人。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人是反对党，那里资产阶级是主人。

我们可以巧妙应付，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让它们厮打。

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德国。

下一步——推动另一方。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战争打响之前，使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相互对抗，是完全正确的。在战争期间，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个就不正确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就失去了以前的意义。

战争引起了根本的转变。

昨天的人民统一阵线是为了减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的处境。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就要提出消灭奴隶制度的问题了！

还站在昨天（人民统一阵线、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就意味着滑向中产阶级的**立场**。

这个口号要取消了。

波兰国家从前（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革命者曾经保卫它不遭分割和奴役。现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消灭这个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消灭了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宁愿同所谓的民主国家签订协议并为此进行了谈判，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想让我们当长工而且还不付分文！我们当然不愿当长工，更不愿白干。

必须告诉工人阶级：

战争是为了统治世界。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打仗是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

这场战争除了苦难和贫困外不会给工人、给劳动者任何东西。

坚决反对战争和战争的发动者。

揭露**中立主义**、资产阶级**中立国家**，它们宣布自己**中立**，却支持在其他**国家**打仗，目的是发财。

必须准备并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纲。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98-99页

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1940年1月21日)

1940年1月21日

.....

在政治局办公室内。

气氛友好。

在场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什基里亚托夫、什切尔巴科夫、马林科夫、布琼尼、季米特洛夫。

.....

斯大林：“把世界革命说成是统一的行动——这是蠢话。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内进行。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事业。

斯大林：“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斯大林（祝酒为红军战士干杯）红军过去未受过足够的训练、穿得很糟，我们现在已在给他们提供衣服鞋袜。红军正在为自己的名誉（在一定程度上已败坏的名誉）和光荣而战斗。

.....

斯大林询问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还问了南斯拉夫

人茨维特科维奇是何许人物。

关于土耳其问题斯大林说：“受损失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土耳其人。我们甚至为能够摆脱同土耳其的某些友好联系而感到满意。”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05-106页

对苏芬战争中苏联军队的评价

(1940年3月28日)

1940年3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

就伏罗希洛夫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梅赫利斯、什恰坚科、库利克（均为副人民委员）发了言。他们攻击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他们说：对于敌人的实力和防御力量、对其工事、基地和领域的不正确情报是芬兰战争中的基本错误。

.....

斯大林（发言反对库利克、梅赫利斯、什恰坚科的攻击）：他们藐视总参谋部，不支持它，现在则把矛头指向它。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是在总部的领导下才开始真正行动起来。错误在于，人民委员们喜欢通过自己的秘书进行领导。

库利克的发言是一种误解。他自己应对领导炮兵管理局负责等。

梅赫利斯是好人，有工作能力，但是无能力领导军队。

什恰坚科负责干部工作，然而对他来说，只有长工们才是有能力的，谁如果不是长工，他就认为谁没有能力。

至于伏罗希洛夫，在我国，很少有人民委员能坦率地谈自己的缺点。

说军队的战斗力在冬天总会削弱是不正确的。俄罗斯军队的所有重大胜利都是在冬天取得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同瑞典人对抗、彼得大帝对抗在芬兰的瑞典人、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我们是北方国家。

在旧军队中有许多好传统，应该利用这些传统。

关于给军队提供面包干等问题。

结论：

(1) 战士们是优秀的。

(2) 指挥员中 60%是好的，40%游手好闲、缺乏毅力、胆小怕事

.....

好的指挥员具有刚强的性格、意志力、知识、理智（他们不会用脑袋去把墙撞穿）。在必要时，他们善于突击；在无法通过的地方则会停止，以便保存力量进行新的打击。

他们不是仅仅伴随着乌拉声被抛起来的人物。

一切取决于指挥员。好的指挥员能管好弱的师团，坏的指挥员能使最好的师团瓦解。

(3) 炮兵部队——决定性作用。

坦克为步兵开辟道路。

空军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4) 我们不仅使芬兰白军，而且还使他们的老师——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跪倒在地。

(5) 假如人民委员部工作得更好，我们就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08-109页

关于签订苏-保互助条约的建议

(1940年11月25日)

1940年11月25日

.....

我刚回共产国际时被斯大林召见，恰好在那里遇见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

斯大林：今天我们向保加利亚人提了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我们提供的不是保障（看来，保加利亚大使斯塔梅诺夫原先误解了莫洛托夫），而是互助条约。我们向保加利亚政府指出，在黑海和两海峡方向，两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必须为保障这一安全而作出努力。在历史上，危险总是来自这一地区：克里木战争中占领塞瓦斯托波尔、1919年弗兰格尔的武装干涉等。

我们支持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米迪亚至埃诺斯一线（奥德林地区、西色雷斯、德德阿加奇——德拉马和卡瓦拉）。我们准备向保加利亚人以借贷方式提供援助，像小麦、棉花等以及船队和采用其他方式。假如签订了公约，将具体商定互助的形式和规模。在签订互助公约时，我们不仅不反对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公约，而且，那时我们自己也将参加这一公约。

假如保加利亚人不接受我们这一建议，他们将完全落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魔爪中，那时他们将遭到毁灭。

关于土耳其，我们要求有基地，好使两个海峡不被利用来反对我们。显然，德国人想让意大利人成为两个海峡的主人，但是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在这地区占优势的利益。我们将把土耳其人赶到亚

洲去。土耳其是何许国家？那里有 200 万格鲁吉亚人、150 万亚美尼亚人、100 万库尔德人等，土耳其人只有 600 万-700 万。

现在主要在于保加利亚。假如签订了这项公约，土耳其就不会下决心同保加利亚作战，巴尔干地区和整个局势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认为英国已被击溃是不对的。它在地中海有很大势力。英国在占领了希腊的岛屿之后，在这一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同德国人的关系表面上客气，但在我们之间有严重的冲突。

这项建议已在今天转交给保加利亚政府。我们的使者已被菲洛夫接见，很快还会被鲍里斯国王接见。应使保加利亚各界广泛知晓这项建议。

（我们决定把斯塔梅诺夫找来，以便把已在索非亚提出的建议也通知给他。）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 第 115-116 页

我们已经有 400 万人的军队做好了战备

(1941 年 2 月 4 日)

1941 年 2 月 4 日

.....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

庆祝伏罗希洛夫 60 寿辰。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元帅、图列涅夫和梅列茨科夫将军、人民委员、中央委员——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马努伊尔斯基、米哈依洛夫（青年代表）和夫人们。出席人数比莫洛托夫寿辰时略少。几乎为所有出席者都祝过酒。

.....

斯大林两三次举杯祝酒。

为红军和海军舰队祝酒：

“依靠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得以利用和平带来的好处（买得便宜卖得贵！）。军队和海军舰队的强大还帮助我们实行中立政策并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

关于年轻干部：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会把年轻干部压制 20-25 年，然后才准许他们到各种各样的领导岗位上去。这是法国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提拔年轻干部，有时甚至过于大胆。我们满意地、高兴地提拔他们。

年纪大的人坚持旧观念，年轻人向前进，及时地用年轻人替换年

纪大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不如此做的国家注定要失败。”

关于加强实力：

“我们很走运。‘上帝’帮助了我们。许多成绩来得容易。存在着冲昏头脑的危险。我们不应骄傲。应刻苦工作和学习。

我们已经有 400 万人的军队做好了战备，以防万一。沙皇曾幻想拥有 120 万的常备军。”

关于列宁：

“是列宁诞生了我们，创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始祖。为了一切我们都对他欠着债。我们应像列宁一样工作。同列宁相比，我们大家都是‘小雏’。”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 第 125-126 页

德国军队并非战无不胜

(1941年5月5日)

1941年5月5日

.....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军事学院毕业生毕业典礼，然后举行招待会。

斯大林在毕业典礼上讲了话。

“红军在现代战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改组和重新武装，但是，我们的学校落后于军队中的这一过程。这些学校没有以最新式的武器为基础进行训练。必须考虑到军事中的巨大变化和当今的世界大战的经验。

为什么法国被击溃，英国遭失败，而德国人取得了战绩呢？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寻求并找到了摆脱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陷入的困境的新途径和手段。它建立了军队，培养了干部，用足够的武器，特别是大炮、坦克和空军装备起来。同时，英法两国在胜利后被成绩冲昏了头脑，夸耀自己的强大，不搞必要的备战。列宁说得对：政党和国家会由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灭亡。

自认为战无不胜，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军队必将失败。

德国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吗？不是！它并非战无不胜。首先，德国是在‘从凡尔赛体系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下发动战争的。它得到了因凡尔赛体系而受苦的人民的同情。但是，当前德国已是在征服其他国家人民的旗帜下，在霸权的旗帜下继续进行战争了。这是德国军队很大的短处。它不仅得不到一些国家的人民先前的那种同情，相反，把

自己置于同它占领的许多国家对抗的地位。一支需要作战，但在自身之下以及自己的后方有着敌对的领土和群众的军队会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这是德国军队的另一短处。

第二点，德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被冲昏头脑。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他们的军队已够强大，无需进一步完善。

这一切表明，德国军队并非战无不胜。

拿破仑在进行打破农奴制枷锁的战争时曾有巨大的战绩，但刚开始进行征服其他国家人民的战争，他的军队就开始遭受失败。

我们的军队应不断巩固和完善。我们的军校也应同军队并行不悖，而不是落后于它。”

在招待会上，斯大林几次举杯，他的心情极佳。

“……装备好的步兵是基本的。但炮兵部队（大炮、坦克）起主要作用。为了起这样的作用，炮兵部队需要空军。空军不能独自决定战斗的命运，但是在同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时，它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远程作战空军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在敌人的大后方进行破坏活动来说，它必不可少），近程作战空军（轰炸机、俯冲飞机）最为重要。近程作战空军保护炮兵部队和其他武器的行动。在现代战斗中，骑兵部队并未失去意义。它很重要，尤其是在敌军从我们的阵地被赶走时，为了追踪他们，使其不可能在新的阵地上站稳脚跟时更是如此。只有在把所有兵种的部队正确地结合起来时才能保证胜利。

我们执行和平的、安全的政策，同时，它又是备战的政策。没有离开进攻的防卫。必须以进攻的精神来教育军队。必须为战争作准备。”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38-139页

在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

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了红军在最近3-4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法国溃败的原因、为何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取得了胜利和德军是否真的不可战胜等问题。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祝贺你们完成了学业，并祝愿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在3~4年前离开了部队，现在当你们返回部队的时候，你们已经不认识它了。红军不是几年前的那支军队了。

1) 3~4年前的红军是什么样的呢？

步兵曾经是军队的主要兵种。那时它配备的是每射一次必须重新填弹的步枪，配备的是轻机枪和重机枪，配备的是榴弹炮和初速大约为每秒900米的加农炮。

飞机的时速是400~500公里。

要承受炮火攻击的坦克的轻薄装甲是37毫米。

我们一个师计有约18000人，但是这还算是衡量它的力量的标尺。

2) 现在的红军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改建了我们的军队，用现代的技术装备武装了它。但是首先必须指出，许多同志从军事经验的角度夸大了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的意义。这里我们说不上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只是一支老化的军队。不告诉你们这一些，就是欺骗你们。

当然，哈桑湖事件（张鼓峰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是有着其积极

作用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事件中我们都打败了日本人。但是改造我们军队的真正经验，我们是从俄芬战争^①和西方现代战争中获得的。

我说了，我们有了一支拥有最新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在我们的军队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从前，红军拥有 120 个师。现在我们的军队是 300 个师。一个师本身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却更加机动灵活。以前一个师的人数为 18000~20000。现在则为 15000 人。

在所有师的总兵额中，1/3 为机械化师。人们对此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们应该了解这一切。100 个师中，2/3 是坦克师，而 1/3 则为摩托师。今年内部队将配备 50 万辆拖拉机和重型汽车。

我军的坦克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从前所有的坦克都是薄壁型的。但是这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厚达 3~4 倍的甲板。

我们有第一线的坦克能够撕破防线。第二、三线的坦克则是配备步兵的。

坦克的炮火威力增强了。

关于火炮。

从前人们非常迷恋榴弹炮。现代战争改变了这个情况，提高了火炮的作用。为了对付敌人的防御工事和坦克，需要能够直接瞄准射击的、炮弹的最大飞行初速达到每秒 1000 米及其以上的火炮。

我军的火炮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飞机。

从前飞机的时速达到 400~450 公里被认为是理想的了。现在这

^① 即 1939 年 11 月底至 1940 年 3 月的苏芬战争。苏军虽然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人员和物质损失的巨大代价，并暴露了它在战备和军事装备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已经落后了。我们拥有大量的并且还在大量生产时速为 600~650 公里的飞机。这是第一线使用的飞机。战时这些飞机将被首先使用。它们将为我们相对陈旧的歼-15、歼-16、歼-153(海鸥牌)和高速轰炸机扫清道路。如果我们先使用这些飞机，那它们就会被击落。

要有好的各级指挥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就可能输掉战争。以前没有注意像迫击炮这样造价低但却具有宝贵作用的武器。它们被人们轻视了。现在，我们配备着现代化的各种口径的迫击炮。

以前我们没有摩托化部队。现在我们建立了这样的部队，这就是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摩托车骑兵。

为了管理所有这些新的设备——新的军队，需要非常懂得军事艺术的指挥干部。

这就是在红军组织中所发生的变化。当你们回到红军队伍中去的时候，你们就会看见已经发生的变化。

这些我就不说了，但是我们的（军事）学校和院校却落后于现代化的军队。

3) 我们的军事院校落后于军队的发展。

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在这里作过报告，他谈到了毕业的学员情况和用军事经验培养他们的情况。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的学校还落后于军队。

他们还是按照旧的技术装备进行训练的。这不，人们告诉我，在炮兵学校训练用的是 3 英寸的火炮。炮兵同志们（朝着炮兵），是这样的吗？学校已经落后于军队。空军院校训练的还是旧的歼-15、歼-16、歼-153 飞机和高速轰炸机^①。不能用这种旧的装备来进行训练了。

^① 1941 年 3 月 4 日，正在航空大队训练的瓦西里·斯大林在致约·斯大林的信中，就具体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见档案附卷一第 72 页。

以旧的装备进行训练，意味着培养落后的人。

教学大纲对于这种落后也有责任。须知，要以新的方式培养新人，就必须改变教学大纲，但为此必须做大量的工作。按旧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是轻松和省力的。我们的学校应当和能够按照新的技术装备来重新建立培养指挥干部的方式，并且利用现代战争的经验。

我们的学校落后了。这种落后是必然的。必须予以消除。

你们将要回到部队中去，在那里你们会发现新的事物。为了有助于你们的工作，我谈了些我们军队的改建情况。

为什么法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取得胜利呢？德军是否真的不可战胜呢？

你们将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就现在发生的事情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曾在军校学习，你们在那里接近上级领导，请你们讲讲，周围有些什么情况？为何法国战败了？为何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却取得胜利？德军是否真的不可战胜？指挥员必须不仅仅能进行指挥和发布命令，这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同士兵进行谈话。向他们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与他们进行坦率的交谈。我们的一些伟大的统帅总是与士兵保持密切联系的。必须像苏沃洛夫^①那样行事。

人们会问你们：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欧洲的情况颠倒过来了？为什么法国失败了？为什么德国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德国的军队是最好的？这是事实——德国的军队在技术装备和组织方面是最好的。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在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就是很能学习。

^①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729/1730—1800），俄国元帅。曾多次在对外战争中指挥俄军获得胜利。

德国人以批评的方式重新审视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更好地组建、培养和武装自己军队的方法。

德军的军事思想向前发展了。军队是以最新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训练是以新的战争手段进行的。

总起来讲，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装备和组织是不够的，必须有较多的盟友。

这就是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的原因——德军吸取了过去的经验。

1870年，德国人打败了法国人。为什么？因为德军在一条战线作战。

1916~1917年，德国人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因为德军在两条战线作战。

为何法国人从1914~1919年的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列宁教导说，如果对于缺点视而不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求进取，因成功而弄昏了头脑，那么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法国人因为胜利和自我满足而昏了头。法国人忽视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盟友。法国因成功而陶醉。法军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它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上。军队没有人关心，得不到道德上的维护。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的道德问题。对军队漠不关心。指挥官被认为是那些没有工厂、银行和商店的失意者和不中用的人而被迫去从军的。甚至姑娘都不愿嫁军人。只有在如此冷遇军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军事部门掌握在很少懂得军事的甘末林和艾兰赛德^①们手中这样的事情。军队应当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格外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军队的最大的道德力量所在。必须爱护军队。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问题，就不会有坚强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① 甘末林，法国将军，二战前夕曾任法军总参谋长，二战初期任法国陆军总司令。艾兰赛德，1938—1940年任英军总司令。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作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作好准备。

政治上作好战争的准备意味着什么？政治上作好战争的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德国进行战争的时候解决了这一任务，而英国和法国没有解决这个任务。

这就是法国失败和德国胜利的原因所在。

德军是否真的不可战胜？

不是的。世上没有也未曾有过不可战胜的军队。有较好的、好的和差的军队。德国发动了战争，而且开始的时候它提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①压迫的口号。这一口号是受人欢迎的，得到了受到凡尔赛和约欺凌的国家的支持和同情。现在情况改变了。

现在德军喊出的是另一种口号。它以掠夺性的口号代替了从凡尔赛和约中解放出来的口号。

在掠夺性的征服战争的口号下，德军不会取得胜利了。这些口号是危险的。

当拿破仑一世^②打着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开始进行战争的时候，他得到了支持，博得了同情，获得了盟国并且取得了胜利。

当拿破仑一世转而进行征服战争的时候，他遇到了许多敌人并且遭到了失败。

既然德军是在征服其他国家和使其他民族从属于德国的口号下进行战争的，那么这种口号的改变就不会导致胜利。

从军事角度看，德军无论在坦克、大炮还是飞机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① 又名《巴黎和约》，1919年6月28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

②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大部分德军失去了战争开始时有过的那种热情。

除此之外，德军中出现了吹嘘、自满和骄傲的现象。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军事装备不仅落后于我们，而且在飞机方面开始被美国所超过。

德国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胜利的？

1. 德国得以如此，是因为德军作为一支被打败的军队进行了学习和改造，并且重新审视了旧的有价值的东西。

2.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在上两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后，没有去探索新的道路，没有进行学习。法军曾经是（欧洲）大陆上一支占优势的军队。

这就是在某一时期之前德军得势的原因。

但是，德军已经是在征服其他民族的旗号下进行战争了。既然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旧的口号联合了不满凡尔赛和约的人，那么德国的这一新口号也就在分离这些人了。

就进一步的军事发展而言，德军失去了继续改善军事技术装备的兴趣。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和战无不胜的。这是不正确的。

军队必须不断地得到完善。

任何产生了自满情绪的政治家和活动家都会遇到不测之事，就像法国遭到灾难一样。

再次祝贺你们并祝愿你们取得成就。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①

① 本卷所引档案资料如未有注明出处者，均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的三次讲话

(1941年5月5日)

第一次讲话

请允许我为我们院校的领导干部、为指挥员、为教员和为消除在现代技术装备研究领域方面的落后状况而干杯！

为什么会出现落后的状况？这是因为，第一，教员们教授熟悉的旧的技术得心应手。要教会学员们掌握新的技术装备，教员自己就必须了解和研究它。必须重新学习。院校里是按照旧的大纲进行教学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后勤部门没有向学校和院校提供新的装备。必须向学员提供这种新的装备以便研究和消除我们学校和院校的落后状况。

第二次讲话

祝炮兵们身体健康！炮兵是军队中最重要的兵种。炮兵是现代战争之神。军队中所有的兵种，步兵、坦克兵和空军中，都有火炮。

祝坦克兵身体健康！坦克是疾驶的、以装甲为护体的火炮。坦克中的大炮口径可以达到130毫米。

祝飞行员身体健康！

有两种类型的飞机。远程作战飞机可以深入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和破坏活动，但是它没有重要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倒是被人低

估和忽视的近程作战飞机。这是一种能够与炮兵、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的飞机，它就是歼击机、强击机和俯冲机。

祝骑兵们身体健康！

我们缩减了一些骑兵部队，但是，现在骑兵的作用非常大，我们骑兵的数量并不少。

在现代战争中骑兵的作用非常重要。在突破敌人的战线后，骑兵可用来扩大战果。它可以追击溃逃的敌军，切入被突破的敌人防线。尤其是当它追击溃败的炮兵时，必然使其无可动弹，绝对不会使其有可能选择新的炮火阵地。

祝我们的通信兵身体健康！祝我们光荣的步兵战士身体健康！这里我没有例举步兵。现代化的步兵是由身披装甲的人组成的，这就是摩托化步兵，这就是坦克兵。

关于自动化步枪的意义。

一名配备自动化步枪的战士等于三名肩扛普通步枪的士兵。

第三次讲话

坦克兵部队的一名少将正在发言。

他举杯为斯大林的和平对外政策干杯。

斯大林同志说：请允许我作些修正。

和平政策保障了我国的和平。和平政策是好事情。直到我军更新武装和现代化的作战装备配备军队之前，我们一直奉行防御性方针。

而现在，当我军得到重新改建和获得了进行现代作战的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的时候，就必须由防御转为进攻。

在保卫我们的国家时，我们必须采取进攻方式。由防御转入进攻性的军事政策。我们必须本着进攻的精神，改革我们的教育、宣传、

鼓动和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就是进攻性军队。

对德关系

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致希特勒电

(1939年8月21日)

德国总理阿·希特勒先生：

感谢来函。

我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为根本改善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点。

我们两国人民彼此之间需要和平关系。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将为我们两国间消除政治紧张局势和建立和平和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我通知您，它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来莫斯科。

约·斯大林

莫洛托夫先生同意回访柏林

——致里宾特洛甫的信

(1940年10月22日)

亲爱的里宾特洛甫先生：

来信收到。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以及来信对不久前事态很有价值的分析。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改善无疑只能置于划分相互长期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莫洛托夫先生同意回访柏林，因此他接受您的邀请。

我们尚需商定他抵达柏林的时间。莫洛托夫先生最方便的时间是11月10-12日。如果德国政府也认为合适，这个问题就可以认为是解决了。

我欢迎您表示的再次访问莫斯科，对去年开始的就两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进行总结的愿望，我希望在莫洛托夫先生柏林之行后这一愿望将能实现。

至于同日本和意大利一起讨论一系列的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认为对这个问题应预先加以研究。致以

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230页

对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指示

(1940年11月9日)

绝密

维·莫洛托夫。对柏林之行的若干指示

1. 访问的目的：

1) 探明德国和三国公约的所有参加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实行“新欧洲”和“大东亚区域”计划中的真实意图；“新欧洲”和“大东亚区域”的边界；在“新欧洲”和“大东亚区域”中国家结构和一些欧洲国家关系的性质；实现这些计划至少是近期计划的阶段和日期；其他国家加入三国公约的前景；现在和将来苏联在这些计划的地位。

2) 拟定苏联在欧洲以及在近中东的利益范围的初步设想，探询与德国（还有与意大利）就此达成协定的可能性，但是鉴于里宾特洛甫近期内将来莫斯科继续进行谈判，所以在现阶段的谈判中不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什么协定。

2. 鉴于苏德关于部分划分利益范围的协定随着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效（除芬兰外），在谈判中要力争使下列地区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

1) 芬兰——以39年的苏德协定为基础，德国在履行协定时应当排除所有障碍和含糊之处（撤出德军、在芬兰和德国停止所有损害苏联利益的政治游行）。

2) 多瑙河，多瑙河的近海地区——按照给索波列夫同志的指示——还要就下列问题提出我们的不满，即，德国没有就罗马尼亚边界和德军进入罗马尼亚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

3) 保加利亚，这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根据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协

议，就像德国和意大利对罗马尼亚一样，保加利亚应当在苏联向保加利亚作出保证的相同基础上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由苏联向其派驻军队。

4) 关于土耳其及其命运的问题没有我们的参与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在土耳其有重大的利益。

5) 作为与苏联交界的国家，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未来命运的问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希望能就此问题同我们进行协商。

6) 有关伊朗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在那里有重大的利益。这一点必须要谈。没有必要不谈这一点。

7) 对于希腊和南斯拉夫，我们希望知道轴心国想要采取什么措施。

8) 在有关瑞士的问题上，苏联的立场仍然是：该国保持中立有利于苏联和德国。德国是否仍然持这一立场？

9) 作为波罗的海国家，苏联对于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船只由波罗的海自由驶出通过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丹麦）、厄勒海峡（丹麦和瑞典）、卡特加特海峡（北欧）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北欧）问题持关注态度。如能按照多瑙河会议的例子，由感兴趣的国家的代表就此问题召开会议，那就好了。

10) 我们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挪威）的煤矿租让企业的工作应得到保障。

3. 德国和日本的过境运输——我们的地段是强大的，这是必须注意到的。

4. 如果问到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可以谈谈我们对土耳其人的答复，即：我们对他们说，由于没有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他们无权要求苏联给予援助。

5. 如果问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那么可以按照在斯大林别墅交换过的意见给予回答。

6. 谈谈人们告诉的如下情况，即：德国方面通过罗斯福向英国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是否符合真相和（英国的）答复是怎样的？

7. 对于可能提出的关于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回答是：美国还问我们：如果发生涉及土耳其和伊朗的危急情况，我们能否向它们提供援助？我们暂时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8. 问问三国公约所说“东亚区域”的边界在哪里？

9. 作为秘密议定书条款之一款的有关中国的问题；谈谈对于中国（蒋介石）谋求光荣和平的必要性，这里，苏联准备（或许由德国和意大利参加）充当调停者，我们不反对承认印度尼西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满洲国仍然属于日本势力范围。）

10. 建议以四国公开宣言的形式采取和平行动（如果主要的谈判——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出现有利的情况的话），其条件是：在英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立即撤离直布罗陀和埃及以及承诺立即向德国返还其以前的殖民地的情况下，保存大英帝国及其英国现在所拥有的领地（不包括委任统治地）。

11. 关于苏日关系——先维持在我对建川美次的答复范围内^①。

12. 询问有关波兰命运的情况——以 1939 年的协定为基础。

13. 关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赔偿问题：一年比例为 25%，三年比例为 50%（份额相同）^②。

14. 关于经济事务：在谈判进程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可谈有关粮食问题。^③

① 在答复日本新任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关于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时，苏联政府只同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② 这里说的是根据苏德协定苏联向在 1940 年离开波罗的海国家的德国人给予赔偿的问题。

③ 此处指的是苏联向德国供应粮食的问题。

在对德签约时删除关于印度的条款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1940年11月11日13时40分发出

第10063号

如果事情进展到发表声明这一步，我以同志们的名义做一次修正：我建议删除关于印度的条款。

理由是：我们担心条约当事人会把关于印度的条款作为煽动战争的阴谋手段来接受。

收到电报及同意与否请回电。

斯大林

同德国协议已告完结一句话说得不准确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1940年11月12日22时50分发出

特字第14号

在你的关于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密码电报中，关于除芬兰问题外同德国的协议已告完结一句话说得不准确。这句话是不确切的。应该说，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定书已告完结，而不是协议，因为德国人可能会把“协议完结”这句话理解成互不侵犯条约完结，自然，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等你同希特勒会谈的消息。

与希特勒谈判的方针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1时发出

1. 关于黑海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希特勒，问题不仅在于黑海出口，而主要在于它的入口，这一入口一直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用来对苏联海岸实施进攻。从上个世纪克里木战争到1918年和1919年外国军队在克里木和敖德萨登陆，所有事件都表明，海峡问题得不到调整就不能说苏联黑海地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说，苏联对黑海问题的兴趣是苏联海岸防御和它的安全保障问题。与此紧密相联的是苏联保障保加利亚的问题，因为不同保加利亚就苏联军队通过它的领土保卫黑海入口问题达成协议就不能保障海峡地区的安宁。目前这一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不能拖延仅是因为土耳其同英国有联系，而且因为英国海军占领了希腊的岛屿和港口，利用它同希腊的协议，它从那里可以一直威胁苏联的海岸，

2. 其余所有问题，按照你已知道的训令办理，至于下一步谈判的结果，你基本上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而莫斯科只剩下收尾和办理手续，——那就最好不过了。

3. 我们认为你在谈判中的行为是正确的。

与希特勒谈判的策略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4时50分发出

我们建议：

1. 不暴露我们对波斯的过多兴趣，只讲我们不反对德国人的提案。
2. 关于土耳其，暂时主张按照里宾特洛甫的精神，和平解决问题。但是要讲，没有我国保障保加利亚，不允许我们的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以作为对土耳其的施压手段，和平解决是不现实的。
3. 如果德国人建议瓜分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您可按照训令精神摊牌，使用上次密码电报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的论据。
4. 关于中国，同意里宾特洛甫妥协的意见，暂不运用训令中的措施。
5. 关于声明，表示原则同意，不要更改其条款。

希特勒主要想干的是进攻苏联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40年11月18日）

在过去几个月柏林和莫斯科交换信件时暗示最好能由两国高级代表参加讨论迫切的问题。德国的一封来信直接指出，从里宾特洛甫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欧洲和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希望苏联的全权代表团能赴柏林谈判。苏联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答应了德国关于今年11月在柏林举行会谈的建议因此苏联代表团的柏林之行是德国主动提出的。据我们所知，希特勒在我国代表团抵达柏林后立即大声叫喊说：“德俄关系已彻底确立！”但我们十分清楚这种说法的价值。我们在同希特勒会晤之前就已清楚，他不愿意尊重苏联涉及国家安全要求的正当利益。我们把柏林会谈看作是摸清德国政府立场的现实机会。希特勒在这次谈判中的立场，尤其是他坚决不愿尊重苏联正当的安全利益、坚决拒绝停止对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事实上的占领表明，尽管他蛊惑人心地声明不会损害苏联的“全球利益”，实际上却在为进攻我国作准备。纳粹元首要

求柏林会谈是在设法掩盖他的真实意图。

有一点很清楚：希特勒在耍两面派。他在准备侵略苏联的同时，竭力要赢得时间，使苏联政府产生他似乎愿意讨论德苏关系今后和平发展问题的印象。

斯大林接着谈到希特勒高层对苏联两面三刀的做法以及英法在1939年夏莫斯科谈判时期的立场，当时英法打算挑唆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强调指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地制止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当然只是暂时的喘息时机，武装侵略我国的直接威胁只是略微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排除。在德国，这方面有强大的势力在活动，德国统治集团不想把进攻苏联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拿下。相反，他们加强了敌视我们的行动，似乎在强调进攻苏联的问题已经决定了。

不禁要问，元首侈谈进一步与苏联合作的计划有什么意义呢？希特勒可能有朝一日放弃他的《我的奋斗》宣布的侵略苏联的计划吗？

当然不会。

历史上还没有过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希特勒的行动中没有目标明确的统一的方针，他的政策不断在调整，往往是截然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观点过去和现在都混乱不堪。希特勒分子自己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政党，而且是最贪婪、最强盗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只是希特勒分子用来欺骗人民、愚弄傻瓜和掩盖其强盗本质的遮羞布。他们用种族理论作为思想武器。这是奴役和压迫各民族的仇视人类的理论。

希特勒一贯声称他爱好和平，但他的政策的主要原则是背信弃义。他同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荷兰都订有条约，但他对其中任何一个条约都不予理睬，不打算遵守，一旦需要就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希特勒为与我们订立的条约也准备了这样的下场。但是我们在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已经赢得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为坚决与希特勒主义决一死战作好准备。我们当然不能依靠苏德条约建立我国可靠安全的基础，加强我国武装力量才是建立持久和平的保证。同时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为争取和平和各族人民友谊而斗争的使命……

希特勒现在为自己的胜利洋洋自得。他的部队以闪击式的突击摧毁了六个欧洲国家，迫使它们投降，我们不得不把这一事实看法西斯德国巨大的战略胜利，因为欧洲再也没有能制止希特勒帝国侵略的

力量了。现在希特勒的目标是收拾英国，逼它投降，为此加强了对英伦三岛的轰炸，大张旗鼓地准备登陆作战。但这不是希特勒主要想干的事，他主要想干的，是进攻苏联。

我们始终应当牢记这一点，加强准备反击法西斯侵略。我们的党除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外，还应该广泛地向劳动者说明国际局势出现的危险，不断揭露希特勒侵略者，加强苏联人民作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准备。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更加突出。现在当我国的边界往西方推移，需要沿着边界有强大的屏障和在邻近的——但不是最近的后方的军队各战役集团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应该尽快同日本签订保持中立的条约。德国和日本在其大国野心方面有着共同的语言，日本承认德国有权干预各国的内部事务。所以我们应该让它保持中立，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军事经济援助。我们必须设法削弱希特勒的同盟，把受希特勒德国影响并依附于它的附庸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238-241页

战争开始

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了

(1941年6月22日)

1941年6月22日

晨7:00,我被紧急召至克里姆林宫。

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了。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中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

斯大林对我说：他们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没有想进行什么谈判就向我们进攻了，像强盗般卑鄙地进攻。在向基辅、塞瓦斯托波尔、日托米尔和其他地方进攻和轰炸之后，舒伦贝格出来宣称，德国认为它受到集结在东部边境的苏联军队的威胁，因而采取了反击措施。芬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同德国人在一起。保加利亚同意代表德国在苏联的利益。——只有共产党人能够战胜法西斯分子……

在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身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

修改将由莫洛托夫在广播电台宣读的政府声明。

向军队作指示。

关于宣布动员令和战时状态的措施。

设立了联共（布）中央和指挥部在地下的办公地点。

斯大林说，各国外交代表应撤离莫斯科，应被送至别处，例如去喀山。在这里他们可能会从事间谍活动。

商谈了我们的工作。

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不应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苏联人民在进行反法西斯德国的卫

国战争。这是粉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它奴役了一系列国家的人民并企图继续奴役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把书记们和领导人员召至共产国际。我阐述了当前我们的立场和任务。

我们给美国、英国、瑞典、比利时、法国、荷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发了指示。

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宣布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42-143页

关于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1941年6月3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41年6月30日决议

鉴于业已形成的特别形势和为了尽快动员苏联各民族所有力量对背信弃义进攻我们祖国的敌人进行反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有必要：

(1) 成立国家国防委员会，成员包括：

约·维·斯大林同志（主席）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副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拉·帕·贝利亚同志；

(2) 国家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国防委员会手中；

(3) 全体公民和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和军事机关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伊·加里宁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维·斯大林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1年6月30日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46)

广播演说

关于组织斯摩棱斯克保卫战的 第2号命令

(1941年7月16日)

绝密

1941年7月16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国防委员会获悉，西方面军各部队指挥人员中弥漫着撤退情绪，在有关我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和放弃该市的问题上，态度轻率。如果上述情报属实，则国防委员会认为，指挥人员中的这种情绪，不啻是一种公开背叛祖国的犯罪行为。

国防委员会责成你们，以钢铁般的手段清除这种有辱红军战旗的情绪，并下令给保卫斯摩棱斯克的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斯摩棱斯克让给敌人。

国防委员会命令你们：

(1)立即组织对斯摩棱斯克的强有力的防卫，使之能够击退无耻敌人的任何进攻；

(2)为保卫斯摩棱斯克战斗到最后一息，决不把斯摩棱斯克让给敌人；未经大本营特别许可，不准从斯摩棱斯克调出部队；

(3)西方面军的所有部队都要以积极行动来支援斯摩棱斯克保卫战。

国防委员会命令西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同志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同志负责斯摩棱斯克的防卫工作。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关于改组方面军和 调整红军指挥人员的决定

(1941年7月29日)

绝密

第 Г К О — 325/CC 号

I

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将西方面军部队和西方方向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合并为西方面军。苏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同志既是西方方向总司令，同时又是西方面军司令。
2. 任命安·伊·叶廖缅科中将为西方面军副司令，协助铁木辛哥同志。

II

中央方面军直属最高统帅部。

III

1. 对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一线的预备集团军实行统一指挥，任命副国防人民委员格·康·朱可夫大将为这些集团军的司令，同时撤销原有的南北两个战区，这一线配置的所有集团军都直属司令。
2. 解除 H. A. 阿尔捷米耶夫中将同志的预备集团军南战区司令职务，任命他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兼任莫扎伊斯克防线预备集群司令。
3. 解除 И. A. 波格丹诺夫中将同志的预备集团军北战区司令职务，任命他为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副司令。
4. 鉴于朱可夫大将同志已被任命为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司令，解除朱可夫同志的总参谋长职务。

5. 任命苏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6. 鉴于西方方向和西方面军已实行统一指挥，将西方方向司令部的多余人员和通讯工具移交给朱可夫同志，以便组建预备集团军的司令部。

7. 任命克鲁格洛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为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8. 今后，维亚泽姆斯基—勒热夫防线预备集团军改名为预备队方面军，这些预备集团军的司令改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直属大本营。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当家的”，好心情

（1941年9月8日）

1941年9月8日

半夜0:00空袭警报。我在基洛夫防空洞躲避。好心情。“当家的”（指斯大林）自始至终机智地开着玩笑：

“假如我们打胜，就把东普鲁士还给斯拉夫，它属于斯拉夫。咱们会让斯拉夫人住到那儿去。”

.....

加里宁提到我们的人在 frontline 作战十分勇敢，斯大林回答道：

“每个蠢人都可以十分勇敢。必须善于作战！”

沙胡林说：“昨天，伊巴露丽发表了热情的演说。”

斯大林就此事说：“对，很好的演说。她（指伊巴露丽）是很好的女人。”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54页

国防委员会关于撤离莫斯科的决定

(1941年10月15日)

鉴于莫扎伊斯克防线地域的形势不利，国防委员会决定：

1.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通知外国使团，希望他们今天就撤往古比雪夫市（苏联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同志保证及时为使领馆提供列车，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组织使团的保卫工作）。

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天就撤退，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政府也要撤退（斯大林同志视情况明天或晚些时候撤退）。

3.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机关立即撤往古比雪夫，总参谋部的主体撤往阿尔扎马斯市。

4. 一旦敌军出现在莫斯科附近，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把不能撤退的企业、仓库和机关以及地铁所有的电气设备（除水管和管道）炸毁。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维·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374页

“今天您就必须撤退！”

（1941年10月15日）

1941年10月15日

莫洛托夫来电谈（德共的）呼吁书问题，他询问我们是否同意斯大林所做的修改。

“……你们必须撤退。我劝你们今天就走。”

在斯大林处。莫洛托夫、沙波什尼科夫、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在场。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我单独留下。

斯大林：“呼吁书已经挺不错了。今天我们就发表……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们得撤退？为了今后也能继续工作，你们必须这么做。政府、外国使团等都在撤退，莫斯科无法像列宁格勒那样自卫。”

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斯大林开始询问起台尔曼的情况来。他想起了台尔曼在去年写的信并且说：“显然，那里的人在极力说服台尔曼。他不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信说明他受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影响。他写了关于寡头政治的事并认为英国已被击溃——这是胡说！……他们不会杀死他，因为他们显然希望在必要时可把他作为‘聪明的’共产党人加以利用……”

我们说着斯大林说过的话同他告别：“今天您就必须撤退！”说这话就像是他说“该吃午饭了”一样。

……

关于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1941年10月19日)

国防委员会《关于从10月20日起在 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1941年10月19日

第813号

兹宣布，莫斯科以西100-120公里内的首都防御责成西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大将同志负责，而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阿尔捷米耶夫中将负责在莫斯科接近地的防御。

为了莫斯科防御的后勤保障和加强保卫莫斯科的部队的后方，也为了肃清德国法西斯间谍、奸细和其他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从1941年10月20日起在莫斯科市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
2. 从夜里12时到凌晨5时，除了持有莫斯科市警备司令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的个人和车辆外，禁止任何个人和车辆在街上活动，在发布空袭警报后，居民和车辆的活动应遵照莫斯科对空防御部门核准并在报刊上公布的规定进行。
3. 莫斯科市警备司令西尼洛夫少将负责维持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最严格的秩序，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卫部队、警察和工人志愿队由警备司令调遣。
4. 要迅速将破坏秩序分子送交军事法庭追究责任，就地枪决挑唆破坏秩序的间谍、奸细和其他敌人代理人。

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一切劳动者维持秩序和安定，全力支持保卫莫斯科的红军。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376-377页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关于 破坏靠近前线地带居民点的命令^①

(1941年11月17日)

N90428

莫斯科市

第18份

秘密

近一个月的战况表明，德军极不适应冬季作战，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受到寒流袭击时就栖身在靠近前线地带的居民点中。自信得近于无耻的敌人打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暖和的屋子里过冬，但我军以军事行动粉碎了德军的这一企图。德军在前线的大范围进攻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后，被迫转入防守并驻扎在距道路两侧20—30公里处的居民点内。德军士兵一般住在靠近前线的城市、市镇、乡村农民的木屋、棚子、仓房和浴室里，德军的司令部则设在较大的居民点和城市，而且一般都在地下，以躲避我军航空兵和炮兵的袭击。这些居民点内的苏联居民通常不是在德国侵略者的胁迫下搬家就是被他们强行赶走。

消除德军驻扎在乡村及城市的可能，把德国侵略者从所有的居民点赶到寒冷的野外去，把他们从一切住所和暖和的防空洞中撵走，让他们在露天地挨冻——这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加速歼灭敌人和瓦解敌人的军队。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 破坏和烧毁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40—60公里处，道路两旁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

^① 发布这一命令的电报被分别送交西北方面军、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的指挥部和莫斯科防御区各独立集团军司令部。

为破坏指定范围内的居民点，要立即派出航空兵，广泛利用炮兵和迫击炮、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在敌方进行活动的游击小组，向他们供应燃烧瓶、榴弹及爆破器材。

2. 为炸毁和烧毁敌军驻扎的居民点，每个团都要组建一支 20-30 人的志愿者小分队。志愿者小分队要由最勇敢，政治上最可靠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组成，要详细地向他们说明任务以及采取这一措施对歼灭德军的意义。执行摧毁德军驻扎居民点任务的勇士们将享受政府嘉奖。

3. 我们的部队被迫向某地撤退时要将苏联居民一起带走，同时一定要无一例外地破坏所有居民点，让敌人无法利用。这项任务可首先考虑由各团的志愿者小分队来完成。

4. 各方面军及独立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要经常查上述指定范围内的居民点的破坏任务的完成情况。每隔三天向大本营单独汇报一次，即报告在过去几天里破坏了多少居民点和哪些居民点，以及破坏的方式。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约·斯大林

B. 沙波什尼科夫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 45 全宗，
第 1 目录，第 479 卷宗，第 104—105 页

艰 难 应 战

你违背了斯大林讲话的指示精神

——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0日)

下午2时

基辅 赫鲁晓夫

(1) 您关于销毁所有财产的建议违背了斯大林同志讲话的指示精神，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说的是在红军部队被迫撤退时销毁所有贵重财产，您的建议则要求在距敌军100-150公里的地区内，不管前线事态如何，立即销毁所有贵重财产、粮食及牲畜。

这样的措施有可能涣散民心，引起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使红军后方陷入混乱状态，在军队和居民中制造必须撤退的情绪，而不是给敌人以反击的决心。

(2) 国防委员会责成您在部队打算撤退时，而且必须是在部队撤退的情况下，在距前线70俄里的地区转移所有的成年男性居民、役畜、粮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照常向东部进行疏散。无法转移的东西应全部销毁，但不包括留下的居民所必需的禽类、羊及粮食等。至于说把所有这些财产分给部队，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有可能使部队变为趁火打劫的强盗。

(3) 发电站不要炸毁，为使发电站长期不能使用，应把所有重要部件卸下来，没有这些部件发电站就不能运转。

(4) 自来水管不要炸毁。

(5) 工厂不要炸毁，但应把设备上的重要零部件、机床等卸下来，以便使工厂长期不能恢复生产。

-
- (6) 我军向第聂伯河左岸撤退后，应将所有桥梁炸毁。
 - (7) 仓库，尤其是炮兵仓库必须转移，无法转移的，炸掉。
 - (8) 至于 70 俄里以外、敌军暂时还构不成直接威胁的地区，工厂转移应提前进行，主要是将机床和其他最重要的设备运出。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等待你们的将是对怕死鬼和逃兵的严惩

——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1941年7月11日)

基辅 赫鲁晓夫同志

得到可靠消息，说你们所有人，从西南方面军司令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惊慌失措，想把部队撤至第聂伯河左岸。

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走出一步，把部队撤至第聂伯河左岸，不去为保卫第聂伯河右岸的筑垒地域战斗到最后，那么等待你们所有的人的，将是对怕死鬼和逃兵的严惩。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342页

应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了

——与西方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7月20日）

绝密

斯大林：您好！迄今为止，你们每次调两三个师增援前线的通常做法并未取得任何实效。如今该放弃这种战术了，并开始在两侧翼集中七八个师及骑兵，从而形成拳头。要选择作战方向，并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指挥意图改变其兵力部署。比如说，是否可抽调霍缅利同志的三个师，奥廖尔地区的三个师，一个坦克师（该师已在亚尔采沃市郊作战）和一个摩托化师，或许再从预备集团军中抽调出两三个师，还要加上骑兵，把这组兵力全部投到斯摩棱斯克地区，以粉碎和赶走敌人，把敌人从这一地区赶到奥尔沙那边。我想，我们应该从小打小闹转向大兵团作战了。我说完了。

铁木辛哥：我认为，实现您所阐述的意图是正确的。最新的资料也表明，敌人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师正在全力从亚尔采沃西北面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运动，其坦克群的主体部分依然集结在叶利尼亚，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直接封锁着斯摩棱斯克。自然，这首先对斯摩棱斯克构成威胁，同时也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直接威胁着亚尔采沃。您建议实行打击，即对斯摩棱斯克敌人进行强有力的打击，无须长途迂回，就会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性影响。我的话完了。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1993年第1期

通过朱可夫向红军骑兵司令传达的命令

(1941年7月21日)

绝密

朱可夫大将：您好，戈罗多维科夫同志！

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命令我向您传达如下事项。

(1) 出动骑兵部队赴敌后行动，其路线另行下达指令规定。对于派骑兵到博布鲁伊斯克以东的地方去，我们极为担心，因为据所有材料分析，在博布鲁伊斯克、普罗波伊斯克一线，有敌人的密集兵力在活动。

(2) 如果你们不能在1941年7月22日让骑兵部队穿越前线，那么必须比部队在7月23日拂晓前越过前线。

(3) 目前，对骑兵部队不提供任何特别的空中保障，这是为了不致引起敌人对骑兵部队的行动区域的注意。敌人如果出动空军来打击我骑兵部队，那时就必须向我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为此，骑兵部队要熟练掌握呼叫歼击航空兵求援的方法，即通过梯次配置至第21集团军司令部的通讯中继站进行联络。

(4) 骑兵部队不要携带任何多余和笨重的物件，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列奇察或若戈梅利地区。为了能够在没有道路的森林或沼泽中行进，骑兵部队必须轻装。

(5) 我将命令给你们使用的联络飞机于今天傍晚或者7月22日清晨降落在戈梅利机场。我说完了。

戈罗多维科夫上将：您好！

我根本就没打算让骑兵部队到博布鲁伊斯克以东的地方去，我主张让部队按照指令规定的路线行动。但是第21集团军的战报称，敌

人的一股重兵——三万步兵和骑兵正在博布鲁伊斯克西南面、特别是格卢斯克地区集结，在南面至科舍维奇一线还有一个步兵团。因此，我曾请求对博布鲁伊斯克和格卢斯克地区的敌人进行轰炸，以支援我们。我已经采取了减轻骑兵部队多余装备的措施。由于第32骑兵师的11个梯队尚未到达，也许清晨才能到达，所以7月23日拂晓让骑兵部队出发，困难很大。我将采取一切措施，于7月23日拂晓先派出一部骑兵，而后最迟不晚于7月23日傍晚，尽全力争取让骑兵部队出发。

关于指令中所说的让骑兵部队向斯摩棱斯克西南面进发的问题，此刻我很难向您报告什么，因为只有根据战斗的进程和那时前线的形势才能判断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派出骑兵部队。我认为，骑兵部队的基本任务在于占据莫吉廖夫、奥尔沙一带的交通线。请您在骑兵部队出发时命令第21集团军向博布鲁伊斯克和格卢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我说完了。

朱可夫：您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关于让库兹涅佐夫发起进攻问题，您与他亲自商谈好了，转告他：大本营要求他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尤其是在骑兵部队穿越敌阵之际。穿越的时间，我建议在夜间至拂晓以前。骑兵部队出发时，要找好向导，从当地党员居民中或经过严格审查的非党人士中挑选，他们必须熟悉所有的林中路径，最好从狩猎者中挑选向导。

我再说一遍，我将于今天傍晚或明天清晨派去联络飞机。联络飞机的任务是：与转战各阵地和各地区的骑兵部队保持联络。在联络中获取情报，希望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为了与骑兵部队联络，请编制专门的密码表，并发给他们；还请你们绘制出带坐标的地图。应通过这一特定的密码和带坐标的地图保持联络和进行对话。

请你们检查一下，让骑兵部队获得压缩食品的供应。要警告巴茨凯列维奇和各师师长，切勿与敌人打旷日持久的仗。如果遇到敌人的

重兵，可以避免它，还是要按照指令规定的目标及任务行动。都清楚了吗？

戈罗多维科夫：我都明白、都清楚了。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关于密码表，我在莫斯科时就与邮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将其编制出来了，米雅切夫上校应该飞到我这里来，但至今还未到。现在供应骑兵的，不是压缩食品，而是香肠和罐头，但完全可以满足轻装和营养的要求。我请求让米雅切夫快点来。我的话完了。

朱可夫：好吧！我立即派米雅切夫去。再见，祝您成功！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1993年第1期

各部队必须与方面军保持经常联系

——与沙波什尼科夫的谈话

(1941年7月26日)

绝密

斯大林：四方面军各集团军有什么新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您好，斯大林同志。向您报告：尚未收到所有集团军的汇报，但可以汇报一些最主要情况。

杜霍尔希纳，亚尔采沃集群，霍缅科同志集群——今天，7月26日，主要是第107坦克师在列捷姆尼察、科雷特尼亚、列利莫沃地区进行了战斗。第166步兵师从两翼给予了配合。第107坦克师遭到敌摩托化师从西南方向发起的攻击。大概是在20日，敌摩托化师一部和大约一个坦克团从西面向埃尔霍夫村进攻。在敌人的攻击下，我坦克师缓缓后撤，停留在叶森纳亚、列利莫沃、科雷特尼亚一线。霍缅科同志的部队今天，即25日，并未参加战斗，只有第250步兵师在南面的杰梅希村介入了战斗。

斯大林：请简要地谈谈各集团军的主要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是！

为了协调霍缅科集群的作战行动，并激励其作战，已派叶列缅科同志前往该部。加里宁集群的第91、89步兵师在沃皮河西岸展开进攻，并向西推进了15公里，但在遭到敌人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反冲击之后，被迫撤至沃皮河东岸，在那里设防固守，击毁坦克约25辆。敌军多次试图偷渡沃皮河，罗科索夫斯基集群情况无变化。第16和第20集团军的战报尚未收到。……（略）

斯大林：方面军和总司令部与一些集团军联系不上，与另一些集

团军联系很差和不够经常，这是很糟糕的。甚至中国军队和波斯军队都懂得保持联系是治军的要务，难道我们连波斯人和中国人都不如吗？联系不上怎么指挥部队？各集团军应在 20 点之前送来战报。现在，已是（凌晨）3 点，战报尚未收到。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胡闹、这种耻辱了！我谨责成您本人和总司令部，命令各集团军和各师尊重通讯工作，与方面军保持经常联系，按时提交战报。要么是消灭通讯工作中的马虎作风，要么是大本营被迫采取断然措施。我说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是，知道了。将尽全力执行您的指示。向您报告：战报迟迟上不来的主要原因是，各师从团里收集材料，各集团军从师里收集材料都要很长时间。当然，这不是理由。总司令将采取硬性措施。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请回答一个问题：亚尔采沃和斯摩棱斯克现在是在谁的手里？

沙波什尼科夫：根据早晨的战报看，斯摩棱斯克的北部和西北部，直到第聂伯河，仍在我们掌握之中；至于东部，我们正从北面向那里发动进攻；南部和西南部则被敌人占领。亚尔采沃也有一部分被敌人占领。

斯大林：正在进攻的是哪支部队？

沙波什尼科夫：向您报告：是第 129 步兵师。此外，第 46 步兵师一部也从北面加入了进攻。关于亚尔采沃，其南部现为中间地带，北部则被小股敌人占据，不过，他们正受到罗科索夫斯基同志的部队依托建筑物进行的狙击。

斯大林：您说的是亚尔采沃市还是亚尔采沃车站？那么，亚尔采沃车站又如何呢？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我方才报告的是亚尔采沃市的情况。亚尔采沃车站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的部队驻在沃皮河的东岸。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今天，敌军从韦利日出发，经尹利伊诺，

沿公路向扎罗佩茨进发，企图渡过西德维纳河。马斯连尼科夫同志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营，但鉴于这一方向的重要性，总司令下令向这里派出一个步兵师，还打算把马斯连尼科夫的一个师拉上去，留下一个师从西面护卫托罗佩茨，以便用两个师向南向杰米多夫展开进攻。这一计划已报大本营审批。此外，总司令命我您报告：希望能从组建好的部队中抽调两个骑兵师，派往托罗佩茨方向，用于加强第22集团军已暴露的左翼。我说完了。

斯大林：将马上对你们的建议作出答复。完了。

沙波什尼科夫：是！报告完毕。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1993年第1期

关于西方面军防御准备工作的情况

——与铁木辛哥的谈话

(1941年8月2日)

绝密

斯大林：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你们在奥尔沙—明斯克公路干线上是否已布了雷？是否找到了第53师，该师现在何处？你们的部队是否已进入阵地？哪几个师落在后面？阵地上的各项工作进展如何？还有，你们是否知道，巴甫洛夫的一部已开向你们部队占领的阵地，他们的情况如何？上述问题，需要你们不时通报。

铁木辛哥：设障所需的材料即将运到。一部分炸药昨天已运至布雷区。公路干线尚未布雷，因为西方面军的部队和后勤机关正在通过这条干线。

第二，第53师在第聂伯河沿岸已控制了从什克洛夫（包括什克洛夫）到莫吉廖夫（不包括莫吉廖夫）的地区。第172步兵师现已开始在莫吉廖夫地区集中，昨天傍晚已有6列运送部队的军用列车到达。昨天，第18师的先头部队已向奥尔沙—什克洛夫地区进发。第1摩托化师的先头部队已进驻托洛钦阵地。刚才，第73师的先遣列车和第69军的指挥机关抵达斯摩棱斯克。我决定将第73师运到奥尔沙、克拉斯诺耶、古希诺地区。今天夜间，3列装甲列车已开往斯摩棱斯克，供列梅佐夫调遣。列宁格勒特种兵营已到达维诺格拉多夫部队集中的地区。

目前，柴油奇缺。此外，急需给炮兵补充穿甲炮弹：45毫米的12 000发，76毫米的7 000发。

昨天，我亲自去了列梅佐夫那里，发现列梅佐夫还没有下决心布防前沿阵地。我已命令他们马上派炮兵人员和工程师对整个阵地进行勘察，现在我准备去趟列梅佐夫那里，直接到他们的阵地上去。

极其需要侦察机和歼击机。现在我们无法进行空中侦察，也无法对部队和重要目标集中的地方进行掩护。我请求尽快让集群空军司令来一下。……（略）

斯大林：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我命令您：公路干线必须布雷，马上从明斯克开始向奥尔沙方向布雷。明白吗？

铁木辛哥：那么，明斯克至莫吉廖夫的公路呢？是否也要布雷？

斯大林：这条路也要布雷。选定几个地方布雷，以便以后需要时按照命令引爆。明白吗？

铁木辛哥：明白。我马上布置此事，然后亲自到列梅佐夫的阵地去。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命令特鲁别茨科伊送给我们一份我们集群部队的运送计划，以便军用列车在各个车站都能通行无阻。

斯大林：好。我们谈完了，再见！

铁木辛哥：好，一切照办，再见。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1993年第1期

要学会自己供应和补充自己

（1941年8月5日之前）

斯大林打电话命令基尔波诺斯^①说：

“立即与方向总司令和南方面军司令一起拟订对赫尔松—卡霍夫卡—克列缅丘格一线及以北（包括基辅）构建防御的计划。尽快构建这一防线，藏进地里去，从后方抽调预备队，特别是炮兵。在这一线上与后撤的部队会师。在8月5日12时之前提出建议。”

基尔波诺斯回答说：“您的指示将被立即执行，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基辅。请求补充兵员和装备。我们奉总司令之命从8月6日早晨开始从科尔孙地区向乌曼方向组织突击，支援被围的部队。想听听您对此的意见……”

斯大林说：“我们同意，大本营不但不反对，而且完全支持一切援助被包围的同志们的进攻行动。但不要忽视防御线。应当时刻既作好的打算，也作坏的打算。这是不陷入困境的惟一办法。至于援助，援助会到位的，但如果以为现成的东西会送给你们，那就不明智了。要学会自己供应和补充自己。就在集团军中制造备件，让一些工厂生产步枪和机关枪。好好动动脑筋，就会发现，在乌克兰就可以为前线创造许多条件。列宁格勒就是这么做的，列宁格勒利用它的机器制造厂和机器制造基地做了许多事。乌克兰也可以这么做。列宁格勒生产出了火箭炮的火箭发射器。这是个非常有威力的武器，它能大力杀伤敌人。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这么做呢？”

“斯大林同志，您的所有指示都将被立即执行。遗憾的是，我们

① 基尔波诺斯，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

不了解火箭发射器的构造。请您下令给我们送来一个带图纸的样品，我们就自行生产。”

“您说什么？图纸你们那里就有，样品也早就有了。但如果您这么不经心，那我就给你们配备一个火箭炮连、图纸和生产设计师……祝一切都好，赢得胜利。”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329页



(72)

必胜信念

苏 英 之 间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一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6日)

第一次会谈：12月16日19时00分

参加人员：苏联方面为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迈斯基同志；

英国方面为艾登^①和克里普斯

(由迈斯基同志担任翻译)

互致问候和艾登表示对再次来到莫斯科并会见斯大林同志深感愉快之后，斯大林提交给艾登关于军事互助和关于解决战后问题的两个条约草案（这两个草案的文本附后）。

艾登迅速浏览了上述文本后表示，对于这样的条约他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但是他当然想要较仔细地研究所提出的文本，并且也许会对它们作些小的改动。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不反对艾登的想法。

然后，斯大林同志说，按照他的意见，最好第二个条约附加一个秘密议定书，其中应规定改变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的总的设想。这个设想可归纳如下：

1. 波兰。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当包括东普鲁士和“走廊”，同时，这两个地区的德国居民应当迁回德国。波兰的东部边界（同苏联的边界）应当沿涅曼河划定，同时，蒂尔西特应当归作为苏联一部分的立陶宛所有。由此往南，这条边界基本上应当大体上以寇松线为准，在某些地点可作局部的修正。

^① 艾登，1940-1945年先后任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

2. 捷克斯洛伐克应当按它原先的边界恢复国家，包括苏台德地区在内。鉴于后者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划给德国。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应当通过取得匈牙利的部分地区而向南扩充，而匈牙利由于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

3. 南斯拉夫应当按照自己原先的边界恢复国家，并取得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里雅斯特、阜姆、亚得里亚海上的岛屿等）而稍有扩大。

4. 阿尔巴尼亚可以恢复为独立国家，由其他国家保证它的独立。

5. 作为对土耳其信守中立的补偿，土耳其可以得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由土耳其人居住的保加利亚布尔加斯以南地区以及或许是叙利亚的某些领土。把爱琴海上能够封锁海上重要海港（如士麦那）出口的某些岛屿划给土耳其也是有益处的。

艾登对此指出，希腊人早就觊觎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了，因为上述岛屿的居民是希腊人，但是，他承认必须讨论这个问题的某种调整方案。

斯大林同志则补充说，布尔加斯地区脱离保加利亚是对保加利亚在战争期间的行为的惩罚。保加利亚还应当在其同南斯拉夫接壤的边界上失去某些领土。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保加利亚有瓦尔那这样一个海港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6. 希腊应当按照原先的边界恢复国家。对于德国占领的所有其他国家也都应该这样做。

7. 法国。关于法国的未来的问题，斯大林同志问艾登，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十分明显，贝当及其同伙已完全不可救药，他们竟把赌注押在德国的胜利上。但是，法国的未来究竟可能是什么样的呢？能否现在就对此说出某些设想，还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为好？

艾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对贝当及其同伙的评价。至于说到法国的未来，那么在他看来，法国将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瓦解和萧条时期，然后才可能重新成为一个强国。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可

能根本不会出现，而法国落到类似西班牙那样的欧洲二等强国的境地。

斯大林说，如果法国在这场战争后长期衰弱下去，那么为了英国的安全，最好由它在法国沿岸的一些地区，例如布洛涅、敦刻尔克等地，建立自己的陆海军基地。同样，如果比利时和荷兰与英国建立公开的军事联盟，并使英国也有权在它们的领土上拥有自己的陆、海、空军基地，那也是适宜的。这一点不仅从英国安全利益的观点来看十分重要，而且也是对比比利时和荷兰独立的保证。苏联愿意支持英国的这些要求。苏联同样不反对英国在挪威和丹麦建立自己的海军基地，条件是由某些大国对波罗的海的出入口进行担保。

艾登对斯大林允诺支持英国在上述国家取得海军基地和其他基地表示感谢。

8. 德国。关于德国，**斯大林**同志说，削弱德国是绝对必要的，首先可以采取把莱茵州及其工业地区从普鲁士分离出来的办法。至于莱茵州下一步的命运应如何安排——作为独立国家或保护国等等——以后可以讨论。重要的是分离。奥地利应当恢复为独立国家。也许，对巴伐利亚也应该这样做。

9. 苏联认为必须恢复自己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边界。这包括1940年苏芬和约规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至于苏联和波兰的边界，那么它正如以上所述，总的说来可以沿寇松线划定，并包括把蒂尔西特划归立陶宛共和国。此外，苏联于1940年曾把佩萨莫作为礼物归还给芬兰，现在它认为，鉴于芬兰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必须把这份礼物收回。还有，苏联希望罗马尼亚同苏联结成军事联盟，并使苏联有权在罗马尼亚领土上拥有自己的陆、海、空军基地。罗马尼亚本身的面积应当在西部通过取得匈牙利的部分地区而略有扩大，因为现在在匈牙利疆域内居住着近150万罗马尼亚人。这也是因匈牙利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它实施的又一项惩罚。在北方，苏联也想和芬兰建立同样的关系，也就

是说，芬兰应当同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规定苏联有权在芬兰领土上拥有自己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基地。

作了以上陈述后，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些设想应当成为准备作为关于战后问题条约附件的秘密议定书的基础。然后，斯大林同志又谈到战后安排的两个问题。第一，他主张德国应当对受它伤害的国家（英国、苏联、波兰等）的损失提供补偿。第二，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在未来重建的欧洲应当建立民主国家的军事联盟，由某一种理事会或别的中央机构进行领导，并辖有国际军事力量。苏联也不反对在欧洲建立某种国家联邦。斯大林同志请艾登就所有以上涉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艾登首先谈到准备公开发表的条约的文本以及由他草拟并且提交给斯大林同志的协定草案（文本附后）。艾登设想，未来条约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我们的文本和他提出的英国的文本的综合，而且它们的许多条款是一致的。

至于说到战后欧洲问题，艾登对斯大林同志如此详尽而坦率地陈述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表示深深的谢意。艾登本人同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意见。艾登认为，战后欧洲重建和维持和平与秩序的责任主要将落在我们两国的肩上，当然也要和美国一起承担，因为美国总的说来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关于未来的德国，艾登可以向斯大林同志保证，英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制止德国的侵略再次发生。至于应当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在艾登看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对德国进行最严格的军事管制，而这种管制应由英国、苏联和美国（如果后者愿意的话）来组织安排。关于肢解德国的问题英国政府并未作出过任何决定，不过原则上它不反对这样做。艾登以为，肢解德国最好尽可能采用在德国促进分立运动的办法。但是，英国政府也愿意讨论实现这一政策的其他方法。英国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赞成奥地利独立。它愿意研究巴伐利亚独

立和莱茵州独立的问题。不过艾登又指出，英国政府至今未曾认真考虑过有关德国未来的问题，同样，也未曾考虑过整个战后欧洲的问题。在这方面它远远落后于苏联政府。因此，他现在只能说些作为阁员的个人意见。不过，回去以后他将把全部问题向内阁报告，经内阁讨论后可以继续在伦敦通过迈斯基或在莫斯科通过克里普斯继续进行磋商。在战争赔偿问题上，英国政府的观点是，钱财赔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上次战争的经验表明，钱财赔偿只会导致财政上和经济上的一连串麻烦，并给战胜国造成比战败国更大的损害。归还德国所毁坏的和掳掠的物资财富（商品、机器等等）则是另一回事。

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也认为钱财赔偿没有多少好处，德国应当归还实物。最好的办法是把德国和意大利最先进的机床赔偿给被占领国或受害国。

艾登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并且表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应当要求德国向例如苏联赔偿被他们毁坏了的那些机床、机器、工厂等等。

然后，艾登转而谈到关于战后重建设想的一般性问题。他补充说，还在苏联参战以前，罗斯福就曾致函丘吉尔，请求英国政府不要在未同他事先协商就应允承担关于欧洲战后重建的任何秘密义务。这当然并不能排除英苏之间就未来和平的基本原则进行磋商。但是，为了更有效和顺利地进行战后欧洲的重建，自始至终同美国保持紧密接触是非常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表示反对，他说有许多问题只涉及我们两国的安全利益。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完全自主地进行讨论。

艾登对此表示部分同意，但是，他坚持认为，在全球性的问题上美国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斯大林同志同意这种观点。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对待欧洲小国组成联邦问题的肯定态度表示感

谢。艾登认为，正在筹划中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应当被看做一种应予肯定的事例。最好巴尔干国家也能找到某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样，所有这些国家应能较易于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随后，艾登又回到条约问题上，并问起斯大林同志应当怎样更好地处理我们现有的三个文件（两个苏联文本和一个英国文本）？是否应当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吗？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艾登提出的文本很像一份声明。相反，苏联政府提出的是两份条约。声明是代数，而条约则是简单的实用算术。我们需要算术而不需要代数。因为艾登听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斯大林同志于是补充说，从他的话中不应当得出结论，以为他轻视代数。代数是一门很好的科学，他对它充满了敬意，但是现在，在目前具体情况下，我们情愿要算术。希特勒在他每走一步时都炫耀他所签订的条约。因此，比较适宜的是我们不局限于发表声明，而是签署真正的条约。斯大林随后问道：如何对待他提出的秘密议定书呢？

艾登回答说，如果不预先同自己的同事们商议，他就不能签署这样的文件。而且英国政府至今还没有认真研究过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

于是斯大林同志表示，他不坚持立即接受关于苏联疆域以外的国界变更的提议，但是，他认为关于苏联西部边界的问题可以立即得到解决。

艾登反对说，他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其他一切涉及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国界改变问题一样，英国政府至今一直设想等到召开和会时再加以讨论。英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表示，它不认为有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前立即承认新的国界。这是英国政府近两年以来的政策。此外，英国政府答应过美国政府，对所有这类问题要同它进行磋商。最后，根据英帝国宪法，英国政府还应当同各个自治领进行磋商。因此艾登认为，关于苏联西部边界问题他只能在同上述

各有关方面取得一致后在伦敦通过迈斯基作出答复。艾登认为，不仅从纯粹的法律观点，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这样的方法比较正确。

斯大林同志问道，如果在伦敦磋商这个问题时，不以条约形式而以交换声明形式进行，是否更便于解决承认苏联西部边界的问题？

艾登回答说，技术上这样做或许稍稍有利于按愿望解决问题，但是，从实质上说，在作出相应的决定以前，英国政府毕竟还是要同美国 and 各个自治领进行协商。

斯大林指出，他丝毫也不反对将我们就这一问题的谈判告知美国。相反，如果美国参与承认 1941 年的苏联西部边界，他会感到非常满意。

艾登反对说，他怀疑美国政府会愿意现在就这么做。按照他的意见，最好是由他在回到英国以后首先同首相磋商，然后把首相的观点通知我们。

斯大林回答说，他想强调说明，他愿意就此问题与英国取得一致，以便同英国建立统一战线。

艾登确认说，他也很想同苏联不仅就这个问题，而且就许多其他问题建立统一战线，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十分为难。关于边界问题英国政府根本还没有研究，也没有作出决定。艾登举例说明自己的想法。关于波兰的未来的问题，他本人完全同意东普鲁士并入波兰共和国。他没有理由认为丘吉尔会反对这样做。但是，他现在不能代表首相发表任何意见，只不过是因为他至今尚未和首相谈过这个问题。

斯大林指出，他完全理解艾登的立场，但是，他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苏联和英国的军事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如此，我们的联盟才会巩固。如果我们的军事目的各不相同，就不会有任何联盟。

艾登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并补充说，他的目的就是协调两国的军事目的。他假设苏联和英国之间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发生一些分歧，但是，他并不怀疑我们的军事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在这方面的统

一战线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如此，但由于边界问题内阁尚未讨论和作出决定，艾登仍然不认为有可能现在就在莫斯科承担某种有约束性的义务。艾登问斯大林同志，他是否就未来波兰的边界问题向波兰人说过什么？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至今什么也没有说过，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说。斯大林同志认为，不管怎样应当把到奥德河为止的所有地区划给波兰，其他部分可以成为普鲁士，或者准确点说，不是普鲁士而是柏林国。

艾登表示怀疑说，如果没有某种前提，诸如德国人民中的分立运动，把德国肢解为几个部分未必适宜。因为否则会产生一种民族统一运动，并在不久的将来就又把全国重新联合起来。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正是这样一类言论把我们引向当前的战争。难道艾登愿意再次受到来自德国方面的入侵吗？

略显窘迫不安的艾登试图为自己辩解，借口说，对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不能过于简单化。随后，艾登声称，他受首相的委托，要向斯大林同志介绍英国的军事形势，并向他通报关于英国武装力量的数量和部署的若干材料。艾登通报的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当 1939 年战争爆发时，英国与德国相比在海上是强大有力的，尽管它并没有足够的为商船队护航的船只。英国空军的第一线部队拥有 1300 架飞机。陆军数量不多，而且没有一个机械化师。敦刻尔克败退之后英国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在佛兰德丢失了 10 个师的全部装备和大量飞机。德国占领了法国北部沿海，从那里它能很容易地对英国大工业中心进行轰炸。英国面临入侵的威胁。海军的任务极其繁重。空军兵力不足。英国全国只有一个受过充分训练和装备齐全的师。既没有工事，也没有防御计划。整个英帝国以及埃及和近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英国军队的数量完全微不足道。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敦刻尔克败退之后在苏丹一共只有 1 个旅，而当时意大利人在

阿比西尼亚就拥有一支 15 万多人的军队。

英国面临的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要想方设法生存下去。海上的危险局势又增加了全局的复杂性。在通常情况下，英国每年输入货物达 7000 万吨。现在这个数字缩小到 4000 万吨。为了实现这项计划英国拥有商船队 1250 万吨。目前，每天在海上有 600 艘军用舰只在航行。海战日益加剧。船只被击沉数日益增加。1941 年 5-7 月，船只被击沉数达到最高峰，当时，英国每月平均损失达 50 万吨。这样的损失它是不可能长期承受的。不过幸好采取了措施，沉船的数字大大减少，例如到 11 月份，已经减少到每月 13 万吨。

目前，在敦刻尔克败退一年半之后，英国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陆军（包括本土、近东等等）拥有 225 万人。空军有 75 万人，而且很快可能增加到 100 万人。海军有 50 万人，商船队有 12.5 万人，大量人员在造船业工作和参加修船，其总人数达到 400 万。此外，英国还拥有 150 万“祖国卫队”（民兵）。大量妇女进入工业和军事部门。在近东，英国现在拥有 18 个师。明年春季前它在那里将会有 28 个师，其中包括 5 个或 6 个机械化师。印度正在建立 150 万人的军队，其中 80 万人的军队已编成。马来亚的守备部队由 4 个师组成。整个英帝国共计向英国提供了 25 个师，其中加拿大 5 个，澳大利亚 4 个，南非 2 个，新西兰 1.5 个和印度 13 个。

英国空军中最为强大的是歼击飞机。空军组建计划在去年遭受轰炸期间受到拖延。轰炸机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英国在近东现有 60 个飞行大队。它们大部分集中在北非，因为英国正在利比亚实施进攻作战。敌人在那里的兵力约为 10 个师，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德军。敌人空军在利比亚约有 600 架飞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正试图向利比亚派兵增援，但无法补足自己的损失。英国政府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最近扫清地中海的敌人，不仅占领利比亚，而且还要占领的黎波里，以便有可能利用地中海进行航运，以及为在欧洲实施进攻战役作好准

备。但是，艾登离开伦敦以后，在远东发生的事态又给总的局势增加了全新的因素。

听完艾登的通报以后，**斯大林**同志表示，按照苏联军事统帅部的意见，相当数量的德国空军（约 1500 架飞机）被德国人调到日本，正是这些德国空军兵力，而不是日本空军近期对远东的英国海军实施了沉重的打击。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斯大林同志指出，近来我方前线德国空军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与此同时德国的飞机产量却达到每月平均 2000—2500 架。那么，这些德国飞机到哪里去了呢？此外，我们根据自身经验清楚地知道，日本飞行员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国也观察过他们。可以大胆地说，最近在马来亚发生的事件不是日本人的杰作。

艾登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通报极感兴趣，他问起德国人是怎样把自己的空军运到远东的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看来很有可能是经由南美洲过境，也可能是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通报的消息十分感谢，并且说，他将通过英国的渠道力求查清这件事。然后，艾登声称，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在口袋里”装有 10 个飞行大队，本来准备只要利比亚的作战情况允许的话就提供给我们派往苏联前线。但是现在他得知英国政府不得不把这 10 个飞行大队派往新加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完全理解英国政府的处境，因此并不反对把提到的 10 个飞行大队派往别处。

艾登对于事情发生这种变化表示歉意，但是斯大林同志再次重申，他完全理解当前的局势，因为我们在自己前线也不止一次地经历过困难的时期。斯大林问，近来的事态是否影响到向苏联发运坦克？

艾登回答说，不影响，因为不管怎么说涉及的是英国本身。不过艾登对于美国存有顾虑。如果美国人停止供货，那么例如英国在近东

就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在那里他们使用的是美国飞机，而英国制造的“哈里肯”型飞机是运往苏联的。

然后斯大林同志问，艾登是否想了解我们的军事形势？

艾登回答说，他很希望对我方今年冬季和明年春季总的作战计划有所了解。

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的军事政策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面战斗一面退却的政策。我们捍卫每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地区，力求逐渐消耗德军的兵力。现在转折点已经到来。德军已经疲惫不堪。德军的指挥人员希望在入冬前结束战争，因此对冬季作战未作相应的准备。德军现在穿着很差，伙食供应也不好，士气越来越低落。他们开始感到心力交瘁。而与此同时，苏联已经筹足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并于前几周将它们投入作战。这在前线形成转折，并且导致近几周来我们看到的局面。德军试图设防扼守，但他们很少想到要修筑强大的工事。我军不断突破他们的防御工事。我们的反冲击逐渐发展成为反攻。我们准备在整个冬季奉行这样的政策。德国人想必力图组建新的部队，并把他们派往东方战线，以便阻止我们的进攻。尚不清楚这将在何时发生，但是可以设想不会早于两个月之内。我们将努力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这一段时间。很难猜想，在我方进攻过程中我们会前进多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一方针将一直持续到春季。我们现在已有一定的空中优势，尽管还不是很大的优势。德国人在坦克方面还有很大的优势，而坦克我们非常紧缺，特别是“范伦泰”型坦克，它们在冬季作战完全适用。相反，“马蒂达”型坦克则适用于夏季作战而不是冬季，因为它们的发动机在冬季使用时马力不够强大。我们正在而且将继续在所有战线实施进攻。德国军队归根结蒂并不那么强大。它的过分的声威是吹嘘出来的。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强调指出这对于英国政府十分重要和有益。然后艾登提到土耳其问题，问道，难道不能设法使土

土耳其和盟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要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是答应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划归土耳其。

艾登又一次回到希腊对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企求，但**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希腊不是也有土耳其人吗？要不然能否建议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交换一些岛屿。

艾登承认**斯大林**同志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指出，不久以前当英国打算占领佐泽卡尼索斯诸岛时，他们已开始同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就该岛今后的命运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结果。不过艾登认为，可以按照**斯大林**同志指出的方针作一些尝试。

接着艾登问起，近来是否发现土耳其人对德国的态度有所变化？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土耳其人非常害怕德国人，虽然并不喜欢他们。

艾登就以下问题征询**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土耳其人是否会让德国军队通过自己的领土？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怀疑。

艾登回答说，他同意**斯大林**同志的看法。

最后艾登提议，第二天早晨由迈斯基同志和卡多根（陪同艾登前来的英国外交部常务助理）会晤，并以现有的三份文件为基础草拟出**斯大林**同志所指的两个条约的文本。

这一建议被接受。

会谈于20时30分左右结束。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二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7日)

第二次会谈：12月17日24时00分

参加人员：苏联方面为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迈斯基同志；

英国方面为艾登、克里普斯和卡多根

(由迈斯基同志担任翻译)

会谈开始后，艾登首先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已经看到早晨对协定几个草案进行加工的结果？艾登指的是早晨迈斯基同志和卡多根整理的协定文本。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结果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更令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未来的边界问题。艾登是否得到了英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

艾登回答说，没有收到，而且甚至不期待能够收到。首相目前正在海上航行途中。因此他（艾登）不可能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同他（丘吉尔）进行联系。在伦敦也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权威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就这个问题发表决定性的意见。艾登现在只能重复他昨天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回到伦敦以后他将把有关苏联西部边界的问题提交给政府，并将同美国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就这个议题进一步磋商不得不通过通常的外交渠道进行。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关于苏联边界的问题（与中欧和西欧边界的一般性问题没有联系）对于我们来说是极端重要的。苏联政府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还因为，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芬兰的问题恰

恰曾是 1939 年张伯伦政府时期举行的关于互助条约谈判的障碍。

艾登回答说，他当时不是张伯伦政府的成员，因此并不知道当时谈判的所有细节。但是，他完全认识到西部边界对于我们的极端重要性，并将竭尽所能根据有利于苏联的精神来调整这个问题。但是，他请求不要要求他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里，在莫斯科，他无法现在就正式承认以 1941 年的边界作为苏联的西部边界。

于是**斯大林**同志问道，是否调整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也必须有英国政府的专门决定呢？这个问题是个公理性的问题。苏联正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残酷激烈的斗争。它不断付出极其巨大的牺牲，在同我们的盟国英国共同进行的战斗中它损失了千百万人。它的肩头承担着战争的主要重负。在这种条件下，难道还要英国政府对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作出决定吗？难道这个问题不是公理性的问题吗？

艾登指出，法律的观点是这样的：当前对英国政府而言，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并不存在。它们并没有外交地位。还继续驻留在伦敦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公使保留着自己的地位只是出于照顾。英国政府同它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交换照会、文件等等。但是，艾登现在不能够满足**斯大林**同志的愿望和正式承认苏联 1941 年的边界。他这时再次重复他在上一次会谈中引用过的理由。

于是**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签署现在谈到的条约。

艾登又一次重复自己的理由，他提醒说，英国首相早就公开宣布，英国不能承认战争期间发生的欧洲各国边界的任何变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反对说，昨天他提出了关于英国政府至少要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的问题。我们的军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仍将拒绝承认这些边界吗？

艾登再次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拒绝的理由，只是言词略有变化。

斯大林同志于是问道，这样提出问题会使英国走到哪一步呢？也许明天英国会声称，它不承认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

艾登回答说，这里明显发生了误会。英国不承认的只是战争期间的领土变化。而乌克兰在战前就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首相的上述声明无论如何不可能涉及到乌克兰。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艾登所持的立场实质上与张伯伦政府当年在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没有任何差别。斯大林同志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惊讶，既然如此，那末看来很难就签订条约达成协议。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最后的说法表示遗憾，他又重复自己的论据，这一次特别强调必须就苏联西部边界问题事先同美国磋商。最后他指出在他看来 1939 年与 1941 年的情况的差别：当时英国政府承认波罗的海国家为独立国家。现在，英国不承认它们的独立存在，因此实际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斯大林同志指出，情况变得极其可笑。

艾登同意说，情况看起来确实可能令人好笑，但是他声称，他不认为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的政治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斯大林同志是否希望英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现在处于历史上大规模战争的风暴之中，而你们却热衷于关于“法律上”和“事实上”这种隐晦公式。这在目前是不合时宜的。根据苏联宪法，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它的组成部分。这是在这三个国家中进行全民表决的结果，绝大部分居民主张并入苏联。如果苏联在自己的宪法中保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英国会反对这样做吗？

艾登回答说，英国政府对此当然不能有任何反对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既然如此，那么应当能够找到相应的文字来表达这种状况。

艾登再一次重复他先前的论据，只是补充说，《大西洋宪章》不允许不经过本国居民的同意而改变一个国家的地位。而且在这个具体

场合下《大西洋宪章》的要求可能被看做为已经存在的规约。

斯大林同志对这个意见的反应是，他说如果艾登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末就不得不推迟签订条约。

艾登回答说，关于签署还是不签署条约的问题取决于苏联政府。不过他认为，即使现在关于苏联西部边界的问题不能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也不能成为拒不签署条约的充分理由。签署条约恰恰能够使英国和美国方面更便于承认苏联 1941 年的边界。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整个苏德战争就是由于苏联西部边界，其中特别是由于波罗的海国家才发生的。他想知道我们的盟国英国是否愿意支持我们恢复上述边界？

艾登又一次搬出自己拒绝承认边界的论据，并提醒说，在 7 月 30 日条约签订前的苏波谈判期间他也拒绝承认西科尔斯基坚持的波兰边界。

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我们受到我国宪法条款的约束。

艾登回答说，他不受我国宪法条款的约束，但是他却受到英国首相关于边界问题声明的约束，还受到他向罗斯福作出的在未同美国事先磋商之前在这方面不答应承担任何义务的承诺的约束。而且整个关于苏联西部边界问题是今天才向他提出来的，使他感到有些意外。在离开伦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要求他正式承认苏联 1941 年时的边界。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到当前局势的荒谬可笑。苏联军队明天就可能去占领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而英国也许会在和会上反对这种占领？在目前的形势下，最好是推迟签订条约。

艾登回答说，如果苏联军队明天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这会使他欣喜万分。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理解英国政府的立场。好像盟友应当支持盟友。如果有人跑去对他说，必须把自由的爱尔兰国家从英帝国分离出去，他会一下子把他赶走。如果英国希望在

比利时和荷兰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他理所当然会给予英国千方百计的支持。盟友对待盟友就应该这样行事。如果英国不认为有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最好还是推迟签订条约，而仍然维持7月份两国签订的互助条约。

艾登指出，不签署条约会使英国和各个自治领感到极大的失望。这两份条约中其实并没有任何内容会削弱苏联要求承认1941年边界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不仅英国有舆论，而且苏联也有。如果我国的舆论得知我们今天会谈时的争论，必然会十会惊恐，而如果他和莫洛托夫签署了一个不包括承认1941年边界的条约，他们两人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艾登又一次试图用事出意外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似乎事先并未被告知，在莫斯科将要求他承认苏联的西方边界。

但是斯大林同志反对说，曾经通过迈斯基同志通知他说苏联政府希望签订两个条约——一个关于军事互助，一个关于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安排，包括欧洲国家边界问题。斯大林同志并不坚持要求按照他先前提出的那样承认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因为他知道，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但是苏联的边界完全是另一回事。斯大林同志再次对于我们的盟国英国对所提问题的态度表示惊异。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艾登提到自己一直是英苏接近的支持者。在英国，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为达到英苏接近的目的而作了如此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应当理解，每一个阁员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他现在在没有得到全权委托的情况下承认了苏联1941年的西部边界，那么各个自治领，比如加拿大，会说什么呢（像加拿大就派出几十万名士兵前去支援英国）？做这种事的阁员返回英国不到24个小时就会被撤职。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他当然不想要艾登做任何做不到的事。他理

解艾登职权的局限性，但是他所讲的不是对他而言，而是通过他转达给英国政府。人们不禁会形成一种印象，似乎《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不是反对那些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人，而是反对苏联。

艾登坚决反驳这样的结论，他证明说苏联边界问题与大西洋宪章决不矛盾。艾登只是由于以上原因无法立即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为此，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稍加推迟。

斯大林同志指出，当英国向美国作出承诺时，我们还不是盟友。当时英国和法国政府正准备向同苏联作战的芬兰提供援助，现在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国目前同芬兰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艾登指出，英国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苏联的请求。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无论怎么说，现在的整个局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但是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似乎是苏联不得不向英国登门告贷。

艾登试图反对**斯大林**同志最后的说法，他强调说，现在讨论的两个条约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惠原则之上的。

莫洛托夫同志对于艾登如此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惊异。我们谈论的是共同的军事目的，共同的斗争，但是在一个最为重要的军事目的方面——在我国的西部边界问题上——我们竟然得不到英国的支持。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艾登反对说，**莫洛托夫**同志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应当更清楚地理解他的处境：艾登不得到英国政府的相应指示不能够超越自己的代表权限。艾登相信，即使首相和他一起在这里，他们两人仍然不能不与各自自治领和美国磋商就正式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这里还有别的麻烦。艾登怎么能同意波苏边界的某种规定而一句话也不向波兰人说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决不坚持立即解决波兰边界问题。他希望在稍晚一些同波兰和英国谈判时，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正如艾登已

经知道的那样，他愿意以寇松线作为苏波边界的基础。斯大林同志现在更为关心的是苏联同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边界。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是否将在和会上因为我们的西部边界而同英国进行斗争。

艾登表示希望说，这样的事当然不会发生，英国政府完全意识到必须在和会召开以前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为此毕竟还需要在相应的环节上同相应的人员讨论这个问题。艾登不得不坚持不能立即正式承认苏联西部边界的做法，对此他自己也感到很不愉快，但斯大林同志应当理解他的处境。

斯大林同志再次表示理解他的处境，但同时也再次对于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奇。

莫洛托夫同志发表意见说，由于苏联西部边界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还是推迟签署条约。

艾登再次声称，这是应当由苏联政府决定的问题。如果条约不能签署，他会感到非常遗憾。这将在盟国的社会舆论产生不良后果。这也会被德国人所利用，他们毫无疑问最后总会了解到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建议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明天上午，以便双方有时间进一步考虑，也许会得出某种结论而为达成一致提供可能。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得到通过。

然后斯大林同志谈到远东的局势。他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日本当然可能在那里取得某些初步的胜利，但是归根结蒂，几个月以后日本一定会惨败。

艾登回答说，斯大林同志的话大大地鼓舞了他，因为他通常极其尊重他的见解。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艾登：如果他关于日本的期待果真实现，而我们的军队在西方又顺利地打退德国人，那么艾登是否认为这在欧洲，

例如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创造了条件？

艾登回答说，他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他一起来的有奈依将军（他正在接待室等候），如果他能参加这次讨论，那将是有好处了。促使英国政府在利比亚作战的动机之一，恰恰是为在欧洲实施进攻战役作好准备。然后艾登问斯大林同志，他是否真的认为日本可能例如在最近6个月内崩溃？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确实这样想，因为日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支持很长时间。加上如果日本人还胆敢破坏中立和进攻苏联，那末日本的末日就会来得更快。

艾登表示他怀疑日本竟敢进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他们真是疯了。

但是斯大林同志再次表示，这样的可能性决不能排除。

会谈于夜间2时左右结束。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三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18日)

第三次会谈：12月18日19点00分

参加人员：苏联方面为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迈斯基同志；
英国方面为艾登、克里普斯和卡多根。

(由迈斯基同志担任翻译)

斯大林同志向艾登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和平与安全安排的条约的新草案（文本附后），同时表示，在他看来，在这个草案中给第4条款找到了一种有可能使双方得到满足的表述方法^①。

艾登通报说，他也拟出了一些妥协性的建议，但想先讨论斯大林同志的新草案。

(由于把斯大林同志草案的第4条翻译成英语和打字需要一定时间，会议暂时转入讨论军事条约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艾登，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签署一个像样的条约？为什么艾登建议现在不这么做，而只签署一份协定？比如说，英国同土耳其签订了像样的互助条约。难道苏联还不如土耳其？如果英国政府同苏联签署正式条约存在某些障碍，最好它能把这一点坦率地告诉

① 新草案的全名为《苏联和英国关于对德战争结束后解决战后问题和采取共同行动以保障欧洲安全的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给第4条款找到了一种有可能使双方得到满足的表述方法”，就是在由迈斯基和艾登在前一天达成的协定的第4条中加入了承认苏联战前边界的内容，它体现在新草案的第3条中，也就是说，原来协定中的第4条经修改后变成了新草案中的第3条。

我们。

艾登反对说，斯大林同志怀疑英国政府愿意同苏联签订正式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艾登建议签订协定而不是条约，纯粹是出于法律上的考虑。正式条约要以英皇的名义签署，而英皇不仅是英国的君主，而且也是各自治领的君主，又是印度的皇帝。签订这样的条约不仅需要英国政府同意，而且也要得到各自治领政府的同意。艾登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全权，但没有自治领政府授予的全权。因此他才建议签署协定。协定的法律效力在英国人眼中一点也不低于条约的效力。但是，如果斯大林同志宁愿签署条约，那么艾登建议采用这样的办法：在莫斯科签署协议，然后经与各自治领作相应的协商后，在伦敦再把这个协议改变为条约，并予以批准。这样的程序是可以的。

斯大林同志同意接受艾登的这项提议。然后他转入另一个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希望把军事协议变作一纸空文，那就必须用一定的实际行动来加以确认。过去我们提出过第二战场的问题，而英国政府借口各种考虑加以拒绝。后来我们又提出另一个建议——派英国军队去苏联前线。如果英国政府认为目前难以实现这项提议，那么我们可以不坚持，并且现在再提出一个新的、第三个建议：英苏在北方，在佩萨莫地区和在挪威北部实施一次联合战役。苏联能够为这次战役派出陆军，需要英国做的是派出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战役目的是占领佩萨莫，并在挪威北部建立一个抵抗德国侵略的基地。此后也可以向那里派遣挪威的志愿兵。在这个地区德军人数不多，而且其中多数是奥地利人。斯大林询问艾登对在北方实施战役问题的意见。

艾登回答说，向苏联南方战线派兵增援，英国目前没有足够的兵力。至于在北方实施战役，在他看来这是很符合人们意愿和实际可行的。他愿意现在，在他逗留莫斯科期间，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并吸收奈依将军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过艾登想知道，这个战役设想大约在什么时候进行？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北方战役可以在一个月以后，或者也许在6周之后开始。

艾登答应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随后谈话涉及能否在较晚的阶段，派遣英国军队前来苏联，其间艾登问斯大林同志，他认为向战线哪一个地段派遣英国军队比较适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英国军队从北路派来，那么他准备把他们派往列宁格勒前线，与爱沙尼亚交界的某个地方。他当然也可以把他们安排在芬兰战线的某处，但是他设想英国人也许愿意避免对芬兰实施作战。如果英国军队从南方派来，那末他们可以参加乌克兰战线上的一些战役。

艾登回答说，在包括向的黎波里进军在内的利比亚战役结束以前，英国未必能够向苏联派出多少武装力量。此外，在决定派遣军队问题时，还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无论从北路或南路运送英军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向苏联运送必要的军事物资。艾登认为，从军事观点看，向苏联派遣军队而影响物资运输，那是不经济的。不仅如此，英国也没有适宜于在冬季作战的军队。不过，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必需这样做，艾登愿意向首相提出这个问题。

这时恰好送来斯大林同志提出的第4条新的表述方法的英文文本，于是会谈转而研究第二个条约——关于战后安排和平与安全的条约。

艾登提议，在斯大林同志草案的第1条中增加以下的话：“谈判双方承诺就和约条件包括边界问题，共同进行磋商。”

这个建议为斯大林同志所接受，不过他提出了以下的修改意见，即：双方不是“共同进行磋商”，而是“在制定和约条件时按照相互一致的原则采取行动”等等。艾登同意这一修改意见。

接着艾登提出第4条第一部分的新的文字为：“谈判双方承诺为欧洲战后重建而共同努力，并充分考虑到其中每一方的利益。”关于“获得”和不干涉其他民族内政的提法被删去。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他不能同意这样的提法。相反，他认为必须保留关于“获得”的提法，只是把它们明确为“获得领土”和不干涉其他民族内政的提法。后面这一点特别有必要，因为国外有许多人一再谈论苏联“实现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意图。

艾登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但是他拒绝接受斯大林同志草案中第4条的提法，认为这样提就是承认1941年的苏联边界，尽管字面上稍稍隐讳一些。艾登接着提议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增加一封信函，信中他承诺回到英国后安排北美合众国、英国和苏联讨论未来边界问题。艾登把这封信的草稿交给了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同意信函的文本，但条件是要把其中提及苏联边界问题之处删去。

艾登不反对删去那一点。但是关于第4条的讨论陷入困境。艾登否决了斯大林同志的提法，而斯大林同志声称，艾登的提法我们不能接受。

艾登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宣称，他来莫斯科的意图是制定和公布“莫斯科宪章”，作为“大西洋宪章”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等物。现在他发现这一点已无法做到。因此他请求斯大林同志接受他对第4条的提法，然后附以补充信函，信函草稿他刚才已经交给了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这还不够。斯大林同志还对艾登不愿意承认恢复我国原有边界（即1941年边界）的必要性表示惊奇，尽管在上一次会议中他准备承认扩大南斯拉夫、波兰、希腊和其他同盟国家的领土。但是，恢复原先的边界是绝对必要的。列宁格勒就是最好的例子。如英国政府不同意这一点，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英国政府也不反对肢解苏联。

艾登试图坚决反对这种猜疑。整个问题在于，英国政府鉴于艾登已经讲过的原因根本反对承认在战争期间出现的新的边界，不管它是

南斯拉夫的边界、希腊的边界还是甚至英国本身的边界。艾登说，他对于不得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示遗憾，但是他没有别的出路：不同美国和各自治领磋商，所提的问题是無法得到解决的。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鉴于丘吉尔和罗斯福即将会晤，边界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容易一些。

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苏联人民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之所以进行这场斗争不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边界。

艾登为了论证自己的立场，提出了以下论据：他如何就承认我国1941年边界之事向别人，例如，向波兰人解释呢？

克里普斯为了明确问题而提出：斯大林同志草案中第4条提法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边界呢？是1941年的边界吗？

斯大林同志确认，这个提法指的就是1941年的边界。

艾登表示，满足斯大林同志的要求就意味着承认1941年的波兰边界。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我们的协议可以不涉及波兰边界。他愿意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就此向艾登提交一封专门的信函。

艾登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指出，这封信应当是秘密的，所以，如果有人是在议会或其他场合问起波苏边界的事情，他是无法引用这封信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可以把他致艾登信件的副本寄给西科尔斯基将军，并且甚至愿意将它公之于众。

但是艾登继续拒绝接受斯大林同志关于第4条的提法。

斯大林同志表示，鉴于在昨天的会晤中发现英国政府对于苏联边界问题的态度不明朗，苏联政府不得不坚持要把承认苏联边界的条款列入关于安排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我们想要同英国人签订同盟条约，但是为此

必须搞清，我们为什么作战。

艾登回答说，我们作战是为了打败希特勒。他拒绝对第4条的提法作出任何让步。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遗憾，他同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签订条约。

艾登回答说，尽管这使他很不愉快，但是他不得不得出结论：条约实际上是无法签订了。现在他了解了形势，知道了困难所在，因此，他回到伦敦以后将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困难。但是目前，除了推迟讨论签约问题，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

斯大林同志指出，艾登应当就这个问题同首相进行商谈。在张伯伦政府时期，因为波罗的海国家问题关于互助条约的谈判失败了，为此丘吉尔对张伯伦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斯大林**同志不认为首相会反对以他提出的方案为基础签订条约。

艾登反对说，他完全相信，首相会采取和他艾登一样的立场。**斯大林**同志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立即承认未来和平条约的一部分内容。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而且现在，由于技术原因，同首相商谈非常困难。因此艾登只能建议再次考虑当前的形势，明天发表最终的意见。

会谈于21时00分结束。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同英国外长艾登第四次会谈记录

(1941年12月20日)

第四次会谈：12月20日19时00分

参加人员：苏联方面为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迈斯基同志；
英国方面为艾登、克里普斯和卡多根。

(由迈斯基同志担任翻译)

艾登首先通报说，他收到了战时内阁对他发往伦敦的关于出现困难的电报的答复，现在想把它通报给斯大林同志。艾登随即宣读了这份回电的正文，回电在所有重要方面确认了艾登所采取的路线。然后艾登表示，他准备签署第一个条约——关于军事互助的条约和由斯大林同志最早提出的方案中的第二个条约——关于安排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条约，再补充他前一天讲到的那封信。至少他也要签署第一个条约，即使如此也好。如果斯大林同志同意艾登提出的办法，那么他艾登愿意在他回到英国以后向英国政府、各自治领和美国政府提出承认1941年苏联西部边界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两个条约相互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很难把它们分割开来。斯大林同志也不喜欢艾登昨天所说的有可能把协定改变为条约的主张。因为协定应当予以公布，而随即将它又改变为条约，会给各种不善意的解释和传闻提供借口。因此最好是把协定的签署推迟2-3周，使艾登有可能同所有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艾登指出，他认为必须作出一点解释。英国政府并不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协定和条约有任何不同。两者都是它必须遵守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那样的话就更有理由签署条约，而不是协定。

艾登宣称，他先前已经讲过，他丝毫也不反对签订条约。随后他用很长时间发表议论说，把两个很容易就能签署的有利于双方的条约扔进纸篓里，甚为可惜。如果关于这两个条约的谈判毫无结果，那末这一事实将对英苏关系产生不利的影晌。艾登无法理解，为什么苏联政府拒绝签署这两个丝毫也不会削弱苏联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相反能够成为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重要步骤的条约。鉴于以上考虑，艾登请求斯大林同志还是签署进行过谈判的两个条约。

斯大林同志表示反对说，按照他的意见，不论条约签署与否，英苏关系必须改善，因为战争迫使两国日益接近。战争也迫使各个国家抛弃种种成见和先入为主的观点。根据这些考虑，不必对不签署条约的事实过于悲观。如果这两个条约在二周或三周之后在伦敦签署，什么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目前，我们的关系则仍将以 7 月签署的互助条约作为基础。斯大林同志接着继续说，他无疑愿意签署这两项条约，也许只需要进行不多的文字改动，如果不发生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论的话。这次争论显露出他无论如何也不曾预料到的局势。他回忆起过去英国曾和沙皇俄国结成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还有芬兰、比萨拉比亚和一多半的波兰。当时没有一个英国的国务活动家想要反对在上述领土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上进行结盟。可是目前，关于芬兰边界和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问题看来成了绊脚石。斯大林同志指出，他曾提议在两个条约之后附加一个议定书，但英国方面反对这样做，于是他就放弃了议定书。他还放弃了建立第二战场的要求。同样不清楚的还有，佩萨莫地区的北方战役问题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由于斯大林同志作了上述各种让步，他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承认 1941 年的我国西部边界以作为一定的补偿。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的话回答说，他很高兴听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关于改善英苏关系前景的话。他对此之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斯大林

同志在他不久前致首相的信函中，谈到两国缺乏良好的关系，谈到必须签署关于军事互助条约和安排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条约以改善双方关系。（以下几页未经迈斯基校改——原注。）正是为了想通过签署上述条约来改善关系，艾登才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改善关系必然会自动地进行，而不需要条约，那么艾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次长途跋涉的极其复杂的旅行。

艾登接着又一次谈及边界问题，并且再次重复那些人们已经熟知的关于无法立即签署正式承认1941年苏联西部边界的条约的理由。鉴于斯大林同志提到他不再坚持开辟第二战场，艾登援引了一些他刚刚收到的关于香港和马来亚半岛军事形势的消息。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自然是让苏联对日本施加压力以牵制其在南方的兵力。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向苏联政府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它完全理解苏联目前履行这项请求存在的困难。苏联政府也应当理解，英国政府在实现苏联前几个月向英国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存在困难。至于提到佩萨莫，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是完全清楚的：英国方面愿意参加这次战役，因此希望能由奈依将军就此同我们的某一位军人认真地交谈一下。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刚才艾登提到的致首相的信函中只谈到英苏关系并不明朗，而这种不明朗的原因是两国之间没有签署关于军事目的和战后和平安排的条约。斯大林同志同时补充说，澄清刚刚提到的几点能有助于改善关系。相反，继续保持不明朗的状况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并对相互信任形成障碍。在这封函件中，斯大林同志并未提出要英国派人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信件中表示希望明确双方关系，而这一点既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莫斯科完成。但是丘吉尔先生提议派艾登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同志对这样的建议当然只能表示完全赞许。根据刚才所说，艾登没有根据可以责怪苏联政府让他艾登徒劳无益地进行了这一次长途跋涉的旅行。

艾登对斯大林同志的话作出反应说，他并不责怪任何人，只是表示自己的失望而已。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对于未能达成协议也感到失望。但是他对于英国的政策取决于美国政府而感到有些惊奇。他感到，英国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对美国在英国政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斯大林同志对于英国不能开辟第二战场或向苏联派兵绝不感到不快。斯大林同志是于11月8日致函丘吉尔的，当时英国的形势比现在要好得多，而苏联战场的形势却比今天坏得多。从那时至今，局势发生了变化，对这种变化必须加以考虑。斯大林同志并不想要求做某种无法做到的事，因此不坚持向苏联战场派遣英国军队。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参加佩萨莫的战役，他对此只会表示欢迎，而且愿意安排奈伊将军同苏联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会见。

斯大林同志当即通过电话就涉及的问题同元帅商议妥当。奈伊同沙波什尼科夫的会见就定在今天23时00分。

艾登指出，英苏关系比条约更加重要。因此他不想再坚持签署和约，而在回到伦敦后将尽一切可能克服发生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感谢艾登的承诺，并表示相信英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不会遥远。斯大林同志从自己方面愿意促进双方关系的改善。

接着艾登提出了远东问题。鉴于那里的严重局势，他请求斯大林同志说明，英国能否以及何时能够期望在反对日本方面得到对它的某些援助。艾登知道，这种援助目前对我们来说未必可以想象。但是，例如到了春天是否有可能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苏联向日本宣战，那么它势必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进行真正的大规模作战。这可不是比利时和希腊可能向日本宣战那样的一纸宣言。因此苏联政府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兵力。目前，苏联还没有做好同日本作战的准备。我们相当数量的远东

军队近来被调往西线。现在在远东正在组建新的军队，但是至少还需要4个月苏联才能在那个地区作好应有的准备。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日本入侵苏联，事情就会好办得多。那样就会在我国造成更为有利的政治和心理气氛。抵抗入侵的战争更容易普遍发动，而且能促使苏联人民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入侵的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德国人在前线开始失利，那么日本入侵苏联是有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必然无疑的。那时希特勒就会采用一切手段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卷入对苏作战。

艾登表示疑虑说，日本在东亚可能采用纯粹的希特勒式战术——各个击破敌人：先同英国了结，然后再入侵苏联。

斯大林同志反对说，英国并非一家在同日本作战。同它一起作战的有中国、荷属印度和美国。

艾登对此指出，目前英国在马来亚半岛实施主要突击，盟国无法在那里帮助它。

斯大林同志问道，中国不能帮助英国吗？

艾登通报说，韦维尔将军今天应当到达重庆。中国政府答应向英国提供援助，但是它缺乏进攻的武器，而英国目前在这方面又不能予以帮助。

斯大林同志问道，艾登是怎样看待中国的立场的？它是否真的准备作战？

艾登回答说，中国政府表示准备作战。

但是**斯大林**同志反对说，中国政府现在实际上是什么事也不做。接着他又补充说，他原准备于春天同英国就远东局势问题恢复谈判。当然，日本人有可能会提早进攻苏联，那样的话，立场自然就会明朗。

艾登感谢**斯大林**同志愿意在几个月之后再回到远东问题上来，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它便能用自己的潜艇给予英国重大帮助。英国自己在远东没有潜艇。荷兰政府约有15艘潜

艇。此外，它还有一定数量的轻型巡洋舰。这是不够的。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经历一个不愉快的而且对它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作战，但不拥有制海权。

斯大林同志指出，潜艇可以迅速而轻易地制造出来。如果从现在开始，那么6个月以后英国和美国在这种武器上就会对日本人形成巨大的优势。

艾登反对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未来这6个月不得不设法应付过去。目前形势仍然极其危险。接着艾登通报说，根据他今日所收到的电报，不管远东局势如何，英国政府决定在利比亚继续发起进攻。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内，远东的英国军队看来只好用自己的力量作战了。

斯大林同志发表意见说，英国政府的决定是完全明智的。意大利是轴心国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这个环节被粉碎，轴心国就会全部瓦解。很遗憾，英国没有在1939年，或者甚至更早对意大利发起进攻。如果它当时这样做了，现在它就是地中海的主人了。

艾登说：“我们被恫吓吓懵了。”

斯大林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也许某种民主主义的幻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艾登回答说，幻想也起了作用，对意大利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也起了作用。这时艾登又通报说，昨天英国舰只同意大利从本土向利比亚运送援兵的船队发生了轻微的冲突（它受到了黑暗干扰）。有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护送4艘商船航行。看来是在把德军运往利比亚。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我们的战场上意大利人作战很差。德国人对待他们像对待黑人一样，而且经常对他们开枪射击。意大利逐渐地会对同德国结盟表示反感。利比亚战役应当可以结束了，如果英国人能够到达比塞大，那就很好。这里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或损害民主原则的事。战争期间，临时占领某些战略要点或领土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也是明智的。自然，很可能韦尔诺·巴特莱会大失所望，并且要反对此类行动，但是这不会有任何意义。

艾登声称，他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有有助于为民主而斗争的事情都是符合道德的。英国就曾在伊朗向法国海军开炮。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肯定，他说这是正确的。战争有自己的逻辑，在战争期间可以不必为占领必要的战略要地而感到于心不安。

艾登说，英国人在最近两天内占领了葡属帝汶岛。

斯大林同志对此的反应是赞叹道：“太好了！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日本人就会这样做。”

艾登通报说，利比亚战役发展顺利，英国人已经抓获了 10000 个俘虏，其中有 4000 个是德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除个别人外，德国人不向我们投降。在克林我们建议他们投降并保证生命安全，但是我们的建议遭到拒绝。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德国人消灭。同样的事在加里宁也发生过。

艾登感谢斯大林同志允许他巡视克林。他在那里看到相当数量的德国俘虏，他们外表和服装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俘虏穿的衣服完全不适合俄罗斯冬季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带着讽刺意味地指出，希特勒在 10 月份曾经炫耀说，已经作好了冬季战役的准备。

艾登指出，据俘虏讲，所有德国士兵都穿同样的衣服。

斯大林同志表示反对说，这个规则有一项例外：党卫军穿得好些。不过现在这类军队也已经不多了。

随后转入讨论公报。斯大林同志和艾登各自提出了一份公报草稿。一致同意采用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文本。

会谈于 20 时 30 分结束。

向丘吉尔转达我对他的信函的答复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莫洛托夫：

1. 我们不反对你对就苏波边界问题给艾登复信的补充。

2. 我们建议立即转入有关第二地区^①的条款上，不要向艾登提交我们关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议定书。

3. 建议同意在返途中停留英国^②。

4. 向丘吉尔转达我对他的信函的答复：

“我已收到您5月20日发往古比雪夫的信函。您在信中告知，装载给苏联的军事物资的35艘船舶现正在驶往苏联的港口。感谢您的这一通报和您采取的运送货物的行动。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将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您在今年5月9日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一地段的运输安全。”

5. 铁木辛哥的情况很糟。他有希望恢复健康。

斯大林

① 似应为第二战场。

② 指莫洛托夫在接下来访问美国后回国途中再在英国停留。

对英国人提出加紧提供 歼击机和坦克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3日)

莫洛托夫^①：

你的两封密电已经收到。前线局势暂时没有大的变化。在巴尔文科沃和伊久姆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德国人在该地区有6个师。伊久姆掌握在我们手中。巴尔文科沃则为德国人控制。在哈尔科夫地区，我们的进攻已经停止。刻赤半岛必须撤出。在其他前线局势依旧。正在积蓄力量，调集我们的后备军。我们非常需要歼击机和坦克。要对英国人提出加紧提供歼击机和坦克特别是“瓦连京号”坦克的问题。

斯大林

1942年5月23日

① 此时莫洛托夫正在先后对英国和美国进行访问。下同。

尽快签订条约并在这之后去美国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942年5月24日收到

莫洛托夫：

1. 我们收到了艾登转交给你的条约草案。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空洞的宣言，我们认定它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条约草案中没有关于边界安全的问题，但这或许不错，因为我们有了行动自由。边界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保障我们国家某些地段边界的安全问题，将通过武力来解决。

2. 我们建议放弃对条约旧草案的修改，同意把艾登提出的把两个条约合在一起的草案作为基础。

3. 我们对艾登草案的修正是：第一部分第1条——“由于我们建立了联盟”改为“由于英国和苏联建立了联盟”。接下去：第二部分，第5条末尾“不干涉其他民族内部事务”改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

4. 如果您还有什么修改，尽快告诉我们。

5. 尽快签订条约并且在这之后去美国是合适的。

上级^①

① 这是斯大林在电文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落款。

你应当在返途中在伦敦停留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4日)

1942年5月24日收到

莫洛托夫：

今天我收到了丘吉尔的一封新的信函，信中他认为，有必要让你在从美国回来的归程中再次访问伦敦以同丘吉尔和艾登进行会谈和谈判。我已经以上级机关的名义写信给你，你应当在返途中在伦敦停留。请把我下列答复转告丘吉尔：

“您最新的来信我于5月24日收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我都认为，在从美国返回的途中在伦敦停留，以便完成与英国政府代表就我们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斯大林

对艾登的草案不要再作任何修正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5日)

1942年5月25日发出

莫洛托夫：

1. 艾登草案的序言部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需要加以修正。
2. 除了昨天我们跟你说的两点外，对艾登的草案不要再作任何修正。
3. 不要暗示丘吉尔让罗斯福参加条约，因为这样做将是不礼貌的，英国人会认为这是贬低他们的作用。
4. 如果美国人或者丘吉尔自己提出美国加入（条约）的问题，那你就应当毫不反对地接受。
5. 我们同意你建议艾登撤除波罗的海国家的使馆。

上级

同意你对第四条条款的修正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2年5月26日)

1942年5月26日发出

莫洛托夫：

1. 同意你对第四条条款的修正。
2. 条约的名称应当简短，似乎可以如下：

《苏联与英国关于在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联盟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

上级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1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1日)

斯大林问艾登，旅途情况怎样。

艾登表示感谢，并说，他带来了首相对斯大林元帅最热烈的祝贺。

斯大林表示感谢。

艾登希望，莫洛托夫已经向斯大林元帅报告过，现在会议^①开得很好。

斯大林答道，莫洛托夫已经向他转达了。现在会议的情况很好。

克尔指出，维·米·莫洛托夫心情很好，这说明会议进展顺利。

斯大林答道，前线打仗打得好，所以心情好。

艾登说，丘吉尔授权他同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商谈护航船队问题。斯大林是否想要他（艾登）开始谈这个问题？

斯大林回答：同意。

艾登说，首先，英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冬季的几个里组织护航运动。每次护航都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战役。必须为每支护航船队弄到4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每次护航船队出发时，英国舰队就必须出海，以确保对护航船队的掩护。英国政府真诚地希望派遣4支护航船队，每支将有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16艘船。丘吉尔电告他（艾登），这样，英国政府就能向苏联派遣装载86万吨物资的130—140艘船。

为什么丘吉尔不想允诺，其惟一原因是，英国政府不愿因为某种

① 指当时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

难以预料的情况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而后来受到责备。英国政府认为，它能够派遣护航船队，并将为此竭尽全力。不过，大西洋战役还没有结束。英国政府考虑到，德国人拥有400多艘潜艇。丘吉尔不想在护航船队方面给予许诺，为的是不要在后来使斯大林元帅失望。但英国政府将为派遣护航船队作出一切努力。他（艾登）恳请相信，英国政府的意图是认真的。它完全意识到存在着困难，但它具有坚定的意向。

斯大林答道，他和首相之间发生争论，并不是因为能否无条件地运送货物这样的问题。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英国不履行义务和不予承诺，而只是简单地表示一下。斯大林说：“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英国人认为自己不受他们同我们所签条约义务的束缚，而把运送货物看做是给予我们的礼物或恩赐。这是我们难以容忍的。礼物也好，恩赐也罢，我们都不想要，但是，我们只要求尽可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争论的第二个方面便是丘吉尔生气了，并且不接受信函。他（斯大林）对此事是这样理解的：丘吉尔不想同他通信。

艾登说，并非如此。丘吉尔电告他（艾登），要是他（艾登）在莫斯科处理这件事情，那就最好不过了。他把这件事情的全部责任转到了我的肩上。丘吉尔并未受到侮辱，可却受到了伤害。艾登说，“斯大林元帅善于给予猛烈打击，当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斯大林问：“难道这是打击”，他说，他无意这样做。

艾登说，无论如何，英国政府不希望其派遣护航船队的意向被当作礼物。英国政府把护航船队看成是给予盟国的援助。不过应当记住，英国政府所以不想给予承诺，就是因为要派遣护航船队，就得从大西洋抽调驱逐舰。然而，如果斯大林元帅相信英国政府的话，它会尽一切努力恢复护航船队的。

斯大林指出，他相信这一点，并对此没有怀疑。

艾登说，英国政府想要利用“梯比兹”^①号失去战斗力的机会，

① 1943年9月22日英国潜艇将德国战列舰“梯比兹”号击伤于挪威北部。

尽快着手派遣护航船队。

但是对英国政府来说，若干数量的护航服务人员是必需的。所需数量并不大，将为 320 人，包括已在苏联的人员在内。我们按此建议采取行动可能会被斯大林元帅接受吧？届时他可以授权莫洛托夫同他（艾登）进行更为详尽的会谈。英国政府不想让这些人注定要无所作为。英国政府可以在别处派他们用场。如果斯大林元帅对护航船队所需驻苏人员数量有疑问，那末艾登准备给予适当的解释。

斯大林说，他怀疑这些人员能否增加。他说：“我们自己能为护航船队提供服务。不过这个问题当然应当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

艾登表示，人员增加不多——只增加 70 人。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有很多英国人在苏联没什么事可干。

艾登说，现在，当护航船队来到时，这些人就会很忙的。假如他（艾登）作了解释，说明英国政府对人员的需要究竟怎样，那就可以确定：我们相互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

斯大林答道，艾登和莫洛托夫可以商谈一下这件事情……

艾登问道，为什么斯大林认为，土耳其参战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问题是，目前地中海区域英国人的力量削弱了。他们把部分英军从那里调去参加意大利战役，或调到英国，为攻入法国准备突击集群。

斯大林回答，盟国向土耳其提供了武器，现在需要它给盟国以援助，否则提供武器将是没有意义的。明年就不需要土耳其参战了。目前土耳其实行中立，这同时有利于盟国，也有利于希特勒，因为它掩护了他的巴尔干侧翼。假如土耳其今年参战，那德国人就没有招架之功，因为他们没有预备队。土耳其试图参加和平会议，并且它是怀有要求的。必须让它为胜利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能让它有权参加和平会议。目前土耳其有着过多的友谊：它同德国友好，同英国结盟，同美国人和苏联也友好。

艾登问斯大林，他对关于需要瑞典向盟国提供基地的建议有什么

想法。

斯大林答道，盟国未曾把自己的封锁扩大到瑞典，并且还向它供应粮食。瑞典过去帮助了德国，现在也帮助德国。瑞典向盟国提供机场以帮助盟国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然，如果遭到拒绝的话，可能就必须向瑞典作出停止供应的威胁。

艾登回答，他将为研究瑞典问题而感到高兴。现在他想谈谈保加利亚问题。关于保加利亚局势，他拥有的情报并不多。他想要知道，斯大林对有关要求保加利亚从南斯拉夫和希腊撤出保加利亚军队的要求持何种态度。

斯大林说，可以这样做。斯大林说：“必要时，我们甚至准备同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系”。

关于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

(摘录)

(1943年10月21日)

.....

艾登说，丘吉尔告诉他，希望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将在下月或过两个月举行。丘吉尔准备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去。

斯大林回答道，他同样准备这样做。但是他认为，把伊拉克作为这次会晤的地点是不合适的，这不是从保卫工作的角度，而是从缺乏同前线的有线通讯的观点去看的。相反，安排在伊朗，就有这些可能性。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役大概正在发展为冬季战役。目前德国人在前线已经无法摆脱困境。这是由于当时集中在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的德国主力集团军已经被歼。他们很少有预备队。所以我们各个战役将有更进一步的良好发展。他的同事们认为，他不在的话，就将影响到红军作战。因为不能满足总统的愿望，他（斯大林）感到很可惜。然而，他同时请求注意，像目前这样的战役50年才一遇，应当加以利用。

艾登说，丘吉尔将乐意到德黑兰，但是，他认为，对总统来说，这个地方太远了，因为他受美国宪法的一些规则的束缚。至于伊拉克，那末，虽然它不是英国的领土，但英国当局准备在哈巴尼亚为苏联代表提供同苏联建立电报和无线电联络设施的机会。哈巴尼亚有大型机场，这个机场装备着优秀的通讯设备。

斯大林答道，我们已经同伊朗有电报和电话联络。他斯大林深为遗憾的是，总统不能到德黑兰去。或许，把会晤推迟到明年春季。

艾登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补充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不过，他艾登管了闲事。

斯大林重复道，总统不能到德黑兰参加会晤，非常可惜。……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第2次会谈记录

(1943年10月27日)

艾登说，他受首相的委托，给斯大林元帅带来了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致艾森豪威尔将军电报的副本。这份电报描述了意大利的真实情况，所以，首相希望斯大林元帅熟悉电文。

斯大林问，应该马上还是稍后熟悉这份电报呢？

艾登回答道，如果文件不太长的话，那末最好是现在斯大林元帅读一读，然后提些他可能感兴趣的问题。

斯大林说，“别的怎么样不敢说，而读文件我已习惯了。”斯大林读着文件说，亚历山大将军提供的材料可能较为准确，不过，根据我们情报机关的资料，在意大利有12个英美师，对阵的是部署在罗马以南的6个德国师。其他6个德国师驻在波河地区。这样，6个德国师在打仗，而6个是预备师。

艾登再问，这样，根据我们的材料，在意大利北部，除了6个师，没有其他德军。

斯大林答道，是这样，他又补充道，根据我们情报机关的资料，在12个英美师中，有4个英国师和8个隶属于美国第5集团军的美国师。

艾登说，据他所知，在意大利有11个英美师，其中有2个美国师和9个英国师。

斯大林答道，艾登当然更了解此事。

艾登说，意大利的形势使首相感到不安，所以首相希望，向斯大林元帅说明那里的形势，就如亚历山大将军所看到的那样。这将有助

于斯大林元帅看到英美军队在意大利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同时首相坚信，必须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并将继续战斗到打赢为止。但是这可能对几天前莫洛托夫先生完全正确地提出的问题——强渡英吉利海峡而攻入法国的日期问题，产生影响。艾登说，他知道得不确切，不过他认为亚历山大将军需要登陆艇，以便对敌人实施侧翼突击。当然，盟军联合参谋部是在研究了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报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艾登补充道，他还认为，如果斯大林元帅、首相和总统举行会晤并讨论这个问题，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就增加了。他们能够把这事办得比他——艾登好得多。

斯大林指出，如果作战师不足，那末可以安排会师。

艾登答道，他不认为，会师可以提供新的师，但这个问题同强渡海峡战役有关。艾登说，“霸王”战役准备措施正在坚决的实施之中。不过，首相希望斯大林元帅熟悉这份电报，以便他能看到困难所在。

斯大林说，如果兵力不够，那就什么也干不了。

艾登说，正如他所认为的，他们有兵力，并且他并不认为，攻入法国的日期将会被推迟。但是，必须注意到，除了登陆船只，可能同时需要利用驻意大利的7个有作战经验的师，拟将其调往英国，把他们组成登陆法国的突击集团。

斯大林问，指的是哪7个师，是现在正在战斗的那些师呢，还是驻英国的那些师？

艾登答道，就是那7个师，从下月开始将把它们从地中海区域调往英国。

斯大林问，这些师目前是否在参加意大利战役。

艾登答道，这些师目前没有参加意大利战役，不过，现在意大利战役可能需要他们。

斯大林说，显然，情形是这样的：英国人已经实施了一次登陆战。如果假定，目前有20个可以动用的师，那末问题就是，把这些师用

于何处为好，用在已经完成登陆的地方呢，还是用在别的什么地方。

艾登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补充道，首相认为，不能冒兵败意大利的风险。

斯大林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有两种。第一是在意大利转入防御，并在现有兵力以及那些可能从意大利抽出的部队的帮助下，在法国实施登陆。第二是决定不在法国登陆，而通过意大利突入德国。作出的决定可能各种各样。一切取决于力量配置。

艾登说，他们的计划是，夺取罗马，然后继续向北推进至比萨-里米尼一线，在那里建立防线，并用其余部队于明年强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但是，问题在于，鉴于意大利现在的形势，首相不完全相信这项计划将能实现。

斯大林问：“不相信‘霸王’战役？”

艾登说，他想给斯大林元帅念一念丘吉尔的电文记录。丘吉尔写道，夺取比萨-里米尼一线，将能提供建成纵深防御的可能性，也就保障了罗马地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机场，就可以从那里出发轰炸德国南部。丘吉尔写道，我们无法坚信我们能成功。

斯大林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在意大利北部山区布伦纳山口同德国人作战将会更困难。

艾登证实，这将是一次困难的战役。英国人不打算实施，而打算改为明年强渡英吉利海峡，并实施登陆。

斯大林说，应当把德国人赶进山区，正如苏沃洛夫^①曾经做过的。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作战是困难的，所以，应当挑选其他地区实施这些战役。

①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729或1730-1800），俄国元帅。曾多次在对外战争中指挥俄军获得胜利。1799年，苏沃洛夫先是率军远征意大利，在意北部指挥俄奥联军同法军作战。其后，他又率俄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军瑞士。

艾登说，正如他们所认为的，法国南部就是可供作第二种选择的地区。

斯大林说，还可以利用穿过西班牙的路线，就如英国人在对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做过的那样。西班牙能否为英美攻入法国打开大门呢？能不能迫使佛朗哥^①干这事呢？还是他不想干这事呢？

艾登说，这未必行。佛朗哥对英国不特别友好。艾登说，佛朗哥不久前通知英国大使，“蓝色师”将于10月25日从东线撤回。要是10月25日以后苏军抓到西班牙俘虏，那末他（艾登）请求让他知道这事。

斯大林说，我们将看一看，事情将会怎么样。匈牙利人同样向英国人提出保证，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军队在东线作战。事实上，与我们对阵的有10个匈牙利师。

艾登指出，他不相信匈牙利人说的话。艾登继续说，预计约有10个法国师参加法国南部战役。艾登认为，考虑到盟国在科西嘉岛上有支撑点，以及在意大利南部有机场，这个战役将能获胜。

斯大林指出，可能这个战役将比登陆法国北部容易些。

艾登说，打算同时实施法国南部战役和“霸王”战役，以便分散敌人兵力。

斯大林说，这是个好主意。在我们的战线上，我们也将在5-6个地段向德国人发起进攻，以便分散他们的兵力，不给他们在任何地方形成强有力拳头的机会。

莫洛托夫指出，应当让巴多里奥为意大利而战。

艾登说，他在赴莫斯科途中会晤过蒙哥马利将军，后者特意请求，不要给他蒙哥马利配备意大利部队，因为他们哪儿都不中用。

① 佛朗哥，佛朗西斯科·巴蒙德（1892-1975），1939-1975年任西班牙国家元首。以法西斯独裁者而闻名。

斯大林说，意大利人不想打仗。

艾登指出，意大利人只可用来守卫铁路交通线和内线巡逻勤务。法国人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能够给盟国以可观的援助。现在已经有10-12个法国师。

斯大林问道，法国师是由法国人还是由北非人民组成的？

艾登答道，是法国混编师。这些师当然不宜用作强渡英吉利海峡的突击部队，但是，对法国南部战役来说，他们是适用的。

斯大林指出，目前任何东西也不可轻视。甚至2-3个意大利师或法国师也能有用。

艾登答道，这当然如此，但他不能决定把意大利师配给蒙哥马利将军。

斯大林说，我们的指挥官们尊敬蒙哥马利将军。

斯大林继续说，这样就决定以法国南部战役取代强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的战役。

艾登答道，并非如此，强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战役没有放弃，法国南部战役将仅仅具有辅助性。

斯大林说，不管怎样，他是这样理解的，即强渡英吉利海峡战役已经推迟。

艾登说，他不能这么说。首相没有说过什么战役将被推迟的话。艾登表示，为了实施这些战役，正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但是，不能容许英美在意大利遭到失败。艾登补充道，他还是希望斯大林元帅能与首相举行会晤，并在那时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他同样希望他能与他们举行会晤，但总统对德黑兰会晤犹豫不决。他补充道，他知道丘吉尔同意赴德黑兰。

艾登指出，伊拉克哈巴尼亚市的魅力看来不能吸引斯大林元帅。艾登开玩笑地补充道，看来，这是莫洛托夫的罪过。但愿莫洛托夫也去参加这次会晤。

莫洛托夫说，他准备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不过他同样比较喜欢德黑兰。

斯大林说，或许可以把会晤推迟，等待较为平静的时候为好。目前出现了让希特勒烦恼的良机，坐失良机是不明智的。我们同德国人的搏斗也同样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好处。目前德国人已经开始从西欧抽调部队了。不久前他们从法国调来1个装甲师以代替被我们击溃了的那个师。我们已把德国人赶出乌克兰产煤区，使他们丧失了煤炭，并且现在他们不得不从栋布罗瓦地区——从波兰运送煤炭了。我们把德国人赶得愈远，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困难就愈多。目前我们不让德国人安宁，苏德战场军事行动的中断不符合我国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盟国的利益。斯大林说，所以他不可能远行。

艾登说，他们英国人是小男孩。两名大男孩决定去哪儿，小男孩就去那儿。

斯大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这场战争中，既没小男孩，也没大男孩。大家干着自己的事。如果德国人没有感受到西线将遭到进攻的威胁，我们就无法使进攻深入下去。甚至一种遭到进攻的恐惧，一个遭到进攻的幽灵，就使希特勒不能在我们战线上大力增强军队。仅仅一个幽灵就能把德国人拴在西线。困难的事情毕竟落在我们肩上。

艾登说，首相希望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同德国人进行战斗。

斯大林说，他不怀疑这一点。不过，首相想要做比较容易的事情，而我们俄国人则干比较难做的事情。做一回、两回，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总这么做。

艾登说，无可置疑的是，海战是很艰难的。他不久前对莫洛托夫说，一天之内，英国舰队就损失了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现在他获悉，损失了5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而这全是一天内失去的。

斯大林说，谁都不怀疑，海战是与重大损失联系在一起的。

艾登说，他可以告知，英国护航船队将于明天抵达阿尔汉格尔斯

克。艾登随后问道，莫洛托夫是否已收到关于轰炸索非亚的消息。

莫洛托夫说，已经收到了这条消息。

斯大林问，这次轰炸已实施了吗？

艾登答道，这次轰炸还没实施……艾登随后说，正如他所认为的，他今天捎给斯大林元帅的消息不涉及明天会议将要研究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艾登今天的消息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某种新东西。

艾登说，一切都在莫洛托夫掌握之中。

莫洛托夫答道，这将取决于艾登。

艾登说，要是莫洛托夫愿意的话，他（艾登）可以把今天捎给斯大林元帅的消息内容通知会议。但是，他（艾登）不想把这份电报正文转交会议。

莫洛托夫说，他想指出的只是，按照他的意见，今天艾登先生的声明不能被视为加快结束战争的期限。

艾登说，他没有这样说。所说的只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意大利所碰到的那些困难。艾登问道，假如斯大林元帅是希特勒的话，难道就不想在意大利给英美一个突击吗？

斯大林说，如果他是希特勒的话，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把英国人和美国人拴在意大利，以便在阿尔卑斯山中与之一战。

艾登声明，他允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跨越阿尔卑斯山。

斯大林说，当然，不该跨越阿尔卑斯山，而是应当避开它。

艾登表示同意这一点。艾登随后问，斯大林元帅对会议有什么意见。他对会议进程是否满意？

斯大林答道，莫洛托夫说，应当对会议进程感到满意。斯大林补充道，无论如何，我们满意的是，希特勒分裂盟国的希望已经落空。

艾登说，他在会议工作期间看到，苏联代表们很善于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答道，他不想谈这个，他补充道，他不知道，现在是否不得不改变第1项议程——关于缩短战期限的措施——的名称。

斯大林开玩笑地指出，主要的事情是不要改变名称。

莫洛托夫说，他只想指出，不仅是我们，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也许，我们对此更为关心些，因为战争是在我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但是战争拖延毕竟不符合盟国的利益，正如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一样。

斯大林说，我们不咬文嚼字。我们不要求我们的盟国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

斯大林继续说，他是这样理解今天艾登先生提供的消息的，即强渡英吉利海峡战役大致推迟两个月。

艾登答道，这个他不知道。他不认为，这些战役一般地将予推迟。这里的问题是，登陆船只比部队更需要。

斯大林重复道，正如他所理解的，看来，这里指的是大约两个月时间。

艾登说，他难以谈及这一点，他请求伊斯迈将军谈谈。

伊斯迈说，如果他不详细地了解意大利态势以及为改善这种态势而必须采取的那些措施，那末，他对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明确的意见。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帮助亚历山大将军。同时，他伊斯迈可以坚定地声明，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实施“霸王”战役，他们正在为准备实施这一战役而努力工作。主要的问题是，部分登陆船只必须用于意大利。同时，美国人有一些登陆船只预定用于太平洋对日作战。也许，这些船只中的一部分可供强渡英吉利海峡使用。无论如何，一切准备工作的出发点是，1944年将实施强渡英吉利海峡战役。

艾登说，他只想补充一下，总统和首相目前正在讨论关于怎样利用美国现有登陆船只的问题。

斯大林说，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登陆已经不那么困难了。盟国现在拥有在意大利登陆所必需的所有设备。同时，德国人反登陆的设备不

足。所以，亚历山大将军甚至凭他现有兵力就能夺取罗马，并守住意大利南部，而如果再给亚历山大4个或5个师，那末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他的任务，并能占领意大利的防御阵地。这不会损害英国的威望。此后就可以开始实施登陆法国的战役。

艾登说，英美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斯大林指出，在现在的战争中，4个或5个师不起特别作用。可以说，这4个或5个师在何处都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将军得到这些师就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艾登说，假如不能把那7个久经战斗考验的师从意大利运到英国，那是非常遗憾的，那些师应组成攻入法国的1个突击集群。也许，鉴于意大利目前形势，这些师的一部分将必须留在意大利对付德国人。

斯大林问道，有何来自意大利的新消息？

艾登答道，没有任何特别的新消息。正在推进，但很慢。艾登补充道，军事战役一般难以在山区进行。

斯大林确认，军事战役实在难以在山区进行。

关于强渡英吉利海峡战役 同英国外长艾登的会谈纪要

（摘录）

（1943年10月27日）

……

斯大林说，不管怎样，他是这样理解的，即强渡英吉利海峡战役已经推迟。

艾登说，他不能这么说。首相没有说过什么战役将被推迟的话。艾登表示，为了实施这些战役，正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但是，不能容许英美在意大利遭到失败。艾登补充道，他还是希望斯大林元帅能与首相举行会晤，并在那时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他同样希望他能与他们举行会晤，但总统对德黑兰会晤犹豫不决。他补充道，他知道丘吉尔同意赴德黑兰。……斯大林说，或许可以把会晤推迟，等待较为平静的时候为好。目前出现了让希特勒烦恼的良机，坐失良机是不明智的。我们同德国人的搏斗也同样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好处。目前德国人已经开始从西欧抽调部队了。不久前他们从法国调来1个装甲师以代替被我们击溃了的那个师。我们已把德国人赶出乌克兰产煤区，使他们丧失了煤炭，并且现在他们不得不从栋布罗瓦地区——从波兰运送煤炭了。我们把德国人赶得愈远，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困难就愈多。目前我们不让德国人安宁，苏德战场军事行动的中断不符合我国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盟国的利益。斯大林说，所以他不可能远行。

艾登说，他们英国人是小男孩。两名大男孩决定去哪儿，小男孩

就去那儿。

斯大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这场战争中，既没小男孩，也没大男孩。大家干着自己的事。如果德国人没有感受到西线将遭到进攻的威胁，我们就无法使进攻深入下去。甚至一种遭到进攻的恐惧，一个遭到进攻的幽灵，就使希特勒不能在我们战线上大力增强军队。仅仅一个幽灵就能把德国人拴在西线。困难的事情毕竟落在我们肩上。

艾登说，首相希望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同德国人进行战斗。

斯大林说，他不怀疑这一点。不过，首相想要做比较容易的事情，而我们俄国人则干比较难做的事情。做一回、两回，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总这么做。……

关于欧洲战后安排的问题

——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记录

（1944年10月17日）

参加会谈者：莫洛托夫、巴甫洛夫、克尔伯恩

丘吉尔表示，被英军在西欧解放的苏联公民将在近期内从英国返回苏联。这些公民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德军强行征召的。他们整队整队地向英国人投降。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些人中间有坏家伙，但是我们不会对他们很严厉。

丘吉尔说，既然这些人是向英国人投降的，那么他，丘吉尔，就认为替他们说这些话是对的。

斯大林同志问，丘吉尔是否开始谈谈有关分割德国的问题。

艾登表示，对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尚未有定论，在内阁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显然，有着几种不同的分割德国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把德国分割成同原来的德意志国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若干国家。分割德国的难处就在于，没有在确定边界时可以遵循的方针。第二种可能性是，以原来的德意志国家为基础来分割德国。第三种可能性是，在俄国和其他盟国从德国工业中拆除一些设备和机床作为对德国所造成的损失的补偿后，对鲁尔、莱茵、萨尔地区建立永久性的国际监督。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点，必须把这些地区从德国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他艾登个人认为，现在是可以讨论分割德国的计划的。

莫洛托夫同志问，这是否意味着建立国际监督？

艾登回答说，这种监督将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将由盟国来予以实施。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个好计划。德国的重工业是德国强大的源泉。

丘吉尔说，按照他的意见，罪恶之源是普鲁士。所以普鲁士必须从德国分离出来。随后丘吉尔又要求剥夺德国对鲁尔和萨尔地区的控制。怎样做则可以进行讨论。首先，必须从德国拿走大量的机床和机器，而这些东西正是苏联、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所需要的。他丘吉尔知道，在战争中遭到很大损失的主要是乌克兰西部地区，他丘吉尔支持以拆除德国工业设备的方法来恢复苏联的西部地区。他丘吉尔以为，这将完全是公正的。但他认为，对所拆除的德国工业设备，盟国中的一些小国应当获得自己的份额。这种拆除当然会导致鲁尔和萨尔的停产。在魁北克^①会议上这一计划得到了对德国人非常憎恨的摩根索^②的特别有力的维护。总统^③似乎是支持摩根索的，他说，英国为何不同其他国家竞争以生产欧洲所需要的产品呢？斯大林元帅将会明白，战争结束时，英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借款供货或租借供货法^④通过之前英国已经耗尽了其40亿英镑的对外投资。英国已对不同国家欠下了英镑债务。战后英国应当加强出口，这样才有可能购买粮食。所以俄国希望从德国拆除设备与英国想要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德国作为欧洲小国的商品生产国的地位是一致的。英国和苏联的利益

① 属加拿大。

② 在1944年9月的美英首脑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曾经提出消除德国的工业能力并把德国变成农业国的计划。

③ 指罗斯福。

④ 指美国国会于1941年1月通过的《租借法》，按照该法，总统可以向“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此法的通过使1939年《中立法》规定的“现款购买”原则失效。

方向是相同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英国所受的损失。对此是可以考虑的。

丘吉尔表示，他支持苏联从德国那里得到工业设备。他丘吉尔不会把高度发达的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和电力技术工业交给德国人。他丘吉尔还未考虑过如何分割普鲁士、如何把它隔绝开来和如何把两个重工业中心——鲁尔和萨尔——从中分离出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向波兰和苏联转交了领土后，剩余的普鲁士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丘吉尔指出，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但他认为，普鲁士的大部分，也就是西里西亚应当划归波兰。而西面和南面的肯尼斯堡地区则归苏联。基尔运河地区应当实行中立，也就是像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一样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应当由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组建一个单独的国家？

丘吉尔说，他对此尚未考虑，而仅仅是想要消灭的德国的工业。他丘吉尔非常清楚地记得上次战争的结局。盟国禁止德国人拥有空军、海军和陆军并且废除了所有的德国军备。但是，盟国没有触动德国的工业。这个工业使得德国再次复兴。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次不必销毁德国的武器、摧毁其火炮和凿沉其军舰，因为所有这些军备都可以用于对日战争。

丘吉尔表示，苏联可以从这些装备中拿走它想要的所有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军舰用不着凿沉，因为它们对于英国人是有用的。

丘吉尔指出，现在的战争表明，空军比海军有更大的意义。

斯大林同志说，海军毕竟具有重大的意义。照他斯大林的观点，德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在它还未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时就决定在欧洲开战。

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英国欢迎有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距离这一步还远着呢。创建陆军要比创建海军容易。

丘吉尔说，在回到他先前谈到的上次战争结束时的话题时，他说，当时有一个德国工业家——犹太人拉特瑙在德国人丧失了海军和陆军后，对他们说，他拉特瑙将要建造一些工厂以向德国提供足够的军备。拉特瑙补充说，如果德国建起了工厂，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强国。但是，德国的领袖们直到希特勒都没有在德国开展生产。盟国这次不应当重复这样的错误，因为盟国不希望德国发动新的侵略。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丘吉尔表示，所以他要谈解除德国工业上武装的问题。可以通过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来这么做。

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剥夺德国人的冶金工业。必须记住，德国在战前就已经年产4000万吨生铁，也就是说比英国还多。

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

接下去的谈话是在地图旁边进行的。

丘吉尔和艾登阐述了把德国分割为三个国家的计划：普鲁士；由鲁尔、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奥地利-巴伐利亚国家。

斯大林同志赞成所说的方案，他说，把德国分解成三个国家比总统在德黑兰会议上所建议的五个国家要好。

丘吉尔问，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联合成一个集团的计划是否符合俄国的想法。

斯大林同志说，对此必须考虑考虑。

丘吉尔表示，欧洲的不幸就在于，欧洲存在着10-15种不同的货币，欧洲海关林立。所有这些都阻碍了贸易。他丘吉尔希望看到欧洲繁荣起来，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寻找譬如像关税同盟那样的实现欧洲国

家经济统一的某种形式。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战后头三、四年里，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占据上风。以自己的方式安排民族生活是这些民族的第一愿望。这些民族将反对通过使它们同其他国家联合的方法来损害它们的权利。所以，欧洲国家的人民未必会同意建立关税同盟。希特勒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发了民族主义情感，南斯拉夫的例子作出了证明，在那里，不仅克罗地亚人，而且黑山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少数民族人都希望获得自治。战后初期，在这些民族的各种愿望中，不受妨碍地享有完全的民族生活的愿望是最强烈的。上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一些虚弱的国家，它们已经破产，这是因为它们建立的根据是不足的。但是，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和迫使一些小民族相互联合则是危险的。很难想象，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甚至捷克人和波兰人，能找到共同语言。所以，他**斯大林**同志认为，现在不能考虑搞联合，即便在未来不能排除联合。

丘吉尔说，按照艾登的意见，德国人不应当拥有航空力量。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德国人不该拥有任何航空力量，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民用的，应禁止德国人拥有航空学校。

丘吉尔说，德国人还不准有海洋船队。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同意丘吉尔的观点。

丘吉尔表示，就如他所见，他和**斯大林**之间分歧是很小的。

丘吉尔问，**斯大林**对他是否有什么问题？

斯大林同志回答，他有一个问题要问丘吉尔。他**斯大林**同志想请丘吉尔不要忘了海峡问题。

丘吉尔说，他承认苏联对海峡的要求是对的。当苏联方面提出它答应提供的建议时，他准备审议这个问题。

丘吉尔问，关于匈牙利的事情是否有什么新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有报道说，霍尔蒂^①被逮捕了。斯大林同志说，据他所知，英国人认为向匈牙利索取4亿美元的赔偿数额太高了。他斯大林想要问丘吉尔，他是否认为把赔偿数额定为3亿美元是合适的，条件是：2亿美元归苏联，而1亿美元给遭受匈牙利侵略之苦的其他盟国。

艾登和丘吉尔回答说，这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对此持什么态度，他们在赔偿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当强硬的。

B. 巴甫洛夫记录

① 霍尔蒂，1920-1944年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

战局转折

关于组建机械化军的指示

(1942年1月3日)

转到组建机械化军上来。每支坦克军有两个全员的坦克旅。坦克旅分缩编旅（各46辆坦克）和全员旅（各93辆坦克）。每军有两个全员的坦克旅和两个摩托步兵旅，各有2500-3000人。每军要有187辆坦克。六个方面军各配备一个军，每个集团军各配备两个缩编旅。每个方面军应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军。这些部队的组建是当务之急，即在2月份以前完成。

组建12个军。按照从前摩托步兵师的编制并加以缩编。配备大炮、高射炮和82毫米、120毫米口径迫击炮。

制定全员坦克旅和缩编坦克旅的编制并在今后不作改动。

尽快为南方面军配备机械化军。

挑选机械化军军长的人选并报斯大林同志批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40页

国防委员会关于有关人员责任范围的决定

(1942年2月4日)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坦克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巴·贝利亚同志：（a）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飞机和发动机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b）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红军空军事务的决定（组建航空兵团并及时调往前线，组织问题和工资问题）并准备相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迫击炮部队司令部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拉·巴·贝利亚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武器和迫击炮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同志：（a）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弹药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黑色冶金业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阿·伊·米高扬同志：监督红军供应工作（物资供应、粮食供应、燃料供应、资金供应和炮火补给）并准备相关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供应和运输机关受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的监督。批准雅科夫列夫同志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在炮火补给问题上的副手。

斯大林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46页

您的立场非常方便但糟糕透顶

——给梅赫利斯的电报

(1942年5月8日)

您的立场很奇怪，成了对克里木方面军失败不负责任的旁观者。这一立场非常方便，但糟糕透顶。您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旁观者，而是对方面军一切成败负有责任并有责任就地纠正司令部错误的大本营负责代表。您与司令部一起为方面军左翼如此不堪一击承担责任。既然“一切情况都表明敌人会在早晨发动进攻”，而您却没有采取一切措施组织反击，只限于消极的批评，那么这对您更糟。也就是说，您还不明白，您不是作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而是作为大本营的负责代表被派到克里木方面军去的。

您要我们用兴登堡一类的人来替换科兹洛夫。您不应该不知道，我们可没有预备什么兴登堡。您在克里木的事并不复杂，您自己满可以对付得了。如果您不把强击航空兵用在次要方面，而是对准敌人的坦克和有生力量，敌人就不会突破方面军，坦克也不会通过了。在克里木方面军呆了两个月，用不着成为兴登堡，也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13页

关于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连的指示

(1942年7月4日)

1. 仍由基洛夫厂生产 KB 型坦克，日产 5-6 辆、月产 150 辆。
2. 从 1942 年 7 月 5 日起停止 T-60 型坦克的生产。
3. 生产 1800-2000 辆 T-34 型坦克。
4. 为各旅配备轻型美式坦克代替 T-70 型坦克。
5. 在第 37 厂和第 264 厂组织生产 T-34 型坦克。在基洛夫厂也是如此。
6. 在 7 月份……
7. 组建：

在斯大林格勒组建 6 个连	(T-34 型坦克补充连
在高尔基市组建 5 个连	共组建 20 个连
在新塔吉尔组建 9 个连	在沃罗涅日以东)
8. 暂不给梅列茨科夫坦克。
9. 在 7 月份给工厂 1350 辆 T-34 型坦克、700 辆 T-70 型坦克。
10. 给费多连科军队集群 9 个补充连，每连有 10 辆 T-34 型坦克。
11. 各坦克军要有预备的坦克。
12. 7 月份第 183 厂要生产 600 辆坦克，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要生产 420 辆，第 112 厂要生产 250 辆，第 174 厂要生产 50 辆，高尔基汽车厂要生产 450 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 年版第 440-441 页

关于修改“指环”计划的指示

(1942年12月28日)

你们提出的“指环”计划的主要缺点是，主要突击和辅助突击向着不同方向实施，根本没有形成合力，战役能否取胜因此值得怀疑。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认为，你们在战役的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切断并歼灭被围敌军的西部集团，而另一个突击应与主要突击相向，这两个突击在卡尔波夫斯卡亚站地域会合。

此外，还应当组织第66集团军经奥尔洛夫卡向红十月村方向实施突击，而第62集团军则实施与这一突击相向的突击，目的是两个突击能够会合并从而切断工厂区的敌人与敌主要集团的联系。

大本营命令根据上述内容修改计划。大本营批准你们提出的战役发起的时间：战役第一阶段应于发起后的5-6天结束；战役第二阶段计划应于1月9日前通过总参谋部送呈，计划中应考虑到第一阶段的战果。

签名：约·斯大林

格·朱可夫

1942年12月28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68页

给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的指示

(1943年1月4日)

第一，敌人从北高加索撤退，烧毁仓库并炸毁道路。马斯连尼科夫的北军队集群变为预备集群，任务是乘胜追击敌人。把敌人撵出北高加索对我们不利，对我们更有利的做法是拖住敌人，以便通过黑海军队集群的突击包围敌人。因此外高加索方面军的作战重心转移到黑海军队集群地区，而这一点无论马斯连尼科夫还是彼得罗夫都不明白。

第二，立刻把步兵第3军从北军队集群地区运走，并火速运往黑海军队集群地区。

马斯连尼科夫可以把他作为预备队的第58集团军投入战斗，这会为我方的顺利进攻带来很大好处。

黑海军队集群的第一项任务是前出至季霍列茨卡亚，从而阻止敌人向西运送装备。第51集团军，可能还有第28集团军会在这方面支援您。

您的第二项任务也是主要任务是从黑海军队集群抽出一支强大部队占领巴泰斯克和亚速，从东面插入罗斯托夫，从而堵住敌人北高加索军队集群，将其俘虏或歼灭。南方面军左翼——任务是前出至罗斯托夫以北的叶廖缅科会在这方面支援您。

第三，命令彼得罗夫如期发动进攻，一个小时也不要拖延，不要等待预备队的到来。彼得罗夫老是在防御，没有太多的进攻经验。要给他讲明白，他应该珍惜每一天和每一个小时。

第四，立即前往黑海军队集群地区并保障本训令的落实。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31页

希特勒失去了所有经验丰富的将军

——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943年2月4日)

1943年2月4日15时开始于尤苏波夫宫

丘吉尔对向他提供的方便表示感谢。

斯大林答道，这是待客的天职。因为时间很少，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不能作得很好。

丘吉尔问，前线怎么样。

斯大林答道，不坏。

丘吉尔宣布，英国集团军群和美国第9集团军将于2月8日一起在北段转入进攻。

斯大林说，这很好。应当使德国人无法将其部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

丘吉尔说，马歇尔将军将在今天的会议上阐明盟军的西线计划。他（丘吉尔）也希望亚历山大^①元帅谈谈意大利战场的形势。

斯大林说，现在德国人已经丢掉了西里西亚煤区，如果他们再丢掉鲁尔，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失去自己的两个主要产煤地的话，德国就会缺煤缺粮，在军事上战败以前，内部就可能崩溃。

丘吉尔答道，这是可能发生的。

斯大林说，目前德国人没有现成的预备队。德国人已经在东线建成坚壁，但这是用很不顽强的后备军兵士守卫的。

① 亚历山大，时任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官。

丘吉尔说，他所赞同的是，德国人没有现成的预备队。说到这里，他（丘吉尔）想问一下，关于伦德施泰特^①的进攻，斯大林元帅有什么考虑。

斯大林答道，伦德施泰特的进攻是很愚蠢的，他是在德国精疲力尽的时候发起进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还自以为是一大强国，然而，它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强国了。为了实施新的战役，需要预备队，而德国并没有预备队。

丘吉尔说，希特勒准备了蜘蛛网，但却忘了蜘蛛。丘吉尔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

斯大林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在他那儿，博克^②聪明得多。如今希特勒失去了所有经验丰富的将军。

（接下来谈话在挂着各战场地图的房间里进行。）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对意大利战场的形势作了说明。

斯大林说，德国人不会在意大利战场实施进攻。所以，应当在意大利战场留下部分兵力用于防御，而将其余部分通过亚得里亚海调走，以便在奥地利地区同红军实行联合进攻。

亚历山大回答说，目前他没有闲置兵力实施这一战役。此外，他认为，目前着手实施这一战役为时已晚。

① 伦德施泰特，时任德军西线部队最高司令官。1944年12月16日，他指挥德军在西线的比利时境内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

② 博克，德国陆军元帅，1942年7月前指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在苏德战场作战。



(145)

三巨头会

关于五个方面军坦克部队建制的指示

(1943年5月14日0时10分)

1. 6月5日前恢复坦克第3集团军。
2. 使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这五个方面军部队的坦克数量达到6000辆。
3. 分别为上述五个方面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配备15个加油站。
4. 起草向人民委员提交的关于为每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配备两个坦克团的报告和建议。
5. 在三个近卫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三个机械化军，每军各有五个坦克团。
6. 授予坦克第12军、坦克第15军和坦克第179旅近卫军称号。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441页

关于被围希特勒军队突围一事

——致朱可夫的电报

(1944年2月12日)

致尤里耶夫^①同志

敌科尔孙集团之所以能从申捷罗夫卡方向的斯捷布列夫地域突围，是由于力量薄弱的第27集团军没有及时得到加强。

不曾采取果斯措施执行我的指示——首先歼灭斯捷布列夫突出部的敌军，因为敌军最可能试图从这里突围。

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左翼和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右翼拥有足够的兵力和物力来阻止敌军突围并消灭其科尔孙集团。

签名：斯大林、安东诺夫

1944年2月12日16时45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528页

① 朱可夫的化名。

苏美之间

要搞清楚“无条件投降”的含义

——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28日）

斯大林对罗斯福说，盟国方面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刺激着敌军人员，迫使他们残酷无情地进行作战，因为无条件投降对他们似乎是侮辱性的。所以，他斯大林希望最好能知道罗斯福是如何考虑搞清楚“无条件投降”含义问题的，也就是要确定，多少数量的军队和运输设备等应当向敌人透露，然后在公布条件时又不把它们称作无条件投降。

罗斯福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确切的回答，转而谈起他青年时代在德国怎样学习和生活。

艾登坐在离斯大林不远的地方，注意地听着他所提的问题。

三国首脑午餐会时的谈话记录

(续^①)

(1943年11月30日)

1943年11月30日13时40分开始

.....

谈完共同的话题以后，丘吉尔说，俄国拥有通向不冻港的出口处是必要的。

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认为这是应当的，但他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晚些讨论。

丘吉尔指出，从前英国人反对俄国人拥有通向暖洋的出口处，但是现在英国人对这点没有任何异议。

斯大林说，如果现在没有异议，那就应当重新考虑修改土耳其海峡制度^②。像俄国这样的大国竟然被锁在黑海里，没有出海通道。对

① 本篇是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9卷第47-48页《午餐时的会谈》的后半部分。该部分原没有公开，后由俄罗斯有关解密档案公诸于众。

② 土耳其海峡制度是由“蒙特勒公约”确定的。1936年6-7月，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一些黑海国家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海峡重新设防和军舰通过的问题。与会各国通过的“蒙特勒公约”公约规定：无论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可自由通过海峡。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必须是1万5千吨以下的水面舰只，且停留期不能超过21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为参战国，是否准予通过海峡，由土耳其酌情决定。同时规定，解散原海峡国际委员会，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区设防。

海峡制度加以调整的，起初是色佛尔条约^①后来是洛桑条约^②，最后是在蒙特勒缔结的公约。那时英国人老是想把俄国卡死，但是如果现在英国人不想再扼杀俄国，那末，就必须使海峡制度变得方便些。

丘吉尔说，他同意这一点，但是，目前最好使土耳其参战，所以，他现在不想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这当然是对的，他并且补充道，还有时间讨论港口问题和海峡问题。

丘吉尔说，他赞成苏联舰队将自由地在一切海洋航行。

斯大林问，按照丘吉尔的意见，能为俄国在远东做什么？

丘吉尔说，斯大林元帅熟悉开罗会议公报并且说他赞同这份公报。

斯大林说，仅仅给他看了公报，并问他对这份公报是否表示异议，他则回答没有异议。其中之一是，他赞成建立独立的朝鲜，并且把福摩萨和满洲归还中国。当然，俄国人本来可以对这份公报提出某些补充，但那是在他们积极参加远东军事行动以后。

斯大林说，苏联还被封闭在远东，因为苏联船只从任何港口都出不去，它们必须或经关门海峡或经对马海峡，而这些海峡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日本人关闭。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与土耳其于1920年8月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订了“色佛尔条约”，除了对土耳其进行领土分割外，还规定海峡地区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撤除一切防御工事，不论平时和战时，海峡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开放。条约使土耳其丧失了对海峡地区的主权和管理权。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胜利后，该条约被“洛桑条约”所取代。

② 实际应是1923年7月在瑞士签订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该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船只不论平时或战时均可自由通过海峡（只要土耳其为中立国家）；如果土耳其参战，中立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其他国家军舰是否可以通过，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海峡地带实行非武装化，由黑海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加以监督。

罗斯福说，为此他想谈谈他有关自由港的想法。其中，在远东，大连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港口。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是，中国可能对这一点不满。

罗斯福说，中国将完全同意这一点。

斯大林说，除了摩尔曼斯克，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俄国惟一的不冻港，但这个不冻港，用起来不方便，因为既没铁路，又没其他良好的道路，所以，难以有效地把它当作港口利用。

罗斯福问道，大连是不是不冻港？

斯大林答道，大连是不冻港，旅顺口同样是不冻港。他补充道，但旅顺口作海军基地比作商港更合适。

丘吉尔说，俄国必须拥有通往暖洋的出口处，那是个完全明显的事实。他随后说，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那些已经感到非常满意并且毫无所求的国家手中。

斯大林指出，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管理世界的那些国家手中。

丘吉尔说，这话完全正确，并且继续说道，假如任何国家对什么事情有所不满，那末，这总是麻烦之源。所以，世界的命运必须集中掌握在强大国家手中，这些强国感到完全满意，也没有再把任何东西弄到手的愿望。丘吉尔说，我们三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在我们之间达成协议后，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完全满意的，而这是最主要的。

斯大林说，如果随后的商谈能顺利地进行，我准备再呆1天，不是12月2日而是3日启程。

丘吉尔说，这就很好。既然他们力求取得很大成绩，要是能就所有问题完全达成协议，那就很好。为了做到这点，再花一天时间是很值的。

罗斯福说，他同样欢迎斯大林元帅再呆一天的决定^①。但是，他罗斯福认为，军事参谋部可先去开罗，以便着手深入研究那些已经在

这里通过的决定。

丘吉尔说，还应考虑会议公报。公报不应太长，然而，不应给任何人以声称这次会晤一无所获的依据。

斯大林说，这额外的一天也可用来拟定公报。他问，今天下午4点的会议将讨论哪些问题？

丘吉尔说，能否向会议宣布，“霸王”行动开始日期已经确定，并将在最近任命统帅。之后就可以认为军事问题已告了结。至于目前（苏、英）外长和霍普金斯所商议的政治问题，丘吉尔认为，也应在小范围内予以讨论。所以，他提议明天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两国外长和霍普金斯会议以便讨论这些问题。

斯大林说，他同意这项建议。

① 12月1日，哈里曼通知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请求转告斯大林，他看了天气预报后，认为必须在12月2日离开德黑兰，否则就要冒几天内走不了的风险。他对缩短在德黑兰的一天日期感到遗憾。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同罗斯福的会谈记录

(1943年12月1日)

1943年12月1日13点20分开始。^①

罗斯福：在美国，也许会有人提出有关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被纳入苏联的问题，而我推测，世界舆论将会认为，应当在将来某个时候让这些共和国的人民以某种方式对这个问题表明意见。所以，我希望斯大林元帅注意这一愿望。我个人毫不怀疑这些国家的人民将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正如他们在1940年所做的那样。

斯大林：俄国革命以前，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没有自治权。那时候沙皇同美国和英国结盟，谁也没有提出这些国家脱离俄国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

罗斯福：问题是舆论不了解历史。我想同斯大林元帅谈谈美国国内的情况。明年美国将面临选举。我不想提自己当候选人，但是，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话，那末，也许我将被迫这样做。美国有600万-700万波兰裔公民，所以，我将是一名讲究实际的人，不想失掉他们的选票。我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即我们必须重建波兰国家，并且我个人对波兰边界从东向西移动一直移到奥得河，没有异议，然而，从政治上考虑，目前我不能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赞同斯大林元帅的主意，我希望，他理解，为什么在这里，在德黑兰，或者甚至明年春天，我难以公开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

① 这是在政府首脑的早餐会和圆桌会议期间的间隙时间进行的会谈。

斯大林：经罗斯福解释后，我对此已经理解。

罗斯福：在美国，也有一定数量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我知道，在过去和不久前，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而且当俄军重新进入这些共和国的时候，我并没有就此要同苏联交战。然而，舆论可能要求在那里举行公民投票。

斯大林：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表达其意愿，那末，我们将有不少场合，给这些共和国人民以表达其意志的机会。

罗斯福：这对我是有好处的。

斯大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共和国里，必须在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举行公民投票。

罗斯福：当然不是这样。在适当时机宣布，将在这些共和国按时举行选举，这可能是有益的。

斯大林：当然，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我想知道，关于明天启程的问题最终决定了吗？

罗斯福：人们向我报告，明天将是个好天气。我剩下的问题不多了，我们今晚可以讨论。明天早晨，我打算启程。

现在有两个我们没有讨论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我已经对斯大林元帅谈过了，那就是关于创建战后世界组织的问题。

斯大林：直到会议结束，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并认为最好建立一个世界组织。

罗斯福：我想，现在决定创立世界组织的问题为时尚早，但是，我认为，应当研究一下有关警察力量的问题。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懂得世界组织的活动将取决于三大国。

莫洛托夫：我想补充的是，按照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莫斯科会议已经通过决议，那就是：三大国政府之间将交换意见，以便使创立世界组织的建议和保证四大国在该世界组织中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具体化。

罗斯福：我们是否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

斯大林：我没有异议。

罗斯福：如果我们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的话，我就准备这样做。我想请问斯大林元帅，他是否已经阅读了我交给他的关于对日战争的文件。

斯大林：我已经读了关于日本的文件，但是还没来得及加以研究。

雅尔塔会议开幕前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4日)

1945年2月4日16时

开始于利瓦吉亚官

罗斯福表示，现在，当他在克里木看到德国人所进行的没有理性的破坏时，非常希望比以前加倍地消灭德国人。

斯大林说，德黑兰会议以后，事情发展得比较好。

罗斯福说，这无疑是对的。他（罗斯福）的一位随员同他争论，先拿下柏林还是先拿下马尼拉。

斯大林说，据他看，马尼拉将比柏林早拿下。目前那里事情进展良好。

罗斯福宣布，日内还将有2万名美军士兵在吕宋岛^①登陆。目前总共有15万部队在那里。现在美国人已经学会实施登陆战役了。

斯大林答道，登陆战役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盟国已经出色地掌握了这些战役艺术。

罗斯福说，他在利瓦吉亚^②的感觉很好。当他卸任以后，他想请求苏联政府把和瓦吉亚卖给他。他非常喜欢森林。他将在利瓦吉亚附近的山上种上大量的树木。

斯大林说，克里木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地方，这里许多东西还需要发展。

① 吕宋岛，菲律宾最大的岛屿，首都马尼拉就位于该岛。

② 利瓦吉亚，雅尔塔西南3公里处的海滨疗养地。

罗斯福说，德国人在克里木进行的没有理性的残酷的破坏，使他感到惊讶。

斯大林答道，希特勒分子没有丝毫道德。他们憎恨人家用双手创造的东西。他们简直是极其残忍的人。

罗斯福说，他同意斯大林元帅所说的，德国人搞的各种破坏，这是他们的暴虐狂的杰作。重要的是，要把德国人从其他地方，其中包括从克里木运走的一切东西夺回来。斯大林元帅将会看到，总起来讲，现在他（罗斯福）对德国人的态度要比在德黑兰会议时更为严厉。

斯大林答道，现在我们大家都变得更严厉了。德国人使宝贵的血流得太多了。

罗斯福说，动身来这儿以前，他见过荷兰女王的女儿。她告诉他，德国人破坏了荷兰的海堤，荷兰的沃土一下子就被含盐的海水淹没掉了。为了恢复这些土地的肥力，需要6年的工夫。他（罗斯福）认为，作为补偿，应当把德国的土地永远给荷兰人，或者至少到上面所说的荷兰土地恢复了肥力时为止。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对的。德国人是真正的野蛮人。

斯大林问，马歇尔将军是否同总统一起来了。

罗斯福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马歇尔将军对西线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

斯大林问道，盟军是否打算在西线实施进攻。

罗斯福答道，盟军肯定将实施进攻。再过4天，也就是2月8日，将实施第一次进攻。然后，2月12日将开始实施助攻，而在3月份将发动大规模进攻。马歇尔将军将在今天的会上报告盟军的西线计划。罗斯福说，他想对斯大林元帅提个请求，即允许苏联军人和盟国军队代表在本次会议期间讨论军事问题。这一请求已经写入莱希海军上将为他（罗斯福）撰写的备忘录里。他（罗斯福）想把这份备忘录交给斯大林元帅。

斯大林答道，今天，红军副总参谋长将在会上报告苏德战场的形势。

罗斯福说，他将很高兴地听这个专题报告。

斯大林说，德国人的煤来自两个产地——西里西亚和鲁尔。如果德国人丢掉了这两个地区，他们就没有煤了。此外，目前德国人缺粮。如果使德国人失掉煤炭，那末，煤和粮食不足将成为德国内部崩溃的原因。

罗斯福答道，这是可能的。

罗斯福说，从西面和东面实施进攻的盟军相互间距离这么近，最好让艾森豪威尔和正在推进的苏军司令部直接发生联系。

斯大林说，当然，这是最好的了。

罗斯福问，苏联各集团军是否已经在奥得河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

斯大林答道，苏军已经在5-6处地方越过了奥得河，目前，正为扩大奥得河左岸登陆场进行激战。

罗斯福说，在莱茵河上，盟军没有桥头堡。强渡莱茵河的困难在于这条河在冬季不冰冻。只好在荷兰，或者在水流量很强的南方强渡莱茵河。

斯大林说，苏联军人怕冰，在强渡江河时，宁愿那里完全没有冰。

罗斯福问，戴高乐是怎样让斯大林喜欢的？

罗斯福说，他记得，两年前，他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时，吉罗^①将军正在那里。

曾决定把戴高乐请到卡萨布兰卡来。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说，法国需要一位精神领袖，500年前的贞德^②就是这样一位精神领袖。戴高乐将军认为自己就是一位精神领袖。第二天，他（罗斯福）再次

① 吉罗，时为法属北非军政当局领导人。

② 贞德（约1412-1431年），法国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

同戴高乐谈话并请他谈谈，法国人怎样帮助盟国把德国人赶出法国。戴高乐答道，吉罗将军将是福煦^①，而他戴高乐则是克列孟梭^②。罗斯福说，目前他帮助戴高乐装备了8个法国师。

斯大林答道，当然，这是应当做的。

罗斯福说，戴高乐不希望把德国领土并入法国，而只希望参与对莱茵地区的占领。

斯大林回答说，他在莫斯科同戴高乐会谈时，后者说的是另一回事，戴高乐说，法国的天然边界在莱茵河。这一点，当时斯大林已经通知了罗斯福。

罗斯福说，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英国人是些古怪的人。他们想吃大馅饼，也希望把这只大馅饼整个地拿在他们手里。

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

罗斯福说，关于让法国在德国拥有占领区的问题，本次会议是应当讨论的。罗斯福补充说，当然，这只是考虑对法国表示好意。

斯大林同意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① 福煦（1851-1929年），法国元帅，在一战中接受德军投降。

② 克列孟梭（1841-1929），曾任法国总理。

就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5年2月8日)

1945年2月8日15时30分

开始于利瓦吉亚官

罗斯福说，如果斯退丁纽斯赴南美洲前2-3天前来莫斯科的话，他将很满意。他（罗斯福）本人希望逗留在莫斯科。

罗斯福说，他今天想谈一些民政和军事事务。他想请求斯大林元帅给美国空军提供布达佩斯地区的机场。此外，他请求准许美国专家就地研究美国空军对东欧和东南欧实施轰炸的效果。

（罗斯福把载有这些请求的信函交给斯大林。）

罗斯福说，美国人打算在日本以南的波柠群岛（小笠原群岛）和福摩萨（台湾）附近诸岛建立空军基地。他认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罗斯福）不希望让部队登陆日本，如果不登陆的话。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才会让部队登陆日本。日本人在列岛上有400万大军，登陆势必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轰炸，那就能指望把所有一切都摧毁，这样，就不用在日本列岛登陆，从而可以拯救很多生命。

斯大林答道，他对美国人将在共青城^①拥有自己的空军基地一事不持异议。他（斯大林）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在共青城有个基地。可在那里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②提供基地。

① 共青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城市，阿穆尔河港口。

②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城市。

至于堪察加半岛，在那里向美国人提供基地只能排在最后。目前日本领事还在堪察加。曾经想要他离开，可他没有离开。此外，新尼古拉耶夫斯克^①或共青城离日本较近。

罗斯福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装运空军基地补给品的船只要从美国航行到苏联远东。

斯大林说，总统在信中说，必须保持供应线的畅通。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罗斯福答道，仅仅是指补给船能行驶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斯大林说，这一切都很好，但他希望知道，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怎样。这里指的是他（斯大林）在莫斯科同哈里曼谈过的那些政治问题。

罗斯福答道，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将交给苏联。至于暖水港，他（罗斯福）在德黑兰曾提议，苏联可获得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但是，他（罗斯福）暂时还没有同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他（罗斯福）认为，苏联利用这个港口，其办法有二：一是建为受国际委员会监督的自由港；二是中国人把这个港口租借给苏联。但是，后一种办法同香港问题有关。他（罗斯福）之所以希望避开租借，其原因在于，他期待着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然后香港可以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自由港。丘吉尔对此可能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如果苏联在北方获得了港口租借权，也就难以说服丘吉尔。所以，他（罗斯福）认为，把建立开放性港口作为第一步更为妥当。

斯大林问，关于保持外蒙古现状问题，总统有什么考虑？

罗斯福答道，他还没有同蒋介石谈起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

斯大林问，关于（苏联）租借中东铁路问题，总统有什么考虑？

^① 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的旧称，位于新西伯利亚州鄂毕河畔。

罗斯福答道，他暂时没和蒋介石谈这件事，但是，他相信可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要使这条铁路为苏联所用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俄中两国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对铁路实行监督。

斯大林说，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的话，那末，苏联人民将会明白，苏联为什么参加对日战争。所以，重要的是有一项由总统、丘吉尔和他（斯大林）签署的文件，上面写上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在那里人们能够保守机密。

罗斯福答道，对保守雅尔塔的机密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只是对中国人可能有些疑问。

斯大林答道，一旦（我们）可从西线腾出 20-25 个师，并把这些师调到远东，就可以通知中国人了。宋子文将于 4 月底来莫斯科，他（斯大林）很希望会见他。

罗斯福说，很高兴，斯大林元帅将接见宋子文。

罗斯福说，还有一个问题，他想同斯大林元帅谈谈，这就是朝鲜问题。

斯大林说，他想首先回答苏联怎样利用远东不冻港的问题。他说，对苏联来说，国际监督是可以接受的。

罗斯福表示感谢，并转入朝鲜问题，他说，在德黑兰的时候他谈到过对朝鲜实行托管。现在的问题是，谁应成为托管者。他（罗斯福）打算邀请中国、苏联和美国充当托管者。

斯大林问，这是不是保护制度？

罗斯福答道，决不是，他解释道，在朝鲜人对自治还没有做好准备时，托管者将帮助朝鲜人管理他们的国家，也许，为期 30-40 年。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邀请英国人充当朝鲜的托管者。

斯大林说，应当确定托管期限。

罗斯福答道，美国人在菲律宾获得了经验，需要 50 年时间让菲

律宾人做好自治的准备。对朝鲜来说可能需要较短的期限，或许是20-30年。

斯大林问，是否必须在朝鲜驻兵？

罗斯福作了否定的回答。

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他不反对实行总统的建议。托管期限则愈短愈好。

罗斯福问，对英国人怎么办？

斯大林答道，如果不邀请英国人，他们会感到受了委曲。

罗斯福说，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强求参与托管。

莫洛托夫指出，英国人离朝鲜很远。

斯大林说，如果丘吉尔知道我们不打算邀请他的话，那末他会阻挠我们的。他认为，可以邀请英国人参加。

罗斯福说，开始时将有3名托管者，以后，如果英国人叫嚷的话，可以邀请他们参加。

斯大林说，他同意。

当回到有关美国人使用布达佩斯地区空军基地的问题时，**斯大林**说，他已经指示军方，给美国人提供布达佩斯地区的空军基地。他还下了指示，满足总统关于研究轰炸结果的第二项请求。

罗斯福说，对于中国，他正竭尽全力以不让它灭亡。

斯大林答道，中国将生存下去，但是，中国需要一些新的领导人。他们必须聚集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人中间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他（**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不提拔他们。

罗斯福说，他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罗斯福说，还有一个问题，他想同**斯大林**元帅交换一下意见。这指的是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个落后国家。居住在印度支那的人同爪哇和缅甸居民相似。在法国的控制下，印度支那没有任何进步。中国不想夺取印度支那。他（**罗斯福**）希望对印度支那实行托管。英国人则想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人。

斯大林答道，法国没有确保印度支那的防卫。因此，英国人丢失了缅甸。他们不希望第二次失去缅甸吧？他（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加以研究，总统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

罗斯福说，戴高乐已经请求他提供船只以把法国军队运到印度支那。

斯大林问，戴高乐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军队呢？

罗斯福说，戴高乐确信，只要有船，他就能找到军队。但是，他（罗斯福）回答戴高乐：他暂时无法为他找到船只。

哈里曼问，让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问题是否合适？

罗斯福说，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将军魏德迈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

斯大林答道，使这些力量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这很好。斯大林说，他想就吨位问题问一下罗斯福。昨天，斯退丁纽斯对莫洛托夫说，美国准备在战后向苏联提供部分吨位。这话对吗？

罗斯福答道，他认为，战后美国的吨位将过剩。现正在采取措施，以非商业性考虑的20年贷款形式把部分吨位提供给苏联。应付费将相当于船只造价，减去交付前已磨损部分。

斯大林答道，这好办，因为苏联吨位不足。

罗斯福说，莱瑟斯勋爵^①喜欢这个主意。

斯大林说，这是美国另一项妙不可言的措施。租借法，这项美国人的新发明，在这场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以前盟国获得资助要有些周折，而现在，按照租借法，盟国获得武器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如果没有租借法，要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

① 莱瑟斯，时任英国军事运输大臣。

柏林会战前夕 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电报

(1945年4月1日)

您1945年3月28日的来电已收到。

1. 您关于贵军与我军会合以分割德军兵力的计划与苏联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2. 同意您提出的贵军与我军会合地点应为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的建议。苏联统帅部认为，这也应是苏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3. 柏林已失去其已往的战略意义，因此苏联统帅部打算将非主力部队派往柏林。

4. 苏联统帅部同意贵军与我军在维也纳、林茨、雷根斯堡的某些地区会合以建立第二辅助包围圈的计划。

5. 苏军大约在5月下旬开始主要突击。对维也纳、林茨地区的辅助突办已在实施。但该计划会因情况的变化（如一旦德军撤退期限缩短）而改变。许多事情也取决于天气状况。

6. 总参谋部正在研究有关改善我军各部队之间通讯联络的问题，相关决定将另行通知。

7. 东线敌军的情况已摸清，敌军人数在逐渐增加。除党卫队第6坦克集团军外均向东线集结，从意大利北部抽调了3个师，从挪威抽调了2个师。

斯大林元帅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2000年第3期

波兰问题

关于旅美波兰侨民对苏联的态度

——与奥尔列曼斯基^①的谈话记录

(1944年4月28日)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参加会见。

奥尔列曼斯基和斯大林同志问候之后说，他首先想代他的妹妹向斯大林同志转交一份小礼物。然后他打开他的手提箱，从箱中取出两个美式鹰徽状的书夹奉送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并说鹰徽不像鹰。它们看上去不像波兰鹰徽。它们更像鸽子。

奥尔列曼斯基说，这是真正的美国鹰徽。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讲述美国波兰侨民的情况。他会向斯大林同志道出真实的情况。情况目前相当困难。波兰人的组织和波兰神职人员有反苏情绪。他（奥尔列曼斯基）来苏联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怎么分化他们。在这一方面他（奥尔列曼斯基）在美国成功地做了自己的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向各界波兰侨民的代表做过讲演。他们支持他的行动。在美国的波兰人很多。例如，在底特律就有33万人。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可能到那里去，向他们做讲演，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在美国的波兰人是一支很大的力量，那里有500万波兰人。仅芝加哥一地就有50万波兰人。波兰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很大作用。因此，罗斯福在对波兰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时不得不慎之又慎。他（奥尔列曼斯基）想把旅美波兰侨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① 奥尔列曼斯基，美籍波兰人。

从而为罗斯福就波兰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奠定基础。这样，罗斯福就能与俄国把一切事情办好。现在，在美国的波兰人大谈什么苏联对待在苏联的波兰儿童和波兰成年人不好。他（奥尔列曼斯基）来到这里后已经见到了波兰儿童和波兰人。他认为，波兰人民应当就俄国过去和现在给予波兰人的一切向俄国和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是吃人的野兽。

奥尔列曼斯基笑了，他说他想看的一切都看了。他和莫洛托夫谈过，对莫洛托夫向他说的一切都满意。他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旅美波兰天主教教徒反对苏联的最大理由，是俄国似乎打算消灭波兰的天主教会。他知道这不是事实，他回到美国后将向波兰人正确地介绍实际情况。如果他把旅美波兰神职人员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么，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会影响到波兰本国神职人员的思想，当红军进入波兰后他们会和红军合作。他想知道怎么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他能够胜任，尽管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关于苏联人的流言五花八门。说他们想消灭宗教。这些流言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存在初期，俄国东正教教会人士和苏维埃政府人士之间发生过一场残酷的斗争。当时，1917年10月政变后俄国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新政府，东正教教会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宣布苏维埃政权大逆不道，并号召人们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

奥尔列曼斯基指出，政教分离是件很好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中有一条就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苏维埃政权刚一成立我们就立志贯彻这条规定。但是，东正教教会人士的叛乱使我们无法贯彻这条规定，当教会宣布要把苏维埃政权扫地出门后，政府不得不应战。宗教界和政府人士之间由此产生了隔阂。这是对德战争前的情况。对德战争开始后，人和事都发生了变化。战争消除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歧。宗教界人士放弃了暴

乱立场，苏联政府也放弃了对教会兵戎相见的立场。

奥尔列曼斯基说，这一点他完全明白。

斯大林同志说，对于波兰，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更不用说干涉它的宗教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我们苏联人希望波兰有什么呢？我们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为了与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第一次进攻法国是在1870年，那次德国之所以打赢战争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中立国。1914年德国再次进攻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输了，因为到战争结束之前许多国家就已不再坚持中立立场，而是反对德国了。看来德国侵略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了。第一次间隔是40-42年，如果从1918年算起至1939年，第二次间隔是21年。他（斯大林同志）认为，15年左右德国能够东山再起。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考虑怎么结束现在的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我们有可能胜利地结束，而且应当考虑再过20年当德国恢复元气后会有什么情况。为了不让德国有可能作为侵略者东山再起，这就是俄国与波兰结盟绝对必要的原因。自拿破仑时代起，在140-150年中俄罗斯三次遭受入侵。拿破仑进犯是第一次入侵。上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入侵了俄罗斯，最后一次是他们现在的入侵。这三次都是经波兰入侵的，由此可见，波兰似乎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走廊。不论这些侵略者是遭到失败还是取得胜利，波兰人都蒙受了苦难。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就像俄国人讨厌大批侵略者经过波兰进军一样，波兰人讨厌把波兰当作走廊。因此，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波兰和俄国结盟，那么由此受益的只有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而受损失的是德国侵略者。他（斯大林同志）可以向奥尔列曼斯基举格伦瓦尔德会战的实例加以说

明，这次会战中各斯拉夫民族曾联合起来反对日耳曼条顿骑士团。那次日耳曼人被联合起来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打败了。他（斯大林同志）认为，需要使格伦瓦尔德会战政策在广泛的基础上复生。这是他的夙愿。他（斯大林同志）问奥尔列曼斯基对苏联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还有什么疑问，他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奥尔列曼斯基回答说，他个人没有任何疑问。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波兰与苏联、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引起了猜疑。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俄罗斯与波兰、波兰与乌克兰以及波兰与白俄罗斯，只有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不占有别国领土的条件下才能搞联盟。他（斯大林同志）觉得，如果这些国家不相互提出领土要求，它们以后就能搞好友谊。当年苏联政府提出关于寇松线的建议，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他（斯大林同志）应当指出，当时，寇松线是在没有征得苏联政府同意，违背它的意志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条边界线是在召开巴黎和会时炮制的。1918年开始炮制，1919年完成，它是这一年对外宣布的。在凡尔赛的波兰代表团没有同意这条边界线，苏联政府也没有同意这条边界线。没有一个不可轻视、举足轻重的独立波兰，将来就不可能遏制德国侵略者。切不可让波兰成为孤立的波兰，而应让它与俄国和西方盟国修好。至于波兰西部边界，必须首先和波兰人士达成一致意见。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都问过他（斯大林同志）。他（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都说，我们的意见是波兰西部边界应当沿奥得河走，甚至奥得河略西一些。最好把斯德丁港划入波兰，这是个很好的港口，也许应把布雷斯劳也划入波兰。罗斯福问怎么达到这一目的。他（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必须打败德国，到那时我们帮助波兰办成这件事。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他（斯大林同志）陈述的这一番话不是我们不切实际的愿望。我们将为波兰获得这些土地而奋斗。

奥尔列曼斯基表示赞同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并补充说：确实需要为此而奋斗。如果俄国与波兰建立友谊，那么德国人就不会东进。那样的话他们会西出。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也不能让德国人西出，因为俄国和波兰也同西方国家英国、法国结盟。

奥尔列曼斯基说，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让逃离波兰、现在住在伦敦和纽约豪华宅院和寓所里的富翁及贵族进入波兰。如果他们跑回波兰，他们就会把那里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就会煽动波兰人民对苏联采取敌视行动。问题在于波兰人民的领导人不好。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过去，总是回过头去看他们的老皇历。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民族是个好民族，波兰人是毫不畏惧的战士。至于说到奥尔列曼斯基所说的波兰贵族和富翁，他（斯大林同志）觉得，波兰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不会让他们进入自己国家的。波兰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德国占领期间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他们能够忍受自己悲惨的生存条件简直是奇迹。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们当然不会让那些给波兰招来现在这些苦难的人进入波兰。据他（斯大林同志）所知，波兰人民的情绪是这样的。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下定决心分化旅外波兰侨民集团。他很高兴与斯大林会见。他一回到美国就积极着手工作，并将一切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不过，他已向莫洛托夫说过，他不希望现在大肆宣传他在这里逗留一事。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报纸已经报道了奥尔列曼斯基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例如《纽约先驱论坛报》。

奥尔列曼斯基称，他希望在回到美国后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再公开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到那时也可以公开他与斯大林的照片。他（奥尔列曼斯基）想知道，他能否与斯大林同志一起照张相。

斯大林同志说同意照相，并招呼摄影师照相。他问奥尔列曼斯基是否同意明天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今天会见的消息。

奥尔列曼斯基称，既然美国报纸报道了他在苏联逗留的消息，那么现在可以发表已经提议的报道了。

奥尔列曼斯基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他（奥尔列曼斯基）最好不要探望在苏联的波兰军，而是返回美国，参加波兰代表大会。他（奥尔列曼斯基）认为，探望波兰军要用10天时间，他会赶不上代表大会。

斯大林同志说，奥尔列曼斯基可去探望波兰军，也许该向他们祝福。为此将为他提供专列。去波兰军和返回莫斯科用不了5-6天。奥尔列曼斯基可于明天12时乘专列从莫斯科出发。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就照斯大林的忠告去探望波兰军。

奥尔列曼斯基请求让美联社代表明天上午8时到他这里来，他打算向他通报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事会办妥的。

奥尔列曼斯基问，他可否参观斯大林格勒，因为他回到美国后人们会问，他是否到过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同志回答：当然可以，他的斯大林格勒之行可以安排。

奥尔列曼斯基表示，他回到美国后将向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或者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同时，他还请求允许他到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听取他所关心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对奥尔列曼斯基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他当然可以到我们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听取他所关心的消息。

奥尔列曼斯基告别时说，斯大林同志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创造了奇迹，他会健康长寿的。他（奥尔列曼斯基）很幸福，因为有机会与斯大林见了面。

斯大林同志感谢奥尔列曼斯基赠送的礼物，并且请求奥尔列曼斯

基对他的妹妹赠送礼物转达谢意。

奥尔列曼斯基说，礼物很轻，但它是奥尔列曼斯基的妹妹诚心诚意赠送给斯大林的。他（奥尔列曼斯基）希望战后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来这里，他想请斯大林答应接见她们。

斯大林同志答应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

记录 B. 巴甫洛夫

1944 年 4 月 28 日 22 时于莫斯科

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 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记录

(1944年8月9日)

莫斯科

1944年8月9日21时30分

出席者：波兰方面——格拉勃斯基、罗麦尔、姆尼舍克；
苏联方面——莫洛托夫同志、翻译帕甫洛夫。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感到十分荣幸，斯大林元帅不顾自己工作繁忙，能在他（米科拉伊奇克）离开前接见他。昨天莫洛托夫就波兰流亡政府代表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谈判问题接见了她（米科拉伊奇克）。他（米科拉伊奇克）希望尽快到伦敦去，以便将这次谈判报告他的同事，因为他没有把谈判进行到底的全权。他（米科拉伊奇克）相信，伦敦波兰政府将与委员会合作，因为波兰政府希望如此。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非常好。

米科拉伊奇克说，他的理解是，斯大林元帅希望波兰政府是民主的。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米科拉伊奇克说，斯大林元帅说过，波兰“向左倾了”。然而正如他（米科拉伊奇克）所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应该是共产主义的。他理解此话的意思是，波兰所有的民主党派应该彼此向对方伸出手来。

斯大林同志说，他正是这样理解的。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波兰政府已经从宪法中删去了所有反民主的段落。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能从宪法中删去一些段落。宪法是被接受还是被废除。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不打算保留 1935 年的宪法^①。他将寻找回到 1921 年宪法^②基础上的途径。他（米科拉伊奇克）想着重指出，假如以 1921 年的宪法为依据有一位总统，他就不会有什么困难。然而他（米科拉伊奇克）不能现在选举总统，因为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他就会失去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是根据 1935 年的宪法而存在着的。按照贝鲁特^③的意见，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是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④的形式存在的。他（米科拉伊奇克）认为，假如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有代表的政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并组成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最简单的办法。

① 指 1935 年 4 月 23 日通过的宪法。该宪法把国家权力中心从议会转到总统手里，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同时对议会和公民的选举权给予很大限制。这是一部反民主的极权宪法。

② 指 1921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宪法。该宪法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对总统权力给予很大限制；议会不仅拥有全部立法权，而且还决定政府的工作方针；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这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

③ 鲍·贝鲁特，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

④ 1944 年 1 月 1 日在华沙秘密成立。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农民党、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它以维护波兰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自己的任务；宣布波兰流亡政府无权代表波兰人民。同年 1 月组建波兰人民军。得到苏联和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同盟的承认，成为与波兰流亡政府对立的权力机构。7 月 22 日，它颁布法令建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指出，临时政府可以没有总统而存在。总统可以在以后，在普选后选举。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想请求斯大林元帅援助在华沙战斗的波兰人。

斯大林同志问：指什么样的援助？

米科拉伊奇克回答，是指援助武器。情况是这样的：德国人现在并不是强大到足以把波兰人从他们占领的华沙那些地区赶出去。波兰人需要武器是为了坚守阵地。

斯大林同志声明，他认为华沙的波兰地下军队所有这些起义举动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起义者手里没有武器，而德国人仅在布拉格^①地区就有三个坦克师，还不算步兵。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打死所有波兰人。这些波兰人实在可怜。

在维斯瓦河和皮利察河交汇处，苏联部队已强渡维斯瓦河，并在维斯瓦河对岸建立了30公里长、25公里纵深的登陆场。开始时进展良好，但德国人已将两个坦克师调到我方登陆场地区。苏联部队当然会制服德国人的抵抗并夺取华沙，但这需要时间。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吝惜武器。我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诸如机枪、反坦克炮这样的武器，但问题是怎样完成这件事。重武器不能从飞机上空投。此外，如果从市区上空空投武器，也没有把握确信这些武器不会落入德国人手里。斯大林同志问，市内是否有可以空投武器的地点。

米科拉伊奇克说，这样的地点是有的，但他现在难以说出它们的名称。在华沙的波兰部队司令部里有苏联大尉卡卢金，他希望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以便向他介绍必要的情况。他（米科拉伊奇克）只知道有这样的地点，如果在那里空投武器，不至于落入德国人

① 华沙市区之一，在市内维斯瓦河以东。

手里。

斯大林同志问，可以相信这一点吗？

米科拉伊奇克说，完全可以相信。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这是指向华沙市内波兰部队空投手榴弹、反坦克炮和弹药。

斯大林同志说，空投武器容易，因为我们的部队就在华沙附近。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如果斯大林元帅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完成空投，他将十分感激。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有呼叫信号和密码。他（斯大林同志）将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最好向波兰部队驻地空投一名苏联军官以便联络。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将在最短时间内为此事提供所必需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声称，他将尽一切可能。

米科拉伊奇说，在与斯大林同志告别时，他想表示确信，波兰与苏联之间将建立信任和友谊。

斯大林同志声称，我们政策的基础是与波兰联盟。必须让波兰人相信，今天俄罗斯的领导人不是沙皇政府时的领导人。那时俄罗斯的领导人想征服波兰。

我们的政治家常被同沙皇的政治家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没有征服任何斯拉夫民族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反对斯拉夫主义，它认为俄罗斯应成为斯拉夫各民族的首领，而这些斯拉夫民族应该受俄罗斯压迫。我们承认斯拉夫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如果波兰领导人能懂得，苏联领导人希望建立波兰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在此意义上把历史翻转过来，那就好了。然而他（斯大林同志）认为，现在的波兰活动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波兰的波兰政府代表向波兰人民声称，德国压迫者要走了，新的压迫者——俄国人要来了。

米科拉伊奇克说，斯大林元帅有可能赢得波兰人民的心。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人民不应该跟在苏联后面走，他们应该和苏

联一道走。波兰人民有自己的道路，苏联也有自己的道路。苏联不希望受波兰支配，波兰也不应该这样做。需要的是苏联和波兰一同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人，互相给予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如果波兰将来与苏联结盟，那么任何危险都不可怕。波兰也应该和英国、法国及美国结盟。

米科拉伊奇克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波兰说的这一番话。他声明波兰无意将什么强加给苏联。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不能也不应彼此将什么强加给对方。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力求与波兰结盟的根据是，不管怎样限制德国，它终究会获得再生并恢复元气。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到1914年进行新的侵犯用了40多年的时间。1939年德国又一次侵犯，而它为准备侵犯所需要的时间缩减到25年。我们认为，现在这场战争后的20-25年时间内，德国可能重新再生。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很了解德国人。首先，需要更猛烈地轰炸德国的城市、工厂，而且需要在德国土地上将德国击溃。战争结束以后，需要切断德国赖以向欧洲国家扩张的所有经济途经。应该长时期占领德国。

斯大林同志指出，反正德国能够站起来。对这种情况需要持剑以待，这柄剑就是波兰和苏联的联盟以及将组建的支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所掌握的部队。

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在离开伦敦前读到了德国俘虏的供词。一位德国军官在供词中声称，德国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获得拯救。

斯大林同志指出，共产主义对德国来说是水牛配马鞍，极不相称。

告别时，米科拉伊奇克感谢斯大林同志热情接待，并表示受到斯大林同志接见是他极大的荣幸。

与丘吉尔关于波兰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4年10月14日)

绝密

丘吉尔表示，他顽强努力地同波兰人工作了整整一个早晨，但未能取得重大结果。困难在于，波兰人想要保留在和会上维护自己事务的正式权利。丘吉尔在纸上写出了他向波兰人宣读的内容。波兰人很不满意，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们距离接受这一切并不特别遥远。丘吉尔把他的建议的俄文译文拿给斯大林看。其间丘吉尔表示，如果有可能在文本上列入某种允许波兰人有权在和会上维护自己事务的权利，那么波兰人会立即同意这个文本。丘吉尔想知道斯大林元帅对于这个文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文件中说明以寇松线作为苏波边界的基础，那么文件是可以接受的。

丘吉尔说，如果文件中能够作出这样的表述，即：波兰人同意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但同时他们对此表示抗议，那么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文件。

斯大林同志说，这不行。

丘吉尔声称，他不能保证美国不在和会上提出波兰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以及如果这方面的消息透露给报刊，那么波兰人可能掀起沸扬的喧闹，而这对于面临选举的总统会造成危害。因此，丘吉尔认为，最好是在3周时间内对这一切都严守秘密，其中包括他刚才拿给斯大林元帅看的文件，直到美国进行选举为止。

斯大林同志问道，丘吉尔是否建议搁置波兰问题，他是否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应当回到伦敦，而莫拉夫斯基^①和别人应当去卢布林。

丘吉尔回答说，他认为，如果波兰问题无法在莫斯科解决，那就应当把它搁置3周。

丘吉尔请求原谅他的坦率，同时他声称，如果无法解决波兰问题，那么就不可能让舆论相信，建立卢布林委员会^②不是俄国人意志的反映而是在红军后方所采取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卢布林委员会所进行的宣传，正在成为伦敦的波兰政府发起反对卢布林委员会运动的十分有效的工具。例如，莫拉夫斯基就大骂华沙起义^③的参加者。丘吉尔必须说，莫拉夫斯基的这类言论产生的危害甚于好处。

斯大林同志指出，莫拉夫斯基反对的不是英勇的华沙居民，而是布尔^④和他的主子。

丘吉尔声称，战前波兰共产党员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人民的推论非常简单浅显。波兰人认为，红军正在解放华沙，因此要问，波兰领导人中谁是红军的朋友。波兰人看到，卢布林委员会同红军在一起。他们看到，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同红军建立了联盟，但他们问，为什么伦敦的波兰政府领导人中谁也不同红军在一起。波兰农民对此无法理解。米科拉伊奇克认识不到这一事实对他造成多大的危害。至于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俄国人意志的体现，那这是不对的，因为委员会得到波兰人民的广泛支持。当

① 莫拉夫斯基，波兰革命者，后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候补委员和委员。

② 卢布林委员会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1944年8-12月该委员会设在卢布林，故名。

③ 1944年8-10月由波兰国家军领导人在华沙发动的所谓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德军的残酷镇压，约有20万人牺牲。

④ 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时任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国家军司令，领导了所谓华沙起义。

然，委员会内部存在矛盾，但是，丘吉尔知道，波兰人是一个多么任性的民族。

丘吉尔请求原谅他的坦率，他说：英国政府了解卢布林委员会中波兰人的经历。例如，他得知，贝鲁特是一个很有才能和很聪明的人，他是共产党员，在毕苏斯基统治时期曾经坐过牢，后来经苏联政府交换出狱。

斯大林同志说，贝鲁特曾参加过波兰共产党，但他于1937年或1939年退了党。他斯大林同志是最近在莫斯科才初次认识贝鲁特的。至于说贝鲁特是交换出狱的，他斯大林同志答应就此进行相应的查询。

丘吉尔表示，英国政府充分同情斯大林元帅要求保证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波兰的愿望。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苏联不仅需要有一个友好的波兰，而且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他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尊敬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正是因为他们理解，苏联并没有像沙皇政府那样试图压迫和同化波兰人，苏联想要有一个强大而拥有独立主权的波兰。米科拉伊奇克则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看不到沙皇政府和苏联政府对波兰政策的差别。

丘吉尔表示，他不相信目前需要继续努力来达成协议。问题在于，如果英国政府公开宣布它早在停战以前很久就同苏联就波兰边界问题达成了协议，那这会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但是，他丘吉尔感到沮丧的是，这个造成许多麻烦的波兰问题竟会在英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得不到解决。

斯大林同志说，米科拉伊奇克受到他周围的人的影响。米科拉伊奇克周围的波兰人想利用盟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而从中渔利。

丘吉尔指出，不论这是否会成为盟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对苏联的批评，波兰问题将是苏联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一个脓疮。

整个问题在于，波兰人害怕正式宣布他们放弃自己的要求，尽管

他们知道他们的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他丘吉尔将进一步努力去说服波兰人同意苏联的观点和清醒地看待整个形势。波兰人应当懂得，如果他们表示同意，他们同波兰的大邻国苏联就会建立友好的关系。处于波兰人目前的境地固执己见是愚蠢的。

他丘吉尔认为，和平的未来前景取决于英美两国同苏联的友好。他丘吉尔将开诚布公地对斯大林元帅说，欧洲的小国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怕得要死。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苏联政府曾经宣布要让欧洲所有国家都改信新教。他丘吉尔记得，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虽然他丘吉尔坚信英国不会发生革命。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丘吉尔可以通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例子相信这一点。

丘吉尔回答说，他相信斯大林元帅向他表示的一切。

由巴甫洛夫担任记录

同丘吉尔关于波兰等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5年2月10日)

丘吉尔说，他为了极其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见斯大林元帅。这指的是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他（丘吉尔）刚才从艾登那儿听到，现在苏联代表团有一项新的建议。

会谈时在场的莫洛托夫把苏联的新建议文本交给艾登，并解释道，他也交给了哈里曼，以转交斯退丁纽斯。

丘吉尔和艾登熟悉了苏联新建议后说，这项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并表示感谢。

丘吉尔说，他将直言不讳。他不知道波兰发生了什么事情，关于那里所发生事件的情报，他（丘吉尔）完全依靠伦敦的波兰政府的仁慈。结果，在伦敦的波兰人在英国国会中广泛传播他对事件的观点。他（丘吉尔）想捍卫总的论点。如果他不掌握波兰的真实情况，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国会中，有人会问他，他能否派些人到波兰去。他不得不对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这将使波兰人所造的谣言在英国扩散。

当然，英国政府允许把苏联使团派到盟军后方的任何地点，到希腊、意大利或佛兰德。

斯大林说，戴高乐在卢布林有自己的代表。或许，英国政府也要把这样的代表派到波兰去。最后，可以把记者派到波兰。在这以前，英国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提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波兰人是不会反对的。

丘吉尔答道，他希望把官方代表派到波兰去。他们不干预波兰的

军务，但是，他们有机会向英国政府报告波兰的情况。他必须说服国会。为此，他想利用最佳的可行方式。所以，他希望把官方人士而不是把记者派到波兰去，因为他觉得，记者少一些为好。此外，一旦有一名记者去了那里，其他记者都会提出这一要求。

斯大林说，如果丘吉尔不怕得罪伦敦的波兰人，最好让英国代表以官方身份去卢布林。

丘吉尔答道，如果能就关于建立波兰新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话，就可以这么做。那时候，英国政府将放弃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承认重新建立的统一的波兰政府。

艾登说，承认新政府以后，英国政府希望把自己的负责人物派到波兰。

斯大林指出，英国政府要委任驻波兰政府的大使。

艾登说，他和丘吉尔希望把盟国派代表驻波兰的条件写进协定，这些代表将向自己的政府报告协定执行得怎样。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伦敦的波兰政府可能开展一场批评和宣传运动。

斯大林问，在波兰政府成立前，丘吉尔和艾登是否愿意派遣自己的代表呢？

艾登答道，英国政府希望在波兰政府成立以后办这件事。

丘吉尔说，可以想象，有一位国会议员可能会站起来，援引他从伦敦的波兰政府那里所得到的消息，说卢布林的波兰人杀害或逮捕地下运动参加者。他（丘吉尔）对此必须回答，这话是不正确的，是夸大的。但是，他必须拿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话，为此，应当在波兰驻有自己的代表。

斯大林说，英国政府应在波兰有自己的大使，而大使将有自己的工作人。

艾登说，英国政府希望有机会在国会说明：在波兰新政府成立以后，在波兰举行选举以前，英国政府将得到有关波兰情况的全面通报。

所以，现在需要把关于英国驻波兰代表将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这一条款写进协议。

斯大林答道，就是指这个。英国政府将在波兰驻有大使及工作人员。

艾登问，英国大使在波兰能否来往自由。

斯大林答道，红军司令部将不妨碍贵国大使来往自由。至于波兰政府，可以同它再谈谈。

艾登说，他非常希望在协议书中包括这种既能安慰英国人民而又不得罪他人的提法。他认为，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最一段文字作如下补充是可取的：“并互换大使，通过自己大使的报告，有关政府将能了解波兰的情况。”

斯大林答道，他同意采纳艾登所说的提法。

丘吉尔和艾登表示感谢。

丘吉尔说，他想再谈谈关于战俘的问题。他知道，西欧有很多俄国战俘。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奴隶，并且用武力强迫他们中的一些人同盟军打仗。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要求不要打击落在盟国手中的苏联公民，不要使他们成为祖国的叛徒。

丘吉尔答道，没有这种情况。关于盟国那里苏联公民的劳动条件，英国和苏联政府好像已经达成了协议。有 1.1 万名苏联公民已经返回祖国，打算再送回 7000 人。

斯大林说，在苏联公民中，有些人是在德国人武力胁迫下做事。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自愿拿起武器反对盟国的，当然，这种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盟国完全有权把他们羁押在集中营中。但是，他想预先告知，苏联政府认为，这两种人都是苏联公民。

丘吉尔说，英国政府希望这两种人尽快返回祖国。这取决于船只的吨位数。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还请求英国政府把苏联公民同德国人分开羁押，不要对他们等量齐观。

丘吉尔答道，英国政府将尽力满足苏联政府的愿望。但是，他也希望知道，红军解放了多少英国战俘。

斯大林说，可以从前线获得这些情报。

丘吉尔问，苏联政府是否允许派遣专门的英国军官到被解放的英国战俘营，以便照料他们。

斯大林肯定地作了回答。

丘吉尔问，能否给已经被红军解放的英国战俘运送红十字会的货物。

斯大林作了肯定的回答。

丘吉尔请求尽可能让英国战俘乘坐最近将把 7000 名苏联公民送回祖国的那些轮船。

斯大林说，当然可以这样做。

斯大林问丘吉尔，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对德索赔数额是否让英国人感到担心。

丘吉尔答道，他已经收到战时内阁的电报，那上面说，目前英国政府反对确定明确的赔偿额。

艾登说，在伦敦，不存在像迈斯基委员会那样的赔偿问题委员会，所以，难以在伦敦对苏联代表团所说的数字作出判断。英国政府赞同赔偿原则。至于赔偿额，按照他的意见，这个问题最好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里进行研究。

斯大林面向丘吉尔说，丘吉尔怜悯德国人。

艾登答道，事情并不是怜悯德国人，而是英国政府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在赔偿问题上获得了可悲经验。

丘吉尔说，他坚决拥护俄国人获得德国的工厂。这对英国人是有利的，因为德国的出口将转到他们那儿。

斯大林说，当然，当俄国人见到德国人的工厂时，就将予以没收。

丘吉尔说，在苏联掌握的俘虏中有很多德国将军。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只是为了宣传才利用他们呢还是考虑在德国利用他们？

斯大林答道：“完全没有！”

丘吉尔对斯大林的答复表示满意。

丘吉尔说，苏联政府没有付清勒拿金矿股份有限公司^①的债券。同对待美国人相比较，苏联政府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因为苏联政府对美国人偿清了债券。

斯大林说，他对这个问题不了解，必须去了解一下。

斯大林说，他想问一下丘吉尔，修改蒙特勒公约^②的事情怎样？

丘吉尔答道，他认为，蒙特勒公约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了。（去年）10月他和斯大林元帅^③已经谈妥，苏联政府将提出修改公约的意见。

斯大林问，如果他在今天会上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问题并提议让外长们讨论这个问题，丘吉尔将持何种态度？

丘吉尔答道，他支持这一建议。

① 英国的一家股份公司。该公司曾于1925年同苏联政府签署租让合同。

② 1936年6月至7月，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一些黑海国家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了讨论土耳其海峡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各国通过了关于海峡新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公约规定：无论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可自由通过海峡。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必须是15000吨以下的水面舰只，且停留期不能超过21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为参战国，是否准予通过海峡，由土耳其酌情决定。解散海峡国际委员会，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区设防。

③ 指1944年10月9-18日丘吉尔和艾登访问苏联并同斯大林会谈。

附件

苏联提出的关于波兰问题文件的
最后一段句子的草案^①

当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恰当地按照上述方法建立时，同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将同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① 该草案已由莫洛托夫于1945年2月10日交给哈里曼、艾登和丘吉尔。

关于波兰的局势

——与赫尔利、哈里曼^①会谈纪要（节选）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Э. 贝茨。

……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②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① 赫尔利，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哈里曼，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②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年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①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于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记录人：B. 帕夫洛夫

^① 萨佩格，波兰宗教领袖，1946年任红衣主教。

苏 法 之 间

会见法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 柏蒂的谈话记录

(1943年9月15日)

在互相问候之后，柏蒂将军声明，戴高乐将军委托他递交斯大林元帅一封信。

柏蒂把信交给斯大林。

斯大林接信后问，这封信要马上译出，还是可以晚一会再看？

柏蒂答，信不必马上译，因为戴高乐委托他在同斯大林元帅会见时口述信的要点。

柏蒂将军接着说，他不仅是一位法国将军，而且是戴高乐将军的朋友。他同戴高乐之间不仅是下级同首长的关系，而且是老朋友的关系。

柏蒂然后声明，他今天不仅是以战斗法国军事使团团长的身份，而且是作为所有法国武装力量的代表，来见斯大林元帅的。他柏蒂将军受委托通知斯大林元帅，法国的力量是这样组织的：吉罗德将军是总司令；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管军事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作为委员会主席之一也拥有军权。柏蒂表示，他料想斯大林元帅知道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各领导机关是如何组织的。

斯大林作了肯定的回答。

柏蒂说，戴高乐将军委托他代表将军本人和法国军队对红军的辉煌战绩表示钦佩。柏蒂又说，法国人非常感激苏联政府，因为它承认了他们的委员会，并且在其他国家承认委员会的问题上起了作用。

柏蒂接着说，他想提到一些实际问题。第一，戴高乐将军委托他

声明，法国人愿同苏联政府交换各有十名军官的军事使团。

斯大林答，他同意。

柏蒂说，他想谈通讯工具问题。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需要电台，以便同法国沦陷区的各法兰西抵抗运动小组保持联系。迄今为止，法国人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所有无线电通讯设备的，但他们想有自己的、不依赖英国人的通讯联系。因此，如果苏联政府提供三十部电台归戴高乐将军支配，他将表示感激。

斯大林问，说的是什么样的电台？也许是小型的短波电台吧？

柏蒂答，法国人想从苏联政府得到容易隐藏和伪装起来的小型短波电台。

斯大林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帮助法国人。

柏蒂致谢以后声明，他还想提出在苏联飞机帮助下开辟阿尔及尔—莫斯科航线的问题。遗憾的是，法国人手里没有用于这条航线的运输机，但是他们有机场和必要的人员。戴高乐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条航线对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同苏联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外交邮件的传递等等，是必需的。

斯大林问，法国人打算沿哪条路线开辟这条航线。

柏蒂答，打算沿下述路线：阿尔及尔—开罗—大马士革—德黑兰—莫斯科。

斯大林说，这样，开辟这条航线需要得到英国的同意，因为航线要经过埃及。

柏蒂答，必须经过埃及，否则路线不好规划。

斯大林问，难道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在航空联络方面帮助法国人吗？

柏蒂答，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在同他们国家的联络上给予帮助，但是法国人想同苏联联络，他们愿意有一条法苏航线。法国人需要援于英国人或美国人，但有的时候，比方说，在运送今天谈到的电台这样的货物时，就有所不便了。

柏蒂声称，法国的王牌飞行员、西班牙战争参加者马尔梅耶上校，可以乘自己的飞机来苏联，初步考察开辟这条航线的问题。

斯大林答，虽然航线问题从技术角度和外交角度来看还没有安排妥当，但如果将军认为必要，他不反对马尔梅耶上校飞来。

柏蒂对答复表示感谢，然后说，他再向斯大林元帅提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他柏蒂想不经过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外联络处，直接同红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来往。柏蒂说，他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了解苏联的作战方式。红军是打仗的模范，法国人非常想了解他们的经验。

斯大林问，将军想在哪儿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见面？在莫斯科吗？

柏蒂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说，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任务非常繁忙，常常在前线，紧张得很。因此将军要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见面是困难的，有时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许多时间在前线度过。

柏蒂声称，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来往对他至为宝贵，所以他想，哪怕有时能和他们中间某一位见面也好。

斯大林指出，将军刚才讲到红军的模范作战方法。斯大林请求将军不要在这方面着了迷。我们同样犯不少错误。斯大林保证，当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莫斯科时，一定帮助柏蒂将军同他们会见。

柏蒂说，他受委托再提一个问题。斯大林元帅知道，法国航空队“诺曼底”在苏联前线作战。最近这个空军大队的人员因阵亡和失踪而受到很大损失。戴高乐将军想补充“诺曼底”航空队，把它扩编成一个团，并且他打算只派遣法国飞行员来这个团，因为这个“诺曼底”航空队有苏联机械员给服务。顺便说一下，苏联机械员和法国飞行员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柏蒂继续说，戴高乐想编制一个航空师，以便在苏德前线作战。这个师由一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组成。

斯大林说，照他的理解，这个师将是混编的。

柏蒂作了肯定的回答。柏蒂接着说，遗憾的是法国人没有飞机，他们只能提供人员：为歼击机团提供飞行员，为轰炸机团提供飞行员和机械员。

斯大林说，这可以搞得成。我们提供物质装备。

柏蒂感谢斯大林的答复。

斯大林答，这不值得感谢，法国人在我们的前线为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共同事业而进行着战斗。帮助法国人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同共同的敌人斗争的利益。

柏蒂说，他还是要感谢斯大林元帅，因为在法国人进行战斗的其他地方，他们都没有像在这里一样受到这么好的对待。

斯大林说，主要的是人，是飞行员，飞机是次要的事情。

柏蒂答，法国人非常需要飞机，他们没有飞机，但是有飞行员。

斯大林说，提供飞机不难，主要的是飞行员。我们根据战争经验确信这一点。我们一天能够造一百架飞机，而为了培养一个飞行员就要好几个月。

接着柏蒂说，戴高乐还想在苏德前线编制步兵部队。有两类人可以用于这个目的。第一类人是被强制动员加入德军而到达苏德前线后投降了红军的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法国人认为这些人是法国人。第二类人是在被强制动员到苏联沦陷区的企业中和托特组织^①中做工的法国工人。戴高乐希望由苏联军事机关进行适当的选择后，把这些人装备成步兵，组成法国部队，在苏联统帅部指挥下同德国人作战。

斯大林答，他不知道，柏蒂将军所说的这种人在苏联统帅部手里有多少。需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柏蒂声称，开头可以考虑编制一个五百人至六百人的营。

^① 托特组织是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工程建筑组织，因其领导人工程师弗里茨·托特而得名，托特组织也驱使被德国占领国家的居民从事强迫劳动。

斯大林说，他应当先弄到法国战俘数量的资料，然后才能作出答复。

柏蒂声明，他要向斯大林元帅提的所有问题，到此都说完了。然而他还想提个请求。他想跟和他军衔一样的一些人一道，带某个梯队到前线一两次；他想看一看战斗中的红军，学习苏联的战术。

斯大林答，这可以办得到。

柏蒂感谢斯大林的接见。

斯大林答，这是他的义务。

柏蒂说，法国人感觉到并且记得，他们在许多方面得到苏联的恩惠。

斯大林答，法国将来会复兴，到那时法国人讲话就会是另外一种口气了。

柏蒂再一次说，法国人非常感激苏联和斯大林元帅的援助。

斯大林答，我们将来仍然援助法国人。一直到——斯大林用开玩笑的方式补充说——我们自己不再需要援助的时候为止。

柏蒂声明，斯大林元帅永远可以指望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们。

在告别时，柏蒂再次感谢接见。

按档案排印

原载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法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 第一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2日)

会谈时在座的有：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法国大使亚·叶·鲍戈莫洛夫、法国驻苏联代表罗歇·加罗以及别·弗·波得采罗布。

在互相问候以后，斯大林问戴高乐一路上是否顺利。

戴高乐答，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措施，他和他的同伴旅行条件很好。

斯大林问，戴高乐去了斯大林格勒没有？

戴高乐答，他去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座城市的名字标志着现在这场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问，戴高乐是否看到破坏的情形？

戴高乐答，他看到了破坏的情形，但也看到城市恢复工作已经开始。

接着，戴高乐说，他通过鲍戈莫洛夫大使的殷勤帮助，向莫斯科表示了自己想见到斯大林元帅的愿望，大使转告他斯大林元帅同意会见。戴高乐接着说，他同苏联政府的第一次接触，是1942年在伦敦的会见。戴高乐补充说，他记得他们当时的谈话内容。现在形势更加明朗了。

斯大林指出，现在情况好些了。

戴高乐说，他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法国现在差不多解放了，可以看出，不从物质意义上而从精神意义上来说，法国几乎没有受到

损伤。尽管有苦难和不幸，全体人民力图使法国恢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停了一会，戴高乐说，法国在 1870-1871 年、1914-1918 年和 1940 年，都遭到了德国的入侵。法国的一切外交困难，甚至内政困难，几乎都是由此而来的。法国人现在深深懂得，为自己开辟通向美好未来之路的唯一手段，是同其他国家紧密合作。

斯大林问，是谁妨碍法国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戴高乐答，这首先是德国人，还需要战胜他们。法国人知道苏维埃俄国为他们做了什么，知道正是苏维埃俄国对他们的解放起了主要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国人不想指靠自己的力量，只想指靠别人的力量，自己朋友的力量。

戴高乐说，实际上，法国遭受不幸的原因，在于法国没有同俄国站在一起，同俄国之间没有协议，没有有效的条约。其次，法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它没有具备能对付德国的良好地理位置。简言之，法国被抛弃在不好的边界上了。

斯大林说，俄国和法国未能携起手来，这对我们也是一种不幸，我们曾经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

戴高乐说，除德国以外，只有俄国和法国在欧洲占有大陆的地理位置，这两国都是德国的邻居，因此都处在德国的威胁之下。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戴高乐说，他不知道斯大林元帅对于将来是怎样想的，可是无论怎样削弱德国，总还是不够的，因为德意志民族还存在。

斯大林说，问题不在于德意志民族，而在于它的正规军干部。德国人有许多暗藏的正规军干部，他们也善于把这些干部隐藏起来。

戴高乐说，在以法国战胜的 1914-1918 年战争以后，法国曾经认为，建立在国际联盟基础上的和平，对于保持和平和安全就足够了。法国人没有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苏维埃俄国离法国很远，法国

又没有做好保卫自身安全的工作。以后就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法国人得到了很多教训。法国人懂得了没有苏维埃俄国是怎么回事，存在某种比现实主义思想更加和平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戴高乐并没有猜想斯大林元帅认为，法国设想无须自己即本国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就能重新恢复自己的实力，保持自己的地位，保障自己的安全。戴高乐说，他知道法国复兴的首要条件，是法国自己的活动，是法国人民的活动。法国人民中的青年，愿为本国复兴贡献一切力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的高涨，是法国人民许多年来没有看到过的。

斯大林说，德国人在这方面帮了我们的忙。他们用自己的占领制度，恢复了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

斯大林然后问，法国工业是否在恢复？

戴高乐答，工业在恢复，但是非常非常之慢。为了了解妨碍工业发展的原因，必须看看运输、煤炭和设备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当盟军进入法国时，他们发现那里有四千多座桥梁被毁，几乎全都是铁路桥梁。尽管如此，法国现在火车还在开行，虽然困难很大。第二，法国战前每年进口四千万吨煤，现在它也非常需要煤。第三，德国人运走了或者破坏了为生产武器特别是大炮所必需的全部设备。为了装备军队，法国人不得不向美国人要武器，而美国人现在不给。戴高乐说，他设想，法国法国恢复自己的工业需要两年。

戴高乐接着说，铁矿分布在法国东部各地。亚尔萨斯有四十二座高炉，现在只有两座开工。这是由于无法从洛林运去金属、铁矿石、煤，因为美国军队在那里，还在打仗，这使局势大大地复杂化了。尽管如此，但法国人民有坚强的意志来恢复工业。

斯大林说，我们恢复工业和运输比较容易。斯大林说，他不懂，为什么法国的事情那么不顺畅。斯大林补充说，法国南方各城市的解放非常容易。巴黎也没有进行大的战斗。可见，工业企业是保留下来了。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法国工业不能迅速恢复呢？为了有一支强

大的军队，就需要装备他们，而没有工业这是办不到的。

戴高乐答，人人都能比他们现在所做的做得更多；他想，法国也能比它现在所做的做得更多。

斯大林说，如果不扩大整个恢复计划，如果稍微推迟民用工业的恢复，军事工业大概可以恢复。

戴高乐说，战前法国有两万二千台机车。现在法国只有五千台机车，其中好多台还被用于军事运输。戴高乐说，他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法国在恢复自己的工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然而法国人为了不依赖他人，一定要恢复自己的工业。法国未能迅速恢复自己工业的主要原因，是交通线被破坏了。

斯大林问，戴高乐的军官干部情况如何？

戴高乐答，1940年，德国人几乎俘虏了全部法国军队和全部军官。剩下的只有少量军官，这些人当时在非洲，现在他们正同从非洲调到法国的军队一道在前线作战。但是大多数法国军官不是被俘，就是牺牲了。

斯大林解释，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红军所经过的一切国家，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德国人到处都搜捕军官干部，把他们运往德国。斯大林说，他猜想，他们在法国也是这样做的。斯大林问，是不是宣布过全体法军为战俘？

戴高乐答，1940年，在德国人迅速推进期间，几乎全部法军都被俘了。留在后方的军官，后来也被德国人逮捕并运往德国。其中有些人背叛了祖国，同维希合作。戴高乐继续说，这样一来，法国现在几乎没有军官干部，正在培养新的军官干部。

斯大林问，戴高乐的飞行员够不够？

戴高乐答，他的飞行员很少，那些原在法国的飞行员则需要重新学习，因为他们四年没有飞行了，除此以外，他们也不了解现代飞机。

斯大林说，在我们前线，由法国飞行员补充过的“诺曼底”航空团，战斗得很好。

戴高乐说，这他知道，法国人为在俄国同德国人作战的本国飞行员自豪。

斯大林说，这是些优秀的飞行员，如果戴高乐需要飞行干部，我们可以把这些飞行员归还法国。

戴高乐说，这些飞行员在俄国这里作战，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很大好处。

斯大林说，要是有足够的干部，我们可以把这些飞行员扩编成一个师。

戴高乐说，他可以为此提供人员。

加罗补充说，法国有大量青年人愿意学习飞行。

斯大林说，也许法国飞行学校少吧。

戴高乐答，那里学校少，并且器材也不足。

戴高乐说，法国政府感谢苏联在法国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法国人知道，正是苏联政府力争就这个问题同伦敦和华盛顿达成协议。法国人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表示感谢。

斯大林指出，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斯大林问，法国人怀念贝当的多吗？

戴高乐答，在法国也许有人怀念贝当，但总的说来很少人怀念他。戴高乐补充说，他应当声明，在法国人中间，甚至在维希所管辖的人里面，跟着德国走的人是很少的。

斯大林问，魏刚在哪里？

戴高乐答，德国人把他送到德国去了。德国人对魏刚没有表示足够的谢意。

斯大林问，甘末林在哪里？

戴高乐答，他也被送到德国去了。戴高乐补充说，所有这些人

是过去的人物，今天他们就象并不存在一样。

戴高乐接着说，对于法国来说，一件大事情是，法国将来对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要使法国能够掩护和加强自己，要使它的军队能够经常保持警惕。对于法国人来说，在地理上历史上能够掩护法国的一条线，就是叫作莱茵河的那条河流。法国人认为，根据一切理由，莱茵河应当是在东方对付德国和德国威胁的最后壁垒。也有其他的壁垒，可是需要实际的地理上的壁垒。法国人的意见就是这样。

斯大林说，这样说来，法国人大概打算把普法尔茨和莱茵区并入法国了。

戴高乐说，如果使莱茵区脱离德国而合并到法国，那将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它的北部即鲁尔矿区，应当建立另一种制度，即不是法国制度而是国际制度。至于说到整个莱茵区，它是应当脱离德国而并入法国领土的，因为这从政治、经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必要的。

斯大林问，盟国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戴高乐说，这个问题 1918 年曾经提出过。克列孟梭那时建议把莱茵区转交法国。盟国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那时他们找到了一个临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后来事变证明，是不成功的。德国人进攻了。戴高乐说，他认为，盟国在走向真理的道路上有进步，但也许他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进步。

斯大林说，就他所知，英国人正在研究另外一套计划，这就是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置于国际管制之下的建议。戴高乐所谈的是一种新的意见，他斯大林第一次听到这种意见。斯大林说，需要了解盟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戴高乐说，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得到讨论。

斯大林说，俄国很难反对这一点。

戴高乐说，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处在莱茵河畔，

就象法国人一样，那么问题就会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了，但是他们不论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处在那里。他们关心的是别的事情。法国人确信这一点；不论是他们或俄国人都为此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这对今后是一个教训。

斯大林说，英美军队在这个地区同德国作战。斯大林说，他认为，需要听取英国和美国的意见，没有他们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戴高乐答，他同意需要和英国、美国一起行动的看法。但是需要解决问题，因为新的和平应当是长期的和平，而不仅仅是1945年的和平。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总是待在莱茵河畔，法国和俄国却总是要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斯大林说，最近两次战争表明，大陆各国的力量不足以制服德国。没有英国和美国军队的帮助，是难于战胜德国的。需要考虑到两次战争的经验。虽然英国和美国远离莱茵河，但对于在取得胜利中起重要作用来说，它们还是很近的。两次战争的教训就是这样。

戴高乐答，这是对的，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在大家都已看到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的。戴高乐说，他指的是法国几乎亡了国。要是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使法国和俄国在对德战争一开始就具有优越的条件，那将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符合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利益。戴高乐说，他不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不理解这一点。

斯大林说，那更好。

斯大林接着说，边界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它有利于对德战争的顺利进行。斯大林说，我们这里也有人认为，喀尔巴阡和特兰西瓦尼亚是俄国的天然边界。但是要把边界推到特兰西瓦尼亚或喀尔巴阡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不坚持这一点，因为解决问题的不是边界，而是优秀的军队和优秀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说，他请求戴高乐谅解他。问题在于，我们俄国人不能不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会谈而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这个问题，别的许

多问题，如果撇开自己的盟国，不设法达成共同的决定，我们也都解决不了。

戴高乐说，他也认为，这个问题以及有关德国的所有其他问题，都应当由盟国共同解决。接着，戴高乐说，在莱茵区建立国际制度对法国有不方便之处。采纳了这种制度，法国的直接安全就要依赖其他国家的善良愿望和准备状况了。

斯大林说，所有国家都互相依赖，为了同德国斗争需要有反德国家的同盟。除了边界问题外，还需要注意互助，因为要消除德国这个危险，仅仅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斯大林说，不要夸大边界对保卫国家的意义。如果认为喀尔巴阡山或莱茵河能够解决问题，而军队可以睡大觉，那就会产生幻想，就象相信马奇诺防线、希特勒防线、希特勒东方壁垒而产生的幻想一样。边界上有高山是好的，但这不决定问题。不应当夸大边界问题的意义。

戴高乐说，他不认为，莱茵河本身会给法国造成安全。戴高乐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即建立反德国家同盟有其高度的必要性。上一次战争以后，法国为了达到这种可能曾牺牲一切，因此法国懂得，正确地解决边界问题，还不足以使德国危险问题得到解决。需要有反德国家的同盟，来阻挠德国重新进攻。这种意见，法国政府是支持的。

斯大林说，很好。

莫洛托夫说，1935年曾经同法国订了一个条约^①，但没有得到执行。

戴高乐说，莫洛托夫也许不愿意看到赖伐尔和戴高乐之间的差别吧。

莫洛托夫说，他看到了这个差别，他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曾经签订过一个条约，但它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得到执行。

^① 指1935年5月2日签订的苏法互助条约。

戴高乐说，1935年的条约没有得到批准，但它的内容并不都坏。其中有些东西，已不属于当前议题范围。例如，条约的一系列原则从属于国际联盟公约的原则。今天看，这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条约本身并不坏。这是法国政府的意见。戴高乐问，苏联政府对此看法如何？

斯大林指出，1935年的条约不坏，但它没有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的历史对我们今后是一个教训。

斯大林说，这次战争不论对苏联或对法国都是非常艰苦的，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戴高乐说，莫洛托夫是否认为，1935年的条约经过修订和补充使可以接受呢？

莫洛托夫答，他几天前读到奥弗竹阿先生在法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他说这个条约已不复存在了。

戴高乐答，条约既然没有得到执行，也就不存在，而现在的问题是要制订新的条约。戴高乐问，莫洛托夫是否认为，1935年的条约可以成为制订新条约的出发点？

莫洛托夫答，他的出发点是斯大林元帅的话：反德国家应当进行协商。

戴高乐说，苏联1942年同英国签订了条约，1943年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条约。这是好条约。

斯大林说，签订1935年法苏条约时，不是一一切都清楚的。后来我们才明白，赖伐尔和他的同事没有把我们当作盟国来信任。他们同我们签订条约，是想束缚我们，不让我们同德国结成同盟。我们俄国人也不完全信任法国人，这种互相不信任把条约给毁了。现在这场战争或者已经消除了这种不信任，或者已经把它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是1944年局势区别于1935年局势的地方。法国人现在相信俄国人会同德国人打架，俄国人也相信法国人。这就为条约创造了顺利条件。这个问题需要考虑。

戴高乐对此同意，并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戴高乐接着说，他不愿人们把他的话说成法国对英国或美国抱有某种不信任。并非如此。但他戴高乐知道，新的和平的条件应当是更可靠更实际的。而法国人和俄国人能够带来这种和平条件中的现实主义。戴高乐说，在丘吉尔访问巴黎期间，这样的话他也对丘吉尔说过了。

接着，戴高乐说，迄今为止谈的是西方，但是还有东方。斯大林元帅说，他不认为问题仅由边界决定。他说得对。但边界问题总还存在。不仅德国西部边界问题重要，德国东部边界问题同样重要，因为存在一个德国，需要考虑它的全部边界。

斯大林说，他认为，自古以来属于波兰的土地应当还给波兰人。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应当归还波兰。

戴高乐说，据他理解，奥德河应当是德国边界，由此向南，边界应沿着尼斯河，即在奥德河以西。

斯大林肯定这一点，并说，在他看来这是公正的。

斯大林接着说，奥地利应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它在苏台德区的东部边界无论如何应当恢复。斯大林接着说，在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中，涉及到了支解德国问题，但没有作出具体决定。

戴高乐说，他不认为法国会对东普鲁士移交给波兰人表示严重异议。东普鲁士在德国的政策中向来是一个很坏的因素。戴高乐说，这里他指的是东部边界问题，未涉及德国其他问题。

会谈至此结束。

斯大林邀请戴高乐于12月3日共进早餐。

戴高乐对接见和邀请表示感谢。

同戴高乐共进早餐时的谈话

(1944年12月3日)

秘密

1944年12月3日早餐时分

现将共进早餐和喝咖啡时的短暂谈话内容摘要如下：

1. 莫洛托夫同志和加罗^①开玩笑地谈起航空在外交和政治中的作用，认为航空方便了各国的政治联系。

斯大林同志也与他们交谈起来，并以讥讽的开玩笑的口吻说：“可别发生飞行事故”。

然后，斯大林同志转向戴高乐，补充说：“在苏联飞行，您可以尽管放心，不会有任何意外的。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故可能会发生在西班牙南部或非洲南部，但不会发生在我们苏联。谁要造成这种事故，我们就会枪毙他”。

2. 在喝咖啡时，戴高乐问斯大林同志对德国、法西斯分子或德国人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德国有好人，但为数不多，在战胜德国后，应当吸引这些人去改造德国。

戴高乐说，他持不同看法并问斯大林同志，俾斯麦的政策和德国现政府的政策区别何在。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苏联的某些历史学家把俾斯麦的政策和威廉二世的政策过分割裂开来，抑或使之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俾斯麦

① 加罗，法国外交家，戴高乐驻莫斯科的代表。

的政策和威廉二世的政策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一脉相传。至于俾斯麦和现在的德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俾斯麦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鼻祖。

戴高乐问斯大林是否把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作为不同派别的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些“派别的划分”是希特勒分子杜撰出来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

戴高乐请斯大林同志谈谈对德国法西斯政府的总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政府”是一伙刑事犯，应当予以消灭，尽管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3. 戴高乐问斯大林同志，为什么总是工作那么长时间。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首先是因为俄国人的不良习惯，其次是因为工作太多，肩负的责任重大。“我怕犯错误”，斯大林同志补充说。

戴高乐问，是不是担心同事会犯错误。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有时是同事犯错误，有时是他本人犯错误。

“错误总是有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有错误，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不得不加倍工作，但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斯大林同志笑着补充说。

4. 交谈中提到德国人是危险的敌人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德国人是顽敌，有时只敲断其脊梁骨，往里瞥一眼是不够的，他可能还活着。那就应当把他的脚砍下来，如果他还活着，就割下他的脑袋。

戴高乐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如果想要砍掉德国人的脚，最好有两个外科医师，用不着四五个。

斯大林同志说，这要看手术情况。也许两个外科医生就足够了。

博戈莫洛夫

在签名后面有一句用打字机打的附言：“该记录是由在斯大林同志和戴高乐早餐谈话时为他们作翻译的博戈莫洛夫整理的。”在下面

页边上有 A. E. 博戈莫洛夫亲笔写的附注：“谈话未做记录，凭记忆整理而成。博戈莫洛夫。”

原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6 年第 5 期

同戴高乐第二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6日)

会谈时在座的有：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法国大使亚·叶·鲍戈莫洛夫、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法国驻苏联代表罗歇·加罗、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莫里斯·德让以及别·弗·波得采罗布。

戴高乐声明，他和他的同伴请求接见，是为了利用在莫斯科逗留的机会，弄清苏联方面对现已出现和即将发生的问题的意见，并向苏联方面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戴高乐说，现在正在讨论苏联和法国之间签订条约的问题，这个条约将确定两国将来对德国的立场。法国人认为，也可以在当前事件和时间允许的限度内，同时讨论围绕这个条约而发生的各个问题。

戴高乐指出，在将要讨论的一切问题上，法国人都打算明确地、坦率地发表意见；法国人从不久以前开始，在同俄国人的关系中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

戴高乐声明，他首先想谈波兰问题。戴高乐说，斯大林元帅知道，波兰和法兰西两个民族之间，由于各种理曲，早就存在着感情上的关系。戴高乐说，他愿意由远到近地谈这个问题。戴高乐说，斯大林元帅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波兰和法国是由文明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很早的时候起，法国就曾徒然地试图保存一个独立的波兰。在上一次战争事变以后，法国满怀对德国的不信任。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它希望波兰能够复兴，成为德国的一个敌人，成为具有反德情绪的一个国家。法国在1918年后力图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政策的真正内

幕就是这样。贝克^①之流推行的同德国达成协议来反对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对法国是巨大的危险。波兰如果对战败了的德国恢复这种政策，对法国和苏联都会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法国人是清楚的。德国向来乐于利用波兰来搞这种政策。这种政策今后也不是不可能有的。

斯大林说，德国是想吃掉波兰。

戴高乐同意这一点，并且说，德国也许想开头利用波兰，然后吃掉它。

斯大林答，当然是这样。

戴高乐说，在他看来，法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在于使波兰不能恢复这种政策，使德国不能创造条件来复活这种政策。

斯大林指出，组成集团和占领会促成这一点。

戴高乐说，他同意苏联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议；他认为，沿奥德、尼斯两河划界，将排除德国和波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戴高乐说，既然苏联方面同意波兰向西扩展，那也就解决了波兰和苏联之间的东部边界问题。

斯大林指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东部边界线是克列孟梭批准的。

戴高乐说，法国对寇松线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戴高乐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认为，波兰应当独立，波兰曾经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他想，这一点他同斯大林元帅是一致的。戴高乐说，法国人认为，如果波兰在西部边界上能够保证得到德国土地，那么波兰东部边界沿寇松线是可以承认的。

斯大林答，这会办到，红军会关心这一点。

戴高乐说，法国人了解波兰问题的状况，即一些波兰人站在这一

^① 贝克，1932-1939年任波兰外交部长。

边，另一些波兰人站在那一边。不知道当整个波兰由红军解放出来时，波兰人民会怎么想。戴高乐说，法国人料想，这方面会有困难。战争给波兰局势注入了很多能促进波兰、法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的因素。戴高乐说，他认为有必要讲明，如果在波兰解放的时刻或者在这个时刻以前，法国有机会运用自己对波兰人的影响，它将本着巩固波兰和法国、波兰和苏联友好关系的精神行事。法国认为，它应当同苏联、英国、美国及其他盟国一致行动。戴高乐说，现在法国政府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保持着关系，这种关系还在西科尔斯基^①时代就建立了。但是这些波兰人不在波兰，法国政府也很少有实际问题和物质问题和这个政府研究。

戴高乐声明，法国政府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旦波兰领土完全解放，法国人就将对波兰人施加自己的影响，以求达到在他们之间建立同盟，使刚才谈到的关于波兰边界的意见被接受，使波兰采取同苏联和法国公开友好的立场。

斯大林说，这一点他理解。

稍停片刻，斯大林说，他想问问，什么是西欧集团，它意味着什么？

戴高乐答，他不完全明白斯大林元帅指的什么。

关于西欧集团，报刊上谈得不少了，他戴高乐不明白斯大林元帅认为这个问题具有何种意义。戴高乐指出，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然后说，根据这一次和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法国知道欧洲是一个整体。不能想象东欧发生的事会同西欧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反之亦然。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个统一大陆上的国家，任何一种涉及一国的现象，都会涉及其余各国的利益，尽管是间接的。不能把欧洲分割成块。法国人很了解这一点。历史表明，任何集团，不论是西欧的、东欧的、南

^① 西科尔斯基，1939-1943年为波兰流亡政府首脑。

欧的、北欧的，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接着，戴高乐说，然而具有相同利益的人们采取共同的实际行动是常有的。现在，人人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德国问题。因此可以说，在欧洲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只有不愿德国进攻的国家的集团。法国人本此精神首先向苏联提出建议，尽管他们有直接的邻居，即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卢森堡、英国。法国无疑将同英国以及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签订善邻协定。也许在什么时候还要同意大利签订协定。但这些协定并不是什么集团。

斯大林说，如果他提了多余的问题，如果他使戴高乐为难，那么请原谅。

戴高乐说，他不认为斯大林元帅的问题是多余的，并说，在集团问题上也有别的意见。

莫洛托夫指出，例如比利时首相比埃尔洛特声明说，西欧集团是存在的。

戴高乐说，这一点他一无所知。

斯大林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所以他问了戴高乐，以为戴高乐知道情况。

戴高乐说，比利时过去和现在都处在德国的威胁下。1914年它遭到了德国的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它有时赞成同法国和英国签订军事协定，有时不赞成签订这种协定。戴高乐说，法国同比利时有经济来往，将来也有这种来往，但这不是集团。

斯大林说，他认为，法国应当同邻国结成可靠的军事防御同盟，在对付德国方面。这将是法国安全的重要因素。

戴高乐说，他想再一次谈到集团问题。他说，皮杜尔曾公开声明，法国不愿组织西欧集团，英国人从来没有请求法国人这样做，法国人自己也没有对英国人提这样的建议。戴高乐说，他认为，莫斯科—巴黎—伦敦集团，将确确实实是欧洲的集团。而其余的一切，都只不过

是个别国家间的地方性经济协定和战略协定。戴高乐说，人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时会看到，欧洲曾经存在过的唯一集团是德国集团。起初的三国同盟，今天的“轴心国”，就是这种集团。不能说，再不会有复辟这种集团的可能了。因此，法国人支持同英国和苏联建立集团。戴高乐说，法国人宁愿要这样的集团，而不要其他的任何集团，并认为这是唯一可能建立的集团。

斯大林说，这一点他理解，又说，法苏之间缔结互助和安全条约，对我们俄国人像对法国人一样有利害关系。斯大林说，他想，这件事日内可告完成。

接着，斯大林说，他想谈波兰问题。戴高乐知道，最近三十年间，波兰成了德国人进入俄国的走廊。我们俄国人希望这个走廊关闭起来。其他国家是不能关闭这个走廊的。必须由波兰自己把它关闭，为此就必须使波兰强盛、独立和民主。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强盛的国家。斯大林说，这是我们对波兰政策的一个转变。这次战争开始以前，波兰和俄国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问题是波兰人曾经两次拿下莫斯科，一百年以后，俄国人也两次占领华沙。所有这些给波俄关系打上了烙印，留下了余痛。我们正在结束并且一定会结束这种历史。这场战争的教训就是，人们意识到了波俄友谊是波兰和俄国安全的保证。不仅是俄国的领导层，而且波兰的优秀分子，都理解了这一点。在历史上，法国一向是波兰和波兰独立的朋友。可以说，法国是波兰独立的保护人。它的政策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的政策高明。波兰人知道并记得这一点。斯大林说，因此他曾想，现在法国的政策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和英国的政策高明。斯大林说，他指望这一点。

斯大林说，他理解，英国同波兰流亡政府拴在一起，就像同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将军拴在一起一样，它有点给缠住了，而现在难以解脱。斯大林说，这一点他理解。但问题是，人们不许米哈依洛维

奇返回南斯拉夫，他躲藏在开罗的某个地方。斯大林说，他担心坐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波兰的吉罗德们和赖戈尔们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接着，斯大林说，坐在伦敦的波兰人在玩弄改组内阁的把戏，与此同时，卢布林的波兰人则在实行类似法国的土地改革；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就实行了这种土地改革，从而为巩固的法兰西国家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说，这两派之间有差别。一派不知道在干什么，而另一派即卢布林派，却在从事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业。苏联政府所以同以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代表的正在复兴着的新波兰建立良好关系，就是依据这样一些理由。斯大林说，他想，法国人会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快理解这一点。

斯大林说，过些时候，英国人也会理解的。

戴高乐问，波兰居民的情绪如何？

斯大林说，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正在研究。

戴高乐问，斯大林有哪些有关波兰的官方情报？斯大林能不能告诉他这些情报？他戴高乐认为，斯大林比别人更了解波兰局势，因为他协助波兰人建立了新的波兰政府。

斯大林答，波兰人开始时困惑不解。来了红军，打德国人，解放波兰人民。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有波兰军队。波兰委员会同人民一起在波兰。波兰人问：伦敦政府待在哪儿呢？为什么波兰解放时伦敦的波兰人不在波兰呢？从这时起，波兰流亡政府的声价就开始下跌了。所谓的华沙起义遭到惨败以后，又开始了波兰流亡政府声价下跌的第二阶段。波兰人民打听到，原来起义是在红军统帅部并不知悉和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的。如果人们问过苏联统帅部，它能不能给起义以军事支援，那么它事先就会说明白，它没有准备好这样做。问题是当时红军在战斗中前进了六百公里，从明斯克直到华沙。当红军接近华沙时，它的大炮和炮弹落在后面四百公里。红军并没有准备好马上开始攻打

华沙。而这个问题人们没有问过红军统帅部。人民知道了这种情况，就对让他们去冒险的做法感到愤怒。牺牲是很大的。波兰流亡政府的代理人使德国人得以在华沙取得了成功。波兰流亡政府威信下降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的所有代理人都反对这一改革。他们杀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阻挠土地改革。这一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把波兰流亡地主的土地以及跟德国人跑了的地主的土地拿过来，卖给农民，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做了同样的事，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波兰委员会成了巨大的力量，而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的威信和影响就失掉了。

斯大林说，关于波兰局势，他所掌握的情报就是这样。

戴高乐说，到整个波兰解放时，就可以清楚看出波兰人民的情绪如何了。如果法国对波兰人还有影响，那么它将运用这种影响来发展波兰、苏联和法国之间的友谊，至于说到伦敦波兰政府问题，法国同这个政府是保持着关系的，就同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也许过一段时间，法国政府会同其他盟国协商，承认另一个波兰政府。这就像苏联政府同其他国家协商，承认了法国政府一样。

沉默了一下，戴高乐说，斯大元帅提到了波兰的赖伐尔们和吉罗德们。然而，在法国人看来，这两个人是有差别的。问题在于，赖伐尔同德国人合作，而吉罗德呢，不管他的观点怎样，却从来没有同他们合作。

斯大林答，他知道这个差别，他不把吉罗德跟赖伐尔混为一谈。

戴高乐问，巴尔干地区局势如何？

斯大林答，在可能限度内，德国人已被驱逐出巴尔干地区了。保加利亚签订了停战条款并将予以实施。这些停战条款并不损害它的独立。

希腊。我们的军队不能到达希腊，因为我们通常不实行扇形进攻。

在希腊有英国海军和陆军。希腊情况要问英国人。德国人正在从希腊逃走，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原来是独立的，现在还是这样。但它只能作为联邦制国家存在，因为组成南斯拉夫的各民族都是发达的民族，都愿意有自治权。

罗马尼亚。莫洛托夫就我们对罗马尼亚的态度发表过声明，这个声明仍然有效。罗马尼亚将像它过去那样是独立的，但是它应履行它所接受并已公布的停战条款。

匈牙利。匈牙利大概将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新的全国政府。曾经同霍尔蒂^①进行停战谈判。但德国人不知怎么探听到了这件事，把霍尔蒂抓了起来。应当认为，现在那里将建立新的全国政府。

巴尔干地区局势的概貌就是这样。

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的德国人还没有完全肃清。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南斯拉夫的德国人会完全肃清的，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不幸的是，直到最近我们还不能给南斯拉夫大的援助，但是我们给了援助，并且还将给予援助。如果匈牙利组成了民主政府，我们就将竭力帮助这个政府，并使匈牙利转过身来反对德国。

戴高乐说，他感谢斯大林元帅所说的一切。

戴高乐说，法国三个月前才解放，它还在聚集力量，暂时只能做很少的事，但是它将会做愈来愈多的事，来恢复同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法国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向莫斯科。除建议缔结互助条约外，法国也打算弄清其他的问题。至于说到其他国家，法国政府幸运地确认，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立场，是支持它们的独立和同它们友好，发展它们同苏联和同法国的友谊，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法国人认为，根据普遍选举制进行选举是民主的基础。

① 霍尔蒂，1920-1944年间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

戴高乐接着说，对于苏联政府对德国各附庸国实行的政策，法国人是满意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政府一致行动。他们现在能做的事还少，但将来会多起来的，他们打算和盟国、特别是苏联一致行动。

斯大林说，他认为我们一定会互相理解。

斯大林说，戴高乐曾打算到前线去看看“诺曼底”航空团，这一旅行他似乎放弃了。

戴高乐说，他并没有放弃，但是天气不好使他不能乘飞机到前线。

斯大林说，戴高乐好像愿把“诺曼底”的飞行员从前线召回莫斯科来。斯大林说，已经这样做了。

戴高乐致谢。接着，戴高乐说，皮杜尔想说几句话。

皮杜尔说，头几次会谈中提到了国际安全组织问题。皮杜尔说，法国人交给苏联方面的条约草案文本中包含着一个假设，即这种组织将要建立。然而这并不是说，条约将依附于建立国际安全组织这个条件。

戴高乐解释说，提出的条约不依这个安全组织为转移，并且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个条约的提出没有任何条件。

皮杜尔说，对于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法国政府的方针可以归结如下。第一，这一组织应当由各大国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来领导，因为这些大国对维持和平负主要责任，并肩负着进行战争的主要重担。第二，法国人认为，必须使小国有机会参加这一组织，发表自己的意见。皮杜尔说。法国政府认为，在解决涉及各大国的问题时，需要遵守一致同意的原则。

戴高乐说，必须避免国际联盟全体会议做法的重演，那时小国可以阻挠任何一个决定，因为作出决定需要一致同意。

皮杜尔说，国际安全组织需要遵循各大国共同行动的方针，小国可以参加大会，参加讨论问题，但不制定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规则。皮杜尔说，此外，国际安全组织应当拥有武力。而且法国政府认

为，不需要为此目的建立一支由没有祖国的人组成的国际军队。法国政府觉得，国际安全组织拥有的部队应当保留其民族特点，但受国际组织指挥。

斯大林说，这一点他同意。

皮杜尔接着说，国际组织应当管原料分配，而且不仅管原料分配，还应当管产品分配。

皮杜尔声明，国际组织应当关心成为这次战争牺牲品的各个国家，勿使它们陷入对供货国的依附地位。

斯大林说，照皮杜尔的想法，国际组织应当拥有分配资源的职能。

皮杜尔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说这很难，但符合人们的心愿。

斯大林说，在敦巴顿橡树林讨论过的方案，规定了国际安全组织的军事职能和经济职能。皮杜尔刚才讲的一切，都没有超出这个方案的范围。

皮杜尔说，这一切诚然没有超出方案的范围，但他想让这一切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

斯大林说，这件事暂时还没有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因为有困难。皮杜尔先生表述的立场，是和苏联、英国的立场接近的。至于说到国际安全组织大会，那末这个大会是需要的。要考虑到民主的要求。应当让大会委托它所选出的机构来领导组织，这个机构则由各大国组成。应当这样做。不可建立一个没有权利的大会。大会应当授权领导机构来维护安全。决不要弄成由大国任命自己来做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会谈到此结束。莫洛托夫交给皮杜尔一件法苏条约草案。

皮杜尔答应对它加以研究。法国代表感谢斯大林的接见。

原载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法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同戴高乐第三次会谈的记录

(1944年12月8日)

会谈时在座的有：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法国大使亚·叶·鲍戈莫洛夫、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法国驻苏联代表加罗以及别·弗·波得采罗布。

戴高乐说，法国人再次请求同斯大林元帅会见，因为他们认为，在进行了几次会谈以后，把他们的想法告知斯大林元帅是有益的。

斯大林答，他准备听取。

戴高乐声明：他愿重申，对于法国来说，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只存在在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德国问题。

法国曾经遭到德国三次入侵。第一次入侵时，法国人被打败了，丢了一些省份，并且威望扫地。第二次，在德国入侵以后，法国人只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了胜利。第三次入侵时，法国完全被敌人所占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戴高乐说，他所以提及可能丧失独立，是因为假如德国胜利了，法国就不会是独立的了。法国费了很大力量，才得以执行今天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甚至在它同盟国的关系上也保障了它的独立。现在，在这一次，德国人没有打赢战争，但它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因此法国政策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来争取战争的胜利。法国人将一直这样做，一直到德国被战胜为止。如果德国人被打垮了，德国和德意志民族仍然没有被消灭。德意志民族会生活下去，虽然要尝到较大的艰难困苦。只要德意志民族存在，德国的威胁就存在。需要采取措施，使这个民族无法给自己的邻国造成危险。

防止这种危险的方法有三个，这就是：第一，划定边界；第二，解除武装；第三，建立同盟。

边界。他戴高乐以前说过，法国同意照斯大林元帅的说法划定德国东部边界。至于说到西部边界，法国人说过，德国主权不应当越过莱茵河，法国人也解释过，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戴高乐说，他认为，位于德国南边、曾经为德国效过不少力的那个民族，应当永远同德国分开。戴高乐解释说，他指的是奥地利。

解除武装。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特别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措施，因为在今天，一个民族的经济和道德风尚，是它的军事力量的源泉。

斯大林说，他同意，我们也这样认为。

戴高乐补充说，法国人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在国际监督下使用鲁尔矿区是有利于和平的。

接着，戴高乐说，他想谈同盟问题。在上一次和这一次战争中，法国通过实践看到，它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建立同盟的政策。从地理位置上说，德意志民族首先威胁法国和俄国。法国和俄国是处于德国直接威胁下的国家，在德国入侵时，也就是在这种威胁变成侵略时，它们要付出比任何人都大的代价。因此，法国和苏联可以叫作安全的第一线。安全的第二线是英国。英国从来是不慌不忙的，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帝国，并且有它的特殊的民族精神。英国总是在德国已经打了起来的时候才插手，总是在处于第一线的国家觉得为时已晚的情况下才出面。上次战争结束和缔结凡尔赛条约以后，法国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曾同英国携手。其结果是，虽然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打得很勇敢，很扎实，但在这以前，它在采取重大措施方面是耽误了时间的。这不是法国方面提出责难。这些现象乃存之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它们要由英吉利民族的气质和英国是一个帝国来解释。英国要干什么事，首先要同加拿大、同澳大利亚、同新西兰、同南非商量，要看看华盛顿的态度。英国从来不慌不忙，而安全有时是非常紧迫的事情。

斯大林说，这是事实，因为英国人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没有固定的军事干部。英国慢腾腾地准备，现在，在这次战争打起来以后才训练自己的军队。苏联和法国有自己的常备军，因此它们时刻有所准备。

戴高乐对此表示赞同，然后说，还有安全的第三线，这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当美国动身的时候，战争已经走得老远了。这一次，美国是在法国已被逐出战争、俄国已遭到入侵、英国已处在灭亡边缘的时候，才参加战争的。

戴高乐说，法国人愿把注意力放在这样一点：一旦需要，同盟义务要能够立即发生作用；但英国是一个难以共事的国家，它随时随地都耽误事。英国到处有自己的利益，并且同法国、同俄国有磨擦，这种磨擦有时会使局势复杂化，使英国难于采取必要的决定。这是事实。戴高乐接着说，你们和我们之间任何地方都没有分歧意见，在对待德国方面，我们有相同的利益。法国和俄国立足于欧洲。迅速生效的和可靠的安全手段，同它们有利害关系。

戴高乐声明，法国政策迫使法国人首先愿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法兰西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是军事民族。俄国有常备军，法国过去有常备军，将来也可望有常备军。因此，法国人和俄国人不难缔结条约，并为防止侵略准备好刻不容缓的措施。在这以后，才可考虑安全的第二线和同英国订立条约的问题。如果斯大林元帅认为，需要同英国一起缔结条约，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将来不能够适时地采取必要的和紧急的措施。至于说到法国，那么它同英国签订条约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法国人同英国在东方有难题，在远东可能也有，因为在那里也有要调整的问题。法国人说不准英国对德政策将究竟如何。法国人了解苏联的政策，并向苏联政府领导人解释了自己的对德政策。然而他们不了解英国的对德政策，而且英国人自己也未必能确切地想象出它是什么样子。

斯大林说，他想，英国的对德政策将是很严峻的。

戴高乐说，它开头将会这样。戴高乐说，他想起了劳合-乔治，他是反对德国的，可是后来贝尔福和鲍尔温上台，就开始实行另外一种政策了。

斯大林说，确实这样。但是现在英国已经有很大可能来摧毁德国的工业，它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美国也会做到这一点。英国人懂得了，只要他们不摧毁德国的工业，英国就总可能由于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而吃苦头。斯大林说，在他看来，英国人在第一次大战中不懂得这一点，而现在他们懂得了，因此他们那么兴高采烈地借助空袭来摧毁德国的工业。

“果然如此，那很好，”戴高乐说，“但假使不这样呢？过了十年，英国会不会象现在这样坚决呢？”

斯大林说，每个国家部应当有自己的力量，并指靠自己的军队。斯大林说，他懂得，和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和俄国应当更好地互相理解，因为它们最先承受打击。它们应当比其他国家更加互相靠近。

戴高乐问，斯大林元帅是否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应该有更加紧密的关系？

斯大林答，这他理解并且接受。

戴高乐问，斯大林元帅准备把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推迟到什么时候才实行呢？

斯大林说，我们两国一定要办到这一点。现在，这对法国特别有利。对我们也有利。

戴高乐说，对。

斯大林说，从法国独立政策的观点看，这对法国会是有利的。

斯大林说，他应当坦率地说，并请原谅，但某些国家妨碍法国实行独立的政策，而条约将帮助它百分之百地实行独立的政策。

戴高乐说，他也想谈这一点，他已经谈了法苏条约。

斯大林说，这他理解。

戴高乐问，下一步怎么办？

斯大林说，法苏条约好。但是有好的条约，也有更好的条约。更好的是把英国也带上的三边条约。俄国和法国承受最初的打击，可是没有英国人很难赢得战争。第二线在打赢战争的事业中起巨大作用。第三线也起巨大作用。有法苏条约好，但三边条约更好。

戴高乐说，这是一个非法国的观点。法国认为，更好的是俄法之间有单独条约，法英之间也有单独条约。戴高乐说，法国人不象俄国人那么容易搞三边条约。俄国人已经同英国订了条约，而法国人还没有，并且他们也不那么容易签订这个条约。

斯大林说，三边条约问题是两天前出现的。斯大林说，他写信给丘吉尔，说法国人来了并提出了法苏条约问题，请他表示意见。丘吉尔答道，他不反对双边条约，但是他认为三边条约更加适当。斯大林说，他和同事们商量，决定同意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签订比英苏条约有各项改进的三边条约，因为英苏条约有它的不足之处。

斯大林说，他看到，三边条约对法国人是不方便的。

戴高乐说，他不认为，同伦敦的条约能帮助法国人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法国人认为，和平和胜利有赖于莫斯科、伦敦和巴黎之间所有问题的调整。然而同伦敦调整问题，不如同莫斯科调整问题那么简单。在对英关系上，法国所处的地位同俄国是不一样的。从法国的观点来看，如果法俄之间有条约，而这两国又各自同英国有单独的条约，那就更好。还有一项反对三边条约的理由。俄国离英国很远。俄国有很多军队，是大国。法国暂时还没有那样的军队，虽然它希望将来会有。如果法国同英国订条约，那它的地位是和俄国有区别的。戴高乐问，斯大林元帅建议如何进行三边条约的谈判？

斯大林答，丘吉尔现在还没有通知，他准备对英苏条约作哪些改进。斯大林表示，他揣测，三国要在莫斯科或其他地点进行谈判。为此要制订草案，而这又要三国之间先举行谈判。所有这些，可能要花

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戴高乐说，法国人对三边条约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他戴高乐想补充一点，即法国人不能同英国订条约，因为他们不了解英国对德国的真实态度如何。自然，法国人在原则上不否定三边条约。

斯大林说，法国人想同俄国订条约，我们也需要这个条约。但如果现在把三国条约搁置起来，丘吉尔会见怪的，因为他斯大林已写信告诉丘吉尔，他同意订三边条约了。

戴高乐说，法国人启程赴莫斯科时，英国人曾告诉他，他们对法苏条约没有异议。

斯大林说，英国人现在也不反对这个条约。这并不怎么重要。现在在英国人建议订三边条约。让法国人为我们效劳吧，而我们也会给他们效劳的。波兰是我们安全的因素。前天我们同法国人谈到了这个问题，让法国人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巴黎的代表吧，我们就签订双边条约。丘吉尔见怪，又有什么法子呢？

戴高乐说，斯大林也许有时得罪丘吉尔吧。

斯大林说，有时他得罪丘吉尔，而有时丘吉尔得罪他。什么时候公布了丘吉尔同他斯大林的通信，戴高乐就会看到，他们有时交换什么样的信件。

斯大林说，戴高乐应当知道，我们同英国和美国在是否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看作一个政府的问题上，有过分歧，有过很大的分歧。

戴高乐说，他想，斯大林在这场比赛中赢了。

斯大林同意是他赢了。比赛就是为赢嘛。但是法国赢得更多。

皮杜尔致词说，他想向斯大林元帅讲下面的话。走戴高乐将军道路的法国临时政府所持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法国政府反对三边条约。但它清楚地知道，签订这个条约要许多时间，并且在签订这个条约的道路上横着许多困难。此外，法国人也清楚地知道，签约参加者愈多，对条约有效性的希望就愈少。两个朋友发誓互相忠诚，他们中间每一

个人都指望着另一个人。三个朋友发誓互相忠诚，每一个人就应当指望两个人了。这好些，但是慢些。因此，他皮埃尔认为，为了确信未来能采取紧急措施来对付德国，苏联同法国之间需要订条约，它会给两国很好的保障。

斯大林说，这个他理解。

稍停一会，斯大林问，戴高乐打算什么时候返回法国？

戴高乐答，他计划在星期天，12月10日飞走。

斯大林问，戴高乐在莫斯科看过飞机工厂没有？

戴高乐答，他没有能看到飞机工厂，可是看了军事通讯学校，它给他很深的印象。

皮杜尔说，他今天早晨参观了飞机工厂。

斯大林问，皮杜尔参观的是哪个厂？

莫洛托夫说，法国人参观的是第三十工厂。

斯大林指出，这个工厂一天产飞机十二架，有时十三架。

皮杜尔说，工厂给法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斯大林说，在西伯利亚我们有一个厂，一天产飞机二十架。

皮杜尔说，工厂装备很好。法国人很幸运能会见这样的工人，他们有出色的装备，为解放各族人民的斗争制造着出色的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用两年半时间建造了这个工厂。这是个好工厂。

斯大林说，这个工厂制造强击机，这些飞机给德国人带来不少灾难。

皮杜尔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飞机。工厂里曾让法国人看，这种飞机怎样开火。

戴高乐说，法国人很惋惜，他们不可能来签订双边条约^①，只

① 这次会谈结束后，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当天会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表示会谈中发生了误会。会见中双方确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建议：如果法国向波兰卢布林政府派驻官方代表，那么作为报答，苏联同意签订双边条约。1944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

好开始三边条约的谈判了。

莫洛托夫说，三边条约，这也是好事嘛。

戴高乐说，他愿重申他在波兰问题上说过的话。法国人理解斯大林元帅的对波政策，并且象他一样，希望波兰能接受向它建议划定的那两条边界，走上同苏维埃俄国和法国友好的道路，希望波兰不可能再恢复贝克执行的政策。法国人乐于对所有波兰人施加影响，让他们在统一的波兰中联合起来。现在斯大林元帅认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具有巨大的意义。法国人不很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情况，也不很知道卢布林的局势。他们已建议波兰委员会派遣一个什么人驻巴黎，自己也准备派遣一个什么人驻卢布林。需要看看事情将如何发展。需要运用一切手段，以便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对苏联和法国友好的波兰。法国将尽自己的一切手段来这样做，这些手段它现在还很少，但将来会多的。

斯大林问，戴高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戴高乐答，他再也没有问题了。

会谈到此结束。

原载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法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229)

胜利喜悦

战后世界

附录 原子弹、原子弹……

(1945年7月—1949年8月)

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休会时似乎漫不经心地对斯大林说：

“我们美国制造了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

斯大林对这个消息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据事后国外的报导，在传递这条信息时，丘吉尔紧盯着斯大林看，观察他的反应。可是斯大林不动声色，仿佛从杜鲁门的话里没有听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来。

丘吉尔在汽车旁问杜鲁门：

“他有什么反应？”

“他一个问题都没有提。”

“据我看，他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可是斯大林非常明白。有朱可夫的话为证：

“约·维·斯大林当着我的面告诉维·米·莫洛托夫他同哈·杜鲁门的谈话。莫洛托夫当即说：

‘他们是在给自己抬高身价。’

斯大林笑起来说：

‘让他们抬吧。今天就应当和库尔恰托夫谈谈，要加紧我们的工作。’

我明白了，说的是造原子弹的事情。”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

“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不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花费了4亿多英镑。”

首相先生是大错而特错了。他如果知道斯大林了解情况的程度，大约会大吃一惊。斯大林不仅明白谈的是什么，而且还有苏联情报人员搞到的美国人进行试验的完整情报。

他早就在关注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来柏林开首脑会议之前，读了国家情报总局关于这方面工作进展的例行报告。斯大林像一贯处理这类情报时那样，吩咐让库尔恰托夫看看这些材料。下面的材料表明斯大林早就十分了解情况，甚至知道杜鲁门企图用来吓唬他的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

“绝密，

‘He’（High explosive）型炸弹。

预料今年7月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炸弹的构造。这颗炸弹使用的裂变材料是94号元素，而没有使用铀-235。用5公斤钚制成的圆球中心安置着所谓核点火装置——阿尔法粒子的钷钋发生器（……）装载这种爆炸物的炸弹外壳的内径是140厘米。炸弹总重量，包括各部件及外壳，约为3吨。

预计炸弹的爆炸力等于5000吨梯恩梯（效率为5-6%）（……）

裂变物质的储备量：

（1）铀-235。今年4月时有25公斤铀-235。目前其开采量是每月7.5公斤。

（2）钚（94号元素）。2号营地有6.5公斤钚。提取工作业已完成，开采计划能够超额完成。

爆炸（试验）预计在今年7月10日进行”。

这份文件上有批注：“库尔恰托夫同志已阅。1945年7月2日。”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00000人死亡，37000多人重伤，235000人受伤）。8月9日，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

斯大林明白现在美国将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他们手中的原子大棒变得越来越危险，可能导致战争，而且取得可以预料的胜利。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间剥夺美国人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

8月18日，斯大林召集一些人开紧急会议，准备把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托付给他们。详细讨论之后，通过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国防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第9887号绝密/特别卷宗）。下面是这份文件中的若干要点：

“责成国防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 领导利用铀原子核能量的全部工作；
 - 开展该领域的科学研究；
 - 广泛开展地质勘探并建立苏联的铀原料基地，同时利用国外（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铀矿；
 - 组织铀加工、生产与利用原子能有关的专用设备和材料的工业；
 - 修建原子能装置，研制和生产原子弹。
- ……责成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组织在境外获取有关铀工业和原子弹的更完整的技术和经济情报的工作，责成他领导这方面由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红军情报局等）进行的全部工作。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

1949年8月29日清晨6时，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上爆炸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准备工作的种种细节都用高频电话报告了斯大林。当一切都准备停当时，他表示了祝福。

美国的原子垄断就此结束。原子弹，还有能够将它们送到大洋彼岸的火箭都可以大量生产了。斯大林这一次也达到了目的——他从美国的原子大棒下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也拯救了全人类。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690-708页

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谈记录

(1946年7月23日)

1946年7月23日23时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的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②。

斯大林同志问赖伊是不是头一次来莫斯科。

赖伊回答说，他到莫斯科来过四次，但莫斯科的情形每次均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问挪威是否还驻扎有外国军队。

赖伊回答说，所有外国军队均已撤离挪威。

莫洛托夫同志插话说，英国人正往挪威运送武器，他们可能是缺少武器。

赖伊回答说，挪威向英国订购了可装备两个师的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当然还得有军队。

赖伊说，挪威还从英国购买了六艘驱逐舰。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好，并问挪威能否自己建造军舰。比方说芬兰就能自己造。

赖伊回答说，挪威不能建造大型军舰，因为挪威自己没有大型造船厂，但挪威可以建造排水量在1至1.2万吨的商船。

① 特里格夫·赖伊，青年时期参加挪威工党，1935年起在政府中任职。曾于1921、1934和1944年访问苏联。1946年，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内在1946、1950年访问苏联，并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会见。

② 巴甫洛夫，莫洛托夫的助手和翻译。

斯大林同志问，挪威是否能承接造船订单。

赖伊回答说，挪威政府现正拟在奥斯陆峡湾建立冶金厂和大型造船厂，但倾向于利用贷款在国外建造自己的商船。

斯大林同志问，占领军对挪威的破坏程度是否严重。

赖伊回答说，不严重，其程度无法与苏联相比。

斯大林同志说，德军仅在苏联就投放了 225 个师。

赖伊说，德军在挪威部署了 15—18 个师。

斯大林同志问赖伊以前去没去过美国。

赖伊回答说，他 1940、1943 和 1945 年参加旧金山会议时去过美国。1940 年去纽约是接收停泊在纽约港的 30 只报废的挪威船，他当时任船运大臣。1943 年去美是与罗斯福会面。

斯大林同志问赖伊目前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

赖伊说，就他个人生活而言安排得不错，可以拿到 4 万美金的年薪。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苦于秘书处没有合适的办公地点。他向杜鲁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对方两个月后才答复说会提供办公地点。不过杜鲁门拖延此事并不说明他有意和联合国作对，看来是因为他当时正忙于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

斯大林同志问，伊朗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有待时日。

赖伊回答说，如果安理会采纳他的建议，伊朗问题早在 4 月 16 日就解决了。

莫洛托夫同志插话说，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知所措。

赖伊说正是这样，并补充说，他可能还会因提交给安理会的建议在联合国会议上遭到攻击。

斯大林同志问谁会出面攻击赖伊。

赖伊说，可能会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英国人不会自己站出来，他们会利用澳大利亚、乌拉圭或其他类似国家达到这一目的。

赖伊对此表示同意。

斯大林同志说，据他所知，联合国正面临是否吸收阿尔巴尼亚、瑞典、阿富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

赖伊回答说，问题同样涉及到约旦、泰国和冰岛，瑞典尚未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因为他们正在等苏联政府作出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已对瑞典作出肯定答复。

赖伊说，吸收瑞典加入联合国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瑞典同丹麦和挪威在政治上属于同一类国家。

斯大林同志说，同瑞典打交道当然要比同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好得多。

赖伊说，瑞典在二战中对盟国的态度并非无懈可击，但现在不宜再提此事。

斯大林同志说，瑞典人对德国人怕得要命。

赖伊对此表示同意。

斯大林同志问，约旦是不是独立国家。

赖伊回答说，洪都拉斯实际上也不是独立国家。世界就是如此，只能接受现状。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印度是联合国成员国，那么约旦也可以加入联合国。

赖伊说，他认为印度在几年后会成为独立国家。现在在东方，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等地正酝酿着重大的事变。

斯大林同志说，战争没有白打：它唤醒了那些沉睡的民族。

斯大林同志问，赖伊是否考虑过英国给予印度自由的问题。

赖伊回答说，他认为英国人会找到出路。工党政府很可能至少会满足印度人75%—80%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贝文^①在莫斯科时说 he 考虑赋予印度以更大的权限。

赖伊笑道，贝文大概也想赋予印度经济上的自由。

赖伊说，他的活动中最有意义的内容是关心外国列强统治下的亿万民众的命运。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些民族理应获得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

斯大林同志说，赖伊在这方面的活动无疑会受到干扰，但不必为此害怕。要在这方面顽强地工作。

赖伊说，他掌握着 15 个男女不平等的国家的名单。这些国家的妇女不能享有与男子一样的上大学和就业的权利。应该作到男女平等。苏联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苏联不能实行男女平等，那它早就被推翻了。

赖伊说，联合国宪章是一份不错的文件，但要争取实施。

斯大林同志说，宪章是写得不错。当年在克里米亚就宪章的基本原则通过决议时英国人曾激烈反对过。丘吉尔以香港为例说，如果有人要英国放弃香港，他是不会答应的。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否决权的说法。丘吉尔称，如果有朝一日提出让英国退出香港的问题，他会视此为挑衅并对这一问题实施否决权。否决权就是这样产生的。罗斯福认为，假如大国只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是协调一致的原则，则很难合作。现在美国人忘掉了这一点。

赖伊指出，正像他几天前对莫洛托夫说过的那样，恰恰是美国人提出把否决权写进宪章的条款中是通过宪章的条件。但否决权本身隐藏着危险。他深知苏美这样的大国不可能让乌拉圭或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在美国发表的所有演说都强调否决权的必要性并称小国应该为和平和富裕付出代价。但作为苏联的朋友，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奉劝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慎用否决权。没有必要在小小不言的问题上使用否决权。

① Er. 贝文 (1881—1951)，1945—1951 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当然不能滥用否决权。所有好的武器一经频繁使用，就会失去它的效力和道义上的威慑力。但英美如果串通一气，终将会迫使苏联使用否决权。无论美英还是苏联都不应谋求凌驾于对方之上，这应是一切的出发点。只要存在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现象就不可能有一致基础上的合作。苏联不想滥用否决权，也不想让其他大国为所欲为，对苏联极尽孤立凌驾之能事。

赖伊回答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并表示同意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看法。他也十分清楚美国媒体掀起的反苏宣传，他认为美英被迫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同样会出现。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将来也会有。否则大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便无从谈起。

赖伊说，他已就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巴黎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向他表示了祝贺。

斯大林同志说，巴黎会议表明，只要付出努力，就能达成共识。

斯大林同志说，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工作首开战后合作之先河。因此联合国工作中摩擦在所难免，但日后会有所改善。他本人不怕分歧，也不怕冲突，更不怕美国的宣传。

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分歧在所难免。至于反苏宣传，我们背地里说，它对我们并不总是有害的，有时还有利。

赖伊说的确如此。但当他读到反苏文章时还是感到不快，苏联对盟国的全线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大林同志问，葛罗米柯^①干得怎么样。

赖伊回答说，葛罗米柯干得很好，并说索博列夫是他的得力助手。其实他还需要更多的俄国人。

^① 安·安·葛罗米柯（1909—1989），1943—1946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苏联驻联合国首任代表。

赖伊问，苏联政府是否反对联合国机构占用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的一些办公场所。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现在苏联和瑞士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苏联政府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反对意见。

赖伊说，瑞士政府借口瑞士多年以来保持中立，在军事指挥委员会的问题上提出了附加条件。他明确告诉瑞士政府，只有在瑞士政府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联合国才会把机构设在日内瓦。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观点完全正确。瑞士的中立立场是靠其他国家来支持的，它本身无法保持中立。它应该记住这一点。

赖伊在告别时说，他为受到自己和挪威人民的恩人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接见而深感荣幸。如果不是苏联和最高统帅斯大林，盟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斯大林同志指出，挪威在战争中饱受创伤。但挪威国王^①表现得很有骨气。

B. 巴甫洛夫记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4辑

^① 指挪威国王哈康七世(1872—1957)。

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会见

(1950年5月15日)

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①和巴甫洛夫同志（翻译）。

斯大林同志说，他把莫洛托夫同志也请来了，因为他是联合国问题专家。斯大林希望赖伊不会介意。

赖伊回答说，恰恰相反，他十分高兴见到莫洛托夫。他此时此刻的心情稍稍有些异样，也许是因为见到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三位著名领导人有些激动。他与最高统帅斯大林上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

赖伊说，他就是一支由一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不代表任何政府，只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和秘书处。他已经到过三个国家的首都，现在来到莫斯科，与有着2.1亿人口的苏维埃国家的领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这位领袖在人口总数达8亿的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着影响。

赖伊指出，他很高兴看到苏联所取得的进步。他曾于1921、1932、1944和1946年到过苏联。现在是1950年，他再次来到这里，亲眼看到苏联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高采烈、穿戴整齐。昨天他在狄纳莫体育场观看了斯巴达克队同列宁格勒狄纳莫队的足球赛。有一半时间他在观察看台上的观众，他对观众和球员同样感兴趣。他看到人们都穿戴整齐、举止文雅。看到此情此景他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从未对苏联做过坏事。

① 安·亚·维辛斯基（1883—1954），1949—1953年任苏联外交部长。

赖伊说现在转入正题。他对全世界的未来感到有些担忧。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的职责是为世界谋幸福。不应让目前的冷战局面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冷战中无胜利可言，因为在冷战中较量的是宣传技巧，他认为冷战是对和平的威胁。他尽一切努力结束冷战，但却因此陷于孤立，因为这涉及到各国政府。但他深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是站在他一边的。此时此刻成千上万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最高统帅斯大林，他们期望最高统帅能有所作为。他，赖伊也期待着斯大林给他出谋划策。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对世界现状忧心忡忡，他们希望和平，因为他们深知几年后冷战将转化为热战。

赖伊日程中的首要问题是下面的问题。他认为大国首脑会晤将是有助于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举措。他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8年，当时他同爱瓦特^①吁请大国首脑会晤解决分歧。他从苏联政府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于当年4月23日与杜鲁门见面时再次提出大国首脑能否举行会晤的问题。杜鲁门说，他十分欣赏斯大林。还说他1945年同最高统帅会面时曾提出为苏联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但却遭到冷遇，当众受辱。杜鲁门没说是谁令他如此难堪。

赖伊是从报上得知杜鲁门表示愿意与斯大林会见的，他问杜鲁门这一态度有无变化。杜鲁门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在华盛顿欢迎斯大林。杜鲁门说，他会派美国最好的战列舰去迎接斯大林。

赖伊回答说，不能把杜鲁门的这一提议看成是实用政治的产物。

赖伊想就会见的形式问题征询斯大林的意见。也许，最高统帅对会晤地点会有所考虑。赖伊不主张在华盛顿见面。他认为可以选在美国的基韦斯特，那里非常安全。他也考虑过伦敦，因为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更稳妥一些。他还考虑过瑞士和瑞典。

英国春季大选期间丘吉尔曾提出与斯大林会见解决分歧的建议，

①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兼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方面对此作出了反应，说联合国正是解决分歧之地。而当赖伊提出联合国要为解决大国之间的分歧尽力时，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均未作出反应。这一事实使赖伊认识到美英法等国对联合国毫无诚意。看来他们需要的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他们占多数的机构。

赖伊说他想就上述问题听取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举行首脑会晤是可以的。会晤可以安排在任何地方，只是事先要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通过外交部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未进行这样的准备、未弄清基本的立场以及不能肯定会晤是否会取得成果之前，讨论会晤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赖伊回答说，他对各国政府首脑会晤心存疑虑，因此他对要在联合国内部开展的准备工作拟定了几条建议。他向刚刚去过的几个国家提交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名为“20年和平纲领”（这时赖伊把备忘录呈给斯大林同志）。实现这一纲领的首要条件应该是理顺中国问题。如果埃及承认毛泽东政府的消息属实，如果法国也像该国外交部秘书长巴罗狄向赖伊保证的那样承认北京政府，那就是7票。这样蒋介石的代表就会退出安理会，毛泽东的代表将取而代之。中国问题一旦理顺，安理会就可以定期召集会议，会议可以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如巴黎或日内瓦召开。安理会定期会议将会讨论成员国所关心的所有问题。赖伊的备忘录只是大致列出了这类问题。安理会成员国开会时会对纲领和工作方法进行协商。安理会定期会议在初期不会取得很大成果，但这没关系。

赖伊说，他猜想斯大林已经从安·亚·维辛斯基那里拿到了他说的这份备忘录。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已经拿到了这份备忘录而且已经知道了内容。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份备忘录是几天前从维辛斯基那里拿到的。赖伊今天的阐述以及备忘录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赖伊试图给无法调

和的各方充当调解人。这当然不错，但赖伊的备忘录并不符合这一目的，它带有一边倒的性质。随便举出备忘录的哪一条都可以证明，它阐述的是美国人的观点，而不是可以作为协议基础的观点。他可以举出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为例，比如，赖仍在其中一条中谈到召集安理会定期会议。这个主意很好，联合国宪章中已有规定。但赖伊却只字不提没有中国参加安理会不得召集会议。国民党大势已去，在中国人民中已无任何分量和基础可言，已不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特里格夫·赖伊对此却避而不谈。

赖伊回答说，他已经口头知会杜鲁门、艾奇逊、艾德礼、贝文、皮杜尔和舒曼各方，召集安理会会议的必要条件应是事先理顺中国问题，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规定，安理会中要有中国代表。他，赖伊，所指的中国代表自然仅指毛泽东的代表。

莫洛托夫同志说，但赖伊在备忘录中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尽管中国的意义丝毫不逊于锡兰这个人人关心的国家。

赖伊回答说，这是个误会，因为原以为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之后他所拟定的纲领才能实施。

莫洛托夫同志说，但备忘录中对此只字未提。

赖伊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专门条款写进备忘录第一栏第一条中。

莫洛托夫同志说，赖伊在备忘录中谈到限制使用否决权的问题，这完全是直接损害苏联利益的美国观点。

赖伊在备忘录中接着谈到对原子能的监控问题，但未提出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这是不客观的阐述问题的方法，是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赖伊接着谈到对军备竞赛的监控问题，但他的语气与美国报纸上的言论如出一辙。苏联就削减武器问题提出的建议被驳回，赖伊对苏联的建议不置可否。

莫洛托夫同志说，备忘录中随便哪一条阐述的都是美国人的观点，备忘录带有一边倒的性质，他从中看不出任何调解的尝试。

莫洛托夫同志说，备忘录中有关联合国武装力量的条款也不例外。苏联一贯赞成履行联合国宪章中的有关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坚持平等原则的建议。但赖伊是用美国的观点来阐释这个问题的。

莫洛托夫同志说，赖伊谈到有关技术援助的规划问题，但不知为何他说这一援助应只是主要由、而不是只能由联合国实现。赖伊的这种说法为美国人违反联合国规定提供了可乘之机。

莫洛托夫同志说，赖伊的备忘录就其目前的形式来看是一份片面的文件，在许多问题上反映的是美国人的观点。这份备忘录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

赖伊叹道：“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讲得很开诚布公，因为会见是在小范围举行的并且没有记者在场。

赖伊说，他尽量提出那些可以作为协议基础的东西。

莫洛托夫同志问这一基础是什么。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人在世界上步步为营，策划原子战争，赖伊在备忘录中对此却只字不提。

赖伊说，他没想过做调解人。当他看到联合国的机构尚未完善，席位空缺，而有的席位又被那些不能代表本国的人占据时，当他不得不亲眼目睹冷战和大国之间不合作的现象时，就感到自己有责任找到让大国走在一起的途径。但他明白他不会成为调解人。

赖伊说他的备忘录并不是最后的文本，还可以补充一些条款。

赖伊说，至于否决权问题，他本不想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宪章所赋予的权利。但他并不认为讨论否决权的问题有什么不妥。宪章规定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至于原子能的问题，他完全同意苏联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说，但特里格夫·赖伊在备忘录中对此只字未提。

赖伊说，这可以讨论。

赖伊说，国际红十字会在发布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倡议书前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红十字会的这一举动表示赞赏并答复说，此类倡议书对他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来说不啻一种声援。

斯大林同志说，莫洛托夫同志谈到的问题既包括备忘录中没有的内容，也包括备忘录中有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问，备忘录能否修改？

赖伊说可以修改并说，他听莫洛托夫同志说备忘录反映的是美国人的观点时感到有些痛心。

他在拟定备忘录时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了种种磨难。也许是自己尚未掌握胜任此项任务的技巧，但他会尽力而为。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理应始终坚持受到某些成员国支持的联合国权力。如果他处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上，在谈到如何实现对落后民族的援助时会采取另外的措词。这种援助应该只能由联合国、而不是主要由联合国实施。这是对弱小国家的保护。莫洛托夫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对的^①。

赖伊回答说，他对此表示同意，但若要做个现实的政治家，则要考虑它的可行性。

任何援助只能由联合国实施，他始终为此而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正确。赖伊说，有苏联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坚持这一正确方针。

斯大林同志说，这类事情目前并未经过联合国，完全适在联合国以外运作的。应做到至少大多数由联合国运作。

赖伊说，他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要从美国国会获得维持联合国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

① 原文中此后删去了“斯大林同志说”一语。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如果赖伊坚决捍卫联合国的权力，那他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份量就会加重，他就会获得更多的经费和尊重。

赖伊说，他当然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为此而奋斗。这种局面只能靠斗争、而不能靠让步得来。赖伊总是急于作出让步。

赖伊说，联合国1948年开始实施技术援助，此项援助募集到70万美元的经费。后来杜鲁门看到这项事业颇有收益，对此大加赞赏，并把它写进一月份给国会的咨文中，不过他在其中谈到这种援助只能由联合国实施，但国会并不支持杜鲁门，提出通过几种途径对落后国家实施援助：通过美国政府、私有化康采恩和在很小程度上通过联合国。不过，他将继续争取实现由联合国对落后国家实施援助。

莫洛托夫同志说，既然如此应该对备忘录中的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斯大林同志指出，赖伊在备忘录中提到了批准国际贸易组织章程的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人企图利用这一章程达到自己垄断市场的目的。这对苏联没有影响，因为苏联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国际贸易组织章程的现有文本对弱小民族会起到压制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放宽章程的某些条件，那章程是可以获得批准的。

莫洛托夫同志说，此外还存在对外贸易上待遇不平等的问题。美国有些集团在苏联对外贸易方面采取的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某些康采恩和实业集团被禁止同苏联作贸易。有关对外贸易中待遇不平等的问题应该写进备忘录中。

莫洛托夫同志说，对外贸易领域至少应该恢复战前的秩序。

赖伊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二位就对外贸易上待遇不平等的问题发表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杜鲁门对赖伊谈到，据杜鲁门说他想向苏联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还说他受了某人的侮辱后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想就这一问题作一下解释。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主张不受限制地同美国进行贸易。我们没有要求贷款。在战争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我们需要贷款，现在我们不需要了。不过如果有人想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会接受。但我们决不把改善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

赖伊说，他非常感谢他们二位就有关问题发表的看法。他终于明白了最高统帅斯大林并不反对安理会定期召开会议。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安理会定期会议有中国参加，他是不会反对的。

赖伊回答说，当然这个条件应是先决条件。

赖伊说，他本来并未指望这份备忘录被全盘接受，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

赖伊说，他认为，如果最终决定定期召开安理会会议，明智的做法是事先成立一个委员会筹备安理会定期会议的纲领和日程。例如，既然议题要涉及到原子弹，那么就要讨论红十字会的建议。

至于限制使用否决权的问题，如果某些大国不愿就此展开讨论，也可以把它从日程上取消。应该让安理会成员国在召开定期会议前就他们将要讨论的问题范围达成协议。

特里格夫·赖伊恳请把他的备忘录仅仅视为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莫洛托夫的意见完全正确，并说，如果这些意见能在备忘录的最终文本中予以考虑就再好不过了。

斯大林同志说，莫洛托夫并未要求不讨论否决权问题。莫洛托夫的意思是，如果要求苏联作出让步，同时也得要求美国作出让步。

莫洛托夫同志说，否则无法达成协议，并问，美国是否打算在某方面迎合苏联。

赖伊回答说，现在还看不出有这个迹象。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不好办了。

赖伊说，他在华盛顿时人家叫他亲苏派。

斯大林同志说，调解人的命运概莫如此，两头挨骂，但最终中间路线会取胜。

赖伊说，他还想再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希腊儿童的。他知道苏联没有希腊儿童，但别的国家有。1948-1949年联合国一致通过决议，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还在希腊并且未被拘捕，就应该让这些孩子回到自己的国家。他认为，收容希腊儿童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可能会惹火烧身，因为他们的做法一直遭到批评。

赖伊说，如果能证实这些孩子的父母还在希腊，就应该把这些希腊儿童遣送回去。

赖伊说，1948年苏联代表曾提出建议，应由国际红十字会与这些孩子所在国的红十字会协同完成遣返工作。

赖伊说，他想请最高统帅斯大林在遣送希腊儿童回国这件事上利用自己的影响并提供帮助。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此事涉及到苏联，他会立即对赖伊提出的问题予以答复。但问题涉及到其他国家，对他来说这是新问题。应该征询一下有关国家政府的意见。**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能代替这些政府解决赖伊提出的问题。他主张孩子应该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但应该了解一下这些孩子所在国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

赖伊说，他感谢**斯大林**同志作出这一答复。他想补充的是，希腊儿童问题令他寝食难安。说一个数字就足够了，他已经收到大约90封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了。

赖伊说，他还想谈谈有关苏联加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专门机构的问题。他知道苏联已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但未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他知道这些组织不会为苏联带来益处。苏联的卫生和教育事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粮食也能自给。但非洲和亚洲还有成千上万人目不识丁，饱受疾病和饥饿之苦。他恳请最高统帅斯大林仔细考虑苏联是否加入这些组织的问题。问题是苏联的敌人不断地指责苏联只加入了联合国和其中两个专门机构，而未加入他刚刚提到的那些专门机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会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赖伊说，现在他想谈谈有关苏联提出的在柏林进行选举的问题。苏联提议占领军撤出柏林并于当地在监督下进行选举。这一建议遭到美英法等国的反对。也许联合国可以在从柏林撤军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不清楚此事，他会过问一下。

赖伊说，他最后想谈谈奥地利条约以及缔结和约的问题。如果缔结和约的问题有所进展就再好不过了。

斯大林同志说，有关奥地利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但他并不了解此事。谈判最终会达成协议，这是肯定的。

赖伊对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会谈表示感谢，祝他为了世界的幸福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会谈于 22 时开始，23 时 20 分结束。

巴甫洛夫记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2001 年第 4 辑

在保卫我们的国家时，我们必须采取进攻方式。由防御转入进攻性的军事政策。我们必须本着进攻的精神，改革我们的教育、宣传、鼓动和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就是进攻性军队。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三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七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七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7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中国革命篇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五一年

签署中央政治局决定

1、就同中国谈判的原则致越飞电 ^① (1922年8月31日)	3
2、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帝斗争的政策 (1923年1月4日)	5
3、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 (1923年3月8日)	7
4、弄清楚越飞对张作霖建议的看法 (1923年3月26日)	9
5、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1923年8月2日)	10
6、拨款50万金卢布援助孙逸仙 (1924年1月24日)	11
7、由伏龙芝负责实施援助计划 (1924年3月20日)	12
8、关于批准与中国的协定问题 (1924年7月24日)	13
9、致函国民党吊唁孙逸仙逝世 (1925年3月13日)	14

① 标题仅为文件重点内容，全部内容请查阅全文。——本书制作者注

10、在中国建立两所军事学校	
(1925年3月13日)	15
11、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5年3月19日)	17
12、正式决定建立中山大学	
(1925年4月2日)	18
13、责成加拉罕开始同张作霖谈判	
(1925年4月2日)	19
14、帮助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	
(1925年5月7日)	21
15、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	
(1925年5月15日)	23
16、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1925年6月11日)	24
17、增加全俄工会电汇上海的款项	
(1925年6月18日)	27
18、推进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	
(1925年6月25日)	28
19、责成中国委员会作出综合报告	
(1925年8月13日)	30
20、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1925年8月22日)	31
21、批准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的预算	
(1925年9月17日)	32
22、补充拨款为中共组织军政训练班	
(1925年9月17日)	33
23、促使中国当局颁布工会合法化的法律	
(1925年9月24日)	35

-
- 24、 责成加拉罕提出关于中国的总报告
 (1925 年 10 月 15 日) 36
- 25、 在最短期限内向中国提供武器
 (1925 年 10 月 22 日) 37
- 26、 基本上采纳伏龙芝来信的建议
 (1925 年 10 月 29 日) 39
- 27、 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
 (1925 年 11 月 5 日) 42
- 28、 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
 (1925 年 12 月 3 日) 43
- 29、 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
 (1925 年 12 月 3 日) 45
- 30、 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中国局势
 (1926 年 1 月 7 日) 47
- 31、 紧急向中国派出使团
 (1926 年 1 月 14 日) 48
- 32、 保护苏联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
 (1926 年 1 月 21 日) 49
- 33、 向拉萨派驻苏联非官方代表处
 (1926 年 1 月 21 日) 50
- 34、 刊登塔斯社关于满洲冲突的报道
 (1926 年 1 月 25 日) 51
- 35、 关于中东铁路可以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
 (1926 年 1 月 28 日) 53
- 36、 起草就满洲事件告全体劳动者书
 (1926 年 2 月 4 日) 54
- 37、 消除中东铁路某些员工的沙文主义情绪
 (1926 年 2 月 11 日) 56

-
- 38、说服国民党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2月18日) 59
- 39、同胡汉民讨论建立高等军事学校问题
(1926年3月11日) 60
- 40、解除中东铁路搞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负责人职务
(1926年3月18日) 61
- 41、关于对满洲和日本政策问题的建议
(1926年3月25日) 63
- 42、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年3月25日) 65
- 43、通过专门委员会关于日本和满洲问题的建议
(1926年4月1日) 66
- 44、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1926年4月1日) 68
- 45、不希望广州军队进行军事远征
(1926年4月15日) 78
- 46、要求张作霖保证我驻北京代表机构的安全
(1926年4月22日) 82
- 47、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
(1926年4月29日) 84
- 48、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
(1926年5月6日) 86
- 49、关于国民军代表同张作霖谈判问题
(1926年5月6日) 87
- 50、对同张作霖谈判拟定的指示
(1926年5月13日) 88
- 51、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
(1926年5月20日) 90

-
- 52、弄清冯玉祥在返回军队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1926年5月27日) 92
- 53、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北伐问题
(1926年8月5日) 95
- 54、将加拉罕正式从中国召回
(1926年10月14日) 97
- 55、目前主要军事危险是奉系军队
(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 99
- 56、对广州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
(1926年10月29日) 103
- 57、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学生的建议
(1926年11月4日) 106
- 58、远东局对发动武装起义采取了轻率态度
(1926年11月11日) 107
- 59、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
(1926年11月18日) 109
- 60、加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25日) 111
- 61、通过罢工加强工会和党组织对群众的领导
(1926年12月2日) 113
- 62、成立审查中国开支账目的检查委员会
(1926年12月16日) 115
- 63、在城市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斗争是错误的
(1926年12月23日) 117
- 64、中山大学必须服从中央鼓动宣传部的领导
(1926年12月30日) 119
- 65、日本必须放弃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政策
(1927年1月6日) 121

-
- 66、调解鲍罗廷和加伦之间的误解和摩擦
(1927年1月27日) 123
- 67、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
(1927年2月5日) 124
- 68、责成苏联商船队派船去广州
(1927年2月10日) 126
- 69、英国推行干涉和恐吓政策必遭失败
(1927年2月17日) 127
- 70、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都不能容许
(1927年2月17日) 130
- 71、在宁夏或其他地点建立电台
(1927年2月24日) 132
- 72、目前中国革命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
(1927年3月3日) 133
- 73、应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
(1927年3月10日) 136
- 74、真正捍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1927年3月24日) 139
- 75、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
(1927年3月31日) 141
- 76、对逮捕苏联公民搜查使馆人员住所提出抗议
(1927年4月7日) 144
- 77、召回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苏联顾问
(1927年4月21日) 147
- 78、不能建议汉口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
(1927年4月27日) 149
- 79、在作出特别决定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
(1927年4月30日) 151

-
- 80、采取紧急措施、保守工作机密
 (1927年5月12日) 153
- 81、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5月13日) 155
- 82、驳斥托季反对派对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攻击
 (1927年5月19日) 157
- 83、重新审议中山大学的教师组成人员
 (1927年5月19日) 161
- 84、不得向武汉和上海发出密电和指示性电报
 (1927年5月26日) 163
- 85、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是可行的
 (1927年8月11日) 165
- 86、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
 (1927年8月18日) 168
- 87、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
 (1927年8月25日) 171
- 88、同意派同志去中国工作的建议
 (1927年9月1日) 173
- 89、最好让陈独秀来莫斯科
 (1927年9月15日) 174
- 90、我们与冯[玉祥]的关系早已结束
 (1927年9月22日) 176
- 91、警告中共防止过去的国民党员加入中共
 (1927年9月29日) 178
- 92、向孙逸仙大学提出逐步共产主义化的任务
 (1927年10月6日) 180
- 93、要采取措施建立苏维埃
 (1927年10月6日) 181

94、不支持在华北交战的任何一方	
(1927年10月13日)	183
95、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将力量分散	
(1927年10月27日)	184
96、采取措施保护我国在华公民和机关	
(1927年12月6—17日)	186
97、对于广州事件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1927年12月6—17日)	187
98、就中国事变制定整个活动的纲领	
(1927年12月22日)	188
99、赞同孙逸仙大学清洗右派国民党员的工作	
(1927年12月29日)	189
100、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必然的伴侣	
(1927年12月29日)	191
101、去北京商谈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	
(1928年1月5日)	193
102、同意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1928年2月23日)	195
103、审议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的问题	
(1928年3月1日)	196
104、把将中国人逐出苏联降到最低限度	
(1928年3月15日)	197
105、拨给中方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全部预计利润	
(1928年3月15日)	198
106、米夫参加中国委员会和蒙古分委员会	
(1928年3月22日)	200
107、清洗军事院校中国学员中的国民党分子	
(1928年3月22日)	201

108、同意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作出调整	
(1928年4月19日)	206
109、指示苏联[驻华]机构所有人员留在原地	
(1928年5月17日)	208
110、在孙逸仙大学集中培训中国工作人员	
(1928年5月24日)	209
111、我驻华代表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	
(1928年6月14日)	211
112、对搜查苏联驻华领事馆提出抗议	
(1928年6月21日)	213
113、斯大林因负担过重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928年6月28日)	214
114、给中国共产党拨6个月经费34万卢布	
(1928年7月26日)	215
115、鲍罗廷在在华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	
(1929年5月23日)	216
116、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	
(1929年10月15日)	217
117、三所共产主义大学不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1930年1月25日)	219
118、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30年2月15日)	220
119、成立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撤校工作委员会	
(1930年4月5日)	221
120、研究接受中国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的办法	
(1930年4月5日)	222
121、对沙文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30年5月15日)	223

- 122、军事学习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游击队人员
 (1930年6月15日) 226
- 123、关于南京人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1932年6月16日) 228
- 124、不侵犯条约可在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解决
 (1932年12月10日) 229

致中央领导成员函电

- 一、转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问题的答复
 ——致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一封信
 (1926年2月16日) 231
- 二、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23日) 235
- 三、关于给中国汇款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4日) 236
- 四、我担心, 武汉会胆怯, 屈从于南京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 237
- 五、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与退出国民党联系起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8日) 239
- 六、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7年7月9日) 240
- 七、我们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1日) 244

八、匆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印象不好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6日）	245
九、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	246
十、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摘录）	
（1930年8月13日）	247
十一、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①	
（1931年9月23日）	248

关于中国革命的讲话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	
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251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27年9月27日）	262
附录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谈话的记录	
（1928年6月9日）	264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年11月11日）	269
同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年11月—1942年3月）	272
关于印度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	
（1951年2月9日）	276

附录 物质援助中国共产党

- 1、请转运货物给八路军使用
——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
(1939年1月8日) 282
- 2、寄给你们一个贵重的包裹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7月28日) 283
- 3、钱交给了亲密的朋友们
——普罗斯库洛夫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8月22日) 284
- 4、要求大规模组织医疗援助
——任弼时等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9月8日) 285
- 5、寄去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包裹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9月21日) 286
- 6、要求为军事学校提供技术装备和教员
——周恩来和任弼时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10月3日) 287
- 7、要求为八路军和中共干部医院筹集资金和人员
——季米特洛夫致安德烈耶夫信
(1940年1月13日) 289
- 8、要求青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
——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致周恩来和任弼时电
(1940年1月29日) 291
- 9、收到无线电器材若干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年2月8日) 292

目 录

- 10、需要 30 万人的防流行病药剂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2 月 24 日) 293
- 11、无线电发报机等已给你们发出
——季米特洛夫致周恩来电
(1940 年 4 月 23 日) 294
- 12、在你们那里积压了大量重要包裹和材料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
(1940 年 7 月 16 日) 295
- 13、规定给我党的款项短缺 87410 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8 月 10 日) 296
- 14、寄回英镑，请寄给我们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11 月 26 日) 297
- 15、可以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0 年 11 月 27 日) 298
- 16、两笔美元和 6 箱各种器材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2 月 17 日) 299
- 17、请拨给我们今年款项总额 1 百万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5 月 16 日) 300
- 18、你们的人拒绝接收书籍等物资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1 年 5 月 21 日) 301

- 19、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 100 万美元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4 号记录（摘录）
（1941 年 7 月 3 日） 302
- 20、为给毛泽东治病急需以下药品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8 月 7 日） 303
- 21、上一份电报中药品名称不全准确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8 月 13 日） 304
- 22、寄去 60 万（美元）请确认收到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1 年 9 月 5 日） 305
- 23、35 箱物资和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13 日） 306
- 24、我们决定建立情报部需 50 万美元等援助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29 日） 307
- 25、寄重庆周恩来的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 年 1 月 13 日） 308
- 26、你们收到的款项是 100 万元援助的一部分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2 年 1 月 17 日） 309
- 27、能否寄来我们需要的全套药品和器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 年 4 月 8 日） 310

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

关于 1945 年 4 月时中国的局势

——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节选）

（1945 年 4 月 15 日） 312

附录一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国共谈判问题

（1945 年 9 月 6 日） 318

附录二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国共谈判和
中国政治、军事形势

（1945 年 10 月 10 日） 322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与中共关系等问题

（1945 年 12 月 30 日） 326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关于东北形势等问题

（1946 年 1 月 3 日） 342

答复蒋介石的来信

（1946 年 1 月 4 日） 354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有关中国共产党近期工作的情况

（1946 年 1 月 7 日） 355

附录四 联共（布）中央：毛泽东可随时前来莫斯科

（1947 年 6 月 15 日） 357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篇目

（1918 年—1927 年） 360

附录 朝鲜支援中国解放战争

朝鲜党和人民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支援

（1945 年—1949 年） 363

插图

一 上海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 105

二 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旧址 210

三 宁汉合流，汪精卫叛变 238

四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 359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正在逐步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译者注，三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中的部分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中国革命篇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五一年

簽署中央政治局決定

斯大林签署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1922年—1932年)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

1、就同中国谈判的原则致越飞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摘录）

1922年8月31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候补委员）、斯大林^①同志。

中央委员：古比雪夫同志、拉狄克同志。

2. 致越飞^②同志电（加拉罕^③同志）

发给越飞同志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①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

① 1922年4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选举约·维·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书制作者注

②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1927），苏联著名政治家、外交家。1923年1月，曾任苏联特使与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会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本书制作者注

③ 加拉罕，列夫·米哈依洛维奇（1889—1937），曾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首任苏联驻华大使。——本书制作者注

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②，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 斯大林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下同，不另注明）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10，第 1、4 页。

铅印稿。^③

① 指 1919 年 7 月 25 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表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和 1920 年 9 月 27 日发表的《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原注

② 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原注

③ 本篇和以下所刊斯大林签署的有关中国革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均选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各卷。文件的标题均为我们所拟加。——本书制作者注

2、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帝斗争的政策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2 号记录（摘录）

1923 年 1 月 4 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同志

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安德烈耶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索尔茨同志

2.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3）马林^①的问题

（1）确认政治局以前关于中东铁路的决议（1922 年 11 月 16 日第 36 号决议）^②。

（2）责成越飞同志发表一般性的宣言，说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中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反帝斗争的原则基础上的，问题

① 马林，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1942），荷兰革命家，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1921 年根据列宁推荐来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工作近三年，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本书制作者注

② 1922 年 11 月 16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 1922 年月 13 日委员会会议的纪要。纪要中谈到，俄罗斯保留中东铁路的财产，但作为东方各族人民的朋友和帝国主义的敌人，俄罗斯放弃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并准备向中国作出让步：缩小划归铁路的地带，以优惠条件提前赎回铁路，参与铁路的共同管理。文件中说，“近期采取的步骤是以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取代敌视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原注

应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力争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解决。宣言中应坚决驳斥被认为是错误的远东局照会，并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结束同白卫分子的斗争。

(3)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4) 指示远东革命委员会^①，它不应干预对外政策。

(5)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召开预备会议。

(6)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列宁同志的名义起草给孙逸仙的答复。

(7) 同意越飞同志休假，并按通常的程序通过中央委员会拨给治疗所需的费用。

(8) 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同志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追加拨给必要经费〔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28，第 1、2、4 页。

铅印稿。

① 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远东边疆区的执行机构——远东革命委员会。——原注

3、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摘录）

1923 年 3 月 8 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候补委员）同志。

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同志。

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3. ——关于中国。

（越飞同志的建议）

（契切林^①、加拉罕、李维诺夫^②同志出席）

（1）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部分。

（2）认为最好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立的形式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3）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 200 万墨西哥元的资助。

（4）认为必须经孙逸仙同意后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

（5）认为最好让越飞同志来莫斯科商谈，并跟越飞同志商定来莫时间。

① 契切林，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苏联外交家，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本书制作者注

②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苏联外交家，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本书制作者注

(6) 向越飞同志指出，政治局非常担心孙逸仙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

(7) 责成由契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政治局下次会议前在业已通过的指示的基础上制定给越飞同志的指示草案，并务必将草案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委员会由托洛茨基同志召集。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39，第 1、2、5 页。

铅印稿。

4、弄清楚越飞对张作霖建议的看法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7号记录（摘录）

1923年3月26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李可夫同志。

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布哈林同志。

中央委员：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斯米尔诺夫同志。

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1. ——关于中国问题。

（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1）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弄清楚越飞同志对张作霖建议的看法，并通过达夫谦同志将此建议告知孙逸仙，征询他的意见。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征询达夫谦同志的意见，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可用来作为越飞同志的指示。

（3）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时不要使张作霖得出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的印象。

（4）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废除达夫谦同志签订的关于中东铁路的协议，并对达夫谦同志违背中央的指示提出警告。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后不要再把重要的事务委托给达夫谦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343，第1、4页。

铅印稿。

5、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摘录）

1923 年 8 月 2 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李可夫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泽和克维林等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3 年 7 月 31 日通过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1）任命鲍罗廷^①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罕同志一起赴任。

（2）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3）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4）责成鲍罗廷同志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尽可能每月一次）。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69，第 1、6 页。

铅印稿。

① 鲍罗廷，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1884—1951），苏联外交家，1923 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俄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本书制作者注

6、拨款 50 万金卢布援助孙逸仙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4 号记录（摘录）

1924 年 1 月 24 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克维林、库比雅克、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苏利莫夫、斯克雷布尼克、哈里托诺夫、丘巴尔同志；候补中央委员斯克雷布尼克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4——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1) 关于孙逸仙（1923 年 12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第 58 号记录 3. (3) ），（契切林、维经斯基^①同志）。

(1) 拨款 50 万金卢布用于购买……^②

(2) 为解决采购地点问题……任命由克拉辛、契切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安德烈耶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契切林同志召集。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12，第 1—2、8 页。

铅印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维经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纳乌莫维奇·札尔欣（沃依琴斯基）（1893—1953），苏联革命家，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本书制作者注

② 文中删节号是原有的。——原注

7、由伏龙芝负责实施援助计划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摘录）

1924年3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0号（特字第×号）^①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5]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报告人：契切林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

决定：1. — [5]（1）通过加拉罕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计划，决定委托伏龙芝^②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

（2）将早先决定的200万卢布的发放日期推迟至接到加拉罕的文件后执行。

抄送：

伏龙芝同志—（1）；

契切林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全部；

布留汉诺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1，第40页。

打字稿，记录原件，斯大林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原文如此，没有标明号码。下同。——原注

②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1885—1925），苏联杰出军事家，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本书制作者注

8、关于批准与中国的协定问题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

1924年7月24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同志。

中央委员：库克林、克拉辛、安季波夫、安德烈耶夫、曼努伊尔斯基、彼得罗夫斯基、苏里莫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索尔茨同志。

听取：13. 关于批准与中国的协定问题^①（报告人：罗特施泰因、科普同志）。

决定：13. 一[1]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将同中国的条约按苏维埃程序报批。

[2] 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不得将外国政府已批准并有明显不能接受的提法的条约提交政治局讨论。

[3]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今后与中国的谈判，包括会议，在对中东铁路条款作解释时，要力图不使苏联政府为向中东银行的持股人及其国籍选择支付补偿承担任何责任。执行这个指示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不破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452，第1、2、6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协定。——原注

一九二五年

9、致函国民党吊唁孙逸仙逝世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2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3 月 13 日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莫洛托夫、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翟鲁巴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孙逸仙逝世的问题。

决定：（2）—（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逸仙逝世。

（2）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孙逸仙灵柩献花圈。

（3）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全中国人民书。

（4）责成维经斯基照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群众大会的组织工作。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指示在整个欧洲组织相应的群众大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92，第 1、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0、在中国建立两所军事学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2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3 月 13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2 号（特字第 39 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 加拉罕同志的建议。（李维诺夫、伏龙芝、斯大林同志）。

决定：（1）通过伏龙芝同志的以下建议：

（1）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由我们建立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

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 30—40 人。

通过伏龙芝同志在一年内拨出一百万卢布用于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

（2）认为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是可行的。装备应是有偿的。

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与此事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

责成加拉罕同志查明对方支付武器费用的能力，或用货币支付，或用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和产品（棉花、茶叶等）支付。

（3）认为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如需无偿拨给则要恢复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贷款，数额为所拨武器的价值金额。

（4）认为有必要对派往中国的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进行最起码的军事训练。

责成伏龙芝同志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商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拨给他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款项。

(2) 责成中央书记处根据在中国建立两所新的军事教官中心的需要，提出两名政治领导人的候选人。

(3) 由伏龙芝同志全面照料和领导教官学校的工作。

(4) 注意到伏龙芝同志的如下报告：特种订货委员会正在就吸收外资建立一个生产 3—X 型线型子弹的新机枪弹药厂问题进行谈判。建议委员会一个月后向政治局报告谈判进程。

抄送：

伏龙芝同志——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1)；

卡冈诺维奇同志——(2)；

书记处——(2)。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85，86，8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1、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3 月 19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3 号（特字第 40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1）（1）关于授予我国驻奉天总领事为外交代表称号一事暂缓。

（2）认为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并责成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同志就此问题拟定一份报告交政治局。

（3）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布罗伊多同志——（2）；

维经斯基同志——（2）；

伏龙芝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3）；

彼得罗夫同志——（3）。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89、9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正式决定建立中山大学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5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4 月 2 日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多加多夫、卡冈诺维奇、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翟鲁巴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瓦雷基斯、马尔科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

6. 一关于建立中山大学^①的问题（1925 年 3 月 19 日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决定：1. —〔1〕）。

（报告人布罗伊多、维经斯基、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6. —（1）认为在西伯利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 500 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

（2）为说明建立大学、选择地址、确定其组成人员的措施，成立由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会议由布罗伊多同志召集。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95，第 1、3、9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即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本书制作者注

13、责成加拉罕开始同张作霖谈判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5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4 月 2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5 号（特字第 42 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加拉罕同志的建议（报告人李维诺夫、伏龙芝同志）。

决定：1. —（1）（1）原则上不拒绝加拉罕同志的建议，责成他开始同张作霖谈判。

（2）建议加拉罕同志弄清楚张作霖希望购买苏联武器的动机，并说明自己对这种买卖是否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看法。

（3）认为只有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给予实际补偿才能出售武器。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伏龙芝同志。

听取：38.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决定 1—（1））。

决定：38. —委托伏龙芝同志召集监督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会议。

抄送：

伏龙芝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99、10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4、帮助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2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5 月 7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2 号（特字第 45 号）记录

1925 年 5 月 5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

34.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4. ——接受伏龙芝同志的建议（见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第 62 号记录决定：34 附录

就加拉罕同志提出的与广州局势有关的要求问题，我建议：

1. 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 200 人的教官团。

2. 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 50 万卢布）。

3. 为同样目的拨出 2 万支步枪、100 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由作为军队固定器材的红军机动储备品中提供的那部分装备，必须通过向军工部门提供相应数额的补充订货立即加以恢复。款数由伏龙芝同志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协商后确定。

4. 把拨出的器材和资金作为给中国政府的贷款提供。

5. 人员的派遣以及装备的发送，要绝对保密。利用“沃罗夫斯基”号通信船运送人员和装备是不适宜的。责成中国委员会为此寻找其他途径（国营轮船、私人船、外国船等）。

6. 让布勃法夫同志参加中国委员会。

温施利赫特同志当伏龙芝同志的副手。

已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15—117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件为经过核对的副本，签字字迹不清。

15、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3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5 月 15 日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莫洛托夫、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5 年 5 月 12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

9. 一关于中山大学。

决定：

9. 一（1）同意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建立该大学的建议。

（2）其他方面的问题交中央组织局审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03，第 1—2、4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6、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6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6 月 11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6 号（特字第 49 号）记录

听取：

20. 一伏龙芝同志的报告。

决定：20. 一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见附录）。

抄送：伏龙芝同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1925 年 6 月 11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29. 一关于中国问题（1925 年 6 月 4 日政治局会议第 65 号记录，决定：41）。

决定：29. 一（1）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 5 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

（2）在集会上通过关于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的决议。

（3）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采取措施，活跃“不许干涉中国”的社会活动。

抄送：

戈尔布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送）；

托姆斯基同志——全部；

乌格拉诺夫同志——（2）、（3）；

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附录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 年 6 月 11 日核准]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1. 为执行政治局今年第 52、62、64 号指示，中国委员会在今年 5 月 29 日和 6 月 5 日的两次会议上决定：

（1）到 1925 年 10 月 1 日止拨款 71 9019 卢布 54 戈比用作军政人员的生活费用、学校经费和秘密开支。

（2）到 1925 年 10 月 1 日止拨款 47 7000 卢布用于在广州组建两个新的师团和为其运送武器。

（3）一次性拨款 10 万卢布用于组建混合运输公司，为库伦—张家口路段服务。

（4）到 1925 年 10 月 1 日止拨款 27 0039 卢布用于运送给国民党将领的器材。

（5）按相当于转交给国民党将领的军事器材的重购价值，即总额 304 4076 卢布 20 戈比，恢复给军事部门的 款。

（6）到 1925 年 10 月 1 日止总的开支额确定为 461 0134 卢布 74 戈比。

（7）除上述支出外，为派遣外交信使每月去北京两次，根据有关条款每月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增加预算 2600 卢布。

（8）凭票据赊销给国民党将领和广州的军事器材两年后付款。

2. 鉴于加拉罕同志新的申请，认为除已经拨给的之外，还可以向国民党将领补充提供带子弹的步枪 5000 支、带炮弹的炮 12 门、带子弹和附属用具的机枪 50 挺和技术器材若干。

按相当于上述器材的重购价值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

为运送上述器材补充拨出贷款。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62，卷宗 2，第 124—128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斯大林的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签字字迹不清。

17、增加全俄工会电汇上海的款项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7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6 月 18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7 号（特字第 50 号）记录

1925 年 6 月 13 日〔电话征询〕

听取：18. 一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8. 一除 1925 年 6 月 11 日决定拨给的（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的）款项以外，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 5 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

抄送：

托姆斯基同志——全部；

戈尔布诺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送；

斯莫利亚尼诺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送。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29—13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8、推进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8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6 月 25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8 号（特字第 51 号）记录

1925 年 6 月 22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17. 一加拉罕同志的电报。

决定：17. 一接受加拉罕同志关于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去中国的建议。

抄送：

契切林同志；维经斯基同志；哈塔耶维奇同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925 年 6 月 25 日

听取：23. 一关于中国问题。

（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23. 一（1）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

（2）一定要防止发生杀害和殴打外国人事件，防止出现诸如悬挂“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标语之类的粗野民族主义举动，尤其不要搞大洗劫行动，要公开警告工人、小店主和知识分子，不要给外国人中的挑衅分子提供说运动具有义和团性质的口实，以使帝国主义者不便进行尖锐的武装干涉；这种警告首先应由中国共

产党提出：

(3) 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要知道，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

(4) 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让政府分裂和瘫痪，以使帝国主义者无法用中国政府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

(5) 倘若上一点所述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

(6) 再次提醒有必要全面地有组织地巩固和建立基层组织和据点；

(7) 建议加拉罕同志作出自己的结论，提出中国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在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调解的口号是否合适；

(8) 建议俄共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同志在口头上和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时一定不要夸耀共产国际执委会、苏联和俄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9) 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地行事。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用密码）。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人民委员：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多列茨基、乌里扬诺娃——8。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34、138—14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9、责成中国委员会作出综合报告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5号（特字第58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

决定：[1]——（1）问题暂不解决。

（2）责成中国委员会对现有一切材料作出综合报告，必要时同莫洛托夫同志协商后可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3）鉴于用于组建部队的资金减少，使组建工作无法进行，责成中国委员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龙芝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全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2，第166、16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0、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6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2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 第76号（特字第59号）记录

1925年8月1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9. 关于中国问题。（1925年8月13日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决定：1—（1））。

（报告人伏龙芝同志）

决定：9. 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不反对提出的计划，它基本上是按006号指示中的建议拟定的。不发详细指示，因为这在当地看得更清楚。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

抄送：

伏龙芝同志——全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2，第167、168页。

打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1、批准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的预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9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9 月 17 日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莫洛托夫、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泽连斯基、克维林、克拉辛、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瓦列伊基斯、格伊、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扬松同志。

听取：38. 关于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局 1925 年 9 月 11 日会议第 107 号记录，决定：11）

决定：38. 批准该大学总额为 55 万卢布的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19，第 1、8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22、补充拨款为中共组织军政训练班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9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9 月 17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9 号（特字第 62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关于中国问题。
（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3）（1）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专门拨款问题的建议。

（2）认为中国人谋害日本大使案件的诉讼程序安排仅限于驱逐他们是不合适的。

（3）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报告在政治局下次会议上提出。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亚戈达同志——（2）；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1）。

1925 年 9 月 17 日[用电话征询意见]。

听取：29. ——关于组织军政训练班（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9. ——补充拨款 1.5 万卢布为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军政训练班。

抄送：温施利赫特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72、17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3、促使中国当局颁布工会合法化的法律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0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9 月 24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0 号（特字第 63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5〕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5 年 9 月 17 日会议第 79 号记录，决定 1. —〔3〕）（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5〕（1）责成加拉罕同志采取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对段祺瑞施加影响，以便尽快颁布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并使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工会。

（2）责成委员会仔细研究确保同广州的联系问题。

（3）对整个问题的讨论移到下次政治局会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74、17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4、责成加拉罕提出关于中国的总报告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3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10 月 15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3 号（特字第 65 号）记录

听取：2.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和中国委员会的问题。（政治局 1925 年 10 月 1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2. ——（1）（1）基本上赞同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2）责成中国委员会：①再次研究支出预算，②将国际部队的拨款从预算中排除，③探讨利用车臣、印古什和奥塞梯没收的部分步枪转交中国的可能性，④在研究枪支分配问题时要考虑由冯玉祥转给广州较大部分的必要性。

（3）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参加中国委员会。

（4）委员会意见一致时，其决定就算是最后决定。

（5）责成加拉罕同志以书面形式提出关于中国的总报告。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3）。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79、18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5、在最短期限内向中国提供武器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4号记录（摘录）

1925年10月22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4号（特字第66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和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1. —（1）（1）采纳中国委员会关于为中国拨款15441584卢布58戈比的建议：①根据技术能力，按照中国委员会预先的考虑在最短期限内向中国提供武器；②由军事部门通过向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管理总局重新订货和动用裁军后在北高加索保存的完好步枪储备补上拨出的武器。由军事部门支付给军事工业管理总局新的订货费用，支付日期由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和雷因格尔特具体商定。③批准拨款5.2万卢布用于增派工作人员。

（2）关于拨款137.4万卢布用于支付教官机构生活费用和坚持军事政治工作的问题，交回中国委员会审议。

（3）批准叶戈罗夫同志为驻华武官，召回沃罗宁同志。

（4）责成组织局提出武官叶戈罗夫同志助手的人选，以取代沃罗宁同志，提出派给冯玉祥的财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顾问人选。

（5）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号子弹100万发，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运送子弹严格保守秘密，排除发生任何非难苏联政府事件的可能性。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1）：②
科兹格夫同志——（3）（4）；
组织局——（3）（4）；
叶戈罗夫同志——（3）；
加拉罕同志——（5）；
温施利赫特同志——（5）；

修改后的决定（4）抄送：
加拉罕同志；
温施利赫特同志；
组织局；
科兹洛夫同志。

6. IV 决定：1—（1）—（1）①②抄送：
阿万涅索夫和布留哈诺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81、18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6、基本上采纳伏龙芝来信的建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6号记录（摘录）

1925年10月29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6号（特字^①）记录

听取：8.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3〕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3〕（1）建议加拉罕同志尽快去北京。

（2）基本上采纳伏龙芝同志的建议，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同志（见附录二）。

（3）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暂缓解决。

（4）鉴于需要加强中国的总的政治工作，责成组织局提出向中国派遣政工人员的候选人。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86号记录，决定：8—〔3〕附录二

伏龙芝的信摘录：

最近来自中国的所有材料都使我确信，我们驻华工作人员，对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没有坚定而明确的方针。同加拉罕的两次谈话（后一次是在昨天进行的）表明，他也没有固定的方针。然而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

① 原文未标号数。——原注

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在中国现时政府方面也一样。在这方面继续迟缓、动摇和犹豫不决，会日益削弱那些同情我们的团体的地位。我所说的指示，应当明确这些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个人认为这个指示的基本点如下：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现阶段国内战争的任务，应该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彻底打垮张作霖。吴佩孚的行动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人民军应当采取行动，但要通过相应的政治工作做好准备。政治工作范围要大，其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人民军的军事行动要安排在能够保证给予张作霖以决定性打击和能够保证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军阀实际控制最重要地理位置的时候。这种地理位置，我认为首先是包括天津在内的直隶全省，然后是热河和北满（黑龙江省）。此外，将来取得成功的时候，要采取果断措施，让国民党追随者占领可以保证北方同广州（以及四川、贵州、广西等省）的联系的交通线。直隶作为中心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热河和黑龙江，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地位和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政治联系，需要国民党追随者固守在这里。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因为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战胜张作霖之后的“分赃”和政治工作方针，都不应忽视这一点。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上海，在那

里必须坚决把工人武装起来，作为确保在上海建立革命人民政权的一种手段。我认为，提出把上海和一定地区从江苏省分离出来建立自由城的思想是适当的。这样才会有很大把握使上海变成中国真正的革命运动中心。

关于深入开展广州的工作、扩大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影响范围，扩大和深入开展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等的原有指示，依然有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核对无误：切丘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84—190 页。

打字稿，记录原件，斯大林的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27、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8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11 月 5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8 号（特字第 68 号）记录

听取：〔6〕. 库比亚亨同志的通报（报告人李维诺夫、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6〕（1）给库比亚克同志发以下电报“政治局建议，您在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之前，在招募中国人方面不要给吴佩孚的将领们以任何帮助。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结果将通报给您。”

（2）通知索洛维约夫和维经斯基同志，他们的电报不能令政治局满意，因为不明确，建议他们紧急通报冯玉祥的真实立场。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库比亚克同志——用密码告知（1）。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9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8、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93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12 月 3 日

出席：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伏洛希罗夫、克拉辛、克维林、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皮达可夫、翟鲁巴同志。

候补中央委员：西尔佐夫和施密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和扬松同志。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中国委员会问题（见政治局 1925 年 10 月 15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决定：2— [1]）。

（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彼得罗夫、阿拉洛夫同志）

决定：1— [1]决定—特别文件。

听取：29. 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政治局 1925 年 12 月 3 日会议第 93 号记录，决定：1— [1]）。

决定：采纳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草案（见附录一）。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93 号记录，决定：29

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 年 12 月 3 日通过）

鉴于有必要使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中立和不愿把中国的斗争重心从英美身上转到日本身上，又鉴于有必要不给资本主义列强多余的王牌，来大谈东方和我们在中国的作用，建议报界遵循以下原则：

1. 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
2. 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睦邻关系。
3. 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
4. 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核对无误：切丘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33，第 1、6 页。

会议记录是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29、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93 号记录（摘录）

1925 年 12 月 3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93 号（特字第 72 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中国委员会问题。
（政治局 1925 年 10 月 15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决定：2——（1））
（报告人：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彼得罗夫、阿拉洛夫同志）。

决定： 1. ——（1）（1）接受中国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建立电讯社问题的建议：

① 批准委员会 9 月 28 日关于有必要在中国建立国家电讯社的决议。

② 通过能够保证我们所需要的政治方针、我们的资本投入和工作安排的人员参加领导机构来确保我们对该社的影响。

③ 用于这项事业的拨款最多 20 万卢布。

④ 由塔斯社社长多列茨基同志负责实施这一措施。

⑤ 责成多列茨基同志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组建该社的方案和预算，并将其提交中国委员会批准。

（2）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问题，接受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以下指示：

① 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在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无论如何不应把这种政策同势力范围政策混淆起来。

② 让加拉罕同志向报界发表消息，张作霖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他一直在加剧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在满洲只有遵循苏日接近的政策才能保住指挥权。

③ 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以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④ 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

⑤ 要求加拉罕同志定期提供消息。责成布哈林同志根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和交换的意见拟定关于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的指示，以便通知报刊编辑部和塔斯社。

⑥ 认为有必要派遣一名重要负责人去中国，委托组织局提出候选人交政治局批准。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2）⑥以前的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同上；

阿拉洛夫同志——同上；

莫洛托夫同志——（2）⑥；

组织局——（2）⑥。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202、203、20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一九二六年

30、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中国局势

联共（布）^①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号（特字第1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7日

听取：〔6〕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同志）。

决定：〔6〕（1）关于向中国派遣专门使团问题推迟一周作出最后决定。

（2）建议组织局物色使团成员人选并在一周内报政治局批准。

（3）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中国局势，并提出具体建议供政治局讨论。

（4）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紧急要求在华的加拉罕同志和其他同志作出全面的报告，并分送所有政治局委员。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全部；

格伊同志——（2）；

组织局——（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1—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自1926年起，俄共（布）改称为联共（布）。——本书制作者注

31、紧急向中国派出使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号（特字第2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14日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月7日会议第1号记录，决定：9—〔6〕）（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7〕—（1）认为由布勃诺夫（团长）、库比雅克和列普赛组成的使团需要紧急动身前往中国，使团成员包括加拉罕同志。

（2）使团任务：①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②同加拉罕同志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③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④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

抄送：布勃诺夫、库比雅克、列普赛、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4、7—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2、保护苏联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1日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克维林、科托夫、皮达可夫、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托洛孔采夫、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卡明斯基、洛莫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丘茨卡耶夫、斯基里雅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5〕（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保护苏联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仅对中国和日本采取外交措施。

（2）撤消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与中东铁路有关的其余所有问题。

（3）决定为特别文件。

1926年1月21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6——关于中国委员会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26——增补拉狄克同志加入中国委员会。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41，第1、3、6、7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33、向拉萨派驻苏联非官方代表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5号（特字第3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1日

听取：6——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关于西藏问题（政治局1926年1月7日会议第1号记录，决定：1——〔7〕），（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6——〔3〕（1）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在最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处名义向拉萨派驻苏联非官方代表处的建议。

（2）拨款2万卢布作为代表处的经费。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5〕（3）建议布勃诺夫同志使团尽快动身去中国，首先了解中东铁路上的局势，并向政治局作出详细报告。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

契切林同志；

布勃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16—17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4、刊登塔斯社关于满洲冲突的报道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5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科肖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拉科夫斯基、契切林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科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1）认为科普同志关于在奉天同日本人联合行动的建议是不必要的。建议科普同志告诉日本政府，必要时他可以就此问题征询莫斯科的意见。

（2）责成契切林同志在一周内向政治局提出给科普同志的详细指示稿。

（3）认为“最后通牒”状态在释放伊万诺夫同志之后业已终止^①。

（4）在以后的谈判中，要对克拉科韦茨基同志签署的协议作出补充^②，要求^①履行关于释放所有因中东铁路冲突而被逮捕的人员的承

① A. H. 伊万诺夫 1926 年 1 月 21 日被捕，1 月 24 日获释。——原注

② Г. B. 契切林 1926 年 1 月 22 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了在 3 天期限内彻底恢复中东铁路秩序和释放伊万诺夫的要求。1 月 24 日在奉天签订了包含苏联政府要求的相应协议。——原注

诺，追究对中东铁路员工施行暴力的那些有严重过失的人的责任；②赔偿损失；③恢复工人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④遵守中东铁路条约和铁路规章。

（5）在报纸上刊登塔斯社关于满洲冲突的报道，责成契切林同志来审定报道内容。

（6）责成契切林同志起草说明整个满洲冲突情况的谈话稿，预先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谈话稿应在整个满洲冲突解决后发表。

（7）按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指示，暂不停止在边境上集结军队。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让费尔德曼和格里亚兹诺夫个人负责采取措施，防止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和违法行为。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3，第 1—2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5、关于中东铁路可以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号（特字第4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8日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5〕（3）根据得到的各种情报，认为军事、外交行动相结合的政策基本上产生了效果，以后可以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因此建议军事人民委员部着手将军队撤离满洲边境。

抄送：

契切林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18、1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6、起草就满洲事件告全体劳动者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

1926年2月4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科肖尔、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基谢廖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扬松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通报和谈话（政治局1926年1月25日会议第7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1）（1）责成契切林同志根据政治局交换的意见修改谈话初稿并在明天即2月5日见报。建议政治局委员不迟于今晚将他们对谈话的修改意见告契切林同志。

（2）责成拉狄克和维经斯基同志起草“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就满洲事件发表告全体劳动者书的初稿。初稿先送全体政治局委员阅。完成期限两天。

听取：（2）关于解决同日本在满洲的关系问题（政治局1926年1月25日会议第7号记录，决定：1——（2）），（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1）契切林同志的报告备案待查。

(2) 责成契切林同志紧急征询加拉罕同志对向他提出的中日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还要让他介绍一下中国人对即将宣布满洲独立一事的看法^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5，第 1、9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1926 年 1 月底 2 月初，一些通讯社从奉天发出几篇关于张作霖打算宣布满洲独立（据另一些材料说是自治）的报道。但是这种打算没有得到日本的赞许并遇到了西方列强和北京政府的消极反应，所以张作霖没有下决心走这一步。——原注

37、消除中东铁路某些员工的沙文主义情绪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号记录（摘录）

1926年2月11日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多加多夫、克维林、科肖尔、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托洛孔采夫、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洛莫夫、瑟尔佐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扎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5—关于在中山大学设立俄中翻译班问题（政治局1926年1月28日会议第8号记录，决定：3），（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5—采纳温施利赫特和拉狄克同志的以下建议：

[1] 中山大学从现有学员中挑选出最适合当翻译的50人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培训。

[2] 把必要的军事、政治课程纳入培训翻译计划。

1926年2月9日

听取：29—关于伊万诺夫斯基同志的电报问题。

决定：29—采纳斯大林同志关于给伊万诺夫斯基同志发去以下电报的建议。

“鉴于您报告说，对中东铁路上的中国职工的工作薄弱，一些俄国铁路员工存在着沙文主义思想，而某些地方工会组织试图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中央建议：

[1] 为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制订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指示，加强对中东铁路上的中国职工的政治工作和专业工作并从他们当中清除祖巴托夫分子和白卫分子；

[2] 为消除某些铁路员工中存在的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格格不入的沙文主义情绪，要对铁路职工进行一次清理，以便在不长时间内解除那些以搞沙文主义而臭名昭著的人的工作；

[3] 禁止地方工会组织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任何最后通牒，并向它们说明，解决中东铁路冲突纯属苏联政府及其驻满洲代表的事情，中国地方当局的一切违背协定行为，现在只能通过苏联政府代表同中国政府代表的谈判来消除；

[4] 提醒中东铁路职工，满洲的主人是中国人民，中东铁路不是经过我们的领土，而是经过中国的领土，职工应当领会同中国居民，特别是同中国工农的友好政策，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来说才是体面的，正是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共和国才是强大的。这样的政策是既能抵制帝国主义又能抵制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提出的一切责难的重要消毒剂；

[5] 本着这些指示精神组织对中东铁路员工的宣传工作；

[6] 警告中东铁路员工，我们将解除任何违背这些指示的人的工作；

至于伊万诺夫同志辞职的问题，请告诉他，中央不同意他辞职。”

听取：30—“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就满洲事变告全体劳动者书初稿（政治局 1926 年 2 月 4 日会议第 9 号记录，决定：1—[1]）

决定：30—批准并作一些修改（见附录一）^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6，第 2—3、9—10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此件发表在 1926 年 2 月 11 日的《消息报》上。——原注

38、说服国民党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

1926年2月18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科托夫、科肖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洛博夫、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施瓦茨、施密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卡明斯基、斯克雷普尼克、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2—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人：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同志）。

决定：12—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今后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在预先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私下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47，第2、6、9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9、同胡汉民讨论建立高等军事学校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4号（特字第10号）记录（摘录）

1926年3月11日

听取：3—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1]—关于预算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4日会议第13号记录，决定：16—[1]），（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布留汉诺夫同志）。

决定：3—[1]（1）认为可以给中国军政工作拨出1925—1926年度上半年的经费，数额为中国委员会所批准的预算的一半。

（2）建议加拉罕同志设法缩减下半年的开支并争取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意支付至少开支的一半。

（3）责成加拉罕同志向政治局提出所拨经费的开支报告并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制定和向政治局提出下半年的预算。

抄送：温施利赫特、布留汉诺夫、契切林同志。

听取：[2]—关于胡汉民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4日会议第13号记录，决定：16—[2]），（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2]—责成加拉罕同志接见胡汉民并和他同我们的军事专家和科学专家一起讨论改组广州大学和在广州建立高等军事学校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并报告是否有必要为此事从莫斯科派去教官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官。

抄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30—3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0、解除中东铁路搞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负责人职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6 号记录（摘录）

1926 年 3 月 18 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叶夫多基莫夫、朱可夫、泽连斯基、科肖尔、克维林、洛博夫、米高扬、米哈伊洛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契切林、丘多夫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日本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库兹涅佐夫、缅任斯基同志）。

决定：1. [1]—（1）日本问题交由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和特里利塞尔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作初步研究。由托洛茨基同志负责召集委员会会议。

（2）吸收维经斯基同志参加委员会工作。

（3）委员会要熟悉关于日本的材料和改变在华工作方法的问题，并研究发表缅任斯基同志所宣布的文件问题。

（4）委员会要向政治局下次会议提出我们近期对日具体政策草案。

听取：[2]—关于同日本的贸易协定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11 日会议第 14 号记录，决定：29）（报告人：加米涅夫、契切林同志）。

决定：[2]—认为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同日本签订协定是适宜的，要以扬松电报中通报的内容为基础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完善有关条款。

听取：[3]—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同志）。

决定：[3]（1）撤换伊万诺夫同志。任命叶姆沙诺夫同志取代他。召回乌斯特里亚洛夫。

（2）在中东铁路上进行清洗，解除所有那些因搞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而名誉扫地的负责人的职务，首先更换《满洲通报》^①编辑部，解除安多格斯基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职务。

（3）今后整个中东铁路当局要坚决执行苏联的方针。

（4）认为有必要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专门文章批驳《满洲通报》的整个方针，尤其要批驳苏林的挑衅性文章。

（5）要把中东铁路看作是商业企业，将其领导权委托给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

（6）根据我们同奉天和同北京协商一致的意见，制定在中东铁路上消除冲突的办法，即调解程序等。

（7）有机会时要在文章中或权威性声明中说明，我们的立场依然是同中国签订条约时的立场。

（8）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到中东铁路出差，责成他同奉天谈判并负责实行本决定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9）就满洲问题作出的决定要告知加拉罕同志，责成他协助贯彻执行本决定。

（10）认为有必要让伊万诺夫斯基同志使团提前回国。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满洲通报》系当时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机关刊物。——原注

41、关于对满洲和日本政策问题的建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7 号记录（摘录）

1926 年 3 月 25 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季波夫、鲍曼、多加多夫、泽连斯基、科肖尔、科托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卡缅斯基、基谢廖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2]——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18 日会议第 16 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决定：[2]——（1）基本上通过委员会关于我们对满洲和日本政策问题的建议。

（2）整个中国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3）责成委员会把自己建议的准确文本分送各政治局委员并为政治局委员提供一昼夜时间告知有关满洲和日本部分的修改补充意见。

（4）决定——定为特别文件。

（5）向加拉罕和鲍罗廷同志询问广州情况、为稳定广州局势采取了什么措施，以及鉴于华中和华北局势的变化莫斯科能在这方面做什

么事情。

(6) 责成余里利塞尔和李维诺夫同志在两天期限内解决发表某些材料的方式问题。

1926年3月2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

决定：32——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让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参加政治局日中问题委员会（政治局3月16日会议决定，第16号记录，决定：1—[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3，第1—2、7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926年3月2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7. 一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会议第17号记录，决定：1—[2]（3））。

决定：27. 一通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在涉及日本和满洲部分中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4，第1、6、8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2、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7号（特字第12号）记录（摘录）

1926年3月25日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2]—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18日会议第16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决定：1. —[2]（4）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组成人员先由中央组织局确定。

抄送：

季诺维也夫、皮亚特尼茨基和维经斯基、莫洛托夫、格伊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3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3、通过专门委员会关于日本和满洲问题的建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8 号记录（摘录）

1926 年 4 月 1 日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多加多夫、泽连斯基、科托夫、科肖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皮达可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施密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戈洛谢金、卡缅斯基、基谢摩夫、拉舍维奇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同志）。

决定：1. —[1]决定——定为特别文件。

听取：16.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提交的问题（代表团核心小组 1926 年 3 月 22 日会议决定，第 10 号记录，决定：13）。

决定：16. —批准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以下建议：（1）在主席团举行会议前召集联共的主席团成员会议，他们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和代表团秘书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2) 在执委会举行会议前召集联共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会议，他们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洛佐夫斯基、舒姆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3) 为解决重要问题，不管主席团或执委会举行会议与否代表团可召集全体会议。

1926年3月2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7. 一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年3月25日会议第17号记录，决定：1—[2]（3））。

决定：27. 一通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在涉及日本和满洲部分中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4，第1、6、8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4、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摘录）

1926年4月1日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会议第17号记录，决定：6），（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同志）。

决定：1—[1]（1）通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就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作以下修改和补充：

① 在决议中要考虑到国民军和其他军阀军队之间的区别，而国民军的失败应视为导致帝国主义者影响加强和向后者作出让步的因素之一。

② 在关于广州的条款（决定：21）中说，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不要促使广州去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③ 建议国民党中央大力加强国民军中的工作。

④ 在关于我们的人清理中东铁路工作的决议第15条中，引用政治局有关这方面的决议。

⑤ 在中国报刊上为加拉罕同志开展系统的猛烈的宣传运动。尽可能在英国也这样做。

⑥ 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修改决议草案，因为这些修改意见来自于政治局决议。

（2）责成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通知张作霖，苏联政府不得不把他关于召回加拉罕的声明视为可能严重影响苏联同他所建立的合作关系的步骤，视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怂恿他采取的步骤。

(3) 还责成他通知张作霖，苏联政府同意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将派遣新的人员取代伊万诺夫同志，并将根据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与张作霖的会谈精神为其作出严格的指示。

(4) 责成契切林同志以适当的、一开始要很谨慎的方式制造英国的这种舆论：英国政府在制造新的尖锐冲突，授意中国反动派要求我们从北京召回大使。

(5) 责成托姆斯基同志就此同英国工联主义者取得联系，如若可能，在议会中组织对政府的质询。

(6) 在共产国际系统开展相应的宣传鼓动工作。

(7) 责成拉科夫斯基同志弄清法国外交界对英国所掀起的要求从北京召回加拉罕同志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并以适当方式告诉法国，它在这个问题上对英国人的支持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最敌对的举动。

(8) 请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局对叶姆沙诺夫同志的任命决定的问题并追究过失者的责任。

(9) 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建议，交由国防委员会紧急讨论。

(10) 鉴于冯^①本人可能不打算离开蒙古，认为蒙古人要求冯立即离开库伦是不合适的。

(11) 将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关于在华军政工作问题的提纲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审阅，并在三天内将其修改补充意见告中央书记处。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8)、(9)除外；

托洛茨基同志—(1)及附录；

扬松同志—(8)；

伏罗希洛夫同志—(9)；

① 指冯玉祥。下同。——原注

李可夫同志—（9）；
全体政治局委员—（11）；
季诺维也夫同志—（4）、（6）；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6）；
鲁祖塔克同志—（2）、（6）、（8）；
托姆斯基同志—（4）、（5）；
亚戈达同志—IV.21，仅附录；
温施利赫特同志—N.23，仅附录。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1 日会议
第 18 号记录，决定：1—[1]
附录（特别文件）。绝密

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最后稿）

1. 在中国的局势中应考虑到三种因素：

（1）中国的内部力量；

（2）军阀组织，它们以某种形式代表着中国的内部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外国；

（3）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是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量。

确定方针的全部困难在于掌握这三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因为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有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速度。

在拥有 4 亿人口的已经觉醒了的国家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最终是国内因素。我们应当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这些国内力量，

也就是首先要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并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我们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我们能在中国实行很长历史时期的政策。

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军阀集团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斗争，但不应让这些事件使我们离开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

一、中国革命的国际方针和苏联

2. 没有什么材料会使人认为，中国革命内部力量的发展已经停止，哪怕是暂时停止。相反，有一切理由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广大工农群众的运动将会得到发展和加强。我们从自己方面应尽一切努力使这场运动具有最大的规模。但是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签订洛迦诺协定^①和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全面提出中国问题，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导革命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尽一切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华统一战线。无论从日本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它在满洲的切身经济、军事利益来看，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革命可能是最危险的。中国革命运动已接近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对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搁下”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也就是实际上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

3. 这种政治方针应当是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协调一致的，当然它绝不意味着停止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般政治斗争。这里要预先

① 又称洛迦诺公约，是1925年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签订的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可侵犯以及保持莱茵地区非军事化的协定。签署洛迦诺协定旨在建立吸收德国参加反苏联盟，助长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气焰。——本书制作者注

估计到，鉴于对日本的极端仇恨，这种方针对于中国的革命人士及广大舆论界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然而，中国革命的内部需要要求我们采取这种方针，因为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它不可能顶住帝国主义者们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同中国革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像中国革命运动需要争取喘息时间一样，苏维埃国家也需要延长喘息时间。

4. 从所说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远东采取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方针和首先同日本实行某种妥协的方针，需要在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方面认真做好准备，以排除不十分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对这种政策作出错误的解释，认为这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

5. 为了对中国社会舆论作适当的引导，认为有必要通过创办新的报刊和通过对现有报刊施加影响来加强对中国报界的革命反帝影响。

6. 一旦建立自治的满洲（这是日本所渴望的），就应该争取使张作霖放弃南进和基本上放弃对中国其余地区内部事务的干预。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决不能采取主动或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满洲自治涵义的理解本身，就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我们规定了必要的行动方针。

7. 鉴于上述总的政治方针，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一切刺激中国社会舆论的多余的、附带的和第二位的因素。毫无疑问，在各主管部门人员对中国的行为中，不允许有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和造成对它的帝国主义看法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要使有关的机关和人员相信，对中国实行这样的政策，甚至采用这样的外部政策形式，以消除怀疑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意图的思想阴影，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各地都要实行以非常重视中国的权利、强调它的主权等等为基础的方针。在每一个违反这种政策的场合，不管这种违反行为多么微小，都要惩处过失者，并通报给中国

公众。

8. 要以各种方式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同情中国民众争取实现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基础之上的，而丝毫没有我们要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人民自己能够解决，也应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苏联政府力求同中国现有一切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政府建立和保持真诚的关系。

9. 在满洲，外交工作将彻底从哈尔滨转移到奉天。

10. 要同张作霖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我们知道，在现有条件下，满洲政权应当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和稳定的关系；我们不损害这种关系，但对满洲政权来说，同时保持同我们的稳定和和睦的关系，从而确保自己对于东京的某种独立性，也是有利的。

谈判时要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人士同意用另一个缓冲将领取代张作霖，而我们认为在建立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有理由用另一个人取代张作霖。

11. 同满洲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为中东铁路制订严格而切实可行的制度：（1）为所有有争议问题或冲突问题制订符合实际的（对等）调解程序；（2）一旦发生麻烦事把问题交由奉天处理。

与此同时，我们的铁路局长、驻哈尔滨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将得到以下指示：铁路当局通过中国当局首脑，尤其是通过向后者提出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单方面解决问题的任何企图，都要受到惩处，决不姑息。

12. 在同张作霖达成协议和在北京对这个协议作相应的注册之后，争取召开中日苏三国铁路会议，其任务是制订三大国共同的满洲铁路经营、建设计划，争取在充分尊重相互的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签订涉及满洲的经济协定。

13. 在把中东铁路的实际机构严格保留在苏维埃政权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最近一个时期使铁路免遭帝国主义者占领）的情况下，

现在就需要采取广泛的文化政治性措施来使铁路中国化：

(1) 公文处理要用两种文字。车站站牌、挂在车站和车厢里的规则等都要用两种文字。

(2) 成立中国铁路职工学校，把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3) 在沿线相应地点为中国工人和与铁路相毗邻的中国居民成立必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14. 必须（让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查明，把铁路直接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是否会被中方解释为我们单方面占领铁路的步骤。

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认真考虑和制订修改铁路规章的一切细节。

15. 利用目前我们在铁路上的行动还很自由的时机，根据政治局3月4日和18日决定，在中东铁路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认真清洗，把不太适合的或名誉扫地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工人调到苏联铁路线上，并用中心铁路线上的绝对可靠的有政治教养的工作人员取代他们在满洲的工作。

16. 另一方面，现在需要认真收集（以后弄清）中国军阀、警察和俄国白卫分子对中东铁路上俄国工人和职员の专横暴力事件，以及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所有民族冲突和生活冲突事件。要创造维护俄国工人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的途径和方法，以便使这些冲突不激起双方的沙文主义情绪，而相反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必须在工会中建立特别的调解委员会或公意审判会，双方以平等原则参加并由那些理解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人进行实际领导。

应根据（同奉天和北京达成的）相应协议制订使铁路职工免遭中国地方当局欺凌的办法，并辅以一切必要的组织保证。

必须就这些问题印发俄文和中文告示和呼吁书并在铁路沿线散发，贴在车站和类似建筑物上以及车厢里。

17. 根据上述政策，更新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人员。

18. 同张作霖（而以后同日本）达成协议的条款之一，应该是使人民革命的蒙古免遭张作霖的侵犯。

19. 现在不要开始同日本进行一般性谈判。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实行上述各种措施和通过对日本舆论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切实改善关系上，并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订相应的措施。不要预先决定（苏联、日本、中国）三国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形式，而要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准备论据，以便使中国可能迫不得已暂时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不致在中国被说成是在我们参与下的势力范围划分。中国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左翼人士的舆论，应该准确地领会到，我们只准备容忍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作出那些对于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来说为避免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而需要作出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的一般性谈判应力求以作出让步的代价来使日本同英国断绝联系。

20. 一旦弄清楚，国民军将长时间把阵地让给吴佩孚，那么同后者寻求和解以削弱他对英国的依赖性的做法就可能是恰当的了，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同英国这个中国独立的主要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作斗争。

21. 国共两党必须对国民军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以便使它成为人民革命运动的不受个人影响左右的真正支柱。

22. 广州。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不仅需要把广州看作是临时的革命桥头堡，而且是拥有 3700 万人口的大国，它需要有正确而稳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

广州政府应当通过实行土地、财政、行政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通过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通过加强它的内部防卫能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共和国的内部巩固上。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动。

注：询问拉科夫斯基同志：广州政府是否有可能同法国正式或非正式地达成某种临时协定？为对法国政府作出这方面的试探，派广州政府代表去巴黎是否合适？

23. 考虑到在已作出的一些决定中含有促使国民党领导人在某些

严格划定的问题上表现出谨慎谦让的成分，为避免产生任何偏离总政策的倾向，必须明确说明，这种迫于形势作出的让步，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运动的革命胆略或减少在中国和其以外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促进相邻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等等，等等。

24. 鉴于受帝国主义挑唆的中国反动派提出了召回加拉罕同志的要求，认为有必要在中国（视情况也在其他国家，首先是在英国和日本）积极开展反对这种蛮不讲理的要求的政治宣传运动，说明加拉罕同志作为苏联的代表所奉行的解放政策的意义和内容。

满洲的铁路问题

1. 在中东铁路上的关系得到改善之前，最好推迟满洲铁路会议。

2. 考虑到苏联不能独立在满洲进行铁路建设，应预先就中东铁路的建设问题同奉天达成协议。

3. 为发展中东铁路的建设事业，必须减少用在完善中东铁路设施上的费用，以便把所有自由资金投放到铁路建设上。

4. 采纳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中东铁路建设计划。

5. 为敷设单独的专用线，认为最好成立股份公司，吸收中国地方资金，并尽可能由中国发起。

6. 中东铁路不应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敷设专用线上，而应争取修筑公路进行汽车运输和发展船舶运输。

7. 要利用一切现有手段反对由中东铁路向吉林以东敷设日本铁路线。

8. 为对日本施加压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关于我们敷设由赤塔经东蒙的铁路线的消息。

9. 打算首先着手建设从上乌丁斯克到库伦、张家口的铁路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苏维埃港的铁路。

10.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弄清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在运价、运价折扣和货物分配问题上有哪些分歧意见要提交政府间会议讨论。

11. 答复出渊胜治：借谢列布里亚科夫访问之机，将就地弄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本人还顺路去东京，之后我们将提出具体建议，力求调解有争议的问题并在有关三方相互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消除磨擦。

关于日本移民问题

在解决日本在苏联远东的移民问题时，必须重视日本社会舆论对此事的极端关注。但是，考虑到日本在远东搞殖民化的危险，必须谨慎地和循序渐进地实行一切步骤。现在要确定被允许进入苏联的日本移民人数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日本的移民不应是大量的。日本的移民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应当借助于为此建立的专门协会利用日本的资金来分批进行。日本的移民应当在加强从俄国中部的移民工作的同时，按国际象棋规则分散安置。提供的地区应当是日本农民可以接受的，并且要考虑到日本的耕作特点。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以南地区有适合于日本移民的地方，但在西伯利亚中心。不应让朝鲜移民打着日本移民的幌子进入这些地区。朝鲜移民问题应单独研究，而且可以为朝鲜人提供更深入西伯利亚的地区。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34—36 页。

打字稿，会议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45、不希望广州军队进行军事远征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20 号（特字第 14 号）记录（摘录）

1926 年 4 月 15 日

1926 年 4 月 5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3. 一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33. 一采纳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同志的电报稿：

1. 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①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2. 在加拉罕同志第 242 号电报中发现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

3. 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抄送：

契切林、加拉罕同志一用密码。

1926 年 4 月 12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9. 一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1 日会议第 18 号记录，决定：1—[1]（11））。

① 即北伐。——本书制作者注

决定：39. 一采纳政治局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华军政工作和远东防务的决议草案（见附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契切林同志。

亚戈达同志—W. 21 及注。

温施利赫特同志—23. 及附录。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第 20 号记录

决定：39 附录

在华军政工作和近期对它的必要改组

（1926 年 4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1. 除广州之外教官组已在各地得到某种程度的推广，但没有对实际需要情况作充分的调查，没有做必要的准备，没有考虑形势。工作人员的数量和类型与实际需要不一致。结果许多来这里的人预先注定无所事事。如果根据明确的任务逐步地派人和根据工作的开展程度来扩充教官组，就可以避免无效地浪费资金，避免发生指挥人员的腐化，就可以为工作带来更大的成绩，更增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声望。

2. 工作人员没有做好在中国环境中工作的准备，人员的挑选往往不符合任务的需要。

3. 物质支援与我们工作的开展和我们影响的加强不是很协调。

4. 我们的指导工作和我们的物质支援速度与国共工作开展的速度，以及与它们对军队和它们所占领的地区的影响的深入也不很协调。国民革命组织在军队中做的工作微不足道，而在本地区居民中的工作也十分薄弱。

5. 由于这些主观原因，也由于客观形势（军事行动）不允许继续在一些部队中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无疑应该承认工作成果是很不够的，在有些场合简直无成果可言。例如，在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中，由于它们彻底崩溃，成果也就等于零。在国民军第一军中可以感觉到的成果是骑兵有所加强，中级指挥人员对我们战术的长处有所领会，在这些人员中赢得了一定的威信。这些成果可能很容易由于在冯不在的情况下最高指挥人员的因循守旧和上层政策的保守而化为乌有。

6. 我们今后工作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冯这个人物的评价，取决于他在战役之后的地位的稳固程度。如果北京中心^①的评价是正确的，如果冯同我们和国民运动的联系仍然是真诚的，而他去库伦只不过是对手采取的一个外交步骤，那么在他的部队进入内蒙境内之后，教官工作虽规模会有所缩小，但也将是一项长时期的重要工作。

但是应该说，冯在目前出走是想放开政府和自己下属对中国北方革命力量的手脚，并让他们断绝同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和物质利益方面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个时期的军事工作就结束了。

7. 无论以后同国民军第一军的关系如何，我们在中国的教官人数都不需要像现在这么多。留下的教官不能超过10名，并且不论从熟悉情况和工作方面，还是从个人品质方面说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其余的应在近期内召回。

8. 留下的教官只能在同军队司令部就他们的实际任务和职责达成全面协议后着手工作。选派每一个新的工作人员都要根据十分明确的具体工作要求来进行。

9. 从事工作的教官应完全配翻译，以便使他们个人的工作是满负荷的。挑选翻译时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可靠性和敬业精神。

① 指设在北京的领导苏联驻华代表整个军政工作的中心，其领导人是加拉罕。——原注

10. 将来应该在开展国民革命组织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加强它们的影响的同时开展我们的军事工作。

在军事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创建模范部队，哪怕是小部队也好。这些部队在接受政治教育的同时可以作为扩大和巩固国民党和党^①的影响的实际支柱。

11. 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必须使作为整个军事工作领导人的武官，有可能根据本军队中的情况，并在中央和全权代表所拟定的总政治路线范围内，独立地确定军事工作方法和完成任务的途径。

武官要为自己领域内的工作结果负责，应该能为军事工作人员确定他们同地方司令部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关系，拟定他们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针。

12. 为了在形势发生变化时能够顺利开展我们的工作，必须预先着手培养军事方面和军政、工会方面的像样的东方工作人员。为此需要在中心举办严肃认真的和长时间的培训班。

13. 鉴于国民军在北方遭到失败，我们进一步加强广州军队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反动派在北方暂时得到加强后，广州可能受到新的进攻和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我们教官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即在广州军队中建立起巩固的核心，并把以前分散的军事集团联合在它的周围。广州政府对教官和物质支援的要求应尽量予以满足。

核对无误：维纳格拉多娃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47—52 页。

打字稿。会议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指中国共产党。——原注

46、要求张作霖保证我驻北京代表机构的安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

1926年4月22日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鲍曼、多加多夫、克维林、科肖尔、科托夫、洛博夫、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托洛孔采夫、丘巴尔、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柳比莫夫、梅利尼昌斯基、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4月15日会议第20号记录，决定：2—[4]），（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1]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1926年4月1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1. 一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31. 一采纳斯大林同志的以下建议：

（1）鉴于存在来自张作霖方面的直接威胁，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它作出安全保证。

(2) 立即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去奉天，责成他要求张作霖作出保证，并向他说明，对我驻北京全权代表机构的胡作非为他个人要承担责任。

(3) 责成波多利斯基同志立即退回张作霖的照会。

(4) 让加拉罕同志视情况行事，但要告诉他，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他去张家口国民军营地是不能允许的。

(5) 建议加拉罕同志同张家口保持联系，再通过张家口同俄国保持联系，以便向莫斯科经常通报北京的事态。

1926年4月2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5. 契切林同志关于根据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1926 年 4 月 19 日电报采纳消除同奉天冲突的提法的建议（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通过。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57，第 1、9、10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7、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摘录）

1926年4月29日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4月22日会议第21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同志）。

决定：1. 一[1]（1）不接受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的建议。

（2）等冯到莫斯科来时再讨论冯的决定问题。

（3）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

4. 因此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危险的。

5. 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6. 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

7. 如果在当地查明，主张在组织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很强大，并且两党关系有严重冷淡的危险，那就同意把这个问题尽快提交共产国际讨论。

8. 建议国民党向莫斯科派1、2名常驻代表。

9. 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

抄送：

契切林同志—（1）、（2）；

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同志——（3）、（4）、（5）、（6）、（7）、（8）、（9）；

温施利赫特——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3）、（4）、（5）、（6）、（7）、（8）、（9）。

听取：〔2〕——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1）认为可以拨出 7500 卢布经费，用于派遣在中国学校^①结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国，让他们从事军政工作。

（2）为审查继续中国学校工作所需经费的数额，成立由鲁祖塔克和温施利赫特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抄送：

温施利赫特、鲁祖塔克、布留汉诺夫同志——全部。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55—5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中山大学。——原注

48、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3号（特字第17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6日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1）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

（2）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57、5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9、关于国民军代表同张作霖谈判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4号（特字第18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6日

听取：1. ——外交人员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1. ——〔2〕（1）允许维经斯基同志等到布勃诺夫同志回来时再动身。

（2）同意加拉罕同志就国民军代表同张作霖谈判问题提出的意见。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维经斯基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60、62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0、对同张作霖谈判拟定的指示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5号（特字第19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13日

听取：4.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
（1）关于奉天的建议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4——〔2〕（1）批准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为同张作霖谈判拟定的以下指示：

① 就张作霖建议的第一条说明，他的表述带有非国家性质，我们以苏联政府单独声明的形式提出另一种表述，说明它过去不干预，将来也不会干预中国和满洲的内部事务。

② 接受关于交换外交代表的第二条，采用张作霖的表述，把这一条作为条约的第一条。

③ 关于第三条，认为在北京政府不反对的情况下，可以从应付给中国的中东铁路纯利润中提取500万卢布给张作霖。认为不能满足张作霖关于从中东铁路利润中再给他提取500万卢布的要求。

④ 关于第四条，出售武器问题不写入条约，只作如下口头声明：这是商务活动，张作霖可以同苏联有关经济机构就购买武器事宜进行谈判。

⑤ 在谈判中我们要提出以下要求：（1）a. 终止为苏联公民制定的特殊制度；b. 中东铁路地区的工会机构和文化机构彻底合法化。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时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同日本开始谈判，为此要利用我们作出的让步和我们同张作霖在奉天进行的谈判。

（3）让克拉科韦茨基留在奉天。

(4) ①认为有必要提取中东铁路利润中属于苏联的那一大部分用于苏联的国家需要。

②责成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弄清这部分利润目前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这部分利润可在多长期限内和多大数额内用于实现全苏联的目标，并向中央政治局作出报告。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马克西莫夫同志（劳动与国防委员会）——（4）；

温施利赫特同志——V. 15 全部；

波斯尼科夫同志——（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64—6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1、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20日

听取：1——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1）伊万诺夫斯基同志使团报告（报告人：布勃诺夫、列普谢、寒切林、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同志）。

决定：1——（2）（1）布勃诺夫同志报告备案待查。

（2）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同时建议它加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实行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

（3）给俄国驻广州共产党员发去联共（布）中央反对监护中国工作人员的秘密信。

（4）中央保留我们目前对张作霖的政策方针仍然有效。

（5）建议冯同意暂时同张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作为改组国民军的喘息时间。

（6）建议冯到军队中去。

（7）告诉冯，我们现在不能向他提供他要求我们提供的援助，我们只能给他最低限度的援助（其规模应由政治局确定）。

（8）同冯的会面不见报。

（9）在同张谈判时要利用我们同冯的接近，以加快这次谈判进程。

（10）立即解决火油问题。

（11）针对佩京的电报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进行调查，并在政治局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12）中国委员会要研究我们在华军事工作人员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

(13) 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14) 责成组织局为领事工作和驻华顾问工作挑选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

(15) 建议中国委员会研究布勃诺夫同志使团的材料，作出一切必要的具体结论，并向政治局报告。

抄送：

布勃诺夫、温施利赫特、伏罗希洛夫、契切林、维经斯基同志——全部；季诺维也夫——（2）；莫洛托夫——（3）、（12）；加米涅夫——（10）；组织局和格伊——（1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74—7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2、弄清冯玉祥在返回军队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8号（特字第22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27日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2）国际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李可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批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见附录1）。

抄送：温施利赫特、戈尔布诺夫、布留汉诺夫。

听取：（3）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政治局1926年5月20日会议第27号记录，决定：1——（2）——（2）〕，（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3）——①重申政治局今年5月20日对冯的决定〔第27号记录，决定：1——（2）——（2）〕。

②特别要告诉冯，对他的援助体现在什么地方（政治局今年5月20日的同一个决定），为此，中国委员会要在星期一以前向政治局提出明确的决定。

③责成温施利赫特和契切林同志会见冯，弄清他在能否很快返回军队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④扣发冯的声明，责成温施利赫特和契切林同志同他交谈在中国实现他的任务的另一种方式。

⑤由温施利赫特同志负责对冯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周到服务，还责成他在星期一以前向政治局提出关于我们向冯那里派驻政治顾问的人选建议。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第 28 号记录，决定：

1—（3）（2）

附录一。绝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李可夫同志委员会
1926 年 5 月 17 日会议第 11 号记录（摘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6 年 5 月 27 日批准）

听取：1. 关于补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给“K”^①的物资的价值问题。

决定：1—（1）批准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出 225 万卢布补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给“K”的物资。

（2）认为需要按照政治局委员会 1926 年 4 月 28 日决定在本预算年度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出 325205 卢布用于结束向“K”运送物资的工作。

（3）认为在以前向“K”运送物资所耗费的 1309096 卢布中有 985899 卢布 64 戈比的数额应同交通人民委员部结算。

（4）建议政治局，在除上述用于部分补偿发往“K”的物资的价值的数额外，必须在本预算年度中再给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 500 万卢布，用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的出口奖励贷款支出，这 500 万

① К и т а й，即中国。——本书制作者注

卢布用于军事订货，其性质和规模由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管理局商定。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77—78、80—81 页。

打字稿，原件，斯大林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53、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北伐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45号（特字第33号）记录（摘录）

1926年8月5日

听取：2.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 [1]（1）郑延禧关于召回加拉罕同志的照会问题推迟一星期再议。

（2）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通知张作霖：向他提供贷款问题应与奉天总的谈判联系起来。

抄送：

契切林同志。

听取：[2]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政治局1926年7月1日会议第37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索洛维约夫同志）。

决定：[2]（1）建议于右任目前撤销关于建立对华北所有国民革命力量的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建议冯和于右任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统一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时（红军的经验表明，这样做是合适的），建立统一的机构来领导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是个按党的系统隶属于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机构，但不干预国民军司令部的行政管理工作和作战工作。

（2）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①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

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

(3) 推迟对香港罢工问题作出决定，就此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

(4) 允许拨款3—4万卢布，帮助冯购买汽油。

(5) 认为不宜在让冯尽快去张家口一事上给冯施加新的压力。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100—10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年），苏联军事家。曾以加伦为化名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参加中国大革命和北伐，并指导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本书制作者注

54、将加拉罕正式从中国召回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1号（特字第45号）记录（摘录）

1926年10月14日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0月7日会议第58号记录，决定：2. ——（1））（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认为有必要将加拉罕同志正式从中国召回。责成库兹涅佐夫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加拉罕同志坚持要求把他召回，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近期内将就此事专门照会北京政府，副本通知张作霖。

（2）认为有必要把所有谈判都集中在切尔内赫同志^①手里。

（3）禁止萨夫拉索夫同志^②进行任何超出章程和条约所规定的中东铁路日常工作范围的谈判，以及关于改变利润分配和现金保管程序等问题的谈判。

（4）催促列格兰同志^③尽快去哈尔滨。

（5）关于谈判内容问题仍按原来决议执行。

（6）认为加拉罕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发表答记者问^④是不能允许的。

（7）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书面材料，说明在中国领土上的法、英、日等外国铁路的表面上和实际上的

① 切尔内赫当时为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译者。

② 萨夫拉索夫当时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副主席。——译者。

③ 列格兰当时为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译者。

④ 可能是指加拉罕答上海《中国日报》记者问。——原注

情况，并将它们的情况与中东铁路现有的情况作个比较。完成期限为
一周。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李维诺夫同志——全部；鲁祖塔克同志
——〔7〕。

1926年10月1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9. ——关于米赫尔曼同志问题（政治局1926年10月9
日会议第64号决议，决定：3. ——〔4〕）。

决定：19. 批准米赫尔曼同志为冯的财政顾问，并保留他的蒙古
银行董事会主席职务。

抄送

组织局；

莫斯克文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舍伊曼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2、4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5、目前主要军事危险是奉系军队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3号和64号（特字第47号）记录（摘录）

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

第63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温施利赫特、洛佐夫斯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1）改组中国委员会，任命下列人员：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接替温施利赫特同志）；委员——契切林同志（接替加拉罕同志）和彼得罗夫同志。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召集。

（2）建议中国委员会按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彼得罗夫同志——决定（1）（2）；加拉罕同志——决定（1）（2）；

温施利赫特同志——决定（1）（2）。

第64号记录

听取：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0月20日会议第63号记录，决定：1. ——（1））。（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 ——（1）批准就西北军行动计划问题作出以下指示：

（1）目前主要军事危险是奉系军队，特别是张宗昌的军队可能对疲惫不堪的广州军队发动进攻。

（2）有鉴于此，认为最好是冯指挥的军队同南方军队联合起来。

（3）不反对冯关于在包头保留阻击部队的要求。

（4）认为有必要协调所有国民革命军以及广州军队的行动。征询加伦同志和国民党中央关于这种协调行动的方式的意见。

（5）我们在华工作的军事人员要严格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自莫斯科的、根据对形势的总的估计提出的作战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束缚中国指挥部的自由，因为指导作战行动的责任完全由中国指挥部承担。

（6）现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加强国民党人对不久前归顺广州并只是在形式上成为国民党军队的这部分军队的政治工作。不在军队里大力加强这项工作，中国革命就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

（7）派给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军队政治部一定数量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志。

（8）责成中国委员会在一周内制定派遣中国学生的具体计划，即：多少人、从哪些学校派、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条件下将他们派往中国。

（2）认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现阶段，广州政府继续同张作霖进行谈判依然是完全适当的，同时不反对同张作霖实行暂时的妥协，这既有利于军事喘息，也会给张作霖施加某种压力。

（3）不接受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同志的建议。撤销今年6月7日政治局会议（第32号记录，决定：1. ——〔11〕）关于鲍罗廷同志副手的决定。

（4）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向广州提供物资援助问题的以下建议：

（1）认为满足广州要求提供总数为2844026卢布的炮兵和航空器材的申请是合适的，条件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担保在1926—1927经济

年度向军事主管部门补偿这些器材所需的费用。

(2) 由军事主管部门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3) 关于向广州转交这些器材的支付条件，由军事主管部门同广州政府商定。

(5) 向广州转交军事器材必须以得到广州政府的明确支付保证为条件。

(6) 建议中国委员会和库比雅克同志一起具体拟定如何向广州运送武器的问题。

(7) 鉴于中国日益复杂的形势，认为有必要确定驻北京领导人（大使），以便领导在华的整个工作。

(8) 关于广州和日本的关系问题，政治局认为，日本政府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去日本，以此来回避事实上或者法律上承认广州政府的问题。

鉴于这种承认对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局建议争取日本方面同意，除了由国民党派代表以外，也由广州政府派正式代表。如果日本方面断然拒绝，则同意只由国民党派一名代表去日本。

(9) 认为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是非常合适的。但政治局同时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

(10) 征询国民党中央和广州政府的意见，他们是否认为任命苏联驻广州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是合适的，是否认为可以任命鲍罗廷同志担任这一职务。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全部；

格伊同志——决定：〔1〕7、〔3〕、〔7〕。

布留汉诺夫同志——决定：〔4〕、〔5〕。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6—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6、对广州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5号（特字第48号）记录（摘录）

1926年10月29日

1926年10月2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9.——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9.——通过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的电报稿，并作一些修改（见附件）。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第65号记录

第9项决定 附录：

致中国北京、广州、汉口、上海
谢廖金^①的电报

答复谢廖金第112号电报

第一、广州胜利后形成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正如国民党所

① 即维经斯基。——原注

面临的困难不应吓倒它并使它向右转一定要同右派结成联盟一样。

第二、既然是指依靠广州和浙江的军队来成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政权委员会，那这是合适的，但要靠武装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泊之中。需要小心谨慎。

第三、谢廖金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这意味着把资产阶级、商人和豪绅推到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的怀抱里去。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北方的危险还存在，将来同它们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应当爱护自己一切可能的盟友和同路人。

第四、同意土地问题应具体地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同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战争正激烈进行的形势下，立即在农村发动内战，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必须在最近时期内向国民党和鲍罗廷提出农民政策纲领，并将你们的具体建议和他们的意见一并报告我们。

第五、暂时停止发表中共中央执委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声明，将基本要点报告广州，最后报告我们。在当前任务方面，必须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协商一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非常危险的。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9—1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件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要靠武装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

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泊之中。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57、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学生的建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6号（特字第49号）记录（摘录）

1926年11月4日

听取：2.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2. ——〔2〕（1）批准中国委员会的半年预算开支，总数为150300卢布（苏联货币）和143300美元，其中包括已经拨给的25000卢布和45000美元，不包括某些待审批的开支项目。

（2）认为该开支数额是最大限度的，建议中国委员会在使用时尽可能地缩减。

（3）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学生的建议。

（4）责成组织局在两周内拟定派往冯、唐生智和汉口各一名政治顾问的人员名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决定：（4）；

格伊同志——决定：（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11—12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8、远东局对发动武装起义采取了轻率态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7号（特字第50号）记录（摘录）

1926年11月11日

听取：〔8〕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8〕1.（1）认为远东局对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2）认为用远东局采取的方式复制多份共产党广州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做法是等于公布这些记录，这在目前条件下是个严重的和不能容忍的错误。

（3）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提出警告。

（4）建议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通报。

2. 在任命驻北京全权代表以前，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3. 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如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则交由莫斯科解决。

鲍罗廷同志和远东局在这些问题上的一切措施和倡议都必须通报莫斯科的驻京代表。

4. 认为任命鲍罗廷同志为驻广州的正式代表是不合适的。在任命我们驻广州政府的正式代表以前，鲍罗廷同志仍负责隶属于广州的各省的工作。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提出适当的人选交政治局批准。

5. 鉴于有必要依靠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尽快成立华中行政机构，

认为现在在占领浙江和南昌的时候，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

6. 不反对在中国成立俄语培训班，以便让中国学生进入我们的高等学校。

由中国委员会确定可能向中国人提供的高等学校接收名额，并预先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同志只能在这个限额内接收。

成立培训班的费用和中国学生在苏联的生活费用应完全由中国负担。

7. 认为由国民党任命一名驻巴黎的代表是合适的。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3—1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9、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8号（特字第51号）记录（摘录）

1926年11月18日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1）（1）建议今天就打电报给萨夫拉索夫同志让他提出辞呈，辞职的理由是督办对他的工作的评价，对他来说是侮辱性的，因此他不可能再继续工作。

（2）立即任命拉舍维奇同志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并在萨夫拉索夫同志提出辞呈后立即公布对他的任命。

（3）责成拉舍维奇同志立即根据契切林同志指示精神发表谈话，并在报纸上刊登。刊登的日期根据契切林同志的指示定。

（4）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制定铁路问题的具体让步计划，今天夜里就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

（5）鉴于业已变化的形势把与奉天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提上了日程，注意到冯看来不得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京方面，认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进一步加强冯在南面的军队是不合适的。

（6）广州目前向北挺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并使张作霖脱离奉天，哪怕以江苏中立为代价。有鉴于此，建议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劝告国民政府占领浙江并继续谨慎地向安徽推进，但不要同张宗昌发生武装冲突。同时，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极有必要把阎锡山吸引到南方人这边来或者使他保持中立。建议国民政府通过冯或同他协商就阎锡山转到国民政府方面来的问题进行谈判，保证他在山西的督办地位。

鉴于于右任和冯之间存在着摩擦，责成鲍罗廷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指出，必须注意使这些摩擦不致发展，并采取推施加以消除。建议我们在华的负责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防止产生意见分歧。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1）、（2）；

拉舍维奇——（1）、（2）、（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5—1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0、加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

联共（布）中央会议

第71号（特字第53号）记录（摘录）

1926年11月25日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1月11日会议第67号记录，决定：2（8）），（报告人：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2）（1）责成拉舍维奇同志于今年11月27日星期六去哈尔滨。

（2）给鲍罗廷、加伦、隆格瓦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近日来的事态证明最高领导机构预先估计到的奉天—山东人进攻疲惫的南方人军队的危险性（10月22日密电第619号）是符合实际的。还出现了包头国民军部队的实际威胁。

“我们深信，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国民革命军的英勇部队和指挥官今后一定会英勇地击退看来不可避免的北方人的进攻。

“然而，考虑到在战斗中已蒙受巨大损失的广州军队各主要军团的内部状况，以及蒋介石和同路人之间的摩擦，目前的任务是：（1）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来整顿秩序和补充部队；（2）加强军队中，特别是同路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3）必须劝告国民党中央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消除或者哪怕是缓和蒋介石、唐生智和其他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临近的联合起来的北方人的进攻危险迫切要求必须消除国民革命军军事首脑之间的纠纷。梅津采夫。”

（3）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政治局1926年11月11日的决定（第67号记录，决定：2——（8）），组织局根据政治局1926年11月4日的决定（第66号记录，决定：2——（2））在下次政治局会

议前提出担任驻广州的正式代表和三名政工人员的人选名单。

(4) 认为有必要给在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日寄来贺信的中国人复信，以(1)红军和(2)所有接到贺信的其他同志的名义回复。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分送复信草稿。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决定：(1)；

拉舍维奇同志——决定：(1)；

伏罗希洛夫同志——决定：(2)、(4)；

格伊同志——决定：(3)；

组织局——决定：(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24—25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1、通过罢工加强工会和党组织对群众的领导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2号（特字第54号）记录（摘录）

1926年12月2日

听取：16.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6. ——[1]批准以下指示：

（1）鉴于一方面奉鲁集团和直隶集团上层领导正打算实行联合，另一方面孙传芳和吴佩孚将领中的分歧越来越大，认为广州的任务之一是加深这种内部斗争。同时作为临时措施应全力支持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开展的争取自治和与南方人结盟的运动。我们建议千方百计利用孙传芳和吴佩孚部分将领中的动摇，推动他们与奉鲁集团作斗争。

（2）认为国民军目前的力量配置是符合现在的形势的，强调国民军继续控制阿山^①——包头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南方集团今后方向的选择——是向信阳（湖北^②）还是向南阳（河南）——应在当地根据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的协议来确定，同时要考虑已出现的形势和冯的军队作为牵制张作霖的反广州人运动的力量作用。

（3）作为对外交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的补充，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援组织和报刊广泛开展争取释放在天津被捕的14名国民党员的运动^③。

① 可能指贺兰山——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河南——译者。

③ 指1926年11月23日天津法租界和英租界警方逮捕的14名国民党员，他们随后被引渡给中国当局。1926年12月底其中7人被处决。——原注

(4) 认为有必要向国民党和广州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防止国民党人继续被捕和被处决，以及为了争取被捕者获释，能否从北方集团所关心的将领和其他人士当中抓一些人质？

(5) 我们认为，对梁士诒提出的就在北京组建政权一事进行谈判的问题应作如下答复：①在军事行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不可能组织任何全国性政府；②必须把北方人不再进攻南方人和冯玉祥军队作为就组建政权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6) 给上海的尼古拉、谢廖金^①发如下电报，并抄送鲍罗廷、北京：

“汉口正在开展的罢工运动需要我们对整个这一运动加以领导，以便①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通过罢工千方百计改善工人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②不容许出现可能挑起外国军队采取武装行动的过火行为。③利用罢工运动来加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领导。④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公开宣布，凡在广州政府解放的省份内，工人一律享有充分的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广州政府将全力保护这些权利”。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3）；列别申斯基同志——（3）；瓦西里耶夫斯基同志——（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26—2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分别指中共中央执委会和维经斯基。——原注

62、成立审查中国开支账目的检查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3号（特字第55号）记录（摘录）

1926年12月16日

听取：3.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扬松同志委员会的报告（政治局1926年12月2日会议第72号记录，决定16—[2]），（报告人：扬松、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3]——（1）批准扬松同志委员会的以下建议，鉴于政治局已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从草案中删去第4条和第5条。

1. 确认1925年4月1日至1926年2月1日期间有308737美元或60万卢布未提交报销单据，这笔款项拨给：加拉罕同志40万卢布，科西奇10万卢布，通过加拉罕同志转给库伦运输公司10万卢布。

1926年2月1日至今这段时间在中国的支出没有提供任何报销单据。在中国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方面也没有报过账。

2. 鉴于北京对拨给它的款项没有报销，没有任何单据材料可以说明开支的项目、开支的数额以及1925年4月1日至今超出拨给款项的开支取自何处，认为无法确定开支是否合理、超支数额以及弥补超支的来源。

3. 鉴于第1、2条确认的情况，责成加拉罕同志于1927年1月1日前向财政人民委员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提交1926年10月1日前这段时间的全部报销单据。

4. 建议中国委员会：

（1）采取措施及时编制从1927年4月1日起的上半年开支预算，并不晚于1927年3月1日提交政治局批准，以便在预算中列出开支的固定项目。

(2) 与财政人民委员部库兹涅佐夫同志一起明确派遣指导员费用及其置装费、安家费、差旅费、家属生活费等问题。

(3) 压缩并尽可能完全停止个别工作人员的预支费用。

(4) 鉴于向莫斯科中央报销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应注意今后每季度结束后都应提交报销单据，最迟不得晚于每季度结束后两个月。

(5) 采取措施追缴个别工作人员的欠款。

5. 确定通过专门的检查委员会来审查中国委员会活动的开支帐目，每年不得少于两次。

(2) 加拉罕同志在担任驻中国全权代表期间财务工作特别是报销工作做得不好，为此向他提出警告。

(3) 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审查中国开支账目的检查委员会。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抄送：

扬松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库兹涅佐夫同志——（1）； 加拉罕同志——（1）（2）。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28—3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3、在城市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斗争是错误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4号（特字第56号）记录（摘录）

1926年12月23日

听取：5.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5. ——[2]——（1）把关于远东局今后工作的问题交由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解决，责成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以政治局就此问题交换的意见作为指导原则。

（2）认为有必要在广州、汉口和上海开设塔斯社分社。

（3）接受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授予布留赫尔和鲍罗廷同志红旗勋章的建议。

（4）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①加快取得对最近发出的关于工人政策问题的电报的答复；②询问鲍罗廷同志，为什么他的报告和军事计划中没有提到同盟者冯，以及广州军队和冯的相互关系如何。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

多列茨基同志——（2）；

戈尔布诺夫同志——（2）；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1926年12月1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9.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在城市里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斗争的这一总政策是错误的。在农村中应该开展斗争，但同时还需要利用有利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千方百计设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避免过火行为和冒进行动。特别应该设法使城市斗争的矛头指向大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向帝国主义者，以便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留在统一战线内反对共同的敌人。我们认为实行调解庭、仲裁法庭等制度是合适的，这样才能通过这些机构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绝对不容许颁布反对罢工自由、工人集会自由等的法令。鉴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请经常报告情况。”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32—3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名为真迹复制。

64、中山大学必须服从中央鼓动宣传部的领导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5号（特字第57号）记录（摘录）

1926年12月30日

听取：6——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索洛维约夫同志的声明（政治局1926年12月23日会议第74号记录，决定：5—[3](1)），（报告人：加拉罕、索洛维约夫同志）。

决定：[3]——（1）同意索洛维约夫同志关于撤销今年12月23日政治局关于任命索洛维约夫同志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决定（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决定：5——[3]（1））。

（2）任命阿拉洛夫同志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汉口）的代表。

（3）派拉祖莫夫去中国，责成中国委员会确定其工作地点并报政治局批准，

（4）责成中央书记处向下次政治局会议再提出一名派往中国工作的工作人员人选。

（5）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格伊同志——（1）（2）（3）（4）；

索洛维约夫同志——（1）；

阿尔洛夫同志——（2）；

鲍罗廷同志——（5）。

听取：[6]——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彼得罗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6] ——（1）认为应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内为 500 名中国工农青年和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青年士兵开设一年期的训练班。开设训练班的费用以 100 万卢布为限。如莫斯科房舍不足，可在列宁格勒开设。

（2）①认为中山大学不能单独派遣驻中国的代表。②将来只有经有关领导机关允许才能派遣代表和同中国建立联系。③认为中山大学必须完全服从中央鼓动宣传部的领导。

（3）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

（4）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去中国的决定。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拉狄克同志——（2）（①②③）；

彼得罗夫同志——（3）；

克诺林同志——（1）（2）（③）；

布留汉诺夫同志——（1）；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3）；

舒米亚茨基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35—3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一九二七年

65、日本必须放弃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政策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7 号（特字第 58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 月 6 日

听取：4——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2 月 30 日会议第 75 号记录，决定：6— [3]），（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4— [2]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作为对他“第 6—10 号急电”的答复：

“如果您提出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单独谈判的问题也是国民党情绪的反应的话，那么最高领导机构就不反对国民政府就在南满和山东作出某些让步问题与日本单独进行谈判，条件是日本在中国其他地方要作出实际让步，日本在广州与安国军^①集团作战时要保持有利于广州的中立，日本要放弃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政策并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完整。当然，谈判只能在日本代表拥有进行单独谈判的切实全权时才可进行。如您将单独谈判的纲领寄来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准备迅速加以研究。

（3）给乔尔内赫同志发去指示，要他把日本准备就满洲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报告给国民政府，并告诉他们，苏联政府将不撇开广州与日本谈判，它不反对在广州和日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① 安国军是 1926 年 11 月在天津举行的反动军阀会议上成立的，目的是联合起来与南方的革命军队作斗争。张作霖被选为总司令。1928 年春安国军被国民党军队击溃，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死后正式结束其存在。——原注

(4) 就国民军任务问题指示隆格瓦和乌斯曼诺夫同志，政治局11月18日指示提请注意，削弱阿山至包头地区军事力量是不恰当的。12月2日的指示指出，国民军的部署符合目前的局势。这些指示至今仍然有效。

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军部队不能向北撤退。关于国民军进攻河南的问题应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蒋介石）商定。

(5) 对国民党关于建立与奉天联盟相敌对的新军阀集团的建议表示赞同。

抄送：

加拉罕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40—4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6、调解鲍罗廷和加伦之间的误解和摩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1 号（特字第 61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 月 27 日

听取：[4]——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给鲍罗廷和加伦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我们获悉加伦与您之间产生了误解和摩擦。中央认为你们绝对有必要共同工作，希望你们考虑身负的责任，达成谅解并合作共事。请你们二位立即报告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规范能保证正常的合作共事。一旦出现分歧，请准确报告分歧的实质和你们各自认为必须有的提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5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7、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4号（特字第63号）记录（摘录）

1927年2月5日

听取：10.——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0.——[1]认为有必要替换已在蒙古任职期满（两年）的工作人员和不适合在该国工作的人员。考虑到今年调换43名工作人员要一次支出5万多卢布，这对蒙古政府来说是力不胜任的，责成中国委员会提出精确预算，拨给此项工作所需资金。

[2]认为国民革命军代表团赴莫斯科采购军用物资最好推迟一个月。

[3]认为有必要再招收10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如招收不到黄埔军校毕业生，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或中山大学中招收。

[4]认为最好派米夫同志和中山大学的2至3名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和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此问题由彼得罗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商定。

[5]在收到鲍罗廷同志答复之前，让由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派往德国的两位代表暂留莫斯科。询问鲍罗廷同志，这两位代表是否确实由国民革命军派遣，他是否支持他们出差。

[6]给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鉴于英国人尖锐地提出了俄国同志在华工作问题，请您采取措施防止中国人过多渲染您在广州的活动。”

[7]请注意，加拉罕同志从未与我驻华工作人员和代表进行过任何（公开的和秘密的）署名通信。

[8] 认为有必要从法律上确定我们在华工作人员的地位，以防止有人利用他们的在华逗留和活动来反对苏联。责成李维诺夫、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向下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有关的决议草案。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彼得罗夫同志——[4]；

莫斯克文同志——[4]；

李维诺夫同志——[8]。

1927年2月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4. ——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24. ——为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①拨款9000卢布。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布留赫尔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56—57、5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原注

68、责成苏联商船队派船去广州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5 号（特字第 64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2 月 10 日

1927 年 2 月 8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7. ——关于加拉罕同志的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7. ——向加拉罕同志提出警告，因为他无视中央政治局的禁令，继续在发往中国的电报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抄送：

加拉罕同志。

1927 年 2 月 9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6. ——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16. ——采纳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责成苏联商船队派“因季吉尔卡”号去广州，费用以根据今年 2 月 4 日政治局决定拨出的 9000 卢布为限。

抄送：

彼得罗夫同志，

伊万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6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9、英国推行干涉和恐吓政策必遭失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7 号（特字第 65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2 月 17 日

听取：1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7. ——[1] 根据鲍罗廷同志近来关于他同蒋介石发生分歧的报告（2 月 8 日第 19 号专电，2 月 7 日第 10 号专电，2 月 10 日第 24—25 号专电）给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2] 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根据已经了解到的中国总的形势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改变的问题向政治局提出实际建议草案。

[3] 给加伦发去如下电报：

“鲍罗廷同志近来关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问题上的冲突的报告没有谈到您的观点。请告您对冲突的态度。”

[4] 鉴于收到关于南方人作战计划（主力进攻上海和沿海地区）的报告（2 月 11 日隆格瓦第 58—61 号专电）和鲍罗廷认为主攻方向是河南的电报（2 月 13 日第 23—24 号专电），给加伦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据隆格瓦报告称，蒋介石的作战计划规定南方人的主力进攻浙江和上海。鲍罗廷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建议重视河南方向，据他说，河南将决定北方战局的成败，速告您的观点。”

[5] 给达夫谦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速告汪精卫动身时间。”

[6] 叶夫根尼·陈^①询问（见鲍罗廷2月13日第26号专电），如果英国继续以同苏联决裂相威胁，他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供什么帮助，对此可向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作复：

“答复您第26号电（2月13日专电），最好转告叶夫根尼·陈：以公开驳斥英国报刊谣言为宜，英国报刊称国民政府和英国的冲突似乎是苏联施压造成的，可以在报刊上声明，中国是独立国家，执行自己独立的政策，任何谣言都不能削弱中苏友谊，英国推行的干涉和恐吓政策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7] 鉴于收到关于国民军物质状况极其困难的报告，考虑到国民军在完成未来作战任务时的作用，建议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提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注意向冯提供巨大物质支援的必要性。

[8] 认为可以接收165名中国军官入苏联军事学校（其中10名中国指挥员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条件是由国民政府支付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费用。

（2）中国委员会保证军事学院大部分空缺提供给中共党员。

（3）责成中国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大共产党员在接收的165名中国军官中的比例。

[9] 认为有必要从人民委员会的后备金中拨出43785卢布用于调换驻蒙教官的费用。

[10] 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11名同志（包括米夫同志，其中有4个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并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费用由上述两个学校负担。

① 即陈友仁，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本书制作者注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布哈林同志——[2]；

戈尔布诺夫同志——[9]；

莫斯克文同志——[10]。

1927年2月1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46.——共产国际执委会1926—1927年度预算（报告人：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46.——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1926—1927年度预算为1305755卢布。

抄送：

布留汉诺夫。

皮亚特尼茨基、伊万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63—66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0、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都不能容许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记录（摘录）

1927年2月17日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阿尔秋欣娜、多加多夫、泽连斯基、卡巴科夫、科马罗夫、科肖尔、库比雅克、列普谢、奥拉赫拉什维里、拉科夫斯基、鲁希莫维奇、斯米尔诺夫、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苏利莫夫、托洛孔采夫、托洛茨基、瞿鲁巴、丘多夫、施瓦茨、什维尔尼克、施密特同志。

候补中央委员：格伊、戈洛谢金、日丹诺夫、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加明斯基、基谢廖夫、克里尼茨基、卢卡申、梅利尼昌斯基、穆萨别科夫、斯克雷普尼克、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译、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3. ——关于新疆问题（报告人：泽连斯基、加拉罕同志）

决定：13. ——[1]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

[2] 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

[3] 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4] 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

[5] 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

听取：1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7. ——决定——列入特别文件。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20，第 1、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1、在宁夏或其他地点建立电台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8号（特字第66号）记录（摘录）

1927年2月24日

听取：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2月17日会议第87号记录，决定：17），（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 鉴于伏罗希洛夫同志患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议。

[2] 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指示他们非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这笔款项。

[3] 考虑到国民军在河南积极作战时的影响，指示加伦同志必须采取措施从汉口与国民军取得联系。

询问坎格拉里同志，通过贺兰山—宁夏建立的联系是否可靠。应告知桑古尔斯基同志，必须在宁夏或其他地点建立电台，以便通过内蒙进行联系。

[4] 询问鲍罗廷和格里高里同志：与在河南同奉军作战的“红枪会”是否有联系，为保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河南爆发的农民战争的领导权采取了哪些措施。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67、6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2、目前中国革命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89号（特字第67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3日

听取：1. ——关于《真理报》和《消息报》（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1. ——[1] 禁止《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宣扬俄国同志在中国和其他附属国活动的报道或文章。

[2] 禁止《真理报》和《消息报》未经联共（布）中央特别批准刊登由俄国人署名的发自印度和英国其他殖民地的报道。

抄送：

乌里扬诺娃同志；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

听取：9.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2月24日会议第88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加拉罕同志）。

决定：9. ——（1）采纳中国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改变的问题所提出的如下建议：

[1] 认为有必要坚决执行发展工农运动、吸收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2] 认为有必要坚决大力为国民党左派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基础。

[3] 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大力促使国民党变为有内部纪律的经选举产生的组织；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

[4] 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

[5] 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部队。

[6] 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

[7] 必须实行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等的实际政权机构的方针。

[8] 必须使共产党在各地公开进行活动；不容许实行自愿的半公开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叛卖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周围揭露国民党右派。

[9] 必须提请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受到巨大威胁。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贯彻执行指示。

(2)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往汉口的有政治指示性质的电报一律由电报局发往海参崴然后由信使送达。

(3) 责成中国委员会就国民党内部的党内派别问题以及国民政府的重大措施问题为政治局委员编写每月综合通报。

(4) 认为有必要在报刊上说明中国国民政府的行动纲领。

(5) 责成中国委员会讨论改进我国报刊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报道的措施。

(6) 责成中央书记处在一周内研究关于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

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

(7) 撤销政治局今年2月24日关于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的决定(第88号记录, 决定1. [2])。

(8) 责成伏罗希洛夫和鲁祖塔克同志确定中国委员会预算的最终数额。

(9) 认为有必要从西欧各国共产党中派出一定数量的指导员和顾问去中国。

(10) 认为可以派谢苗诺夫同志去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2);

库比雅克同志——(6);

鲁祖塔克同志——(8);

布哈林同志——(1);

古谢夫同志——(4) / (5)。

听取: 13.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 斯大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 13. ——(1) 禁止今后通过国家机关向中国运送武器。

(2) 责成中国委员会为此目的组织私营公司。

(3) 向在中国接收武器的人极为秘密地通报本决定。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 目录162, 卷宗4, 第70—74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73、应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0号（特字第68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10日

听取：1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加拉罕同志）。

决定：12.——[1]给鲍罗廷同志发去由布哈林同志根据共产国际委托签署的如下电报，并转国民党中央成员，抄送中国共产党中央：

“（1）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建立两个中心、两个国民党、两个政府和因此建立两支军队的做法是危险的和不能容许的。（2）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①（3）我们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的中国。（4）我们认为不久前蒋介石显然为讨好国民党右派所作的答记者问，是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的打击。（5）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在武昌提出的同蒋介石合作的条件^②是正确的并能保证国民党的统一。 受共产国际委托 布哈林。”

①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0至17日在汉口举行。蒋介石拒不参加这次全会。——原注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2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其中谈到必须集中党的领导和恢复党的权力，恢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中国民革命军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治教育工作，统一外交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和同党建立密切的联系。——原注

[2] 秘密征询鲍罗廷同志和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意见，是否应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3] 责成鲁祖塔克和加拉罕两同志草拟政治局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交中央通过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作出决定。

[4] 认为阿拉洛夫同志去广州不是担任大使，而是担任苏联政府的代表，以便同广州政府建立接触。认为阿拉洛夫同志必须乘第一班轮船去广州。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3]；

阿拉洛夫同志——[4]。

听取：13.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3 月 3 日会议第 89 号记录，决定：9），（报告人：库比雅克、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彼得罗夫同志）。

决定：13. ——[1]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对于东方各国应是统一的，其活动范围应包括中国在内。

[2] 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

[3] 拟由列普谢同志任远东局书记，责成库比雅克和莫洛托夫同志在列普谢来莫斯科后同他谈一下。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3]；

库比雅克同志——[3]。

听取：14. ——关于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综合通报问题（报告人：缅任斯基同志）。

决定：14. ——[1]责成书记处收回所有已发出的《中国委员会综合通报》第一期，并予以销毁。

[2] 建议中国委员会今后在综合通报中系统地介绍一个月的事态，其中不应引用秘密文件和密电。

抄送：

伏罗希洛夫、托夫斯图哈同志。

1927年3月1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 ——关于中国委员会下半年预算（政治局1927年3月3日会议第89号记录，决定：9—8），（报告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32. ——批准中国委员会1926至1927年度下半年预算总额为94547卢布70戈比和183819美元。

抄送：

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布留汉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76—7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4、真正捍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2号（特字第70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24日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3月17日会议第91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1] 同意切尔内赫同志关于派西纳尼同志去阎锡山处工作的建议，责成他弄清情况、工作的可能性并建立必要的联系。如形势有利，则要留下来工作，以太原师范学院教师的名义作掩护（阎锡山的建议）。

[2]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对谭平山同志的任命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与广大农民群众取得联系并制定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土地问题的具体途径。

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右派和资产阶级地主分子的斗争矛头将会指向国民革命政府的土地措施和谭平山这位共产党员。

因此应立即着手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采取一系列实际的土地措施，这些措施要向农民表明，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是真正捍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这样会保证农民给予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以必要的支持。”

[3] 征询鲍罗廷同志的意见，要他在与中共中央商量后作出报告，他们是否认为由我们派一位有理论素养和土地问题实际工作经历的同志担任谭平山同志的顾问是合适的。也请鲍罗廷同志报告一下谭平山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划。

[4] 授予以下同志以红旗勋章：（1）戈列夫（尼基京）——第

四军顾问；（2）波洛——第四军第12师顾问；（3）捷尔（捷鲁尼）——华南组组长助理；（4）切列潘诺夫——第一军顾问；（5）谢尔盖耶夫——飞行组组长；（6）克拉夫佐夫——飞行员；（7）塔尔贝格——飞行观察员；（8）贝泽瑙——飞行观察员；（9）科夫里日尼科夫——机械师；（10）基赫坚科——机械师。

[5]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抄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据我们获悉的迟到情报，蒋介石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愿意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鉴于我们未能及时收到蒋介石的这份电报，现表明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有必要会见蒋介石。如果你们认为这一会见合适，请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转达它的这一指示。”

[6] 关于隆格瓦的问题仅限于加拉罕同志发的电报。

抄送：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1927年3月2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41.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41.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并转国民政府：“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

抄送：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83—86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5、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31日

听取：5.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 ——[1]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并抄送林德同志：

“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2] 给上海中共中央发去对今年3月31日来电的如下答复：

“（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6）请每日通报情况。”

[3] 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在逮捕我国外交信使和鲍罗廷娜同志的问题上不求助日本的意见。

[4] 就贷款问题答复鲍罗廷同志，我们原则上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但要说明鉴于各种困难希望分两期付款，并请告知，可否一部分贷款用商品支付和用哪些商品支付。我们认为，形式上应以我国经济机构的名义来组织贷款。建议有关贷款问题暂时保密。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2]。

1927年3月2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9——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9. 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加拉罕同志关于发去如下电报的建议：

“上海，致中央委员会。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

抄送：

加拉罕、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927年3月2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0.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0. ——给上海党中央发去如下电报：

“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福京立即返回莫斯科。请经常通报情况。”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伏罗洛夫同志。

1927年3月31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32——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去 10 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炮击的受害者。

抄送：

别列尼基同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沙因曼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90—9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6、对逮捕苏联公民搜查使馆人员住所提出抗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7日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2. ——[1]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搜查我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事件^①以塔斯社名义起草一份新闻公报。

[2] 成立由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新闻公报稿，决定该公报的发表问题，以及就这一问题拟定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3] 指示切尔内赫同志仅对逮捕和搜查享有豁免权者的住所正式提出抗议，未经莫斯科批准不要采取任何其他步骤。

[4] 建议委员会在政治局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蒋介石的代表邵力子的来信的复信。

[5] 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拟派格里高里^②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这样做是否合适。

[6] 认为有必要把切尔尼亚克同志从上海调到另一个责任较小的地方。责成加拉罕和布哈林同志派另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7] 绝对禁止利用中东铁路的地带和组织在北满组织游击运动或搞破坏活动。不准在苏联境内建立游击队。

[8] 认为有必要研究国民政府的军用器材订货并开始与代表团就

① 指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军队的士兵和警察闯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区，搜查和抢劫武官住所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住宅、逮捕苏联公民的事件。

② 即维经斯基。——以上原注

交货事宜和支付条件进行谈判。

[9] 建议加伦和鲍罗廷同志派一名更称职的同志去代替李济深的顾问叶夫列莫夫同志。

[10] 征询国民党中央意见，中山大学的一批国民党右派学生是否必须返回中国。

[11] 认为有必要推迟阿拉洛夫同志去广州的日期。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李可夫同志——[2]；

布哈林同志——[2]，[6]；

温施利赫特同志——[3]、[5]、[6]、[7]、[8]、[9]、[10]、[11]。

1927年4月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1.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 ——立即通过远东银行上海分行拨给汉口中央银行200万卢布。

抄送：

加拉罕、沙因曼、弗鲁姆京同志。

听取：32.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重新研究政治局就派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国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请求。

决定：32. ——改变政治局今年4月5日的决定，批准希塔罗夫同志出席中国共青团代表大会^①。

^① 指1927年5月10—16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原注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97—98、10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7、召回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苏联顾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96号（特字第74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21日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2. （1）将所有不能在现在工作的地区继续公开工作的军政工作人员调到别的地区；将不太重要的工作人员召回。

（2）鉴于武官离开中国，暂时委托乌拉尔斯基同志全面领导军事工作人员。

（3）征询银行家^①和加伦两同志对给冯玉祥委派政治顾问是否合适和相应人选的意见。

（4）指示拉舍维奇同志取消中东铁路的秘密专递。

（5）询问北满委员会是否采取了销毁中东铁路俄国党组织文件的措施。

（6）为答复北满委员会的询问，发去以下内容的电报：

“要避免出现任何可能给中东铁路上的惊慌或我们在那里等待出乱子的做法提供任何借口的行为，因此，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坚决同中东铁路上的任何撤离情绪作斗争。”

（7）以必须完成学业为由，拒绝国民党右派学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国。

（8）征询国民政府的意见，今后如何对待由李济深派来的并由国民政府授予全权的代表团，如何处理经该代表团转来的资金。

（9）给希塔罗夫发去电报，如邵力子犹豫不决，不想回中国，我

^① 即鲍罗廷。——原注

方仍要热情款待，他如果愿意可以留在我国境内；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给人怀疑我们搞强制提供借口的行动；建议我方组织要非常客气地对待他。

(10) 要求多夫加列夫斯基极其秘密地探听日本政府对苏联、满洲和华南的行动计划，并将结果报告莫斯科。

(11) 征询拉舍维奇的意见，他如何评价业已形成的局面，关于张作霖的计划，他有什么消息。

(12)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天就起草答复中国代办照会的照会；责成吸收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最后审定照会。

(13) 给鲍罗廷、汪精卫和加伦发去以下内容的电报：

“我们认为召回我们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顾问是适宜的。因为他们属于派给你们使用的人员，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就将他们召回并通知我们，你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召回。”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9）；

李维诺夫同志——（12）；

莫洛托夫同志——（1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03—104、10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8、不能建议汉口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97号（特字第75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27日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4. ——[1] 给林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回复33号电，转发最高领导机构决定：（1）我们认为您的政策和建议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我们的指示和汉口的计划的。（2）认为您建议汉口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在政治上是有害的。（3）顾问是临时派到汉口国民政府工作的，应让他们去那里请求指示。您的干预是不必要的。”

[2] 给洛佐夫斯基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顾问是临时派到汉口国民政府工作的，应立即让他们去那里请求指示，请您不要干预。”

[3] 认为有必要向湖南提供石油制品和电工器材。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紧急执行本决定，并且每周以书面形式向政治局报告所采取的措施。

[4] 给远东边区委员会发去以下电报：

“回复您71号电。已给哈尔滨发出指示，现将同样指示通知你们：（1）不要成立任何罢工委员会，如有这样的委员会，应予解散。（2）不要组织任何游击行动，如有这类企图，应该打消。（3）今后等待我们指示。”

[5] 认为有必要根据国民政府的请求，从以借款形式拨给国民政府的款额中调拨60万卢布交冯支配，并将此事通知汉口。

[6] 责成中国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情报严格保密，禁止用电报通报详细作战计划。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米高扬同志——[3]；

斯蓬德同志——[5]；

远东边区委员会——[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08—10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9、在作出特别决定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9号（特字第77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30日

听取：1. ——温施利赫特同志提交的问题（政治局1927年4月28日会议第98号记录，决定：（8）），（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武器交易业务交东西欧换货贸易公司租赁协会。

（2）责成温施利赫特和米高扬同志在一周内协调好该协会与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关系，商定补偿它因按低于成本价出售武器所受到的损失的办法。

（3）在政治局作出特别决定之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1）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据我们得到的一些值得重视的侦察材料，海军将军们^①决定，一旦叶夫根尼·陈对调解南京事件^②的照会作出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

① 指集结在中国水域的外国海军将官。——原注

② 南京事件，又称“三·二四”惨案。1927年3月24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罪行之一。——本书制作者注

他们就摧毁汉阳和广州的兵工厂。不排除这种决定将被取消，因为还在犹豫；但也不排除他们试图使用这种制裁。请您在同外国人特别是同英国人谈判时，注意并利用这一点，以防万一。”

(2)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以特殊理由允许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的妻子经苏联领土前往中国，将此事通报我国报刊新闻部和驻外新闻记者。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11 —11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0、采取紧急措施、保守工作机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1 号（特字第 79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5 月 12 日

听取：6.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6. ——（1）采纳中国委员会的建议，提前按任命派遣中国指挥官。

（2）允许现有股份公司同来自中国的代表团^①达成关于向国民政府出售军事器材的口头协议。如果代表团认为必须返回中国，要在这方面给予协助。

（3）把向汉口提供无线电台的问题按苏联程序交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协商解决。

（4）责成由科肖尔、亚戈达、李维诺夫和别尔津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修订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保管档案、发送和保管发往国外的密电和其他机密材料的程序问题的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委员会工作期限为两周。由科肖尔同志负责召集。

（5）责成李维诺夫同志和加拉罕同志在两天内向政治局提出关于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②的诉讼程序的决议案。

① 指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团。

② 1927 年 4 月 6 日搜查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时，中国当局逮捕了 15 名苏联工作人员，指控他们从事非法活动。1928 年初，苏联工作人员获释回国。

——原注

(6) 推迟审议科兹洛夫斯基同志就任上海领事的问题。向林德同志下达断然指令，让他不要干预政治，只起传递者作用。

(7) 认为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此目的选派负责工作人员，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书记处协商其人选。

(8) 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的这项决定，让上述前往中国的工作人员带去发给全体在华工作同志的专门指示。

(9) 责成加拉罕同志起草给在华工作人员的必要的政治指示信，并呈交中央书记处。

(10)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内发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保守工作机密和销毁有损名誉的文件的密电。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4）；

亚戈达同志——（4）、（7）、（8）、（10）；

听取：18. ——关于北京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18. ——（1）认为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是不适当的。

（2）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报界说明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的情况。

抄送：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1—2、4、6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1、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13日

1927年5月13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 ——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①。“致鲍罗廷、罗易^②和陈独秀。你们关于土地运动的报告收悉。我们的建议是：

（1）现在在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各省，特别是在广东省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这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这是在中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军事大军的基础。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过一个月或更晚些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现在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关于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法令是必要的。

（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

（3）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

① 文件的缩写稿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原注

② 罗易(1887—1954)，生于印度。1926年底，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工作，1927年8月返回莫斯科。——本书制作者注

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不能容忍。”

抄送：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8—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2、驳斥托季反对派对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攻击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3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5 月 19 日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丘巴尔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阿尔秋希娜、克维林、科马罗夫、大科肖尔、洛博夫、鲁希莫维奇、斯米尔诺夫、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苏利莫夫、瞿鲁巴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卡明斯基、基谢廖夫、克里尼茨基、柳比莫夫、谢列布罗夫斯基、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奥尔忠尼启泽、索尔茨、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4——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102 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李维诺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决定——特别文件。

听取：17. ——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的草稿。

决定：17. ——批准（见附件 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103 号记录

决定：17，附录 2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抄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最近一个月来，即在联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的时期里，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这些文件中的有些文件只是近日才为联共中央所了解，因为它们没有发给联共中央，看来预先规定是在联共组织中传播的。所有这些文件都带有很明显的派性，收到这些文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文件直接攻击联共中央的路线和决定，间接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定。

没有必要答复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他们关于英苏委员会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重复，而且已被联共中央 1927 年 4 月（4 月 13 日—16 日）全会所否决，联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如下：

1. 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他们对联共中央的指责（说它在使中国革命遭到“灭亡”）——所有这些事实不值得专门加以评论，因为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对它们的正确评价，无需加以证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中谈到中国革命的“灭亡”，实际上是说一个小派别的真正灭亡，即在大家眼中业已破产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派别的真正灭亡。濒于灭亡的派别是会把自已的灭亡描绘成革命灭亡的征兆的，联共中央明白这样做的心理动机。

2. 实际上，联共中央在中国问题以及英苏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主要指示和决定的具体体现和贯彻。特别是联共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下列文件中都有反映：共产国际关于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中国事件的有名呼吁书（联共中央直接参与了呼吁书的起草工作）、以共产国际的这个呼吁书为基础制定的《供宣传工作者使用的斯大林提纲》（这个提纲经联

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并在《真理报》上发表）、政治局今年5月7日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的“答复”（这两个文件都发给了执委会委员）、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布哈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联共中央直接参与了该提纲的起草工作），最后是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有关社论。联共中央认为，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所有“原则性”攻击的有力回击。

联共中央确信，反对派关于立即同总委员会决裂的要求，实际上是利用一些困难进行极左投机，它只会削弱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导致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处境进一步复杂化，而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

3. 形式上就两个问题，即英苏委员会问题和中国问题，联共中央全会已有机会发表意见和作出决议，谴责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这些决议说：1）“赞同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代表团在英苏委员会中的工作”，2）“赞同政治局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方针，拒绝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决议案”（见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决议）。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现在的表演是对他们所发表的关于服从联共中央决议的声明的粗暴违反，同时也是企图在联共中央全会已经解决的问题上挑起全苏范围的争论，并把这种争论强加给党，而这种争论无论从事物的根本实质上考虑（党已不止一次地证明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明显站不住脚的），还是从苏联目前的困难以及国际形势的角度考虑，都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其次从全苏范围的争论必然要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困难的角度考虑，也不能认为是合适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核对无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35，第 1、5、15—17 页。

记录为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83、重新审议中山大学的教师组成人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3 号（特字第 81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5 月 19 日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101 号记录，决定：6），（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4. ——（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以前作出的关于利用我们从国外报刊和我国报刊中获得的秘密消息的决定，在报刊上就北京逮捕苏联信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事并针对对他们的态度和被处决的危险等掀起一场运动。

（2）责成中央书记处重新审议中山大学的教师组成人员，以配备思想上更为坚定的教师，特别是要立即解除拉狄克、普里戈任和达林同志的中山大学教师的职务。

（3）建议鲍和加^①就派遣学生到我国普通高校和军事院校学习一事，同莫斯科协调，使派遣工作在核准的分配名额限度内进行。

（4）中国委员会关于在华政治领导问题的建议推迟审议。

（5）建议汉口选派从广州召回的部分顾问到于右任部队工作。派遣 10 名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毕业的中共党员到于右任部队工作。

（6）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就把于右任的一定数量人选纳入派往我国高校学习的中国青年总分配名额的问题同汉口进行交涉。

（7）满足冯玉祥关于给他派去 5 名医生、1 名工会运动顾问、1 名土地问题顾问和 1 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教官的请求。

① 分别指鲍罗廷和加伦（布留赫尔）。——原注

(8) 派遣格^①同志到冯玉祥那里任政治顾问。

(9) 同意鲍罗廷同志关于派遣拉祖莫夫同志去四川的建议。

(10) 责成组织局挑选工作能力较强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的组成人员。

(11) 给加伦同志派去一名译电员，并责成中国委员会从其预算中为加伦同志的电报开支拨出所需的经费。

(12) 允许外交人民委员部签署关于赤塔—哈尔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海参崴电话联络的电话协议。

(13) 将米夫同志从中国召回，任命他为中山大学校长。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和加拉罕同志——除（2）以外的其他各项。

科肖尔——（2）、（10）、（1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0—1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可能是格林施泰因。——原注

84、不得向武汉和上海发出密电和指示性电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5 号（特字第 83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5 月 26 日

听取：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7. ——（1）未经中央书记处允许不得向武汉和上海发出密电和指示性电报。

（2）调拨给乌拉尔斯基同志飞机备用零件的问题和发送给冯的 6 架飞机的问题推迟到下星期四讨论。

（3）允许中国委员会从其经费中每月拨给安德烈同志 1000 美元用于军事组织工作。

（4）为了给特种部队（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今年毕业生中挑选 10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军事部门保证对他们进行培训。中国委员会要向下次会议提出必需的经费预算。

（5）派遣 64 名中山大学毕业生供国民政府使用；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次是国民党员。在确保途经南方港口的路线安全之前，仅通过库伦派遣。

（6）鉴于从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已经提供了个人口供，将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这个消息备案待查，并建议将这些口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7）认为有必要将米夫同志回来的行期推迟两个月。

（8）不调科兹洛夫斯基同志去上海。

抄送：

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第 16—1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5、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是可行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9 号（特字第 97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8 月 11 日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 1927 年 7 月 21 日会议第 118 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3——（1）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①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 15000 支步枪、1000 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帐上）、30 挺机关枪和 4 门山炮，带 2000 发炮弹，总金额 110 万卢布。

（2）只有取得上级机关^②特别允许后才能开始将货物运往海参崴。

（3）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

（4）将 41 名中共党员暂时留在库伦。

（5）关于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关于伯纳^③ 1927 年 8 月 9 日的电报问题，等布哈林同志回来后再议。

（6）不接受中国委员会关于让柳克斯同志留在汉口以便取得情报的建议。

（7）不要阻拦唐生智的 17 名军官离开苏联。

（8）提请中国委员会副主席^④注意，向政治局提交的问题在两个

① 即布留赫尔（加伦）。——原注

②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原注

③ 即罗米纳兹。1922—1924 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 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 1927 年中共的“八七”会议。——本书制作者注

④ 指温施利赫特。——原注

月以前已经解决了。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年7月25日

听取：3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①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1927年7月29日

听取：3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7——立即给伯纳和乌拉尔斯基寄去30万美元。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

抄送：伏罗希洛夫同志。

听取：39——关于中东铁路问题。

决定：39——认为可以根据政治局1926年11月20日和1927年3月11日决定单独解决经费问题。

抄送：加拉罕同志。

^① 指南昌起义和随后向广东进军的计划。——原注

1927年8月5日

听取：4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47——（1）给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都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

（2）给加拉罕的指示：

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秘密工作人员带去30万美元。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1927年8月8日

听取：52——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52——给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把你们那里的工作做好，不要忘记[军事]部队和群众运动的联系。很高兴取得了成绩。感谢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乌拉尔斯基发表政治声明，我们认为多余的。如果没有安全保证，我们建议乌拉尔斯基返回莫斯科。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74—7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6、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0 号（特字第 98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8 月 18 日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米高扬同志）。

决定：2——（1）鉴于乌拉尔斯基同志已离开，取得所需经费和支配基金的权力授予伯纳同志。

（2）远东银行上海分行的 30 万美元划在伯纳名下。

（3）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 1 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

（4）责成加拉罕和米高扬同志在 24 小时内商定派工作人员去汕头的问题，以便在那里设立商务代表处或我们的其他某种经济机构，并紧急通过政治局的相应决定。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1）、（2）、（3）；

沙因曼同志——（1）、（2）、（3）；

米高扬同志——（4）。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8 月 13 日

听取：3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

“伯纳、乌拉尔斯基。答复你们 489 号专电：

(1) 批准柯巴^①12日关于使国民党革命化的电报^②；(2) 你们的方针仍然有效；(3) 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4) 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5) 在目前阶段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决不能迫使国民党左派支持这种宣传；(6) 关于建立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参加而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的上海式的省国民政府^③的建议是正确的；(7) 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8) 同意立即预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套做法；(9) 对形势总的估计是：在将领们之间斗殴、张[发奎]、南京和武汉相互削弱、工农日益不满、共产党善于领导和你们的军队对农民做出模范行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和成立工农革命民主政府大有希望。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温施利蚌特、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附录] 密电

致汉口苏联领事伯纳

您没有理解指示的意思。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

① 即斯大林。——原注

② 见附录。——原注

③ 指1927年3月上海起义时建立上海市政府的计划。——原注

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农村一切政权归农会”的口号仍然有效。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不要让加伦卷入冯[玉祥]和唐[生智]的肮脏斗殴中，即使提提意见也不要。日内我们将逐项转告最高领导机关的答复，这里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请转告加伦，感谢他提供的善意的情报。 柯巴。

晚间发出。

1927年8月12日。

托夫斯图哈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84、86—8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7、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21号（特字第99号）记录（摘录）

1927年8月25日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1927年8月18日会议第120号记录，决定：2（报告人：米高扬、加拉罕、温施利赫特、沙茨金同志）。

决定：2——1.（1）批准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同志作为派往广东工作的人选，在最终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前安排好这项工作。

（2）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

2. 将今年正规学校的毕业生分为三组：

（1）没有受过政治训练和暴露出反革命观点的学生，要遣送回中国回原部队（23人）。

（2）要为在加米涅夫学校^①毕业和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提供继续在“射击”^②学习的机会，并为他们成立一个专门组（7人）。

（3）利用5名完全可靠的学生来从事我们在华的工作。

3. 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立即给军事主管部门拨款549000卢布用来补偿已耗费的物资。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庭审议军事主管部门支付这笔经费的程序问题。

4.（1）批准奥赫京同志为驻蒙古全权代表。以中央名义给奥赫

① 以工农红军总司令C. C. 加米涅夫命名的高级联合军事学校。

② “射击”是1918年成立的高级指挥训练班。

京同志发去关于他在那里活动的指示信。

(2) 责成中央书记处确定派往库伦的人选，以便举行定于9月20日召开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大会。

5. 批准派施塔尔曼和弗兰克同志去安德烈同志那里。

6. 采纳沙茨金同志关于派阿布戈夫同志去中国协助别尔格的建议。

7. 将米高扬同志关于汕头的报告备案待查。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舍波尔达耶夫同志——1(1)、4(1)、(2)、5、6.；

柯西奥尔同志——4.(1)、(2)；

弗鲁姆金同志——3.；

文佐夫同志——3.；

米高扬同志——7.；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1)、6.；

戈尔布诺夫同志——4.(1)、第一部分；

叶努基泽同志——4.(1)、第一部分。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年8月22日

听取：2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1——派维伊曼同志去中国工作。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89—90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8、同意派同志去中国工作的建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2 号（特字第 100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9 月 1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8 月 29 日

听取：2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7——将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送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听取：28——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

决定：28——相信阿尔布列赫特同志今后不会犯由包括阿尔布列赫特同志在内的上海四位同志所签署的信^①中所犯的那些错误。同意皮亚特尼茨基关于派阿尔布列赫特同志去中国工作的建议。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92—9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 H. A. 福京、T. Γ. 曼达良、H. M. 纳索诺夫和 A. E. 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该信于 1927 年 3 月 17 日收到并被托洛茨基用来在 1927 年 5 月 2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联共（布）领导的对华政策。——原注

89、最好让陈独秀来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4 号（特字第 102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9 月 15 日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 1927 年 9 月 8 日会议第 123 号记录，决定：10 和政治局 1927 年 8 月 11 日会议第 119 号记录，决定：3，第 5 点）。（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布哈林同志）

决定：3——（1）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①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要注意到这些军事人员应受过政治训练，应把自己不仅看作是军事顾问，而且看作是政治方面的顾问。

（2）1. 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2. 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3. 将此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最后决定。

（3）关于在每个地方政府中保留我们的军事代表问题和驻南京的领事馆问题，推迟审议。

（4）任命库丘莫夫同志为中山大学教务部主任，把他从中国召回。

（5）1. 在国家银行给驻莫斯科中国代办开立每月支付 3000 卢布的 6 个月贷款户头。2. 凭北京外交部签署的保证书付款。

（6）通知乌拉尔斯基同志，让他立即来海参崴待命。

（7）关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统一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问题，推迟审议。

① 即温施利赫特。——原注

(8) 1. 将呆在库伦的 41 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 H 部队^①革命委员会的调遣。2. 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 4000 美元作派遣费用。

(9) 将学院的 5 名学员——国民党右派遣送回中国。

(10) 由组织局立即拟定派往内蒙古工作的人选。

(11) 1. 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2. 不反对叶甫根尼·陈发表声明，建议他只针对国民党发表一个声明，此外还在报纸上发表谈话。

(12) 关于李济深的申请[®]问题——推迟审议。

(13) 同意政治局今年 5 月 5 日关于秘密文件的决定，建议加拉罕和温施利赫特同志（按侦察局系统）监督我们的中国工作人员执行这一决定的情况。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全部。

莫斯克文、克雷洛夫——（4）。

沙因曼——（5）。

科肖尔——（10）。

叶努基泽——（11） 1. 。

布哈林——（2）。

瓦西里耶夫（共产国际执委会）——（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98—99、10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似指南昌部队。——原注

90、我们与冯[玉祥]的关系早已结束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5 号（特字第 103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9 月 22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9 月 19 日

听取：15——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5——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答复第 335 号专电。我们与冯[玉祥]的关系早已结束。他的代表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往，在入境时或在途中我们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听取：2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1——对今年 9 月 13 日伯纳同志的电报（第 558 号专电）作以下答复：

“汉口。致伯纳。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我们不清楚您的

① 指 1927 年 8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国际局势》的决议。——原注

建立各省政府的计划。请告知，这些政府将在什么旗帜下建立：是苏维埃还是国民党。 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07—10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91、警告中共防止过去的国民党员加入中共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6 号（特字第 104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9 月 29 日

听取：6 一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洛佐夫斯基同志）。

决定：6—（1）认为与冯[玉祥]彻底决裂的政策无疑仍然有效，派我们的同志去兰州和开封只是为了搞情报，给予他们像在上海授予的类似领事称号。

（2）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今年 9 月 15 日决定着手派 11 名军事人员去广东。

（3）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 10 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

（4）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

（5）向伯纳发电报作以下指示：

1. 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

2. 认为同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实行内部结盟的政策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的国民党登台的话，但是同这样的国民党实行外部结盟，有时根据目前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是可行的。

3. 警告中共防止过去的国民党员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最大限度的严格措施。

（6）责成由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温施利赫特和加拉罕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这些决议、洛佐夫斯基和温施利赫特的草案和

政治局交换的意见起草给伯纳同志的电报稿。电报中强调，目前广东最大的敌人是张发奎，斗争应主要集中反对他，同时与武汉派的拥护者们绝对不应签定任何协议。委员会由布哈林同志召集。

(7) 关于成立士兵委员会的问题推迟审议。

(8) 责成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起草关于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总决议，以俄国代表团名义提交共产国际。

(9) 责成米哈伊洛夫同志和中央出版部监视在报刊上不要突出叶挺和贺龙的名字，而要把南昌部队革命委员会和整个南方革命军提到首要地位。

(10) 到今年年底为中国情报局^①提供 350 英磅的津贴，由加拉罕同志个人负责该局的活动。

(11) 英国工党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问题交给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作最终解决（见决定：6）。

(12) 关于孙逸仙大学在建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在中国传播方面的活动的报告于两周内提上政治局议事日程。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布哈林同志——全部；

布马日内同志——（9）。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10—1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苏联设在英国的“中国情报局”。——本书制作者注

92、向孙逸仙大学提出逐步共产主义化的任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8 号（特字第 106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0 月 6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0 月 6 日

听取：28——关于孙逸仙大学问题（见组织局 1927 年 10 月 3 日会议第 148 号记录，决定：9）。

决定：28——（3）向中国的大学^①提出逐步共产主义化的任务，但不排除接受非共产党员和非共青团员的工人和农民入学的可能性。限额约占学生总数的 20%。

抄送：克里尼茨基、米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1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这里是指孙逸仙大学等苏联招收中国人的学校。——本书制作者注

93、要采取措施建立苏维埃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8 号文件（摘录）

1927 年 10 月 6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9 月 29 日

听取：16——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6——发去以下电报：

“上海。致伯纳和中共中央。答复你们第 093 号电报。最高领导机构。

9 月 20 日我们已给你们发去关于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并赋予你们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为何没有告知收到该指示？作为该指示的补充，建议：第一，广东的形势要求尽快着手在所有大大小小工业化城市里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因此要采取措施来建立苏维埃；第二，同意保留‘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但要考虑到，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必须将农会改变成苏维埃，因此要采取措施准备向农村苏维埃过渡；第三，在目前形势下和在我们现时的方针下，我们认为试图由共产党人来建立左派、革命的国民党，这是不能允许的，但如果这样的国民党出乎意料地自动出现，我们认为与这样的国民党结成内部联盟也是不能允许的，建议只结成外部联盟，丝毫不能束缚中共的领导权；第四，警惕过去的国民党员可能纷纷涌入共产党，建议在吸收他们入党时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第五，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

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在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第六，在广州立即恢复工人纠察队，把尽量多的可靠工人和省港罢工者武装起来。对这些工人纠察队应该加强军事训练，使他们成为苏维埃的支柱；第七，不要在司令部下面设任何特别委员会、革命法庭或特别处，而要在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和党组织下面设特别处。应当免除一贯摇摆不定和在目前危险的谭平山的职务，给他一个名誉职位。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内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要由绝对可靠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组成；第八，把更多的工农暴动者吸收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里来，在所有部队里成立坚强的党支部，在每个党组织下面设立军事委员；第九，要跟武汉和整个汪精卫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他们指望张发奎把广东省变成自己的据点。张发奎现在是主要敌人。反对武汉和南京的斗争，一分钟也不能停止。在国民党部队投诚你们时，要把将领和指挥人员逮捕起来，接收士兵要经过一定的挑选。”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54，第 2、7—9、1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94、不支持在华北交战的任何一方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9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0 月 13 日

听取：9——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9——（1）批准塔斯社的以下声明草案：

“外交人民委员部授权塔斯社声明：报纸报道以及凯洛格先生的声明，称闫锡山或冯玉祥发起的反对安国军的运动是苏联支持的，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谣言。”

（2）在《消息报》上发表相应文章，嘲笑诽谤者，并称：苏联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支持在华北交战的任何一方。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55，第 1，3，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安国军，见本卷第 121 页注 1。——本书制作者注

95、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将力量分散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32 号（特字第 110 号）会议记录（摘录）

1927 年 10 月 27 日

听取：4——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4——（1）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 30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按高等院校培养外国人的拨款预算条款，增加给军事部门 45000 卢布的预算。

（2）将所有中共党员从库伦调回莫斯科继续学习。由中国委员会为此拨给必要的经费。

（3）关于在内蒙古工作的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

（4）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项指示，鉴于革命军在广东遭到失败和农民运动暂时低落，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并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同时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在这个时期将党的力量分散，从而导致在新的革命高潮时有耗尽力量的危险。提出在大的中心城市创办党的报刊作为当前时期的一项特殊任务。

该指示由布哈林同志负责完成。

（5）给伯纳^①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鉴于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建议不召开全会，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后同其他中央委员单独或分组达成一致。提出这项建议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必须爱惜每一位中共中央委员。至于外国人，

① 即罗米纳兹。——原注

建议只由一人参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20、12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96、采取措施保护我国在华公民和机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9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2 月 6—17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2 月 16 日

听取：1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1——（1）同意给南京政府的答复照会草案并作一些修改，然后由契切林同志签署发出。

（2）不反对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采取措施保护我国在华公民和机关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63，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97、对于广州事件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39 号（特字第 116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12 月 6—17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2 月 10 日

听取：5——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5——发去以下电报：

“致广州莫利茨^①。副本送上海奥里加^②。

关于广州事件^③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3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即 Г. 牛曼。——原注

② 即 О. А. 米特凯维奇。——原注

③ 指 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本书制作者注

98、就中国事变制定整个活动的纲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2日

听取：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责成由契切林、布哈林、米高扬和托姆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在今晚前就中国事变制定整个活动的纲领，既包括对外关系和与华南的贸易联系方面，也包括各个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的号召书草案）以及苏联国内方面。委员会拟定的草案提交政治局通过征询政治局全体委员意见的方式批准。

委员会由契切林同志召集。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664，第1、5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99、赞同孙逸仙大学清洗右派国民党员的工作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9日

听取：22——关于孙逸仙大学问题（见政治局1927年11月24日会议第137号记录，决定：10和组织局1927年11月18日会议第155号记录，决定：7）。

决定：22——（1）在肯定该大学出版工作方面现有成绩的同时，认为有必要根据该大学制定的计划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特别要建议讨论一下能否用中文出版列宁全集的问题。

（2）为了加速在该大学建立中文印刷厂，责成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保证尽快地从中国取得必要设备，并委托莫斯科卸载委员会物色适当的场所。

（3）建议国家出版局用俄文出版该大学最有价值的翻译著作。

（4）为了开展该大学中国学的工作，认为有必要：1. 通过中央鼓动宣传部吸收相应的学术机构来充实该大学图书馆有关东方的书籍；2. 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的印数增至300份，同时改进其内容^①；3. 组织出版中国年鉴；4. 加速在该大学成立中国问题研究所。

（5）认为在该大学继续保留国民党支部是合适的，撤销中央书记处1927年1月29日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并建议大学管委会解散国民党促进支部。

赞同大学管委会进行清洗右派国民党员的工作。

建议米夫同志从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遣返右派国民党

^① 指1927至1928年间孙逸仙大学出版的《中国问题资料》通报。——原注

员办法的指示。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66，第 1、4、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00、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必然的伴侣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号（特字第3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9日

听取：4——关于日本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责成契切林同志在会见后藤时发表大致如下的声明：

（1）我们同意，中国问题确实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应通过相互理解来加以解决，同时很明显，正如后藤男爵在备忘录中正确谈到的那样，中国国家^①不应受到损害。

（2）我们认为，苏联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要维护这种威望可能需要采取某些特殊措施。至于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在我们看来，共产主义宣传不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它在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到处存在。

我们不理解某些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和不安。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必然的伴侣，只要允许民族运动在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存在。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观点来看，我们对中国事务的态度是，我们保持绝对的中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我们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某个时候对共产主义宣传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中，不管是被揭露或被怀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人是一秒钟也不可能留在机关里的。就让后藤去说吧，究意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日本人对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产生过分夸大的，有时简直是可笑的担心呢！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方面。——原注

抄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4—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一九二八年

101、去北京商谈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4号（特字第4号）记录（摘录）

1928年1月5日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12月22日会议第2号记录，决定：12：（2）（3））（报告人：基辛、米高扬、契切林、施莱费尔同志）。

决定：7——（1）改变政治局1927年12月22日的决定，允许贸易人民委员部保留苏联消费合作中央联社和苏联商船队在中国的茶叶采购机构。

（2）同意派我们的代表去北京商谈关于在先释放在北京被捕的所有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的条件下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①。

抄送：

契切林同志 全部；

米高扬同志——（1）；

基辛同志——（1）。

^① 为抗议1927年4月6日对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的袭击，苏联政府于4月9日通知北京政府召回切尔内赫代办及全体使馆人员，只留下履行领事职能的人员。但北京驻苏联临时代办郑延禧仍留在莫斯科。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中占领北京后，关于释放被关押的15名苏联使馆人员的谈判一直拖延到1928年9月8日。9月29日他们才从中国大沽港取道日本回海参崴。——原注

听取：2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7——给外交人民委员部除已汇去的12万美元外再拨去28万美元，以支付《纪念列宁号》轮船的罚款^①。

抄送：加拉罕、布留汉诺夫、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6—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纪念列宁号》轮船是1927年2月28日被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在南京扣押的。船内3名苏联外交信使、鲍罗廷的妻子和47名船员被逮捕。外交信使和鲍罗廷娜在北京的法院受审，1927年7月12日才被释放，其他船员被山东军队的军事法庭处罚款。——原注

102、同意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 号记录（摘录）

1928 年 2 月 23 日

听取：9——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布留汉诺夫、斯蓬德同志）。

决定：9——决议列入特别文件。

听取：10——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报告人：布哈林、斯大林同志）。

决定：10——同意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委员会审议（见附录 2）^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74，第 1、3、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签署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附录 2），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于 1928 年 2 月 25 日通过并在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发表。——原注

103、审议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1日

听取：24 一关于鲍罗廷同志的问题。

决定：24——成立由布哈林（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来审议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的问题。^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675，第1、5—6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1928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委员会在一个月內结束对鲍罗廷在华活动的审议，1928年5月10日又建议在三个月內结束，而1928年12月6日决定撤销这个问题。1929年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决定审议这个问题。——原注

104、把将中国人逐出苏联降到最低限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15日

3——日本人的建议^①（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认为有必要用照会答复日本政府。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政治局意见交换的基础上起草一份照会，并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照会中声明，我们没有也不打算将武器运往中国。

4——关于中国人的照会（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1）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国内外报刊上驳斥中国报纸所宣扬的关于将一批中国人——罪犯窝主等强制赶出苏联的报道。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起草一份给中国政府的答复照会，并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3）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库比雅克、丘茨卡耶夫、亚戈达同志参与下，根据实际情况，从将中国臣民逐出苏联降到最低限度的必要性出发审议这个问题，并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作出报告。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677，第1—2、8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1928年3月1日田中义一给托罗扬诺夫斯基的照会，日本政府以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12国名义，建议苏联加入由这些国家于1919年4月在北京签订的关于禁止将武器输入中国的协议书。——原注

105、拨给中方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全部预计利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5号（特字第14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15日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见政治局1928年3月3日会议第14号记录，决定：16）（报告人：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1）认为可以拨给中方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全部预计利润，数额为550万元。

（2）关于在边境部署装甲车问题。推迟审议。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1）；

布留汉诺夫同志——（1）。

听取：36——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问题。

决定：36——为了协调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

（1）在哈尔滨除苏维埃机关外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分部。

国家政治保安局机关应在不通过正式边防站和没有办理签证的人员通过边境进入苏联领土时给予大力协助。

（2）从哈尔滨领事馆工作人员中选出一名可靠的同志，由他发出密码电报给莫斯科，并由他接收这样的电报。这位同志应与国际联络局哈尔滨分部的一位同志保持秘密联系。

领事馆内不要留下任何东西。该同志也不应接待任何人，等等（总之，该同志应履行对在一些全权代表处从事类似工作的同志所采用的那些条件）。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契切林、缅任斯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9，第 41—4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06、米夫参加中国委员会和蒙古分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22日

听取：40——关于中国和蒙古问题。

决定：40——米夫同志参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和蒙古分委员会，以取代彼得罗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678，第1、7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07、清洗军事院校中国学员中的国民党分子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6号（特字第15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22日

听取：3——关于中国人的问题（见1928年3月15日政治局会议第15号记录，决定：4）（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緬任斯基、库比雅克同志）。

决定：3——同意委员会的建议（见附录1），作以下修改：

第7条在“我国边界防卫”后面加上“无论是同朝鲜的边界，还是同满洲的边界”字样。

抄送：

契切林、緬任斯基、加马尔尼克——全部；

戈尔布诺夫——5、6、7；

鲁祖塔克——5；

布留汉诺夫——6。

听取：5——中国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5——1. 认为有必要确定一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便使该同志能够参加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此后到中国工作。责成布哈林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确定合适的人选。

2. 认为有必要在最近期间派一名具有一定经验和资历的军事顾问驻中共。

3. （1）鉴于军事院校的中国学员中有大量异己分子，责成中国委员会立即进行清洗，开除所有国民党分子、无党派的冯分子和可疑

分子，或者令人不满的共青团员。

将从军事学校开除的学生送回中国。

(2) 从军事院校今年的毕业生中，留下那些经过相应的政治培训今后能为中共用来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国指挥人员，在苏联继续学习。

(3) 认为有必要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招收不少于 200 名中共党员入军校，要特别注意增加特种军事院校（航空、炮兵、工程技术学院等）的学员名额。

(4) 鉴于学员成分发生的变化，提出进一步明确军校中国班向特种课程（武装暴动策略、游击斗争、破坏工作等）专业化方向发展的目标问题。

(5) 采取措施加强所有院校对中国学员的系统政治服务工作。

责成远东书记处和沃龙佐夫同志提出具体建议。

(6) 认为可以让毕业于军校并在中国担任过指挥职务的朝鲜人回到工农红军队伍里来。

(7) 满足下列中国学员提出的因病回国的要求：

- ① 扎鲁茨基……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② 杰米雅诺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③ 伊夫涅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④ 波克罗夫斯基……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⑤ 克罗波特金……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⑥ 马洛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⑦ 雷科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⑧ 胡基雅科夫……骑兵学校。

4. 鉴于有人谴责叶挺在领导广州暴动期间消极怠工，认为有必要调查这个问题，为此成立由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结果向中国委员会下次会议报告。

让叶挺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业务水平。

5. 责成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在一个月内结束对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问题的审议。

6. 认为立即派吴玉章去中国是不合适的。让吴玉章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在苏联从事理论工作4至6个月。

7. (1) 责成孙逸仙大学管委会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起派20名学生立即去中国，派15名学生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工作，然后去中国工作，派遣工作要分小批进行。

(2) 责成远东书记处进行动员。

8. 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要求给内蒙古的工作拨款5万卢布，建议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经费中拨出这笔款项。

9. 认为可以让加伦同志就释放被捕的俄国同志一事对蒋介石进行私人访问。

10. 认为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是合适的。如果宋庆龄愿意让柳克斯同志陪同去美国的话，不反对他去。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会见她。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2.、3.、(5)、4. 第一段7.、8.；

布哈林同志——1.、5.；

米夫同志——7.、1.；

舒米亚茨基同志——7.、1.；

科肖尔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绝密

政治局会议第 16 号记录

决定：3 附录 1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中国人问题的建议

(1928 年 3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1. 授权远东边疆区执委会或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海参崴代表释放被逮捕和被判刑的 57 名中国非法银行的老板，如果中国领事提出释放这 57 人的话，条件是立即将他们驱逐出苏联边境。

2. 对被捕的几百名刑事罪犯，无论是已经判刑的还是正在侦查中的，责成远东边疆区执委会采取紧急措施释放一部分关押在监狱里的中国人，例如可以将部分犯人送往中国境内，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3. 为了捣毁从事货币投机活动的中国非法银行组织，认为可以将该组织的头目进行逮捕，但不要超过 5 至 10 人。

4. 将来要避免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也要避免大规模的驱逐。

5. 为了消除中国货币投机商从事大规模非法货币投机交易的重要根源，建议交通人民委员部加速解决乌苏里铁路沿线边境运输的海关付费问题。

6. 建议财政人民委员部迅速制定和实行中国工人向境外汇款的办法，使得在远东工作的中国工人有可能将自己的部分工资汇给在中国的家属。

7. 鉴于今年将有大批中国人从闹饥荒的山东省逃荒到满洲（据中国报纸报道约 800 万人，其中有 100 万流浪汉），鉴于我国边界防卫，无论是同朝鲜的边界，还是同满洲的边界，都很薄弱，认为有必要加

强我国的边防，以防止这些人非法偷渡。

核对无误：苏霍娃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46—48、51—53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108、同意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作出调整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21 号（特字第 20 号）记录（摘录）

1928 年 4 月 19 日

听取：5——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1. 认为在沈阳通过韩述曾领事转交给库兹涅佐夫同志的中国人的建议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2. 同意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作如下总的调整。

（1）交换关于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同意承担不支持敌对集团的义务）的书信；

（2）北京政府对袭击北京使馆^①表示歉意或遗憾；

（3）释放在北京被捕的人员（15 人）^②；

（4）我们恢复使馆和派遣驻北京的外交代表；

（5）从监狱中释放在我国境内无论按行政程序还是依据法律被逮捕的中国人，并将他们遣返回国。释放和遣返工作要根据北京政府或中国领事提交的名单在被捕人员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3. 如全面调整关系的谈判拖延下去的话，认为可以根据第（2）项第（3）、（5）条首先进行关于相互释放被捕人员的谈判；

4. 试探一下在谈判中扩大释放我国公民问题的范围，力争释放各个时期在哈尔滨和满洲其他城市被捕的人员。

5. 务必在我们提出的条件清单中列入由北京政府解散俄国武装

① 指 1927 年 4 月 6 日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袭击。——原注

② 指 1927 年 4 月 6 日苏联使馆遭袭击时被逮捕的苏联公民。——原注

自卫队伍并将其驱逐出满洲的要求。

6. 不反对冯[玉祥]的子女离开苏联。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6.。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61—62、6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09、指示苏联[驻华]机构所有人员留在原地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5号（特字第24号）记录（摘录）

1928年5月17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8年5月12日

听取：26——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6——答复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询问，发去斯大林同志建议的以下电报：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同南方人进行谈判。我们认为，南方人可能进攻我们机构的危险性，如果说没有被排除的话，那么也是被大大夸大了。关于张作霖和蒋介石在驱逐苏联机构问题上发生分裂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挑衅性的恶作剧。有人毫无道理地想让我们撤退，使我们处于令人可笑的境地。还毫无道理地要为将来苏联同未来的北京政府发生争吵制造前提。有人想造成我们拥护张作霖的印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贸易人民委员部要指示苏联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留在原地，并责成斯皮尔瓦涅克定期向莫斯科报告情况。”

抄送：契切林、米高扬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87—88、90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10、在孙逸仙大学集中培训中国工作人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6 号记录（摘录）

1928 年 5 月 24 日

听取：11—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和孙逸仙大学合并问题（见组织局 1928 年 5 月 21 日会议第 37 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克里尼茨基、舒米亚茨基、米夫同志）。

决定：11——批准组织局 1928 年 5 月 21 日关于在孙逸仙大学集中培训中国工作人员和取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的决定。

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88，第 1—2、8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旧址



当年的中国学生们



宋庆龄和陈友仁访问中山大学

(210)



教师与学生

111、我驻华代表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29 号（特字第 28 号）记录（摘录）

1928 年 6 月 14 日

听取：8——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8——（1）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驻华代表发出指示：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不死乞白赖地要同北京或南京当局就建立正常关系等问题进行谈判。

（2）15 名被捕者问题在收到斯皮尔瓦涅克的通报后提出。

抄送：契切林同志。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8 年 6 月 11 日

听取：17——关于驻天津商务代表处问题（政治局 1928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25 号记录，决定：26），（报告人：欣丘克同志）。

决定：17——向驻天津商务代表处重申，以前给它下达的关于继续进行正常工作的指示仍然有效。

抄送：欣丘克、契切林同志。

听取：18——中国问题。

决定：18——（1）预算问题交由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议，责成该委员会审查以前拨款的结余部分。

(2) 立即拨出 90000 卢布，作为预付款用于特别支出，计入预算。
抄送：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103—10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12、对搜查苏联驻华领事馆提出抗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0号（特字第29号）记录（摘录）

1928年6月21日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2——1.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目前只通知中国使馆收到了他们的照会并对搜查苏联驻华领事馆^①提出抗议。

2. 就孙逸仙夫人^②去中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施加压力。

抄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106、10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1928年6月20日中国方面搜查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原注

② 即宋庆龄。——原注

113、斯大林因负担过重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1号（特字第30号）记录（摘录）

1928年6月28日

听取：1——斯大林同志的声明（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1——同意斯大林同志因负担过重不在中共代表大会^①上作报告。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110—11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本书制作者注

114、给中国共产党拨6个月经费34万卢布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5号（特字第34号）记录（摘录）

1928年7月26日

听取：5—中国问题（政治局1928年6月11日会议第29号记录，决定：18），（报告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5——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给中国共产党拨6个月经费34万卢布，计入以前拨给的9万卢布，不足的25万卢布，靠以前拨给中国工作的款项的结余部分和已经拨去但还没有使用的款项解决。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116、117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一九二九年

115、鲍罗廷在在华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摘录）

1929年5月23日

政治局 1929年5月20日决定

27——关于鲍罗廷同志。

认为鲍罗廷同志在其在华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错误，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有重大违反纪律的过失（公然不执行指示、向中共中央隐瞒这些指示等），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根据这些情况对鲍罗廷同志进行了遣责，同时认为他可以从事目前在塔斯社的工作，但认为现时让他担任特殊政治性质的负责工作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741，第1、5、9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16、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2 号（特字第 100 号）记录（摘录）

1929 年 10 月 15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9 年 10 月 9 日

听取：36——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5 日会议第 101 号记录，决定：15）。

决定：通过由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的指示草案（见附录）。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102 号记录，

决定：36 附录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指示

（1929 年 10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请电告中国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游击运动）的状况、党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张发奎和改组派行动的方针。我们的初步指示是：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利用已经爆发的军阀

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政治经济状况的普遍恶化。在反动政权明显削弱和群众运动日益高涨的地区，你们要组织革命的职工运动，尝试摆脱地下状态。你们要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你们要尽最大努力靠军阀部队，即解除他们队伍的武装，掌握他们的辎重车队来把自己的力量武装起来。占领和驻守军阀放弃的地区。力求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其基本任务是：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成立苏维埃。你们要争取把我们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的游击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尽最大努力通过报纸、传单、呼吁书和口头宣传来揭露国民党各个派别的反革命性质。党必须动摇统治本地区的任何军阀集团政权。同时要把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主要斗争矛头针对试图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的左翼国民党人和改组派。你们要坚持不懈地揭露改组派的虚假民主、骗人的反帝口号和土地口号。他们反对蒋介石独裁，只不过是为了实行其他军阀的独裁。我们认为党内特别危险的，是削弱同改组派作斗争的倾向，错误地把他们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贬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作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指靠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工农独立斗争。要特别重视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努力开展政治罢工。

政治书记处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7，第 167、178—18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

117、三所共产主义大学不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5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1 月 25 日

10——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①。（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1）认为有必要使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不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在一周内实施。

（2）将孙逸仙大学改组为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支援的私立大学。

（3）责成中央书记处讨论关于少数民族学校今后是否存在和如何组织的问题。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74，第 1—2、9 页。

打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注

118、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7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2 月 15 日

46.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作为对政治局今年 1 月 25 日决定（第 115 号记录，决定：10）的补充，认为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同时在国际列宁学校成立由中国真正共产主义分子组成的中国部是合适的。

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讨论改组国际列宁学校的问题。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实行这些措施。

（2）明天即公布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76，第 1、9、1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19、成立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撤校工作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2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4 月 5 日

47.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别尔津、基萨诺娃、斯捷茨基同志）

（1）同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关于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成立由基萨诺娃、别尔津、巴兰斯基、戈普涅尔和斯捷茨基同志组成的撤校工作委员会的建议。

（2）决定——作为特别文件。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81，第 1、10、14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20、研究接受中国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的办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2 号（特字第 120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4 月 5 日

47.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别尔津、基萨诺娃、斯捷茨基同志）。

（2）责成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和斯捷茨基同志研究关于接受中国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的办法问题。

抄送：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同志——（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8，第 129、13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1、对沙文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26号（特字第124号）记录（摘录）

1930年5月15日

64. ——关于中东铁路（政治局1930年3月15日会议第120号记录，决定：6）。

批准由政治局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东铁路秘密工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决定草案（见附件一）。

抄送：鲁祖塔克、加拉罕、莫斯克文、佩列佩奇科、什维尔尼克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126号记录，
决定：64 附件1（特别文件）
绝密

关于中东铁路

（1930年5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

1. 中东铁路的冲突表明，参加工会组织的苏联工人在保卫苏联利益方面负有并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冲突还暴露了工会中混进了许多立场不坚定、思想庸俗的人乃至反苏分子，俄罗斯工人和中国工人关系疏远，工会会员甚至领导人中有挑拨离间分子，领导人没有做好在不合法条件下工作的准备，表现得极其软弱。

2. 东三省特区的工会应在吸取冲突教训的基础上适应完全不合法的条件彻底改造自己的工作。工会不应干预中东铁路苏方管理当局的工作，记住工会不是在苏联境内而是在他国领土上在完全不合法的条件下工作，工会所处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向它们提出了特别的任务并要求争取与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方法。

3. 为了领导工会工作必须从中央派出3到5名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党员工会工作者。1人应留驻伯力，在边疆区委书记亲自领导下领导工会的工作并亲自向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位书记报告自己的工作。

3人派往满洲，其中1人（或2人，第二个人作后备）在哈尔滨党组织中工作，1人派往中东铁路西线，1人派往东线。与伯力的联系通过党组织的联络渠道进行。责成组织调配部指定相应的同志。

在各地（铁路段党委和地方党委）应抽调三人小组或特派员，通过从在冲突期间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善于在不合法条件下工作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工会工作。

4. 工会应为自己提出如下任务：

（1）支持苏方管理当局进行节约经费、缩减非生产性开支的斗争，同时争取在削减编制的情况下保留经过考验的苏联工作人员骨干，辞退白卫分子。

（2）领导旨在改善工人物质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切措施，尤其要保证今后仍全面领导中东铁路的合作社。

（3）利用一切合法条件来领导通过铁路员工会议、俱乐部、体育组织等提高工会会员文化水平的工作。

（4）参加中东铁路学校的家长委员会，目的是加强苏联对这些学校的影响并与白卫分子作斗争。

（5）协助苏方管理当局把异己分子、敌对分子从铁路部门清洗出去，揭露他们的活动，使他们受到社会的抵制，对沙文主义者和殖民

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无情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清除出去。

(6) 瓦解中国当局在白俄分子协助下建立的警察、工会和合作社组织。

(7) 在青年工人中进行工作，要格外注意培养业务熟练的苏联干部。

5. 工会在采取这些措施和做各种工作时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中东铁路苏方管理部门的工作。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8，第 151、155—15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件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122、军事学习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游击队人员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28号（特字第126号）记录（摘录）

1930年6月15日

93.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问题。（政治局1930年3月30日会议第122号记录，决定：47—（2））。

批准政治局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见附录1）。

抄送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第128号记录

决定：93（特别文件）附录1

关于招收中国工人进军校学习的办法

（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

1. 考虑到迄今为止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从为国民党军队培养指挥员时期继承下来的在工农红军军校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人员的做法（学习期限长、学习课程中偏重正规军成分、主要通过翻译教学，等等），加上学员选拔不能令人满意，这些不符合今天中共的需要，今后在苏联对中共党员进行军事培训将依据以下原则：

（1）在工农红军军校学习的中国人一律于今年毕业并转交中共安排工作。

(2) 军事学习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游击队的实际工作人员（指挥员、别动队员、爆破手、无线电报务员、军械员）。

(3) 学习班的期限不超过9个月。

(4) 学员人数不超过50人，完全是有相当党龄和革命经历的久经考验的游击队实际工作者、中共党员或团员，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5) 教学基本上应由中国人用中文进行。

(6) 留下几名（4至5人）经过考验和干练的人在苏联进一步从军事上进行深造，以便充任中国红军未来的指挥员或担任中共党员学员的教员。

2. 同[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代表团一起研究帮助在当地（在中国）主要革命起义地区开办培训游击队指挥员学校的必要性问题。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17，目录162，卷宗8，第160、164、167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件是经过校对的副本。

123、关于南京人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政治局 1932 年 6 月 16 日会议第 104 号记录

决定：34 附录 2

致斯大林

第一，从您所知道的可靠消息来源得知，南京决定恢复与我们的关系。南京决定同我们一起参加签订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南京认为，恢复外交关系将通过签订不侵犯条约来实现。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官员王[承穗]已被责成以“个人意见，秘密和非正式地”弄清苏联政府的意见。显然，为执行这一指示，王[承穗]已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科菲洛夫斯基提出接见请求。

第二，我们认为，南京的决定主要是由于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关系，而且通过签订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阻挠我们建立我们所需要的与“满洲国”的关系。可以肯定，中国人将会把一些直接约束我们对满洲的政策条款列入不侵犯条约。

第三，我们认为，最好现在科菲洛夫斯基不见王[承穗]，让王[承穗]去见远东司的一名工作人员，由该工作人员建议王[承穗]，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可用书面提出来。请告知您的意见。

1932 年 6 月 12 日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莫斯科联共（布）中央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南京人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意你们的意见。如王[承穗]提出书面意见，请用电报将副本寄来。

1932 年 6 月 13 日

斯大林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124、不侵犯条约可在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解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5 号（特字第×号）记录（摘录）

1932 年 12 月 10 日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32 年 12 月 4 日

32/26. ——关于中国问题。

1. 如果中国方面重新提出签订不侵犯条约的建议，答复如下：这个问题可以在实际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解决。

2. 与中国互换恢复关系的照会后，不反对中国大使在我国全权代表去中国赴任前到莫斯科来。

3. 在共同商定建立领事网以前，要求现在就允许在上海^①、北京^②张家口和^③……设立领事馆，理由是在苏联的海参崴、海兰泡、伯力和赤塔已有中国领事馆。

抄送：李维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14，第 24、26、2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以下用手写加上了：天津。

②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③ 以下删去了广州。——均为原注

致中央领导成员函电

斯大林致中央领导成员的函电

(1926年—1932年)

一、转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问题的答复

——致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一封信

1926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机密

致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乌格拉诺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中央委员：叶夫多基莫夫、科肖尔、瞿鲁巴、契切林、布勃诺夫。

日前，书记处给布勃诺夫同志使团寄去了根据政治局交换的意见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还寄给了不久前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同志。

布勃诺夫同志使团的答复还没有收到。维经斯基同志的答复在这里连同问题一并附上。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3，目录65，卷宗471，第111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附录：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问题的答复

1926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致斯大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

对您的有关中国的问题，我可以作如下答复，但附带说明一下，这些答复不是全面的，因为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情况与我去那里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张作霖过去就曾试图宣布满洲独立。一年多以前，张作霖在军事方面的处境很困难时，曾声称他要宣布满洲独立，现在他也在以此进行威胁。实际上，张宣布独立的企图说明，他想在1924年秋天战胜吴佩孚之后成为中国中心人物的愿望已经破产。

张威胁要宣布满洲独立，似乎是说他要暂时离开全国舞台，不过他的离开明显带有敌对情绪，并打算一旦在满洲积蓄更多的力量后将再次沿长城那一侧出动，同时他希望加剧在中国北方以直隶人和国民军为一方同以反对国民军的奉天张宗昌和李景林余孽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

不言而喻，张作霖同这些反对国民军的军事力量都有联系，但看来他现在更愿意他的盟友同国民军及早发生军事冲突，以期在敌人和盟友两方都遭削弱后他得以成为首领。

张作霖“威胁”要宣布满洲独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试图在满洲本地把自己的权力更好地集中起来，消除他的某些省督在郭松龄倒戈时表现出来的种种独立企图。

但是这一次张作霖是否真的宣布满洲独立，这还是个问题。上面列举的原因仅仅表明，为什么张有可能采取这种策略，但绝不是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也有妨碍实行独立计划的一些原因。第一，这种举动无疑会加深包括商界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对张的敌视态度，从而使直隶人(吴佩孚)同奉天人在反对国民军的斗争中难以联合和合作。

第二，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会同意满洲独立，因为这

意味着日本的势力不仅在满洲而且以后在北方都会有更大的加强。

另一方面，在日本本土，在这个问题上军方和宪政会内阁也不会有一致意见。很可能出现郭松龄倒戈时出现的那种局面，即军方主张积极支持张，而内阁摇摆不定。

至于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可能它只以劝导的方式对张施加影响而不进行公开斗争，因为现在力量对比还不能促使政府对张宣战。

2. 依我看来，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现在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由于郭松龄失败和国民军暂时停止进攻，军事力量在重新组合。这种重新组合会加强奉天人的军事联盟，也会通过吸收被卷入斗争的新的军事力量巩固国民军的军事联盟。

另一方面，现在在华北和华中，上海事件时期发起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群众接受并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在北方，在国民军地区，国民党将会得到发展，工人组织将会取得半合法存在和在某些地方取得合法存在的可能性。而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也会得到发展壮大。

3. 就第三点而言，我不能对加拉罕发自北京的报告补充任何东西。

4. 现时的北京政府与前政府（即组成以冯玉祥分子黄郛为总理的新内阁以前）的区别仅在于，在内阁组成人员中，冯的拥护者比张作霖的拥护者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新的内阁和前几届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冯可以推动它或推翻它，但是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无论推动它还是推翻它都不能给冯带来任何实际的东西。

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帝国主义者对北京政府持藐视态度，他们很清楚，北京政府只不过是靠国民军的仁慈支撑着，有部分国民军就驻扎在直隶地区。

5. 广州在全中国的声誉确实提高了，特别是在去年秋季之前，香港政府不得不改变对南方政府的调子，甚至帝国主义报纸也认为，在广州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受欢迎的政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发展情况，可以根据以下数字作出判断：最近半年来，共产党人数增加了2倍，而国民党人数增加了5到6倍。

6. 中国公众对我们同张作霖在中东铁路上的冲突的态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国民党左派当然将站在我们一边，并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发言中说明冲突的真相。但国民党右派和未加入国民党的纯民族主义集团，将对我们产生怀疑。他们不会维护张作霖，甚至相反，会说应该打败他，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来侵犯中国领土和不损害中国的主权。

我不认为，因为这次冲突对我们的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但需要尽一切可能向广大群众说明冲突的真相。

7. 关于叶戈罗夫和持里福诺夫的问题，使团已作出答复，我认为它的建议是正确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3，目录65，卷宗471，第112—115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二、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23日于索契

.....

（8）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的。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充当新的事态发展条件下的领导人，因为他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独立地理解这些事态，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好，紧握您的手。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1925—1936）》

俄文版第94—95页。

三、关于给中国汇款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4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刚从信使那里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关于中国问题，我想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敬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俄文版第103页。

四、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年6月27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和尼古拉：

（2）我在密电中已谈到冯的问题。看来，关于冯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①。由于鲍罗廷问题（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而同武汉进行争论当然是不值得的。但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3）近日我收到汪精卫的一份电报，并作出了很长的答复。请读这份电报，并简要地谈谈你们的看法。

（4）关于洛佐夫斯基，我没有异议。

（5）关于“规定”同蒋介石的关系的做法是否合适，我表示怀疑。与张作霖相提并论不合适。三年前我们承认了张作霖。如果问题发生在现在，我们就不会正式承认他。现在承认蒋介石，就是打击武汉（武汉还存在）和向张作霖挑战（请回忆一下中东路事件）。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最好等一等，要维持现状。

紧握你们的手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俄文版第70—71页。

① 指汪精卫倒向蒋介石一边。——本书制作者注



宁汉终于合流



汪精卫彻底叛变

(238)

民国政要“迎汪倒蒋”成泡影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五、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与退出国民党联系起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8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1）在拍发我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我手头也没有关于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材料）。显然，如果有这些材料，您就有根据作出新的指示。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受到军队中飞黄腾达的人的迫害，这说明完成这项任务是有基础的。因此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做到：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敬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俄文版第73页。

六、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7年7月9日于索契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①

你们两个人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的）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在新指示草案中提到唐生智和解除工人武装（“真正解除”，唐生智“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工具”，等等），可是，第一，那里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事实，第二，任何报刊、（当时我手头有的）任何密电都没有谈到存在这样的事实。不仅你们使我感到有点难堪，而且可能我的冗长而相当严厉的回电也使你们感到难堪。

我收到你们的新指示草案后就断定：那就是说，反对派用大量新的“提纲”搅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不得安宁，他们终于向讹诈让步了，那就是说，克利姆^②现在会很高兴，他可以不再向武汉支付款项，因而对新指示满意地投了赞成票。如此等等。现在我看到，这一切并非如此。昨天我看了一整天信使带回来的新材料。现在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些新指示是否已经寄出，而是寄出得晚了。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

① 在信上有标注：“已阅。布哈林。已阅，李可夫、A. 安德烈耶夫，M. 托姆斯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原注

② 即 K. K. 伏罗希洛夫。——原注

但是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此。主要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体面地摆脱**这个新的时期（地下工作、逮捕、屠杀、枪决、自己队伍中的变节、挑拨离间等等），成为坚强的、经受过锻炼的党，而没有分化瓦解，变成一个或几个小宗派。决不能认为已经不存在这种危险，也不能认为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资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间隔，这与我们这里1905年和1917年（2月）之间有过的那种间隔相类似。此外，我认为，**这种危险**（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被分化瓦解的危险）比现在充斥中国的某些虚假的现实性更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罗易自己曾说，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藏起来……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尽管任何合作总会多少束缚合作成员的手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合作。就拿蒋介石的沿海五省（从广东到上海）来说，那里没有与国民党进行任何合作。蒋介石的代理人在瓦解共产党人“军队”方面取得的成功要比共产党人在瓦解蒋介石后方方面取得的成功要多，这如何解释呢？许多工会脱离了中共，而蒋介石继续稳坐宝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共的“独立性”又是什

么样呢？……在我看来，原因不在于这些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也有作用，而在于现在的中央（它的上层领导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锻炼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洗礼，但它**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相对立**。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错误地称之为政党的（的确，有相当战斗力的）各种人物的大杂烩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当然，在基层是做了工作。而这方面的工作应归功于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中央走向工农，而是工农走向中央，而且工农越是接近中央，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央离开他们就越远。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归结为高谈阔论“封建资产阶级”（现在彻底弄清了，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原来是罗易）。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过早地让**这样的党**到“汪洋大海”中去自由游泳（它还来不及巩固就会被碰得粉碎……）。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需要采取另一些措施。需要用汉语撰写一批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种书籍应该是有分量的，而不是由一些

“传单”拼凑而成的，为此，现在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提供所需要的款项（克利姆可能说，这可要比供养它 100 个长痔疮的反革命官员半年的费用少得多）。其次，我们对中国军队建立顾问制度的操心太多（而这些顾问在政治上并不称职，因为他们从来不善于及时地向我们预告自己“上司”的过急行为）。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区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通常派到中国去的不应该是我们不需要的人员，而应该是优秀的工作人员。应该这样来安排此事：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中央将向党务顾问们学习，党务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及其地方上层人物的重大缺陷。他们（暂时）还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

如此等等。

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保姆”的需要将会消失。

算了，就此搁笔。

握你们的手

斯大林

又及：收到此信后请告之。还请把你们的意见告我。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让其他政治局委员阅读。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俄文版第 74—77 页。

七、我们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1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2）我看了政治局关于退出中国国民政府的指示。我想，很快就得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等回来后再讲。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俄文版第77—78页。

八、匆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印象不好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6日于索契

致莫洛托夫

（1）关于中国的事来后再谈。你没有理解我的信^①的意思。信中说不能认为间隙是例外，但这还不意味着可以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期新的高潮是例外。一句话，来后再谈谈。看来，您那里决定将反对派的文件分送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您拿什么东西来跟这些文件相抗衡呢？难道只拿布哈林的最近一篇文章^②吗？这可是非常不够的！**所以散发文件是不利的。**

（2）您匆匆忙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算是什么——是向张伯伦的献媚还是其他诸如这类的东西？干吗如此匆忙呢？

致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年）》

俄文版第78页。

① 指斯大林1927年7月9日给莫洛托夫的信。——原注

② 指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载《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原注

九、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你好！

……

（2）中国将出现麻烦。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士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入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

紧握你的手

斯大林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书信（1925—1936）》

俄文版第167—168页。

十、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致莫洛托夫的电报（摘录）

1930年8月13日于索契

绝密

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①，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专藏文献。打字稿，副本。

^① 指1930年立三路线提出的全国总暴动主张。——本书制作者注

十一、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

——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①

1931年9月23日于索契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1) 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

(2) 不排除，但不大可能，美国会为保护张学良反对日本而掀起一阵值得认真对待的喧嚣，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它可以保障自己在华的“份额”而不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可以征得中国人的同意。

(3) 不排除，甚至很可能，日本人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的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之类的老奉天分子^②的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

(4) 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

(5) 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当然是应该的，但同时也要询问中国人，哪怕是通过对哈尔滨。

(6) 报刊上应该这样处理，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反对武装干涉的。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凯洛格公约^③是为占领辩护的工具；美国是瓜分中

① 此件发表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一书第67页。——原注

② 指奉系军阀集团成员，1928年夏，其首领张作霖被杀害后不复存在。——原注

③ 指凯洛格—布里安关于不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公约。该公约于1928年8月在巴黎由包括日本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原注

国的拥护者。要让《真理报》大声疾呼，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和平主义者正在瓜分和奴役中国。《消息报》也应采取同样的方针，但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对于《消息报》来说，温和的语调是绝对必要的。

(7) 应该让共产国际的报刊和整个共产国际特别关注日本的行动。

(8) 目前这样做就够了。

斯大林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 558，目录 11，卷宗 76，第 76 页及其背面。

亲笔签字。

关于中国革命的讲话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讲谈话

(1927年—1951年)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

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就讲几句话，因为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虽然一些挑拨是非的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好像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存在分歧。不需要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话。我声明，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讲的所有观点。那些挑拨是非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很大分歧，这令我震惊，因为那些谣言绝对毫无根据。——这些挑拨是非者应当知道，我们没有分歧，我们也不会有分歧（掌声）。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首先讲我们常说的性质问题，及前景问题，即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现在中国形势怎么样呢？在农村——是封建残余的压迫。拉狄克同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明白，在中国农村，封建主义残余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原始积累型城市资本结合在一起。拉狄克同志不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封建残余，就是它在中国农村压迫农民，使他们无法生存。此其一。再者有各省的封建官吏。中国的一些省份的人口少说也达到三四千万。掌管这些省的是省长及其幕僚，他们以种种苛捐杂税剥削农民。此其二。那里有中央当权集团，北方的张作霖和张宗昌等，他们同样在压迫、掠夺、剥削农民和工人。此其三。还有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它也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剥削中国工人。

此其四。在中国，有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还有日本、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帝国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船利炮；是因为这些帝国主义者把持着主要的工厂、银行、商号和铁路，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它们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依赖于帝国主义，因为它被像条链子一样拴在英、美、日银行身上。此其五。那么，最后，是工人和农民。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

谁是主要的敌人，最强大、最凶残、最有威力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支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官僚政治、官吏集团，当革命者在中国刀上膛剑出鞘朝封建残余和军阀挥去时，帝国主义就给它们撑腰，给它们提供保护。

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然后是同路人：民族资产阶级。它对帝国主义不满，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它受到帝国主义银行的束缚，受帝国主义商号的束缚。然后是民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工人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动力。其余所有的阶层虽然也支持反帝战线，但却是辅助阶层，它们很重要，但毕竟是辅助性质的。从这里可看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似1905年我们经历过的这么一种革命。

但是，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却有区别，并且是根本区别。我们那时的革命是针对沙皇制度和地主，而在中国这里，主要说来，是针对主要势力，即主要敌人——针对支持地主，也支持官吏的帝国主义。可见我们面对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锋芒所向主要是帝国主义。由此，这个革命被称为民族解放革命。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上述阶段，中国的政权应当是何种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动力，如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显然政权应当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与1905年

时我们所说的相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目的的专政。我想，我们这最后一个问题不叫分歧，因为拉狄克同志说过，他承认中国走的是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道路，即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为形式的政权。所以，如果不提他对中国封建主义残余认识混乱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拉狄克同志没有任何实质分歧。

可是接下来我们之间就出现分歧了。拉狄克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革命民主政权有能力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同志们。这是根本错误的。任何一种革命民主政权都不能消灭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应当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拉狄克同志，您说过很多次，这都有记录，说革命民主政权是一个将消灭和根除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是幻想，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这里可能有错误）如果您同意，我很高兴。所以，为了使中国革命能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为了这个，革命应当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进行斗争的阶段。同志们，这才是前景。

如果我们说，革命民主性质的政权必须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过渡，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列宁早在1905年讲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时就说过，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其过去，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一是其将来，即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为了这个将来，中共应该抓住越来越多的东西，以便将现在的革命，极其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时，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谈得上在中国根除帝国主义。

正因为如此，虽然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中表示反对，但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想，拉狄克同志所有的报告中的错误，在共产主义学院以及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它所处的国际环境。他在这里慷慨陈辞，说是胡汉民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国民党人有时应当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暂时妥协。拉狄克同志慷慨陈辞，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将资产阶级部长从中国国民政府赶出去的口号。这样的部长那里是有的。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存在。他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使中国像我们的十月革命那样超阶段地跃进。但他不了解，现在的世界形势不一样了。他的根本性错误在这里。他老是将目前的中国革命的形势等同于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形势。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十月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被分裂成两个同盟，两个阵营，因为那时进行着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那时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瓦解了他们自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正因为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帝国主义前线的瓦解，正因为如此，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那时才得以如此轻松地跃进到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完蛋了。

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环境吗？当然，没有。现在没有出现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它成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四亿人口，庞大的铁路网，三条大河能承载一切运送货物到中国内部去的船只，巨大的港口上海——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纽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现在帝国主义算是在争抢这唯一的前线。日本帝国主义耍花招，装扮成自由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能白给中国哪怕一团羊毛。绝对如此。美国有时候会玩弄点自由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向中国人开枪，绝对如此。我就不说英、法等国了。目前并不存在帝国主义在前线的分裂。并不存在交战的两个联盟。不存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有利形势。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更为艰苦。因此这个革命将进展得很缓慢，比我们的1917年革命更慢，曲折而又坎坷，失败和成功相伴，挫折和跳跃

共存。而且毫不奇怪，在这条曲折行动的道路上，国民党政权有时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以便先消灭一个敌人，再消灭另一个敌人。全部一起消灭相当困难，同志们。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拥有一个有25年历史的党（而中国的党才成立不久），拥有像列宁这样一些领袖，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与中国人相比，虽则我们同西方工人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况且还是在战时帝国主义分裂的形势下，但就是这样，我们在各个革命阶段推动革命都还是举步维艰。毫不奇怪，中国人缺乏这些有利因素，必然艰难得多。毫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进度会慢一些。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这个国际形势的差异。

听了拉狄克同志的发言，我就想：如果让他来领导革命，他就会慷慨激昂地唱一番革命高调诸如赶走资本家部长、上海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之类，三下五除二就把革命糟蹋完了。（笑声）

所以我说，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国际形势，没有看到现在帝国主义像一道墙一样挡在中国面前，它不像我国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拉狄克同志的其他所有的错误都发端于此。

举个例子，就说上海问题吧。拉狄克同志说，上海人民应当起义，立即赶走帝国主义。这是愚蠢的，同志们。拉狄克同志不知道，我现在秘密地告诉他，自从南京枪击事件后，我们从上海接到过类似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想举行起义，立即武装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回答他们：再等等，同志们，不要单独组织上海工人与帝国主义军队战斗。形势如此，现在不能进行决战。我们希望上海工人稳住，为以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我们不希望上海工人组织巴黎公社那样的流血行动。上海工人——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推动力。我想问：决战刚刚开始就让这个推动力遭到毁灭，难道是明智的吗？显然，不是，这形同犯罪。这就是拉狄克同志不想搞清楚的地方。

我们禁止他们组织武装暴动，保住了实力，用于未来的反帝斗争。而战斗才刚刚开始。根本问题还没有摆上日程。应当从帝国主义手中把铁路夺过来——这是一场战斗；应当夺回各类工厂——还是一场战斗；还应当夺回银行——又还是一场战斗。数不清今后还有多少战斗。我们需要后备力量，而最好的后备力量，就是需要极其慎重地使用的上海人民。（有人插话：大声点。）

我刚才没说话，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能让你们听见（笑声）。

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它是一种类似革命议会的东西，有着自己的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并建立了政权。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参加这个议会。”这可不严肃，同志们。严肃的人不能这么说。这个天赐我们的革命议会，里面聚集了所有持反帝主张者的代表，应有尽有，包括明天可以搁置起来的右翼，——但现在还不能急于动它。那里有中间派，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情况就这么摆着，有一个议会，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共产党周围团结了多数人，有这样一个在全国的意义非同小可的议会——有人居然建议我们离开它。拉狄克同志，你说，这是为什么？如果右派听从多数人的决定，而这个多数又是我们的人，那我们见什么鬼就得退出议会，为什么急于赶走右派？难道不能利用右派，就像到今天为止所做的那样？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笑声，掌声）谁同意这样做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右派要是不听话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开始阻挡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两次赶走他们了吗？只要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我们就叫他们滚，我们还会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们，到时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开是应该的了。

在国民党内，右派是中国人里最老谋深算的一部分人，虽然它代

表少数派。这些老练的老政客，在中国之内算得上老谋深算。有时甚至是顶级的骗子。他们与商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向帝国主义送秋波，并和他们有来往。试想，把共产党人从这么一个国民党里拉出来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让国民党听凭右派摆布，让国民党的旗帜，这面全中国旗帜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帜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强盛。这就是拉狄克同志的策略。但究竟是谁，请原谅（笑声），究竟是谁，除了（笑声）（拉狄克插话：“都明白，都明白。”）有谁，除了极其精明的人（笑声）和极其有经验的人，可能提出现在的策略？

说到右派和强行驱逐他们，拉狄克同志不明白中国存在的独特国情。这种独特性是什么？我顺便说说：尽管这些右派身上有各种毛病，有各种缺点，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性质，尽管他们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和将来反革命的中心，从这些人中将来会产生中国真正的反革命政党，尽管这，尽管那，然而这些人眼下毕竟正领导着反帝军队。这是不是事实？独特性就在这里。蒋介石是否领导着反帝军队？是的，是领导着。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列铁里和唐恩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唐恩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致，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因为他不想失势。而克伦斯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挑起反对被压迫人民的战争。这就是根本区别所在。

这就是不能放弃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还有可能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

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开展革命，建立起了一个极其独特但非常强大、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政党，一个工人、农民、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在这个党内，在这个组建了政府的革命议会里，实际的掌权者是共产党人。这个，同志们，不是说大话——就是这样。别以为鲍罗廷同志和其他同志在那里白呆着。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帝国主义（笑声，掌声）。这样，同志们，就说明，如果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退出，由于国民党中间派和左派的组织水平差，右派就会成为领导力量，他们会将革命引上别的道路，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道路，不是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道路，而是消灭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拉狄克同志不对，他在不自觉地帮助右派，不自觉地帮助同样也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

拉狄克同志不是第一个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早就提出过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这些同志不明白，他们喊着让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革命口号，实际上是在帮助右派，帮助军阀。

关于该不该让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争论由来已久，同志们。还在1926年4月下旬，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时，争论就开始了。我不记得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是否在政治局里。托洛茨基以前就提出过这问题，但中央政治局当时一致否决了这个提案。（当时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同意，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了，因为那些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被斥为中国革命的取消派）。政治局当时通过了如下决议：

（略：关于让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及将右派孤立和排挤出国民党的方针的引文。）

这就是我们当时发出的基本指示，我们执行了，现在仍在执行。

我想问，采取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是不是赢了？我想是的。共

产党在中国壮大了，它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角色，好也罢，坏也罢，还是有保障的，前方战事取得了成功，孤立了右派，把革命向前推进了。

这就是上述政策的结果。

如果当时我们赞成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让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在拉狄克同志口中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是一回事）退出国民党，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我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会在国民党内被孤立，右派会占大多数，革命运动会面临灭顶之灾。

现在，谈谈参加革命政府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拉狄克同志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拥有革命议会的国民党，另一方面却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由国民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如果国民党内的革命议会建立了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加入这个国民党，可又加入这个党建立起来的政府——您的逻辑究竟何在，拉狄克同志？我想，就像刚才布哈林同志所说的，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混乱。拉狄克同志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一个实例。

好了，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我们的分歧这个问题，以外交方式来缓和这个状况。他认为，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退缩了；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或者我们的党中央应该受到责难。这是在耍滑头，而且是目光短浅地耍滑头。毋庸置疑，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存在过分歧。去年4月拉狄克同志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事实。党否决了这个意见，也是事实。

事实是，现在拉狄克自己在这个讲台上也不得不说，他也不是反对加入。到底是谁在退缩，谁在前进？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在退缩。谁应受谴责？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可是为什么要把事情说成这样呢：好像拉狄克扮演了原告的角色，那谁应当成为被告？哪儿来的这种狡猾手段，为什么要这样？

最后说的是，有人认为我们像是在掩盖国民党的缺点，不向党通报过去和现在依然在持续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些省份的恶劣行为。它有

没有枪杀、逮捕，或者以逮捕相威胁？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实？是的，有过。以后还会有的，同志们。如果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年前共产党才开始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70年摧残、文明程度低、组织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到处进行挑拨活动的国家，——如果以为在那里不存在恶劣行为，是很难想象的。说我们掩盖它们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夸大这些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应当核对“事实”，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在中国发行的帝国主义的英文报刊的报道（他们经常撒谎）。其次我们不能公开地从莫斯科发出指示。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同志，采取对外界来说是内部的、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用建议的形式来体现指示。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会被采纳和发挥指导作用。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本来中国共产党就受到责难，说它似乎靠俄国革命者的帮助才得以发展。有人叫嚷，在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的狡猾伎俩”。面对这些情况，请想想该不该在报刊上夸耀我们的领导作用。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愚蠢的和不严肃的。我们有别的非常严肃而可行的方法，以根据需要来把握方向。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吗，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我深表怀疑）非常遗憾，您没有说明这些方法为什么可疑。我想，恐怕您现在可以说，该是我而不是您做“结论”来表述一些您无法驳倒的论点了。但是，拉狄克同志，我不打算在这里，也不能演示我们拥有的各种方法和渠道。我可以这样说，这些方法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国民党的左倾化，不会有北伐大业的成功，不会把右派逼得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和表示自己的忠诚，就不会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动摇”，乃至有时让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不再铁板一块。我这里说的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感到骨鲠在喉，因为一旦革命的中国扩展到北方，那么朝鲜就要发动起来，日本人感到了，所以沉不住气开始动摇。有了这个，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领导运动呢？

我就讲这些了，同志们。总之，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中国在世界政局中的特殊性——鉴于帝国主义阵线的统一，你不可能以比目前更快的速度或者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一样快的速度推动革命。那时是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他们正兵戎相见，互相厮杀。

再者，拉狄克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不明白，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把国民党交由右派摆布的话，它目前就不应当退出革命议会，退出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民党。

第三，拉狄克同志的逻辑一片混乱，准许共产党员进入政府，但不准许他们进入国民党。这简直是语无伦次，简直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我甚至懒得驳斥。就说这些了。（掌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58，目录 11，案卷 1110，第 77—93 页。

打字件，经校对的速记记录，原件。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①

(摘录)

1927年9月27日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责备我们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不来驳斥托洛茨基同志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我只想谈谈南方革命运动整个这个事件：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等等。我想说，整个这个事件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倡导发动的，而且只是根据它的倡导。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知道一点儿情况的话。如果这个运动取得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涨成为事实，那末，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時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共产国际已经给我

^① 这里发表的是斯大林讲话的最初记录稿，与后来公开发表的文本（见《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第41期）有所不同：南昌起义军向南推进的计划被改成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还删去了关于对待革命的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态度的一段话。——本书制作者注

们中国同志发出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不对此大喊大叫，我们不在报刊上宣扬这一点。也不应该这样做。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83a，第 28—29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附录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谈话的记录

1928年6月9日于莫斯科

瞿秋白等人同斯大林的谈话

出席：斯大林、瞿秋白、米夫、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

瞿秋白提出要谈的问题：

1. 形势。

2. ^①

斯大林说：他已读了秋白的报告^②，关于五大矛盾的结论。五大^③报告中许多对的，但亦有不对的。因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诚然，有些地方城市工作已起来，有些地方农民暴动已高涨，而统治阶级不能稳定，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这不能说，革命已高涨了。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在俄国，1906年后是如此地争论了许多。

城市不能暴动。

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④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

1. 以零星部队可集中甚至取得某些城市。

2. 农民武装暴动。

① 记录原文如此。根据内容判断，应为：中共的任务。——原注

② 指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俄译本（莫斯科1928年）。——原注

③ 即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本书制作者注

④ 记录原文如此。——原注

广州暴动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

俄国 1905 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少年先锋主义是看轻了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斯大林说：我们以 1905 年同中国（作）比较（并）非全部。只是说失败后的新潮流未来时的短时期。

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尤其是忘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势力。

俄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改良主义。

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主要的，如忘记了是什么革命问题，讨论（就会）得出，革命高涨是革命进攻，而反革命退让。在现在的中国，是日本掌握着北方，英日美掌握着长江，南方法英在压迫着，而我们工作（范围）小了。

说中国现时较俄国危险少是不对的，主观上，中国的工人少，国内即不讲其他危险，帝国主义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华（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决不同于俄国革命。俄国一、二次革命不必说了，而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也无略加以大的压迫。

现时，帝国主义对华是一致的，日美是相当好的。在北方扬子江，帝国主义都是（帮）助反动势力在中国取得胜利的。

第一次浪潮：自香港罢工、北伐，打到武汉。

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常常取吊膀子和让步政策，他们不敢向革命进攻。

南京事件起，革命渐渐低落，（不久）到叶贺，他们是一个反抗的尝试，广州也是一个尝试。

广州暴动引起了全国的同情。1871 年、1905 年和 1917 年 7 月都唤起了工农群众的同情。1905 年 11 月也干了（采取了行动），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

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

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

两个高潮中的时间，当然不像俄国那样长，因为战争的痛苦不能再使中国工农长期忍受下去了。

现在此中间时期，我们如何做呢？

1. 党要有坚固的、觉悟的、好的、马列主义的……是质量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中国同志多只做实际工作，但不够，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马列教育。尤其是马列主义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以及新奋斗的知识分子。此责任是传达马列新作，不是只“打倒”、“万岁”而已！

党员成份中工农都有，就觉悟程度说，如能有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者，才容易形成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假使真能有从50到100个（这样的人），力量（就）很大了。

2. 群众工作：工人和雇主发生任何小的冲突，都应该利用之发展，不是我们主观硬造的。

3. 农民工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虽少，但帝国主义常利用之，以保护其利益。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

党便在此处利用此机会以创造军队，因为没有武力是不行的。

4. 知识分子，中国同志看成太不行了。如学生对帝国主义的仇视，我们就不应（将他们）撵出去，（而要）使之做党的工作。

5. 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要加紧工作。

以上尚不是暴动。

1. 用术语（的混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结果。

革命高涨：反革命退步（却），革命进攻胜利。

在反革命中心，大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没有一个严重情形在主要城市中，仅仅在乡村中从彼处至此处，此处至彼处。而反革命则（掌）握住主要城市。

我们敌人帝国主义在华并未一点减弱。

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

因为对于高涨的了（理）解不同，便对于环境的观察有异了。

不是每一（次）工人的暴动都能（发展）成为革命。

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

现在仅仅是农民暴动，说他（它）破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对的，但对全国却不能说高涨。

以为国民党能北伐，因有公开旗帜，政纲，好否？（这）是另一问题。而现今苏维埃革命尚未开展这一局面，故不能谓为高涨。

2. 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这个企图结果是失败了。

当暴动者去暴动时，一定要想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故他们可以说，这是新的革命高涨的开始。但在客观上只是工人阶级在过去高潮中的

最后一次斗争——回光返照的企图，故遭到失败了。

假如我们如此说，是否减轻了广州暴动的意义？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十二月暴动也是一个最后的企图？中国工人阶级最后的英勇企图，虽未展开新的革命高潮，但给了一个苏维埃形势的信号，指出了以后新的高潮来时的新阶段，这仅是信号，不是已经开展了这个高潮。

3. 关于大会决议案事，我未看见，无意见可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①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

我关于党的任务，已说的不再重复了，宣传教育、工人运动、农村斗争，以及训练军事人材等等。我现在只说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其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

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

工人阶级及党在能利用农民运动在党指导内为工人用，非是为相反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514，目录1，卷宗994，第4—7页。

中文手稿，影印件。

^① 指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原注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①、康生、王稼祥。

[斯大林：]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

① 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次谈话后即回延安，却竭力推行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本书制作者注

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 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 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

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

(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 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

还要生产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 八路军必须要有 30 个师，而不是 3 个师。

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

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 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

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 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

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

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独吞猎物的可能。

(11) 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①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① 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书制作者注

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同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年11月—1942年3月)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国防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14日

2.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①，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① 即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本书制作者注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 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 询问[中共]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国。

两个方案：（1）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2）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援助中国共产党——50 万美元。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话，斯大林称不能接见我去谈中国问题，因为他很忙。没有阅读送去材料。他说：“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 30 万美元的援助。”

1941年1月13日

致铁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诸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

应准许国防人民委员部把一组中国共产党员共 26 人转移到延安。

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1941 年 1 月 21 日

我同斯大林谈了中国问题。

“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

“看来，3 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

我们商定以后几天讨论这一问题。

1942 年 3 月 19 日

斯大林同志来电话询问德国同志何时抵达，中国同志是否启程。

“他们到后，请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关注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会见崔可夫少将（驻中国武官），他通报了中国的局势以及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关于印度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

(节选)^①

(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

……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① 这次会谈记录的前半部分刊于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十·国际共运篇》“关于印度”。——本书制作者注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①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

……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

……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现在谈论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我已经谈过了，这就是农业革命。这涉及武装斗争，但是应该说，中国人没有谈论武装斗争，他们谈的是武装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同解放区和同解放军一起进行的游击战争。这意味着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武装革命和游击战争，而不是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说法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报纸中经常刊登。武装斗争的含义要大于游击战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革命是怎么开始的呢？

1926—1927年，中共的同志脱离了国民党。他们组建了另一阵营，并组建了4—5万人的军队反对国民党。这支军队主要开展游击战。他们隐藏在森林和山地，远离城市和铁路。当然，那里设有中共中央，主要的干部也在这里。中国的军队不能在城市建立根据地，在城市他们很容易被包围，为了不被包围和消灭，他们继续远离城市和

^① 兰纳迪夫，1948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者注

铁路，驻在了一些游击队解放区。在被包围的时候，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放弃了原来的解放区，建立了新的解放区，并尽力不进行战斗，越这样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脱离了工人和城市。毛泽东当然不希望中断同工人的联系，但游击战道路的结果是，导致了他脱离了城市。这是苦恼的，但也是必需的。最终，他们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防守。他们把农民吸引到了自己的一边，并武装了他们，开展农业革命，壮大自己的军队，并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避免一些损失，这种损失是游击战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游击队解放区呢？它仍然是国家中的孤岛，在这些地区没有后方，它会被包围和封锁；它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事情就是这样。延安被包围了，而中国共产党离开了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而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决定转移到东北的话。在转入东北以后，他们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状况，获得了以友好国家为代表的后方。现在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孤岛了，而像是一部分深入到苏联的半岛。在此之后，蒋介石不再有机会包围中国的游击队。而只有在中国同志得到休整之后，他们才得到了自北向南发动进攻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非常有益于革命。在此方面，中国人对革命的实践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当然，在农民占80%—90%的国家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牢记这种斗争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从中国同志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解放区进行的游击战争有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于，游击区总是很容易被包围。要想克服这种包围并取得胜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为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还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游击战没有拥有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如果游击战有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国，那么一定就会取得胜利。非常典型的是，在向东北转移之前，中国同志不愿发动进攻，他们害怕被包围。只是在转移到东北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动进攻，并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游击战争的缺陷应该被考虑到。你们经常说，要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游击战就足够了。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条件要比印度有利。中国已经培养了人民解放军。而你们没有培养军队。中国没有像印度这样密集的铁路网，这对中国的游击队是非常有利的。相比中国，你们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机会要小一些。工业方面，印度比中国发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是，从游击战的角度来说就不好了。无论你们建立什么样的队伍，建立什么样的解放区，都将会被孤立。你们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

阿富汗、伊朗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到达的西藏，都不是像苏联这样的后方。缅甸？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只有陆上边界，而其余国家都只有海上边界。因此，应该寻找出路。

需要游击战争吗？当然需要。

.....

中国的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对印度人来说是不够的，印度需要把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一些人认为，中国同志反对这样的结合。这是不对的。

如果上海的工人们罢工了，或者在进攻南京的时候，军工厂的工人们罢工了，难道毛泽东不高兴吗？当然，不会的。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毛泽东同城市失去了联系。如果铁路工人罢工了，蒋介石不能取得弹药，那么毛泽东是会高兴的。但是，缺乏同工人的联系，这是悲哀的，也是必需的，但不是理想的。如果你们取得了中国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把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那么这样就理

想了。

丹吉^①：我们几乎把没有工人参加的游击战争变成了一种理论。

斯大林同志：如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一点，他会咒骂你们的（笑声）。

.....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3卷第228—236页

①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者注

物质援助中国共产党

附录 要求和提供物质方面的各种援助^①

(1939年—1942年)

1、请转运货物给八路军使用

——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

1939年1月8日

秘密

亲启

致伏罗希洛夫同志

根据我们的请求，米高扬同志拨给我们15吨各种军用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和中国特区^②的需要。

请您指示奥尔洛夫同志将这些货物转运给八路军使用。

季米特洛夫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下同，不另注明）

全宗495，目录74，卷宗308，第1页。

打字稿，副本。^③

① 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援助，主要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进行。——本书制作者注

②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本书制作者注

③ 本篇和以下所刊有关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均选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各卷。文件的标题均为我们所拟加。——本书制作者注

2、寄给你们一个贵重的包裹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7月28日

绝密

7月25日寄给你们一个贵重的包裹，林伯渠或朱德应在西安收到。请提醒他们，这是给[中共]中央的并要求尽快送给你们。请确认是否收到及收到的数量。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第29页。

手稿，亲笔签字。

3、钱交给了亲密的朋友们

——普罗斯库洛夫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8月2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的人通过林伯渠将钱交给了亲密的朋友们。林伯渠认为，钱数无疑是不够的。

(普罗斯库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07，第 11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4、要求大规模组织医疗援助

——任弼时等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9月8日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同志

关于单独较为有效地给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第四军^①提供医疗援助的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认为，通过红十字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系统提出大规模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问题是适时的。

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医院，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运输。还可以沿我们感兴趣的路线在西安、延安及其他地点设立红十字会分会。

这种像样的有组织的援助，看来会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社会团体的支持。

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把中共干部转运到莫斯科治疗的必要性。在乌鲁木齐地区，除了医院还可以为受伤的官兵建立一所体面的康复疗养院，在那里也可以为我们的干部做些简单的治疗。

实际上，我们认为，最初阶段需要15到20名医务工作者、4至5辆救护车，至少一架急救飞机和一两位能领导这项事业的有毅力的政工人员。

（陈林^②）（莫尔德维诺夫）

全宗495，目录74，卷宗305，第20—21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新四军。——本书制作者注

② 即任弼时。——原注

5、寄去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包裹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39年9月21日

绝密

9月20日给你们寄去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包裹，林伯渠或朱德应在西安亲自接收。

请预先提醒他们，这是寄给中共中央的，并要求尽快送给你们。

请尽快确认是否收到。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第45页。

手稿，亲笔签字。

6、要求为军事学校提供技术装备和教员

——周恩来和任弼时致季米特洛夫信

1939年10月3日

绝密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由于您的关心和协助，还在1937年就打着盛世才督办的名义，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现在已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

为了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设立了以下各班：炮兵班、航空兵班、坦克兵班及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

根据方林^①和徐杰^②同志的报告，该校学生在两年的学习期间已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最近6、7个月以来，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大大妨碍了今后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技术装备和教员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他们就不能继续学习了，这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就不可能作为军事专家（飞行员、坦克手）来使用。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我们有以下建议：

1. 为使在乌鲁木齐学习的这批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和完成学业，需要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给他们提供几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几辆坦克、五六部汽车、一名火炮方面的教员、一名坦克方面的教员）的派遣问题。

2. 如果从政治上考虑不便给他们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那就

① 邓发。——原注

② 陈潭秋。——原注

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在那里成立一所能够接收 200 名学生继续学习的专门军事学校或军事培训班。

如果您同意第二点，那就需要通过我们和组织部派一些同志来，为该校招生。

考虑到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重要性和不宜中断这些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的学习，我们请您彻底解决和落实这个问题。

（周恩来）（陈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09，第 17—18 页。

打字稿，原件。

7、要求为八路军和中共干部医院筹集资金和人员

——季米特洛夫致安德烈耶夫信

1940年1月13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

中国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半民族解放战争，对其伤病战士的医疗服务，是由中国红十字会和各种国际红十字组织（英美等国的红十字组织）保证的，这些组织在中国开办了医院，组建了急救医疗队、考察队等。

考虑到对中国军队伤病战士的医疗服务严重不足，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伤病战士和中共干部的艰难处境，必须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系统在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甘肃、新疆建两所约200—400张床位的定点医院和在乌鲁木齐建一所150—200张床位的临床疗养型医院。后者基本上是为中共及其八路军干部而建的。近一个时期中共和八路军的伤病负责人员被送到了莫斯科，因为不可能在中国为他们组织医疗和休养。在陕甘宁特区（边区）聚集了相当数量需要医疗救助的伤病战士和战争残废人员。

一年组织、设备和管理总开支约为950万卢布（这里包括使用两架救护飞机的费用）。而且首先需要在乌鲁木齐为中共干部建一所临床疗养型医院，这个项目的开支约为4182043卢布。资金可以通过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系统或者通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执委会系统筹集，红新月会从1938年12月3日起就是预算组织。

干部：20—25名医生和16名护士长可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招收，主要是从曾在西班牙工作过并表现很好的人士中挑选。在莫斯科有部分这类干部。领导人员和行政政工人员应从苏联人中挑选。

所有其他人员约 400 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中国爱国组织的帮助下在当地挑选和培训。

这些措施应由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执委会具体实施，办法是：

1. 由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执委会派代表团去中国。代表团可以由彼得·科拉罗夫同志率领（有关他的材料附上）。

2. 关于在新疆开设疗养院的问题，可由代表团与乌鲁木齐督办盛[世才]协商解决，而开展两所医院工作的问题，代表团应取得蒋介石或其代表的允许。

3. 为医院和疗养院挑选干部的问题由红十字会执委会事先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协商解决。

在苏维埃机构这个问题形式上将由红十字会执委会来提出。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17，第 4—6 页。

打字稿，原件。

8、要求青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

——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致周恩来和任弼时电

1940年1月29日

绝密

致周恩来和陈林

请转告青年共产国际：（1）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所在地区的局势很紧张，学校在那里难以为继。这种学校可以建在延安，但没有经费。近来供养一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倍。如果仅用我们党下拨的经费，那很少。因此，请提供援助，哪怕每月提供1万美元。候复。

青年委员会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13，第11页。

打字稿，原件。

9、收到无线电器材若干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年2月8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收到以下无线电器材：（1）灯管 20 只，（2）碱性蓄电池 6 节和苛性钾。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3，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

10、需要 30 万人的防流行病药剂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2 月 24 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

为了前线八路军和后方勤务人员，大体上需要 30 万人的防流行病药剂。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3，第 45 页。

打字稿，原件。

11、无线电发报机等已给你们发出

——季米特洛夫致周恩来电

1940年4月23日

绝密

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给你们发出，应到兰州了。铅字已全部随你们发走。报纸印刷纸张在乌鲁木齐。你们驻兰州的人可以把这些东西发出。我们正在弄清楚是否能够寄送药品、卷烟纸和自然科学参考书。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第23页。

手稿，亲笔签字。

12、在你们那里积压了大量重要包裹和材料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

1940年7月16日

绝密

在门址^①积压了大量我们给你们的重要包裹和材料，包括无线电发报机、无线电器材、纸张和帐目。

用我们的办法再提供这些东西很困难。请讨论一下采取有力的措施，并告知结果。还请告知你们驻门址和航春^①的负责人姓名，我们可以把重要包裹和帐目转给他。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第44页。

手稿，亲笔签字。

① 门址、航春两地名均为音译。——译者

13、规定给我党的款项短缺 87410 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 年 8 月 10 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在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了你们寄来的 50000 (500000?)^① 美元，7500 英镑，除这两笔数目外还有 10000 美元专门用于联络，5000 美元给李奎^②专用。

2. 你们在周恩来动身之前汇出的并且我们于今年 5 月底在西安收到的款项如下：106670 (106070) 美元，8200 英镑，此外还有 40000 美元专门用于联络。

3. 在周恩来动身之前已同索尔金同志谈妥，每一英镑合 4 美元，而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 美元 60 美分。因此实际上我们总共只收到 212590 (212500?) 美元，除了这一款项外，还有 10000 美元用于联络，5000 美元给李奎专用，40000 美元用于代表大会^③。

4. 根据目前英镑的价格，我们预计，我们应从你们那里得到规定给我党的 3000000 美元款项中的 87410 美元。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3，第 104—105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原文如此，下同。——原注

② 即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原注

③ 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14、寄回英镑，请寄给我们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0年11月26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今年9月29日，周恩来收到43287美元和11500英镑。此外，他还收到了各种政治通报材料。

2. 鉴于英国货币目前在中国不流通，所以我们把我们收到的11500英镑连同我们手中的2015英镑，总共13515英镑，通过潘友新同志（苏联大使）寄回给你们，并请代替英国货币寄给我们美元。希望近期将这笔钱通过潘友新同志转给周恩来。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13，第34页。

打字稿，原件。

15、可以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0年11月27日

亲启

致毛泽东

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整条道路的安全，那就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要赶紧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把您的想法和具体建议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第96页。

俄文手稿。

16、两笔美元和 6 箱各种器材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2 月 17 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24500 美元和 6 箱各种器材收到。此外，潘友新转给我们 3 万美元。

如果杜重远等人将被督办^①释放，那可以把他们派往重庆或延安，这都可以。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第 46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即盛世才。——原注

17、请拨给我们今年款项总额 1 百万美元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5 月 16 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从今年 1 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为 1 百万美元的款项。

2. 还请批准我们在香港、菲律宾、新加坡、仰光、上海、天津、重庆、西安、澳门、印度支那、荷属印度等地组建电台和联络站的年度预算及中共中央联络局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美国、日本和上述地方进行通讯联络的开支。整个这笔预算和开支规定为 6 万美元。

3. 据我们所知，近期有苏联飞机拟飞延安。请顺便寄给我们部分上述款项。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第 153 页。

打字稿，原件。

18、你们的人拒绝接收书籍等物资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1年5月21日

绝密

从兰州发出我们700公斤物资——纸张、书籍等。现这些物资已抵达西安，但你们的人拒绝接收。

请立即采取措施接收物资并运到你们那里。请速告结果。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9，第12页。

手稿，亲笔签字。

19、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 100 万美元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4 号记录（摘录）

1941 年 7 月 3 日

绝密

1941 年 7 月 3 日

179.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

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00 万美元，用来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

抄送：季米特洛夫、兹韦列夫同志。

中央书记

全宗 495，目录 162，卷宗 36，第 1 册，第 41、6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20、为给毛泽东治病急需以下药品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年8月7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

为给毛泽东治病，我们急需以下药品：gioan flionydtm chlmtidf（治纤维蛋白原发炎药）30盒、fxrtavimlfrrlamp（紫外线灯）一套。

请随来我们这里的飞机寄给我们上述物品。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第251页。

打字稿，原件。

21、上一份电报中药品名称不全准确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年8月13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

在上一份电报中，药品名称不全准确。正确名称是：

1. Atries cicalquo lamp（紫外线灯）。

这是英文名称。这种灯广泛用于苏联医学。它属于电疗类。

2. Qiomnioihydtmchlmtidf（治纤维蛋白原发炎药）。

这种药是日本造，但不仅在日本生产。毛泽东患纤维蛋白原发炎。如果苏联医学了解这种病并有好药，那也请用上述办法把这种药寄给我们。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第253页。

打字稿，原件。

22、寄去 60 万（美元）请确认收到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1 年 9 月 5 日

致毛泽东（亲启）

直接给延安寄去 30 万（美元）并通过周恩来寄去 30 万（美元）。
请确认收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9，第 5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3、35 箱物资和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13 日

致季米特洛夫

1. 35 箱物资和你们电报中提到的其他物品已收到。
2. 从卡列洛夫那里收到 30 万美元。
3. 请在近期把款项的另一半寄给重庆周恩来。需要钱支付必要的开支。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第 81 页。

打字稿，原件。

24、我们决定建立情报部需 50 万美元等援助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1 年 9 月 29 日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请转国防人民委员^①）

我们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像样的情报部，下设军事的和党的侦察情报分部。在所有游击区都设立情报资料收集整理机构。在国统区，首先是在重庆，组建情报站，而在日占区和满洲建立侦察机构网和军事爆破机构。情报部的主要任务是探明日本人的军事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爆破作业。过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是薄弱的。侦察国民党的活动（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重新组织对太平洋国家和英美的侦察情报工作，过去我们没有这项工作。

我们突出地感觉到，拥有军队和政权的中共也应该设立强大的情报机构，这不仅对于我们的政治军事领导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也可向苏联提供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日本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我们有 60 万党员和 50 万军队，能够建立起有工作能力的情报网和军事爆破机构。

但是我们有一些困难，因此希望你们向我们提供以下援助：

（1）50 万美元；（2）60 套用于装备小型移动式电台的材料和其他无线电联络器材，以及爆破作业用的材料和工具。请派来一两名情报工作指导员，帮助我们培训干部和就地领导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第 61—62 页。

经季米特洛夫修改的打字稿，原件。

① 即斯大林。——原注

25、寄重庆周恩来的 30 万美元已收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 年 1 月 13 日

致季米特洛夫

1. 寄到重庆周恩来名下的 30 万美元，我们已收到。这笔款项是不是你们批准用于党的工作需要的经费的一部分？
 2. 从哪项经费中拿出 7000 元给李奎？
 3. 联络局的预算是否得到批准？数额是多少？
- 请就这些问题作出答复。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第 2 页。

打字稿，原件。

26、你们收到的款项是 100 万元援助的一部分

——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电

1942 年 1 月 17 日

致中共中央

你们收到的款项是以前批准的 100 万元补助金的一部分。你们要从这笔款项中抵偿联络局的开支。单独的预算还没有批准。给李奎的 7000 元暂时从你们总的经费中支出。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7，第 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7、能否寄来我们需要的全套药品和器械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

1942年4月8日

致季米特洛夫：

在延安的主要干部当中，有一些同志患了胃病、心脏病和肺病。但我们这里缺乏医疗设备。您能否通过到这里来的飞机给我们寄来装备治疗上述疾病的诊所所需要的全套药品和器械？我们特别需要爱克斯光设备和拍照材料。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第49页。

打字稿，原件。

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

关于 1945 年 4 月时中国的局势

——与赫尔利、哈里曼^①会谈纪要（节选）

（1945 年 4 月 15 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Э. 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 1936 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

^① 赫尔利，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哈里曼，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人去办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藉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

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

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 5 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 800 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超过 150 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 3 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 36 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

国总共将拥有约 40 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 5% 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有 300-400 人，而汉族人有 600 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

记录人：B. 帕夫洛夫

附录一 彼得罗夫^①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

(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10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

① 彼得罗夫，时任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本书制作者注

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成。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闻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间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替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 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48个师（或者是60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12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12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48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25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国民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

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 H. B. 罗申和 H. 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

B. M. 莫洛托夫同志、

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

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一卷

附录二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关于国共谈判和中国政治、军事形势

(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

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

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替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

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一卷

斯大林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

（1945年—1946年）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与中共关系等问题

（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

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 20 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 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 5 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

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 16 至 20 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 16 至 20 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①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 3 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 30—32 名代表。^②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

① 指 1945 年 7 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原注

② 这里所说的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化名孙平）、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弗拉基米罗夫 1942 年 5 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奥尔洛夫和梅利尼科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 1946 年 1 月抵延安，他们于 1949 年 11 月奉命回国。美国驻延安代表是指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原注

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①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

①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应为联共（布）中央。——原注

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 30 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原注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

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會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①的困境。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

^① 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原注

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①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半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半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

①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原注

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

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 8 000 至 10 000 或 12 000 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 50—60 万军官以及大约 12 000 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

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B. 帕夫洛夫记录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一卷

同蒋经国会谈记录：关于东北形势等问题

（1946年1月3日）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 4 000 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 100 公里的路段，

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

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①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①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195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原注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问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 000架飞机、3 000辆坦克、

5 000 门大炮、40 万支步枪、20 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公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公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公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

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B. 帕夫洛夫记录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一卷

答复蒋介石的来信

(1946年1月4日)

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远东第一司司长格·伊·金
转交蒋经国先生
1946年1月5日

194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大元帅先生：

令郎蒋经国先生1945年12月30日向我转交了您的热情的来信，为此向您表示感谢。

在我和蒋经国先生的两次会谈中谈到了苏中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中苏两国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能按苏中条约的规定得到发展，今后我会经常对此予以关注。

不久前在莫斯科闭幕的三国外长会议取得了有益的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会议促成了对中苏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远东战后问题的解决。

请您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寄往重庆蒋中正大元帅亲启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6年第4期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有关中国共产党近期工作的情况

(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①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

①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共联系时经常使用的化名。——原编注

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一卷

附录四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
联共（布）中央：毛泽东可随时前来莫斯科
(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①：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②

1947年6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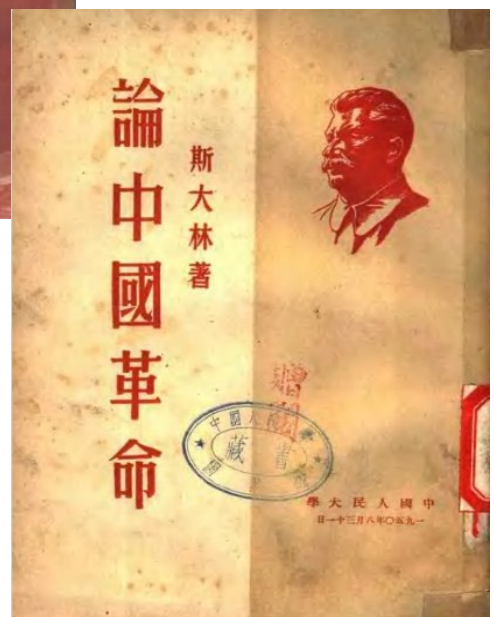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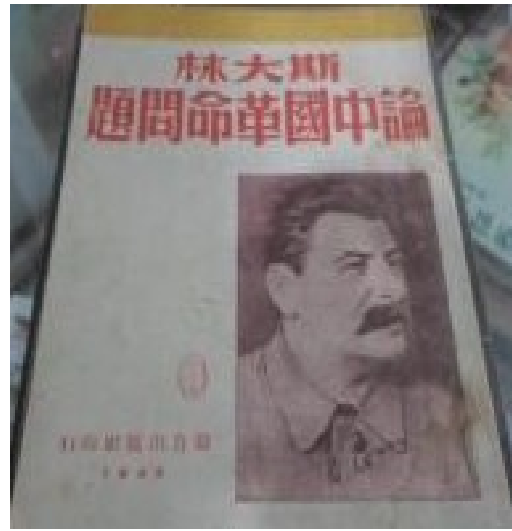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一卷

① 捷列宾，А. Я.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原编注

②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原编注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篇目

(1918年—1927年)

一、不要忘记东方

(1918年11月24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1925年12月18日)

节录：中国革命的力量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9—200页。

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6年11月30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60—271页。

四、给邱贡诺夫的信

(1927年4月9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43—144页。

五、中国革命问题

(1927年4月21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57—163页。

六、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1927年5月9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66—170页。

七、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1927年5月13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71—190页。

八、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1927年5月24日)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1—221页。

九、时事问题简评

(1927年7月28日)

节录：二 关于中国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5—256页。

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7年8月1日)

节录：关于中国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8—27页。

附录 朝鲜支援中国解放战争

附录 朝鲜党和人民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支援

(1945年—1949年)

一 金日成关于支援中国解放战争的讲话和指示摘录

1、1945年11月，在敌人对中国安东市狂轰滥炸的情况下，金日成冒着生命危险跨过鸭绿江到安东与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萧华研究对策，并说：“哪怕形势再危险，再困难，也要帮助中国同志。”

2、1946年11月7日，在审议有关中国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时，金日成说：“无论身处如何逆境，我们都要坚决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3、金日成在赠送10万件武器装备给东北民主联军时说：“现在我们把中国革命当成我们朝鲜革命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从缴获的物资中我们只留下极少量，然后尽量送给中国人。现在我们拿到的火药、导火索、雷管和布匹、盐、医药品等军需物资，全部送给中国东北地区。”

4、1947年1月2日，金日成在会见中国特使王一知时说：“我国人民需要再次勒紧腰带，坚持到底，把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物资，包括我们国内生产的一切战略物资，全部送到中国东北。”

5、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记述：“1947年夏天，我下达了紧急命令，命所有制鞋厂立即停止其他一切鞋类的生产，马上专门生产供给中国战友的军鞋。”

6、金日成在与平壤学院院长、朝鲜保安局长谈话时指示：“虽然我们的条件也很紧张，但是我们要尽量克服，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7、金日成在1949年2月接见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朝鲜师164师师长王效明时说：“支援中国革命到底，这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立场，我们帮助中国一定要帮到底。”

8、金日成在1952年5月12日视察朝鲜人民军时说：“朝鲜青年几乎参加了解放中国的各大战役。在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中，有很多朝鲜青年用肉体挡住了敌人的火力。”

二 中国领导人关于朝鲜支援中国革命的讲话摘录

1、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2、周恩来1958年访问平壤的讲话中指出：“过去在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

3、1963年刘少奇访问朝鲜时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年代里，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三 解放战争时期朝鲜对中共物资援助的粗略统计

1、朝鲜对东北民主联军最大的一次武器支援，是东北局派陈云和萧劲光到朝鲜请求提供武器，得到朝鲜援助东北民主联军10万件武器装备。

2、朝鲜援助武器装备的运输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左右。除了南阳军火库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外，朝鲜还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日本武

器弹药，包括82炮、60炮、山炮、野炮、高射炮、高射机枪、反坦克枪、轻机枪、三八马枪、三八步枪、手枪、望远镜和地雷等。

3、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东局派人到朝鲜采购了大量作战物资。1946年，山东我军通过办事处在朝鲜买到300吨炸药，300万支雷管和120万米导火索；1947年春，又买到20吨炸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15万双胶鞋。

4、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朝鲜到底支援了我们多少武器弹药很难准确计算。从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略见一斑：“第一批是我委托金日成同志要的12个车皮，第二批是刘亚楼来要的24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要的110个车皮，这些都是金日成同志亲自组织，无代价地帮助我们装运的。这次又是600—800个车皮。”

5、朱理治在东北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写给中共中央的《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综合统计为：“融合总部及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的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

6、东北民主联军非常缺少药品，金日成一下子解决了一车皮的药品，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7、朝鲜有关部门想办法接到了1000匹质量很好的军装布料（可做一万套军装），还有1000套成品军装和大批药品。金日成亲自在运往中国延吉的布匹、军装和药品清单上签字。

8、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夏季攻势”，在泥泞的雨水中行军需要一批水袜子（朝鲜特产，与雨靴类似），民主联军派王效明到平壤向金日成求援，订做了两万五千双水袜子。

9、抗战胜利初期，中共牡丹江地区朝鲜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新报》严重缺少纸张及其它印刷材料。金日成得知后，立即赠送给报社20吨纸张，还有朝文铅字和部分铜锌板，保证了报纸的顺

利出版。

10、1947年10—11月，国民党军队炸毁了安东和通化两座城市的供电设施，朝鲜方面马上提供了电力支援，直接从朝鲜供电，前后大约半年多时间，直至两个发电厂于1948年5月恢复。

11、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与朝方之间的贸易总额据统计为：我方对朝鲜贸易输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卷）24684万元，输入品总额36526万元。其中仅山东等地1947年春夏就在朝鲜先后购买了420吨水泥、120万米铜线、300万个铁钉、100吨铅锡、200吨硝酸、15万双胶鞋。

四 朝鲜成为中国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后方

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朝鲜党和人民将自己的国土无条件地提供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使用。危机时刻，中共的党政机关、医院、印刷厂、广播电台、兵工厂、军事学校、物资装备、粮食等都转移到朝鲜境内或经过朝鲜转移到其它安全地方。

1、1946年，通化市县政府人员和物资转移到朝鲜楚山。同时撤到楚山的还有通化医院。通化广播电台撤到朝鲜中江。

2、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直属供给处，即沈阳造币厂，有近300人及造币所需要的所有设备，于1946年8月9日过鸭绿江到朝鲜满浦。8月下旬经朝鲜边境城市南阳再进入中国图们。

3、1947年，数千名八路军部队借道朝鲜去南满。

4、“一保临江”战役开始后，由于敌人重兵压境，临江县党政机关向朝鲜疏散。

5、1946年11月，国民党部队占领通化，鸭绿江畔的辑安县党政机关撤退到朝鲜满浦。

6、1946年新中国空军的摇篮通化航校借道朝鲜转运飞机28架。

7、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将朝鲜作为东北解放战争的隐蔽后方时，设计了在朝鲜境内转运物资和人员的四条交通线。其中陆路两条：中国安东—朝鲜新义州—朝鲜平壤—朝鲜南阳—中国图们；中国通化—中国辑安—朝鲜满浦—朝鲜平壤—朝鲜南阳—中国图们。水路两条：中国大连港—朝鲜西海岸南浦港；中国大连港—朝鲜东海岸罗津港。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除安东和通化有大批物资借道朝鲜转移之外，我军还有大批的军用物资和贸易物资，从各地借这四条水陆通道在南满北满之间、关内关外之间、国际国内之间运进运出。紧急情况下，朝鲜政府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为我方紧急装运，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8、1946年4月7日，东北军工部180多节车皮的设备及人员、物资组成专列，从通化出发经辑安进入朝鲜满浦后借朝鲜国内铁路运送到朝鲜边境城市南阳，再从南阳运往图们。

9、1947年，东北局军工部将子弹厂、炼钢厂和化工厂迁往朝鲜阿吾地（属朝鲜咸镜北道）。

10、1948年3月25日，瓦房店纺织厂的全套设备由大连港经朝鲜南部的釜山，穿过日本海峡到达朝鲜东海岸的罗津港，然后装火车经南阳从中国图们入境。

11、1946年9月底，民主联军第七师将20000多支步枪，110多挺轻机枪及一批弹药，装了满满两车皮从图们出境，经朝鲜南阳、先锋、罗津、清津抵达平壤，然后从平壤经新义州过鸭绿江大桥到中国安东装船后运到山东龙口。

12、1947年春，400吨粮食从图们出境，经朝鲜铁路运到长白县。大连也经历了借道朝鲜运输粮食的情况，具体路线是从哈尔滨出发经图们进入朝鲜，经南阳运到了清津港，再用轮船过朝鲜半岛运到大连。当时大连严重缺粮，所以说这是大连地区人民的一条生命线。

13、1947年11月，满载1000吨东北大豆、黄鼠狼皮和中药材以

及一批黄金的轮船从我国北满进入朝鲜，经罗津港驶抵香港，在香港售出后购买东北所需的西药、真空管等无线电器材、卷筒新闻纸、汽车零件、纺织机械等物资，经朝鲜罗津港装车陆路运抵北满解放区。这样的贸易过程在1948年5月、10月、11月还进行过三次。

14、1946年四平战役期间，罗荣桓从苏联获得了8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品，从苏联经海路运到朝鲜，再从朝鲜满浦过境中国辑安运到了梅河口。

15、1947年6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接运苏联经朝鲜援助中国的大批武器、弹药和军工机械。7月1日开始每天两个列车从中国图们出发，经朝鲜南阳运往前线和我国后方部队、仓库、工厂。至九月末共接运2800多车皮。通过这条路线，1948年共运输过境物资多达30.9万吨。

16、由于金日成的高度重视和朝鲜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1946年—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来自北满、南满、大连、山东以及香港的我方机关、部队、学校的干部、家属以及民主人士，纷纷借道朝鲜，形成了一股涌动的人流。其中主要有：

① 1946年6月2日，国民党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下2700余人起义，被我军队编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这支队伍。”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朝鲜最高领导人同意，这支穿着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辑安上火车过江，在朝鲜境内行驶一天一夜，经南阳过境进入中国图们，改编后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

② 1946年10月，民主联军第七师留守家属从山东经朝鲜国土去北满根据地。一行五六十人从大连乘苏联轮船直达朝鲜西海岸港口南浦，然后换乘火车经平壤、罗津和南阳进入中国图们。

③ 1947年1月10日，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为主体的200多人，乘苏军运输船到达朝鲜西海岸港口南浦，然后乘军用列车经平壤、元

山、咸兴、清津一路北上，由南阳过境到达中国图们。然后继续北上，到达哈尔滨。

④ 1947年3月，在旅顺和大连地区参军的新兵1200余名，从大连乘船东渡黄海，经朝鲜南浦北上，越过朝鲜北部山区渡过鸭绿江到达临江。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参加了“四保临江”战役。

⑤ 1947年5月，我军最早的坦克学校（对外称旅大警察学校第四大队）1500多人，从大连乘苏联货船东渡黄海，到朝鲜南浦转乘由20多节车厢组成的专列经平壤、咸兴、罗南、清津到达南阳。由此过境进入中国图们，又北上抵达中国民主联军司令部所在哈尔滨。

⑥ 1948年9月，当时遭受国民党迫害而转移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均儒、章伯钧等十三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一起乘船到大连再经朝鲜罗津港、南阳等城市进入中国北满，参加政治协商。

⑦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党我军通过朝鲜国土往来于南满与北满之间的领导人、单位和人员很多，如陈云、韩先楚、李立三、滕代远、欧阳钦、韩光、何长工、吕东等。

⑧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少部队和各界人士取道朝鲜转移的，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给中央的报告统计：“1947年几个月里有1万多人，1947年春由安东去新义州然后经满浦到辑安的2000人。由大连去临江的新兵3000人，春初由大连去北满的干部2000余人，都是经朝鲜北部过境转运分赴各地的。到1947年6月27日统计，仅9个月来经朝鲜北部过境的人员不下2万人。”另据延边党史资料记载：“仅1946年下半年，就有18批部队取道朝鲜进入延边。1948年有8685人经朝鲜南阳过图们进入延边地区。”

⑨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与朝鲜的大力支援有直接关系。东北民主联军的很多后方医院、后勤仓库和兵站基地设在朝鲜境内。我军运输机关分为两个梯队，前梯队设在临江，主要靠铁路运输，后梯队设

在朝鲜，主要靠汽车运输，运输队设在朝鲜满浦。

五 朝鲜为中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人力援助

1947年，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做过统计：“参加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正规部队的朝鲜人有12万人，加上参加地方部队的朝鲜人先后共有25万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另据统计，在3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仅延吉地区6县市在 frontline 牺牲的革命烈士2912人，其中朝鲜官兵占90%。

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中参战的朝鲜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朝鲜义勇军和由其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二是从苏联回到中国东北的第88国际教导旅中的朝鲜官兵。三是其他朝鲜人组成的地方部队。

当时的朝鲜义勇军分三路挺进东北：

1、1945年9月，275名在延安朝鲜军政大学学习的朝鲜学员和40余名在延安的朝鲜干部，在武亭同志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随大军挺进东北。

2、从太行山、河北、山东来的朝鲜义勇队的干部战士，大约500余人。

3、1945年9月，冀、热、辽的朝鲜义勇军工作队韩清来到沈阳，组织了由1000多名朝鲜青年参加的部队。

1945年11月10日，这三路义勇军在沈阳汇合，召开了“东北朝鲜义勇军部队”成立大会。武亭任司令员，下辖1、3、5、7共四个

支队。到1946年，第1支队扩大到5000余人，第3支队扩大到3000余人，第5支队扩大到6000余人。这些队伍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些朝鲜同志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很多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摘自《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吉林白山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在解放区进行的游击战争有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于，游击区总是很容易被包围。要想克服这种包围并取得胜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为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七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八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八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8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苏中关系篇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访苏周折

附录一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6月15日)	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前景 (1948年4月20日)	4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访苏及其计划 (1948年4月26日)	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 (1948年4月29日)	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延缓来访时间 (1948年5月10日)	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延缓对苏联的访问 (1948年5月10日)	1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年7月4日)	11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请毛泽东改变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13
附录五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延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14
附录六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15

附录七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年7月28日)	17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1948年9月28日)	1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19
附录九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20
附录十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22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年11月21日)	2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几天访苏是正确的 (1948年11月23日)	24
附录十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1949年1月9日)	25
联合政府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2月30日)	2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2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联合政府可能在春季建立 (1949年1月10日)	30
和谈风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美国人授意南京政府提出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0日)	3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1949年1月11日)	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南京政府的备忘录原件	
(1949年1月11日)	35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2日)	37
附录二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反对参加任何谈判	
(1949年1月13日)	3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抓住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	
(1949年1月14日)	40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4日)	4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1949年1月15日)	44
附录四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 复函草案及正式答复	
(1949年1月17日)	45
西柏坡行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年1月17日)	4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	
(1949年1月23日)	49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代表是米高扬	
(1949年1月28日)	50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1月28日)	52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转告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年1月28日)	53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	
(1949年1月28日)	54

附录四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5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年2月2日)	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应努力尽快夺取大城市	
(1949年2月3日)	5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国民党正在偷运国有黄金和贵重物品	
(1949年2月3日)	60
附录五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	
(1949年2月4日)	61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	
(1949年2月4日)	62

助建政府

附录一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	
(1949年2月4日)	6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1949年2月7日)	65
斯大林转达毛泽东：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已停止活动	
(1949年2月16日)	6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	
(1949年4月19日)	68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陈云电：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	
(1949年4月26日)	7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建立新政府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1949年5月26日)	71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	
(1949年6月12日)	7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	
(1949年6月18日)	76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 （1949年6月27日）	77
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的批注：中共建国的大政方针 （1949年7月4日）	82
附录三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 （1949年7月6日）	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 （1949年9月12日）	100
附录四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 （1949年9月19日）	101

出版毛著

附录一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日）	104
斯大林致中共中央电：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2日）	105
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您的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1949年12月16日）	106
附录二 毛泽东、尤金致斯大林电：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情况 （1950年10月4日）	107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 毛泽东的《实践论》 （1950年12月10日）	11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尤金再次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11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 （1951年9月30日）	11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兼职“毛选” 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113

中共建国

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新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116

苏联政府声明：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117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118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
斯大林肖像越好

（1949年10月11日） 11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
顾问赴中国

（1949年10月14日） 12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
提供帮助

（1950年11月6日） 121

缔结盟约

附录一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123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苏中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
等问题

（1949年12月16日） 12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
大连等问题

（1950年1月22日） 131

附录二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 文件草案 （1950年1月22日）	137
附录三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141
附录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的草案	143
附录五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 （1950年2月15日）	145

友好往来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关于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3日）	14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会议决议：同意中国党务工作者 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4日）	15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 （1950年4月8日）	1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 （1950年5月3日）	15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准许苏联电影用汉语等 多种语言配音 （1950年5月23日）	15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团工作人员 来苏学习 （1950年11月13日）	154
附录 联共（布）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 （1950年11月22日）	155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 （1951年1月9日）	15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 （1951年3月14日）	15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 五一节活动 （1951年3月24日）	158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延长部分苏联人员在华 工作期限 （1951年3月28日）	15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 （1951年4月18日）	16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 （1951年5月8日）	16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 文艺演出 （1951年5月10日）	16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 展览会 （1951年5月16日）	16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 代表团访苏期限 （1951年5月17日）	165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 参加夏令营 （1951年5月26日）	16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准许部分中国学生 回国度假 （1951年6月11日）	16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 电影放映设备 （1951年6月13日）	16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对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 错误问题的处理 （1951年6月23日）	17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周年 （1951年6月26日）	172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 在华期限 （1951年6月28日）	17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 （1951年8月2日）	17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人来苏学习 （1951年8月4日）	17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 （1951年8月7日）	17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 访问苏联 （1951年8月13日）	178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 （1951年8月14日）	17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巩固民族 和平”国际奖 （1951年8月16日）	18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杜绝在华专家在生活方面 的多余开支 （1951年8月20日）	181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消除在华专家滥用中方
服务设施的现象
（1951年9月1日） 182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两部
苏联电影
（1951年8月23日） 183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
（1951年8月28日） 184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年9月24日） 185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
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187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出差
（1951年9月29日） 188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
访问苏联
（1951年10月2日） 189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
《金星英雄》
（1951年10月4日） 190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192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参加五一节活动
（1952年3月21日） 194
-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在新疆的苏联公民
受到挑衅的问题
（1952年3月31日） 195

经济互助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多项援助 （1950年1月6日）	197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1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 （1950年12月3日）	199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 （1951年5月26日）	200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 代表处 （1951年5月30日）	20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同意中方缩减中苏船舶公司 经营期限的建议 （1951年6月2日）	203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 苏方董事 （1951年8月25日）	204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失误的问题 （1951年8月29日）	205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的不足 （1951年9月1日）	206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克服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工作中的缺点 （1951年9月6日）	207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 航空拍摄	
（1951年9月22日）	209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年10月7日）	210
附录一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212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年1月28日）	213
附录二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214
附录三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216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217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21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年3月15日）	219
附录四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备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220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2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4月2日）	224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第一部分）：关于援建中蒙铁路、 军事工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2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关于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等问题	
（1952年9月3日）	233

橡胶生产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请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243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2日)	24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代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245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8月17日)	2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248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 (1951年9月16日)	2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是否赞同朱德组建中苏橡胶股份 公司的建议 (1952年3月15日)	251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 橡胶不太合适 (1952年3月28日)	252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橡胶种植及苏方向中国提供设备和 专家的清单 (1952年3月28日)	2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树协议及有关物资供应等问题 (1952年4月4日)	255

军事合作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 (1950年1月8日)	258
---	-----

斯大林致中国领导人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	
(1950年7月13日)	25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向中国派遣防空和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261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7日)	26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26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2日)	264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26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一事	
(1951年5月26日)	26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提供60个师武器装备的问题	
(1951年6月24日)	2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的问题	
(1953年1月15日)	269

旅顺撤军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苏联可以应中国政府的 请求从旅顺撤军	
(1949年12月16日)	27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雅尔塔协定——那就 见它的鬼吧！	
(1950年1月22日)	273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 旅顺港地区	
(1952年3月28日)	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

提出论据

（1952年4月2日） 277

附录一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 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278

附录二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 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279

外交协调

斯大林致苏驻捷大使电：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

（1950年8月27日） 281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政府任命

张闻天为大使

（1951年3月16日） 28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284

附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

（1951年5月7日） 28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关于朝鲜停战、联合国、

对日关系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87

附录

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94

二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296

三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中国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病情
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298

插图

- 一 斯大林和米高扬在一起 51
- 二 毛泽东阅读斯大林著作 109
- 三 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44
- 四 中国观众争睹《金星英雄》 191
- 五 旅顺口苏军烈士纪念塔 275
- 六 1953. 3. 5, 斯大林与世长辞 299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正在逐步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中的部分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苏中关系篇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访苏周折

附录一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①：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②

1947年6月15日^③

① 捷列宾，А.Я.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编者注

②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编者注

③ 本篇及以下各篇均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至第四卷。——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前景

(1948年4月20日)

绝 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①。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 1948 年 3 月 15 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 年 4 月 20 日

① 毛泽东 1947 年 11 月 30 日致斯大林的信的第 9 部分，是这样一些内容：

“9. 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引自《中共党史研究》杂志 2002 年第 1 期第 85-86 页）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访苏及其计划

（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 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①，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 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4. 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100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10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1936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① 见本卷第4—5页。——本书制作者注

我们计划访问1—3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 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以便在途中及时联系”，这是所说的而不是写的。——捷列宾）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毛泽东

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

(1948年4月29日)

毛泽东同志：

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两位俄国医生应该与您一起来。我们同意留一部无线电台在哈尔滨。有关其他问题我们面谈。

斯大林

1948年4月29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建议延缓来访时间

(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义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①

1948年5月10日

^① 斯大林用的化名。——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延缓对苏联的访问

（1948年5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1948年5月10日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年7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①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2 224米，从东到西宽368米，起飞跑道长2 000米，宽96米。

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6-7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15-20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俚岛或石岛，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从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15日

① 潍县，即今山东潍坊。——本书制作者注

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 1 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 2—3 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 25 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 15 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 15 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 8 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 20 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 3000 多公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 2 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48 年 7 月 4 日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
请毛泽东改变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

斯大林

1948年7月14日

附录五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延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兹报告：

7月14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

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毛泽东

7月14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附录六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Φ.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①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

① 自己的语言，似指方言。——本书制作者注

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附录七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年7月28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 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 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 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 关于价值3 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 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 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要求尽快访问苏联^①

(1948年9月28日)

9. 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

1948年9月28日

^①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中公布的是节录。——编者注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
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列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1948年9月28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会很高兴于11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年10月17日

附录九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 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 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

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附录十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

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11月中旬启程，在11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12月份动身，即12月中旬或12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推迟几天访苏是正确的

(1948年11月23日)

绝 密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1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年11月23日

附录十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1949年1月9日)

斯大林同志！

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①

为了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

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

如果您认为技术准备时间不够，可以延后几天。飞机到达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您决定，然后告诉我。

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到达上述地点的时间最好是清晨。

与我一起访问的有21人。

毛泽东

1949年1月9日

①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所谓“国共和谈”呼吁，并于1月9日要求苏、美、英、法等国充当调停人。为反击这一“和谈”阴谋，毛泽东这次访苏没有成行。参见本卷第32—46页。——本书制作者注

联合政府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 您11月28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①

10. 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 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12. 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1949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1949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① 关于军事态势的内容略。——本书制作者注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致捷列宾

复第1号文件

请转达毛泽东：

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感谢您提供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并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府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促使中国民主力量更进一步，有更大的发展。

您在电报中提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的日期定于夏季之事，我们有些疑问。是否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些民主政治人士吸引过去，以此影响他们团结在中国北方人民解放力量的周围。国民党可能会走这一步棋，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企图让自己的爪牙参加民主协商会议以及以后的民主联合政治的阴谋遭到失败的时候。

因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事不宜拖延到夏季，而应该在解放北平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这样就会把一直在策划建立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乱。

斯大林

1949年1月6日

请电告执行情况。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联合政府可能在春季建立

(1949年1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你1月6日的电报已收到。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各种真正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建立联合政府，不会有重大影响力。我们的联合政府可能在夏季建立，也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即春季，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2. 我军已彻底消灭了被围困在徐州附近的杜聿明指挥下19个师的国民党精锐部队。

3. 占领天津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现决定：1月13日攻打天津，占领天津后开始进攻北平，然后进攻太原和大同。

4. 今年春季我军主力将作休整，夏季可以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他们在战斗意志和技术装备方面都将超过国民党军队。

到秋冬季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可以占领9个省，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以下城市：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苏州、无锡、福州、西安。

至于上海，问题不在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定能在今年冬季占领上海。问题在于燃料、粮食的供应和保障方面。是否采用强攻，我们还得考虑。

5. 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弼时和高岗等21人组成。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49年1月10日

和谈风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美国人授意南京政府提出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南京政府尚未得到上述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还未予答复。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做大致如此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

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如你们有不同意见，请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至于说到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抱歉，我们以为，鉴于上述情况，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当然，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都是不利的。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0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1949年1月11日)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他们不能污蔑中共蓄意继续国内战争。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1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转交南京政府的备忘录原件

(1949年1月11日)

致毛泽东：

现转交南京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

“忠于爱好和平传统的中国人民一贯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国内和平。只有当他面临残酷侵略时，才会被迫采取自卫，因此，全中国人民奋起武装抗日。在中国人民与同盟国的紧密合作下，最终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胜利前夕，中国希望为全世界奠定和平的基础，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与同盟国一起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组建工作。因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维护和平，才能真正保证人类文明的继续和发展。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后来在马歇尔将军的帮助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可是最后由于双方观点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很遗憾，军事行动又恢复了。虽然和平的努力暂时受到了挫折，可是我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对和平失去希望。

在三年中，由于战争灾难在继续，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因此我政府无法实现在抗战期间考虑好的所有恢复和改造计划。如今，在人民受苦和生产下降的情况下，恢复和谈确实刻不容缓。当前世界，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和平和世界的稳定。

一个国家的内部不稳定未必只影响这个国家。因此，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避免由于中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而阻碍全世界和平的进步。

中华民国总统对此十分担忧。他在新年咨文中毫不犹豫地声明要恢复和谈。总统咨文公布之后，全国人民拍发了不计其数的电报支持咨文，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和平的真正愿望。苏联政府过去很友善地关心中国问题，多次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谨此向苏联政府声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并希望了解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上述愿望的观点。如果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将万分感谢。中国政府后来又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

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如能尽快做出答复，中国政府将感谢不尽。”

南京政府认为这个建议不宜公布。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1日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2日）

菲利波夫同志：

1月10日电收悉。

一、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二、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尽管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从而达到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

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因此，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殷切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三、关于是否允许南京政府人员，包括战犯在内，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还需斟酌一番。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与我们一道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这刚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而这样做却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也会使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遭到严重损害。

自1947年7月以来，我们一直细心地注意到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求进行谈判，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

令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种骗局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将迫使我们再一次做出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说不能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暂缓建立联合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使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打出他们所有的王牌，而我们则是在最后时刻才打出自己的王牌。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战犯名单，共计43人，是以非正式形式（权威人士声明）公布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出缉拿这些战犯的逮捕令。

1月1日，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议。对此我们同样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记者评论）作了回答。

总之，我们已为转折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何反应。

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四、感谢您就如此重大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若您不同意我的上述意见，或您对之有何修改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1949年1月12日

附录二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反对参加任何谈判

(1949年1月13日)

Φ.库兹涅佐夫同志：

这是答复的最重要内容。

毛泽东谈得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

现在国民党会同意一切条件，但是谈判还是无法进行。

关于莫斯科之行。

看来，如果毛泽东在近期，最早1月底前，不能成行的话，可能他就无法去莫斯科了。

师哲讲得直截了当。

捷列宾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抓住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

(1949年1月14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长电收悉。

一、倘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和平建议，倘若美国搞的这套和谈花招根本都不存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显然，这套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造成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它的存在是个事实，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予以重视。

二、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南京方面事实上并不想同中共和谈，与中共和谈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放弃其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基本政策，就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灭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其次，他们懂得，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其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

那么，南京方面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并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最起码他们的企图是要阻挠共产党将国民党军队彻底击垮。

这就是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核心。

三、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

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并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你们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你们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而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你们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无法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就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我们认为，对待忠诚的朋友采用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方式是恰当的，可是，如果与南京政府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回答可能是危险的。

是否可以采用另一种回答方式。这便是：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第二，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第三，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第四，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当立即停止。

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

但假定——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共产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呢？

第一，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要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会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四、以上便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及给你们的建议。或许我们在前电中没能把我们的建议完完全全地表述清楚。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五、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六、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4日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1月11日续电收悉，我感到十分欣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在其和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①

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43个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

二、因捷列宾同志的无线电台很忙，请您吩咐你们在沈阳的同志把我们的声明转交给您。

三、在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慌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人民大规模地要求国民党恢复和平，谴责国民党提出的条件甚为苛刻。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匆忙出来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为什么必须掌握军队。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局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

1949年1月14日

^① 毛泽东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编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1949年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刚收到了您发来的简短电报，知悉我们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就是说，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5日

附录四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
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及正式答复
(1949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呈上中国政府关于调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请审阅。

莫洛托夫（签名）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附件一：

给中国政府复函草案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希望苏联政府调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中国政府也向法国、英国、美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苏联政府看过中国政府的呼吁书以后认为，有必要在此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____^①的。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____^②的国家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实现统一而不受外国干涉。^③

① 斯大林在空白处手写加上了“适宜的”。——原注

② 空白处原来的词被删去，斯大林手写加上了“爱好和平”。——原注

③ 在此处有斯大林手写的补充：“通过双方直接谈判，通过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原注

附件二：

苏联给中国政府请求的复函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呼吁苏联政府参加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和谈的调停。中国政府同时也通知，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详细地研究了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后，认为有必要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适宜的。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通过自己内部的努力，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手写批注：

批准。

B. M. 莫洛托夫

1月17日

附件三：

英国和美国拒绝调停中国内政

南京，1月16日（塔斯社）。据报刊报道，中国政府向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政府呼吁，请求它们参加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和谈。最新消息，英国、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调停请求。

手写批注：

送报刊、电台（今天）。

B. M. 莫洛托夫

西柏坡行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年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您1月14、15日拍发的两份电报均已收到。
2. 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
3. 我们非常欢迎您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

石家庄是他到达的最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隐蔽，由此可直接到达我党中央驻地。在那里可以就一系列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5位同志进行交谈。

石家庄到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尚未恢复，石家庄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至少需要20天。有许多民主党派代表住在沈阳，如果途经沈阳的话，势必不能做到保密。因此你们的同志乘飞机来石家庄比较容易保密。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最好让他在1月底或2月初来。

毛泽东

1949年1月17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 10 天内抵达
(1949 年 1 月 23 日)

绝 密

毛泽东：

在我们的电报中提到，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 10 天内抵达你们那里。他将抵达您在自己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个城市。

你们在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派送。

斯大林

1949 年 1 月 23 日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
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代表是米高扬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于今天即28日抵达大连。他的姓氏是米高扬，党内代号是安德烈耶夫。他的姓氏需要保密。

斯大林
1949年1月28日



斯大林与米高扬（左）在一起



米高扬会见中共领导人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斯大林同志：

特别请求你们的代表于2月2日至5日抵达石家庄。这样较为妥当，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

毛泽东

1949年1月28日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
转告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经在路上了，并将于1月29日或者30日抵达他们那里。

斯大林

1949年1月28日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急 电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指定的时间，你们的代表即在1月29日或30日到来。

关于民主人士的访问计划，我们可以另行安排。

中央书记处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迎接他。

毛泽东

1949年1月28日17时

附录四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斯大林：

抵达石家庄

今天，1月30日，一大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机场着陆了。机场是带水泥跑道、日军样式的。飞机马上就向远东地区返航了。

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主任任弼时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迎接了我们。

同毛泽东的会面

在乡间土道上颠簸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

毛泽东在询问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健康之后，把政治局委员叫到了自己这里，向我介绍了他们。他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

除了毛泽东，书记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

此外，在吃饭期间和饭后进行了会谈。关于会谈的内容另行告知^①。

米高扬

1949年1月30日

① 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共历史、军队状况、对外政策等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将会谈内容及时电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 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年2月2日)

绝 密
急 电

米高扬：

现把我们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转告给你，并把对其他问题的答复推迟到你返回莫斯科之后。请让毛泽东知晓我们的答复。

第一，在对各种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在对中国同志的看法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组建政府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这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

第二，中国同志通报说，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是比南京更适合的首都，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当然，从战略上来说，相比南京，北平是更适合的首都。如果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较适合的话，那么就应把北平作为首都。若干年后，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把罗申^①派往广州是为了进行侦察，以便他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关于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

① H.罗申，苏联原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10月开始为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本书制作者注

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一些次要的人员派往了广州，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局势原本就是了解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大使派往广州，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大使派往中共的地区，当然，是作为自己的情报人员派去的。我们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四，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

如果能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对苏联机构的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建议就好了。

第五，关于其他问题在米高扬返回莫斯科后进行答复。

斯大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应努力尽快夺取大城市

(1949年2月3日)

绝 密
急 电

米高扬：

请把这封电报的内容转告毛泽东。

第一，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同志获得了大多数农民和大学学生的**支持**，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少同大工业中心打交道。

无论如何都应消除这种不足。大城市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不仅不需要害怕大城市，而且相反，应努力尽快夺取它们，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堡垒。工业化是中国独立的基础，而如果没有掌握大城市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

根据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若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并对其进行领导。需要在工厂、铁路组建工人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需要打开门户，接受劳动知识分子中可靠的工人和职员加入共产党。需要不通过罢工或者借助罢工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对工人的生病、伤残和年迈进行保障。工会领导人应是经受考验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抛弃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些人，并将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工会应当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你们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制定劳动法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无论怎样都应获得工农青年的支持，掌握妇女解放运动。在青年工作方面可以建立类似“青年爱国者联盟”的组织，在妇女运动方面可以组建“妇女民族联盟”这样的组织。

第三，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

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9/10的干部或者都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需要把更多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把青年军官送往学校或者送往对工业、农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大城市等进行管理的特别的学习班进行学习。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学校，需要尽快建立。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当然，最初的时候俄国专家会帮助你们管理好国家。但俄国专家只是沧海一粟。你们需要千千万万中国自己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管理国家。你们赢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干部，你们无疑会失去中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一些人到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类专业。

第四，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我们会尽量帮助。三硝基甲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斯大林

1949年2月3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国民党正在偷运国有黄金和贵重物品

(1949年2月3日)^①

绝 密

米高扬：

提请毛泽东注意如下问题：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南京方面正在把银行和其他机构中的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各撤离区和城市运往南方。最好对南京方面提出一项谈判条件，无条件返还所有这些贵重物品，把其转交给人民解放民主政权。^②

斯大林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者注

② 原文如此。——编者注

附录五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急 电

斯大林同志：

2月4日晚上结束了同毛泽东就所有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些信息将另外发送给您。对中国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您转交给我的答复可以不经过我通报给他们。2月5日之后，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他没有给我们新的委托的话。

我打算在5日离开这里，应毛泽东的请求推迟了一天。

如果对我们没有新的指示的话，我在2月6日拂晓前到达大连。

米高扬
2月4日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
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

(1949年2月4日)^①

绝 密

米高扬：

如果局势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并留在毛泽东那里，至少等到2月8日。

斯大林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者注

助建政府

附录一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急 电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向您通报，感到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各部的基础。这里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它们今后会被保留下来。

尽管组建政府的期限现在有所推迟，但目前中共方面必须着手采取一些准备措施，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组建一些可以成为各部基础的机构。要让被联合的各党派面临已有这样的机构和准备好的各部骨干的事实，这是必需的。

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

在现有的军事委员会（与我们的国防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之下组建一些关于国家各领域工作的部或局。

这些部或局的领导人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应被任命为未来的部长，如果部长为其他党派的话，共产党人应为副部长。在一个月內从苏联派遣顾问为这些部门的组织提供帮助。这需要事先挑选一些共产党员，以对国家的工作进行领导，应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新工作，应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挑选可靠的干部，这不必都同其他党派进行协商。但如果在联合政府组建之后再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进行协商。各部应在北平组建。

是否要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请指示。

第76号电

米高扬

2月4日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
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1949年2月7日)

绝 密

米高扬：

对您的第76号电报的复电。

无疑，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斯大林
1949年2月7日

斯大林转达毛泽东 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已停止活动

(1949年2月16日)

受莫斯科的委托，请向毛泽东口头转达下列事项：

“苏联政府已向在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及满洲里的苏联领事馆发出了指示。

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建议您：

1. 在收到特殊指示以前，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看作与此无关的个人。

2. 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非正式关系的联系，必须在相关民主政权向您提出了请求或受外交部专门委托的情况下由领事或副领事处理。

3. 负责哈尔滨、天津和其他解放区苏联刊物出版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领事挑选。他们应该到当地的中国行政机构妥善地办理刊物的登记工作。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

4.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应该停止自己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在接受民主政权的要求时，必须与他们谈妥，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信息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并将收集到的中国政权机构有关信息转送到莫斯科。

5. 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正式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来自莫斯科的课题和有关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

议写些通讯报道。”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菲利波夫

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

(1949年4月19日)

绝 密

致科瓦廖夫^①：

与毛泽东会见时请转达下列事项：

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想把中国分割成南、中、北三部分，成立三个政府。同时，它支持华南国民党政府、华中国民党政府，看来也不反对支持华北民主政府，目的是让这些政府内讧，削弱中国，美国可以从中渔利。因此，如果你们想得到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应该只与那些拒绝支援国民党广东、南京集团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贷款和贸易条件中不给中国附加限制中国民主政府的民族主权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即可。

三、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问题，我们通知你们如下：与中国的易货贸易我们照常进行，不需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决议。至于贷

^① 科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驻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本书制作者注

款，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必须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而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反对给中国贷款，但需要有一个中国和苏联代表签订的贷款**协议**。没有这个文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无权同意贷款。如果你们不能派代表来莫斯科签订贷款**协议**，那么我们全权委派科瓦廖夫同志同中共中央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协议**草案，如双方同意，就由代表签约。这样以后我们就认为，贷款已经提供，你们既可获得设备，又可请到俄国专家。

菲利波夫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陈云电
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

(1949年4月26日)

绝 密

致科瓦廖夫：

沈阳，第43号

请转告陈云，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把它当作反帝的一股力量吸引过来，一起合作。因此我们建议你们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譬如说与香港或其他外国资本家的贸易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决定买什么货，卖什么货。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对建立新政府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1949年5月26日)

绝 密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下列事项：

第一，建立经济领导核心的思想我们认为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制订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结构草案，我们有几点看法：

(1) 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

(2) 海关和边防军保卫边境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海关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因此这件事应交给专门的部门主管。

(3) 中国的私人企业不能与外国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相提并论，应该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哪些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觉得，中共中央比我们更了解。

第二，中国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因此科瓦廖夫不应加入这一核心组织。是否让科瓦廖夫当中共中央的顾问？如果需要，可以同时兼任经济领导核心的顾问。

第三，我们至今还未收到中共中央需要为协助上海组织经济领导核心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苏联专家名单。我们请中共中央和科瓦廖夫同志一起制订一个名单后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派遣苏联专家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我们认力，苏联专家可以担任评审员，确定委派哪些中国同志到合适的岗位。

第四，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宣传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宣传安排在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中国民主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时较为合适。

第五，我们不反对中国民主人士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如果中共中央觉得合适，这个代表团甚至可以安排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

第六，我们建议不要再推迟中国民主政府成立的日期。现在中国已无政府。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中国没有政府，从对内政策观点来看是很危险的，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也是很危险的。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

第七，人民解放军成就辉煌，我们为之感到高兴。我们认为，战役并没有结束。英国、法国、美国不会不懂，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南中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我们建议：

(1) 不必急于认真准备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

(2) 从向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增加这些地区的兵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

(3) 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

第八，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同意他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第九，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出的意见。

第十，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通报。

文件两份，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

(1949年6月12日)

绝 密

兹报告：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将他的报告转交给您。

下面是报告的全文：

一、您5月26日通过科瓦廖夫转来的电报收到。

除了已经请科瓦廖夫同志转交给您的报告外，我再给您写一份正式报告。从今年3月19日和21日给您写了报告以后，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向您汇报，请给予指示。

二、关于建立政府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在今年8—9月份建立政府。一切筹备工作在8月中旬完成。8月中旬或下旬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政府。

筹备工作的内容如下：

1. 全国范围内有44个党派、社会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这些组织中将选出500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来宾。

2. 制订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和权力。

3. 编制协商会议一般政治纲领草案，并预先进行讨论。

4. 在事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协商会议的结构、组织基础和组成。由于长江以南区域的许多省份很快将归入我管辖地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和组织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广泛。因此，协商会议将代表中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民。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过去根据以夺取战争胜利为重点而制订的一般政治纲领应该重新审查，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制订。

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应该围绕解决这个任务进行研究。一切筹备工作将在8月中旬加紧完成。因此，协商会议可以在9月中旬或下旬召开。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时间是合适的。

各界人士希望这次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圆满。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

希望。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认为，会议应该在夺取广州和重庆之后召开，现今他们不再坚持了。

三、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年冬季占领广州、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青海、宁夏等城市和地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大国可能采取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 尽快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残余。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中国大陆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将难以或无法实现经济封锁和干涉。

2. 建立沿海地区的防卫。

3. 做好经济自助的工作，摆脱一切可能的经济封锁。

.....^①

十、目前我们不但不能削减军队的人数，相反，由于在新解放的省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建立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的人数要达到 150 万。

因此，如果加上直属中央的部队和北方老区地方部队 215 万人以及常规部队 150 万人（包括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我军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 500 万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缩减部队的数量。到那时，中国有 300 万人的部队（包括常规军和地方卫戍部队）就够了。

目前我们要缩减的不是部队，而是军事工业。

在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我们拥有 160 个军工厂，有 10 万名工人和职员。

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来看，现在不需要生产武器和弹药。我们野战军打仗完全可以依靠战利品和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军事工业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开始缩减军事工业，将军事工业转入生产民用产品。否则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对我们没有好处。

为了建立国家的永久国防，需要在经济总计划中考虑列入建立符合国防目的的新军事工业的适当规划。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专家们的帮助。

十一、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

这样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于正式办理贷款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合同手续，同时将促使苏联专家们能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

① 有关军事态势的介绍部分略。——本书制作者注

政府将在8月成立，而民主人士要和我们一起在6—7月份召开协商会议，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十分紧张）。因此，赴苏事宜只得推迟，到政府成立之后再行。此事我们还没有与他们交换过意见。

十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未来的中国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不宜庞大，要灵活，应该适合中国国情。

十三，关于我们需要的苏联专家人数及其专业清单，我们6月9日已通过电报给您寄去。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49年6月11日

给斯大林同志，第55420号密码电报

1949年6月14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

(1949年6月18日)

绝 密

请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您的关于组织政府和进一步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战役计划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认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干涉和封锁已经排除，因此我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好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坏的一面，以保证自己能对付偶然事件，不致措手不及。

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新疆石油蕴藏量丰富，还有棉花。缺少石油，您会感到寸步难行。如果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到新疆开展工作，过2—3年后就可以有自己的石油了。

可以从石油开采和加工区铺设一条输油管到锦州站^①，再从锦州通过水路或铁路将石油输送到全国各地。因此，占领新疆事不宜迟。派一个军就可以解决了。对马步芳的兵力，您估计得过高了一些。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并没有那样强大。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① 原文如此。——编者注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

(1949年6月27日)

莫斯科，1949年7月28日

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爾斯基（即师哲，翻译）和И. В. 科瓦廖夫。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①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

①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和正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加的。——原注

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提高。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民主国家不同。东欧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①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

① 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编者注

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和制度。我们想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他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

是骑兵，在有火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 40 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同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①。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他们关于

①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原注

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的请求。同意再过三四天开会，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①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去各种值得参观的企业。

中国同志表示，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①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编者注

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的批注

中共建国的大政方针

(1949年7月4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1949年5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2.75亿^①，占全国总人口的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2000个县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9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

①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画，下同。——原注

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还有空军 7 500 人，海军 7 700 人。

[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①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新疆向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

① 方括号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原注

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将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①

①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 134 人，其中党员 43 人，肯定跟随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 48 人。中间人士 43 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 12 人，在进步人士中有 15 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 21 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包括党派 14 个。代表 142 人，地区代表 102 人，军队代表 60 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 206 人，总共 45 个组织，510 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3/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4 / 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

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还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

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今年2月安德烈耶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建议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①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不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10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

①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万人，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有没有买办集团？]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向我们靠拢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德烈耶夫同志今年2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改装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 四、用许多方法接近中国共产党，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

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一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对。]^①

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6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英国占有一半资本

①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们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将来在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构。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①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12/对。】^②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

①、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各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12万人，其中上海有65 000多人，东北有54 000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13/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14/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15/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①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16/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②【好。】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双重竖线。——原注

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而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 / 我们来帮助进行。]^①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通过与它们的直接谈判。]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很少，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同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20/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之间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的相互理解。【22/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23/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予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24/还有白银呢？】^①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①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含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编者注

附录三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

(1949年7月6日)

联共（布）中央

И.В.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的战争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它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国际局势的指导性材料。^①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一）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二）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①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们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四）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①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 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 1—2 个工厂、1—2 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 1—2 所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 1 000 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①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 3—4 个月。^②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增长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遣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有关建立苏中之间的邮政、电报联系，^③苏中之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开辟自苏联经哈尔

①、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③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画的，下同。——原注

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①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 80 万—100 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

（二）关于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为了促进大连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大连的工业。

（三）关于开放大连港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②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我们能否利用大连港进出口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大连港？

（四）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 7 500 万日元，而朝鲜为 5 000 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帮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报纸、杂志和发行书籍等方面的工作。^③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①、②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③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

(1949年9月12日)

密码电报，第3715号

绝 密

请通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除一吨奎宁寄往北平外，已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发送990公斤疟涤平、66公斤抗疟素和500瓶新肿凡纳明。

文件共4份，送：斯大林（2份），莫洛托夫、巴林科夫各1份
第5699号

附录四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

(1949年9月19日)

绝 密

文本第7份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机关：

指挥人员 15 人

顾问 4 人

服务人员 6 人

翻译 3 人

共计 28 人

(2)空军（6个空军学校）：

指挥人员 42 人

教官 96 人

飞行员—教官 84 人

军官—教官 238 人

准尉、中士—教官 278 人

翻译 42 人

共计 780 人

(3)海军（1个海军学校）：

指挥人员 5 人

教官 75 人

翻译 6 人

共计 86 人

(4)炮兵：

指挥人员 1 人

军官—教官 20 人

共计 21 人

2. 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 1949 年 8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第 3424-1425cc 号决议。

3. 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根据附件一的标准免费向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发放军服和民用服装。

4.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生活费以及他们的着装费、往返中国的费用均由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

5.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

(1)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

Rx18 型教练机 68 架

1x - 11 和 YTB -2 改进型飞机 84 架

YTVI、Jla -9、YTY -2 型战斗教练机 84 架

Jla -9 和 Ty -2 型战斗机 84 架

Bx - 12 型通信机 12 架

Jla -2 型运输机 2 架

共计 334 架

(2)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

85 毫米 120 门

37 毫米 240 门

共计 360 门

(3)高射炮用炮弹，每门 3 箱弹药基数。

(4)7.9 毫米高射机枪 360 挺，100 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6. 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发放飞机、高射炮、机枪时随时各附一套使用说明书。

7. 委托科瓦廖夫同志告知毛泽东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军事专家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送武器装备事宜，责成科瓦廖夫就地商谈：

(1)根据 1949 年 8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第 3424-1425cc 号决议中的一些条款说明，有关派往中国工作的军事专家的工资支付方式问题以及非军人专家的工资问题；

(2)关于发放的武器装备支付问题，可用实物向苏联结算，也可用自由流通货币或黄金结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

8. 根据附件二批准对派往中国的苏联将军、军官和其他军人的指令。

出版毛著

附录一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
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日)

绝密（严禁复印）

致菲利波夫：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第525号

斯大林致中共中央电
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2日)

绝密（严禁复印）

致捷列宾

第525号复电：

请转告中共中央如下内容：

“已收到你们提出的关于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请求。

我们在收到你们经作者校对的新版本之后，再着手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共3份，发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①、莫洛托夫同志
发送人普雷夫金娜，第3387号

① 需发送斯大林两份，故名字重复一遍。——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①

您的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1949年12月16日）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① 见本卷第129—130页。——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二 毛泽东、尤金致斯大林电：
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情况
(1950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4日16时25分收到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①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1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两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作报告。这约需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4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1月底或2月底。

可否，请复。

毛泽东”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个3卷的《毛泽东选集》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已详细地研究了 my 建议，并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目前正由毛泽东审订。已转告我：他将于近日内约见我，以研究我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我以前报告过的，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约有30—40个印刷页码。

① П.Ф.尤金，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家。——本书制作者注

对于由翻译译出的 300 多页新的译文，我已收到了（约有一半为新的文章），也研究过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给文章的作者。翻译要将余下的文章译出，约需用 1 个半月的时间。

毛泽东多次请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走一走，并请我给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为翻译正在译那些新的文章。这次到这些城市旅行，约需用 2 至 3 周的时间。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 2 至 3 周的时间即可完成对余下文章的审订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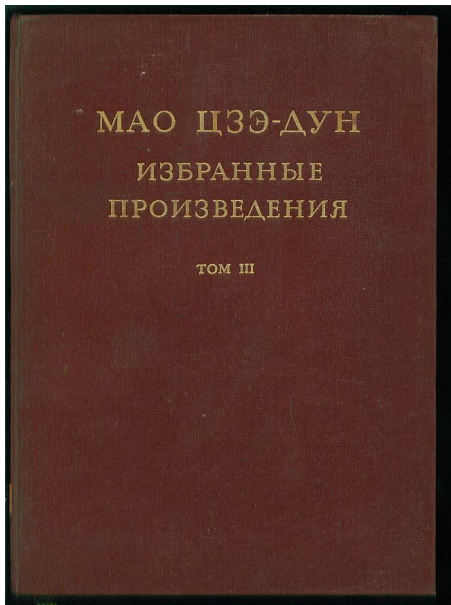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到 12 月底，我根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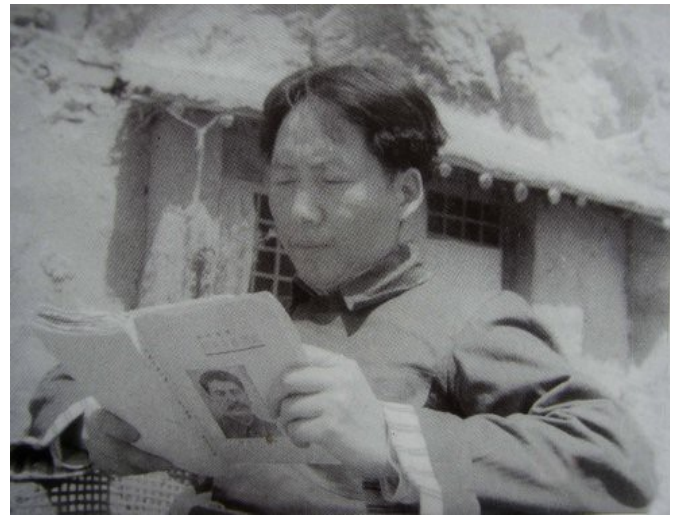
H.罗申

1950 年 10 月 4 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 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格里戈良同志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毛泽东阅读斯大林著作



П.Ф.尤金



Н.Т.费德林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
（1950年12月10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32项 关于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的问题。

责成《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在下一期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1937年7月）。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派遣尤金再次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30 日

第 368 项 关于派遣 П. Ф. 尤金同志去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 П. Ф. 尤金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 3 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如下电文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尤金同志将于今年 7 月中旬前往北京，为期 3 个月。

菲利波夫”

收到请回复，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

（1951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30 日

第 655 项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
批准所提交的预备给尤金同志发出的电报内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苏联大使转尤金同志：

同意关于在得到作者的同意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的建议。

维辛斯基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费德林兼职“毛选”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5 日

第 705 项 关于费德林^①同志的问题。

批准所提交的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复电草案。中共中央曾在来电中
请求苏联派费德林同志参加毛泽东同志选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苏联大使

第 1567 号电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

“中共中央：

你们在今年 9 月 20 日的电报收悉。

兹作如下答复：我们不能派遣费德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著作出版委员会工

① H.T.费德林，苏联外交家、汉学家，曾任驻华首席专家。——本书制作者注

作。费德林同志可以继续在大使馆工作的同时兼职这一工作。

联共（布）中央”

1951年10月5日

收到请回复。

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中共建国

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周恩来电
苏联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确认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年10月1日的公告和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议。

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与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关系的、深信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代表者的苏联政府向您通报：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建立苏中关系和互换大使的决定。

受苏联政府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A.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苏联政府声明

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鉴于中国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广东的阎锡山先生政府^①不再执掌全国的政权，而沦为广东省的政府，丧失了代表中国与外国实现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和外国的外交关系的终止。

苏联政府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东的外交关系已经结束，决定召回广东的外交使节。

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① 指1949年4月从南京搬到广东的所谓国民政府，阎锡山任行政院长。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①电
同意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优先拍发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拜会外务相或副相并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至于建交时间的问题，莫斯科认为越快越好。

电告执行情况。

第463号

菲利波夫

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

① 什特科夫，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

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越好

(1949年10月11日)

斯大林 1949年10月11日通知科瓦廖夫^①：

在关于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问题上，高岗同志是错误的，而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无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如此简单，我甚至感到惊讶：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关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必须重视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上，高岗同志也是错误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无疑是正确的。

请向高岗说明这一切，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请向刘少奇和其他同志说明这些。总之，应该说，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

^① 收集到的该文件为打印草稿，文本中有一些删节之处。——编者注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

（1949年10月14日）

第393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问题。

1. 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 A.A.伊万诺夫和 П.С.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

2. 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

“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安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

菲利波夫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帮助

（1950年11月6日）

第440项 中国问题。

1. 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B. И. 库列绍夫和 A. И. 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携必要技术设备）；边境部门工作人员 Д. А. 阿尔杰费耶娃同志和警察机关工作人员 З. А. 法季扬诺夫同志，以援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2. 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如下电报草案：

致毛泽东同志：

应您关于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边防工作人员和警务工作者的请求，兹派遣两名携必要技术设备之电台专家，以及一位边防事务工作人员和一位警务工作人员前往你们那里。

所有这些人将于近日抵京。

菲利波夫

缔结盟约

附录一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摘自 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1号

绝 密

今年11月10日下午5时，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动来大使馆拜会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受毛泽东委托谈了以下情况，并要求转告苏联政府：

一、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今年夏季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赴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想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刚进北京，还没有组建政府，面临大量的组织工作，若毛泽东不在就无法进行，因此毛泽东留在了北京。此外，刘少奇之行带有非正式性质，是以高岗的东北代表团作掩护的。

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想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科瓦廖夫在今年11月5日的谈话中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态度。毛泽东在会见科瓦廖夫时，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了他想于今年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以便亲自向斯大林同志祝寿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这一天，全世界对苏友好国家的代表团都将到莫斯科，因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

1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莫斯科发了类似内容的电报。

今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拜会大使，将毛泽东想拜会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大使，并请大使将此事转告莫斯科。

我问，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属什么性质，中国政府人士中谁陪同他。周恩来回答说，访问时除了与斯大林同志建立个人友好接触外，看来毛泽东同志还想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没有人和毛泽东一起去莫斯科，如果毛泽东同

志访问时要制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立即坐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一条约。

接着周恩来问大使，大使是否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使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去做。

.....

使馆参赞 C.И. 齐赫文斯基同志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关于苏中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保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5—10年，而且可能20—25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 and 英国同

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

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正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援助将有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

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斯大林同志：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和教官，我们随时都有。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登陆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陆战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选一个连的陆战队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将来派往台湾，并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否会越过边境。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并以此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政策。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采用广东省与香港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

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人员和谍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矿物开采。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先建兰州以西至成都的输油管，然后再由水路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金属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服务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

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 1950 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费德林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东北、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

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5年缩短到3—4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1950年1月1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①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东北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东北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

^①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共和苏共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编者注

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东北呢？

周恩来：对东北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东北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东北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 10 000 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卡尔斯基）。

附录二 联共（布）中央决议：
《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草案
（1950年1月22日）

斯大林同志：

现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草案呈上，请予审批。

- 一、《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二、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
- 三、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 四、代替1949年7月30日协定的苏中贷款协定；
- 五、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
- 六、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议定书；
- 七、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 八、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
- 九、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
- 十、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
- 十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东北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
- 十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

上述草案已同有关各部协商。

已决定将上述第1、2、3项文件拟公布于众。涉及中长铁路的问题，除应公布的议定书外，不应公布的协定也将签字，其中将明确几个实际问题（恢复双方共同管理铁路的期限等）。相应文件的草案将由委员会进一步提出。

上述列举的其他一些文件的文稿或者内容的公布问题要进行专门审核。

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B.莫洛托夫

A.米高扬

A.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2日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附件一：^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① 目前收集到的只有前三个附件。——编者注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原则，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 30 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 年 1 月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附件二：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期内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并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以及苏联政府表示的意愿，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重新审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

二、目前处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将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的 2—3 年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从 1950 年开始。

三、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 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

附件三：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分别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同意下

列事项：

一、重申 1945 年 8 月 14 日于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所规定的有效期。同时，根据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 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

附录三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方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份文件是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于1月24日23时递交给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的。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我们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译自中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这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同上述国家发生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不经互相 商不单独或同其他国家一起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 5 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翻译：克鲁季科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

附录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的草案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障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__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祝贺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



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画家笔下的签约场面

附录五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
（1950年2月1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15日

第9项 关于外交部的课题。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9项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

1950年2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如下礼物：
向毛泽东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毛泽东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向周恩来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周恩来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赠给陈伯达教授一套采用斑岩制作的书写用具；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刘亚楼将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政治秘书师哲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外交部秘书处处长赖亚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重工业部技术顾问沈鸿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贸易部技术顾问肖荣泉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旅大市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局局长柴树藩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电业管理局局长程明升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鞍山钢铁工业公司副经理王勋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煤炭局计划处处长罗伟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陈燕清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毛泽东的副官汪东兴少将^①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叶子龙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周恩来的私人秘书何谦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翻译马列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译电员陈江新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速记员陈邦臣大衣料子和西服料子各一块；
赠给警卫人员李家珍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厨师耿树宾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阿济佐夫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邓力群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军队的政工干部马寒冰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农业银行行长胡萨因·穆拉托夫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翻译陈锡华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作为对苏联部长会议预算的增补，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拨出用于支付本决议列举的那些礼品所必需的款项。

3. 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于 1950 年 3 月向苏联外交部拨出本决议第一条中指明的车辆，以便把这些车辆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① 原文如此。——译注

友好往来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
关于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3日)

绝 密

拜会刘少奇同志并转交下列回信：

“刘少奇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者代表团可以于2月份来莫斯科。有关代表团在苏联的费用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承担。

菲利波夫”

请证实已收到。

请电报告知已执行。

维辛斯基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同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会议决议 同意中国党务工作者代表团访苏

（1950年2月4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2月4日

第402项 关于中国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苏联的问题。

1. 满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允许由4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来苏联访问，期限为3个月，以研究联共（布）在党务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2. 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杰多夫同志（党务、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和波波夫同志（宣传鼓动部），制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进行审批。

3. 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和杰多夫同志，负责完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

4. 委托联共（布）中央办公厅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的接待和服务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В. 斯大林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
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
(1950年4月8日)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为北京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教授和教师的信件我已收到。今年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 42 名教授和教师，关于挑选这些教授和教师的指示已经下达。我希望，挑选的大部分教师最近能够到达中国。我认为可以把菲利波夫^①教授派往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4月8日

^① 是一位已在中国的本名菲利波夫的苏联教授。——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

(1950年5月3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毛泽东下述事项：

“致毛泽东同志：

一、您有关空军器材、海军器材和顾问的申请单已收到。王稼祥应已告知您，这些申请单将尽快落实。

二、在与罗申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刘少奇提出，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有些人中国已经不需要了。请将这些专家的名字告知，以便我们能尽快将他们召回。

三、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

四、王稼祥转来您寄来的有关印度问题的材料。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印度的同志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认为，此后不必专门发表批驳这些同志的文章。需要的只是观察他们是否确实在自己的政策中实现了明显的转变。

向朋友们致敬

5月3日 菲利波夫”

又及：

罗申同志，请您将本电第二项内容转告阿尔希波夫。

菲利波夫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准许苏联电影用汉语等多种语言配音

（1950年5月23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23日

第221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准许苏联电影部：

1. 制作电影《必遭灭亡者的阴谋》用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汉语、朝鲜语和德语配音的译制拷贝；

2. 确保工作的高质量，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中国、朝鲜和德国的电影制片厂里制作电影的配制拷贝。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接受中国青年团工作人员来苏学习

（1950年11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0年11月
13日至1951年1月11日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1月13日

第3项 关于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到中央共青团学校参加学习班的问题。

1. 满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冯文彬同志的请求，允许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共青团学校举办的为期9个月的学习班。

2. 与培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支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录 联共（布）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
（1950年11月22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81项 关于派H. C. 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 X. 瓦西连科同志到中国出差的问题。

1. 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管理局（叶戈罗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格里戈良同志）的建议，派苏联教授H. C. 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 X. 瓦西连科同志前往中国，作为医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限为一年。

2.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122c号决议的规定，确定到中国工作的苏联教授H. C. 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 X. 瓦西连科同志的物质保障。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
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
(1951年1月9日)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提出的请求，为了做好《人民中国》杂志的工作，将派遣一名编辑和一名校对人员。所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将在近期通告。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9日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

（1951年3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14 日会议第 80 号记录
1951 年 3 月 14 日

第 489 项 关于杨晓云^①、容洪和黄一中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工作。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的提议，并批准杨晓云、容洪和黄一中从中国到苏联来担任委员会汉语编辑部的播音员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① 俄文译名略，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五一节活动

（1951年3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3 月 24 日

第 68 项 关于邀请国外对苏友好和文化协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的关于邀请外国代表团于今年 4—5 月来苏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和了解苏联的成就：

……（2）由 20—25 个人组成的中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团，期限为 3 个星期。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延长部分苏联人员在华工作期限

（1951年3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第 90 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罗申同志关于 22 名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自 1951 年 4 月 1 日延期 1 年以及 20 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延长 4 个月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444. 请通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将 22 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工作的苏联工作人员以及 20 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自 1951 年 4 月 1 日起，延长其期限分别为 1 年和 4 个月。苏联政府还同意在大连出差的苏联某些工作人员继续逗留一个月，以便向中国专家交代工作。

请通报周恩来，苏联工作人员拉琴科无法继续留下工作，因为一系列原因他应该返回祖国。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

（1951年4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
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18日

第239项 关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事宜。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并准许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邀请由5个人组成的、开完国际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大会就要返回中国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于今年4月到莫斯科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以便按照所提出的名单了解苏联的科学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工作情况。

2. 委托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有关的支出预算，并为此而拨给必要的经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给中国学者代表团参观的机关、组织和企业的名单

1. 苏联科学院。
2. 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
3. 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

4. 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
5. 苏联林业部。
6. 苏联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
7. 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护林造林总局。
8. 莫斯科“橡胶”工厂。
9. 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高楼大厦建筑。
10. 莫斯科斯大林铁路运输工程学院。
11. 莫斯科一喀山火车站运输分站。
12. 莫斯科博罗季诺桥的改建工程。
13. 莫斯科林业技术学院。
14. 莫斯科第三家具厂。
15. 莫斯科第一医学院。
16. 苏联卫生部的莫斯科“盐酸阿的平”工厂。

此外，代表团将参观列宁墓、博物馆，展览会、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还将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五一”大检阅和大游行。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

（1951年5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8 日

第 371 项 关于在苏联发行《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的问题。（1951 年 5 月 4 日会议第 562 号记录第 165 项决议）

1. 接受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如下建议：

(1) 关于在苏联发行中国用俄语出版的半月刊杂志《人民中国》和月刊画报《人民画报》；

(2) 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与中国相关组织签署合同，其内容是向苏联发送中国采用俄语出版的《人民中国》，数量为 2.5 万—3 万册，《人民画报》，数量为 4 万—5 万册。

2. 委托苏联通讯部（普苏尔采夫同志），通过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按照登记在苏联零售《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3.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用飞机向苏联运送《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文艺演出

（1951年5月1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10 日

第 393 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会的问题。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 1951 年下半年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相关开支预算。

第 394 项 关于邀请中国艺术家访问苏联的问题。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 1951 年下半年邀请总人数为 100 人的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的一些城市进行为期 4 周的演出。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邀请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相关的开支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

（1951年5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16 日

第 443 项 关于在莫斯科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请求。

2. 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彼得鲁绍夫同志）于 1951 年 7 月至 8 月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业品展览会。

3. 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提交供苏联部长会议核准用的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期限

（1951年5月1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17 日

第 467 项 关于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对苏联访问的期限。

1. 满足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请求，并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关于要把上述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期延长到今年 7 月 10 日的提议。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和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因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延长在苏逗留期限而提出的追加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参加夏令营

（1951年5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26 日

第 70 项 关于邀请中国少先队工作人员来苏联的问题。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邀请由 23 个人组成的一队中国少先队员到苏联的“阿尔捷克”少先队夏令营来休息两个月和邀请由 20-25 个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先队工作人员代表团到苏联来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少先队组织工作经验的学习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准许部分中国学生回国度假

（1951年6月1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11 日

第 176 项 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关于准许在莫斯科的苏联学校里学习的 14 名学生和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一名职员——中国负责人员的孩子们到中国去度暑假的提议（附有名单）。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请求允许在 1951 年到中国度暑假的人员名单

1. 朱敏（齐英），1928 年生，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1941 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二年级学习。

2. 允斌·克里姆，1925 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的儿子。1939 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化学系五年级学习。

3. 陈保罗，1928年生，1941年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儿子。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

4. 陈梅利，1931年出生，1941年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

5. 克鲁普尼克·然娜，1930年出生在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工作人员乔伯臣同志的女儿（其母克鲁普尼克 Ф. Е. 是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的校对员）。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习。

6. 基巴利契科·莫尼亚，1930年生于苏联，И. Н. 基巴利契科（韩铁声，原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现在中国）的儿子。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水电系学生。

7. 涅维罗夫·弗拉基米尔，1926年生于莫斯科，民主人士沈志远（沈观澜）的儿子。列宁格勒工学院四年级学生。

8. 万南·莉莉，1928年生，1936年到苏联，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五年级学生（医疗系）。已经牺牲的中共干部李世超的女儿。

9. 师文·雅科夫，1929年生，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三年级学生。

10. 许琼谢，莉莉，1931年生，1934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习。

11. 普罗列塔里耶娃，1926年生于苏联，在莫斯科电力学院无线电广播系五年级学习。

12. 张芝明，1927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同志的儿子。1938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习。

13. 卡尔斯卡娅·泰霞，1934年生，第635中学9年级学生，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的女儿。

14. 卡尔斯基·伊戈尔，13岁，第170中学六年级学生，师哲的儿子。他母亲琴佐娃·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护照中写有他的名字。

15. 齐菲·弗拉基米尔，1928年生于上海，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编辑部工作。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电影放映设备

（1951年6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13 日

第 188 项 关于为中共中央划拨轻型汽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

1. 满足王稼祥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和苏联电影部（博尔沙科夫同志）在今年 6 月份按苏联外贸部的凭单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物资把 2 辆胜利牌轿车、1 辆莫斯科人牌轿车和 4 套 КПЦ 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运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要与全套备用零件一起运去。

2. 提供第一条中所指明的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的工作是按苏中贸易协定来进行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对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错误问题的处理

（1951年6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
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3日

第303项 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在中国发行苏联文学作品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1951年6月20日会议第571号记录第5-c项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和苏联驻华贸易代表处，在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苏国际图书协会擅自确定了1951年明显过多的中文版苏联图书的出口计划，并且没有经过苏联有关部门的同意，就委托自己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从中国的相关组织中获取了根据这个计划出版文学作品的订购单。苏联驻中国的副贸易代表A. B. 戈卢布科夫同志和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B. A. 格里舍尔同志，在与中国相关组织谈判时，毫不客气地向这些组织强行推销苏联文学作品，指责中国工作人员不了解中国居民对苏联图书的需求，强迫他们几次更改和扩大自己的订购计划。

除此之外，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人强行让中国相关组织订购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其数量达1130万册（76个品种），而没有考虑到，苏联出版局根本没有完成这个订购单的可能性。

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库兹明同志），忽视了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的这个恶劣的行为。不但如此，过高的不现实的在中国销售苏联图书的计划，还被该部机械地列入了外汇计划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由于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撤销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副主席 C. M. 安东诺夫的职务。

给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原主席 M. И. 杰奥米多夫同志、副主席 A. C. 谢米伊金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2. 给予驻华贸易代表 B. И. 米古诺夫同志警告处分，因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问题谈判时所犯的严重错误。

3. 给予负责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工作的苏联对外贸易副部长 M. P. 库兹明同志警告处分，因其忽视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所出现的严重错误。

4. 建议对外贸易部长缅希科夫同志：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副贸易代表 A. B. 戈卢布科夫同志以及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 B. A. 格里舍尔同志；

（2）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组织就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问题进行谈判，并改正在这项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在签署关于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协议书时，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组织将提交的计划为依据；

（3）加强全苏国际图书协会的专业干部队伍，调整其工作中应有的秩序，根除在境外发行苏联图书的具体工作中重犯错误的可能性。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

（1951 年 6 月 26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26 日

第 317 项 关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而出版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民主！》^①的问题。

接受《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编辑米京同志的建议：在该报今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的文章。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北京

中共中央：

苏共中央热烈欢迎和祝贺兄弟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袖——经受考验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在强大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推翻了反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摆脱了国外帝国主义者压迫。

中国人民首次在历史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共

和国顺利地开展了农业改革，实现了农民数个世纪以来得到地主土地的梦想，开展了其他大规模的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改革，巩固了新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在和平战线上努力工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奴役中国的新的企图作斗争，坚定地捍卫国家的独立，为加强爱好和平的反帝阵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队伍，教育广大党员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武装他们。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都取得成功，以建设一个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维护和平事业。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苏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① 此处应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者注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在华期限

（1951年6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28 日

第 331 项 关于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逗留期限的决定。

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决定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的逗留期限至 1951 年 10 月 1 日。小组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M.E.叶夫斯特拉托夫、И.С.祖布里林、B.B.库什涅鲁克和 A.C.谢苗诺夫。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

（1951年8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 日

第 33 项 关于邀请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 20—25 个人组成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于今年 9 月份为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配置和苏联共青团在大学生中间的工作经验而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人来苏学习

(1951年8月4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收到了您关于派遣 375 名大学生前来学习，派 88 名工人到企业实习的电报。我们不反对你们提出的这些建议。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4日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

（1951年8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7 日

第 68 项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问题。

1. 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管理委员会（杰尼索夫同志），作为礼物，送给中苏友好协会 2 台带磁膜的磁带录音机和装备了流动电影放映机和无线电转播站的 5 辆大轿车。

2. 责成苏联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在今年的 8 月份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调拨出 5 台 Г 3 А-651 牌轿车，以转交给中苏友好协会。

3. 责成苏联贸易部（扎沃龙科夫同志），不用划拨结算的方式，而是通过贸易渠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 5 台“拉脱维亚”牌的带扬声器的无线电接收机。

4.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预算，并划拨出必要的资金用于为中苏友好协会购买礼物的支出。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1年8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13 日

第 103 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 5 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于 1951 年 8 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

（1951年8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14 日

第 122 项 关于在中国组建电影放映站。

1. 准许苏联电影部在北京组建电影放映站，电影站的工作人员由“苏联电影出口公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名代表组成，这三名代表不计入得到批准的“苏联电影出口公司”海外工作人员的人员编制内。

2. 委托苏联外交部就组建驻北京的电影放映站的问题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授予宋庆龄“巩固民族和平”国际奖

（1951年8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16 日

第 140 项 关于爱伦堡同志到中国出差。

采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斯科别利岑同志）的关于派遣委员会成员 И. Г. 爱伦堡同志于今年 9 月到中国出差一个月去授予中国社会活动家宋庆龄“斯大林‘巩固民族和平’国际奖”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杜绝在华专家在生活方面的多余开支

（1951年8月2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0 日

第 191 项 关于费德林、瓦日诺夫同志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的电报。

责成由维辛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缅什科夫和贡多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 3 天期限内就费德林和瓦日诺夫同志的电报向政治局提交建议，同时杜绝用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生活方面的任何多余的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消除在华专家滥用中方服务设施的现象

（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1 日

第 350 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根据现有的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滥用依靠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在 1950 年 3 月 27 日中苏协定中并没有规定，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派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И.Ф. 库尔久科夫同志，授命他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上述滥用现象。将所采取的措施上报中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用汉语配制两部苏联电影

（1951年8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3 日

第 217 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电影部的关于用汉语配制电影《顿涅茨矿工》和《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

（1951年8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8 日

第 272 项 关于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的问题。（1951 年 8 月 24 日会议第 585 号记录第 2 条）

1. 接受苏联电影文化部的建议（博利沙科夫同志）：

(1) 自 1951 年 10 月 1 日到 10 日期间，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邀请中国电影创作工作者代表团 10-12 人来苏联参加本次活动，期限是 3 周。

(2) 关于在电影展期间，展出如下中国影片：《中华儿女》、《光芒万丈》、《无形的战场》、《钢铁战士》、《白毛女》、《中国民族大团结》，苏中联合摄制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新北京》、《长江两岸》、《新上海》、《杭州——中华明珠》、《在华南》。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议并批准关于苏联电影部邀请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预算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年9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4 日

第 602 项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之际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

通过斯大林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之际所提出的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北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之际，请您，毛泽东同志，接受我友好的祝贺。

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本人在中国今后的人民民主建设中取得成就。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伟大的友谊在今后更加牢固！它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5 日

第 604 项 关于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

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共青团中央、苏联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关于今年 9—10 月间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赴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具体包括以下同志：Л.Н.索洛维约夫（代表团团长）、А.И.奥巴林、В.Г.雅科夫列夫、Д.Б.卡巴列夫斯基、П.А. 玛里宁娜、Р.Г.特洛菲缅科、И.С.佐捷拉娃和尤努索夫·萨比尔，访问期限为三个星期。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出差

（1951年9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9 日

第 646 项 关于在 1951 年派苏联专家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在 5 天期限内，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政治局提交详细的报告和就此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1年10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2 日

第 665 项 关于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采纳苏联作家协会邀请由 12—15 个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于今年 10 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和苏联作家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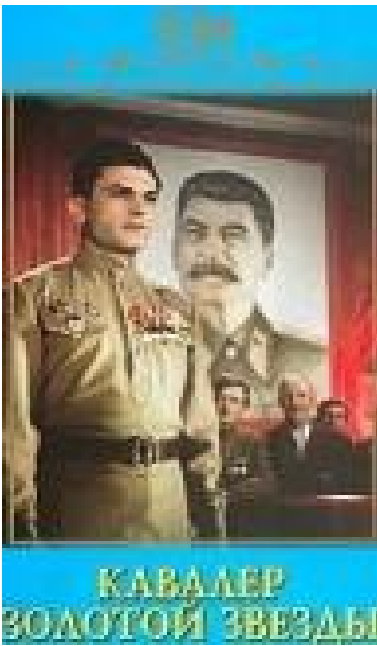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金星英雄》

（1951年10月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4 日

第 694 项 关于发行《金星英雄》汉语影片。
准许苏联电影部生产用汉语配制的电影《金星英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彩色影片《金星英雄》上演海报

中国观众争睹欣赏



#F调

在庫班的草原上

Н. 什維道夫作詞
T. 赫列尼阿夫作曲
孟廣鈞譯詞徐德配詞
國光編口琴譜

中庸速度 (蘇聯電影《金星英雄》插曲)

2/4 $\underline{1 \cdot 2 \ 3 \ 1} \mid \underline{6 \ 5} \mid \underline{4 \ 3 \ 2} \ \underline{5 \ 5} \mid 1 - \mid \underline{1 \cdot 2 \ 3 \ 1} \mid \underline{1 \ 7 \ 6} \mid$

(一) 庫班河的兩岸無邊的草原，行進在晌午的炎熱裏
(二) 姑娘們想知道好多的事情，我們非常和藹地
(三) 草原上面不久灌滿了活水，我們祖國的土地會
(四) 庫班河的兩岸無邊的草原，我們向前行進在

$\underline{3 \ 3} \ \underline{4 \ 2} \mid \underline{5 -} \mid \underline{3 \ 3 \ 5} \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 \ 2} \mid \underline{3 \ 6 \ 7} \ \underline{1 \ 7} \mid \underline{6 -} \mid$

我們歌唱；越過淺水灘走在祖國的草原，
回答他們；鶴羣在那天空自由的飛翔，
變得更美；黑夜裏的電燈照得像白天，
祖國土地上；我們大家一起愉快的勞動，

$\underline{2 \ 2 \ 4 \ 6} \mid \underline{6 \ 5 \ 1 \ 6} \mid \underline{5 \ 2} \mid \underline{1 -} \mid \underline{1 -} \mid \underline{1 -} \mid \underline{1 \ 0} \mid$

路上遇到了哥薩克的姑娘。
哥薩克的前途無限寬廣。
姑娘們隨着我們走遊玩。
從那小村出發去向遠方。

說明：如按原調女高音聲部唱不上去時，可酌情將整個歌曲移低唱。

影片插曲广为传唱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7 日

第 719 项 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批准所附给刘少奇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对第 1591 号特别电报的回复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交如下电报内容：

“刘少奇同志！

您的来电已收到，在电报中您通报了关于派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打算。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并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代表团成员了解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代表团到来之际，正是十月革命 34 周年的日子，由于农田工作已经结束，因此可以主要地向代表团介绍一下社会主义畜牧业和水利工作方面的问题。

如果代表团在 1952 年 4—5 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收到电报后请确认，并按电报要求执行。

维辛斯基

1951 年 10 月 7 日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参加五一节活动
(1952年3月2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 年
3 月 1—31 日会议第 86 号记录
1952 年 3 月 21 日

第 125 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 1952 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提议：邀请由 10—12 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 1952 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逗留期限为 3 周。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关于在新疆的苏联公民受到挑衅的问题

（1952年3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 年
3 月 1—31 日会议第 86 号记录
1952 年 3 月 31 日

第 190 项 外交部的的问题。

批准给驻华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向他通报，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处得到的消息，在地方当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盗窃斗争的运动之际，在伊宁地区有一些敌视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坏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个措施。这种现象反映在：在公开的集会上，他们向当地苏联公民中的某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公民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

有鉴于此，请询问一下：中国朋友是否认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防止各种反动分子利用伊宁地区进行集会的机会，从事针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曾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的当地苏联公民的活动。

请电告执行情况。

经济互助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
同意向中国提供多项援助

（1950年1月6日）

毛泽东同志：

1. 收到您送来的来自中国的电报，希望苏联提供各类商品。又收到关于新疆的电报以及您关于松花江水电站的信。所有这些问题正由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我深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2. 前几天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越南和胡志明同志的材料，他是能干的共产党人，专心致志领导自己的事业，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

此致

敬礼

斯大林

1950年1月6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①同志

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500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的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的汽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5辆汽车，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17日

^① M.B.扎哈罗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编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

(1950年12月3日)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9日要求供应甲板、油罐、设备和物资的信件我收到了。我们将满足您的请求。但是所有您请求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很难在第一季度供应。因为必须向我们的工厂额外要求订货，也需要一些时间改变以前下达的任务计划，对于你们请求的设备和物资的供应我们确定了如下期限：

1. 12 000吨轧钢将在1951年1、2、3月份提供，每月供应量相同；
 2. 10 000吨用于建设跨桥的物资在6月1日之前的5个月内供应；
 3. 300个50吨的铁路油罐、200个50吨的火车甲板、10台45吨蒸汽起重机以及10套仪器在1、2、3和4月份供应；
 4. 6座移动发电站以及80辆自卸卡车在1月份供应；
 5. 2个锅炉在1月份和2月份供应。
- 其余设备将在5月1日之前供应。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3日

斯大林致罗申电
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

(1951年5月26日)

特 电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同意您关于签署中方提出的关于确定卢布和元的汇率的协议草案的建议，协议草案规定自签署协议之日起，确定一卢布兑换 6754 元^①。在签署协议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如下保证：中方不允许歧视苏联的卢布，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5日^②

① 此为人民币旧币的币值，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本书制作者注

② 该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51年5月26日。——原注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代表处

（1951年5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5 月 30 日

第 103 项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批准所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机 密

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为了改进苏中股份公司——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50 年 3 月 27 日签署的协议而成立的新疆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加强对这些公司苏联方面的工作的领导，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在莫斯科市设立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

二、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

金属股份公司) 事务全权代表处, 负责这些股份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工作。根据公司的规定, 确保完成在新疆境内的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寻找和勘探工作, 并组织对这些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进行开采和加工。

鉴于已经成立了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事务全权代表处研究所, 决定取消石油工业部、冶金部和外交部的相关职能。

三、任命 Ф. С. 波波维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事务全权代表, 免除其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矿物监督管理总局的工作。

任命 Д. Т. 杰夏特尼科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作的副全权代表, Ф. А. 卡尔宾科同志为地质勘探工作的副全权代表。

四、责成 Ф. С. 波波维同志在一周期限内, 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关于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事务全权代表处的条例以及全权代表处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 以便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全权代表处机构的工作人员, 可以从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和苏联外交部负责新疆股份公司工作的人员中挑选。

五、责成石油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在一周期限内, 向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事务全权代表处划拨用于购买根据 1951 年上述所说的这些股份公司计划中规定的材料和设备的资金。

六、责成 Ф. С. 波波维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 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在 1951-1953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年度计划)。要着重强调加强这些股份公司在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和开采方面的工作以及采油场、石油加工厂和矿山企业的建设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方缩减中苏船舶公司经营期限的建议

（1951年6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2 日

第 132 项 关于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的问题。

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于把苏联方面提出的苏中股份公司“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30 年的经营期限，缩减为 25 年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苏方董事

（1951年8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5 日

第 246 项 关于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1. 批准下列人员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И. И. 基列耶夫——董事会成员兼任第一个三年中的董事会副主席；

A. C. 拉斯卡托夫——董事会成员。

2. 批准 H. A. 科斯坚科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的总经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关于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失误的问题

（1951年8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8 月 29 日

第 290 项 关于如何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失误的问题。

责成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两天期限内对在相关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做出总结报告，而布尔加宁同志务必事先对就该问题所再次制定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不足

（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1 日

第 340 项 关于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不足。

考虑到要交换意见，特委托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最终定稿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克服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缺点

（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6 日

第 395 项 关于克服中苏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缺点。
批准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以确保中苏民航股份公司正常地开展工作，没有向该公司提供作为苏方在该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技术投入的份额，也没有为该公司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干部，其结果使公司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这是不正确的。

二、为了消除上述缺点，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通过民航股份公司的苏方机关，采取措施以彻底改善公司的状况和工作，并达到如下目的：

1. 在今年的 11 月 1 日前，根据附件一的内容向公司提供苏方在公司股份

中所占有的资产；

2. 在今年的11月1日前，为公司的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专业干部，使其编制人员达到满额，并更换那些在其专业方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根据附件二），

3. 为沈阳—赤塔、兰州—阿拉木图航线政治处增设数名副主任。这些工作人员的薪资计在民航管理总局预算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人员津贴项下；

4. 采取措施使公司固定使用的办公和住宅建筑达到要求，并建设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乘客所需要的公共设施；

5. 派国际民航管理总局局长 Г.И.斯托利亚罗夫同志、机场事务工程师 Б.С.伊万诺夫同志、运营技术工程师 В.В.雷巴尔金同志及通讯和无线电导航工程师 В.Е.诺维科夫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2个月，以便在改进公司工作以及分配和使用拨给公司的技术器材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

三、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今年的12月1日前提交关于采取措施的结果的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

（1951年9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2 日

第 598 项 关于新疆的石油和矿场的航空摄影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和波波维同志审理该问题，并向政治局提交就此问题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7 日

第 723 项 周恩来同志今年 9 月 30 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

接受提交的：

（1）对周恩来同志今年 9 月 30 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的答复草案。

（2）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黑色轧钢的指示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一：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交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

您的 9 月 30 日关于提供 2 701 吨黑色金属轧材的电报已经收到。

将按电报中指明的规格，于 1951 年第四季度向你们提供 1 376 吨，1952 年

第一季度向你们提供 1 325 吨，结算方法：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协议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 年 10 月 7 日

附件二：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

1951 年 10 月__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责成冶金工业部按照附件的规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 2 701 吨黑色金属轧材，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 376 吨，其中 1 007 吨使用购买大型轧材的出口基金，369 吨使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

1952 年第一季度 1 325 吨利用出口基金购买。

对外贸易部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上述所说数量的轧材，费用计入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协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项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附录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绝密，禁止复印

急电、特电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在1953年在全国进行货币改革。由于没有能力在我国印制货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为我们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四种货币，印制的总数量为4.66亿张，用苏联的纸张印刷，并带水纹。

提供面值为5元和10元的货币的总数为450 000 000张，可以在1953年3—9月份提供，其余货币可以在1954年完成供应。

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将派出专员把货币的样品和关于该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带往莫斯科，以便解决问题。请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知我们。

周恩来

1952年1月22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年1月28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答复：

“周恩来同志，您在1月22日发送的电报我们收到了。我们同意按照您的请求，为中国印制货币。请通知我们，你们的代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以便在莫斯科就所有的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并完成这一任务。

菲利波夫

1952年1月28日”

执行情况请回电告知。

附录二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绝 密

(特别文件夹)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2 年 4 月 18 日第 1853-703cc 号决议，苏联财政部应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面值为 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的纸币，数量为 4.66 亿张。

面值为 5 元和 10 元的纸币应该准备妥当，并在 1953 年 3-9 月期间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面值的纸币在 1954 年 3 月提供。

国家货币印制厂根据中国人提供的图纸，已经准备好了面值为 5 元和 10 元的中国纸币的机器印刷样板，并且在 9 月份已经把上述纸币的样板都转交给了中国人，以便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伪造中国货币，国家货币印制厂采用了带水印和化学保护的特别的纸张；在印制中国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两面的印制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版印刷术、不能通过印刷途径模仿的组组饰线，还采用了特别的防伪措施：在规定的位罝印刷最小的符号、花纹线和图案线，它们的走向是连贯的，由黑到白，由白到黑。

根据中国代表的通报，国家货币印制厂提供的样币不能使中国人满意。今年 9 月 22 日，我接见了中国大使，他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请求说，在中国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纸币的印制还应采用苏联货币使用的其中的一项防伪措施（带黑白线的图案）。大使接着说，对样币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今后在中国印制面值为 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的中国货币，就必须把使用“黑白线图案防伪”印制货币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

考虑到中国人的请求，考虑到在苏联的货币上除了上述的防伪措施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靠的防伪措施（奥尔洛夫印制法、双重金属线、所谓的涅兹韦茨

基防伪法以及在钢网上的照相凹版印刷），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的货币上采用“黑白线图案”防伪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附后。

苏联财政部部长

A.Г.兹韦列夫

1952年9月25日

附录三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 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 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请转告周恩来，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苏联提供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请求我们已经进行了审议，这些请求将被满足。

苏方将提供 141.1 万吨的石油产品，这些产品将在 1952 年 3—5 月期间运往中国。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和氧气设备共计 1 万辆（件），这些设备将在 1952 年运出，每季度的供应量大致相当；关于这个问题，苏方将不提供 486 辆嘎斯-63 汽车和 844 辆吉斯-151 汽车，但将提供吉斯-5 和嘎斯-51 型汽车。

特制汽车将提供 258 辆，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 600 辆。不足的 342 辆特制汽车将另外提供嘎斯-51 和吉斯-5 型汽车作为弥补。

苏联贸易代表处有关于上述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详细说明，该贸易代表处被委托同中国进行接触，提供上述货物，并把其列入 1952 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议的结算中。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第二，1951年5月朱德在同费德林进行会谈时表示，应该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能够找到足够的中国人建设铁路，需要苏联政府提供的是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是钢轨、枕木、车厢以及其他的设备。如果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愿意铺设这条铁路。

第三，如果您同意上述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在莫斯科或者在北京进行谈判。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附录四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备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 年
3 月 1—31 日会议第 86 号记录
1952 年 3 月 22 日

第 145 项 关于准备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机关审议和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就该问题所提交的提案。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2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求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

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4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面能否

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4月2日)

密电，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

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第一部分）^①

关于援建中蒙铁路、军事工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并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斯大林感谢周恩来，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告知，近两年来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并说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斯大林指出，许久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1939年有150万党员，现已将近600万，尽管我们限制接纳党员，但党仍然在发展。

询问代表团旅行情况。

周恩来感谢关照，并回答说，旅途十分顺利，途中代表团得到了一切方便条件。他代表毛泽东为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事业和对敌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援助，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斯大林：不必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状况，难道中国同志不帮助我们吗？

^① 这是会谈记录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编入《斯大林全集·附卷（档案选编）》的“朝鲜战争”篇。——本书制作者注

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虽然给予援助是应当的，但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我们也应感谢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给我们提供橡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援助，我们也必须感谢中国。

周恩来说，遗憾的是，中国给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你们执政晚，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允许说明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提到毛泽东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的电报，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年的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并指出，正在准备书面报告。中国代表想在提交书面报告后汇报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延长旅顺口协定。

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

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并建议互换照会。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相应请求。

下一个问题是建设从乌兰巴托到蒙中边界的铁路。

斯大林问，中国对这条铁路是否感兴趣？

周恩来指出，新疆的铁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中国政府打算首先建设在蒙古方向出境苏联的铁路。在中国境内铁路长约350公里。预计在1955年6月以前完工。这条铁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打开沟通苏联的直达铁路线，便于从苏联向中国接运工业设备以及向苏联运输中国商品。

斯大林指出：新疆方向从长远目标看是极其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如果中国同志有意修建经过蒙古境内的铁路，那么我们准备从自己一侧援助蒙古境内的建设。这将更快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放弃新疆方向，因为这是一条穿过含油地区的极其重要的铁路。在中国境内肯定会有石油，而蒙古缺少石油。

周恩来指出：在平地泉^①地区有许多铁矿，而且这里将是炼铁和铸钢工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建设新疆铁路的设计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从兰州到哈密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从哈密到苏联边境的铁路。

斯大林赞同这样做，并再次强调新疆铁路对开采石油的长远意义。

周恩来肯定，这条线路上到处有石油。转入橡胶协议。

斯大林指出，原则上问题已经解决。

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转入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说，正在起草有关的书面报告，待整理好报告后，他想会见斯大林同志并亲自对报告做出说明。

斯大林同意这样办。

周恩来请求帮助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转入中国正在筹建的各种工业项目问题，并说他指的是151项工程。他指出，中国需要苏联的设备援助。请求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并且说明苏联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援助并规定期限以及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他强调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给了中国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帮助培养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斯大林：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国有了本国干部的时候，它将牢牢地站稳脚跟。

周恩来通知说，他们希望从苏联得到800名专家。

斯大林说，研究一下这项申请并尽我们所能予以派遣。

周恩来请求再帮助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斯大林说，没有资料当然不行。

周恩来询问，今后能否再派大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向苏联企业派遣

① 集宁旧称，1951年设平地泉镇，1956年改设集宁市。——编者注

实习生。

斯大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谈到国内五年计划的问题，通知说，正准备材料并将提交有关此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武器装备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说，现在是指提供武器装备。他指出，对60个师的事已经有了协议，他还想讨论海军供货问题。他问，在飞机方面能得到多少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不打算建设航空工厂吗？

周恩来说，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得到，特别是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

他指出，掌握飞机制造预计至少5年，而发动机制造要3年。

斯大林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例子，这两国先从装配厂开始。说苏联可向中国运送发动机和其他飞机部件，而中国可在本国进行飞机组装，借此培养干部。装配厂可以变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中国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条道路。先要建立一至二个发动机装配厂。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可在中国组装飞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是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安排，组建装配厂以后，经过3年，也就可以建立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简单、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说，他们已开始懂得这一点，正在组建修理和装配厂，并补充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

斯大林问，苏联向中国运去的供60个师的装备，已用来组建哪些师？

周恩来解释说：他们已经接到10个师的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已交给朝鲜人，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的中国部队。

斯大林问，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即全部装备将用在朝鲜前线。

周恩来确认。他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是这样。他告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 60 个师装备中的 3 个师交朝鲜人，42 个师准备用于朝鲜……

斯大林问，中国人使用新装备是否习惯。

周恩来解释说：正在逐步掌握这些新装备，要训练 3-4 个月。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熟悉新装备和师的编制。这大约需要近 6 个月的时间。否则，会对武器生疏。此外，利用这段时间检验各种仪器的性能，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把这些部队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在后方，在前线附近，例如在朝鲜，进行这种训练。必须把一半得到新装备的师留在中国。

周恩来指出，把一些师派到朝鲜去，是因为需要补充已有的损失。

斯大林强调，必须派出接受过训练的师，才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提出援助火炮的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能不能制造炮弹。

周恩来回答说，已经着手这件事。

斯大林指出，最困难的是运炮弹，运火炮要容易些。

周恩来再次提出援助火炮的请求。他强调说，中国人发射 1 发炮弹，美国人要回击 9 发。

斯大林：这不好。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人发射 9 发炮弹，中国人就应发射 20 发以上。我们就是用炮弹把德国人压下去的。我们每隔 2 米距离就有 1 门炮，而德国人在 2 公里距离上才有 1 门炮。炮兵可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帮助建立这类工厂。

周恩来指出他们正在改建现有一些工厂并筹建一些新厂。

斯大林：这件事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机床。

周恩来说他们有机床，不过是老机床。

斯大林说，需要有制造 122 毫米炮弹、3 英寸火炮和高炮的机床。

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忙。

他补充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炮弹的：有些厂造药筒，有的厂装药。集中在一个工厂做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谈到航空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将按苏联政府的建议行事，并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这项工业。

斯大林强调首先组建装配厂的重要性。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筹划建立坦克厂，即一个是年产 1 000 辆坦克的轻型坦克厂，另一个是中型坦克厂，计划建 4-5 年。

斯大林仍然建议先建装配厂。他指出，战争时期我们把汽车厂变成了坦克厂。说中国若是有一至两个汽车装配厂就太好了。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长春筹建一个年产 2 万辆汽车的厂，改建一个年产 3 000 辆车的装配厂，请求帮助再设计一个厂。

斯大林强调，应当在装配厂和修理厂培养干部。对这件事必须关心。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告知说，中国政府正在办这件事。他们有修理厂，现正在组建装配厂；明年这些厂就开始生产。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厂办徒工学校。还补充说，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这种学校。

周恩来承认，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在工厂有训练班。他们吸收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派党员参加。

斯大林指出我们有专门的部，即劳动后备部，有徒工学校。中国若采取某种同样办法就好了。我们每年从这类学校中培训近百万青工。

周恩来问我们有哪些培训中级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解释说，有中等专业学校。

周恩来说想讨论一下有关雷达的问题。

斯大林答应帮助这件事。无线电和雷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建设这方面专业的装配厂。

斯大林强调，以后必须建立雷达设备生产厂。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还不能制造雷达设备。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再次提出专家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不仅想请我们派专家，而且还打算组织培养本国专家。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指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等国也将请求中国政府派专家。又补充说，中国政府最好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工厂充实提高。

周恩来提出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问题。说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这时，周恩来指出，当然这对苏联是一个负担。

斯大林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执政得早，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中国同志执政得早，那么，我们势必也要请求弥补这类差额。

对此，周恩来指出，莫斯科是鼓舞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

斯大林提议现在就着手工作。告知说苏联方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任主席，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库梅金同志。中国代表团可以同莫洛托夫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周恩来感谢通知此事，并请斯大林同志指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形势。

斯大林表示同意，周恩来一准备好书面报告就接见他。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关于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等问题

(1952年9月3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梅金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相互问候后，双方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问题举行会谈。

斯大林：我们了解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规定年增长率为20%。给工业规定20%的年增长是否高了，或许应在20%里留有余地。

周恩来提醒说，他们对编制计划还经验不足。以往3年的经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预计从苏联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我们编制五年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不可能估计到所有因素。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计划中总是列入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里没有这一点。同时，对计划中规定的全部支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说明。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按各个项目需要提供多少。必须进行计算。在提交的材料里未包含这类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最后意见。为了计算并讲出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

通常我们起草五年计划至少需要1年时间。然后审查准备好的草

案还需要2个月，但还是总出差错。

我想，你们应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研究你们的计划，以便答复你们的问题。

其他问题进展怎样？旅顺口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是这样就要决定下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就讨论一下。

中长铁路移交公报草稿好像也没有不同意见了。

第三个问题是橡胶问题。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我们希望至少得到1.5万-2万吨橡胶。卖给我们的橡胶很少，英国控制着橡胶。请你们再考虑一下为我们采购所需数量的橡胶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解决，因为周恩来急着回国。

周恩来说，他很难在这里停留2个月。他想9月中旬返回中国。李富春可以留在这里。

斯大林：好的。

还剩一个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的问题。来过莫斯科的蒙古总理也同意这件事。

这就是说，要同周恩来解决的就剩下4项问题：旅顺口、中长铁路、橡胶和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

周恩来谈到橡胶问题时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一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但他们担心，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可能妨碍彻底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团顾虑，这会被视为违反对苏联的义务。

再次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但在未切实完成供货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说明原因，而且不把这种情况认为他们方面不履行承担的义务。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指出中方将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

成供货，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提供不了商定数量的橡胶，那么，我们只好减少卡车订货。

开玩笑地问，胡志明大经理不能帮忙做这件事吧。

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机会（主要是走私）。

回到建设铁路的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斯大林指出，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发表公告，橡胶问题不公布，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铁路等建成后再公布。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五年计划问题。再次强调，他们对本国能力估计不足。他们同意，对五年计划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说明，因为计划中未列入军事问题，而在拟定军事计划方面他们有许多困难。他们根本不清楚，要不要把军事问题列入总计划。对五年计划要不要公布，他们原来并不打算公布五年计划，而只公布该计划的基本方针。

斯大林解释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为了让人民了解建设规模，公布计划是必要的。仅仅公布基本方针是不行的。总会有人想了解 and 看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的建设规模。因此，必须把军事建设列入计划，但不必列出各个军工企业，等等。这样比较好。计划应当统一，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工建设。

至于苏联，那么，我们作为供货方也必须知道，需要我们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这些援助。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苏联。但是，我们既要为民用部分，也要对军用部分进行核算。我们必须了解，按各个部分算出的总数是多少。

譬如说，1953年我们提供10-15个师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完成这些订货需要多少钢和其他材料。在1953年同一年我们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设备。这也需要计算。然后得出军用和民用部分两个数字，并且确定，我们能不能按这个数量保证供货。据此再编

制每年的计划。中国同志也许认为，这类装备全都现成放置在我们的仓库里。不是的，这些装备都需要现造。

周恩来完全同意斯大林说的所有意见，并想确认一下，60个师的装备怎么办，如果这些装备用贷款付，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确定下来。

毛泽东同志有个想法。如果朝鲜战争再打1-2年，那么，可否把20个师装备的供货期延长到下一年度。

斯大林说，现在还难说。也许不得不缩减，也许不需要缩减。需要核算一下，核算的结果才能说明问题，在此以前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周恩来谈到海军装备的供货时间，是把这类供货列入计划，还是单独分出来。这一类供货大约应在6年内完成。原先的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斯大林：对于军事供货和海军供货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全部有效。但在确定供货的总金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不撤销任何贷款，不拒绝执行任何一项协议。我们认为拒绝执行承担的义务是绝不允许的。既然签订了协议，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一定执行。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

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将按这个比例编制他们的整个申请单。

斯大林：好的，这个比例可以接受。

周恩来说，最初计划建设151项工业企业，现在他们把这个数目缩小到147项，不包括军工厂（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厂、造船厂）。并解释说，这147个企业都不是军工企业，但可以为军事需要服务。

斯大林：我们通常很少建新企业，尽量扩大老企业。这样比较节约。中国却相反，尽量建新企业，因为那里的老企业不多。战时我们把飞机修理车间变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我们广泛采用了各企业协作的办法，不同的企业制造不同的部件，然后把部件装配起来。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这比建设专业工厂要容易。

周恩来说，内战年代他们也采用协作办法生产轻武器，但现在他们开始生产重装备，为此必须打下基础。

谈到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供货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时说，有3种弥补差额的办法：（1）扩大中国向苏联的出口；（2）支付外汇：美元、英镑、港币、瑞士法郎；（3）贷款。问这3种办法中哪一种更合适。

斯大林：也许，这三种办法全都要用。

周恩来说，他们预定把对苏出口扩大到130亿卢布。我们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品、缝品、矿产、食品（大豆、油脂、茶叶）。

指出在5年内他们可以筹集2亿美元以及16亿英镑、港币和瑞士法郎。

斯大林：最好是美元。英镑流通范围有限。港币问题需要同我们的财政部商量一下。

苏联十分需要铅、钨、铋，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货。

指出我们还可以进口苏联在其他国家采购的柠檬、橘子、菠萝。

周恩来说，他们想从苏联获得的贷款总数为40亿卢布，是这样安排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

斯大林：势必要给，但具体给多少。要算一下。我们提供不了40亿卢布。

周恩来说，这个数字里不包括飞机。飞机的费用他们考虑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问题不在数字上，而在我们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设备。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因此，需要2个月时间。

周恩来转到申请派专家的问题说，从1953年起中国需要190名新的财经专家，417名军事专家，140名医科等学校教师。此外，还需要军工专家，但这些问题还要研究。

斯大林：这个问题要研究，什么专家，哪些专业、部门。我们要派，但派多少难说。

在华苏联专家做出了成效吗？

周恩来回答说，成效极大。

问斯大林同志对提交的报告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印象良好。中国在成长。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

周恩来指出，报告里有一条附注：在停战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建立一支320万人的军队，102个师。

斯大林：这很好。但这是最起码的。中国应当有良好的装备，尤其是空军和海军。

周恩来：我们想保持 150 个航空团，共 13 000 名飞行员。

斯大林：少了，必须增加，需保持 200 个航空团。

周恩来：那势必要增加飞行人员。

斯大林：必要。也许要改为 3 团制师。师属机构少，可以节约。

周恩来问，喷气式歼击机与螺旋桨飞机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比例。

斯大林说，螺旋桨飞机要逐步淘汰，改用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的航速 800 公里。用螺旋桨飞机训练飞行员，然后改飞喷气式飞机。螺旋桨飞机一两年就要全部淘汰了。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航速 1 000—1100 公里的新式歼击机。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不得。

周恩来提出向中国提供生产 122 毫米榴弹炮、37 毫米加农炮和 76.2 毫米野战炮的技术文件问题。

斯大林说，图纸可以提供。

周恩来问，要不要马上建立坦克厂，还是先建汽车和拖拉机厂，然后将它们转产坦克。

斯大林回答说，应当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这个厂还可以逐步扩大。至于汽车厂，则可多建一些。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修改自己的五年计划并请我们提出意见。修改后的材料将交给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建议把总增长率规定为 15%，而在年度计划中则规定 20%。这样，计划就将留有余地。而对劳动者则必须提出超额完成计划的口号。这样计划就能超额完成。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编制我们的计划，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总有考虑不周之处。

斯大林对中国制造水雷的情况表示关心。

周恩来回答说，正在筹建水雷制造厂。

斯大林指示说，必须保卫中国的海港。

询问澳门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说，澳门仍然由葡萄牙控制着。

斯大林说，必须把这个留在中国大门口的恶棍赶走。

周恩来说，他们对东南亚各国坚决执行这样的策略，即不派军队，而用和平方式影响这些国家。举缅甸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尽力用和平方式影响该国政府。对西藏也这样。问这种立场对不对。

斯大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必须驻有中国军队，而对缅甸则要谨慎从事。

周恩来说，缅甸政府隐瞒自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但实际上倾向美英，执行反华政策。

斯大林：如果缅甸有一个亲华政府就好了。在缅甸政府中有不少冒充什么活动家的骗子。

周恩来解释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入西藏，现驻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是不成问题的。

强调说，同西藏保持联系就难了。同拉萨联系需要配有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的四引擎运输机。苏联能否提供这种飞机？双引擎飞机只能飞 $\frac{3}{5}$ 的路程，就不能往前飞了。

斯大林答复说，这件事苏联可以帮忙。

周恩来问，那么，中国能否在苏联订购20架四引擎飞机？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先提供10架，然后再提供10架。

指出，必须修筑进西藏的道路。

周恩来说，目前正在修，修路要用明年一年，一部分要到1954年。

斯大林指出，没有道路就难以在西藏保持应有的秩序。西藏喇嘛谁都可以投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价高，就投靠谁。

周恩来说，喇嘛确实有敌对情绪。今年（2、3、4月）他们策划叛乱，但中国政府把叛乱镇压下去了。指出，结果达赖喇嘛的弟弟逃到国外去了。

斯大林说，进藏道路必须修，那里必须驻扎中国军队。

会谈结束时，约好9月4日晚9时会见。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橡胶生产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 请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我们感觉天然橡胶严重不足。我们生产了足够的人造橡胶，但是用其来生产橡胶制品的话，每百万吨人造橡胶需要混合30万吨天然橡胶。不进行这样的混合的话，人造橡胶就不适合于工业应用。

前不久我们向垄断天然橡胶的英国人购买了天然橡胶，但是，现在英国人不再向我们出售天然橡胶了，哪怕是最少量的规模。这就为我们的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将使我们的工业面临缺少橡胶制品的威胁。

我的请求是，请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适的途径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转给苏联。如果最近能购买50 000吨天然橡胶就很好了。我们当然会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通过香港或者其他方购买，那么至少需要购买8 000吨和10 000吨。

能否满足我的这一请求，请告知。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1日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菲利波夫同志！

收到了您在11月21日的来信。现在我们有18 000吨天然橡胶。我已经向贸易部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按照购买的价格立刻向苏联政府提供8 000吨天然橡胶。

我们希望从苏联获得与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等值的新闻纸和棉布。

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在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继续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运往天津市。我们现在可以为苏联政府购买5万吨其急需的天然橡胶，甚至更多，达7万吨，但需要用美元或者英镑支付。现在天然橡胶的价格提高到了每吨1 200美元。

供应天然橡胶的期限近几个月会确定下来。

关于天然橡胶的供应及其今后的采购问题我们将责成对外贸易部的叶季壮同志同苏联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古诺夫同志直接进行谈判。请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相关的指示。

毛泽东

1950年11月22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 为代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您通报说，已经命令中国贸易部立即从自己的储备中以购入价格向苏联提供8 000吨橡胶，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通报。我对您做出的这一决定表示感谢。我们同意向中国提供新闻纸和棉布，来补偿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其中天然橡胶价值的三分之一用于提供棉布。

第二，我们希望，除了向苏联供应8 000吨天然橡胶之外，不是购买5万吨，而是购买7万吨的天然橡胶，购买的这些天然橡胶只能用英镑支付，因为我们的美元不足。您通报的价格我们认为可以接受。

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在以小批量组织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出现投机行为。必须特别注意，所购买的天然橡胶主要都应该是上等品——特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三等品的数量不超过20%—30%，因为我们可以用人造橡胶来替代低等的天然橡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一些四等品和五等品的天然橡胶，但这类橡胶的供应量不应超过5%—10%。

橡胶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请求对于购买的天然橡胶应该进行质量检查，因为在供货的时候橡胶投机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

第三，将就购买天然橡胶问题向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下达必要的指示。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4日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8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提议，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的结果制订了计划。我们打算立即着手完成该项计划。

我把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以及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1951年8月11日向我提出的计划发送给您。

请您审核该计划，并做出相应的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17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收到了您关于阐述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的电报。

1. 为了使我们在天然橡胶这一重要的战略原料上一起最终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认为，计划中应该考虑，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规模至少应能保证每年得到 20 万吨橡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考虑的是中国、苏联和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需要。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种植橡胶树，以便尽快得到天然橡胶。

2. 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橡胶种植园应该属于谁呢？属于国家还是农民？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建立国有的橡胶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考虑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橡胶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需要实行机械化，而这些都是农民所做不到的。在组建国营的橡胶种植园的同时，应该尽力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树。有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农业用地，也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国家提供的相关帮助下，这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橡胶。

至于需要栽培的橡胶树苗，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为此，应当进行特别的组织工作，应该组织专家对种苗的培植工作进行领导，并大规模使用机械化。

3. 从你们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海南岛以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可以成为生产橡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而且近年就可以生产出橡胶。因

此，我们需要尽快制订计划，着手在海南岛建立大面积的橡胶种植园，这一点非常重要。

4. 准备地块，准备在近年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所需要的一些机械：拖拉机、耕地机、中耕机等机械。在此方面我们愿意给予必要的帮助。

5.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一组熟悉林业工作和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专家、熟悉对多沼泽的土壤进行改良的专家、熟悉种苗机械化种植工作以及树木种植工作的专家。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

(1951年9月16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关于种植橡胶树的电报我们收到了。

您提出的意见非常好，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可以保证每年得到 20 万吨天然橡胶：海南岛可以保证 10 万吨，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保障 10 万吨。其中的大部分天然橡胶将会供应给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少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正在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以便得到 20 万吨以上的橡胶的可能性。

您提出的如下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在于，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橡胶种苗的培植将会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

我们非常需要苏联和苏联专家提供技术帮助。

10 月下旬，我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会议，对关于种植橡胶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苏联专家能够在 10 月中旬到达北京，以便参加 10 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会议。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那么我请求您及时把苏联专家派往中国。

毛泽东

1951年9月16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①

是否赞同朱德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的建议

（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

^① 摘录自1952年3月1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电报全文见本卷第219页。——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①
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不太合适
（1952年3月28日）

.....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

^① 摘录自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电报全文见本卷第221页。——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橡胶种植及苏方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的清单
(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1951年12月25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1000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3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25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1951年9月10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5月和6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7—8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31名专家和26名技术工人（共计57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2名机械专家、3名机械工

程师，共计 5 人。希望这组专家在 4 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1 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1 名育种专家、3 名育苗专家、4 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1 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 4 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 14 人。希望这组专家在 5 月底到中国。第三组：2 名机械专家、10 名机械工程师、26 名技术修理工，共计 38 人，希望这组专家在 6 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

(清单和计划共计 34 个项目，此处略。——本书制作者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 年 3 月 28 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种植橡胶树协议及有关物资供应等问题

(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①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 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 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者注

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 1952 年第四季度和 1953 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 年 4 月 4 日

军事合作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
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

(1950年1月8日)

北京

致科托夫^①：

请拜会刘少奇并给他转达下列电报：

“刘少奇同志，收到您关于为培训飞行员由苏联提供液体燃料的电报。待我们的专家进行核算后，制定供应标准。您的电报中所述为培训飞行员所需要的一切液体燃料，按苏联军队中实施的标准确定如下数量：高辛烷值汽油 13 400 吨、低辛烷值汽油 5 270 吨、航空润滑油 1.3 315 吨、P-9 产品 26 吨。

根据这个核算，我们命令把上述数量的液体燃料在上半年内，从 1 月份开始给您送去。

中国支付我们所提供液体燃料的程序和条件，建议在 1950 年中苏贸易协议中确定。

菲利波夫”

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10 份分别标上葛罗米柯、佐林、莫洛托夫、波采罗布、库尔久科夫等同志的名字

①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军事顾问。——编者注

斯大林致中国领导人电 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

(1950年7月13日)

1950年7月13日5时50分

第5426号

请将下列意见转达给周恩来或毛泽东：

“一、英国人通过其驻莫斯科使节向我发出正式声明，鉴于安理会相关决议，他们暂且无法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当然，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的军队撤回三八线，那么这可能会有助于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无礼和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应这样答复，即在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朝鲜问题已严重复杂化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有苏联、中国和朝鲜代表参加的安理会，并认真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才可能得以解决。

请通报你们的看法。

至于印度大使的声明，我们决定不予以答复，因为我们已经获悉，这个声明只是该大使的个人观点，与印度政府没有关系。

二、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地区部署9个师的兵力。如果你们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派遣携有124架喷气式飞机的歼击航空师去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们认为，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飞行员经过2-3个月的

培训，我们再将所有空军方面的物资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这样，你们便可完成在上海组建空军师的工作。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向中国派遣防空和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科托夫同志

复第1726号电

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

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38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①、莫洛托夫同志

① 送斯大林的文件是两份。——编者注

附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7日)

急电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28日19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10月27日收到毛泽东致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

因此，我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同志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随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两同志。

上述事项请您研究。并给予适当答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7日”

备注：扎哈罗夫同志看过该电报后认为，海军司令员随同库兹明一起赴莫斯科谈判是必要的。

H. 罗申

1950年10月28日

第262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海军问题的电报已收到。同意萧劲光等同志来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无偿提供 372 架米格-15 飞机

(1951 年 5 月 22 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东北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 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师目前已有 10 个，其中 6 个为米格-9 歼击机师，4 个为米格-15 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 歼击机取代米格-9 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 372 架米格-15 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打算将这 372 架米格-15 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你们仅需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 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 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 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 10 天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 372 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 72 架，6 月 20 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 8 月初以前

能得到全部 372 架飞机。

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 年 5 月 22 日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6日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第2586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无偿提供米格-15 飞机一事

(1951年5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 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 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 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 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 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6日

第 279 号密码电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提供 60 个师武器装备的问题

(1951 年 6 月 24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您 6 月 21 日的电报收悉。

一、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二、关于装备 60 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 10 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 1951 年、1952 年、1953 年和 1954 年上半年内，也就是 3 年内有可能完成 60 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关于目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24 日

第 635177 号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的问题

(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枚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①

1953年1月15日

^① 斯大林的又一化名。——本书制作者注

旅 顺 撤 军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①

苏联可以应中国政府的请求从旅顺撤军

（1949年12月16日）

.....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① 摘录自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苏中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见本卷第125—130页。——本书制作者注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①

雅尔塔协定——那就见它的鬼吧！

（1950年1月22日）

.....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

^① 摘录自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见本卷第131—136页。——本书制作者注

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的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



旅顺口苏军烈士纪念塔



沙俄和日占时期的旅顺军港



中长铁路直通旅顺口

今日旅顺海军基地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①

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

（1952年3月28日）

.....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

^① 摘录自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全文见本卷第221页。——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①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

（1952年4月2日）

.....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

^① 摘录自1952年4月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全文见本卷第224页。——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二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1950年2月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9月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 А.Я.维辛斯基同志

附录三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9月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A.维辛斯基

1952年9月15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外交协调

斯大林致苏驻捷大使电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

(1950年8月27日)

绝 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①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及随后事态的发展，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

① 哥特瓦尔德，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共和国总统。——编者注

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拖着中国去为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期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斯大林签署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政府任命张闻天为大使

（1951年3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会议第 81 号记录
1951 年 3 月 16 日

第 6 项 外交部的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同意张闻天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的任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发自莫斯科

致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

我们已拟定了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并决定于5月8日（星期二）将其送交美国大使。我们于5月6日晨将我们复函的内容给您送去，请至迟于5月7日24时前将你们的意见寄我。

我们复函的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我们对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要求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中、苏、美、英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二、我们要求该条约草案中应明文确定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

三、我们认为把日本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是不妥的。

四、我们坚持要仿照同意大利签订和约时的做法，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

五、我们的复函是这样结束的：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决主张尽快同日本签订和约，并且认为，该和约必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强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加以制定，该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参加这一工作。

据此，苏联政府提出：

第一，1951年7—8月份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代表组成的外长会议，以便起草对日和约，并且要吸收所有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参加制定对日和约的起草工作，然后将该和约草案提交和平会议审定。

第二，对日和约的制定，要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为 basis，并遵循以下主要目的：

（一）日本应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二）必须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确保日本国民有民主的权利，不允许有那种以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军事或军事化组织的存在；

（三）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和约中必须规定限制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以使其不致超过自卫需要；

（四）在发展日本和平经济方面不对日本施加任何限制。

第三，该条约中应规定，日本不得参加那些旨在反对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某一国家的联盟。

第四，该条约中应明确规定，自对日和约签订之日起，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第五，还要商定，凡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国家均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附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

(1951年5月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7日23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转去，其全文如下：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6日电报已收到。完全同意您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1951年5月6日24时”

H. 罗申

1951年5月7日

说明：1951年5月6日博戈莫洛夫同志^①转交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送：斯大林同志（2份）

^① 博戈莫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者注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关于朝鲜停战、联合国、对日关系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同志；
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同志。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直接在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

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议，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接着问道，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不想交出全部战俘，扣留一部分，打算雇佣，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而现在我们每天都抓到被美国投到我方来的几名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借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

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周恩来说，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条意见，让中国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他仍然保留以前的看法，但要补充一点：除现在的联合国外，要单独建立亚洲、欧洲等洲的联合机构，不是代替联合国，而是与联合国平行。让美国人去建立美洲的机构，欧洲人建立欧洲的机构，亚洲人建立亚洲的机构，但都与联合国并行不悖。

周恩来说，中国与联合国不相干，他们清楚，要在建立大陆机构方面发挥主动。

斯大林强调，联合国是美国的机构，要打破这个联合国。但又保持一种不反对联合国的姿态，在尊重联合国的姿态下干这件事，不明说要打破、要削弱这个机构，而实际上却削弱这个机构。

回忆起在战争时期丘吉尔曾建议组成大陆联合国，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当时，我们缄默不语，听着这场争论，但后来英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于是我们便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

周恩来问，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就此事给毛泽东写封信。

斯大林解释说，最好不写信办成事，说他看见周恩来正在记，而且完全信任他。

周恩来谈到定于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大会时说，现在不得不把会期改在10月初，又说，中国将吸收日本和印度参加这次大会。

斯大林问，巴基斯坦参加吧。

周恩来肯宠，巴基斯坦也应参加，巴基斯坦已受到了邀请，但巴基斯坦政府不发给护照。至于印度，印度代表团的部分人已经动身，日本人则由香港入境。

斯大林接着说，现在应当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因为：(1) 召开大会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2) 这样会更好，因为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

周恩来问，我国代表团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斯大林回答说：和平。

周恩来说起尼赫鲁关于召开苏、中、英、法、美五国会议的建议。

莫洛托夫更明确地说，这是国大党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说，应当支持这项建议。

周恩来强调说，印度当然是同英国一起出席此种会议，但利用这项建议显然是合适的。

斯大林同意此意见。

周恩来说，由于公布关于旅顺口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应持的立场便十分明朗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表明，是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

斯大林补充说，而且还准备侵略，但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

周恩来提出台湾问题，说既然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协定，从而就证明了它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排除了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只要保留与台湾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

斯大林强调，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支持周恩来的看法，即只要保留与蒋介石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指出，日本与蒋介石签约一事只能恶化日本的地位。

周恩来问，在德国问题上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

斯大林说，这难以预料。看来，美国不赞成德国统一。美国人在掠夺德国。如果东西德联合起来。那么，对德国就再也不能掠夺了。因此，美国人不希望德国统一。

周恩来发表意见说，虽然美国在重建西德和日本武装力量，指望利用他们，但这些武装也会调转过来对准美国。

斯大林说，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在以希特勒—纳粹分子领导的德国。

周恩来转到新疆形势问题，说新疆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新疆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同时非法没收牲畜方面、宗教方面以及减租减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左”倾过火行为。为了纠正这些过火的行为，召开了中央全会，免除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职务并派多名中央委员到当地处理过火行为。总的来看，当地的不满情绪已经平息，外逃包括逃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已被制止。

斯大林说，过火行为是想尽快获得土地和牲畜的反映，于是便没收富人的土地和牲畜。

周恩来指出，改革的消息刚一传开，敌对分子便立即宰杀牲畜。

斯大林指出，当年在我国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后还会出现掠夺行为。

周恩来解释说，土改是在农业区进行，而在其他收区则进行分配，过火行为是在分配时发生的。既然牧民参加分配，中国领导便决定改善牧民状况，这对改善整个状况也有利。

斯大林说，你们当然了解得更清楚。

周恩来说，刘少奇通知，印尼共产党要派两名代表出席十九大，并询问同他们在莫斯科讨论党的问题是否适时。

斯大林说，现在难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向中央提出此事。指出，印共代表来的时候，就请求帮他们制定党的纲领，当时虽然忙，但还是照办了。

周恩来通知说，日本同志也要来，大概也想商谈党务问题。

斯大林答复说，大哥哥不可拒绝给小弟弟办事。说这件事要同刘少奇谈，他有丰富的经验。询问说，中国对此事有何看法。

周恩来对此指出，刘少奇考虑随身带些有关的资料，以便讨论一系列问题。

斯大林指出，如果中国同志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不想谈，则不必谈。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肯定想谈。

斯大林回答说，那样，时间总可抽出来。

周恩来说，不排除越南同志也要来。

斯大林就此指出，越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会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于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

莫洛托夫在回到军事贷款、支付中国 60 个师的装备问题上，问道，他对周恩来上次说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对，即 60 个师的供货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 1951 年 2 月 1 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中国 60 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 60 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

随后提起中国政府代表团给苏联代表的赠礼问题，说赠的礼品太多了。

周恩来解释说，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时他们未能及时送礼。去礼品博物馆时看到其他国家赠送的礼物，便决定不能不补上他们未及时办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想赠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几辆苏制卧车。说我们有一种“吉姆”车，比“吉斯”小，但很漂亮，我们打算赠送几辆“吉姆”车。

随后提起对宋庆龄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说，她正在加紧自我修养，逐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到他们方面，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说宋庆龄对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感到非常自豪。

会谈从 10 时 30 分开始，12 时 30 分结束。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1952 年 9 月 19 日

附 录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周恩来（签字）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〇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周恩来（签字）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附录三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中国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摘自 A. C. 潘友新^①的工作日记

1953年3月31日

第290号

会谈纪要
机 密
文本第2份

今天，3月4日23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高岗同志访问了大使馆。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表示，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在这段艰难的日子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和警惕性，这完全被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应当这样”。

毛泽东表示，真诚地祝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尽快康复。

他说，刘少奇和陈云现在正在医院，因此无法同他们一起前来使馆。

A. 潘友新

① A. C. 潘友新，时任苏联驻华大使。——本书制作者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约·维·斯大林与世长辞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菲利波夫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三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九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九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9



斯大林

目 录

本卷说明	1
------------	---

朝鲜战争篇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战前朝鲜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 (1947年12月31日)	3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同意苏联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 (1948年10月12日)	8
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纪录：关于经济和文化援助 (1949年3月5日)	9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苏联海军暂留朝鲜的决议 (1949年3月18日)	17
斯大林致苏驻朝大使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19
斯大林与金日成谈话纪录：关于经济计划和文化交流 (1950年4月10日)	20
附录三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 (1950年5月14日)	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同盟条约 (1950年5月16日)	26

三八线上

附录一 华西列夫斯基等关于三八线形势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4月20日)	28
附录二 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通报金一与毛泽东会谈情况 (1949年5月15日)	30
附录三 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取瓮津半岛的报告 (1949年9月3日)	3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关于朝鲜问题来电的答复 (1949年11月5日)	3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朝鲜问题 (1950年1月30日)	34
附录四 伊格纳季耶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朝鲜大使李周渊的情况 (1950年4月10日)	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军事器材、金日成访苏等事 (1950年5月3日)	36
附录五 什特科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的谈话 (1950年5月12日)	38
附录六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想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说明 (1950年5月13日)	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的条件 (1950年5月14日)	41
附录七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转上级电：关于朝鲜开始进攻时间 (1950年5月30日)	42
附录八 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上级赞成您的建议 (1950年6月1日)	45
附录九 朝鲜外务省通报：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发起突然进攻 (1950年6月26日)	46

战局初开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朝鲜战局的几个问题 (1950年7月1日)	48
--	----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是正确的 （1950年7月5日）	49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朝鲜人民军必须重视补充兵员 （1950年7月6日）	50
附录一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谈苏联顾问和中国代表等事 （1950年7月8日）	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 （1950年7月8日）	53
斯大林致驻朝大使电：建议朝鲜驳斥美国诬蔑人民军虐待战俘 （1950年7月13日）	54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驳回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1950年7月13日）	5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英国无理要求和安排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7月13日）	56
斯大林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回信 （1950年7月15日）	58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对朝鲜人民军作战问题的建议 （1950年8月28日）	59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同意与美方接触的决议 （1950年9月27日）	62
斯大林给马特维耶夫和什特科夫：关于扭转朝鲜作战局势的指示 （1950年9月27日）	6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对朝鲜作战局势的处理意见 （1950年10月1日）	66

中国出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 （1950年10月1日）	69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1950年10月3日）	7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1950年10月5日)	73
附录二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的态度和顾虑	
(1950年10月7日)	75
斯大林致金日成信：中国表示过一些时候再出兵	
(1950年10月8日)	78
附录三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	
(1950年10月13日)	80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决定援助朝鲜，暂缓部队向北撤退	
(1950年10月14日)	82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的最后决定	
(1950年10月14日)	83
军事援助（上）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8日)	8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87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留下苏联顾问整编朝鲜部队问题	
(1950年11月1日)	88
附录二 金日成致斯大林信：请求留下苏联顾问培训部队	
(1950年11月2日)	8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供应步兵武器装备	
(1950年11月7日)	9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您关于加强空军的建议	
(1950年11月15日)	91
附录五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抽调苏军汽车事宜	
(1950年11月17日)	92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提供500辆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93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培训朝鲜飞行员的问题	
(1950年11月20日)	94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军事贷款支付差额问题	
(1951年1月14日)	95

相互支援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感谢朝鲜提供铅，将满足朝所需装备	
(1950年3月18日)	98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致周恩来电：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	
(1950年11月9日)	99
斯大林签署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在苏朝鲜籍大学生去中国东北	
(1950年11月28日)	10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帮助朝鲜恢复铅工业生产的问题	
(1951年2月3日)	1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单独准备的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103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1951年5月7日)	105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向朝鲜人民赠送5万吨面粉	
(1952年4月14日)	106

战局进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	
(1950年12月1日)	108
附录一 罗申：中国政府拟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11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112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的作战计划	
(1951年1月28日)	1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1951年1月30日)	11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的问题	
(1951年1月30日)	117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我的电报不是指示而是建议	
(1951年2月3日)	119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1951年3月1日)	1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未来战役方针和苏联空军入朝事宜	
(1951年3月3日)	12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再调拨1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	
(1951年3月15日)	125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等问题	
(1951年3月18日)	12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朝鲜铁路运输应交中国指挥部管理	
(1951年3月25日)	127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否近期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7日)	12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13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	
(1951年6月5日)	132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和高岗将前往莫斯科	
(1951年6月5日)	1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	
(1951年6月7日)	1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中国空军使用问题	
(1951年6月13日)	13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问题和提供军队装备问题	
(1951年6月24日)	138

停战谈判（上）

-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1年6月30日） 140
-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反应电
（1951年6月30日） 141
-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您亲自领导这次会谈
（1951年6月30日） 142
-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1951年6月30日） 143
-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朝鲜应与中国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
（1951年7月2日） 145
-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来电
（1951年7月3日） 146
-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
（1951年7月3日） 147
-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
（1951年7月3日） 148
-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问题
（1951年7月3日） 150
-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
（1951年7月5日） 151
-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7月13日） 152
-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提出的谈判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1951年7月14日） 154
- 附录九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
（1951年7月20日） 155
-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
（1951年7月21日） 157

附录十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敌人在中立区的挑衅行为 (1951年8月27日)	15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1951年8月29日)	160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们有关邀请中立国代表 的意见是不适宜的 (1951年8月30日)	161
派遣顾问	
附录一 金日成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0年7月8日)	16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关于向朝鲜派遣苏联顾问事 (1950年7月8日)	164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防空与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165
附录二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空军顾问 (1951年2月12日)	166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 (1951年2月16日)	167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1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1951年9月10日)	1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12日)	170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兵团 (1951年9月20日)	17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 (1951年9月26日)	172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1951年10月4日）	173
---	-----

军事援助（下）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2日）	175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1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 （1951年5月26日）	178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不能马上满足供应迫击炮的申请 （1951年5月29日）	17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新的武器装备申请单由高岗带去 （1951年6月9日）	180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尽快培训中国飞行员 （1951年6月13日）	181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为中国训练米格-15飞行员 （1951年6月26日）	182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 （1951年8月17日）	183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1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 （1951年9月26日）	186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军用物资问题 （1951年10月4日）	18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装备和贷款结算方法 （1951年10月7日）	189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1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 （1951年11月13日）	19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2年4月9日）	1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向中国提供弹药的问题 （1952年7月24日）	19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关于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1952年7月24日）	1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等问题 （1952年12月27日）	2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2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27日）	203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阿芒拿炸药 （1953年1月29日）	204

停战谈判（下）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和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20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1951年11月19日）	209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21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您拟定的计划和对谈判进程的估计 （1952年2月3日）	21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1952年7月17日）	214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关于战争局势和遣返战俘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15
斯大林与金日成和彭德怀谈话纪录：关于双方情况和 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2年9月4日）	221
附录三 周恩来向斯大林转交毛泽东来电：关于墨西哥的建议等问题 （1952年9月16日）	23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 （1952年9月17日）	232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关于墨西哥建议和交换战俘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33

苏联生变

附录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 （1953年3月19日）	238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238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242

朝鲜战争大事年表	243
----------------	-----

插图

一 三千里江山	7
二 美国军队突破三八线	29
三 仁川登陆，战局剧变	61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84
五 三次战役，展开攻势	109
六 著名的米格走廊	124
七 边谈边打，打打谈谈	199
八 朝鲜战争双方兵力投入	236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正在逐步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将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不同的卷次，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中的部分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朝鲜战争篇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

战前朝鲜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
(1947年12月31日)

北朝鲜的形势

1946年至1947年北朝鲜进行了广泛的民主改革，其目的在于保障居民的政治自由，并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

由于土地改革（1946年），72.5万无地和少地农户无偿获得了过去属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朝鲜走狗的100万公顷土地。土地改革扩大了北朝鲜的播种面积（1946年为191万公顷，而1947年达到223.4万公顷），并提高了产量（1946年收获181.4万吨粮食，1947年超过200万吨）。

1946年8月，对属于日本人及朝奸的工业、运输、通讯和金融企业实行了国有化。

同年夏天通过了保障工人和职员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劳动法。

由于建立了妇女平等的法律，成千上万的朝鲜妇女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取缔了艺妓。

在国民教育方面进行了根本改造。现在用朝鲜语进行教学。教育机构和各种文化教育机构网显著增加。

北朝鲜人民的主要成就是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政权机构。地方人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全国普遍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联合在民族统一民主阵线中的所有3个政党（劳动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和北朝鲜的社会团体在选举时发表了共同纲领和统一的候选人名单。99%的居民投票赞成民族统一民主阵线的候选人。这一选举显示了朝鲜居民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并表明他们团结在人民委员会的周围。

1947年2月，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选出了最高权力机关——北朝鲜人民会议（成员为237人）。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1947年2月21-22日）肯定了临时人民委员会自1946年2月成立以来的工作，并成立了由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担任主席的北朝鲜常务委员会。

1947年11月18-19日，召开了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制定朝鲜临时宪法的历史性决议，同时通过了起草诉讼、民事和刑法等法典的决议，并批准了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一系列法规。

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科奉作了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报告人在说明了战后的国际形势后，指出朝鲜人民在建设自己独立的民主国家的事业中遇到了困难，因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企图把反动政府强加给朝鲜人民，并通过这种方式使朝鲜服从于美国的利益。金科奉提醒大家注意最近在南朝鲜通过的临时宪法，所谓立法院选举法和一系列旨在巩固反动统治的法规，并强调必须通过宪法巩固人民的政权以及在北朝鲜实行的民主改革，必须将这部宪法与一切反动宪法草案进行对比，从而向北方和南方人民群众表明，他们要争取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宪法。

人民会议选出了朝鲜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已开始工作。

在北朝鲜生活中最近的一件大事是进行了金融改革（从1947年12月6日到12日）。用新的足价货币（圆）代替占领时期的临时纸币以及日本人发行的目前还在南方和北方流通的旧币。除了投机分子以外，朝鲜人民都热烈欢迎整顿北朝鲜货币制度和保障北朝鲜经济发展的改革。在改革的同时，国营市场价格下降了50%。私营市场的价格急剧下降。同时北朝鲜的货币改革使美国人遭到打击，由于大量的旧币转入南方从而加剧了南方的通货膨胀。

尽管困难不小，北朝鲜总的经济形势比南朝鲜要好，并且在继续逐步好转。

南朝鲜的局势

美国军队占领南朝鲜两年多来，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没能够解决。显然，这符合美国在朝鲜政策的目标。

南朝鲜的居民没有理由不认为，自己目前的状况同日本统治时期相比要艰难得多。实际上，美国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人在朝鲜形成的全部殖民统治关系。土地同以前一样掌握在地主手中。日本人的土地所有权转为由美国人控制的“新朝鲜”公司支配。除了将收成的1/3支付租金外，南朝鲜农民还要交纳大量的现金税和强制性地向国家提供实物。工业处于停顿状态。美国人蓄意延缓工业复苏。某些美国专家不得不承认，美国吹嘘的给予朝鲜的大量经济援助是假的，坚实的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据1947年11月28日路透社报导）。

根据南朝鲜报刊的资料（1947年9月10日《朝鲜全南日报》），1947年9月，南朝鲜全部工业的开工率总共只有30%。许多企业倒闭。缺少工业设备、机器备件、燃料和一些原材料。所有原先属于日本人的工业企业和从前的日本的产业都由美国人接管并视为“敌产”。失业人数月月在增加。比如，根据1947年9月10日《朝鲜全南日报》的资料，1947年9月失业人数和从其他国家回国的穷苦的朝鲜居民达到250万人。

南朝鲜的整个政权掌握在美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手中。甚至到了1946年11-12月，由该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的所谓立法机关和指定的民事行政机关（从1947年6月起命名为过渡政府），实际上还不拥有任何权力。朝鲜居民对没有政治权利的地位表现出极大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有时甚至在右翼人士中也显露出来，尽管他们和美国人关系密切。

共产党（1946年秋与人民党联合成为南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南朝鲜民主运动受到了来自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种种残酷的镇压。1946年夏，在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中断之后，美国人加强了镇压。对人民政治上的恐怖手段和严峻的经济状况引发了全面罢工，在地方上转为武装起义（1946年10月）。镇压了罢工后，美国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民主团体并迫害民主人士。在美国人实行破坏联合委员会工作和成立南朝鲜独立政府的方针的同时，1947年8月，出现了大规模逮捕民主人士和摧毁民主团体的新浪潮，这种恐怖活动由于联合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在1947年春暂时地减少了。对民主人士的逮捕一直继续到现在。

目前，劳动党以及追随它的南朝鲜民主团体实际上被迫处于秘密状态。尽管通过镇压手段保证了右派在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但美国人在使其所庇护的右翼党派和团体之间采取统一行动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目前，这些党派和团体之间的争吵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有所加强。如果说以李承晚为首的所谓民主党顺从地跟着自己主子的话，那么右派阵营中的另一个主要政党——以金九^①为首的独立党则站出来，反对美国人关于成立单独的政府和强化朝鲜分离的计划。看来，这些矛盾的产生不仅是李承晚和金九之间个人的斗争，也是广大民众阶层对上述计划不满而导致的。朝鲜人对美国人企图在南朝鲜待下去的强烈

① 金九(1876-1949)，南朝鲜政界右翼势力代表人物之一，1945年回国后任南朝鲜民主议院副院长，反对南朝鲜进行单独选举。1948年赴平壤参加南北方代表协商会议，次年被李承晚派人暗杀。

不满，在中间各党派和团体（即温和的右派）的立场上表现出来，他们赞同在占领军撤出朝鲜后，以召开南北方代表会议的方式成立统一的独立政府。

在这方面很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南朝鲜轰动一时的所谓“当前措施的纲要”事件，该纲要是南朝鲜过渡政府行政委员会在秘密情况下，作为向美国政府转达朝鲜人民的意见而制定的。美国人“安插”的朝鲜行政机关人员反映了他们主子的意见，请求把南朝鲜民政机关变为永久的朝鲜政府，并为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保留“与未来的朝鲜政府同等的权力”。有关“当前措施的纲要”的消息在报刊披露时，许多团体，甚至右派都站出来反对这个公开赞扬美国人占领南朝鲜的“纲要”。南朝鲜立法机关于1947年11月14日以34票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当前措施的纲要”的如下决议：

“不承认南朝鲜过渡政府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当前措施的纲要’。成立特别委员会审判纲要的炮制者并严惩他们。”

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右派民族主义团体对美国公然保持国家分离状态和将南朝鲜变成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一纲要的反对立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美国正倚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加紧实现这一纲要。

民主党——美国人在南朝鲜的主要亲信——赞成立即进行选举和成立南朝鲜政府，就证明美国人坚决要把自己的计划变成事实。

虽然军事管制委员会首脑没有正式核准由立法机关公布的普选法，但还是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并于11月15日开始了工作。对左派的继续镇压也说明美国人加强了南朝鲜选举工作的准备。

奴役南朝鲜的计划是在执行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决议的口号下实行的。据美国无线电台报导，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计划于1月2日到达汉城。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已经指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南朝鲜的选举拟定于3月31日进行。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

T. 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B. 佩图霍夫

选自国内出版《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94—97页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2003）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同意苏联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

(1948年10月12日)

1948年10月13日1时28分发出

平壤

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您10月8日的来信收悉，您在信中通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提出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以及建立两国间相应的经济联系。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朝鲜政府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联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1948年10月12日

同上，（上册）第108页

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纪录 关于经济和文化援助

(1949年3月5日)

1949年3月5日20时

出席者：维辛斯基^①、什特科夫^②、M. M. 金（翻译）。

朝鲜方面：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内阁副首相洪命熹、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俊泽、贸易相张时雨，教育相白南云，递信相金正柱、驻苏大使朱宁河(Chu Yong Ha)、翻译文日(Mun Il)。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成员一路是否顺利？

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给予的关照，并说他们一路顺利到达。

斯大林同志问：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来的？

金日成答：坐火车。

斯大林同志问：路上有人生病吗？

金日成答：所有人都健康。

斯大林同志提议开始谈正题，并问有哪些问题。

金日成说：苏联军队解放朝鲜之后，苏联政府和苏联军队在朝鲜经济发展方面、在发展民主方面都对朝鲜给予了援助。朝鲜政府知道，没有苏联进一步的经济和文化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和文化时将极其困难。为了进一步发展朝鲜的经济和文化，需要苏联的援助。

① 维辛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②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斯大林同志问：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金日成答：经济的和文化的。

斯大林同志问：具体需要什么？

金日成说，他们^①批准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为了完成该计划和加强经济基础，他们需要经济援助。需要工业、邮电和交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用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他们还需要技术援助，如派苏联专家去朝鲜、编制新专案（各类工厂）的建设计划、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同志问：哪些新专案？

金日成答，比如安州的水利工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建设，但是缺少专家，还有恢复和扩建的清津冶金厂，修建水丰水电站等等。

斯大林同志问：朝鲜有铁矿吗？

金日成答：朝鲜的铁矿很多。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给予这方面的援助，也可以派专家。

金日成指出：到目前为止，两国间的贸易开展得很顺利。今后为了完成两年计划，我们需要从苏联进口设备、蒸汽机车、电动机车、纺织工业的配件和设备。然而朝鲜的出口无法抵偿进口，所以他们需要向苏联贷款。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并问需要多少贷款？

金日成答：至少要4,000—5,000万美元。

斯大林同志：可以，还有什么？

金日成答：为了便于运输和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必须建一条从阿吾地到克拉斯基诺的铁路。

斯大林同志问：这条铁路位置在哪里，全长有多少公里？

什特科夫同志介绍说：这条铁路应当建在从克拉斯基诺站（在苏联境内）到阿吾地站（在朝鲜境内），全长58公里，其中10公里在

① 原文如此。这里的称谓显然是从翻译人员的角度纪录的，下同。

朝鲜境内，48公里在苏联境内。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要考虑一下。并问还有什么问题。

金日成说，必须建立朝鲜和苏联之间的空中航线，并说他们现在没有自己的运输机和飞行员，但建立空中航线是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问：在朝鲜没有苏联飞机吗？

金日成答，苏联军队撤出后没留下空军部队和飞机。他说，他们现在已开始培养自己的飞行员。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有自己的飞机吗？

什特科夫同志介绍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航空教练团，并有一些教练机和战斗机，但是他们没有运输机。

斯大林同志问：有多少架飞机？

什特科夫同志答：有48架战斗机和19架教练机。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我们每个团的飞机也少了，我们正在减少团里的飞机数量。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金日成说：必须与苏联建立文化联系。比如，最好派苏联学者到朝鲜大学里工作：派朝鲜大学生到苏联学习：派朝鲜专家去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给朝鲜寄送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参考书籍；在文化艺术方面进行人员交流，这些都是我们的愿望。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这些问题同苏联是否有协定？

金日成说：过去有这样的协定。现在，政府成立之后还没有正式协定。

斯大林同志说：这件事可以办，只是派专家和大学生恐怕有困难，因为他们语言不通。

金日成说：目前在朝鲜所有中学和大学都在组织学习俄语。必须从苏联派教师去朝鲜。

斯大林同志说：他们不懂朝鲜语，这会有困难。

金日成说：朝鲜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教师，目前已有苏联学者在

朝鲜工作，他们通过翻译可以进行教学。

斯大林同志答：可以派教师去。

金日成说：就上述所有问题签订协定，即经济协作和扩大贸易的协定、贸易协定、苏联技术援助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

斯大林同志问金日成是否考虑过贷款或借款问题。

金日成答，已经考虑过，他们希望获得贷款。

斯大林同志答，这个可以办到，并问他们想获得多长时间的贷款？

金日成答：如果贷给 5,000 万美元的话，将从 1951 年至 1954 年偿还清。

斯大林同志问：什么时候还清贷款？

金日成答：从 1951 至 1954 年。

斯大林同志问：想一次性获得贷款，还是 1949 年、1950 年、1951 年分批获得？

金日成答，他们想在 1949 年获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办不到，则在 1949 年和 1950 年上半年得到。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无法做到。你们需要机器，而机器要先订货才能生产。这需要时间。

金日成说，他们需要汽车、蒸汽机车、纺织工业设备和石油，这些最好今年能得到。

斯大林同志答：一年内做不到。又问他们希望得到哪种货币的贷款？

金日成答：美元。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现在不按美元核算而按卢布核算，并指出不久后 1 美元将兑换 5 卢布。斯大林同志提出 3 年内以贷款形式分批提供设备和机器，在这 3 年内朝鲜人不用还贷款，而在以后的 3 年内他们应分批偿还贷款。大致情况是这样：1949 年、1950 年、1951 年，也许可能到 1952 年这几年给予贷款，从第 4 年起开始分批偿还贷款。

这样用6年付清贷款。我们是按这些原则去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我们对所提供贷款收取的利息为：如果国家已恢复过来，按年息2%；如果国家尚未恢复，则按年息1%。此外，还将继续两国之间的非贷款性的正常贸易，这一办法将由协定确定。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有没有人能开始拟定这些协定。

金日成答，他们有这方面的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能给2亿卢布（即4,000万美元）的贷款。我们虽然想提供更多的贷款，但目前做不到。

金日成说，他们同意。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汽车？

金日成答，没有自己的汽车，他们想在苏联购买汽车。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可以提供汽车。我们还可以提供飞机。

什特科夫同志说：朝鲜政府不仅想得到飞机，还想建立合资航空股份公司和修建铁路。

斯大林同志答：这可以办到。至于修建铁路，这一问题要研究。我们缺少劳动力修建苏联境内这段铁路。他问朝鲜是否有劳动力？

金日成回答说：朝鲜有劳动力。

金日成说：在朝鲜南方还有美国军队驻守，并不断在加强反对北朝鲜的阴谋活动。他说，他们有步兵，但几乎没有海防部队。在这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问：南朝鲜有多少美军？

金日成答：近20,000人。

什特科夫同志说：约有15,000至20,000人。

斯大林同志问：那么在南方有没有由朝鲜人组成的正规军？

金日成答：有，人数约60,000。

斯大林同志问：这数目只是正规军还是包括了警察？

金日成答：只是正规军队。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问：你们怕他们吗？

金日成答：不，我们不怕，但是希望拥有海军部队。

斯大林同志问：哪一支军队更强大，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朴宪永答：北方的军队更强大。

斯大林同志问：在朝鲜有日本人留下来的造船厂吗？比方，在咸兴或在朝鲜其他地方。

金日成答：没有造船厂。

什特科夫介绍说：有一些造船厂，但都不大。

斯大林同志说：在这方面可以给予援助，并说朝鲜需要拥有自己的军用飞机。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是否渗透到南朝鲜军队中，那里是否有自己人？

朴宪永答：他们渗透进去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暴露自己。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是对的，现在不需要暴露自己，并指出，看来南方人同样会派遣他们的人进入北方部队，应当小心谨慎。

斯大林同志问：在他们的三八线地区出了什么事？南方人进犯并占领了几处据点，然后这些据点又被拿回来了，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答，他们考虑到南方人会派遣他们的人打入北方部队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金日成通报说，在江原道的三八线地区与南方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警察武器不足。正规部队一到，南方人就撤退了。

斯大林同志问：南方人是在被赶跑的，还是他们自己退出去的？

金日成答：经过战斗赶走了南方人，撵出了国界。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有军事学校吗？

金日成答：有军事学校。

斯大林同志问：有飞行学校吗？

什特科夫介绍说：他们有一个战斗机教练航空团。

斯大林同志回想起上次有两个人来过莫斯科，并转向朴宪永问道

他是不是第二次来？

朴宪永答：是的。

斯大林同志说：金日成和朴宪永二人都胖了，现在都难以认出来了。

金日成说，他们有军事学校，但是没有军事学院，在朝鲜军队的指挥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毕业于军事学院。他请求准许派朝鲜军官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

斯大林同志问：过去不准许吗？

金日成答：不允许。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允许。

金日成说，他们再没有问题了。

郑俊泽问：可以派苏联专家去朝鲜和派朝鲜专家到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吗？

斯大林同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已谈过了。可以派苏联专家去朝鲜，苏联也可以接受朝鲜专家。

斯大林同志问：朝鲜人从何处搞到棉花？

金日成答，他们想从苏联得到棉花。去年他们已得到了 3,000 吨。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自己还想从朝鲜得到棉花呢。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同别的国家是否有贸易关系？如日本、中国、菲律宾。

金日成答，他们同中国有贸易关系，但中国在打仗，所以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

斯大林同志问：那同其他国家如何？

金日成答：同其他国家没有贸易往来。同香港有贸易，但不是官方的，只偶尔有些生意。

斯大林同志问，在他们自己的商人中是否有贸易公司？

金日成答：有，这种贸易公司主要同香港、大连市和中国做生意。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有这样的贸易公司，这没有什么不好。民族

资产阶级是存在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好人，需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生意并运送货物，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没问题了。

斯大林同志转向维辛斯基，问他还有什么问题。

维辛斯基同志答，他没有问题。

洪命熹感谢斯大林的接见。

斯大林同志也感谢代表团的来访和谈话。

（谈话进行了1小时15分钟。什特科夫和翻译M. M. 金纪录。）

同上，（上册）第156—162页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苏联海军暂留朝鲜的决议

（1949年3月18日）

1949年3月18日决议

14. 朝鲜问题

批准：

- 一、苏朝关于苏联海军分队暂时留驻咸兴港的议定书（附件一）；
- 二、苏联民航总局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通省关于开设伏罗希洛夫市和平壤市之间的定期空中航线的协定；
- 三、苏联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建设从滨海铁路克拉斯基诺站至北朝鲜铁路阿吾地站的铁路线的协定；
- 四、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重新签订和部分修正建立苏朝海运公司和石油加工公司协定的决议；
- 五、苏联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条件的协定；
- 六、关于在朝鲜设立苏联贸易代表处的照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议定书草案

议 定 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并且鉴于美国军队在南朝鲜的存在，同意自己的海军分队暂时留驻咸兴港，而且苏联政府负担上述海军分队的全部费用。

第二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将咸兴港为保证建立上述海军分队基地所需的设备和建筑物交由苏联政府支配。

第三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苏联发出的用于咸兴港的海军分队经济技术服务的货物，以及苏联发出的属于这些分队的货物，免除海关检查，免征各种海关费用和关税。

为海军分队服务的苏联公民在从苏联赴朝鲜和从朝鲜赴苏联时，将按由苏

联主管机关根据双方商定的办法颁发的证件出入朝鲜边境。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授权（签名）

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签名）

莫斯科，1949年3月__日

同上，（上册）第166—167页

斯大林致苏驻朝大使电
同意朝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

优先拍发

平壤

苏联大使：

拜会外务相或副相并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至于建交时间的问题，莫斯科认为越快越好。

电告执行情况。第463号。

菲利波夫^①

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

同上，（上册）第261页

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斯大林与金日成谈话纪录 关于经济计划和文化交流

(1950年4月10日)^①

翻译：文日

金日成对斯大林说：核准的发展朝鲜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今年就要结束了，因此就产生了制定新计划的问题。鉴于要制定新计划，有些问题我们想与您谈谈。

关于机器制造方面的问题。我国近期还没有可能广泛发展机器制造业，所以我们想发展冶金工业——包括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而机器制造产品，如：汽车、拖拉机、机车、仪表等等，我们想从苏联获得。

众所周知，北朝鲜蕴藏有丰富的矿藏，这是朝鲜最重要的资本。

斯大林同志插话问：有些什么矿藏？

金日成解释说，北朝鲜有许多黄金、白银、钨、铅等等矿藏。

斯大林同志说：这太好了。

金日成指出，他们想和苏联政府协商，朝鲜最好是发展什么，苏联对什么感兴趣。

斯大林同志在回答金日成的问题时指出：苏联对从朝鲜获得铅、钨、锡、黄金感兴趣，我们将长期购买这些东西。

随后金日成指出：朝鲜除了无烟煤以外，没有别的煤炭，所以铁路运输费用十分昂贵，但朝鲜的水力发电能力很大，所以我们想对铁

^① 原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根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值班纪录判断，应为1950年4月10日。

路实行电气化。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苏联的援助，希望苏联能给我们提供电力设备、电动机车和变压器等。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设备我们苏联有，我们能够帮助你们。

接着金日成提出了在朝鲜发展造船业的问题。他指出：朝鲜具备发展造船业的条件，有船坞、有很多劳动力，但是没有有经验的技术干部，没有造船的技术图纸，所以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你们有船厂，那就必须发展它们。你们的船坞在什么地方？

金日成说：在元山、海州、咸兴都有这样的船坞。

斯大林同志：我们能够帮助你们发展造船业。

随后，金日成对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想请求您允许我们往苏联派一大批工人去进行生产实习，使他们掌握风镐、橡胶制品、住宅建设等的生产技能。去年我们派了 29 个人。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有什么抱怨的事情没有？

金日成说：他们在苏联工厂工作，对工作条件非常满意。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能够接收，我国东部有这类工厂。

金日成说：迄今为止，除了军事顾问和高等院校教师以外，有 136 名苏联专家在朝鲜工作，其中有 73 人已经到期，将返回苏联。我们想请您补充再派一些苏联专家，为此我们再提交补充申请。

斯大林：好，既然部分人要离开，可以再派一些人。只是你们要在申请书中写清楚，你们需要什么人。

金日成：我们想提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朝鲜的土地使用问题。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的提高。一部分农民有可能变成富农。我们想进行预防，想请求您的指示。

斯大林同志：你们想怎么办，想组织集体农庄吗？

金日成解释说：只要国家还没有得到统一，我们就暂时不这么提

出问题。但我们想在我们将来的计划中预先进行防止。

斯大林同志在回答金日成同志的问题时指出：对这件事情暂时不必着急。你们有国营农场吗？看来，你们的耕地很少。

金日成说，我们有国营农场，但不多。

斯大林同志问：您清楚不清楚，朝鲜有多少耕地？

金日成说了一个数字。

斯大林同志说：地太少了。并问道：你们有沼泽地吗？

金日成解释说，他们没有沼泽地。但他们有些地在涨潮时会被海水浸泡。所以他们想开垦 30 万公顷，建成耕地。

斯大林同志问：从南到北贯穿国家的山脉走向是怎么样的？

金日成回答说：山脉从与满洲交界处一直通到南方。

斯大林同志对金日成指出，他们的耕地太少了。

金日成解释说，他们打算进行耕地建设，向大海夺取大面积的耕地。据朝鲜专家论证，为此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他们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国营农场。

斯大林同志说：对，可以这样。集体农庄的事情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将向你们提供拖拉机，你们应该发展国营农场。

后来，金日成提出了朝苏海运轮船公司的问题。当海运公司建立的时候，朝鲜方面曾同意将属于冶金工厂的港口转交海运公司使用。现在决定恢复冶金厂，自然冶金厂就需要该港口。

可不可以把港口还给冶金厂，而朝鲜方面做出一定补偿呢？

斯大林同志：这当然可以，可以补偿。

金日成解释了将港口转交给冶金厂的必要性。

斯大林回答说：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也可以把海运公司取消。您想怎样就怎样。

金日成说：不，海运公司还需要，只是把工厂的港口还给工厂就是了。

接着，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志帮助朝鲜方面解决军事学院的教师问题，他们想建立一所军事学院，需要 7-8 名教员。

斯大林同志转向布尔加宁同志问：您的意见呢？可以帮助吗？布尔加宁同志回答说：可以帮助。

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们认为可以成立一个远东共产党和劳动党情报局，可以帮助协调这些党的行动。

斯大林同志指出：对此问题还需要斟酌。我们不清楚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如何，我们也不清楚菲律宾的情况。印度有一个共产党，但它的状况也不太清楚。

我们与你们相互是理解的。我们与你们及中国人可以达成协议并相互理解。

金日成回答道：好，现在我清楚了。

随后金日成对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军队解放朝鲜已经过去了 5 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复兴朝鲜文化和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想派一个 75 名演员组成的艺术团去苏联演出，以展示朝鲜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可以派，但只能在今年的夏季。

金日成：对，我们想在今年 5 月、6 月派 75 个人前往。

斯大林同志：好，可以。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种棉花吗？

金日成回答说：是的，我们种棉花。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问到：那么纺织工厂有吗？

金日成回答说：在我们北方有两座工厂，一座在安州、一座在沙里院。但是在南方有大量的纺织厂，主要是纺纱厂。

朴宪永对斯大林同志说：今年是朝鲜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 5 周年纪念，我们请求苏联政府派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好，我们派人前往。

最后，斯大林同志说：关于供货和经济问题，将由你们的代表与我们苏联的组织进行具体的谈判。

金日成回答说：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是为了提出来与苏联政府协商的，此前我们已经进行授权提出自己的申请和建议。

谈话到此结束。

同上，（上册）第 332—335 页

附录三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

(1950年5月14日)

机 密

发自北京

急件

特件

菲利波夫同志：

5月14日14时40分，我拜访了毛泽东，并将您的电报面交给他。毛泽东同志对回电表示感谢，并说，5月13日晚，朝鲜同志同他交谈时详细地向他通报了国内局势以及同您谈话的情况。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同意他们对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

毛泽东继而指出，他告诉朝鲜同志，（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能作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

罗申

1950年5月14日

分送下列同志圈阅：斯大林、斯大林^①、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2卷第412—413页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

① 送斯大林的电报为两份。——编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中国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同盟条约

(1950年5月16日)

绝 密

1950年5月16日优先拍发
密码电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毛泽东，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A·维辛斯基

1950年5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2卷第413—414页

三八线上

附录一 华西列夫斯基等关于三八线形势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4月20日)

致斯大林同志：

现将朝鲜三八线的局势报告如下：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已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

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起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起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期间。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多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是“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

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局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

例如，第1步兵旅已从汉城调到开城地区。

据需要证实的消息称，“南方人”还在继续向三八线调集部队。

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华西列夫斯基^①（签名）

什捷缅科^②（签名）

1949年4月20日

选自《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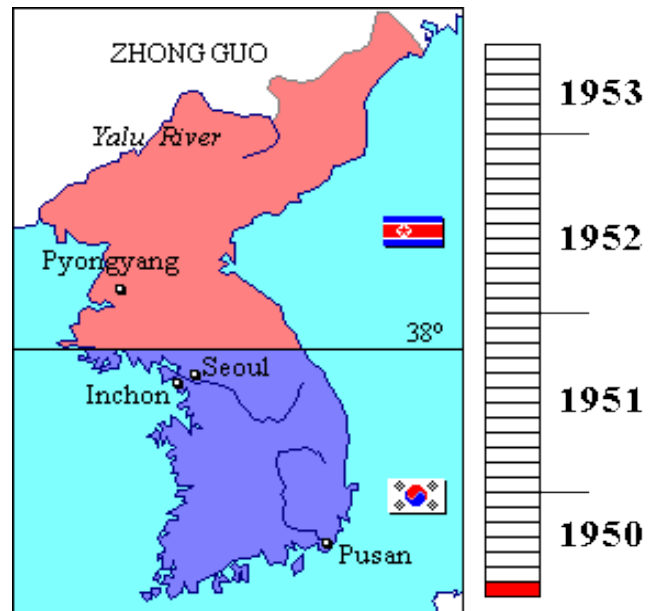
① 华西列夫斯基，苏军元帅，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② 什捷缅科，时任苏军总参谋长。



美国军队突破三八线

(29)



© 2002 Matthew White

三八线南北



附录二 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通报金一与毛泽东会谈情况

(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师问题（朝鲜师系指由满洲朝鲜人组成的师）。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

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4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会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

朱德询问了朝鲜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可以支援朝鲜粮食，同时也请朝方支援中国肥料。

在返国途中，金一会见了高岗。高岗说，他已接到毛泽东关于2个朝鲜师的指示。他表示希望同金日成建立联系。金一问高岗，他能否到朝鲜去。高岗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去。

金一拟于5月底在平壤与高岗会晤。

金一通报说，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朝鲜代表前来访问表示满意，并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

什特科夫

1949年5月15日

附录三 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取瓮津半岛的报告

(1949年9月3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籍朝鲜人）来到我处。他受金日成委托向我通报，他们得到可靠消息，南方最近企图夺占位于三八线以北的瓮津半岛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

文日说，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占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

文日说，金日成认为，如果国际局势许可，他们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取南朝鲜。

我请他转告金日成，这是一个十分重大和严肃的问题，必须加以认真、周密的考虑，因此我郑重地建议金日成不要仓促行事，暂时不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决定。

大概金日成近日内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现已查明，朝方确实截获了一份给瓮津半岛驻军司令的命令，其中要求该司令于9月2日8时开始炮击海州市水泥厂，并将其摧毁。从这份命令中可以看出，南朝鲜方面认为这个工厂是军工厂。

命令中所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但炮击暂时还没有发生。

北朝鲜方面采取了必要措施，以防对工厂的炮击。

关于南朝鲜方面企图夺占位于三八线以北的部分瓮津半岛一事，现在只有南方投诚者的口供。

从8月15日起，三八线上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只发生了一些零星对射和偶尔炮击瓮津半岛的北朝鲜地区，以及擅越三八线等事件。

南朝鲜方面正在三八线上加紧构筑防御工事。

请指示。

顿金^①

1949年9月3日

同上，（上册）第230页

① 顿金，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对关于朝鲜问题来电的答复

(1949年11月5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处

第20475号

收到时间：1949年11月5日2时50分

发出时间：1949年11月5日3时55分

绝密
禁止复印

北京科瓦廖夫收

请将菲利波夫对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如下答复函转交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5日

列印5份：

分送：1. 斯大林同志 2. 莫洛托夫同志 3. 马林科夫同志 4. 第十处
5. 副本

同上，（上册）第276页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朝鲜问题

(1950年1月30日)

平壤

苏联大使馆

致什特科夫：

一、您的报告已接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二、我对金日成同志有个请求。苏联十分缺铅，我们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 25,000 吨铅。如果朝鲜每年能向苏联提供上述吨数的铅，那么，朝鲜将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希望金日成不会拒绝我们这一请求。也许金日成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和某些苏联专家，我们准备向他提供这种援助。请把我的此项请求转告金日成同志，并替我请求他把他对此事的意见告诉我。

约·斯大林

1949年1月30日

同上，（上册）第 309 页

附录四 伊格纳季耶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朝鲜大使李周渊的情况

(1950年4月10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①通知我以下事项：

一、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其中谈到，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李周渊。

在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时，根据后者的提议，讨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对于会晤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李周渊藉口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未作具体答复。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二、金策通知说，朝鲜南方游击队领导人金达三4月3日从南朝鲜来平壤。南方报界和电台曾多次正式宣布，他在与南朝鲜军讨伐队作战时被击毙。金达三来北朝鲜汇报南朝鲜游击队运动的形势并接受对此问题的指示。

金策请我把上述各事通过什特科夫同志转告金日成^②。伊格纳季耶夫^③

1950年4月10日

同上，（上册）第336页

① 即金策。

② 此时，什特科夫正陪同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

③ 伊格纳季耶夫，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军事器材、金日成访苏等事

(1950年5月3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毛泽东下述事项：

“致毛泽东同志

一、您有关空军器材、海军器材和顾问的申请单已收到。王稼祥^①应已告知您，这些申请单将尽快落实。

二、在与罗申^②和阿尔希波夫^③会谈时刘少奇提出，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有些人中国已经不需要了。请将这些专家的名字告知，以便我们能尽快将他们召回。

三、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

四、王稼祥转来您寄来的有关印度问题的材料。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印度的同志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认为，此后不必专门发表批驳这些同志的文章。需要的只是观察他们是否确实在自己的政策中实现了明显的转变。

向朋友们致敬”

5月3日 菲利波夫

又及：

罗申同志，请您将本电第二项内容转告阿尔希波夫。

菲利波夫

-
- ① 王稼祥，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 ② 罗申，时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 ③ 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和苏联在华专家顾问组组长。

附录五 什特科夫报告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的谈话

(1950年5月12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李周渊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动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的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 一、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 二、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 三、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和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四、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3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同上，（上册）第381—382页

附录六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想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说明

（1950年5月13日）

发自北京

立即报告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5月13日23时30分，周恩来来我处，并根据毛泽东委托转告以下事项：

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天5月13日来北京。

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一行。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三、朝鲜同志将在北京停留两天。

鉴于上情况，毛泽东同志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根据罗申同志转来的菲利波夫同志的上一封电报，本应在近几天内就接到说明”。

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罗申

1950年5月13日

同上，（上册）第383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的条件

(1950年5月14日)

1950年5月14日4时10分收到

1950年5月14日5时3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菲利波夫”

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维辛斯基（签名）

1950年5月14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处，复件存档

同上，（上册）第384页

附录七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转上级电：关于朝鲜开始进攻时间

(1950年5月30日)

密码电报

绝密

禁止复印

- 第1份：作修改用
- 第2份送：斯大林同志
- 第3份送：斯大林同志
- 第4份送：莫洛托夫同志
- 第5份送：马林科夫同志
- 第6份送：贝利亚同志
- 第7份送：米高扬同志
- 第8份送：卡冈诺维奇同志
- 第9份送：布尔加宁同志
- 第10份送：维辛斯基同志
- 第11份送：葛罗米柯同志
- 第12份：副本

发自平壤

1950年5月30日13时40分第16030号

16033 16044

专号：第408-410

特档

优先拍发

致维辛斯基（转呈上级）：

5月29日，根据金日成的请求，我与他进行了会晤。在会晤开始时，金日成通报说，他在莫斯科期间要求的那些武器和弹药已经基本上运达了。武器已经被分运给重新组建的那些师，在6月1日前将全部发到士兵手中。接着金日

成继续通报说，他已经到这些重新组建的师里去过，考察了他们的军事训练进程，并认为，到6月底这些师将具备战斗能力。

金日成说，根据他的委托，总参谋长已经结束了关于进攻的原则性决定的研究工作。总参谋长已经将这个决定的提纲报告给他和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他赞成采取的决定和选定的在进攻时主要打击的方向。他请求我与他、总参谋长和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一起会面，共同审阅这个决定。我回避了这样共同的会晤，并藉口说，我要到瓦西里耶夫将军那里了解一下这个决定。

接着金日成通报说，陆军中的组织筹备工作在6月1日前能够全部结束。海军中的工作要落后一些，因为他们还没有收到一艘苏联的扫雷舰和猎潜舰。这些战舰的全体船员已经选出，但是还没有接受培训，因为还没有这些舰只。他请求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运来这些舰只。我回答他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这些舰只将在6月初运抵朝鲜。接着金日成还指出，他们的步兵已经准备参加战斗行动。10个步兵师中有7个师已经准备好参加进攻行动。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团也都准备就绪。3个新射击师的训练工作将在6月份结束。这对他们来说完全合适，因为他们被指定作为第二梯队。

接着他指出，南方人完全没有掌握关于人民军状况及其战斗准备情况的资料。但是，他们目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的部署，虽然南朝鲜的部队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考虑到人民军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行动的准备，他希望在6月底开始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继续拖延军事行动的开始对北方人是没有好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南方人将会发现他们的计划并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军队。第二，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到那时就不得不将进攻行动推迟到9月份，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接着金日成指出，根据总参谋长的报告，他需要16天的时间集结部队。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在6月8-10日开始调集部队。金日成说，在党的政治委员会讨论会上他还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打算在最近几天提出这个问题，这取决于进攻行动开始的时间。我回避了直接回答他提出的关于战斗行动开始的时间这个问题，并藉口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应该与军事领导人商量，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好自己的部队，还要同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们商量，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附注

在就这些问题与金日成进行会谈之后，我召见了顾问瓦西里耶夫将军和波

斯特尼科夫将军，了解他们对朝鲜军队准备工作的程度和6月底开始战斗行动的可行性的看法。瓦西里耶夫将军和波斯特尼科夫将军认为，集结部队和与师、团指挥员详细研究作战行动需要很多时间，因此，7月份开始进攻行动是合适的。但是，考虑到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以及南方人将会发现北方人的战斗准备计划，并开始加强自己的队伍，他们更倾向于，人民军能够结束部队的准备工作并于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

我的意见

由于金日成打算在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并且在此之前部队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期限。

接着，金日成通报说，他与朴宪永对政治措施计划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向南方人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最初他们考虑代表祖国阵线发表声明，而后来改为代表政府。他请求我接见朴宪永，并帮助他起草这些文件。我对此表示同意。

谈话结束时，金日成请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贸易代表处定购的、时至今日仍未收到的药品的运输工作，以及应该在6-7月份运达的10,000-15,000吨石油。金日成强调指出，目前他们非常缺乏汽油。我答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支持金日成的请求，他们确实非常需要药品和汽油。

我请求就所触及的问题尽快下达指示。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30日

12份

列印：5月30日20时20分

分送：

发放：列古诺夫

同上，（上册）第401—403页

附录八 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上级赞成您的建议

（1950年6月1日）

专号：第333号
密码电报

平壤 苏联大使 第1份

特档

优先拍发

1950年5月31日

答复您的第408-410号电报。

上级赞成您的建议。药品和石油将提前收到。

葛罗米柯^①

1950年6月1日

分送：

1. 斯大林同志
2. 莫洛托夫同志
3. 马林科夫同志
4. 维辛斯基同志
5. 作副本用

同上，（上册）第404页

① 葛罗米柯，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附录九 朝鲜外务省通报：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发起突然进攻

（1950年6月26日）

发自平壤

致安·安·葛罗米柯同志：

在此向您转呈朝鲜外务省于1950年6月25日通过无线电广播所做的通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通报：

今年的6月25日清晨，南朝鲜傀儡政府所谓的民族国防军部队，沿整个三八线向北朝鲜发起了突然进攻。开始突然进攻的敌人，攻入了北朝鲜境内，纵深达三八线以北1-2公里的海州以西地区，以及金川、铁原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保安部队下达了命令：打退攻入北朝鲜境内的敌人的进攻。目前，共和国的保安部队正在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共和国的保安部队在杨阳地区已经打退了攻入北朝鲜境内的敌人的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责成外务省，警告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如果不立即停止自己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冒险的军事行动的话，他们将采取坚决的措施消灭敌人，而对于所有这一切因冒险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南朝鲜傀儡政府当局将承担全部责任。”

什特科夫

同上，（上册）第406页

战局初开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关于朝鲜战局的几个问题

(1950年7月1日)

平壤

苏联大使：

一、你对朝鲜司令部的任何计划都没有报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推进。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外国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二、还要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被吓坏了，还是在继续地顽强坚守。

三、朝鲜政府是否打算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我们认为必须这么做。

四、我们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将这点通知金日成。

冯西^①

1950年7月1日

第362号电

同上，（上册）第424页

① 冯西，斯大林的化名。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是正确的

(1950年7月5日)

1950年7月5日23时45分收到

1950年7月6日0时55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一、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二、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三、您关于苏联飞机在中国东北领空飞行的消息未得到证实。已下令禁止此类飞行。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上册）第431页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朝鲜人民军必须重视补充兵员

(1950年7月6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同志：

复第 439 号密码电报。

一、武器将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

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三、我们全部供给 2 个师、2 个坦克旅和 12 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以及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 12,000 人。必须在各师建立征兵机构，负责补充兵员并对其加以审查和训练，然后补充到各师。这才是最重要的。

冯西

1950年7月6日

第 374 号密码电报

同上，（上册）第 432 页

附录一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谈苏联顾问和中国代表等事

(1950年7月8日)

第477号

1950年7月7日，根据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

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问道：嘿，苏联顾问的事情进展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汉城？我答道，近两天我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至今仍未接到上级关于苏联顾问可以到三八线以南的指示。

金日成说，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向他询问苏联顾问是否与自己一同前往南部。金日成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于是姜健声称，如果苏联顾问不到汉城来，自己便什么也干不成。因为没有苏联顾问，自己便无法指挥部队。

我再次答道，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可补充的。

金日成说，如果苏联顾问不去汉城，那就意味着失败，再说一次，就是崩溃。金日成接着说，姜健请他立刻正式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其允许苏联顾问前往汉城，到各军团领导小组中去，自己将保证苏联顾问的安全，不会让他们当敌人的俘虏。

随后，金日成又让我向他解释成立预备役兵团，对其中人员进行培训和组建步兵营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的意义。

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

会谈期间我通知金日成，朝鲜最近预订的空军设备、武器和弹药已装运，将于7月8日运抵边境口岸。我问他，关于这些货物经中国铁路转运至朝鲜境内之事是否已与中国人达成协议。

他答，正式的协议还没有。不过，他已给高岗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与此同时，金日成带着明显的不满说道，没有人可以和他签订协议，因为在平壤没有中国代表。最后，金日成再次请我加快关于苏联顾问问题的答复。

金日成接着说，各地区均给他打电话，都是关于美国空军的空袭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今天美国人炸毁了一个铁路枢纽，咸兴地区被敌机摧毁的多座铁路桥仍未恢复。

在我与金日成的多次会面中，这是我首次看到他的心绪如此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

什特科夫

同上，（上册）第 438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
(1950年7月8日)

1950年7月8日18时40分收到

北京

苏联大使：

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

菲利波夫

第379号密码电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上册）第437页

斯大林致驻朝大使电
建议朝鲜驳斥美国诬蔑人民军虐待战俘

(1950年7月13日)

平壤

苏联大使：

建议朝鲜方面立刻回复赖伊^①，朝鲜军对待俘虏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要让朝鲜方面在报纸上揭露美国报纸关于朝鲜方面虐待俘虏的诽谤。最好，俘虏中能有人通过广播宣称朝鲜方面对俘虏态度良好。

冯西

1950年7月13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上册）第445页

^① 赖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关于驳回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1950年7月13日)

平壤

苏联大使：

转告金日成以下事项，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①把他们自己的意见通报给我们。

“英国人正式通过自己驻莫斯科大使向我们宣称，他们在遵守安理会决定的前提下，暂时不能提出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建议，但是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的军队撤回三八线，那将可能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表明自己的意见。

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厚颜无耻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打算这样回答：由于外来武装干涉使朝鲜问题异常复杂化，这一复杂问题只有通过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安理会，才能得到解决，同时邀请朝鲜的代表到会，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请告知您的意见。

冯西

1950年7月13日”

电告执行情况。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上册）第449页

① 原文如此。疑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之误。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英国无理要求和安排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7月13日)

1950年7月13日3时15分收到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下述事项：

“一、英国人通过其驻莫斯科大使向我们发出正式照会，申明他们由于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暂时还无法提出有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的部队撤回三八线，那就可能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提出自己的主张。

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毫无道理的和不能接受的。

我们打算答复，朝鲜问题在外国武装干涉以后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样复杂的问题只能在苏联和中国参与下，由安理会加以解决，同时邀请朝鲜代表参加会议，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

请告知您的想法。

至于印度大使的声明，我们不打算答复他，因为现已查明，他的声明是他个人的看法，印度政府与此无关。

二、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

我们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

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绘你们的飞行员。我们考虑，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请告知您的意见。”

请电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上册）第 450 页

斯大林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回信

(1950年7月15日)

印度共和国总理

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

欢迎您的和平倡议。完全赞同您的观点，同样认为通过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5大国代表必须参加的安理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适宜的。我认为，为尽快解决朝鲜问题，在安理会上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是适宜的。

顺致敬意。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7月15日

选自《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454页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 对朝鲜人民军作战问题的建议

(1950年8月28日)

平壤

苏联大使：

口头转告金日成以下事项。如果他要求书面形式，可以给予，但不要签署我的名字。

一、联共（布）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的辉煌胜利。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

二、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对德作战时期就未曾有过连续的胜利。朝鲜人民的最大胜利就是，朝鲜已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军队现在都将向朝鲜人民军学习给予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坚决打击的艺术。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现在朝鲜并不是孤立的，他拥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

三、建议金日成同志在前线不要分散使用而要集中使用空军。要使人民军在每次进攻开始时，都有强击机对敌人军队的有力打击与互相配合，而歼击机则尽可能保护人民军不受敌机的攻击。如果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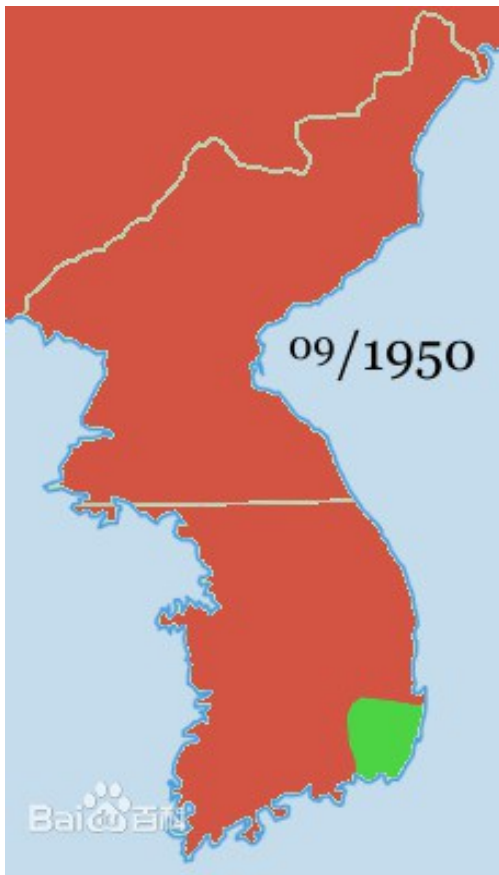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

冯西

第 483 号密码电报

1950 年 8 月 28 日

同上，（中册）第 515 页



(61)

美韩军被压在釜山一隅



仁川登陆，战局剧变

附录二 联共（布）政治局关于同意与美方接触的决议

（1950年9月27日）

1950年9月27日决议

71. 维辛斯基同志的第62号电报

批准给维辛斯基同志的回电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给维辛斯基的电报稿^①

纽约

致维辛斯基：

请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

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

请电告结果。

根据上级委托。

安·葛罗米柯

同上，（中册）第555页

① 该电于1950年9月28日4时45分发出。

斯大林给马特维耶夫和什特科夫 关于扭转朝鲜作战局势的指示

(1950年9月27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0年9月27日决议

73.朝鲜问题

批准给马特维耶夫^①和什特科夫的指示。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斯大林给马特维耶夫和什特科夫的指示稿

平壤

致马特维耶夫、什特科夫：

近日来，在朝鲜人民军前线，无论在汉城地区还是在东南部都出现了严峻形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线指挥部、方面军指挥部和师指挥部在部队指挥，特别是在部队战斗中使用策略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的结果。

我们的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我们的军事顾问没有做到准确和及时地执行总司令官关于将4个师从主要战线撤退到汉城地区的命令，而当时有充分的可能做到这一点，结果延误了7天时间，从而给汉城附近的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及时撤出这些师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形势的。

① 马特维耶夫是扎哈罗夫的代称，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

到达在汉城地区的几个营和独立团编制不整，且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分散并与司令部失去联系，因而没能发挥作用。从东南部调来的一个师仓促地投入了零星而没有组织的战斗，这使敌人轻而易举地打垮了他们。本来按照我们事先的指示，这个师应该部署在汉城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在那里进行休整，那怕给予一天时间的休整，使其做好战斗准备，只有在此以后才能有组织地使其投入战斗。

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战术是错误的和根本不允许的。近来你们在战斗中使用坦克时，事先不进行炮击为坦克开路，因此你们的坦克很容易就被敌人击毁了。具有卫国战争经验的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应当知道，这样外行地使用坦克只能造成损失。

我们的顾问在战略上无知，而且不懂得侦察工作，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不了解敌人在仁川登陆的重要战略意义，而什特科夫甚至建议把《真理报》报导美国登陆消息的作者交付法庭审判。这种无知和缺乏战略经验，导致了对把部队从南方调到汉城地区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调动本身被拖延了，从而失去了7天的时间，这使敌人感到高兴。

我们的军事顾问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如部队调动问题、组织侦察工作问题和进行战斗指挥问题，对朝鲜指挥部的帮助太少。结果，朝鲜军队各部队几乎没有指挥，盲目地进行战斗，在战斗中不能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在顺利进攻时这或许还可以容忍，但在前线形势复杂化的情况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你们必须把这一切向我们的军事顾问，首先向瓦西里耶夫说清楚。

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向朝鲜指挥部，特别是在朝鲜人民军从东南部有组织地撤退和最快地组织起汉城东部、南部和北部新防线问题上提供帮助，我们的顾问必须做到：

一、主力部队的撤退要在从各个师中拨出的能够对敌人进行顽强抵抗的强大的后卫部队掩护下进行，为此，后卫部队的领导应由有战

斗经验的指挥员担任；用大炮，首先是反坦克炮，工兵部队，在有可能的地方用坦克来加强后卫部队。

二、后卫部队必须广泛利用各种障碍物，为此可使用地雷和其他有效手段进行节节阻击。后卫部队的行动应当是果断的和积极的，以便赢得主力部队撤退的时间。

三、各师主力尽可能不分散，而是要集中，要准备好以战斗开路。要从主力中抽调有战斗力的先头部队，配以大炮，可能的话还要配备坦克。

四、坦克只能在事先进行炮击后与步兵协同使用。

五、派出的先头部队应当占领峡谷、桥梁、渡口、山口和主力前进道路上的重要枢纽，并坚守到主力通过。

六、在部队撤退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作、侦察工作以及保卫侧翼和保持各部队之间联系的问题。

七、在组织防线时，应当避免把力量分散在整个战线上，而应当牢固地保卫主要方向和建立主动出击的强大后备队。

八、在组织朝鲜指挥部同各部队的联系时，要利用无线电通讯工具，并使用密码。

在组织我们的军事顾问根据上述指示开展工作时，你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像过去已经指出的那样，不要让任何一个顾问被俘。

报告所采取的措施。

冯西

同上，（中册）第 556—558 页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 对朝鲜作战局势的处理意见

(1950年10月1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9月30日和10月1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的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断。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共和国进行防御的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朝鲜共和国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

1950年10月1日

同上，（中册）第573—574页

中国出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

(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分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

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同上，（中册）第571页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①、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罗申

1950年10月3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中册）第576—577页

^① 尤金，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899-1968），苏联哲学家，其时正在中国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1954年出任驻华大使。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1950年10月5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将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5日

同上，（中册）第581—584页

附录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的态度和顾虑

(1950年10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7日11时55分收到

第1份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4676号电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到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5-6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9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108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1个军（3个师）就有大约1,5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1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4倍的兵力和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

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 1,000 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 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 22 亿美元，其中只有 2 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 10 月 8 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 1 小时 45 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罗申

1950 年 10 月 7 日

第 2318 号

译电：阿拉乌什金 第 9-10 号，第 8 处

1950 年 10 月 7 日，13 时 00 分

列印：切列金奇娜

1950年10月7日13时50分

第8609号

第1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2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

第4份送：马林科夫同志

第5份送：贝利亚同志

第6份送：米高扬同志

第7份送：卡冈诺维奇同志

第8份送：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中册）第588—590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信

中国表示过一些时候再出兵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了他：

(信见本卷第69页至第70页，此处略。——本书制作者注)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

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同上，（中册）第 591—592 页

附录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

(1950年10月1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4日1时38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2时译出

1950年10月14日3时30分送出

致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第2406号电（包括在第25612号电内）^①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见到此电。

罗申

10月13日

第2408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中册）第597—598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中国决定援助朝鲜，暂缓部队向北撤退

（1950年10月14日）

平壤

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

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

冯西

1950年10月13日^①

同上，（中册）第600页

^① 原件如此，应为14日。根据前后文件内容看，斯大林是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电报之后发出此电的，而罗申的电报送到斯大林处已经超过了14日3时30分。故该电应是在此后时间拟就并发出的。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中国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的最后决定
(1950年10月14日)

平壤

苏联大使：

向金日成转达：

经过犹豫和若干暂时的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

我为终于做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

有鉴于此，您要注意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中国军队所需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祝您成功！

冯西

1950年10月14日

同上，（中册）第601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84)



中国伸出援朝之手

军事援助 (上)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8日)

急电。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28日19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10月27日收到毛泽东致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

因此，我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同志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随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两同志。

上述事项请您研究，并给予适当答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7日”

备注：扎哈罗夫^①同志看过该电报后认为，海军司令员随同库兹明一起赴莫斯科谈判是必要的。

罗申

第2623号电

1950年10月28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中册）第607页

^① 扎哈罗夫，时任苏联军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来莫斯科
(1950年10月29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海军问题的电报已收到。同意萧劲光等同志来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29日

送：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中册）第608页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关于留下苏联顾问整编朝鲜部队问题

(1950年11月1日)

致什特科夫：

您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和顾问留下来在朝鲜人的指挥下整编朝鲜的部队。这是您的观点，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不清楚朝鲜政府的观点，我们还不清楚朝鲜政府是否希望留下苏联军官和顾问，或者他们认为请中国人更好。您至今尚未通告我们朝鲜政府就此事的观点。我们不能强求朝鲜政府留下苏联军官和顾问。请金日成告知对这件事的看法。

斯大林

1950年11月1日

同上，（中册）第611页

附录二 金日成致斯大林信：请求留下苏联顾问培训部队

（1950年11月2日）

致冯西：

转呈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给您的信。

“冯西同志：

与中国同志商定，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进行准备的人民军后备队有：9个步兵师、军官学校、坦克训练团、附设1个航空训练团的航空师；在朝鲜境内补充装备6个战斗师。

现恳请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境内留下除军事学院之外的现有军事顾问，以帮助上述师团及军校进行短期培训。

金日成”

我赞同金日成同志的请求。

什特科夫

第1577号密码电报

1950年11月2日

同上，（中册）第612页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供应步兵武器装备

(1950年11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1月8日0时2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12个军，计36个师，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略——)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我。^①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0年11月7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同上，（中册）第616—617页

① 11月9日，周恩来会见扎哈罗夫，得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的步兵武器，并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您关于加强空军的建议

（1950年11月15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①，通过给中国补充两批共120架米格-15飞机来加强别洛夫空军师的力量，并建立航空兵指挥部。

至于东北各机场全面加强防空措施的问题，我们将与扎哈罗夫同志一起解决。

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祝您一切顺利！

毛泽东

1950年11月15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同上，（中册）第622页

^① 11月15日晚，扎哈罗夫向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120架米格-15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成立空军军一级指挥部。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商定：苏联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在安东附近再修建一个机场供其使用。

附录五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抽调苏军汽车事宜

(1950年11月17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据彭德怀和高岗报告，我们从事后方运输的车辆不足，敌机给运输汽车造成了损失，而当地人力资源和物资也同样无法保障供给，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到敌机轰炸。

江水开始封冻，因而无法架设暗桥和浮桥。所以在大江尚未封住，汽车尚不能从冰上通过之前，我们必须在最近八、九天内，以极快的速度运输粮食、冬装和弹药。否则，将影响下一阶段战役的完成。

因此，除了动员东北一切可以动员上前线的车辆，我们最多能从中国北方动员 200 辆汽车，并迅速将其派往前线以解燃眉之急外，我恳求您命令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部给我军运送 500 辆汽车。这 500 辆汽车将从您答应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5 日发来的那批为数 3,000 辆汽车中抽出归还。

您能否满足我的请求？请您尽快给予答复。^①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第 2933 号电

1950年11月17日10时

同上，（中册）第 625 页

① 11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曾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紧急提供 500 辆汽车
(1950 年 11 月 17 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 500 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的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的汽车，11 月 20 日移交中方代表 140 辆汽车，11 月 25-26 日移交 355 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今年 12 月 5 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 1,000 辆汽车。

菲利波夫

1950 年 11 月 17 日

同上，（中册）第 626 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关于培训朝鲜飞行员的问题

(1950年11月20日)

致什特科夫同志：

转金日成同志：

您关于培训飞行干部的电报，由于苏联办事机关的延误，收到较迟。

据我军方人员的意见，这一问题采取下述方式解决较为适宜：

一、在中国东北地区在现有的延吉航校内，组织培训 200-300 名选自朝鲜大学生的飞行员。

培训这些追加名额的学员将派去苏联教官。

二、可以在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我们的某个米格-15 喷气机航空师组织培训两个喷气歼击机团飞行员的工作。培训之后，将提供给这些飞行员米格-15 飞机。

关于培训一个轰炸机飞行团的飞行员，最便利的办法是在朝鲜人在我们滨海边疆区办的航校进行培训。在物质方面，将提供轰炸机飞行团所需的图-2 飞机。

三、我们同意额外接收 120 人，在滨海边疆区朝鲜航校学习，把他们培训为航空机械师和强击机飞行员。

四、朝鲜飞行员接受空中实习的地方，最好就在他们学习的地方，即在中国东北或苏联滨海边疆区。

如果您同意这些建议，将向我方的作战司令部发出相应指令。

冯西

1950年11月20日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军事贷款支付差额问题

（1951年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16日14时3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1月4日电报已经收到。

我完全同意您的电报中所做出的所有安排，感谢您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

二、我们已对军事贷款协定草案进行了研究。

我们完全同意该协定草案，但第3条第1和第2款除外，我们根据您今年1月4日电报已对两款做出了修改，并请扎哈罗夫同志转告您。

有关该协定的签订问题，将由周恩来同志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加以解决。

三、您在您的电报中称，在1950年前10个半月期间，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不久前，王稼祥同志带回了2月和5月军事物资申请单，这两份申请单，他是从外贸部军事工程局得到的，其总价值为237,548,103.64卢布，其中2月申请单为114,415,274.67卢布，5月申请单为123,132,828.97卢布。

我方电报中所列出的军用物资供货总价值为9,750万多卢布，因此这一总额低于2月和5月申请单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

由此可否认为，申请单中所订购的军用物资尚未完全到货？这一差额是否将于1951年补上？请您将此告我。

四、您已确定了1951年军事贷款数额，这非常好。待我们对前两份申请单作一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将拟定1951年军用物资申请单，并对这些军用物资的价值作仔细核算，以使其总价值不致超过您所确定的4亿卢布的数额，使苏联政府不致因完成我们的军事订货而负担过重。

五、对您做出的关于根据军事贷款协定，用军事贷款方式向我们提供铁路设备，并将这种设备减价25%的决定，我深表感谢。

六、我们同意对 1950 年已提供的 5,000 辆汽车及将于 1951 年提供的 12,000 辆汽车要按商品流通付款的意见。我希望，您对我的请求进行研究，并对提前提供其余 12,000 辆汽车，以满足前线需要一事做出答复。

七、请告知我们，1950 年 10 月 19 日发出的军用物资申请单中所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汽车汽油和航空汽油，是否已将其列入军事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军用物资之中？军事贷款协定是否适用于上述汽油？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 年 1 月 14 日

送：斯大林同志（2 份）、莫洛托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

同上，（中册）第 661—662 页

相互支援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感谢朝鲜提供铅，将满足朝所需装备

(1950年3月1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

请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答复转告金日成：

第一，接到您3月4日关于同意按您列出的数量向苏联提供铅的通知。谢谢援助。至于您所要的设备和材料以及铅工业专家，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请求。

第二，还接到您3月9日提出的向贵方提供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的建议。苏联政府决定也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顺致敬意。

约·斯大林

1950年3月18日

同上，（上册）第328页

附录一 苏联外交部致周恩来电：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

(1950年11月9日)

1950年11月9日决议

448.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所附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给罗申同志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葛罗米柯给苏联大使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周恩来：

您请求就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进行协商的电报收悉。

我们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以同样的方式拒绝接受安理会提出的邀请。理由是该邀请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讨论中国最迫切问题，即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台湾问题的权利，因为它规定中国只有权参与审议麦克阿瑟的报告。

第二方案：接受邀请，并委托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就上述问题发言，把问题的讨论变成为对美国的声讨。如果不让中国代表团充分阐明其立场，中国代表团就离开会场，并拒绝只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

我们认为，第一方案更为妥当^①。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投票赞成英国代表德雷布议案的行为不应束缚你们的行动，况且，我们内部讲，苏联代表马立克并没有得到投票赞同英国议案的指示，给他的直接指示只是在苏联议案遭到否决的情况下行使否决权。看来，马立克对他终于迫使美国人赞成邀请中国着了迷，但他没有考虑到安理会通过的邀请形式会把中国置于不利地位。

请电告执行情况。

安·葛罗米柯

1950年11月10日

① 11月11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本届安理会主席贝勃勒，声明中国绝不接受安理会本月8日提出的“邀请”中国代表与会参加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的决定，同时要求安理会将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议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在安理会能够同时提出控诉。

斯大林签署部长会议决定 派遣在苏朝鲜籍大学生去中国东北

(1950年11月28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责成苏联国防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0年12月5日前，向满洲派遣在苏联民用高等院校学习的朝鲜籍大学生200人。派遣费由苏联国防部的资金支付。

二、责成苏联国家公安部（阿巴库莫夫同志）以简化的手续，通过当地警察局直接给朝鲜大学生办理出境签证。

三、责成苏联外贸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办理与派遣朝鲜学生去满洲有关费用的结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事务管理局局长

M.波马兹涅夫

同上，（中册）第631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关于帮助朝鲜恢复铅工业生产的问题

(1951年2月3日)

金日成同志：

我们的铅不足，不仅无法满足中国和朝鲜的需求，连自己所需都不够。因此我们决定派苏联专家小组去朝鲜帮助朝鲜各机构制定恢复矿山、选矿厂和铅工业工厂的措施。我们还想组织将铅矿石运往苏联进行加工，因为目前在朝鲜无法加工这些矿石。

我们希望，你们不会反对这一意见。等候答复。

冯西

第83号密码电报

1951年2月3日

同上，（中册）第690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对美国单独准备的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1951年5月6日)

发自莫斯科

致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

我们已拟定了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并决定于5月8日（星期二）将其送交美国大使。我们于5月6日晨将我们复函的内容给您送去，请至迟于5月7日24时前将你们的意见寄我。

我们复函的内容可归纳如下：

“我们对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要求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中、苏、美、英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二、我们要求该条约草案中应明文确定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

三、我们认为把日本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是不妥的。

四、我们坚持要仿照同意大利签订和约时的做法，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

五、我们的复函是这样结束的：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决主张尽快同日本签订和约，并且认为，该和约必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强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加以制定。该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参加这一工作。

据此，苏联政府提出：

第一，1951年7-8月份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代表组成的

外长会议，以便起草对日和约，并且要吸收所有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参加制定对日和约的起草工作，然后将该和约草案提交和平会议审定。

第二，对日和约的制定，要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达协定为基础，并遵循以下主要目的：

（一）日本应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二）必须如同对意和约所规定的那样，确保日本国民有民主的权利，不允许有那种以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军事或军事化组织的存在；

（三）如同对意和约所规定的那样，和约中必须规定限制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以使其不致超过自卫需要；

（四）在发展日本和平经济方面不对日本施加任何限制。

第三，该条约中应规定，日本不得参加那些旨在反对会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某一国家的联盟。

第四，该条约中应明确规定，自对日和约签订之日起，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第五，还要商定，凡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国家均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6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同上，（中册）第755—756页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1951年5月7日)

发自北京

1951年5月7日23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转去，其全文如下：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6日电报已收到。完全同意您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1951年5月6日24时”

罗申

1951年5月7日

说明：1951年5月6日，博戈莫洛夫^①同志转交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送：斯大林同志（2份）

同上，（中册）第757页

① 博戈莫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向朝鲜人民赠送 5 万吨面粉

(1952 年 4 月 14 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援助朝鲜粮食的决议

1952 年 4 月 14 日决议

104. 朝鲜问题。

批准所附电报文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

平壤

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即刻面交）：

转金日成同志：

我已得知朝鲜人民需要粮食的消息。我国西伯利亚有 5 万吨加工好的面粉。我们可以把这些面粉赠送给朝鲜人民。如你们同意请电告。我们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立刻发运面粉。

敬礼！

约·斯大林

1952 年 4 月 14 日

送：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维辛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同上，（下册）第 1167 页

战局进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

(1950年12月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的第3153号电报。

感谢您告知中国国内情况，并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地展开攻势。

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为之振奋。请允许我向您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们在抗击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并变成为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1日”

同上，（中册）第633页



(109)



三次战役，展开攻势

附录一 罗申：中国政府拟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发自北京^①

1950年12月7日6时55分收到

特急

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我，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传达了下述事项：

近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克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只一次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②：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

他们的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在不利的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将下述说明交伍修权，以答复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特里克夫·赖伊：

“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周恩来以书面方式转交了上述条件。

周恩来接着说，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

①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

② 195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恳切地要求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希望今天就得到答复。

我告诉周恩来，对于他转达的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和有关答复的请求，将尽快呈报苏联政府。

罗申

1950年12月7日

同上，（中册）第639—640页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1950年12月7日)

特急

1950年12月7日19时10分收到

1950年12月7日20时4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

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①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十处，副本存档

同上，（中册）第641—642页

^① 12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13日，周恩来电示伍修权、乔冠华向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的作战计划

（1951年1月28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29日18时4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目前美军正企图向汉江南岸通往汉城和仁川的地区实施进攻。已形成的情况是：我军已无法继续进行休整，被迫立即准备第四次战役。现将我1951年1月28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寄给您，请您一阅。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请将您的看法告我。

“彭德怀同志：

一、你1951年1月27日的电报及给各军关于准备实施军事行动的命令，均已收悉。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三、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展进攻。

四、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敌）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

五、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但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六、我部队尚未得到人员补充，调动转移也不够。在这一方面尚有很大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城方向突击，消灭部分美军和4-5

个南朝鲜师。请你在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

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以后，必须再进行2-3个月的准备，此后才能实施带有决定性的最后一次即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来看，这较为有利。

八、第9兵团必须于最近转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地区，以便进行休整。同时，该兵团必须担负防守该地区的任务，以防止敌军在仁川和镇南浦登陆。在第五次战役期间，该兵团必须参加前线西段的战斗行动。

九、在进行第四次战役期间，请您考虑一下：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主力分为两个梯队，这是否更好一些？第一梯队部队必须携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部队负责完成突破，将敌军追击到一定地区，而第二梯队部队则负责继续追击敌人，以使战役能持续10-12天时间，并利用这一时间尽量歼灭更多的敌军。

你意如何，盼复。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19时”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

第478号电

同上，（中册）第673—674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第四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1951年1月30日)

北京

扎哈罗夫：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28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已收到。同意您的看法。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正确的。

第60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同上，（中册）第675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的问题

(1951年1月30日)

北京

扎哈罗夫：

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兹送去我给拉祖瓦耶夫^①的电报副本。望告知您的意见。

“致拉祖瓦耶夫同志：

请您与金日成同志及其亲密的朋友商讨下列电报，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一、可以认为无可争议的是，现有的朝鲜师在作战能力上，不如去年夏季原有的师。原因在于，当时朝鲜人有10个师，它们编制齐全，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训练有素的。而现在，朝鲜人有28个师，其中19个师在前线，9个师在中国东北。显然，对于数目如此庞大的师，朝鲜人无法保证配齐各级军官。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每个师有8,000人，至少必须有800名军官，士官还不算在内。我指的是有能力把一个师凝聚在一起的真正的军官，而不是匆忙中授予军官称号的人。显然，朝鲜人还没有这么多的军官。所以，现在的朝鲜师是稀松的、不坚强的和缺乏战斗力的。朝鲜人只追求军队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军队的质量。

二、在目前情况下，朝鲜军队以不超过23个师为宜，因为精简

^① 1951年初，拉祖瓦耶夫接替什特科夫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下来的5个师的军官可以补充到其他编制不全的师中去，而士兵则用来作为预备部队，这将加强各师的力量，削减开支，在装备上也会占有优势。对于4个缺乏战斗力的朝鲜陆战旅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它们军官和士兵补充到各个师里去。

三、在现阶段，组织集团军的指挥系统不合适，因为能够领导集团军的指挥员，目前还没有或者是几乎没有，而军团的指挥机构已经有了。最好组织5个军团的指挥机构，每一军团辖4个师，以便军团的指挥机关能亲自直接地领导下属各师。在此情况下，朝鲜武装力量可有5个军团的编制（总计20个师），而3个师可以作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以便在战役过程中支援最迫切需要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指挥员们成长起来了，指挥员的数量充足了，也学会了指挥师的联合作战时，就可以转向集团军的建制。

当然，上述改编并非现在就要进行，而是在战役以后休整时期再做。

请你们讨论这些建议，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

冯西”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同上，（中册）第676—677页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
我的电报不是指示而是建议

(1951年2月3日)

致拉祖瓦耶夫同志：

您没理解我1月30日有关朝鲜师的电报。这封电报不是指示，而是想同朝鲜同志一起讨论的建议。电报中我请求告知我朝鲜同志的意见和你个人的意见。而您却回答我说，我的指示您将照办。您没弄明白我的电文。请再次向金日成及其朋友们说明我的电报，并在讨论了我的建议之后，将朝鲜人的意见通知我。

冯西

1951年2月3日

第81号密码电报

同上，（中册）第689页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1951年3月1日）

发自北京

1951年3月2日2时4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来京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确定的一些意见告您。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军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月当中，敌人当占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了其中的60-70%，而其余30-40%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重新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10个军（计30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从中国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3个军（将于最近得到补充，其中2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9个军（27个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4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6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6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4个军，共计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6月左右用于前线。

鉴于第三番志愿部队10个军中有4个军在5个月过程中已参加作战，需作

休整，因此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抵达前线之后，这4个军将调到平壤和元山地区休整，并在此地负责完成沿海地带的防御任务。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其余2个军将撤回中国休整。

中国志愿军在前4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10万多人。为了弥补此一损失，需要用12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30万人。因此，还需要有30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至于朝鲜人民军，彭德怀同志已根据您的建议，提请金日成同志将现有的8个军团缩编为6个军团。每个军团宜编3个满员师，每师为10,000人。此外，还要组建5个警备旅，用以防守沿海地带和主要城市。

金日成同志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因此，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也可采用轮番作战的方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三、1-2月份的作战经验表明，当我3个军在汉江以北地区因损失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休整时，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此，我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而不能发动胜利的进攻，而当敌人派来援兵时，我又无法同其进行对抗。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向南推进，交通线也就日益延长，供给上的困难也就不断增大，我被迫留下部队以警卫后方。因此，如不大量歼敌，如无空军掩护，那么，当敌过早地被压向南方时，我们将难以各个歼敌。目前的形势是：在第二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9个军于4月上旬抵达前线之前，陆军方面的优势将在敌人那边，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战役进攻。我们必须使用从第一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4个军团，在南汉江以北地区实施防御，以迟滞进攻之敌。

但必须考虑到，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利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第二番志愿部队前出至指定地区以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4月15日到6月底）在三八线地区歼灭美军和伪军部队数支正规部队，约数万人，尔后再向南汉江以南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彭德怀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如果敌人得以重新占领汉城和再次越过三八线，那么这在政治上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风波，对此我们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

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6月底将又有6-7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4-5月份，我们将可以使10个航空兵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根据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6,000辆汽车。

有无这种可能，盼复。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日

同上，（中册）第706—708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未来战役方针和苏联空军入朝事宜

(1951年3月3日)

1951年3月4日1时10分收到

1951年3月4日2时38分转交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

我们同意您关于朝鲜未来战役的看法。

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1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4座的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

菲利波夫

1951年3月3日”

同上，（中册）第709页



(124)



著名的米格走廊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苏联再调拨 1 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

(1951 年 3 月 15 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或周恩来：

“在朝鲜，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在最近将面临几个大的战役。显然，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你们将需要大量的飞机。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即 2 个中国歼击机师配置在安东地区，以掩护这一地区。但是，现在我们看出，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 1 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 2 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用于那里的战役。

我们希望您不会反对。

菲利波夫

1951 年 3 月 15 日”

同上，（中册）第 721 页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等问题

(1951年3月18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及第1749号电报，均已收到。对您关于将2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兵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转场到朝鲜境内的决定，以及关于再派1个大型歼击机航空兵师到安东以掩护中朝部队的决定，深表感谢。您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中建议，我们在朝鲜再建4座混凝土跑道机场。我们现已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和朝鲜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完成这一工程。朝鲜同志现有1个钢板跑道机场。感谢您关于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的决定。

我们现正在计算需用多少数量的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的铁路桥。最后计算结果将由周恩来同志补充告您。

关于您已同意于今年下半年再向我们提供的6,000辆汽车，其具体品种、名称将由周恩来同志拟定，并通过扎哈罗夫同志告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第1368号电

1951年3月18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

同上，（中册）第722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朝鲜铁路运输应交中国指挥部管理

（1951年3月25日）

我们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最近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如下意见，即为正确组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指挥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支持这个意见，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会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即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顺利进行解放战争起见，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我们一致地认为，为朝鲜本身利益着想，最好能建立起中国和朝鲜间的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斯大林

1951年3月25日

同上，（中册）第724页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否近期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7日)

发自北京

1951年5月27日20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给您寄去，请您了解其内容：

“彭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掉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①1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

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也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2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

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1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1军、新6军、5军、18军和桂系的第7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我军入朝以来5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

① 土军，指参加联合国军的土耳其军队。——本书制作者注

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并电告。”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7日

第2627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同上，（中册）第772—773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第284号密码电报

同上，（中册）第774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

(1951年6月5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6月4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

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的进程，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作战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了三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他们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1951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

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战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

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 3-4 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5 日”

同上，（中册）第 784—785 页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和高岗将前往莫斯科

(1951年6月5日)

发自北京

1951年6月5日18时3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朝鲜作战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如下一些严重问题：如财政问题，在前线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敌人有在我后方沿海一带登陆危险的问题。

我们拟于近日内派高岗同志乘机前往莫斯科，向您报告上述问题，请您对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给以指示。

现在，金日成同志刚好也在北京，他希望随高岗同志一同前往，以同您讨论这些问题。可否成行，盼您将您的意见电告。

毛泽东

1951年6月5日

第2787号电

同上，（中册）第786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

(1951年6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我们已经收到您关于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的电报。我们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并同他们讨论您电报中指出的问题。

6月8日早晨，我们从莫斯科派飞机到北京迎接高岗和金日成同志来莫斯科。飞机将于6月9日抵达北京。

请您指示你们的有关部门让飞机无阻碍地飞行，并在北京机场迎接飞机。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7日”

同上，（中册）第804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停战和中国空军使用问题

(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罗申：

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

第三，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

我在这里不谈细则，您的代表们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8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两个或三个米格-15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5个或6个米格-9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8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他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5-6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7-8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16个

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似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菲利波夫

第 302 号密码电报

1951 年 6 月 13 日

同上，（中册）第 806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停战问题和提供军队装备问题

(1951年6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一、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①。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二、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关于目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第635177号电

同上，（中册）第825页

^① 指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广播节目中提出，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停战谈判（上）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1年6月3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6月30日11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一）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

（二）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二、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①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

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第3260号电

1951年6月30日

同上，（中册）第835—836页

① 李奇微，美国上将，时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在朝联合国军总司令。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反应电

（1951年6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导中说：

‘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从不断传来的报导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导。

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

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

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第3261号电

同上，（中册）第837页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您亲自领导这次会谈

(1951年6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二、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

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三、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四、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第3267号电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同上，（中册）第838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1951年6月3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定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您28日^①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

① 这里指的是北京时间，按美国东部时间，该声明是29日发表的。

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第 335 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30 日

同上，（中册）第 839 页

斯大林告知金日成
朝鲜应与中国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
（1951年7月2日）

1951年7月3日14时45分发出

致拉祖瓦耶夫同志：

您于1951年7月1日发来的电报收到。

请转告金日成，朝鲜政府应就电报中所提诸问题同中国政府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从来电中看不出金日成的方案是同毛泽东协商过的。

第4/3208号电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日

同上，（中册）第839页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来电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3日12时1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朝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

一、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

二、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3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

四、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

五、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

六、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

七、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

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

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4号电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3日13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我致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同对方代表准备和进行谈判的时间大约需要10至14天。请你们认真地执行以下几点：

一、在现有的10天时间内尽一切努力增加一线部队的人员，尤其是武器弹药的补给。请高岗同志在10天以内将计划调运的人员、武器和弹药从后方调往北朝鲜，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后，上述人员和装备是不能调运的。

二、在此之前要提高警惕，一线部队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和敌空军对我后方猛烈的轰炸。在谈判前或谈判期间，敌方可能会以此迫使我们签署对我们不利的协定。

如果敌人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应转入反攻，并击溃敌人。

三、必须下命令给杨成武的两个军和第50军快速进入指定地区，防止敌人趁机在元山登陆。

我第38-39军和42军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在西海岸进行登陆。

四、请你们考虑一下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协定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

毛泽东

1951年7月2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8号电

同上，（中册）第852页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3日13时5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五点：

一、“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二、“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三、“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四、“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1-2-3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

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五、“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五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一、“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

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二、“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

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

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也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5号电

同上，（中册）第853—854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问题

(1951年7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3点的第2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4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5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第340号密码电报

同上，（中册）第855页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

（1951年7月5日）

第 21497 号

现送上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的文本，供阅。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定（草案）

在朝鲜交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为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为另一方），授权派出代表参加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在朝鲜建立和平的会谈。

双方代表在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一、1951年一月一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

二、双方陆、海、空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 10 公里，在三八线向北和向南 10 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在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状态。三八线以北属于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属于南朝鲜政府管辖。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

四、双方遣送战俘。在停止军事行动后 3 个月期限内，每一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在朝鲜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2-3 个月期限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难民在 4 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毛泽东

1951年7月5日

同上，（中册）第 856 页

附录八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56号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13日15时收到

抄送：1. 斯大林，2. 斯大林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在两次会议期间，美国人为了拖延时间、制造舆论、摸清我们的计划，同时达到休会的目的，蓄意提出记者参加会议。但这是愚蠢的把戏。我们坚决坚持，没有双方同意，新闻界的任何记者或代表不得单方强行接近开城以南。

如果美国人一两天后来进行谈判，那么我们想恢复谈判后，首先确定谈判议程，然后确定双方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不允许他们进入会场提问题。如果美国人无耻地破坏双方同意的纪律，没有记者就不来，那么，我们就不顾这些，将坚持自己的决定，不退让。

关于谈判议程的斗争，南日同志在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3条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实际上是我们的倡议，因此，恢复谈判之后由于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和斗争，我们想提出以下总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了实现朝鲜的停火和停战，首先要接受解决双方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的决定。

三、为了防止在朝鲜再出现敌对行动，要接受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决定。

四、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停战和监督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后俘虏的措施。

上述议程在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需要得到美国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意不具体地把建立三八线列入议程，而将这个问题留在讨论议程的具体问题时再谈。与此同时，关于进行监督的共同意见列入议程的第4个问题，而且在讨论它时可以补充其他具体问题。

如果美国人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那么我们就坚持首先对我们提出的5点议程不作改变。要知道，金日成同志告诉李克农，如果双方同意自己的军队撤离三八线，那时可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放置一旁。

但是，根据总的形势，我们认为需要坚持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只是在表达这些问题时需要指出一个总的思想：在从根本上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解决三八线问题。

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可在一个单独阶段实施。

履行监督可以委托没有参战的中立国家，而双方谈判代表团员应该只完成停止军事行动的任务。

关于交换难民的问题，金日成同志研究的结论是，这对北朝鲜不利，因此这一问题未列入议程。

上述是否全都正确？

请您研究之后做出自己的指示。

现在，我们的军队仍然紧张地同敌人斗争着。如果谈判失败，准备在几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使战争向有利于我们转化。

毛泽东

13时7分

第3511号

同上，（中册）第871—872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您提出的谈判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1951年7月14日)

密码电报第4153号

只送斯大林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于7月13日给菲利波夫的第3511号密电。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同敌方谈判所有事实，一致认为您7月13日电报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7月14日”

收到即转。

1951年7月14日第1118号

同上，（中册）第873页

附录九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

（1951年7月2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5次会议期间，我们与敌人在议程上已达成三项协定：

一、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二、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三、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

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况，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

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

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但是在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把敌人赶出南朝鲜。

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8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

如果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说明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

马立克同志说，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

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的列入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的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第3656号电

1951年7月20日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不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

（1951年7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7月20日来电收悉。我们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不再坚持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在谈判中你们充分利用撤军一条，一方面显示出你们热爱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敌方不想加快和平进程。现在则可以于事无损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议程。^①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1日

同上，（中册）第907页

^① 收到斯大林此电后，毛泽东于22日致电金日成，就上述看法征询意见。金日成随即复电表示同意。23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今后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十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敌人在中立区的挑衅行为

(1951年8月27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敌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

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

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施加压力。

当然，这可能是南朝鲜谍报机关破坏谈判的计划，但是除非得到美国同意，否则李承晚不会派飞机袭击在开城地区——他自己主动要求进行谈判的所在地的建筑物。因此，敌人的挑衅行为已迫使我们做出了反击的决定。

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有两个发展可能，一个是拖向破裂。

我们已在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正面军事进攻，同时也严防敌人从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登陆。在几天敌机侵入中国沿海城市青岛、上海、常州^①，这是有挑衅目的的。

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海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

① 原文如此。

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另一个可能是，敌人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

目前，我们准备在停会期间与敌人进行宣传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罪行。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形势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敌人可能想恢复谈判，这样，我们就主动提出一个能够使谈判发生转机的方法来恢复谈判，并且迫使敌人同意这一办法。

金日成同志建议为了开城中立地带的安全，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作为谈判期间的监察员和证人出席谈判，并以此作为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在将来控制执行停火的组织中发挥作用。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第 4279 号电

1951 年 8 月 27 日

送：斯大林同志（2 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984—985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1951年8月29日)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你们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同上，（下册）第986页

附录十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我们有关邀请中立国代表
的意见是不适宜的
（1951年8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 1951 年 8 月 29 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第 4358 号电

1951 年 8 月 30 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987 页

派遣顾问

附录一 金日成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0年7月8日)

1950年7月8日9时26分发自平壤

1950年7月8日11时15分收到

1950年7月8日11时35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致冯西同志：

我收到金日成给您的信，内容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元帅约·维·斯大林同志：

请接受我们对您的深深敬意和对于您在我们争取独立斗争中给我国人民的宝贵援助的感谢。

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司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国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忠实于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1950年7月8日于平壤”

第481号密码电报

什特科夫

1950年7月8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上册）第438页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关于向朝鲜派遣苏联顾问事

(1950年7月8日)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八局
密码电报 第36275号
只用电报线拍发

平壤

苏联大使：

看来您的表现是不正确的，因为您事先没有询问我们，就答应朝鲜人给他们派苏联顾问。

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

按所要求的数量派出我们的顾问，让他们穿上便装，作为《真理报》的记者到前线参谋部和方面军部队中。

您本人将对苏联政府负责，保证我们的顾问不落入敌人手中。

冯西

第380号密电

列印出3份

第1份分送：斯大林同志

第2份分送：斯大林同志

第3份分送：布尔加宁同志

由布达诺娃列印，1950年7月8日19时35分

核校：苏军总参谋部第八局第四处拍报室主任冈察尔上校

同上，（上册）第439页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向中国派遣防空与空军专家

(1950年8月27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科托夫^①同志：

复第1726号电。

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

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38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同上，（中册）第514页

① 科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

附录二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空军顾问

(1951年2月12日)

发自北京

1951年2月13日20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中国政府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以参加当前朝鲜战役。为帮助该集团军战斗行动的计划与领导，请您向中国派出以下顾问人员：

- 一、空军集团军司令员顾问1人。
 - 二、集团军参谋长顾问1人。
 - 三、作战处处长顾问1人。
 - 四、情报处处长顾问1人。
 - 五、机械工程师顾问1人。
 - 六、专用设备和无线电工程师顾问1人。
 - 七、军械工程师顾问1人。
 - 八、野战修理工程师顾问1人。
 - 九、集团军后勤部长顾问1人。
 - 十、后勤参谋长顾问1人。
 - 十一、专用汽车部主任顾问1人。
 - 十二、技术处处长顾问1人。
 - 十三、地面导航站主任顾问1人。
 - 十四、地面导航设备主任顾问1人。
 - 十五、通信处处长顾问1人。
- 共15人，切盼顾问人员于1951年2月抵华。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第753号电

周恩来

1951年2月12日

同上，（中册）第694页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

(1951年2月16日)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您关于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的请求将予以满足。我认为，给您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是合适的。将由扎哈罗夫大将手下的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

其余顾问的名单将随后告知。

菲利波夫

1951年2月16日

第 635037 号电

同上，（中册）第 695 页

附录三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发自北京

1951年9月8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一、志愿军司令部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二、5个兵团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三、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4492号电

1951年9月8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1019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1951年9月1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

关于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同上，（下册）第1020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12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

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

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同上，（下册）第1039页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①：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兵团
（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9月20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

此致

敬礼

第4726号电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1040页

^① 此电其余内容见本卷第184-185页。——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①

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

（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命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同上，（下册）第1045页

^① 此电其余内容见本卷第186页。——本书制作者注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①：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5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一、请派5名军事顾问于10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4933号电

1951年10月4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1056页

① 此电其余内容见本卷第187页。——本书制作者注

军事援助 (下)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无偿提供 372 架米格-15 飞机

（1951 年 5 月 22 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①转毛泽东同志：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 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兵师目前已有 10 个，其中 6 个为米格-9 歼击机师，4 个为米格-15 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 歼击机取代米格-9 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 372 架米格-15 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 372 架米格-15 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 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 约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 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 10 天的时间。

^① 克拉索夫斯基，苏联空军上将，时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

我们已拟定了将 372 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 72 架，6 月 20 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 8 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 372 架飞机。

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 年 5 月 22 日”

同上，（中册）第 769 页

附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无偿提供米格-15 飞机
(1951 年 5 月 25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5 月 26 日 0 时 15 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 1951 年 5 月 22 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 372 架米格-15 飞机，用以改装 6 个米格-9 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第 2586 号电

毛泽东

1951 年 5 月 25 日

送：斯大林同志（2 份）

同上，（中册）第 770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

(1951年5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①，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第279号密码电报

1951年5月26日”

同上，（中册）第771页

^① 中国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一事，可见《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三·苏中关系篇》第243页至第256页。——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不能马上满足供应迫击炮的申请

（1951年5月29日）

平壤

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

拜会金日成同志并转达，我们收到了由你转来的他们关于补充供应步兵迫击炮的申请。通知金日成同志：很遗憾我们不能马上全部满足他的申请，因为他们的申请几乎是在1951年的年中寄来的，而早在2月份供应人民民主国家的武器就已分配完毕。

现在我们可以6月里供应朝鲜的是：卡宾枪25,000支、冲锋枪5,000支、手提机枪1,200挺、重机枪550挺、TIIK式机枪275挺、反坦克枪500支、82毫米迫击炮700门和120毫米迫击炮125门。

电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第4/2761号电

同上，（中册）第775页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新的武器装备申请单由高岗带去
(1951年6月9日)

发自北京

1951年6月9日19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6月5日和6月7日两封电报，均已收到。

您1951年6月9日派出的专机已抵北京。

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由高岗同志随身带去。

请您对此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因病目前正在大连治疗，申请工作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现在编制申请单的工作才刚刚结束，因此延误的过错应由我们来承担。

由高岗同志带去的申请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编制的。这次申请单所列总价值相当大。

请苏联政府按这些申请单供货，并按半价计入军事贷款，还请延期支付这一款项。请您和高岗同志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将您的决定通过高岗同志告我。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当面向您报告，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第2893号电

1951年6月9日

同上，（中册）第805页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 尽快培训中国飞行员

（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飞行员培训朝鲜人非常慢，马马虎虎。你和别洛夫将军看来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5-6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7-8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

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第303号密码电报

1951年6月13日

同上，（中册）第807页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 为中国训练米格-15 飞行员

(1951年6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已收到毛泽东的以下电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算向朝鲜派遣配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参加战斗，这将比派遣米格-9战斗机师要好得多。因此，必须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将用米格-9战斗机武装和训练出来的第6、12和14歼击机师，用米格-15战斗机重新训练，以便在1951年9月将其派往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您指示在华苏联专家在上述期限内用米格-15战斗机重新训练第6、12和14歼击机师。”

可见，毛泽东不想从中国机场撤下米格-9战斗机并将其派往前线，而宁可将其留在当地，在前线只使用米格-15战斗机师。请您同毛泽东谈谈，如果我们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可对他说，您的人将负责现在驾驶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重新练习驾驶米格-15飞机。我们认为，这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中国人坚持，可以训练他们两个月。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6日

同上，（中册）第826页

附录三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
（1951年8月17日）

发自莫斯科

1951年8月17日收到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8月11日发出的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和航空兵转场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您关于在安州地区修建3个机场并在今年10月20日完工，以及中朝航空兵于今年11月转移到朝鲜机场以便参加前线战斗的决定，我们认为正确的。

为了直接掩护安州地区机场的建设，我们同意从当前担任安东地区掩护任务的团队中抽调两个苏联高炮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年8月17日

同上，（下册）第981页

附录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9月20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①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

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定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

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

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给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

^① 9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

物资总值 1/5 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

价值相当于 1951 年 9 月 8 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 4/5 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 1952 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略）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726 号电

1951 年 9 月 20 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1040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
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

（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

关于补充贷款（6亿卢布）和1951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9月8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1/5，同时又提供6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

我们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在1951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1/5的军用物资。

但是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1952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和时限。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同上，（下册）第1045页

附录五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关于提供军用物资问题

（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5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

二、请苏联政府于1951年底即10-12月按照我在9月20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9月8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1/5）给我们发出120门85毫米高射炮、7种火炮弹药、6种火炮轮胎和1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同意从10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6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1952年4-6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三、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1-3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4/5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

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于1952年7月开始发出其余5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

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四、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

不久前，我国商业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

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 3,510 辆汽车和 1,900 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一批 5 个师的军用物资内）。

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 60 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贷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933 号电

1951 年 10 月 4 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1056—1057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提供装备和贷款结算方法问题

（1951年10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

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

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定，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

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定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1951年10月7日”

同上，（下册）第1062页

附录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24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①将军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1个由3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二、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1951年11-12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463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一）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二）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

① 洛博夫，苏联空军中将，时任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

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 2 个侦察团和 2 个拉-11 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三）给中国派出 1 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 1 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 1 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 2 个伊尔-10 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四）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 1 个图-2 轰炸机航空兵师、1 个拉-9 歼击机航空兵团和 1 个里-2 运输团，但到 1951 年 12 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 14 名顾问，给拉-9 歼击机团派出 5 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5281 号

1951 年 10 月 24 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1069—1070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

（1951年11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一、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需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须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二、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兵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 1 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 5 和第 11 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 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 航空兵团的顾问，共计 19 人。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报：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 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 年 11 月 13 日

同上，（下册）第 1096—1097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2年4月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①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定，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加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① 从内容上看，在此电之前应该还有一封电报，但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电。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第167号密码电报。

结束。

同上，（下册）第1165—1166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向中国提供弹药的问题

（1952年7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 10 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同上，（下册）第 1190 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
关于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2年7月24日）

平壤

致拉祖瓦耶夫转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同志：

您今年7月16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很难完全做到这些，但考虑到朝鲜的困境，我们尽可能满足您的申请：提供5个高射炮团的武器和30架图-2飞机（而不是申请的40架）。关于这批供应的发货已向军事部下达了命令。

根据您对提供汽车、燃料、炮兵射击武器和其他军用技术装备的申请，我们早已做出决定，并已给你们补充发运出1,000辆汽车、2,600吨燃料以及医疗器材和弹药。

还将再运出2,600吨燃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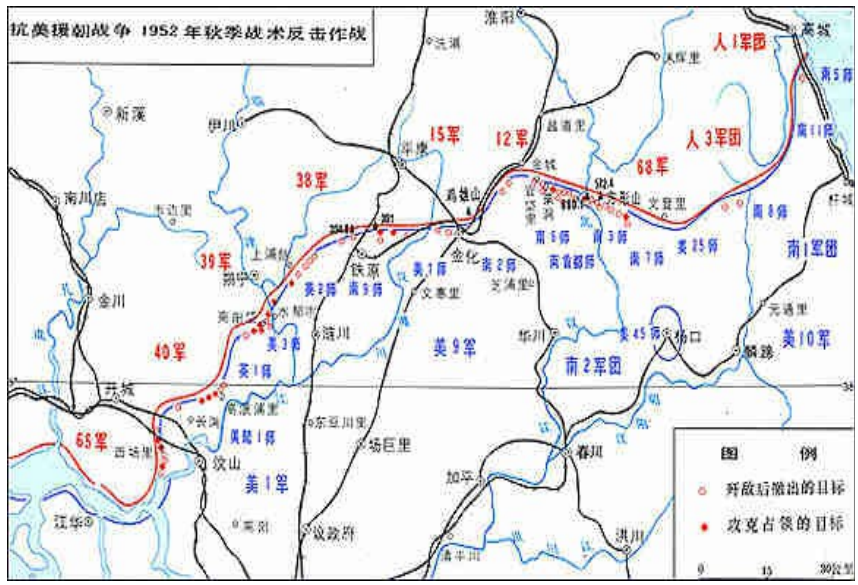
我们同时接到北京报告，我们提供的3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用品均已全部转交你们。

你们申请中的其他物品目前正由我们的军事部在审核。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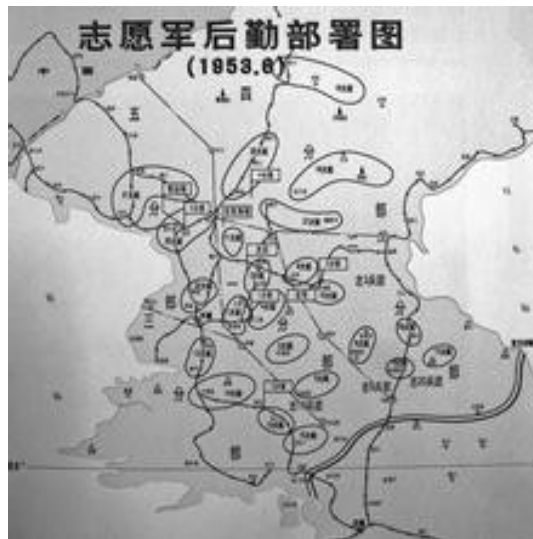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边谈边打，打打谈谈

可靠的后勤保障

(199)



西部三八线的北南朝鲜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 1953 年军需品订购等问题

(1952 年 12 月 27 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 12 月 17 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 1953 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 1953 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 1953 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 1953 年将向您提供 20 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 20 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 80 万发，各式大炮 1,320 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 1953 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 20 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 12 月 17 日电报申请数的 1/4，计：炮弹 60 万发、各式火炮 332 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 1953 年提供 20 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药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 140 万发（1952 年为 112.5 万发）、各式火炮 1,652 门（1952 年为 1,056 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①

1952年12月27日”

同上，（下册）第1258页

^① 谢苗诺夫，斯大林的化名。——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发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15日

同上, (下册) 第1267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在朝鲜使用中国海军部队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向您提供鱼雷艇、飞机和装备的电报已收到。

您请求告知我们对派中国海军志愿军赴朝是否适宜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大概指的是使用海军陆战队。当然，海军陆战队可以成功地用在沿岸抗登陆防御总体战中，以消灭敌人靠岸和登陆时的运输工具和登陆部队。我们认为您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

关于向你们提供海军需品问题我们已下达了指示：拨给你们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

已向海军部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你们发出上述装备。

关于顾问，我们打算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您邀请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将从目前正在中国的我方海军顾问中派出。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27日”

附录七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阿芒拿炸药

（1953年1月29日）

致谢苗诺夫同志：

为了保证顺利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登陆战役，中国志愿军部队正在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修筑防御工事，所以我们急需阿芒拿炸药。

目前我们的阿芒拿炸药还无法满足工业和军队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工业上已采取措施节约阿芒拿炸药，并把一部分供应军队的阿芒拿炸药运往前线，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仍不能保证军队需要。

为了保证在2-3月份完成朝鲜沿岸的防御工事，经我们估算，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2-3月份分两批向我们提供3,000吨阿芒拿炸药、2,400万支雷管和960万米导火线。

请苏联政府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告知决定。

敬礼！

毛泽东

第223号电

1953年1月29日

同上，（下册）第1274页

停战谈判（下）

附录一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和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定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且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会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

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 1-2 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 3 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 3 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 4 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 7 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 3 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援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 1950 年预算增加了 60%，而总预算中的 32% 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大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第 5631 号电

1951 年 11 月 14 日

同上，（下册）第 1102—1104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1951年11月1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1-2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同上，（下册）第1108页

附录二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 1952年1月31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定。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定。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定（协定全文附后）。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藉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定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定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定仍然不是最终协定，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定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定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纪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定——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定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定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定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定第1款有关的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定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天、釜山——共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

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 5 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 4 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 2 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 1 人，共 2 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 40 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定，双方各自开放 5 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 16 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 10 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6 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定的地点。

所有上述 8 条都涉及到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附：关于第 2 项议程所达成的协定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326 号电

1952 年 1 月 31 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同上，（下册）第 1144—1147 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同意您拟定的计划和对谈判进程的估计

（1952年2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以下复电电文转告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您1月31日有关停战谈判的电报已经收到。

同意您所拟定的计划和您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

关于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观察委员会一事，我们认为应与波、捷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自然会同意的。

致以敬礼！

菲利波夫”

收到电报后，请来电确认。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72号密码电报

同上，（下册）第1151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①。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②

执行情况请电告。

第303号密码电报

同上，（下册）第1186页

① 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中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中方于7月3日和6日提出双方均应遣返全部或绝大部分战俘，但对方于7月13日提出了83,000人的遣返数字，其中朝鲜人民军76,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中国志愿军仅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收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我方亦对扩大战争有所准备。

② 斯大林这封电报应是17日发的，该电报的档案原件最后注有“7月17日确认”的字样。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第二部分）^①

关于战争局势和遣返战俘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

（周恩来）接着简要说明了朝鲜局势。他指出，1951年5月以前，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从1951年5月起战线明朗了，战争也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双方力量大体相当。敌人不能进攻作战，出现了一定的均势。但我方也未进行大规模进攻。敌人在15-20公里的纵深加固了自己的阵地，我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坚固地带，并且继续扩大坑道工事。敌人无法摧毁我军的坚固阵地。大约200公里的战线已全部得到加强，左右两翼也有良好坚固的工事。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坚信能。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守住现有阵地。今年的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守住这些阵地。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发动进攻，攻击敌人。过去我们想，我们不一定能进行7天以上的进攻作战。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

斯大林问：你们能不能发动进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可以发动夺取个别阵地的进攻战役，但难以发动全面的进攻。自从战争形成阵地战以后，美军当局极力拖延谈判，不想缔结停战协定。

^① 这是会谈记录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已编入《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苏中关系篇》第226至232页。——本书制作者注

斯大林说：看来，美国人想多扣留中国战俘，这说明他们拒绝遣返战俘，也许他们想把战俘送给蒋介石。

周恩来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俘中安插了特务。

斯大林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违反一切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 83,000 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要花招，因为在 83,000 人中只有 6,400 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 13,600 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 76,000 名^①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 96,600 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 116,000 名^②战俘，其中 20,000 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只要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

① 原文如此，应为 76, 600 人。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 116, 600 人。

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援他们。

问及朝鲜的粮食情况如何？说我们还能帮他们什么？

周恩来说，朝鲜在这方面有困难。中国政府知道，苏联援助过朝鲜。说他们也援助过朝鲜并曾告诉金日成，这些若不够，他们还可以提供食品、衣服，他们要什么都可以提供，但无法提供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再给朝鲜一些武器，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

周恩来再次说：同美国谈判时不能让步。

斯大林指出：如果美国作些让步，那么，可以同意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想缔和，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哪怕再打一年。

斯大林肯定，这是对的。

周恩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没有做好世界大战的准备。补充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起了先锋作用，如能挡住美国对朝鲜的进攻，那么，对把大战推迟15-20年是有利的。到那时，美国就根本不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有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朝鲜战争以后才根本不能打大战。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

实力？斯大林取笑说：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周恩来告知说：如果美国人作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并且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同时考虑到可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解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斯大林问：有多少美国战俘？

周恩来解释说：朝、中控制的战俘总数达 12,000 人，其中南朝鲜人 7,400 名。

斯大林不排除按周恩来的建议去解决问题。同时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向报界宣布。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那么就宣布他们可能想把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如果这些建议都不成功，那么就可以采取调解办法。主要的是建议停火。

周恩来说：实际上缔结停战协定，也就是停火。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定出三项办法：第一，先宣布扣留南朝鲜和美国战俘的比例，这个比例与扣留朝中战俘比例一致，这个办法可以谈；第二，由中立国调解；第三，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战俘问题分开，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周恩来转入军事援助问题，说明了朝鲜同志要求向他们提供 5 个高炮团的问题。我们告诉朝鲜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同

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我们提供 5 个团。我们答应向他提供。也许中国可以提供 5 个团？

周恩来再次说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对他们是新东西。

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要找金日成弄清楚。

原已答应的以外，周恩来要求再提供 10 个团的装备。斯大林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周恩来转告朝鲜同志要求，即要不要对南朝鲜进行轰炸，他们没有把握，这样做对不对。

斯大林解释说：航空兵归国家所有，中国志愿军也不要动用国家航空兵。

周恩来告知，朝鲜同志问，他们能否发动一次新攻势？中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进行战略进攻。

斯大林指出，当正在举行停战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战略进攻还是战术进攻都不要进行，不得进行任何进攻。

周恩来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可否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

斯大林：我乐于同他们谈一谈，但他们离得太远。此外，我不便邀请。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乐于接见他们。

周恩来告知，彭德怀很想来，但还不知道金日成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也许可以同他谈谈这件事。

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周恩来再次说：中国政府认为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延一下是适宜的。但中国也做好了战争可能打 2-3 年的准备。再次请求提供飞机、火炮和炮弹援助，因为中国自己尚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斯大林宣布：我们能办到的，全部提供。

问朝鲜人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惊慌失措？

周恩来解释说：朝鲜确实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鸭绿江电站被炸以后。这使朝鲜同志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想尽快实现和平。

斯大林说：美国的谋略就是恫吓。但他们吓不倒中国人。能否说，他们也吓不倒朝鲜人？

周恩来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不错。

周恩来补充说：朝鲜人有些动摇，他们的情绪不太稳定。在部分朝鲜领导人员中甚至有些惊慌情绪。

斯大林提到，他从金日成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有这种情绪。

周恩来肯定了这种情况。……

同上，（下册）第 1195—1204 页

斯大林与金日成和彭德怀谈话纪录 关于双方情况和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2年9月4日）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

我方：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方和朝鲜方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朴宪永。

翻译人员：师哲、费德林。

斯大林：朝鲜居民的情绪如何？

金日成：情绪很好。

斯大林：朴宪永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朴宪永：是的，情绪很好。

斯大林：那么军队中情绪如何？

金日成：军队中的情绪也很好。

斯大林：彭德怀对此是怎么认为的？

彭德怀：是很好。

金日成：如果不考虑弹药问题的话，总的局势是有利的。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歼击航空部队？

金日成：有一个师。

斯大林：中国将自己的航空部队列入其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志愿军了，而是国家的部队。志愿军没有自己的航空部队。我们的人也会询问：这是否有利于民主主义阵营？在我看来，声明中国的国家部队参与战争是不利的。金日成应该有朝鲜航空

部队。

金日成：如果物质条件许可的话，我们是能够组建 1-2 个航空师部队的。

斯大林：朝鲜人民尽管已经疲于战争，但它仍然值得称之为英雄的人民。因为朝鲜人民饱受了灾难，我们准备为朝鲜裁掉自己的 1-2 个师。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歼击师部队？

金日成：有。

斯大林：可以将它调运过来。

金日成：学校里还有一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我们可以为 1-3 个师的人员提供物资装备。

金日成：我们能够确保 3 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那好吧，我们就为 3 个师提供物资装备。朝鲜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由于敌人不断加强轰炸，我们必须扩大高射炮部队。不久以前我们会请求援助 5 个高射炮兵团，但是我们需要 10 个这样的团。我们向您，斯大林同志，请求了 5 个，向中国同志请求了 5 个。毛泽东说，目前中国没有可能满足朝鲜这一请求。因此，我们请求您给予 10 个高射炮兵团部队。

斯大林：你们有几个陆军师？

金日成：有 18 个陆军师。

斯大林：有多少炮兵部队？

金日成：我们几个炮兵团，但是，他们的装备不足。

斯大林：我们的每个炮兵师是由两个炮兵团组成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样的？

金日成：我们实行的也是这种编制。

斯大林：如果你们缺少什么，请编制一份相应的清单。

金日成：这样的清单已经编制好了。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迫击炮？

金日成：有的，122毫米的。

斯大林：我们给你们提供10个高射炮兵团的物资装备。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我们的陆军部队缺乏榴弹炮和其他的武器，过后我们可以提出清单。

斯大林：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目前尤其尖锐的问题是确保工程兵部队和通讯兵部队。这些部队有很大的缺额。这种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存在。我们缺少设备和材料，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一个月之后将停止生产口径为122毫米的炮弹。

斯大林：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我们。

金日成：我们已经编制了清单。

斯大林：粮食情况怎么样，白面，大米？

金日成：今年收成很好，但是，在下一年来临之前粮食还不够用。毛泽东已经答应保证我们的粮食和服装供给。

斯大林：你们那里吃不吃小米，或者只是吃大米？

金日成：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斯大林同志，作为礼物给我们运去了5万吨粮食。我们的人民喜欢吃面粉。目前，在克服着困难的同时，朝鲜居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但是，我们的运输工具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的机器、拖拉机和化肥。

斯大林：把相应的清单交给我们。据说，在关于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时如何表达自己意见这一问题上，你们即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

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中国的同志们也关心这一点。

斯大林：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即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 20%的中朝战俘，那么就应该扣留 10%^①的美国战俘，一直到中国和朝鲜战俘返回为止。或者说，如果他们不将这 20%的中朝战俘遣返，那么他们的那 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也可能，这种观点更好一些。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并达成停火协定。关于未返回部分战俘问题的谈判，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和停火之后继续进行。我不清楚，对此你们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会确信你们的立场是公正的。美国人可能会说，20%的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我们对此并不相信。借助这种计谋，20%的问题就会拖延，而 80%的战俘会返回。这是建议的实质所在。中国的同志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等待着美国人提新建议，以便修改自己的建议。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金日成：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了什么？

金日成：在与我们交谈时，毛泽东提出了几套方案：第一，继续坚决地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第二，在停战之后解决全体战俘的问题；第三，由于敌人扣留着我们的战俘，我们也应该扣留敌人的相应数量的战俘。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观点就与您，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一致了。我们认为，这 3 个方案是最合适的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给出个主意，为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① 原文如此，似应是 20%。

斯大林：在我看来，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内），应该继续坚持返回全部战俘。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提出20%的问题。这里说的不是方案，而是立场。第一个立场：这就是返回全部战俘；第二个立场：20%的战俘不返回。确实，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某种新的建议，或者是等着美国人提出新的建议。我认为，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第二个立场对你们以及你们的鼓动工作非常有利。20%的战俘不遣返给你们，你们就不遣返他们的20%战俘。第二个立场将瓦解美国人的阵营。巩固关于遣回战俘、停止战争的意见，这将会有利于你们。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们是否很会打仗？

彭德怀：美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士气低落。

斯大林：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斗的：是斗志高昂、勇敢善战，还是兵力占优势？

彭德怀：在1-2月份期间，美国人发动了200多次进攻，但是成功率只有1%。我们在这一个月期间进行了大约30次的进攻，其中有80-90%是成功的。

斯大林：这些成绩表现在哪方面？

彭德怀：我们成功地消灭了敌人的小股部队——排或者是连。

斯大林：金日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金日成：当然同意。

斯大林：美国人的工事是否坚固？

彭德怀：最近他们的工事更加地牢固了，而我们的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工事设施本身并没有我们的工事好，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装备。

斯大林：他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有 3 条。

斯大林：你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实际上有 2 条，第 3 条正在修建中。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地雷场？

彭德怀：我们的地雷和铁丝网都很少。我们在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即指地雷和铁丝网），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敌人。

斯大林：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我们有专门的地图为自己的部队指示通道。我们认为，没有地雷和地雷场是无法打仗的。

彭德怀：在我们的前沿地区和敌人之间有很小的一段距离——总共只有 300-500 米。

斯大林：显然，你们的前沿地区防线过于靠前了。

彭德怀：也可能，这是由于，自 4 月份开始我们逐渐向前挺进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各条工事防御线之间的距离如何？

彭德怀：距离不大，它取决于地势情况。在某些地方防御线连结在一起，而某些地方距离可达到 20 公里。目前，我们正在修建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堑壕？

彭德怀：有。

马林科夫：如何解释这一说法，即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而敌人抓到的很多？

彭德怀：总的来说，我们抓到的俘虏还是比敌人抓到的多。

斯大林：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共有多少人？

彭德怀：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人战俘有 12,000 人，而美国的报导说有 20,000 人。朝鲜人战俘的数量很大，因为在 1951 年 10 月之前，美国人成功地抓获了大量的朝鲜人战俘。美国人在实施进攻行动

时还俘获了大批后备队人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共俘获了 12,000 名战俘，其中有 8,000 名美国人。李承晚军队的战俘数量是 40,000 人。但是，由于艰难的物质条件，战俘中的许多外国人死掉了。

金日成：根据我们出示的清单，我们总共抓获了 12,000 人，其中有 4,416 名外国人，其余的都是李承晚军队的人。战俘中有 300 名美国飞行员，他们之中有 30 多名军官。大约有 27,000 名南朝鲜人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关于这一部分战俘，报刊上从来没有报导过。

马林科夫：在前线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否进行换班？

彭德怀：是的。

马林科夫：这意味着中国部队有机会进行训练？

彭德怀：是的。临近 1953 年 8 月在朝鲜的全体志愿军部队将进行换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人员（方面军的、集团军的、师的）都将经过朝鲜前线（的考验）。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卡秋莎（火箭炮部队）”？

彭德怀：前线有一个师，另外一个在后方。

斯大林：在敌人的后方是否有游击队在活动？

金日成：是的，正在活动，尽管条件非常困难。

斯大林：日本人是否有被俘虏的？

彭德怀：被抓获的只有美国籍的日本人。

马林科夫：该如何解释，在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期间，美国飞机被毁坏的很少？

彭德怀：我们认为，并不少。自战争开始以来，被击毁的美国飞机大约有 5,800 架。

斯大林：中国飞行员能否驾驶喷气式飞机？

彭德怀：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飞行员能够参加战斗行动。

斯大林：为什么，难道他们害怕？

彭德怀：中国飞行员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驾驶技术。

斯大林：应该经常将他们带入空中，只有在空中才能学会驾驶。苏联飞行员有时候也不愿意到空中飞行，他们认为在学校里更好一些。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了飞行，就学会了飞行。现在，我们是按飞行的次数来评定飞行员的。谁飞行的次数多，谁就能够获奖。学校里的授课给予的不多。战斗训练才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经验。不应该害怕空练，而正相反，在空中应该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还应该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否则你们将不会拥有空军部队的。必须建立奖励制度。

你们是否设立了勋章和纪念章制度？

彭德怀：暂时还没有。我们打算在 1953 年实施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觉得，对于勋章和纪念章这样的制度，他们持有无政府主义的轻蔑态度。他们那里没有将军。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反共产主义的。其实，军队里设立各种军衔、纪念章和奖励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而拥有的只能是游击队。他们已经进行了 15 年的国内战争，驱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而军队里却没有实行军衔、勋章和纪念章等奖励制度，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在成长，他们的成长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关于这一点应该认真考虑。正规部队应该有良好的保障，应该有奖励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和保障军事干部，为他们建立必需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军事人材。

周恩来：斯大林同志，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因为，近 20 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国内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组我们的军队，将在军中的供职由自愿变为义务，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目前，我们的军队里共计有 430 万人，其中有自军士以上的 144 万名军官。除此而外，我们还有一支由 53 万人组成的内务

部队。自今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军队的改建工作，计划在 1954 年全部完成军队的改建工作。我们计划将部队裁减到 300 万人以下，这是考虑应该改善部队的装备之后，最终只留下 250 万人，再加上 50 万内务部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但是 250 万人——这是最低的标准了。除了陆军之外，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彭德怀：早些时候我们无法改组我们的军队，因为朝鲜发生了战争，我们不得不拨出大量的经费供养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 26 亿美元。目前，由于国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财政状况，我们才能够相对快一些地改组我们的军队，并在部队里实行奖励制度。

金日成：我们将具体与谁就所提出的与军事问题相关的那些请求和清单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

我们计划分别向中国和朝鲜派出一个师的歼击机部队，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周恩来和金日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我想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正式的宴会，他们是公开来到我们这里的。至于那些非公开来这里的同志们，我想为他们举行家庭宴会。

周恩来和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由尼·费德林纪录。

附录三 周恩来向斯大林转交毛泽东来电：
关于墨西哥的建议等问题
(1952年9月16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年9月16日

附件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定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去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

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

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52年9月15日

同上，（下册）第1224—1225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

(1952年9月17日)

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录（摘录）^①

关于墨西哥建议和交换战俘问题

（1952年9月19日）

.....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那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

^① 该会谈记录全文载于《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三·苏中关系篇》第287至293页。——本书制作者注

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定，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并且问，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人不想交出全部战俘，而要扣留一部分，打算招募他们。美国人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现在我们每天都能抓到几名美国派遣到我方来的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藉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

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

同上，（下册）第 1227—1232 页

参战国		参战兵力	参战国		参战兵力
	中国	中国投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780,000人。		美国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投入海陆空兵力480,000人。
	苏联	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总共投入了26,000人（主要为飞行员）。		韩国	韩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投入兵力590,911人。
	朝鲜	朝鲜在朝鲜战争中投入兵力250,000余人。		英国 澳大利亚 埃塞俄比亚	“联合国军”其他15国联军总兵力为134694人。

朝鲜战争双方兵力投入

(236)



朝鲜战争的三个阶段

苏联生变

附录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

(1953年3月19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批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的信函（附件一）。

此信通过周恩来^①同志和库兹涅佐夫^②同志转交毛泽东同志，通过马立克同志寄给金日成同志，立即发往平壤。

二、批准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令（附件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目的。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

① 周恩来已于3月8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② 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

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 2 月 22 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定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 1 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定”。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 1952 年 10 月 16 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按照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定。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定：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定签字 12 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定草案第 1 条）。

（二）关于成立由 10 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 5 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 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 19 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判解决破坏停战协定的问题（第 24 条和 25 条）。

（三）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 36 和 37 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了如下协定：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 3 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 60 条）。

还在协定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新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就必定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修改，并提出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必要的表态。

第六，补充意见。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一、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同志）在即将进行的讨论波兰代表团有关朝鲜问题的提议时，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和声明。

苏联代表应陈明苏联对待交换战俘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应指出以下一点：苏联曾不只一次建议而且仍然主张在朝交战双方立即和全面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苏联的倡议，1951年7月开始了交战双方关于在朝停火和停战的开城谈判。这些谈判使双方就遣返战俘以外的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仍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准则，也符合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关于交换战俘的问题是在朝作战双方谈判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光明磊落的倡议。苏联热情支持恢复朝鲜谈判的建议，以求达成有关交换伤病战俘的协定，以及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解决停止朝鲜战争和签订和约的协定。

二、责成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 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定，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定，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同上，（下册）第1295—1300页

朝鲜战争大事年表^①

1948 年

2月26日

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在朝鲜南部单独举行选举。

4月19日-23日

朝鲜北部和南部的民主党派与社会组织代表，在平壤联合召开大会，抗议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关于在朝鲜南部单独举行选举的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945年8月9日和9月7日苏联和美国军队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

4月29日

朝鲜人民委员会（北方）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5月10日

朝鲜南部举行单独选举，组成大韩民国国民议会，并通过宪法。

7月20日

李承晚当选为大韩民国总统。

8月15日

大韩民国政府在汉城宣告成立。

8月25日

朝鲜北部举行选举，选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9月2日-8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并任命金日成为首相。

9月9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壤宣告成立。

^① 此大事年表原载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一书，反映了该书编者的看法，现转载于此，仅供参考。——本书制作者注

9月18日

苏联宣布同意在1948年12月底以前将军队全部撤离北朝鲜。

9月20日

美国发表声明，将在第三届联合国代表大会讨论撤军的问题。

1949年

3月5日

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会谈。

6月25日

朝鲜南、北方71个政党、团体在平壤建立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提出朝鲜的和平统一方案。

6月30日

美国宣布从朝鲜半岛撤军。

9月3日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报告，金日成准备发动夺取瓮津半岛的战役。

9月24日

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不同意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计划。

1950年

1月19日

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全面进攻的问题。

1月26日

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月30日

斯大林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以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

4月10日-25日

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了武装进攻南方的问题。

5月13日-16日

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并就发动战争问题征得毛泽东同意。

6月1日

斯大林通知金日成，同意将进攻日期定在1950年6月25日。

6月25日

凌晨4时，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发动全面进攻，并迅速越过三八线。

6月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派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命令驻在远东的美国空军、海军支援韩国军队作战。

6月28日

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南追击韩国军队。

6月29日

杜鲁门下令美国空军轰炸北朝鲜。

7月1日

杜鲁门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战争。

7月5日

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乌山首次与朝鲜人民军交战。

7月7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同意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Ethiopia）等。

7月8日

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7月13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抽调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7月19日

杜鲁门授命国务卿在美国实行后备军总动员。

8月1日

苏联代表返回联合国安理会。

8月4日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主张停止朝鲜战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

8月中旬

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洛东江一线，将美军和韩国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9月15日

美军以第10军所属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配合下，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及其以南水原方向进攻。

9月16日

联合国军和韩国军在洛东江正面战线的主力10个师开始实施反攻，朝鲜人民军全面败退。

9月27日

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指令，授权其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以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9月29日

汉城恢复为韩国的首都。同日，杜鲁门批准麦克阿瑟提出的占领北朝鲜的作战计划。联合国军和韩国军进抵三八线。

10月1日

韩国第3步兵师第65步兵团越过三八线。同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出兵朝鲜。金日成和朴宪永也联名发出求援信函，请求中国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朝鲜内务相朴一禹10月3日将求援信面交毛泽东。

10月2日

毛泽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中国暂时不能出兵朝鲜。

10月3日

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立即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报告，并请印度转告美国和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

10月4日-5日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会议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到朝鲜境内作战。

10月7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允许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美军开始向朝鲜北方挺进。

10月8日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10月10日-11日

周恩来与斯大林在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举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要求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并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所需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会谈后，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10月13日

斯大林致电金日成，要求朝鲜政府和军队撤退到中国和苏联境内。同日，毛泽东分别致电斯大林和周恩来，告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一致认为中国军队还是出动到朝鲜较为有利。斯大林遂取消关于撤退的安排。

10月15日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举行会谈，麦克阿瑟断定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因而计划于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

10月1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开始从辑安（集安）秘密渡过鸭绿江，向战区挺进。

10月18日

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周恩来说明了苏联决定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的情况，但会议仍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入朝作战。

10月19日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军从辑安和安东（丹东）两个渡口秘密渡过鸭绿江。

10月22日

金日成向中国政府通报：在战场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朝鲜党和政府准备将新组建的部队、军事学校、部分医院、国家机关共计17.23万人撤退到中国东北地区。

10月25日

联合国军西线各路部队先后进至博川、云山、熙川一线，先头部队继续向鸭绿江边之楚山前进。当天，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同韩国军队第6师遭遇，并发生激战。这一天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11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令各军停止进攻，第一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和韩国军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地区。

11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第二次战役，分东西两线进行作战，西线于25日、东线于27日先后发起反击。

12月6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正规部队进入平壤。

12月12日

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按照计划开始向三八线挺进。联合国军和韩国军未作抵抗，继续南撤。

12月14日

联合国通过决议，寻求停火。

12月16日

联合国军和韩国军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12月22日

中国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建议。

12月24日

第二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广大地区，并迫使联合国军转入防御。

12月31日

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联合国军和韩国军的三八线阵地。

1951年

1月4日

联合国军放弃汉城。

1月13日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将在适当的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1月17日

周恩来复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拒绝了该委员会提案。

1月25日

联合国军和韩国军由西至东在全线发动大规模进攻。

1月27日

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转入防御和反击，史称第四次战役。

3月14日

联合国军收复汉城。

3月27日-31日

美国第8集团军抵达三八线，中朝军队陆续退至三八线以北。

4月11日

杜鲁门撤销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任命李奇微为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范弗里特接替李奇微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

4月22日

中朝军队发动全线反击，是为第五次战役。

5月9日

美国远东空军对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5月2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动北撤，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6月3日

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朝鲜战场的作战及有关停战谈判的方针和具体方案。

6月2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的双方谈判停火和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30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联合国军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7月1日

金日成和彭德怀同意开始停战谈判。

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来凤庄举行。

10月7日

停战谈判从开城移至板门店继续进行。

1952年

2月2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控联合国军进行细菌战。

8月5日

整个朝鲜停战谈判除遣返战俘问题外，已达成全部协定。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参谋人员举行第11次会议，双方同意对于停战协定草案朝、中、英3种文本的文字校正工作，在必要时可由双方翻译人员协商解决。但此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

8月20日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向斯大林说明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强硬方针。

8月29日

美国空军对平壤进行大规模轰炸。

10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提出遣返战俘的新方案：即停战协定生效后，双方一律将全部战俘送至非军事区交对方接收，由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进行访问，并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这项工作须在中立国观察小组观察下进行。联合国代表拒绝讨论这一问题，继而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12月5日-8日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抵韩国访问。

1953年

3月21日

出席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应邀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苏联在会谈中提出了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方针。

3月28日

按照苏联的安排，金日成、彭德怀分别复信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同意他2月22日提出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并认为应把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4月1日

金日成、彭德怀分别致函克拉克，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以初步安排交换病伤战俘事宜，并商定恢复停战谈判日期。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3月30日和金日成3月31日发表的声明，提出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原则立场。

4月6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

4月11日

谈判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计划在本月第三周开始交换病伤战俘。

4月26日

在板门店正式恢复停战谈判。

6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就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并正式签字。根据这一协定，除直接遣返的战俘外，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1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90天后如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交由联合国另行召集的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做出处理的战

俘，赋予其平民身分。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定，双方进入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细节的工作。但韩国代表反对签订停战协定，并退出了谈判。

6月15日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与联合国军方关于战俘问题达成协定，按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协定规定16日零时后攻占的阵地无效。

6月17日

韩国私自就地释放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声称将继续作战。

7月13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新的攻击，主要目标是打击韩国军队。

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生效。

同上，（下册）第1351—1358页

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十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全集

附卷·档案选编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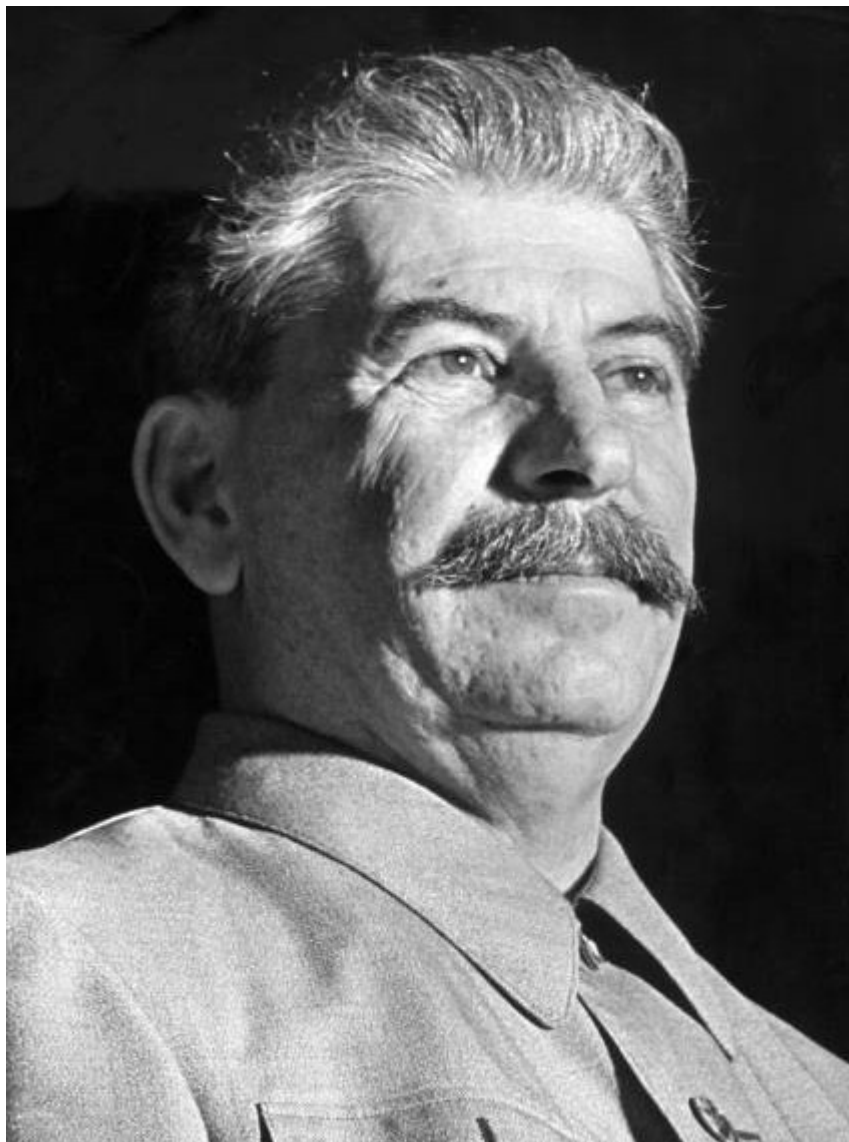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年·中国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приложенный**

ТОМ

10



斯大林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1
---------------	---

国际共运篇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三年

关于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往来便条 (1928年1月12日)	3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年4月7日)	5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得很精彩——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8月5日)	9
关于共产国际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 (1937年2月11日)	10
弄清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 (1937年11月7日)	11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年10月24、25日)	12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年11月7日)	14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年4月20日)	16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年5月8、11日)	18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年5月21日)	19
---------------------------------------	----

关于德国^①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0日)	22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3年8月21日)	25
将苏联制度移植到德国的道路是错误的 (1945年6月7日)	28
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31日)	2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一) (1948年3月26日)	3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二) (1948年12月18日)	59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三) (1950年5月4日)	82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四) (1952年4月1日)	107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五) (1952年4月7日)	122

关于英国

出版我国支持英国罢工者的决议——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6日)	132
---	-----

① 以下各国的顺序，按首份档案日期的先后排列。——本书制作者

我们的代表团在柏林表现得不错——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8日）	134
现在应当全力支持向英国禁运煤炭——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27日）	135
英国的工党现在很难后退	
（1946年9月4日）	138

关于美国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一）	
（1929年5月6日）	140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二）	
（1929年5月14日）	148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三）	
（1929年5月14日）	160

关于西班牙

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退出政府	
（1938年2月17日）	165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有的	
（1939年4月7日）	166

关于法国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169
实行适合法国形式的“左派联盟”路线	
（1944年11月19日）	171
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4年11月19日）	172

与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

(1947年11月18日) 181

关于意大利

对意大利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204

关于保加利亚

重要的是要保留住保加利亚军队

(1944年10月6日) 206

保-南联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

(1945年1月28日) 207

与保加利亚总理关于莫斯科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7日) 208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年9月2日) 216

关于保加利亚面临的一些问题

(1946年9月2日) 218

这一切都可以静悄悄地进行

(1947年8月8日) 220

苏联政府对保-南无限期条约的态度

(1947年8月12日) 222

关于建立保-南联邦问题的谈话

(1948年2月10日) 223

关于南斯拉夫

对铁托无理指责红军的来信的回复

(1944年10月31日) 231

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赫布朗的会谈记录	
(1945年1月9日)	232
南斯拉夫人想要……、想要……	
(1945年1月10日)	249
同铁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7日)	251
关于阿尔巴尼亚局势给铁托的信(节录)	
(1947年12月23日)	256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年3月27日)	257
附录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1948年6月28日)	263

关于罗马尼亚

给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议	
(1945年1月4日)	272
关于罗共党内和国内局势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等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2日)	273
关于罗马尼亚的经济政策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10日)	279
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谈话纪录	
(1948年2月3日)	284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与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谈话记录	
(1945年6月28日)	293
争取在近期内签订捷-波互助条约——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5日)	298

关于签订捷-波互助条约——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7日）	299
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 ——与捷政府代表团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9日）	300
对贝奈斯关于捷对外政策问题的来信的意见 （1947年7月11日）	305

关于蒙古

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 （1945年7月7日）	308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年2月22日）	309

关于波兰

建立具有共产主义纲领的波兰工人党 （1941年8月27日）	314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年11月14日）	315
与贝鲁特等人关于波兰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4日）	318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作用问题 ——同莫拉夫斯基等人的会谈纪要 （1946年8月19日）	341

关于伊朗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年5月8日）	352
-------------------------------------	-----

关于匈牙利

与匈代表团关于苏匈关系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7日) 356

关于印度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

(1951年2月9日) 361

关于阿根廷

同阿根廷驻苏大使布拉沃的谈话记录

(1953年2月7日) 373

新的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年1月28日) 380

附录 关于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问题

——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11月2日) 38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答季米特洛夫

(1948年11月6日) 385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3月14日) 387

插图

一 列宁在共产国际演说 20

二 马-恩-列-斯 394

本卷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学说和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斯大林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卷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斯大林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书的初步尝试。作为我们已经推出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至第二十卷（1901—1953）的“附卷”，按档案资料的内容共分为十卷，以飨广大读者。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这个“附卷”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书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卷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本卷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国际共运篇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三年

关于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往来便条

（不迟于 1928 年 1 月 12 日）

斯大林的便条

- 1) 我看最好任命我们的审议和修改纲领的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会）；
- 2) 这可以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 7 人会议上做；
- 3) 我有关于草案的几个意见，既有结构上的，也有实质性的；
- 4) 现在改变些什么是不是方便，因为草案就要由第六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了。

布哈林的便条

虽然有代表大会的批准和伊里奇的批准，但是一定是要改变的。主要需要另有表述的是：

- 1) 资本主义的危机（需要更灵活的表述）；
- 2) 新经济政策（现在许多东西更清楚了）；
- 3) 苏联；
- 4) 殖民地（？）
- 5) 一些部分的要求等。

斯大林的便条

是的，而且需要有专门的一章论述“在个别国家和民主的‘夺取

政权’途径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
11号目录，137号案卷，第34张。手写的。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年4月7日)

1934年4月7日

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

关于致奥地利的信，他指出：

(1) 压缩一下！

(2) 不要训斥，而要辩论、说服。欧洲工人从历史上就同议会民主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明现在资产阶级背弃了民主，正在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转变，因为它不会用别的办法进行统治。与过去不同，对于工人来说为争取议会民主而斗争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3) 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起义。只有在以夺取政权为任务时，才有起义。奥地利的情况不是这样。

(4) 不要直接号召工人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听到这一点会有偏见。他们会想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他不得不这么讲。此外，加入共产党这样一个地下政党，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应该让他们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党也曾经很小，但有许多追随者。

(5) 信中不要把结论写透。要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自己得出这些结论。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对于欧洲工人必须耐心地、易懂地说明为什么议会民主对工人阶级已经没有价值。以前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民主让工人阶级跟着他们走，为此作出某些让步。现在它在战胜了封建

主义之后，面对着新的敌人——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在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克服极大的困难，它就不能用议会民主的办法进行统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所有国家，资产阶级都会向法西斯主义转变。英国也一样，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往往把对俄国工人来说正确的东西照搬给欧洲工人。他们不明白，我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议会制。俄国工人没有从杜马得到什么，而欧洲不是这样。如果我国的资产阶级再有30年时间，它也会通过议会制同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推翻它就会困难得多了。

不要斥骂议会民主，而要向工人群众阐明这个发展过程。

季米特洛夫：我在监狱里也曾经反复思考过，为什么我们的学说正确，但是在关键时刻千百万工人不跟我们走，却仍与在行动上如此叛卖的社会民主党站在一起，譬如在德国，他们甚至还走到国社党里去。

斯大林：您的结论呢？

季米特洛夫：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宣传系统和我们对欧洲工人的不正确做法。

斯大林：不，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欧洲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联系；其次，在于欧洲的特殊情况——欧洲国家缺少足够的本国原料，煤、羊毛等。它们要靠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它们就无法生存。工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也怕失去殖民地。在这方面他们倾向于同本国资产阶级走在一起。从内心来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反帝政策。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对这些工人采取正确的做法。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一个工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轻易地争取到欧洲的千百万工人。

千百万群众有一种随大溜的心理。他们只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人物，通过自己的领袖行动。当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失去信任时，他们就

会觉得软弱和迷茫，他们怕失去自己的领袖，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尽管对领袖不满，还是跟着他们走。只有出现了别的更好的领袖时，他们才会离开以前的领袖。这需要时间。

马努伊尔斯基不明白这一点。他每年都预计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可总是没有发生。有一次他汇报说有个村子起义了，可是却无法找到那个村子……

这些人不注意细节。但往往是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进行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我为写一个报告曾叫过瓦尔加来，要他提供有关危机的数字，他又惊奇又害怕地问我：“要什么样的数字？”

我说：“实际存在的数字。”

“真实的数字吗？”

“是啊，当然是真实的数字！”

他拿给我那些数字，松了一口气。他说，天啊，总还有人喜欢听真话！您想想，他怕给共产国际提供真实的数字，因为那样他就会马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要我同意他才敢发表这份报告。

莫洛托夫：是啊，瓦尔加是个很好的学者，可是胆子很小！

斯大林：这些人不爱进行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总说些大话和一般论断。这还是季诺维也夫留下的东西。

哎，在这方面伊里奇可是十分精确的，多么精确啊！

斯大林：现在谁在那里（指共产国际）带头呢？谁应该带头呢？

季米特洛夫：我现在很难弄清楚。

斯大林：您别耍滑头啦！

季米特洛夫：以前我知道马努伊尔斯基是政治领导人。现在只知道……如果皮亚特尼茨基不在，工作就会乱糟糟，他就是通常所说的主心骨。

莫洛托夫：是啊，所以我们总是只找皮亚特尼茨基。

斯大林：库西宁挺好，但是个学院派的人；马努伊尔斯基是鼓动家；克诺林是宣传家；皮亚特尼茨基……

季米特洛夫：我在狱中常常想，共产国际终于在您的领导下历史地凝聚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马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克诺林）。

斯大林：谁说这“四个人”应该这样呆下去。您说的是历史，而历史有时也需要矫正。

季米特洛夫：我想您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总还应该担负领导共产国际的责任，尽管您万分繁忙，也应该参与对重大问题的研讨。

斯大林：是的，我们曾在这张会议桌上讨论过全会的提纲，后来怎么样？他们回去后就依然如故了。

您看见我们有多忙了吧。

我们的最优秀干部都到建设工地去了……哎，您跟几个同志先干起来吧，我们会帮您的。

莫洛托夫：您曾面对敌人。现在出狱了，就把工作抓起来吧……

季米特洛夫：我的苏联国籍会怎么样？它对我发表意见会有什么障碍吗？^①

斯大林：必要时您可以放心地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并不对每个苏联公民的行为承担责任。

……

（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等在座。）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35-38页

① 1934年初，季米特洛夫出狱后到共产国际工作，并取得苏联国籍。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得很精彩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8月5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來信收到了。关于今年完全取消工业品和食品配给证的问题，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这件事应当一抓到底。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得不错。季米特洛夫和埃尔科利作报告之后，大会开得更精彩。代表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决议草案写得不错。我认为，该在共产国际体系内建立第一书记（总书记）制度了。我以为可以由季米特洛夫担任第一书记^①。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其他人（外国人）可以作为书记入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我确实感到有些疲劳。跟共产国际的人打交道，编制1936年控制数字，处理各种各样的日常问题，——不知不觉就感到累了。但没有关系，休息几天，哪怕只休息几小时，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敬礼！

约·斯大林

1935年8月5日

选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②

①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② 本卷中档案凡未注明出处者，均系选自该书。

关于共产国际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

(1937年2月11日)

1937年2月11日

同斯大林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

斯大林：

(1) 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

(2) 应该指出，这些人都是在列宁生前就反对列宁、反对党的。

(3) 要引用列宁说反对派的原话：“在苏维埃政权下，党内任何反对派如果坚持……就会滑到白匪的泥沼。”

(4) 引证庭审的速记记录，引用被告的证词。

(5) 展示出他们准备苏联失败的政策和工作。

这个决定是愚蠢的。

所有你们这些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都在帮敌人的忙……不要搞决定，决定是必须执行的。致各党的信更好一些。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53-54页

弄清在联共（布）和 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

（1937年11月7日）

1937年11月7日

与斯大林谈话：

“弄清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况。

克诺林是波兰和德国间谍（从很早以前直到最近）。

拉科夫斯基从革命前直到最近，一直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他还招募了博戈莫洛夫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皮亚特尼茨基是托派。所有的人都供认他是托派（克诺林、阿勃拉莫夫等）。

库恩同托派一起反对党。他极有可能还参与间谍活动。他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的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

安提波夫、瓦雷基斯等人是沙皇情报机关的特务。

有材料指出，托洛茨基在1904-1905年也为沙皇情报机关效过劳。这点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来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57页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年10月24、25日)

1939年10月24日

日丹诺夫关于文章^①的问题来电：“我与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看过文章了。还修改了。文章很好。他想今天晚上和您一起看看修改的地方，但是他那里没有文章。他说他会给您打电话的！”

1939年10月25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文章问题。

不要着急！

不要一下子提出所有问题。

必须提出那些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必须提出那些成熟的、群众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问题。必须逐步引导群众接受革命口号！

必须提出那些能够帮助群众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头头们的口号！

(1) 目前主要是一些否定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停止战争，停止流血！

驱逐主张战争的政府！

我们不会反对主张和平的政府！

现在提出在消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就意味着帮助张伯伦，

^① 指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

帮助战争煽动者，就意味着在群众中孤立我们自己！

（2）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就过高估计了形势。

当时我们大家都性急了，犯了错误！

这可以用当时的条件来解释，但是不能自我辩解。

现在不应该再重复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立场。

从那以后我们学了点东西，变得聪明些了！

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共产党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掌权。

现在有苏联！

（3）共产党不应该是宣传小组，而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现在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

需要的是动员群众进行斗争。

我们认为，我们在（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缔结的）互助条约中找到了我们能够把许多国家置于苏联影响范围之内形式。但是，为了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必须严格维护它们的国内制度和独立。我们不谋求它们的苏维埃化。它们自己进行苏维埃化的时候会到来的。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101-102页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年11月7日)

1939年11月7日

检阅和游行（人们抬着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和几幅台尔曼的画像。）

在斯大林那里吃午餐。

斯大林：欧洲合众国^①的口号是错误的。列宁发现后即取消了这一口号……

我认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只对俄罗斯合适，在俄罗斯，工人与农民密切相连，在沙皇制度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强攻资产阶级。

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个口号就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了某些民主改革，被它们紧紧抓住，没有准备好走上内战（革命）的道路反对资产阶级。（必须用另外的方式对待欧洲工人。）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以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为他们提出另外的口号。

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善于作剧烈的转变，他们没有同资本主义传统连在一起，与张伯伦一类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不同。

① “欧洲合众国”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10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宣言《战争和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中提出的。列宁曾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合众国口号》一文中批判过这个口号。

官僚主义墨守成规、老套，不进行独立思考，不吸收由于条件改变而出现的新东西……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102-103页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

——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年4月20日)

1941年4月20日

在大剧院中。

塔吉克斯坦的闭幕演出。出席者（在政治局包厢中）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季米特洛夫。

演出结束后我们呆到两点。

.....

当时斯大林说：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134-135页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年5月8、11日)

1943年5月8日

当晚，与曼努伊尔斯基一道去莫洛托夫处。就共产国际的未来进行了商讨。得出结论是：在已形成的条件下，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

1943年5月11日

与曼努伊尔斯基校订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草案。

我将这个草案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当晚和曼努伊尔斯基去斯大林处（莫洛托夫在座）。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草案。讨论了如何通过决议。谈到了下列程序：

- (1) 草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
- (2) 通知各支部并取得它们同意；
- (3) 得到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

哪些职能和在什么形式下今后还应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我去讨论并准备出具体的建议。

就此，斯大林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例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是这也不要急于行事……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年5月21日)

1943年5月21日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我和马努伊尔斯基。

莫洛托夫宣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

斯大林阐述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在战争条件下，当德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任务是打倒本国政府和执行使它们失败的策略的时候，而在苏联、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是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完全支持本国政府争取最迅速地消灭敌人。

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体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247-248页



列宁在共产国际演说 (20)



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

共产国际召开会议



关于德国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0日)

绝密

第3216/C号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鲁祖塔克等同志

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寄上他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的意见，供参阅。

中央书记助理（签名）

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意见

绝密

1. 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提纲不应公布。应当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俄国同志在德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德国革命的指导性文章。应当想方设法避免一切可能让人认为革命是有人从俄国“操纵”、“策动”的任何借口。必须绝对通过德国共产党和以它的名义行动。

2. 必须在提纲中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说明，所指的是由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应当直截了当地指出，工人政府的口号只不过是包含有统一战线的思想的鼓动性的口号，它的最终形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果它万一竟能实现，那么这样的政府必定是瘫痪的和一片混乱的政府，由于软弱无力注定要在最短时期内立即垮合的政府。应当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共产党人，只能靠他们单独在德国夺取政权。

3. 提纲中正确地指出，当前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工农政府。但是，

应当坚持不懈地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由他们批准的，对他们负责的苏维埃的机关。地方苏维埃应当在发生第一个革命高潮时就组建起来。也许在萨克森这样的地区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应当说明，没有地方苏维埃作为其支柱和组织基础，工农政府只会是无根之木。

4. 提纲丝毫没有提到，或者极少提到，德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保持政权，以及根据哪些主要条件可以期望能够保持政权。提纲主要谈到必须和可以夺取政权。然而，保持政权目前是德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础，提纲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号召俄国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时，把自己论据的全部重心都集中在说明“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的问题上。现在，由于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一点应当以更大的力量加以强调。

5. 应当在提纲中直截了当而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也许还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同德国开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封锁德国（不让从美国运来粮食，等等），对此现在就要制定对策。提纲中这个问题含混不清。

6. 应当在提纲中清清楚楚地说明，德国发生革命和我们用食物、武器、人员等帮助德国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同波兰也许还有其他缓冲国爆发战争，因为，显而易见，不进行一场胜利的胜利战争，至少战胜波兰，我们就不仅不能运去食物，而且也不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期望德国发生工人革命时波兰会保持中立，并让我们能够从波兰走廊和立陶宛过境——这不啻是期望发生奇迹；关于拉脱维亚也应这样说；至于英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不会允许我们从海上运输的）。我已经不去说从我们方面给予革命的德国以军事支持的其他论据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帮助德国人——而我们愿意也应当予以帮助——，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作战，而且要认真和全面地作好准备，因为事情归根结蒂涉及苏维埃联邦的生存和世界革命的近期前途。提纲中对这个问题也说

得含糊不清。

7. 必须制订出德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经济纲领。
8. 其他较次要的意见以后再谈。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9日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

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3年8月21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讨论纪要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21日会议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

出席：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

中央委员：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皮达可夫、拉狄克。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书记处：纳扎列强、巴扎诺夫。

.....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联邦的存亡问题。或者是德国革命失败，我们被打倒，或者是革命获得成功，一切顺利，从而我们地位得到保障。没有别的选择。重要的是俄共的行动路线。而问题的核心是必须把我们的军事力量全力调动起来。

“工农政府”、“统一战线”口号。不能取消这些口号，它们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要向我们的共产党员亮清底牌，应当说明他们要承担起主要的重担。必须约束左派，必须向布兰德勒说清，基本的重

负要由上层承担。

凡尔赛条约——在这方面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拉狄克同志。不能提出承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最好是玩弄手法：也许承认，也许不承认（拉狄克：“我赞成这样做”），那就好。应当加进托洛茨基的修改意见。还有一个措施可以缓和局势：必须加强我们在缓冲国中的力量。应当选派这些民族的共产党员去那些国家。有一小块同德国的共同边界对我们很重要，也很必要。应当力求在某一个资产阶级缓冲国打开一个窗口，从而形成一个通往德国的走廊。到革命开始时，应准备好这步。目前还不清楚怎样做，但应当研究这个问题。

至于日程表，我怀疑它是否适用。工人们仍然相信或半信社会民主党。也许希法亭有8个月就够了（布哈林：“他无事可做。”拉狄克：“也可以8个月什么也不做”）。可以规定尝试性发动的日期，不能规定决战行动的日期。

应当把俄共问题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删去。问题要分成两个：一个是涉及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涉及我们俄共。这第二方面要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划去。自然决定不能透露出去。

.....

斯大林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我们完全赞同制订我们的日程表。在德国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因素是无法事先预见到的。而举行发动恰恰应当赶上这类有利的因素。我们当时曾存在这样的因素：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撤出（托洛茨基：“这些因素是我们创造的。”斯大林：“是我们激起的”）。我赞成制订时间可变动的大体的日程表，而且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发动的时间要赶上有利的因素。

关于左派。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过早地夺取工厂等等，会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束缚左派的手脚，但不要打击他们。

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要用公开发表关于援助、关于重心转移、关于德国革命等等的一般性言论来敷衍，而不应下达具体的指令。共产国际只应核准，而不是提出具体计划，不要采取主动行动，不应通过报刊而是暗地里纠正错误。

当前，外交游戏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必须换牌，对我们外交政策上的许多问题要重新审视。必须见机行事。同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关于凡尔赛条约最好避而不谈。这样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民族色彩。

应当在我们国内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告诉庄稼汉，土地和自由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向他们说明，一旦吃掉德国，接着就会吃掉我们。

.....

巴扎诺夫记录。

1923年8月22-25日整理

将苏联制度移植到德国的道路是错误的

(1945年6月7日)

1945年6月7日

晚上在斯大林处（包括莫洛托夫）我们讨论了致德国共产党的呼吁书草案，作了些实质性修改。

斯大林建议：要明确声明，在当前，将苏联制度移植到德国的道路是错误的，应该确立反法西斯民主议会体制。

由共产党提出组成具有共同纲领的反法西斯政党集团。

不要如此赞颂式地谈论苏联等。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344页

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31日)

参加谈话的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皮克同志、格罗提渥同志、乌布利希同志、费希纳同志、厄尔斯纳同志、苏斯洛夫同志、谢苗诺夫同志。翻译：沃尔科夫同志。^①

一、谈话总的情况：

1. 皮克同志热烈问候斯大林同志，并向他转达德国劳动人民对伟大帮助所表示的感谢；

2. 格罗提渥同志作了关于德国现状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任务的报告，几乎逐字逐句对他们的三个文件^②作了解释，这些文件是昨天由我分发出去的；

3. 在报告过程中（翻译时），斯大林同志不断即兴插话和发表一些意见，莫洛托夫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

4. 斯大林同志发言的内容包括：对德国现状的评价，关于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我们对德问题的外交立场，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任务；

5.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二、（奥·格罗提渥）报告的主要内容：

① 这个谈话纪要是苏斯洛夫整理的，谈话时间是1947年1月31日21-24时。

② 这三个文件是《关于和平条约与全德政府》、《我们对双占区协定的立场》和《我们对形势的估计》。

在卫国战争期间，您，斯大林同志说：“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而德国人民和德国国家还存在。”您的话在德国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希望。

德国现状是严峻的，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前，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建议。

1. 和平条约或和平宪章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签订和平条约，因为和平条约：

(1) 为成立德国中央政府创造了条件，这个政府将保证履行和平条约，保证德国作为和平和民主国家的发展；

(2) 要求所有政党为和平条约承担责任，以限制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美国顾问）墨菲的建议，即盟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宣布对德国和平宪章，以代替和平条约，因为这会促使沙文主义的发展，危害民主化，使德国某些政党有可能推卸履行和平条款的义务。

2. 是否需要进行关于和约的全民投票？

我们从美国方面听到应当在德国对和平条约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全民投票，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特别是围绕东部边界问题的沙文主义运动和蛊惑宣传，破坏德国的民主化，并使德国的国际地位复杂化。

3. 德国方面谁来签订和平条约？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和平条约由德国中央政府签订。

4. 一些德国政党在统一国家问题上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维护联邦制。

基督教民主联盟也维护联邦制。

自由民主党赞成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唯一赞成通过分散管理的德意志统一国家的政

治上的维护者。

5. 是否需要就统一国家问题进行全民投票？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这样的全民投票，认为这种全民投票会削弱德国的反动势力，有可能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而且德国统一社会党将作为德国人民民族统一的最积极的维护者出现。

我们期望在这种全民投票中取得成就，即努力做到在 5000 万张选票中为赞成国家统一争取到不少于 3000 万张的选票。

盟国方面将反对全民投票。

（**斯大林**）插话：“他们还反对德国中央政府，反对民主化，反对德国振兴，目的是不允许来自德国方面的竞争，竭力不让德国兴起，这就是他们的政策。”

6. 关于全德中央管理机构

我们认为在柏林会议的决议中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适宜的，即不是建立“一些德国中央管理机构的重要部门”，这些部门相互平行地开展工作，而是建立一个德国的中央管理机构。（我说：“那么，这些管理部门就不建立了”。）

在柏林决议中规定的五个德国管理机构（财政、运输、通信、外贸和工业），应当作为德国管理机构的部门进行工作，还应增补经济计划部门、外贸部门和农业部门。

这是建立德国中央政府的第一阶段。

在苏占区还没有这种协调的管理机构，而在英、美占领区里设置了类似的管理机构。

如果在占领区建立这种机构，会不会加剧德国的分裂？不会，如果不拖延建立中央政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加剧德国的分裂局面。

（**斯大林**）插话：“即使我们的伙伴不同意建立德国中央政府或中央行政机构，我们也支持这样做。”

7. 应当如何建立德国中央政府？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德国中央政府应由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并吸收工会参加，以使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推卸责任。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联邦制，反对从各联邦专区和占领区管理机构中选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

（斯大林）插话：“你们赞成统一的德国、反对联邦制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反对联邦制的宣传中，你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没等回答，（斯大林）就说：“现在德国的联邦制是一种手段，靠着这种手段，反动阶级力图保存自己的特权并摆脱社会主义。”

听了同志们支持建立由所有政党和反法西斯组织的代表，而不是由各联邦专区及类似形式的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的理由后，（莫洛托夫）同志说：“联邦机构并没有得到全民的最后表决，而这里说的是要建立全德政府。此外，联邦机构也不是民主选举的机构，实质上是由占领者组建的。”

8. 关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之间的协议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协议，认为这一协议目的是致力于为美国和英国资本家获取市场，为了出卖德国和奴役德国人民。

（斯大林）插话：“占领区的联合（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叫喊），是占领者的联合，而不是德国人民的联合，这与德国人民有什么相干？”

关于国家的政治状况

为了国家的民主化要建立什么样的前提？

在各占领区是完全不同的。

消灭法西斯的斗争在各占领区也是完全不同的。

（斯大林）插话：“西德的法西斯势力的实力如何？全民投票时他们可能占多大比重？必须把积极的反动分子、卖身的纳粹分子与纳

粹分子中的爱国分子区别开来，应当同前纳粹分子中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应当把爱国的、正直的分子从他们中间争取过来。”

在苏联占领区进行了清理康采恩、大银行和法西斯经营的部门的工作，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

在西部占领区则相反，竭力阻挠清理康采恩，大银行继续存在。没有触动大地主、军国主义的支柱。

进行反对纳粹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各占领区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开展的。

9. 政党力量的相互关系

工人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得票比例发生了变化，与1932年相比，工人政党得票增长了10%。

	1932年	1946年
社会主义者得票	36.70%	46.60%
资产阶级政党得票	63.3%	53.4%

4970万选民的选票（指1946年10月20日在苏占区地方自治代表大会，1946年10月20日在柏林选举的投票，以及10月13日在英占区和法占区，1945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在美占区所进行的投票）在以下各政党中的分配：

单位：千张选票

工人政党		资产阶级政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	5071	自由民主党	5400
德国共产党	3059	基民盟	17634
社会民主党	14681	中派	1138
全力救援农民联盟	283	人民自由党	1405
其他团体	36	其他团体	965
总计	23131	总计	26543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各党的组织力量如下：

德国统一社会党	166.3 万人
社会民主党（包括柏林）	66.3 万人
德国共产党	27.3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仅苏占区）	约 18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美占区	约 40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占区	约 30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占区	约 15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总计	103 万人
自由民主党（仅苏占区）	15 万人

接着，同志们对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等进行了评述。

在评述社会民主党时报告人提出了该党的内部矛盾：

- （1）国家的统一—联邦制，分离主义—欧洲合众国；
- （2）国有化—社会化—工人参股；
- （3）工人阶级统一—加深分裂，承认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这些矛盾更加深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加深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提供了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打开缺口以及争取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可能性。

（斯大林）插话：“也许要对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这些矛盾进行投票表决？也就是说，看居民喜欢什么？”

在西部最危险的是要确立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方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德国的民主发展，防止魏玛时代的结盟政策。因此，最主要的是要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为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在企业 and 工会中采取统一行动而斗争。

10.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状况

实践证明，两党联合是正确的。党在不断发展，联合以后增加了 10 万人，现在共有 166.3 万人，除柏林外，其他地方发展得都很好。

任务：把 1600 万人培养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还缺乏有经验的干部，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人还没有结合在一起。

为了培养干部，建立了 130 所区级规模的政治学校，而在柏林建立了中央高级政治学校。

德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计有 27.3 万人，1945 年底选举时获 305.8 万张选票，对比 1933 年前的情况，这样的数字是很大的增长，那时，德国共产党在整个德国共 35 万人。

占领当局对共产党的活动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德国共产党没有为统一战线进行持久的斗争，许多组织轻视大区的工会工作，没有完全克服宗派主义。

（斯大林）插话：“在西部地区的社会民主党里有没有著名的左派领导人？”

舒马赫分子不让左派分子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积极活动，毫不迟疑地把他们孤立起来，并把他们开除出党。

（斯大林）插话：“应当鼓励在西部地区建立左派社会民主党，也许舒马赫不让这些左派生存？”

从前我们曾认为需要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联合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但没有成功。在进行了一系列解释工作后，我们认为只有在占领当局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情况下，在西部地区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才是适宜的。

（斯大林）插话：“如果在西部地区有一个统一社会党，那就太好了。在那里，只有德国共产党代表你们，那里的居民看了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而民主无产者一类人则违背和破坏了这个纲领，这吓坏了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在那里有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更为有利，这便于使大多数劳动人民了解社会主义，不必追求人数。”

有人说：“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4月和10月期间)。”

我们认为，我们在西部地区要求允许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会引起在苏占区要求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没有必要允许在苏占区建立社会民主党。

(斯大林)插话：“应当允许。”

“怕什么？要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评。”

“对此不需要害怕。”

“你们应该对宣传进行监督。”

“用占领当局禁止的办法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如果没有占领当局你们就无法坚持反对舒马赫的斗争，那么你们是虚弱的。”

在进行拆除设备、战争赔偿引起严重问题，以及困难的经济状况等条件下，党开展工作很困难。

(斯大林)插话：“是啊，党很困难。”

三、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对德和约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看来，这个条约要拖延下去，因而，建立中央政府也会拖延。

因此，在波茨坦协定基础上提出建立这些部是适宜的；不仅仅是波茨坦协定中规定的五个部（尽管这些部还没有建立），还要建立其他的部。除了军事部和安全部，其他部的建立不要拖延到建立中央政府的时候。

在建立这些部的同时应建立中央联合机构。

大概，我们的伙伴会反对这么做，但是在三月会议上应当提出来。这将是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阶段，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波茨坦协定。

四、斯大林的讲话

英国和美国非常害怕德国作为国际市场竞争者而崛起，一切都源

于此。他们想有一个在自己监督下的国际市场，保证商品的垄断价格。他们认为，既然德国已经战败，这就意味着不允许它复兴并进入世界市场。他们是从这些前提出发的。

因此，所有可能加快德国发展的事情，盟国都拒绝接受。

以联邦制和分离主义代替德国的统一，因为这意味着削弱德国，而德国被削弱就将难于进入世界市场。

为削弱德国，就不应让它建立中央政府。

我们的观点相反。对人类有利的是让德国和日本进入国际市场，那样的话，商品价格将会低廉，劳动人民将首先因此而受益。

美国垄断集团的霸权控制意味着高价格和劣质商品，这对人类是无益的。

要使德国站起来并进入国际市场。

不能把德国及其 7000 万居民从历史中勾销。

应当考虑到，如果不让德国进入世界市场，它就会衰弱，而它的居民就会贫困，整个欧洲是需要商品的。

德国需要振兴还因为，如果德国不站起来，不走上世界舞台，它将成为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复仇主义倾向的土壤。此外，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情德国的无产阶级，他们备受折磨，我们希望德国的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好一些。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没有完全的联合，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统一。

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能是占领者的联合。

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德国的恢复也就越快。

德国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

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就需要（这是最坏的情况下）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

实际上，我们的伙伴希望有四个德国存在，并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

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应当建立有资格签署和平条约的中央政府。我们再也不提出拆除设备的要求了。军队将缩编，对他们的供应也会减少。我们将不催促战争赔偿，这一点可以延缓。这样，将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创造前提条件。

五、各种问题和意见^①

能否指望在东部边界有一些小的修正？

“恐怕不会有任何结果。”

交换了关于乌泽德岛西部的意见。

关于召开德国所有政党代表的协商会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可能性，您有什么想法？

“应当摸一下底，以免你们的党在会议上陷入孤立。我们的伙伴会拖延签订和平条约，并将指责是我们在拖延。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签订和平条约就必须建立中央政府。”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全民投票的活动？

“应当找到开展活动的理由。”

关于战俘问题

已经接收 12 万人。妇女们要求继续遣返。

我们想加强对战俘的民主教育。

“请提供一些德国人，让他们进行政治工作。”

在战俘营里有一些民主分子，但没有充分加以利用。

我们希望联共（布）中央过问这一问题。

“联共（布）中央的负担太重了。”

我们请求让受过培训的反法西斯战俘在战俘中进行宣传，我们还请求根据反法西斯分子的名单派几百人回到德国。

“我们会派的。”

^① 根据苏斯洛夫的记录，无法确定这些问题是谁提出的，是谁答复的。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一)

(1948年3月26日)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B. C. 谢苗诺夫（代表苏联驻德军管局），翻译 Г. Я. 科罗特克维奇和 F. 厄斯纳。

皮克^①感谢斯大林的会见，同时也感谢苏联驻德军管局给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帮助。

斯大林问，军管局确实给予帮助了吗？还是在说恭维话？

皮克和格罗提渥^②说确实得到了帮助。

斯大林开玩笑似地问，就是说不光是压迫，还是给了帮助？

皮克笑了笑，同意了这一说法。然后他说他来谈政治问题，格罗提渥来谈经济问题。据皮克所说，在同德国缔结帝国主义条约还是缔结民主条约、是统一德国还是分割德国、是促进德国朝着民主方向发展还是通过“马歇尔计划”使德国沦为殖民地等问题上，盟国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德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影响。广大群众对这些矛盾并不那么清楚，但这些矛盾却影响到群众的情绪，特别是在柏林更为突出。西方强国竭力对居民施加影响，引导居民反对苏联，诱使德国人

① 威廉·皮克（1876—1960），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执委会书记，1946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② 奥托·格罗提渥（1894—1964），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敌视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要吃人、要没收德国人的私有财产，等等。

斯大林笑了。

皮克说，尽管这种宣传很愚蠢，但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及后来的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反共教育的居民却产生了影响。逮捕德国人的事件，由于被捕的人同亲属失去了任何联系，就成了德国人出现反苏情绪的因素之一。

斯大林问，是谁逮捕了这些德国人？

按皮克的说法，是苏联占领当局逮捕的，而且逮捕后这些人似乎就失踪了，既没有向被捕的人提供同亲属进行联系的可能，也不进行公开审判。居民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可以改变这一切，但却不愿意这么做。皮克建议，在实施大规模逮捕时请苏联驻德军管局事先通知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同时允许被捕的人同亲属通信并进行公开审判。皮克解释说，在德国西占区各占领当局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但那里允许同亲属联系并随时进行公开审判，这些都助于缓和气氛。

斯大林问，苏联当局逮捕的可能是些外国的走卒，间谍？

皮克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又指出有些人是由于反动分子告密而被捕的。被抓起来的法西斯分子，比如那些“猎狼”组织的法西斯分子有时招认不利于社会党人的口供，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由于这些不实之词，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年青人和政治上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信任的人被逮捕。我们想知道这些逮捕原因，同时希望释放那些被错捕的现正关押在拘留所的人。

斯大林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怎么不就此事给我们写个书面材料。

皮克回答说，他们不想拿这些小事打扰斯大林。

斯大林顺口答道：“这叫什么打扰！”

皮克说，他们想在这里就此事陈述他们的请求，他们认为除保留

那些保障安全所必须的措施外，必须对一些方法加以改进。由于进行土地改革和没收法西斯战犯的企业，党在剥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犯了一些错误，不过党当然认为这些民主改造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问，是什么人把土地收归国有的？

谢苗诺夫回答，早在1945年秋德国的有关机构就完成了土地改革，但没有进一步把地产收归国有。没收法西斯战犯的企业是根据德国各州土地委员会的决定实施的，苏联驻德军管局只是批准了这些决定。

皮克承认说，土地改革已经结束了，但没收企业的工作至今尚未开始。

斯大林问，被没收的企业归谁了？

皮克答，归了德国有关管理机关。

斯大林强调，可见这些企业是归了德国公司而不是俄国公司。

皮克提醒说，有一部分企业归了苏联股份公司。

斯大林问，企业归苏联股份公司是现在的事吗？

皮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占领区再一次展开的没收财产的工作对德国有关管理机关有利。

斯大林问，谁在进行这项工作？

皮克回答，德国有关委员会，但资产阶级政党都反对这种措施。

斯大林说，他斯大林有权管苏联军管局，可无权管德国人。如果对军管局不满，他斯大林接受。如果对德国人不满……

皮克说，他是想以此表明党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斯大林说：“我明白。”

接着皮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有很大增长。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建立西德国家。因此与西方强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些国家便对

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恐怖手段。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运动。共举行过两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在伦敦外长会议期间召开的。派了一个代表团，但外长会议拒绝听取代表团的陈述。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848年革命纪念日时举行的，通过了在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的决定，同时选出了一个由400人组成的小议会式的人民委员会。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还就德国的民主和经济建设问题通过了重要决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比较冲动，第二次代表大会则比较务实。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2200名代表，其中460人来自西占区。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2000名代表，其中512人来自西占区。大部分西占区的代表是非法过境的，但很顺利，没有遭逮捕。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有600人，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360人。减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人数，是想表明人民代表大会不只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事情。

斯大林问，从西占区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属于什么党？

皮克回答，80%是共产党人。但也有些著名的资产阶级人士。

斯大林请说出具体的名字。

皮克提到了曾在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辩论时发过言的、来自明斯特的黑斯特曼教授，还提到其他一些政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取得了成绩，这可以从各西方强国占领当局采取的反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措施中看出来，这些强国禁止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进行厚颜无耻的宣传来反对人民代表大会，罗伯逊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也对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侮辱性的攻击。德国统一社会党请求英国政府迫令罗伯逊收回由己的侮辱性言论。

接着皮克讲了人民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其中有300人来自苏占区，有100人来自西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共有85人，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约有 10 人，其余的是来自其他政党和群众组织的代表。

斯大林追问道，“社会民主党人也进入人民委员会了吗？”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接着说，苏占区采取的经济措施，特别是把法西斯战犯的企业转交人民的措施对居民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驻德军管局第 234 号命令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该命令以“生产越多、生活越好”这一口号为依据。苏占区的经济状况有了某些改善，但仍有很多困难。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改组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与苏占区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相反，西占区的经济有所下降。那里的粮食状况更糟。

斯大林问，西占区的粮食供应很糟吗？真是这样吗？

皮克肯定了这一点并指出，西占区因此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罢工。英国占领当局硬说共产党人策划了把罢工变成起义的计划（即所谓 M 计划）。英国占领当局写道：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更危险的“P 计划”。德国统一社会党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英国秘密部门发明出来的，想以此打消英国人以后从事这些“计划”的兴致。在这方面党得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驻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泽姆勒的大力支持，泽姆勒严厉批评了美国人在西占区的政策，强调美国人的政策导致了贫困，基督教民主联盟将亲自领导罢工。克莱声明，泽姆勒在说谎。当巴伐利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再次选举泽姆勒为本联盟驻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时，克莱没有批准这项选举。

皮克接下来谈了西占区在肃清纳粹影响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西占区许多管理机关的领导岗位上还有不少过去的反动分子干部。很多司法机关和警察局的头头是法西斯军官。甚至舒马赫也不得不就此发表声明。无疑，舒马赫是英国的走卒，他的声明是想安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阻止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任何的工业国有化。他们宣传“马歇尔计划”，据说他们准备向德国提供援助。德国统一

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宣传不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那样有效，因为在居民中传播着“马歇尔计划”所引起的许多幻想。党在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中暂时没能吸引住广大群众跟着自己走。在西占区，德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治上都很薄弱。我们把德共看作受德国统一社会党统一领导的党。德共也声明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在西占区成立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共同工作委员会，可这些委员会没有得到占领当局的承认。德共组织有31.25万党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80万党员。

斯大林问，这是哪儿的数字，是西占区的吗？

皮克回答说是。德共在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席位太少。在西占区12个州的1300个委托席位中，共产党员只有83个席位，占6.3%。

斯大林问，西占区是不是表面上没有禁止德共的活动？

皮克说没有。皮克接着说，在西占区2000万选民中，共产党人只得到9.1%的选票。但德共在企业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是在鲁尔，那里在选举生产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34%的选票。德共的薄弱还表现在缺乏统一领导上。到现在为止，只是州里有党的领导机关，州与州的党组织之间却很少合作。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决定成立全西占区的统一常务委员会，由三位在西占区工作的富有经验的同志组成。

斯大林问，共产党人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皮克回答，舒马赫坚决反对合并，他把所有主张同共产党人合并的人都开除了社会民主党。

斯大林问，社会民主党人中有没有什么反对派？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越来越清楚，民主党越破坏工人运动，反对派的人数就越多。舒马赫自己就企图用诋毁共产党人的做法来反对工人运动。

斯大林说他说的是另一回事。如果西占区也有个联合的党就好了。摘掉共产党人这块让许多人害怕的招牌是可取的。这会好一些。这种联合，即使只有少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也就足够了。

皮克解释说，当有人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变相的德国共产党时，他们便放弃了两党联合的想法。

斯大林说，假如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内有个什么反对派的话，可以让这个反对派进入联合的党，从而实现联合。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皮克说，有这个可能，他举了多特蒙德的例子，说那里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联合的党组织。

斯大林问，这难道没好处吗？

格罗提渥说，联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占领当局禁止共产党改名，禁止工人政党联合。

斯大林又问了一遍，是禁止联合吗？

莫洛托夫肯定地说是禁止。

皮克指出，西占区当局甚至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开会。

斯大林问，难道占领当局需要共产党人这块招牌吗？然后他解释说，西占区这么诋毁共产主义，现在居民都吓得敬而远之了。

皮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不来梅，占领当局强令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画上签上德国共产党的名称，用来吓唬选民。

斯大林说，骗子。他们拿这个吓唬人！

皮克说西德共产党人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前不久作出指示，将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并准备转入秘密状态。

斯大林说，“假如共产党人像波兰那样宣布自己是工人政党呢？”

皮克说可以考虑，但这要得到占领当局的许可，它们可能会反对。

斯大林说，可以试一试，可能不错。

皮克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干部、纸张和资金上给予西德共产党人援助的情况。1946年给了西占区共产党人130万马克，今年给了430万马克。皮克请斯大林帮助把“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使用，这个电台封前被用来为苏联占领军转播莫斯科的无线广播。西德，特别是鲁尔听不到归德国人使用的柏林中波电台的广播。

斯大林问，“一个电台够吗？”

厄斯纳说，“德国广播电台”是德国有影响力的电台。

斯大林询问了瑙恩电台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这个电台在打仗时被破坏了。

斯大林问，从柏林到鲁尔有多远。他又补充说，可以至少给两个电台，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可以使他们的广播覆盖整个欧洲。

皮克重复道，归德国人管的柏林电台，西德听不到。

斯大林问皮克他希望怎么做。

皮克问答，他们希望能把“德国广播电台”移交给他们。

谢苗诺夫说，全德的普通收音机都能收到“德国广播电台”的广播，而收不到柏林中波电台的广播。他认为把“德国广播电台”移交给德国人使用是可以的，但索科洛夫斯基反对。

莫洛托夫说，苏联驻德军管局当时反对把这个电台移交给德国人是因为这个电台是由四方共同管理的，因此，如果苏联驻德军管局把这个电台移交给了德国人，盟国就会把这个电台夺走。

谢苗诺夫肯定了这一点，他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斯大林说，我们交还这个电台。

皮克说，柏林西占区当局拥有强大的宣传机构，德国统一社会党目前不可能与之相抗衡，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苏占区的宣传活动有所发展，但西占区占领当局对在企业中开展的工作大加干涉，禁止张贴宣传画和集会，当局还建立了托派组织。今年10月柏林将举行新的选举。皮克认为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说选举结果不会好于1946年。

假如能让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们将很高兴。

斯大林说，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吧，或许能把它们赶走。

皮克谈了柏林的工会选举结果，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丢掉了很多选票，包括冶金工人的选票。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把损失补回来。必须克服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政治宣传上的不力局面，因为，假如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再争取走一些工会组织的话，那就更困难了。在苏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对比对统一社会党有利。在地方自治代表会的选举中，党得到了47.6%的选票，如果加上农民互助会和民主革新文化协会的选票，党得到的选票已达50.5%。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地方自治代表会中的得票率是49.5%。但在某些州，资产阶级政党在地方自治代表会中占有微弱多数。因此，必须同那些在政治问题上，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上对统一社会党施加巨大压力的党保持联盟关系。就数量而言，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整个德国最大的政党，有177.4万名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占区和柏林共有党员80万人，其中柏林有4.5万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有党员10.8万人。苏占区的资产阶级政党共有党员38.2万人，其中柏林有3.1万人。有40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了工会。

斯大林问在哪儿？

皮克答在苏占区。其中64%的人是在工业企业、运输业和机关中工作。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内部状况近期有所改善。党内团结不断加强。但原共产党人和原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分裂出去的危险。敌人的诽谤在党内引起了某种动摇，比如在逮捕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党必须向管理机构、经济机构、群众组织、党的机关和报刊等部门输送工作人员。原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不多。因此难以遵循人数均等的原则，可能很快就要放弃这个原则了。干部培养问题也很重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培训制度是这样的：

在生产小组和按居住地组成的小组中，每个月都有几个晚上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会议。在生产组织中，有近50%的党员参加这些活动，而在非生产性组织中，则有20-40%的党员参加。在115个区（包括边疆区）中都有区办学校，学员人数达4800人。有6万名党的积极分子已从这些学校毕业。有6所州办三月制学校，有学员620人。党的最高级教育机构是高级党校。其课程不久前已延至两年。该校有200名学员和27名教师，教师的工作负担很重。高级党校下设各种短训班。5月份，一个为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举办的三月期的专修班即将开学，这个班以后将改成一年期的专修班，学员将达到600人。它将为管理机关培养高级干部，也培养一些教师。皮克说党计划在苏战区的6所大学和3所高等学校开设一门必修和必考的新科目“科学社会主义”。选择这个科目是为了抵抗西占区的反社会主义宣传。

斯大林问其他政党同意这么做吗？

皮克说，应该会同意。在德国有许多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有人却拿截然不同的东西冒充社会主义。甚至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斯大林再一次问是不是所有政党都同意这么做？

皮克继续说，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需要培养20名副教授。为了抵抗高等学校中的反动影响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大学生不愿选修这门课，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想把这门课设为必修课。

斯大林笑了。

皮克说，他们会对大学生说，大学生不一定非得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假如他们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至少也应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笑着问，怎么样，大学生同意吗？因为这花的是国家的钱，而不是党的钱。

皮克说他们会接受的，这不会有困难。

斯大林问不会有困难吗？

皮克作出肯定的回答。他又说，苏联军管局的佐洛图欣支持这个

主意并估计它能成功。皮克继续说，苏占区的大学和高等学校的16200名大学生中，只有4600名学生是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有4200名学生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占26%），7.5%的学生为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9.2%的学生为自由民主党党员。其他学生属非党派。一些反对分子隐藏在非党派学生中。在学生会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占36%，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占19%，自由民主党党员占19%，非党派学生占25%。

皮克说，因此党还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方面的任务也很重大。一开始就赞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凯泽尔最近又试图把苏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拉到西方强国一边。自由民主党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特别是在反动分子聚集的柏林。必须在这些党的内部找到可依靠的力量，撇开反动分子。只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声明拥护和平和德国统一，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皮克说，有必要为过去名义上的纳粹分子、从战区过来的移民和部分战俘组建第四政党。

斯大林说，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不反对。他问，没有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他们吗？

皮克说通报了。他说，他们已经开始做起来了，他们出版了《国民日报》。但在挑选该党领导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困难，因为这需要一些既不反对我们，又同我们的联系不太公开的人。

斯大林同意。

皮克说，资产阶级政党强烈反对建立这样的新党，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党的发展将对他们不利。

接着皮克谈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成分的变化情况，说他们打算组织一次审查，把那些分别按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两次登记入党的人清理一下。近来，统一社会党损失了12500名党员，他们之所以退党，部分人是因为对粮食供应状况不满，部分人是因为党的教育工作薄弱

使他们不能融入党组织。在这期间又吸收了42000名新党员。必须加强新党员的学习和教育工作，此外必须在企业中开展吸收党员的运动。

皮克归纳了一下说，他对斯大林有两个请求，一个是有关逮捕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无线电台的问题。

斯大林说他记下了。他问妇女工作开展得怎样？

皮克回答说，目前有一个妇女民主联盟，在妇女中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

斯大林问青年工作做得如何？

格罗提渥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共有60万成员，在青年中工作开展得也很有成效。

斯大林问，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没有这样的联盟？

厄斯纳回答说有。

皮克说，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较为薄弱，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民主革新文化协会有着决定性影响。

接下来是格罗提渥谈情况。他指出伦敦代表会议使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波茨坦协议已规定了制订对德和约的明确程序。但这个程序被破坏了。外长会议作为可以制订和约的机构失去了意义。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来缔结和约、缔结什么样的和约。在国际法方面，德国呈真空状态。就政治而言，德国没有政府。盟国管制委员会一连几个月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索科洛夫斯基对伦敦三国会议提出严重质疑的3月20日会议后，工作进一步瘫痪。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停止了。目前没有核准德国赔款计划的机关。我们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国家正处于灾难之中并提出一系列口号。如果没有能完成全德任务的机构，德国人民就应该走民族自救的道路。但民族自救因占领当局的种种干涉而受到限制。伦敦代表会议于1947年12月破产后，西德单独采取了一系列改组经济委员会的重大措施，实际上是开始筹建政府。现在“马歇尔计划”是德国西占区

政策的核心。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关于财政改革的争论证明，西德有单独进行财政改革的危险。这意味着德国将在经济上分成两块。单独进行财政改革是“马歇尔计划”针对德国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西占区，大部分居民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盯着美元，以为“马歇尔计划”能让德国人的生活好起来。但我们认为必须揭露“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后果，因为资产阶级政策没有任何人道可言。事实上，在西德不允许提高产量，不允许发展工业品出口业务，却加大了原料输出，恢复了旧的垄断机关，而且鲁尔又变成了武器工业中心。

斯大林问，鲁尔的生产有增长吗？

格罗提渥说，那里的煤矿开采量提高到每昼夜30万吨。

斯大林询问了鲁尔的冶金生产情况。

格罗提渥说，冶金生产有大幅度提高，这是实施粮食供应奖励制的结果。格罗提渥没有西占区工厂的准确数字。格罗提渥继续说，我们反对“马歇尔计划”，赞成和平；反对垄断，赞成民主。有证据表明，在德国技术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中敌视“马歇尔计划”的情绪不断增长。这些人越来越相信，对德国来说同东欧和东南欧的联系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联系。这种看法在这些人身上的传播速度甚至比在工人中间还要快。格罗提渥指出，西占区的罢工是非政治性的，但表达了对饥饿的抗议。格罗提渥继续说，反动势力在其宣传中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布尔什维主义、俄国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他们把德国统一社会党与俄国等同起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正在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途径。在这场斗争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苏占区建立起起码的经济基础。因此，苏占区的经济问题现在被提到了第一位，应该把经济问题与党对全德国发出的经济口号有机地结合起来。苏占区的工业生产是148亿马克，1947年是94亿马克，这里包括苏联股份公司所属的企业，如果加上这些企业的产量，苏占区的总产值总共是104亿马克。这样，工业生产达到了1936年的56%。

斯大林问这些计算是否用的可比价格，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格罗提渥说，根据1948年的计划，苏占区的工业产值预计比1947年增长5%。他说，我们想提高到10%，但出现了我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格罗提渥说，要使工业产值增长10%，必须再进口如下数量的原料：25万吨轧材和钢材，30万吨煤，22000吨棉花，1700吨羊毛，3000吨亚麻，1200吨大麻纤维等。

此外，还必须从苏联股份公司中为德国经济拨出38000吨人造毛和5000吨人造丝。谈到供应问题，格罗提渥说，现在苏占区每人每天供给的热量约1500卡。1950年打算增加到2600卡。但由于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如果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因此需要进口28万吨粮食、12万吨饲料和120万吨油粕。苏占区战前消费的肉和油是60万吨，而现在的产量总共才有20万吨。因此还亏空40万吨。

斯大林问苏占区的人口增加了吗？

格罗提渥说增加了。

当格罗提渥说出油粕的需求数量时，斯大林问不会弄错吧，并说格罗提渥说的数字太大了。

格罗提渥说可能有误。他接着说，必通过进口饲料和保证肥料供给来奠定发展农业的基础。苏占区需要氮肥15万吨，这可以从苏联股份公司所属企业中拨出一部分。另外，还需要增加12万吨磷酸盐为生产石灰需要再拨16万吨煤。只有提供这些化肥才能保证1950年的正常收成。格罗提渥又补充说，他所说的这些数字可能不准确，因为他们对苏占区经济问题还不是了如指掌。接着，格罗提渥请求不要从1948年的收成中扣除任何战争赔偿了。赔偿计划规定了4个季度要收走的糖和酒精的数量。接着，格罗提渥开具了党所需要的纸张数字，之后强调了纸张在党的政治宣传和财政方面（党在培训干部和办公经费中的支出很大）的意义。格罗提渥指出，尽管党员人数已经增

加，而且党面临的任务也更复杂，但德国统一社会党 1948 年得到的纸张数量却比 1946 年少了一半。

斯大林问需要多少纸张？

格罗提渥回答，现在他们每季度得到 3500 吨，而苏联驻德军管局能得到 9000 吨。他们请求每季度能从这 9000 吨中拨出 3000 吨给德国统一社会党。

接着，格罗提渥请求斯大林指示苏联上级机关批准苏德合营德发电影股份公司的合同，根据该合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公司股东有权依据它们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参加德国电影的发行工作。这份合同在柏林签署后还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批准。

谢苗诺夫说，这份合同根据电影艺术部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但苏联驻德军管局同意批准该合同。

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把情况写来，难道你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吗？

斯大林对格罗提渥说，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争取尽其所能。

然后斯大林问，苏占区有没有德国警察局？掌握在哪一方手里？由谁主管？

格罗提渥回答，德国警察局由各州内务部机关主管，也归苏占区内务部中心管理委员会管理。

斯大林问共有多少警察局，装备如何。

格罗提渥回答说警察局的装备很差。

斯大林问警察局的人靠得住吗？

格罗提渥回答，90%的人是党员。他强调，各州内务部部长全是自己人。

斯大林问，在中心地区呢？

格罗提渥回答说也是。

斯大林问，你们不认为应该加强警察局的建设，牢牢控制住它吗？

格罗提渥说，这当然是个关键问题。

斯大林问需要我们什么帮助？

格罗提渥说希望帮助训练警察。

斯大林问，他们有能训练警察的优秀干部吗？

格罗提渥说警察局的干部本来就很少。

斯大林说可以从战俘中找一些。

格罗提渥说，他们已从“自由德国”委员会挑了一些警察干部，他还特别提到了柏林警察局局长马克格拉夫上校和某州内务部副部长贝歇尔。

斯大林说，如果需要从战俘中挑人，可以去那儿找。他问，警察局需要多少人定下来了吗？

谢苗诺夫回答，据他所记，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盟国管制委员会没能就此达成协议，但需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斯大林说，如果需要装备，可以利用我们这儿可能有的德国武器。斯大林强调，警察局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该认真讨论。它将是有益的。

斯大林问还有什么问题。

格罗提渥说，虽然苏占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并不想在西占区采取分立措施之前先实行国家分区治理的措施。

斯大林说，我们也持这种政策。这是正确的政策。

格罗提渥说，因此他们将推迟在苏占区建立议会和政府。

斯大林同意。

格罗提渥说，人民委员会可以讨论某些问题，似它没有行政权，不能通过法律。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你们仍然应该建立类似于全德议会和政府的机构，或更准确地说建立个雏型。

格罗提渥说，德国经济委员会就是政府雏型。他们已经在专门的文件中谈了他们对这个委员会的要求。

斯大林说，他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他问文件送到哪儿去了。

科罗特克维奇说，文件是由苏斯洛夫分发的。

格罗提渥从分发出去的有关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文件记录中读了他特别坚持的那些措施，即年度经济计划未经经济委员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斯大林马上回应道，好，德国人还打算支付赔款吗？

格罗提渥和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

格罗提渥继续说，但是，除赔偿计划和占领区支出计划外，别的就不要再扣了。否则不可能刺激工人发扬生产的主动精神。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接着斯大林问，格罗提渥知不知道在数百万马克或美元的赔偿项目中俄国人每年拿多少。

格罗提渥说，计划1948年付12亿马克，这大约是苏占区工业总产值的10%。

斯大林问合多少美元？

莫洛托夫回答，按3个马克兑换1美元的比率，应该合4亿美元。

斯大林问，怎么样，负担重不重？

格罗提渥没有回答。他说他们很孤立，他们认为必须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为此他们想成立一个研究进行贸易可能的委员会。

斯大林问同哪些国家建立联系？

格罗提渥回答，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这种联系。如果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那么西德将失去市场，而东德将有一个良好的市场。

格罗提渥问，明年，苏占区有没有可能制定一个两年或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

斯大林说，如果经济委员会得到扩大和巩固，他认为是有可能的。

格罗提渥说：要学会游泳，必须得下水。

斯大林同意。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学。我们过去也什么都不会，后来学会了。德国人有能力。他们学起来不会比我们差。

斯大林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的什么机关制定出德国宪法并把它提交给西德和东德讨论就好了。这个宪法不应该太民主了，以免吓得人们不敢接受，但这部宪法仍然应该是充分民主的，好让东西德的优秀分子都能接受。这样才更好。应该吸引全体居民参加宪法的讨论。这将为实现德国统一奠定心理基础。

皮克说，人民委员会已选出了制宪委员会，还选出了和约委员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等。

斯大林说，成立签订和约的委员会是个表面问题。而制订宪法，他斯大林认为是使德国居民为统一作准备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要把统一这个词总挂在嘴边。听多了，人们就厌烦了。应该提出具体计划并吸收居民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应该尽快做起来。关键不在实施宪法。这个急不得。应该使宪法成为使群众为德国统一作好准备的手段。英国人和美国人会极力收买德国人，使他们得到特别的优待。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从思想上作好统一的准备。宪法就是很好的工具，是最好的工具。

皮克说，他们曾试图在1946年党的路线中贯彻这一点。

斯大林说，问题不在这儿。委员会应该制定宪法，而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讨论，同意后再拿到人民当中去。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程。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话，你们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对此作好了思想准备，统一不会遭到破坏。到时美国人也没办法了。你们如果能接受这个建议就好办了。

格罗提渥声明他们也是这个看法，这为具体的宣传提供了可能。

斯大林同意。全体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也期待着得到有关材料。而美国对此根本无计可施。通过这个办法你们可以把所有居民同人民代表大会起来。必须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威信。斯大林说，德国统一

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应该通过大力宣传争取德国的统一。

斯大林问还存什么问题，是不是急着回去。

皮克说是想急着回去，准备乘周一的飞机走。

斯大林问可不可以再多呆几天。

皮克问能不能公开这次访问。经索科洛夫斯基同意，他们已经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书记处成员通报了这次访问。

斯大林说，他们公开或不公开此次行程，我们无所谓。应该考虑一下怎么做对党更有利。对你们来说，公开可能不大好。有人会说，瞧，他们去莫斯科了，得到了莫斯科的命令，社会党人从来没有自我，他们总是奉命行事。他斯大林也不知道该不该大肆宣扬这件事。如果有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什么人来莫斯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这样会把事情搞糟，因为有人会说，社会党人没有自己的头脑。难道不会有人这么说吗？你们商量一下自己决定吧。

皮克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说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可能快来莫斯科了。

斯大林说，到那时可以公开这次访问，而现在这是党内的事情。

皮克说，他们将把此次访问的情况向党的书记处成员汇报。

斯大林同意。他们派你们来，他们应该听取你们的汇报。你们应该向他们汇报情况。

接着斯大林问，他们能不能在莫斯科呆到周三，那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就有答复了。

皮克说他们可以留下来。因为正在过复活节，即使他们不在柏林，也不易引起注意。

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了皮克和格罗提渥在莫斯科的安排情况，招待他们的伙食好不好。

皮克和格罗提渥对此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告别。

谈话从 19 时到 21 时 30 分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记录：B. 谢苗诺夫

Г. 科罗特克维奇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

杂志 2002 年第 2 期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二)

(1948年12月18日)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和 B. C. 谢苗诺夫同志，翻译弗·厄斯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部部长、科罗特克维奇。

皮克对斯大林同志给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提供机会共商德国局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任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是否真有一人投靠美国人了？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投靠美国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成员戈尼弗克从一开始就在党内耍两面手法，从社会民主党转入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是心怀敌意。

斯大林同志问，怎么会让他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

皮克说，这都是因为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职位要在原社会民主党人和原共产党人之间进行平均分配而造成的。

斯大林同志问，怎么没找个优秀的更可靠的人。就是说你们对人的考查工作没做好？能否说说你们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皮克答道，由于戈尼弗克事件打算改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机关并成立政治局。现有的由 18 人组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将不再起领导作用，而进入这个人数不多的党的新领导班子的将是被挑选出来的更为可靠的人。

斯大林同志问这次想谈什么？

皮克说，他们想讨论一下经济、管理和党内的一些问题。他对苏联驻德军管局通过索科洛夫斯基、谢苗诺夫和鲁斯基赫同志给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帮助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问都给了哪些帮助。

皮克回答说，包括很多建议和物质援助。德国的情况很复杂，党经常需要各种建议。柏林有两个市政府，正在进行货币战。西方占领国悍然决定将西德变成向苏联进攻的军事基地。皮克认为，帝国主义的愿望与可能性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目前正朝着不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发展。德国被分裂了。占领国的地位使德国西部注定要变成殖民地；马歇尔计划意味着对德国的掠夺。克莱^①甚至禁止在西部谈论社会主义。和平工业的发展停滞不前。西德币制改革后，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为了安抚工人，西德工会的反动领导前不久搞了一次一日总罢工，对此克莱表示赞同，因为他知道，这些工会确实不再为改善工人的状况而进行现实斗争了，而只是想通过无害的示威游行发泄不满情绪。

斯大林同志又问了一遍，罢工是经过克莱许可的吗，难道克莱对罢工感兴趣？

皮克答道，总罢工只是个减压阀，因为工人情绪太激动了。但是工人通过一日罢工什么也没有为自己争取到。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克莱耍的危险把戏。斯大林问道，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同意搞总罢工吗？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补充说，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想向工人表明，他们也同意为克服工人状况的恶化而斗争，但事实上他们组织罢工只是想安抚一下不满的工人。

斯大林同志说，这对舒马赫分子和克莱来说是个危险的把戏。

① 克莱，时任美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美国占领军管理局军事总督。

皮克说，罢工那天对工人来说实际上是休息日，而不是斗争日。按皮克的说法，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开始对党内舒马赫领导集团的政策表示不满。该党内部开始了更换领导人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西德的共产党很弱。皮克认为，这是因为德共于1945年12月底才被解禁，而到1948年4月该党在全德境内实际上还没有联合为一体，只是在某些州和地区得到了发展。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尚不明确。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拥有统一的领导。两党每月都在柏林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期间还要就西德共产党人的问题与他们召开专门会议。但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还没有针对西德和东德的统一政策，实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党的领导。西占区占领当局对党采取公开的恐怖活动。最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正式禁止到德国西占区参加党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德国共产党在西占区的组织工作也很薄弱，不过慕尼黑、鲁尔和汉堡的德共比其他地区的相对要强一些。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党费不能按时交纳。东占区不可能给予足够的帮助，因为没有克莱的马克，然而没有物质基础党的工作很难开展。德共对一系列问题尚缺乏明确思想。

皮克认为，党的任务是为德国统一打造更广泛的基础。西德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对涉及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经济问题的提法还行，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就显得相当弱了；在鲁尔最近的生产委员会选举中共产党人得到32%的选票，而在鲁尔的政治普选中只得到6-7%的选票。在最近的工会选举中共产党人失去了推荐自己候选人的机会。西德的资产阶级政党十分仇视共产党人。新法西斯主义分子通过针对苏联的军事挑衅、暗杀和恐吓工人等形式又活跃了起来。斗争相当艰难。

斯大林同志问，对此您想怎么帮助？

皮克认为，必须使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同西德的共产党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需要派指导员去西德，还要给予纸张上的援助，有

可能的话，在柏林为西占区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

斯大林同志问，同德共代表聚会，官方大肆宣传同他们的联系，这种做法好吗？

皮克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他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工人联合会”是由他们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再次问道，保持西占区和东占区共产党人公开的密切联系，这种策略正确吗？

皮克回答说，有必要这样做。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他问的是策略问题。有必要采取这种策略吗？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西德保持公开的大肆宣扬的联系，共产党人就会被认为是俄国的奸细。为了迫使敌人放下这一武器，必须正式禁止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西占区德共联系。西德的共产党人应该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这种联系。这样比较好。

皮克指出，到目前为止这种联系没有公开，多是秘密进行的。

斯大林同志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们在寻求这种联系，也确实有这种联系。

乌布利希指出，党在减少官方联系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闭在柏林为西德共产党人开办的学校，因为美英两国向该校派遣了间谍。

皮克插话道，必须帮助西德的共产党人。

斯大林同志说，他说的不是这个。帮助是应该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美元和办报纸张。这一定要秘密地暗中进行，以便使共产党人能够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克莱就是要让西德的共产党同东占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联系。而指责共产党人是俄国奸细的舒马赫对此也很感兴趣。

皮克指出，反正还会不断有人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是“俄国人的党”。

乌布利希说，德共代表至今一直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

议。以后就不再参加了。

斯大林同志说，保持德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公开联系这一老政策反而害了你们，该终止这种政策了。斯大林同志问，可不可以让一些优秀共产党员进入西占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然后开始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这种策略可行吗？斯大林同志认为，德国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太露骨。老日耳曼人赤膊上阵同古罗马人进行斗争，结果损失惨重。斯大林同志认为，在这方面德国共产党人有些像老日耳曼人，因为他们进行斗争太直接。然而这种方法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也不是总能达到目的。要学会伪装自己，因为这场激烈斗争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

斯大林同志讲道，匈牙利有个小农业主党，不久前该党在匈牙利国会中占居多数，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劲的政党。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就把自己的一些接受小农业主党的纲领的人派进了该党，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做法。目前共产党人已经完全瓦解了这个党。匈牙利现任总理就是一个潜藏的共产党员，他早就被秘密地派进了匈牙利小农业主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使用了这种方法，对此很惊讶。

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我们所遇到的正是必须用计谋加以对付的敌人。战争期间可以使用计谋。而你们那里正在进行真正的战争。经验表明，这样的巧妙手段是必要的。赤膊上阵不是总能成功。勇敢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战争中光靠勇敢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

皮克证实道，西德的共产党人就是如此：只会进行公开斗争，而不会施展计谋。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这样是不行的。老日耳曼人非常勇敢，但是，在他们没有学会使用计谋之前总是受到古罗马人的重创。斯大林同志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是否认为这种斗争方法道义上是允许的。

皮克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允许的，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

尝试一下这种斗争方法。但是被派去的人一定要非常机智灵活。

斯大林同志说，德国共产党人的聪明灵活不会比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差。

皮克说，德国的阶级斗争太尖锐。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曾一度也到处是抗议活动和枪杀事件，形势非常不妙。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要像东占区那样实现正式联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西德必须另辟蹊径。

皮克讲道，他们曾尝试在西德建立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友好合作关系。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到共产党人这边共同工作。然而这种开端没有得到继续发展，现在已不再搞了。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危险。必须认识到，西德的工人害怕同共产党人合作，因为克莱不希望这种合作，而大权掌握在克莱手中。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也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工人有些怕克莱和舒马赫，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

皮克说，西德的共产党人想更换党的名称，但克莱不批准。

斯大林同志说，克莱需要一个叫共产党的政党，好有打击对象。他希望西德共产党是个稻草人，不给它以生机，而使它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就是克莱的政策。这也是工党的政策。斯大林同志询问需要给西德共产党哪些帮助。他认为，必须有一些人作为党在西占区的代表，给他们以非官方的帮助。这样比较好。

皮克说需要纸张。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可以提供纸张”。

格罗提渥说需要在柏林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个可以办到”。

格罗提渥说需要经费。

斯大林同志说，这方面我们可以帮助。

皮克说西占区德共领导干部的口粮成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道，“这方面也要帮助吗？这该怎么帮？”

厄斯纳说，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这种帮助，给西德秘密运去了一批粮食，对德共中由于虚弱而病倒的工作人员也给予了治疗。

斯大林同志问经济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皮克说，苏占区的经济正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影响和亨内克运动^①日益扩大。但是反动势力也开始活跃起来，表现为暗中破坏和投机倒把。私营企业主从国家手里得到原料，却把产品拿到黑市上出售。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分子牢牢控制起来。必须对他们施加强大压力，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暗中破坏和投机倒把。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问道，是颁布法律和命令，还是怎么办？

皮克作了否定回答。德国经济委员会设有协调所有企业的部门，而在州和地区也都设有工商业办公室。但是这种办公室实际上是企业主的组织，它们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建议成立专门部门来协调私营企业。批发商业应逐步转归国家。这对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批发商常常用牲畜欺诈农民和国家。在农村，富农不断扩大自己在农民互助会的影响，企图把互助会变成旧式的“帝国土地组织”。这就要特别注意富农的所作所为。皮克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工人总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但是对此国家机关尚未做好准备。工人的阶级觉悟还不够高。国家机关同中小企业的联系也不那么巩固。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右翼分子没有被击败，而事实上他们是这些政党中的主宰，特别是在自由民主党中。在反对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击败资产阶级政党的右翼。德国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建立联盟和制定一个要求和平、统一德国和改善居民生活状况等内容的泛民主主义纲领来完成这一任务。届时大部分资产阶级政党组织都会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一道行动，而反动分子会更加激烈地负隅顽抗，因此他们将使自己陷入孤立。皮克讲述了德国社会活动家代表团1948年11月访问莫斯科对占领区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

现在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努施克、卡斯特纳和德廷格等人正在占领区作介绍苏联情况的精彩报告，这产生了积极影响。皮克认为，主要任务是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如果能成功地击败这些政党中的右翼，我们就将沿着剥夺的道路走下去，剥夺是必要的，但是在占领区进行这种剥夺的时机尚不成熟。

斯大林同志询问富农的情况。

皮克回答说，必须限制富农对他们所掌握的农民经济组织的影响。没有打算改变土地关系。有关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传说毫无根据。但是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各地的富农都在农民互助联合会中把持着重要职位，很多富农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甚至组织了自己的统一社会党小组。必须加强中农和小农在农村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税额要有较大的差别。

斯大林同志问，皮克的经济问题和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问题是否谈完了。

皮克说关于经济计划由乌布利希详细谈。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完全同意皮克所阐述的政策。目前任何剥夺都不需要，此事尚不成熟。也不需要任何直接打击资本主义分子的强制命令。否则你们将自己削弱自己。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还为时尚早。需要等待。但是应当颁布打击投机倒把法。对某些投机倒把分子绳之以法，而对资本家群体先不要去碰。这样做工人和农民都会满意。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因为剥夺的结果将会有很多私营企业被关闭。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法，作为对资本家的某种限制措施将会受到欢迎。关于成立专门部门和使私营企业依附计划部门的建议也不妥当。对私营企业的监督必须采用别的方式。德国的形势复杂，社会主义不能径直到达，而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这就是任务的特殊性。如果你们实行人民民主这一原则，那么联盟将会崩溃，舒马赫在工人中的拥护者将大大增加。在农村不要去碰那些完成实物税的富农，而对那些不完

成税收的富农必须追究个人责任，万不得已时要没收财产，为此或许应该稍微加强相应的法律。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没收，而是按国家价格强制收购那些不完成义务交售任务者的土地和农具。

斯大林同志说，在苏占区改行俄国 1925-1927 年曾采用过的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方法还为时尚早。有充分的手段依法控制富农的活动。比如，可以少卖给他们汽油，颁布农业雇佣劳动法：规定工作日的时间、工资水平、雇农的居住条件等，然后追究那些破坏该劳动法的人的责任。对此农民和工人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机会主义政策呢？因为你们的情况不同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那些国家是共产党人掌权。而你们还没有掌权，德国还不是统一的国家。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现在不应该把德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人民民主国家提出的那些问题上，而应该集中到统一德国、和平条约、降低物价、提高工资和改善饮食等问题上。这样才能把全德国团结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此事应该好好议论议论。必须用法律约束资本家。**斯大林**同志问，苏占区有没有这样一种法，规定西德的资本家可以在东占区拥有企业？苏占区的资本家可不可以把自己的企业卖给西占区。

格罗提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种做法行不通。当然，在占领区内部一些企业的股份可以转卖。

斯大林同志说，或许应该禁止资本家把企业卖给私人，只准许国家收买这些企业：该颁布相关的法律，然后再抓破坏法律的行为。

皮克说，这件事在西柏林做起来会特别复杂，因为那里的企业主可以随心所欲。

莫洛托夫说，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他说的是东占区。应当禁止将私人企业卖给西柏林。总之，应该颁布一个共同的法律，规定企业主不得将自己的企业卖给私人，而只有国家有权收买这些企。这个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企业

主。这样工人才会相信企业不会被关闭。

斯大林同志说，因此他才为苏占区提出这一“机会主义政策”。否则民主力量联盟就会瓦解，而舒马赫及其主子的影响将会在工人中得到加强。人民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在德国应当采取其他办法来限制资本主义分子，如颁布打击投机倒把法、关于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法、工人和雇农劳动与权利法，等等，根据这些法律来打击破坏分子。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实行预备党员制。否则就会犯我们的错误。一下子吸收入党，然后又要清除或开除出党。这会使人们产生怨恨。应当实行预备期制，比如两年，在此期间进行考验，而不要一下子就吸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在个别情况下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准许破例。同时不应排斥富农，可以吸收他们为德国统一社会党预备党员，如果他们有的话。斯大林同志强调说，在苏占区必须实行这种谨慎的政策，社会主义不能径直到达，而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因为德国的环境太严峻，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说，因此，他在这种情况下到晚年时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说，这只是他的建议，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他建议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皮克插话道，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预备党员的问题书记处曾经讨论过，但是没有作出明确决定。

斯大林同志建议告诉大家，波兰和俄国都有这种程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预备期可因人而异，一年两年不等。

斯大林同志向乌布利希询问了原料问题，并补充说，我们愿意尽可能地帮助你们。

乌布利希说，他有几个关于党的问题。必须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目前的成分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个区的审查表明，55%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是富农。党内甚至还有进行亲美宣传的百万富翁。能不能用一种什么形式对这样的党员进行小心的清理（审查）？

斯大林同志问，审查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开除他们吗？

乌布利希说，一部分应当转为预备党员，而另一部分应当开除。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工人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那很好，你们处理吧。一部分人必须开除，但是他斯大林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要把此事的全部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当然，总有人要被开除或转为预备党员。

乌布利希说，还有关于资本主义分子的问题。政治出发点是清楚的。但是他所感兴趣的是某些措施。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小农中的影响有所减弱。现行法律规定对义务交售农产品要区别对待。但是按照现行的上交办法富农仍然比小农或中农更容易完成上交计划。希望能够解决如何能减轻小农的上交负担问题？苏占区在交纳基本税上也没有明显差别。农民的肥料供给问题由富农来定。牲畜由牲畜批发商供货。总起来说，我们对新农民和小农的帮助很少。脱粒机掌握在富农手中，小农必须用粮食向这些富农支付打谷的费用。无论到哪里，叫处是富农和老的牲畜供货商。农民说，新法令不错，但他生活得不好。乌布利希认为，必须巩固国家的地产，把它变成给劳动农民示范的农庄。交售制度应当改一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小农的播种材料甚至都被没收了。我们的同志已经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些小措施改变农村的现状。需要有大举措。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交售法没有规定差别吗？

乌布利希回答说，有规定，但不能令人满意。

斯大林同志问，农村有没有农机站？

乌布利希回答说有农机点，但技术装备很差。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农机点属于谁。

乌布利希答道，属于农民互助会。

斯大林同志说，在苏联没有一个农机站属于农民。所有的农机站都是国家的。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变化，尽

管农机站最初是掌握在农民手中。

乌布利希说，由于同西德断绝了联系，苏占区的农业机器生产下降。但是，如果不发展农机站，小农和中农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斯大林同志说，在苏联也曾一度实行过这种政策，当时把拖拉机卖给了新成立的集体农庄。后来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民都没有任何好处。为维持农机站，需要有维修基地、燃料库、熟练技术人员、农艺师，各集体农庄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又从农民那里把这些机器收购回来，1927年起所有的农机站都已掌握在国家手中。现在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属于自己的拖拉机、康拜因等这类大型农业机器。农民认为这样看来更好些。他们同农机站签订合同，用粮食支付农机站在他们土地上的工作报酬。这对双方都好。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没有必要把苏占区属于农民互助会的农机站收回来。收购的问题可放到以后再提。但机器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目前在苏联，国家有两个得到粮食的来源：按较低的国家定价上交的公粮和以实物支付给农机站的劳务费。而第二个来源给苏维埃国家提供的粮食甚至比第一个来源还略微多一些。农民对义务交售粮食不满，但他们很乐意向农机站交出粮食，——既然得到了服务，就应该付报酬。这个经验可以利用。农机站应该同农民签订耕地、收割、脱粒等合同，而且不要向小农索取高价。这对小农将是很大的帮助，如果农机站有脱粒机、收割机等机器，那就更好了。农民需要机器。如果你们开始这么做，农民会满意的。

皮克说，这需要大量资金。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开始干吧，我们会帮助你们。本钱以后会收回的。

乌布利希补充道，另外还可以由农民互助会出资从富农那里租用他们暂时不用的机器。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有这样的法律吗？

乌布利希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个法不错。换成他斯大林，他会颁布一个法，规定未被开的和未被耕作的土地收归国家，这将迫使富农耕作所有的土地。现有的一切机器必须卖给国家。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农民互助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将是农村中经济上较有实力的人，而富农有经济实力，他们有很多土地，他们手中掌握着农艺师。

乌布利希提出牲畜供货商的问题，这些人剥削农民、欺骗国家，比如，他们以执行义务交售的形式从小农和中农那里买来好牲畜，然后换成富农的劣牲畜，再把这些劣牲畜交售给国家。乌布利希认为，应利用同贸易和供给管理机关签订合同的牲畜供货商，把农村收购牲畜的工作转交国家机关。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试一试，还要制定一个打击投机倒把法。

皮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正在考虑搞国家批发商业。

乌布利希说明了这一建议的理由。现在商品从生产者到购买者手中要经过 10 个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很多商品流失了。大商人捞到了巨额利润。他们掌握着商品的分配。大部分产品流向黑市。例如，在纺织城市梅耶兰有 35% 的产品通过非法的投机渠道流失到柏林的西部地区。

斯大林同志更详细地询问了乌布利希的意思，他是否希望企业主把产品卖给国家，再由国家把这些产品转给零售网。这样做很对。当然可以成立管理机关，但这还不够。价格怎么定？如果价格不合适，企业主就没有兴趣把产品卖给你们。

乌布利希说，根据法律企业这样做，需要制定双重价格，生活日用品价格不能太高，其他商品价格可以高一些。

斯大林同志询问从企业主那里购买商品的批发价格。

乌布利希说，在这种情况下批发商手中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可以退

还给企业主。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做法不错，但需要好好组织。成立管理机关不难。一定要把事情搞好。

乌布利希说，还有一个涉及私营企业的问题他搞不太清楚。苏占区的私营企业组成了工商会，这些工商会实际上是企业主联合会。理论上讲我们在这些工商会中拥有多数，可实际上这是大资本家的组织。如果取消工商会对重要私营企业的监督，而把这些企业转由各州经济部监督和控制，这就为完成计划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因此我们想改组工商会，并成立专门的部门。企业的积极性依然保留，但是企业主再不能像此前那样来欺骗我们了。

斯大林同志问，东占区的国有化企业多吗？

乌布利希说，国有化企业占东占区工人人数在10人以上的现有企业总数的8%。东占区约45%的工业产品由这些企业提供。私营企业从国家手中获取主要原料。

斯大林同志问原料怎么到的国家手里。

乌布利希回答说，主要原料由国营企业生产。比如，纺织工厂主只能从国家手中得到人造纤维，因为没有一家私营企业生产人造纤维。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也就是说你们的资本家都不是大资本家。

乌布利希回答说，工人人数在50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300多家。其中有些企业可以提供像黄铜等重要产品。重要的是要建立对这些企业的监督。而从经济计划角度来讲的那些小企业我们不感兴趣。

斯大林同志说，可小企业很多。他说，如果你们掌握着原料，你们可以把这些原料供给你们所需要的私营企业，而别的私营企业不给或者按较高的价格给。因为东占区有很多私营企业，对这些企业看来只能通过原料有计划地调节。斯大林同志说，你们的误区就在于想用行政手段约束私营企业，其实应该采取经济手段约束它们，因为你们可以作为定货人和原料供货人对它们施加影响。没有经济基础，仅靠

行政性决定是不够的。必须更多地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行政命令不能取消经济规律。你们掌握着权力，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意志作决定，但是，如果这些决定违背经济规律，你们将一事无成。或许通过原料施加影响更好些。那些不想受你们影响的私营企业主只好从你们那里少得到原料或是付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做是适当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是原料的占有者，否则会引起议论纷纷，有人会说，他们剥夺私营企业的积极性。

斯大林同志强调说，原料是个大杠杆。为了不分裂工人，在限制私营企业主方面要小心谨慎。你们作为原料占有者，可以以较贵的价格卖给一些人，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另一些人。这是你们的事，你们要把自己的原料给那些对你们有利的人。目前由工商联分配原料的制度不妥，你们只要把这个制度改一改就足够了。

格罗提渥说，关于工商联的问题给联盟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资产阶级政党千方百计地极力强调这些工商联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原料政策总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原料是我的，我把它分给那些能顾及我的任务的人。原料够用，就分给大家，不够用，就有选择地按合同分配，因此，对私营企业最好是不谈计划，而谈任务，不谈控制，而谈合同。

皮克说他有几个涉及德国国家体制的问题。如果联盟就统一名单达不成协议，东占区大概就不进行选举了，我们要到1950年春季时才能着手此事。关于联盟统一选举名单将视我们对资产阶级政党中右翼的打击情况来定。如果西德成立政府，那么我们也建立一个苏占区德国政府，还要在德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基础上成立议会。接着皮克说明了《苏占区行政制度法》草案的内容，该草案以前寄给过斯大林同志。然后他又谈了柏林的特殊形势，说那里有两个市政府和两个城市代表管理机构。

斯大林同志问，有人想在西部成立新的市政府吗？

皮克作了否定的回答，但又补充说，我们提出的供给全柏林粮食和燃料的要求为临时民主市政府的全市性质提供了某种根据。西柏林市政府依赖空中走廊，没有实际基础。

斯大林同志问，艾伯特是否合适，可不可靠。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艾伯特在1948年11月节日期间来过莫斯科。这对他是个转折，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在苏联政府和人民是统一的。艾伯特很乐意地答应了在柏林市政府工作，并已顺利开展起来。

斯大林同志问，艾伯特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受欢迎吗？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指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骂他这个主席。皮克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组织更换领导人的情况，因为原有的领导人不够积极。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管理委员会主席是恩格雷茨基。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原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是原共产党人。这样，柏林党组织没有两个主席，这第一次打破了均等原则。艾伯特受到索科洛夫斯基的接见，索科洛夫斯基向他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此事在柏林颇得好感。由于更换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组织的领导成员和组建新的市政府，柏林工人阶级的情绪更高涨了，民主力量的活动明显加强。然后皮克又提到如果成立西德政府，就在柏林组建德国政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不想成为分裂德国的肇始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西部成立单独的西德政府，那么你们也只好在柏林成立政府。

莫洛托夫同志觉得不该把这个政府称为地区性政府。他认为这个政府最好叫德国临时政府。

皮克表示同意。

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政府称为德国临时政府较为合适。其含意就是说在德国统一之前，这是个临时成立的政府。

接着斯大林同志问道，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是否担心他们在

选举中得不到多数票？要不要苏联驻德军管局帮助并下令搞一个统一的选举名单？

格罗提渥说，不需要，因为这样会在西部产生不良影响。最好是在没有军管局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在联盟中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非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妥。如果西部进行选举，那么东占区也应该进行选举。否则就会有人叫嚷，说东占区的政府不民主，这会使你们的处境不妙。

皮克说，自由民主党有可能不参加联盟的共同名单。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想怎么组成这个非选举的政府。

皮克回答说，打算由州议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人民议院”，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其中约占55%的表决权。

莫洛托夫问，人民议院和德国人民委员会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自己的建议中为何只字不提。

皮克回答道，德国人民委员会是全国性机关。

莫洛托夫问，可不可以把政府同人民委员会结合起来，以使政府没有明显的地区性。

斯大林同志重申，这一点非常重要。

皮克说，可能的话，最好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但西部会有很多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

乌布利希说，德国人民委员会的民主程度不如德国经济委员会，因为经济委员会是在州议会广泛选派代表的基础上成立的，而人民委员会则是由群众性组织选举产生的。

斯大林同志问，能不能把德国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院这两个机构结合起来组成政府。

莫洛托夫认为，这会给德国临时政府打造更坚实的根基。

格罗提渥认为，如果打算组建全国性政府，就只能把人民委员会

和德国经济委员会结合起来。

斯大林同志认为，因为选举要推迟两年，也许最好由居民选举出来的各州议会选派代表，好为政府打下更加民主的基础。

谢苗诺夫提议，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在有更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召开。成立西德政府也会在西德引起不满。这就为西德那部分先进分子选派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可能。在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可以选出新一届德国人民委员会并同意成立德国临时政府。

斯大林同志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程序及其权力很感兴趣，莫洛托夫同志给他作了相应答复。

乌布利希建议政府由人民议院成立，然后由德国人民委员会批准。

斯大林同志归纳说，这样，政府将是地区性的，但会得到全国性机构的同意。

格罗提渥问，临时政府是否要包括现官员或者需要吸收党的负责人代表参加。

斯大林同志说，政府应该有党的主要领导人参加。政府必须有权威性，应该把那些有威望的人吸收进来，否则人们会说，这不是真正的政府，因为主要人物都没有参加。

皮克提出在刑事警察局内设立德国国家安全机关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从德国警察局挑出的人是否可靠，警察局的装备如何？

乌布利希说，正在落实相应的决定，挑选的都是可靠的人。

斯大林同志问，警察局有多少分局。

乌布利希回答说有几百个。

斯大林同志问，警察局里有没有团和团长。

乌布利希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正在落实有关警察局的决定。

斯大林同志说，决定是人做出来的，这些决定可以改变和改进。他问，可不可以把占领区的警察局扩编为军队？

乌布利希说，没有指挥人员。需要培养。德国的旧军队将军都不大合适）因为他们普鲁士味道太浓。应该在这里培养干部。

斯大林同志说，保卢斯^①请求准许他去德。斯大林问让没让他去。

皮克和格罗提渥回答说，德国不需要保卢斯，德国需要培养自己的人。

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共产党员中有很多军事上训练有素的人，并问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乌布利希回答说，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还在德国，此外还有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

谢苗诺夫说，或许可以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人成立个军事学校，吸引保卢斯、赛德利茨等其他德国将军来授课。

斯大林同志肯定了这个建议。

乌布利希请求成全此事，还请求批准成立德国国家安全机关。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很好。

谢苗诺夫说，阿巴古莫夫有不同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决定这样的问题不是阿巴古莫夫的事。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在德国刑事警察局内成立国家安全机关。

斯大林同志问，可不可以把这个刑事警察局扩编为军队。

乌布利希回答说，可以把2万个拥有自己的指挥部、自己的给养和联络等系统的监狱警察局和边防警察局扩编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使东占区的84000名警察都成为尉级军官，到那时就可以把警察局扩编成军队了。

斯大林同志问警察局有没有迫击炮和装甲车。

①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1890-1957），德国陆军元帅，1942-1943年在苏德战线曾指挥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包围并投降的第六集团军。被俘后加入德国反法西斯军官组织。1953年回到民主德国。

乌布利希作了否定的回答。

接着皮克向斯大林同志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将于1949年1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并顺便提到将由格罗提渥作的关于巩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报告。

斯大林同志又问了一遍：专门谈巩固党的问题？这不妥。就是说，你们等于承认党是软弱的，党不巩固。

格罗提渥说，希望进一步从思想上发展党。

斯大林同志问，可不可以给格罗提渥的报告改个题目？

皮克明确说，报告的题目叫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及其向新型政党的转变》。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题目还可以。

皮克讲述了如下几个问题：计划改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机关、成立由7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成立为政治局准备问题和解决机关日常实际问题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小书记处。他说，现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在政治局成立后将主要研究一般政治问题，那时需要在比政治局更广泛的领导人中进行讨论。

斯大林同志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机关的结构很感兴趣，他问，怎么能够组建政治局，因为此事必须由党代表大会决定。

莫洛托夫说，党的代表会议也可以成立政治局，但是代表会议的决议要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批准。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皮克说，计划政治局由5名原共产党人和4名原社会民主党人组成。

斯大林同志问，在德国这个“原”字还要说多久。

皮克答道，下次党代表大会将消除这种均等现象。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改组党的领导机关时，不要使中央书记处成员陷入尴尬境地。中央书记处应该有自己的任务，否则书记处成员自

己就不重视自己了。当然，党代表会议可以担负起党代表大会的一些职能，可以改组党的机关，但同时绝不能使中央书记处陷入尴尬境地。

皮克说，中央书记处将讨论一般政治问题，而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不是每月召开，而是两个月召开一次，这样更合适一些。

斯大林同志不反对。

皮克提出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进入情报局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否有利。

皮克回答说，对此他们也不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想和斯大林同志共同商讨。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最好先稍微等等，他又问了一下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莫洛托夫说，现在还为时尚早。应该先使共产党情报局巩固起来。目前其他一些国家的党多次提出声明请求加入情报局，满足这些请求暂时还办不到。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对莫斯科的关系上最好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

皮克笑着说，在这一点上反正别人也不会相信他们。

斯大林同志说，不能再给敌人提供新的论据。现在最好等一等，然后自然要进入情报局。

皮克就1949年秋季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征求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认为，不应再往后拖了。接着他建议说，委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一名可信赖的书记同西德工人联系。必须给西德以帮助。应该有一名书记处成员按党的系统专门从事此事。斯大林同志让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考虑一下，对西德共产党人的帮助需要多少钱。

格罗提渥通报说，他们今天收到了柏林发来的电报，电报说经济

委员会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筹备反苏运动，抗议 1948 年 12 月 31 日以后把德国战俘留在苏联。格罗提渥认为应就此事发表一个苏联官方通告以防止运动发生。

莫洛托夫说，此事要好好考虑考虑。

乌布利希提出苏占区粮食供应问题。占领区有一半的成年居民每天可从政府得到 1520 卡路里的热量，但实际上还要少一些，因为 1948 年我们还不能完全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油脂。1949 年土豆和粒粮的供应会有好转。口粮可以达到 1700 卡路里，而有 40 座大城市居民的口粮将达到 1930 卡路里。但是到 1949 年底肉将短缺 4.8 万吨，因此不得不用代用品满足需求。油脂问题是最迫切的难题。1948 年从苏联送来的 1.08 万吨油脂是对苏占区的巨大帮助。考虑到西部的情况，1949 年应该把苏占区每人每天的油脂供应量提高到 20 克。这样油脂总共短缺 2.4 万吨，而这些油脂没有地方可以弄到。1950 年肉和油脂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苏占区将改行农民按公顷上交畜产品税。

斯大林同志问粮食情况怎么样。

乌布利希说，勉强够，但苏占区可以摆脱这种困境，可是油脂问题解决不了。

斯大林同志对苏占区有没有议价商店很感兴趣，他指出，此事应该发展。斯大林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油脂。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一些粮食。

乌布利希说，最好能得到大麦，好加工成大麦米。乌布利希接着说，同德国西占区断绝关系后轧材严重短缺。苏占区采取各种办法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钢铁生产，但还是短缺 21.9 万吨轧材，为此德国统一社会党请求斯大林同志的帮助。东占区的农机生产、恢复工业和其他方面的需要都少不了这些短缺的钢铁。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需要考虑一下。

皮克说，他们想在莫斯科访问一些“部”，好了解些工作经验。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会谈持续了 3 小时 50 分钟。

记录：B. 谢苗诺夫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 45 全宗，第 1 目录，
第 303 卷宗，第 53—79 张。打字稿。副本无误。

原载俄罗斯《历史档案》
2002 年第 5 期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三)

(1950年5月4日)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崔可夫、B. C. 谢苗诺夫。

翻译——弗雷德·厄斯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有什么新闻？

皮克说有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

皮克回答说，7月23日。代表大会的日程是：1.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包括10月选举问题，报告人是威·皮克；2. 争取和平的斗争与民主德国民族阵线的发展，报告人是奥·格罗提渥；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报告人是瓦·乌布利希；4. 修改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5. 选举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机构。

斯大林同志问，五年计划是在政府批准之前还是之后向代表大会报告。

皮克回答，五年计划将由党代表大会提交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道——也就是说，在政府批准之前。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请斯大林同志同意先让乌布利希谈一谈五年计划的情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怎么都可以。看你们方便吧。

乌布利希问，给他多少分钟作汇报。

斯大林同志问，——是整个谈话？还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汇报？乌布利希想要多少时间？10个小时可以了吧。

乌布利希请求给20分钟。他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五年计划的基本控制数字，确定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之后国家政府再最后制定出五年计划并于今年秋季选举前公布。民主德国制定五年计划的出发点是，必须证明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比西德优越。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同苏联建立密切联系并根据经济计划用德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五年计划预计，民主德国工业总产值将比1936年大约提高10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种发展速度资本主义的德国曾经有过。按五年计划，投资额预计为250亿马克，劳动生产率将提高61%，对外贸易将增长120%，国营企业的成本将降低23%。五年计划提出的目标是争取民主德国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西方。这在目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必须发展本国的冶金业，建设新煤矿，尽管地质勘探尚未提供煤炭现有储量的确切资料。还将建设新铜矿，开始铁矿的勘探工作，尽管这方面的地质分布还不十分清楚。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的地质学家干得不好吗？

乌布利希承认是不好。存在很多官僚主义的做法，必须撤换民主德国地质部门的领导人。民主德国将开始石油钻探工作。乌布利希请苏联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因为民主德国没有钻井技术设备。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我们会提供的。

乌布利希继续说，把一些机器制造厂从通用机器制造改造成重型机器制造的工作特别困难，必须装备冶金业和矿井，必须扩大电力生产等等。五年计划期间，居民的供应水平要达到德国1936年的水平。

斯大林同志问，——希特勒时期的生活水平？这可不是什么好标准。

乌布利希说过一会儿他再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困难。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这是个很坏的标准。

乌布利希说，暂时还没有可能定更高的目标。只有大大独立于西方，民主德国的货币才有可能坚挺。到现在，美国人之所以可以在货币问题上耍各种花招，是因为民主德国商品匮乏。计划降低非配给商店商品的价格。但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保证在生产上独立于西方。在五年期间预计把价格指数从100降到57。

乌布利希请求允许提一些需要苏联政府出主意或提供援助的问题。

第一，乌布利希说，五年计划只有在民主德国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协作和相互援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乌布利希说，我们请求接受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以交流经济经验，使经济实力协调发展。我们还请求同意开始谈判，签订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

斯大林同志问，想同哪些国家签订协定。

乌布利希回答，想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乌布利希继续说，我们请求允许民主德国生产盟国管制委员会禁止德国生产的那些商品。乌布利希说，民主德国在苏联驻德军管局和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帮助下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应该对民主德国解禁。盟国管制委员会曾在第24次会议上确定了德国无权生产的产品清单……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已经不存在了。

乌布利希说，这很好。但是让德国人必须履行的禁止生产的清单还存在。应该撤消这个清单。

斯大林同志肯定地说，一定要撤消，并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我们撤不撤消这个清单？

政治局委员们表示同意，莫洛托夫同志还说，他们（德国人）现在已经超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所禁止的范围，但形式上这些禁令还有效，必须撤消。

斯大林同志说，要撤消。

乌布利希说，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禁令还涉及造船业，发展造船业是民主德国五年计划定下来的。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也向你们订购了几艘军舰。如果你们不能整艘制造，可以制造一部分。

乌布利希说，这个问题他后面会讲到。

第三，乌布利希继续说，五年计划中最严重的是原料问题。民主德国对原料的需求量已同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达成了协议。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可能多地在民主德国生产金属产品（他列举了五年计划中生铁、钢和轧材的生产数字）。五年计划预计建设新的钢铁公司。但还是不够，乌布利希说，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能把民主德国所欠缺的那部分生铁和钢卖给我们。

第四，乌布利希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在五年计划期间进行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问题。德国统一社会会党政洽局认为，在最近五年内还应该继续使用斯大林同志在上次谈话时对我们说过的经济手段同民主德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民主德国的五年计划规定，到1955年国营工业在民主德国经济中的比重将从71.7%提高到76.7%。

斯大林同志问，——是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吗？

乌布利希作了肯定的回答。私营工业的比重将从28.3%降到23.3%。

斯大林同志问，手工业包括在内吗？

乌布利希回答，只包括一部分，也就是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小手工业不在计划考虑之内。在绝对数字指标上，五年计划预计使国营工业产品增长103.2%，私营工业产品增长56.3%。到1955年，私营工业的积累额将达到13亿马克。当然，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必须借助税收政策，力求不让私营工业长成参天大树。1949年成立了一些批发贸易中心后，公有经济成分已在批发贸易中占了优势。五年

计划对零售贸易作了下述改变：到 1955 年，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将从 15.3% 增加到 40.4%；合作社的比重将从 17.7% 增加到 25%；私营零售贸易的比重将从 57% 降到 33.6%。五年计划基本的社会政治路线是，加强国有经济成分，同时利用一切现有的工业生产设备，包括私有的生产设备。农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农业机器租赁站。到 1950 年 1 月 1 日，民主德国已有农业机器租赁站 524 个。计划到 1955 年将有 750 个。

斯大林同志问，——农民接受这件事吗？他们看到好处了吗？

乌布利希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农业机器租赁站主要只能帮助那些新农民。在旧农民居多的州还没有发达的机器租赁站网。重要的是扩大机器租赁站网。也就是到五年计划末期，所有土地都用拖拉机耕作。目前，民主德国已有拖拉机 7350 台，到 1955 年将达到 37500 台。民主德国一年可生产 12000 台拖拉机，并将一直保持这个生产水平。

厄斯纳对乌布利希说，20 分钟已经过了。

乌布利希继续说，农业机器租赁站应该成为农村的技术、农艺和耕作中心。到 1950 年底，民主德国将开始把农民互助联社和农业合作社合并。这是两个平行的经营组织，而且合作社中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根据五年计划，由于进行新的建设，一些企业要改行两班或三班倒工作制，民主德国将十分缺少劳动力，需要新增 156.6 万名工人。

接着，乌布利希就民主德国同苏联贸易协定一事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因为这对西德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西德一部分大企业家对同东方发展贸易很有兴趣。因此，乌布利希说，我们向西德的工业家声明，在拟定我们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协议时，我们同意考虑尽可能地由西德向这些国家供货，其中包括向中国供货。

斯大林同志强调说，中国人很想同德国人建立联系。

乌布利希说，民主德国政府近期将派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件好事。

乌布利希把话题转向航海业。他说，根据战争赔偿，民主德国要造6艘每艘总排水量1000吨的船。乌布利希请求准许再造两艘排水量8000吨、两艘排水量5000吨、5艘排水量3000吨的船及9艘排水量1000吨的运输船和10艘捕鱼船。为此还需要在瓦尔纳明德修建两个船坞。民主德国需要船，首先是为了同中国进行交流。

斯大林同志说，——船造得越多越好。

乌布利希说，美国人可能会凭四方协议的禁令，不许民主德国拥有大型商船。

斯大林同志说道，美国人不可能禁止得了民主德国拥有商船，然后开玩笑地说，可以挂南斯拉夫国旗。

乌布利希反对说，最好挂德国和波兰两国的国旗。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好。

乌布利希再次说，要是美国人干涉，他们希望在出航时挂波兰国旗。

米高扬同志说，美国人无权干涉。

乌布利希表示希望建立苏德汉萨联合航空公司，同时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在苏联培训德国飞行员的骨干力量。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那里有德国专家，他们是航空事业的优秀建设者。让他们去你们那里，你们就收下吧。

乌布利希说，我们需要飞行员。

斯大林同志说，也有德国飞行员。我们可以帮你们培训飞行员，放心吧。

乌布利希说，我们还没想过要造飞机，但是如果您认为需要，我们可以生产飞机发动机。

斯大林同志说，最主要的就是飞机发动机。机身随便哪里都能找到。

乌布利希声明道，民主德国现在就可以转向飞机发动机的生产。乌布利希问，——要不要作生产运输机的准备？民主德国对此不太感兴趣，而是想向苏联购买运输机。这还涉及到机场设备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商量。

乌布利希继续说，崔可夫同志声明，按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计划，1951年预计雇用11万民主德国的职业警察。我们同意这个计划。但警察所需武器的生产没有列入计划。乌布利希希望苏联政府能把武器借给民主德国。

斯大林同志回答，我们会借给你们。

乌布利希把话题转向科学和技术问题。目前还在实行盟国管制委员会对科研工作的监督法，该法禁止科学和技术的一系列重要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这对民主德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必须要发展代用品的生产。乌布利希请求允许进行盟国管制委员会禁止的科研工作，其范围将在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规定之内，也包括原子核研究领域。

斯大林同志问，有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研力量。

乌布利希回答说有一些。在民主德国首先可以开展癌症治疗的研究工作。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好。可以做起来。

乌布利希还请求允许进行电子技术、宇宙射线、固体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我们确信，乌布利希说，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将面临在民主德国把原子能实际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目前，民主德国有褐煤，这是动力供应的主要原料，但到五年计划末期，民主德国将转向设计以原子能为动力的机械。

接着乌布利希强调了在德国重建被破坏的城市的重要性，并对德国建筑师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民主德国面临着必须重构整个建筑行业 and 建筑艺术的问题，因为在德国建筑师当中广泛传

播着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绪。乌布利希请求派一个苏联建筑科学院代表团今年秋天访问民主德国，帮助民主德国制订重建大城市的计划。接着乌布利希转入改善民主德国居民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与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从今年9月1日起，肉的定量将提高到每天10克，油的定量将提高到每天5克。为此需要进口14000吨肉，这样打算向波兰和匈牙利贷款。当然，增加这些定量不可能对选举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计划从今年8月1日起非配给商店的价格将降低20%，从今年9月1日起降低30%，还要按时向居民供应凭证供给的纺织品。今年秋季前要从匈牙利运来10万双工作鞋。还想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一些鞋，但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贷款也就得不到鞋。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同波兰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波兰人弄到一些德国专家，而且对他们很满意。

乌布利希回答说，民主德国同波兰的关系很好。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要近。

斯大林同志笑着说，乌布利希学会外交辞令了。

乌布利希解释道，同波兰关系的改善，是由于在民主德国内部曾就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进行过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使同波兰人的关系密切起来。同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没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问，波兰人能否大量地向民主德国提供焦炭。他们是可以提供。他们有储备。

乌布利希回答说，波兰人给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焦炭。在对外贸易方面，民主德国目前有不少困难，因为我们没有人民民主国家想要和我们交换的商品。比如说，这些国家请民主德国提供废铁，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会影响我国的冶金业。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乌布利希继续说，选举前打算改善供应来影响人民的情绪。但粮食配给证到今年11月1日后才取消。

米高扬同志问，——为什么要到选举后取消？

乌布利希解释说，取消粮食配给证势必要提高定量商品的价格，因此选举前不宜这样做。

乌布利希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汇报。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反对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也不反对民主德国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签订贸易五年计划，更不反对解除盟国管制委员会对经济和科学领域一些部门的禁令。将在造船方面给予帮助。我们也很愿意帮你们培训飞行员的骨干力量。关于民主德国所需要的原料问题在这里还不能明确答复。

接着斯大林同志问，按照五年计划，预计每年偿付的赔偿额是多少。

乌布利希回答，五年计划定的赔偿额同1950年定的数额相同。这当中也包括占领军的开支和抵作苏联在德企业收入的商品出口额。

斯大林同志问苏联在德股份公司企业的协定签没签。你们所有的人是否都满意这个协定？

乌布利希作了肯定的回答。民主德国政府完全赞同协定的内容，但苏联代表团在谈判结束后声明，协定待苏联政府作出决定后再签署。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马上在莫斯科签署。然后，斯大林同志继续说，必须明确我们的赔偿关系。根据克里米亚会议的四方协议和波茨坦会议公布的决议，以及苏联在这两次会议上的声明，我们索赔的总额为100亿美元。根据我们的计算，有关情况我们会通报给你们，按赔偿义务，德国已偿付了约36.6亿美元，这其中包括1950年规定的供货。这样还剩下63.4亿美元。我们认为，斯大林同志说考虑到德国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这部分削减1/2，也就是从63.4亿美元中减去一半，还剩下31.7亿美元。苏联代表团在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曾声明，代表团想让德国在20年内分期偿付赔偿，不管赔偿是给东方还是给西方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意苏联的建议。但

是，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我们的声明。你们已经偿付赔偿 5 年了。也就是说还剩 15 年。必须把这 30 多亿美元在 15 年内分期付清。这就意味着每年必须偿付大约 2.11 亿美元。斯大林同志问，——这样分合适吗？

乌布利希和皮克回答说很合适。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可以减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预算和五年计划的负担，还可以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编制五年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偿付赔偿方面所作的这一修改。

乌布利希说，在这种情况下将可以提高民主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这样，1936 年的指标就不能再当作标准了，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放弃这个标准，居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比 1936 年有所提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可以拨给你们一些油和肉。这些我们可以帮你们。我们还可以多给你们一些棉花，比以前给的要多一些。如果你们有高炉，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铁矿石。波兰人就是要我们的矿石。

乌布利希说，民主德国有高炉。

斯大林同志说，对我们来说，提供铁矿石要比提供钢更容易。铁矿石的品质很高，铁含量达 47% 至 60%。希特勒一直管苏联要克里沃罗格铁的矿石，但我们不给他。现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冶金业全都靠克里沃罗格的铁矿石来维持。

斯大林同志问，谁还要谈一谈。或许有什么问题。

皮克向斯大林同志表达了极大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斯大林同志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准备给你更多的帮助，可能还要再减去一些赔偿额，但不得不考虑到苏联反对这样做的社会舆论。战后，苏联遗留下许多残疾人和孤儿，破坏很严重，人民还不能忘记这一切。德国人不大喜欢我国人民。但我们也可以像对其他国家那样把你们的赔偿额减去一半。每年偿付 2.11 亿美元对你们不会太困难。

过去付得更多，尽管那时的状况还要糟。

莫洛托夫同志说，现在民主德国比较强大了。

乌布利希问，能不能在选举前从苏联得到斯大林同志说过的那些肉和油。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做到，他也是这个意思。2万吨左右的油是可以给的。可能还会多一点儿。要再看一看。还可以给一些肉。

米高扬同志说，对德国人来说肉比油需要得更多。

皮克同意这一说法。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我们只能给一部分，其余的由波兰和匈牙利提供。你们还要作一些储备。但最重要的是要在选举时获胜。如果你们被打败，崔可夫又得去打仗了。

莫洛托夫同志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选举筹备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已经同资产阶级政党就统一选举名单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道，这是好事。

皮克说，下面要谈的是民主德国民族阵线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问题，由格罗提渥来汇报。

格罗提渥说，组织民主德国民族阵线运动的基础是三个原则性问题：民主统一德国，缔结和约，撤走占领军。这些基本方针从未改变过。但国际局势的发展、波恩政府的政策和成立民主德国这一事实，决定了要对某些策略进行改变，这种改变在斯大林同志刚刚就赔偿问题作出声明后更具有特殊意义。在争取政治上统一德国的斗争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在9月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英国人和美国人正极力将危机转嫁到西德：封锁西德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把西德变成原料进口国，拆除工业企业。

接着格罗提渥详细地谈了民主德国民族阵线的任务，依然坚持他在民主德国成之时在人民议院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观点。格罗提渥特别强调，目前，争取统一德国的斗争同时也就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民主化的道路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然后格罗提渥谈了争取和平斗争的一些问题，特别表示德国人民高度关注国际和平拥护者阵线的斗争成果。

格罗提渥说在德国开始的为和平拥护者常设委员会提出的号召书征集签名的活动已取得成果。在征集签名的第一天，即5月1日，民主德国就征集到了约200万人的签名。在萨克森，头两天有30%的居民在号召书上签了名，许多居民点圆满完成了征集签名的工作。党征集签名的活动是同党的选举筹备工作配合进行的。

斯大林同志说，这当然很好。做得对。

格罗提渥继续说，争取和平的运动比民主德国民族阵线对人们的影响更广泛，西德有很多人认为民族阵线是共产党人控制的组织，因此，德国决定成立独立于民族阵线委员会的争取和平斗争委员会。目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也在开展反对德国应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这种论调的斗争，因为这种论调会把德国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引入歧途。争取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可能向德国人民证明苏联是最强大的国家，是和平的堡垒，也有可能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民主德国，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情绪日益增长，这一点从德苏友好协会会员人数大增的实例中便能看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好，但重要的仍在于进行广泛的和平运动。德国对这场战争记忆犹新，德国因战争遭到很大破坏。德国人不想要战争。如果在德国开展广泛的和平运动，那么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就会使美国人没有可能使西德同东德发生冲突。德国人现在有两条路：战争或者和平。美国人企图把德国拖入战争，还说这是复兴强大的德国的唯一办法。和平运动正在证明，战争之路将摧毁德国，而复兴强大的德国的唯一道路是和平以及爱好和平的人民之间的合作。如果全体德国居民都被吸引到争取和平的运动中来，那么美国把德国拖入战争的全部计划必遭破产。

格罗提渥把话题转向西德的状况。他说，波恩政府是德国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走卒。西德资产阶级政党阵营中的矛盾并不深，因为这些政党都赞同肢解德国，反对民主德国民族阵线，要求对共产党施行恐怖手段。西德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很薄弱。东德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是目前德国人民民族抵抗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不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起者，而且也是民族阵线的最高组织力量。但工人阶级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影响取决于工人阶级实现统一的程度。西德民族阵线力量弱小的原因就在于，虽然有好的开端，虽然也成立了一些统一行动委员会，比如反对拆除工业企业委员会，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阴险领导人直到现在还在扮演着假反对派的角色，而且利用权力机关阻止工人阶级实现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阵线将来没有发展的前提。在居民的各个阶层和所有政党中都有很多德国人准备加入民族阵线。问题在于如何争取这些阶层。组织民主德国的政治活动家前往西德的可能性日益减少。共产党在西德的影响很弱。

莫洛托夫同志说，要行动不能单靠党。

格罗提渥强调，共产党是可信赖的可靠支柱。但德国共产党的境况不好。党正在经受意识形态的巨大困难。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正努力帮助西德的共产党，但共产党没有找到与群众交流的正确语言。由于根据哥本哈根协定对无线电波进行了重新分配，民主德国的广播电台无法向西德播送，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什么困难？美国人在干涉吗？

厄斯纳回答说，根据哥本哈根协定，分给民主德国的无线电波不能够播送到西德。美国人破坏哥本哈根协定，控制了波段。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遵守哥本哈根协定，因此情况很糟。

莫洛托夫同志说，鉴于美国人的这种行为，看来只得违反哥本哈根协定了。

格罗提渥请求为民主德国提供两条新电波。

斯大林同志说，这件事可以马上解决。

格罗提渥强调，这对民主德国很重要。

格罗提渥说必须发展民主德国和西德的工人与农民之间已经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建立某些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互派代表团，邀请西德的工会代表和某些企业的工人及其他人访问民主德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必须吸引年轻人，并强调，现在还有很多为发展民主德国争取统一的广泛运动的巨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格罗提渥谈到民主德国同西德的贸易发展问题，认为这是保持经济联系的方法之一。西德的工业家非常想同民主德国做生意。如西德的著名垄断资本家灿根就曾声明：“我们当然清楚，过几年你们会同我们一刀两断，但眼下我们想同你们做生意。”西德工业家打算同民主德国签订贸易合同，而不管美国人的阻止。

贝利亚同志问，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些。

斯大林同志说道，——不，不一定知道。

厄斯纳强调，美国人不想让西德同民主德国发展贸易，但西德工业家在寻找途径。

斯大林同志说，人要是想找到路就能找到。

格罗提渥说西德的文化正日趋衰落，这与民主德国的情况正相反，民主德国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发展德国的民族文化。

莫洛托夫同志说，应该发展这项事业，要考虑到这一事业的重大民族意义。

格罗提渥强调了德国经济委员会关于保护和发展德国民族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决定的历史意义。这个决定在西德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接着格罗提渥介绍了西德拆除工业企业的情况。

斯大林同志问拆除的设备运到哪里去了。

厄斯纳回答说，大部分设备被毁掉了。比如汉堡的一个大造船厂就被炸毁了。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随便就毁掉了？！

厄斯纳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英美资本家很害怕德国的竞争。

格罗提渥在谈到民主德国的成立对西德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以及民主德国政府最近通过的一些法律时表示相信，民主德国一定能证明自己的社会制度比西德的优越。格罗提渥认为，工人工资没有大幅增加是民主德国民族阵线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的工资总额是多少？每年要有几百万马克用于支付工资？

乌布利希难以回答，他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是通过让工人改行计件工资制来提高工资。否则，乌布利希说，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得到提高。

斯大林同志问，——如果把工资增加10%，需要多少钱？两者并不矛盾。可以既增加工资，又同时改行计件工资制。

乌布利希回答说，他们1950年涨的工资已经大大超过预算的许可了。

斯大林同志问，——这才什么时候？1950年才刚开始。如果把工资上涨10%，你们会失去什么？能出什么事？会发生灾难？

乌布利希声明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是提高工资的基础，否则不可能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发展工业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看法不对。他，斯大林同志，建议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把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提高10%到15%，是决不会破产的。给生活保证差些的工人涨15%，给好一点的工人涨10%。

乌布利希说，选举后，由于将取消配给制，并提高口粮的价格，所以打算涨一点工资。不过在选举前涨工资也行。

斯大林同志说，不要怕涨工资。当然，一开始会有很大困难，但是一年以后你们自己就会看到工人会干得更好，工资的提高将带来极大的生产效率。

米高扬同志说，这一步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说都是正确的。

斯大林同志建议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同志，忌讳直接提建议，但还是认为，提高工资，哪怕平均提高10%，也是好的。

斯大林同志说，他在这里听了格罗提渥同志的汇报。格罗提渥分析了西德的情绪和力量对比。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西德的情况应该比格罗提渥汇报中说的要好。因为格罗提渥是根据某些组织如政党、工会及报刊的情绪作出判断的。如果根据一些政党或非党组织的情绪就能对力量对比作出判断的话，那么格罗提渥在这里所描述的情景或许是对的。但是只根据一些组织的情绪是不能判断出人民的情绪的。他，斯大林同志，可以讲一讲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中的一些情况。当时所有组织的情绪都是强烈反布尔什维克的。给人们的印象是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丝希望。但只要下到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就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在沸腾。那些声称不需要斗争的其他政党和组织的领袖们，实际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只要点燃星星之火，一切就会大不一样。然而我们一些最大组织的领袖就这样倒下了。突遇灾祸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民的需要。我想，斯大林同志说，西德人民群众的情绪与西德的工会和党派组织所表现出的情绪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长期占领，撕毁和约，拆除工业企业，大规模失业，使工人及其家庭失去生活资料。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教德国人民起来反抗，这决不是他们的本意。你们想一下子就让一切大变样，让所有的人都起来反抗？这是不可能的。西德居民害怕美国人。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然而居民正在开始觉醒。斯大林同志说，他建议西德的共产党人要继续做好自己内部的组织工作。建立并加强同普通百姓的联系。少一些空喊，多一些解释。可能人民想行动起来，但他们害怕，他们在沉默，而有时，人民这种隐忍不发的沉默比公开的示威还要危险。所以不能

只看政治活动家下的结论，而应当去看看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人民群众中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憎恨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加剧，现在西德人更愿意把帝国主义者称作占领者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因此，西德的前景比格罗提渥汇报中说的要好。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是难免的。这不能责怪格罗提渥。他，斯大林同志，想让我们德国同志不仅要考虑其所见，而且要考虑其所未见，而这些下层确实存在。

斯大林同志问，——要不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他想问一下该如何公布赔偿决定？

乌布利希问，能不能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向苏联政府提请削减赔偿额，不说具体数字，然后由苏联政府作出回应。政治影响应部分地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承担。

斯大林同志问，有没有其他建议，这个做法是否合适。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先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向民主德国政府提出，然后再由民主德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同志，他们对此有什么意见。

乌布利希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并归纳道，党代表大会向民主德国政府提出，由民主德国政府再向莫斯科提出。

谢苗诺夫同志说，不应拖到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再公布。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现在就公布决定。否则会有一些传闻出来，居民将从第三者那里得知这个决定的内容。政治上打击的力度就会减弱。应该让居民知道这个决定，不是道听途说，而是通过政府。

斯大林同志最后说，我们将等待德国政府对削减赔偿的意见。越快越好。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讨论战俘问题。遣返德国战俘的工作已经结束。明天塔斯社将就此发布公报。最好看一下公报全文，也应该解决保卢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同意。

厄斯纳把塔斯社关于从苏联遣返德国战俘的工作已结束的公报全文译成德语。

皮克和格罗提渥表示同意公报的内容。

莫洛托夫同志说，保卢斯和他的三名随从没有被列入应遣返的名单中，而是被列到被遣返的病号名单中了。希望了解德国统一社会党对遣返保卢斯问题的意见。

皮克答道，关于这个问题，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决定，党不反对把保卢斯遣返回民主德国。

斯大林同志问，——是要保卢斯还是不要？斯大林同志说，没有德国统一社会党人的同意我们不打算放他。这时，斯大林同志转向崔可夫问道：您的朋友保卢斯现在怎么样？你们收留他吗？

崔可夫同志答道：只得收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问，从国际形势的观点看，放了保卢斯合不合适。

皮克说，保卢斯未必会去西方。美国人会在那里逮捕他。

莫洛托夫同志说，保卢斯希望被遣返回民主德国。

皮克说，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做。

斯大林同志问，——他对你们的工作有用吗？

乌布利希说，准备在国家机关给保卢斯安排一个能让他发挥自己能力的小职位。重要的职位是不会给他的。

斯大林同志问，要不趁着你们在这里的机会安排你们同保卢斯见个面？

乌布利希和皮克回答说，不必了，他们最好是在德国同保卢斯见面。

斯大林同志听了后问道，——假如他要跑了呢？或许，最好把他暂时留在我们这儿？

皮克说，他不会给民主德国不利。

乌布利希说，其他被遣返的将军也不会给民主德国不利。

斯大林同志问，是不是其余所有的德国将军包括塞德利茨都要被遣返。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差不多所有人都要被遣返，但塞德利茨正在受审。他极端敌视苏联。

斯大林同志说，塞德利茨很危险。他曾骗过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把自己被包围的部队撤出了杰米扬斯克。他是个聪明的对手，是个大滑头。

斯大林同志问，——或许等两个月再遣返呆卢新，或者以后再决定？

贝利亚同志说，保卢斯当然应该留在苏联。

马林科夫同志说，保卢斯在被遣返前应该给民主德国政府写一个类似保证书的东西。没有保证书决不能放他。

斯大林同志说，德国战俘都要被遣返，但保卢斯不是普通的战俘。这是个特殊的问题。必须等一等，如果保卢斯以后写了保证书，那最好不过了。

斯大林同志示意，谈话可以结束了。

皮克说，他们还想就十月选举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皮克讲述了民主德国即将进行的选举的政治意义。这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将同时产生各乡、县、州的管理机关和民主德国议会。选举中总共将提出约50万名候选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一个政党将提出10.2万名候选人。选举的政治口号是根据民族阵线的行动纲领而来的，这就是和平，统一，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和文化。西德当局非常清楚民主德国这次选举的特殊意义。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伊提出了一个蛊惑性的口号：“全德自由选举”。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反击口号：“自由国家的自由选举”，并指出在西德举行自由选举是不可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筹备选举时

已同民主德国所有政党就提出统一选举纲领发表了声明并同所有政党领导人就统一选举名单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在什么地方公布了吗？

皮克说没有公布，他指出，资产阶级政党希望等一等再公布统一名单的协议，理由是，如果提前公布这个协议在西德将会受到指责，说选举是被授意进行的。关于统一名单的协议将在5月份公布。

斯大林同志对名单中的力量对比很感兴趣。共产党人是不是占多数？

皮克讲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将得到24%的代表当选证书，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得到22%的代表当选证书，新政党、工会、青年联盟、妇女联盟、民主德国文化联盟及其他组织将总共得到54%的代表当选证书。

斯大林同志问，能不能保证这些代表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协调一致。

皮克肯定了这一点，并指出那些组织里有许多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

乌布利希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种情况。

皮克说，主要问题是吸引居民参加选举。1949年5月党已经有了按统一名单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经验。资产阶级政党当时提出了不参加选举或对名单投反对票的口号。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选举准备不足。结果，按统一名单推选的候选人只得到66%的选票。这次将对选举进行最充分的准备，可以考虑用别的办法。德国统一社会党将争取得到80%—85%选民投统一名单的票。

斯大林同志说，比如同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相比，这个结果就很好了。美国只有56%的选民投了杜鲁门的票，杜鲁门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票。

皮克讲述了西方各占领当局提出在柏林进行共同选举的蛊惑性建

议的情况。他表示同意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建议，根据这个为进行全柏林选举而提出的建议，希望柏林的西方各警备司令部恢复柏林1946年的法律和宪法，取消该市的东西部划分，把占领军撤出柏林。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不会接受，这是明摆着的。

皮克肯定了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笑着说，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已经学会巧妙地回答西方各占领当局的信件了。

接着皮克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继续得到巩固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一些情况。皮克指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各个组织在研究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

斯大林同志笑着说，把恩格斯落下了。他问：你们不想研究恩格斯了？

皮克指出这是翻译的错。他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应该揭露并克服党在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缺点，此外还应该对党的积极有效的工作作出总结。

斯大林同志问皮克，党的领导中有没有新人出现？好像没看到有新人？你们自己当上了领导，就不给别人让位子了。

皮克说，有新人，很快就提上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应该培养新人。他们正在成长。而你们应该给他们提供领导的位子。

皮克指出在对党的领导岗位的空额作补充时已取消了平等分配的原则。德国统一社会党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会会员中的教育工作开展得很薄弱。为了巩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队伍，打算1951年1月对党证进行一次核查。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这将是一次清党。一次暗中进行的清党。

皮克说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党章草案已起草好，这个草案与联共（布）的党章很接近。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认为这个党章已经过时了。一旦联共（布）召开代表大会，就会修改联共（布）党章和党纲。别全都跟着联共（布）党章走。要考虑自己的经验。这样更好，这才是主要的。

皮克说，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的文件及党章也已过时，也需要修改。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党章中，将规定实行预备党员制。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对的。

皮克说，根据党章草案，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将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是选举监察委员会吗？

皮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监察委员会将由中央委员会选出。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这样做。

皮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将选出两位党的主席和一位中央总书记。

马林科夫同志问，——由党代表大会选举？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总书记将不受中央委员会的控制，中央委员会也不能影响总书记，假如总书记推行了错误路线，中央委员会也不能罢免他。这不大对。关于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主席这个问题，可以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但总书记还是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中选举产生。必须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监督总书记。总书记应该服从中央委员会。必要时中央委员会应该有权撤换他。

皮克说，因为党的两位主席现在都担任着国家要职，他们认为有必要选出专门从事党务工作的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同志说，——好，应该这样。但是总书记不服从中央委员会，这对吗？他，斯大林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但他要服从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同志强调，否则党内就会出现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总书记。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总书记就会利用党代表大会给予的特殊权力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总书记开始推行不同于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就可以撤换他并选出新的中央总书记，必须做到这一点。因此，总书记应该由中央委员会选出，至于由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两主席的问题就按你们的意见办。

皮克说，中央委员会计划由 80 名委员和 30 名候补委员组成。

斯大林同志说，这太多了。

皮克说，也可以选 60 名委员，30 名候补委员。

斯大林同志说 50 名足够了。

乌布利希建议选 50 名委员，25 名候补委员。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选 50 名委员，30 名候补委员。我们，斯大林同志说，也想减少联共（布）中央委员的人数。

皮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预计由 9 名委员和 4 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委员是：威·皮克、奥·格罗提渥、瓦·乌布利希、F·达朗、P.梅尔克、弗·艾伯特、弗·厄斯纳、埃·鲍曼、蔡塞尔。候补委员是：A.阿克曼、海·劳、埃·昂纳克、G.延德雷茨基。

斯大林同志问，阿克曼是做什么的。

皮克回答，他是外交部副部长。

斯大林同志问，索博特卡现在在哪里工作。

皮克回答说在矿业部门。

马林科夫同志问，是打算从中央委员中选出中央监察委员还是用别的方式选出。

乌布利希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同意以后也这样做。

皮克说在柏林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汇率的比差对他们很不利，又说在柏林取消配给制遇到了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或许在德国不要急于取消配给证？伦敦还在使用配给证，尽管英国是战胜国。或许不必急着取消，先储备商品，然后在低价格水平的基础上再取消配给证。

格罗提渥说，他们在政府的声明中已经许诺将取消配给证。不过可以把取消配给证的时间再拖一拖。

斯大林同志说，既然许诺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必须储备商品。

贝利亚同志说，即使民主德国取消配给证，看来柏林还得保留，以备西柏林的居民把不多的商品抢购一空。

斯大林同志说，由于柏林的特殊情况，这样做可能会好一些。

格罗提渥问对他们离开莫斯科回柏林的日期有什么建议。

斯大林同志回答，——看你们的！你们要留下来——你们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不怕有客人。如果你们不能留下来，就没办法了。

格罗提渥说该走了。

斯大林同志说，这也好，并请他们把有关赔偿问题的信尽快寄来。

乌布利希说，还有一个涉及党章的问题。德国统一社会党新党章草案是参考联共（布）的经验制订的。但是，如果马林科夫同志有联共（布）新党章草案的新方针，或许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草案可以做参考。

马林科夫同志说，他没有新方针。修改联共（布）党章的意见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

乌布利希请求有可能的话想了解一下这些方针。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随便什么时候和谁谈都行，——和马林科夫同志或者和斯大林同志。和谁都一样。

皮克请马林科夫同志5月5日接见他们。马林科夫同志表示同意。

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告别。

谈话于 22 时开始，深夜 1 时 15 分结束。

记录：B. 谢苗诺夫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四)

(1952年4月1日)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谢苗诺夫（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

翻译：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弗雷德·厄斯纳。

皮克同志说，有许多问题，他们想同斯大林同志谈一谈，以使问题更明确。第一类问题涉及德国局势，这些局势的形成一方面同苏联政府建议的对德和约的原则有关，另一方面同西方强国的军事政策有关。由此会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政府提出什么任务呢？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已在向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提交的提纲草案中阐明。威·皮克简要阐述了这一观点后说，苏联政府就对德和约提出的建议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使阿登纳政府陷入了困境，这从西方强国对苏联政府的照会的答复中就可以看出来。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想了解斯大林同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缔结对德和约的前景如何？四国会议会不会举行？会议能产生什么结果？

第二个问题，关于进行没有联合国干涉的全德自由选举的问题。我们应该为争取这些选举而展开广泛的群众运动，以推翻阿登纳政府。

第三个问题，党应该怎样继续在西德进行斗争？

目前最重要的是使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前致信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德国统一与和约问题上

共同行动。但是，这个建议大概不会被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所接受。进一步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的爱国力量联合起来。不久将举行一次有各种爱国团体参加的“千人代表会议”。

斯大林同志问，——是在西德？

皮克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

代表会议将选举常设主席团，以便在会后进行的争取统一与和约的斗争中协调行动。这将有助于扩大运动的规模。关键问题是加强德国共产党的力量。近年来，德共在反对重新武装国家和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阿登纳政府威胁要禁止德共的活动。但是，这些成绩与西德的紧张局势并不相符。德国西南地区的选举表明，党尚未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在这些选举中，德共甚至失去了若干百分点的选票。部分原因是选民参选的人数少。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竭力帮助德共，从民主德国向西德派遣指导员和负责工作人员。难的是，德共没有足够的干部，现有干部在开展广泛的民族斗争方面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不久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德共纲领制订委员会。我们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德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党纲，党内在民族解放斗争和西德工人运动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上还摇摆不定。在党纲草案完稿之后，我们想请联共（布）中央帮我们作最后的修订。

第二类问题，——皮克同志继续说，——由西方强国同波恩政府可能在今年5月签署“总条约”引发的任务而产生。我们认为，要尽一切可能阻止“总条约”的签署（举行罢工，以征集西德和东德居民签名的方式“呼吁和平”，以“千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名义制订民族纲领）。民主德国政府将声明不承认总条约。此外，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给西德的经济制造麻烦（对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公路干线征收重税，为西柏林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通线制造障碍，对西柏林居民前往民主德国实施通行证制度）。

第三类问题，——皮克同志继续说，——针对西方的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军事防卫？现在，民主德国有人民警察，但这不是防卫。警察的装备十分落后，配备的手枪性能很差，又没有子弹。

斯大林同志问，——这叫什么警察？

乌布利希同志说，这样的警察世界上绝无仅有，他们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局面，是你们自己的错。

乌布利希说，警察是用德国的旧武器装备的，没有所需数量的子弹，而民主德国自己又不能为人民警察生产武器，因为这是西方协议禁止的。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对自己的权利理解得很差。你们完全有权拥有自己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警察。

莫洛托夫同志说，——还要为警察生产必要的装备。

斯大林同志强调，民主德国可以为人民警察生产机枪、步枪、手枪和子弹。有充分的权利。

皮克同志说，这太好了。皮克问，要不要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德国军队采取措施。

斯大林同志说，——不是采取措施，而是应该建立军队。是采取什么措施？

皮克同志说，为此应该生产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西方国家在西德正在破坏所有的决议，为所欲为。

皮克同志说，为了建立军队需要在民主德国展开相应的宣传，指明西德建立的军队同东德的国家军队之间的区别。

斯大林同志说，建立军队无需大肆声张和宣传。当军队建成时，那时才可以大肆宣扬。

皮克同志说，我们进行了赞成德国非军事化、反对任何军队的宣

传，但是，由此使和平主义情绪得到了传播，这一点不得不考虑。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曾经是必要的。现在不需要了。

皮克同志说，这在讨论苏联和约原则草案中的军事状况部分时已显示出来。产生了误解。

斯大林同志问，——误解？什么误解？

乌布利希同志讲了在民主德国传播的和平主义情绪。

斯大林同志问，——如果有人打你们，你们会自卫吗？这叫做不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鼓吹的就是这个。这不是和平主义。这更坏。

皮克同志说，民主德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民主法制。在民主德国取得建设成就的同时敌人（富农和教会）也加紧了行动。应该更公开地表明提高警惕、捍卫民主秩序的必要性。应该进行几次公开审判，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逮捕和判决一些人。到现在还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做法不恰当。但这样做是需要的。此外，改判苏联军事法庭对情节较轻的犯罪的原判看来是适宜的。现在，民主德国的监狱人满为患。或许，应对情节较轻的犯罪的原判进行改判。

斯大林同志问，——是释放吗？

莫洛托夫同志进一步问道，——是对情节较轻的犯罪？

皮克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皮克说必须通过建立工资级别和提高较熟练工人的工资来改善民主德国熟练工人的状况。我们同时讨论了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该怎么办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那里的状况更糟吗？

厄斯纳同志说，糟得多。

皮克同志说，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规定，奖金只有在完成了国家合同的定货后才予以发放，同时按私营企业工人工资的3%提成建立社会文化基金。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想不想得到部分或一半的苏联在德企业？

乌布利希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更明确地问，——不想吗？

皮克同志说，这最好不过了。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打算把一半的苏联在德企业卖给民主德国政府，一年或略晚一年后再把另一半卖给你们。一半，我们从所得利润的角度算一算，——如果全部苏联企业比如说每年提供8亿卢布的利润，那么我们卖的就是每年提供4亿卢布利润的企业。

皮克同志说，这太好了。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这个问题你们要具体地谈一谈。我们建议你们一部分用马克支付，另一部分拿商品抵付。那时，你们就会有不少国营工人了。

皮克同志说，这太好了。然后皮克说，许多知识分子从民主德国跑到了西方。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你们应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厄斯纳同志说，民主德国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皮克同志说，我们打算同工程技术人员签订单独合同。这个早就决定了，但是没有实施。在旧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与工程师的工资之比是1:2.5，现在在民主德国是1:1.7。在鼓励发明和发放专利以及有关技术书籍方面都做得不大好。

斯大林同志更明确地问道，——是指出版吗？出得很少？

厄斯纳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也很少能得到国外的技术书籍。

皮克同志谈到必须改善民主德国国家机关的工作，那里严重缺乏责任心和首倡精神。应该对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并有必要为此成立一个直属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的机关。关于这个问题格罗提渥会谈到。我们认为，——皮克继续说，——外交政策问题应该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务大多是由外交部决定的，但至今毫无成效。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保不住秘密。

皮克同志谈了苏联给予民主德国经济援助的必要性。民主德国1952经济年度的开局比1951年度要糟。前景不大乐观。我们请求在五个方面给予援助，这五个方面格罗提渥会汇报的。

以上是总的问题。

皮克同志转而谈到党内状况，他说，不久前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中央全会，全会主要讨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权力机关工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党员的登记严格吗？有多少党员？

皮克同志回答说，——有115.3万党员。

斯大林同志问，比去年少了？

乌布利希同志说，少多了，因为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了核查，在一年的核查期间停止接收新党员。

皮克同志说，党现有115.3万党员和10.2万预备党员。其中妇女占23%，工人占42.4%，职员占27.2%，农民占5%，知识分子占43%，不工作的人占16.1%，等等。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有失业吗？

皮克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

乌布利希同志说，有失业。失业是因为原料方面的困难造成的。比如说，在科特布斯纺织区不得不裁掉大约1000名工人。

斯大林同志问，——农民对政权的态度怎么样？

皮克同志说，中小农民对政权持肯定的态度并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富农则相反，他们在今年暗中破坏农产品的供应，甚至对农村党的积极分子开始采取恐怖行动。所以富农在抵抗。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自然的。

皮克同志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农村中的工作有很多漏洞。我们的政策在农村中的支点是农业机器租赁站。

斯大林同志问，——有集体农庄吗？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建立机器租赁站是为了什么？

皮克同志回答说，民主德国建立机器租赁站的目的是让贫农和中农摆脱富农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问，——这就是说，机器租赁站是为私营经济服务的？农民向机器租赁站寻求帮助？机器租赁站给私营农民带来好处？

乌布利希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必须建立更多的机器租赁站。

斯大林同志问，怎样支付机器租赁站的劳动——用实物还是用货币？

皮克同志说用货币并强调机器租赁站在政治上说服农村居民的重要性。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很多机器租赁站吗？

乌布利希同志说有 540 个并说必须把机器租赁站网扩大到 600 个。

皮克同志谈到由于柏林被分割成两部分所形成的复杂周势。美国人试图依靠西柏林对民主德国实施破坏政策。反动分子纠集在西柏林。出版有不少的反动报纸，拥有 3 个对民主德国广播的电台，它们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柏林进行单独选举，力图扩大自己对整个柏林的影响。从柏林的党员数量来看，德国统一社会党有 39700 人，社会民主党有 34000 人，但西柏林的全部管理机关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

斯大林同志问，——社会民主党在东柏林的党员多吗？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很少。

皮克同志说，从 1948 年起，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减少了 6000 名党员，群众不满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最后皮克同志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感谢对德国人民的援助、特别是所建议的和约原则草案以及派专家来帮助民主德国。皮克同志

说，他还想对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及崔可夫和谢苗诺夫同志在工作中给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人经常性的帮助表示感谢。

然后是格罗提渥同志谈。他说，民主德国国家机关跟不上国家文化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主要错误在于，我们未加认真改进就效法了魏玛的国家机关结构。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土地改革和计划经济），国家面临全新的任务。国有工业的增长、经济中计划原则的加强、劳动竞赛的开展、技术标准的实施、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斗争、企业中集体合同的履行、合同制和经济核制的实行，都提出了经济中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大幅度提高工人的觉悟有关。当然，我们的经济机关有不少错误，但那里使用新方法要比国家管理机关多。在民主德国成立后我们试图去适应新任务（魏玛共和国有14个部，现在设了25个），但各部委同其领导之间仍然不能真正地协调起来。机关在广度上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深度上发展得不够。在政府和党的机关的职责分工上还存在许多缺点，这造成工作中的平行重复和矛盾。国家机关中形式主义和冗长的文牍主义报告制盛行。我们的建议旨在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保证决策的专业水准。我们打算为此建立一个直属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的专门机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劳将被免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他来协调所有的经济问题，包括工业、运输和农业。国民教育部部长汪戴尔将被任命为协调科学、国民教育和艺术等问题的专职副总理。将设立领导地方权力机关的副部长一职。这三位同志将直接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领导，并负责相应部门的全部筹备工作。政府工作同党的领导的联系将更加密切。此外，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之下设立领导外交部的对外政策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格罗提渥，——他有几位副总理？

格罗提渥同志回答说有五位。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都管什么？

格罗提渥同志说，有两位副总理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我们很高兴他们什么也不管。

斯大林同志问，——乌布利希管什么？

格罗提渥同志回答说，乌布利希负责许多关系到青年、体育等政府方面的问题。他还在总体上负责政府同党的联系工作。

斯大林同志问，——如果让第一副总理只管工业及协调工业的工作，怎么样？

格罗提渥同志说，这一任务我们想主要委托给劳。

斯大林同志说，除部长外，还应设副总理并对他们之间的工作进行分工，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对某个确定的部门负起责任来。

格罗提渥同志说，他们的改组计划，正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由于是各党联盟，任务完成起来困难重重。在设立新职位时，必须考虑把某一个职位分给资产阶级政党。但是，随着我们任务的扩大，把某个部分分配给资产阶级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资产阶级政党要什么？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他们想得到职位，过安定的生活。

斯大林同志说，经验表明，不能只通过部长来进行管理。除部长外，应该有若干副总理，每人主管确定的几个部。从管理的角度看，没有这一条绝对应付不了。

格罗提渥同志说，民主德国的任务就是要进行这样的归类，但同时不把任何职位分给资产阶级代表。如果考虑到必须解决军队、武装力量等问题的话，那么资产阶级代表只会碍事。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国防部，警察归谁管？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警察形式上由民主德国内务部管理，但那里有负责警察问题的专职副部长，他实际上并不归内务部管。

斯大林同志感兴趣地问，谁是民主德国内务部部长。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是斯泰因霍夫，——一个纯粹的和平人员。

斯大林同志问，——就不能提拔一位打过仗的人？一位军人？

乌布利希同志说应该提。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部长是一个和平人员，那么警察也会是和平的。或许不必设立国防部，可以以内务部为依托搞一个雏形。

乌布利希同志说，组成军队的那部分警察只在形式上归民主德国内务部管，实际上直接服从于国家全部和总理。

斯大林同志说，那最好以国家全部为依托搞一个这样的雏形。

乌布利希同志表示同意。

格罗提渥同志说，民主德国存在着一系列他们无法解决的经济困难。我们请求在下述方面给予援助：

铸铁——除长期协定的规定外还需要 25000 吨（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申请）。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我们能给。

格罗提渥同志说必须得到数额为 250 万美元的短期贷款，用以从西德购买轧管机，因为无缝钢管严重不足（短缺 19000 吨）。

斯大林同志说，贷款可以提供并问想要多少无缝钢管。

格罗提渥同志回答说，他们估计，如果得到轧管机，从第 4 季度开始轧制钢管的话，钢管勉强够用。

谢苗诺夫同志回答了斯大林同志的问题，他说，根据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计算，即使得到轧管机，民主德国的无缝钢管也不够，现在民主德国正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谈判，商谈由这些国家接受用民主德国现有的钢管毛坯轧制 19000 吨钢管的定货。

格罗提渥同志说，即使得到轧管机，民主德国 1952 年无缝钢管的缺口仍会有约 14000 吨。

斯大林同志问米高扬同志，这个数量能不能满足？

米高扬同志说，这会有困难。

斯大林同志说，只要能给的，我们都给你们。250 万美元的贷款，

你们什么时候要，我们就什么时候给。哪怕是明天。

马林科夫同志问，——轧管机哪里有？西德？

格罗提渥同志回答说，轧管机是西德制造的，但已被运走，民主德国要通过英国和瑞士购买。

格罗提渥同志请求缩短造船所需厚铁板的供货期，具体的要求是：向苏联购买的72000吨厚铁板，在今年4月底前供给32000吨，第3季度供给40000吨。

米高扬同志说，这会有困难，第4季度民主德国工业仍会需要厚铁板。他建议4月底前供给21000吨，第3季度供给30000吨，第4季度供给21000吨。

格罗提渥同志说，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

斯大林同志说，这应当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明确下来。

乌布利希同志说，已经谈了几周了，但毫无结果。

斯大林同志问，——和谁谈判？

乌布利希同志说是和苏联外贸部。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将追究工业家的责任。也许可以提供，但是暂时还什么也说不准。如果德国贸易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话，那么应该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格罗提渥同志说，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从苏联运来的金属材料在分配中有许多错误，民主德国的负责工作人员同苏联驻德财产管理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把70%的金属材料转交给苏联在德企业。我们不承认这个协议，要求准确核查需求量。我们知道，苏联企业在民主德国仓储的原料比它们所需要的多得多。

乌布利希同志说，苏联在德企业和民主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没有完全协调好。苏联“海神”造船厂全年所需的厚铁板都得到了保证，现在从苏联得到的厚铁板全都入了仓库。而我国在施特拉尔松的造船厂却开工不足，虽然它同时还要履行战争赔偿。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提过这件事？同谁谈过吗？

乌布利希同志说，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同苏联驻德财产管理局的领导谈过。

谢苗诺夫同志证实说，第一次向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今年的3月19日，为了进行核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乌布利希，——不能向莫斯科写封信吗？

乌布利希同志说，他们通常试图就地调解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有什么不满，应该向联共（布）中央提。这个申请必须由苏联在德企业来满足。问题要在这里，在莫斯科而不是在柏林解决，满足你们的请求。

格罗提渥同志请求向民主德国供应7000吨铅。

斯大林同志问，——给过多少？

格罗提渥同志说，暂时还一点儿也没给。

米高扬同志证实说，苏联外贸部还没有向政府通报同民主德国代表团进行的贸易谈判的结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斯大林同志问格罗提渥，——5000吨铅够不够？

格罗提渥同志要7000吨。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一定给。中国人拿走了很多。他们比你们来得早，先拿走了。

格罗提渥同志请求提供1万吨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有困难，但是我们一定给。

格罗提渥同志说，没有铜不能生产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一定给。

格罗提渥同志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假如我们能做到的话，我们会给你们双倍的。我们把“海神”造船厂连同全部金属储备卖给你们。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发现铁矿？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民主德国大部分金属产品是由各地的贫矿生产的。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高炉？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高炉正在建，但情况不大好，“东方”联合企业出现严重的开工困难。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向来是向德国人学习冶金工业建设的。你们没有能力建高炉，怎么回事？

乌布利希同志说缺专家。所有的冶金专家现在都在西方。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好事。最终你们会建立起你们本国的工程知识分子队伍。

乌布利希同志请求苏联派遣相关领域的专家给民主德国的企业提供技术援助。比如，到坦克修理厂等企业。

莫洛托夫同志问，——德国不制造坦克？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所有的坦克厂都被炸毁了，非军事化实行得非常彻底，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

斯大林同志讲述道，当苏联军队逼进柏林时，美国人请求苏联指挥部允许轰炸离苏联军队驻扎的西线 10 公里的德国地区。我们一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对美国人说应该这样做，因为那里有军队。但是，美国人仍然请求允许轰炸。后来明白了，他们是想摧毁德国的工厂。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允许轰炸。然而，他们派出了轰炸机，我们就派出了苏联歼击机迎击，并打掉了几架美国轰炸机，他们才走了。早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开始破坏工厂了。现在我们将建设工厂。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很愿意向民主德国提供技术援助，因为你们会很快掌握这些技术，不像中国，那里做事要慢得多。

乌布利希同志说，然而，民主德国也做了不少蠢事。

斯大林同志说，只有不干活的人才不会出错。

乌布利希同志请求给农业联合机、混凝土搅拌机、起重机、联合

采煤机及其他煤炭工业的成套设备提供短期贷款。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并建议就此进行具体谈判。

乌布利希同志请求给民主德国提供学术帮助，派遣苏联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到高校和党校讲课。

斯大林同志答应尽可能给予帮助。

乌布利希同志又谈到皮克同志提出的对那些组织纵火、搞破坏活动、谋杀民主德国党的工作人员的西方间谍进行公开审判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进行公开的审判，用战斗精神教育工人阶级。

莫洛托夫同志说必须对西柏林居民前往民主德国实施通行证制度。难道现在西方间谍还可以在民主德国来去自由？

乌布利希同志说，现在几乎是公开地从民主德国偷渡到西柏林，而警察甚至不能开枪打偷渡者，因为没有子弹。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样不行。

斯大林同志说，这不行。决不能容忍这样。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边防警卫队？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边防警卫队力量很弱，应该加强并使之隶属于军事机关，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西德的局势、前景以及总条约等问题可以在第二次会见时再谈。

皮克同志表示同意。

乌布利希同志请求让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人了解一下斯大林同志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著作。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并强调，这一著作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我国曾对经济问题有过争论，争论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意见》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这纯粹是俄国的问题。

乌布利希同志请求允许同联共（布）中央随便一位领导人谈谈中

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可以。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你们有一些不同的条件。

乌布利希同志说，他们自己会考虑如何把苏联的经验运用于民主德国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民主德国现有警察的状况不能持续下去。警察应该有战斗力。应该改变警察的工作条例，改进装备和训练。

乌布利希同志说，他曾参加警察的党代表会议，警察同志对现有条件感到很气愤。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常的。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提拔工人到负责岗位上？

乌布利希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询问提拔农民的情况？

乌布利希同志说，这项工作做得很差。

皮克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派苏联代表团参加纪念贝多芬的活动。苏联演员的演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斯大林同志笑着说，这些都很好，但是，拥有军队更重要。

记录·谢苗诺夫

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五)

(1952年4月7日)

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谢苗诺夫（苏联驻德监察委员会）等同志。

斯大林同志说，上一次谈话时，威·皮克提出了德国发展的前景问题，涉及到苏联的和约建议以及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对德政策。斯大林同志认为，无论我们就德国问题提出什么建议，西方强国都不会同意，它们反正不会撤出西德。认为会达成妥协或美国人会接受和约草案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人需要在西德驻军，以便掌控西欧。他们说，在那里拥有军队是为了反对我们。事实上，他们驻军的目的是为了掌控欧洲。美国人会吸收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他们会建立西德军队。阿登纳被美国人所控制。所有前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们也是如此。实际上，西德正在成为独立的国家。你们也应该组织自己的国家。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分界线应被看作边界，不是看作普通的边界，而是看作危险的边界。需要加强这个边界的守卫。第一道边界守卫线将由德国人驻守，第二道边界守卫线我们派俄国军队。西方强国的间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行动太自由了，他们会采取极端措施杀害你们或崔可夫同志。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应该拥有强大的边界守卫。

然后，——斯大林同志继续说，——我们打算重建军事警备司令部。这也是一种抵抗可能的破坏活动的好事。我国军队也应该拥有可靠的保护。你们也需要这个，你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强大。斯大林同志

问，这些建议合适吗？

皮克同志说，这很重要。

乌布利希同志表示同意。他问，是不是要在所有地方重建警备司令部？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不了解这一点。崔可夫同志打算重建警备司令部并为此派遣 3000-4000 名军人。

皮克同志说，这很重要也很必要。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弄清了德国警察的装备问题，我们认为，装备应该用俄国的。现在德国警察拥有的是没有子弹的德国旧武器。必须或者恢复子弹的生产，或者我们卖给你们武器。

乌布利希同志说，他同意这一点。但是，是卖给我们全部武器吗？是先卖手枪，还是先卖机枪？

斯大林同志说，全部武器。如果你们的警察不武装起来，那叫什么警察。你们有权利拥有武装警察。崔可夫同志说，除普通警察外，民主德国还有兵营警察，即军队。他请求为此提供坦克和大炮。我们同意。请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他有两个问题。上一次谈话弄清楚了，民主德国工人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之比是 1:1.7。这是完全不对的。这会毁掉你们的整个工业。你们可能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公社时期曾说过，工程师不应该得到高于技术熟练工人的工资。这在当时或许是对的，可现在绝对是错的。工程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他应该拥有住宅和良好的环境；他不应该为了一块面包而奔波。他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所必需的。他必须拥有书房，生活舒适，使他能够安静地读读书，写点东西。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些，不仅你们那里的旧工程师会走掉，而且年轻的工程师也会流失。我国的工程师挣得比工人多 1-2 倍，有的地方高达 3 倍。院士每月挣 12000 卢布。不这样做就不能工作和提高自己。因此，应该抛弃这方面的旧观点。现代技

术同公社时期相比要复杂得多，工程师甚至技术熟练工人都要不断学习，以便掌握这个技术。工程师应该有不断提高自己、读书和写作的可能性，不这样就不是工程师。

对军队的态度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需要民兵。我们在最初几年也同样认为只需要民兵。生活证明这是不对的。现在为了捍卫国家，需要拥有众多专家的现代化军队。民兵只有在战争由步枪来解决时才是有用的。现在需要抛弃这种旧民兵。现在作战的不是工场手工工业化的军队，而是机械化的军队。因此，参加军队的应该是懂得机器的人。

斯大林同志说，他还听说，民主德国技术熟练工人挣得并不比非技术熟练工人高多少。

乌布利希同志说，技术熟练工人挣得多一些，但差距不大。因此打算实施等级工资。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工厂里成立了公社，工程师和非技术熟练工人都参加，把自己的工资交公使用，大家平分。这种做法很愚蠢。技术熟练工人没有提高自己技能的动力，非技术熟练工人也没有把自己提高到技术熟练工人水平的动力。大家都受到了损失。当时有些人说，这种方法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会对你们说，如果他得到更多的薪水，他就会提高技能，否则就不会。技术熟练工人应该比普通工人挣的多得多，工程师应该比技术熟练工人挣的多得多。无论这会花费多少钱，都需要去做。我国已经这样做了25年了，只因为如此事业才蒸蒸日上。技术熟练工人也有了奔头，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了工程师考试，成为优秀的专家。应该抛弃农民的平均主义。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领导人同意这一点吗？并补充说，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皮克同志说，这是对的。

斯大林同志说，他还有第二个问题。他，斯大林是这样理解的，民主德国根本没有集体农庄，机器租赁站只为私营农户提供服务。

乌布利希同志肯定了这一点并补充说，我们甚至在农民想要集体农庄的地方禁止组织集体农庄，为的是不妨碍德国统一的进程。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抱怨富农。可这叫什么策略，——抱怨？！应该把富农包围起来，在他们的旁边建立集体农庄。我国在组织集体农庄的同时没收了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这条道路不适合你们。让富农留下来，不要触犯他们。但是，除富农外，在你们的农村还有生活在富农身旁的贫农。应该把他们吸引到生产合作社中来。有多少贫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社，5户，10户，15户，这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贫农没有机器，缺少种子，没有必要的经营知识和经验。因此他们的收成很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贫农会破产，会没活干。如果你们组织起小型的集体农庄，帮助他们搞好经营，农民就会考虑，是参加集体农庄好还是单干好。匈牙利有很好的经验，他们组织了很好的集体农庄，不去触犯富农，把机器提供给集体农庄，竭力提高集体农庄的收成。不能认匈牙利人比德国人更有才能。这你们也应该做到。应该向生产合作社提供优惠，就像我国曾做过的那样。更便宜地提供机器，资助他们种子，给他们出主意。如果需要组织集体农庄的指导员，我们可以派遣给你们。当然，如果政党联盟反对这样做，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农民希望组织生产合作社，如果你们在这方面帮助农民的话，政党联盟就反对不了。这里有什么坏处吗？你们自己会看到，农民将会到这些集体农庄做客，看看新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发现，斯大林同志说，你们的政策对农民不够重视。这是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的陈旧偏见。如果认为这种看法正确，就应结束这种状况。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同志，他们需不需要农民？是不是农民供给他们粮食？如果需要农民，就意味着必须有同农民结盟的基础。

皮克同志说，当民主德国进行土地改革时，敌人宣传说我们打算建立集体农庄。农民对集体农庄抱有很深的成见，因此我们害怕提出集体农庄问题。现在我们在农村有农民互助社和商业合作社。这里含有合作化原则。或许，现在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在农村建立生产合作社并且就用这个名称。这只会好处。你们将会在农民中间拥有坚实的基础。匈牙利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你们早就可以这样做了。对敌人的一切宣传不应沉默，而应进行反宣传。你们可以说，贫农愿意加入生产合作社，政府是在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皮克同志说，这很好。

斯大林同志指出，应该向合作社提供优惠——更便宜地卖给它们机器，在最初两年资助它们种子，然后合作社就会壮大起来。这可以吗？

乌布利希同志说，可以。这会缓和我们在农村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说，——当然，你们将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基础。不要逼迫任何人，愿意加入，很好，不愿意加入，也不要强迫。农民自己会加入生产合作社的。也可以从城市失业者中派一些优秀的人去组织这种农村合作社。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苏联没有失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扩大了生产，一是因为农民都在务农。过去，每年都有2300-2500万饥饿的农民从农村跑到俄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因为农民关心农村的工作。现在苏联没有失业，而是苦于工人不足。我们动员年轻的农民，派他们去从事工业。这样，我们从两头战胜了失业。不应该舍不得帮助集体农庄。这会在以后得到补偿的。那时你们就会形成工农联盟。没有农民，

单靠工人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你们需要农民的帮助。

乌布利希同志说，这会产生后果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民主德国一直说，我们主张建立民主制的德国，没有采取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们也从未说过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

乌布利希同志问，在德国严重分裂后，我们要不要继续过去这种策略？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也不需要大肆宣扬社会主义。但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

乌布利希同志说，至今我们没有说过这种话，也没有指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我们对民主德国产生的社会关系有所掩饰。

斯大林同志说，借助这个面具，你们就不会吓倒西德的中间阶层。但假如不戴这个面具，你们或许就会更有力地吸引到下层阶层。如果工人知道你们把工业国有化了，他们会很高兴。否则他们会说，你们是同波恩政府一样的政府。可以说，民主德国的工业是国有的，国有化了的，而在西德是个别资本家一百万富翁在控制着工业。这里应该随机应变，一方面不应把中间阶层吓跑，但同时也不能让西德的工人扫兴。我们会把我国的股份企业卖给你们。知道国有化工业因此而扩大，对德国工人是非常重要的。工人对此会很离兴的。当然，在对待中间阶层方面，应该随机应变，应该加以掩饰。如果说，你们有国有工业，那就意味着企业不是控制在资本家一掠夺者手里，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的手中。但是，你们自己应该知道，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农村的生产合作社，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可以不大肆宣扬。当生产合作社的事业越来越好，全体农民看到集体农庄的实惠和实力后，农民就会转向工人。但暂时不必大肆宣扬这个，因为你们还没有集体农庄。依我看，你们应该开始这项事业。虽然德国建立了两个国家，但暂时不必大肆宣扬社会主义。这些农庄也暂时不要叫

集体农庄，而是叫它们生产合作社。

皮克同志说，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应该认真地讨论，在全党澄清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先建几个集体农庄，然后再在党内讨论。现在你们没有进行讨论的材料。斯大林同志笑着说，要先做后说。

乌布利希同志问，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有什么经验？在收割后开始建设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更合适？

斯大林同志说，对农民的组织工作通常是在冬天进行的。收割后可以同农民谈谈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事。

皮克同志说，工人问我们，民主德国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吗？我们至今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但工人们对此不满。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对你们的工人说，——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你们有许多私营资本家。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应该证明，你们比阿登纳政府更接近工人。

斯大林同志问，你们的最高机关是什么机关——是书记处还是政治局？

皮克回答说，这个问题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尚不明确，虽然按照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章，政治局高于书记处。联共（布）中央的佩戈夫同志在这里同我们举行了会谈，他详细解释了工作的方法，澄清了问题。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同库兹涅佐夫、罗曼诺夫和米海伊洛夫等人就应征前的军训问题交换了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建设集体农庄，你们或许需要指导员。可以从匈牙利或波兰招一些指导员。

马林科夫同志说，他们在德国农民的心中还不如苏联人有威信。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会派一两个指导员。只是不要在集体化的同时剥夺富农。你们可以暂时不触犯富农。

乌布利希同志说，我们无需触犯他们，因为只要一组织生产合作社，部分富农马上就会跑到西方去。

斯大林同志说，这有什么不好？你们可以把他们的地拿来嘛。在波兰，部分富农卖掉了自己的地，现在在跑马车运输。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国营农场？

乌布利希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国营农场大约占民主德国全部播种面积的5%。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农场经营得好吗？

乌布利希同志说，不大好。

谢苗诺夫同志证实说，民主德国国有地产的收成大大高于农民土地上的收成，但国有地产往往不盈利，要靠国家补贴。

斯大林同志说，个别国有地产如果经营不好的话可以交给农民。在我们国家，在苏联，一开始也在组织国营农场工作方面遇到了困难。于是我们把部分国营农场交给了农民，结果经营变得有收益了。为了保障国营农场工人的生活，我们分给他们一块地，他们就工作得更好了，更坚定地务农了。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同志得到轧管机了吗？

格罗提渥同志回答说，购买轧管机的资金已经到位，但暂时还不能确定能否买到。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想要得到轧管机吗？

格罗提渥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他们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制造这样的轧管机以及所有必需的设备，但是，工厂的定货已经超额。

斯大林同志问，民主德国有没有新的铁矿？

乌布利希同志回答说，民主德国拥有的都是贫矿，含铁量约为20%。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把贫矿石和富矿石混合起来。战前，德国人

连含铁量为5%的矿石都不放过。

乌布利希同志说，民主德国建了若干专门开采贫矿石的浅井。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把这样的矿石同富矿石混合起来。波兰人从我国进口克里沃罗格的铁矿石，然后掺上50%本国的贫矿石。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就从我国进口铁矿石。不久前我们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含铁量达60%的富矿。但是这个矿区离铁路很远。

乌布利希同志说，他们还有一个请求。我们已经通报说我们打算制订德国共产党纲领。我们将尽力加快制订这个党纲，争取在德共被禁止前公布。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我们的草案并帮助我们修订。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格罗提渥同志说，他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对西德的局势和美国的政策的评价。他，格罗提渥，想问一下，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目前必须改变我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论据和民主德国政府在恢复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官方观点。

斯大林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应该继续不断地宣传德国统一问题。这对教育西德人民具有巨大意义。现在这是你们手中的一个武器，应该一直把这个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也将继续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建议，以揭露美国人。

格罗提渥同志请求斯大林同志再多卖给民主德国8000吨长纤维棉花。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并建议同马林科夫同志商谈这个问题。

厄斯纳作为翻译也出席了会谈。

谈话从22时零5分进行到23时20分。

关于英国

出版我国支持英国罢工者的决议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5月26日)

再一次向你问好！

由于你们总是忙于抓大事，一些小事可能就忽略了，因此，提醒你们注意几件必须办的小事，我想不会是多余的。

(1) 应当提醒布哈林写一篇反对“工人反对派”的文章。这件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把文章写出来。让布哈林写这篇文章比让格里沙^①写对我们有利。格里沙一拖再拖，令人不能容忍。让布哈林写，在战略上有利。布哈林完全有这个权利，因为格里沙对政治局的委托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

(2) 要尽快用西欧的所有主要文字全文出版我国（各地区的）工人支持英国罢工者，特别是采煤工的决议。我认为，应该出小册子，并由布哈林或托姆斯基写个前言。不用格里沙，也不用洛佐夫斯基。前言应当由布哈林或者托姆斯基来写。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决不能退让。出版事宜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或国家出版社负责。用共产国际的牌子不合适，用这个牌子会把事情搞糟。最好是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牌子。

(3) 请通报一下乌格拉诺夫和亚戈达报告的那件令人担心的事的情况。如情况顺利，就电告：“健康”，如不顺利，则电告（用明码）“生病”。

① 指格·季诺维也夫。

暂且就写这些。天气好起来了。

斯大林

1926年5月26日

我们的代表团在柏林表现得不错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8日）

9月8日

来信收悉。

（1）我们的代表团在柏林表现得确实不错^①。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总的来说是好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也是好的。托姆斯基的答记者问很精彩。关于给总委员会或采煤工联合会提供借款的问题，我不坚持己见。我想借款问题可以暂时缓一缓。我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向“欧洲”表明，我们的共和国不是“钱袋子”，我们的人是节俭的，善于节省每一个戈比，我们现在把钱借出去，将来还要把它收回来，等等。但这个问题可以暂时缓一缓，也许就根本不再提了。

.....

祝一切顺利！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1926年8月2日，在柏林召开的英俄委员会会议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建议开展广泛的运动支持英国矿工的斗争，直至对英国实行煤炭禁运。英国总委员会代表团拒绝了这一建议。

现在应当全力支持向英国禁运煤炭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6年8月27日)

致莫洛托夫（并转朋友们）

(1) 英国采煤工代表团如果现在还没有到达苏联的话，可于近日内到达。对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要“完全照规矩”进行，并要多给采煤工筹集一些钱。据说，美国人答应给100万美元。我们得尽快筹集并寄出200万卢布左右（不能少于美国人），甚至300万整。英国的形势严峻。我们不得不作重大“牺牲”。

(2) 我认为应当通知安德列耶夫，要他坚持禁运^①。禁运问题现在已经迫在眉睫。英国共产党人掀起了强大的运动支持禁运。不能允许总委员会光号召筹款了事。这样做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应当竭尽全力支持禁运。顺便问一句，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如何？

(3) 我看，无论是我们的报刊还是英国共产党的报刊都没有利用托马斯和韩德逊逃避在“工党”和“工会总委员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一事实（“他们去休假了”，一个去了加拿大，另一个去了澳大利亚）。我国的和英国的报刊应大张旗鼓地揭露这两个叛徒是在逃避责任，以便在讨论罢工问题时由于他们缺席而不会触及他们。还要揭露，是总委员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帮助了这两个人逃避监督，因此它们理应对这两个人的丑恶行为负责，等等。奇怪的是，英国的（和我国的）报刊对此却沉默不语（我看英国共产党的报纸，知道它们没有对这些事实加以揭露）。

① 指禁止向英国输送煤炭。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你关于开展运动要求解散国会和重新选举的信反应如何？英国共产党人对此事有何看法？

(5) 出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周刊（《共产国际》）之事不能拖延。你和布哈林都要抓这项工作。它对于改进和改革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整个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布哈林对此有何看法？

(6) 经济方面的情况如何？征购工作进行得怎样？出口情况如何？请有空时简单告诉我一下。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1926年8月27日

在斯大林8月27日信上写的意见：

关于第一点。（a）**托姆斯基答应**今天安排发表矿工中央委员会就英国采煤工罢工4个月给他们的公开信。公开信中说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矿工中央委员会相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百分之一的愿望**定会实现**。这件事现在至关重要，因为罢工的采煤工9月2日要举行代表会议。

（b）赶在工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9月6日之前），在工会举行的有矿工代表团参加的隆重集会上解决200万卢布的汇款问题。政治局还要对这个问题（b项）进行讨论。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完全赞成。仅作一点补充：应该掀起一场运动，特别首先是在英国，宣传解散国会、“打倒保守政府，支持真正的工人政府”等政治口号。

维·莫洛托夫

9月1日

（1）施瓦尔茨和我都同意发致敬信，9月1日2时还要同莫洛托

夫商量一下。

(2) 赞成援助，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

(3) 我不反对揭露托马斯和韩德逊，但是不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什么显著的作用。

米·托姆斯基

9月1日

英国的工党现在很难后退

(1946年9月4日)

1946年9月4日

到中央委员会找日丹诺夫。我们讨论了国际形势。

日丹诺夫：**斯大林**同志认为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他认为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局势，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进行判断，可以勇敢地摆明我们的观点：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只不过是恫吓，别无其他。他们企图破坏苏联在本国工人眼中的形象。但这已经证明，我们在他们国家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英美之间的矛盾即将显现。美国的社会冲突越来越蔓延。

英国的工党多次向英国工人承诺执行社会主义，现在他们很难后退。不久，他们会不仅和本国资产阶级，而且会和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拉斯基^①带领代表团来我们这里不是毫无目的的。他经常为自己和工党辩护，总结他们做了那些事。他表示，他们不会在帝国主义者面前退缩。他们将沿着自己的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苏联道路更好，但如果你们认为议会道路适合英国，我们不反对。看得出来，拉斯基想知道，莫斯科是不是会对英国实行苏联化政策……同样很明显，工党也想稳固自己的基础，在他们陷入困境时可以得到苏联某种帮助……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387-388页

① 拉斯基，时任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鼓吹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美国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

(之一)

(1929年5月6日)

同志们！在这里发言的已经不少了，美国共产党内两派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我就不必长篇大论地讲了。我不准备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我不准备涉及，是因为在这里的辩论过程中已经弄清楚，两派在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方面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种夸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派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考虑熟这些特点。但是把这些特点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共产党活动的基础应当是对所有国家来说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而不是某个独立国家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独有的特点仅仅是对于共同特点的补充。两派的错误在于，它们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的意义，从而忘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而这些基本特点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因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互相责难，说对方有右倾分子，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否认，美国现实造成的环境，使共产党容易陷入迷途，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稳固性。这种环境也促使我们的美国同志——不论是多数派的，还是少数派的——犯右倾类型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环境，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美国的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向左转估计不足，并且一般喜欢把美国资本主义看作某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之

外和之上的东西。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在原则上不坚定，根源都在这里。

讲了这些一般性意见以后，现在来谈谈政治实践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首先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受无原则的派性考虑的左右，把自己一派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第二，这两派——特别是多数派——患有派性病，以致他们不是把信任的原则，而是把腐朽的外交手腕、外交把戏的政策当作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基础。

举几个例子来说。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多数派领导人和少数派领导人都在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投机。你们知道，美国共产党的这两个部分像赛马似地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拼命拿联共党内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来投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许美国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吧？不是，当然不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一派得益，而让另一派受害。在福斯特和毕尔特曼看来，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对联共忠诚，这是无可指责的。但这恰恰是不体面的行为，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没有也不应当有什么“斯大林派”吗？少数派为什么干出这种不体面的事呢？是为了伤害多数派，即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为了表明洛夫斯顿派反对联共，因而也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基本核心。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和不严肃的。但是少数派却不管这些，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少数派的派别利益伤害多数派，使它信誉扫地。

而洛夫斯顿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怎么做的呢？也许它的行为比少数派要体面些吧？可惜并不如此。可惜它的行为比少数派更不体面。你们自己判断吧。福斯特派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靠拢联共。洛夫斯顿看到，这样一来，他自己那一派会受到某种损失。因此，为了进行报复，洛夫斯顿派突然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

跃，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的决议。结果成了一场按照谁胜过谁的原则互相追逐的游戏。这样做不是在进行原则斗争，而是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最无原则的投机。你们看，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政策，结果就是如此。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佩帕尔同志事件。这个事件的经过，你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共产国际两次要求把佩帕尔同志召回莫斯科。美国共产党中央进行抗拒并且在实际上违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佩帕尔的一系列决定。美国共产党的多数派就是以此表示自己同佩帕尔亲近，而佩帕尔的机会主义动摇是尽人皆知的。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出席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重新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召回佩帕尔。以洛夫斯顿和吉特劳为首的多数派又一次进行抗拒，并且不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福斯特派便利用这一事件反对洛夫斯顿派，断言美国共产党多数派反共产国际。洛夫斯顿派终于领悟到，它要是落到同共产国际对立的地位，那么从自己一派的利益来看，它会输掉这一局，因此洛夫斯顿派又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跃，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开除的正是它昨天还不惜反对共产国际而加以维护的佩帕尔。这又是一场看谁超过谁的相互角逐的斗争。为什么多数派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佩帕尔的决定呢？当然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只是为了多数派这个派别的利益。为什么多数派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把佩帕尔开除出党呢？也许是为了党的利益吧？当然不是。这只是为了洛夫斯顿派的利益，这一派不愿让自己的对手——福斯特和毕特尔曼派别集团——多得王牌。派别利益高于一切！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对联共的忠诚，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要比福斯特派更进一步，要求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靠拢共产国际，力求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执行召回佩帕尔的决定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更进一步，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请看，这就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派性造成的结果。

但是，同志们，共产国际可不是交易所。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最神圣的东西。因此不能把共产国际和交易所混为一谈。要么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支部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应当像水晶那样纯净透明，——那么，腐朽的外交把戏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应当有存在的余地。要么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那么，腐朽的外交手腕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我们的关系中就会有充分的市场。二者必居其一。同志们，对此必须做出选择。

为了说明在派别斗争过程中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怎样被歪曲被玷污，还可以举出一件实事，比如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这件事。我说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那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同志在同自己朋友通信时把这次谈话描绘成某种神秘的、不公开谈论的事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就这次谈话向福斯特同志提出控诉书时，提到他同我的谈话，而且在这里吹嘘说，他洛夫斯顿同志与福斯特不同，他能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宣扬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亲爱的同志们，这种神秘主义从何而来，有什么必要呢？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的谈话中能有什么神秘东西呢？听了这两个同志的话，会以为我同他们谈了某种不好意思在这里说的事情。但这是荒唐的，同志们。为什么要来这一套神秘主义的把戏呢？我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隐瞒的，这难道不好理解吗？我随时都可以把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的内容从头到尾讲给同志们听，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到那时福斯特和洛夫斯顿在这里竭力散

布因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神秘主义会怎么样呢？

福斯特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他埋怨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搞派别活动，不讲原则。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肯定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有这些毛病，但当时就补充说，福斯特同志这一派也有同样的毛病。福斯特同志根据这个话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我同情少数派。试问，根据是什么？福斯特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我没有看出少数派的缺点，甚至还同情这一派呢？福斯特同志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洛夫斯顿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谈了福斯特同志和毕特尔曼那一派如何不行。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他说，两派都有重大的缺点，我劝他设法肃清派别活动。这就是全部内容。

这里有什么不好公开谈论的神秘之处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同志们竟把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搞成只能引起严肃的人发笑的秘密，这岂不是怪事吗？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毒化美国共产党的生活、败坏质朴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的派性气氛，这里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也许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我说的是几天前同洛夫斯顿同志的一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又借着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荒唐的流言，把谈话说成是一种秘密。真好像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追求“神秘”……的癖好。他前几天跟我说了什么呢？说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取消把他从美国召回的决定。说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议中的决定不把矛头对准美国共产党多数派领导人，他洛夫斯顿准备执行这个决定。说他保证做一名共产国际的忠实战士，并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如果共产国际给他相应委托的话。说他并不谋求美国共产党内的任何高位，只要求考验他，让他有标明自己对共产国际忠诚的机会。对于这些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说，检验洛夫斯顿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已经检验三年了，可是有什么好的结果也没

有得到。我回答说，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暂时留在莫斯科，不论对美国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国际都较为有利。我回答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是治好美国共产党的派性病，使美国共产党免于瓦解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我回答说，尽管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我同意把洛夫斯顿同志的建议转交俄国同志们研究，并保证把俄国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

看来好像是很清楚了。然而洛夫斯顿同志又试图把这些很清楚的事情搞成秘密，并且接着我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了种种谎言的留言。显然，如果没有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至上、把外交把戏利益置于共产国际利益至上的政策，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情，就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搞成神秘的传奇。

为了肃清所有这些不像话的事情，使美国共产党走上列宁主义政策的轨道，首先需要铲除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

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

出路何在呢？

福斯特同志设想了一种出路。从他的建议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明确地和多数派划清界限的同时，没有同样明确地和少数派划清界限，这是犯了错误的。如果主席团委员会重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这一错误，那就可悲了。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在自己的草案中应当既和多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也和少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正因为他应当和两派的错误都划清界限，它不能建议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因此，福斯特同志的建议以及由此得出的一切结果自然不能成立。

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同福斯特同志建议截然相反的另一出路。大家知道，美国代表团的建议包括十点。这个建议的内容归结起来是：为多数派领导人完全恢复名誉，承认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是正确的，取

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召回洛夫斯顿同志的决定，从而肯定扼杀少数派的做法。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之所以不能，是因为这种出路不是肃清派别活动，而是把派别活动奉为原则。

那么出路何在呢？

出路在于：

(1) 要基本上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活动和建议，删去建议中同福斯特同志建议相近的各点；

(2) 要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发出致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明党内两部分人的错误，并且着重说明铲除一切派别活动根源的问题；

(3) 要谴责多数派领导人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活动，特别是在佩帕尔问题上的活动；

(4) 要结束美国共产党目前的这种状况，即必要的工作的问题，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问题，工资、工作日、工会工作、同改良主义斗争、同右派斗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人去注意，反而被洛夫斯顿派和福斯特派的派别斗争的小问题所取代；

(5) 要更新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而且要吸收那些除派别斗争之外还能够承认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把党及其统一的利益放在各派及其领袖的利益之上的工作人员；

(6) 要召回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由共产国际调配，让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最终能够懂得，共产国际在十分认真地肩负起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

据我看，出路就是这样。

下面简单讲讲美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使命。同志们，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共产党肩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从世界革命运动角度来看具有决定性的任务，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实力，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现在以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不会触及美国。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加速发展，它不能不触及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现有的三百万失业工人，是表明危机也在美国成熟的第一个征兆。美国英国之间对抗的加剧，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还有军备的巨额增长，则是说明危机迫近的第二个标志。我认为，革命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刻不远了。而革命危机一旦在美国爆发，这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必须使美国共产党能够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领导未来美国的阶级搏斗。同志们，需要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做好这种准备。为此要改进美国共产党，使之布尔什维克化。为此要努力肃清这个党内的一切派别活动和种种倾向。为此要努力重建美国共产党的统一。为此要努力造就真正革命的干部和真正革命的、能带领千百万美国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阶级搏斗的无产阶级领导人。为此要抛弃一切个人因素和派性考虑，把对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教育放在首位。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需要极其认真地对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提交你们审议的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就是要使美国共产党健壮起来，消灭那里的派别活动，建立统一，巩固党，并使它布尔什维克化。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
人民出版社，1980出版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

(之二)

(1929年5月14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事实。美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来，我们同代表团一起磋商，讨论美国共产党的迫切问题，探索摆脱现有状况的出路。代表团的每一成员都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即发表意见并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同志提出批评。你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充分行使了这种权利，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的任何阻碍。你们知道，洛夫斯顿同志要求俄国同志必须发表意见，你们知道，俄国同志已经就问题的实质发表了意见。可见，为了找到出路并把事情圆满结束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委员会都办到了。

但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对待事情没有采取深思熟虑的态度，也没有下决心最终肃清派别活动，相反，在美国代表团成员中间派别活动又一次爆发，又在试图破坏美国共产党统一的事业。几天前，我们还没有共产国际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当时我们只是订出了解决问题的一般原则，目的是要肃清派别活动。可是，美国代表团等不及决议草案出来，就二话不说，抛出了5月9日宣言——一个派性极端严重的宣言，反党的宣言。你们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的成员们见到这个宣言，是多么憎恶。你们知道，委员会已经把这个宣言驳得体无完肤。原来以为，美国代表团会回心转意，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委员会提出的、现在已分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这个草案刚一出来，美

国代表团就抛出了5月14日的新宣言，一个比5月9日宣言派性更严重和更加反党的宣言。这个宣言你们当然已经知道了。吉劳特同志在这里发言时已经宣读了。这个宣言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公开宣布不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的立场。这就是说，多数派领导人那种极端的派性把他们推上了不服从的道路，因而也是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道路。

不可否认，美国同志和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有不同意见委员会决议草案的充分权利，有同这种草案进行斗争的权利。如果他们只是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那就没有什么不好，也不会有什么不好。但不幸的是，5月14日宣言并不到此止步。它走得更远，认为在草案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以后，斗争仍应继续下去。因此，我们应当向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认为在草案成为共产国际的有约束力的决议之后可以不服从这个决议呢？我们在委员会辩论了整整一个月，我们进行过多次讨论，我们为这件事花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用在比较有益的事情上的。最后，我们总算结束了讨论阶段，而处在通过决议的前夜，这个决议应当是对共产国际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的。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列宁主义者，是否认为可以不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呢？

同志们，现在全部问题在这里。

现在请允许我从实质上分析一下宣言本身。

5月14日的这个宣言写得相当狡猾。我相信，这篇宣言是由某个精明的法学家、某个讼棍式的律师执笔的。你们自己判断吧。一方面，宣言说对共产国际完全忠顺，说宣言作者不但过去，不但现在，而且将来也不可动摇地忠于共产国际。如果这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当然很好。另一方面，宣言说，它的作者不能承担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责任。那里直言不讳地说：

“有一些极有分量的理由使我们不能接受公开信的新草案，不能在党员群众面前承担执行这封信的责任，不能赞同这个新草案一经通过必然会给我们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消除的危害。”

请看，一方面是完全忠顺，另一方面又拒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把这一切叫做忠于共产国际！这确实是讼棍伎俩！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不是虚有其表而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会嘴上说对共产国际忠顺，同时又不肯承担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责任吗？亲爱的同志们，这叫什么忠顺呢？要是这样，还有什么叫做不忠顺呢？为什么需要这种虚伪，这种假仁假义呢？洛夫斯顿同志需要空喊对共产国际忠顺和忠诚，是为了欺骗“党员群众”，这不是很清楚吗？

这不由得叫人想起难忘的张伯伦来。张伯伦一方面拥护和平，拥护裁减军备，而另一方面采取一切措施来扩充军备，开足马力进行战争准备。张伯伦需要高唱和平是为了掩护新战争的准备。洛夫斯顿同志需要空喊对共产国际忠顺和忠诚是为了掩护他同共产国际决议作斗争的准备。洛夫斯顿同志当然不是张伯伦。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地方。然而他的“手法”同张伯伦的“手法”却是相似的。这一事实应当足以使他警惕了。

但是宣言并不就此止步。它走得更远，还从防御转入进攻，竟然宣布必须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作斗争，说这些决议是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它公然说，决议草案即共产国际的公开信草案（这个草案在这里，在主席团得到了普遍的赞同，有一切根据说它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是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路线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宣言公然说，“草案对于我们党（即美国共产党）的工作及其领导的评价，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是同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路线和决议背道而驰的”。

我不想去说明，宣言的这些断语是对共产国际及其执行机关的卑鄙的不体面的污蔑。同样不值得去证明，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共产党

多数派目前的领导人一贯违反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就肃清美国共产党内派别活动问题通过的主要决定。库西宁同志在发言中充分证明了，美国共产党的两个派别，特别是多数派，从1925年起就一贯违反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关于肃清派别活动和恢复统一的主要决议。只要读一下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会确信：现在多数派的领导人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和文字不可救药的违反者。

至于说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决议中直截了当的指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束那种不以任何严肃的原则分歧为依据的派别斗争”。洛夫斯顿同志这一派在贯彻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方面做了什么呢？同志们，你们自己看得见，他们在这方面至今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变成一纸空文。

事实就是这样。

而宣言不顾这一切事实，还在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违反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精神和文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宣言的作者们想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同他们自己一贯违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对立起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是为了假惺惺地拿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旗帜作掩护，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进行斗争。宣言的作者们这样做，仿佛是在说：我们洛夫斯顿派拥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公开的草案却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相抵触，所以，我们应当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作斗争，而且要斗争下去。

宣言的作者们大概以为，他们用这种口是心非的“手法”搞出了什么新名堂，我们识不破他们这种“手法”的内在用意。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同志们。他们打错算盘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背离共产国际的同志们，恰恰都是从玩弄这种“手法”开始的。季诺维也夫背离共产国际，是从他把共产国际路线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

议对立起来开始的。托洛茨基也一样，他背离共产国际，也是从把共产国际路线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对立起来开始的。这是一条早就踩出来的机会主义老路，而且和世界一样古老。可悲的是，宣言的作者们正是向往走这条道路。

宣言的作者们把共产国际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立起来，他们的想法同过去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想法一样，是要把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共产国际分离开来。真是可笑的愚蠢的想法！宣言的作者们显然忘记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者仅仅是执委会及其主席团，而不是他们。如果宣言的作者们认为，他们的解释比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解释更能使美国工人相信，那他们就错了。

美国代表团宣言的实质就是这样。

可见，美国代表团的宣言是一个为了维护机会主义动摇、为了搞无原则的派别活动、为了破坏美国共产党的统一而同共产国际路线作斗争的纲领。

下面谈谈委员会的草案。

现在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注意的委员会草案是依据什么拟定的呢？依据的是在美国共产党的队伍里坚持共产国际路线的思想，使美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思想，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各种倾向、首先是右倾作斗争的思想，实现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的思想，最后是而且首要的是肃清任何派别活动的思想。因为，同志们，毕竟应当承认，派别活动是美国共产党的主要祸害。

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往往不得不进行派别斗争来反对机会主义。这是过去的事情，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处在一个共同的党内，布尔什维克必须组成为派别，以便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共产党。那时派别活动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现在呢？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局势根本变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固若磐石的共产党，即共产国际

的各个支部。现在派别活动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它削弱共产主义，削弱共产主义对改良主义的攻击力，破坏共产主义反对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显然，我们的美国同志不懂得过去和现在的这个根本差别。

派别活动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有哪些危害呢？

首先，派别活动使党性感淡漠，使革命嗅觉迟钝，把党的活动家弄得晕头转向，以致他们醉心于派别活动而不得不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共产国际的利益之上，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派别活动常常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那些被派别斗争弄得晕头转向的党的活动家评价党的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一切条件，常常不是着眼于党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着眼于本派小天地的利益。

难道洛夫斯顿及其同伴们不知道，为了不损害自己的革命者声誉，应当同佩帕尔保持距离，应当同他划清界限吗？为什么他们无视共产国际的一再警告，没有及时同他划清界限呢？因为他们首先是作为派别分子行动的。因为对派别斗争来说，每一块木片、每一根绳子、每一个哪怕是不好的士兵、每一个哪怕是不好的军官都是宝贵的。因为对派别斗争来说，甚至像佩帕尔那样的人也可以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被派别活动弄得晕头转向，不能不把本派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难道福斯特同志不知道应当同他那一派中的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距离吗？为什么他无视一再的警告，没有及时地同他们划清界限呢？因为它采取的首先是派别分子的那种态度。因为为了对洛夫斯顿派进行派别斗争，连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他也可以是有用的。因为派性的蒙蔽使人们的党性感迟钝，使他们变得不择手段。诚然，这种政策是有害的，是同党的利益不相容的。但是派别分子常常容易忘记党的利益，——他们只看到自己那个派别的小天地。

第二，派别活动妨碍对党进行原则性政策的教育，妨碍对干部进行坚持无产阶级光明正大的革命精神、不搞腐朽的外交手腕和无原则

阴谋诡计的教育。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相反，派性认为，派别的外交手腕和无原则的派别阴谋诡计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派别斗争的气氛培养出来的不是有原则的政治家，而是狡猾的派别生意人、老练的骗子手和孟什维克；他们善于欺骗“对手”而又不留痕迹。诚然，派别分子的这种“教育”工作是同党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但是派别分子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只承认自己的派别外交阴谋及其肮脏的利益。因此无怪乎有原则的政治家和诚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得不到派别分子的赞许。而那些派别的机灵鬼和生意人、无原则的阴谋分子和组织无原则联盟的幕后活动能手却受到他们很大的尊敬。

第三，派别活动削弱党争取统一的意志，破坏党的铁的纪律，从而在党内造成一种特殊的派别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的全部内部生活对阶级敌人无秘密可言，党自身也面临着沦为资产阶级密探手中的玩物的危险。这种情形通常是这样发生的。譬如说，中央政治局在解决某个问题。政治局里有少数派和多数派，它们各自用自己一派的观点看待每项决议。如果派性制度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那么两派的生意人就会立刻把政治局的某项决定通报自己的基层组织，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训练它们，并且相应地对它们进行思想灌输。这种通报办法通常是形成制度、反复采用的。它所以形成制度、反复采用，是因为每一派都认为有责任按自己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基层组织，使它们保持动员状态，做好同派别对手厮打的准备。结果，党的重要的秘密决定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话资料。而街上的人们又同周围的人关系密切，所以资产阶级的密探就能打听到党的秘密决定，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党内生活的材料来反对党的利益。诚然，这种制度使党的队伍有完全涣散的危险。但是派别分子不管这些，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派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最后，派别活动的危害在于，派别活动彻底破坏党的任何必要的

工作，使党的工作人员无意去研究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工资、工作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等等），削弱党训练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搏斗的工作，从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党的威信在工人心目中必然下降；工人不是整队整队地去加入党，而是不能不离开党的队伍。现在在美国共产党党内看到的正是这种现象。最近一个时期，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派别领导人主要干些什么呢？是闹无谓的派别纠纷，忙于派别的种种小事，制定毫无意义的大大小小的政纲，为这些政纲草拟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修正案。用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抓派别对手的把柄，揭发他，从派别对手的私生活里捞到某种东西，如果捞不到，那就编造某种谣言。显然，在这种气氛中，必要的工作必定受损失，党的生活必定庸俗化，党的威信必定下降，那些要求搞实际工作、不闹无畏纠纷的优秀的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必定离开党。

以上就是在共产党队伍中派别活动危害的主要表现。

因此，美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肃清派别活动，使自己最终摆脱这种病症。

提请你们注意的委员会草案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这里简单谈谈洛夫斯顿同志这一派自吹自擂的作风，他们扬言自己的讲话和发言代表全党，代表美国共产党的百分之九十九。他们发言都是代表党的百分之九十九。可以想见，这百分之九十九都装在他们的口袋里。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这种作风是不好的。我提醒你们，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一度也曾拿百分数夸耀，他们要大家相信，他们争取到了或者至少能争取到联共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数，同志们，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种自吹自擂落得个怎样可笑的下场。所以我可不劝你们拿百分数来夸耀。你们断言，你们在美国共产党党内拥有可靠的多数，这个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你们。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这样说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你们拥有多数，

是因为美国共产党至今把你们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朋友，你们才在美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拥有多数。但如果美国工人知道你们企图破坏共产国际队伍的统—，并打算同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进行斗争，事情又将会怎样呢，——问题就在这里，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否认为，美国工人会追随你们反对共产国际，会把你们的派别集团的利益放在共产国际利益之上呢？共产国际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情形：一些最有名望的、比你们威信更高的领导人，一旦举起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就成了孤家寡人。你们是否认为，你们的运气会比这些领导人好呢？同志们，这是一种糟糕的想法！现在你们还有形式上的多数。但是，如果你们试图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进行斗争，明天就不会有任何多数，就会完全被孤立。这一点你们是可以确信的，亲爱的同志们。

有人说洛夫斯顿同志是有才能的领导人，是美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据说，美国共产党没有洛夫斯顿同志不行，撤掉洛夫斯顿同志会毁灭党。同志们，这话不对。而且这不是真心话。一个党如果没有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就不行，这个党就糟了。美国共产党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弱。它至少比有些人所形容的要强得多。党是由工人阶级建立的，不是由个别领导人建立的。要是倒过来说，那就可笑了。何况洛夫斯顿同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领导人。他当然是一个有才干的同志。但他的才干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用到派别纠纷、派别阴谋上去了。洛夫斯顿同志无疑是一位机灵的有才能的派别生意人。不能否认他是这样的人。但是不能把派别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混为一谈。党的领导人是一回事，派别领导人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任何派别领导人都能充当党的领导人。洛夫斯顿同志在现阶段能否成为党的领导人，我是很怀疑的。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会问，出路何在。我看出路就在于通过委员会的草案，抛弃美国代表团的宣言，并且责成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无保留地执行主席

团的决议。要么美国同志们不动摇地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贯彻，——这将是走向消灭派别活动和达到党内和平的重要一步。要么他们坚持自己的宣言，拒绝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但这将意味着不是和平，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美国共产党队伍内的战争。我们建议和平和统一。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接受我们的建议，那很好；他们不接受，对他们会更坏。共产国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占上风的。这一点你们可以确信，亲爱的同志们。

最后，简单谈谈当前发生的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新过程。

洛夫斯顿同志在几天前同我谈话时说，他不知怎么地脱口而出，讲过共产国际机关患了“癌瘤”这样的话。他断言，这话是偶然说的，同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回答他说，如果他这句话真是偶然脱口而出说的，那就不值得注意，虽然这句话不言而喻是绝对不正确的、错误的。然而在这以后不久，我读到了洛夫斯顿同志在美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在那里也讲到了“癌瘤”，但说的不是共产国际的机关，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可见，在洛夫斯顿同志那里“癌瘤”这句话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应当认为，对于世界资本主义来说，“癌瘤”的意思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世界资本主义的瓦解过程。那么，洛夫斯顿同志说的共产国际机关患“癌瘤”，意思应当是什么呢？看来是指共产国际机关也有同样的危机和瓦解。这句话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是哪些情况迫使洛夫斯顿同志要说共产国际机关患了“癌瘤”或陷入危机呢？大概也就是迫使联共队伍中的右倾分子说共产国际陷入危机和瓦解的那些情况。右倾分子谈到共产国际的瓦解时，往往举出这样的事实，如右派被驱逐出德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内的右派被粉碎、法国共产党党内的右派被孤立、美国共产党党内正在为孤立不可救药的派别分子而斗争，如此等等。也许这些事实真是共产国际身患重病的征候，是共产国际瓦解的

征候，是共产国际患了“癌瘤”的征候吧？当然不是，同志们。只有党内庸人才会这样想。实际上，这是从共产国际各支部清除右派和调和派的有益过程，是从共产国际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和动摇分子的有益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巩固是靠清洗掉自身的秽物而实现的。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其意义就是这样。党内的庸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国际瓦解的症候，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以外的任何东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知道，这是我们兄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有益过程，没有这种有益过程就不能训练党和无产阶级从事未来的阶级搏斗。

许多人认为，国际局势近来没有任何变化，一切照旧。这是不对的，同志们。实际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都在激化，欧洲革命危机在增长，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在成熟。昨天，洛兹的总罢工给了我们这种信号。不久前我们在柏林也看到了信号。明天，在法国，在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美国，在印度，在中国，都会发出新的信号。世界资本主义脚下的土地很快就会燃烧起来。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未来的阶级搏斗立即着手进行并开展群众性的准备工作，使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众做好新的革命战斗的准备。要加强同改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要加强把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斗争。要更加努力，争取锻炼出党的真正革命的干部，挑选出党的真正革命的领袖；这些人应当能够进行战斗并带领无产阶级前进，在风暴面前不胆怯，不惊惶失措，而是迎着风暴前进。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一分钟也不耽搁（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立即着手清除共产党内的右派和调和分子，因为他们客观上是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队伍中的代理人。做这件事还不能用平常的速度，而必须加速进行，因为，我再说一遍，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不能让事变把我们弄得措手不及。要是在两年前，还可以不必急急忙忙做这件事，可以指望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分子运动过程会逐渐抛开右派和动摇

分子、所有这些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形形色色的派别生意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当时也许可以不必着急，因为不致于有迟误的危险，现在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慢慢来就意味着迟误，而迟误就意味着在未来的革命危机面前措手不及。因此，现在发生的清除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的过程，乃是巩固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有益过程。庸人们害怕这个有益的过程，惊惶失措地乱谈共产国际的瓦解，就因为他们是庸人。反之，革命家永远会欢迎这个有益的过程，因为它同时也是训练工人阶级参加未来阶级搏斗这一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业正是现在全世界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委员会草案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可以使美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完成这一基本任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
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

(之三)

(1929年5月14日)

同志们，我觉得某些美国代表没有认清现在我们这里形成的形势，即主席团通过委员会草案以后的形势。同志们看来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在决议未通过前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一回事，在决议通过以后服从共产国际的意志则是另一回事。既然代表团成员认为委员会草案不正确，那可以而且需要对它进行批评，进行斗争。但现在委员会的草案已经成为主席团的决议，美国代表们就应当有勇气服从集体的意志，即共产国际的意志，并且承担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责任。

必须善于珍视十位美国代表中的八位同志在反对委员会草案方面表现出来的刚毅和顽强。但是，这八位同志在他们的观点在这里遭到完全失败以后，却拒绝以自己的意志服从最高集体的意志，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意志，这样则是不能赞同的。真正的勇敢不在于把自己个人的意志置于集体意志之上，置于共产国际意志之上。真正的勇敢在于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克制自己，抑制自己，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服从党的最高一级的意志。否则就没有集体。否则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集体领导。

我想你们不会否认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坚强和坚持自己信念的本领吧。某一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时候通常是怎样做的呢？因为不愿破坏党的铁的纪律，少数通常服从多数的意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几十次、几百次这样的事例：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虽然确信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了不正确的决定，但在讨论以后，在

激烈的争论以后，在捍卫了自己的信念以后，仍然宣布自己完全愿意服从最高领导集体的决定并加以贯彻执行。我暂且就举 1907 年事件这样一个事实来说吧，当时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杜马，而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则主张转变政策，参加杜马，于是少数无条件地服从了多数的意志。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不善于以个别同志的意志服从多数的意志，不善于集体地行动，那他们就会葬送俄国革命的事业。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我们这些推翻了资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今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善于集体地行动，甘愿以个别同志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因为，没有这种勇敢，不善于克制可能是自己的一种自尊心，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没有这些品质，那就没有集体，没有集体领导，没有共产主义。这样说不仅对于个别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这样说对于联合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者政党的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关是尤其正确的。

吉特劳和洛夫斯顿同志在这里非常自负地宣称，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信念不容许他们服从和执行主席团的决定。弗洛尔同志在这里也这样说。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他们不同意主席团的决定，那么他们就不能够服从和执行这个决定。但是说这种话的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列宁主义者，因为列宁主义者有义务把集体的意志置于自己个人的意志之上。他们说到自己的良心和信念。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也是有自己的良心和信念的。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良心和信念同美国代表团某些成员的良心和信念发生冲突，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美国代表团的宣言在主席团只有一票赞成，即只有吉特劳同志的一票赞成，而主席团其余成员一致反对美国代表团的宣言，而赞成委员会的草案，那该怎么办呢？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你们是否认为，吉特劳同志的良心和信念高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绝大多数人的良心和信念呢？你们是否开始懂得，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而不考虑集体的意志，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决定、任何集体意志、任何领导？

随便拿一个工厂来说。假定说，该厂多数工人表示要罢工，而少数工人借口自己的信念，反对罢工。两种意见开始交锋，召开了群众大会，最后工厂的绝大多数人决定罢工。如果只占工厂少数的一二十个工人声称他们不同意多数工人的决定，因此不能服从这个决定，你们该怎么说他们呢？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该怎么称呼他们呢？你们知道，这样的工人通常被叫做工贼。如果少数不服从多数，那么罢工、游行示威和其他群众集体行动就根本无法进行，这还不清楚吗？如果个别人乃至少数人不服从多数的意志，最高集体的意志，那么我们不论在各个党里或共产国际里都永远不会有任何决定和任何集体意志，这还不清楚吗？事情就是这样摆着的，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

最后，简单谈谈由于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美国共产党的命运将会如何的问题。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把事情说得过于悲惨了；他们断言，委员会的草案通过以后，美国共产党或者会灭亡，或者至少会跌到深渊的边缘。同志们，这话是不对的。而且，这简直是可笑的。美国共产党活着，而且和美国代表团同志们的预言相反，还会活下去。不但如此，只要美国共产党从自己队伍中排除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它还会成长和兴旺起来。主席团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正在于，它可以使美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地肃清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建立党内的统一，最终走上群众性政治工作的康庄大道。不，同志们，美国共产党不会灭亡。它会活下去并且会兴旺起来，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战心惊。要灭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如果它继续顽固下去，如果它继续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意志，如果它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的话。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的命运和美国共产党的命运等同起来。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可能在政治上灭亡，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美国共产党必定灭亡。既然这个小小的派别集团注定要灭

亡，那就随它去，让它灭亡吧，——只要美国共产党能健壮和发展起来就好。亲爱的美国代表团同志们，你们对事情的看法太悲观了。我对事情的看法比较乐观。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0辑
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关于西班牙

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退出政府

(1938年2月17日)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1) 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退出政府。他们有两个次要职位。

他们如果退出政府，佛朗哥阵营会进一步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善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处境。

退出不应该是示威性的，不要被看做是对政府不满，而是为了使政府更容易执行任务。

理由是因为工团主义者不参加政府，共产党人认为参加是不适宜的。

(2) 支持政府，但是不参加政府——这必须是我们当前阶段的立场，在法国也是这样。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64页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有的

(1939年4月7日)

1939年4月7日

去克里姆林宫（何塞·狄亚斯，马奴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翻译基里洛娃）。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

关于通过法国同志转交西班牙党的珍贵文物问题。

直接由西共中央根据清单、交接书等转交。

斯大林：西班牙人勇敢，但是漫不经心。马德里好像在共产党人手中，可忽然别人夺取了政权，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看来，共产党人好像是溜掉了，留下了群众自己，没人领导。

任务并不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一定要打。如果形势无法控制，党可以宣布它认为可以更换一个对当前形势更适合的政府，可以考虑停止战争。但是党有责任把这点向群众说清楚！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有的！

会有失败的。列宁在1915年说过，敌人把我们打败了。不是一定要进攻不可，但是党有责任告诉群众做什么，而不是退到一边，让群众无所适从。

党有责任向群众解释政府为什么不战而退。对马德里军事独裁政权要采取正确的立场。最大的缺点是米亚哈等人从前就是暗藏的阴谋家并作为阴谋家行事。

当战斗不在加泰洛尼亚进行的时候，他们在马德里站稳了脚跟。

马德里变了天！

共产党人忽视了这一点。

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很好地表现了应该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并积累了重要经验。

他们没能很好地表现出应该怎样交出政权，怎样退却。必须召开西班牙共产党人会议，弄清所有这些问题，以便其他党也能吸取教训。

也必须从反面经验吸取教训。

关于陶里亚蒂在信中解释说他们未能推翻军事独裁政权是因为未能开辟战线，斯大林叙述了1918年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的一段往事：当我们被团团包围时，反革命分子发动了暴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向每个团里要了70名战士，把暴动镇压了下去。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91-92页

关于法国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1944年3月5日(星期日)

爱尔科利来。告知他同斯大林的谈话：

.....

委托爱尔科利向法国同志(马尔蒂、居约等)口头转达下述指示：

“我的建议：

(1) 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中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时，不要在次要问题和形式问题的争论之中，在类似那种只能激化同戴高乐关系(例如吉罗的候选等)的鼓动政策的冲突之中，纠缠于细小问题，而要把战争的基本问题置于中心地位；

建立法国军队及其积极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战斗行动；

从国家和军事机构中清洗贝当—赖伐尔的爪牙；

对武装的、战斗在法国的游击小组给予援助。

(2) 有关法国未来宪法的辩论完全是操之过急的和不必要的。在需要用一切手段去彻底消灭希特勒军队的条件下，这样的辩论会偏离方向而转向抽象的宣传活动。不能允许党像流亡者那样滑向愚蠢的议会争论道路，用想入非非的宪法议论替代粉碎希特勒德国的斗争。

(3) 党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表现为能代表民族意愿的民族领导力量，应表现为有从事国务活动能力的党，它不只善于言之有据地说服思想一致的人，而且同样能说服更广泛的阶层，也包括动摇的人士和集团。

(4) 同时党对有些人不能做任何让步，因为这些人企图扭转法

国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政策，使之朝向业已过时的、相当反动的老方针的方向发展，从而是在为贝当—赖伐尔服务。

(5) 党不要为维护苏联而表现出多余的热心，以免敌人借机把党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相反，要把法国和苏联的真挚友谊作为法国外交政策和法国人民复兴的基础而加以普及和维护。

(6) 对马尔蒂的意见，他应在活动中更策略些。

(7) 党要为争取多列士回到阿尔及利亚而努力。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280—282页

实行适合法国形式的“左派联盟”路线

(1944年11月19日)

1944年11月19日

晚间多列士来（斯大林接见之后，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曾出席）。

多列士汇报了谈话情况。他强调，总体上一切都同我就法国工作所谈内容相符。

斯大林建议：

- (1) 实行适合法国形式的“左派联盟”路线；
- (2) 耐心地从社会党人、激进党人等中间寻找同盟者；
- (3) 宣布主张复兴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和工业的法国并主张实行民主制（同盟国想要的是软弱的法国以及软弱的意大利）；
- (4) 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和不要认为党自己能成功地完成法国人民面临的任务；
- (5) 不要把自己孤立于其他民主集团和群众之外；
- (6) 对戴高乐政府不要鲁莽行事，要实行诚挚善意的政策；
- (7) 不要坚持保留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需要有统一的军队，但要尽力做到在军队中有自己的人 and 阵地；
- (8) 不是一定要恢复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是建立共同的人民青年爱国联盟等。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315页

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 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4年11月19日)

绝密

参加谈话的有莫洛托夫同志和贝利亚同志。

相互问候以后，斯大林同志问道，多列士^①同志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去法国？

多列士同志回答说，他想明天同妻子及法共中央委员拉梅一起从莫斯科起飞。

斯大林同志问道，多列士同志乘坐什么飞机？

多列士同志回答说，他乘苏联飞机到德黑兰，然后改乘英国飞机，如果能办成，那就乘法国飞机。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可以安排多列士乘苏联飞机直接飞到巴黎。只要英国人不制造什么麻烦……

莫洛托夫同志说，可以安排多列士同志乘我们的飞机直飞巴黎。

斯大林同志问道，多列士同志有什么问题？

多列士同志回答说，对法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度过现在这个困难时期，现在共产党人不是法国的主人，他们在法国有敌人也有朋友。怎样才能聚集力量，而不让反动派集聚他们的力量。

① 多列士，莫里斯（1900-1964），1930-196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斯大林同志问，皮多尔是什么人。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皮多尔战前靠拢人民民主党，是天主教徒。战前他曾出版一种天主教会的反对派报纸《黎明报》。

斯大林同志问，这份报纸是反对谁的？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这份报纸反对天主教会的官方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皮多尔战前立场接近法国共产党人。他主张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反对慕尼黑协定，反对德国。但是，战争爆发以后，他同许多先前与共产党人接近的人们一样，比共产党人的其他敌人更加狂热地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爆发后，他被动员入伍，被德军俘虏，后来获得释放。

斯大林同志问，皮多尔是被德国人释放的，还是他逃出来的。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皮多尔是被德国人释放的，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德国人把这样的人都从俘虏营里放了出来。不过，德国人也不是对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都实行这项规定。

斯大林同志对于前战俘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表示惊奇。

多烈士同志说，政府中也有其他被德军俘虏过的人。儒安将军就是。他曾被德国人俘虏，后获释，被维希政府派往非洲取代德国人不完全信任的魏刚担任法军司令官。不久前死去的前财政部长勒佩克也被德军俘过。

斯大林同志问道，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关系怎样？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人成功地把相信社会党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但是，社会党领导层不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不久前，法国社会党书记在谈党代表大会上说，社会党人主张同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但事实上社会党人拒绝团结合作。社会党人宣称，在法国一切都好，一切人都好，但除去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对德战争爆发时采取的立场还需要人们有所谅解。社会党领导机关指出，共产党人在战争爆发时不支持保卫祖国，直到1941年以后才成为对德国人作战的英雄。

斯大林同志说，社会党人可能受到要求他们孤立共产党人的压力。完全有可能是戴高乐在采取措施孤立共产党。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最好是使党拥有同盟者。党应当仔细审视，在激进派中，包括在某些可能尚未形成组织的激进派别中，寻找盟友。也要在社会党人中寻找盟友。应当力求建立起反对反动派的联盟。最好也能把社会党人吸收进这个联盟。也许还能够找到某些能在这个联盟中加以利用的人。应当在共产党周围集聚一定的力量，以便进行防守，而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也可以用于发起进攻。共产党人不应当在社会党人中搜寻：谁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反对苏联的话。我们很熟悉社会党人。社会党人是资产阶级的左翼。现在对我们而言，主要的是建立左翼联盟。共产党，不论它有多么强大，不应当成为反对反动派的惟一的力量。不应当让共产党陷于孤立。党的迫切任务是同工会、同青年建立密切的联系。青年不应称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应当考虑到，有一些人看到旗帜十分害怕。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

共产党人——斯大林同志继续说道，——还没有强大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足以只身去承担同反动派斗争的重担。斯大林同志说，他希望党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它受到敌人的挑唆，它将被置于死地。必须逐渐地、坚韧不拔地建立左翼联盟。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成就，反动派就会谨慎些了。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应当懂得，即使戴高乐自己并不想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党人，那么也会有人推动他采取这种步骤。想在法国建立反动政府（正如他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到处这样做一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会推动他这样做。因此，党应当拥有盟友，哪怕一开始只有弱小的盟友。如果社会党领导人在报告中说，社会党主张同共产党团结合作，那么就要回答说：“那好啊！”也要吸收其他政治集团参加筹建中的左翼联盟。必须在工会中拥有盟友，必须建立类似联盟一类的

东西。

斯大林同志问，抵抗组织有没有某种武装力量？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有武装的爱国民兵，它们是法国被占期间的主要抵抗力量。目前，这些民兵队伍保留着自己的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他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感到共产党人还不理解，法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在形势已经不同的情况下仍然理直气壮地继续执行原先的路线。当需要建立联盟和在社会党人中寻求盟友时，他们却想把所有的社会党人坏蛋全都赶去见鬼。共产党人力图保留民兵。这不行。政府已经建立，并为英国、苏联、美国和其他大国所承认，而共产党人却仍按照惯性行动。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以前不同了，它给了戴高乐以机会，形势变化了，就应当作出转变。共产党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给予政府迎头一击的程度。它必须聚集力量，并寻求盟友。需要采取措施，使共产党人在反动派发起进攻时能够拥有坚固可靠的防御阵地，并能够说：反动派不是在向共产党人进攻，而是向人民进攻。一旦形势好转，党就可以利用团结在党周围的力量发起进攻。

政治组织需要有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应当包括：恢复工业、向失业者提供工作、维护民主、惩处扼杀民主的人。

斯大林同志问道，法国抵抗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这个组织的名称是“抵抗运动”。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应当另外起一个名称。或者把这个组织称作“恢复阵线”。从前谈的是解放国家，而现在说的则是复兴国家。如果在这面旗帜下能把左翼力量、工人、知识界、文化界团结起来，那就很好。

多烈士同志说，最好也吸收农民参加这个运动。

斯大林同志说，他忘了说农民。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这个运动中来。他们之中会有合适的人。必须使共产党变得强大起来，使它周围有盟友存在。敌人想孤立共产党。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

接着斯大林同志说，不一定要把这个联盟称作“阵线”。这样的称呼会使资产阶级联想起“人民阵线”。应当考虑一个别的什么名称。也许可以这样叫：“巩固法兰西民主运动”。如果说“争取民主斗争运动”，那么人们会回答说，法国已经有民主了，有了共和国，等等。也许最好叫做：“恢复强大法国和加强民主运动”。这个名称当然长了一些，不过法国共产党人自己会想到更好的名称。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他只是提出一种想法，而法国共产党人会找到实现这种想法的具体形式。

这一运动的纲领，——斯大林同志说，——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纲领应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表述。

斯大林同志说，他说了他想要讲的意见，并问多烈士同志对这些意见有无问题。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他没有问题。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戴高乐想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他在一次发言中说，法国人想在战争结束以前试一试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戴高乐想显示一下，高卢人是什么样的。他不怕要去面对德国占领作战阵地。同时，戴高乐还向我们的人抱怨说，他想获得武器装备军队，但

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要向他提供武器。

斯大林同志问道，戴高乐有多少个师？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戴高乐拥有5个装备美式武器的法国师。此外，还有一些没有重型武器装备的游击队。他们只拥有枪支。这些游击队封锁着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西海岸的港口。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曾谈到莱茵区和萨尔的未来问题。丘吉尔主张肢解德国。他建议把德国，除并入波兰的东普鲁士以外，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普鲁士；其次是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并包括德国南方的两个省——巴登和符腾堡；再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区，这两块地方应当成为在国际监督之下的单独地区。建立这个区的想法是为了不使德国有可能利用铁和煤。马西格利^①似乎同意这个计划。他曾经表示主张把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分离出去，并对它们建立国际监督。

斯大林同志说，他目前并不劝共产党人提出兼并莱茵区和萨尔的要求。情况还不清楚。应当了解法国人民对这样的要求持什么态度。目前最好还是先不提兼并口号。如果情况改变，而且已经搞清楚，社会舆论、知识界、人民支持这样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大林同志说，他担心这样共产党人会和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纠缠在一起。将来人们会对共产党人说：“看你们和什么人在一起！”最好先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先等一个月，或许两个月。应当收集信息，摸清情况。

斯大林同志指出，戴高乐在讲话中主张兼并德国的领土，而皮多尔却反对这种兼并。这是怎么回事？能否设想，同是一个政府，却实施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

斯大林同志问，皮多尔对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持什么态度？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皮多尔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看做是法国领土的

^① 马西格利，1944年6-9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一部分。皮多尔提到法国拒绝兼并，是说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就是法国的领土。

多列士同志说，按照他的意见，皮多尔反对兼并德国的领土，其目的在于反对把现在德国部分领土划归波兰。法国的反动分子想把波兰尽可能地朝苏联内地推移，因而不愿波兰西移。法国的反动分子和英国的反动分子一样，也希望波兰能够成为反苏的工具。

斯大林同志说，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都这么想，但是他们办不到。波兰人想得到德国的富裕和发达的地区，他们失去的仅仅是平斯克沼泽地。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的军工厂是否仍在生产？

多列士同志回答说，大部分工厂都停产了。人们一般认为，原因在于原料不足和交通瘫痪等。在工人自行开工的地方，中央政府机关则进行干预，阻止其生产。这样，法国工业停顿，存在着大量失业工人。

斯大林同志说，重建法国的大规模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工业企业首先是军工企业开工生产。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工业遭受战争的破坏比法国工业更为严重，但是我们很快就使德军占领区的工业恢复了生产。桥梁、铁路以及其他一些项目也在恢复。

多列士同志说，各地的工人都希望恢复工业，但是问题一提到中央政权机关那里，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多列士同志说，这是消极怠工。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他说，这是消极怠工，他还说，应当为恢复法国工业而斗争。

多列士同志指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想恢复法国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希望只在他们那里有工业存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买他们的货物。因此，他们的空军如此凶猛地轰炸德国的工业企业。英国人和美国人想尽可能破坏德国的工业，使德国缴不出战争赔偿。斯大林同志问道，如果戴高

乐要求苏联供应武器，怎么办？要给他武器吗？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一切取决于将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很难对武器供应事先提出如此明确的条件。**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向法国人提供武器。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丘吉尔在一次声明中答应向法国人提供武器，但在后来的一次声明中则说，由于迄今为止法国人得到的只是美国武器，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使提供的武器规格统一。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军队有没有同德军作战的明确战场？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他们在正对贝尔福的战线南端有一个地段。

斯大林同志问，戴高乐的5个法国师是由法国人编成的还是由殖民地军队组成的？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在这几个师里，多数是殖民地军队。

斯大林同志说，老的法国指挥官力图保留十分服从上级的殖民地军队。应当努力使法国军队中有尽可能多的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中有许多好小伙子，但毕竟不是法国人。**斯大林**同志说，还要努力使法国军队在前线有自己的战场，而这个战场的军队由法国人指挥。

多烈士同志说，按照他的意见，法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同意这个意见。法国共产党人不必害怕建立庞大的军队。他们应当在军队里有自己的人。

斯大林同志说，在苏德战场上有一个法国的“诺曼底”飞行大队参加作战。我们的人对这个大队的飞行员非常赞赏，说法国飞行员打仗很好。其中有真正的王牌飞行员。多烈士和这些飞行员是否熟悉？

多烈士同志回答说，他认识一些，但不是全部。他说，这些飞行员中有反动分子，有大贵族家庭的代表人物。他们总是冷眼旁观，人们对他们也抱有某些疑虑。不过前不久大队飞行人员获得奖赏时，这些飞行员也获得了勋章。这给大队的所有飞行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是最近佩蒂将军告诉多烈士的。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并不是随便颁发勋章的，我们奖励的是那些在同德国人打仗中表现出色的人。我们想给法国飞行员中的某些人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斯大林同志说，可能戴高乐来苏联时会请求把“诺曼底”飞行大队调往法国。那时是否要同意飞行员们把他们的武器装备——飞机——带走呢？

多列士同志说，这是好事。他还补充说，法国飞行员以他们能使用这样优秀的歼击机作战而非常自豪。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飞机确实是不错的。他还补充说，让飞行员在离开苏联时解除武装是不妥当的。恐怕要让他们带着飞机走。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对他和在座的同志还有没有问题？

多列士同志回答说，他没有别的问题了。

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预祝多列士成功，并请他向杜克洛、马蒂等法国同志转达问候。

多列士在同斯大林同志告别时说，他保证忠于我们的事业和斯大林同志，并感谢这次接见。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同志之间不必言谢。

多列士同志说，他还是要感谢斯大林同志，而且永远需要他的忠告。

会谈持续 1 小时又 45 分钟。

波采罗布记录

与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

(1947年11月18日)

绝密

在场的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和叶罗费耶夫（翻译）同志。

多列士说，他首先代表法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法共中央向斯大林同志致以敬意和感谢。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问，多列士不会是因为法国共产党人在华沙挨了骂而谢他吧。

多列士答说，法国共产党只会对给它指出缺点表示感谢。多列士说，他就几个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谈谈并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和建议。

多列士说，九国共产党会议作出的局势分析在法国完全得到了证实。例如，在国内，美国人的干涉增多了，经济困难加深了，阶级斗争激化了。法国共产党遵照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指示进行保卫国家独立的斗争，和反动势力的联盟孤军作战。在最后一次市政选举中法国共产党保持了原来的票数甚至略有增加。目前戴高乐把法国最极端反动分子网罗到自己身边。这损害了社会党人特别是人民共和党，它们在选举中丢了很多票。

斯大林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党就是皮杜尔^①的党。

多列士对此作了肯定，并说人民共和党在市政选举中失去了 3/4 的票。

斯大林同志说，人民共和党就像一个中转站。人们先加入它，再

① 皮杜尔，人民共和党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

投向戴高乐。

多列士称，社会党人、人民共和党和戴高乐派尽管在一些内政问题上存有一定的分歧，但在为美国人效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沆瀣一气。法国的社会党领导人把对美国人的奴颜媚骨和对共产党的仇恨及对苏联的敌视结合在一起。法共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采取的路线，坚决加强了对社会党领导人和拉马迪埃^①政府的批评。法国共产党向群众指出，社会党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正和最反动的集团结盟并公然进行挑衅。最新的证据就是博列加尔^②事件。法国共产党人尽管表示完全拥护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定，但他们之中仍有某些动摇。比如，有一些同志对社会党人的叫嚷和拉斯基的声明反应不正常。拉斯基在最近一次演说中斷言列宁曾支持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说法不对，列宁从来没有支持过克伦斯基。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揭露了拉斯基的这些言论并指出，列宁发动工人阶级去和科尔尼洛夫作斗争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克伦斯基。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说法是对的。

多列士称，他想知道斯大林同志对以下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法国出现了以介于共产党人和戴高乐派之间的第三势力自居的集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他们。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各派势力看来将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组合和分化。共产党人无疑会壮大，但戴高乐派也会壮大起来。然而想在和平与战争、共产党人与戴高乐派之间骑墙的人都将声誉扫地。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和平或者战争的问题。必须在和平拥护者与战争拥护者之

①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47年任政府首脑。

② 指1947年11月14日法国宪兵袭击博列加尔苏联遣返人员营地事件。

间作出选择。不能犹豫不决。斯大林同志问，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谁。

多列士回答说，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莱昂·勃鲁姆。

斯大林同志问，社会党有无左翼。

多列士回答说，社会党有左翼，是居伊·摩勒领导的。社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摩勒一直做出比拉马迪埃和勃鲁姆左的样子。但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就能看出摩勒对美国奉承巴结，对苏联却十分敌视。因此，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摩勒和勃鲁姆意气相投。多列士说，摩勒和勃鲁姆之间并没有像南尼和萨拉盖特那样大的区别。法国共产党对社会党右派和假左派都加强了火力。法国的社会党内当然也有一些反对派集团，但它们力量都很小。左派社会党人出版了一份《自由射手报》，这家报纸在内政问题上，如工资、罢工和工人要求等问题上竭力要表现得比共产党还左。另一方面，这家报纸却为马歇尔计划唱颂歌。《自由射手报》还因“大西洋宪章”谈到保护各国主权的必要性而对它进行谴责。按社会党人的看法，这个要求既过时又反动。

斯大林同志说，他觉得，法国社会党人如同英国工党分子一样都在自己党内亲自培植左翼。名声最大的左翼领导人都是右派的代理人，诸如法国的勃鲁姆等和英国的贝文等这类领导人，都清楚在其党内将自下而上形成一个真正的反对派。为了不让这些反对派分子投向共产党人，为他们建立了左派领导。“左派”们为了满足自下而上的反对派的要求，大肆蛊惑人心，右派则把持党的领导权并引导党按其路线发展。他们就是用这样奸诈险恶的方式蒙骗人民，目的在于把反对派留在党内，不让他们投向共产党人。反对派里当然也有一些襟怀坦白的好人，但反对派不是由他们领导的。领导反对派的是齐利亚库斯之流。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齐利亚库斯本人就承认过他是英国国家情报局的老雇员。

斯大林同志说，反对派中有正派人，要谋求同他们接近。法国和

英国的共产党人应该向左派社会党人的上层发起进攻并争取社会党基层党员。斯大林同志指出，在苏联托洛茨基也从左面攻击过党，而他本人却要求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提供租让。

多列士说，法共中央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定精神明确了自己的策略。法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和领导抵抗运动的经验，它争取社会党的普通党员。因此法共中央决定在各个工厂成立保卫法国独立同盟。根据共产党的建议，这项工作由总工会负责。共产党在最近一次总工会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反对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的多数派。这一多数派是在弗拉商^①领导下并得到赛扬的支持而形成的。若奥是少数派。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能相信赛扬。

多列士回答说，当然不能过分信任赛扬，但这一回赛扬第一次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表现得立场鲜明。法国的反动分子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都对总工会的这次会议寄予过很大希望，以为会上会如他们所料发生分裂。然而他们的指望落空了，这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大胜利。

斯大林同志说，若奥摘掉了假面具。

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虽然只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但也想在农村建立保卫国家独立同盟。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不错。

多列士介绍说，今年12月法国各农村地区要举行20个代表会议，会议将把农民感兴趣的问题同反对马歇尔计划、争取法国独立斗争的利益结合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在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中不要做得过火。否则社会党人会说共产党反对从美国人那里取得贷款。应该回答他们说：不，我们不反对。共产党人接受贷款，但条件是不危及国家主权。共

^① 弗拉商，时任法国总工会总书记。

共产党人反对有损法国独立的奴役性条款。共产党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一点务必向农民解释清楚。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着手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成同盟。比如，正在筹备的保护法国电影业同盟。加入这个同盟的有反对勃鲁姆和美国人摧残法国电影业的协议的电影制片厂工人、演员、音乐家、技术人员以及老板。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

多列士称，共产党计划在汽车和航空工业中也建立起类似的同盟。参加这些同盟的甚至有不满美国人竞争的企业主。

斯大林同志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团结一切为争取民族工业独立而斗争的人。

多列士称，法国战前曾是汽车生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国内汽车工业的恢复举步维艰，因为美国汽车简直充斥法国，而实力削弱的法国工业根本无法和美国人竞争。多列士说，法国确实可算是航空工业的摇篮。共产党员梯荣任军需供给部部长时曾致力于重建法国的航空工业，扩大发动机和飞机的生产。然而现在这一工业在法国正趋于消失。不久前戴高乐称打算卖掉飞机制造厂。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会党人正在出卖祖国。

多列士说，他想就九国共产党会议谈一下一个与其说是有关将来不如说是有关过去的问题。法国共产党接受对其缺点的公正批评，其中包括对其没有迅速而坚决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计划所作的批评。当然，法共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注意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危险性。法国共产党开展了自我批评并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然而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上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对法共的批评有时有失公允。例如，南斯拉夫同志指责法国共产党很晚才加入抵抗运动和没有在法国解放的决定性时刻保住人民政权。多列士说，依他看，这一批评是不公正的。为了能正确地向法国广大党员通报情况和不致于使他们迷失方向，多列士

想了解一下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开展斗争的党，它早在 1939 年就为保卫祖国反对德国入侵而战。在法国沦陷期间，共产党领导过抗击德国人的武装斗争，甚至连戴高乐这样的和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都不否认共产党在沦陷期间是组织武装抗击德国人的唯一力量。法国共产党在 1944 年 8 月法国解放时没能掌握政权，是一系列国际原因造成的。法国共产党当时致力于促使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强化战争和加速战胜德国。法国共产党担当了美英军队的后卫。

斯大林同志说，要是苏联红军打到法国的话，就将是另一个局面了。

多列士说，当时声望还很高的戴高乐曾经试图怂恿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然而法国共产党并没上他的当。法共不想削弱自己和孤立自己。党向人民揭露了戴高乐这个狂热的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真实嘴脸。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当然犯过错误，但依他看党在那一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共产党人在当时不可能执掌政权。即使掌握了，随后也会失去，因为美英军队驻扎在法国。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有时也因其他一些问题遭到批评。例如，来法国参加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某些苏联同志曾经责问法国青年为什么不自称共产主义青年。这些同志差点儿没有指责法国青年犯了机会主义。在这以后很多青年人跑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来说，苏联同志批评了法国的共产主义青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很惊讶，苏联同志竟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多列士称，不能责备法国共产党没有把其青年后备力量称作共青团。法共因此扩大了青年运动的基础。现在受法共影响的有 20 万青年人。法共由于采取这样的策略团结了 600 万工会会员。为数 5—6 万组织起来的妇女跟着法共走也得益于这一策略。

斯大林同志说，不应用党性来吓唬党外人士。不过法国共产党在创建统一战线时无论和谁结盟都应保留鼓动自由。这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手下留情，可是社会党人对他们却不手下留情。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是否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会晤以及他如何看待意大利共产党的现状。

多列士回答说，他曾两次会晤陶里亚蒂并同他讨论了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这还是莫洛托夫同志在巴黎时的事。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责骂法国共产党人的，正是引起南斯拉夫他在夸奖法国共产党的缘由，具体说就是对的里雅斯特问题的立场。多列士说，依他看，意大利共产党成长得很快，队伍也有显著扩大。唯令他担心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追求增加党员数量时有时会在原则问题上放弃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打趣地指出，这是墨索里尼教会他们的。如果墨索里尼在法国的话，他也会教会法国共产党人的。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是否还认识其他意大利同志以及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多列士回答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中出现了很多新人，他们不久以前才脱离地下状态，因此他还不认得他们。多列士说，他很熟悉几个老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他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位同志——隆哥。多列士和季·维多里奥也见过面。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设法尽可能多地会见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并说要更经常地互访。斯大林同志问，西班牙共产党的状况如何，有无作用和是否有好人。

多列士说，多洛列丝·伊巴露丽现在在巴黎，他认为她是一个很强的党的工作者。

斯大林同志问，她是否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还有人比她的地位高。

多列士说，共产党领导人中有卡里略，前西班牙共和政府部长。利斯特的位置稍稍靠边。米赫在马德里工作。多列士说，在西班牙同志中他还想提一下乌里别，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共产党员。法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帮助西班牙共产党。

斯大林同志说，西班牙共产党原本提出过派遣代表参加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要求不恰当。希腊人也想派代表。我们认为，参加情报局的党应该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有些党已经公开活动。

多列士说，杜克洛曾就九国共产党会议结果向西班牙同志以及英国共产党人，如法国的波利特作了专题报告。把会议结果也向比利时同志作过通报。西班牙共产党人出席了法国共产党中央的会议。此外，两党书记处曾就很多问题进行过直接会谈。

斯大林同志问，在这些西班牙人中有没有敌人的代理人。对他们应该认真审查。斯大林同志又问比利时共产党的情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比利时共产党尽管力量还很薄弱，但比战前已有所壮大。共产党的老领导已名声扫地，现在由新同志取代。多列士说，他认识比利时共产党的几个老同志，其中包括已有30年党龄的拉奥。多列士指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是，比利时共产党的影响在法语区较强，而在佛拉芒人地区较弱。

斯大林同志说，佛拉芒人按种族来说更接近德意志人。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如何评价英国共产党的现状和他是否认为英共在壮大。

多列士回答说，英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壮大，相反越来越弱。英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英国的共产党人不相信工党的普通党员，在他们面前充老布尔什维克。英国共产党脱离了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打算帮助英国共产党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带有宗派主义性质。

多列士说，英国共产党人最近一段时间有过开展工作的良好机会。他们中有像矿工工会领导人奥纳那样的好人。奥纳也许政治上不很开展，但却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他坚定顽强、忠心耿耿。他在矿工中享有很高威望。

斯大林同志问，奥纳是否参加了共产党。

多列士答，他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的议会代表很弱。

多列士说，加拉赫的确能力很弱。列宁当年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批评过他。到现在加拉赫也没有多大长进。

斯大林同志指出，加拉赫甚至倒退了。

多列士说，他来莫斯科路过布拉格时会晤了哥特瓦尔德。如有可能他想从莫斯科返回时取道华沙，在那里可以同波兰同志座谈，可能的话再经过柏林。

斯大林同志说，多列士当然可以这样办。

多列士说，他很想同德国同志谈谈。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对给予他们的任何微小的关注都非常敏感，苏斯洛夫同志出席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使他们很满意。皮克和格罗提渥给多列士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法国代表团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斯大林同志说，德国共产党处处挨打，谁也不给他们好脸色看。任何一个安抚都能让他们高兴。这些可怜的人处境艰难，但这一切并不都是他们的过错。

多列士说，法国出版一种《新民主》杂志。因为情报局将要出版自己的报纸，所以他想问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应该继续出版《新民主》，还是应把这份杂志停办。

斯大林同志问，这份杂志名义上属于谁。

多列士回答说，杂志属于法国共产党，尽管负责人中有各个党派

的代表。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杂志如果有助于民主力量的团结，可以加以保留。斯大林同志又问，出版这份杂志的费用大不大。

多列士说，出版杂志的费用不大。

斯大林同志指出，法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请联共（布）提供援助。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们看来害怕援助。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具备在必要时提供援助的物质条件。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的物质条件不错，资金雄厚。还在战前法共就有 2000 万法郎。现在这个金额大大增加了。

斯大林同志说，多洛列丝·伊巴露丽在莫斯科时，他也问过她，西班牙共产党人是否需要一些物质支援。而她也回答说，他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不需要任何援助。

多列士回答说，共产党人经营着一系列公司，其中就有法国航运公司。

斯大林同志问，这能否获利。

多列士回答说，有数百万法郎的进项。

斯大林同志说，多列士应该明白，只要有需要，联共（布）愿意提供帮助。法国共产党如果接受这一援助，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多列士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同志干得非常出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斯拉夫是由红军解放的。如果邱吉尔晚一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红军就打到法国了。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曾设想一直打到巴黎。

多列士说，当时美英军队在法国登陆，与其说是要摧毁德国，不如说是为在西欧抢占地盘。

斯大林同志说，美英军队当然不容许自己呆在非洲岸边坐视红军解放巴黎这样的丢脸事发生。

多列士说，他请斯大林同志相信，法国人民会热烈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将是另一种局面了。

多列士说，这样就没有戴高乐了。

斯大林同志设想说，戴高乐会逃跑。

多列士说，他不愿浪费斯大林同志的时间。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多列士一点儿也不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很难得见面。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要是知道他有幸和斯大林同志会谈时将非常高兴。多列士指出，他虽然是个法国人，却有十颗苏联公民的心。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人，这就说明了一切。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共产党人如何处理武器问题。他们打算保留武器还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全权委托两位同志——政治局的一位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专门负责这个问题。其中一位是勒柯尔，沦陷期间他是巴黎共产党组织的书记；另一位是梯荣，他是法国游击运动的组织者。他们在老游击队员中开展工作，建立了军事性质的组织。法国共产党把好几个武器弹药库隐蔽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要保存武器和组织，以免在敌人面前赤手空拳。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进犯，应予以回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斯大林**同志还说，苏联有武器，需要时可以提供。

斯大林同志问，有无可能通过无线电等方式和法国共产党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苏斯洛夫同志说，用无线电同法国共产党有一些联系。法国有一个在莫斯科受过培训的无线电报务员。

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人有几个无线电台。

斯大林同志问，电台工作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多列士回答说，电台的活动是秘密的。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保住了无线电设备。现在正在开设索非亚方向的专门电台，以便和季米特洛夫同志联系。电台还没有投入使用，但已经安装好了。

斯大林同志问，有无出事后的备用电台。仅有一个电台是不够的。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把电台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人的电台都设在市郊。战争结束前法国共产党有3个电台和莫斯科联系。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电台是否既能接收又能拍发。

多列士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问，发报机的射程是多少。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的无线电台能够和莫斯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斯大林同志转换话题说，法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不要忽视农民。他们是一支必须争取过来的强大力量。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要重犯这一错误。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在中部地区及卢瓦尔河南部地区农民中影响很大。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好。

多列士说，最近一次选举时农村中投共产党的选票甚至比一些城市中投的还多。

斯大林同志问，杜克洛是否是多列士的得力助手。斯大林同志说，杜克洛在议会作的关于工人阶级不会听信挑拨去发动武装起义的声明是不合适的。应当记住，敌人是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弱者发善心的。

多列士回答说，杜克洛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工作做得很多，只是有时在议会的发言缺乏预先的充分准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常常上敌人的当而说了不是他打算说的话。尽管如此，杜克洛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机智的共产党员。

莫洛托夫同志问，法国共产党中央在执行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定

上是否有动摇。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中央有过这样的动摇。例如安德列·马尔蒂的立场就不正确。多列士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尽管安德列·马尔蒂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勇敢斗士，但他过分重视形式逻辑。他对任何一种急剧转折和复杂局面都不能迅速掌握。这一回他竟然在中央委员会另作了一个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副报告，声称据他看来头号敌人是戴高乐。多列士说，他向马尔蒂解释说，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法国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戴高乐、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人。关于马尔蒂的错误立场问题政治局讨论过。他本人对此不很满意。但第二天他在巴黎共产党组织的一次会上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发言就很好、很正确了。多列士说，马尔蒂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同志。不过他确实有些性子急，和他打交道要有极大的耐性。

多列士说，马塞尔·加香尽管年近80，仍是共产党的一位卓越活动家。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劲头十足的共产党员，但不知为什么他相信如果他是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的话，他就几乎可以左右整个对外政策了。马塞尔·加香是苏联的老朋友之一。对他来说俄国人的话就是法律。

斯大林同志问，加香有没有犯过过去的老毛病。

多列士说，现在没有发现他重犯这样的毛病。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共产党有一位蒙慕梭同志，他用罢工使法国的资产阶级咋破了胆。比方说，他宣布举行总罢工。谁也没有罢工，但他却宣布了。

多列士说。蒙慕梭是弗拉商的亲密战友，也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多列士指出，青年同志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干部。法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1940年他就在国民议会本着李卜克内西的精神作了一次出色的发言。现在他分管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前共青团书记雷蒙·居约也是一位好同志。现在他担任巴黎地区共产党组织书记。

这位年轻的党员很有天赋，也很有经验。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从妇女中提拔了领导力量。

多烈士回答说，法共中央有7—8名女同志。她们诚然既不异常活跃，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也不显得突出，但妇女工作做非常好。她们和莫斯科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瓦扬-古久里。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能干的同志。

多烈士说，法共中央在战争期间只出了少数叛徒和逃兵。战前选进中央委员会的50名委员中仅有4人当了叛徒。其中3个被共产党人自己处死了，第四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多烈士指出，法国共产党的薄弱环节是中层领导力量不够。很多这一层的人被德国人枪杀了。战争中德国人杀害的共产党员有35万之多。很可惜，一大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积极参加过人民阵线筹建工作的同志牺牲了。这些人怀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刻骨仇恨。而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则是在战时另一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需要对他们做大量工作。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教育党员。

莫洛托夫同志说，弗拉商是个好同志。

多烈士说，弗拉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1926年就入党了。他曾任政治局委员，后因接手总工会领导工作而不得不离开政治局。但他非正式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

多烈士说，他非常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在适当时候接见弗拉商。弗拉商最近一次来莫斯科回国后，对没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接见有些失望。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是弗拉商不想会见任何人。

多烈士说，弗拉商只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库兹涅佐夫谈过话，但联共（布）中央委员一个也没见到。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多列士回答说，是弗拉商自己不敢提出请斯大林或党的其他领导人接见的要求。

苏斯洛夫同志说，两年前莫洛托夫同志曾同弗拉商谈过话。

斯大林同志说，弗拉商该说出想与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会见的意愿，他又开玩笑地补充道，“我们连一切资产者都可以见，当然要接见弗拉商。”斯大林同志问，贝当是否还活着。

多列士回答说，贝当靠戴高乐的庇护还活着。他已经91岁了。

斯大林同志又问，魏刚现在何处。

多列士回答说，魏刚在法国。

斯大林同志问，魏刚在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起作用。

多列士回答说，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多列士说，魏刚、贝当当年都是戴高乐的顶头上司。多列士说；他有一次在法国驻苏大使馆听说，戴高乐在莫斯科时说过，他不会给波兰人任何好处，他太了解这些波兰人了，早在他在魏刚手下服役时就看透了他们。

斯大林同志指出，可是戴高乐的主要助手却是波兰人帕列夫斯基。这个人是英国人的代理人。邱吉尔当年在戴高乐身边安插了代理人。

多列士说，现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马西格利也是英国人的代理人。多列士谈起，戴高乐有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发表讲话时，为了讹诈英国人和美国人，故意说了几句苏联的好话。马西格利马上就致电所有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指示对总统的这些话不必太在意。他的电报还说，法国一如既往地把政策建立在和英、美结盟的基础上。

多列士说，有一次听帕列夫斯基讲，约·维·斯大林跟他谈过逮捕多列士的话题。

斯大林同志说，确实有过这回事。那是在和帕列夫斯基谈话时，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多列士一在法国露面，帕列夫斯基就要逮捕他。帕列夫斯基回答说：“哪里会呢，哪里会呢。”

多列士说，弗拉商请他有机会时向斯大林同志讲一件事。这是弗

拉商在美国时亲眼目睹的事实。美国的反动派疯狂地发动了一场反对“红色分子”的运动。有人问一个美国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他不是。于是告诉他，您是共产党员，因为您的儿子叫约瑟夫。既然您给您的儿子取了斯大林的名字，那您就一定就是共产党员。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元是会让人的头脑空虚的。钱袋越满，脑袋越空。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打算什么时候回国。

多列士说，他后天，11月20日走。就差办理签证了。多列士说，他对莫斯科之行非常满意。他出席了十月革命30周年的庆典。多列士说，总之苏联对他的接待，用法国人的话说，像是对帝王般的礼遇。

多列士说，他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早在27年前他来过这个厂，当时这个厂叫莫斯科汽车公司。现在他看到工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的工业正在发展，他又问法国的工业是否也在发展。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业曲线经过短期上升后又下滑了。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失业现象。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没有失业现象。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多少工人。

多列士回答说，算上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法国共有1000—1100万工人。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的冶金业恢复了没有。

多列士回答说，冶金业恢复非常缓慢。生铁不够，也没有焦炭。由于缺乏钢材，汽车工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高炉也没有全部点火。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能炼焦的煤。

多列士说，法国炼焦煤很少。皮杜尔错误地以为，只要把萨尔并入法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萨尔的煤非常少，而且都就地加工或被运往德国其他地方。此外，萨尔的煤也不是炼焦煤，连萨尔当

地还要从鲁尔进口焦炭。多列士说，洛林的几个区是冶金业的集中地。但这几个区不可能和萨尔合并，因为这些区和萨尔竞争，萨尔不可能给予补充。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北部煤炭情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煤的产量比战前增加了 20%。这完全归功于矿工的干劲。法国共产党号召他们提高煤产量。然而由于现在很多共产党员被排除在煤炭业领导部门之外，矿工们对此普遍不满，所以煤产量又下降了。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著名的 200 家家族代表是否都保留了下来。

多列士说，他们都留在法国。法国煤炭工业的国有化并没有取消给国家预算带来巨大损失的地租制度。在法国有 4 家银行被收归国有。但两家大银行仍留在私人手里，其中巴黎区的一家的副行长是戴高乐的兄弟。法国的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需要大笔资金。资本家却不向这些国有化了的企业投资。

斯大林同志说，他们不乐意这样做。

多列士说，社会党人为美国人投资法国工业提供了机会。汽车工业中建立了法美合营公司。福特在泊松建立了企业。通用电气公司吞并了雪铁龙企业。美国的康采恩垄断了法国的电气设备。美国对法国经济生活的入侵在法国的殖民地上进展尤其迅速，比如在摩洛哥、法属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地。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也向法国工业投资。

多列士回答说，投资的主要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斯大林同志问。比塞大现在由谁掌握。

多列士回答说，比塞大仍归法国人所有。

斯大林同志回忆说，邱吉尔曾想染指比塞大。他当时表示英国人流了血，所以想得到比塞大。

多列士说，美国人在摩洛哥站稳了脚跟；而英国人则在突尼斯站

稳了脚跟。在阿尔及利亚双方的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冲突。

多列士指出，共产党员的作用在很多法属海外领地有所增强。例如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国民议会中 2/3 席位属于共产党人。共产党在黑非洲的影响也很大。法国国民议会有 12 名黑人共产党员议员。留尼汪岛的共产党员占议员的 2/3。吉布提有一个党员议员。多列士说，共产党人委任普梯将军作为驻法兰西联邦的代表。这位将军曾任驻莫斯科武官，回国后对苏联颇有好感并开始寻求同法国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成为法苏协会的积极分子，和法国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他本人因此被解职退役。现在共产党人请他担任驻法兰西联邦的代表。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军队。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士兵，但没有军队。法国现共有 50 万士兵。分布在德国、北非、印度支那半岛和其他一些地方，法国竟然派不出一个师去印度支那，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法国军队十分薄弱。法国军队用的武器都是从英国来的。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本国难道不制造武器吗。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主张扩大法国的武器生产。但社会党人横加阻拦。多列士有一次去军工厂对工人们讲话时指出，为争取和平和民主及尽快打败德国人需要生产更多的武器。社会党人却利用这一讲话疯狂地掀起反对多列士和共产党人的运动。社会党人说，战争一结束，一切武器就都没用了。他们以此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诡计容易得逞，而向法国出口武器对英美来说有利可图。社会党人还主张取消法国的航空工业。

斯大林同志问，没有军队，独立从何谈起。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总参谋部。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的是司令部和将军，比士兵要多得多。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是否还留下一些军舰呢。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一艘大型战列舰，此外还有一艘“黎塞留”号巡洋舰时刻待命。

斯大林同志说，该利用这些材料来打击社会党人。要揭露社会党人主张解除国家的武装。

多列士说，社会党人倒是从英国人那里弄来了一艘“哥伦布”号航空母舰。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一艘没有飞机的航空母舰。

多列士回答说，意大利人将保留军队，意大利舰队要比法国舰队强大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一部分舰只移交给了意大利人。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留给意大利人的舰只将予销毁。

多列士说，他不久前拜访卡特鲁将军，同他探讨了军队问题。多列士问卡特鲁，法国在目前状况下能做些什么。25年前德国人不给法国人煤，彭加勒就拿下了鲁尔。而如今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但不给法国人煤，而且不让他们控制鲁尔时，法国却束手无策。多列士对卡特鲁说，法国现在的处境竟然使它做不了彭加勒25年前做过的事。卡特鲁回答多列士说，法国没有军队，这一点他一直在对戴高乐说。

斯大林同志说，世事的变化真是耐人寻味。20年前把共产党人称作卖国贼，而现在保卫祖国的只有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也只有他们提出了国家独立的口号。他们现在是最彻底的国家独立的保卫者。共产党人可以公开宣称只有他们在保卫民族的荣誉和实力。

多列士说，他想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这番话提请注意以下情况：20—25年前社会党人就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他们当时打着社会爱国主义的旗号。现在他们一如既往地反对共产党及工人阶级，但却已明目张胆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蜕化了，大大蜕化了。斯大林同志说，拉马迪埃是个大骗子，他指出，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多列士回答说，拉马迪埃原来是外省的一个小律师和小政客。一

度当过社会党员，社会党分裂后追随德阿。法国解放后他才重又参加社会党。

斯大林同志问，多里奥的下场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多里奥被炸死在德国。他死的时候还穿着德国军官制服。

斯大林同志指出：“无耻之尤。”斯大林同志说，德国人进攻莫斯科时，多里奥从所谓的法国志愿者中组建过一支军队。

多列士说，多里奥是个胆小鬼，自己从来设法躲在后面。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多里奥是德国人的奸细。

多列士说，多里奥早在1925年，27岁就当叛徒。有一次在和警察发生冲突时他踢死了一个警察。他因此被捕入狱，但只在狱中呆了8天，就被放了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他被收买了。

多列士讲，从此以后多里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充当法共中央的反对派。1926年他反对党中央，斯大林同志在特别委员会中分析了多里奥的问题。1927年他反对共产党。1929年多里奥反对苏联和对苏友好政策。1934年，当法西斯威胁全世界时，多里奥却保护希特勒德国。他以为，法西斯无所不能。多里奥声称，德国法西斯既然能在德国取胜，就也一定会在其他国家取胜。

莫洛托夫同志说，多里奥是德国人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多里奥被警察招募了。后来法国警察当局把其代理人移交给了德国人，德国人接收了他。

斯大林同志问，赫里欧近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赫里欧现在是国民议会主席和激进党领袖。这个人有自己的主张。沦陷期间在激进党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他说，法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执行正确的对苏政策以及忽视了军备问题。达拉第发言反对赫里欧，他说俄国是法国的敌人，而德国才是法国人

的朋友。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激进党有多大影响。

多列士说，激进党现在无足轻重。

多列士说，过去投票支持激进党的农民撇开人民共和党，直接投向共产党。这些农民具有反教权主义情绪，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承认法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法国独立斗争中的功绩。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朋友达拉第”在1940年到处兜售经芬兰出兵苏联的计划。

多列士说，当时马西格利也在策划轰炸巴库。多列士说，莫洛托夫同志好像见过马西格利。

莫洛托夫同志开玩笑说，他有许多朋友，其中贝尔纳斯可以算作一个好朋友，他在他的新著中多次提到过莫洛托夫。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将掀起一个爱国主义高潮。法国的统治集团扼杀了国家，使它失去了军队、舰队和军事工业。

莫洛托夫同志说，所有珍视本国独立、电影及其他民族事业部门自主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来。

多列士说，经常有人指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人尽管是爱国者，但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想法。戴高乐有一次就对多列士说过这样的话。

斯大林同志说，戴高乐自认为是将军，却不组建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茹安将军有什么消息。

多列士说，茹安现已退役。多列士说，从军事上来说，茹安将军才华横溢。他唯一的一个“污点”，是被希特勒释放后由德国人派到北非作战。茹安是法国优秀军事将领之一，他学会了红军的作战经验。例如，有一次在意大利蒙德—卡西诺战役中茹安就运用了红军的经验。茹安告诉多列士说，他不损一兵一将就攻占了要塞，得力于他在该地区集中了大量炮兵，差不多每隔一米就安了一门大炮。在法苏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茹安开诚布公地说，他希望法国能有一支像苏联那样的

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茹安和戴高乐的关系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戴高乐解除了茹安的职务，因为担心他会同他竞争。戴高乐本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补充说，戴高乐也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多列士肯定了这一点并说因为戴高乐从来就没有打过仗。

临别时斯大林同志预祝多列士及法国共产党取得更大成就。

谈话进行了2小时30分钟。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45全宗，
第1目录，第392卷宗，第83—106页
打字稿。原件。

关于意大利

对意大利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1944年3月5日(星期日)

爱尔科利来。告知他同斯大林的谈话：

两个阵营的存在(巴多利奥国王和反法西斯各党派)削弱了意大利人民，这对英国人是有利的，他们希望地中海有一个软弱的意大利。如果今后这两个阵营的斗争仍继续下去，这将导致意大利人民的毁灭。

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要求意大利成为强大的国家并拥有强大的军队。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形式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决定性意义。事物的实质是决定性的。国王并不比墨索里尼更坏：如果国王反对德国人，就没有必要要求他立即退位。在德国和西班牙没有国王，但是希特勒和佛朗哥并不比最反动的国王好些。

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巴多利奥的政府，以便：

(1) 加强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实现国家民主化和实现意大利人民的斗争中的团结统一；

(3) 在不提及俄罗斯人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方针，当然可以让人们理解到苏联也是不会反对这样的意大利政策的；

(4) 表面上对英国人友好和谐的关系。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280-281页

关于保加利亚

重要的是要保留住保加利亚军队

(1944年10月6日)

1944年10月6日

.....

斯大林电话：“保加利亚人应当从色雷斯和马其顿撤回自己的军队，重要的是要保留住保加利亚军队，英国人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是英国人拖延了停战协定，他们想由威尔逊而不是由托尔布欣签字，想要由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任监督委员会两主席。我们坚持并会做到由托尔布欣签字和由我们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职务。红军在保将停留到签订和平协议，最迟将到对德战争的结束。”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 第311页

保-南联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

(1945年1月28日)

1945年1月28日

在斯大林别墅。南斯拉夫方面被邀请的有：莫沙·皮雅德、赫布朗和南斯拉夫大使西米奇，保加利亚方面有：我、总理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内务部长于哥夫、保加利亚政治代表米哈尔切文教授和工人党中央书记特莱乔·科斯托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出席。

气氛非常热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团就联盟条约方案达成一致，双方没有分歧。……

很多人祝词。在自己的祝词中，**斯大林**强调，保-南联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斯拉夫各民族联盟的开端。斯拉夫人民有责任相互帮助、相互保护。德国将被击败，但德国人是拥有众多干部的强大民族，他们将重新崛起。当他们再次试图进攻时，斯拉夫民族不能毫无准备。而将来，德国人的再次进攻很可能，并几乎肯定会发生。古斯拉夫主义体现了沙皇俄国征服其他斯拉夫人民的欲望。我们的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是要在平等基础上统一斯拉夫各民族，共同保卫自己的生存和未来。我们不想强加给其他斯拉夫人民任何东西。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 第331页

与保加利亚总理 关于莫斯科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7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交谈的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基尔萨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方面参加交谈的有保加利亚总理基·格奥尔吉耶夫先生，外交部长斯泰诺夫先生，内务部长尤戈夫先生和保加利亚驻苏公使米哈尔乔夫先生。

会谈从晚间10时10分开始到11时40分结束，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双方互致问候后开始交谈。斯大林向格奥尔吉耶夫打听保加利亚1945年发生的干旱所造成的后果和畜牧业的情况。

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除了南部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外，干旱给整个保加利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同时说，目前保加利亚正在下大雪，有理由指望1946年会有好收成。全国的秋播计划差不多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谈到畜牧业时格奥尔吉耶夫认为，由于干旱，使畜牧业的长期危机在1945年进一步加剧，预计还要持续至少两三年时间。

之后，斯大林把话题转到了与执行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的有关问题上，这些问题占用了会谈的所有时间。这次交谈中没有提起其他问题。

斯大林同志：“你们那里反对派的情况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那里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出现了困难。”

格奥尔吉耶夫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受到了保加利亚全国人民的欢迎。祖国阵线政府对这一决议感到满意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祖国阵线的立场在决议中得到完全尊重。

斯大林同志：“决议不会给你们的处境造成困难吧？”

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政府没有理由抱怨这些决议。决议很好，对于双方——无论对政府或对反对派都是可以接受的。

格奥尔吉耶夫接着说，一开始以为，在保加利亚找不到反对这些决议的人，事实上并非如此。政府收到的有关莫斯科决议公布后反对派人士情绪的最新材料说明，反对派，尤其农民反对派，倾向于和解。在收到苏联政府方面的友好建议以后，保加利亚政府发出了一些信函，请从祖国阵线中分裂出去的农民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对派集团领导人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政府的代表就这些集团的代表参加祖国阵线政府的问题举行谈判。1月5日，连续同两个集团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在这些会晤期间，政府的代表团根据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任务是用其他两个民主派集团的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但绝对不是改组政府。接着格奥尔吉耶夫列举并评述了向反对派集团提出的它们的代表进入政府的条件（见附件1）。佩特科夫在同政府的代表团交谈中流露出比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更趋向于和解的情绪。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中有一些与祖国阵线从来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如帕斯图霍夫。根据两个反对派集团代表的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这些集团的代表进入政府的条件，并请求他们也以书面形式在第二天（即1月6日）做出答复。昨天（1月6日）政府收到了这些集团的书面答复。把这些答复进行对照后可以得出结论，这两个集团是一致行动的，他们的答复几乎一模一样（格奥尔吉耶夫把农民集团佩特科夫的答复交给了斯大林）。格奥尔吉耶夫继续说，

从这些答复中可以看出，反对派提出了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并且不尊重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这些条件明显同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相矛盾。

斯大林同志扫了一眼佩特科夫的答复后插话说：“他们表面上承认这个协定，实际上否定它。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法。”

格奥尔吉耶夫对此表示同意并继续说，由于保加利亚的反对派明显不愿意尊重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保加利亚政府决定今天午间通过广播电台专门播发有关当前局势的报道（格奥尔吉耶夫把报道原文交给了斯大林，见附件2）。

斯大林同志问，这份报道发表了没有，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斯大林说，保加利亚政府仓促地将其发表，可能会造成麻烦。斯大林同志指出，报道本身写得也不正确，里面没有摘引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答复的原文，而是对这些答复进行了综合和转述。反对派此时会说，政府故意对他们的文件进行歪曲。

接着，斯大林同志向保加利亚部长们介绍了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是如何通过的。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保加利亚连同罗马尼亚问题一并提了出来，他们对两个国家都提出了要求：（1）内务部保持中立；（2）两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和政党有在选举中提出单独名单的权利；（3）吸收反对派的代表参加政府组成并改组政府。他们没有谈到保加利亚的选举是无效的。关于改变国内外政策问题，他们也没有谈到。

我们回答他们说，首先应该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区别开来，因为在保加利亚已经进行了选举。他们对此表示同意。然后我们指出，反对派应该奉公守法，例如美国就是这样。我们拒绝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关于改组保加利亚政府的要求，他们对此表示同意。在对待罗马尼亚问题上，我们拒绝了他们把马尼乌、卢普和迪努·布莱蒂亚努吸收到政府中的请求。我们也不接受改组罗马尼亚政府的要求。我们对英

国人和美国人讲，罗马尼亚政府表现很好，没有任何理由对它改组。至于谈到选举，我们同意罗马尼亚政府必须保证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希望保加利亚政府也能发表相关的保证性声明。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们也不同意罗马尼亚内务部中立化。

这样一来，在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中既没有写进关于改组政府、进行新的选举的内容，也没有写进关于改变国内政策的话。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今天得到的消息说，罗马尼亚国内已经达成了谅解。而且，罗马尼亚政府不是把所有反对党的代表都吸收到政府中。例如，民族自由农民党提出了米哈拉凯，当被告知这个候选人不合适后，他们就提出了其他候选人。候选人贝贝·布莱蒂亚努也被否决了。在保加利亚，事情不知为什么办得如此糟糕，原先以为这里的事情要容易一些。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对于保加利亚政府较之关于罗马尼亚的决议对于罗马尼亚政府来说更加有利。而实际上却出现了保加利亚政府对保加利亚反对派的付出多于罗马尼亚政府对罗马尼亚反对派的付出。在罗马尼亚，进入政府的反对派代表没有得到一个部长职位。而在保加利亚，反对派得到了好几个部长职位，但他们还不想进入政府。斯大林同志最后说道，这是无耻行径。

之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保加利亚的两位部长，今后他们想干什么。

格奥尔吉耶夫谈了他的打算。他说，在布加勒斯特达成的协定可能会对保加利亚的反对派起到清醒的作用。但他同时又指出，他不相信这一点。并且说，反对派从外国得到了不怀好意的劝告。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停止这些不怀好意的劝告，而代之以善意的建议。

斯大林问，反对派从谁那里得到了不怀好意的劝告。

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从美国政界代表人物巴恩斯那里。并且说，巴恩斯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联系过于密切，全然不顾一个外交代表所应有的行为准则。

之后开始热烈交换看法，我仅列举一些交谈过程中最重要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显然，我们应该干预。很清楚，佩特科夫、卢尔切夫和帕斯图霍夫都不应该进入政府。”

莫洛托夫同志：“你们同反对派的谈判还不能算是结束吗？”

格奥尔吉耶夫：“表面上看，谈判没有中断，而实质上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

斯大林同志：“在罗马尼亚，事情的结局很好。那里的反对派更聪明。对于达成的协定，国王比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高兴得差点哭出来。他本来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现在谢天谢地，暂时得救了。”

斯泰诺夫：“我们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选举结束了，你们的反对派可能全部完蛋。反对派抵制这些选举，三大国承认这些选举。从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中难道不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吗？”

斯泰诺夫：“是的，反对派看来没有远见。”

斯大林同志：“不总是那么有远见吧。丘吉尔要比你们反对派有远见得多吧，但在柏林会议期间，他向我们保证一定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艾德礼本来只希望自己的票数稍有增加，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党会在议会中得到多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预见到，这很困难。”

“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要是保加利亚进行自由选举的话，祖国阵线就会处于少数地位。而结果并非如此。”

格奥尔吉耶夫：“他们戴着反对派的眼镜看我们。”

斯大林同志：“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选举是合法的”。**莫洛托夫同志：**“莫斯科公报中没有一句话提到选举，也闭口不谈出版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在这份公报上签了字。因此，反对派在这一点上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会暗地里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公开这样做。你们那里过去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斯泰诺夫：“是的，这是对选举的默认。”

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什么时候应该去伦敦？能否把他派到保加利亚，把那里的事情搞清楚？当然，无论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都不应该进入政府。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同意承认保加利亚政府，可以等待他们承认。我们也曾经多年不被他们承认嘛。”

斯泰诺夫：“我想，就是维辛斯基来了以后，反对派也不会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事情不在这里。现政府和反对派正在争吵。如果谈判没有成功，他们可能把责任推到保加利亚政府身上。如果作为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维辛斯基去了，你们的争吵就有了一个调停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调停失败了，我们就来承担责任。到时候谁也不会怪罪你们。”

斯泰诺夫：“我们不怕承担责任。”

格奥尔吉耶夫：“我们考虑到了我们的政治习惯，所以我们不仅要以书面形式阐述我们的条件，而且要求反对派也要有书面条件。”

斯大林同志：“你们做得不对。不应该从书面阐述条件开始，而应该从口头谈判开始，并且一步一步地让他们口头上亮出自己的观点，这以后才可以让他们以书面形式阐述其要求。看来你们还缺乏党与党之间的谈判经验。”

格奥尔吉耶夫：“这是一些丧失理智和不讲信用的人。如果我们不从以书面形式阐述各自的观点开始，那么有朝一日他们就会把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归咎于我们。”

斯大林同志：“佩特科夫有一种农民的心理状态，他害怕纸面上的东西。农民可以做许多事情，只是不能逼迫他在某份文书上签字。如果他不得不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他一定要附带种种条件。我认为，对于你们和我们来讲，最好是正面解决问题。倘若反对派不这样做，

那对他们更为不利。他们就会完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行。但愿佩特科夫不要以为，苏联和美国会因他而打起仗来。”

斯泰诺夫：“应该迫使反对派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你们很需要佩特科夫的承认。显然，维辛斯基应该向保加利亚人解释莫斯科决议。”

莫洛托夫同志：“这是已经占领的阵地。你们不正确地理解了莫斯科决议。选举已经得到莫斯科会议的承认，这次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提到选举不是偶然的。不应该要求反对派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这是一条公理，而你们想把这条公理变成定理。你们有一个问题——用反对派集团的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斯大林打电话问维辛斯基，什么时候公开发表关于让反对派代表参加罗马尼亚政府的协定，并就保加利亚问题指示维辛斯基说：‘佩特科夫厚颜无耻地要求改组保加利亚政府和解散议会，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应该像对待罗马尼亚国王那样对待他’）。只向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想不想派自己的代表去政府？其他的问题都不用讲。罗马尼亚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他们那里还没有搞选举。此外，那里不仅有反对派，而且还有国王。你们佩特科夫有提出某些条件和发表宣言的机会，让人不好理解。”

斯泰诺夫和米哈尔乔夫：“要是反对派在维辛斯基去了以后仍然拒绝参加政府，那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在你们，而在我们。他们可能指责你们撕毁莫斯科决议，却不会指责我们，他们不敢。主要的是瓦解反对派。莫斯科会议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决议已经开始使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四分五裂，因为决议中只说让每个反对派出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这完全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许诺的东西，也不是反对派头目所希望的东西。在罗马尼亚，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是众人唾

骂的对象。如果你们那里反对派头目不提出进入政府的代表，那么反对派内部就会不可避免地打起来”。

谈话记录基尔萨诺夫
1946年1月7日于莫斯科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年9月2日)

1946年9月2日

晚上在斯大林处(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在场。后来布尔加宁也来了。

.....

关于[保加利亚]新宪法问题，斯大林阐述了下列思路：你们的宪法应该是人民宪法；尽可能少一些细节；议会制度下的人民共和制国家的宪法；不要让非劳动阶层感到害怕；使宪法比南斯拉夫宪法更偏右一些。（答应看看我寄给他的第一部分意见，并写出自己的意见。）

对此，斯大林还说：你们有必要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将你们党和其他劳动者政党（比如农民的政党等）团结到这样一个政党中。有工人党，或称为共产党，这并不好。早先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帮助工人阶级独立成为工人政党。那时候他们是反对派。现在你们参与国家的管理。对你们来说，最低限度有必要把工人党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团结起来，至于最大限度的团结，那是将来的事。农民把工人党看做别人的政党，而把劳动党看做自己的政党。我特别奉劝你们做这件事，劳动党或者工农党适合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这将会是人民的政党。相信我，你们不会损失任何东西，相反，只会获得。况且从你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看，这会大大减轻你们的任务。就实质而言，这个党是共产党，但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这将帮助你们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①而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革命时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采取别的方式

和形式，而不要模仿俄罗斯共产党人，他们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

不要害怕我会指责你们在搞机会主义。这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在当今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385—386页

① 斯大林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苏联采用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是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卷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本书制作者注

关于保加利亚面临的一些问题

(1946年9月2日)

1946年9月2日

.....

贝恩斯向保加利亚代表团建议将反对派的代表召到巴黎，讨论和决定保加利亚问题。

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不会同意。

对于问题“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拒绝与现保政府领导下的保加利亚签署和平条约，能否指望与苏联签署单独的条约”，斯大林表示：事情不一定会到这一步，因为归根到底他们有义务签署和平条约。

.....

对于问题“假设基蒙提出辞职，我们能否推举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解释道：这在现在还不适宜——这只会给保加利亚造成新的外交政治困难，从农民联盟中推举某个人更好，只要他能真诚地与你们一起工作。

你们还不如努力影响基蒙，让他更坚决地宣布反对“环节”联盟右翼，直到该右翼分裂出去，而基蒙和你们留在一起。

.....

南斯拉夫人居高临下地看我们，并认为，在巴尔干国家中苏联就指望南斯拉夫而轻视保加利亚。

对上述说法，斯大林表示，根本不是这样：南斯拉夫是重要国家，但我们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将统一为一个共同的国家，将在巴尔干地区发挥共同的作用。

关于色雷斯问题，**斯大林**说：保加利亚想要色雷斯，将会为它确立未来地位。需要一场新的战争才能最终解决此类问题。

谈到希腊共产党的策略，**斯大林**强调，前段时间希腊共产党人抵制了议员选举，从而犯了错误。“只有当抵制时能导致对方垮台时，才可以抵制选举。否则，抵制是不明智的。”

斯大林谈了保加利亚军官在国内而不是在苏联进行培训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这里的困难更大。况且我们的教育不完全适合保加利亚军队。我们可以提供教员、教材等进行帮助，但最好你们在国内有自己的学校。”

斯大林认为在我们的军队中有苏联监督员并不好，弊大于利。况且监督员的存在经常妨碍自身军官的独立发展。“最好让他们在没有保姆的情况下学习。”

他同意指示比留佐夫派出几名苏联军官，在他的领导下非正式、不张扬地帮助保加利亚军队。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385-387页

这一切都可以静悄悄地进行

(1947年8月8日)

1947年8月8日

.....

(晚上)到斯大林别墅。谈话从保卫我们的黑海海域问题开始。

斯大林同意再给我们几艘汽艇(共一个大队)。他还认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海军基地和海军。为此,必须把我们的海员派到敖德萨学习,以便操作这些船艇。还允诺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武器来装备军队和边防军。他召来布尔加宁,指示他落实这件事。

.....

至于说到布列德会谈的决议,斯大林认为不应该宣布条约文本,因为还没有公布。他批评条约是无限期的,这不符合国际关系中的惯例。在和约还没有批准之前,做这一切完全是不恰当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利用这个事实,增加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总之,“你们太匆忙,太急躁:用不看声张。这一切都可以静悄悄地进行。尤其要考虑到保加利亚还被认为是二战中的卫星国”。

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来说,外部威胁是主要的,而不是内部

.....

“至于说到苏联的援助,它有一些难处,因为战时保加利亚站在希特勒一边,在提供公开援助时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事实。经常须要寻找其他的途径,但我们会援助的。”

我们还谈到修建氮肥厂、贸易协定、卢布汇率、在保加利亚的德国企业等问题。当我谈到在保加利亚的苏联机构像普普通通的公务员

在例行公事，而不研究保加利亚的特殊政治地位与作用，并对此表示担心时，斯大林表示，这许多事情他都完全不清楚，建议再发生这类事时直接找他。

……我在场的情况下，斯大林还跟布尔加宁谈了几个军事方面的问题和军队的再训练问题。

“应该不仅夸耀我们的胜利，而且要努力研究在战争各个时期与战役中所犯的错误。”

“而且，胜利者也应该由于自己的错误受到谴责！”……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406-407页

苏联政府对保-南无限期条约的态度

(1947年8月12日)

1947年8月12日

就我国的经济问题给德鲁什科夫写了三封信。

晚上到德鲁什科夫处。给了我苏联政府的如下决定：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苏联政府认为有义务通报兄弟的共和国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表明自己对保南无限期条约的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在和平条约尚未生效之前和不顾苏联政府的劝告就缔结了条约，而且是无限期条约，这是犯了个错误。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由于草率行事，就为英美反动分子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帮了忙，提供了多余的借口。

当然，苏联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都有同盟关系。但是，它同南斯拉夫只有形式上的同盟条约，同保加利亚则有事实上的同盟条约。而现在这也等于是形式上的同盟条约。但苏联政府有义务提醒，对于不同苏联政府商量就在外交政策方面签订如此重要的条约，它不会承担责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1947年8月12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 第407页

关于建立保-南联邦问题的谈话

(1948年2月10日)

1948年2月10日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佐林。

我方：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

南方：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

.....

莫洛托夫：苏联政府与保加利亚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存在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关键问题上：保南条约；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答记者问；南斯拉夫军队进驻阿尔巴尼亚。

.....

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因为不管敌人还是朋友都认为这是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这是绝对错误的，今后绝不允许再发生。季的解释于事无补，甚至更在添乱。从这一解释看出，过去是德国妨碍同塞尔维亚建立联邦，而这次是苏联在妨碍。

季：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斯（大林）：您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应该不仅想到自己的愿望，而且还应该想到您讲话的后果。我们不光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关税同盟，而且这是倒行逆施。

.....

季：关于布列德条约的事我当时就解释了，我们没有缔结布列德条约，而是商定了未来保南条约文本的内容。至于答记者问，我在祖国阵线代表大会上专门讲了，指出批评是正确的。为了提高我国的经

济势力和国防能力，我们需要其他新民主主义友好国家的合作。

斯：您想别出心裁。波兰人和捷克人在讥笑您的联邦。请去问问他们想不想要联邦？

季：这是有害的，完全不正确。我的解释旨在反对那些想利用我的讲话反对我们和苏联的人。从根本上讲，我们之间目前没有分歧。此类声明今后不会再重复。

斯：我们互不理解，这就说明我们之间有分歧。而您却力图掩盖这一点。

莫：这是严重的分歧，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斯：您是一位老资格政治活动家。有什么错误可言？您可能有其他想法，不用说您自己就能意识到。不应如此频繁地发表答记者问。您想说点什么新意，好震撼整个世界！您俨然还像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在接受共产党报刊的采访。您在鼓励美国反动分子，让他们蒙骗社会舆论，说只要成立西方集团，美国就不用作出什么特殊努力，因为巴尔干不仅有集团，而且还有关税同盟。目前，美国正面临总统大选。什么样的政府上台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美国是一个强国，武器装备优良，领导政府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真正的财团。这些人极端仇视我们，拼命寻找借口向我们发难。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行动鼓舞了进步人士，那他们就可以破坏大选。但是，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言行使反动派受益，那我们就帮助他们了。美国政府处在大选前夕，害怕产生其他后果。但是，倘若政府落到金融巨头的手里，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人们会说：‘你们不仅有了集团，且联合了一批国家，反对谁呀？’你们要建立这种集团干什么？再说，假若想联合起来，那也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啊。你们要么是缺乏经验，要么是像幼稚的年轻人学着蝴蝶往石头上撞。你们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切呢？为什么要去替英国、美国和法国解围呢？

再说阿尔巴尼亚问题。南斯拉夫同志们就这么轻率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战时，三个同盟国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并表示将支持这种独立。在民主同反动斗争的各个环节中，阿尔巴尼亚这个环节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阿尔巴尼亚还未被接纳进联合国。英美还不承认它。问题仍悬而未决。只剩下阿尔巴尼亚在国际关系中尚未得到法律保护。倘若铁托派一个师或仅一个团进去，那英美也不会不知道。它们就会叫嚣，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难道阿尔巴尼亚公开向南斯拉夫求援了吗？那时，这些英美恶棍们便将充当捍卫阿尔巴尼亚独立的角色。这样，除了傻瓜谁还会来建立毫无希望的战线呢？当前应该加强阿尔巴尼亚军队的组织工作，向它提供教官和武器。然后，如果它遭到攻击，它应该请求南斯拉夫援助。否则，南斯拉夫就会被看做在占领一个独立国家。那时肯定会出现武装干涉。美国的舰队和基地在虎视眈眈。美国将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当你去打仗时，你要建立对你有利的战线，而在此地，你却亮出后背让美国人来打。

你们看看中国在进行什么样的战争。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兵一卒。

难道阿尔巴尼亚人比中国人差吗？你们去训练他们，武装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学会防御。当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独立时，这就最好。美国人很难自己发动进攻，不然的话，他们的任务就容易完成了。你们很容易就决定了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复杂的。

如果希腊游击队遭到进攻，你们会开始战争吗？

卡德尔：不会。

斯：我是在分析了游击队和他们的敌人现存力量之后这么说的。最近，我开始怀疑游击队的胜利。倘若你们也不相信游击队会胜利，那就应该缩小游击运动。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地中海十分感兴趣。他们想在希腊拥有军事基地，才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在那里维持听命于他们的政府。真是一个重大国际问题。

如果缩小游击运动，那他们就没有进攻你们的理由。如果失去了你们在希腊组织内战这一借口，目前他们也就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当然，如果你们相信游击队有获胜的可能，那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对此有点怀疑。

季：我们这方面的消息不多。

斯：你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你们通报更多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要签署一个就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必须遵守协商的纪要。

季：我们遵守这一条。

斯：同保加利亚缔结条约一事不会久拖。这个月 15 号匈牙利人来访。然后是同芬兰人会谈，随后就同你们谈。

莫：在一个条约中讲到要消灭侵略的所有策源地。这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多余地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炮弹。在其他条约中已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多加一句？你们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吗？

斯：这是左得可爱。

莫：不能赞成联合国反对侵略的每一项倡议。他们也可以通过旨在反对我们的倡议，当年我们对付芬兰时，国联不也是宣称我们是侵略者吗？南斯拉夫朋友不让阿尔巴尼亚购买我国的 5000 吨燕麦，却让它在阿根廷去采购！

斯：南斯拉夫人显然是害怕我们从他们手里夺走阿尔巴尼亚。你们可以夺取阿尔巴尼亚，但应该明智一些。

根据协调经济计划的安排，你们把自己的主权和罗马尼亚的主权都作了限制。

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而又顺理成章的：

- (1)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 (2)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 (3)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只有这种联邦才是可能而又现实的。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邦联是一种臆想。

科（斯托夫）：那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加速建立保南联邦的方

针呢？

斯：你们成立联邦吧，如果你们愿意，明天就成立！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们仅仅是反对那种青年人（心血来潮）式的联合方式。筹建联邦应该使国内的社会舆论和外界能接受。

卡德尔：我们想，甚至同保加利亚也不必急于成立联邦，主要是考虑到国际的原因。因为这可能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

斯：你们这里又错了。你们不应该拖延南、保、阿三国的联合。但是，各国的议会必须委托各自政府开始关于联合的谈判。最好是先从政治联合开始，然后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这样，这一举动就不会成为进攻的借口。原先成立联邦为时尚早，因为尚未跟保加利亚缔结和约。而现在，目前保加利亚是一个正常的和享有与大家同等权利的国家。我个人认为，你们现在不是要推迟，而最好是加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通过各国议会来实现联合，一切都会很好。联邦能解决一切问题。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不仅种族接近，而且生活习惯非常相似，每个人都将理解这种联合。同样，阿尔巴尼亚人也可以在联邦里得到好处。因为一个统一的阿尔巴尼亚其人口将增加一倍。

应该为实现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联邦而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民族文化，巩固它的军队。否则，波兰指望我们，而你们指望波兰，谁也无所作为。没有必要脱离九国共产党决议的精神。

莫：如果需要消灭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说的侵略策源地，你们可以做，但没有任何必要去大肆宣扬。现在人们想抓住一言一语作文章。

科：我们认为，希腊游击运动的失败将对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局势。

斯：当然，游击队需要支持。但是，假使某个国家的游击运动前景暗淡，那最好还是将斗争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期。当力量对比不行的时候，不必去唉声叹气。需要对力量作出理智的分析。如果某个时期力量不行，不应拒不承认这点。形势不利时，游击运动会收缩，今

天不行，明天就会行，你们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你们受到“道义上”的影响。假若你们举不起要你们举起的重量，就应该承认举不动：你们不应害怕道义上“须绝对执行的命令”这一问题。我们没有这种“须绝对执行的命令”。整个问题是要看力量对比。假使行，你就出击！假使不行，千万别投入战斗。我们接受战斗不是因为敌人希望我们参加战斗，而在于我们的利益。

卡：要花几个月时间来搞清这个问题，看看游击队的前景到底怎样。

斯：好，那你们就等一等。也许你们是对的。

我对中国人将取胜同样表示过怀疑，曾劝他们暂时跟蒋介石达成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而事实上继续干着，继续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后来，他们公开讲：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他们说：好，那你们需要什么？事实说明，他们的基础非常牢固。他们是对的，而我们错了。也许这次你们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行动牢靠。

科：美国人会让游击队取胜吗？

斯：不用去问他们。假若有能力获胜，又有人去动员人民的力量，就应该坚持斗争。不要认为在希腊无所作为，失去了一切。周邻国家应该最后一批承认马尔科斯将军政府，让那些较遥远的国家先承认它。

莫：季米特洛夫同志反对卢尔切夫（卢系保社民党反对派首领——译者）。反对派的讲话也是错误的，这一讲话现在被敌人广泛利用。这么做有什么必要呢？

季：这主要是基于国内时局的考虑，不能让他们重新抬头。

斯：对付反对派还是让于哥夫谈一谈，他有一套办法。

卡：我们认为，我们之间没有实质性分歧，只有个别的错误。

斯：这不是个别错误，而是系统的错误。

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里，可以用捷克模式来制约：一旦捷克

遭到德国或同德国结盟国家的进攻，如果另一方也面临进攻的危险，那相互协商的条款就可以生效。

帮助犹太人迁居到巴勒斯坦，这是按联合国向巴勒斯坦迁移 40 万人的决议进行的，联合国对犹太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这样，英国人就没有任何权利抗议。

科：做一个落后的小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提出巴尔干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协调计划问题，是须要互相帮助的，以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

斯：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同南斯拉夫结为关税同盟，可以统一起来。但是，我没有看到同罗马尼亚建立关税同盟和协调计划对你们有什么帮助。罗马尼亚人可以将他们的商品销售到他们认为有利的地方。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 第 446-453 页

关于南斯拉夫

对铁托无理指责红军的来信的回复

(1944年10月31日)

我理解您在解放贝尔格莱德后的困难处境。您应该清楚，苏联政府尽管牺牲巨大，伤亡惨重，还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你们。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你们竟然把红军中个别官兵的个别事件和过失归结并扩大成整个红军的行为。帮助你们赶走德国人、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流血的军队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的。不难理解，家中难免有丑儿，但因为有一个丑儿全家人都要受到凌辱，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红军战士们知道，吉拉斯同志和那些不制止他的人都认为英国军官在道德方面要好于苏联军官，那他们会因为这种不公正的侮辱而大叫起来。

.....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 第572页

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赫布朗的 会谈记录

(1945年1月9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维·米·莫洛托夫、А. Ф. 基谢廖夫和B. M. 萨哈罗夫。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

代表团成员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候后，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是否一路顺利，赫布朗^①用俄语回答：“非常顺利”。赫布朗口头转达了铁托元帅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带来了什么问题。

赫布朗回答，有三类问题：一、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问题，二、南斯拉夫的外交要求，三、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和组织问题。

赫布朗在谈到需要苏联经济援助时说，首先需要粮食援助，不过，除粮食外，南斯拉夫还想从苏联得到南斯拉夫一些工厂必需的原料、军用和民用服装及靴子、卫生物资、大学和中小学用的设备、宣传物资（新闻纸、书籍，油墨，等等）。

^① 赫布朗，时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访问苏联的南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48年因反对铁托集团的反共反苏政策遭南当局逮捕，1951年6月在狱中自杀。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过什么援助。

赫布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补充说，根据租借法案从盟国得到过某些援助。

斯大林同志指出，也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援助；接着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匈牙利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大约9亿美元的严重物质损失，因此，南斯拉夫要求赔偿损失。

斯大林同志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德国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他们还打算参加对德国某些地区的占领。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正就匈牙利媾和的条件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进行谈判。看来，匈牙利的战争赔款额将为3亿美元，即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赔款额一样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大量战争赔款，因为他们认为，大量战争赔款会削弱匈牙利，匈牙利的购买力会减弱。

赫布朗说，战争赔款额太小，并说他明白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反对增加赔款额，因为他们害怕匈牙利太弱。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煤炭生产如何。

赫布朗回答，过去南斯拉夫开采煤炭，但产量很低，现在的煤炭产量更低，储量减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从匈牙利获得煤炭，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对南斯拉夫的全面经济援助时说，现在，在战争时期，苏联不可能给予南斯拉夫大量的经济援助；将来可能会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战争正在进行，不可能给予大量援助。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是否收到了粮食。

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但是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北部提供的粮食也算在了俄罗斯提供的粮食账上。照赫布朗的说法，这不是俄罗斯的粮食。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部分粮食可以算是红军缴获的战利品，这完全合乎情理。斯大林同志接着补充说，南斯拉夫夫人对战利品问题总是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托，认为红军应当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一切留给南斯拉夫人，这是不对的。战利品属于缴获它的那支军队所有。如果军队知道缴获的东西必须送人，它就不会努力夺取战利品。军队不仅想在战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立功，而且想在夺取敌人的物资，即战利品方面立功。要求红军交出所有的战利品是不对的。

赫布朗说，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粮食运往匈牙利，这给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许多南斯拉夫夫人对此不能正确地理解。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粮食是运给红军的，与红军驻扎在哪里根本没有关系；粮食运往匈牙利是给红军的，它没有稳定的粮食供应就不能作战。军队浴血奋战，却认为他们偷了东西，这是对红军的侮辱。斯大林同志提到了吉拉斯的言论，他曾经说，苏联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比英国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差。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侮辱。不能根据个别情况概括一支军队，不能因一个丑恶的人就侮辱整个红军。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三千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精疲力尽。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观点是不正确的。英国军官在希腊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会有个别情况给我们战士脸上抹黑，我们为此也枪毙了人。不过必须记住，他们精疲力尽了，精神已经紧张到极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什么事都允许干，什么事都可以干。斯大林同志讲了最近的一件事，有个飞行员，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在一个地方聚众畅饮，在那里打死

了一个人。他被关进监狱，应当枪毙。调查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完全喝醉了，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保释了这名飞行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飞行员。现在已经将他释放，派到了前线。必须记住，战士随时都有危险，特别是飞行员，不仅在战斗中有危险，而且只要在天上随时都有危险。德国人不那么容易打，然后还要追击他们。由于精疲力尽，人们失去了平衡，不能用通常的尺度去衡量他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给予南斯拉夫物质援助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归纳，他说，会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会进行援助。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军事问题上，他说，在军事方面，南斯拉夫期望得到苏联的两种援助：军事装备和人员（教官和顾问），期望帮助南斯拉夫建立一支按现代化标准组织的军队。

约万诺维奇在对赫布朗的讲话作补充时强调，南斯拉夫已经有这样一支军队的骨干和基础。必须组建军队的中央领导机构，即总参谋部、集团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和和其他较大的司令部。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南斯拉夫军队有多少个师。

约万诺维奇回答：现有 50 个师，51.8 万人。随着南斯拉夫全境的解放，将再动员 30 万人。50 个师中有小规模游击队师，应当进行改编。这样一来，师的总数将减少到 40 个。打算将来组建 3 个集团军，另外组建 12 个军。每个集团军 5 个师，每个军 3 个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一个师现在有多少门火炮。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现在一个师有 72 门火炮，其中包括迫击炮，南斯拉夫人想把 1.25 万人的师的火炮数量增加到 84 门。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么多大型师不现实，建如此多的师，军官不够。**斯大林**同志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曾经动员了 20 个师的兵力，但是军官不够：于是不得不把师的数量压缩到 10 个，其中 5 个师现在在前线，另 5 个师最近也将调往前线。**斯大林**同志说，不过，这将是些优良师。师的编制为 8000-9000 人。如果南斯拉夫有 20 个师，但

都是优良师，这就很好了。问题不在数量。师可以很多，但是其价值却很小，必须培养军官，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是 20 个师，这已经很多了，不应热衷于数量。斯大林同志又说，中国抗战持续了 8 年，但是那里学习抓得不紧。建了 400 个师，但是又不培养军官，因此，他们的军官不行。前不久，日本人从北进犯，8 个日本师打败了 43 个中国师。

考虑到南斯拉夫缺乏军官这一实际情况，斯大林同志谈了一个想法：应当用轻型火炮装备几个游击队师，把它们留在后方。师的编制应当少于 1.3 万人。斯大林同志说，对南斯拉夫来说，20 个师就够了，这就很好了，以后每个师可以扩编成军，1 个师就成了 3 个师。师多了供养很困难，它们打起仗来是不会顽强的。斯大林同志提醒他们注意这件事情的困难，并说，目标必须提出来，但是现在达不到，师不过是纸上的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怎么建设：是统一指挥，还是塞尔维亚军队、克罗地亚军队和其他军队分立。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统一指挥。

斯大林同志问，语言怎么办，通用哪种语言。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通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只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使用，因为这两种语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不同。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会帮助组建司令部：我们给人，给我们的条令：但是南斯拉夫必须有自己的军官，有好的连长、营长。南斯拉夫过去有这样的军官，因为南斯拉夫当年有一支很好的军队，南斯拉夫人主要是拜过法国人为师。

约万诺维奇说，现在南斯拉夫士兵的战斗力也很强。基谢廖夫补充说这个军队毕竟还不顽强，并且举了一个实例：南斯拉夫第 21 师在敌人不大的压力下就溃退了，而且损失了一部分火炮。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德国人有，我们也有。

斯大林同志询问南斯拉夫军队将来采取什么样的编制。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军队有两种编制方案。按第一种方案，每个师都是正规的整编师，按第二种方案，部分师为非满员师。对这类师的司令部，已经详细研究过。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以采用旅的编制，并以红军的经验为例说明，1942年红军的编成中有100-120个旅，每个旅的编制为4500-5000人。这些旅英勇善战，后来变成了师。这样的旅非常容易指挥，当指挥员有了经验，他们也能统率正规师。也许，南斯拉夫应当有7-10个1万人编制的师，其他师改编为旅，好让年轻的军官获得管理和指挥的经验。这种旅甚至可以叫做师。以后可以再把它打变成正规的现代化师，不过现在应当让军官成长。1942年红军就是这么做的，后来这些旅扩编成了师。斯大林同志说，游击队员必须训练，他们不适用于现代化的军队。当红军在游击区会合后，就把游击队撤到了后方，一部分游击队员留在部队或者送去学习，其他的都被遣散了。在后方他们是好样的，但是进行野战不行：他们不想进行野战，也不习惯军队的纪律。

约万诺维奇说，在南斯拉夫建40个师的干部是足够的。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须知必须指挥他们，指挥这些师。斯大林同志在阐述这一想法时说，德国人是很会打仗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军官就不可能有军队，因此，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就把所有的军官抓起来押往德国，他们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法国都搜捕军官。戴高乐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时就抱怨法国缺乏军官。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回到南斯拉夫今年师的编制问题上，他谈了一个想法：也许应当建7000-8000人的师。斯大林同志接着说，对游击队员必须严格要求，严加约束，使他们适应现代化的军队。对这一点他们往往不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训练他们。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人是否正在从南斯拉夫撤离。

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一些方向上构筑工事。

斯大林同志说，德国人将会争夺萨格勒布，争夺卢布尔雅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据点能掩护驻意大利德军集团的侧翼。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哪些地区解放了。

约万诺维奇回答：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几乎全境以及伏伊伏丁那已经解放。德国人在利卡和克罗地亚滨海地区防御得特别顽强。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又回到南斯拉夫军队的编制问题上，他指出，先和我们的人商量一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编什么样的师，编多少师。用不着编大型师。日本人一个师以前是2万人，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把一个师的兵力压缩到1.7万人或者更少。斯大林同志说，一个师的正规编制为1.2万-1.3万人。指挥干部问题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培养指挥员必须花数年的时间。

斯大林同志问，过去预定向南斯拉夫提供的装备，南斯拉夫已经收到了多少。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已经收到近10个师的装备。

斯大林同志命令查清已经收到什么装备。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还得解决建什么样的师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所有的问题将和布尔加宁同志和安东诺夫将军讨论。

约万诺维奇请求向南斯拉夫军队派遣教官，并说，已经规定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义务。他们将享有相应部队副指挥员的权力，可以向上一级报告自己的意见。还规定苏联教官着南斯拉夫军装。

斯大林同志说，教官穿南斯拉夫军装的话应当懂南斯拉夫的语言，否则，穿南斯拉夫军装没有意义。波兰的经验表明，苏联军官穿了波兰军装，但不会说波兰话，化装没起到作用。这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教官应当只是教官、顾问。他无权取消指挥员的决定，也不能将决定

强加于指挥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目前可以提供教官。斯大林同志又说，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弱点就是靠顾问，南斯拉夫人什么时候明白顾问会离开，他就知道必须学习了。

斯大林同志谈了由于新的轻便火炮的生产我们炮兵编成的一些变化，并问，一个南斯拉夫师应当有多少门不小于72毫米口径的火炮。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这样的火炮应当有36门。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是否需要缴获的装备。

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还需要弹药。

斯大林同志说：“当然”。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

基谢廖夫将军说，初步打算建几个兵种（炮兵、坦克部队、工程部队），它们也需要装备及其他物资。还要给南斯拉夫军队建3个包括供应机关、指挥机关和后方机关在内的军事机构。

约万诺维奇特别强调了急需运输工具，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整个军事机构和后方服务机构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原有的公路和运输工具都毁坏了；国内马匹很少。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汽车运输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不仅要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而且主要是汽车运输需要大量汽油，这个问题难得多。不过，将为较重型的花炮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所有的轻型火炮必须靠骡马拖运。

斯大林同志问，初步打算具体建什么样的坦克部队和工程部队。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初步打算建4个坦克旅、9个工程兵营和2个高炮团。此外，预计在最近3年内培训好南斯拉夫的空军人员，并从苏联得到8-10个航空师的技术装备（约1000架飞机）。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正在向南斯拉夫人移交的2个航空师的装备，干部培训进行得怎么样。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由于缺少足够数量的教练机，训练有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从总的方面说怎么为军队培养军官，有没有军事学院。

约万诺维奇说，有分别培训炮兵、机枪手和通讯人员的军官学校。炮兵干部的培训情况最好。南斯拉夫没有军事学院，不过初步打算建立联合军官学校，培训初级和中级军官，办高级指挥员进修班。

斯大林同志指出，除了为单个兵种，如机枪手、坦克兵和炮兵培养军官外，还必须培养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员。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发扬南斯拉夫训练和培养军事专业人才的传统。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还有什么军事方面的问题。

约万诺维奇说，主要问题都谈过了，只有一个请求：为军事测绘研究所提供设备，贝尔格莱德原有的设备被德国人运走了，还有一部分给了保加利亚人。

军事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斯大林同志请南斯拉夫方面阐述实质性的政治问题。

赫布朗首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要求。他说，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州及其首府佩奇市蕴藏的煤，对南斯拉夫的经济至关重要。该州居民基本上是匈牙利人，但是也有一定数量的斯拉夫人。该州连同佩奇的几个矿场必须并入南斯拉夫；另外，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还包括，将所谓的包姚三角地，即匈牙利的首府为包亚市的州并入南斯拉夫。该州是历史上巴兰尼亚省的一部分，有许多斯拉夫人。

斯大林同志插话：“匈牙利人同意吗？”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拥有这些州对南斯拉夫至关重要，也许，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些州。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人去占领晚了一些，又说他也不怜悯匈牙利，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强烈反对这样做。在解决领土问题上他们主要遵循的是民族原则。斯大林同志又说，生活在这些区的南斯拉

夫人必须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必须做出决定，大声疾呼。必须为合并进行斗争。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人是否知道德国人在伦蒂市地区每年开采 5000 吨石油的消息。

赫布朗和约万诺维奇回答说不知道，之后，**斯大林**同志在地图上给他们指出了这一石油产地。

赫布朗请求让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对匈牙利和谈问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说，这要力争，我们方面不会反对。

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该委员会问题交换了意见。

赫布朗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要求。南斯拉夫人提出，将科鲁什州（现属奥地利卡林西亚省）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那一部分并入南斯拉夫。第一次大战后该州属南斯拉夫，但是那里举行全民投票后并入了奥地利。

赫布朗又说，现属意大利的伊斯特拉半岛，连同的里雅斯特港、包拉港和里耶卡（阜姆）港，也必须并入南斯拉夫。伊斯特拉半岛的居民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只有港口城市有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赫布朗出示了该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面标有南斯拉夫所要求的边界。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让这些州自己要求并入南斯拉夫。

赫布朗讲，去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法西斯议会应这些州人民关于并入南斯拉夫的要求，提出了相应的合并决定。其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议会也批准了这些决定。

赫布朗接着说，从战争最初的日子至今，这些州就有广泛开展的南斯拉夫人游击运动。

约万诺维奇补充说，现在，南斯拉夫的两个军、一个师和几支游

击队在这些州作战。这些州完全掌握在南斯拉夫人手中。

赫布朗继续说道，在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阜姆）只有人数不多的几个自治分子团体，他们在英国人的保护下，要求给予该地区自治权。

斯大林同志询问了这些团体有多少人，当知道数量微不足道时，半开玩笑地说把他们淹死。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讲了同丘吉尔的非正式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丘吉尔建议将伊斯特拉半岛划出，成为一个自治州，它能使未来的奥地利得到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罗马尼亚问题上，阐述了南斯拉夫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即将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地区的领土，包括蒂米什瓦尔市，并入南斯拉夫。赫布朗对此提出的根据是，该地区有一个县的居民全是塞尔维亚人。蒂米什瓦尔市的居民以前主要是德国人，现在也可以交给南斯拉夫。

斯大林同志问报刊上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文章，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说，必须让该地区的人民，即塞尔维亚人，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总之，这是将来和会讨论的问题。不过，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和会上，必须有众所周知的证据。

赫布朗还请求改变与罗马尼亚在雷希察市地区的边界，因为这座位于罗马尼亚领土上而离南斯拉夫边界只有 20 公里的城市，有几个南斯拉夫非常需要的制铁厂。如果不能将雷希察并入南斯拉夫，那么，保证南斯拉夫通过其他途径从这些工厂获得钢铁，对南斯拉夫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赫布朗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赫布朗称，事情进展非常艰难，过错在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不接受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他看过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不合适，保加利亚和

南斯拉夫是可以加入联邦的两个国家，而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根据南斯拉夫人现在建议的联邦条约，保加利亚人将获得与南斯拉夫各民族诸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平等的权利，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个条约草案有吞并他们的意图。必须向完全联合努力，这将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但是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朝这一目标走，先从联盟，从互相援助开始，然后逐步走向联合。这不是权宜的联盟，而是永久的联盟。这是自由的联盟，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

赫布朗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人希望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是力图缓解保加利亚解决马其顿问题的困难，摆脱它因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陷人的那种孤立状态的困难。条约能使保加利亚人逃避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责任。从另一方面说，保加利亚可以保留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接受签署互助条约的建议，并于1月初通过了联邦条约的新方案，新方案的基础也不是二重原则，而是保加利亚加入联邦，享有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各个民族将享有的同等权利。由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的话，将来的联邦能够通过内部努力正确地影响保加利亚。联邦条约在南斯拉夫将很容易获得通过。按照规定，条约应当由南斯拉夫各联邦成员诸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联邦条约的第一个方案时，认为条约应在1944年12月31日签署，1945年1月1日宣布。初步打算1月1日隆重庆祝条约签署。所有的问题，乃至细节都作了规定：找好了举行庆祝活动的礼堂，指定了乐队，等等。但是，南斯拉夫的方案没有被接受，保加利亚同志通知说，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劝阻了他们，他建议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不正确，遂于1月初提出了另一个联邦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保加利亚人要联盟，他们要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这很好，最好签署 10 年或者 20 年的友好互助条约，现在应当把二元制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按奥匈帝国模式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但是又避免了旧奥匈帝国存在的许多弊端。

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 and 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必须准备基于二元制原则上的联邦制联合。

莫洛托夫同志强调，即使友好互助条约也会使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害怕，使罗马尼亚人害怕，欧洲会一片慌乱。这将是欧洲的一个大事件，大家都害怕，只有苏联一家不害怕。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交换了意见。捷克人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们支持斯拉夫人团结的原则，但是，他们害怕这是左派斯拉夫人的联合。此外，这将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关系，斯洛伐克人可能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类似的措施。

斯大林同志问对希腊有什么要求。

赫布朗回答说，南斯拉夫打算得到希腊的马其顿和萨洛尼卡。这些要求过去没有提，以免给希腊人民解放军造成困难，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国内的地位，给它的地位造成困难。现在，要提出这个要求了。

莫洛托夫同志说，希腊的马其顿人自己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们和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都是敌对关系，好像你们打算和全世界打仗；造成这种局面没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询问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

赫布朗回答说，过去，在被占领时期，他们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很不好，不过，最近他们表现很好。

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是否认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退出帕潘德里

欧政府^①是正确的。

赫布朗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没有征求我们意见而迈出的不正确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询问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赫布朗称，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中有各党派的代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索古国王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国内有不人的反动团体，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没有危险。

赫布朗继续讲道，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前不久访问贝尔格莱德时，签署了南阿友好互助条约，还签署了贸易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既然南斯拉夫承担了条约义务，那么它就应当履行条约义务。一旦出了麻烦就不得不打仗，它能不能打英国，它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这还是个问题。对阿尔巴尼亚应当慎重。英国人只承认实力。贝尔格莱德解放了，这很好，这又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人害怕红军向希腊开进，假如红军朝那里开进，那里的局面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在希腊没有海军就一事无成。英国人看到红军没有向希腊开进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理解不允许军队采取分散运动的战略。红军的战略是建立在集中运动基础之上的。

斯大林同志又询问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情况。

约万诺维奇回答，阿尔巴尼亚有三个军，由八个师组成。

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和英国人打仗。关于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互助条约还没有批准，没有宣布，这很好。建议2月以前不公布条约。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是什么政府，是全国委员会还是临时政府。

^① 指1944年4月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组成的新一届希腊流亡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前不久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已经向同盟国政府提出了承认的问题，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至今没有得到承认。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人是否承认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还没有承认，在地拉那只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承认了保加利亚政府，保加利亚政府是否承认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赫布朗回答说，保加利亚在贝尔格莱德有部长级公使托多罗夫，而在索非亚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和贸易使团。

斯大林同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按照国际关系法，好像应当先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再签署条约和协定。接着，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南斯拉夫组建政府的事怎么样。

赫布朗回答说，舒巴希奇^①到达伦敦后收到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赞成舒巴希奇与铁托签署再经修订的协议，并表示希望尽快组建南斯拉夫政府。但是可以看出，英国人故意拖延统一政府的组建（我们给舒巴希奇的期限是12月31日前），这对南斯拉夫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负作用。

前不久，贝尔格莱德给在伦敦的舒巴希奇发了封电报，电报指出，组建新政府的时间不能迟于1月下半月。

赫布朗称，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所持的态度是；如果1月15日前不能组成统一政府，那么，就宣布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不应宣布全国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应当得到承认，英国人和美国人大概不会承认它，苏联政府倒是可以承认，但是现在它还受波兰事务的牵制。在波兰问题上，苏联政

① 舒巴希奇，战时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首相，后参加南斯拉夫联合政府。

府不顾英国和美国的简单态度，承认了临时政府，丘吉尔吞下了这颗苦果，而罗斯福垂头丧气，现在还在生气。

斯大林同志建议，在2份之前，当许多问题还没有明朗之时，暂缓宣布成立政府，

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的推测：丘吉尔由于在希腊得手非常得意，正在寻找借口在南斯拉夫故伎重演。不应在这件事上给丘吉尔帮忙。当然，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打败对南斯拉夫也是坏事。希腊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进攻抗衡。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退出了帕潘德里欧政府，他们做得不对。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了。在南斯拉夫不要发生争斗，不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不能给他借口，而丘吉尔正在寻找这样的借口。丘吉尔在希腊很多方面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故伎重演不会那么容易，何况还怕我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挑起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事是否合适表示了怀疑。他又说，首先应当力求把政府的组成明确下来。丘吉尔认为，铁托-舒巴希奇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为不论是铁托还是舒巴希奇，都是克罗地亚人。但是英国人失算了，这一点现在看得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南斯拉夫方面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我们的意见，否则，我们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斯大林同志在谈话过程中说了句：从族系上说，阿尔巴尼亚人也是斯拉夫人。他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想自信，必须有实力。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你不能进攻，那就以守为攻，积蓄力量，然后再进攻，对待资产阶级政客必须谨慎从事。他们资产阶级政客胸怀非常狭窄，报复心很强。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如果感情用事，一定会输的。列宁当年没有想过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争取到的这种力量对比。列宁当时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将进攻我们，倘若某个很远的国家，譬如美国是中立国，那就很好了。而现在的结果是一些资产阶级反对

我们，另一些资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过去列宁没有想过可以与一派资产阶级结盟，和另一派资产阶级打仗。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左右我们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性、分析、权衡。

在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分组讨论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并允诺挑选权威人士参加讨论。

赫布朗在告别时转达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全体人员的请求：允许代表团在回国前会见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会谈持续了 3 小时 15 分钟。

（记录：基谢廖夫少将，萨哈罗夫少校）

南斯拉夫人想要……、想要……

(1945年1月10日)

1945年1月10日

斯大林来电话：昨天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南斯拉夫人对我说，他们向保加利亚人建议说让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并拥有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相同的权力。但保加利亚人没有同意，而坚持建立平等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盟国家。我说，保加利亚人是对的，而南斯拉夫人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该在平等的原则上建立二元国家，有点像以前的奥匈。否则，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会意味着对保加利亚的吞并。况且，南斯拉夫人还没有政府，无法与保加利亚签订条约。他们要求保加利亚人向贝尔格莱德派出外交代表，但保加利亚政府不能派出外交代表，而只能向全国委员会派出政治代表。最好从互助条约着手，然后进行下一步。

南斯拉夫人缺乏经验，保加利亚人显然更有经验一些。

我建议希腊不要开始这项斗争。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不应该从潘帕德里欧政府中撤出来。他们忙的是自己所力不从心的工作。看来，他们指望红军会南下到爱琴海。但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也向希腊派遣自己的军队。希腊人干了傻事。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境内的马其顿地区。他们也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这是不明智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赫布朗看来比较明智，理解我所说的意思，但在贝尔格莱德的其他人不理解。

对于科拉罗夫启程赴保，我担心他的到达会令农民联盟的人和其

他人不愉快，他们会挑剔他的履历，掀起非议，利用他的到来引发关于保加利亚苏联化之类的议论。此外，现在的政府最好能够保留，可能的话，得到扩大……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第328-329页

同铁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7日)

秘密

在座的有：

苏联方面——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А. И. 拉夫连季耶夫；

南斯拉夫方面——内务部长亚·兰科维奇、总参谋长科·波波维奇中将、塞尔维亚部长会议主席涅什科维奇、斯洛文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德里奇、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

谈话开始时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如果要给的里雅斯特制定自由市条例，那么是只包括市区还是也包括市郊，哪一种条例好些——是梅梅尔型的还是但泽型的。

铁托回答说，市郊住的是斯洛文尼亚人。可以只包括市区。但他以后仍要坚持把的里雅斯特并入南斯拉夫版图。随后铁托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对苏联代表团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审议意大利—南斯拉夫边界问题时给予的支持向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介绍了梅梅尔条例和但泽条例的不同之处，指出，梅梅尔型的条例更有利。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南斯拉夫工业和农业的情况怎么样。

铁托回答说，所有的土地都播种了，可望有中等水平的收成，并说工业运行状况良好。

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铁托列出南斯拉夫代表团今晚想谈的几个问题。

铁托提了以下几个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铁托说，南斯拉夫不想向美国借款。美国即使同意提供借款，也会要求南斯拉夫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南斯拉夫没有进一步发展工业的资金。南斯拉夫政府想得到苏联的帮助，主要是通过建立苏联—南斯拉夫合营公司的方式。南斯拉夫有足够的矿产资源，但它没有能力组织生产，因为没有所需的机器。比如，南斯拉夫有石油，但没有钻机。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会提供帮助的。

对斯大林同志关于南斯拉夫是否生产铝、铜和铅的问题，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指出，南斯拉夫有很多铝土矿和矿石可供生产这些金属。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贸部向南斯拉夫人表明它准备进行关于组建合营公司的谈判，但没有从南斯拉夫人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因此造成一种南斯拉夫不想建立这些公司的印象。

铁托不同意这一说法，说恰恰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向萨奇科夫大使表示过南斯拉夫政府建立苏联—南斯拉夫合营公司的愿望。

对斯大林同志关于苏联—南斯拉夫合营公司建立以后是否允许其他强国进入南斯拉夫经济的问题，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允许其他强国的资本流入自己的经济。

稍后，**斯大林**同志小结说，既然如此，苏联—南斯拉夫的经济合作可以建立在建立合营公司的基础上。

铁托肯定了这一点，说他打算明天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建议。

关于军事合作问题铁托说，南斯拉夫政府想以信贷的方式，而不是双方结算的贸易方式从苏联得到满足南斯拉夫军事需要的供货。南斯拉夫拥有规模不大的军事工业，能生产迫击炮和地雷。在许多方面

都是人才济济。但没有相应的设备，因为被德国人掠走了。南斯拉夫政府想以抵偿战争赔款的方式从德国得到部分机器以恢复某些军工厂的生产。但南斯拉夫自己毕竟无法满足本国的所有军事需要，因此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应该有几个军工厂，比如飞机厂，因为南斯拉夫有丰富的铝土资源来生产铝。也要有制造大炮的工厂。

铁托指出，可以在苏联铸造炮身，而在南斯拉夫进行加工。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有关南斯拉夫海疆的问题时说，为了保卫海疆要有一支好的舰队。要有鱼雷艇、护卫艇和装甲艇。尽管苏联在这个领域并不强，但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我们会提供帮助的。

关于阿尔巴尼亚，**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局势不明朗。有消息说，阿共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有什么事情。有报告说，科切·左泽想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来莫斯科研讨几个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达了和佐泽一起来莫斯科的愿望。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情况他是否有所了解。

铁托声明自己不了解这些问题并回答说，霍查近期内打算去贝尔格莱德。因此他，铁托，认为可以答复阿尔巴尼亚人说，佐泽和霍查来莫斯科的问题将在霍查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后再予考虑。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我们一直试图让阿尔巴尼亚人打消来莫斯科的想法，但阿尔巴尼亚人坚持要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到莫斯科来可能会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良反应，这将使阿尔巴尼亚的对外政治局面更加复杂。

接着**斯大林**同志问铁托，恩维尔·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联邦的版图。

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目前同时解决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版图问题

和的里雅斯特问题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将很困难。

铁托对此表示同意。

因此，**斯大林**同志接着说道，首先应当讨论的是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友好互助的问题。

铁托说，这个条约主要应该对保卫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作出规定。

斯大林同志说，要研究这个条约的表达方式并使阿尔巴尼亚进一步靠近南斯拉夫。

斯大林同志谈到保加利亚加入联邦的问题。

铁托说，联邦不会有结果的。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这件事应当做。”

铁托声称，联邦不会有结果是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此外，保加利亚国内其他党的影响很大，而南斯拉夫尽管有其他党派，但整个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用不着担心。初期可以只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而实际上应当多做一些。

铁托对此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现在由于还没有和保加利亚缔结和平条约而可能出现一些困难。保加利亚被看作昔日的一个敌对大国。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不该有本质上的意义。众所周知，当波兰还没有得到其他强国的承认时，苏联就和波兰签订了友好条约。

随后**斯大林**同志对谈话作总结说，对南斯拉夫政府在经济问题以及军事事务方面的要求是可以作出安排的。现在需要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些问题。

铁托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情况。他首先谈到拉科西的贝尔格莱德之行。铁托声称，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在外

长会议上提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问题（对博尼三角区^①）。铁托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签署了赔款支付协议表示满意。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匈牙利想和南斯拉夫建立和平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应该支持这种意愿，因为对于南斯拉夫来说主要的困难在于和希腊及意大利的关系上。

拉夫连季耶夫记录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第45全宗，第1目录，第397卷宗，第107—110页。可信副本。

① 原件如此。应为“博约三角区”，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边境上，中心是博约市。

关于阿尔巴尼亚局势给铁托的信

（节录）

（1947年12月23日）

……根据您的建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同波波维奇同志^①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谈了两次话。由于在这两次谈话中发现了新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您最好能派一位负责同志来莫斯科，可能的话，就派吉拉斯^②或其他最了解阿尔巴尼亚局势的同志来。我准备满足您的所有愿望，但是我需要正确地了解这些愿望。

致同志式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47年12月23日

① 波波维奇，时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

② 吉拉斯，时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年3月27日)

致铁托同志并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

你们3月18日和20日的回信均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了结，因为你们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依然认为有过对加加里诺夫的诽谤性指控。

所谓克鲁季科夫同志讲的苏联政府曾拒绝在今年举行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同志断然否认强加于他的那种事情。

二、关于撤回事顾问的问题，我们的消息来源于武装力量部代表的反映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国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而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比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的数量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无意强迫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顾问。

但是，后来包括科切·波波维奇在内的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认为，可以声明必须把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减少到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军事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声称，苏军的条令是刻板公式，陈规旧俗，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还有人毫不掩饰地暗示，苏联军事顾问白拿薪饷，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

方面还不如英军军官。但是，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言论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此，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不是与苏联政府友好地进行磋商和解决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而是污辱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声誉。

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造成不友好的气氛。如果认为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同意把自己的军事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败坏苏军声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承担责任。

三、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

你们的声明，即似乎斯尔曾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苏联专家如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完全不符合事实。请看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

“基德里奇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助手斯尔曾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决定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杰夫。所以，不论过去有过什么许诺，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国家安全机构受命监督此事，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想亲自与列别杰夫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可以看出，斯尔曾蒂奇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从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取必要的经济情报的一些经济机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中央和政府交涉，那是可笑的。

其次，真实情况显然与你们在来信中所述的完全相反，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看，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代表确实受到了南斯拉夫安全机

构的控制和监视。

不妨指出，这种监视苏联代表的做法我们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才会遇到，而且那也不是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时应当指出，南斯拉夫安全机构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还监视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显然，对业已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也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这就是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其军事和文职专家的原因。

四、你们在来信中还希望向你们通报引起苏联不满和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其他事实。这种事实的确存在，虽然它们与撤回文职和军事专家没有联系，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通报这些事实。

第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种种反苏言论，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辞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从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些关于苏联的言论，当然让人觉得好笑。但问题在于，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中久已流传，如今还在流传，这自然正在造成一种恶化联共（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权批评联共（布），如同联共（布）也有权批评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一样。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该是公开的，真诚的，而不能是背地里的，诽谤性的，从而剥夺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然而，南斯拉夫活动家们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和真诚的，而是背地里的和没有

诚意的，同时还具有两面派性质，因为他们一面背地里以其“批评”来败坏联共（布）的声誉，一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正因为如此，这种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联共（布）声誉、丑化苏维埃制度的手段。

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托洛茨基打算向联共（布）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责联共（布）蜕化变质、犯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开始的。当然，他左右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了所有这一切。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而当他被揭露后，他便公开转到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以发人深省。

第二，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我们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迄今尚未完全合法化；仍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构的决定通常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也从不公布。

在南共党内生活中看不到有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实际上受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应该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在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达到应有程度的原因。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是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看不到有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

分正在农村中迅速增长，在城市中也很活跃，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搞得昏昏沉沉，而这个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沿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主要的实际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溶入人民阵线。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人民阵线纲领的另外的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这个关于党组织的奇怪理论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其实这里毫无新先西。早在40年前，俄国一部分孟什维克就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认为这些孟什维克是用心险恶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第三，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①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的同志们都知道，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他们甚至还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也认为韦莱比特是间谍。尽管如此，韦莱比特依然是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

^① 韦莱比特，194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军事使团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军事使团团团长，回国后历任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往来置于英国间谍的监督之下。显然，由于韦莱比特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领导层，苏联政府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的境地，不可能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通信往来。

这就是引起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不满并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事实。

如上所述，这些事实与撤回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恶化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签名）

约·斯大林（签名）

1948年3月27日于莫斯科

附录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

（节录）

（1948年6月28日）

一、情报局着重指出，近来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实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情报局赞成联共（布）中央的行动，即主动揭发南共中央的错误政策，特别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同志的错误政策。

二、情报局宣布：南共领导正在执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斯拉夫执行了一个诽谤苏联军事专家和损害苏联名誉的下流政策。南斯拉夫为苏联文职专家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规定，从而使他们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的监视，并经常被跟踪。联共（布）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官方代表，都曾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跟踪和监视。

所有这些事实和一些类似的事实都说明，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和共产党人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们已经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方法对待苏联。南共中央这种反苏立场造成的结果，就是使那些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里借来的诸如联共（布）已经“变质”，苏联已经“变质”等等的诽谤性宣传广为流传。

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种反苏态度，认为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态度只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

二、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在自己的国家里

滋长着资本主义成分，从而也否认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否认是机会主义信条的直接产物。这种机会主义信条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变得更加尖锐，而是熄灭了，这恰恰是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分子所宣传并断言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农村推行一种错误政策，他们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且认为个体农民都是单独的统一体，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背道而驰的，是和列宁关于小农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的。而且，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并没有使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理由。在南斯拉夫盛行的情况是：个体农民生产占优势，土地尚未国有化，还存在着土地私有和土地自由买卖，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富农手中，并且使用雇佣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们会以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南共，而这样一来，必然会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

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走上民粹党、富农党的道路，因为他们断定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稳定的基础”。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作为“当代社会里革命到底的惟一阶级……必须是在全体人民为一个彻底的民主转变所作的斗争中和在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斗争中的领袖”。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违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就农民而言，即使可能其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已同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但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是漠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

显而易见，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相适应的观点。

四，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特殊的纲领，不能把自己溶解于非党群众之中。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

然而，在南斯拉夫，被看做国家主要领导力量的是人民阵线，而不是共产党。南斯拉夫领导人贬低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于由极为复杂的阶级成员（工人、从事个体农业的农民、富农、商人、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并把党与包括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混同起来。南斯拉夫领导人顽固地拒绝承认他们这样一种信条的虚伪性：即所谓南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纲领，南共应满足于人民阵线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阵线在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而党及其组织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出现在人民面前，这一事实不仅贬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损害了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党的本身，因为党的任务是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及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纲领，赢得人民不断增长的信任，并影响更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南共领导人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于非党群众组织之中的错误。所有这一切暴露出南共党内存在着取消主义的倾向。

情报局相信，南共中央的这个政策威胁着共产党本身的生存，而且终究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变质的危险。

五、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人在党内建立的官僚统治，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场灾难，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有过一些空洞的保证，但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共产党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状态。党的会议或是根本不开，或是秘密召开，这个事实只能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像南共这种类型的组织，只能被称为宗

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组织。它正在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作为独立活动的有机体的党引向灭亡，它正在党内培养着与托洛茨基在当时所提倡的方法类似的军事领导方法。

南共党员最根本的权利受到压制，对党内不正确措施哪怕只作一点点批评，也要受到粗暴的制止。这一事态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共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敢于批评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并要求南斯拉夫与苏联友好，南共领导人就把他们开除出党并且加以逮捕，这种行动是不光彩的。

情报局认为，这种不光彩的、纯粹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容忍的。南共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统治。

六、情报局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给予了南共中央委员会以兄弟般的帮助，并向其领导人提供了迅速改正所犯错误的一切必要条件。然而，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南共领导人，不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并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以挑战和敌意来对抗批评。他们走上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他们的一切错误的反党道路，并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如何对待自己错误的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由于不敢正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南共领导人走上了公然欺骗党和人民的道路，它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

近来，在联共（布）和其他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之后，他们试图新增加一些左的法令。他们匆忙颁布命令，对中型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尽管完全缺乏这样的基础。由于匆忙地增加了一种新的粮食税，而对实施办法同样未作准备，因此这只能打乱对城市人口正常的粮食供应。还有，就在最近，南斯拉夫领导人大声疾呼，宣

称他们热爱并忠诚于苏联，但是，众所周知，在实践上他们却执行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

事情还不止于此。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信心十足地高声宣讲一项在南斯拉夫清除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在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写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在国内清除资本主义残余的各项措施。”

按照这条路线，卡德尔同志4月25日在斯库普什蒂卡的讲话中宣称：“在我国，人剥削人的残余现象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了”。

在目前南斯拉夫现有的条件下，南共领导人关于清除资本主义分子——从而清除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只要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占优势，只要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要大多数农业工人对集体耕作方法的好处还没有信服，要想解决这项任务就是不可能的。联共（布）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最后和最大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才是可能的，而消灭富农阶级也是农业集体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从而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党需要在农村进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仔细的准备工作的，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使社会主义工业能为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机器。在这方面仓促从事只能招来不可弥补的危害。

只有在仔细准备和不断执行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才能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过渡到消灭这些因素。

南斯拉夫领导人仓促地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企图，都意味着或者这种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自吹自擂、空洞无物、蛊惑人心的宣言罢了。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正竭力用这种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策略，表明他们不仅赞成阶级斗争，而且甚至走得更远，但考虑到现

实可能性，这样的做法已超出了南共在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方面所能提出的要求。

情报局认为，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在目前条件下不过是在蛊惑人心，而且是行不通的，因而他们只能有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情报局认为这样的冒险策略是一种下流的花招和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煽惑性措施和宣言，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并诚恳改正错误的事实。

七、考虑到南共党内的局势，并为了设法向南共领导人指出摆脱这种局势的途径，联（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应该像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其他共产党的活动一样，以同样的、经常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

然而，南斯拉夫领导人却拒不接受兄弟党一再提出的关于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情况的建议。

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逃避兄弟党在情报局内提出的公正批评，捏造了所谓他们的“不平等地位”的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当情报局成立时，各个共产党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争辩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即每一个党，正像它有权利批评其他党一样，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它的工作。

在九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上，南共曾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利。

南斯拉夫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活动并听取其他共产党的批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各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事实上就等于南共要求在情报局里享有特权地位，

八、鉴于以上情况，情报局表示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3 月到 5 月间给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对南共党内局势的评议，对南共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批评和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根据南共领导人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党反苏观点，根据他们的整个态度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一事实，南共领导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所属各个共产党的对立面，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谴责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反党政策和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共产主义统一阵线之外，从而也将自己置于情报局之外了。

.....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所犯错误的基础，在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在过去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从前以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南共领导中已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共领导已经同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而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内部的民族力量及其能力，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能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革命力量的援助。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由于不了解国际形势，并被帝国主义的敲诈威胁所吓倒，因此，他们认为，用让步的方法可以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搞交易，以获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并且逐渐地使南斯拉夫人民适应这些国家，也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正在悄悄地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论点出发——“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比苏联的危险要小一些”。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显然不了解，或者可能是假装不了解，这样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变成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丧失独立，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存在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力量。

健康力量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力量的任务就要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8年6月28日

关于罗马尼亚

给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议

（1945年1月4日）

1945年1月4日

在别墅接见了罗马尼亚同志安娜·波克、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部长）和阿波斯托尔（罗马尼亚工会联合会主席）。

他们详细介绍了罗马尼亚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活动。

介绍了与斯大林的谈话。

斯大林建议：

（1）重视土地改革（现在实际上正在分配逃跑了的的地主和法西斯走狗的土地）。王室和寺院的土地目前先不要碰。（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它以前没有地主；法国则在废除地主制后开始得到发展。）

（2）组建农机站（苏联将提供一定数量的拖拉机）。

（3）苏联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棉花，供罗马尼亚纺织厂加工。

（4）国有化问题现在不要提。要重视发展石油工业。

（5）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反法西斯德国的）资产阶级阶层，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

（6）可以把弗拉迪米列斯库的师当作全国民主阵线的内部柱石。

（7）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的方针。

（8）阐明：如果成立了这样的政府，苏联将帮助罗马尼亚拥有北特兰西瓦尼亚。

如果成立这样的政府，苏联愿意签署互助条约，类似于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条约。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326-327页

关于罗共党内和国内局势问题

——与乔治乌-德治和波克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2日)

秘密

谈话时在座的有：莫洛托夫同志，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卡夫塔拉泽同志，苏萨伊科夫上将，什科达（译员）少校。

斯大林同志首先祝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大选中取得的胜利，然后问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共产党正在按照党的路线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提拔在这次选举中表现突出的人，并准备取消州委员会，只留下直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县级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局中是否有意见分歧，如果有的话，都是些什么分歧，其原因是什么。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其实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并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曾经发生过一件涉及帕特拉什卡努的事情：他由于对自己未被选进中央书记处和受到尖锐的批评不满而想提出辞职并退出政府。后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帕特拉什卡努在克卢日发表了针对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的讲话，也就是说，那次讲话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气息。后来帕特拉什卡努解释说，他当时是打算以此来把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吸引到格罗查政府方面来，认为这具有很大的意

义，因为罗马尼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是占多数的。乔治乌-德治说，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迫使帕特拉什卡努放弃了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帕特拉什卡努表示服从，但是终究还是感到不满。

斯大林同志问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是否还有过其他的分歧，有一些传言甚至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有一种潮流，希望党内只有罗马尼亚人，具体地说，也就是希望按民族说并非罗马尼亚族人的安娜·波克和卢加不能在党内占据领导岗位，这种传言是否符合事实。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有这种情况，党将从社会的、阶级的党变成种族的党。如果党能够保持其社会和阶级性质，则它将得到发展和巩固；而如果它具有了种族性质，则它将注定要灭亡。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党内不存在这样的潮流，的确有过某些带有这种情绪的讲话（维丹-克卢日），但这并不是党内的普遍现象。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很好。

斯大林同志问，联盟中的合作情况如何。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民主主义政党联盟中的合作仍在继续，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个试图在这个联盟中制造困难的右翼。自由党人也有这样的企图。

斯大林同志强调，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将面临一个为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和削弱参加联盟的其余政党地位而工作的任务。在共产党人的概念中同盟者就意味着是兄弟，而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中每一个今天的盟友都被看做是明天可能的敌人。因此，为了不输给对方和不因天真幼稚而受害，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必须开始这项重要的工作。

乔治乌-德治说，这次选举已经显示了反动派的力量，他们特别是在农村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农民中间拥有很大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指出，需要特别注意去争取农民，需要考虑一下建立一个劳动农民的政党的问题，并以这个党与富农阶级相对抗。斯大林

同志强调，马尼乌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同富农的斗争，因为没有充分阐明这一斗争的意义，没有砸开农村这块铁板。因此，农民们看不到存在于罗马尼亚的各农民政党之间的区别。只有当每个村庄的贫苦农民和中农起来反对富农的时候，农民们才会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和为什么需要这场反对富农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举波兰为例做了比较，在那里米科拉伊奇克的党正在成为富农的党，因为劳动分子正在从该党退出。

波克说，成立劳动农民的政党将会导致同格罗查的冲突。

乔治乌-德治强调，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即一开始集中全力打击马尼乌以粉碎该党，然后再致力于同特特勒斯库及其他参加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政党的斗争。乔治乌-德治说，需要把富农分子从“农民阵线”党中清除出去并把贫农吸收进去。

斯大林同志指出，为此需要预先取得“农民阵线”领导人，首先是格罗查的同意。

波克断言，格罗查、查罗尼、米科洛·贝拉和“农民阵线”的其他领导人肯定不会这样做。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更勇敢地转向同富农阶级的斗争，这只会巩固和加强共产党人在农村中的地位。

波克指出，罗马尼亚共产党现在拥有农民出身的党员20万人。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缴纳党费，但他们是否明白加入共产党成为其一员意味着什么。

波克回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缴纳党费，在他们当中的解释工作一直进行得很不得力。

在转入经济性问题时乔治乌-德治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承担了责任，从而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非常勇敢的一步，就是他个人也不会下决心去干这件事。

乔治乌-德治说，反正共产党人也要对国家的经济负责，因为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多数。

斯大林同志问，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是否认为格罗查也是共产主义者。

波克做了否定的回答。

苏萨伊科夫说，格罗查随时准备入党。

斯大林同志说，那时他将会希望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袖。

波克强调说：格罗查是有这样的想法，格罗查甚至还幻想成为所有巴尔干国家的领袖，并把自己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

斯大林同志问，有关经济援助方面的要求都有哪些。

对此乔治乌-德治列举出如下一些问题：

- 1) 以贷款形式向罗马尼亚提供 8200 万美元的货物和机械；
- 2) 重新审定按第 12 条所定的价格问题（4 月 1 日以前的或者 4 月 1 日以后的）；
- 3) 从停战协议第 11 条规定的数额中扣除按第 10 条已用掉的数额；
- 4) 向罗马尼亚共产党提供资金援助。

乔治乌-德治说，他提出关于第 12 条的问题不是基于法律方面的理由，而是作为请求。

莫洛托夫驳斥了乔治乌-德治的这一说法。他援引了乔治乌-德治交给维辛斯基的两份文件，从该文件中很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对苏联政府依照第 12 条所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并且指责苏联政府不正当地向罗马尼亚政府收取战争赔款方面和返还战时被掠财物方面的钱款^①。

^① 乔治乌-德治交给维辛斯基的报告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重新研究减轻罗马尼亚对苏联的赔偿义务；二是重新计算罗马尼亚政府在 1945 年 7 月到 1947 年 1 月为驻罗苏军支付的开销数额。

莫洛托夫批评了罗马尼亚政府在占领军开支，即用于供养驻罗马尼亚苏军的开支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苏联与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状态只有在和平条约由三个大国批准的那个时候才算结束。在此之后，苏联将自己负责为保护通往奥地利的交通线而仍将驻留罗马尼亚的苏军的费用。而罗马尼亚人则试图证明他们仅仅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有义务供养苏联军队。因此他们要求将按第 10 条规定的开支全都列入第 11 条，并说出了 1.6 亿这个数目。

乔治乌-德治说，他认为这份文件是非正式的，他只是“随便”把它送交给维辛斯基看看，他将收回这个文件。

莫洛托夫向乔治乌-德治指出，既然文件已经提交，因此也就不能排除外部世界均已知晓的可能性，对这个文件必须做出回答。

斯大林同志同意首先需要做出回答，然后再提出关于削减第 12 条规定的 3 亿列伊的问题。

波克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说，美国人已经同意向罗马尼亚转让 4.5 万车皮的小麦和玉米，条件是罗马尼亚政府必须公开宣布它购买这批粮食仅仅供罗马尼亚居民食用，并保证用黄金支付粮款，同时还必须发表一项关于德国黄金问题的声明。

乔治乌-德治和波克请求斯大林同志给出个主意。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接受美国人的要求，因为人民需要粮食。他强调，当有可能的时候，苏联把粮食供给了罗马尼亚人，但拒绝收取特特勒斯库向苏联提议支付的黄金。而如今苏联则由于今年的收成不好而不能向罗马尼亚提供粮食。

斯大林同志同意派专家、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去帮助乔治乌-德治，并建议准备通过发行新币替换旧币的办法进行金融改革。他建议在秋收之后再采取这一措施。

斯大林同志强调，这项措施具有重大意义，它将给资本家和财团以打击，但却将巩固列伊的地位和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得到稳固的工资。

不断贬值的货币导致工人阶级越来越穷，以及国家的经济崩溃，这将有损于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特别是共产党，但却有利于罗马尼亚的资本家们。

记录什科达少校

1947年2月2日21时于莫斯科

本记录业经C·卡夫塔拉泽审阅和修正

关于罗马尼亚的经济政策问题

——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10日)

秘密

谈话时在座的有：莫洛托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苏萨伊科夫同志，什科达同志（译员）。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已交换了在上一次谈话中谈到的信件。

格·乔治乌-德治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向乔治乌-德治询问罗马尼亚国家经济部的组织结构和职权。

格·乔治乌-德治说，在罗马尼亚，国家经济部统管所有的工业、国内贸易以及对外贸易。国家经济部所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均经由罗马尼亚最高经济委员会批准，隶属该委员会的是所有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各部，也就是国家经济部、财政部、采矿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等。得到最高经济委员会认可的各种方案和计划再提交部长会议讨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乔治乌-德治。

斯大林同志指出，乔治乌-德治一方面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同时又是国家经济部的部长，是“自己领导自己”。

格·乔治乌-德治说，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提请政府审议批准关于改组国家经济部的法案和关于按部门组建工业管理局的法案。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管理局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们是否将

拥有定价的权力。

格·乔治乌-德治回答说，每一个管理局都将负责处理所有涉及相应工业部门的问题。各管理局提出的建议将提交给部长。格·乔治乌-德治说，在罗马尼亚的纺织工业系统中就有这样的管理局，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样的管理机构有助于政府对私营企业实行监督。

斯大林同志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承担了罗马尼亚经济中责任最重而且又是最困难的岗位。在他们看来，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得了这些岗位，而实际上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是有意识地把这些部推给了他们，因为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知道存在的困难，并希望以此来败坏共产党人的名声。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觉得他们是在领导着这些部，而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当你根本没有生产原料、设备和零配件，当你不能自己确定市场价格的时候，你就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领导。当前，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有准备地实行金融改革，以便使国家拥有坚挺的、稳定的通货。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格·乔治乌-德治回答说，采取这项最为重要的措施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德治应当开诚布公、老老实实在地讲话。在罗马尼亚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此事的准备工作，而德治却在说与实情相反的话。

格·乔治乌-德治请求苏联派出经济专家给予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应派这样的专家去给予协助，但他强调说，这些人一开始需要很好地深入了解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熟悉所有的实际资料。

格·乔治乌-德治对此表示感谢。接着又说，金融改革计划在今年的农作物收获季节之前实施，匈牙利人已经同意（帮助）印制相应

数量的新纸币用以替换旧币。

米高扬同志说，货币改革的实施应当尽快而不是过5-6个月之后。

在谈到罗马尼亚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直接贸易谈判，以及罗马尼亚政府关于帮助改善国内困难的经济形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再次帮助罗马尼亚并实行如下减免：

1) 苏联政府把罗马尼亚政府按照停战协定第12条应当偿付的3000亿列伊减少到1000亿列伊。

2) 尽管已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的协议，但苏联政府还是承担在苏联领土上转运归还给苏联的苏联财产所需的费用。

罗马尼亚人只需将归还的苏联财产运到苏联边境和港口即可。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和罗马尼亚港口转运这些财产的一切费用将由罗马尼亚人支付。在苏联领土和苏联港口转运这些财产所需的一切费用将由苏联支付。

3) 苏联政府将依照贸易协定向罗马尼亚提供数额为1000万美元的贷款（用货物）。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将再向罗马尼亚提供其所要求的总值为1500万美元的货物，作为交换，苏联政府将从罗马尼亚得到总值同样为1500万美元的货物。

格·乔治乌-德治对此表示感谢并强调说，如果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得到苏联的相信和援助，则他们定能完成摆在自己国家面前的经济任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整顿秩序和走上正轨，则任何来自外部的援助都帮不了他们的忙。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阶级被放任自流，使其养成了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习惯。因为不能养活他们，使其得以维持生计，所以也无法强令其干活，而从农民那里又不征税。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管理好国家而只能使国家崩溃。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减少工厂中的工人数量，立即向农民征税，减少职员的数量。在实行金融改革之后应当减少工资，采取果断措施对付投机商人。应当把所有这些措施呈报政府，而如果政府在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加以阻挠，则德治就应当准备辞职并将这一点告知政府。

在话题转入有关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状况的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德治没有全部地、诚心实意地向他介绍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民族主义倾向的情况。要知道，德治自己就曾经向维辛斯基提出过需要把波克派往巴黎的问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态度。需要珍惜并举荐好的干部，而不去看他们是罗马尼亚族人还是犹太族人或者是匈牙利族人。在俄罗斯同样曾经有过势力强大的反犹太人运动，比在罗马尼亚国内的还要强大。屠杀、劫掠和蹂躏犹太人的浪潮曾遍及整个俄罗斯。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解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犹太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破坏苏维埃政权并为反对这个政府而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也解除了一些俄罗斯人的职务：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是个好人，那么即使是在某个时期存在着反对某一民族的潮流，也要给他出路。曾经有人在犹太人问题上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他们说，甚至连伊里奇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顶住了这些攻击并批驳了它们。罗马尼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罗马尼亚有许多犹太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人怎么能够试图仅仅由罗马尼亚族人来组建自己的党呢？他们应当记住：如果他们的党将成为一个阶级性的、社会性的党，那么它就将会发展壮大；而如果这个党将是一个种族性政党，则它定将灭亡，因为种族主义将导致法西斯主义。

乔治乌-德治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早在1946年维辛斯基就曾建议他把安娜·波克派出国，而现在他则向维辛斯基提出了这一想法。

格·乔治乌-德治指出，就提出让波克当议员和任命她为议会党团领袖的问题，他曾同苏萨伊科夫进行过交谈，苏萨伊科夫当时就已经向他指出了其观点的错误。但是他（德治）没有理会这些忠告，以为这样从策略的观点来看也是比较恰当的。

斯大林同志说，从策略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

格·乔治乌-德治答应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斯大林同志问，波克和卢加工作得如何。

苏萨伊科夫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应力求掌握政权，并提醒注意中央委员波德纳拉希的放荡不羁的性格。指出，对此人必须盯紧，不能任凭他为所欲为。

格·乔治乌-德治请求就农业合作社问题给予指教。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个事情需要暂缓到金融改革实施之后再去做。

在谈话中还提到了向美国订购粮食的问题。就此问题双方决定：由德治起草一份答复，然后交给莫洛托夫同志审阅一下，他将帮助确定这一答复的最后措辞。

谈话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译员什科达

1947年2月10日19时20分于莫斯科

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谈话纪录

(1948年2月3日)

秘密

1948年2月3日20时

参加接见的有：

罗方：部长会议主席彼得鲁·格罗查、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工业与商业部长乔治乌-德治、财政部长瓦·卢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洛·拉达恰努、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弗拉杰斯库-拉科阿萨

苏方：维·米·莫洛托夫、谢·伊·卡夫塔拉泽、П. Е. 科特利亚尔（译员）

在例行的握手和问候之后，斯大林说彼·格罗查气色很好。

彼·格罗查回答说，他努力保持好的精神状态，以吓唬敌人和鼓舞朋友。

斯大林问格罗查，他们游览得如何。

格罗查回答说，游览得很不错。他们向苏联学会了欲速则不达。

斯大林问，罗马尼亚是否暖和。

格罗查说，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国家太暖和了。

莫洛托夫说，苏联今年就没有真正的冬天。

斯大林问格罗查，罗马尼亚的工业状况如何，是否有了起色。

格罗查说，在座的工业和商业部长乔治乌-德治对于这个问题最内行。

斯大林说，身为总理，格罗查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格罗查指出，在部长乔治乌-德治的努力下工业有了起色，尤其是最近，也就是把塔塔列斯库及其追随者逐出政府之后。现在财政部由卢卡任部长，这样就可以正确地协调两个部的相互关系。

斯大林问，罗马尼亚是否有失业现象。

格罗查回答说，罗马尼亚实际上不存在失业现象。

斯大林接下来问，罗马尼亚本国货币怎样，是否坚挺。

格罗查回答说，罗马尼亚像少数几个国家那样，在不借外债的情况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尽管自由党人要求在借6亿美元外债的基础上进行货币改革。人民欢迎改革，财政部高层的一些人试图暗中对抗改革，把他们逐出政府之后，情况就好转了。

斯大林问货币改革是否有好处。

格罗查说，在任命卢卡为财政部部长之后，国内财政形势大为好转。自由派分子力求扩大货币的流通量。瓦·卢卡不仅不再向罗马尼亚国民银行借债，而且依靠加强税收征管和其他货币手段还清了欠国民银行的旧债。

斯大林问，预算平衡情况怎样。

卢卡回答说，他不仅达到了预算平衡，而且有了一些剩余资金。

格罗查说，如果说最初新货币的购买力有一些降低，那么现在这种势头已受到遏制。而且，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降低，外汇的汇率也有所下降。

斯大林问，国王是彻底离开了呢，还是会回来。

格罗查说，国王还可能回国，只不过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国。

斯大林问，国王对他在罗马尼亚的大庄园和林地作何处理，是否售出。

格罗查回答，国王土地的主要部分实际上一直是国家财产，只有土地的收入归国王所有。现在所有这些土地均已收归国家所有，国王还拥有面积不大的地段，但由于国王不再拥有过去的特权，那么根据

土地改革法他的地产将被没收，只给他留下 50 公顷土地。

斯大林问，所谓罗马尼亚政府花 300 万美元买下了国王的大庄园是否确有其事，要么这不过是传闻而已。

格罗查回答说，罗马尼亚政府花 100 万瑞士法郎向国王购买了 360 吨葡萄酒，而且实际上只向国王付了这个数目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国王只有在表现好的条件下才能拿到。政府付给国王的钱恰到好处，以免有人说政府欺负国王，但也不是太多，以免国王感觉到自己就可以作主。

斯大林说，罗马尼亚人有个非常独特的国王，但愿人人都能有这样的国王。

格罗查补充说，他前一天向维·米·莫洛托夫说，罗马尼亚政府应该考虑到国王已被授予苏联胜利勋章。

斯大林说，这一切都干得不错，并问国王是否随身带着勋章。

格罗查回答说，国王一直随身带着勋章，并补充说，罗马尼亚政府动身前往莫斯科时就希望对政府的表现做出这样的评价。

斯大林又重复说罗马尼亚政府干得很好。然后问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否已经看过互助条约的草案。

格罗查回答说，代表团对条约草案逐条和从总体上进行了研究，同意条约的内容。

斯大林问，草案是否引起异议。

波克要求解释，条约草案第 2 条第 1 段末尾的形容词“军事的”是否同样用来修饰“援助”和“支持”，还是只用来修饰“支持”一词，按照草案的罗马尼亚语文本可以这样解读。

莫洛托夫说，“军事的”这个形容词用来修饰“援助”和“支持”。

斯大林建议从文本中剔除“支持”，一词，因为它只起了弱化作用，并未增添什么意思。“支持”是具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援助”

这个词更加现实、更加有力。

波克接着问，条约草案第2条第2段的“联合国章程”是否与“联合国宪章”意义相同。

莫洛托夫确认二者是意义相同的概念。

波克然后说，从措辞的角度看，条约草案第1条第2段中的“集中到”一词在罗马尼亚语中不能用。

斯大林建议用“目的在于”来代替。

莫洛托夫说，那样一来“目的”一词在这个句子中会重复两遍。

斯大林于是建议该段中最后一个词“目的”换成“任务”。

波克表示，她再没有别的意见了。

斯大林说，这样一来罗方是“任务”，而我方是“目的”。

莫洛托夫补充说，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达到目的。

格罗查表示，目的会达到。然后接着说，由五个人组成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为这句话折腾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措辞。这就叫“五个接生婆紧忙活，生出一个死胎来”。

斯大林说，这也不尽然。

格罗查表示，前一天莫洛托夫就条约草案原则向代表团作了清楚准确的解释，现在又对于措辞的所有意见作了解释，代表团同意条约草案并且准备签署。

斯大林说，明天就可以签署。只需准备相应的文件。

莫洛托夫说，他有一个问题。

自1940年以来罗马尼亚和苏联的边境就没有明文规定。这里说的是当时没有明文规定的那段边界。为此需要在签署条约的同时签署一项将多瑙河河口岔流的小塔塔鲁、伊斯坦布尔、林巴等五个岛屿划归苏联的议定书。1940年的罗苏混合委员会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斯大林问，这五个岛屿目前由谁占领。

莫洛托夫答说，由我方占领着。

斯大林问是否合法。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认为这是合法的。

格罗查说，早在1946年巴黎会议之前，他曾就这一问题同塔塔列斯库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争论。当时的政府就已得出结论，所有此类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如今更加必要了，因为即将签署的《苏罗友好条约》将进一步加强罗马尼亚与苏联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罗马尼亚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本人仔细考虑过了，深感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和义务，他得出的结论是：失去这些岛屿仅仅意味着多子粒的鱼子的减少。然而，存在着多瑙河的苏利纳运河变浅的危险，它可能切断罗马尼亚前往黑海的通道，不过与苏联的友谊“变浅”才是更大的危险。罗马尼亚人民首先关心的是保持这种友谊。这个道理他们应该明白，而且肯定会明白的。

斯大林问，这是否意味着表示同意。

格罗查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问，多瑙河的运河是否在变浅。

格罗查回答说，只有大规模的疏浚工程可以防止这种危险。

斯大林说所有的河道都需要定期疏浚。又补充问道，罗马尼亚政府有无修建一条连接多瑙河和黑海的新运河的计划。

波克回答说，十年前曾经有过一项修建连接切纳伏德和康斯坦察的运河的计划，但后来不了了之。

斯大林说，如果罗马尼亚政府哪一天重新启动这一计划，我们可以帮忙。

格罗查说，与苏联的合作将会成百倍地补偿罗马尼亚失去几个岛屿的损失。他明白，苏联需要这些岛屿来控制多瑙河的河口。由像苏联这样的友好大国实施的控制，不仅不会限制罗马尼亚的自由，而且只会对罗马尼亚有好处。

斯大林为此向格罗查表示感谢。

接下来，约·维·斯大林重复说，如果罗马尼亚政府将来重新启动修建运河的计划，苏联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格罗查说，在同苏联关系方面上，罗马尼亚政府并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而是出于对本国人民利益的正确理解。

斯大林说，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莫洛托夫问，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同时签订条约和议定书。

波克问，是否可以在议定书的文本中加入苏方在多瑙河—黑海运河的修建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关于那段尚未达成一致的边界的议定书必须签订，并问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否有什么问题。

格罗查和代表团的成员商量之后，回答说，没有什么问题。

斯大林问，原外交部长塔塔列斯库在做什么。

格罗查说，塔塔列斯库不再领导民族自由党了。他在辞职信中建议民族自由党支持政府，但保留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的权利。塔塔列斯库很容易就屈服了，他是聪明人，但作为一个人，他立场太不坚定了。他格罗查收到塔塔列斯库的一封信，塔塔列斯库在信中声称不再搞政治。

波克说，根据现有的情报，塔塔列斯库想逃往国外。

格罗查说，他个人认为塔塔列斯库不会走这一步。因为他是个胆小鬼，得过且过。在自由派退出政府和塔塔列斯库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后，该党已分崩离析了，和马尼乌受审后的国家民族党一样。这证明这些政党在人民中间没有根基。

斯大林问，罗马尼亚的侨民中，除了加芬库之外，还有谁在搞破坏活动。

格罗查回答说，主要有三个团体：加芬库的团体、克列齐亚努的团体和人数不多的季利的团体。但他们相互敌视。

波克又加上了尼古列斯库-布泽什蒂和维绍亚努这两个人，他们分别在1944年8月23日后的头两届罗马尼亚反动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

格罗查一口咬定，现在维绍亚努不搞破坏活动了，他现在一直往国内写信，表示回国的愿望。至于说勒德斯库，他现在甚至在国外支持他的那些团体中都没有任何威望。最起劲的是加芬库的团体。然而君主制的废除对这些侨民组织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原因之一是国王出国后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国王不仅没有发表任何反对现政府的声明，而且还对其父亲——卡罗尔国王的声明进行了驳斥。政府希望国王今后也持这样的立场，因为政府已使国王在物质方面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斯大林问，加芬库和其他类似的人是否还是罗马尼亚公民。

波克回答说，他们仍然是罗马尼亚公民，不过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剥夺所有在国外从事反政府活动者的罗马尼亚国籍。

斯大林说，如果议会中有人提出以从事破坏活动为由剥夺这些人的罗马尼亚国籍的问题就好了。

波克说，他们打算取消这些人的国籍和剥夺其财产。

斯大林问，国王的父亲是不是罗马尼亚公民。

波克说，他至今还是罗马尼亚公民。

斯大林说，应该剥夺国王的父亲和其他人的国籍。这样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谍报机构就无法再利用他们了。他们就会失去价值。年轻国王的国籍应予保留，这样他会表现得更好的。

斯大林问，国王的母亲是否和国王一起出国了。

格罗查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国王的母亲对作出的决定也很满意。她对国王说，她在这个家庭中已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的遭遇。

斯大林说，国王的母亲是希腊人。

莫洛托夫问，代表们对于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有无建议。

格罗查请求在日程中列入招待会。代表团希望在莫斯科的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莫洛托夫问，代表团认为以下安排是否合适：明天外交部为客人们举办外交招待会，当天晚上举行条约及议定书签字仪式。后天下午6:00—8:00为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招待会，晚上9:00为克里姆林宫的宴会。

彼·格罗查、安·波克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表示同意。

谈话持续了1小时20分钟。

记录：谢·卡夫塔拉泽
无误

原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2002年第2期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与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谈话记录

(1945年6月28日)

秘密

参加谈话的还有维·米·莫洛托夫和瓦·阿·佐林

约·维·斯大林问：费林格^①先生对哪些问题感兴趣。

费林格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一系列的问题，并提议先讨论有关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条约问题。费林格通报说，条约的文本几乎已经协商好了，现在谈的只是条约议定书的一些条款。

约·维·斯大林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现在签署该条约是否感到合适，并且指出：“我们不会催促你们，只要你们认为合适，那就采取行动。”

费林格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拟定条约的时机合适，因此就会主动提出签署条约的建议。

接着宣读条约和议定书文本。

当谈到议定书第2条时，维·米·莫洛托夫建议规定公民选择国籍应依照每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现行法律办理，因为像在苏联，丈夫一方对公民国籍的选择并不包括妻子的国籍，而依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妻子自动拥有丈夫的国籍。

费林格同意该项建议，并建议以相应方式拟定议定书第2条。

^① 费林格，时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

在读完第3条后，费林格指出，与移交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有关的财政问题看来在以后应明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目前不能说出用于补偿部分公民在迁居捷克斯洛伐克后将自己财产留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支出所需的金额。因此，费林格提议，要在议定书中制定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双方对居民迁移相关支出相互抵消，以及在条约批准后的18个月内有关两国政府之间日后结算的总章程。

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意这一提议。他们吩咐最后校对一下条约和议定书的草案，如果可能的话，就在6月29日前签署该条约。

费林格继续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利品问题感兴趣。他指出，尽管科涅夫^①元帅坚决声称工厂和其他战利品现在不会搬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因此而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仍有关于从有关企业运出设备的事实及有关运出大量糖和其他粮食的报道。费林格请求考虑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利益，对该问题加以调整。

约·维·斯大林说，这一问题将做出调整，而且我们不想从捷克斯洛伐克运走工厂和设备，除了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即将谈妥的少量物品外。

约·维·斯大林认为，一些地方的军代表和其他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在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有越轨行为，但是从7月5日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要取消军代表制度，只在火车站保留军代表办事处，以保证军事供应的正常铁路运输，那些还未被军事机关占领的仓库应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支配。关于涉及战利品和驻捷克斯洛伐克我方部队全部行动的所有问题，约·维·斯大林提议均直接与科涅夫元帅商量，并且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科涅夫的司令部中要有常务代表（一名

① 科涅夫，时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

或者数名)。

费林格同意这个建议并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高兴地派出这样的代表。然后，费林格要求解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居民迫切需要的烟草问题和银行问题。苏联的收缴机构认为这些银行是战利品，但实际上银行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现钞和一定数量的德国货币，当然这些德国货币现在只配被销毁。费林格要求搞清楚这些被认定是德国银行的性质，应考虑到德国人在这些银行中没有任何投入，这些银行所利用的纯粹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资本。

约·维·斯大林说，关于烟草问题可以进行协商，显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与红军共同分享这些烟草。关于银行他则提议作专门研究。维·米·莫洛托夫说，关于这一点现有一系列的建议，这些建议显然在最近就要予以研究。

约·维·斯大林补充说，关于大型企业，特别是那些被德国人占领的企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他特别建议要把维特科维采工厂掌握在自己手中。

费林格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在考虑做到这一点。

对于约·维·斯大林提出的美国人是否想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费林格回答说，美国人放慢了撤出自己部队的速度，并且还在询问苏联部队在何时撤出。

约·维·斯大林通报说，苏联军队将减少三分之二，而且它们大部分驻扎在边界地区。他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美国人提出撤走他们军队的问题。

克莱曼蒂斯^①通报说，已就此向美国人发出了照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可以利用苏联军队大规模撤军的机会，再次要求美国人撤走他们的军队。

① 克莱曼蒂斯，参加谈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

费林格然后问，如何才能使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去。

约·维·斯大林说：“我们将不妨碍你们，把他们赶走吧，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什么叫统治他人。”

费林格因此要求给苏联军人下达指示，协助将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迁移出去。

约·维·斯大林问道：“难道我们的军人妨碍这一项工作？”

费林格说，妨碍倒是没有，但是想以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约·维·斯大林然后问费林格，能否友好地与波兰人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问题。

费林格回答说，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为波兰人想分割特欣州，对此，任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不能这样做。

对于约·维·斯大林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费林格回答说，对捷克斯洛伐克而言，特欣州是领土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让步。

约·维·斯大林指出，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人显然不会在任何其他领土问题上让步，尤其是在克拉德斯科地区，看来，波兰人将坚持己见，因为我们已许诺把这块土地给他们。

费林格回答说，波兰人得到的领土太多，未必能管理好它们。

约·维·斯大林重申了苏联政府关于友好地解决有争议问题的立场，同时指出，如果在不能这样解决的情况下，那就不得不把这一问题提交和平大会讨论。

然后，费林格问道，能否指望从苏联政府方面装备捷克斯洛伐克保留下来的6个师，上次总统访问时曾就这些部队的部署达成了协议。

约·维·斯大林说，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事我们包下了。

费林格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感谢。

最后，费林格代表总统赠送了礼物——扬·杰兹卡^①的全身铜像。
约·维·斯大林请求转达对总统的谢意。

记录瓦·佐林

1945年6月28日于莫斯科

^① 杰兹卡是15世纪捷克的民族英雄。

争取在近期内签订捷-波互助条约

——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5日)

绝密

亲爱的哥特瓦尔德同志！

我们认为，继续拖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互助条约，不论在苏联还是在其他对我们持友好态度的国家都将造成令人难堪的局面和不良的印象。需要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并在近期内签署该条约。我们盼望您能克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的阻力并采取同民主波兰接近的步骤。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47年2月25日于莫斯科

关于签订捷-波互助条约

——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7日)

绝密

致哥特瓦尔德同志

佐林大使向我们报告了同您和同克莱曼蒂斯谈话的情况，从中了解到，您对我们的信件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克莱曼蒂斯的答复我们不认为是对我们信件的答复，况且这一答复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需要的是您的答复，因为我们的信件是写给您的，而不是写给克莱曼蒂斯的。您是想还是不想做出回答呢？^①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47年2月27日于莫斯科

^① 1947年2月28日，哥特瓦尔德复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通报说，在拟定于最近召开的政府会议上，将按照莫洛托夫的建议，提出与波兰签订带有议定书和补充协定的同盟条约问题。1947年3月10日，在华沙签署了捷-波友好互助条约。

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

——与捷政府代表团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9日)

秘密

参加谈话的有：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哥特瓦尔德，外交部长马萨利克，司法部长德尔蒂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亨德里赫和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霍拉克。

斯大林同志问哥特瓦尔德：“你们有些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来？”

哥特瓦尔德回答说，他们希望讨论3个主要问题：

- 1·关于参加1947年7月12日的巴黎会议问题。
- 2·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的条约问题。
- 3·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苏联对外贸易部长的贸易谈判问题。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地问哥特瓦尔德，他们希望从哪一个问题开始讨论。

哥特瓦尔德回答说，最好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斯大林同志说：在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从巴黎返回莫斯科的2-3天之后，南斯拉夫人就向我们询问，他们该怎么办，是参加将于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还是不去参加，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说他们考虑拒绝参加这次会议。随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起初我们曾经想建议他们前往赴会，并在那里就地使其无法进行，而后来根据从我们的大使们那里收到的材料我们确信，在向欧洲提供贷款援助的幌子下正在组织某种类似反苏的西方集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果断地决定并将我们的意见告知了他们所有的人说，我们反对参加这次将于 1947 年 7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

我们对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吃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问题。你们在客观上是在帮别人孤立苏联，不管你们主观上是否愿意，但的确是在这样做。请看看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所有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都不参加这次会议，而同样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去参加。那么，他们就会判定，既然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拉到孤立苏联、反对苏联的一边，那就是说，它同苏联的友谊已经不是那么牢固了。这将被看做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不能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取消这一决定，应当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并且这件事你们做得越快越好。

马萨利克请求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很清楚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对西方的依赖性。工业界的代表们认为，为了不错过获得贷款的机会，参加此次会议是适宜的。就在此时，波兰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并告知我们说，他们已决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最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参加 1947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的决定是由所有政党一致做出的。

马萨利克继续说，他曾经赞成参加这次会议，他不打算推卸为此而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他请求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从未打算通过这一决定来做任何反对苏联的坏事情。马萨利克最后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帮助他们改善处境。

莫洛托夫同志向马萨利克指出：你们去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

联。

马萨利克回答说，他本人、政府、所有政党以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不愿意也绝不会做任何反对苏联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怀疑过并且现在也不怀疑你们对我们的友谊，但是实际上客观出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德尔蒂纳说：他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他所属的全党申明，如果说我们的决定是反对苏联的，那么我的党是不希望这样做的，并且也不会这样去做，我的党甚至连有可能使人得到把我们的做法解释成是反对苏联的借口的事情都不会去做。与此同时，德尔蒂纳还请求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别于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斯拉夫国家，它的出口和进口有60%有赖于西方国家。

斯大林同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的贸易存在的是逆差，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向西方支付外汇。

德尔蒂纳说：他指的是出口和进口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人民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得不到贷款，从而我们就将降低我们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苏联的贸易在1947年已急剧下滑了：在结束其发言的时候德尔蒂纳请求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增加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需要的某些产品是可以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例如石油工业管道、窄轨铁路用的铁轨、车箱以及其他等等，并且我们可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签订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定。

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产品，而苏联则暂时还不购买这些产品。

斯大林同志说：为什么不买？我们要买的。

哥特瓦尔德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合公报中写明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来访苏联将给我们些什么。

马萨利克和德尔蒂纳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帮助他们研究出拒绝参加巴黎会议的理由。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看一看保加利亚人是以什么样的措辞拒绝参加会议的，你们同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提出关于拒绝赴会的理由的措辞。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同法国的条约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按照贝奈斯的说法，似乎是我们苏联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不确实的。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同法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但我们同样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条约不要次于同苏联、同南斯拉夫、同波兰的条约。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关于一旦遭到侵略立即给予援助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需要这样的援助，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德国的一些仆从国，例如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在进行侵略的时候能够干得比德国本身更猖狂。历史告诫我们，并非一定要由德国自己去进行侵略，它也可以借助于自己的仆从们去干这样的事。所以，苏联希望的仅仅是一点，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不要次于它已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签订的那些条约。

马萨利克说，当他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之间的友好互助条约问题接见法国大使德让的时候。德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对法国提出的要求比苏联同法国签订条约时写入的还要多。

斯大林同志确认：在苏联同法国的条约中，确实没有写入关于一旦发生侵略缔约双方应立即予以互相援助的问题。这是由于我方的疏忽，但是我们打算对条约的这一部分进行修正。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在同英国的条约中写入了关于一旦发生侵略缔约双方应立即予以互相援助的问题。

哥特瓦尔德说，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问题，他将就此写信给斯大

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在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提醒哥特瓦尔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必须在今天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即在1947年7月10日。

马萨利克说，他们将于明天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在傍晚时分才能把自己的意见呈报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这件事应该马上办。

代表团对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接见和所给予的必要的忠告表示感谢，并答应将像已经商定的那样做好一切工作。

记录者博德罗夫

1947年7月9日于莫斯科

对贝奈斯关于捷对外政策问题的 来信的意见

(1947年7月11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日丹诺夫、
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

秘密

从总统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总统认为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之间的互助条约持否定的立场。我不同意对苏联立场做这样的解释，并认为有必要申明，苏联是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之间签订互助条约的，因为这样一项条约将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而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应当认为也是有利于苏联。

同时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之间的条约不应次于或弱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业已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些条约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互相支援以反对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侵略；第二，对正在准备中的和已经开始的侵略立即予以援助。法国人把这两个方面排除在条约之外，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条约中业已争得的有利地位受到削弱。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应当同意对捷克斯洛伐克有利地位的这种削弱，而应当争取使法国同意签订一项不次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已经签订的那些条约的条约。我们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要把关于德国在侵略行动中的同盟者的提法去掉。难道德国的同盟者不会像德国一样对捷克斯洛伐克构成威胁？我们同样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法国人要去

掉关于一旦发生来自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侵略而自动予以支援的内容？俄国倒是可以不在乎关于自动予以支援的内容，因为它拥有辽阔的土地，所以它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暂时后撤 100-200 公里以等待来自自己盟国的援助，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小国，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关于立即自动予以援助的内容，因为只要敌人从边境山区突进约 40 公里，捷克斯洛伐克就可能要陷入灭顶之灾。法国人在立即予以支援问题上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上过一次当了。不能让捷克斯洛伐克忘记这一教训。

除此以外，还应当考虑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同法国的条约中同意削弱自己的地位，则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同法国相比就有可能陷入不利的境地。从而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将开始比照法国的先例。^①

斯大林

1947 年 7 月 11 日于莫斯科

① 原文件上有如下标注：“责成驻布拉格的苏联代办博德罗夫同志将该文件交给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的来信，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收到的。

关于蒙古

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

(1945年7月7日)

1945年7月7日，И. В.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B. M. 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 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

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

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 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 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入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

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許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

关于波兰

建立具有共产主义纲领的波兰工人党

(1941年8月27日)

1941年8月27日

从2:00-3:30在防空洞中。

我同斯大林谈了波兰问题。他说：“最好是建立具有共产主义纲领的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不仅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而且还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现阶段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然，不是像英国工党那样的党。希特勒制度锻炼了共产党人。沙皇制度使我们成为共产党人。

我提出了关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五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有关游击运动和国外的破坏活动工作的协调问题。“五局的人想领导运动，这不行。戈利科夫会回米，这件事应恢复正常。”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 第153页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 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年11月14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

秘密

送莫洛托夫同志并四人小组阅

谈话未做记录（波兰人认为不需要做记录），因此我以问答形式转述本次谈话的内容。

波兰人问：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其中包括对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否已经改变？

斯大林答：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对波兰人和对波兰共产党人像从前一样友好。

问：是否需要通过一部关于对大型工业和银行实施国有化的法案？

答：在贝奈斯通过这样一项法案之后，在波兰也必须通过这样一项法案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在波兰是否需要允许以租让或其他某种形式吸收外国资本？

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由波兰人自己去深思熟虑。

注：波兰人只字未提他们当时曾经拒绝了苏联关于建立合股公司的建议。我得到的印象是波兰人不反对在这方面的外国资本做出让步。

问：是否应当接受波兰社会党关于取消粮食收购和宣布实行没有有限价的自由市场运作的建议。

答：不论这样做是多么令人不快，波兰人迟早都不得不采取这一

措施，因为在非苏维埃制度下，又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粮食收购和限价体制的。

问：我是否反对波兰人向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借债，我是否认为可以在或多或少对其在波兰的使用自由加以限制的条件下接受这种借贷？

答：债可以借，但是要在没有任何限制波兰使用借款权利的条件

的情况下。

问：可否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

答：可以，但是要使该条约完全符合波兰与苏联之间签订的互助条约的精神。

问：是否应当深究关于特欣的问题^①，苏联能否在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特欣问题举行的谈判中给波兰以支持？

答：我不主张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在波兰得到了西里西亚的能产焦炭的煤之后，波兰已经没有理由再要求把特欣划给波兰人了，因此苏联也就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给波兰人以支持。最好还是尽快消除这个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纠纷问题，限制特欣地区的波兰人迁居波兰并恢复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良好关系。在特欣地区波兰人迁居波兰的问题上，苏联在波兰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谈判中可以支持波兰人。

问：是否应当邀请联共（布）的代表出席不久将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

答：最好还是不要邀请，以免反对派们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

问：可否在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早在战争之前已被取缔的波兰共产党路线和传统的继承者？

答：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尽管敌人们把波兰共产党说成是联共（布）的代理人，但实际上该党当时已经变成了毕苏茨基分子的代理

^① 指波捷之间关于特欣地区归属问题的争论。

人。最好在波兰党代表大会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一个新的政党，它同波兰共产党的路线和传统并无联系。

问：我们关于把波兰的大选再推迟一年举行更为适宜的意见是否正确？

答：我想大选最好不迟于 1946 年的春天举行，因为不论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方面考虑，再往后推迟此次选举都将是困难的。

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现很不好，如果他在近期内不能改正，我们想在选举进行之前就以朗格先生（现任波兰驻美国大使，是一位温和的波兰社会党人，据波兰人认为，他对共产党人颇具好感）取代他。您的意见如何？

答：如果你们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提贝鲁特为替补人选（波兰人认为这一作法不适宜），那么你们可以通过试试借助朗格来分化波兰社会党。请你们去同万达·利沃夫娜商量一下，她同朗格很熟。

后来的谈话涉及的是有关从罗科索夫斯基^①的储备中借给波兰人 3 吨谷物种籽问题和关于满足波兰人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请求问题。但这些事情你们均已知晓。

斯大林

1945 年 11 月 14 日于莫斯科

①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时任苏联北方军队集群总司令，1949 年起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

与贝鲁特等人关于波兰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4日)

秘密

昨天，即1946年5月23日晚上22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会见了抵达莫斯科的以贝鲁特总统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总理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波兰方面参加会见的有：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罗拉-日缅尔斯基元帅、什瓦尔贝、哥穆尔卡（维斯瓦夫）、明兹、科瓦尔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将军。

贝鲁特简要说明了波兰政府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目的。

“斯大林同志”，贝鲁特说，“我们到你们——我们伟大的朋友这里来是为了说一说我们对波兰事态进程的想法，并检查一下我们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还想同您讨论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希望，这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后，同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伦敦流亡集团签订的协议能为国内形成良好的环境提供可能。我们认为，尽管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推行过有害于波兰利益的政策，但也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政府，以便使米科拉伊奇克的反映部分富裕农民利益的党加入民主集团。我们之所以要把米科拉伊奇克吸收

到政府中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要为其他阶层居民的利益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想把大资本家和地主从我们社会中清除出去，米科拉伊奇克在这个方面看来能够帮助我们。

遗憾的是，实践表明，这些希望落空了。把米科拉伊奇克吸收到政府中不仅没有促使国内形势的稳定，反而成为斗争越来越加剧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正处在这场斗争的极其重要阶段——处在选举前夕。正确估价国内政治形势对于我们来讲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在成立政府时同4个民主政党的团结越来越巩固，这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同工人政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政党的思想一致（当然，在纲领和其他方面有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没有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思想一致，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面临的任務。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斗争将尖锐化并导致极其尖锐的冲突。

今天工人党的两个领袖也在这里。这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同志——波兰社会党的领袖，这是哥穆尔卡（维斯瓦夫）同志——波兰工人党的领袖。我想让您听一听他们对国内形势的评价。”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哥穆尔卡谈一谈。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先说。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同意贝鲁特所说的国内斗争尖锐化是由于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的结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新生的波兰还在米科拉伊奇克之前就存在有反对派，但是那个时候反对派是隐蔽的。现在也有反对派，但现在的反对派是公开的，所有区别就在这里。“我认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的阵营对国家居民的影响是缓慢的，但是在不断增大。”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的反对派由下面三个集团组成：相当大部分的农民，大量的知识分子，大量的青年。他认为，有对立

情绪的知识分子包括两种人：主要因为处境艰难而产生对立情绪的宗教界人士和小学教员；在战前就有反对情绪至今仍未改变自己观点的中等和高等院校的教师。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把青年首先分为有组织的青年和无组织的青年。”

斯大林同志让他说准确点，是指什么样的青年，是青年学生或是泛指青年。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他指的是青年学生，这里面包括中产阶级的孩子，知识分子的孩子，工人和农民的孩子。

波兰现政权的反对派的组成中有在情绪上明显反动的人，此外还有动摇分子。如果谈到新波兰目前进行的改革，那么谁也不会激烈反对，包括有不满情绪的人和反动分子。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大家都赞成改革。在目前的波兰，批评改革的人不受欢迎。居民，甚至对波兰现政权有反对情绪的那一部分居民，越来越相信“伦敦政策”必定破产，相信民族团结政府推行的政策是正确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目前导致国内形势复杂化的惟一原因是对国际形势认识不清。由于情况不明，流言四起。有敌对情绪分子寄希望于发生战争，以改变波兰的现状。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当一部分波兰的反对派只是具有敌对的情绪和心理，行动上并不积极。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还很低。米科拉伊奇克对此很清楚。他知道，对于多次被其他国家奴役过的波兰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独立。他利用波兰人担心再度丧失独立的恐惧感，企图让他们相信，只有他的党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波兰政府。接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把话题转到了各政党的特点上。

关于波兰工人党，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维斯瓦夫同志在座，由他来介绍，我不准备讲。我只想强调一下，由于波兰工人党是一个

对建设新民主波兰做出最大贡献的党，它就成了反对派的主要打击对象，因此波兰工人党所做出的牺牲最多。

至于波兰社会党，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党，由于分裂和某些领袖人物的叛变，它经受了巨大危机。波兰社会党如果是个统一的党，它可能会对建设新波兰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但是，波兰社会党的危机已经结束，这个党获得了新生，如今是完全团结的。上层头面人物中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没有回到党内，他们要么自己把自己开除出党，要么被党清除出党。不久前，最后一个反对集团被波兰社会党接纳。我们认为，从团结的观点看，接纳这个（右派）集团是适宜的。我们接纳反对派集团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一，我们希望，不给重新产生一个同波兰社会党竞争的社会主义集团创造条件。比方说，使这个与我们竞争的集团不能在选举期间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以波兰社会党的名义提出让茹拉夫斯基当候选人的不合理的名单。第二，我们不想让国外说波兰有两个波兰社会党。由于我们吸收茹拉夫斯基和他的集团入党，现在国外已经不讲有两个波兰社会党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社会党对于波兰民主政府的内外政策进一步取得胜利有极其重大意义。他认为，波兰社会党是一个任何反对派分子都不可能指责其没有爱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在波兰，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党，它的口号向来是为独立而斗争。此外，波兰社会党是一个在思想上比波兰工人党更接近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所以它能容纳自由主义分子。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谈到农民党的特点时说，目前这个党还不是很有力量，主要原因是党没有足够数量有经验的干部。而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却有有经验的干部。波兰农民党吸收了伦敦代表团的官员以及波兰农民青年组织“维茨”的领导干部。

劳动党的活动基础多少和农民党有点相似，但这个党的人数还不

多。由于它具有以波比尔为代表的更温和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领导人，它对民主阵营不采取激烈反对的立场。这个党曾经同民主集团的4个政党一道反对波兰农民党（例如，在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较之同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相比同劳动党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波兰反动派支持波兰农民党，因为反动派把它视为巨大的力量。

波兰农民党的基础各式各样。它的核心力量是富农。但是也有许多不了解国内政治形势的有激进情绪的农民加入这个党。例如青年农民组织，战前它是一个激进组织，而现在加入了波兰农民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指出，波兰的农民运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能从政治上思考问题的领袖。这些领袖人物的思维总是落后于形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农民党之所以具有反动性，是因为前往伦敦代表团的官员在这个党里面定调子，伦敦流亡“政府”许诺让他们当省长、村长等等，但是他们在新波兰什么也没有得到。加入波兰农民党的还有前民族民主派，他们现在没有权利重新成立自己的合法的党。

因此，波兰农民党是一个由所有带有不满情绪的人组成的党。米科拉伊奇克认为自己是全国性的领袖，所以他向所有对所谓卢布林联盟不满的人打开了自己的党的大门。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明，民族民主派是不是在形式上同波兰农民党联合起来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民族民主派的党的干部有一部分仍处于非法状态，有一部分加入了波兰农民党。其标志是，米科拉伊奇克打算把自己的党变为全国性的党，正在向城市进军，那么现在的波兰农民党正在按照工人党的方式在各城市建立自己的组织（支部、区委等等）。在各城市中，米科拉伊奇克的党主要是吸收反动干部。虽然在米科拉伊奇克的党里面反动分子是少数，但是，由于他们有积

极性和政治经验，能起到定调子的作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举出一个典型例子：米科拉伊奇克的机关报——《农民日报》就是由民族民主派分子编辑的，波兰农民党没有自己的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份报纸发表了某篇明显反民主的文章，波兰农民党的领导人就声明说，这并不代表他的观点，说什么文章是以前不属于农民党的人写的，他不得不容忍他们，因为报社没有自己的干部。当时由民族民主派分子编辑的报纸诬蔑民主阵营，毒害群众的意识，散布幻想，说什么波兰农民党及其领袖米科拉伊奇克是波兰的惟一救星。

反动派的地下活动越来越猖獗。所有政治上反动的集团都支持波兰农民党。米科拉伊奇克的党里面还有一个由走出森林的人组成的还没有合法成立的集团。米科拉伊奇克的战术（同政府进行尖锐的斗争）有助于波兰反动的地下活动。

接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长时间地、断断续续地试图证明，在米科拉伊奇克的党里面存在着两个集团（米科拉伊奇克集团和凯尔尼克集团），这个党是可以分裂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和凯尔尼克由于都有个人野心，多少有点儿互相敌视。凯尔尼克似乎赞成在选举中同4个民主政党结盟，而米科拉伊奇克一概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从米科拉伊奇克的党里面可能可以分裂出去一个独立的集团——“皮亚斯特”，这个集团由农民的右翼部分组成，但是在情绪上愿意和解，不想争吵，准备同政府协商。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又不得不马上承认说，这个集团的弱点在于它里面有许多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过去同萨纳齐亚（战前波兰的执政当局）经常有勾结。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对值不值得解决这个集团的活动问题感到没有把握。再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有过关于波兰的政党不能超过6个的命令，而目前已经有6个政党。但是莫拉夫斯基认

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考虑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接着指出了三个导致米科拉伊奇克的党活动猖獗的原因：1.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做得不好，因此一系列省份的反革命集团有恃无恐；2. 严峻的经济形势引起农村教师不满，甚至导致工厂罢工，而罢工就是波兰农民党组织的；3. 外部势力。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这里指的是间接的压力。有时英国人和美国人直接干涉波兰的内政，例如在选举、出版自由、“迫害”米科拉伊奇克等问题上。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3月1日以后，当明显发现米科拉伊奇克不打算同我们达成协议、拒绝参加选举联盟并企图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时，我们开始同他进行了尖锐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某些良好成果。我们准备继续执行反对米科拉伊奇克的这一方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场斗争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担心，我们的这一方针会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政治复杂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指出了这种复杂化的征兆，他说，美国政府同波兰签订了向波兰提供总额为900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提供。其借口是，波兰政府过于迟缓宣布交换有关这个问题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的波兰农民党副主席班奇克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反政府讲话稿被没收。

关于选举问题，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选举是国内局势稳定的重要条件。波兰社会党的态度是，尽可能把选举的时间往后拖延，因为时间对民主阵营有用。民主阵营可以得到巩固，取得经验，而米科拉伊奇克的机会可能丧失。米科拉伊奇克之所以如此急于进行选举，是因为他想利用困难制造纷争。

斯大林同志问，波兰工人党对这个问题也是这种意见吗。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这个问题将由维斯瓦夫亲自介绍。他继续说，为了回答米科拉伊奇克的一味要求，民主政党联盟已经宣布在秋天举行议会选举。尽管如此，政府有可能不考虑这一情况。如果

这不会引起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复杂化，我们就准备拖延选举。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可以不同反对派计较。尽管我们应当承认，由于我们建立的经济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巩固了私有制，尽管是小私有制），因此国内现在和将来都存在反对派的基础。但是波兰农民党怎么办呢？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把它解散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在现存的国家经济制度下它还有基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如果我们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民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应当是目前的这种被动的民主（说到这里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转身对着贝鲁特，露出尖刻的冷笑），或者说不得不扩大民主？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压制和打击反动派的途径建设我们的国家，因为我国人民是爱好自由的人民，有时准备以轻率的举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我们希望找到发展我们国家的最好的道路。波兰工人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的争议在于如何更好地巩固政权。

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讲完后，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维斯瓦夫）发言。

哥穆尔卡也承认，国内政治形势尖锐。他和贝鲁特都认为，同米科拉伊奇克签订的莫斯科协定没有促使波兰国内形势好转，反而使其恶化。哥穆尔卡说，米科拉伊奇克到我们这里来是有一定目的的。米科拉伊奇克的目的不是波兰民主的团结统一，而是使波兰回到伦敦的政策上去。今天大家对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

政治形势恶化首先表现在反动派的恐怖活动加强。反革命集团特别加强了对个人的恐怖活动。国内反动分子的猖獗活动与国外的波兰反动集团的活动相互联系，例如同安德斯集团的联系。安德斯得到伦敦“政府”的实际援助和官方援助。反动派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波

兰工人党的，部分是针对农民党的。有许多事例表明，从事恐怖活动的不仅有非法的反动集团，还有波兰农民党的一些合法支部。为此我们已经解散了波兰农民党的两个县级基层组织。

贝鲁特：近日还将解散了几个组织。

斯大林：如何解散米科拉伊奇克党的地方组织？

贝鲁特：没收文件，把走街串巷的同反动派集团直接联系的领导人投入监狱。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兰农民党是一个把所有的反动派都联合在它周围的党。波兰农民党进行宣传的主要提纲是，在波兰再也没有反动派了，因为波兰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这一提纲对反动派十分有利，它把反动派联合在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的周围。

米科拉伊奇克的党没有进行过任何值得肯定的国家工作。这是一股破坏势力，它阻挠恢复国家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工作。米科拉伊奇克已经对它奉行的反政府政策再也不加掩饰。在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之前召开的部长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米科拉伊奇克声称，鉴于已经签订向波兰提供贷款的协定，他的党的机关报有意识地不刊登反驳美国人造谣的文章。

哥穆尔卡说，在战前的波兰，农民党并不是特别强大。它在最好的时期在议会中总共也只有25%的席位。哥穆尔卡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说法，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的机关的主要骨干力量是来自伦敦代表团的人。他肯定地说，波兰农民党并不是米科拉伊奇克创建的，而是前伦敦代表团建立的。他指出，加入波兰农民党并成立这个党的一系列支部的指示是从伦敦发给反动的地下工作者的。

波兰农民党的骨干分子就是伦敦“政府”的骨干分子。

哥穆尔卡认为，在各民主政党同米科拉伊奇克关于选举联盟的谈判破裂以后，波兰的政治形势尤其紧张。哥穆尔卡说，我们提出，在未来的议会中，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0%席位，给加入选举联盟的农

民党 20% 席位。而米科拉伊奇克要求，在未来的议会中仅他的党就应该有 75% 席位。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我们没有接受这个要求。现在米科拉伊奇克说，他所说的在未来议会中有 75% 席位不是为了他的一个党，而是为了两个农民党，尽管另一个农民党并没有授权他谋求议会席位。

哥穆尔卡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尽管形势如此，我们的基础（波兰民主的基础）并没有缩小，反而正在扩大。他以五一节游行为例，游行的规模超出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一些领导人的意料。将近 300 万人参加了今年五一节游行，其中有许多农民。

斯大林同志问，米科拉伊奇克 5 月 3 日组织的反游行的规模多大。

哥穆尔卡回答说，这是米科拉伊奇克组织的第一次反游行，在一些城市有数百人参加，在克拉科夫有数千人参加，这些游行主要是由大学生组织的。

斯大林同志说，反动分子举行这样的游行在芬兰也发生过。

当哥穆尔卡谈到加强波兰政府的行政机构及其国家安全部门时，斯大林指出，这种机构目前还很薄弱，因为反革命集团至今还有恃无恐。

哥穆尔卡承认斯大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且补充说，在这方面，事情不仅在于行政机构，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在组织上软弱，而且在于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数量不足。他说，我们现在在波兰组建志愿警察预备队，我们从工人即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党员中选拔这种警察预备队的干部，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军事训练。目前波兰共有志愿警察约 6 万人。

斯大林同志问，这是警察还是警察支援人员。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说，可以更准确地把这些武装的工人叫做支援民警支队。但是他认为这些支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武装的工人阶级。他说，我们想让武装的工人支队的总人数达到 15 万-20 万人。

这将使我们有能力对付反革命集团，否则我们无法消灭反革命集团。哥穆尔卡认为，关于波兰目前的形势，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波兰农民党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波兰农民党向城市渗透，在工人中散发自己的报纸和小册子，散布种种传言……

斯大林同志打断了哥穆尔卡的话后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谣言四起，那就说明党组织得不好，说明这个党没有开展反宣传。

哥穆尔卡同意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意见，尽管他认为，波兰工人党正在巩固自己的阵地，无论在组织方面或在数量方面都有长进。

在谈到经济困难时哥穆尔卡指出，工人的工资水平比战前还低，仅达到战前的40%，而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的工资更低，只及战前的20%。

斯大林同志问，兹罗提贬值了吗？

贝鲁特回答说，波兰没有通货膨胀，但是兹罗提的价值只相当于战前的1/100。

明兹补充说，今年5月1日波兰的物价指数比去年5月1日的物价指数稍低一些。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很大的成就。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说，波兰政府很快就会有收支平衡的预算。

哥穆尔卡随之说道，波兰代表团打算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要解决政治问题必须了解国内的经济形势，他同意专门讨论经济问题。“你们的纺织工业情况怎么样？”斯大林同志问。

明兹回答说，纺织工业目前只达到战前水平的20%，但是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已开始进入市场，不受需要供应军队的限制了。

哥穆尔卡又谈起了政治问题，他说，波兰农民党想方设法分裂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统一阵线。对于米科拉伊奇克讲，现在这是

头等重要的事。波兰农民党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波兰工人党。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党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得以分裂民主阵营联盟，那么波兰就注定灭亡。哥穆尔卡说，遗憾的是，不能说不存在分裂的前提条件。哥穆尔卡说，我们不完全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对波兰社会党所做的评述。我们担心，这个党目前的右翼部分的领导人可能同波兰农民党合作，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例如，德罗布涅尔极力为波兰农民党涂脂抹粉。他甚至在波兰农民党组织的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之后建议将志愿警察部队司令和副司令的职位交出去，因为在德罗布涅尔看来，不这样做的话，波兰农民党就不会参加消灭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中的右派没有看到波兰农民党的真正面目，他们把波兰农民党看做是一个农民的政党。

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这样说，米科拉伊奇克的党不是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由几个派别组成的阵营和集团，或者说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

哥穆尔卡和贝鲁特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波兰农民党的定性。之后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在自己的党内散布幻想，说什么可以同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农民党达成协议，共同对付反动派。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在对待米科拉伊奇克党的态度上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哥穆尔卡说，我们认为，同米科拉伊奇克的党不能合作。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各出3名代表的协商委员会上，我们经常谈到制定我们两个党对待米科拉伊奇克党的一致立场的必要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两个党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我们制定统一的立场，我们会十分感谢的。

哥穆尔卡不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绞尽脑汁提出的关于在波兰农民党内可能存在分歧的说法。哥穆尔卡说，我们允许其出版杂志的“皮亚斯特”集团马上就对波兰工人党进行了猛烈攻击，热烈响应波兰社会党的建议，赞成在波兰建立统一农民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打断了哥穆尔卡的话，问：“是这样吗？”

哥穆尔卡说：“是的，是这样写的。这一期杂志就在我的公文包里。”

哥穆尔卡认为，建立“皮亚斯特”集团是米科拉伊奇克进行的新的破坏活动，“皮亚斯特”集团不可能成为波兰民主政党的同盟军。

之后哥穆尔卡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认为，如果政府的阵营里面没有波兰农民党，这就是专政这样说是不正确的。他说，加入我们的联盟的除了两个工人党以外，还有农民党和民主党。尽管这些政党都不很巩固，但毕竟都是政党。要知道我们是在没有波兰农民党参加的情况下、在4个政党的基础上在卢布林建立了临时政府的，但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错误地认为，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有波兰农民党的位置，如果它是个自由党，还可以同意这种意见，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反动派阵营。

哥穆尔卡认为，波兰阶级斗争尖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民主政权执政没有经过特殊的斗争。应该看到，国内的反动势力得到了国外的支持。哥穆尔卡说，我们在制定对待波兰农民党的策略时应该考虑到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对米科拉伊奇克做出让步，但是我们认为，过分的让步有使民主的成果丧失的危险。

哥穆尔卡认为，可能不得不广泛采取镇压的措施，但是对于波兰工人党来讲，国际环境还不完全明朗。尽管波兰工人党知道，在确定波兰民主阵营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的态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国际环境，而是国内的力量和波兰人民的需求。

哥穆尔卡请斯大林同志向他详细介绍国际形势。之后他谈到了波兰的教会。他指出，最近天主教界人士试图同政府接触。哥穆尔卡认为，教会持观望态度，想通过同政府建立联系来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哥穆尔卡说，我们正在同天主教界人士进行谈判，尽管还不是直接谈

判。如果能达成协议就好了。

哥穆尔卡认为，议会选举还是应该在今年举行。他说，莫拉夫斯基说得对，时间有利于我们。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经济状况改善的速度非常缓慢，一旦收成不好或者发生其他灾害，形势可能再度恶化。要是今年举行选举，国家的形势就会稳定下来，反动派将被粉碎。

之后，农民党的一位领导人，文化和艺术部部长科瓦尔斯基说，他去过20个县，会见了他熟悉的老资格的普通农民活动家，想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反对政府联盟，为什么米科拉伊奇克在相当一部分农民中有自己的追随者。科瓦尔斯基说，事情在于商品短缺，农村中的宣传工作开展得很不好，农村中流言四起，看不到报纸。

斯大林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更好地组织无线电广播。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指出，建立无线电广播网有困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已经通电。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个问题可以找我们解决，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

科瓦尔斯基接着指出，波兰反动派散布的对集体化的恐惧心理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20名前议会农民议员进入党的领导层以后。波兰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恐怖活动对农村的情绪有很大影响。他说，居住在闭塞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最容易受影响。

科瓦尔斯基认为，农民党现在比米科拉伊奇克搞分裂前更加强大。干部确实不够。莫拉夫斯基说得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干部多一些。但是不应该忘记，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的干部是资产阶级的干部。罗兹省、凯尔采省和其他一些省份是跟着农民党的，而不是跟着米科拉伊奇克的。至于说青年农民组织“维茨”，那只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支持米科拉伊奇克，下面的人，其中包括某些省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是同农民党合作的。科瓦尔斯基说，米科拉伊奇克奉行两面派的政策，他一方

面建立自己的小组和支部，另一方面却保留非法的反动组织。在米科拉伊奇克的人组织的农民大会上，首先是攻击苏联，之后攻击波兰工人党。例如，波兰农民党的发言人向农民说，目前波兰的新制度是不巩固的，苏联最终将让波兰人自行选择，西方国家也不会容忍波兰的现政权。

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说，在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员大会上发言人公开发表反苏演讲？”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尔贝试图让斯大林相信这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明兹举出了刊登在米科拉伊奇克的党的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来反驳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尔贝的说法。这篇文章毫不掩饰地暗示说，现在波兰已被苏联占领。

科瓦尔斯基认为，如果哪怕让土地少的农民免交公粮、消灭反革命集团并扩大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米科拉伊奇克的工作效果就会化为乌有。寄希望于米科拉伊奇克交出自己的阵地是荒谬的，米科拉伊奇克正在把事情引向国内战争。科瓦尔斯基认为，不应该为选举而担心，推迟选举没有必要。

科瓦尔斯基发言后，斯大林建议休息10分钟。休息以后斯大林同志致答词。

斯大林同志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并且指出在解决波兰的国内政治问题中应该怎样理解国际形势。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敌人正在大肆散布战争的流言。

英国人和美国人通过他们的走狗散布战争的谣言，企图吓唬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人民。我认为，现在不可能发动战争，大家都厌恶战争了。再说也没有战争的目标。我们不打算进攻英国和美国，他们也不想冒险。至少在20年内不会有任何战争。

英国人和美国人散布战争谣言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波兰人说，你们的制度是不巩固的，你们不应该相信苏联，因为苏联在困难的时候，

在你们遭到进攻的时候不会帮助你们。

丘吉尔的讲话是讹诈，他的目的是吓唬我们。我们之所以对丘吉尔的讲话做出毫不客气的回答，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说，新的战争贩子未必能够重新挑起战争。如果英国或者某个其他国家的反对派对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必定被粉碎。我们做出这样尖锐的回答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让丘吉尔吓唬我们的人。

波兰解放后建立起来的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是没有战争，我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具有另一种性质。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是由于普法战争于（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俄罗斯产生了。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我们要推翻三头大鲸——沙皇、地主和极其强大并得到外国人支持的俄国资本家阶级。为了对付这些力量，需要建立依靠暴力的政权，即专政。

你们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你们的资本家和地主由于同德国人勾结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因此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把他们打倒，他们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欠的这笔账还没有算。毫无疑问，波兰消灭资本家和地主得到了红军的帮助。

所以说，你们那里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波兰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是新型的民主，它没有先例。无论比利时、英国、法国的民主都不能成为你们的样板。你们的民主是特别的民主，你们那里没有大资本家阶级，你们100天就进行了工业国有化，而英国人为此奋斗了100年。所以，你们不要照搬西方的民主，让他们去仿效你们吧。

你们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可以使你们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

列宁根本就没有讲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允许通过利用建立诸如议会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的途径进入社会主义。你们那里由于进行改革，无疑会出现中产阶级和小资本家。但是，中产阶级任何时候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

你们那里没有大型私人银行，没有私人的大型工业。

所以，我不能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关于波兰存在他称作“被动的民主”的说法。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现在苏联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的是苏维埃民主。我们没有什么人要镇压，我们需要政权是为了保卫国家免遭外部敌人侵略。

你们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大工业已经国有化和大资本家和地主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的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在工业部门建立相应的制度，提高工业产量，降低价格，向居民提供更多的日用品，国内形势就能稳定下来，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你们不必通过流血斗争就可以接近社会主义。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建立的新民主对波兰是个救星。波兰目前建立的新制度保证波兰有最大的独立性，并为建立没有剥削劳动者的繁荣社会创造所有的必要条件。

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如果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联盟垮台了，波兰建立的新民主势必灭亡。

英国和美国的反动派不希望波兰独立，他们希望看到波兰出现他们的走狗，他们当然企图对你们施加各种压力。他们不喜欢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制度，他们想消灭这种新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寻找依靠力量。例如，在波兰他们找到了以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党为依靠力量。

对米科拉伊奇克应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同志认为，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

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民主阵营需要反对派是为了拉走地下活动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认为，波兰的民主阵营在选举中必须结成联盟，如果对米科拉伊奇克施加压力，他就会提出谈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他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 25% 的席位，给科瓦尔斯基的党 15% 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不加入选举联盟（他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走狗，无疑会得到关于要他单独参加选举和在国内点燃国内战争的指示），他就是输了，因为社会舆论都知道你们对他做出了让步，而他不愿意接受。这样就会使米科拉伊奇克再次暴露自己。

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应该从政治上孤立米科拉伊奇克的党。至于那些继续开枪射击的人，就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了，应该消灭他们。如果你们尊重自己就应该这样做。不会保卫自己的制度是不好的制度。农民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尊重强大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米科拉伊奇克不愿意合作，你们没有他也能够管理国家。能够吸收波比尔的党参加合作也不错，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参与孤立米科拉伊奇克。

斯大林说到这里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打断了斯大林的话，他说，如果建立统一的政党联盟，把米科拉伊奇克孤立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对此回答说，在这方面他看不到会对波兰造成任何复杂的国际环境。如果波兰的民主政党结成联盟参加选举遭到英国人和英国人的抗议，那么可以告诉他们，波兰不是第一个这样选举的国家，南斯拉夫、比利时就是采取这种途径进行选举的，罗马尼亚也是建立

统一的选举联盟的。可以比较一下希腊的选举，那里有个单独的选举名单，但是选举的结果看来不值得仿效。对改变波兰现行制度感兴趣的一些国家的主要方针是按单独名单进行选举。斯大林说，所以我再次强调，你们在选举中要结成联盟，而且首先是两个政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联盟。

斯大林同志说到这里时，什瓦尔贝深深地叹了口气，有点不安地在椅子上晃动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外国人能拿你们怎么办呢？绝对不会有任何办法。他们不提供贷款，企图以某种方式向你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不可能做到长时间推行这样的政策，因为英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这种政策。不要忘记，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比革命后我国的地位好得多。美国14年、英国两年不承认我们。斯大林同志说，哥穆尔卡同志看来急于进行选举，因为他认为，选举将最终向外国人表明，卢比肯河已经渡过^①，所以不会给任何人提供干涉波兰内政的权利。但是应该懂得，即便波兰的选举取得了保留现存制度的结果，外国资产阶级国家对波兰的态度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斯大林同志表示希望，只要波兰保留现存的制度，波兰就能保持独立，比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工厂和矿山的波兰将由于这场战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只是需要整顿工业并奉行保卫民主成果的坚定战线。

斯大林同志结束自己的谈话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向他提了个问题：如果米科拉伊奇克不参加选举联盟，并且按照自己的党的单独名单取得了50%的议会席位，那时会是个什么情况？

① 卢比肯河是亚平宁半岛上的一条河流。公元前49年，恺撒自高卢率兵渡过该河，挑起战争。后来，“越过卢比肯河”就成为采取不可更改的决定的同义语。

斯大林同志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

什瓦尔贝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目前国内不满情绪的人很多。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表示不满是一回事，对现存制度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票是另一回事。有不满的人，但是如果对他们说，你投米科拉伊奇克的票，就是赞成消灭一切民主成果，赞成丧失独立，这样他就会为现存的制度投上自己的一票。

在随后的谈话中，斯大林建议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疏远教会人士。他认为，应该把波兰的天主教看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它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还是可能同现存制度结成联盟的，尽管它不喜欢现存制度。

可以看出在场的某些人，比如说波兰社会党人（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可能目前对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没有信心。于是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要着急。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时间对你们有利，那么可以把选举推迟到明年秋季进行。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那国外会怎么说呢？”

斯大林同志再次重复说，他看不出国际舞台上对波兰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改变西部边境协议方面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他们就得同苏联断绝关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现在是在吓唬人，将来也会吓唬人。只要不被他们吓唬住，那么吵吵嚷嚷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如果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他在国内的威信就会一落千丈。在这个问题上惟一使莫拉夫斯基感到窘迫的是，担心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首先是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为此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认为，莫拉夫斯

基错了。如果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那么他的机会就多了。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组成人员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的理由。“我不是建议你们破坏他同你们签订的协议，”斯大林同志说：“要忍耐，否则米科拉伊奇克就会说，由于害怕他，因此还没有等到选举就把他除名了。”

斯大林同志说，按事情发展的逻辑当然是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后就逮捕他，但这未免走得太远了。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是需要米科拉伊奇克的，我还要说得更过分一些，如果没有米科拉伊奇克，又该想别人了。敌人也在培养人。老一辈经验丰富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说，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地方，革命力量也强大。革命力量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势力也强大。我再说一遍，你们目前还需要米科拉伊奇克。”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米科拉伊奇克在波兰的活动促使波兰政府和所有民主政党更加努力地为建立新波兰而工作。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在我们苏联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同德国人打仗，这看来是件好事。我们同德国人打仗能学到东西。如果比方说我们同中国打仗，我们无疑可以获胜，轻而易举地获胜，但是什么也学不到。同强大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是件好事。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可是要知道米科拉伊奇克并不聪明，他愚蠢。

斯大林同志：可是他的主子们并不愚蠢。

在之后的交谈中贝鲁特谈了关于米科拉伊奇克有可能自动退出政府的想法。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他这样做，那太好了。可以指责他破坏莫斯科协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排除了米科拉伊奇克自愿退出政府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说，米科拉伊奇克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办事，执行英国政府的意志。

在随后的交谈中，波兰人更具体地介绍了波兰国内的经济情况。波兰对苏联在庄稼收获之前提供粮食帮助表示感谢。今年的收成预计不错，但还是稍低于去年，因为某些地方在播种的时候缺少肥料。波兰大约短缺 70 万-80 万吨粮食。波兰政府打算在明年部分地取消向国家交纳粮食。

斯大林同志建议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建立起 20 万-30 万吨的粮食储备，以便必要时投放市场，以降低粮食价格。他还建议发展同瑞典的经济关系，瑞典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不同，对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态度多少还比较认真。

由于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波兰的农村有钱，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议千方百计多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并收点税。

莫洛托夫同志问，西部地区的移民进展情况怎样，哥穆尔卡回答说，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靠近波兰的地区，德意志人总共只剩下了 170 万人。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贝鲁特提出了关于解决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争端问题，同时他表示，希望动用斯拉夫国际仲裁机构，因为捷克人看来根本不想谈判。

斯大林同志说，捷克人是不想谈的。一方面，贝奈斯和马萨利克想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暗送秋波；另一方面，这是在玩竞选花招，指望吸引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选票。

斯大林同志认为，竞选过去以后，捷克人会比较愿意谈判的，他建议通过直接谈判解决类似问题。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示担心说，在和平会议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问题，比如说在关于克拉茨科（前德国的西里西亚，根据柏林会议的决议归波兰管辖）问题的争端中支持

捷克人。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可能破坏关于波兰西部领土的决议，因为苏联是不会同意的。三个大国必须意见一致。

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

记录帕夫洛维奇
1946年5月24日于莫斯科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作用问题

——同莫拉夫斯基等人的会谈纪要

(1946年8月19日)

秘密

1946年8月19日晚10时，斯大林同志在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陪同下会见了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

在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开始谈话并问波兰朋友有些什么问题要向他提出。

首先发言的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要客观、全面地分析一下由于不久前进行的全民公决而在波兰形成的政治形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从根本上不同于波兰工人党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工人政党之间在今后将要采取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即将到来的、预计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全民公决表明，现有的四党政府联盟在波兰人民中的基础过于狭小。政府联盟只得到28%的选票。而其余选票均为波兰农民党、“自由和独立”党以及“国民武装力量”所得。报刊上公布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是拙劣的伪造之物，奥苏布卡-莫

拉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件不能容许的事情，因为关于此事在波兰是尽人皆知，并会动摇政府联盟在居民中本来就不甚牢固的威信。

斯大林同志打断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话，表示：对全民公决中投票结果的伪造行为，他是在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之后才知道的，这种伪造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还指出：他认为，把第一个问题——保留还是取消议会的两院制——提交全民公决是一个错误。这样做把许多人搞糊涂了，因为甚至连真诚拥护波兰现存民主制度者当中的一些人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要知道，在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实行的都是两院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波兰的民主政府却反对这样的制度并号召人民投票反对上院？把这个问题提交全民公决给了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在波兰有许多人之所以投票反对取消议会的两院制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在所有其他民主国家都普遍采用的两院制究竟有什么害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避正面回答斯大林同志的这段插话。他说，全民公决总的来说并没有决定性意义，更为重要得多的是选举，因为在选举期间反动势力将向波兰年轻的民主制度挑战。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社会党建议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扩大政府各党联盟，吸收劳动党和波兰农民党加入其中。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试图证明，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政府联盟把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即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从而支持了在波兰进行的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力量，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对于波兰的民主事业将是极为有利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这种政策的适宜性阐明的理由是：把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吸引到政府联盟一边来将不会构成对波兰现行制度的威胁，同时还有可能使米科拉伊奇克在该党的极端反动分子心目中名誉扫地，因为他辜负了他们的希望。波兰农民党里的极端反动分子将指责米科拉

伊奇克背叛并将离开他。按照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这一构思，米科拉伊奇克将因此而失去作为一个奢望扮演民族领袖角色的人物的声望并最终可能被清除。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没有米科拉伊奇克也可以同波兰农民党结成联盟。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怎么可能在不理会米科拉伊奇克这个该党领袖的情况下同波兰农民党结成联盟呢？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虽然米科拉伊奇克是党的领袖，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他也可以不再是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继续断言，在未来的选举中必须依靠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政府联盟得到多数。

接下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解释了为什么民众中的某些人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支持在波兰进行的改革。他认为，在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的人当中不仅仅有隐蔽活动的露骨的法西斯分子，而且也有许多诚实但却一时糊涂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和实际生活中的这种或那种消极现象引起的各种不满，而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示自己的抗议。

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列入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人当中不仅有德意志人和德国代理人，而且也有被遣送回波兰的人。波兰的极端反动分子恐吓这些被遣送回国者说，如果他们支持将西部领土划归波兰，那么他们就已经不再有可能返回维尔诺和利沃夫。

接着莫拉夫斯基转而评述了波兰的匪帮。他把这些匪帮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刑事犯罪分子，第二类是反动的恐怖主义分子，第三类则是受反动宣传蒙蔽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如果在行将举行的选举中，政府联盟能够从4个党扩大到6个党，则不仅各种心存抱怨和不满者，而且今天仍在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其中包括匪徒当中的许多人都将转向政府方面。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认为，这将确保人民的大多数支持波兰的现行制度。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工人党对扩大政府在行将举行的选举中的基础的意义估计不足。波兰工人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同米科拉伊奇克结成联盟，即使四个政府政党的联盟在选举中遭到事实上的失败，还可以伪造投票的结果。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解释了为什么在准备全民公决时期，他在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公开讲话中说如今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实际上并不是由波兰的现政府确定的，而是在该政府组成的很早以前——由三大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确定的。他认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和该党报刊就边界问题发表的讲话和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比波兰工人党的官方宣传要大得多，按照这种宣传，本来就无需向波兰人提起东部边界的事。

说到这里，斯大林同志向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波兰社会党以及他本人是否将维护波兰现今的边界。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和他的党完全赞成波兰目前的边界并且将竭尽全力为维护这些边界而斗争。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现今的波兰社会党乃是完全新的、与旧的波兰社会党毫无相似之处的党。这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是坚持社会改革并同时由于在数十年过程中其主要口号就是为争取波兰独立而斗争，因而在波兰人民中享有充分信任和很高威望的党。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称，波兰工人党在群众中，甚至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却小得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波兰工人党在波兰被认为是曾经忽略为争取波兰独立而斗争的口号的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

波兰社会党曾经向波兰工人党做了过多的让步，这是一个错误。波兰工人党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策略给民主波兰的复兴带来巨大的损害。波兰工人党直到最近以前一直掌握着国内90%以上的政权。现在它仍然保留有近80%的政权并力图在实际上独揽政权。这与波兰工

人党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并不相符，而且有损于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在追随波兰社会党的那部分工人和支持波兰社会党人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威信。

波兰工人党不信任波兰社会党人，不让他们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任职。国家安全机关完全都在波兰工人党的手中。各地的安全机关常常为道德败坏和违法犯罪分子所充斥，这些人滥用权力和对居民使用恐怖手段（有时一些“安全机关”的不负责任分子竟然当众抢杀完全无辜的人，甚至焚烧整个村庄）。在波兰工人党里和在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机关都由犹太人把持着，这种情况会引起很大的危险，因为在波兰国内的反犹太人运动的规模，正如在凯尔采地区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是如此之大，甚至在萨纳齐亚统治的最黑暗年代也未曾达到过。

尽管按照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看法，波兰社会党在群众中拥有比波兰工人党更大的影响，但它所要求的并不多：波兰社会党希望成为一个权力平等的共同执政的政党，而不是依附于波兰工人党的附庸，不是一个仅仅听命于波兰工人党决定和指示的机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烈地表示反对解散全体波兰农民党县级和省级组织的政策。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概括他的上述谈话时说，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即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为代表的党的政治委员会）来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向斯大林同志阐明自己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观点。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请求斯大林同志支持波兰社会党的观点并劝告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选择新的策略路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说，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应当像信任波兰工人党那样充分信任波兰社会党。他说，只有在波兰工人党同意波兰社会党人提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波苏友谊才能得到充

分的巩固与发展。

西伦凯维兹基本上重复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想法。他认为有两条道路：目前参加政府的四个党的联盟，即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事实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六党联盟，即扩大政府的基础。西伦凯维兹认为，扩大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目前存在的状况不符合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在波兰存在着三个强大的政党：1. 波兰工人党，2. 波兰社会党，3. 波兰农民党。至于说到其余的政党，则它们其实称不上是政党，而只能说是充充样子。因此，漠视波兰农民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有别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是，西伦凯维兹认为，把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排除在外而同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去结成联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米科拉伊奇克是波兰农民党的领袖。如果去同波兰农民党中脱离了米科拉伊奇克的那一部分或者在将来将退出该党的那一部分结成联盟，则这就意味着米科拉伊奇克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不会输，而且相反还会赢，因为他在党内和民众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威信总的来说，很遗憾，是非常之高的。

什瓦尔贝也认为，没有波兰农民党的参加，在波兰就不能成功地进行他所说的诚实的选举。什瓦尔贝设想，在某些省份将可以在不同米科拉伊奇克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接着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贝和西伦凯维兹三个人分别地、时断时续地发表的意见。其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非常引以为荣地评述了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的优点。他说：什瓦尔贝这个人整个波兰都知道在9月前的波兰就是一位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战士，他在战争之前就曾退出过波兰社会党，因为这个党当时的领导不主张建立线一战线。至于西伦凯维兹，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此人曾经蹲过奥斯威辛和其他德国集中营。西伦凯维兹在被关在集中营期间曾参加过地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该委员会曾向盟国提供有关集中

营的材料以供反希特勒宣传之用。

接着，在波兰人把所有问题都讲完之后，**斯大林**同志开始讲话。

1. 斯大林同志说，对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以及他的朋友们看得更清楚。但是在对波兰的政治形势的评价方面，他（斯大林）却有某些不同的意见。斯大林同志认为，由于所进行的全民公决，民主联盟和民族团结政府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恰恰相反，更加巩固了。而米科拉伊奇克的地位却是大大地削弱了。米科拉伊奇克在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要求对波兰选举工作实施英-美监督。一个人如果求助于境外大国以寻求他们对自己的政策加以庇护，那么这个人就不是自己国家的爱国者，对此，波兰人民，那些迄今以来曾经一直追随米科拉伊奇克的波兰人将会十分明白。

2. 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试图按照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一个问题——新的波兰议会应当是单院制还是两院制——的百分比来判断此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不对的。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正如他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把这个提交全民公决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3. 在行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扩大联盟是否适宜？对这个问题需要由波兰人自己去认真加以考虑。但是同米科拉伊奇克结成联盟现在恐怕是已经不可能了。他过分地胡作非为，他作为波兰利益的敌人、波兰独立的敌人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米科拉伊奇克要求由外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来对波兰的选举工作进行监督，这将给波兰自身带来巨大的危险，因为它可能在将来招致外国的直接干涉。

4. 波兰是否应当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不应当。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这样做还将是有害的。在波兰面前，像在其他东欧国家面前一样，通过这场战争已经展现出了一条另外的，较为轻松和较少流血的发展道路——社会经济改革之路。由于这场战争，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出现了完

全不同于以前在一些国家建立的民主制度，甚至是法国的民主制度，在那里仍然一如既往由 200 个家庭在主宰国家的命运，这是一种民主制度形式。斯大林把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形式称为即便在这场战争之后也依然未触动国家经济基础的政治民主制度。至于在欧洲东部国家，其中包在波兰出现的民主制度，则乃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民主制度。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种更为综合的民主制度。它既触及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也触及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这个民主制度实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造。例如在波兰，新的民主政府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大型工业的国有化，而这就为今后在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沿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奠定了完全充分的基础。由于这场战争，各国共产党的面貌改变了，它们的纲领也改变了。以前曾经存在于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除。例如，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的这个联合政党的纲领中就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

5.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沿着改革之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各国民主政府不需要坚决地与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反动势力做斗争？不是，不意味着这样。对在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在波兰，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必须要能够将其维护到底。

6. 斯大林同志认为，“犹太人把持”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在波兰确实存在的话，是不容忽视的。斯大林同志想象不出波兰工人党人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7. 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相互信任无疑是必要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插话问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是否信任波兰社会党？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毫无疑问是信任的。他解释说，这里谈到的信任乃是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另一个同苏联有着友好关系并且同它

签订有互助条约的国家的政府或政府联盟，一般来说可以给予的信任。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依然存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在过去波兰的统治集团曾经为了尽可能地使俄罗斯蒙受更大的损害而做尽坏事。而俄罗斯统治集团也同样地为了削弱波兰而做了它能够做的一切。当然沙皇俄国的统治集团的罪孽比波兰统治集团要更大一些。他们不仅参加了对波兰的瓜分，而且有时还充当过这些瓜分的发起者。但是不应当忘记，俄罗斯的先进民主人士和革命人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从来都是支持波兰独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后来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认为波兰的独立乃是波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至于说到列宁和我们——他的俄罗斯信徒们，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贯持有支持任何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的独立的立场。接着，斯大林同志说：众所周知，苏联政府曾经收到过参加对希腊大选工作的监督的邀请。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曾有机会去揭露希腊保皇派和其他反动势力的舞弊行为。然而我们基于我们的基本戒律——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拒绝了参加上述监督。干涉别国内政是在对待其他国家人民态度方面的不公正行为，因而将给我们的国家招致危险。而我们，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

8. 至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及其朋友们关于支持波兰社会党的路线和谴责波兰工人党的路线的请求，斯大林同志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波兰工人党即在这里似乎被当作被告的党的领导班代表现在不在场。斯大林同志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指出，甚至按照在资产阶级国家现有的法律，法庭也不能在未听取被告陈述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斯大林同志说：有一点我可以对你们说，在我看来，在波兰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应当由一个政党说了算——不论它是波兰工人党还是波兰社会党。只有这两个政党结成统一战线，才能保证波兰民主制度的成果和波兰的独立得到维护。

斯大林同志表示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在波兰大选之前能够同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领导班子的代表举行一次会晤。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都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这样做。

关于会晤的地点，斯大林同志认为两党的代表不一定必须来莫斯科。在距波兰比较近的某个地方——比如说在基辅、明斯克或者布列斯特更为适宜。

波兰人同意关于会晤地点问题需要另行商定。

谈话共持续了4个小时，于夜里2点钟结束。随后斯大林同志邀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共进了夜餐。

夜餐后，应波兰人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们放映了影片《誓言》。

谈话记录B·帕夫洛维奇
1946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关于伊朗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年5月8日)

比雪华里^①同志：

我认为，您对伊朗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价是不正确的。

首先，您希望现在就实现阿塞拜疆革命的全部要求。但是，目前的形势排除了实现这一纲领的可能性。列宁提出的革命的根本要求是实际要求，我要强调的是，实际的要求只有在出现因与外敌的战争失败而加深的强烈的国内革命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对日战争失败时的1905年，情况就是这样。对德战争失败时的1917年，情况也是如此。您想现在就按列宁的话去做，这是很好的，并且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伊朗现在完全是另一种形势。目前在伊朗没有深刻的革命危机。伊朗的工人很少并且组织得也不好。伊朗的农民暂时还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伊朗现在也没有爆发有可能在失败的时候削弱伊朗反动集团的与外敌的战争。所以，伊朗不存在能让列宁1905年和1907年的策略得以实现的形势。

第二，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驻伊朗，您当然可以指望争取实现阿塞拜疆人民革命要求的斗争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不能让苏军继续留在伊朗，主要是因为苏军驻扎伊朗损害了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原则。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军可以留在伊朗，那为什么英军不能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希腊；美军不能留在中国、冰岛和丹麦呢？所以，我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以便夺走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上的这件武器，发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从而使我们的

^① 比雪华里，时任伊朗人民党（原伊朗共产党）主席。

解放政策更为有理和有效。您作为一个革命者当然能理解我们不能那样做的原因。

第三，根据上面所述，可以就伊朗的形势得出下述结论。伊朗不存在深刻的革命危机。伊朗没有发生同外敌的战争，从而也就不会出现能够削弱反动派和加深危机的战争失败的情况。在苏军还在伊朗时，你们有可能在阿塞拜疆展开斗争，发动提出深远要求的广泛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的军队必须撤离并且已经撤离了伊朗。现在我们在伊朗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卡旺政府同代表伊朗最反动分子的亲英集团发生冲突。不管卡旺过去是什么样的反动分子，他现在为了自卫和维护自己的政府也不得不去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并在伊朗民主力量中寻找依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冲突来迫使卡旺作出让步，我们应当支持卡旺，孤立亲英分子，从而为进一步实现伊朗民主化创造一定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根据形势给您的建议。当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唾弃一切，与卡旺决裂，从而使亲英反动派稳操胜券，但这不算策略，而是愚蠢。实际上这是对阿塞拜疆人民和伊朗民主事业的背叛。

第四，您竟然说，我们先是把您捧到天上，然后又把您抛入深渊，使您蒙受耻辱。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们会感到惊异。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采取的是每一个革命者都知道的通常的革命手段。为了保证在像伊朗这样的局势中实现运动的某些最低要求，必须使运动超前发展，超越最低要求并对政府形成威胁，创造从政府那里取得让步的机会。如果不使运动大发展，您在伊朗现在的局势下就不可能实现卡旺政府现在被迫同意的那些要求。革命运动的规律就是这样。对您来说，谈不上任何耻辱。如果您认为我们让您蒙受了耻辱，那就非常奇怪了。相反，如果您理智地行动，并在我们的道义支持下实现使阿塞拜疆现在的局势合法化的要求，那么，无论是阿塞拜疆人

还是伊朗人都将赞扬您这位中东进步民主运动的先锋。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4年第3期

关于匈牙利

与匈代表团关于苏匈关系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7日)

秘密

参加人：维·米·莫洛托夫、蒂尔迪·佐尔坦、丁尼斯·拉约什、拉科西·马加什、萨卡希奇·阿尔帕特、莫尔纳尔·埃里克、韦赖什·彼得、道比·伊斯特万、塞克费尤·久拉，和 Г. М. 普希金、Б. Я. 格里戈里耶夫（翻译）

斯大林同志问旅途如何。

蒂尔迪回答很顺利。有很多新印象。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代表团有什么问题需他回答。

丁尼斯说，昨天匈牙利代表团研究了由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转交给拉科西和莫尔纳尔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草案。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可以接受这个草案并准备签署条约。但是，丁尼斯说，按照匈牙利宪法，条约要在国家议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所以请求对这个条约草案做相应的修改。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

丁尼斯请求斯大林同志将匈牙利战俘遣送回国，从4月份开始，以便在今年秋天结束。

斯大林同志回答可以。

丁尼斯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将匈牙利驻苏公使馆和苏联驻匈牙利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声明这个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匈牙利和苏

联的友好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应可以。

拉科西用俄语表示，还有其他问题看来可以通过主管部门而不用在这次会见中解决。

斯大林同志请翻译把拉科西的话翻译给代表团听。

然后**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如何。

蒂尔迪回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关系很好，在此补充到：匈牙利还有一个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希望和它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请**斯大林**同志协助此事。

斯大林回答说，按他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人本身不会反对与匈牙利建立这样的关系，答应协助此事。

蒂尔迪再次强调匈牙利希望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友好关系的热望。

斯大林同志答应给予协助，但说捷克斯洛伐克未必会反对改善关系。

莫洛托夫同志补充说，友好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斯大林表示对匈牙利国内情况感兴趣。

蒂尔迪回答说匈牙利国内的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

斯大林问，福林是否坚挺，工业近况如何。

蒂尔迪说，福林是稳定的货币，工业在发展，农民工作得不错。

斯大林问国内有没有怠工的情况。

蒂尔迪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说匈牙利今年种植面积比往年有所增加，虽然由于干旱，匈牙利的秋播工作延迟了，但后来已经成功地弥补了这些损失。

斯大林问农民的情绪如何。

蒂尔迪说，大部分农民情绪很高，特别是分到土地的农民。

斯大林指出，他们会保护自己。

接着**斯大林**问，预算增加了没有。

拉科西回答，增加了预算，并说明预算问题一直是匈牙利政府关心的事。

斯大林同志对匈牙利军队的问题很关心，并问匈牙利政府是否想过削减军队。

丁尼斯说，正相反，政府想发展军队。今年要发展到3万人，并对此解释说，由于预算紧张和武器不够，很难执行这个措施，并请求帮助发展匈牙利民主军队。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将给予帮助。

莫洛托夫同志问，什么时候可以签署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丁尼斯回答，明天可以签署。

斯大林问，根据“和平条约”，匈牙利可以有多少军队。

拉科西回答，7万人。

斯大林问，苏联武器对匈牙利是否适用。

丁尼斯回答，适用，还说苏联武器是最好的。

斯大林答应帮助，并说苏联所关心的是匈牙利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特别是在签署条约后。

斯大林问，还有别的问题吗？

莫洛托夫同志说，主要的问题都研究过了，因为没有不同意见，可以认为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拉科西说，匈牙利人和铁托进行谈判，铁托有一个意见，由于必须建立匈牙利军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匈牙利的战争赔款或按贷款条件提供匈牙利武器。

斯大林指出，看来铁托说的是自己的赔款和自己的武器。

拉科西说，他也正是这样理解铁托的。

斯大林指出，由此看来，匈牙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关系不错。

代表团主席和团员承认这点。

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丁尼斯问，明天什么时候进行条约签字。

莫洛托夫说，打算明天晚上7点签署条约。

丁尼斯表示，这个时间对匈牙利代表团也合适。

谈话进行了30分钟。

普希金记录

1948年2月17日19时于莫斯科

关于印度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

（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收到了。我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然后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许，你们会感到奇怪，我们总是在晚上举行会谈。我们白天很忙，要不断工作，晚上6点才能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

或许，你们感到奇怪，会谈要持续这么长时间。但遗憾的是，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中央委托我们亲自接见你们，向你们提出一些建议，对你们的党进行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党了解得很少，对于你们也了解不多。对于这一任务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我们承担起提供建议的职责，那么我们就以此承担起了在道义上对你们的党负责的义务，而我们也不能轻率的提出建议。我们希望熟悉材料，了解你们，然后给出建议。

你们或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询问。但是我们所处的状况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材料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情况，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没有办法。局势要求必须这样。让我们转入实质性的讨论。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

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①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

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此就进行了反驳，指出，印度将会经历中国的道路，也就是将经历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以如下方式建设自己的革命阵线：鼓舞所有的农民和富农起来反对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农民都鼓舞起来孤立封建主义者。应该把社会舆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进步阶层都鼓舞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孤立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集团。你们经常说，应该通过一次性的打击，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英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都驱逐出去。不能够建立这样的阵线。在全民族阵线中，迫切的问题应该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让其他的帝国主义者，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你们不会触及他们。为了不使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你们，为了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这样做是必需

① 兰纳迪夫，1948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者注

的。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自己插了进来，那么，那时候印度的统一战线就应该把矛头也转向他们。

高士^①：我们不明白，当前美帝国主义者被认为是反民主的阵营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同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只反对英帝国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非常简单。为了建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了获得民族独立，需要反对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你们的民族特点。由于谁，印度才处于半独立状态？是由于英国而不是美国。印度存在的状况是：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而是在同英国人合作。你们军队中的一些军人和专家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够摆脱的。我想说的是，党不应把所有的任务都承担起来，不应承担起同全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需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摆脱英帝国主义。这是印度的民族任务。对于封建主也是一样。当然，富农是敌人。但是，反对富农和封建主是不明智的。承担起反对富农和封建主这两项沉重的任务是不明智的。应当这样组建阵线，以便被孤立的不是你们，而是敌人。这可以说是减轻共产党斗争压力的一种战略。如果某人是明智的，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到自己肩上。应当承担起的一项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和英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孤立封建主、消灭封建主，消灭英帝国主义，其他的帝国主义暂时先不要碰。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工作的阻力。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插了进来，那么也应当同他们作斗争，但人们将会了解，不是你们，而是他们发动了进攻。当然，也会轮到反对美国人和富农，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顺序。

高士：我现在明白了。

丹吉^②：但这不会妨碍开展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同他们作斗争

① 高士，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后担任总书记。——编者注

②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者注

的宣传吗？

斯大林同志：对于敌人应当明智地予以孤立。你们进行的革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而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行了干涉，那么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拉奥^①：富农中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封建剥削，他们出租土地，也放高利贷。他们通常站在把土地出租给农场主的大地主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这不意味着什么。同消灭封建主这一总的艰巨任务相比，这只是部分任务。你们在自己的宣传中需要反对封建主，但不要反对富裕的农民。而你们也不应把富农推往一边，使其同封建主建立联盟。不应该使封建主得到自己的盟友。富农在农村中有巨大的影响。农民认为，富农之所以出人头地是由于自己的能力等。不应该给富农分裂农民的机会。在你们国家，封建主中有贵族吗？

拉奥：有的。

斯大林同志：农民不喜欢贵族。应当抓住这一点，使封建主没有机会在农民中建立联盟。

布尼亚^②：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还有一些混乱。应当怎样理解民族资产阶级？

斯大林同志：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别的国家的政策。难道你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考虑去掠夺别的国家吗？现在掠夺印度的是英帝国主义者。民族资产阶级，这指的是印度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剥削者。应该说，你们不要反对他们，而要反对现在的敌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人是赞同你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但他们只是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会很多。资产阶级对你们的支持主要在于他们

① 拉奥，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者注

② 布尼亚，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者注

感兴趣的是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他们的兴趣还在于，消灭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良好的市场，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将会产生国内市场，将会产生能够购买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报刊进行解释。如果资产阶级不站在英国人一边，对你们将是有利的。你们应该这样做：要使英帝国主义者不能在印度获得新的盟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至于印度的革命，完全是英国人发动的骗人的把戏。如果你们制定了行动纲领，那么，你们应当在纲领中说明，你们需要建立巴基斯坦、印度和锡兰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这三个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国家将会接近。结果将是这些国家的联合。你们应当提出这些国家需要接近的想法，而人民将会支持你们。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上层将会反对，但是人民将会对他们产生怀疑。从孟加拉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为的分割达到了什么程度。孟加拉省首先脱离了巴基斯坦。

丹吉：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上我们经常受如下精神的教导：中等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转向了英帝国主义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在印度有纯粹的英国银行吗？

丹吉：是的，在印度有英国银行，也有同英国人合办的银行。在我们的纲领中有民族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是官僚资本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这不是官僚资本。这是工商业资本。中国的官僚资本成了国有资产的积累。这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资本同工业的关系很少。它依赖宋氏等家族同美国人签署的优惠合同得到钱财。至于中

国大的工商业，它们是完整的。我建议你们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如果他们仍然同美英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话。最好大声地说，那些公开地转向敌人一边的人将会丧失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如果你们的革命达到了高潮，将会对部分的大资本家进行打击。到那时候宣布他们为叛徒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而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同英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这我就不再建议了。就要像中国做的那样。如果在你们的纲领中有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要求，那么应该删除这一点。应该制定新的纲领或者行动纲领。中立大资产阶级并使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百分之九十脱离其影响对你们是非常有利的。你们不必人为地为自己制造新的敌人。何况你们的敌人已经很多了。以后你们着手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时机会到来的。应该分阶段地解决革命的问题。不应把所有的阶段都混在一起。应当分阶段地解决问题，应当部分地消灭敌人：今天消灭一些，明天消灭一些，而当巩固的时候，可以消灭所有的敌人，而现在你们还很弱。你们中有人模仿我国的革命。但这是不同的阶段。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应当批判性地接受，并且这种经验应当与印度本地的条件相结合。你们会被批评太左，不要害怕。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曾批评列宁太左，但他们被证明是可笑的。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

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能否把尼赫鲁政府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就像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就像把现在的普列文（保加利亚城市）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

在我看来，当蒋介石在中国还有基础的时候，不能认为他是傀儡。当他转入福摩萨^①的时候，他就成了傀儡。我不能把尼赫鲁政府看作

① 指台湾省，这里沿用了西方的称呼。——本书制作者注

傀儡。他在人民中仍然有自己的基础。这不是保大政府，保大确实是傀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能把游击战看作是印度主要的斗争形式。或许应该说，是最高的斗争形式。在走向最高的斗争形式中有各种斗争形式。农民的斗争形式：抵制地主，农业工人罢工，拒绝佃户的工作，同地主进行个别的冲突，夺取地主的土地，然后把游击战作为最高的斗争形式。工人的斗争形式也一样：地方性的罢工，行业性的罢工，政治性的罢工，举行政治总罢工，把其作为起义的前夜，然后举行武装起义，把其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战是国内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下论断也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内战争正处于高潮。这是不正确的，现在还没有国内革命的高潮。在特伦嘉人民夺取了土地，但这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这只是进行公开斗争的开端，但不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对此印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当在如下一些小的问题上教导农民进行斗争：减少租金，减少要交付给地主的粮食税，等等。应当在这些不太重大的问题上教育干部，而不要马上就谈论进行武装斗争。如果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那么你们将会出现重大的困难，因为你们的党是弱小的。

要使党的力量强大，在需要的方面开展群众斗争，而有时还要抑制群众。1917年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在陆军、海军中有许多同情者，我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苏维埃。但是我们制止了举行工人起义的决议。有人提出了赶走临时政府的要求。但这当时还不在于我们的计划中，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7月，有4—5万名工人的布吉罗夫斯基工厂的工人开始游行，海员、士兵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并前往中央大楼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制止了他们，因为还没有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大规模的起义。出现了起义的客观因素——当时群众在向前冲，但还没有举行起义的主观因素，党还没有准备好。

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我们在9月一个月內提了出来。决定举行起义，但这是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当时政治局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报刊发表了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声明，他们认为这是在冒险。列宁宣布他们是叛徒，并且说，他们成了我们敌人的俘虏。因此，关于举行武装起义是不能批评的，起义是非常突然的。

拉奥同志会说，让我们向人民发表演说，询问他们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是不能这样做的，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计划，你们所有人都会被逮捕的。允许我假设一下，农民们会说：好，应该起义。但这不意味着，应当跟着人民走，拍人民的马屁。领导人就是要使人们跟随自己。人民有时候会说，他准备举行起义，他考虑的只是本地区的事实和事态，而不是从全国举行起义的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虑。中央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

印度同志：是的，明白了。

斯大林同志：你们问道，对于被怀疑背叛的党员，党组织能否宣判死刑。

不能。列宁总是教导说，中央能够做出的最高的惩罚形式就是开除出党，但如果党掌握了政权，某一党员违背了革命的纪律，那么政府可以追究其责任。从你们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同志们经常倾向于对敌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如果你们向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询问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对你们说，在我们的党中，总是以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如果人民自己开展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同地主进行的冲突中杀死了地主，那么我们不认为这是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在这一冲突中参与的是群众。如果为了杀死地主，党组织自己组织了恐怖小组，并且没有群众的参与，那么我们通常是反对的，正如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一样。在群众消极的情况下，个别恐怖分

子的这种激进的行为会扼杀群众的独立精神,会使群众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对此人民会这样认为:我们不必行动,有英雄为我们代劳。因此,存在英雄的时候,另一方面就存在不参与斗争的群众。从培养和组织群众积极分子的角度来说,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俄国就曾存在这样的党——社会革命党,这个党有特别的队伍,对一些主要的部长实施恐怖行为。我们一直反对这个党。他们在群众中丧失了任何威信。我们反对英雄主义理论和群众主义理论。

你们也许会问,现在应该怎样提出关于印度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在现阶段你们不应该提出这一要求。不能一方面提出划分地主土地的要求,同时说,土地应该转交国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从来都没有宣布过土地国有化,更不要说在中国了。人民民主国家是怎样做的呢?这些国家都禁止买卖土地。这就是对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只有国家才能拥有土地。禁止私人购置土地。现在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对你们不利。

你们中的一些同志现在认为,印度正在进行内战。关于这一点言之尚早。你们正在酝酿内战的条件,但这种条件还尚未成熟。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有了纲领,或者说有了行动纲领就好了。当然,你们会有分歧。我们也曾有分歧,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由多数人决定,这是不变的法则。即使那些不同意多数决定的同志,也要认真地执行决议,因为党应该有统一的意志。你们都愿意进行讨论。在和平时期这是允许的,但在你们那里,革命的局势正在加剧,你们不能讲究这些。何况你们的党员数目是如此的少,你们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会使群众误入歧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03-1912年期间公开进行了讨论,因为这在沙皇的条件下是允许的,以便驱逐出孟什维克,当时我们制定了分裂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内有敌人。我们在1912年驱逐了孟什维克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摆脱了孟什维克

的党，党成了纯洁的党。当时也存在分歧，但是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问题。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大家都开始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托洛茨基使党陷入了我们不愿意进行的一场讨论，但不得不进行这场讨论，因为托洛茨基挑衅性地断言，党不愿意进行讨论是由于党害怕真理。我们进行了讨论，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在这场讨论中，反对托洛茨基的是整个党。如果党在某种程度上纯洁了，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那么该党就不需要进行讨论了。讨论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大多数人的决定就是法则。

高士：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了。

斯大林同志问道，在印度共产党内是否有关于共产党同情者的组织？

拉奥、丹吉：没有，我们只有党员。

斯大林同志：我们党有560万党员和80万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愿意入党的人，我们在其入党之前，对其进行考验。对一些人的考验要进行4年、5年，并对其进行教导。许多人希望入党，但他们首先要经受考验，其次，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其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必需的，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接受其入党。在我们的实践中，这种候补党员的制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党的周围我们有共产党同情者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也不应使党过度增加新党员，不应过度扩充党。关键的是提高已被接收入党的人员的素质，而不是党员的数量。

你们也问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开始游击战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击战争没有大的意义。游击战在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在落后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很难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有许多大城市，发达的铁路网和工业区，在这种条件下，游击队很快就会失败。要让人民群众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把英雄视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以便使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对敌人。但

是，不应该只是指望游击战争。当然，游击战会有所帮助，但是游击战本身也需要帮助。应该在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开展更多的工作。如果在工人中间存在武装，那么在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夺取政府机关。我们在列宁格勒曾建立了工人近卫军，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夺取了冬宫。我们的农民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总之，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农民最忠实于工人阶级。应当把两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工人游行。

你们记得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印尼有很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他们受到挑唆，过早地发动了起义。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优秀的、勇敢的人，但是被挑唆起来（发动了起义），并且牺牲了。

你们最好有纲领或者行动纲领。把这一纲领或农业革命的纲领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你们也向我询问关于尼赫鲁对外政策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游戏和手腕。他企图显示，好像他们是反对美国的政策的。事实上，尼赫鲁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游戏。

拉奥、丹吉、高士和布尼亚同志对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表示了感谢，并说，他们将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自己的整个活动重新进行审议，并将根据这些指示行动。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向你们做出任何指示，我所说的只是建议，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你们也可以不接受这些建议。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

B. 格里戈良记录
1951年2月10日

选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3卷第228—236页

关于阿根廷

同阿根廷驻苏大使布拉沃的谈话记录

(1953年2月7日)

斯大林问，大使有多久没在苏联了，这段时间莫斯科的变化大吗？

布拉沃回答说，他已有4年没在苏联了，莫斯科发生了明显的巨大变化。到处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

布拉沃继续说，阿根廷总统庇隆请他向最高统帅斯大林转达衷心的问候并请他转告，阿根廷希望同苏联加强联系，特别是发展贸易关系。

斯大林说，我方不反对。

布拉沃表示，能拜会最高统帅是他莫大的荣幸并感到无比高兴，这次拜会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斯大林说，接见大使是他的职责和义务。

斯大林问布拉沃，阿苏之间可能开展哪些贸易活动，阿根廷想从苏联买什么，他们有什么能卖给苏联？

布拉沃回答道，阿根廷外交部已向苏联大使列扎诺夫递交了备忘录，备忘录中含有阿根廷计划从苏联购进商品的清单和阿根廷能够向苏联提供的商品清单。阿根廷首先想从苏联购进石油工业钻探设备、石油和农用机械。阿根廷方面可以向苏方提供皮革、羊毛、植物油等商品。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会考虑这一建议，苏联对同阿根廷开展贸易很感兴趣。

布拉沃说，他从小就对苏联感兴趣，读过许多有关苏联的书籍，因此他本人也非常关注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布拉沃赞赏苏联进行的大

规模建设以及苏联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斯大林说，靠武力强迫人民搞建设是不行的，苏联人民自己要想搞建设，这样的建设才容易搞。

布拉沃提到阿根廷总统庇隆也开始了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

斯大林问，难道阿根廷现在不是独立国家吗？

布拉沃回答说，是独立国家，但是过去国内有很多外国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它们控制了阿根廷的重要经济领域。庇隆总统发起了外国企业国有化运动并且已将其中的铁路、港口、电气工业、城市交通、屠宰冷藏联合企业等部分企业收归国有。布拉沃说，经济上不独立就无自由可言。

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他说，美国人就很懂得，掌握了国家的经济也就掌握了国家的独立。阿根廷如果能实现经济独立，哪怕是逐步实现，对它来说都是件好事。这对阿根廷有利。

布拉沃说，庇隆及其支持者目前做的也正是这些：争取经济独立，从而实现政治独立。布拉沃说，阿根廷希望加强同苏联在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

斯大林赞同这一建议。他说，过去西班牙人有过很优秀的运动员，并问体育运动在阿根廷是否普遍。

布拉沃答道，阿根廷人最喜欢踢足球。阿根廷有意派足球队来苏联，也希望苏联派球队去阿根廷。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斯大林问阿根廷的国语是不是西班牙语？

布拉沃证实说是。

斯大林说，他记得，几年前阿根廷的外交部长是布拉穆格利亚，又说，在高加索有两个村子就叫布拉穆格利亚。

布拉沃证实说，布拉穆格利亚确实担任过阿根廷外长。现在他是大学教授。

斯大林说，战争期间，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是帕斯库阿。这个姓氏在高加索也很常见，高加索和西班牙有些民族的语言很相似。

布拉沃表示同意并说，今年夏天他准备访问高加索，因为他觉得高加索的民俗习惯与他的国家的民俗习惯很相似。

斯大林说，古时候很多民族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高加索山区。后来这些民族的后人在此繁衍生息，如同地质层般地沉积。迄今为止高加索还有巴斯克人、萨尔马特人、阿瓦尔人以及一些现已消失了的民族的后裔。因此从民俗的角度来看，高加索是很有趣的。要是学者开始研究高加索的风俗构成，定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就拿达吉斯坦来说，在相距不远的三、四条峡谷中就住着几个彼此听不懂对方语言的民族。

斯大林向大使询问了墨西哥的经济独立情况。

布拉沃回答说，他认为墨西哥过分依赖美国，因此不可能自由发展。

斯大林说，是这样。

布拉沃说，目前拉美各国都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运动。阿根廷人民对苏联怀有极大的好感，认为苏联是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先锋队。由各政党以及宗教信仰和职业不同的40名代表组成的阿根廷代表团出席了各国保卫和平代表大会；代表团中包括工人。代表团成员中有15人访问过苏联。这些代表拜访了大使并向他讲述了在苏逗留期间以及参观莫斯科企业包括斯大林工厂（他们参观了该厂的汽车装配车间）给他们留下的强烈印象。

斯大林说，当西班牙还只关心天主教的时候，英美两国就已经努力去发展自己的工业了，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斯大林指出，要想独立，就必须有自己的工业。

布拉沃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阿根廷才展开了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斯大林说，不这样做就无法取得独立。

布拉沃告知，本年度阿根廷的一些工厂为国内农业部门提供了拖拉机和国产卡车。

斯大林问，阿根廷有没有石油。

布拉沃回答说有，但缺少油井钻探设备。

斯大林又问有没有采油专家。

布拉沃回答说有。又说，阿根廷的石油工业已收归国有，属国家所有。

斯大林说，这很好，非常好。

布拉沃预先声明，他下面的这段话不代表官方。他说，几年前，英国一直白吃阿根廷牛肉，因为屠宰冷藏联合企业、铁路和海运都属英国所有，所以阿根廷必须保证向英国出口足够的牛肉。

斯大林问，以后还会这样吗？

布拉沃回答说，不会了，因为现在铁路、屠宰冷藏联合企业和港口都已收归阿根廷了，但他又说，阿根廷还缺少车皮和铁路设备。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向阿根廷提供一些车皮和机器。

布拉沃表示感谢。

斯大林请大使转告庇隆总统感谢他的问候并祝阿根廷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布拉沃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他将马上把这一切转告庇隆总统。

斯大林说，过去，也就是沙皇制度时期，我国列宁格勒的整个工业和整个波罗的海舰队烧的也都是英国的煤，现在则不然了，因为我们把英国人赶跑了。所以英国人也骂我们，

布拉沃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骑在别人的头上。这种行为该结束了。

布拉沃说，好在各国都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英国很快就

只好呆在自己的家里了。

斯大林说，就让它呆在自己家里吧，我们可不想侵犯它的家。

布拉沃认为，面对日益高涨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英国现住不敢再侵犯别的国家了。

斯大林说，不对，现在还有一些地区正遭到英国的侵犯，比如马来亚、非洲等地。他又说，英国对比利时和荷兰也极感兴趣。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英国也想掠夺，但是这样的地区一天天在减少。

布拉沃希望这样的地区能很快全部消失。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哪怕是最小的民族都希望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布拉沃完全同意。他说，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愿望。

斯大林说，拉美国家应当联合起来。他提出，拉美国家或许可以组成一个类似南美合众国这样的联盟？

布拉沃说，好在拉美国家正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争取经济独立的事业中阿根廷做出了榜样。

斯大林说，应当成立一个拉美国家的某种联合会，这不仅仅是为了组织起来进行抵抗活动，而且是为了经济建设这样的积极目标。**斯大林**问，拉美国家是否愿意结成这样的联盟？

布拉沃说，似乎有这种愿望，但只要哪个国家开始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美国就在报刊上挑起反对这个国家的敌对运动，拼命指责这个国家热衷共产主义，听苏联的指使。

斯大林说，这只能暴露出美国领导人思想上的贫乏，他们有钱，却没有头脑。**斯大林**同时指出，美国总统通常都不喜欢动脑子，他们更喜欢依靠“智囊团”，比如，罗斯福和杜鲁门就有这样的智囊团，显然他们认为，他们有钱，无需动脑子。

斯大林问大使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

布拉沃说没有了。他还想说，他对能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斯大林**表

示自己的崇敬之意感到无比自豪和万分感谢，这次拜会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斯大林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再次接见大使，因为这是他的职责。

布拉沃说，看到最高统帅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精力充沛他感到很高兴。

斯大林问，有什么值得那么高兴的，他能给阿根廷带来什么利益？

布拉沃说，斯大林是令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所关注的人，是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人，大家都在询问他的情况，读他的书并遵从他的主张行事。

斯大林说，大使显然言过其实了。

布拉沃说，这都是肺腑之言。

斯大林说，他不怀疑，但是其他国家的人高估了他的作用。一些人称赞他，另一些人随声附和，这样大家就唱起了颂歌。

布拉沃说，不管怎么说，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斯大林这样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斯大林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一些人在夸他，另一些人在骂他。比如说，丘吉尔。

布拉沃对给予他的这种荣幸再次表示感谢，说他能有机会拜会并和最高统帅进行交谈使他万分高兴。

持续了40分钟的会谈就此结束。苏联外交部长安·亚·维辛斯基参加了会谈，

维辛斯基同志和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做了记录。

新的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 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年1月28日)

1945年1月28日

在斯大林别墅。……

很多人祝词。

在自己的祝词中，斯大林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一个是法西斯派，另一个是民主派。目前出现了我们与资本家民主派间的联盟，因为后者不能接受希特勒的统治，而这种野蛮统治能导致工人阶级的极端困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垮台。我们现在和这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将来也要反对资本家的这一派。

如果认为苏维埃形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那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实践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但完全不是惟一形式。也可以有其他形式——民主共和国，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君主立宪制……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出版

附录 关于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问题

——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11月2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12月初将召开我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为此，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检查我们的观点和对某些原则问题的正确性。所以，我受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恳求您了解我们这里对下述问题的观点，并以您的高见帮助我们正确地校正党在困难和复杂条件下，这一时期所面临的活动方向。

(1) 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问题

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国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势力的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的结果，这一切导致东南欧一系列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

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点决定的：

第一，人民民主国家就是劳动者的政权，即在工人阶级起主导作用下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这就是说，首先，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被推翻了，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作为当代社会最进步阶级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正起着领导作用；其次，这种国家是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活动和倾向的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第二，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

无论我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还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都是由于苏联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中所起的解放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以维护和巩固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密切联系与真诚合作、互助与友好为先决条件。任何削弱这种同苏联合作的意图，都是在反对我国人民民主本身存在的根基。

第三，人民民主国家属于民主的反对帝国主义阵营。

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参加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统一民主反帝阵营，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

第四，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负有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使命。

这就是说，虽然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被推翻了，这些阶级的财产变成了人民所有，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根本铲除，资本主义势力还继续存在着和发展着，企图恢复他们的奴役。因此，惟有对资本主义势力作无情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彻底肃清，才能向社会主义迈进。

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始终不渝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巩固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人民民主停止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停止镇压和排除资本主义分子，那么后者就必然占据上风，他们不仅能够破坏人民民主的基础，而且会使它灭亡。

(2) 关于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认识的：在法西斯国家侵略者军事上崩溃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和苏联的日益强大以及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存在密切合作的条件下，这就为我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即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经过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是经过人民民主，前提是这种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要依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

人民民主制度在体现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者统治地位的同时，它能够，而且也应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像经验已经证明了的那样，成功地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它能够粉碎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抗，镇压和消灭他们恢复资本主义政权的企图。它能够在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从事工业建设。同时，我们还希望，人民民主制度将能够克服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农的动摇性，肃清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并把基本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执行这条以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为目标的路线时，毫无疑问，人民民主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领导阵地必须不断巩固，在同富农及其走狗剧烈斗争的时期，农村中一切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力量，都必须加以团结。人民民主制度作为限制和肃清阶级敌人的手段，必须更加巩固和做得更好。

(3) 关于现阶段的基本任务问题

我们认为，人民民主国家，其中包括我国，已经走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们为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还须要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目前，我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经济和文化基础而进行工作。

正因为这已成为现阶段人民民主的基本任务，因此，我们认为这也就是工人阶级以及领导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这项总任务包括一系列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方面：

- 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不断巩固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 加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盟；
- 加速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特别是发展重工业（我们已经将工业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大型的商业和外贸企业国有化了）；
- 采取限制和孤立农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而后加以消灭的一贯政策，为肃清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创造条件；
- 在农民基本群众中全面发展生产合作社，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农业机械、贷款、贷种等给予贫农和中农以帮助，提高他们对同工人阶级联盟的兴趣，用合作农业的范例来使他们相信这种制度的优点，并用对资本主义分子势不两立的精神来教育他们。

我们认为，关于现在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具体任务还为时过早，因为劳动农民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作好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希望，通过逐渐吸引贫农和中农参加农业劳动合作社，通过禁止土地买卖和出租，通过限制拥有 10~15 狄卡尔^①土地，同时，通过制订有关的政策和教育工作，我们能够加速实施土地国有化的准备工作。

(4) 关于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无论它以什么面貌出现，总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铁托民族主义集团的反共行动就是明显的证明。因此，同民族主义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首要责任。

① 1 狄卡尔约合 1.5 亩。

在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表现的同时，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忠于自己祖国的精神来教育我国劳动者，也就是要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忠于自己祖国的精神进行教育，首先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到，在反对国际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攻的斗争中，各人民民主国家同伟大苏联的牢固而团结的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要提高和加强这种认识。我国人民的整个未来，一方面取决于苏联的强盛，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人民一旦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在共同的斗争中忠实地完成自己义务的准备程度和能力。

与此同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教育，这也意味着要认识到，各国共产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尽管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理论还存在，各国共产党政策中的统一行动目标还存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还存在。

我们认为，我们一切成就的最重要条件是，必须坚持不懈地以这种精神来教育党、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整个劳动知识分子。

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得到了祖国阵线各党派团体的公开支持。祖国阵线最近一次代表大会还把这一点写进了自己的纲领。尤其典型的是，农民联盟的领导人在农民中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承认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解释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忘记农民联盟内部有许多人按其信仰并不接受这个方针，但事实是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这说明了我们的总路线在劳动群众中的情绪。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接受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最真诚地感谢您对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宝贵教导与无私帮助。

格·季米特洛夫

1948年11月2日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476—480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答季米特洛夫

(1948年11月6日之前)^①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可能性或者两种形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定理。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民主共和国，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中看到的，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其中占优势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民主共和国不是像美国或者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而是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国。此后，列宁发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是一种在我国条件下更加合适和更加合理的形式。在我们俄罗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通过内部起义实现的，而一旦开始起义，便摧毁了一切。苏维埃形式表明是最合适的形式。在你们那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是内部起义完成的，而是通过外部——苏军的援助，也就是说比较容易，没有经过特别的努力，可以不采用苏维埃形式而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的那种形式，即人民民主议会制的形式。我们认为，你们不采用苏维埃制度也行。对你们来说，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这种制度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取消了富农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我们这里，只有劳动者才有选举权。200万富农须要迁移到北方去，在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后，我们才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资产阶级

^① 这是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1948年11月2日来信的答复。——本书制作者注

和地主跟我们斗了四年，而在你们那里，他们干脆逃跑了，没有经过搏斗就投降。那时，没有一个外国像我们现在帮助你们一样帮助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组织的另一种形式。你们可以不采用苏维埃制度。但这种在你们那里存在的制度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哪里有对抗的阶级，哪里执政的工人和劳动者就不能没有专政。但是，你们可以用合法的理由打击敌人。现在，你们那里还有内战的因素。只有当你们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时候，才能宣布你们那里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

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优势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合适的形式。而在我国出现的苏维埃，不是议会制，而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的苏维埃，排除了一切非劳动者。说苏维埃形式好，是因为它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要流血，但很快。而你们可以不经这种形式，因为你们的资本家立即就投降了。一句话，适合于你们，我们承认也许我们这方面错了。

只要存在对抗性阶级，就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在你们那里有另外的形式，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你们可以不经苏维埃制度。但是，人民民主制度可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职能，即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选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485—486页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3月14日)

[1948年2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联共（布）中央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斯大林就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任务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堪称新的《共产党宣言》，为各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本书制作者]

在政治局2月会议上，莫洛托夫同志给我们详尽地论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我同意他所作的结论，但是对当前世界危机的原因的判断，我还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前我曾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由掌握着金融资本、剥削地球上大多数人的那些人组成；另一个阵营则由殖民地和附属国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组成。很自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头领，而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苏联，则成为后一个阵营的领袖。由于两个阵营的各自目标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

准确地讲，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所以，寻找两个敌对阵营和解的办法是徒劳的，理由很简单，它们各自的观点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除非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投降，否则，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早晚要发生，绝不可能避免，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

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是我要重申，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期将要来临。同志们，那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应当毫不拖延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种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别的出路。许多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阵线的指导和联合，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阵线早已存在，虽然我们对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还不满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尤其应当对西班牙和南美国家给予特别的重视。

所有中、南美洲的国家政府无一例外都是借助于忠实它们的几万名士兵的刺刀来维持统治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如同小孩子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只要劲风一吹，它们就会被吹垮，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我们都应当拥有这种力量，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被压迫的群众推翻这些可笑的独裁者，帮助群众执掌权力，剥夺美国所必需的原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桩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这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色彩，只要我们注意到，在中、南美洲国家里，70%（有时甚至更多）的人口是受压迫和被剥削的贫苦人民，他们对压迫者非常痛恨。我们要强调，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如果情况需要，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现在，需要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宣传和全面地组织起我们的所有力量。

美国试图把中、南美洲国家变成它可靠的据点，就南美各共和国政府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确实如此。至于工人群众，我们清楚

地知道，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以同压迫者进行不懈的斗争。下个月，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泛美国家会议，我坚信会议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成果。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利益和目标也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之间只有胃口是一样的。在悦耳和奉承的词句下，隐藏着相互间的深深的不信任和尽可能多取少给的愿望。一切结果都将以相互团结和共同利益的优美动听的辞藻来表达，而当真正危险来临时，它们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以至于使它们变为美国的债务而不是财产。

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巴西，巴西拥有如此巨大的原料资源，以至于美国有很好的理由指望巴西成为它的天然贮藏库。在巴西，共产党受到残酷的迫害，但这对它来说只是一种帮助。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将经受炮火的洗礼，从而能够使它摆脱机会主义者、意志薄弱者和那些简单地反对任何政权的人。我们希望巴西人民能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巴西共产党只要由这样几百名优秀人物所组成，那她就能乐观地面向未来。

巴西之后，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是委内瑞拉。在这个国家，巨大的石油资源全被北美的资本家所利用。一旦战争爆发，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事情就是阻止美国的工业使用委内瑞拉的石油。因为我们已经就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所以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对你们重复该计划。

关于巴拿马运河，我认为它对我们来说最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以后发生战争，水面舰只将完全失去其价值，我们没有理由对巴拿马运河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如果它被摧毁，恢复运河将需要很长时间，这仅仅会延缓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欧洲，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西班牙。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那里的佛朗哥政权很快就要垮台。当然，我们能加速它的崩溃，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目前这样做的时机尚不成熟。日丹诺夫同志也曾论述过为什么现在在那个国家促成这种变更于我们不利的的原因，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目前，在加强我们的地位和宣传方面，我们应

该有所限制。

在意大利和法国，我们的地位非常牢固，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任何选举和任何政府变更。必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将与我们站在一起，虽然有很多人设法把自己出卖给美国资产阶级。

我们不怕英国或者欧洲的一些小国。它们追随美国是迫不得已，因为害怕而屈服于美国，这种害怕是由熟练的宣传制造出来的。对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们已制定了我们的灵活计划，现在它有赖于我们去贯彻执行。

我们最重要的王牌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亚洲。千百万受奴役的群众在本世纪已经觉醒，不管殖民帝国主义者玩弄怎样的诡计，它们都无法扼杀千百万群众争取自由和享受独立生活的愿望。所有的殖民帝国都已面临末日，它们的彻底崩溃仅仅是一个不远的将来的问题。显然，我认为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要以十倍的努力进行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作巨大的努力以加快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对我们来说，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它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肯定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接下来我们应注意的是印度。印度现在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看来只是一种神话。印度千百万劳动群众不能也不愿意按旧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他们懂得，帝国主义者玩弄阴谋诡计的真实意图是要变换手法以延长他们在亚洲的统治。反帝斗争正在更为广泛的人民中展开。我们将帮助他们赢得并享受自由的各国人民大家庭中

的平等权利。

总之，在整个亚洲，我们要坚定地和不懈地执行我们去年制定的计划，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项计划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成功里面有时候也有些不利因素，这些因素有时会引发一些危险，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会功亏一篑。有些人因为成功而过分骄傲。危险的是，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所迷惑，忘乎所以，夸耀地说，“世界正跪伏在我们脚下”，“我们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能这样，同志们，我们要再接再厉，更努力和更艰苦地工作，因为总的说来，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

在综述我们在国际上所做的工作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苏联国内的工作。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正继续进行，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的任务是要在短期内克服这些不足，既不要在任何障碍面前停滞不前，也不要因那些居功自傲的人的阻挡而裹足停步。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摒弃那些陈旧的东西和妨碍我们前进的人。

我们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正在继续顺利地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将在四年内完成。

我们应当永远重视苏联的陆、海军的建设。我们掌握了绝对可靠的有关美英军队的情报，把苏军的现状同美军和英军相比，我可以明确地说，只是在水面舰只这方面，我们处于劣势，而在其他方面，我们远占优势。尽管美国玩弄诡计，尽管它为陆、海军拨出巨额预算，但是美国的军队无法赶上我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苏军与美英军队的力量对比方面，将会产生有利于我们的更大优势。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也不怕战争。

从现在起，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防止人类遭到新的灾难，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想要引起灾难，那么，这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只会对他们产生更糟的结果。

对“联合国”组织所起的极为可鄙的作用，我不能保持沉默。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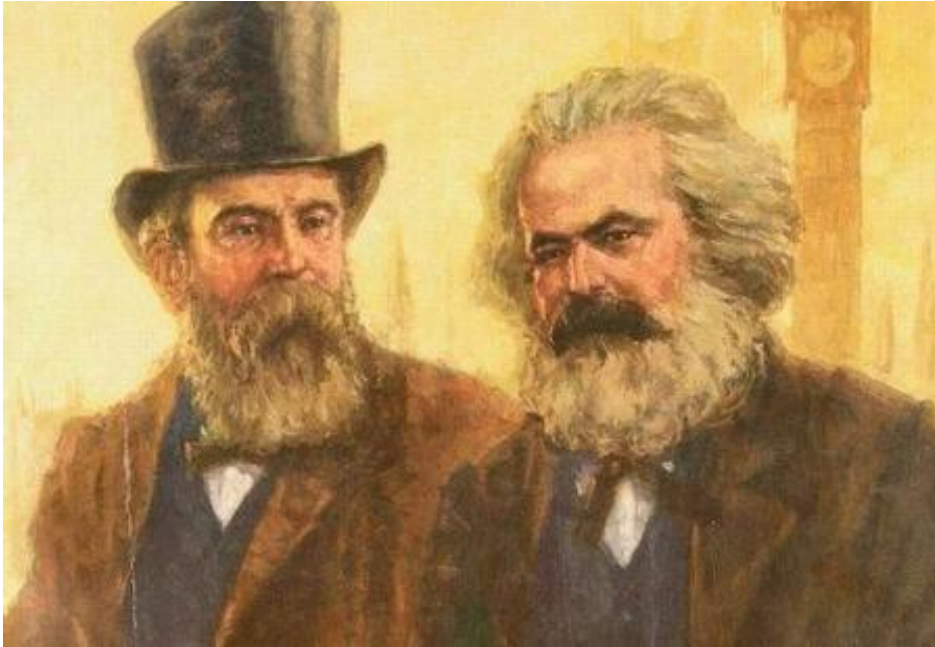
是那个设在日内瓦的已破产的“国际联盟”还曾经保持着较大的尊严和独立性。现在的“联合国”，只是木偶的聚会，他们通过举手表决听从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他们的行动常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相矛盾，只是为了取悦于那个强大的家伙，所以，我们同这样的组织毫无交道可打。

再以马歇尔计划为例。从经济角度看，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早在美国提出过的有关“出口或失业”问题的战时计划的更拙劣的翻版而已，它试图把威胁美国经济的灾难转嫁给其他国家。华尔街的垄断者们希望通过向欧洲大陆的国家出售那些在美国经济恢复中不需要的东西来达到上述目的。他们输往欧洲的不是机器设备和重要的工业原料，而是成品。这些进口产品将构成一种威胁，会扼杀西欧国家的重要工业部门，使工人阶级处于长期的失业状态。所以难怪许多欧洲国家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些国家的政府认识到，所谓的“美援”将会给它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带来严重的危害。虽然帝国主义者竭力欺骗人民和瓦解人民的抵制，但是，反对阴险狡诈的华尔街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工人阶级不能同意把他们的祖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奴役他们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我们要挫败这一计划，这也是为了世界工人的利益。

苏联同那些向美国乞求援助的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因为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路线，我们可以组织群众贯彻这条路线。看看其他国家，有多少国家有拥有一条正确路线并将其贯彻执行的执政党呢？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党，因为所有的政党都前景暗淡，为混乱的经济危机所困扰，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只有我们党懂得怎样驾驭形势和向胜利挺进。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年了。在这段时期里，许多资产阶级政府都试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而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个

崩溃了。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旗帜下，为我们的成功而工作而斗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永远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旗帜，永远忠于所有国家兄弟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

原载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国际史研究专题论文集》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有一百年了。在这段时期里，许多资产阶级政府都试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而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个崩溃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永远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旗帜，永远忠于所有国家兄弟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三月制作